1986年组团访问云南，同时也去滇缅公路走了一趟，慰问被历史遗忘了的一群参加抗战的华侨机工。他们的遭遇及可歌可泣的历史，在本书中已有详尽的记录，不多赘述。

三千多名南侨机工回国参战，其中一千多人在抗战中为国牺牲，战后复员回返南洋的只及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一分散在国内各个省份，幸存者剩下一百多人。

1987年陈毅明老师把华侨大学林少川先生所写的《一个华侨机工的经历——记滇缅公路的南侨机工的蔡汉良》一文出示，于是特约他来会谈。林先生对南侨机工的专题特感兴趣，福建省方面已访问了一些尚健在的老机工，我为了不使这段轰轰烈烈的历史湮没无闻，于是就鼓励和资助林先生沿着滇缅公路考察南侨机工史迹，深入云南、四川、贵州、湖南、广东、广西以及海南，寻踪觅迹，访遍天涯海角，对一百多位幸存机工及部分家属，作详细的专题采访，收集资料。他经过了两年的奔波跋涉，四年的呕心沥血，终于整理出这部二十多万字的专著，把南侨机工为国牺牲所经历的惊天动地、轰轰烈烈、流离失所、痛苦悲惨的史实，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作为教育后辈珍贵的历史教材。在华侨大学陈觉万校长、郑民所长的推动与大力支持之下，这部图文并茂的巨著才能付梓问世，希望将来能够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永留青史。

移居海外的华侨及其后裔，历史悠久，人数众多，遍布世界各地。华侨是和平移民，是开拓者、建设者，和当地人民肩并肩，互相学习，携手合作，同甘苦、共患难，为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旧中国的贫穷、落后，使华侨备受屈辱，成了任人宰割的“海外孤儿”。华侨切身感受到弱者的悲怆，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兴衰存亡紧紧联系在一起。华侨盼望中华振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保障自己的合法地位。华侨情系故土，许多人倾其所有辛苦积蓄，支持家乡的建设和公益事业。华侨有功于革命，被孙中山先生誉为“革命之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整个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结果。华侨在这场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中，亦尽其天职，功勋卓著。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但中国上下为之震荡，而且激起了海外华侨的无比义愤，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

“卢沟桥事变”后，海外华侨更是爱国热血沸腾，民族义愤填鹰，同仇敌忾，抵制日货，出钱出力，源源不断地向祖国输送捐款、药品、服装、汽车、飞机，并把支援中国抗日的浪潮推向世界各地。

1939年，中国沿海港口全都被日寇占领或封锁，刚修通的滇缅公路成为保障获得抗战前线补给的唯一国际通道，急需大批汽车司机和修理人员。著名华侨领袖、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为此发出号召，组织三千二百多名南侨机工分九批回国支援抗战。

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事迹令人感动，尽管各人的经历各异，但他们都是响应陈嘉庚先生的爱国号召共赴国难的。几乎每个人回国来参加抗战的经过，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

奋战在千里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线上的南侨机工，他们忠于职守，技术娴熟，工作相当出色。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他们从南洋回来，所经受的困难确实很多，包括工作条件差，水土不服以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骤变所带来的种种困难。但艰难险阻何所惧？他们不愧为项天立地的英雄汉，他们之中有一千多人为抗战的胜利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约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滇缅公路是战时我国唯一的国际军事运输线，南侨机工的作用，不仅在于他们出色地完成运输任务本身，而更在于他们回国抗日建殊功的英雄壮举。

南侨机工的英雄壮举，雄辩地说明了华侨对祖国抗日战争作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南侨机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其赤子情怀是我们中华民族之精魂。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南侨机工满腔热情为抗日而归，竟遭到了当时有关当局的苛求苛待。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寇切断，当局无视南侨机工抛家别亲回国效劳的实际情况，突然宣布解散，使广大南侨机工陷于走投无路的境地。

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非常关心南侨机工。他不仅亲自率领南侨慰劳团视察滇缅公路，调查机工情况，向当局提出保障机工能正常工作的要求，并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议，派刘牡丹、庄明理，侯西反向当局进行交涉，敦促头等机工。抗战胜利后，经陈嘉庚先生的有力交涉，才使一千多名南侨机工复员南返。

战后留居国内的南侨机工亦逾千人，他们刚欢呼抗战胜利，但不久就陷入内战的痛苦之中。这些抗战救国的有功之臣，渐被遗忘了。新中国成立后，南侨机工和全国人民一样，当家作主以火热的激情，投身于祖国的建设，过上了一段开心的日子。但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他们因“南侨机工”的历史而遭到不同程度迫害。

人民不会忘记他们。1986年11月，陈嘉庚先生之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共存先生率新加坡考察团，在全国侨联、全国政协等有关单位的支持和陪同下，赴滇缅公路访问了留居云南的南侨机工。这一行动，代表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愿望，引起很大的反响。当时我被邀请，本应随陈共存先生参加考察团活动，可惜于由某种原因，而错过了机会。

在陈共存先生率团考察滇缅公路的同时，华侨大学（泉州）青年讲师林少川先生，从已迁回福建的南侨机工史迹入手，进行专题调查。当时，社会上已刮起“向钱看”、“讲实惠”的热风，而他却不改初衷，矢志搜集、整理资料，研究华侨史，确实难能可贵。

1987年春，他在厦门调查时，经我的推荐，在宾馆受到陈共存先生的热情接见。他写的《一个华侨机工的经历——记滇缅公路的南侨机工蔡汉良》一文，得到陈先生的重视与好评。随后，在陈先生的鼓励下，他继续在福建全省进行调查。9月，陈共存先生建议扩大范围，由于福建扩展到大西南各省以至全国范围，争取写成南侨机工专著或写成剧本拍成电影，并资助了专题调查经费。

同年11月，林少川先生背着简易的行装，带着录音、照相器材，持着陈共存先生致全国各地地侨联的亲笔介绍信，只身沿着滇缅公路考察南侨机工史迹，深入云、贵、川、湘等省城乡进行采访和调查，直至农历除夕才回家过年。龙年春节刚过，他又匆匆上路了，继续南下粤、桂、琼，寻踪觅迹，访遍海角天涯，终于对目前国内幸存的一百多位南侨机工及部分遗属作了详细的专题采访，抢救并整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口述录音、历史证件及现状实录），其中诸如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日记手稿、南侨机工纪念章、侨务委员会奖状、军事委员会证明书、南侨慰劳团锦旗，还有华侨先锋大队别具一格的老式“结婚证书”及殉难机工的碑铭墓刻，亦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了！这些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史料，无疑是华侨参加抗战最真实的历史见证。可以说，如此全面、系统地搜集国内健在及已逝的南侨机工无名英雄的专题史料，华侨大学林少川先生是五十年来第一人！

今天《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一书正式出版了，它填补了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史上的一段空白。让我们永远纪念南侨机工，长思缅怀这群赤胆忠心为抗日救国、为民族解放而牺牲自我的无名英雄！

陈毅明

1993年9月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土沦亡，生灵涂炭，广大海外侨胞，同仇敌忾，不仅从精神上物质上全力支援祖国，而且直接回国参军参战，滇缅公路上的三千多南侨机工的辗转战斗，浴血牺牲，就是其中突出的事例。

星移物转，半个世纪过去了，为缅怀抗战史上这段几乎被遗忘的南侨机工可歌可泣的史实，笔者在海外知名人士陈共存先生（陈嘉庚之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前会长）和华侨大学校长陈觉万教授的热心支持下，沿着滇缅公路考察南侨机工史迹，深入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福建、广东、广西及海南岛，寻踪觅迹，访遍天涯海角，终于对目前国内幸存的100多位南侨机工及部分遗属作了比较详细的专题采访，收集、抢救和整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口述录音、历史证件及现状实录），其中诸如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日记手稿、南侨机工纪念章、侨务委员会奖状、军事委员会证明书以及“南侨慰劳团”视察滇缅公路的锦旗等。这些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史料（见本书《南侨机工图片集》），无疑是华侨参加抗战最真实的历史见证。

“南侨机工”的全称是“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是抗日战争时期从南洋各地回国支援抗战的华侨汽车司机与修理技术人员的通称。由于抗战爆发，我国沿海口岸及对外交通要道先后沦陷，国际军援运输濒临断绝。1939年新开辟的滇缅公路（1938年动工修筑，1939年1月10日正式通车），成为战时我国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自云南昆明至缅甸腊戍，全长1146公里。内可联川、康、黔、桂四省，外可通曼德勒、仰光，成为我国与东南亚联系的纽带，海外华侨捐赠的军需物品、药物和世界各国支援的军火武器均赖此路输入。新抢修的滇缅公路，山高谷深，地势险恶，崖壁陡峭，山路崎岖，沿途要翻过海拔三千多米的横断山脉、怒山和高黎贡山；要横跨水流湍急的漾濞江、澜沧江和怒江；还要穿越亘古荒凉、人烟稀少的“烟瘴之地”。象这样恶劣的行车环境，非有熟练的机工难以胜任，因此急需大量技术娴熟的司机与修理工。但当时国内驾驶人员十分匮乏，一时要训练这种人才，远水救不了近火。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主事人宋子良致电“南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企望代招募华侨机工回国，以救燃眉之急。陈嘉庚先生急祖国之所急，立即于1939年2月7日发表《南侨总会第6号通告》，并在报上刊登广告，号召机工回国服务，共拯危亡。

机工招募的条件是：一、能驾驶大型货运汽车的司机及修理工。二、年龄在20岁以上，40岁以下，持有当地（侨居地）汽车驾驶执照者。三、略识中文，略会讲普通话，无不良啫好（尤其不嗜酒）。四、凡应募者，须持该地筹赈会或商店介绍函，知其平素确具爱国志愿。招募广告附告：各地筹赈会负责征募，考验合格者报南侨总会。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陈嘉庚先生振臂一呼，立即得到南洋华侨的热烈响应。南侨机工赤诚报国的壮志情怀，是十分动人的。陈嘉庚先生在《南侨回忆录》一书中写道：“有一修机工在洋十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据笔者到滇缅公路实地寻访，《南侨回忆录》所记载的这位机工，就是新加坡的英国汽车公司卓有声望的机械工程师王文松。当时招募广告规定机工月薪仅国币30元，而王文松却抛弃200坡币（折合国币近700元）的月薪，自甘牺牲，并带领一批伙伴，自备全副机修器具回国。由此可见，南侨机工的爱国情操与奉献精神是何等高尚！王文松在滇缅路上任下关修理厂厂长，为抢修抗战军运车辆贡献殊多，不幸于抗战后期因车祸殉国。同伴中幸存者韩利丰、黄守琛老人向笔者追述半世纪前与王文松“青春作伴好还乡”的难忘经历，感慨万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贵州采访了一位将全家老小送回故乡而铁心参战的新加坡华侨机工许志光，他仍珍藏着1939年3月13日陈嘉庚先生亲笔签署的一封信（见图85），信上写道：“华侨青年许志光君，热心国家，此次毅然牺牲原有职业，回国服务司机工作，帮助国家，殊足钦佩。现伊母亲及其妻子，拟不日遄返原籍安居……希予以特别优待。”从这封历经半世纪沧桑的珍贵信件中，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机工队伍中，也有几位热血的华侨女青年。槟城筹赈会妇女部职员白雪娇（现为广州师院副教授），瞒着双亲报名参加机工队，临行才留下一封家书，信中写道：“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此去虽然千山万水，未卜安危，但是，以有用之躯，在有用之日，尤其是在祖国危难的时刻，正是青年奋发效力的时机。这时候，能亲眼看见祖国决死斗争……自已能替祖国做点事，就觉的此生无负于祖国！”信的全文发表在1939年5月19日的《光华日报》上，现在读来，依然令人振奋。另一位被何香凝题词誉为“巾帼英雄”的海南籍马来亚华侨机工李月美（见图65—72），女扮男装与弟弟李锦容一起回国参战，则更富有传奇色彩。有一次，李月美在滇缅公路翻车受重伤，幸亏及时送医院抢救才脱险，人们也才知道“他”原来是女郞。后来，李月美与一位对她精心护理的海南籍华侨机工杨维铨在患难中结成伴侣，一时传为佳话，被当时海内外报章誉为“当代花木兰”。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当时这些海外赤子，有的是放弃海外待遇优厚的职业而回国；有的年仅十七八，却虚报为二十岁才够条件回来；有的惜别未婚妻而奔赴抗日疆场，并约好胜利归来再相会；有的已经结婚却毅然别妻离子投报祖国；有的因家长不同意，则改名瞒着家庭秘密参加机工队伍……总之，踊跃报名的动人事迹，感人肺腑，无法尽述。仅在1939年的半年内，前后共有9批机工回国，总数达3200多人。他们当中，既有普通司机、修理工，又有富家子弟、工程师、大学生等等，但都在爱国号召下不落人后，共赴国难。正如《新华日报》1941年1月27日所报道的：“几乎每个人回国来参加抗战的经过，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

三千多南侨机工回国后，经昆明潘家湾训练所的短期军事、业务集训，便先后编入西南运输处属下的十几个大队以及后来专门组建的“华侨运输先锋大队”（分第一、第二大队），奔赴滇缅公路沿线服务。修理工除部分随队维修外，其余都分配到芒市、保山、下关、昆明、贵阳、重庆等地的修理厂。南侨机工开车的地方很广，四川、贵州、湖南、两广以及越南、缅甸仰光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滇缅公路上。据南侨总会《大战与南侨》一书记载：“滇缅公路上的熟练司机有半数以上是南洋回国华侨。”可见，南侨机工成为“抗战输血管”——滇缅公路上的一支主力军。

云南“南侨机工联谊会”理事长杨保华、副理事长王亚六（见图95）回忆说，当年他们刚从海外回来，一下子投入紧张的军事运输，要闯过种种难关。首先是“险路关”：滇缅公路蜿蜒在横断山脉纵谷区，海拔自五百至三千多米，沿途悬崖、峭壁、陡坡、急弯、险谷、深流，令人惊心动魄，满载军火物资的卡车行驶在如此险峻的路上，稍一不慎，便车毁人亡，有的甚至连尸体也找不到，南侨机工的无名英雄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次是“雨季关”：由于滇缅公路突击建成，路基未稳，路面狭窄，坑洼坎坷，一至雨季，泥泞粘滑，行车犹如老牛拖犁，裹足难前，塌方险情，更是屡见不鲜。但是，南侨机工早有精神准备，每人都随车带有厚木板，遇到险路段则随时铺垫，冒险通行。第三，还要闯过“瘴疟关”：由于滇西至缅北一带，是世界上有名的“烟瘴之地”，毒蚊猖獗，恶疟流行，对每位机工构成很大威胁。据《新华日报》1941年1月27日报道：“当此路通车之始，华侨司机就做了开路先锋。他们驾车驰至芒市、遮放一带，每天遭遇流行的恶性疟病，平均死亡率每日约计七、八人。”此外，还有“空袭关”：日寇为了封锁滇缅公路，时常派飞机空袭、轰炸，尤其是1940年10月，“滇缅路重开之后，敌机的轰炸，愈演愈烈。但华侨司机们并不因此而气馁，他们自动踊跃地参加华侨义勇抢运大队，在敌机机翼下拼命地为祖国抢运抗战物资，前仆后继，以加紧运输来为死难的同胞复仇！整个滇缅路的运输就依靠这些抗战英雄的壮烈牺牲来维持！”（引文同上）。当年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军火，其艰辛状况可想而知。然而，南侨机工却风趣地向海外亲人描述，滇缅公路的车队是穿行在“风花雪月”之中（即云南沿途风物的四大特点：下关的大风、祥云的茶花、苍山的积雪、洱海的明月），表述了其革命乐观精神。

由于滇缅公路的运输不断补充了抗战实力，对日本妄想迅速灭亡中国的企图构成巨大障碍，因此，日寇将切断这一国际要道作为重点目标。1940年，日本玩弄外交手腕逼英国宣布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7月18日至10月18日）。消息透露时，南侨机工组织一次突击“大抢运”，夜以继日，将大批军火赶在封闭前抢运国境来，立了功勋。当滇缅公路重新开放后，日机则更疯狂轰炸功果桥与惠通桥，企图切断滇缅路的咽喉。据统计，自1940年10月18日至41年2月27日的130多天内，日寇出动飞机400多架次，轰炸滇缅路的重点桥梁20多次。其中严重的有，1941年1月23日，功果桥遭到9架日机的狂轰滥炸，有一半桥面坠入澜沧江中，敌广播“滇缅公路已断，三个月内无通车希望”；然而，南侨机工却用144个汽油桶扎成大浮筏，冒险将满载军火的车队及时抢运过江，使军运大动脉畅通无阻。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大举进攻东南亚。1942年2月，南洋群岛各地先后沦陷，日军由泰国入侵缅甸。为保卫滇缅公路，根据中英协定，中国派贵遣10万远征军入缅与英缅联军并肩作战，但因种种原因，战事失利。3月8日仰光沦陷，4月下旬，日军占领腊戍，随即以装甲车为先导，用汽车载运步兵先遣队沿滇缅公路向中国境内推进。5月3日，日军占领我国边陲城镇畹町，4日攻下龙陵，5日挺进至怒江惠通桥西岸。为阻止日军东进，国民党军队自炸惠通桥，致使数百名南侨机工、近千辆汽车及数万名缅甸华侨难民未及过桥而被阻于怒江天险。这些南侨机工有的冒险渡过怒江，有的上山参加游击队，还有不少人被日军抓去惨遭杀害。至此，敌我双方隔江对峙，滇缅公路的国际运输终于被切断了，国内运输只剩昆明至保山之间的路段继续运行。

随着战局的恶化，南侨机工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三年多来（1939年1月10日至1942年5月5日）发挥过重要作用（抢运45万多吨军火）的滇缅公路一切断，西南运输处（此时已改为中国缅运输局）竟然对回国参战、屡建功勋的南侨机工撒手不管。除一小部分被留用外，多数机工被遣散，突然间成为无业游民，生活陷入困境，而国民政府竟无一部门过问。当时南洋已沦陷，侨汇中断，有家归不得，许多机工无依无靠，只得四处飘零，流离颠沛，有的竟在贫病交迫中悲惨地死去。尽管处境艰难，但南侨机工仍不忘矢志报国的夙愿，积极做好力所能及的抗日工作。根据在东南亚开展敌后斗争工作的需要，有一部分南侨机工被盟军选派进行训练，然后潜往南洋日军占区担任地下情报工作，侦察日军动态，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作出新贡献。泰国华侨机工蔡汉良（见图37—47，今退休在泉州），曾出1944年被派往泰国，侦察拉温日军基地。由于他熟悉当地情况，深入虎穴，巧妙周旋，终于摸清敌情，配合盟军一举摧毁拉温日寇军事基地。另外，也有数百名机工奉命随盟军赴印度服务，他们协助盟军搞军运后勤，并为中印公路和中印输油管的修建奉献了力量。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历尽艰辛流落在国内各地的南侨机工，他们都尽力参加收复滇西的战斗以及各地的对日反攻，坚持到最后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亲历抗战征程的南侨机工欣喜若狂，其心情的亢奋，有如杜诗所描述的“剑外忽传收冀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抗战胜利了，南侨机工的历史使命完成了，于是要求复员南返。可是国民政府当局却拖延阻挠，致使机工迟迟未能南归与亲人团聚。

抗战刚结束，在重庆的潘国渠、庄明理、白仰峰等人，即多次向国民党政府交涉南侨机工复员事宜，却无效果。据《星州日报》1946年5月30日载《庄明理谈华侨机工现况》称，庄明理曾向当局提出八项要求：1、办理各线华侨机工总登记；2、设法安置失业机工，或将其遣送南返；3、办理华侨机工分别登记，有工作可做而不愿南返者，请政府保障他们的生活，失业者应从速收容，并作复员工作之准备；4、向英政府办理机工南返手续；5、在交通恢复后，给予机工南返的优先权；6、发给南返机工服装；7、发给机工奖励金，一方面作为奖励，另一方面作为南返生活费；8、发给服务证明书，并通令海外华侨优先任用机工工作。此外，还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就是在抗战期间，或行动有失检点，或因怨谤而被禁锢的机工，请政府从速提审，分别轻重，迅速遣送回南洋。

庄明理向国民政府侨务部门提出上述要求后，1945年10月，侨务部即联合行政院、救济善后总署、外交部、交通部、公路总局、后方勤务部等举行联席会议，一致认为所提要求极为合理，即席通过。但此次会议之后，直到11月底至12月初，当局仍未公布任何正式实施办法。到了1946年3月，庄明理再到侨务部交涉，当时侨委会委员长陈树从答应请政府拨款国币一百万元，交华侨机工互助会负责人办理紧急救济。不久，庄明理返新加坡向陈嘉庚先生请示协助机工南返问题。但两个月过去后，政府一百万元紧急救济还没着落，至于遣散机工事，更如石沉大海。

为机工复员事，设在云南的“华侨互助会”亦做了大量工作，首先是进行华侨机工总登记。据华侨互助会《南风》半月刊记载，第一期总登记，机工人数共1203人，其中新、马有1061人，占87%，而后来获准遣返，享有奖金及证书的有1144人。当年3200余名机工回国，胜利后登记入册者竟不足半数，其余的不是牺牲、病故就是失散，可见损折是相当大的。为使劫后余生的机工早日南旋，1946年3月2日，华侨互助会派代表白清泉、邱新民，携带机工名册和公文从昆明飞往重庆，奔走了行政院、救济总署、侨务委员会、外交部、社会部等部门，甚至还跑到国民党二中全会会场“请愿”，最后才由善后救济总署复示优先遣送华侨机工南返，但仍没着落。过后，华侨互助会又派代表一行四人（白清泉、邱新民、袁阿喜与龙历文），于5月21日启程南下，经越南、泰国抵达新、马，为复员南返做了许多工作。

与此同时，陈嘉庚先生为交涉机工复员之事，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终于取得最后胜利。众所周知，华侨机工回国是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的，陈先生对机工的命运一向极为关心。早在1939年8月，他就派刘牡丹到滇缅公路调查考察，后又任命庄明理为南侨总会常驻滇缅公路代表，1940年陈先生又亲率南侨慰劳团前往滇缅公路慰劳南侨机工。后来在南洋沦陷、玛琅避难的三年间，陈嘉庚先生著有《南侨回忆录》一书，其中多次叙及华侨机工。抗战胜利后，他更强调原本为抵御外侮而回国参战的机工，决不能留下参加内战，应当复员南返，并为此进行不懈的斗争。

1946年6月16日，陈嘉庚先生在吉隆坡福建会馆主持召开了马来亚各区筹赈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1、关于遣送机工南返事，交由驻新加坡伍伯胜总领事全部负责办理，并选出陈嘉庚及庄明理、陈可用、何炽祥、蔡伯祥五人于18日“晋谒”伍总领事，以策进行；2、遣送机工南返限期两个月办理完毕，另在昆明已登记的失业机工400人，应早日将他们遣送新马；3、以全马华侨筹赈会援助机工复员代表大会名义，通电行政院，请速遣送机工南返；4、一部分被扣机工，应请政府提早审讯，如无罪，立予释放；5、如两月内遣送工作未能完成，应请伍总领事返南京向中央请求力争。随后，6月19日，陈嘉庚先生一行五人，会见了伍伯胜总领事，提出三点办法，伍当场表示“赞同”，并愿尽力促其实现。

两个月期限已至，仍未见机工南返，陈嘉庚先生又连续二次致函伍总领事（见图35、36），要求遵守诺言，“倘国内政府未能急切遣送，或至遣送徒成具文，应请阁下代表侨民回国交涉”。伍总领事先后于8月24日及9月3日函复陈先生，报告了经总领馆与国内政府有关机构接洽及与当地政府交涉的结果。至此，稽延了一年多的机工复员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侨务委员会发出通告，根据华侨互助会的机工登记名册共1144人，转呈行政院核准发给奖金，每人美金200元，订于1946年10月1日起发给。

为表彰赤子功勋，侨务委员会特颁发奖状，内容是：“华侨机工□□□，热心爱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致勤劳，应予嘉奖，此状。委员长陈树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_\_月\_\_日。”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亦发给荣誉证明书，内容是：“兹证明：□□□于抗战期间，由南洋回国，在公路运输服务，颇著勤劳，此证。兼局长俞飞鹏，副局长龚学遂。中华民国三十五年\_\_月\_\_日。”

为庆祝南侨机工胜利复员，1946年10月26日启程之日，云南各界隆重召开欢送大会，并颁发“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会后，第一批复员机工219人，眷属202人（共421人）由昆明西站出发。接着，第二批机工71人、眷属85人和第三批机工177人、眷属129人，分别于11月15日和29日启程。总之，复员机工被视为民族英雄，所经之处，受到各界民众的热烈迎送。机工南返，既有整批的，亦有零散的，时间前后也拖得较长，据统计，陆续有一千多人（包括部分眷属）几经辗转返回了南洋，约占回国机工总数的三分之一。至此，三千多南侨机工回国服务这项义举，总算是有始有终，没有辜负华侨父老的重托，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为南洋华侨在祖国抗战史上，写下令人难忘的光辉的一页。

在整个南侨机工回国参战过程中，为抗日战争而牺牲宝贵生命成为无名英雄的达一千多人，约占机工总数的三分之一；抗战胜利后，复员返回南洋的也有一千多人，约占机工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其余的三分之一，则由于各种原因留在国内，人数将近一千人。这些留在祖国的机工，经过战后40多年的风风雨雨，历尽沧桑，目前全国幸存的仅100多位。他们当中，最高龄的是海南岛宋扬才（杨材），年93岁，最“小”的是四川宜宾洪华民（18岁回国），而今亦已年逾古稀。

战后留在国内的南侨机工，有的是已在抗战期间成了家，不愿或不能南返的；也有的因来不及办理复员手续而失去南返机会的。他们大都在云南一带落户安居。到新中国成立时，留在西南及滇缅公路沿线的还有300多人，其余的则已回原籍闽、粤家乡，也有一小部分星散各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南侨机工的工作和生活得到妥善安排。各地机工在各自岗位上，发挥技术专长，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的贡献，涌现出一批先进工作者（仅笔者对100多位机工的专题采访，就见过他们珍藏的奖状上百张）。全国劳动模范黄步云（见图96，昆明总站司机）等，还光荣出席北京群英会，受到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接见。1955年，陈嘉庚先生到云南、贵州等地视察，看到南侨机工安居乐业，甚感欣慰。

毋庸讳言，在极“左”路线影响下，许多机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尤其是“文革”十年浩劫，南侨机工们更因海外关系及参加抗战的经历而受尽折磨。在人妖颠倒的年代里，多数华侨老机工都戴着各种不光彩的“高帽”，诸如“特嫌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历史反革命”、“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机工”、“海外关系复杂”等等，光荣的历史被抹黑。当代“花木兰”李月美，宁死不屈，被迫害而死。尽管各地机工们几乎无一不受到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们热爱祖国的赤诚之心仍不动摇，坚信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光荣史实终究会得到历史持平的公论。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华侨政策得到重申和落实，抗战史上这段曾被遗忘甚至被颠倒的南侨机工历史，终于得到公正的评价，冤案得以平反，名誉得到恢复。1986年9月，云南的70多位老机工在昆明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南侨机工团体——南侨机工联谊会。这个“机工之家”为机工战友办实事，排忧解难，进行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同年11月间，陈嘉庚先生之侄陈共存先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率考察团到滇缅公路慰问考察，专程调查南侨机工可歌可泣的史迹，给这一群把青春年华无私奉献给祖国的海外赤子、抗战遗孤以极大的抚慰和鼓舞。同年年底，我国政府制定新政策，照顾南侨机工享受100%退休金的待遇，以保障幸福的安度晚年。

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3200余名南侨机工共赴国难，回国参战，为抗日战争作出巨大的贡献。他们虽然是一些无名英雄，然而海内外炎黄子孙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的历史贡绩。

早在1946年7月7日，为了追悼回国参战华侨烈士和死难同胞，马来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在升旗山与鹤山交界的山坡上，树立了一座“槟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罹难同胞纪念碑”（见图108）。三角形的纪念碑分成两段，下段有三面不同内容的刻石，一面是林连登书写的“浩气长存”，一面是刘玉水题写的“忠灵不朽”，正面是碑记，由黄严管撰、周曼沙收、蒋清室刻，碑记内容如下：

**慨自滔天祸水，起于卢沟；刮地腥风，播及槟屿。凡是侨居华族，莫不切恨倭奴，出力出钱，各尽救亡之天职；无老无少，咸怀抗战之决心。是以募机工，大收骊驾辇车之利；技参军运，竞树蜚刍挽粟之功。矢石临头，都无畏色，而疆场殉职，宜慰忠魂也。迨日敌偷渡重洋，首沦孤岛，先布肃清之令，更颁炮烙之刑。公治被诬，同羁缧绁；嬴秦肆虐，重演焚坑；暴骨露尸，神号鬼哭。虽扬州十日，无此奇冤；嘉定三屠，逊兹浩劫也。所幸两声原子，三岛为夷；八载深仇，一朝暂雪。第飞扬白旆，虽远竖于东瀛；而内烁青磷，尚游离于南廓。客过岘首，空怀坠泪之碑；鹤化辽东，未见表忠之竭。言念及此，情何以堪。槟屿赈会，早经议决，极思掩盖，借安英灵。奈经处处搜寻，始得一丘之萃。兹者卜地旗山之麓，建立丰阡；招魂槟海之滨，来归华表。漫说泽枯有主，定教理石无忧；庶几取义成仁，亘千秋而不朽；英风浩气，历万古而常昭。**

这篇情真意切的碑文，寄托了对抗战英勇献身的机工的悼念，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罪行。

为表彰华侨机的爱国精神，1947年11月30日，马来亚雪兰莪华侨筹赈会特在吉隆坡广东义山亭为殉难机工建立了一座纪念碑（见图110），使机工参加抗战的忠勇事迹，长存人间，该碑刻下了以下的文字：

**民国廿六年，七七事变，倭寇猖獗，蹂躏神州。我国政府，颁发动员令，全面抗战，歼彼倭奴。南岛华侨，纷起响应，组织筹赈机构，从事救国运动。斯时沿海各地，均遭封锁，寇患日深。我国政府，为运输孔道，以资接济，唯战区辽广，辎重运输，急如星火。驾车人材，须尽量搜罗，方克奏功。本会奉命选拔精于技术华侨，遣送回国，肩此重任。抗战八年，沐风栉雨，备尝艰苦，幸获最后胜利，完成光荣任务。生者固受奖南归，死者则名留史迹。此种爱国精神，至为可风，爰为之铭曰。**

**机工技术，驾轻就熟。机工勤劬，风尘仆仆。机工任务，滇缅往返。不畏天险，褒斜缩谷。祸生陡变，丧身寒谷。为国牺牲，谁不敬服。自来殉国，必有纪录。勒诸丰碑，良志芳躅。**

1989年“7·7”，正值南侨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1939—1989）纪念之际，为了缅怀南侨机工的历史功绩，表彰和发扬华侨的爱国精神，云南省人民政府特在滇缅公路的起点——昆明树立起一座雄伟庄严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见图112）。纪念碑矗立在西山公园滇池之滨，碑身以汉白玉石砌成，显得飒爽英姿，浩气磅礴。碑前两层台阶均为七级，象征“七·七”抗战；碑的上端雕有“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四条墨石横带象征当年四万万同胞齐心抗日；碑的下面镌刻有“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十一个鎏金大字，落款是“云南省人民政府立”；碑身的两侧砌成两面旗帜形状，象征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旗帜上雕刻三个“七·七”纪念章，代表着回国抗日的三千多名南侨机工；碑身高九米，碑座高三米，体现着“九·三”胜利节；碑座的正面刻着四个大字：“赤子功勋”，是对南侨机工和海外华侨为祖国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高度赞誉；碑座的侧面和背面镌刻着碑文，碑刻全文如下：

**七·七事变爆发，日寇猖狂入侵，神州大地，烽烟四起，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全国同胞抗日怒潮汹涌澎湃，气壮河山。海外华侨敌忾同仇，义愤填鹰，积极参加抗日，广泛开展义演、义卖、募物、捐款等救亡活动，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波澜壮阔，四海翻腾。**

**一九三九年，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三千多名热血奔腾的南洋华侨机工，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民族责任感，毅然离别父母亲人，远涉重洋，回到祖国，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救国服务工作。**

**当时，沿海港口均已沦陷，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国际通道，世界各国和海外华侨支援我国抗日的军需物资均赖此路输入。南侨机工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弥漫的战火，夜以继日地抢运军需辎重及兵员，组装、抢修车辆，培训驾驶、机修人员。滇缅公路沿途山高谷深，地势险恶，道路崎岖，设施简陋，加之敌机狂轰滥炸，路塌桥断，险象丛生。南侨机工淋雨栉风，披星戴月，历尽千难万险，确保了这条抗日生命线的畅通，被誉为“粉碎敌人封锁战略的急先锋”。在执行任务中，有一千多人因战火、车祸和疫疠为国捐躯。在滇黔、滇川、广西、湖南公路以及印度阿萨姆邦丁江机场，南侨机工也担负抗日军事运输任务，勋劳卓著。他们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抗日战争胜利后，约有一千名南侨机工复员回到南洋；留在国内的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继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半个世纪过去了，南侨机工的伟大献身精神一直鼓舞着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统一祖国而努力奋斗！**

**为了表彰南侨机工的光辉历史功绩，并激励来兹，特树丰碑，永志纪念。**

**云南省人民政府**

**一九八九年五月**

······································

综上所述，半世纪前，正当祖国民族处于最危急关头，三千多南侨机工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毅然抛弃海外较为优裕的生活，在南侨总会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大规模回国参战，这是华侨史上的一大壮举。南侨机工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滇缅公路的军事运输方面。据《中华民国统计提要》的记载，从1939年7月至1942年7月这三年中，滇缅公路运输的军需品和其他物资共计452，000吨；另据《华侨先锋》第2卷第9期记载，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平均每日的军事物资输入量保持在300吨的水平以上，被誉为抗战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此外，他们还在其他军运线（四川、贵州、广西、湖南等地）以及中印公路抢运军火兵员，并积极配合盟军对日反攻。总之，南侨机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卓越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历史意义，不仅直接增强了祖国抗战能力，而且也以他们为民族存亡而献身的壮举，鼓舞了全民族抗战的意志和信心。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南侨机工的光辉历史，仍将继续激励与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振兴中华而共同奋斗！

一个华侨机工的经历——记滇缅公路的南侨机工蔡汉良

在艰苦的抗战年代，正当祖国处于最危急关头，有众多的海外赤子自愿抛弃侨居地安稳舒适的生活，毅然回国参战。现居住在泉州的泰国南侨机工蔡汉良，便是其中的一员。1985年，正值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笔者首先在泉州采访了这位1939年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幸存者。年逾古稀的蔡老先生回顾了抗战时期在滇缅公路的不平凡历程，将这段几乎被遗忘了的可歌可泣的史实作了详尽的叙述，并出示了“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侨务委员会奖状”以及“荣誉证书”等珍贵的实物资料。本文记述的是一位当年回国参战的华侨机工的经历，作为南侨机工的一个缩影，为华侨抗战史提供一个真实的历史见证。

蔡汉良，原籍福建南安。民国初年，南安山区土匪出没，民不聊生。汉良5岁时曾被土匪绑票，其父倾家荡产花了450元银圆才将他赎回，结果背了一身债，无力偿还，日子难熬。在汉良7岁时，父亲便服毒自杀了。由于家贫上不了学，他刚8岁就得帮人放牛，尝尽了艰辛。幸亏闽南一带是著名侨乡，有海外关系，不少人在家乡活不下去就出洋“过番”，蔡汉良的家族也是这样。他父亲有兄弟9个，就有8人到泰国谋生，其中八叔蔡铁民，靠经营锡矿渐渐发迹，后来在乃佛及弄宣拥有“吉兴”、“吉利”、“泉南”、“铁民”四个矿务公司，自己铺筑铁路运输产品，还开办酒厂、火砻厂、大戏院、百货公司等。到抗战前夕，蔡铁民已跻身于南安县大富侨之列。

1928年蔡汉良10岁了，五伯父蔡兴普从南洋回家探亲，便将他带到泰国读书，上午学华文，下午学泰文，读了6年，小学毕业后便在叔父蔡铁民的吉兴矿务公司开火车及修汽车。当时他的生活费用全由叔父供给，因此月薪50元便可全部寄回家赡养母亲。在1934年至1937年的四年间，月月如此。

可是，正当他家日子开始好转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一场民族灾难降临了。当时，南洋广大侨胞虽然安居海外，心中却时刻惦念着祖国和家乡，大家每天最关心的是抗战新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是“七·七”以来华侨社会最普遍的口号和行动。蔡汉良在泰国弄宣，也参加当地华侨商会组织的“人民抗日军青年宣传队”，经常上街卖花筹赈，抵制日货，还积极投入当地筹赈分会的活动，并将月薪捐出10%，直至回国参战为止。

1939年，由于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急需大批熟练机工，经陈嘉庚先生一号召，南侨总会登报招募，极大地激发起华侨青年的爱国热情。在新加坡，报名参加南侨机工的非常踊跃，有的机工已经“在洋十余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在泰国，华侨热血青年也跃跃欲试，大家不当亡国奴，急着回国抗战。蔡汉良觉得自己符合条件，既是熟练司机又是机修工，更应发挥特长回国效劳，于是下决心报名回国。

可是，考虑到家庭大概不会同意，该怎么办呢？十多年来，叔父的养育之恩，蔡汉良铭记在心，现在要说服叔父让他参加机工团回国抗战，觉得不好开口。然他爱国心切，且血气方刚，干脆就来个先斩后奏，便偷偷地由弄宣乘车赶到几百里外的董里什呈筹赈会去报名。在董里什呈，竟遇到一段小小的插曲，差一点被留下改变他的命运（如果是那样，本文历史自然将重新改写）。原画，在那里报名时，偶然被叔父的一位老朋友王联辉（惠安籍）看到。王是个开店的侨商，一向对蔡诸多关照，并且早就有意将其读中学之女许配给蔡，因此当得知蔡要回国抗日时，便设法挽留，于是好心好意地让他选择几条道路：（1）让蔡留下与其女成亲；（2）若暂时不结婚也不勉强，可租一间店铺让蔡独立开店，做收购橡胶生意；（3）若是喜欢开车，可将其16部汽车让蔡挑选所满意的，自己去经营一个客运公司亦可。尽管上述几点都是合情合理和可行的，然而，强烈的爱国热情使蔡汉良认识到国难当头，无国便无家，于是婉言谢绝了叔父的这位老友的一番美意，铁下一条心：“报名回国！”

与蔡汉良同时报名的有30多人，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走不了。经过一番周折，才由当地筹赈分会的一个负责人自费带领他们一行人到槟城，加入第九批回国机工队伍。在离泰前夕（1939年8月8日），蔡汉良才给家中伯父、婶婶（叔父铁民已于38年病逝了）及王联辉各留下一信告别。三人接到信后不约而同地追到槟城。婶婶（是泰国人）对蔡说：“今天是特意来追你回去了，你若不回，今后就永不相认了！”王联辉随后也赶到槟城，见挽留不住了，便在“天天酒家”设宴为其饯行。后来，当伯父托着拐杖匆匆赶来时，船却已离开槟城了（此乃1944年蔡回泰侦察日军基地时，一个堂兄告诉他的）。

当他们由高头廊乘车到达槟城时，受到在槟城留学的泰国华侨学生的热烈欢迎，并合影留念。现仍珍藏着这张近半世纪前的照片（见图37）。蔡汉良一行7人分别为前排：左四钟炎祥、左五蔡汉良、左七邝天祥（后改为邝振声）、左八钟道清、左九蔡高耿、左十陈潮海、左十五蔡惠文。险蔡汉良与陈潮海为闽籍外，均为粤籍。

1939年8月12日，他们由槟城启程，到达新加坡又受到隆重的欢迎，14日开始由新加坡搭“丰庆号”轮船出发，17日到安南（即越南）西贡，20日改乘火车，尽管车厢内闷热难受，但大家有一股爱国热情，心情是舒畅的，一路高唱着激昂的抗日歌曲，终于在8月23日到达昆明。

第九批的华侨机工一到昆明，先被西南运输处安排在潘家湾进行短期的军训，因战事吃紧，很快被分配到各个运输大队，蔡汉良分配在第15大队45中队。1939年10月，南宁战役危急，他与南安同乡洪本霖同被抽调编入第十六兵站，赶到南宁投入前线运输。经过激战，南宁不幸于11月24日失守，他们随即又投入昆仑关战役。其时白天战火激烈，只得改在夜间出发运输，每夜赶开三趟直至天亮。不久昆仑关亦沦陷，只得退入武鸣，又被包围了三天三夜，幸而援军打开了一条血路，他们才退入柳州。后又转移到安南境内的高平。西南运输处在安南设有分处，在安南的最初几个月内，他们突击抢运经安南转口的各式汽车及大量的军用物资回国。后来，由于日寇占领安南（1940年），他们在安南的整个特别大队的车全部被封去，人员百多人全被集中在安南“南生旅社”，然后分三批返回昆明，他属第二批回来的。

当滇缅公路被封三个月重新开放后，蔡汉良被编入第二大队，行驶在这条被称为“抗战输血管”的滇缅线上。闻名中外的滇缅公路，全长1146公里，由昆明直达缅甸腊戍，沿途要翻越高山（苍山、怒山、高黎贡山等），穿过大河（漾濞江、澜沧江、怒江等），行程需七、八天，特别是需经一段原始森林“烟瘴之地”，毒蚊袭人，疟疾时有发生，再加上日机常来盘旋轰炸，其艰辛状况可想而知。可是广大华侨机工，自甘吃苦，苦中有乐，有的人还风趣地描述滇缅公路的车队是整天奔驰在“风花雪月”之中（即下关的大风、祥云的茶花、苍山的积雪、洱海的明月），对祖国河山大加赞美，表现出革命乐观主义。

蔡汉良在滇缅公路期间的经历，最值得一提的大致有这么几件：

①被推为机工代表，二次受到陈嘉庚先生的接见

1940年陈嘉庚先生率领“南侨慰劳团”回国视察，特地到滇缅公路慰问华侨机工。当时，蔡汉良被保山第二大队“华侨互助会”推选为三位代表之一，两次见到了陈嘉庚先生，并用闽南语当面汇报了华侨机工的情况。第一次是汇报“南侨总会”发给华侨机工的物品被贪污之事。因当时陈先生曾组织“南侨总会”向每个华侨机工赠送九件物品（包括蚊账、毛毯、工作服、卫生衣、羊毛袜、运动鞋、奎宁等）。可是竟被一些贪官污吏加以克扣，到华侨机工手上有的只领两三件，有的甚至连一件也没有，为此，他据实向“南侨慰劳团”反映情况。第二次是向陈嘉庚先生汇报华侨机工与第五军打架之事。起因是由于第五军严重危害群众利益，见鸡抓见菜摘，还到市场随便压价买猪肉，致使当地群众叫苦连天，这引起华侨机工的愤慨不平，于是仗义执言，与之争吵。可是第五军自称他们横行七八省，从无人敢管，在滇缅公路竟被这群“番仔兵”（华侨机工）来教训？于是，双方打起群架。经陈嘉庚先生的调解，此事得以平息。

②接送远征军，参加入缅作战的运输

日寇偷袭珍珠港之后，分兵进犯东南亚，并直指缅甸。当时英国在欧洲战场失利，远东又兵力薄弱，因而希望中国出兵共同防御滇缅公路。于是，根据中英协定，中国组织远征军入缅。在第五军、第六军出兵进缅作战期间，蔡汉良担任分队长，直接运送兵员、军火及其他补给品进缅。可惜远征军入缅过迟，处境被动，指挥不协调，战事不利，致使一部分退入印度，一部分溃退回国。后来情况更加危急，当日军攻至滇缅线的要冲惠通桥时，1942年5月5日，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兼局长俞飞鹏不得不下令自炸惠通桥，将日军切断在怒江西岸，而华侨机工队也有不少被截在那边，仅蔡汉良这一中队，就有6辆车不能回来。这些机工大都遇难，仅剩一个潮州籍华侨机工奇迹般地逃回来。原来那些人被俘后派去当杂役，有一次在杀牛时被差出来挑水，第一担水先挑回去，而挑第二担时就趁机跳入江里，从惠通桥边泅水过江归队。

③“五·四保山惨案”历险

在5月5日炸断惠通桥的前一天，蔡汉良还亲身经历了“五·四保山惨案”。那天上午，他的好友钟少伟（粤籍华侨机工）特地邀请蔡一块上街赶墟，因为钟妻刚生一女孩才三天，准备买鸡做“月子”。而蔡汉良刚好有任务，需去领车队的蓄电池，于是与钟少伟分手，不料竟成永别。当天中午12时，日寇飞机突然来炸保山，蔡汉良与另一老华侨机工邱建和（此人亦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迅速从驾驶室下来，就近疏散到田岸沟里，幸而脱险，而在赶墟的钟少伟却被炸死了。这一天，正逢举行“五·四运动”纪念集会，学生、难民与无辜百姓被炸死数千人。蔡汉良他们将华侨机工车队疏散到大理之后，又奉命回来掩埋死难者。其时成千上万腐尸遍野，臭气熏天，惨绝人寰。这是他有生以来目睹的最大惨剧，直至40多年后的今日，犹有余悲。

④滇缅公路切断后，华侨机工竟被草率裁减，放任自流衣食无着

1942年5月，滇缅公路在发挥了三年多“抗战输血管”的巨大作用之后，终于被日寇切断了。令人痛心的是国民党当局竟草率地将华侨机工裁掉了事。其时太平洋战争已爆发，南洋沦陷，海外侨汇断绝，许多华侨机工无依无靠，生活无着，甚至沦为乞丐。当年冬天，就有十多位老弱华侨机工，贫病交加冻死在昆明。蔡汉良的一个同乡侯合意，走投无路，也只好当乞丐。与蔡汉良同一批从泰国回来的邝天祥，失业后只好蜷缩在小西门防空洞里过夜。汉良本人在车队疏散时还代理副中队长，可是几个月后在石塘山“整训班”时，也被裁掉，失业三个多月。后经友人介绍到西南运输公司开客车，走下关至昆明这一线。当时汽油奇缺，只好开“木炭车”，林新李（华侨机工）还当蔡的助手。

后来，还有一部分华侨机工，被盟军总部昆明分部选调去进行特种训练，潜往东南亚日军占区做侦察工作，蔡汉良便是其中的一个。

蔡汉良原先侨居泰国，熟悉当地情况，经选调进行一番严格训练之后，于1944年5月被盟军总部派往泰国，任务是侦察日寇在泰的拉温军事基地。他先乘专机到南宁，再步行由东兴进入安南，经芒街、海防、河内等地，然后经老挝湄公河到达沙湾拿吉，雇小船渡到泰国边境穆达汉，在那里办理入泰手续。其时有个裔官员对他严加盘问，并用泰语表示怀疑，可是另一泰官员却认定蔡是个乡下佬，说他不懂礼貌，进门不懂脱鞋脱帽，也不会鞠躬，后来终于办理手续让他入境（见图39，蔡汉良化名为蔡坤，奉派前往泰国侦察日军情报时的证件）。

当他从乌汶乘火车赴曼谷时，车上就有特务前来盘问，被他巧妙周旋应付过去。来到曼谷，他先在过去熟悉的耀华力大街歇脚，当夜便住进“大华百货商店”楼上的“东亚旅社”。第二天当蔡在街上行走时，忽然有人拉一下他的衣角，示意进小店喝咖啡，他便警觉地跟进去。奇怪的是那人留下自己的“大白笠”，而顺手将蔡相同的一顶“大白笠”戴走了。蔡觉得这里必有奥妙，随即溜至僻静处取下大笠仔细看看，里面果然有一张字条，内容是提醒注意该旅社有三个日本特务，一个是登记处的，一个卖眼镜的，一个是按摩师。蔡判断此人大概是奉派暗中对他进行保护的，于是随即设法离开旅社。

当蔡汉良辗转来到离侦察目标——拉温基地还有93英里处的春蓬时，这里开车出入的全是日本人，每五公里便设一个检查站，难以进入。他只得暂时到附近一个堂兄那里再想办法（此时，堂兄才告诉他回国之时伯父曾追至槟城而船却开走了的情况）。在堂兄家中呆了一个月，一个难得的机会终于来了。原来，有个曾在叔父厂里做工的泰国侨生郑阿隆，时下正给晶本人当杂货采购员，蔡通过他介绍进拉温当杂役。蔡汉良与郑阿隆一起乘日本人的卡车进入了拉温，并在一家日本人开的菜馆找到一份杂役差事。在这家菜馆工作，消息灵通，可以趁机了解基地的有关情报。原来这个军事基地是设在一片原始森林里的，武器弹药一堆堆垒成三、四层楼高，并用篷布遮好，日军驻在地道里，几千名被抓来的华工及土著在修筑工事。蔡汉良还混进禁区与民工聊天，边走边用脚步测量并故意对一个民工说：“我们在这里做工，又是军事基地，飞机一来，那可无处跑了。”可是那人却说：“你可能初来不知，没啥可怕，这里及对面山上都有高射炮，飞机一来，高射炮就会响起来。”交谈当中，问者有心，答者无意，便探听了不少情况。经过几次侦察，他利用日文旧报纸绘制成秘密图纸，然后准备离开。可是进来不易出亦难，他只好对老板诉说在此被蚊子咬得受不了，要回家拿蚊账及衣服。老板便派一人跟踪并交待要“快去快回”。那人是槟城土生华人，跟踪蔡一天一夜才被甩掉。那夜他们同住进春蓬一家旅店，次日清晨4点蔡刚起来，那人马上追问：“天未亮干什么？”蔡连忙说昨夜着凉拉肚子，并故意从箱子里取手纸上厕，还留下箱子迷惑他，然后从后门溜出来，立刻雇了三轮车赶至火车站，买了一张抵万伦的长途车票，而实际上只乘两个小站就下了车，以躲过那家伙的追踪。

在回国途中，又经历了种种风险。在途经安南海防时，适逢滇越铁路的桥梁被盟军派机轰炸，日寇因此进行大搜捕，见生人先抓起来再说。蔡在一家海南华侨开设的“大同旅社”也被捕了。幸亏他懂得海南语，冒认是该店老板的同乡，经老板的尽力营救，终于获释。

可是刚离开“大同旅社”，第二天在海防轮渡码头又遇上了麻烦。这里日本宪兵搜身很严格，蔡汉良便将密写情报的晶日文报纸当作废纸包裹着皮鞋置之箱底，当日兵开箱一看是臭皮鞋，便顺手扔到老远一边。待搜身之后，他才匆匆捡起报纸包住皮鞋，顺利地过了关。

当抵达安南芒街与我国东兴交界的国境线时，他却被边防军检查站扣留了，被送到东兴镇公所。经他说明后，镇长马上给他松绑并向他作了解释。此时，正值南宁第三次失守，归途再也无法乘飞机了，钱又花光了，只好暂时困在东兴一段时间，并向总部发电求援。不久，总部汇来安南币一千元，寄在芒街办事处。在东兴镇公所派人掩护下，蔡汉良到芒街办事处从一位五条杠的法国军官手中领了款。过后，又有几位派出侦察的华侨机工回来，蔡也帮他们通过这条途径领了款，然后七、八人结伴步行回国，先穿过十万大山，再步行十六天到广西百色，然后经贵阳回到昆明，这时已是1945年5月了。

蔡汉良将出国侦察所得向盟军总部作了详细汇报。经过核实之后，盟军总部从昆明和印度调了大批轰炸机，将拉温基地的军火仓库、火车站、电台、高炮阵地、停港战舰全部摧毁，大火燃烧达六、七天之久。轰炸前后，均拍有照片证实。总部特地让他看二张照片：一张是炸前拉温基地全景，另一张则是炸后整个基地变成一片浓烟火海的景象。

出国侦察任务完成之后，总部又派他去印度当空降兵，但因病未能去成，便留在战时运输局开车，直至抗战胜利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了，这些亲身回国参战的华侨机工，终于亲眼看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高兴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发给蔡汉良一张奖状（见图40），内容是“华侨机工蔡汉良，热心爱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致勤劳，应予嘉奖，此状。委员长陈树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 日”。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亦发给一份证明书（见图41），内容是：“兹证明：蔡汉良于抗战期间由南洋回国，在公路运输服务，颇著勤劳，此证。兼局长俞飞鹏，副局长龚学遂。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 日”。此外，他还荣获二枚珍贵的南侨机工纪念章（见图42、43），一枚是“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是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赠的，号码是1457号；另一枚是云南各界欢送大会赠的“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号码为266号。（在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为了使更多的人们了解和缅怀华侨对抗战的历史贡献，蔡汉良特将这些珍藏40多年的荣誉证书及纪念章等宝贵实物及照片捐赠给华侨大学“陈嘉庚纪念堂”展览，引起了海内外参观者的关注与兴趣）。

在抗战胜利结束之初，华侨机工纷纷要求复员，可是由于政府当局的拖延，致使他们迟迟未能返南洋与亲人团聚。后经陈嘉庚先生多次出面交涉，并亲自为机工复员事致新加坡总领事伍伯胜，终于使华侨工在1946年获得复员南返。复员时，每位华侨机工发给200美元，折合67万国币。蔡汉良这批复员时的领队是白清泉（见图6，白先生也是1939年第一批回国南侨工“八十先锋”的领队），行程由昆明经香港回南洋。沿途受到热烈的欢送，情景十分动人。这时，因接到母亲的急电，蔡汉良便从香港转厦门回到南安老家，从此定居国内。

战后，蔡汉良复员回到原籍，在泉州“泉安汽车公司”当驾驶员，并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工会活动，临解放接受分配护车任务，刚解放即被派为新工会骨干，参加接管工会工作。接着，他即奉派随军加入支前运输，由南安向同安、厦门推进，并参加大、小嶝岛及金门战役，到停攻金门才调回泉州，编入“泉州支前运输大队”（“泉安公司”蔡若水任大队长）。其后，1953年参加东山岛战役，1955年转入福建省汽车运输公司工作，直至1979年退休。

新中国成立后，留居在祖国各地的南侨工得到人民政府的关怀与照顾，安居乐业，继续为祖国贡献力量。蔡汉良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努力工作，技术精益求精，坚持节约用油，做好“四勤”保养，保障安全行车，超额完成任务，在运输生产上创造了好成绩，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生产能手”，至今仍保存很多奖状（见图44、45、46、47）。

可是，“文革”十年浩劫，黑白颠倒，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光荣经历，却被歪曲为“历史污点”。蔡汉良参加南侨机工到西南运输处，是国共合作时期响应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回国支援抗战军事运输的，却被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特别是他曾受盟军总部的派遣往泰国侦察日军基地，是国际反法西斯的特殊战斗，却又被打成“国际特务”，因此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值得一提的是，蔡汉良被揪出去游街示众，头上戴的并不是文革“最时髦”的纸糊高帽，而是一架铁条焊成的十几斤重的“定时炸弹”，其发动机部件还会旋转，尤其引人注目。尽管被套上铁制高帽游斗，并被关进“牛棚”迫害，但他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从不动摇。

粉碎“四人帮”之后，蔡汉良获得平反，恢复了名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历史得到了公正的评价。1986年，国家制定新政策，照顾南侨机工享受100%的退休金待遇；1989年，正值南侨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1939 - 1989）之际，云南人民政府特在昆明建立一座“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碑”。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南侨机工无名英雄们！

新婚别 别离为救国——记永春南侨机工刘瑞齐

刘瑞齐的新婚别，是南侨机工可歌可泣英雄事迹中鲜为人知的真实而生动的史实之一。他的事迹集中地体现了当时广大热血的华侨青年崇高的爱国情操。

刘瑞齐，1914年出生于闽南侨乡永春东郊留安塔下留安村。据传说，该村虽小，但历史上却赫赫有名：五代清源节度使、晋江王留从效、南宋连任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宰相留正，都是该族显要人物。后来为避政迫害，不得不改“留”为“刘”（据族谱记载，宋末元初被迫改“卯田留”为“卯金刘”）。该村村民出洋“过番”的历史亦悠久，谱载明永乐年间，该村族人刘孟福即随郑和下西洋，后卒于印尼苏门答腊。刘瑞齐生于民国初年兵荒马乱时代，3岁丧母，12岁又失去了父亲，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幸亏堂兄从南洋回乡探亲，便将他带往马来亚谋生。

刘瑞齐起初在大山芭割橡胶，后来在一家永春籍华侨商让当学徒。由于为人敦厚，刻苦耐劳，渐渐赢得店主的信任，让他学开汽车，为店里运载橡胶及各种货物。有一回，街邻失火，殃及该店，刘瑞齐不计个人安危冲进火海，冒死抢救出一箱箱的货物和帐簿，保住了店里的财产，而他却被无情的火焰烧得遍体鳞伤而入院医治。为此，店主颜先生深感其德，将次女许配给他，并拨出部分业产（包括商店一间、卡车一辆以及橡胶树一千棵等）由他独立经营。

1939年春，报上传来陈嘉庚先生号召华侨青年回国抗日的消息，南洋各地血气方刚的青年都踊跃报名。刘瑞齐也有一颗热爱祖国殷红的心，他被星马日益高涨的爱国热情所感染，决心报名参加。可是此时，他已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温柔贤慧的妻子当然舍不得让新郎奔赴烽火连天的战场，岳父的四间商店也正需要他继续帮助经营。怎么办呢？刘瑞齐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认为“国难当头，无国便无家”，下决心瞒着家人，“先斩后奏”！

为了防止走漏消息，刘瑞齐不在本埠报名，而是悄悄开车到另一埠头芙蓉筹赈分会报了名，待体检、驾驶考核以及一切手续办好之后，于启程回国之前夜才回家。按照要求，他与机工同伴集体理了光头，顺便在街上买了顶毡帽带上。当他跨进家门时，新婚妻子见从不戴帽的丈夫突然带上个毡帽，上前好奇地掀开，顿时露出一颗闪亮的“和尚光头”引得岳父母以及小姨子们的哄堂大笑。岳母关切地探问原因，他只好临时撒了个谎，说是因治疗头疼，让番仔医生敷药时剃掉的。但细心的妻子似乎从他神秘的举动中猜出了什么，当夜悄悄地问他：“莫非你想回国？”为了明天能够顺利启程，此时他仍不敢以实相告。半夜里，刘瑞齐起身把自己的手表、结婚金戒指和一些贵重东西连同写给妻子的告别信凑成一包，放进妻子的大衣柜里，只取走一套衣服，把钥匙放在梳妆桌上，默默地离开了温暖的家。此时此刻，妻子仍然在温馨的睡梦中。这场“新婚别”，竟成了他与妻子的终生别离！

偕刘瑞齐同行的还有永春籍的林广怀（领队）、颜世国等人，他们由芙蓉埠出发，前往新加坡集中编入第八批回国机工队伍。陈嘉庚先生亲切地接见了全体机工，用闽南话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勉励大家回国后应好好拼搏，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第八批机工队伍三百多人回国后，先集中在昆明进行军训，经考试合格便陆续分配到滇缅公路沿线服务。刘瑞齐被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15大队44中队，开赴广西前线。队部驻扎在镇南关附近，上级下达的任务是到安南将汽油等军用物资运回南宁，同时，从国内运出桐油、猪鬃等物资去安南。

1939年11月底，南宁失守，刘瑞齐随车队退入安南高平，编入特别运输大队，日夜抢运经安南转口的各式汽车及军用物资，在海防至广西靖西、东兰、河池一带穿梭行进。日寇占领海防之后，特别大队撤回昆明。经过重新整编，西南运输处集中力量投入滇缅公路抢运，刘瑞齐被调到“华侨先锋大队”。

在滇缅公路抢运期间，岳父从海外给齐瑞齐来信说，自从他不辞而别回国以来，其妻日夜思念，忧郁成疾，终于病倒在床。老岳父急切盼望他能有一个机会南返团聚，无论该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可立即汇来。读着海外来信，刘瑞齐流泪了，预感妻子将发生不幸，但为了民族大义，他只好擦干了泪水，在回信中写道：“中国抗战一日未胜利，我就一日不能回去！”

接下来，太平洋战争很快爆发了，日寇疯狂南进，中国派远征军入缅作战，刘瑞齐奉命运送远征军入缅，经历了一段最艰难的战斗岁月。

后来刘瑞齐才得知：妻子病危时，老岳父关掉商店特意回国寻找他，因遇太平洋战争爆发，回不了南洋，便辗转回到老家永春，滞留至战后才重返马来亚，可是其妻早已病逝了。

忍痛辞别新婚的妻子，离开温暖的家，千里迢迢回来共赴国难，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妻子病了，岳父来函催他回南洋关照一下，救妻子于垂危。可是，为了民族大义，为了抗战胜利，刘瑞齐有家不回。昔日，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成为千古佳话。今朝，刘瑞齐为了抗战救国，置新婚妻子于不顾，这种公而忘私的襟怀和热爱祖国的高贵品质，也当载入史册，传之千秋。

为了救亡图存，为了抗战胜利，多少华侨青年作出了牺牲，多少南侨机工的妻子、亲属作出了奉献。

广大华侨青年，千百万海外侨亲为抗日战争付出的代价，历史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这是一张南侨机工李飒与傣族姑娘刘学义的“结婚证书”。是华侨青年与傣族姑娘姻缘结合的珍贵文物，它蕴含着海外赤子与云南少数民族姑娘神奇般的爱情故事，也是南侨机工李飒回国参战的实物见证。

这张“结婚证书”颇具特色，它既有龙凤呈祥的图案，展示了百年好合的祝福；又有爱神丘比特红箭，象征千里姻缘一线牵，可谓中国古老传统与西方神奇传说相结合，真是“中西合璧”，别具一格！

它伴随主人历经沧桑，从烽火连天的滇缅公路的抗日军运线上，到抗美援朝硝烟弥漫的战场，又遭受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折腾。辗转近半个世纪之后，“婚书”虽已有些残缺脱落，但文字大都隐约可辩。

**试考订如下：**

**结婚证书**

**民国□□年十二月初二日生，福建安溪县人**

**民国□□年四月初四日生，云南省龙陵县人**

**今由**

**刘攸齐  陈东山先生介绍，谨詹于中华民国三十年二月**

**日上午十二时，在芒市华侨先锋大队部举行婚礼**

**恭请**

**连文瀛先生证婚。看此日桃花灼灼，宜室宜家；卜他**

**年瓜瓞绵绵，尔唱乐炽。谨以白头之约书向鸿笺，将红叶之盟载明鸳谱。此证。**

**结婚人   李飒  刘学义**

**证明人   连文瀛**

**介绍人   刘攸齐  陈东山**

**主婚人   李清倩  刘仕书**

**中华民国三十年二月十五日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婚书”标明在“芒市华侨先锋大队部举行”，时间为1941年2月15日，即滇缅公路国际运输线畅通期间，使这张“结婚证书”更成为不可多得的华侨抗战历史见证。

“华侨先锋大队”，是由1939年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于1940年组成的一支军事运输车队，全大队200多辆各式车辆全部由海外华侨捐赠，200多名成员，从大队长至驾驶兵，清一色由海外侨胞组成。大队长为麻埠华侨机工刘贝锦（永春籍），该“华侨先锋大队”是“抗战输血管”——滇缅公路上朝气蓬勃的一支抗日队伍，被誉为“抗战建国运输战线上的神行太保”。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的统计，在滇缅公路畅通期间，每日平均输入军事物资不下300吨。“婚书”上的证婚人连文瀛，就是“华侨先锋大队”的大队副，系莆田籍新加坡第四批回国机工；介绍人刘攸齐、陈东山，亦均为南侨机工。

新郎李飒，又名李石飒（李屑），是马来亚吉隆坡热情奔放的侨生，原籍福建安溪龙涓乡。1939年他呼应陈嘉庚先生的号召，毅然抛弃海外舒适安稳的生活，参加第五批南侨机工团，回国服务，分配在芒市“华侨先锋大队”当驾驶兵，每天满载着抗日军火穿梭在滇缅公路的下关（常刮大风）、祥云（有美丽的茶花）、苍山（终年积雪）、洱海（明月逗人爱）之间，南侨机工戏称为“风、花、雪、月”之境。而新娘刘学义，则是云南龙陵县的傣族姑娘。正是由于抗战期间在滇缅公路上的奇特遭遇，使万里之外归来的海外赤子与傣族姑娘在烽火弥漫的战斗空隙中（1941年2月）喜结良缘。

在纪念南侨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1939-1989）前夕，笔者来到泉州汽车运输总站采访了年逾古稀的李飒、刘学义老夫妇，据他们的追忆及退休在泉州的几位古稀老华侨机工的补充介绍，举行婚礼的那天，数百名南侨机工战友欢聚一堂，在芒市华侨先锋大队部里，大家举杯痛饮，载歌载舞，把婚礼办得喜气洋溢。热火朝天。

抗战胜利之后，李飒复员回到家乡安溪，并参加当地地下党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便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50年代中期转业至福建省汽车运输总站工作，直至1975年光荣离休。如今，李飒、刘学义夫妇正在泉州安度幸福的晚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寇于1942年4月由缅甸入侵云南，沿滇缅公路进逼惠通桥。5月5日，国民党守军下令自炸惠通桥，将日寇阻拦在怒江西岸，结果使大批南侨机工车队以及无数难民陷入敌手，幸存者廖廖无几。不久前，笔者有幸在福建泉州汽车运输总站采访了当年炸毁惠通桥的现场目击者——南侨机工郑天赐，他是断桥之夜泅渡怒江天险归队的幸存者。

年逾古稀的郑天赐，个子矮小，红光满面，行动举止敏捷，记忆力很强。他原籍福清，1918年出生在新加坡，后随父母迁居马来亚柔佛居銮，小学毕业即在自家开设的修理行修车，20岁开始开车。1939年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参加第四批机工团，并将自家的修车工具也一起带回国。他编入西南运输第14大队，行驶在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线上。

郑天赐回忆说，在滇缅公路的南侨机工，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一段惊险遭遇，而他至今印象最深的则是惠通桥（见图28）炸断之夜泅渡怒江天险的经历。

那得从1942年滇缅公路的大撤退说起。由于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日寇入侵云南，抗战大后方突然变成抗日最前线。滇缅公路作为抗战期间我国最重要的国际运输线，进口物资由缅甸输入，其中以军用物资汽车、汽油、轮胎、兵工器材等为最多。当日寇入侵缅甸之后，南侨机工抓紧抢运，力图将大量军用物资撤运入国门畹町。此处物资堆积如山，仓库满了就沿路边堆放。从畹町到保山、下关一带，沿途成千上成的汽车，往来不绝，紧张抢运。迨腊戍仓惶失守，所有的车辆载物资、难民撤退，接踵于道途，争想逃难，惊惶混乱。5月3日，日寇占领畹町国门，战局突然急转直下，这些重要军用物资已无法抢运，又不忍心把它留给敌人，于是南侨机工就放火焚烧。

郑天赐一行四人，小队长陈文芳、南侨机工王亚十，以及一个姓李的广东人（被称为李广东），行车由缅甸回国，遭空袭时陈文芳被炸死，只剩三人随着溃退的车队撤退出畹町。此时，日寇穿着中国军装夹杂跟踪而来，利用我们的混乱，企图跟着大批撤退车辆偷混过惠通桥。

5月5日上午，郑天赐一行从腊勐盘旋下山，临近惠通桥时，已经传闻要炸掉惠通桥以阻敌，大家急着抢超车，有时几辆车挤在一起，进退不得，结果互相阻塞，走走停停，欲速不达。当时车子过桥是一辆一辆地过，人拥车挤，行动非常缓慢。大约上午9点左右，敌军占领腊勐，发炮将怒江东岸老鲁田的车子打翻并燃烧起来，把路堵住，惠通桥两头的车辆停满公路上。郑天赐的车子在桥西几百米处挤不动了，从驾驶室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惠通桥上两个中国士兵，已将炸弹摆在桥板上，正在忙于摇发电机的接线操作。同时，守桥部队挥舞着旗子，催促人们尽快跑步过桥，慌忙当中，忽闻枪声，混在车队中的日军先头部队以为被发觉，当即抢占有利地形，开枪向东岸射击。守桥部队立即炸毁惠通桥，“轰隆”一声，整座惠通桥坠入江中，连桥上的汽车行人也掉入江中，车毁人亡，凄惨万分。从郑天赐的记忆，时间是5月5日的中午。

惠通桥炸断了，郑天赐匆忙离开驾驶室，躲进山林中，等到天色已黑，才撬开汽车轮胎，用口吹气，与王亚十、李广东三人合抱这个“救生圈”横渡怒江。怒江水流湍急，冰冷刺骨，底下还有漩涡，三人冻得浑身打颤，直起鸡皮疙瘩，大约漂了近一小时，才登上对面沙滩上，已经精疲力尽了。

郑天赐三人泅水过来，又急忙爬山上了公路，走了一程，到了“老鲁田”，对岸日军阵地开炮过来，好危险，郑天赐他们只好绕过这段路。原来此处地形呈一U字形大弯，从惠通桥至老鲁田相距数公里，敌人在腊勐山炮击桥东岸并封锁老鲁田西边的一个拐弯处公路，只要弯内的车一露头，炮就打过来了，致使挤在弯内的汽车无法通过这一封锁线。郑天赐三人好不容易绕过这段路，在路边看到一辆军车，驾驶兵已被打死，就拉开那个死者，发动一下，车子还可以开。便开着车子朝昆明撤退。半路上，有一宪兵连长拦车，将他从缅甸带来的一个部属让郑天赐载回昆明。郑天赐向那人开了一张证明，便于路上通行，就将车子开回昆明黄土坡。交车之后，有关当局竟对南侨机工撒手不管，至此，大家就莫明其妙地失业了。

现居住在厦门的退休驾驶员庄霖助，是福建南侨机工幸存者之一。他原籍惠安，1920年出生在马来亚槟城的一个华侨家庭。在他读小学时，父母因事回国，他被安顿到槟城大姐家中。小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工厂学修车。出师后，当了汽车驾驶员。在当时，司机的待遇较高，月薪足够维持小康生活水平。“七·七”事变后，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降临祖国大地。庄霖助身居海外，深知华侨与祖国的依存关系，深感一旦祖国被日寇灭亡，华侨将一个个成为海外孤儿。激于爱国义愤，17岁的庄霖助积极参加槟城筹赈会的工作，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并参加青年歌咏队，上街义演、卖花筹赈，以激昂的抗日救亡歌声，唤起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时隔半个世纪之后，当笔者专程前往录音采访之时，他追忆难忘的往事，竟情不自禁地唱起悲壮的抗战歌曲来！

1939年，滇缅公路建成之后，急需大量驾驶人才，陈嘉庚先生发出爱国号召，立即得到南洋华侨青年的热烈响应。按规定应20岁才符合条件，而瞒着家人前往报名的庄霖助年仅19岁，他便多报了一岁。经过体检、驾驶考核并办好一切手续之后，直到回国前夜他才悄悄告诉大姐。这可把姐姐急哭了，因为父母回唐山时，就把他托给姐姐照料。姐姐培养他上学读书，又帮他谋到司机职业，正期待他好好工作，成家立业，可现在却突然要回国参战，此去安危未卜，当姐姐的实在不放心。可是庄霖助认为，国难当头，眼看祖国军事运输正急需熟练的司机，自己又具有这项特长，理应回国报效。姐姐被他的爱国热情感动了，只好同意，并连夜帮他整理行装，但附加一个条件：抗战一胜利立即回南洋。

启程前，槟城回国机工队受到各界侨胞的热烈欢送，槟城筹赈会主席刘玉水（惠安籍）发表讲话，筹赈会总干事、汽车司机公会主席庄明理（泉州籍，解放后任全国侨联副主席）亲自授予南侨机工队旗。槟华抗敌后援会赠给庄霜助一面“为民先锋”的锦旗以及天赐他们幅绣着“杀敌光荣”、“为了祖国踏上征途”的绢绣。庄霖助至今仍珍藏一张当时的回国纪念照片，上面写着“槟城萍羽球队欢送回国抗日机工  民国廿八年七月五日。”

庄霖助一行在《再会吧，南洋！》的悲壮歌声中告别了亲人，从槟城乘轮船到新加坡，加入第八批回国机工队伍。在新加坡，陈嘉庚先生亲切地接见了全体机工，他用闽南方言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鼓励华侨机工回国后勇敢战斗，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这给每位回国机工以莫大的鼓舞。

第八批回国机工队伍计330多人，乘“丰庆轮”先到西贡，然后转火车抵达昆明。经过军训之后，1939年10月，庄霖助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15大队第45中队。当时大队部设在广西凭祥，而中队部则设在镇南关的一个寺庙里。南侨机工车队主要任务是从安南的谅山、同登运汽油等军用物资至南宁、柳州前线，从国内则运出桐油等。该运输线山路崎岖，且时常遭敌机突袭，沿途处处是险境。

1939年11月14日，庄霖助从安南运军火至广西龙州，回途车子被敌机炸坏了，等了好久才搭上同大队华侨机工李则权的车子回队。由于路基不固，加上雨天路滑，在一急转弯翻了车，庄霖助头部被撞伤流血，右手肘部，李则权也受重伤。幸亏后面车队战友及时抢救，分队长林己茂（厦门籍南侨机工）连夜开车送往南宁美国教会医院治疗。三天之后，庄霖助虽然脱了险，但手臂崩折却接错了位，疼痛难熬。此时因战事吃紧，眼看南宁朝不保夕，美国医生考虑到日本人打过来后连自身也难保，只好让庄霖助裹着绷带匆匆出院离开南宁。南侨机工林己茂平素喜欢摄影，这一天还特地为庄霖助抢拍了一张断臂挂着绷带的纪念照片，上面写着“翻车后第四天，1939年11月17日摄于南宁”。庄霖助从南宁撤至柳州，住进一位民间武林高手的诊所治疗，断臂很快就接正了。没过几天，便传来南宁沦陷的消息。

1940年春，庄霖助伤愈后，立即去找车队，可是原来的车队因南宁、昆仑关、武鸣等地失守而退入安南境内的高平，另组成特别大队。他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大队部，随即投入抢运经安南转口的各式汽车及军用物资，主要路线是由海防运进广西的靖西、东兰、河池一带，然后转运至国内各地。日寇占领海防后，该路被切断，特别大队撤回国内。经过重新整编，1940年7月，庄霖助被编入“华侨先锋第二大队”，开赴滇缅公路。“华侨先锋大队”两个大队的大卡车全是由海外华侨赠送的，装备新士气旺，成为滇缅公路军运线的一支生力军。此时，恰逢陈嘉庚先生率领“南侨慰劳团”到滇缅公路慰问，陈老先生亲切勉励南侨机工坚持到底。庄霖助作为华侨机工代表，还当面向陈嘉庚先生表示，南侨机工一定不辜负海外父老的殷切期望，坚持抗战到底，为华侨争光，为祖国争光。

南侨机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据庄霖助回忆，当年战斗在滇缅公路的南侨机工，每个人都必须闯过种种难关，他曾亲睹许多机工战友或因险路翻车而牺牲，或因瘴疟侵袭而病逝，或因敌机突袭而殉职。庄霖助本人虽以娴熟的驾驶技术闯过一个又一个的险阻难关，但因过度劳累而患了严重胃病，却仍咬牙坚持着。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寇入侵缅甸，按照中英协议，中国派远征军入缅作战。庄霖助奉命在运送远征军入缅的途中，因胃出血而被送回昆明惠滇医院治疗。不久，远征军战事失利，日寇沿滇缅公路攻至惠通桥，中国守军自炸此桥，以阻抑日军的进犯。

据不完全统计，自1939至1942年的三年中，滇缅公路运输军需品和其他物资共计45万多吨，即平均每日的军事物资输入量达300吨以上，可见南侨机工在抗战运输线上的贡献是巨大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惠通桥炸断后，中缅运输局（原西南运输处）竟对南侨机工撒手不管，除留用一小部分外，其余均放任自流。庄霖助从昆明医院出来后，原来南侨机工车队已解散了，幸遇一位在华侨中学读书的好友，便一起到侨中继续读书。后来，侨中亦遭到突袭，他又失学了，在抗战后期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与许多华侨机工到处颠沛流离，直到抗战结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庄霖助回到厦门市立医院开救护车。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2年被选为厦门市公路运输工会主席，同年被选为厦门第二届人大代表。1954年，他响应政府的号召，赴云南参加支援边疆运输，在沾益汽车站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8年转到同安县汽车队后，这位当年抗日南侨机工就一直默默地奉献，直至八十年代才退休。

庄霖助退休后，为解决居住厦门的危楼搬迁之事，以一个老南侨机工的名义写了一封信，托我转交给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共存先生，很快得到陈先生的复信。陈共存先生1988年特地致函厦门统战部，指出：“庄老先生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响应‘南侨总会’征募机工回国参加抗战的呼吁，为爱国热情所驱使，甘冒生命危险从事抗战物资运输工作……他所提出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希望贵单位在可能范围内给予协助，解决他的困难，是所企盼。”在福建省和厦门市侨务部门及统战部的大力支持下，1990年，庄霖助的搬迁得到了落实，照顾搬进一套新房，地址就在华侨博物院旁边。现在，庄霖助正安度幸福的晚年。

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滇缅公路新开辟通车之际，三千多华侨热血青年响应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毅然抛弃海外安逸的生活，奔赴祖国大西南烽火漫天的抗战疆场，为抗日救国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他们当中，有一些是来自陈嘉庚先生家乡或陈嘉庚公司的人员，现居便设一在集美郊区后溪乡的李荣竹，就是当年积级响应号召起表率作用的南侨机工幸存者之一。不久前，笔者在陈嘉庚故乡采访了这位默默奉献的古稀老人。

李荣竹出生于同安潘土村，今属集美郊区，自小就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小学读书。1928年前往新加坡，起初在陈嘉庚创办的橡胶制造厂当学徒，后来转学开车，当了驾驶员。由于他性情敦厚，刻苦耐劳，勤奋上进，得到公司的赏识，屡被加薪，待遇优裕，过着小康生活。

抗战爆发之后，新加坡华侨在陈嘉庚先生及 “南侨总会”的领导下，迅速掀起抗日救国热潮。李荣竹居安思危，挂念着祖国抗战的命运，积极参加新加坡筹赈会的募捐活动，上街卖花义演，宣传抵制日货，并坚持捐出月薪的10%，集中交南侨筹赈总会汇回祖国，支援抗战。

1939年陈嘉庚先生发动和组织南侨机工回国服务，李荣竹便带头热烈响应。与李荣竹同为第五批回国的南侨机工计530多人，如今虽然时隔半个世纪，但他仍叫得出许多机工战友的名字：李亚三（与他同乡同厂）、林水咸（厦门籍，任领队）、刘志仁（厦门籍，今在云南）、陈武烈（今在泉州运输总站）、郑天赐（今在泉州运输总站）、邓文聪（南侨机工联谊会副理事长，今在云南）等。此外，他还记得同来自陈嘉庚先生故乡而先后回国的南侨机工：许成瑞（同安籍，任第二批机工团副总领队，已在抗战中牺牲了）、洪华民（同安籍，今在四川宜宾）、林己茂（厦门籍，战后留居成都，已逝）、陈友国（原籍集美，第九批回国机工，战后复员返新加坡）等。

据李荣竹回忆，当时由南侨总会统一组织的南侨机工共有三千多人，先后分九批回国，经过昆明集中军训之后，便陆续编队调往各个战区从事抗战运输工作。南侨机工先被编为西南运输处第11、12、13、14等大队，后来，又专门组建了“华侨先锋运输大队”（分为第一、第二大队）。此外，有的则混编于第1、3、5、9、15大队当中。车队均按“三三制”编队，即三班为一分队，三分队为一中队，三中队（外加一个补充中队）为一大队。每一个大队约有200多人，配备150多辆卡车。南侨机工的车队，组织军事化，纪律严明，被誉为“抗战运输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

李荣竹经昆明军训考试合格之后，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14大队14补充中队任驾驶兵，奔赴滇缅公路抢运军火。初到滇缅公路，使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该路之险要，令人咋舌。滇缅公路横跨横断山脉，途中高山峻岭，迂回重叠，连绵延布，其海拔高达三、四千米，而低谷则深五、六百米。两峰之间相望近在咫尺，而汽车盘旋上下要花大半天。车队盘旋上山巅，只见层峰叠嶂，云雾迷蒙，一侧悬崖峭壁，一侧深谷大川，沿途陡坡急弯，令人迟迟动魄。在这条路上抢运军火，随时随处都有翻车的危险。李荣竹曾亲眼看到许多南侨机工战友车毁人亡的惨景。但是，为了抗日救国，大家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再陡再险也难不倒。为了战胜险路关，南侨机工想出许多办法，譬如最陡处上不去时，后面车的司机便下车用垫术垫住后轮，然后继续往上爬。又如上下陡坡又碰上急转弯的窄路，他们就在急转弯处架上渡板，前轮过后，后轮靠外边的轮子正好可以从渡板上滚过，避免后轮悬空翻车的惨剧。

由于滇缅公路这一条国际运输线不断为中国抗战“输血”，因此被日寇视为“眼中钉”，出动大量飞机重点轰炸功果桥及惠通桥，企图扼断咽喉。有一次，李荣竹开车到功果桥，目睹日机轮番俯冲轰炸，江面水柱冲天，桥面被炸断了，但南侨机工却用汽油桶扎成大浮筏，用钢丝拉到西岸，冒险将满载军火的车队运过江，日夜不停，保持这条军运大动脉的畅通无阻。

李荣竹与南侨机工战友们在滇缅公路出生入死，出色地完成抢运任务，曾受到上级的嘉奖。他至今仍珍藏一份民国三十年（1941）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汽车运输第十四大队奖状（奖字第037号），上面有孙中山先生的肖像，两边是孙先生的题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奖状内容为：“查本大队第十四补充中队驾驶士李荣竹，品技兼优，服务勤谨，应予发给奖状，以资鼓励，此状。发给李荣竹。大队长陆绍康、大队副冯翠富。中华民国三十年一月一日。

抗日战争结束后，南侨机工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李荣竹复员南返新加坡，受到陈嘉庚先生及海外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陈嘉庚先生赞誉他们为祖国争了气，为华侨争了光。

1948年，李荣竹再次回国，在老家定居。1949年，他在家乡积极参加解放战争的支前工作，荣立三等功，1950年福建军区给他颁发奖状，同时，还荣获“支前光荣证”。1959年，李荣竹参加杏林建委材料运输工作，任驾驶员。1961年下放回家参加劳动。1986年，我国政府特制定新政策，照顾南侨机工享受100%退休金的待遇。目前，李荣竹在家幸福地安度晚年。

在纪念南侨机工回国抗战50周年（1939 - 1989）前夕，笔者在莆田县侨联访问了原马来亚新山南侨机工余汉洲。他是1939年参加第九批机工团赴滇缅公路服务的，战后复员南返。50年代回来参加祖国建设，长期从事侨联工作，直至1978年退休在家。余汉洲回忆录，为我们编写南侨机工史提供了一份较为详细的史料。

余汉洲于1913年出生在莆田山区一个小村庄，因其父患病未能下田劳动，靠母亲辛勤操劳，难于维持生活。5个姐妹不得不先后送给人家，4个兄弟最后也留不住，不得不将最小的弟弟送人。余汉洲只念了三年私塾，因生活困难，便跟人学制棕衣手艺，18岁时到涵江一家客栈当杂工。21岁时（1934年），他向亲友借了路费，前往南洋投靠二哥。他二哥是早几年到马来亚的，在柔佛新山开一间理发店。他由二哥介绍，找了修补车胎的工作。不久，他跟朋友学开车，考取驾照之后，生活开始好转起来，能汇款接济家用。

经过几年的辛勤积累，正当他准备与朋友合股做生意时，不料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激起海外华侨的极大义愤，抗日救亡活动搞得热火朝天。余汉洲也热心参加卖花募捐等爱国活动，并且愿捐出工资的一部分，统一交由南侨总会汇回祖国。

到了1939年，抗战进入危急关头，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急需大量司机，陈嘉庚先生登报号召南侨机工回国服务。余汉洲看到好几批华侨青年参加机工团回国的动人情景，也产生报名回国的念头。可是，他又想到自己是借路费南来的，如今有了司机职业，安稳舒适的好日子才刚开始，还可以经常汇款帮助家用。回国要吃苦，甚至流血牺牲。他思想斗争确实很激烈。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当他看到报纸上刊登日军侵华暴行，得知祖国同胞遭受蹂躏，他再也按捺不住对日寇愤怒的心情，便下定决心报名回国。

余汉洲拿定主意后，便到柔佛振林山黄梨厂找当地筹赈会报名。但按规定还要商店担保。他因原来拟办的合伙商店还未开张，第一次未能报上名。于是，他回来找一个朋友介绍请振林山振兴食品公司作担保，由该公司老板带去办理报名手续。接下来，他们集中在黄梨厂进行训练，不久，全体到新山医院进行体检。

体检一关一关顺利通过了，可是，最后一位医生却突然通知余汉洲留下，其余的先回去。这使他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妙，于是忐忑不安地望着医生。医生问：“家里还有兄弟吗？你为什么要回国？”余答：“兄弟有三个，我属老三，回国为了抗日救国，虽然有危险，但家中有兄弟，没有关系！”医生听后，高兴地说：“好，有志气，你合格了，让你回去救国吧！”说着，又从裤袋中掏出一封信来说：“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余汉洲觉得奇妙，走出门口就打开一看，原来是二哥余玉清写的，目的就是阻止他回国。二哥早几年来南洋，赤手空拳谋生不易，如今已开了一间不小的理发店，他曾多次劝弟弟不要回国，希望弟弟珍惜时机多赚些钱寄回家赡养父母，做个孝顺儿子。可是余汉洲偏偏听不入耳，故写信请求医生留人。信是这样写的：

“医生：我只要求您说一句话就好，余汉洲体检不合格，不能参加回国，附上二百叻币给您吃茶，谢谢！余汉洲之兄弟托！”

当天晚上，余汉洲带这封信及二百叻币去找二哥，讲明回国的决心，至此，二哥亦不再强留了，只是抱着弟弟大哭一场，然后交代今后应自己保重，抗战胜利应及早回来。

告辞了二哥，余汉洲等一行集中在振林山黄梨厂待命，等待南侨总会通知返国日期。他们这一小队，选出队长陈友国（原籍同安集美），副总长陈聪明（同安籍），队员是李祥发、陈仁坛、林兆坤等20多人。

余汉洲等一行由新山到新加坡统一编入第九批南侨机工回国队伍。这批人数最多，达500多人。1939年8月14日，他们由新加坡启程，数天之后抵达昆明。

余汉洲刚到昆明西南运输处训练所，感到很不习惯。首先是伙食差，但华侨机工回国不是为了享受，这还比较容易克服;其次，觉得军训内容枯燥无味，机械死板，华侨机工普遍反映，回国参加军事运输，只要能熟练驾驶及维修就行了，不必那么呆板地操练;此外，还有打架的问题，机工曾与昆明军校的学生在街上因口角而发生过几次斗殴事件。

1939年12月训练结束后，余汉洲分配到第5大队13中队当班长。当时第五大队运输路线主要从昆明到贵州、湖南、广西等地，运载的都是抗战军用物资。敌机时常在上空盘旋扫射，曾有一个时期，白天不能开车，改在傍晚出发，第二天早上又停车，只靠夜间抢运。

有一天，余汉洲出车到贵阳运桐油，车开出桐油站三公里处，突遇敌机突袭，汽车后门板被射穿了十几个洞，幸亏人未受伤。还有一次十分惊险：余汉洲一组三车由毕节装军用棉衣回昆明大坂桥附近，敌机扔个炸弹在车边爆炸，车被气浪震翻到公路边水沟里，余汉洲与莆田老乡林亚田都落入沟中，浑身都是泥土，汽车报废了。

在滇缅公路上抢运，几乎每一个华侨机工都有一段出生入死的传奇经历，余汉洲也是这样。他除了自己亲身经历之外，还有许多亲眼目睹的惨剧：

第12大队的新加坡南侨机工杨金清，原籍莆田大洋乡。1941年由保山开车来昆明，停车在西站修理，因紧急警报由车场开出避突袭时，在西山公路急转弯处撞车死亡，遗体由西南运输处就地埋葬。

第5大队补充队有个新加坡南侨机工，土名叫黄番仔，亦是莆田籍。1941年5月间由贵州运钨沙出发，车经贵州与云南交界的地方，被云南平彝弯检查站哨兵开枪打伤，因流血过多无人抢救而死亡。经第5大队13中队发现，报告大队派人去处理，结果只好就地掩埋。

12大队的新加坡机工陈玉蕊，也是莆田人。1942年4月间，由下关出发去缅甸八莫抢运汽油回国，因该路是单程线窄路，从八莫开夜车的途中不幸翻车，掉入深谷，连车带人不见踪影，加上天黑无法抢救，连遗体也无法收拾。

后来，西南运输处改为中缅运输局，下关第二大队的新加坡机工方九十，原籍福清，1943年12月间，由下关出发往贵州毕节，经过“替天高”险路时，翻车身亡，大队部派人前往收尸就地埋葬……仅余汉洲记忆所及，车毁人亡的南侨机工，现在还得叫出名字的有十几个人，还有更多的是已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他们都是为抗日救国而英勇献身的无名英雄！历史是不会将他们遗忘的！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还有一位新加坡南侨机工陈亚清，祖籍莆田，属第9大队。有一次由保山出发到腊戍武器返回，行驶至惠通桥边，不幸由半山翻入深谷，幸而及时发现，经抢救头部缝了21针，从死神那里夺回了一条命，这可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战后他留在云南，直至不久前逝世。

1942年5月由于日寇入侵，滇缅公路切断了，余汉洲与广大南侨机工一样，度过一段最困难的时期……

后来进入滇西收复失地的反攻战斗中，南侨机工继续投入运输工作。1943年底，重庆派卫立煌为总司令负责滇缅反攻指挥，南侨机工又归入十一集团军统一领导，负责协助运兵员、武器奔往前线。在紧张的松山反击战中，余汉洲曾连续十几天日夜抢运。夜里没有机会睡在床上，只好在驾驶室打盹。有一次，余汉洲的车出故障，暂停放在保山修理，搭别人的车回下关队部，在离保山30公里处，因车开太快而转弯翻入路边，四轮朝天，他的脚受了伤。幸好治疗及时，康复后能继续开车。

1945年8月，余汉洲出车到昆明，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车子交昆明中缅车场，便到昆明华侨互助会，准备等候办理复员手续。但是好事多磨，复员工作被拖了一年多，经陈嘉庚先生在海外奔走呼号，国内机工选代表多次到重庆交涉，最后才办理复员手续。

余汉洲参加第一批复员机工，由昆明出发，取道贵州，经广西到广州，然后乘火车到香港，经乘轮船经安南抵新加坡。在新加坡登岸时，受到华侨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不久，南返的机工在陈嘉庚先生的关心与支持下，正式组织建立“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余汉洲作为首批基本会员，担任该会交际职务，积极奔走为复员机工谋福利。此时，他还参加兴安会馆、司机工会、柔佛州理发总会等各种社团的活动。为了开展各地交际工作的方便，他开着一辆小轿车四出活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们在海外联络各界人士热烈庆祝，并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50年代初，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引起世界的关注，更给海外华侨以巨大的鼓舞。祖国，象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无数海外赤子回归到她的怀抱。一批批青年学生回国升学，一批批科学家、技术人才从世界各地冲破重重封锁回国报效。余汉洲亦决心回国，继续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55年3月22日，余汉洲启程回国。回国之前，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写了四封信由他带回。一封致北京中侨委，一封致陈嘉庚先生，另外二封分别给汕头海关及莆田侨委会。其中致陈先生的信，是全体南侨机工职员写的，拟组织发动一批海外华侨技术人员回国为建设新中国服务。

船到汕头，边防部队派人前来，余汉洲取出致北京中任委和陈嘉庚先生的信，他们立即与北京通电话，得知陈先生近日在福建集美，便送余汉洲到集美。

余汉洲到集美见到了陈嘉庚先生。陈先生说，海外拟组织南侨机工等技术人员回国参加工作，现时对这批人不大适宜，因这批人年纪都大了，解放军队伍是十八至廿五六岁的年轻人。他叫汉洲写信给南洋，不要组织机工回国，理由介绍给他们听就可以。陈嘉庚先生又问：“你要回南洋，还是要留下？”余汉洲说，要留下来工作。陈老先生便对他说：“好，你先回去休息，今后本地政府会通知你的。”

余汉洲回国后，定居在故乡莆田，1955年7月间，他到县政协报到，担任华侨组工作，并任莆田华侨新村筹委会委员，省华侨投资募股委员会委员、莆田华侨投资募股委员会委员。莆田县侨联会选他为华侨代表，连任华侨代表至今，又当选为历届侨联委员，并选为第一、二届政协委员。1970年10月，余汉洲调到县干部招待所，直至1978年退休。

当回忆起当年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经历，余汉洲老人感慨地说：“我响应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参加机工团回国抗战，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现在回忆起来，可以说青春无悔。最近政府又专门下文照顾南侨机工享受100%退休金待遇，还在云南建立南侨机工纪念碑，这不仅使我们这些幸存者心满意足，而且更可以告慰那些已逝的南侨机工无名英雄的在天之灵了！”

现居诏安县梅岭乡玄钟村年近八旬的张章胜，是目前国内唯一幸存的砂拉越南侨机工。他6岁之时随母亲到砂朥越，少时即进华文学校读书，课余则帮家庭收燕窝。小学毕业后到美里坡“亚细亚煤油公司”学开汽车。经过磨炼，不论是驾驶技术，还是机修都很熟练。1939年，陈嘉庚先生代表南侨总会登报招募华侨机工回国服务的消息在南洋华侨社会中激起冲天巨瀾。张章胜与一群热血华侨青年热烈响应，认为国难当头，正是报效祖国的时机，理应将自己的技术专长为国效劳，于是下决心报名。为避免家庭的阻挠，他索性不告知父母，悄悄地跑到古晋坡姑妈家中，打听到设在轮渡码头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报名处”，然后改名为“张志强”报名应征。他走后，家人不知其下落，直到1957年夏，才知他尚在人间！

报名的第二天拂晓，张章胜举着一面题着“华侨抗日回国服务团”的大旗来到码头，与方亚力等16名应征者一起登船赴新加坡集合。几天后，等候马六甲、爪哇等地的人员到齐后，才启航回国，当时全队计117人，组成第七批回国机工队伍，领队是广东惠阳籍的廖萍。队员当中印象较深的有现留居福建龙岩的黄礼归等。

张章胜一行到达昆明后，在潘家湾训练所仅受训十余日，即转到贵州唐家培训近半年。他编入“后方勤务部辎重第三团第三营第八连”，驾驶一辆二吨半的福特牌卡车，车号为：19445。八连是个“华侨连”，人员主要由南侨机工组成。他们奉命开赴滇缅公路及各个战区从事军事运输。张章胜还参加了许多重大战役，如南宁之战，昆仑关之战等，他与战友们一起冒着枪林弹雨为前线运输弹药和军粮等，为抗日战争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1940年，陈嘉庚先生率“南侨慰劳团”回国慰问抗日将士，张章胜作为机工代表在柳州晤见了陈嘉庚先生。陈先生代表南侨总会向劳苦功高的机工致以亲切的问候。当陈先生听到南侨总会送给机工们的一批慰问物品（每位机工可得九件）被某些贪官污吏鲸吞时异常气愤。

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切断之后，张章胜与同营机工陈玉水（星州一富翁之子）就流落在江西会昌一带，数月之后又辗转到湖南衡阳、广东韶关、广西桂林。在桂林五华山，他拜访了宗亲张贞（诏安人，时任军委会战区风纪第四巡察团上将主任委员），汇报了回国为抗战服务的详情，得到嘉许。由于张贞的介绍，他被安排在桂林“江南盐务联运处”开车，后来该处改设在江西赣州，即随之抵赣。因其技术高超，他特别被安排为处长宋毅华（福州人）驾驶福特牌小轿车。抗战胜利后，“江南盐务联运处”撤销，张章胜再度失业，只好到处替人临时开车。最后辗转回到诏安老家。

张章胜当年甘愿舍弃海外优裕的生活条件，回国参战，是广大侨胞为抗日战争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历史见证人。

抗战期间，正当祖国处于最危急的生死存亡的关头，数千名南侨机工毅然抛弃海外安逸舒适的生活，奔赴祖国烽火弥漫的抗日疆场，在华侨史上谱写出一曲曲气壮山河的篇章。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中，竟然有女扮男装被誉为“当代花木兰”的巾帼英雄，李月美便是其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真实历史人物之一。

李月美已于“文革”动乱中的1968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1979年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笔者于李月美逝世20周年之后的阳春三月，前往广东英德华侨农场采访她的几位女儿，承蒙提供第一手资料及珍贵的历史照片，谨以此文献给这位“当代花木兰”的在天之灵！

李月美，又名李月眉，1918年生于马来亚槟城一个华侨家庭，原籍广东台山。父亲李荣基，是一名华侨商人，为人豪爽正直。母亲梁凤蝉，善良贤惠。李月美兄弟姐妹计九人：锦伦、锦全、月明、月美、锦容、锦和、锦圆、月琴、月平，她居第四。

李月美自幼在当地华侨学校读书，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文学习成绩优异，幼小的心灵向往祖国。随着岁月的递增，她长成一米七十多的高个子，象个英俊的小伙子。她的社会活动能力较强，兴趣广泛，尤其喜爱文娱体育，能歌善舞，吹口琴、弹吉它，样样拿手;更爱好游泳、打球、骑马、赛自行车，还学会开汽车。正因为她会驾驶汽车，参加了机工团回国，奋战在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线上，乃谱写出名闻海内外的传奇故事。

“七·七”卢沟桥的枪声，宣告祖国全面抗战的开始，亦震惊了海外华侨的心。战争初开，日寇咄咄逼人，长驱直入，祖国的锦绣河山大片沦陷，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难，侨居海外的炎黄子孙，忧心如焚。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李月美和同学们热血沸腾，积极行动起来，组织宣传队进行义演，上街卖花，抵制日货，还组织女蓝球赛，将募捐到的款项交给筹赈会，支援祖国抗日救亡。

随着战局的发展变化，1938年底，广州沦陷，香港通道被阻，积存在港的大批军火，除部分改由安南运入广西外，大部分移往仰光，准备由刚建成的滇缅公路运入云南。但当时国内驾驶人员奇缺，因此，西南运输处致电向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求援。陈先生急祖国之所急，立即以南侨总会名义发出通告，号召华侨青年回国服务。南洋广大华侨青年闻风而动，踊跃报名参加，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潮。

李月美被这股爱国热潮所鼓舞，也兴致勃勃地前往筹赈会报名，却被拒绝，原来不招收女机工。怎么办呢？难道女人就报国无门吗？李月美心里不服气。她想起在华侨学校读到的中国古代“木兰从军”的历史故事，自古就有女扮男装上战场的巾帼英雄，千古流芳，难道不正值得后人效法吗？

终有一天，李月美瞒着家中父母，穿上弟弟李锦容的衣服，到一个不熟悉的埠头报名应征。她的体魄和声门，她对于运动的嗜好和泼辣个性，谁也没觉察到这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女侨工。

她终于以一个中华铁血男儿的身份，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回到了苦难深重的祖国来。

李月美没有把回国的事告诉家人。为了祖国的亿万人不受倭寇凌辱，不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之苦，李月美将自己豁了出来，顾不得儿女情长了，横下一条心，悄悄离开家门，踏上抗日救国征途。

1939年2月，李月美一行经过海上几天几夜的颠簸，在安南上岸，又经过陆上几天几夜的颠簸，乘火车到达祖国大西南重镇——昆明。在昆明经受军训，被分配到总部设在贵州的“红十字会”当司机。李月美既有男子的粗犷，又有女子的精明；既有男子的豪爽，又有女子的细心，因此，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里，都没有让同伴怀疑到“他”是个女子。李月梅在感情深处，更以一个女性的全部温柔，表现在她所进行的救死扶伤的行动中。战场抢救伤病员，军运线上抢运医药、武器，到处都有她的足迹到处都有她的嗓音。在红十字会里，谁都认识“他”，赞扬“他”，但谁都没有想到，“他”竟然是女扮男装！

1940年某日，李月美因公在滇缅公路一急转弯处不慎翻车，身负重伤，脑部震荡。幸亏过路的南侨机工车队及时发现，海南籍南侨机工杨维铨奋力抢救，把她从压扁了的驾驶室中搭救出来，马不停蹄地送往医院急救。

杨维铨是个朴实的汉子，论个头，比李月美要矮一截。而当他人危急时，他奋不顾身地帮助别人，显得精力过人，神采奕奕。他与李月美素不相识，他救下李月美，又亲自送“他”入医院。救人救到底，他甚至留下来精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终于，李月美再也没能隐瞒自己的真相，她把自己的真相向这邂逅相逢、热心仗义的男子汉和盘托出，并要他为之保密。杨维铨满口答应下来，仍象小哥哥一样护理她，而且更加尽心尽力。

一个月后，李月美康复了，她对杨维铨的诚实和善良深有感触，也渐渐理解了他的真挚感情。他们这两个司机伴终于相爱了。当杨维铨带着还她“女儿装”的李月美来到队长面前，队长和南侨机工战友们无不称奇。这一段滇缅公路巧结的传奇姻缘，这一位花木兰式的巾帼女子，在海内外顿时被传为佳话。

星马报界曾以“当代花木兰”为题，详细加以渲染报道。

廖仲恺夫人、著名社会政治活动家何香凝女士为彰其爱国精神，特地题“巾帼英雄”四个大字，赠李月美作永久纪念。这面红绸锦旗，李月美一直珍藏在身边，视为至宝，（可惜在1966年红卫兵“大破四旧”狂潮中，被抄家至今而下落不明）。

从此李月美脱去军装，成为“白衣天使”。她以女性特有的温柔细心护理、照料为国负伤的抗日将士，以热情的歌声鼓舞大家的士气和斗志。凡是经她护理过的南侨机工伤病员，即使是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日，对笔者回忆此事之时仿佛就象昨天一样，记忆犹新。从一张保留下来的照片看，上面题的正是：“白衣天使李月美”。

李月美的弟弟李锦容，亦于1939年7月参加第八批机工服务团回国，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十五大队，在滇缅公路从事军运工作，姐弟有机会经常会聚一起。夫妻恩爱，姐弟重逢，那是李月美最幸福的岁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中国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亲身回国抗战的李月美姐弟，与幸存的南侨机工战友们，怀着无比欢乐的心情热烈庆祝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为表彰南侨机工赤子功勋，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特颁发了奖状，文为：“华侨机工李月美，热心爱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致勤劳，应予嘉奖……。”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也发给荣誉证明书，内容是：“兹证明：李月美于抗战期间，由南洋回国，在公路运输服务，颇著勤劳……”

1946年，李月美复员回到槟城。当年她乔装打扮不辞而别，曾使母亲老泪纵横。而今“花木兰”重着女装奏凯南返，全家团聚，欢天喜地。李月美特提议多拍几张照片。

战后复员与家人团聚之后，李月美便与丈夫杨维铨带着孩子定居缅甸，开设一间咖啡店。数年之间，她连续生了十个孩子，把精力倾注在培养孩子方面，忘不了对孩子进行中华文化教育，牢记华族之“根”。

李月美永远不会忘记，1954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缅甸时，李月美作为华侨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当缅甸侨团介绍她是当年女扮男装回国抗日的“花木兰”时，周总理连连称赞：“巾帼英雄！”周总理还语重心长地叮嘱：“要注意培养下一代，让孩子们到祖国读书吧！”李月美把总理的教导铭记在心，为此，她计划将孩子培养成为出色的翻译人员，为中缅文化交流和友谊贡献力量。于是，她有计划地开始实施培养子女学习中、英、缅多种文字。

1965年，李月美首先将四个较大的孩子（次女玲华、三女玲玉、长子善国、六女玲美）送到广州侨校补习。结果，善国和玲美双双考上北京外语学院。消息传至缅甸，李月美非常高兴，提出将家中另外四名小孩也送回国读书。

可是，在继续将子女送回国读书的问题上，李月美曾与丈夫发生了争执。杨维铨希望留几位在缅甸身边。而李月美则坚持全部送回国。最后，李月美说服了丈夫，并决定她本人带孩子全部回国定居，以培养子女读好书。1965年11月，李月美带着另四个小孩（七女玲莉、八女玲茜、九女玲薏和幼子善中）又回国了，只剩丈夫留在缅甸。

没有想到，李月美回国才几个月，即遇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被迅速地卷入漩涡。她初住广州，却很快被下放至山区英德华侨农场。

“文革”浩劫一开始，农场开始对归侨划分“成份”。以下是一次让她极为伤心的对话：

“工作组”：“李月美，你知道你在海外是什么成份？”

李：“不懂得。”

“那么你小时候是干什么的？是否给地主放牛？”

“我小时候在南洋读中国书，没有给地主放牛。”

“那么你小时候生活很好？”

“是的，我记得小时候生活很好。”

“那个时候（1949年以前）生活很好，肯定是资产阶级。”

“？”（李月美一愣，不懂如此“逻辑”，没有回答）

“你长大干什么？”

“我长大时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回国抗日，参加滇缅公路西南运输处军事运输和‘红十字会’工作。”

“西南运输处是国民党的，你知道吗？你是国民党残渣余孽！”

就这样，李月美被划为“资本家”成份，再扣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开始被勒令下田劳动改造。

下田劳动就下田劳动，李月美二话没说。可是，奇怪的是当时全国流行“政治评工分”，身强力壮的李月美拼命出工出力，出了十分力只能评五分工分，她想不通了。接下来，有人竟怀疑海外亲友寄来给八个孩子读书的钱是“特务经费”，迫得子女没权利读书，也得下田劳动，每天挣正常劳动力工分的1/4。海外经济来源断绝之后，李月美一家生活发生困难，孩子们正在长身体阶段，挣工分所得却填不饱肚子。为此，李月美写了一封信向周总理反映情况。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接到处于困境中的一位缅甸归侨的来信后，亲笔回信指示要加以解决。接到总理复信的李月美，这位一向具有男子汉坚毅性格的巾帼英雄，泪水湿透了枕巾。

有了总理的亲笔信，照理问题该好解决了。但令人遗憾的是，在那人妖颠倒的特定的历史年代，给总理写信反而成了李月美的罪名！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更大的灾难在后头等待着她！

造反派气势汹汹窜入住宅抄家了，所有海外带回的信件、书籍、南侨机工历史照片等，全部被搜去，连何香凝题的“巾帼英雄”红绸锦旗、周总理亲笔的信，也不例外。其中能证明“好人”身份的何香凝题词和周总理亲笔信则被弄得下落不明了;而穿着西南运输处南侨机工制服的照片，却又作为“坏人”的罪证。

迫害一步步升级。开始搞戴高帽游街示众了，每天强迫李月美敲锣游斗。所到之处，人们拳打脚踢，小将们高兴时随时揪着头发来回折腾。不多久，李月美的身体垮下来了。瘦得皮包骨头，再也经不起长期间的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残酷的折磨，她时常昏倒过去。李月美再也忍受不了，决心以一腔热血，为祖国人民也为自己所遭受的不公，作最后一次轰轰烈烈的抗争！

1968年8月28日深夜。

经过数月的政治喧嚣，疲惫了的批斗者和挨斗者已变得习以为常的时候，一个刚烈的女子，以最后的母爱环视睡熟中的八个子女，然后转身到隔壁窗口，朝着黑暗中的迷惑星光，举起一把镰刀，朝左右双手的动脉管猛割。殷红的血液流淌着，在一片血光中，她用滴血的双手捧着镰刀，把脖子对着镰刀猛扑，鲜血染红了镰刀和土地，她如此壮烈地、用自己一腔热血，对“文革”暴行进行最后一次反抗和示威！

她，就是这位1939年女扮男装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被誉为“当代花木兰”的巾帼英雄——李月美。

李月美死得真壮烈，死得象个不屈不挠的烈女英雄！

李月美壮烈牺牲了，她没有死在日寇的枪林弹雨之下，她没有死在异国他乡;她死在号称“最最革命”的人手里，她死在她梦寐以求的故国家乡;她热情如火地从异国他乡归来，没有想到得到的是如此归宿;这是一个无限执着的爱国“巾帼英雄”的悲剧！

李月美走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次日早晨，当孩子们醒来之际，被眼前的惨景惊呆了，哭声招致“专政队员”上门，在床头开了批斗会，勒令孩子们应与母亲划清界线，不能有一滴眼泪。

●人死不能复生，尸体总得埋葬。“专政队员”就地召集了正在农场劳动改造的省侨委的几位“牛鬼蛇神”，在茶场后山随便挖一个坑，用缅甸带回的那件尼龙蚊帐裹着草草埋葬。

●李月美死后，殃及子女，定量口粮早已吃光了，自留地种的一些菜又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去了。孩子们走投无路，从墙角边捡起抄家时遗漏的一张信封，上面写着父亲老家的地址：“海南岛琼海县福田公社埠头大队。”于是，在一个深夜，八个孩子悄悄向母亲坟墓最后磕了头，抄山路步行几十公里到英德县城，因无钱剩车，只得继续步行，饿了就咬几口辣椒配路边的凉水，经几天跋涉，来到广州车站，准备投奔海南故乡。

在汽车站，最小的孩子善中手持信封向陌生人打听海南路途，幸亏遇上信封上所写地址的乡亲。这位乡亲听说过同乡杨维铨及李月美的名字，就出车船费将八个孩子带回乡。

当地政府及众乡亲，伸出援助之手，安置了这群孩子。小的继续读书，大的则进厂或下田参加生产劳动。直到粉碎“四人帮”，才回来为母亲拾骸。

●物转星移，八年光阴过去了。1976年，孩子们来到英德农场后山，竟找不到母亲的坟墓。怎么办呢？经寻访当年下放农场的省侨办的“牛鬼蛇神”、现已官复原职的老同志，在他们的指点下，才挖出李月美的骨骸，还认得那件包裹着的尼龙蚊帐是1965年由缅甸带回的，因而确证无误。

●1979年10月23日，中共英德华侨茶场委员会，召开了为李月美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大会（见图71）。平反通知书全文（见图72）如下：

**《关于为李月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

**1966年我场四清运动后期，亦即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在归侨中全面进行评划阶级成份，李月眉同志被划为资本家，并扣上了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为了拨乱反正，全面落实党的侨务政策，根据英德县革命委员会（1978）第197号《关于取消原驻英德华侨农场四清工作分团结归侨评划阶级成份的通知》精神，现决定：**

**一、公开为李月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二、强加于李月眉同志的所谓“资本家”、“国民党残渣余孽”应予推倒，有关评划归侨阶级成份的材料应予销毁。**

**三、通知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和有关亲友所在单位，消除影响。原发出的有关材料应予收回销毁。**

**四、李月眉同志因以上原因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廿八日被迫害致死，已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廿三日召开追悼会。**

**中共英德华侨茶场委员会（公章）**

**一九七九年十月廿四日**

在广东陆丰，我循着友人提供的线索，寻访年愈八旬的南侨机工张光旺（又名张万森）。他参加第9批机工团回国，曾在滇缅公路翻车负了重伤，头破血流，右眼暴出，耳朵震聋。经抢救得以死里逃生。我起初猜测，这位负过重伤的老机工，或许已经迟钝，担心能否记得往事了。可是在访谈中，我惊奇地发现他记忆力非常好。他不仅能如数家珍地讲述当年回国参战的全过程，而且对一些重要事件的时间的回忆，能够精确到几时几刻。例如他回国的日期是1939年8月14日，早上6时在同济医院集中，10时全体507人出发到丹绒百葛四号码头登船，下午三时“丰庆轮”正式启航，8月23日抵昆明。对胜利复员这件事，他清楚记得他们第一批复员机工220人，连家属计421人，于1946年10月26日启程，12月3日回到新加坡，历时39天。这与我从云南档案馆查录的有关史料丝毫不差。我惊叹不已，一再表示敬佩。张老笑着说：“好记性不如勤笔头。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写日记。当年从回国参战到胜利复员南返的全过程，我都写在日记上。”他转身回卧室从箱子里取出一本珍藏半世纪的日记本。

这是一本泛黄的日记簿，从深浅不一的墨迹及断断续续的记录，可看出主人坚持写日记是费尽苦心的。尽管作者文化程度不高，但他记录真实，是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史迹佐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下面侧重摘录“回国参战历程”和“胜利复员南返经历”两段手稿，以飨读者。

**民国廿八年（1939）  八月十四日**

今天，我们五百余司机同志，全体早上六时正到同济医院集中，准备上船开往中国打日本（侵略者）。到了十时许，全体由同济医院出发，到丹绒百葛四号码头。老早就从人山人海的同胞兄弟姐妹等候着我们登船。一队一队登船。同胞们鼓掌欢送。同时，我们“青年抗敌后援会”到来一车同志，欢送并请我到码头摄影留念。在码头上，各位侨胞不愿散去，他们在码头上受太阳（曝晒）。下午三时正，“丰庆轮”将开了，欢送者唱起抗日歌曲，我们皆唱歌答谢。船开了，再会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万岁！万万岁！

**八月十五日  离星加坡的第一天**

下午七时许，本船因有人中毒身亡，情形未明，结果检查本船小贩（即水手），在厦门办有各色酒：三星酒、五加皮、玫瑰露、红米酒、白啤酒，当场查出（有问题）。全体司机同志气愤要打倒汉奸走狗，将小贩处包围，想将小贩丢落海。总领队追来，警笛一吹，将五种色酒交队长转给本船库房化验，然后本队即派纠察队维持，结果查清是日本制造毒酒。被毒死者送落海，事情由船主去办，然后将情形呈星加坡南侨主席办此案。

**八月十六日  第二天**

今天，我们就离开了可爱的马来亚，在船上顺风而漂。上午十时半，天色已变，大风大雨，船身摇动，物件乱翻。同志数百，同时没有一人晕船，皆是铁胆铜人。至十二时十五分，风波更厉害，但是大家都不害怕，一队一队唱歌、做游戏、吹口琴。直到下午二时，才得见风平浪静，只见海中凸出一片大山，海里鲨鱼游来游去，每条都有数十斤。过了好久，天将晚矣，大家准备安睡了。

**八月十七日  第三天**

上午一时，抵安南海，停泊一刻，马上查关，电船驶过来带路。早晨七时四十分抵安南岸。当地政府不许我们司机同志登陆，大家感到失望。我们总领队亲自到中国领事馆，请问当地政府是否许可我们登岸，得到答复：“登岸可以，但要住他们的机关，不准出街，若要上街，衣帽徽章要先交当地政府，要离开时才交给你们。”大家得知这一消息，一概不愿登岸。

**八月十八日  第四天**

丰庆轮仍停泊，本来今天要开往香港，因司机未有登岸不得离开。本早船主与总领队再到领事馆交涉准后，马上打电到河内，特请专列火车运送我们到云南省，结果下午三时十五分，我们一队一队登陆。经过检查关口查毕，中国旅行社派大罗里车送到火车站。而我们士乃队带来大帆布廿二张并药品一箱，被关口扣留，报告中国旅行社转由领事交涉矣。罗里车驶由安南街道经过，安南人穿的服装中国式，男女都穿长衣，没有领子，裤头是白的。言语安南话，口食藕菜，牙齿完全乌黑。车马均靠右边行驶，与新加坡不同。马路边全部种树，电车行铁轨，商店低矮。我们到达火车站时，安南华侨战地服务团派数十人来维持秩序，以免汉奸混入。旅行社送来供几百人食用的干粮，是订做的长面包，共余千条，罐头鱼二千余罐，中国茶叶数十罐。直至下午六时一刻，快车启动了。华侨战地服务团唱《全国总动员》的歌曲，高呼口号：“打倒日本东洋鬼子！中华民族万岁！”再会吧，我们专车前进矣！

**八月十九日  第五天**

火车开了一夜，今天上午五时半抵“芽庄车站”休息。八时又向前行进，此地山太多，又进三座暗洞才抵“大岭车站”，再过五座暗洞，十二时半，方到平原。此处一望无际皆是禾田，居民房屋皆是草盖的，或是一种风俗。又经“东作车站”，再过一座吊桥面，有三、四英里长，然后抵“浽和车站”。这个车站房屋商店都没有，只见四周都是铁道，没有停，继续前进，得见大山。火车进入暗洞经五分钟才出山洞口。下午五时抵达“瑶池车站”，此地的警察皆是穿中国装，脚打绑腿，穿黑鞋，头戴安南雨笠，背着长枪，立在车站旁。晚间十时五十分，火车又向云南方向前进矣。

**八月廿时  第六天**

今天我醒来时已六点廿五分了，连过二座铁吊桥，每座都有同新山（柔佛）一样长。七时三十五分到达了“土轮车站”，八时四十五分又到达一车站，增加一节车头（助推），过了一段危险山路之后，后面的火车头就撤下来了。十一时安抵“化化车站”，有粤南顺化救国会欢迎我们华侨青年司机，赠送“保卫祖国”的锦旗，并送中国茶、各种果品，鼓励上前线多杀敌。天气不景，下起毛毛雨，又穿过暗洞、铁桥……到了晚上八点，没有再记，各位同志安睡了。

**八月廿一日  第七天**

今天六十四十五分，我们的快车到达河内，转换火车又前进。天下着雨，附近有乡村，完全被水淹了，不过每家都有一小舟可以避灾。这一路低洼处，都是被水淹的。下午六时半到达“安沛车站”，站上很多热心华侨欢迎。站上有警察维持治安，一位安南警察写有法国文字给我们看，说要同我们回到中国去出力。想此警士明白中日战争的情形。忽然就快到十时半了，我们火车就要开了，他向我们告别、行礼。留在我的日记簿上的这行文字是法国文字（略），是在安沛车站警察写给我们的。意为：祝你们回到中国的时候要达到最后的胜利！再见，再见吧！

**八月廿日  第八天**

今天早上四时半到达河口的法国关口检查站，这边是法国国旗，那边是中国国旗。我们全体司机同志皆穿上军装，戴着军帽，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和走狗！”“我们的领土决不能丧失！”然后，火车分开二列，每列拖六节。早上九时半即开车，穿过许多山洞与急弯，下午四时才到达“芷村车站”。因前面的铁道山高路险，又增加一节火车头（助推），直到后边的路较好，接上的车头才撤下来。……下午六时十分，到达“大庄车站”，逗留一刻，又向前进。七时廿分到达“开远车站”，自大庄到开远经过十六个暗洞。火车停于开远站时，各位同志从未看过云南省的风光，都下车往市内游览。因抗战期间没有建设，街道商店不成样子，街道边都有种树木，不过一丈余高，街道两边非常阴凉。市内的东西百物高涨，但米酒不贵，因本处多出产粮食。忽然时间已到八时半，我们全体同志返火车安睡矣。

**八月廿三日  第九天**

早上七时由开远站动程。在车站边的居民房屋用竹木建的，外面以泥浆涂之，也是一特色。但此地的平民百姓穿着大都破烂，好比难民一样。我们见了，将面包从火车上掷下去给这些同胞，他们非常喜欢。接着，又经过“巡检司”车站、“拉里黑”车站、“西扯邑”车站、“盘溪”车站、“糯租”车站、“禄丰村”车站、“徐家渡”车站、“宜良”车站、“可保村”车站、“水塘”车站、“呈贡”车站，直到晚上八时正才到达昆明车站。从“巡检司”到昆明站，共入暗洞四十二个。到达昆明车站时，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派来很多大架罗里车，将我们送到潘家湾司机训练所。

自民国廿八年（1939）8月14日离星，23日抵滇，历时整九天。

**民国三十五年（1946）十月廿六日  胜利复员第一天**

今天是我们胜利复员的日子，第一批复员同志都到西站第四区车场集中。各机关长官、各团体欢送大旗甚多，整个车场都挤满了人，共数千人。八时开会，各长官训话及赠旗。十时完毕，马上开车由武成路经正义路、金碧路、拓东路向东站行进。下午六时抵马龙县，岗哨卫兵说：“曲靖有土匪，你们车子不要前进了。”我们立即交出“委令”，官长看见之后，马上派兵护送至曲靖县，幸平安无事，九时三刻抵曲靖矣。

**十月廿七日  第二天**

我们很早就起来，整理行装，上车待发。命令一到，车子就开，一路平安，下午四时抵达盘县。

**十月廿八日  第三天**

清早全体集中，因一位同志不小心，护照被茶房盗去。我们立即向当地追究，将老板扣留，令其将护照及证件交出来，然后继续向目的地前进。贵州境内下了很大的雨，大众都受了大雨之苦，下午五时多才安抵永宁镇。

**十月廿九日  第四天**

今天很早就起来，由永宁镇出发，抵达贵阳市三桥时，我们十二辆车子集中排队出发，浩浩荡荡由大街流行至车场。

**十月卅一日  第五天**

因有一辆车抛锚未到，大家就逗留贵阳市。伙食每餐要1000元，房租每晚1300元。

**十月卅一日  第六天**

我们六时起床，全体去参加大会。到会者万余人，贵州省主席杨森向我们全体赠旗：“为国为民”。十时多散会。下午一时半，由杨主席率领全体华侨机工到贵州市运动场、抗战门、胜利门等游览。在中小学大礼堂，杨主席向我们演说，并问及回来服务情形、经过，会毕全体合影。

**十一月一日  第七天**

今天全体向杨主席献旗，锦旗绣着：“惠我侨工”。杨主席说：“明天请你们看戏，太太小孩都带来。”

**十一月二日  第八天**

看戏的时间到了，同志们带太太小孩一起到新声大戏院。“贵阳市各界欢送侨工复员大会”由周市长主持，各界人士赠旗：“胜利荣归”。周市长演讲：“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能达到最后的胜利，运输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你们华侨同志担任运输抗战，辛苦八年，今天达到最后胜利，工作完毕，光荣南归矣。不过今天贵州省没有好好招待，请各位多多原谅吧。敬祝各位一路平安到达目的地。”会毕，立即演戏：《薛平贵征西》。十二时演毕散场，回旅馆交四天房租，共5200元。从昆明至贵阳计四天路程，在贵阳逗留四天，总计房租伙食50000元。

**十一月三日  第九天**

早上我们将行李搬至车场，十二辆车子排列甚齐，马上出发，下午六时到了马场平。

**十一月四日  第十天**

今天特别早，五时四十分由马场平动身，经过都匀县，那个地方日本鬼子到达过，变成焦地，十二分可怜。下午五时半到达南丹县。

**十一月五日  第十一天**

我们很早由南丹出发，天气很好，大家感到很舒服，梦中就到了宜山县。

**十一月六日  第十二天**

全体五时到车场，先派二辆到柳州通知救济总署，十辆随后，到达大塘查车站，要我们交现款养路费，否则扣留司机。我们华侨复员司机要找站长交涉，卫兵见我们动怒，马上提枪出来威胁。我们不服，发生冲突。结果，站长只好向各位说好话，放车通行。十时一刻抵达柳州城。

**十一月七日  第十三天**

今天到柳州“联合国救济总署”办手续及领路费，由柳州至梧州路程五天，每天发给国币1000元，共计5000元。

**十一月八日  第十四天**

当局又派新道奇车十二辆送我们，十时由柳州出发，下午六时到达宾阳。

**十一月九日  第十五天**

各位很早起床，大家心想赶快到达目的地，下午五时抵容县。

**十一月十日  第十六天**

天未亮四时许就开车出发，一路顺利，天气甚佳。下午三时半抵达龙圩县，在岭南大酒楼住宿。房租每天2500元，伙食每餐1200元，每天平均要花几千元才够矣。包一船去梧州，每位500元。

**十一月十一日  第十七天**

今天到“联总”办手续去广州及领路费，每天500元，三天共1500元。

**十一月十二日  第十八天**

天亮后，全体将行李搬至“珠江码头”，从第一至第十二队排列整齐，顺序搬上船，验关，下午三时才正式开船。

**十一月十三日  第十九天**

天未亮四时四十分船抵肇庆，停留一刻，继续航行。晚上十一时四十分安抵广州，仍未登岸。

**十一月十四日  第廿天**

早上七时许，全体登上同安码头。总领队及顾问先到联合国救济总署办理手续，直至下午二时派车来送我们到三元里村，即广州市私立中德中学，内设临时招待所。

**十一月十五日  第廿一天**

今天休息，因身体有病到广州取药及打针，仍未好。

……又连续停留四、五天，每天旅馆费3500元，连医治病用10余万元才愈矣。

**十一月廿二日  第廿八天**

今天七时三刻火车由广州开发，十一时一刻安抵九龙车站，验关后由电船送到香港海口，登丰庆轮前往南洋。

**十一月廿三日  第廿九天**

各位同志都在丰庆船上休息一天，因运南洋的货物未装完。

**十一月廿四日 第卅天**

在船上休息无事，登香港一游。下午未到三时马上返船，等待启航。想不到四时十分船头货仓发生火灾，英人消防船及时赶来，火灾马上被扑灭无事。六时正船开了，向安南水域前进。

……

经过三天，于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到达安南海口，停泊休息。

……

**十一月卅日  第卅六天**

我们的一位华侨机工同志在途中生病，医治不愈，抵安南时一命归西，结果交法医生开刀检查，办理安埋。他的名字叫——“陈荣”（第四批回国的雪兰莪南侨机工）。八年艰苦抗战他都坚持过来，可是南返与家人团聚只剩三天航程，却来不及了……

**十二月一日 第卅七天**

七时一刻船开至九十九湾，突然发生危险，方向盘铁链断了，船身转头，马上落锚停泊，换新铁链。修毕继续前进。出了安南港进入大海，大风大浪又起，二层舱窗皆吹入海水。复员机工同志们的家眷及小孩子，没有见过这种情形，叫苦连天。

**十二月二日  第卅八天**

今天天气好，风平浪静，机工同志与几天来被风浪吓坏的太太们，都起来看海景。早上七时许，得见星加坡海口。七时三刻抵港，停泊验关。

**十二月三日  第卅九天**

下午，船才泊丹绒百葛码头，天又下雨，前来码头迎接的有“华人机工工会”、“琼州会馆”、“三民主义青年团”、“男女服务队”等团体。总领队看见今天我们这些打不死的南侨机工回来了，在码头上欢迎的人很少，就将我们由昆明出发一路各机关团体赠送的锦旗挂在船上，忽然，观众越来越多，整个码头全满了……伍总领事亲身抵码头欢迎，脱帽向各位招手，登船慰问。然后，这批男女服务队帮助搬行李带小孩，用罗里车送到后港五条石亚答厝暂住，天色已晚矣。自十月二十六日由昆明出发，到达星加坡为十二月三日，计三十九天。

我们终于胜利复员南返了……

1940年10月的一天深夜，一辆救济车风风火火地由保山驶向惠通侨边。据车队报告，晚上九点多钟，有辆从腊戍满载汽油回来的卡车，未知何故而翻了车，车上两名南侨机工翻入山沟底。该救济车就是奉命前来找尸体的。

救护人员在现场发现，一位驾驶员脖子被玻璃割伤，因流血过多已经牺牲了，查看证件，死者邓丁元是从泰国回国服务的机工。另一位司机受重伤，右眼暴出，脑壳和头皮破裂，浑身冰冷，但还有一口气，查看证件是“第9大队第6中队班长张万森”，当即用毛毯包裹起来，连夜送往医院抢救。到达保山医院时，天快亮了，经紧急施行手术，暴出的右眼被装了回去，脑壳和头皮缝了好几针，但伤势严重，大小便不通，仍处于昏迷状态。

一星期之后，伤员才甦醒过来，睁开眼睛，发觉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只见医生和护士在晃动。向护士了解，才知道翻车的过程和抢救的情况，才知道是医护人员把他从死神夺了回来……

这位伤员原名张光旺，祖籍广东大埔。他14岁只身到马来亚谋生，后来在柔佛州士乃埠当裁缝师。抗战爆发之后，报上登载陈嘉庚先生号召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消息，他便与“青年抗敌后援会”的伙伴们一起去报名。可是，南侨总会要的是汽车司机，自己不懂开车，怎么办呢？他毅然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卖掉，买了汽油拜一位姓杨的师傅学开汽车。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突击训练，他终于学会了开车。为防止家人反对，他化名“张万森”，报名参加了柔团回国，赴滇缅公路服务。

1940年10月，滇缅公路被封锁了三个月之后重新开放，南侨机工立即投入紧张的大抢运。由于敌机日夜狂轰滥炸，晚上行车都不敢开灯。那天晚上，在惠通桥畔的险要地段，由于刹车出故障，而发生了本文开头那惊险的一幕……

为了进一步治疗，张万森被送往下关医院，住院达18个月之久，直至1942年仰光告急时，虽然伤未痊愈也只好出院回昆明。抗战胜利之后，张万森于1946年复员南返新加坡。1948年再次回国，定居于故乡大埔。从1958年起，他一直在陆丰华侨农场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自己的力量。

张光旺（万森）还是个业余摄影爱好者，他用那架老式照相机拍摄的数十张记录机工生涯的历史照片，仍珍藏至今。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当年抗日烽火岁月之中，他能够坚持写日记，忠诚地记录了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史实，为华侨抗战史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南朝是，陈国驸马徐德言因兵荒马乱与妻子乐昌公主各持一半铜镜而走散，后来凭着信物——两片破开的铜镜夫妻团聚，世称“破镜重圆”。这是一千多年前传奇式的故事，被历代传为佳话。在当代，也盛传着破镜重圆的真实传奇故事。它的主人公是王支峰和阿莲。

下面是南侨机工王支峰的录音记录：

我叫王云峰，1916年出生，今年70多岁了。青年时我参加第九批南侨机工回国抗战，起初主要在滇缅公路抢运抗战军火，1942年参加远征军到印度，在炮兵团服务。1945年回国，仍在炮兵团，1948年淮海战役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舟山群岛时，在金堂岛火线上入党，随后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抗美援朝，1952年复员回海南岛工作。文革期间被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惨遭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7年落实中央关于南侨机工政策，享受100%退休金待遇。

我的老家在海南岛琼海县一个乡村，家境中平，属于小康之家。1934年，我在家乡与阿莲结婚，次年生下一个男孩。我俩男耕女织，孝敬父母，一家过得和睦美满。我的家乡是侨乡，每年都有不少人出洋过番。20岁那年（1936），征得父母的同意，买了一张船票（100元光洋），离乡出国。

我告别了妻、儿，由海口搭船赴新加坡。在海上五、六天的航程中，首先碰上一场霍乱风波，差一点被丢入大海。原来初次离家出远门，家中硬给多带一些月饼，不知不觉中竟染上霍乱，吃了饼之后，又吐又泻。幸亏一位医生极力抢救，而同船中竟有人染上霍乱被抛入大海葬身鱼腹的。

到了新加坡，我首先学割橡胶，埋头苦干，经济收入还不错。不久，我积下一笔钱，打算过一段时间把阿莲及小孩也接来新加坡。

正策划着，却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侵华，烽火漫天，国家处于危急存亡关头。我虽安居海外，可是胸怀祖国，关心着抗战时局。我觉得，祖国一旦被灭亡，我们海外华侨就无脸见人，难以立身世界。因此，我积极参加筹赈分会的活动，上街卖花，参与义演，踊跃募捐，竭自己绵薄之力支援祖国的抗战。

1938年，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武汉、广州相继沦陷，中国海上对外交通被日寇封锁隔断，因此，新开辟的滇缅公路即成为战时最重要的国际运输线。当时国内网正缺少熟练司机和修理工，西南运输处向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求援。陈嘉庚先生立即号召华侨青年回国服务。南洋各地的华侨都积极响应。有一位海南籍的华侨王文松，是新加坡一家英国公司的工程师，月薪达200多元，亦自愿放弃优厚待遇，带动一批徒弟并将自备全套设备回国效力。我当时虽不会开车，但激于爱国主义热情，也前往筹赈会报名。可是，筹赈会要招的是能够从事抗战运输的司机，没有技术的不录用。第一次报名就失败了。难道报国无门吗？我不甘罢休，想立即学习驾车，争取机会投报祖国。

不久，海南岛沦陷的消息传来，我痛失梦中的河山，我怀念家乡的父母、妻儿及乡亲们，眼前呈现一片日寇的铁蹄下挣扎、呻吟的情景，我恨不得立即飞身回国参战，亲手痛歼敌寇，驱敌于国门之外。于是，我与几个好友，凑了一笔钱，合租了一辆小包车，到公园草场上学习驾驶。我们请了一个马来人当教练，大家轮流学开车。由于大家胸中燃着抗日烈火，憋足了劲头，争分夺妙，结果学得很快，收效大，短短时间大家都“出师”了。

学会了开车，我再去报名，经过体检，驾车考核，终于批准参加了南侨机工第九批回国服务团。

1939年8月，我们从新加坡启程，受到各界侨胞的热烈欢迎，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们乘“丰庆轮”，在海上航驶了三天三夜，经安南上岸，转火车到达昆明，进了西南运输处潘家湾训练所。

经过短期的军训，我被编入西南运输处第九大队，开赴滇缅公路，从事抗战军火的运输。当时的滇缅公路，可以称得上世界最惊险的运输线。道路盘旋于原始森林与陡峭山岩之中，坑洼不平，尘土飞扬;雨天山洪横溢，泥泞难行。南侨机工驾车稍一不慎，便车毁人亡。在滇缅公路的艰难历程，每一个华侨机工都有一段自己的难忘经历。我们车队要穿行“烟瘴之地”的原始森林，毒蚊横虐，有一次我被叮上了，随即发生严重的“寒热症”，幸亏战友们用“金鸡纳霜”及时抢救，才从死神那里夺回生命。

我真正的死里逃生应该是1942年5月——滇缅公路“大撤退”时的遭遇。当时，仰光已经沦陷，西南运输处尚有几百辆卡车，奉命日夜不停地向国内抢运大量积存在中转站腊戍的物资。在撤退途中，滇缅公路上人车混杂造成堵塞，南侨机工驾的车像蚂蚁在爬行，慢还不打紧，最可怕的是一经阻塞就得停下车来，拨开人群，挤出一条缝，车轮刚刚滚动几圈又被人群堵住了。临近惠通桥，可以看到日寇从腊勐山上用大炮对准惠通桥轰击，桥的两侧已布满了炸药，随时都准备引爆以阻止日寇的追击。我刚把车开过惠通桥不久，就传来炸毁惠通桥的爆炸声。当时，许多机工战友与无数难民，来不及过桥都落入日寇魔爪，少数人侥幸泅水过江，大多数惨遭杀害。我有幸脱险，但汽车出了故障，只好徒步绕道回昆明。

惠通桥炸断了，虽然将日寇阻拦在怒江天险的西岸，但是，在抗战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滇缅公路中断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西南运输处（已改名为中缅运输总局），竟然对南侨机工撒手不管，放任自流。有的机工失业了，加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沦陷，外汇断绝，有家难回，致使南侨机工陷入困境。我在云南举目无亲，便与海南籍机工王亚昌等一起报名前往印度。由于滇缅公路中断，中国失去了与英美等西方盟国的陆路交通联系，美英等国供应中国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只好依靠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印航线输送。然而，这些在印度的军用物资，同样需要先用汽车运往机场，这又需要一批司机，为此，盟军便在昆明招募一批机工到印度抢运援华军用物资。我怀着继续抗日的决心，应召前往印度协助盟军搞运输工作，后来，还参加炮兵团。

1945年，我由印度返回昆明，又调到贵阳等地，继续从事抗战运输。同年8月，抗战胜利结束，我们这些从海外归来的南侨机工，都盼望着复员回南洋过和平生活。可是，我又被编入国民党部队的炮兵团，抽调上内战战场。过去我们是为抗战而回国的，枪口对外，共同打日本侵略者，身上有劲；日本投降后，让我们打自己的同胞，心中难受，不想干了。后来，机会终于来了，在淮海战役中，我们炮兵团被解放军包围时，我与几个华侨机工悄悄开车与解放军联系，终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随后，在解放军部队中，通过政治学习，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我在解放军炮兵部队中担任了教官。当人民解放军进军舟山群岛时，在解放金堂岛的战斗中，我在火线上入了党。我至今仍清楚地记住入党的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是解放军这个革命大熔炉，把我从一个爱国华侨机工培养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

后来，我随着解放大军南下，正准备解放海南岛时，突然接到命令北上，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出了国门，投入抗美援朝正义战斗。在志愿军中，我继续在炮兵团中开汽车，还担任副排长的职务。有一次，在战斗中被敌机炸伤，于1952年回国治疗。养好伤之后，同年6月正式复员。当我回到阔别近二十年的故乡时，油然产生一种“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之感。这也许是海外燕子归来时的共同感受吧！

那天旅途乘船转车，回到家乡已是晚上了。当我踏上故乡熟悉而又陌生的椰林道路时，不由思绪起伏，浮想联翩，一草一木都显得特别亲切，家乡起了很大的变化，旧时的记忆已有些模糊。走走停停，终于摸到自家门口了。我轻轻叩着家门，门好久不开，正觉奇怪，突然，门打开了，老母亲刚一探头见到我，顿时“啊”了一声，她惊呆了！母亲上下打量着我，迟疑地问道：“你到底是人还是鬼？”我见母亲惊恐不安的样子，连忙跪下说：“我不是鬼！我是人！我是云峰！我回家了！”这颤动的声音惊动了左邻右舍，堂亲叔侄们都围了过来，终于看清是我，于是迎进了家门。老母亲突然想到什么似的，拨开众人，只见她双手颤抖地把为我设置多年的“灵牌”打碎了！（后来听说这是我们乡村除凶祈吉的一种举动）原来，家中早认为我已死了，今天突然“复活”回家，怪不得家人又惊又喜：惊的是我的“鬼魂出现”，喜的是我终究“活人回家”！这可真是悲欢离合传奇式的一幕！

原来，1942年5月5日炸断惠通桥的时候，我已经侥幸过了桥，后来因车子出故障而徒步翻山绕道回保山，再辗转参加盟军赴印度，而同伴当中确有许多南侨机工在惠通桥殉难，幸存的人找不到我，便以为我牺牲了，于是给家中稍信。既然我已经为抗日救国而牺牲了，家中便为我“引魂”，建了坟墓，又请和尚做了“功德”，母亲还特为我设了“灵牌”，每逢祀日便烧香祭祀。这已经是多年的事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母亲不知为我流了多少泪水。

我“死”了多年，又活回来，这是传奇。我破镜重圆，更是传奇。

原来，我20岁出洋到新加坡时，留下阿莲及未满周岁的小孩在家中。1939年，日寇占领海南岛，阿莲带着小孩乘船出逃，从此杳无音迅。我复员返乡后，母亲悲伤地告诉说阿莲走失的情况，对此，她抱着莫大的遗憾。我与阿莲婚后十分和睦，对于她的走失，我有揪心之痛。她的景况如何？十几年了，杳如黄鹤，那当然是凶多吉少了。日复一日，我就当她早已离开人世了。

可谁也没料到，在我复员不久的一天，一位从新加坡回来探亲的乡侨，听说我大难不死特地登门访问。当他证实这一切后，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场宣布一条特大喜讯：阿莲现时还在新加坡！

原来当年阿莲带着孩子，乘船往香港辗转到新加坡。她到处打听，企望能找到我。没有料到我已参加南侨机工服务团回国了。在新加坡，她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幸亏遇到一位好心的同乡华侨收留了她。随着战局的变化，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寇疯狂南进，新加坡也沦陷了。后来，又传闻说我在抗战中牺牲了，阿莲在悲痛之余，不得不嫁给那位好心收留的乡佬，又生下一男一女，连同她从海南带的去男孩，已是二男一女了。

听了这个消息，我悲喜交集，悲的是日寇侵华害得我家破人亡，喜的是阿莲她还活在人世。说实在的，在那兵荒马乱的年头，要活下来已经是多么不容易啊！既然她已在海外成了家，我也为她有了依靠，能在新加坡安居乐业而放了心。我并不奢望能再见到她。

可是过了不久，奇迹又出现了：

有一天，阿莲突然带着三个小孩（二男一女，其中只有长子是我亲生的）回家了，这一切真是来得那么突然，那么不可思议！原来，那位回乡探亲的华侨返新加坡之后，将我的传奇新闻告诉了阿莲。这可给阿莲出了一个难题了。从感情上讲，她听到消息后，立即就想回到我的身边。可是，那位乡侨，带念在乡亲的份上，在抗战最艰辛的岁月中收留了她们母子，结合之后又生下一男一女，现在怎能忍心抛下人家呢？如今，这一妻二夫的尴尬局面使阿莲蒙受巨大的精神打击，真不知如何是好！

至于我呢，我当然不敢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是从抗日烽火到朝鲜战场过来的人，多次负伤大难不死，能活到胜利的今天已很难能了，而且复员后还安置一个正式工作，多年单身汉的日子已过惯了，只要阿莲在海外能够安居乐业，也就好了。

而阿莲呢？她可就不同了，她更多地想着回乡破镜重圆。但这又身不由己啊，实在不好开口。自从得知我的消息之后，她左右为难，情思仿佛，当然瞒不过患难之际收留了她的那位同乡侨亲。难能可贵的是这位豪爽的乡侨，他天生一副侠骨义胆，竟然是他主动提出让阿莲回乡破镜重圆的。

于是，阿莲怀着感激之情告别了新加坡，带着两家的小孩（二男一女）一起回到海南岛。我当时在海口一家工厂工作，她被就近安排在海口军区的幼儿园。我的一家，又过上了欢乐和谐的日子。值得欣慰的是，阿莲教养了来的孩子个个都挺懂事，对我孝顺，使我体味到家庭的温暖。即使在“文革”造反派横行的日子里，我被揪出来批斗，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清洗回家去拣牛粪，孩子们亦仍始终对我敬重。

死里逃生，破镜重圆，确实是传奇。但这没有半点虚构，它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是我王云峰——一个普普通通的南侨机工悲欢离合的真实故事。

小林同志，您瞧瞧，今天这位用三轮摩托车载我来侨联（口述机工历史录音）的，不是别人，正是阿莲后来在新加坡生的女孩，今年算来，也已有40多岁了……

**附记：**

**1988年4月，笔者专程赴海南岛寻访星散在海角天涯的17位南侨机工幸存者，在海南侨办吴开进同志（厦门大学历史系校友）以及南侨机工罗杰（第九批机工）的热情陪同下，来到五指山下、万泉河畔的“红色娘子军”的故乡——嘉积市，登门造访了南侨机工王亚昌（批二批机工）。经当地侨联取得联系之后，76岁的王云峰拄着拐杖由其女儿用三轮摩托车送来侨联参加座谈会（见图75）。本文所记述的就是王云峰的口述录音。**

**林少川  记于椰林掩映下的海南侨联大厦**

1988年4月，笔者前往海南岛拜访了十几位南侨机工幸存者，其中定居在东方（八所）的刘源，是战后复员南返的重要成员，曾任新加坡“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主席。刘源老人已年逾古稀，个子不高，精神矍铄。虽然饱经风霜，但仍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心直口快，真诚坦率。

提起难忘的往事，老人不禁感慨万分。他那悲欢交集的叙述，时而低沉，时而激扬。他说：“我原籍海南岛文昌县龙马乡大惠村，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农家。5岁之时便失去父亲，母亲被迫改嫁。我自小就是由姐姐抚养的，到十几岁才上小学，因考试名列前茅，新加坡的叔叔知道了，资助读到六年级。小学毕业后，于1935年前往新加坡谋生。”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到新加坡后，最先当学徒，勤快好学，又肯吃苦，不怕脏累，几年功夫，白手起家，开始有了积蓄，正准备开创自己的事业。可是，‘七·七事变’爆发，激起我的民族义愤，我不愿当亡国奴，于是加入新加坡茶业工友互助会，又加入抗敌后援会，积极投入抵制日货、筹赈救国工作。”

“当陈嘉庚先生号召南侨机工回国服务时，我毅然报名参加，决心回国报效。我当时是个单身汉，没有家庭负担，凭着自己的一股爱国热情，说回国就回国，于1939年7月回到昆明。经过集训之后，我被分配到贵阳后方勤务部，编入汽车六团三营八连。这是一个著名的‘华侨连’，司机都是海外归来的健儿，连长梁志坚。队部驻唐家山，专门从事搞战军事运输，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将部队给养运到前线。”

“1939年底，南宁失守，为了收复失地，我们华侨连也积极配合，穿梭于前线与后方之间，主要走柳州、宜山、河地、三旺、东兰、靖西、百色一带，负责运送兵员粮食和武器。当时拉锯战异常激烈，我们穿行在这条新开的运输线上，时常遭到日军炮火的袭击，不少华侨机工为国殉难。”

“1942年5月，滇缅公路中断之后，日寇从广西桂林一直打到贵阳。我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没有汽油，我们就改用木炭车，千方百计作贡献。在1943至1944年反攻阶段，盟军开始配合反击，美军用飞机运载汽油起落于云南的沾益与陆良两个机场，我们华侨机工继续驾车运送汽油至各前线。”

“1945年抗战胜利了，我们南侨机工完成了历史使命，开始准备复员返回南洋。由于国民党当局有意阻挠，使复员工作拖延，进展缓慢。海外陈嘉庚先生，则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呼吁，终于促使机工复员南返。由于当时种种原因，有的已在国内成家了，有的不想回南洋了，有的则因失去联系而留下，我则抓住机会，办理复员南返。复员时，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特颁发一张奖状，文为：‘华侨机工刘源，热心爱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致勤劳，应予嘉奖。’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亦发给一份证明书。此外，我还荣获两枚珍贵的纪念章，一枚是‘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另一枚是‘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

“1946年底，我们复员回到新加坡，受到侨胞父老的热烈欢迎。战后的新加坡，百废待兴，生活艰苦。我继续从事工人运动，领导工人与英殖民当局斗争。1954年被选为新加坡司机工友联合会副主席、新加坡电车工友联合会副主席。我们还于1947年成立了‘新加坡南侨复员机工互助会’，公众推我为互助会第四任主席等职。50年代中，新加坡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罢工频繁。我因从事工人运动工作，于1957年被新加坡政府逮捕入狱，罪名是‘共党暴乱分子’，囚禁一年零三个月之久。关禁期间，电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1958年，我全家四口被驱逐出境。”

“祖国派船把我们接回，从此，我在国内安居乐业，积极工作，多次受到表扬。1946年，调到海南岛东方盐场工作。”

“后来‘文革’爆发，灾祸降临，我因参加南侨机工的历史而挨整。由于南侨机工隶属国民党军委会西南运输处，因此被戴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又加上华侨‘里通外国’的罪名，被关进‘牛棚’。”

“值得庆幸的是，粉碎了‘四人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放改革，华侨政策得到落实，南侨机工的历史得到公正的评价和肯定，我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1939年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黄迎风，奋战在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线上，还参加远征军入缅作战，由驾驶兵提升为少校翻译官。当中国远征军与盟军在缅甸会师之时，他分享了胜利的喜悦，奏凯归来，受到热烈的欢迎。

黄迎风，又名黄万全（见图77），祖籍海南文昌，自幼与父亲到泰国，12岁时随外婆到新加坡。在新加坡，他努力读书，以英文为主，也学马来语、福建话和广东话。为适应当地的生活，他在语言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1930年，黄迎风到马来亚吡叻州太平埠一家罐头食品公司当学徒。公司的顾客大都是欧美人，因此，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在与洋人一起工作和接触中，英语水平迅速提高。他的工作受到好评，1933年被升为售货员。从此，他经常随车送货上门，还学会了开车。由于平常积极肯干，任劳任怨，为公司赚了不少利润，他个人待遇也随之提高，家庭生活得到改善。

当南侨总会征募南侨机工回国服务时，黄迎风在是否报名的问题，曾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一方面，他为抛弃目前堪称满意的职业而感到惋惜，因为年老的母亲和未成年的弟弟都靠他的工资来维持生活;但同时又想到自己是炎黄子孙，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怎能坐视祖国于危难而不顾。有国才有家，国亡家何在？当一个没有祖国的侨民，怎能立足于世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他毅然报名，弃家赴国难。

出发前，公司为他们特制了金质纪念章，勉励回去之后要为国立功，为华侨争光。送行的队伍，有老一辈亲友，也有依依难舍的知己。但是为了抗日救国，他终于挥泪而别了。

1939年7月3日，黄迎风参加由廖萍领队的第七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回国，于7月11日抵达昆明，经潘家湾西南运输处短时间学习后，便整批地分配到后勤部汽车第31团第八连，驻扎于贵阳唐家山。这是在荒山坡上搭起的草屋营房，离贵阳十多公里，离村落亦远，其住宿之简陋和生活条件之艰苦，是他们在南洋时所想象不到的。但是，大家为了抗日救国，家都弃了，生活苦又算得了什么？

八连的连长梁志坚是广东梅县人，是早些年从南洋回国，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的军人。他带领全连驾驶员，安顿了生活，再领来了新车，大伙驾车往返于广西前线，运送军用物资和生活补给品。1940年，日军占领了南宁，企图侵入贵州，切断川滇运输线。我军组织兵力反攻，集中了在贵阳一带的华侨司机，包括八连在内，抢运兵员，奔赴前线。双方争夺异常激烈。1941年，我军收复了南宁。在这次战役中，不少华侨司机光荣牺牲，为祖国献出宝贵的生命。为了表彰华侨司机勇敢赴敌的精神，上级特发给奖状，以资鼓励。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南洋各地，并于1942年初攻入缅甸，企图切断了滇缅运输线。为了保卫这条运输线，我国组织军队入缅，协同英缅联军作战。谁知英军一见日军就抱头鼠窜，溃不成军而被包围。此时，我国第38师前往救援解围，击退了日军，救出了以亚历山大上将为首的英军7000多人，还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美传教士500多人。这次战绩，使中国的军队声威大振。为了表彰战功，英国女王向第38师师长孙立人授了勋章。

八连在远征军入缅时，承担了运输任务，因此，也一度分享了胜利的喜悦。

远征军在缅甸的胜利，仅是昙花一现。由于英军不顾大局，再次撤退，会战的计划破产了。中缅战区司令部只好部署退却，一部分撤入云南，一部分撤往印度。

1942年，为了协同盟军反攻缅甸，我国扩充了驻印军事力量，八连被调入汽车六团入驻印度，经常要与英美军联系，从领车到领料，从修车到装配运载，从问路到去市场购物，都需英语翻译。黄迎风早年学习过英语、广州话和厦门话，在这里竟派上了用场而被重用。不久上级批准他为三级英语翻译员，从一个普通士兵提升为校官，并领校官在印度服务的津贴待遇。

中国入印远征军是由前从缅甸退入印度的38师与22师为基础，外配两个工兵团、汽车六团、高炮营和坦克营组成的。经过近年的休整、充实与训练，并得到新式武器的装备，战斗力大为提高。1943年，驻印远征军开到上利都，在野人山原始森林的掩护下筑路前进，美军两个机械化工兵团、一个步兵旅、一个宪兵团及后勤部队协同行动。

开辟中印公路是项艰苦而伟大的工程，它既要预防敌人的袭击，又要与蚊蝇、蚂蟥、毒蛇、猛兽作斗争。当时环境恶劣，许多人因患霍乱和伤风等疾病而丧失了生命。尽管如此，官兵们仍日夜辛勤地施工，还铺设一条油管沿着公路向前延伸，隔一段距离就设一个加油站和汽车修理厂。

当时，汽车部队经常要与油站、修理厂打交道，为了方便司机们与美军交往，黄迎风教司机们用英语讲汽车的各种零件和油料的名称，以及简单的日常生活用语，方便了司机们的工作，受到司机们的欢迎和称赞。

1943年年底，公路通过野人山进入缅甸境内时，这里已被日寇封锁。为突破封锁线，每天天一亮，美军飞机便一批批飞来前线，在日军阵地上轰炸扫射，我国的炮兵也随着向敌人开炮轰击，此时士兵们勇猛地冲上去，用冲锋枪、喷火器射击，一个一个地把据点夺下来。

前线的胜利消息不断传来，在后方工作的官兵更为振奋，个个摩拳擦掌，要求上前线杀敌，以发泄久积心中之恨，报仇雪耻。

打通中印公路运输线，是盟军在亚洲战场上一个重要战略。随着中印公路的打通和缅甸战场的胜利，中国远征军在美军的协同战斗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下密支那、八莫、南坎和腊戍，把日寇打得落花流水。1945年春，远征军与盟军在滇缅路上会师。这时，外援的汽油源源输入昆明，成百上千辆汽车又开动起来，每天都有成百吨的物资运入祖国。

这时，第38师升为新一军，继续向南追击穷寇。人们欢欣鼓舞，期待着最后胜利的到来。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了，那时汽车六团尚在缅北执行任务。消息传来，人们热泪盈眶，奔走相告，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它是无数英雄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这时，盼望已久的回国时间到来了。各营、连都把车辆重新整理换新，以备几千公里行车之用。1946年春，汽车六团550多辆十轮大卡车和20多辆中小吉普车，排成几公里长的纵队，浩浩荡荡地由中印公路开入老滇缅路，经过昆明，安全到达贵阳。在祖国大道上，受到沿途市镇、村落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呼和迎接。其时的激动自豪心情，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

回到祖国后，上级要把黄迎风留在部队，继续当军官，但他探望母亲心切，便谢绝了领导的好意，办理了复员手续，离别了战斗多年的部队。后来因其母亲病逝，加上其他原因，黄迎风在长沙开商业汽车，直至海南解放才回到海南家乡。

返回家乡后，由于人们对黄迎风这段经历不理解，他竟受到“管制”处理。后来，在土改划分阶级时，他被划为贫农，人民政府还批准他考取驾驶员执照，并介绍他去海南劳动局分配工作。从此，他犹如枯木逢春，重获新生。黄迎风怀着高度工作热情，参加了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从1953年初开始，他相继在海南汽车运输公司，海南建筑公司、东方县商业局、东方县建筑公司、东方县综合厂和东方县农机厂任汽车驾驶员，直至1979年光荣退休。

在海南岛万宁县兴隆华侨农场，凭着友人提供的一丝线索，我找到了蔡如秋先生——一位鲜为人知、当年自费从泰国回来参加抗日运输的南侨机工。尽管岁月的逝水无情地将他的鬃发冲刷得雪白，但从老人坚毅的脸上，我仍然寻找到当年热血青年的身影。

与众多南侨机工统一组织回国服务的经历相比，蔡如秋的经历更为独特些，他是目前硕果仅存的自费返国南侨机工中的一位。

蔡如秋，原名蔡美光，祖籍海南，1919年出生于泰国。1937年卢沟桥抗战的炮声，在海外侨胞中引起巨大震荡。1938年就有许多旅泰侨胞纷纷回为请缨。

“当看别的华侨青年满怀壮志地回国参加抗战时，我也坐不住了，”蔡美光告诉我：“1939年从报纸上看到新加坡陈嘉庚先生组织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消息，我们非常激动。当时滇缅公路正急需大批熟练司机，为了报效祖国，应该有一技之长，因此，我便与同学文永丰去学习汽车驾驶技术。”由于当时泰国尚在銮披汶高压统治之下，华侨抗日救国活动不能像新加坡等地那样公开。蔡美光等人苦于报国无门，于是求助于当地《华侨日报》主编老丁，询问参加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方法和路线。经弄清前往昆明的路线并筹备旅费之后，他与文永丰又邀集了五位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郑庆光（郑亚泉）、沈世成、吴镇初、陈如陵、和章文育，按照老丁介绍的路线，于1939年8月3日离开曼谷，途经柬甫寨金边、安南河内，于8月15日抵达昆明。一问，才得知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第9批人员也是近日到达昆明驻扎在西南运输处潘家湾训练所的。他们一行当即前往要求参加，遇上了大队值星大队长郭清。在说明来意之后，郭大队长答应去与该所的教育长张炎元及总队长联系，很快被接纳，顺利地编入第9批机工服务团一起集训。

在潘家湾训练所，他们与南侨总会集中组织回国的机工队伍一起投入紧张的军事训练。他们7人当中，章文育是搞机修的，安置在修理厂，其余6人编在第二大队。蔡美光与文永丰同在第一中队，中队长是孙仲汉，印尼棉兰华侨、第9批机工总领队吴福华任中队副。除了一般的军事训练之外，他们还投入适应山区崎岖道路的驾驶训练。三个月之后，蔡美光与文永丰经驾驶考核合格，文被分配前往广西，他则被分配到安南海防的西南运输处分公司。在海防，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码头抢运美国援助的军用物资，运回广西镇南关，然后由其他车队接运至昆明。

1940年10月，蔡美光一行奉调回昆明，此时正值滇缅公路封锁三个月之后重新开放，第9大队即将开赴芒市，他们便编入第9大队27中队出发了。这回的任务是接“大道奇”新车，从缅境分段将军用物资运回国内的遮放仓库，再转运至芒市、保山等地仓库。这一时期，是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的高峰期，南侨机工全力以赴，闯过滇缅路上的各种险阻难关，穿梭往来，为“抗战运输管”的畅通作出重大贡献。

接下来，西南运输处改为滇缅公路运输局，第9大队与12大队合并为第15大队，驻扎在保山，此时的运输路线，主要行驶于保山、下关、昆明之间。

1941年，蔡美光又转至缅甸腊戍西南运输处分公司车队。谈到在国外的运输生活，蔡美光说：“在腊戍的任务主要是赴仰光将外援就地安装的各类汽车驶回国内遮放、芒市一带。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缅甸局势一天天严峻起来，为了赶在沦陷前尽量将军用物资运回国，南侨机工再次掀起抢运热潮。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但局势并未挽回，仰光很快失陷，日军沿滇缅公路进攻云南境内。当日兵追到惠通桥时，国民党守桥部队炸断此桥，凭借怒江天险固守，滇缅公路从此中断。“随着战事的失利，滇缅公路被切断，我也失业了，只得靠早些时候撤回昆明的旧友文永丰、沈世成等人的接济维持生活，这是相当艰难的一段日子。”

与多数南侨机工的遭遇一样，蔡美光开始四处飘零。在朋友的资助下，他到了柳州考取了驾驶执照，于1943年进入捷和钢铁厂开车。后来，由于日寇进攻湘桂，柳州紧急疏散，许多工厂迁至河池、独山，一时无法复工，工厂解散，蔡美光随着人流又流浪到了昆明。1944年，好不容易经泰国同埠朋友黄拔如介绍，顶着别人的名字进入川滇公路运输局陆良机场驳运队开车，将美国飞机从印度加尔各答运来的物资驳运进仓库，凭仓库的远近发给油票，然后每日按实用的油料扣除，剩余的折价发给油票奖金，勉强维持着半饥的生活。直至日本投降，驳运队才结束机场运输任务。

抗战胜利后，南侨机工要求复员南返。经过多方交涉，1946年7月，蔡美光才在昆明侨务局领得200美元的复员费，又变卖衣物等作路费，取道河内，由老挝渡河返回曼谷，与离别多年的母亲和兄弟见面。在泰国，他仍操本行，开车为生。

屈指算来，从1939年至1945年，蔡美光将他一生中最宝贵的七年青春奉献给了祖国神圣的抗战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海外侨胞深受鼓舞，1953年，蔡美光举家回到广东汕头。当我问蔡老先生为何再次回国？又是怎样回到海南岛定居的，有些什么考虑？他答道：“当时的想法就是看到祖国建设需要人才，同时感到寄人篱下终非久远之计，于是再次返回。1954年，我响应党的号召，加强农业生产建设，来到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就一直在农场汽车队当司机，1980年才退休。”

整个访问过程中，老人没有过多地提及这几十年来所受的风风雨雨，也不愿多谈自己的贡献，语调仍然那么平静，但我强烈感受着他那颗跳动着的至诚的赤子之心！在他所在农场，时至今日尚有许多人不知道这位平平凡凡的老人有过不寻常的经历与贡献，因此笔者愿借这一访问记录，让后人了解并永远铭记住他和他们——一群热血沸腾的南侨机世所创下的业绩！

（1988年）

**附  记：笔者在海南岛寻访这位自费回国参战的南侨“编外机工”蔡美光之后，又继续前往云南档案馆查阅西南运输处档案，果然发现了关于蔡美光、郑庆光等七名泰国回国机工编入西南运输处训练所并与其他华侨机工一律待遇的档案：**

**该档案编号为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运输人员训练所收文滇兴第9862号文，训字第2079号。**

**事由：准越南南圻救国总会理事会介绍司机郑庆光等七名投所受训已予编队并与其他华侨学生一律待遇呈请备案由。**

**拟办：准予备案。**

**公文内容如下：**

**窃职所准越南南圻华侨救国总会理事会介绍司机郑庆光、吴镇初、陈如陵、章文育、沈世成、文永丰、蔡美光等七名来所受训，已於八月十五日到所，十六日即行编入华侨第二大队第七队训练，并与其华侨学生一律待遇，所有接编该生等经过情形，理合呈请**

**钧处鉴核备案，实为公便。谨呈**

**总经理处主任   宋**

**副主任  龚、吴、刘**

**兼运输人员训练所所长  宋子良**

**兼副所长龚学遂、吴琢之、刘吉生**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八月二十八日**

1989年“7·7”之夜，在祖国广西山明水秀的一边陲古城，一位年逾古稀的马来亚老华侨，打开电视按键忽然一愣：突如其来的电视镜头使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老花眼了，连忙呼来夫妻一同“证”“视”现实。他揉了揉双眼，定神仔细一看，“对了，全是真的！绝不是做梦！”老人乐了，饱经风霜的脸上锭出久违的笑容。

这是由“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落成剪彩镜头引出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下面请听本文的主人公——南侨机工殷华生的自述：

今年（1989）7月的一天，我偶然从电视中看到南侨机工纪念碑在昆明落成剪彩的镜头，这对我这个“被遗忘的角落”的原南侨老机工来说，简直是“喜从天降”！记得在抗战时期，我们就希望能为死难的南侨机工战友建一座纪念碑。半个世纪的夙愿，今天终于实现了！能有这一天，是我们在“文革”关在“牛棚”时所不敢想象的。我仿佛一下子又年轻了20岁，高兴得彻夜难眠。半个世纪来的悠悠往事，如同电影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蕉风椰雨的南洋风光——如火如荼地筹赈救亡热潮——报名参加机工团的狂热情影——滇缅公路的军事运输的惊险镜头——抗战胜利之时的狂欢场面——战后的风风雨雨以及坎坷的人事沧桑——粉粹“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半个世纪的漫长历程，一起涌上了心头！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老妻匆忙登程，前往省城南宁，找侨务部部门谈我的南侨机工情况。广西自治区以及南宁市侨务部门非常重视我的来访，不但查到南侨机工名册档案。上面赫然写着我的名字——“殷华生”三字，而且还查出三年前（1986年）国务院侨办、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发出的侨政会字第23号关于给予南侨机工生活补贴费的文件。

为了落实政府对南侨机工照顾享受100%退休金的政策，南宁地区侨办特别为本人致函我所在的林业汽车运输公司，给本人补发了从1986年以来的补贴费四百多元，这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大喜事。回到家，我买了一串鞭炮放得震天响，引来周围人们的围观。一些熟人得知缘由后，亦为我庆幸。为了重温我过去的光荣，我和老妻便决定到昆明去瞻仰纪念碑。

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与老妻怀着回娘家的兴奋心情，风风火火地来到当年战斗过的故地重游。如今赶上开放改革的时代，昆明变化太大了，重新腾飞了。在昆明，我们受到“娘家”——侨联及“南侨机工联谊会”的热情招待，陪送我俩来到西山公园，瞻仰纪念碑。当我下车抬头一看，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矗立眼前，比在电视上匆匆一瞥的印象高大多了。望着“赤子功勋”四个大字，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感到一股强劲的暖流从我的身上通过，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无限光荣，无比幸福！我觉得有了纪念碑就是对我们南侨机工的爱国之心的最充分的肯定。

时间回溯到半个世纪前，由于日寇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考验，祖国大地燃遍抗日烽火，远在海外的华侨，亦出钱出力，掀起抗日救国热潮。那时，我随祖父母和父母在马来亚谋生，在彭享文冬埠的一家公司开车，过着舒适的生活。当陈嘉庚先生号召组织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唤起了我立志报国的决心。当时，我也想过，父亲有一辆40座位大客车，有60亩果园，都很需要我，而且我已结婚并有了女儿，祖父母、父母和妻子是不会同意我走的。如果在本埠报名，家里肯定会发觉，我就悄悄地跑到吉隆坡报名，瞒着家里。等至出发日期，我才悄悄地离家去新加坡。当父亲发觉后开车追到新加坡来阻止时，我已坐上第四批南侨机工回国的轮船了。父亲没有找到我，我们就这样连最后的一面也没有见上，生离竟成了永别。我当时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之下，毅然不顾家中年迈的祖父母及疼儿心切的父母，甚至割断了朝夕相处的夫妻情。时至如今，我已年逾古稀，做了祖父，才能切身体会到当年我的祖父母、父母、妻子该是怎样的心情！假若时光能倒流，我真愿意再次跪在祖父母及双亲面前，再说一声“再见！”然后互道一声“珍重”而别，不至于给他们留下太多太多的遗憾！古语云，忠孝两难全。当年我满腔热血回国抗战，一片忠心可对天！如今，只能求我那已逝的祖父母、父母的在天之灵原谅吧！

1939年4月，我们第四批南侨机工，途经安南抵达昆明，编入西南运输处训练所。两个月后，我被分配到龙陵第12大队，大队长是谭江柏，分队长谭英祥。从此，我就在滇缅公路上日夜开车搞运输，满载枪支弹药由遮放运回昆明。当时滇缅公路刚从高山险谷中开辟出来，路基不坚固，道又窄，坡又陡，弯又急，下起雨来成泥坑，出太阳时变“搓板”，崎岖曲折，坎坷颠簸，难走极了。来往的车又多，都是赶任务，稍一疏忽，就出事故。天上还常有敌机来轰炸，沿途常翻车，令人惊心动魄。我曾亲眼目睹许多机工战友翻车滚下百丈深谷，有的连尸体也找不回来……我告诫自己，为了安全完成运输任务，一定要格外小心谨慎。开起车来，专心致志，不超速，不超车，看准路。碰到对面车，主动让道。平时爱护车，常检查。加上我从来不抽烟，出车不喝酒，我做到了在滇缅公路上安全行车几十万公里，没有出过任何一件大小事故，表达了自己报效祖国的一片心意。

1939年11月，我驾车从重庆返回昆明，正值广西昆仑关战火纷飞。我们奉派立即驾车转赴南宁，在宾阳——柳州之间，救运伤兵。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我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出生入死抢救伤员。任务完成后回昆明，学习了两个月，驾驶英产8吨大卡车后，被派往下关，抢运军需物资回昆明。

有一次，队部派我们两人运载步枪子弹赴亦龙。车开到马龙山间，突然从路边跳出一个土匪，扬着手枪堵车。车停了，车门打开了。土匪逼着我俩立即交出钱来，否则开枪。我吓了一跳，随后陪笑回答：“对不起老哥，我们穷司机没有钱。 ”“没钱，立即把身上的棉大衣脱下来，不然，要你的命！”“好，好，我们脱。”我俩边脱边交换一下眼色。我脱下大衣，在交接的一瞬间，突然出其不意，张开大衣，往土匪头上蒙盖下去，随即连衣带人紧紧死抱住他，我的助手随即冲上来，夺下土匪手里的勃郎林手枪。可是山上还有几个匪徒，还在挥枪指着我们大骂，向我们冲来。正在千钧一发之际，运送新兵的车子刚好到来，山上土匪见势不妙，只好逃之夭夭。我把匪徒连枪交给新兵连带走。

1941年，有一次队长派我专车运汽油去重庆，车上装了21桶汽油，我小心谨慎地运送到重庆南岸，才松了口气，还未卸货，敌机突袭的警报突然响了。只见男女老少慌乱躲避，我就地隐蔽起来。空袭警报解除之后，我卸完了汽油，搭渡船过江，到重庆市区观游。走到一个防空洞附近，只见街道两人旁三步一岗地站了两长排宪兵，阻挡着不许通行。我随人群涌到宪兵背后向前看去，只见防空洞口停着几辆大卡车，多少人在忙着从防空洞里抬出尸体，一具具往车上丢，车装满了立即开走。不久，开来了两辆小车，从车上下了十几个人，走向防空洞口，走在前面的那个全副军装，光头没有戴军帽，另一个身穿长袍，胡须很长。他俩看了一会儿，问了几句，穿军装的铁青面孔，说了几句，挥了几下手。我旁边的人议论着，说那两个就是蒋介石和林森，宪兵还回头瞪了一眼。我还听他们议论说，防空洞可装几万人，里面空气缺氧，平常警报解除，立即打开洞口大门。这天不知怎么搞的，警报已解除好久了，大门还不打开，结果，造成窒息大惨案，除了近洞口的一部分外，里面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大部分窒息死亡。从尸体上取下的手表、戒指、手镯、钢笔等，堆积多少箩筐，旁边的人还说，蒋介石说的大概是，把管门失职的人立即抓来枪毙。这就是重庆防空洞的大惨案，真是惨不忍睹，这也是日寇在我国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

1942年5月，日寇由缅甸入侵滇西，守军炸毁惠通侨，将日军阻隔在怒江西岸，滇缅公路切断了。西南运输处改为“滇缅公路管理局”，实际上只管惠通桥以东至昆明的军运。而被遗弃的怒江西岸的数百辆卡车和南侨机工，则陷入敌手。他们大多惨遭杀害，只有小部分泅江归来。管理局军运任务锐减，车辆残破，车队瓦解，南侨机工人员星散。失业、饥饿、贫病交加，不少南侨机工露宿街头，冻死巷边，暴尸荒野。我看到形势如此凄惨，也动了思乡之念。有人劝我趁早回马来亚。我想念家里既有高龄的祖父母，又有年迈的双亲，还有妻子女儿。我也盼望着有机会回去一家三代团圆。但是，摆在面前，更使人揪心的是，保山遭日机轰炸的大惨案，滇西日寇的大屠杀，国土未复，日寇未灭，我怎能回家？我记得陈嘉庚先生的叮嘱：你们是代表千万华侨回国抗日的，一定要坚持到底！我深感报效祖国的任务尚未完成，决不能打退堂鼓，而应咬牙坚持下来。但是，我还能干什么呢，此时，已无汽车需要我开了。

1943年，我终于找到了机会，参加了“美国陆军炮兵游动修理队”在昆明干海子修理各种大炮。我既会修理汽车，也可把修理技术用到修大炮上。经数月完成了任务之后，随即出发到保山，分成两个分队，每队十多人，分头开展工作。我编在第二分队，队长徐汉生，也是海外归来的技师，专门修理望远镜及指南针，兼当翻译官。我则负责专门修大炮。有的大炮炮筒炸烂了，就换一个；撞针断了、秃了，要换，要磨；炮身因弹簧失灵，进退运转失灵，要调节；瞄准器失调失不准，要调整。经过我们抢修完毕，立即当场实验。官兵们都很满意。我们先后到了下关、大理、凤仪、弥渡、巍山、云州、祥云等处，为第5军、第6军、第71军、独立炮兵营、36师等部队修理各类大炮。到处都有专车接送，很受重视，每地修完他们都要颁发给我们纪念奖状。我们到处抢修，大概搞了四、五个月，主要都是在怒江以东工作，条件方便。此后，由于工作需要，就进一步西挺进。

第二分队有五个美国人，由一个名叫克罗纳的中校带队，中国人中挑选出我们四人，一共九人，每人配备卡宾枪、子弹、食宿用品都是美军军用物资，由骡马驮着，就向西步行，跋山涉水，日夜兼程。在山林里，天黑了就在两棵树间挂起睡袋，远离地面，能避蛇蝎野兽，又能防止蚊蝇叮咬，还不怕雨淋。

到了怒江边上，我们早有准备，拿出了橡皮艇，顺利渡过怒江。又经四天跋涉，到达了象达。前面三、四公里处，就是同日军作战的阵地。日夜炮声隆隆，前线把大炮拖回来，我们就马上抢修，修好立即就送上前线。有时，前线作战紧张，或者大炮太重，不便拖来拖去，我们就赶到前线抢修，一边修理，一边作战，截断了日军的退路。当时日军企图由龙陵向畹町撤退，我国在印度的新一军，巧妙地包抄过来，两面夹攻，炮火震天动地，打得日寇死伤惨重，尸横遍野。我们九人小组不断修炮，痛击日寇，不觉过了三个月。这时已是1945年8月，突然传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的消息，抗战八年终于最后胜利了。我们欢天喜地，喝酒放炮都难以表达胜利的豪情。记得胜利的那一夜，我们狂欢到天亮。我们在潞西，加紧把打坏的大炮统统修理好后，然后高兴地开车回到保山，把积存在保山地区的大炮、机关枪等修好，交回军部，这样才最后完成任务。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盟军中美军民合作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当美国人要转道昆明飞回国时，我们就在保山依依惜别。临别时，美军中校特别颁发给我们一张奖状，并一遍又一遍地叮嘱说：“这不仅仅是一张奖状，而且是一张美国特殊通行证，只要你拿着它到美国大使馆，任何时候都可以到美国来，后会有期。”可惜，这奖状连同其他奖状，在“文革”期间，全部被付之一炬了。幸亏我的老伴胆大心细，把三枚纪念章保藏下来。第一枚是“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第二枚是“华侨互助会会员证章”，第三枚是“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纪念章上刻着：“保卫祖国”、“捍卫祖国”，今天看上进心来，倍觉珍贵；闪闪的金光，更显示了我们海外赤子的赤诚之心。

抗战胜利之后，除了复员回南洋之外，留在国内的南侨机工主要分布在滇缅公路沿线以及返回闽粤家乡，但还有部分星散在祖国的天南地北。现居住在湖北葛洲坝的谢耀南，就是其中之一。

1939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吉兰丹的各界华侨在聚春酒家隆重举行宴会，这是专门为欢送南侨机工回国参战而举办的。当地中华总商会负责人马奇杰站起来讲了话，他勉励南侨机工回国之后，要不畏艰难，不怕流血牺牲，为国出力，为华侨争光。说完，他将两块特制的铸有“抗日救国”四字的金质纪念章分别挂在谢耀南和何纪良胸前。

欢送宴后，谢耀南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而最使他费心的是母亲从泰国的来电。原来他是瞒着唯一的亲人——母亲，报名参加机工团的。

谢耀南原籍广东惠阳，1919年出生于泰国北大年，1934年经父亲的朋友介绍到吉兰丹益昌百货商店当学徒，后来学会了开车。这次他没征求母亲的同意，就与好友何纪良报名参加了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当他母亲从华侨报纸上看到“谢耀南”的名字之时，便从泰国来电，要求儿子回去见面。谢耀南回到泰国见到母亲时，母亲泪飞如雨，因为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深怕他回国后在烽火漫天的战争前线，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实在放心不下。但是，谢耀南回国抗日的决心已定，无论母亲如何劝说，他总是不动摇。他耐心地等母亲把该说的话说完，然后恳切地向母亲保证：抗战一胜利，就马上回家团聚。母亲通情达理，终于同意了。

告别了母亲，谢耀南加入南侨机工第二批回国服务团的行列，被委为该队文书（总领队为钟运熙）。这一批共207人。1939年3月13日，乘“丰庆轮”经安南西贡，然后转乘火车直奔祖国西南大门——昆明。虽然连日来在旅途上车船颠簸劳累，特别是启航后的第二天早上，曾遇到一艘悬挂日旗的舰船，为防止其袭击，全船上下都紧张了一阵；然而大家都怀着抗战必胜的信心，精神仍然十分饱满。

谢耀南经短期培训后，被分配到第11大队33中队任分队长，住在云南保山，担任滇缅公路军用物资的运输任务。他和战友们跋山涉水，穿梭险路，备尝辛苦，历尽艰险。1940年，时局紧张，当时在安南境内有一批军用物资急需运回国内，他带领33中队，开赴广西整编，成立了“红牌车”大队，住进平马，车队往返于安南的海防、谅山等地。这条公路路面狭窄，桥梁简陋，每往返一次，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一进入国境线，又随时可能遭到日机的突袭。一旦有空袭的警报，车队就要迅速分散隐蔽。记得曾有一次警报后，日机已经临空，有两位司机来不及驾车隐蔽，汽车被炸毁，司机也因此牺牲。另一次，车队到了平马，司机把汽车隐蔽在郊外，然后到平马镇吃饭，敌机在上空找不到汽车目标，便对平马镇进行狂轰滥炸，虽然车队幸免于难，但平凡镇几乎被炸成废墟，百姓伤亡惨重，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就在日机经常空袭的情况下，大家仍精神焕发，勇往直前，坚持了数月的突击运输，终于完成了任务。

后来，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安南，封锁了我国通往安南的公路。谢耀南带领的第33中队又回到云南保山，担任滇缅一线的运输任务。但保山也连续遭到敌机的轰炸。有一次，他们的车队刚离开保山不久，住保山的部队和惠通桥便遭敌机的轰炸，许多房屋被炸毁，伤亡很大。在滇缅公路上行车更艰险。这条公路的许多地段是从高山密林中穿过的，有的地段悬崖峭壁，路面狭窄，陡坡弯急，加上敌机时来骚扰，稍有不慎，就有车翻人亡的危险。他们除运汽油、药品之外，每天还要运输其他军用物资和生活补给品。在这坎坷不平、硝烟弥漫、风云不测的运输线上，大家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越战越勇，一直坚持到抗日结束。

抗战胜利后，西南运输处交由云南输公司管理。谢耀南被分配到中国柴油公司开车，后来调到重庆劳工协会任司机。1946年，南洋华侨筹赈总会筹划南侨机工复员，他被指定负责重庆市的登记工作。在领取了新加坡的入境证件和旅费后，谢耀南等复员机工到昆明集中，分乘三架运输机经桂林到广州，再由广州经香港乘海轮回新加坡。到达时，受到新加坡以及原侨居地吉兰丹各界华侨人士的迎接，并发一笔“胜利奖金”和生活费。随后，谢耀南被安排在南洋烟草公司修理车间工作。

1954年，谢耀南从报纸上看到祖国建设正在飞速发展的报道，不由怀念起他为驱逐日寇而浴血战斗的祖国，怀念起在大西南共同生活战斗的父老乡亲。当时，他在新加坡领的工资胜过国内好几倍。但他想，日寇侵华八年，把祖国的大好河山都践踏破坏了。医治战争创伤，建设祖国正需要人才。于是，他放弃优厚的工资待遇，放弃舒适的生活，再次投入祖国的怀抱，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谢耀南再次回国，受到人民政府的欢迎，被分配到武汉水利局工作。他工作积极，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还被选为工会组织委员、华侨组组长。1958年，武汉支援“三线”建设，他被调往丹江水电工程局修配厂工作，先后担任检验员、车间主任。1973年，谢耀南又调到国家重点工程葛洲坝工程“三三〇技工学校”任教员，培养出大批专业技术人才，直至1979年退休。他常说：在祖国工作，钱虽不多，但生活可过得去，且领导信任，同志关心，心里十分舒坦。

1988年1月26日，笔者在成都访问了被誉为“八十先锋”的第一批回国机工幸存者——吴璋。吴老先生祖籍福建南安，是在新加坡出生的，现虽已年逾八年，但身体硬朗，记忆力很好，讲话声音洪亮，只是患哮喘症未愈，谈话过程不时被咳嗽声打断，却仍十分健谈，兴致极浓地讲述了当年参加机工团的难忘经历。

1939年，本来在马来亚福兴汽车公司开车的吴璋，响应陈嘉庚先生的爱国号召，参加了峇株巴辖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在该埠中华商会暨各社团、各热心人士资助下，他们一行48人，于2月27日由峇株巴辖启程，浩浩荡荡开抵新加坡集合。当时在新加坡《星州日报》任职的著名作家郁达夫，曾对华侨机工返国服务给予高度赞扬，在他发表的《送峇华机工回国服务》一文说：“这48位勇士，非但代表了华侨，证明了侨胞出力出钱，在绝大牺牲下，誓死争取民族的自由与独立；并且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气，证明了我中华民族是决不会做亡国贱奴的民族。”半个世纪过去了，吴璋至今还记得该机工团48人的名字：正团长廖国雄，副团长刘谭福，以及团员叶修青（见图7，今在广州）、徐元镗（今在昆明）等……

与此同时，新加坡亦集合了第一批南侨机工32人，正队长是白清泉，副队长是傅瑞生。新加坡和峇株巴辖两地机工共80名，共同组成南侨总会统一正式遣送的首批回国服务机工团。吴璋还清楚地记得，当天下午，陈嘉庚主席在怡和轩俱乐部召见了全体机工，并发表演说。陈先生说：新加坡、峇株巴辖华侨机工放弃在海外的职业，愿回国服务，不但利益减少，工作亦较劳苦。“然以青年有志具此牺牲精神，足为全马来亚之模范，感召所及，不但劳动界可增加出钱出力之意念，就是其他商学各界，更当有绝大之感奋，尤其是资本家看到诸君此种伟大牺牲之精神，应当更加出钱，庶可以对诸君无愧。”

1939年2月18日（农历除夕），“八十先锋”正式启程，他们乘搭法国邮轮“安打拉文”号赴法属安南，途经西贡，由海防登岸，再转乘滇越铁路火车，胜利抵达昆明。然后编入西南运输处赴滇缅公路服务。

吴璋回忆说，滇缅公路是西南大后方最重要的抗日运输线。他们天天在滇缅公路险恶的路段与死神打交道，与瘴气斗，与毒蚊斗，还得与日寇的飞机斗，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经常处于死亡边缘。其中最惊险的经历，则是大撤退时惠通桥虎口脱险之事。下面，就是吴璋的讲话录音：

1942年5月初，我们车队一行9人，到芒市运汽油。当时因日本占了缅甸，大量难民回国，我们也奉命一起撤回。滇缅公路上挤满了各式车辆，两旁尽是逃难的侨民，他们扶老携幼，秩序混乱。车子走走停停，有的开不动了，就被推下旁边的深谷。日本兵也化装（穿第五军的军装）尾随而来。到了惠通桥边，检查站查到了装在卡车里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于是当局下令自己炸断惠通桥，把日寇阻截在怒江西岸。

我们的车子开到临近惠通桥边，突然听到“轰隆”的爆炸声，惠通桥随着爆声被炸断了。走在桥上的难民以及拥挤过桥的卡车都掉入江中，惨不忍睹。看到这触目惊心的一幕，我们连忙煞车，躲到旁边山上。又一想，汽车上装载的汽油不能落入敌手，于是，又回来点燃汽油烧毁卡车。我们正在烧车，日本兵看见了，就包围过来，一看到我们是驾驶兵，也许认为对他们有用，就抓了起来，关在一间破篱笆墙的屋子里。我们9个人被捆在一起，遭到一顿毒打，第二天，日本兵开始分配我们作苦力了，有的被派往砍柴，我则被叫去挑水，到了晚上，又将我们捆了起来。外面留一个日本兵站岗。我悄悄与大家商量，应抓住机会连夜逃跑。半夜，日本兵抱枪睡着了。我们挣断绳子，互相松绑，就朝江边跑去。不知是哪个驾驶兵碰到东西，碰出了声音，日本兵醒了，马上开枪射击。我们分散逃亡，只有我与李五安跑到惠通桥下游处，其他人被冲散了，至今不知死活，也许一个个都牺牲了。

滚滚的怒江横在前面，水流湍急，虽已是五月初了，依然冰冷刺骨。但为了逃离虎口，我俩还是毫不犹豫地脱下衣服，只将驾驶证含在口中，跳入江中泅水归队。江流很急，又有漩涡，把我俩冲散了，我只好随着江流漂着，大约挣扎了一个多小时，才漂到下游斜对岸。

泅水过江后，已经精疲力尽，被岸边我国驻军发现了，以为我身份不明的危险人物，另眼看待。我连忙说我是华侨机工，刚从日本兵那边逃回来。驻军人员检查了我的驾驶证之后，指着一条山路说，那里有一座庙，里面有逃难的。于是我吃力地攀登着前往。当时又冷又饿，再加上刚水泅时严寒的刺激，一直咳嗽，结果，留下气喘后遗症。在这座古庙里，住满了逃难的缅甸华侨，大多是福建，广东人。我用闽南话与他们交谈。他们得知我是南侨机工，一位老华侨马上拿出一副西装给我穿上，并给一些饼干充饥。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结伴一起徒步回昆明。一路上，跋山涉水。历尽艰辛，脚底磨出了血泡。走了两天，路上没有东西吃，只得在路边喝凉水。结果染上了痢疾，一边走，一边拉，病得快走不动了，才到达了保山。

当时，保山城已被日军炸得一塌糊涂，电线杆上还溅挂着同胞们的血肉，触目惊心。我忙着找过去住过的机工车队，但已经撤退了。再到过去的加油站看看，还有一些抛锚的军用卡车，我就去挑选，将几部破车零件拼凑起来，终于“组装”成一辆可以开动的汽车。于是，我载运同路回来的难侨，一起返回昆明。

从保山颠簸开着破车，走走停停，开了两天半才到昆明。回到西南运输处，再也无人管了。于是，我随着几个机工朋友开始四处飘流……后来，到四川、贵州等地谋生。抗战胜利后，我在四川结婚，便留下来了。解放后，在四川汽车运输公司工作，到过岳池、南充、泸州、雅安、甘孜等分公司，直至1979年才退休。

1989年7月7日，在昆明西山风景区内举行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揭幕仪式上，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瞿铄的老人健步登上台阶，深情地抚摸着石刻碑文，两眼情不自禁地流淌着泪花，沉浸在回忆之中，以至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走过来与他握手时，他竟还反应不过来……这位老人便是当年马六甲南侨机工的幸存者之一——洪华民，是专程从四川自费赶来的。

这是个颇有传奇经历的人物。不久前，笔者在“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专程对他作了录音采访。洪华民原名叫洪六爻，“华民”这个名字是他1939年回国参战时取的，目的为着激励自己的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一）**

洪六爻祖籍福建同安县新店乡东坑村，但他却是个中日混血儿，父亲洪启昌是个侨商，母亲宝玉子是个日本人。1926年，洪六爻5岁时，父亲突然病逝，母亲只身返回日本，他成了孤儿，被叔父带往安南抚养，在河内读至小学毕业。12岁时，四叔父又把他带往马门甲并收为养子。

在马门甲，洪六爻到一家英国人办的道奇汽车大修厂当学徒，白天做工，晚上与堂兄学文化。养父曾在泉州少林寺学武术，到南洋继续练武，以弘扬国术。见洪六爻诚实可靠，养父便将全部武艺传授给他。由于少年时代的勤学苦练，他不仅练就了“童子功”等少林功夫，而且培养了良好的武德，他那不沾烟酒的习俗及宽容刚毅的性格，为日后的成长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6岁那年，他转入英商亚细亚货运公司开汽车，月薪40元叻币，过着安稳舒适的日子。

**（二）**

1937年“七·七事变”，祖国遭难，也给洪六爻平静的生活投下了阴影，他深感故土的安危与华侨的境遇密不可分。于是，他积极上街卖花，募捐义演，投入当地筹赈会的活动。同时，盼望有机会回国参战，报效祖国。

有一次，洪六爻出车到新加坡，正逢夏之秋、项堃率领的中国“武汉合唱团”赴新义演。那凄婉悲壮的歌声，那激昂慷慨的召唤，使全场侨胞的心中燃起熊熊烈火。尤其是“救亡三部曲”，更令人热血沸腾，使得他再也无法平静下来，回国抗日的决心更为强烈了。

回马六甲不久，又看到报上“南侨总会”招募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消息，洪六爻感到这正是天从人愿、报国有门了，随即跑到筹赈会报名应征。

养父得知洪六爻报名回国抗日，深怕他年纪太轻，难以适应艰苦的战争环境，便多方劝阻。养母更是泪如雨下，苦苦劝留，甚至托人物色一个18岁姑娘准备从速为其成亲，却被他婉言谢绝了。洪六爻认定，国难当头，无国便无家！养父见此，只好肯定他回国抗日的良好愿望，但又表示救国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我们华侨多出钱也是支援抗战的表现，并愿意立即出一笔钱给他成家立业，实业救国，仍不失为爱国之举。总之，养父母为了不辜负六爻已去世的父亲的嘱托，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他能平安地留在身边。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说实话，洪六爻也有些舍不得离开亲人，不忍放弃海外安稳自在的生活而孤身回国，到战争环境中过意料不到的艰苦生活。但眼看祖国有难，作为一名具有驾驶技术的华侨热血青年，理应挺身而出。于是，他恳托筹赈会侨领协助动员说服。经过一番波折，养父母终于同意了，不过，还再三叮嘱一条：抗战一结束，必须立即返回。就这样，年仅18岁的洪六爻，为达到需20岁才符合条件的规定，自己多报了两岁，才如愿以偿，高高兴兴地辞别海外亲人，踏上了抗战的征途。

谈及这段历程，洪老先生记忆依然清晰，他激动地回忆说，与他同一批回国的马六甲华侨机工有20多人，其中原籍同安的许成瑞，已在抗战中牺牲了，还有戴新菊（今在四川）以及余英沛（今在昆明）等人。他们一行乘船抵新加坡加入第三批南侨机工回国队伍，他还被推选为领队。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在新加坡，陈嘉庚先生接见了全体机工。他说：“我虽与陈先生是同乡，还有亲威关系，对于陈老的崇高声望早有所闻，但直接见面这还是第一次。当时陈老已经60多岁了，个子不高，肤色黝黑，留着胡子，戴一副眼镜，显得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从他敏捷果断的言谈举止中，给人一种刚毅坚韧的印象。陈嘉庚先生用浓重的同安口音演讲，他对我们说‘祖国正在遭受日寇的侵略，抗战运输线正急需大批熟练司机，这次南侨机工回国抗日救亡，是非常光荣的，希望大家高兴而去，胜利而归，为祖国争光，为海外侨胞争光！’陈先生的慷慨陈词，使全体华侨机工激动不已。为表达这种爱国心情，我当即将自己的名字洪六爻改为‘洪华民’，以示报国之志”

第三批回国机工共590多人，总领队是麻埠侨领刘贝锦（永春籍，后来任华侨先锋大队大队长），许成瑞任副总领队，洪华民任马六甲支队长。1939年3月27日，他们从新加坡启程，乘轮船抵西贡，后转火车到达昆明。在西南运输处经过几个月军训之后，洪华民被分配到第12大队第10中队（谭江柏任大队长）从事“抗战输血管”——滇缅公路的军事运输。

**（三）**

滇缅公路由昆明通往缅甸腊戍，沿途要翻越苍山、怒山、高黎贡等高山峻岭，穿过漾濞江、澜沧江、怒江等大江天堑，不但迂回曲折，坡陡路险，而且有些地段属于单行道。在这条路上抢运抗战军用物资，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消息传到南洋时，海外亲友都为南侨机工担忧。洪华民的表哥从安南寄信寄钱来，劝他回南洋，叔父还寄给入境手续，以便机遇不顺之时能有退路。但洪华民却抱定必胜信念，即日寇一日不除，便一日不返南洋，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一心扑在抗战运输工作上。他给海外回信，总是对滇缅公路军事运输充满信心，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让海外亲友放心。这些信件及照片在海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鼓舞了不少机工又陆续回国抗战。

在机工生活中，足令洪华民感到骄傲的是一段义演活动。1940年，云南芒市一带发生特大水灾，难民流离失所，南侨机工为此组织了文艺义演，筹赈救灾。自幼练就南少林武功的洪华民，在义演中竟大显身手。他表演了“汽车过人”的硬气功，惊险的场面博得热烈喝彩。在集体表演叠罗汉节目中，又是他运用轻功跃到最上面。他还与马来亚机工莫才合作，成功地表演了被日寇“活埋”后获救的气功节目，在当地义演中引起轰动，一时成为新闻人物。

在滇缅公路经历的许多惊险事件中，洪华民至今印象最深，也最感痛心的是1940年四月间的遮放军火仓库爆炸事件。遮放是靠近我国边境畹町的一个小镇，西南运输处在这里设立仓库，存放着大批由仰光抢运入境的军工弹药和器材。那一天，洪华民刚卸货离开仓库不久，便发生了大爆炸。这些兵工署急需的军火物资，是华侨机工经历千辛万苦抢运来的，却由于当局管理不善，使千余吨弹药毁于一旦。对此，每位机工无不扼腕叹惜！

随着战局的恶化，1942年5月初，侵华日军沿着滇缅公路直逼国门，南侨机工车队奉命东撤。洪华民目睹了一幅最恐怖的战乱场面，至今，他仍记忆犹新：“当时滇缅公路上，各种车辆首尾相接，互相超越，走不动的车子就被推下深渊，两旁逃难的人们，肩挑手查，扶老携幼，络绎不绝，不少行李衣物散落在路上。日寇追兵在后，当我随着混乱的军队刚驶过惠通桥，随着一声‘轰隆’巨响，桥被国民党守军炸毁了。日寇虽然被阻拦在怒江西岸，但未及过桥的南侨机工车队以及无数难民则沦入敌寇的魔掌。”

惠通桥一炸断，三年多来（1939.1 - 1942.5）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滇缅公路国际军运线终于中断了。此时西南运输处（已改名中缅运输局）竟然不管南侨机工的死活，南洋又已沦陷，有家归不得。洪华民不得不四处飘泊，辗转各地，最后到云南盟军机场当苦力。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结束。

战后，为表彰赤子功勋，当时的侨务委员会发给奖状，军事委员会也发给证明书，并颁发“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及复员奖金。在洪华民家中，洪老先生还展示了他精心保存40多年 前的奖状及证件。

**（四）**

新中国成立后，洪华民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章。他被分配到重庆运输公司当司机。1950年，洪华民奉命随军支援进军西藏的战斗，在领队运送军用航空汽油途经四川资中县时，突遇土匪围追，由于他当机立断，沉着指挥，率领车队避免了一次汽油大爆炸事故，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军部的记功嘉奖。

长期以来，洪华民在汽车运输岗位上，对技术精益求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不过，在极“左”路线的冲击下，与许多留居国内的南侨机工一样，洪华民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文革”浩劫中，他因曾参加抗日南侨机工在西南运输处的经历，被诬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而关进“牛棚”，受到残酷迫害。尽管如此，他那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仍不动摇。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历史得到公正的评价，洪华民获得平反，恢复了名誉。1979年，他当选为四川宜宾市第七届人大代表。此后，又连年评为先进工作者。1986年，洪华民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颁发给安全行驶一百万公里以上的《荣誉证书》，该证书写道：“洪华民同志，截至一九八四年底安全行驶116万公里，特予奖励”。1984年退休后，洪华民还担任家宾侨联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继续奉献余热。

在第八批回国南侨机工中，原籍海南的吉隆坡华侨陈昌雄，在抗战结束复员时，因交通受阻等原因而滞留大陆，现居四川泸州兰田镇，是一名退休驾驶员。尽管年事已高，但只要一提起在滇缅公路从事抗战运输的往事，老人的情绪立即高涨，谈着谈着，有时竟激动得情不自已。他说：

“前年十月份，省侨联召开‘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在川人员座谈会’，接到通知后，我激动非常，按期搭车去成都。不巧的是汽车沿途抛锚，身体不适，不得不中途折回，未能到会与昔日同伴相会叙旧，实在遗憾！”

陈昌雄出生于海南文昌县清澜乡良友村（原名友河村），14岁时由堂兄陈昌珉带来马来亚，找到了在吉隆坡给一家英国商人当厨师的父亲。在那里，父亲将他送入尊孔学校读书。父亲虽是个厨师，但见多识广，尤其崇敬孙中山，常给他讲述当年在新加坡见到孙中山先生的情形。父亲常说“我们中国太弱了，帝国主义不断地用武力侵略我们”，希望他努力学习，将来为建设祖国出力。可是，因家里负担太重，陈昌雄小学未毕业就停学了，到宗叔陈家耀的汽车修理厂当学徒，从此开始了当汽车机修工的生涯。4年后，在他21岁那年，父亲不幸病逝，他随同三叔陈家灼，到新加坡七马路联友电器公司当工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空前高涨，陈昌雄也卷入新加坡华侨抗日募捐热潮，脖子上挂了一个“救国捐”箱子，到处募捐。每天晚上把捐满钱的“救国箱”送到筹赈会，第二天又背着箱子四处募捐去了。1938年，“武汉合唱团”来新加坡义演募捐救国，新加坡华侨一致捐出自己一个月的收入，但遭英国当局的阻挠。华侨非常愤怒，大家团结一致，工人罢工，商店罢市，公共汽车停开，经过好几天的斗争，终于迫使当局同意华侨捐献活动。陈昌雄也参加了这一斗争，当即将45元叻币月薪，除留下9元作伙食费以外，其余的36元全部捐献出来。

24岁那年，陈昌雄奉母命回文昌与同乡姑娘黄玉花完婚。新婚之际，时局紧张，日本飞机经常轰炸海南岛，保长要来抓壮丁，陈昌雄告别了新婚两个月的妻子，搭船返新加坡。在新加坡，他进了德国人开的“美邻闽电器公司”，学习柴油汽车修理技术。

1939年，陈嘉庚先生号召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战，陈昌雄报名参加考试，电工技术考的是实际操作，同时也检查身体，结果两项都合格，便被录取，参加第八批机工队伍。回国前，他们在广肇会馆，由南侨总会派人来训练，每人发给一套黄色制服、一顶大盖军帽，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7月17日，南侨总会派黄景镇来当邻队，机工们都清一色穿上黄制服，威武雄壮，前面还高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巨大横幅，每人拿着一面三角旗子，大家在“保卫祖国”、“回国抗战”的口号声中前进，沿途受到成千上万华侨的热烈欢送，其情景十分动人，机工队伍登船出发了，码头上欢送的人群还久久不愿离去……

轮船经过几天的颠簸，当驶到安南堤岸时，当地的华侨早已在码头等候、欢迎了。可是，法国当局不允许靠岸。经过当地侨领与法国当局交涉，第二天才让船靠拢码头，此事引起机工们的极大义愤。他们整队举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横幅，高呼口号雄纠纠地开进西贡。然后转乘火车，经河内直抵昆明，住进潘家湾西南运输处训练所。

在训练所开始进行集训，每天早上集队操练，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培训，并通过技术考试合格后，陈昌雄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17大队。当时每大队有3个中队，1个补充中队和1个修理班。每个中队有50部车，全大队有200多部。他所在的大队，都是崭新的3吨“GMC”和2.5吨的“小道奇”。他的修理班主要负责修理，起初都是新车，修理工作不太忙。后来，战事一天天紧张，汽车日夜奔驰，损耗很快，修理任务也繁重起来，连夜突击抢修，更是家常便饭。虽然工作辛苦，但为了抗日救国，大家都精神振奋，毫无怨言。

在昆明半年之后，17大队奉调西南运输处重庆分处，住在黄山路口。此时运输任务更繁忙，日本飞机又不断轰炸，几百部汽车摆在一个地方，目标很大。为避免挨炸，机工们想出了办法，汽车一进站立即调去运货，需要维修的抓紧维修，修好后立即开走。夜间修车也不开电灯，只用修车的小电瓶灯照明，以免暴露目标。

机修班的工作地点，紧靠一片坟地，石砌的古坟成了机工们天然的防空洞，警报一响，就往坟地里钻。有一次，敌机连续七天七夜轮翻轰炸，炸弹密密麻麻丢下来，死伤多人。一天，陈昌雄正埋头修车，三道警报拉响了还来不及跑开，一架敌机俯冲下来，子弹嘎嘎扫射在机器上，他连忙从抑制板上，滚进了水田里，浑身沾着泥糊，死里逃生。回头一看，修理班的工棚被炸中了，许多汽车包括刚从香港才买来的新轿车都被炸坏了，他从新加坡带来的那箱工具也毁了，到处燃着熊熊大火。但警报一解除，大家又毫无畏惧地朝各自的岗位跑去。在重庆修车近一年，17大队又奉调到泸县，修理班住在三岩的一座庙里。不久，又调到宣威、毕节等地。最后，又调到18大队，住在兰田坝。

1941年，陈昌雄从逃到重庆的侄儿陈时炯的来信中得知，妻子已被日本鬼子杀害了，对此他悲痛欲绝，未想到新婚的暂别竟成了永别！大家纷纷前来安慰他。第二年，在大伙的介绍和催促之下，他与四川姑娘金先凤结婚。她是初中毕业生，抗战时的中学生在泸县还是不多的。金先凤被陈昌雄的遭遇和爱国情怀所感动，给他很大的安慰与照顾。

1944年，陈昌雄调到川滇东路第四区运输处，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往往未到月底早就囊中告罄。但为了抗战的最后胜利，他咬牙坚持下来。

抗战终于胜利了，传来南侨机工复员的消息。陈昌雄与新加坡机工蔡志强一起赶到昆明，登记复员，并领到200美元（折67万国币），陈昌雄把5万国币捐赠给昆明侨光学校。在昆明，他未赶上头两批返南洋的队伍，但听说复员南返的道路曲折艰难，十分不顺，“华侨互助会”的人就劝他待平静之后再南返。就这样，一等再等，拖延未能回南洋，直等至解放。

解放军派军代表对他们说：“中国解放了，今后的建设还需要您们这样的人才，您们就留下来吧！”于是，陈昌雄便留在四川。与他同时留在四川的还有：福建籍的张天赐，在四川省运输公司任驾驶员；洪华民，在宜宾运输公司当驾驶员；海南籍的符利华，在四川省轻工业局，已逝；广东籍的陈苏，文革期间受迫害致死；郑志南，调去南充任驾驶员；还有潮州籍的卢国龙，前年在兰田坝交通机械厂病逝了。

1972年，陈昌雄收到文昌且老家的来信，告知95岁的老母病逝，他回老家治丧，才得知道玉花牺牲的详细情形：那是海南岛沦陷之后，从新加坡返回文昌的陈时农组织了抗日游击队，玉花积极参加妇联抗日活动。一天，游击队在乡里的一座庙里开会，由于叛徒告密，引来日本鬼子包围袭击，玉花在突围时牺牲了。

昌雄老人1972年退休之后，在家安享晚年。与老人交谈，令他梦绕神牵的事，还是与滇缅公路有关的人与物。至今，他仍完好地保存着当年西南运输处发给的一枚“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他对纪念章图案尤其熟悉，连纪念章的号数都清楚地记得：1453号。

另一件却是憾事：1939年离开新加坡回国前夕，在宗祠文昌会馆与欢送宗亲的纪念合影，上面写着：欢送华侨机工回国服务，这张照片他一直随身带着，直到“文革”时，有人要抓他的“尾巴”。他才忍痛烧掉。谈及此事，老人连声说：“可惜，实在可惜！”

现居住在山城重庆的马来亚华侨林广怀，原名林江海，“广怀”这个名字，是他1939年报名参加南侨机工时为瞒过家人避免阻拦而改的，并包含着“心怀祖国”以激励自己之意。

1919年，林江海出生在福建省永春县一个小山村（土角楼），未满周岁就由父母抱着“过番”到南洋，侨居在马来亚丹绒马林开杂货店的祖父家里。当时，祖父开了几间商店，家境殷实，父亲协助经营，生意更加兴隆。后来，祖父逝世，父亲便接手经营“成美”号，而叔父则在实叻务经营“谦美”号，若论财务，叔父在当地华商中还可以摆在前几位。江海自幼生长在优越的环境中，全家弟妹八、九人，他居长当“孩子王”，在华侨学校读书时便对体育运动特别兴趣，还组织一个“小蓝球队”。他刚满15岁时，其父不幸病逝，全家便和祖母搬迁到实叻务叔父家。他开始在叔父“谦美”号学习经商，帮助处理财务，让弟妹全部上学读书。

“七·七”事变之后，祖国军民的浴血抗战，进一步唤醒了海外侨胞的民族意识，报纸上也天天报道国内的局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呼声响彻云霄。在“南侨总会”领导下，各地筹赈分会的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搞得热火朝天。星马一带还流行用青纱做袖章，上面写着“毋忘国耻”四个大字，每个爱国侨胞都争先佩带。当时林江海组织的“日光蓝球队”队员的爱国热情十分高涨，大家都带上青纱袖章走上街头游行宣传，卖花筹赈，还通过蓝球比赛进行募捐，先后共募捐二千多元，悉数上缴森美兰筹赈分会，统一汇往祖国支援抗战。

1939年2月，陈嘉庚先生号召南侨机工回国服务，林江海立即响应，兴冲冲地赶到芙蓉筹赈分会报名参加首批回国机工团。不料当地报纸马上登出林江海的名字。年迈的老祖母便赶到筹赈会阻拦，她说：“你父亲不幸病逝了，放下一群弟妹八、九个，你是长子，要好好维持这个家庭！”筹赈会考虑到他家的实际情况，只好将他留了下来。第一次报名没有达到目的，林江海在失望之余，还故意与家庭斗气，不回叔父的公司工作，自己到巴刹做菜摊生意，并另租铺面开设糖果店。由于商务关系，他经常去吉隆坡、马六甲和波德申等地，看到南洋各地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深受鼓舞。尤其是短短的几个月内，各地报名参加南侨机工的已达数千之众，再一次激起他“弃商从戎”之决心。有了上次家人阻挠的教训，他便不用原名，而改名“林广怀”，再次到芙蓉埠报了名。经过考核，芙蓉埠计有20多人合格，其中有永春籍的刘瑞齐、颜世国、林财（林广怀之堂弟）等，大家推选林广怀为队长。这一回，家里要反对也来不及了。老祖母为他的决心所感动，鼓励孙子回国后要好好效力，不要半途而废，并且千叮咛万嘱咐：“抗战一胜利，就要马上回来，老祖母等着最后见你一面！”就这样，林广怀高高兴兴地辞别海外亲人，踏上了回国征途。

在林广怀的带领下，芙蓉埠的20多名热血青年，乘船前往新加坡加入第八批南侨机工回国队伍。在新加坡，陈嘉庚先生接见全体机工，勉励大家要团结一致，尽忠报国。这批回国机工共330多人，编为七个中队，林广怀被任命为第三中队领队。

回国后，经昆明潘家湾集训之后，林广怀被编入西南运输处第17大队华侨补充队，当即奉派前往腊戍等地接运军车，然后运送武器到广西柳州前线。接着，又奉命运军需品上迁江前线。行车途中，无论白天黑夜，常遭敌机袭击。为了安全，车队规定，夜间运行不准开灯，只能摸黑前进。在此期间，前线炮声不绝于耳，满载军火的车队行驶在险要的山路上，这对海外归来的南侨机工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为了抗日救国，大家毫无怨言。林广怀回忆说，当时运送部队兵员及武器到前线，然后又运载伤员回后方治疗，往返过程，历尽艰险，南侨机工总是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至于饥饿口渴，就更置之度外了。

1941年，林广怀随车队调往宣威，运送军需物资到泸州、贵阳等地。经过叙永训练班的培训之后，林广怀奉派回昆明，在第三大队任少尉分队长。

1942年，林广怀又奉派前往仰光抢运，殊料刚到腊戍，仰光已告沦陷，便改在腊戍转运华侨难民回昆明。这时滇缅公路沿途车辆拥挤，无数难民扶老携幼，饥寒交迫，有的惨死在路边。一路上，机工车队与各式车辆因抢道而互相堵塞，走走停停，有的车辆走不动就被推下深谷，情景令人心寒。日寇在后面步步进逼。林广怀刚撤过惠通桥不久，即传来该桥被炸毁的声音，一同回来的堂弟林财以及一批未撤过桥来的南侨机工车队不幸罹难。

惠通桥炸断之后，滇缅公路无法通行了，众多南侨机工只好在昆明待命。林广怀回到石塘山司机训练所，但该所一片混乱，没人负责，比难民收容所还不如，失业机工便四处星散。在失业、生活断源的困扰下，林广怀跟着友人来到重庆，找到原西南运输处第三分处，经熟人介绍得以到兵工署汽车运输处开车，运输器材，往返于昆明、贵阳、湖南等地。1944年，日寇大举进攻贵阳时，林广怀参加战斗运输，夜以继日地运送第九军、十三军部队兵员到独山前线。有一次，车队被日军包围，他守在车上两天两夜，度日如年又吃不上饭，第三天早晨才奉命调头运送伤兵回贵阳。

抗战胜利结束后，南侨机工完成了历史使命，在陈嘉庚先生的大力促成下开始复员南返。林广怀却因执行运输任务到湖南长沙，待他回到重庆时，已错过南返机会。林广怀只领到“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及复员奖金。他把这枚历经抗战血与火洗礼的纪念勋章寄回南洋，让家中亲人们分享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喜悦。

新中国成立后，留居在祖国各地的南侨机工得到人民政府的关怀与照顾，安居乐业。从1951年起，林广怀一直在重庆国营运输汽车公司开客车，几十年如一日，埋头苦干，默默奉献，对技术精益求精，出色地完成运输任务，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荣获“特级驾驶员”的称号。

岁月匆匆流逝，转眼近半个世纪过去了，1984年林广怀与妻子双双光荣退休。退休后仍得到单位领导的关怀照顾，在落实华侨政策中，又安排他们搬进公司新宿舍。1986年，林广怀与全国各地幸存南侨机工一起，享受国家专门制定的新政策，领到百分之百的退休金。1987年8月，林广怀申请前往新加坡探亲（见图82），作为战后留居在中国的南侨机工南返代表之一，受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共存先生的亲切接见。在陈共存先生的关怀下，8月16日，新加坡《联合晚报》记者李永乐专题采访了林广怀。10月24日，《联合晚报》以整版的篇幅，全文刊载了大特写《久违了，南洋！——留居中国的机工近况实录》，介绍了这位抗日南侨机工的事迹。

现居住在山城重庆的公交公司退休驾驶员颜世国，是永春籍南侨机工之一。不久前，笔者在嘉陵江畔采访了这位1939年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回国参战的幸存者。

颜世国于1914年出生在永春。5岁时便随父母前往马来亚怡保，先在当地华侨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即学会开汽车。16岁开始在其父朋友的“春成”布店当司机，月薪优厚。后来，应叔父之邀，到马口埠叔父开设的“成发”杂货店协助经商。在他的努力经营下，“成发”商店生兴隆，盈利颇丰。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国难当头，海外华侨群情激昂，同仇敌忾，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当时颜世国在叔父“成发”店经商，个人虽然安稳舒适，但他情系祖国，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筹赈活动。除了带头将该店每月盈利捐出10%之外，他还带动筹赈分会成员组织起来，主动向当地的橡胶园包工头及各商店开展卖花募捐，将筹集的义款交南侨总会统一汇往祖国。

1939年春节，颜世国在马口埠举办婚礼，他与妻子双双将结婚金戒指捐献出来，连同喜宴所节俭下来的一笔款交给当地筹赈会，表达了海外赤子爱国之心。当地华侨报纸对其爱国行为作了褒扬。

不久，陈嘉庚先生在报上发表了《南侨总会通告》，号召华侨青年机工回国服务。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正急需大量熟练司机，颜世国认为，自己刚好有这项特长，正是报效祖国的大好机会，于是产生了报名应征的念头。可是考虑到已建立了美满的小家庭，妻子已有了身孕，他又感到已经不能象其他无牵无挂的单身汉那样说走就走了，怎么办呢？他设法先将妻子送回槟城岳母家中安顿妥当，然后瞒着母亲和弟妹前往报名。他考虑到本地马口埠熟人多，一旦声张出去家人会来阻拦，便特地赶到芙蓉埠筹赈会报名，待一切手续办好之后，才回家悄悄告诉弟弟，连母亲也没让知道，就与芙蓉埠机工队出发了，前往新加坡加入回国机工团。

颜世国随第八批机工团回国后，于1939年底分配到重庆黄山路口的西南运输处分处任驾驶兵，主要任务是从事重庆至柳州之间的军事运输工作。当时柳州已成前线，短兵相接，战斗异常激烈。颜世国与机工战友们冒着炮火投入抢运，当日军由柳州头塘攻至二塘时，他们已将大批抗战物资移入四川了。不久，独山失守，颜世国则随机工车队调到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是举世闻名的险要路线，该路是战时紧急抢修的，许多地段不合标准，山高路陡。颜世国在滇缅公路上历经了无数艰险，亲眼看到许多华侨机工不幸翻车殉难。有一次，颜世国与战友们运载一批军火到达滇缅公路的咽喉——功果桥边，突然遇到日机轰炸，桥面已被炸得坠入江中，但南侨机工却用汽油桶扎成大浮筏，冒险将军火运过江，使这条军运大动脉畅通无阻。

颜世国在这段戎马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是1942年5月滇缅公路上大撤退之惨状。当时，仰光已经沦陷，西南运输处奉命日夜不停地向国内抢运积存在中转站腊戍的大量物资。尽管几乎每天都有车辆在翻越陡峭急弯的山路时坠入深谷，但整个车队没有退却。司机们机智加勇敢，前仆后继，战胜艰难险阻，战斗在运输战线上。

在撤退途中，滇缅公路沿途哀鸿遍野，无数难民扶老携幼，饥寒交迫，有的惨死路边。整条公路上人车混杂堵塞，南侨机工车队走走停停，不断地按着破喇叭，有时还得跳下人往前拨开一条缝，才勉强让车轮滚上几圈。临近惠通桥时，可以看到日寇从腊勐山上用大炮对准惠通桥轰击，桥上两侧已布满了炸药，随时都准备引爆以阻止日寇的追兵。颜世国刚把车开过惠通桥不久，就传来惠通桥断毁的声音。

惠通桥一炸断，滇缅公路便切断了，中国失去了与英美等西方盟国的陆路交通联系。美英等国供应中国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就只能依靠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印航线。然而，这些在印度的军用物资，同样需要先用汽车运到机场，这就需要一批司机，为此盟军便在昆明招募一批机工到印度抢运援华军用物资，颜世国与200多名华侨机工，怀着抗战到底的决心，毅然应征前往印度，参加盟军反法西斯战斗。值得一提的是，这批南侨机工曾在滇缅公路开过车，技术很高，救国心切，因而入印不久就受到盟军的赞赏。颜世国在印度阿山省地普罗加飞机场工作期间，主要任务是在机场运输汽油、军用物品以及大锡锭等，他们经常冒着敌机空袭的危险坚持抢运，直至1945年胜利才回国。

抗战胜利结束后，颜世国荣获了侨务委员的奖状，继续留在重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分配到重庆公交公司开车，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评定为一级驾驶员。颜世国退休之后，仍然继续发挥余热，他担任区政协委员、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委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1989年，正值纪念南侨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1939—1989）之际，四川省侨办、侨联特为全省十几位劳苦功高的南侨机工颁发了《荣誉证书》。颜世国也获得这一殊荣，领到了荣誉证书（见图84）。证书上写道：

**颜世国同志响应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号召，怀着满腔爱国热忱，在抗日战争期间加入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半个世纪以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特发此证，以资表彰。**

**四川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四川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一九八九年九月**

荣誉证书眉既表彰了以颜世国为代表的幸存南侨机工的特殊功勋，也褒扬了数以千计参加抗日救国斗争而英勇献身的海外赤子的奉献精神！

第五批返国南侨机工中，来自新加坡的程龙庆有着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在他脑海中，不仅有滇缅线上的烽火，更有重庆红岩村的终生难忘的回忆！

1939年，年仅18岁的程龙庆，在一股爱国热潮的推动下，经过一番曲折的报名过程终于搭乘第五批回国机工团的轮船，踏上回国参加抗战的征程——这是1939年5月22日，一个令他终生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新加坡红灯码头格外壮观，回国机工团登轮启程，各界华侨人山人海，热烈欢迎，启锚时，岸上口号声震耳，机工队伍唱起《告别南洋》的雄壮歌声，但见无数人激动得热泪横流，无数的礼帽被抛向空中，抛向海里，蓝色的海面上，顿时漂浮着好多好多帽子，帽子代表着亲人的心愿——陪伴机工队伍一道回国！

轮船在大海上颠簸了四个昼夜，才到达安南西贡。在安南，属于西南运输处的机工团先乘火车直抵昆明，而程龙庆一行17人，却又搭原船驶向香港，因为香港还有一批属于“海员工会”的华侨等在那里，在香港上船的归国华侨约40多人，多数是机工，也有回国赴延安求学的华侨青年，（其中一位是后来成为新华社名记者的王唯真，当时年仅十七岁。）途中经过海南岛时，听说海南岛已被日寇占领，船长在大家的要求下同意绕道，可是就在快要绕过海南岛时，却与日本舰相遇。船上面通知旅客准备接受日军检查，大家赶紧把身上穿的中山装脱下来藏在煤堆里。不知什么原因，日本人并没有上船来，这才闯过了危险的一关。

轮船驶至安南海防，程龙庆一行便转乘火车、汽车进入离镇南关不远的广西边陲重镇凭祥县。在树林中，那里早有二十几辆汽车等着他们了。这些汽车，有的是美国、加拿大华侨送的，其中一辆德国制造的漆着红十字的大救护车，车身上标有“宋庆龄送”字样，尤为引人注目。在新加坡，程龙庆和方川如（方毅同志的堂兄）等十几人就已确定分到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在香港由办事处派龙飞虎科长接洽，所以，次日便分别驾驶着这些汽车直驶重庆。

凭祥到贵阳的公路也是运输各种物资的咽喉要道，但路面狭窄破烂，坑坑洼洼。当时没有防空设备，常遭日机狂轰滥炸。一天，在南宁附近躲敌机轰炸时，车队一辆汽车钻进了国民党军的高射炮阵地。蛮不讲理的士兵，硬说是刺探军情的汉奸，将司机五花大绑，关了一天一夜，随后押赴南宁市，扬言要杀头。正当紧急的时刻，办事处的龙飞虎同志赶到，经过一番交涉，才救回了人和车。

经过一番艰辛历程，1939年10月，华侨机工车队终于抵达重庆。当山城的万家灯火出现在眼前时，海上的风波、日机的轰炸、通路的坎坷，霎时都烟消云散了，他们一个个笑出声来。

按照事先安排，回国的华侨机工大部分都分在西南运输处，只有程龙庆等人去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报到，暂住土湾的办事处仓库。五、六天后，即出发到离西安六十里处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训练班，在那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训练班对青年学员着重进行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学习一些革命理论，并开展丰富多采的文艺活动。1940年3月，程龙庆等九个华侨司机返回了重庆。

当时车队临时组成，所在地四周都是农田，宿舍和车库都用竹子和篾席搭架起来的，相当简陋，修理间是茅草棚。这地方吃水困难，煮饭、洗东西都是用田里的水。一至炎夏酷暑，田里干涸了，吃水更加困难。由于水土不服，华侨机工经常生病，至于打摆子，冷一陈、热一陈，成了家常便饭，但大家从不叫苦叫累。

办事处坐落在化龙桥的一个山沟里，同志们很注意勤俭节约，自己挖地种菜，男女同志都是一色的军服，每月生活费很少，给华侨机工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一次，在处长办公室闲谈，程龙庆说起钱不够用时，刚好周恩来同志从外面走进来，听了大家的谈话，风趣地说：“是啊，我们处长每月也才五块钱哩，你们华侨同志每月发三十块，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我们大家想办法解决嘛！”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

当时回国的大部分华侨青年，只是为了抗战，爱国热情很高，但对中国共产党、解放军区以及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缺乏认识，总想几年以后再回南洋去。由于生活艰苦，加上家中音信杳无，因此也有些不安心工作。周恩来同志和办事处的领导的言传身教，使他们深受教育。一次，一个华侨司机开着小车送周恩来同志，汽车发动不起来，周恩来同志立即下车去亲自推车。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养伤回来后，在办事处作国内外形势报告，还让华侨同志一起去听，给程龙庆留下很深的印象。

程龙庆在办事处的两年多时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头。那时重庆是陪都，日本飞机常来空袭。起初，车队一听到警报，就把车开到郊外躲起来，后来，跑警报跑厌了，有时索性呆在屋里。不料，在一次轰炸中，程龙庆正在屋里，听到“丝丝”的声音，才急忙趴在乒乓桌底下，右脚被弹片划了一个大口子。

程龙庆受伤的消息一传到办事处，医生很快从办事处赶来，周恩来还派另一位华侨机工来专门照料。幸亏没有伤着骨头，半个多月即痊愈了。有一次程龙庆去办事处看球赛，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在人群中一下子就认出他，连连招呼道：“小鬼，又来了！伤好了吗？”并嘱咐好好休息。

程龙庆回忆说：“两年多时间里，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了共产党人对归国华侨的热情关怀和对参加抗战的归侨青年的热情鼓励，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作风和为人，更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服务的两年多时间里。程龙庆除了到西安等地出远车，还三次直接到延安。车队每次出征少则五、六辆，多则十来辆。运输任务除了国民党政府拨给十八集团军的给养外，还运送各界进步人士捐送的药品、汽油等急需物资。另一个特殊任务就是运送一批批去延安的地下党员、民主人士、青年学生和技术人员，并秘密捎带党组织从港澳及各地转来的材料、文件、电台等。

由于重庆到延安这条公路，是当时我边区与国统区联系的唯一的地面交通线，十八集团军重庆、西安办事处的车队是这条线上引人注目的共产党车队。为保证行车安全，周恩来同志操了不少心，每次出车之前，都是他亲自与有关当局交涉，办理手续；出发时，他要一一清点人数、物资，还对我们华侨司机和修车工再三叮嘱。

当时，国民党一路上层层设卡布哨，每道关卡都配有军、警、宪、特人员。由西安通往延安的路上，检查哨就更多了，车队每到一个县城或大镇，都得停下来接受检查，甚至连汽油桶也要伸进细棍搅一搅。即使如此，车队还是在他们的眼皮下带秘密物品进出。办事处的同志巧妙地将文件单本和电台部分紧紧夹藏在大油桶底下，装满了汽油的桶太重，检查人员是不会抬下来查看的。

历尽艰难险阻之后，每当车队一进入陕甘宁边区，车箱里的沉闷空气就一扫而光，大家心情大快，精神为之一振。在这两年里，程龙庆他们的车队就曾运送几百人去延安。

车队每次到达延安，都受到边区军居的热情接待，每次总在宝塔北面的兵站里休整一、二十天。因延安太冷，滴水成冰，华侨司机每人都得到一件羊皮祅，这是从封锁圈子来的礼物，得之不易，温暖了华侨的心。程龙庆不由对比刚来重庆时的情况，由于刚回国未带寒衣，陈嘉庚先生发动南侨总会向每位回国机工赠送一批寒衣及其他生活用品，竟被贪官污吏侵吞了，华侨机工连一件寒衣的影子也未见到，结果被冻了好些天。两种情况一对比，大家对延安的感情更为亲切了。

在延安，程龙庆他们还听过毛主席的报告。为毛主席开车的司机，也是位马来亚华侨，姓梁，海南籍的。毛主席乘坐的那辆老式的黑色雪弗莱小轿车，是美国洗衣馆的华侨工人捐赠的。

抗战胜利后，程龙庆留居山城重庆。由于当时国民政府的阻挠，南侨机工复员南返一事一拖再拖，为此程龙庆与其他19名机工联名致信陈嘉庚先生。陈先生将该函转载于1946年5月31日《南洋商报》上，全文如下：

**返国服务机工**

**致函陈嘉庚先生**

**请求敦促我当局办理遣送**

**或发给旅费自行设法南归**

**【按：当我国抗战之初，热心机工回国服务者达三千余人，服务至今，经已多年，入伍者多已复员，惟一般机工，因种种关系，尚未能南旋。在失业贫苦中，兼以物价飞涨万倍，屡次请求，均遭拖延，其中有程龙庆者（原住马六甲街）本月六日与其同事联函致其友人洪水星，转托本报记者呈交陈先生。】**

**嘉庚先生大鉴：抗战胜利，万民腾欢，遥悉先生安然返星之息，无任欢感，第以关山阻隔无以言达为憾耳。**

**民等均系抗战初期受先生伟大爱国精神所感召，激於义愤热忱，不畏艰难困苦，毅然舍离妻儿，参加回国服务团回祖国服务，其时悲壮之情绪迄今仍映眼前。回国之后，民等莫不以乘忠竭诚之本志努力工作，周遭处境，最不免有令人灰心之处，总以一忍度之，皆盼抗战早日胜利，俾使凯旋海外，度安谧和谐之日子。如是一日终于到来，诚足庆幸，奈胜利迄今，将届一载，国内复员工作殆已完成，独民等此回国服务机工仍滞留内地，度失业穷苦之生活。据民等所知，前次太平洋战事后归国难侨，政府尚且发给每人二百美元之旅费，而民等回国服务者刚闻无所闻，似此未免令人心灰。以数年来之努力献身祖国，而令在海外父母子女度凄苦之日子，其报答竟是如此。现民等滞留重庆，生活穷苦，莫不思归心切，虽经数度向当局请求，每次均答以侯拟，力予拖延。数月已逝仍无消息，似此恐无返归之一日。先生乃侨界之宿望，素以关心侨民一切苦况□□，且此事又直接与先生有关，诚盼能予协助，或敦促政府当局迅速办理遣送事务，或发给旅费，自行设法南归。以先生在国内之硕望，必能达成佳果，殷望之至，恳祈速予指示免再受痛苦，不胜铭感。赐复寄“中国重庆小龙坎第廿四号信箱程龙庆”，专此**

**敬祝康安**

**星洲华侨回国服务团机工：张荣生、程龙庆、黄金水，第九批卢松深、林渊元、杨木深、张永隆、林金狮、曾杏存、严亚国、伍书旺、伍瑞添、林英侨、蔡成贵、黄金堆、黄□□、江咏源、方俊卿、张木隆同上，三十五年（1946）五月六日。**

当时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遂答应解决护照和办理复员手续。恰在此时，程龙庆的岳母不幸病重，为了照料她，只好留在重庆。

新中国成立后，程龙庆被安排在重庆公共汽车公司工作，连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安全行车标兵。1956年，程龙庆递送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认为“海外关系复杂”，被一拖再拖，但他毫不气馁，坚信理想一定会实现。直至1983年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程龙庆先生退休在家，经常参加市、区侨联的活动，一家人和和睦睦，过着幸福的生活。

 我是三千多南侨机工中的一员，由海外声援抗战到亲身回国参战，在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中，至今依然铭刻在脑海中的有如下几件往事：

**募捐慰劳八路军将士。**卢沟桥事变后，抗日烽火燃遍了祖国大地。不久，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消息传来，广大华侨人人为之震惊，个个义愤填鹰。当得知故乡厦门沦入日寇魔掌时，我更加怀念故土与亲人，积极参加星华各业工人抗敌后援会的活动。抗敌后援会在郑青剑的领导下，组织了星华木业工人互助会筹委会，经民主选举，我被选为主任委员。为了表示对祖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支持，我们以木业工人互助会的名义向筹赈会共捐箱三个，并将卖花所得之钱交筹赈会。以后，我们又将老板认购救国债券的钱，以星华木业工人互助会筹委会的名义寄回祖国，支援抗日，慰劳平型关大捷的八路军将士。事后，我们收到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十八集团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两人盖章的收条。

**分配到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1939年5月，我报名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5月22日，我们第5批机工从新加坡红灯码头出发，计500多人，大部分将赴西南运输处跑滇缅公路军事运输，仅十几名被分配到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我是其中一员，同行的还有程龙庆（现仍留居重庆）等人，领队是李振华同志。

我们乘坐的轮船抵达安南西贡时，属西南运输处的南侨机工先下了船，转火车去云南。而我们一行17人，继续搭原船去香港。途中，为了躲避日寇军舰的搜查，绕道经菲律宾才驶到香港。在香港，又有40多个机工以及回国赴延安的华侨青年（其中有菲律宾的王唯真）上船，然后驶向安南。

在海防，我们办好入境手续手，转乘车进入广西凭祥。紧接着，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开着海外华侨捐赠的二十多部汽车，日夜兼程，历尽艰辛，冲过一道道关卡，出南宁，翻独山，经贵阳，终于在1939年10月抵达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亲驾新车送给新四军。**到重庆后，我在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任中士驾驶员。当时，祝会同志（后在北京商业部任职）是我们车队直接负责人。他在重庆给周恩来同志开车，并负责处理车队的日常事务。我曾驾车在重庆延安之间往返几次，还为新四军送过车。

1940年春，我和余枝同志由贵阳到桂林办事处去接香港运来的卡车。那两辆卡车是叶挺军长的弟弟押运回国的。当时敌机频频出动封锁公路，只能夜间行车，结果在离南宁不远的八塘，一辆卡车翻了车，叶挺之弟失事身亡。我们在桂林得到消息，连忙赶去救援。我把另一辆卡车开回桂林。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李克农处长命我把车开到安徽省岩寺新四军办事处。我们一行三人（其中一个是新四军的副官，另一位是《新华日报》的记者），驾着卡车，冲破种种封锁，终于安全到达岩寺，亲手把车交给新四军。第二天，我和新四军副官乘军车到金华，然后转火车回桂林办事处。

**运物资赴革命圣地。**在重庆办事处的三年时间里，我们曾多次运物资送人到延安。而令人难忘的是最后一次赴延安。

1940年底，抗战进入十分艰苦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却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公路运输线封锁得更加严密。那次我们五辆卡车，两辆小车由重庆出发去延安。走到川陵交界处的宝城时，国民党检查站借口查武器号码与持枪证是否相符进行刁难，强逼我们把车开到汉中。到了汉中，又胁逼我们把车开回宝城。宝城检查站无事生非，要扣押车队的一个军医（该军医原在白崇禧部队做过事），几经交涉才准许离开宝城。途中的一个检查站又故意找麻烦，在扣押一个参谋后，才让车队继续前进。几经波折，车队才进入边区。当我们远远望见延安宝塔山时，大家都高兴得唱起歌来。

我们刚到延安，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不久，我从延安返回重庆，龙飞虎同志随车同行。我们再次冲破重重关卡，才达到目的地。回重庆后，办事处及汽车队人员多已解散，南侨机工队员中我是最后的离队者。离队前，祝华同志带我去见办事处钱之光处长。钱处长非常关心我离队后的生活，给我发了路费。斯时，我怀着沉重的心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我叫陈寿全，可是抗战时期，在昆明西南运输处所属南侨机工服务队里，大家都叫我“歌全”。这是为什么？话还得从当年苏门答腊码头说起：

那时，刚满21岁的我响应陈嘉庚先生的爱国号召，报名参加了第八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为了抗日救国，我不忍告诉年老体弱的父母，我知道这一次飘洋过海回到战火连天的祖国，以后有没有相见的日子是难以预料的。我悄悄从家里跑出来，在邦加岛客属公会的保送下，来到苏门答腊码头，准备登船回国。码头上簇拥着无数送行的同胞，个个脸上流露出眷恋惜别的表情。乐队奏响雄壮的欢送军乐。我悄悄地看了四周，没有一张熟悉的脸孔！这下我放心了，随着队伍大步登上轮船。

“呜——”告别的汽笛拉响了，船慢慢离开了码头，前方就是无边无际的大海。随着海浪一阵阵的撞击，我的思绪随着巨浪翻腾起伏：今晚，当爸妈发现我再也不回家时，他们该怎么为我担心呢？还有那一直跟在身旁的弟弟呢？……正在这时候，一个熟悉的面形忽然闯入眼帘，我拼命睁大眼睛捕捉它：就在那里，是他，是我那12岁的弟弟！一见轮船已离开码头，小弟弟便扑跪在码头上，一边呼唤着“哥哥！”，一边放声大哭。

“小弟，小弟……”我也声嘶力竭地喊叫他，我叫他赶快回去告诉爸妈，我回唐山去抗日救国，请他们原谅我的不孝！等赶走日本侵略者，我会马上回来的！……可是，海风吹散了我的话，小弟仍然跪在码头上痛哭！渐渐地哭声听不见了，他的身影也看不见了！我心情沉重地回到舱里，看到同伴们和我一样，仍然沉浸在别离的伤感中。我呆呆地望着大家，心想：难道就这样带着眼泪上战场吗？可是，怎样让大家高兴点呢？正在无所适从的时候，我仿佛听见空中飘来了为我们送别的雄壮军乐声，不由精神一振，引吭高歌起来：

**向前走，别退后，**

**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同胞被屠杀，**

**土地被强占，**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

**亡国的条件，**

**我们决不能接受！**

**祖国的领土，**

**一寸也不能丢！**

唱着唱着，我看见有的同伴眼里露出刚毅的光，有的同伴已在轻声跟唱。慢慢地，变成了全船机工的大合唱。

这首歌，激励着我们从印尼到新加坡，又领着我们踏上国土，奔向抗日民族解放的战场……因为我常常领头歌唱，鼓舞了同伴们的斗志，因此，大家都亲切地叫我“歌全”。

贵州之行前，我读到南侨机工许志光的一份史料，颇具传奇色彩，他在决心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抗日的同时，将其全家老小送回故乡莆田安置。他本人的爱国举动，以及老母和妻儿的如此深明大义，实在难能可贵，十分感人。至今他仍珍藏着一封1939年陈嘉庚先生介绍回国参战的亲笔信。

循着这一线索，在贵州省侨联的帮助下，我在贵阳公园路44号找到了许志光老人。见到有人专门收集有关南侨机工的历史资料，老先生显得十分激动，愉快地接受我的录音采访，话题就从海外家世谈起。他说：

“我是1914年出生在新加坡的，祖籍福建莆田，6岁时开始在兴安会馆创办的宏文小学读书，13岁时到陈嘉庚先生的橡胶厂当学徒，学习机修，维修制鞋机器。15岁时在一家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16岁开始学开汽车，领到驾驶执照后开了几年车，20岁就自己买一辆‘的士’。当时在新加坡，司机的收入较高，经过几年的奋斗，经营出租车，还建立了小家庭，家境逐渐好起来了。‘七·七’抗战爆发，为了支援祖国抗战，我将出租车让人开，自己出来义务作一些救亡工作，参加筹赈会的募捐活动，上街宣传筹赈救国。南侨总会发出通告，号召南侨机工回国赴滇缅公路服务，我就下定决心回国参战。”

当我问起他是如何把全家老小送回国而独自轻装上阵时，许志光笑了笑说：“当时我已26岁了，上有老母，下有妻儿，一家五口，我已不能像其他快乐的单身汉那样屁股一拍就走，我必须将家属妥善安置才行，于是，决定把他们送回莆田乡下老家。母亲深明大义，妻子贤惠通达事理，她们都非常支持我参加机工团回国，当时我又动员妻弟陈光明（潮州籍），一起报名参加机工队，他也非常乐意，并愿意将其母（即志光之岳母）送回国内老家。这样一来，我与内弟可以无后顾之忧，轻装上阵了。”

“当得知我打算将全家老小送回国而铁心参加机工团，陈嘉庚先生非常高兴，立即叫南侨总会秘书写了一封介绍信，并亲笔签了陈嘉庚三字……”听到这里，我迫不及待地问：“后来陈嘉庚先生这封信呢？”

“还在！还在！几十年来我一直珍藏在身边！”许志光说完转身进入内屋，取出一张虽已泛黄但字迹仍清晰完好的信件。信的全文如下：

**迳启者：华侨青年许志光君，热心国家，此次毅然牺牲原有职业，回国服务司机工作，帮助国家，殊令钦佩！现伊母及其妻子，拟不日遄返原籍安居，所有沿途经过祖国关隘码头，一切行李检查手续务希军政长官予以特别优待，实为至盼。此致**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公章）**

**主席陈嘉庚**

**廿八年三月十三日**

当我取出照相机翻拍这张不寻常的信件之后，许志光继续说：

“我们是第二批回国机工队伍，总数200多人，总领队是钟运熙，我被任命为副总领队，兼任新加坡中队负责人。回国时，新加坡《星洲日报》派了随团记者李志达和我们一起出发。启程那一天（1939年3月13日），码头上到处彩旗如林，锣鼓喧天，鞭炮声震耳欲聋，一片热烈景象。新加坡‘和丰’轮船公司派出海轮送我们踏上征途，同船回国的母亲、妻子及两个孩子，亦享受特别铺位免费同行。她们后来转车回到福建莆田定居，我则随机工队伍到达昆明，进入西南运输处训练所”

“在训练所集训之后，我被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一大队的补充队当班长，从事芒市到保山之间的军运任务。随后，又调到第9大队27中队当中队长，驻扎在保山。滇缅公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初是险路和疟疾。当时该路刚抢修完工，遇到雨季，使我们尝到‘山大王’的滋味；有时呆在山上两三天，没有吃的，只好上山采野果子充饥；又时常被‘疟疾蚊’咬叮，患上‘打摆子’，发冷时即使盖上重被、裹着毛毯也无济于事。幸亏机工战友献出印尼筹赈会送来的‘金鸡纳霜’（奎宁丸），才转鋢为安。”

许志光回忆说：“我们南侨机工团是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回到祖国的，大家怀着共赴国难的壮志，离开了海外温暖的家庭，许多人还抛弃了原来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前来报效祖国。我们回国后，按照当时的货币核算收入，月薪远远不及在南洋时的半数，而且衣、食、住、行、工具及药品都十分缺乏，工作条件极差。但是，无论在运输线上还是在机修厂里的华侨机工，大家都毫无怨言，自觉地勤奋工作。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证了滇缅公路上每日平均运入三百吨军火，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可是，华侨机工的爱国热情，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当局的冷遇，分配到的尽是一些老掉牙的杂牌车，行车路线也尽量环境恶劣的危险地段。加上当时滇缅、滇桂黔一带气候多变，疾病流行，使回国华侨机工的生活十分艰苦，不少人因翻车事故及疾病献出年轻的生命。鉴于这些情况，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于1939年8月派发交际委员刘牡丹前来慰问，并将了解到的有关实际情况向总会报告，总会立即着手改善回国服务人员待遇。1940年初，在海外侨胞的资助下，南侨筹赈总会首批将一百辆美制‘GMC’牌新货车运到仰光，我们组织机工把车接回来，并按照总会的意图，组成了华侨先锋运输队第一大队，事隔不久，南侨总会又将一百辆美国新制的‘大道奇’货车经仰光运来，于是又成立了华侨先锋队第二大队。两个运输队的人员全部都是华侨。后来，由于时局发生变化，总会原订分批给运输队送车的计划被迫中断。1940年底，华侨先锋运输一大队和二大队在缅境腊戊、八莫一带执行任务以后合并，原一大队队长刘贝锦任大队长，连文瀛任大队副，我担任了第三中队长，继续在中缅边境的遮放至保山一带担任紧张的运输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1942年初，日寇由缅甸进逼云南边境。许老先生回忆起这一时期，心情十分觉重：

“当时我们中队奉命由遮放撤回昆明，一路上塞车难行，我于5月4日天亮时开过惠通桥，当时刚到保山时，那‘5·4保山惨案’被炸尸体惨不忍睹，事后得知，仅我们中队就有十几辆卡车在龙陵一带遇敌后下落不明，有的被阻隔在怒江西岸，可能牺牲了。”

“滇缅公路断绝后，在混乱的时局中，南侨机工团的成员四处流散，许多人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白天外出自行谋生，晚上就住在防空洞中。本人也历经一段失业流浪的生涯。尽管如此，机工队的大多数成员，仍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顽强地向困难作斗争，坚持到抗战胜利。”

当我问及抗战胜利后，南侨机工的境遇如何时，许老先生说：“抗战胜利后，已改名为中缅运输局的原西南运输处移交给云南运输公司。南侨机工纷纷要求返回南洋与家人团聚，但遭到国民党政府别有用心的阻挠。为此，陈嘉庚先生于1946年6月在吉隆坡召开‘支援华侨机工复员大会’，要求政府做好机工复员工作。随后，各地机工来到昆明登记，截至当年年底，只剩一千多名机工前往登记，陆续返回南洋者仅千余人。大家遥想当年共有三千多人回国参加抗战，如今已有三分之一牺牲了，我们虽然为此伤心落泪，但也因为替祖国作出贡献而感到光荣与自豪。新中国成立后，尚有数百名机工留在云贵高原一带。而如今，贵阳只剩下三人，且都年逾古稀，已垂老矣。但每当我回想起这段战斗经历，常常又觉得回到青春热血沸腾的时代。”

贵州，有一位为了“驱除日寇，还我河山”而改名“李山河”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他是第九批回国服务的，曾在滇缅公路立下汗马功劳，不料却遭受冤狱磨难。下面记录的是这位机工的辛苦回忆：

我原名李成业，祖籍海南岛。1927年共产党在家乡闹革命，我也参加了儿童团。不久，地主还乡团回来了，革命受挫折。1928年我13岁时随亲友到新加坡。而父亲与二叔留在家乡，不幸于1932年被反动派枪杀。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海外华侨掀起抗日救亡热潮，侨胞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在新加坡加入星华茶业工友互助社（社长为吴伦），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每逢星期天或假日，总是参加南侨总会举办的卖花募捐筹赈活动。当时，南侨总会主在主席陈嘉庚先生的领导下，援助祖国抗日的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南侨总会宣传委员侯西反的宣传演说特别吸引人，鼓动性极强，每次演讲，我总是到会聆听。

1939年，陈嘉庚先生发起号召，南洋华侨青年纷纷报名参加南侨机工服务团回国抗战。为了表达“消灭日寇，还我山河”的壮志，我改名“李山河”，满腔热情地去报名。可是，南侨机工团要求有开车技术的，我不懂开车，结果报名未被批准。但我没有泄气，我下决心学开车，终于通过了考试，加入第九批机工队伍回国。

8月14日，我们乘轮船经西贡回国，在昆明潘家湾集训，考试合格后，编入西南运输处第九大队。不久即参加南宁战役的军火运输。当年11月底，南宁第一次失守，我们奉命撤回昆明。此时，陈嘉庚先生派南侨总会刘牡丹前来慰问南侨机工，我们才得知南侨总会送来给南侨机工大批的物品（衣服、药品等），都被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侵吞了。得知之时，我们非常气愤；但为了抗日救国，也只好忍受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为抗日军事运输和贡献，无暇去计较。

后来，第九大队调往滇缅公路抢运，大部队设在芒市。我们行驶在芒市至下关一线，有时直接到昆明。经常冒着敌机的空袭，闯过多少次滇缅路上的风险。我亲眼看见不少机工战友翻车牺牲。但大家抱着抗日救国不怕牺牲的决心，埋葬战友的尸体后，又悲愤地投入新的战斗。

谈起本人在滇缅公路的经历，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终生难忘的冤狱：

1941年4月，我在保山与当地一个女青年小王（保山中学生）订了婚。有一天，未婚妻的哥哥王富民（保山师范学院员工）搭我的军车去下关参观大理花会，车子刚开到保山大板桥就被稽查站扣留了，说我稍客带货违反军令，属于贪污行为，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关了起来。我怎样解释也没用，就被关押在保山二个月，然后转送昆明看守所。西南运输处军法处不进行调查核实，判我两年六个月徒刑，送入昆明线局街第一监狱，这是含冤坐牢的。我被带上脚铐，受尽折磨。

当我被送进监狱时，还看到几十位南侨机工也被捕入狱，其中有九大队的陈家标，十二大队的吴国栋、符和明、林宏英、戴新菊等，有的现在已记不清名字了，他们也被带上脚铐。当时国民党的监狱里，有所谓“四大金刚”、“八大天王”。他们是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犯人，这些恶棍凶得很。我们这些海外归来抗日的侨工，含冤入狱，竟要受这些恶棍的欺凌。他们要索取什么东西都得给，不然就得挨揍，有理也说不清。这些人在狱中横行霸道，反动当局从不过问。一间牢房只有十平方米左右，要关十多个人，只能挤在地板上睡，又脏又臭，还得受“四大金刚”的敲诈。我们侨工原来每月只有30元国币补贴，生活费用大都靠侨汇。被关入狱后没钱了，就更受欺负。每人一天只吃两餐，每顿只有二小碗带沙的糙米饭，没有菜。当初大家为了抗日救国，放弃了海外优裕的生活而回国，如今却落个悲惨的下场。许多南侨机工都想不通，就在狱中开展斗争。为了改善生活，我们侨工向看守要求工作，于是弄来一些布鞋来纳，每双一角钱，每天可纳两双，便可以买一些菜来配了。令人痛心的是，日机常来空袭，警报一响，看守人员就逃跑了，竟不顾我们这些为抗日救国而来的南侨机工的死活！牢里的铁窗生活是暗无天日的，生病也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只得听天由命，能活下来是侥幸的。与我同牢的九大队陈家标，就在1942年患霍乱症死于狱中，年仅20多岁。这一次，狱中“犯人”因得不到医治，5天内就死了100多人。死了人还要叫我们抬出去埋葬。抬尸者也染上疫症，死于非命的。我亲眼看见外面有三间专门放置死人的房间，里面装满了尸体，有的机工今天还被派去抬死人，明天则由别人抬出去埋葬掉。

陈嘉庚先生在《南侨回忆录》曾写道，华侨机工无罪被关在暗房，写的就是我们的情况。陈嘉庚先生还派侯西反到监狱里看望过我们。侯西反在新加坡时我们就已经认识了，他是一个爱国侨领，热心抗日，宣传鼓动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祖国抗战，抵制日货。他的爱国行动惊动了英国殖民政府，1939年底被驱逐回国，在重庆中侨委继续做抗战护侨工作。当他看到狱中看望我们时，安慰我们说：“您们是爱国华侨机工，是含冤坐牢的，我要去重庆向政府当局交涉！”后来他为机工事到重庆交涉之后，不幸在返昆明时飞机失事殉难。我们每个南侨机工都放声痛哭，并为侯西反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我于1934年出狱，此时，惠通桥已炸断，滇缅公路断绝了，许多机工都失了业，我只好到昆明同仁街友联荣店当工友。此时曾亲眼看过有的机工战友贫病交加，冻死在昆明街头，而我本人也自身难保。1945年2月，我转到美国陆军执行所当工友抗战胜利后，经熟人介绍，我到后勤总部汽车连当驾驶员，调往重庆，与我在一起的还有侨工刘瑞齐（永春籍，今在福建）、周学锦等人。1949年，我在四川参加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见图86）。新中国成立后，我转到贵州汽车运输总站工作，直至1979年退休。

时光流逝，转眼五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当年参加南侨机工的经历，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我是怀着一颗抗日救国的赤诚之心回来的，尽管受到一些挫折，但仍不违初衷，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作为一个南侨机工幸存者，我有责任将这段亲身经历写下来。同时，我还有责任将所熟悉的已故南侨机工战友的无名英雄事迹记录下来：

南侨机工符平，有一次运军火回来，因病车停在龙陵站，结果死在停车站上，年仅27岁。

颜振生，也是南侨机工，病死在永平站，那时大家推运繁忙，他生病时我们都不知道，等到病死了，站上才通知我们去为他埋葬。

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一位侨工战友黎锡宽，他也是海南籍。他没有死在日寇的炮火下，倒是被国民党第五军开枪打死在云南马龙。当时，他开车跟在军马之后，慢慢地走了几公里路。军马不让路，黎锡宽性急，按了一声喇叭，军马惊跳一下，他及时刹车。头刚伸出驾驶室外一看，“砰”的一声枪声响了，正好击中头部，当场死亡，年仅26岁。他的坟墓还留在马龙。

南侨机工抗日有功，纪念碑可作为历史的见证。

在曲靖沾益汽车站，我拜访了当年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邝振声。当我说明来意之后，老人面对沙沙转动的录音机，略一沉思，便滔滔不绝地讲起40多年前的往事。夕阳从窗台上透射进来，在老人饱经沧桑的脸上涂上一层古铜色。

“我原名叫邝天祥，现名‘邝振声’则是1942年滇缅公路断绝后，因失业不得已而冒名顶替的。”

“我出生在泰国董里什田埠，祖籍广东，从小就亲眼看到华侨在国外受到各种歧视和压迫。11岁时，一次见到卖鱼的华侨商人因事与当地人吵架，泰警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华侨拖出去，如拖死狗一样。那件事给我很强烈的刺激，我感到祖国不强盛，海外华侨才受到如此歧视。祖国全面抗战开始后，当时泰国华侨社会反应强烈，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但由于当地政府禁止华侨进行抗日的政治活动，因此报名参加南侨机工，是秘密进行的，自费悄悄回国，如林犹兴、岑金洪等人，就是历经曲折自费到昆明的。而我们一行七人，则在筹赈会许先生的资助下回国，1939年8月8日启程。临行前，董里华侨团体给我们送了一面三角锦旗，然后由许先生领队，从什田乘汽车到高头廊，再转乘国际快车前往槟城。在槟城，我们受到在此留学的泰国董里华侨学生的热烈欢迎，并由该校师生带领包车游览了槟城的一些名胜古迹，还与留槟泰华师生一起摄影留念。”

说到这里，邝振声转身到房里取出一张珍藏近半世纪的发黄照片（见图37），前排七个机工为：左四钟炎祥、左五蔡汉良、左七即本人邝天祥（后改名为邝振声）、左八钟道清、左九蔡高耿、左十陈潮海、左十一蔡惠文。

接着，老人继续回忆：

“8月12日，我们到达新加坡集中，加入第九批回国机工队伍，受到隆重的欢迎。陈嘉庚先生接见了机工团，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8月14日，满载华侨机工的‘丰庆轮’起航，三天后抵安南西贡，受到当地侨团的热烈欢迎，送来了上火车吃的面包和罐头食品。8月23日，终于到达昆明，驻进潘家湾训练所。经过短期军训后，我被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6大队18中队，驻扎在贵州关岭场。”

谈及回国后的首次行车经历，老人对所走过的路线与地名的记忆，竟是如此清楚：

“那次我们由贵州关岭到昆明接柴油车之后，转运军用物资到重庆。因为头一次远程行车，对国内公路不熟悉和不习惯，从昆明到重庆竟走了一个多月。返回时，队部已经搬到广西柳州了，驻在马鞍山。由于南宁告急，上级命令我们突击抢运浮石兵工厂机器，转移到柳州。当任务完成之后，南宁已失陷，我们车队就搬回六寨。此时，大塘到南棕的公路已切断，改由车河新开一条公路，由车河到东兰，经田东、福昌、天保，靖西到岳圩。该线连接安南国境，从境外的同登、重庆府一带，抢运外援军用物资入广西，我们队部奉命调驻东兰，穿梭行驶在中越运输线上，经常受到敌机的猖狂空袭。南宁沦陷后，敌机从南宁起飞，每天都来轮番轰炸，企图扼断该运输线。为了避开敌机空袭，车队被迫改为夜间行驶，白天将车停在树林底下隐蔽起来，太阳落山后才出动。有时候任务紧张，只得冒着敌机轰炸，白天也出车。好几次，我们的车队在行驶中被日机追上了，便迅速将车开进山洞躲起来，敌机追至洞口，无可奈何，只扔几个炸弹又飞走了。幸亏广西的天然山洞很多，有利于躲避敌机的空袭，所以我们的队部住地都选择靠在山洞边。”

“从田东到福昌过河需搭渡船，每当等候过渡军车摆成长龙之时，敌机总要趁机来轰炸。没有轮到过渡的车上人员，只好先离车寻找躲藏的地方。接下来，队部又搬到安南边界的地方，抢运境外转运来的军用物资。当时不知是谁的主意，在安南境内支着一匹很大的白布，上面用英文字样写着‘安南地界’，日机空袭时见到安南地界就不炸了。有一次我曾见到敌机来了，只好转开回安南境内，竟保平安无事。1939年底，当日军准备在安南登陆前夕，我们驻岳圩的队部已经撤退了，当我由越境重庆府装运汽油回交界处时，该路已被民工挖了半边，一段一段地破坏，我们艰难地驾车撤退，稍一不慎，则可能翻车爆炸。这是一次艰难的历程，一路上小心翼翼，开过遭破坏的公路，退回六寨待命。”

“1941年，在贵州甘巴哨新成立第10大队，其中156中队是清一色的华侨机工，中队长是林君凯，中队副是白清泉。当时长沙再度告急，我们奉命将湖南晨溪兵工厂的全部机器搬迁至四川东溪，前后将近运了一年，才全部运完。第二年，整个大队调往昆明，住黄土高坡保养场。主要任务是继续到畹町、遮放等地抢运，跑滇缅公路运输。由于西南运输处驻缅甸办事处中印大队缺驾驶人员，印籍王亚能任大队长，于是我们由林经光带队加入中印大队，开赴腊戍。随着战局的发展变化，日寇入缅沿滇缅公路进攻云南，我们奉命撤退。在撤退时，有许多华侨难民要求乘我的车撤退，于是我载着汽油又搭了20多人连夜开车，天亮时开到畹町。当时退回昆明的车队摆成长龙。过惠通桥到达老鲁田吃饭时，抬头望见一群日机飞往保山方向，当天下午我们到保山时，只见保山已被炸成废墟，有的大腿被炸飞到电线杆上挂着，真是惨不忍睹。这便是举世震惊的保山‘五·四惨案’，时在1942年5月4日。”

“我将车子开到保山站报到，要求卸货，而车站一片混乱，根本无法卸，只好开到下关才卸了。随后，我们奉派到凤仪乡下疏散，待命一个多月。接着，我们接到通知，中印大队的车全部开往昆明西站停车场。交车后，当局便撒手不管了，因为惠通桥已炸断，滇缅公路切断了，许多华侨机工竟失了业。”忆及此事，邝老先生至今心情仍很激愤。”

“刚开始，我们还有点钱，而钱用完了，便卖衣物，衣物卖完了，连每天吃一顿饭都成问题了。夜间只好蜷缩在昆明小西门城脚的防空洞里。每洞有一米宽，可勉强容纳二人，盖的是稻草和麻袋。白天到金碧路和祥云街，见到熟人讨点钱，但见到的都是失业者。有的机工就因连讨几角钱吃饭也讨不着而饿死。我记得最深刻的是，同我第九批回国的雪兰莪机工邝松登，与我同住一个防空洞里，睡到半夜又冷又饿，就双脚一蹬悲惨地死去了。”

“这是南侨机工史上最艰难的一段，度日如年，究竟死了多少人，都没有准确的统计。那种艰难日子是怎样度过来的，至今回忆起来，连我自己都很难相信还能活下来。对于多数南侨机工来说，这也是最难捱的时光。情急之中，我跑到黄土坡请求大队长王健存、胡凯军、白清泉相助，在白泉清的帮助下，暂时收留下来。过了个把月，中队长胡凯军对我说，查到队上空了一个名额，此人开小差离开了，名叫‘邝振声’，于是，我就顶了这个人的名，把原名邝天祥改为‘邝振声’了。”谈到此，邝老先生惨然一笑：“我这个冒名顶替的假名，竟一直保留到现在，可是，查南侨机工的档案，只有记载‘邝天祥’才是真正的我啊！这是不得已的事，当日若不去顶名补缺活下来，也许早已饿死在防空洞了！”

“在此期间，我跟华侨机工朱松胜（后留居在广西）当助手，开的是‘木炭车’（当时缺乏汽油，只好靠烧木炭发动），帮他摇木炭炉，路线主要由小西门至黑林铺。过后，又跟另一个机工黄和平（见图14，今留居在福建漳州）开客车，亦是木炭车，跑昆明至下关一线。”

“1944年底，有关当局调集部分失业机工到晋宁盘龙山集训。集训所所长为葛丰，副所长扬友柏，大队长是马风岗。在盘龙山主要是修路，也听听技术课。几个月之后，又回黄土坡156中队，然后分到昆明巫家坝滇缅运输局空运站驳运飞机运来的物资。有一次，敌机轰炸巫家坝机场，新加坡一个南侨机工遇难。我们在这里坚持到日本投降，飞机场工作结束之后，才调到曲靖开大道奇车，从四川泸州运盐巴到曲靖。不久，我又调去跑滇缅路。”

“1946年南侨机工复员，在昆明南强街福建会馆发给每位机工200美元（折67万国币），我捐出7万元国币修理福建会馆。当时复员来去自由，我便继续留在昆明，驾车行驶下关、保山一线。后来，在华侨机工黄辉庭的帮助下，自制卷烟售卖，也做一些小本生意，一直度到昆明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侨务处特别关怀华侨机工的失业人员，尽快地向各单位联系，安排工作。”录音机磁盘在继续转动，老人的声音里充满着激奋和喜悦。

1950年10月，侨务处通知失业机工人员到黄公西街川藏公路报考司机，邝振声被正式分配到黑林铺小团山工作，整修旧万国车，修好之后，就装运筑路材料到下关等地。在以后的工程建设中，他积极克服困难，出色地完成任务，1952年光荣地出席云南省第一届工农业劳动模范大会。1955年，他调到沾益运输总站，工作十分出色，连续得过安全先进工作者奖状。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老人也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政治迫害，但他坚信祖国最终会了解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得以平反昭雪。现在，我虽已年过古稀，退休在家，但我心情舒畅，继续贡献余热。单位领导特别关心我们这批参加抗日的南侨机工，最近还分配给我一套新宿舍，宽敞明亮，我们全家都感到非常满意。看到我们为之奋斗过的祖国一天天强大，我们这些老人可说青春无悔了。”

现居住在云南玉溪汽车站的退休驾驶员郑文通（见图87），为什么要改名换姓叫“黄亚涛”呢——说来话长，那还得从50年前讲起。请听他的讲话录音吧：

我原名郑文通，祖籍福建莆田，“黄亚涛”这个名字，是为了避开家人的阻挠，完全是为着抗日救国，参加新加坡第五批机工团回国而改名的。

1939年，正当祖国抗战进入最艰难岁月，急需大量熟练司机从事军火运输。南洋华侨青年在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组成了“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由新加坡起程分批回国抗战。在广大侨胞爱国热情的感召下，我也报名应征。大哥知道后，向筹赈会捐献了500元，却不让我参加机工团回国。当时大哥要我为郑家后代着想，认定此去必九死一生，故千方百计阻止。我与大哥争辩，他却说：“大道理谁不懂，为了抗日救国，每次募捐，我们从不后人，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华侨主要是有钱出钱嘛。”说完后硬是要把我留下，让我去学经商，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可是，我的决心已定，不到黄河心不休，一气之下，和我的老板商议，将自己的姓名郑文通改为“黄亚涛”，祖籍福建改为广东，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了第五批回国机工团。当我大哥见我剃了光头，换上军装，要再阻拦也没有办法了，只好转变态度支持我回国。

1939年5月22日，我们由新加坡启程回国。在昆明潘家湾集训后，我被分配到芒市接车。当时滇缅公路刚开通，滇西芒市一带路段最差，坡陡路险，更糟的是汽车运输需经原始森林的“烟瘴地带”，毒蚊成群，恶性疟疾不断奔去华侨机工的宝贵生命。当地流传的民谣：“要上潞江坝，先把老婆嫁”，就是滇缅公路险恶的真实写照。有一次，我从保山到芒市，顺便带一位熟人，当晚因风雨大作无法行车，在龙陵住下，结果被检查组查出，随后被押往昆明五华山拘留所，被法院判了两年半徒刑。其原因是军车不准带人，带人则违反了军令，也不管是熟人。我怀着抗日救国的赤子之心回来，却被卷进监狱受折磨。幸亏同乡华侨的鼎力相救，我只蹲了半年牢。所剩下二年徒刑以每天一元折算，付出很高的代价，才把我赎了出来。

吃了这次大亏，出监之后，我吸取了教训，又到下关华侨十四大队报到，把憋了半年的劲头全都投入抗战军事运输中去。为了多拉快跑，我们有时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虽然吃不好睡不好，但为了抗战胜利，谁也没有怨言。

由于华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抢运军火，增强了中国抗战的实力，被日寇视为眼中钉。于是日军出动飞机重点轰炸惠通桥和功果桥，企图炸断该路的咽喉。有一次，我经惠通桥回下关，行驶途中遭敌机轰炸，我前面那辆车上的机工陈天生不幸牺牲，而我右脚也受了伤，鲜血直流。但我咬紧牙关，不顾一切先把牺牲的战友拉在车厢后，继续将汽车发动起来，开到旁边隐蔽处，并通知后面随车人员继续将该车开回，然后才开着自己的车子前进。到了“老鲁田”我才抽空包扎伤口。车到“七0七”时，由于我的右腿流血过多肿胀发麻，后面赶来的分队长发现后，当即将我拉上别的车送往昆明治疗。

我在昆明金碧路陆军医院治疗时，医生知道我是华侨，就说治疗要花很多钱，否则要把整条腿给锯掉，其意要我多花钱。恰好此时南侨慰劳团到滇缅公路慰劳南侨机工，侯西反先生来医院探望侨工伤病员。我把情况反映给侯先生，经他出面疏通，医院才对我进行认真诊治。经一个多月的治疗才出了院，但留下了后遗症，直到现在还有些跛脚。

1942年5月，惠通桥炸断之后，我们许多机工失了业，我回到昆明南强街华侨互助会，因生活无着，到处漂流打工。抗战胜利后，1946年10月，我随500多名机工及其家属复员返回新加坡。由于生活环境改变了，处境不好，因此五十年代我再次回国定居云南，在玉溪汽车站工作直至八十年代退休。

在风景如画的云南大理，我登门拜访了一位被机工战友们称为“无名”英雄的南侨老机工——李伟庆。他为什么被称作“无名”的呢？原来，“李伟庆”的名字并不是直接记录在南侨总会统一组织回国的一至九批南侨机工名册上，而是收录在民国历史档案馆的“荷属华侨救护队”档案中。年逾八十的李伟庆老人，根本不在乎他的名字收录在“荷属华侨救护队”（1938年）档案与南侨机工名册（1939年）档案有何区别，反正都是回国参战，并肩奋战在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线上。他说：“赤子报国，回国服务，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下面记录的是这位机工老人的回忆：

我叫李伟庆，原籍广东梅县，因祖父参加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遭到清政府的迫害。父亲只好逃到印尼谋生。我出生于印尼苏门答腊明古粦。

1938年，我告别了老母亲，参加“荷属华侨救护队”回国服务。这个组织是由巴达维亚养生院院长、著名医学博士柯全寿等侨领发动的，带着印尼华侨捐赠的大量药品、救济品和救护车，来到祖国的抗战疆场。我们一行40多人，是乘轮船经马尼拉、香港回国的，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的安排，我们这批救护队员被分散到各个战区去救护、运送伤病员。因此两湖、两广、川陕都有我们救护队的足迹。我和林坤良被分配到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部”。当时，必须绕道安南的海防，经广西才能转到贵阳。为了避开敌机的狂轰滥炸，我们将救护车进行了伪装，昼伏夜行。用了五天时间才到达图云关。图云关设有“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队长是新加坡著名医学博士林可胜（侨领林文庆之子）。

1938年武汉、广州失陷之前，我带领七辆车组成一个救护车队，往返于贵阳和海防之间，运送各种物资。1939年4月，“中国红十字会总队”把驻在湖南的救护车队部分车辆调回图云关，准备派往刚开辟的滇缅公路去运输国际援华物资。由于该车队的驾驶员都不会说普通话（通常只讲英语、印尼语等），于是我受命带领这支车队前往云南畹町。

滇缅公路是应抗战急需而建成的泥巴路，穿越滇西海拔3～4千米的高山峻岭。其惊险程度是世界所罕见的。由于路基不固，时常塌方，尤其遇上雨季，泥泞路滑，车子陷下去便难以自拔。为此，在龙陵地段原始森林处，两旁都备放一些大树杆。如果车辆陷下去，就将这些木头作为枕木垫上去。如果再陷下去，又铺上枕木。我们作为滇缅公路首批运载军事物资的车队，被称为“开路先锋”，历经许许多多的艰难和意料不到的险境。

1939年雨季的一天，我过了惠通桥，汽车在一处急弯险路上翻车，左大腿被汽车大梁下一颗5寸长螺丝穿入，至今仍留下一处伤疤，是我一生中经历最危险的一次，留下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那一次，我们的车队刚从畹町运载一批药品到贵阳，随即奉命两次抢运一批重要物品。于是不顾疲劳连续出车，出车时特从贵阳运载桐油出口。我们红十字车队一行五部车子，每辆车载18桶桐油。我当领队，带车殿后（四辆在前）。当时由于敌机轰炸，军事委员会颁布命令，惠通桥只能在下午三时到第二天上午9时前才准通行。我们车队来到惠通桥边，便排队等到下午3时才通过。当时桥面只能容单部车辆过桥。我们约定当夜在腊勐车站集合，于是前面4辆先过桥了，我在后面办理公文手续（检查通行证）。当我开过惠通桥之后，刚刚爬上一道陡坡，由于路基不固，车子突然倾覆，翻了几滚，在距离江边几米处被一块石头挡住了，车门自动打开了，我被甩出车外，压在大梁底下，被汽车底盘一颗大螺丝钉穿进左大腿，血流不止，昏迷过去了。大约过了半小时，我才苏醒过来，看到自己被压在车底下，一棵特大螺钉穿进我的大腿，螺钉又顶在底下一块石头上，动弹不得，我才明白已经翻车了。此时天快黑了，过路的车辆也不易发现我翻车在深沟底，成群的毒蚊嗡嗡嗡轮翻来乱叮乱咬，我也无可奈何，只盼望着同事们开车至腊勐之后回头来找我，也得几个小时，我还能挺得住吗？我隐隐预感到这回难免一死。但抗战未胜利，我不能死！我咬紧牙关，提醒自己要坚持住，同志们一定会来救我。

真所谓“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一筹莫展之际，老天爷帮助我也，下起了一场及时雨。“下关风，龙陵雨”，这里的气象变化莫测，瓢泼大雨说来就来，多亏这场大雨的冲刷，使得原来顶住我大腿下面的那块石头渐渐松动了。我抓住这个天赐良机，用手一直扒开周围泥土，终于使这块石头掉下去。我的左腿才从螺钉穿压之下拔了出来。

这时，大约是晚上7点多钟了。我的助手彭莲贵（下关复兴村民，当时在红十字会车队当勤杂人员，现住大理州汽车总站）与其他同事开车赶来救援，我远远看到他们提着汽灯在叫喊，我担心翻车的汽车及车上的桐油爆炸，马上叫他们不要提汽灯下来。于是他们只好摸黑下来，把我抬上车，急忙开往腊勐一个卫生所。医生察看之后说伤势严重，于是立即转送到龙陵县医院。当我在滇缅公路惠通桥翻车受伤的消息传出后，附近的老百姓都来探望，有个小脚的老大婶提着一蓝鸡蛋送来，口中不住地祝福：“先生您命长，老天会保佑抗日将士的！”第三天，我因伤势太重，只好转到昆明白龙潭医院诊治。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伤口终于痊愈了，只是在左腿上留下一处螺丝钉穿过的大伤疤。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云南成家立业。解放后，我在大理州汽车运输总站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1945—1985）之际，我珍藏的一张“荷属华侨救护队”的照片（见图88），被送到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展出。1986年，陈嘉庚先生之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共存先生亲自到大理与我们这些南洋华侨机工座谈，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还与我们一起合影留念。随后，国家制定了政策，照顾我们这些尚健在的南侨机工享受100%退休金待遇。目前，我正在继续写一些回忆录，贡献余热。

1988年1月8日下午，笔者在滇缅公路大理段的沮华洞汽车保修厂下车，按照云南南侨机工联谊会提供的档案名单和有关线索，径直来到厂区宿舍采访了退休在家的75岁南侨机工林树容。

林树容是海南岛文昌人。当他尚在母亲腹中时，父亲便往泰国谋生去了，一去未回，后来病逝在南洋。6岁那年，母亲又不幸病亡，他便成了孤苦伶仃的孤儿，幸亏堂兄从海外回乡探亲，就将他带到新加坡。先在华侨小学读书，12岁时就入修车店当学徒，15岁时学会了开汽车。起初为一个英国人开车，月薪50叻币，三年之后，自己筹集了一笔资金，买了一辆汽车载客，收入还不错。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新加坡学生们上街卖花义捐，筹赈救国，他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精神每次用车子接送学生上街义卖，都不收钱，尽自己的一份爱国情义。

1939年初，报纸传来陈嘉庚先生号召华侨机工回国服务的消息，林树容满腔的热血沸腾了。他得知祖国滇缅公路军运输线正急需司机，便前往筹赈会报名，经体检及考核之后，被批准参加机工团。他将自己的汽车送给朋友，并特别交代那位朋友：送学生上街卖花不能收费。然后加入第五批回国队伍，于1939年5月启程，抵达昆明后编入西南运输处第14大队14补充中队。

在滇缅公路抢运抗战军火，几乎每一个南侨机工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惊险而悲壮的经历。林树容当时主要行驶在保山至下关地段，这是滇缅公路最险要的路段之一，沿途一边是高山峻岭，另一侧则为峡谷深渊，他曾经历无数的惊险，多次死里逃生，身负重伤，至今仍留下许多不顽疾。可是林树容不愿意多谈自己的事，他说，我们这些人回国参战，出生入死，能活着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不容易了；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摧残，现在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国家还制定政策照顾南侨机工安度晚年，这是不幸中的大幸，比起那些为国殉难的机工战友，算是值得庆幸的。

我特地问他，在滇缅公路印象最深刻、终身难忘的是什么？他回答说：“是战友！是一位为国捐躯的无名英雄——吴世光！”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林树容夤夜护送机工战友遗体归队的事迹，虽然时隔近半个纪世，但他接受笔者的录音采访时，仍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我按下录音键，记录了林树容的口述：

那是1940年夏天一个炎热的黄昏，我刚完成军运任务由保山开车回队部下关，途经永平加油站时，站长对我说：“林树容，你把这位翻车牺牲的华侨机工运回队部。”我连忙问道：

“是谁？”

“是吴世光！”

一打听，原来是海南籍南侨机工吴世光，今天下午在永平一公里处翻车滚入悬崖深谷，当场不幸身亡。附近的修路工沿着峭壁下去抢救，竟无法将遗体抬上来，只好想出一个办法，用长绳子捆住尸体拉了上来，然后将尸体停放在加油站旁，等待着过路的机工车队运回队部安葬。

吴世光，是我的机工战友，与我一同编入第五批回国的，在老家海南岛还有妻子儿女。他青年时旅居新加坡，当了汽车司机，激于爱国义愤，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回国服务，没想到“出师未捷身先死”！

吴世光殉职时大约30来岁，而我仅21岁。我在南洋，从来未接触过死人，而这天傍晚时分去抬尸体，难免增添几分胆怯。但想起战友，想起世光与我的友情，事到如今，容不得我犹豫与害怕了，硬着头皮也得上了。说来奇怪，我突然鼓起了勇气，仿佛已经向谁借了胆子一样，虔诚地把吴世光的遗体用毛毯包裹着，请人帮抬上了车，安顿好之后，我开始开车，此时已天黑了。永平距下关不到100公里，如果一路顺利，大约几个小时就可归队。

可是，事不凑巧，当我开出几公里之后，爬上一座海拔3000多米的峭壁陡坡路时，车子却抛锚了。原来刚才忙于折腾，竟忘了加水，由于天气炎热，水箱又没水了，烫得直冒烟，若不及时添水面继续开车，则有爆炸的危险。可是，在这段险要路上上哪儿去加水呢？一边峭崖绝壁，一边是百丈深渊，虽然漾濞江的江水滔滔奔流，然而无路下去取水。如果冒险去找水，万一碰上毒蛇猛兽，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怎么办呢？在这寂寞的夜晚，在漾濞江畔的滇缅公路上，周围的群山在银色的月光下仿佛在为海外赤子孤魂默哀，偶尔还传来猫头鹰凄凉的叫声，我独自一人，孤零零地守着一位为国牺牲的战友遗体，心里怦怦直跳，悲恐交集。我素来小胆，在南洋时常听老人家讲鬼故事，脑海中残留一些恐怖的幻觉，什么“妖魔鬼怪”啦，“无常鬼”啦，“勾魂鬼”啦，“催命鬼”啦，还有什么“阴间十八地狱”啦，刹时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一一浮现……要是在往常，还有机工战友们作伴，心中不会害怕，而今晚却独自与尸体同车，说实在话，心时确实害怕极了。我无可奈何地把车门关紧，坐在驾驶室里，望着窗外悲凉的月色，听着松涛江流的交响声，只好默默地向我身边的“上帝”——“吴仙人”祷告：“吴世光呀，我的好兄弟！我俩是同一批回国的，又分配同一中队，如今您不幸先归天了，小弟有责任把您护送归队安葬，以慰您的异乡孤魂，将来也好向家人交代。吴世光呀，您可要保佑我，让我驾车平安顺利地回队！”我恭恭敬敬地与死者对话，情不自禁地流着眼泪，一直不停地自言自语，以壮大自已的胆子。

过了一会儿，摸摸水箱还在冒热气，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有一条了：那就是让发动机水箱自然冷却，然后再开一程另找水源加水。此时，夜更深了，滇缅路上更加谧静了，我一边与战友尸体对话，以爱国的浩然正义将过去残存在脑海中的妖魔鬼怪、恐怖幻影驱散，一边焦急地等待水箱早点自然冷却。大约过了一个钟头，原先发烫的水箱终于冷了下来，总算可以勉强地开了一程。可是开了不久，水箱又发热了，车子又开不动了，附近还是找不到水，只好再次停车等待冷却。

过了一段时间，又勉强开出一程，水箱又冒烟了，我急中生智用自己的小便给水箱“加水”，然而，“杯水车薪”，仍解决不了问题，只好再停下来。就这样，一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直至临近下关的地方，在一处桥边好不容易痛快地加了水。当我赶回部队时，已经是下半夜二、三点钟了。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难以意料的，有时一件事情的偶然发生，虽是历史长河中极其短暂的一瞬，但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当时仅21岁的我，由于受怪异故事的影响，一向是怕“鬼”的。然而，在抗战烽火中夤夜护送战友遗体一事，却根本改变了我的概念，只因心中有了爱国正气，有深厚的战友情谊，自然而然就压倒一切“鬼崇邪气”。我想，这也许是海外赤子为国捐躯的忠魂在感召吧！从此，本来胆小的我，竟然成为一个胆大出奇的人。归队时，由于天还未亮，我为了不惊“醒”这位长眠的机工战友，便将其遗体留在自己的车上，然后开始筹办明天早上治丧事宜。

第二天早上，我向14大队的大队长汇报了昨夜的经历，大队长说：“我们要为这位为国牺牲的华侨机工立碑，历史是不会忘记这些无名英雄的！”随后，他又问：“小林，你一个人深夜运尸体，还怕不怕？”我说：“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山路上，本来是恐怖的，可是有战友的忠魂相伴，就由可怕变为不怕了！”

为了悼念这位为国殉难的机工战友，西南运输处第14大队特举行了一个既简朴又隆重的追悼大会。是日，连老天爷亦有情，下起一场细雨，苦雨凄惨，充满无限哀悼情绪。我们抬着吴世光遗体，把他安葬在下关附近的董家庄。在坟前，华侨机工献上了自己动手用鲜花扎成的花圈。记得当时，我们还特意为吴世光立了一块墓碑，这是一块60×40厘米的大理石碑，上面刻着：

**归国抗日南洋华侨机工吴世光之墓**

**西南运输处十四大队立**

**一九四0年   月   日。**

我立在墓碑前，默默地哀悼着，泪水像雨点滴在碑石上，吴世光为抗日救国在运输战线献身的英雄形象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1986年11月7日，陈共存先生率领新加坡赴滇缅公路察访问团来到保山，在访问原南侨机工的座谈会上，有一位从马来亚回来的南侨机工老人——孙其文，他以沉重的心情，讲述了当年隐瞒着父母与妻儿参加机工回国抗日的动人经历之后，还泣不成声的噙着老泪，痛述了他至今仍不被海外亲人所谅解的一段近事。老人说，不久前，他经辗转托人与马来西来的妻儿去了一封信，但遭到妻舅回信痛斥，说他无情无义，拒绝再与他通信和联系。在座的陈共存先生甚为关注此事，当即向他问清了其妻舅的通信地址，表示回去后要协助做其妻舅的工作，以求得谅解。

时隔一年，当我采访南侨机工史迹前往保山，拜访寓居仁寿门3幢203室的这位孙其文老人时，孙先生已75高龄，这时因患病正在家治疗。我登门探望，只见他面容清癯，但精神矍铄（见图92）。提起往事，老人不禁感慨万千。他时而慷慨激昂，时而痛楚悲伤的叙述其经历，很快就把我的思绪带到了那不平凡的岁月。

孙其文说：“许多往事都渐渐淡忘了，但是，在个人的经历中，有些事与国家、民族的历史事件有关，那就是终身难忘的。”四十多年的岁月流逝了，但老人说到当年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抗日的往事，仍象述说昨天的事一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消息传到南洋后，激起了侨胞的无比愤怒。”

“那时，我是一个二十几岁的热血青年，在马来亚的一家工厂开车，为了不当亡国奴，我积极参加筹赈会的抗日活动。我们常常带领着学生走上街头，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揭露日寇屠杀祖国同胞的滔天罪行。在宣传活动中，我们高唱《张老三我问你》、《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唤起侨胞的抗日爱国热情。”

“到了1939年，南侨总会号召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那时，广大的华侨热血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爱国热情极其高涨。当看到同伴们一批又一批参加机工团回国了，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知道自己若报名，家庭肯定会千方百计出来阻拦的。因为我的父母从永春来麻坡定居后，只生我一个独子，而且我又是已经娶了老婆，还有一个两岁的儿子。我必须承担照顾老人、养活老婆孩子的责任。我若一走了之，这个家庭怎么办呢？”

老人沉浸在回忆当时左右为难的情景之后，搓了搓双手，又继续谈到报名不但要过家庭关，而且首先是要过自己的思想关。“说实话，当时我在报名还是不报名的问题上，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首先，我想到自己已有一个温暖的家，还有一份满意的职业，回国后到炮火连天的战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家庭由谁管呢？不过，再想一想，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国才有家，国亡家难保。国难当头，爱国不爱国，要看实际行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下定决心，报名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抗日服务，以报效自己的祖国。”

“主意一定，我便瞒着父母，也瞒着妻子，独自一人离开麻坡，直接来到新加坡报名。”

“由于我是悄悄离开麻坡的，没有声张，不敢宣扬，也没有像其他人在当地登报，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全家没有一人知道。”老人讲到这里，露出无可奈何的笑，像在对我说，又像在问自己：“你看这是否太过份了吧？是的，我想这是太过份了。”

显然，老人在经半世纪之后回忆当时的情景，感情是何其复杂，而心潮更是翻腾不已。他看到我深表同情的目光之后，又点点头说：“这就是妻舅至今还记恨的原因，难怪他说我无情无义，至今还不原谅。”但紧接着，老人又连忙摇了摇头，自我申辩地说：“不！我不是无情无义的人！更不是忘恩负义的人！爱国无罪，我是为了爱国而回来的。如果当时让全家人知道，那我还能回得来吗？”

老人发自肺腑的这一席话，道出了当时海外一千多万侨胞赤诚爱国的心声，我深深地被感动了。

据了解，去年（1986）新加坡访问团来到保山访问，孙其文请陈共存先生打听马来西来的家庭情况，现在得到了可靠的信息：孙其文回国后，其妻就气疯了，不久就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后来他父母相继去世，他的儿子被舅舅家收养，起了舅舅家姓郑的名字。

老人继续回忆说：“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们是由新加坡红灯码头上轮船，经安南转火车到昆明的，然后分配到西南运输处13大队39中队，奔赴滇缅公路从事军运工作，驻扎在遮放一带。我先后参加过三次接车，第一次接大道奇，第二次接GMC，另一次是接小GMC。第三批车接回后，我参加了‘华侨先锋运输在队’，被提拨为少尉分队长。先锋队的任务是从缅甸的八莫、腊戍一带，抢运盟国支援的抗战军用物资回保山。自39年至42年5月，我们亲手运载了大量的军需品，有力地支援了祖国抗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南洋沦陷，孙其文无法南返团聚，加上惠通桥炸断后，他滞留保山，经机工战友的撮合，在保山又成了家，并生有一个女孩（名孙惠云，现在保山工商管理局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孙其文到过西藏、四川等地从事运输工作，1962年回保山工作，直至不久前从芒宽糖厂退休。最近，又接到上级通知，为关心每位南侨机工安度晚年，国家特照顾享受100%退休金待遇。

当我踏着月色告辞时，老人再次表示他的最后心愿：愿在有生之年能够见到留在南洋的儿子，并能够得到海外亲人们的谅解。我默默地为老人祝福，祝福他早日康复，祝福老人所热切盼望见儿子的心愿能够实现！

南侨机工陆续回国服务后，陈嘉庚先生于1939年8月派南侨总会交际委员刘牡丹前来滇缅公路视察，调查战勤运输和机工生活情况。当时任《南洋商报》的记者张楚琨（现任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随行报道：南侨机工都是这些年轻小伙子，他们与云南少数民族姑娘的爱情故事是机工运输生活的外一章。他在《南洋商报》上如此报道过：“华侨机工有不少漂亮的青年，他们体格好，富于情感，会唱动人的英文歌和马来歌。此外，还有一张棕色健康的脸……这些多情的女郎，就往往把我们的机工当作丘比特的对象。”

在我所采访的留在云南的南侨机工中，就有一段因答谢傣族姑娘帮助而结成的良缘。他就是祖籍惠安的马来亚华侨蔡文兴先生。

蔡文光又名蔡大头，出生于马来亚太平埠，自幼在华侨小学读书，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对“唐山”有深厚的感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看到祖国处于危难之中，爱国之情油然而生。由上街宣传、组织歌咏队、演唱抗日歌曲、卖花筹赈，到响应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1939年3月，蔡文兴加入第三批机工团由新加坡启程回国，集中在昆明进行军事训练。由于战事紧张，训练提前结束，蔡文兴与队友分配到西南运输处第6大队第16中队当驾驶兵。当时，广西、贵阳一带军火奇缺，运输力量严重不足，第6大队即调往贵阳、广西一线抢运军火。此间生活相当艰苦，地形极其复杂，日夜兼程，还常常遭受敌机空袭。

1940年，第6大队调回云南，从事滇缅公路的抢运、蔡文兴被编入“华侨先锋大队”。该大队有200多辆车辆，全部是华侨捐赠的。全大队200多个成员，从大队长至驾驶兵全都由华侨组成，队部就设在芒市。

芒市是风景秀丽的边疆重镇，这里山明水秀人情好，兄弟民族的民风淳朴，尤其是傣族姑娘，美丽纯洁，热情大方。她们对于千里迢迢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怀着崇高的敬意，总愿意帮助“华侨先锋大队”的华侨机工做点什么，彼此关系比较融洽。有一次，蔡文兴开车驶过芒市附近的原始森林地带，被毒蚊咬伤，不幸得了恶性疟疾。由于运输任务紧张，加上年轻气盛，认为挺一下就可以挺过去。没料到，当汽车行驶到一座傣家村寨旁，他再也坚持不下去，“打摆子”恶性发作，浑身冷得发抖。就在此时，一群傣家姑娘经过此地，看到这种情况，马上用当地一种秘方施行抢救。其中，有位姑娘特地赶回家抱来一床花棉被盖在他身上，待到脱险之后，才让蔡文兴继续上路。对此蔡文兴非常感激。过后他带上一些礼物，特地登门致谢。蔡文兴这一行动，按汉族的习俗，是件正常的事。可是按当地傣族的风俗，送礼即聘礼之意，傣家便以隆重的礼节接待。蔡文兴却不知底细，大大方方地将点心吃完。此时，家长高兴地宣布女儿与他的婚事定了下来。蔡文兴非常诧异，连连解释说：“不是那个意思”，但已经来不及了。后来，在华侨先锋大队机工战友们的帮助下，蔡文兴了解到这位傣族姑娘确实是个善良可靠的人，便正式向华侨先锋大队部申请办理《结婚证书》（该证书保存至今）。大队部撮合这桩婚事，择个“吉日”（即抢运工作暂告一段落的休息日），在大队部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全体机工战友欢聚一堂，痛饮欢庆一番。当年年底，蔡文光“升了一级”当了“爸爸”。

1942年5月初，日寇由滇缅公路入侵云南边境。为了赶在日寇入侵国门之前焚毁畹町、芒市一带的军火仓库，蔡文兴与几个机工战友奉派前往执行这一惊险、紧张的任务。当蔡文兴亲手沿途焚毁几座军火库之后，日兵已经尾随而至。他来不及进家门便驱车撤回，汽车被阻在龙陵808公里处时，惠通桥已炸断了。怎么办呢？他躲进深山避难。从此，蔡文兴就在龙陵、平达、象达、景坎一带流浪。几个月之后，有一名从日本留过学的土司代翻译了日本人的“安民告示”，告示说要让所有在外的人员回来“安居乐业”，蔡文兴才趁机潜入傣家。起初不敢露面，生活问题全靠妻子负责。后来，才陆续探头出来做点小买卖帮助养家糊口。

抗战胜利后，经过多方努力，蔡文兴于1946年办理了复员南返手续，当局给他发了200美元（折合67万国币）的“胜利奖金”。蔡文兴本来想返回马来亚，但妻子、孩子不愿意离开芒市傣家，于是全家留了下来。他将这笔“胜利奖金”在芒市开了一间“闽兴旅社”。

1956年公私合营时，老蔡离开了旅社，重操旧业，分配到昆明汽车总站任司机。不久，又被调回边疆芒市，直至1979年退休。现在蔡老先生正和儿孙们共享天伦之乐，安度晚年。

从一名热血青年至白发苍苍的老翁，蔡文兴将自己的大半生与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这实在是难能可贵。当我探问他对此有何想法时，蔡老先生说：

“回想四十多年前，年青力壮，血气方刚，目睹祖国处于危难之中，即满怀赤诚报国之心，毅然辞别亲人回国参加抗战，当年在滇缅公路运输线上和抗日前沿阵地可歌可泣的动人场面，依然激荡着我的心怀。”

1988年元月2日下午，经德宏州侨联同志的引路，我来到芒市跃进巷8号，拜访了海南籍南侨机工谢川周。这位当年回国仅17岁的热血青年，是三千多南侨机工中年龄最轻、个子最小的一个，近半世纪的沧桑岁月，已使他双鬃染霜，却仍透露出一股刚毅、豪爽的英气。当他得知我专程采访的来意后，情绪非常高涨，迅捷地取出珍藏在箱底的“侨务委员会奖状”。这张发黄的奖状，是抗战胜利时颁发的，上面写着：“华侨机工谢川周，热心爱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慕服务，前后七载，备致勤劳，应予嘉奖。”这是对海外赤子谢川周的历史评价，亦是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文物见证。

根据云南同志的介绍，我得知谢川周是与哥哥谢森周一起参加第八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战后哥哥复员回新加坡，而他却一直留在云南，于是，就请他从家世谈起。

老人仿佛又回到了抗日烽火的年代，兴致勃勃地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谢川周于1922年出生于海南岛万宁县，兄弟姐妹7人，哥哥谢森周比他大5岁。谢川周是14岁时到马来亚太平埠落脚在伯父家的，起先给人当杂工，后来在一家汽车厂当学徒，学会了修车与驾驶技术。

“七·七事变”爆发后，祖国面临亡国的危险，太不平埠立即掀起了抗日救国浪潮。谢川周认为，国难当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已虽然拿不出多少钱来，但年青力壮，可以为抗日出力奔波。于是他报名卖纸花，为抗日救国募捐，整天拿着花沿街叫卖。纸花本没有用处，但不少华侨同胞仍解囊争购，涓涓之水，汇成巨额筹赈义款，源源不断地汇往祖国。

有一天，一位卖花同胞跳上街道的高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日演讲，号召华侨青年参加机工服务团回国抗战。听了演讲，谢川周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便迎上前去问道：“阿哥，你说参加机工团回去打日本鬼子，这要出多少钱？”那人回答：“只要你愿意回去，不用你自己出钱，费用由筹赈会负责！”于是，他便请那人介绍前往报名。一周之后，他就接到了回国服务的通知。这件事，谢川周是一直瞒着伯父的，怕老人知道后不让回国。离别的前夜，他辗转反侧，心想这一走，恐怕再也见不到伯父了，偷偷地流了泪难以入眠。第二天早上，他独自悄悄地跑到太平埠筹赈会集合，登上开往新加坡的火车。只见车站上挤满了欢送的人群，有年老的父母来送儿子，有新婚妻子来送丈夫，有的机工含泪吻别襁褓中的孩子……情景实在令人感动。突然，有个小妹妹递上一束小花对他说：“阿哥，你回国要多打几个日本鬼子！”川周激动地表示：“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我们要多打胜仗！”各埠机工汇集在新加坡之后，乘轮船经安南转火车抵达昆明。

初抵昆明潘家湾西南运输处训练所时，谢川周迫不及待地问队长：“我们什么时候上前线？”不料队长却笑了笑说：“我们的任务不是直接上前线打仗，而是搞运输。”队长解释说：“军队打日本鬼子不能没有武器，我们运送武器弹药给他们，军队有了武器，就能更好地打日本鬼子！”性急的谢川周又问：“那到哪里去运输呢？快点让我们去吧！”队长说：“你先不要急嘛！大家还要经过训练才能去驾车呢。”

经过短期的训练，谢川周结业后被编入西南运输处第9大队26中队32分队。大队部驻在云南潞西县三棵树。从此，他便开始了滇缅公路紧张的军运生涯。那时，沿海各地已相继沦陷，滇缅公路成为战时我国唯一的国际交通线，大批的外援物资由水运或空运至缅甸，再由该线运回国内。滇缅公路沿线分驻几个运输大队，分段接力转运。起初，他先到遮放，负责往返畹町、遮放、芒市间的抢运任务。后来，行程更远了，差不多滇缅线都跑遍了。

西南运输处每月发给南侨机工的津贴是法币36元，出车费每天八角。比起海外优厚的待遇，这点补贴是微不足道的。但机工们凭着回国报效祖国的热情，根本不计较个人得失。大家最大的心愿是：为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谢川周指着一张照片告诉我：“这是我最初在滇缅公路开的车，车上有一对特殊的标志：车灯两边各插一根小竹竿。”他最初开的是美国小道奇卡车，载重两吨半，那时刹车装置还是油刹，应急刹车时往往一下子刹不住，下雨行驶时就得更小心。由于他当时个子矮，看不见车窗外近旁的路，为此，爱动脑筋的谢川周想出这个办法，在车灯两边各插个小竹竿。很幸运，行车中没有出过什么事故。后来年龄大了，人长高了，这个土办法就不用了。

车队虽然有队部，但由于经常跑车在外，根本没有时间回去。一般是随车行至哪里就住在哪里，或者干脆在驾驶室里睡着。雨季，公路时常塌方，阻车少则几小时，多则几天。有时没带干粮，便饿是眼花身软，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实在忍不住，就跑到农民地里啃生包谷充饥。夜晚，则常常一个人蜷缩在黑洞洞的旷野里，四周不时传来野兽的嚎叫声，令人心惊肉跳。接受饿肚的教训，以后出车，他们干脆带上铁锅和粮食，一旦车子抛锚，就埋锅做饭，肚子不再受委屈了。

谢川周回忆说，自从1939年冬至1942年夏，他运载军火物资穿梭往返于滇缅公路的险路上，犹如坐在火山口上，时时刻刻都得格外小心驾驶。他的车子之所以能保持安全，不出事故，这不仅仅是因为驾驶技术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非常爱护汽车，精心保养。每次出车前，总要先仔细检查各个部位，消除隐患，带齐零部件及机修工具，稍有故障便及时维修，因此，任务完成得很好，即使在难以意料的艰苦条件下，车子也很少出故障，保证抗战物资按时、安全地运到前线。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小事，谢川周经常遇到路面冲坏或陷进泥浆，车子像老牛拖犁走不动，有时要等救济车来拖，影响抢运任务。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在车厢里装上两块厚木板，每当路面冲坏或稀陷时，就把木板垫在上面，让车子顺利地从木板上开过去。这个办法还真的解决不少问题。以后，这个办法还推广到各个车队。有时遇上塌方，大家把自带的木板一起铺垫上去，还可以解决大问题。

当时出车一般没有太严格的时间要求，多数情况靠司机们的思想觉悟，若想在途中休息或在集镇上玩玩，不会有人知道，但他们从不这样做。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热情非常高，他们深知抗战时期“一滴汽油一滴血”，于是提出响亮的口号——“一个华侨能出力，十个敌人九不回！”有一次，谢川周车到下关染上了疟疾，只得住进当地医院。医生说他至少要住一星期，可第二天他刚感觉好了一些，就悄悄跑出医院，医生追出来狠狠批评了一顿，非让他回病房不可。但他软磨硬泡，硬是不回去，最后跳上车子开走了。

在滇缅公路国内路段跑了一年多，谢川周被调往仰光，每天负责将装卸军用物资的工人运到码头干活，并参加抢运军火，直至1942年初，日军占领仰光前夕，才撤回到八莫，继续将堆积在八莫的物资抢运到畹町、芒市，并运送远征军入缅作战。局势越来越紧张，由于各种原因，远征军入缅失利，节节败退，日军则长驱直入。1942年4月底的一天，拉着一车军用物资的谢川周从缅甸八莫出发，刚翻过一个山坡，车子就被堵塞了，前面的难民哭天喊地。原来勐汝已被日寇占领了！勐汝地处滇缅公路缅境一侧，是通往八莫和曼德勒的贫路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退路已断，开车回芒市已不可能了，但总不能将这车物资留给日本鬼子。于是谢川周把汽车倒到崖子边，将汽车推下山谷，机工战友们也都学着他的样子，毁车而逃。此时，身在异国，举目无亲，只好跟着大批难民向东北方向的山坡爬去。崎岖的山道，挤满看不见头尾的难民，惊慌喊叫着，向山路上涌去。

步行逃难回国，这是一段相当艰难的历程。当他18天后摇摇晃晃回到腾冲时，体力几近耗绝，再也不能向前迈步了。身上肮脏不堪，形容枯槁，骨瘦如柴。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非亲身感受者是难以体会的，他回忆说：

“18天里，我有整整15一没粮食吃，只靠野果及凉水来维持生命。刚开始走的时候，我还带着一些罐头、面包、干粮，3天后就全部吃完了。偶尔经过一个山寨进去要点吃的，但村民早已逃光了，而且在我之前不知有多少难民去寻找过食物，哪里还有吃的！有一天经过一间磨房，碾槽里早被饥肠辘辘的难民扫清了。我仔细一看，哟！槽缝里还剩一点点碎米渣渣，便小心翼翼地收拔起来，放在空罐头盒里煮了吃。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能吃到这一点点‘粮食’，真算是幸运极了。”

“为了抗日，这个强烈的信念使我没有倒下，忍着饥饿，昼夜兼行。实在走不动了，就倒在路旁歇一会儿，喝点冷水后继续走。一路上，亲自目睹多少惨绝人寰的景象：逃难的人们开始都带着不少东西，挑的、背的、抱的、挎的，什么都有，连日艰苦跋涉及粮食罄尽，再也无力携带沉重的东西了。为了逃生，只得丢弃。我本人也是如此，最后只剩两手空空的。一路上，到处都可见到扔掉的各种物品，草丛中、山沟里、遍地狼藉。有的人实在走不动了，就由亲人拖着拉着走，再不行，就只有被弃置道旁，听天由命了。最惨的是那些拖着婴儿的母亲。我并不是不愿去帮助他们，这些都是我们的同胞，可是，力不从心，我连自己都顾不上了。记得到后来，许多父母不得不忍心将自己的孩子丢下了，路边树丛里，时常传出婴孩的哭声，听了真叫人心如刀割。”

“快到腾冲时，当地有关部门在路旁摆出一些米汤，救济逃难的人们，每人给一碗，我也要到一碗，几大口一下子就別光了。在腾冲时，还遇到几个机工队员。休息几天后，我们又走到怒江边。怒江天险隔在前面，江水湍急，汹涌澎湃，惠通桥已被炸断了，并被日军占领西岸了，我们避开日寇的视野范围，来到一处僻静地段，出钱雇了一个筏工，冒险乘着竹筏渡到对岸，继续向保山方向艰难迈步……”

当他们回到保山时，这座抗战时期的滇西重镇已变成废墟一片。原来是日寇制造了“五·四惨案”，炸死保山平民成千上万，加上瘟疫流行，原来的部队早已不知转移何方了，只好搭车回到昆明。

在昆明，由于滇缅公路已切断了，南侨机工便失业了。谢川周到驻曲靖的一个辎重兵团那里，也没有车子可开了。后来，因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从广东调来的一个石城炮兵总队，队长刚好是他的同乡海南人，名叫云昌贵，于是谢川周到部队找他，要求参加他们的远征部队到印度去，老乡同意了，就让他随这支部队乘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到了印度。不料，他却被分到一个“骡马团”里，负责养马。他想不通，自己是开车的，为什么变成养马的？于是跑去问长官，但长官根本不理睬，只说这是上面决定的，他们管不着。以后他才知道，这是顶替一名逃兵的缺额，他甚至连自己的“谢川周”的名字也没有了，而成了另外一个连他都不认识的人了。点名时，叫到那人的名字，他还得大声答到“到”。不久，他跑到附近一个炮兵五团，但这里亦相当艰苦，整日操练跑步，搞军事演习。印度的太阳特别炎热，晒得人们受不了，晒脱了皮后每人差不多都变成“黑人”。他一心想开车操老本行，又跑到加尔各答，参加了英缅政府军的运输队，在那里继续开车运输抗日物资，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抗战胜利后，谢川周准备回国之际，恰逢加尔各答的中国领事馆陈总领事招募驾驶员，打算将一批“GMC”卡车送回国内。于是，他参加了送车，沿着新开辟的中印公路（又名史迪威公路）一直将车开到昆明黑林铺交车。

交了车，他便失业了。此时南侨机工开始复员南返，国民政府发给每个机工一张“侨务委员会奖状”，并发给200美元（折合67万国币）的复员奖金，愿意回侨居地的由政府送回，不愿回去的自谋生活。谢川周因与芒市一位傣族姑娘结了婚，不愿再回马来亚，就在芒市定居下来，靠帮人接送汽车维持生活，直到云南解放。

新中国成立初期，谢川周在芒市街上摆小货摊过日子，其中有一阶段患病，整整在家休息了五、六年。病好以后又继续摆摊，修理小五金。1960年，当地政府把他们这些摆摊搞小修理的人员召集起来，成立五金小组。经过数次变迁，几易其名，成了现在的潞西县五金厂。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很多东西都被颠倒了。华侨机工几乎无一幸免，许多人被诬为“里通外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打击。1969年3月，谢川周也被通知进“学习班”，失去了自由。他被强加上“里通外国”的特务头子的“罪名”，还被诬蔑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被当作“牛鬼蛇神”处罚体力劳动，罚挑砖瓦，罚扫厕所。关在“牛棚”的日子里，虽然他没怎么被吊打（据红卫兵说是怕把他打死，以后就得不到什么材料了），但精神上却遭到严重折磨。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当初明明是满腔热血，为报效祖国而从南洋归来参加抗战的，却被一口咬定成“特务”。就连以前老岳父在缅甸腊戍送他的一件黑毛呢大衣，也被当成罪证，说是“当国民党团长时穿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最使他感到悲痛的是，不仅对他个人的诬陷、迫害，而且波及他远在万里之外的海南老家。造反派说他曾用飞机运了三大蓝大洋回去，硬逼他家里人交出来。他的一个弟弟因此被关了七天七夜，最后实在受不了，偷偷跑到山上自缢身亡。得知这个噩耗，他悲痛欲绝。

1972年下半年，他才出了“学习班”，但没有做“结论”，只得到一句：“你的事情等以后再说。”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南侨机工的经历得到历史公正的评价，机工们在文革被极“左”路线迫害的冤假错案得到澄清与平反。谢川周老人虽然退休在家，但政府从各方面加以照顾及帮助，连家属子女的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及就业，都得到妥善的安置。

尤为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人民政府还组织他们这批南侨机工的幸存者到首都北京参观游览。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上，谢川周老人真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他说：“做梦也难以梦到会有这么一天啊！我想起九泉之下的兄弟和曾并肩战斗过的机工队友们，若冥灵有知，也该欣慰了！”

“孩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爸爸支持你回国报效祖国，不当亡国奴。你勇敢地去吧！给我们全家争光，为我们华侨争气！”

父亲嘱托的这段话，始终铭刻在谢金标的心中，伴随他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之路。

1939年回国服务的南侨机工谢金标，是一位出生在马六甲的第二代侨生，虽然从未回过故乡，但从父亲的口中，知道他的祖籍是广东。与其他一些南侨机工回国要隐瞒家长不一样，谢金标要回国抗战，则是得到其父亲的全力支持与鼓励的。

父亲是一名修船工人，月薪不高，但爱国热情很高，坚持捐出月薪的10%支援祖国抗日。谢金标也是一位好样的爱国热血青年，令他至今难忘的是，当年他曾在爱国热情的激发下，提着一桶稀牛粪泼到几家日货商店墙壁上，警告售卖日货的奸商。1939年，当谢金标打算响应陈嘉庚先生号召回国服务时，他刚一开口，父亲竟毫不犹豫地加以赞成。“给我们全家争光”、“为华侨争气！”这是父亲的教诲，深深地刻在他的记忆中。

谢金标登上轮船启程时，父亲以及亲威朋友，还有素不相识的人们都来送行。当船开走了，只见父亲还在码头上摇着三角旗……

谢金标带着父老的嘱托，踏上祖国故土，在昆明西南运输处进行短期军训之后，便分配到下关11大队，开始其在滇缅公路的抗战军运紧张生涯。

在南洋习惯平坦道路上行车的南侨机工，一下子面临举世闻名、惊险出奇的滇缅公路，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要征服这个难关，不仅要靠娴熟的驾驶技术，而且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碍。谢金标回忆说：“当时，主要是靠一股爱国热情，为着祖国的生存而战斗。因此，产生了无穷的力量，甚至出现过奇迹，化险为夷！”初到滇缅路，他开着美制小道奇卡车，在昆明、下关、保山、畹町以及缅甸的腊戍、仰光几个站之间往返驰骋。滇缅公路的滇西路段，路面狭窄，凸凹不平，坡陡弯急，龙陵以下的南天门、芭蕉窝等处，不啻是一个个“鬼门关”。尤其是刚开始行车时，路况不清，应急反能力差些，他曾在老鲁田那里翻过一次车，幸亏人未受伤，车子也仅受到一点轻微损坏，拉起来仍照常行驶。而另一个华侨机工李水师，则没有这般幸运了，有一次他拉着一车驾驶员到畹町接车，在凌就翻到山崖下，一下子死了28人，其中有15位是南侨机工，水师本人也为国捐躯。

来自天空的威胁则更不可意料，行车时常遭到日军的轰炸袭击。谢金标遭空袭的经历不计其数。最危险的一次是在仰光抢运军火时，忽遇敌机来袭，炸弹就落在身边，他连忙翻滚着，躲进附近一座大金塔里，拣回了一条命。

南侨总会以及海外侨胞始终关心着南侨机工，时常从精神上、物资上给予援助。1940年，陈嘉庚先生主率领慰劳团回国考察，亲赴滇缅公路慰劳南侨机工。在保山南门街口，谢金标见到了陈先生，陈先生慈祥地拍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们回国抗战，辛苦了。你们肩负着南洋华侨的重托，一定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陈先生的话，更坚定了大家的信心。

1942年5月初，谢金标从仰光运载军火撤退回国，当时战局很紧张，听说日本兵从后面追上来了，可是滇缅路上到处是抢运的车辆和逃难的人流，根本无法快行。车子走了几分钟又得停下来，等待着前面蠕动，有时比步行还慢。人群中，缅甸华侨难民最多。公路边随处可见到被遗弃的东西，有的还较贵重。可是这种时候，也无人去拣了。

5月5日下午，他好不容易将车子开到怒江边，可是已经晚了，惠通桥已于中午炸断了！只见排成长龙的军车、商车遗弃在桥西路上，无数人群挤塞在江边，惊恐万状，不知所措，有的捶胸顿足，有的仰天哭泣，更多的则躲向山野隐蔽起来，寻找着脱险的途径。

滚滚的江水成了生命的分界线，仅仅是一江之隔，这里已是沦陷区了。四周不断地响起枪炮声，日军已混在人群之中，他们正向对岸炮击，并向那些试图渡江的难民们射击，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怒江！在混乱之中，谢金标碰见机工队友邓奇，两人商量一下，决定找个隐蔽的地点游过江去，决不能落入日寇魔掌！

待到天色渐晚，两人便摸到断桥的上游岸边，只见江水哗哗地流淌着、撞击着，显得阴森可怕。幸亏谢金标自幼在蕉风椰雨的马六甲常与伙伴到大海中游泳，练就了好水性，还曾在水中救出过好几个人，邓奇的水性亦不错。尽管如此，他们的心还是不踏实，一是不了解水情，二是担心日军和汉奸发觉。

天黑了，他俩慢慢顺着陡岸下水了。江水刺骨，真能把人冻僵，他俩尽力划着双臂，朝着对岸游去。江水表面还平缓，但水底怪石嶙峋，犬牙交错，形成无数个强劲的漩涡，不一会儿，两人就被冲散了。谢金标独自一人搏击着，不时从上游漂过难民的尸体，不慎触及，令人毛骨悚然……

大约经过一个小时的拼搏，谢金标顺水漂至下游的地方，终于爬上了岸。不久，邓奇也游上来，他俩亲切地拍打着，庆幸着虎口脱险，同时，想到江那边的无数同胞，他们正在遭到日寇的摧残，心中充满了悲哀与愤怒！

他俩吃力地爬上江坡，沿着滇缅公路蹒跚而行，此时又冷又饿，只好在路边喝了点水，不幸却染上痢疾，一路上拉肚子，行至老鲁田时病倒走不动了，只好躲到一家姓杨的老百姓家中，经过治疗，仍未痊愈。后来，回到部队，机工队伍已散伙了，但谢金标侥幸地被留了下来，编入守军部队军运行列。此时，我军与日军隔江对峙，部队调动频繁，曾发生几次小规模的战斗，谢金标奉命运载军队、武器到达指定的地点。

1943年底至1944年初，为了配合远征军即将进行的反攻，谢金标又开始从保山运送工兵团及其所需军备、器材到惠通桥，准备驾设浮桥渡江。

在怒江东岸行车是危险的，常常遭到对岸日军炮火的袭击，许多汽车被击中毁坏。有一天，正在江边休息待命的谢金标，忽然听到一阵尖锐的呼啸声，紧接着就是猛烈的爆炸声，日军的炮弹落在不远处工兵排的宿营地，当即炸死十多个人，他的熟人李排长也同时遇难了。谢金标算是命大，又躲过一次恶运。

1945年抗战胜利了，政府当局给南侨机工颁发了奖状和一些安置费，不少机工南返回南洋。而谢金标失业后在保山拜著名雕刻家“神刻”李石疾为师，跟他学艺，1946年在保山成家，住在书院街，摆摊给人刻图章，有时也到畹町、九谷替茂恒商号接车、运货。

1956年4月，云南德宏自治州成立，谢金标任刻印社主任，带着一个徒弟到芒市，为刚建立的各部门刻公章，以后就留在芒市，在县五金厂工作，直到1980年退休。

在“文革”中，谢金标与其他机工一样受到迫害，被戴上“华侨地主”、“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在手工业系统办的学习班呆了三年，不时遭到揪斗、吊打、强迫他承认“里通外国”的罪名……在逆境中，他时常回想抗战返国的经历，自问无愧于祖国。他还想到姐姐谢金水，为了抗日，回国参加新四军，最后牺牲在前线。拳拳报国之心，何罪之有？他相信自己的问题是会得到澄清的。

打倒“四人帮”之后，谢金标老人冰冷的心渐渐复苏了，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对他们参加抗日救国的爱国举动给予高度的评价，并从政治上、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谢金标老人的爱国热情，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这是他最感到欣慰的。

现居住在云南边陲遮放的沈治平，是第二批回国南侨机工队的一员。1911年他出生在广东惠阳淡水市东门街，14岁时与二弟随父亲出洋。在马来亚，他做过橡胶工、裁缝小工、造船工，后又在联商巴士公司开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投入南洋华侨抗日救亡热潮之中，一次次地上街斗参与抗日示威游行，抑制日货，卖花筹赈。

谈及抗战往事，沈治平说：“国难当头，我们海外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定要支持祖国打败日本侵略者，决不能当亡国奴！——这就是当时我们华侨的心愿！”他依然清晰记得，1939年2月的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一位学生模样的热血青年站在人群中演说。那位青年用那富有煽动性的语言，慷慨激昂地痛拆了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并大声呼吁：“目前祖国抗战正急需大量司机，陈嘉庚先生号召南侨机工服务，现在不怕没有钱，只怕没有技术人才！”沈治平听完演讲，犹如心底的一团火烧上了汽油，熊熊燃烧。于是，他当即下了决心：回到祖国，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主意一定，沈治平就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报名参加了南侨机工团。为了表达抗日救国、维护中华民族神圣权益的强烈愿望，沈治平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沈护权”（该名字现仍留在云南档案馆的南侨机工第二批花名册中）。经过考核和体检之后，他于1939年2月，告别了父亲与弟弟，随第二批机工团回国。抵达昆明，他们马上进入西南运输处训练班，训练班的军事生活是很紧张的。由于抗日前线急需大量军需物资，而运输军事物资急需大批汽车机工，因此仅培训了两个月就分配了。沈治平被分配到第11大队，大队部驻扎在保山，大队长是温天一，大队副是谢传胪，陈光强任中队长。

最初，沈治平奉命到遮放接车，把从美国买来的大卡车开回昆明，接着，将武器弹药运往贵阳。属他们中队运输任务的地段，山路险峻，路基很坏，道路难走，特别是雨季，路面泥泞不堪，形成烂泥路，还时常出现塌方。贵州的山路俗称“七十二弯”，加上当日被日机炸得坑坑洼洼，行车分外艰难。贵阳的冬天特别冷，车到那里，都要赶紧把水箱的水放掉，第二天走时再装上水。当时人们都称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但南侨机工车队，迎着困难上，满载着军火弹药，在艰苦的运输线上穿梭往返。

随着战局的发展，1940年10月，滇缅公路被迫封锁三个月之后又重新开放。为了加速抢运，沈治平奉调由贵州赴腊戍，加入“华侨先锋运输第一大队”，从事滇缅公路抢运工作。滇缅公路是当时唯一的国际军运线，被誉为“抗战输血管”。在该路上，南侨机工车队付出巨大的代价，因车祸事故或遭受敌机空袭而死伤者不计其数。

有一次，沈治平与好友钟烈冒雨行车，因前面道路有险情，钟烈来不及急刹车，连人带车翻下山沟，幸亏果断地跳了车。沈治平连忙下山抱起身受重伤的钟烈，送到下关医院抢救，才把战友从死神那里夺了回来。钟烈翻车后，所在车队的人因找不到他，还曾报了死亡名单。而另一个名叫李禹的机工，则没有那么幸运了，在水平翻车时当场死亡，尸体就埋在那里。更为不幸的是，还有人翻车掉进怒江激流中，则连尸体也找不到了。

还有一次，那是在支援广西前线的抢运途中，当时正值雨季，洪水泛滥，运输车队在漾濞桥受阻，等待过桥的车队排成长龙。突然，日寇飞机超低空进行空袭，连飞行员的模样都可以看清楚，沈治平连忙躲进路边的大石头洞中，幸免于难。而另一个机工临时躲进车底下，被日机机关枪射中油箱，引起爆炸，该机工即为抗战运输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疯狂南进。42年春，日军由缅甸长驱直入，沈治平的中队在缅甸难以立足，便向国内撤退。先从腊戍退至木邦，后由木邦退回遮放。由于时局恶化，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眼看遮放也保不住了，沈治平等人还奉命焚毁留在遮放仓库的武器及汽油，以免落入敌手，然后撤回昆明。回昆明后，滇缅公路断绝了，南侨机工车队被解散了。

沈治平31岁时，经分队长的撮合，与遮放当地一个傣族姑娘结了婚，妻子只有18岁。撤退时，他带着她一起到昆明，因机工队伍解散了，生活无着落，便来到下关，在朋友的帮助下，做卷烟买卖度日。后来，与几个机工朋友创立了一个小规模的“中南烟草公司”，生产廉价的“钥匙”牌香烟。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南侨机工开始筹办复员工作，沈治平因成家立业了，便带着妻子和一岁多的儿子回到遮放。

在人妖颠倒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极“左”路线干扰破坏，沈治平遭到迫害，被抄过两次家，也挨过斗。令人气愤的是，在批斗会上，竟有无知的家伙责问他：“帮谁救国？”尽管当时他不理解，心里有怨气，但总相信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历史一定会得到公正的评价。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现在家中安度晚年的沈治平，谈起近况，老人显得信心十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神州在地带来了春风，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我们的家庭生活宽裕了，子女亦成长了，作为南侨机工的幸存者，亲眼看到这段曾被遗忘、甚至被颠倒过的历史得到公正的评价，可就心满意足了……”

陈嘉庚先生在著名的《南侨回忆录》一书中，曾多次提到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历史，其中在《华侨司机回国》一文中记载：“有一修机工在洋十余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岁月流逝，转眼之间半个世纪过去了，笔者赴滇缅公路采访南侨机工史迹，查证出《南侨回忆录》记载的这位无名英雄，就是海南籍的新加坡华侨工程师——王文松。

王文松已于1943年在云南滇缅公路上殉难了，而当年“并招同伴十余人”也大都陆续作古了，目前尚健在的只有云南的韩利丰和海南的黄守琛、何启凤等人，且都年愈八十了，但回想起当年“青春作伴好还乡”的亲身经历，仍然记忆犹新。

根据韩利丰、黄守琛等老先生的介绍，王文松原籍海南万宁县，早年在新加坡英国摩尼汽车公司任工程师，是当地卓有声望的高级技术人才，深为陈嘉庚先生所器重。王文松的英文程度很高，技术精良，在海外工资待遇优厚（月薪二百多叻币折国币七百多元）。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可是为了抗日救国，他毅然抛去安稳舒适的生活，告别了老母亲、妻子及三个孩子，带领十多个同伴，并带全套修理工具和机器回国效力。

1939年3月，王文松参加第二批机工团回国，全队207人，他任副总务。在王文松一行启程回国前夕（3月12日），陈嘉庚先生特地再次致函西南运输处（见图93）：

**迳启者：此次机工回国服务员，计有207人。其中……修机领队王文松君，每月薪水国币一百元，其余每名月薪五十元，经前次接洽时当面应许，除请西南运输公司代转一函外，特再修函奉达，谨希查照是荷。此致**

**昆明西南运输处**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公章）**

**主席陈嘉庚**

**廿八年三月十二日**

3月13日，王文松一行应时代的召唤，带着南洋一千多万华侨的嘱托，搭乘丰庆轮由新加坡启程回国，踏上了抗日战争的征程。

轮船缓缓地离开码头，南侨机工队伍与送别的亲友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声中依依告别。王文松站在甲板上，望着码头上不停挥手致意、越来越远的妻子儿女的身影，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告别南洋》这首歌。这是上海“一·二八”抗战之后，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抗日歌曲，是一首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战斗歌曲。当王文松深沉地唱起“再会吧，南洋”之时，全船的南侨机工战友们都合唱起来了：

**再会吧，南洋！**

**你海波绿，海云长，**

**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我们民族的血汗，**

**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

**再会吧，南洋！**

**你椰子肥，豆蔻香，**

**你受着自然的丰富的供养。**

**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

**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

**再会吧，南洋！**

**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

**血流着黑龙江。**

**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

**再会吧，南洋！**

**再会吧，南洋！**

**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王文松一行抵达昆明不久，便奉命率领一支数十人的队伍（海南籍南侨机工）前往西南运输处设在缅甸的仰光汽车修理厂担任厂长。他们的任务主要是装配大批美国道奇汽车，加强滇缅公路的军事运输能力。美国工程师原计划每组五天装配好一辆，而王文松与全体侨工积极努力，苦干加巧干，既讲高质量，又求高速度，终于创出奇迹，每组每天装好一辆，全队每天可安装十辆以上。这种惊人的速度，连美国工程师也连声赞誉“OK、OK！”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闻讯后，特地前往接见并嘉奖他们。

在仰光胜利完成装配任务之后，王文松又被调往下关任第八修理厂厂长，继续为抗战而抢修军运车辆，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胜利前，1943年的一天，王文松不幸因车祸以身殉职。

王文松工程师以抗日救国为己任，放弃南洋高薪职位，告别亲人，离开温暖的家庭，奔赴祖国的大西南，为加强滇缅公路的军事运输能力，贡献自己技术才干，直至奉献自己年轻的生命。这是南侨机工的典范，是南洋广大华侨青年的典范，也是中国人民光辉的典范，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怀念！

第一次见到韩利丰，是在云南南侨机工的联谊会办公室，时在1988年。这位当年与王文松“结伴回国”的第二批南侨机工老队员，是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中简略提到的无名英雄中尚健在者之一。他的记忆力很好，详细地追忆了那已远逝的机工回国抗战历史，补充了许多珍贵的史实。根据他的讲话录音，我写了《青春作伴好还乡——王文松的老战友韩利丰访谈录》一文。转眼几年过去了，1993年我又赴云南补充修订《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一书的文稿，再次见到了韩利丰，尽管他已84高龄，却依然精神矍烁，行动敏捷，毫无老态龙钟的样子，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到机工联谊会来。

南侨机工联谊会理事长杨保华风趣地说：“小林，上次你访问韩利丰未完的故事，如今有了新的续篇了啦！”原来，当年韩利丰不惜抛妻别回国抗战，如今，经历半世纪沧桑的海外结发妻子终于回到昆明团聚了。这一悲欢离合的真实故事，尤其是大团圆的美满结局，理应在南侨机工史上补上一笔。为此，我与南侨机工联谊会顾问刘宝全先生一起，再次来到位于潘家湾原西南运输处机工训练所旧址的新宿舍区，登门拜访了韩利丰的一家。

我们刚踏进韩家，两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婆热情地出来接待，原来都是韩利丰的妻子。新社会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而韩利丰怎么会有两位妻子呢？这当然是半个世纪前抗日战争历史所造成的。这三位老人（见图94）向我们诉说了一段既辛酸又动人的真实故事。

韩利丰是海南岛文昌县地灵村人，12岁就跟堂兄飘洋过海到马来亚投靠在柔佛谋生的父亲，起初在“宽柔学校”读书，小学未毕业就进一间修理厂学机修，掌握了一手修车技术，后来与人合伙在新加坡开了一间“明新汽车修理厂”，收入颇丰。在他24岁的时候，奉父母命，回国娶了海南家乡的姑娘周亚妹为妻室，随后，带着“过埠新娘”返新加坡。一年之后，便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抗日战争爆发后，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线急需大量的司机与修理工，经陈嘉庚先生振臂一呼，南洋各地华侨机工热烈响应。当时王文松已是新加坡著名的机修工程师，月薪二百多元坡币（折合国币七百多元），但他毅然带头抛弃优厚的待遇，与好友韩利丰、黄守琛、何启凤等一群海南籍机工结伴，报名应征。此时，韩利丰已有一个温馨的家，但为了抗日救国，他毫不犹豫地告别了妻子女儿，高唱“向前走，别后退，生死已到最后关头……”的救亡歌曲，并自带一整套的机修工具，离开新加坡到了昆明。（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那批机修工具已在抗战烽火中陆续散失，可韩利丰却奇迹般地仍保留着唯一的一把螺丝刀。该螺丝刀钢水很好，数十年了仍很坚固，最近已捐献给厦门华侨博物院作为“南侨机工回国参战专题展览的珍贵文物）。

韩利丰回国赴滇缅公路抗战运输线服务，成为”王文松队“的得力技术骨干，曾任“技术总检”，发挥技术特长为抗战作出贡献。不久，新加坡沦陷，韩利丰担心着妻子女儿的安危，想方设法联络，结果杳无音讯，他的希望完全破灭。多年以后，经机工战友的撮合，他与云南姑娘李瑞萱结婚，从那时起夫走妻随，跑滇缅、闯险关，抢运抗日物资，过着出生入死、颠沛流离的生活。

留居在新加坡的周亚妹，日思夜盼，希望韩利丰早日胜利归来。有一次，日军来搜捕，气势汹汹地问：“你丈夫作什么去了？”她镇静地回答：“几年前出去做生意，得病死在外边了。”而后来盟军问及此事，她则自豪地说：“丈夫回中国抗日去了。”她有个坚强的信念，生是韩家的人，死是韩家的鬼，为国效劳是光荣的，即使他不在人世，也愿为他守寡，再艰难也要把孩子拉扯长大。就这样，她守了半个多世纪的活寡。

新中国成立后，韩利丰被分配到云南一平浪矿山车队工作，为矿山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驾驶员和修理工。他继续搞技术革新，不断取得新成绩，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并在1953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当了汽车队长。李瑞萱也当了小学教师，一家生活得和和美美。史无前例的“文革”灾难，韩利丰两口子也不能幸免。韩利丰这小小的车队长也被打成“走资派”，要“靠边站”；李瑞萱因为出身于旧军人的家庭，竟被打成“军阀”。1974年韩利丰心灰意懒，携妻回到阔别数十年的海南家乡，住了一段时间。在家乡时，才偶然从一位华侨口中得知在新加坡的前妻还活着。回到昆明后，这消息他一直没有告诉李瑞萱。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老韩在新加坡的妻子还活着的消息，最后还是被李瑞萱知道了，开始她有意见，怪他当年没有告诉她。但随后，她认为这是抗战历史造成的，不能怪老韩。有一天，李瑞萱对老韩说：“你这个死老头，就忍心抛下她们母女，几十年不管，人家为你守了50多年的活寡啊！想必她也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不知她生活得怎样？有没有人照顾？还不快写信去联系，把她接过来一起过晚年。”李瑞萱说出了老韩多年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老韩听了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1991年9月，八十高龄的韩利丰到新加坡探亲，和周亚妹白发相逢，不禁悲喜交集，喜的是找到了前妻，悲的是他女儿过早辞世。老韩在他女儿墓前失声痛哭：“女儿，阿爸来晚了，原谅阿爸吧，现在阿爸看你来了，你能叫我一声阿爸吗……”，在场的亲友无不流下眼泪。周亚妹在新加坡除了有外孙，亲人并不多。老韩看到周亚妹孑然一身，十分难过，遂向亚妹提出：“跟我回国吧，瑞萱她希望我接你回去，我们都已七老八十了，也不图别的，让我们一起相依为命吧。”亚妹欣然答应，跟老韩一起回昆明。当周亚妹踏入家门时，李瑞萱满腔热情地迎上去：“老姐姐，你终于来了，欢迎你呀！你看，这是儿子、女儿，这是孙子、孙女，他们都很孝顺，会照顾你安享晚年。”亚妹早已热泪盈眶，颤抖着双唇，叫了一声：“瑞萱，阿妹哟……。”三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三位老人泣不成声。

从此，这三位老人相扶相助，相处格外融洽。特别是李瑞萱和周亚妹，好像亲姐妹一般。周亚妹经常对人说：“我福气真好，能遇到阿妹瑞萱，算是有缘份。”老韩一家人团团圆圆共享天伦之乐，人们看到都羡慕，都敬佩，在海内外的南侨机工中传为佳话。

我刚20岁的那年，就报名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曾有人问我：抛弃海外舒适的工作，回到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滇缅公路，这究竟是为什么？我（见图95、右三）回答说：情系中华，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

“情系中华”，并不只是一句寻常的口语，而是蕴含着我们家庭四代的艰辛经历：

我的曾祖父是太平天国的先锋兵。太平天国失败后，为躲避清政府株连九族的暴政，他带着18名族人，坐上一条木船，在海上漂流了四个月，才到达了新加坡。后来，我们这个家庭便在马来亚森美兰州芙蓉埠定居。我的祖父曾怀念祖国，怀念家乡，但他与曾祖父一样，客死异国他乡，连“魂归故土”的权利都没有。我的父亲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加入了同盟会，为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贡献了力量。我于1919年出生在马来亚，是在海外特定环境中成长的。可是，我的根在中国，祖辈、父辈与祖国的命运和前途，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当陈嘉庚先生号召南侨机工回国驱逐日寇时，我得到父亲在同盟会的挚友沈汉初的推荐，瞒着我大哥报了名。就要离开相依为命的大哥，心里实在不是滋味。第二天绝早我便不辞而别了。

我是参加第8批机工团的，在新加坡编队时，我被选为副秘书长。陈嘉庚先生在“南天酒楼”的露天台上设宴为我们饯行，大有“与子同戈袍，共赴国难擒敌酋”的古风。

船抵安南海防码头时，我们还未下船，便有一批注奸走狗先挤到船边，散布谣言，妄图阻止我们回国抗日。他们的无耻行径激怒了我们，霎时间，酒瓶、罐头瓶、汽水瓶横飞，砸得汉奸们抱头鼠窜。

昆明是抗战的大后方。我们的任务是通过滇缅公路，把汽油枪支弹药等抗日军用物资从缅甸运回再送往前线。经过西南运输处训练所作了短期山地驾驶技术训练后，我被编入第9大队26中队任班长。我们的车多数是六排档的“道奇”、“福特”、“万国”等牌号的大卡车。从昆明至缅甸腊戍，沿途要经过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区，地形险要，路况很差，稍有不慎就会车毁人亡。每跑个单边顺利时也需七、八天。

后来成立了“华侨运输先锋大队”，我被任命为第2大队4中队尉队副。有次车子方向盘失灵，一边前轮滑出公路，车子无法开动了。我拦住一辆车打算回队部救援，不料这辆车开出不远便翻了，我见势不妙急忙跳车，车子翻下山，我滚到半山腰抓住一棵树干才幸免于死。

不久，敌人发现了这条交通线，天天派飞机骚扰。我们车上装的全是汽油、枪支、弹药，特别是装有烈性炸药TNT，若有一辆被击中起火爆炸，便会波及一大片。有一次，我驾车运送18桶汽油去龙陵。车到怒江上的惠通桥就遇到敌机轰炸，我急忙刹车，停在一个石洞下面。这次来了9架飞机，轮番向大桥投弹，河水被炸起巨大的水柱，连大鱼都被炸上了岸。桥上铺设的木板着了火，伤亡情况惨不忍睹。我们被困在山上，没有粮食，只有采野果充饥。以后我们干脆白天休息，夜里行车。一到夜里，车灯一齐亮，盘山公路上便会出现一道道光圈，缓缓移动，十分壮观。

滇缅公路所经的深山老林和热带坝子，是疟疾流行的瘴疟区，许多侨工染上了这种病丧了命。1940年底，我也患上了恶性疟疾。发起烧来，恨不得剥下一层皮，冷起来时几床被子也不顶用；肚痛拉白痢，折腾得我有气无力。虽然住进了西南运输处医院，但病员多床位少，再加缺医少药，医院硬把我赶走让我自己求医。幸遇在生活书店供职的女朋友，征得书店经理同意，把我接到书店精心护理调治，我才再度战胜死神，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奋战在西南运输线的南侨机工，都是情系中华的英雄儿女。不少人已为国捐躯，长眠荒山。当时许多人连西南运输处的津贴也不领，完全靠海外汇款来维持生活。尽管机工的生活十分艰苦，但我们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发怨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激励我们为抗战的胜利而拼搏奋战！

我名黄友镐，是新加坡侨生，原籍广东。“七·七事变”日寇入侵中国，烧杀掠夺，无恶不作，激起我们海外华侨的民族义愤。于是，我于1939年参加陈嘉庚先生组织的第九批南侨机工团回国抗战。

我们这一批机工共有500多人，由新加坡乘船到安南，然后转火车到昆明。在昆明集训三个月后，我奉命前往芒市接运新车，专门负责运送军火物资。我编在9大队27中队当驾驶员，大队部设在苏州市。我们车队主要任务是由遮放军火库运至保山，在滇缅公路最险要的路段穿梭往来。这条滇缅公路是世界出名的险路，我们许多华侨机工不幸翻车牺牲，但为了抗日救国，大家前仆后继，抢运快运，一心把军火和军需物品运往抗日前线，好让前线将士早日将日本兵驱逐出国境。

在滇缅公路抢运期间，我个人就经历了四次较大的劫难：

第一次，我运载一车炸药，行驶在距惠通桥约二公里的地方，路旁一位养路工指着天空，叫我停车。此时，我才发现敌机在空袭，立即跳下车来，躲在大树底下。这次，敌机来炸惠通桥，炸弹落在桥的周围，弹片横飞，江面炸起水柱。如果不是养路工提醒，我那辆汽车正好通过惠通桥，要是中弹片引爆运载的炸药，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被炸死事小，惠通桥被运载的炸药炸断，所酿出的灾祸则是巨大的。

第二次，我满载一车汽油，刚通过功果桥不到三分钟，敌机又来轰炸，江面被炸得水柱溅起几丈高。幸好我的汽车与功果桥有一段距离。要是靠近些，车上汽油点燃起来，我当然不能幸免。

第三次，我们车队尚未过功果桥，敌机在桥的上空轮番轰炸，功果桥被炸断了，怎么办呢？敌机再狂，炸弹再凶，也泯灭不了我们南侨机工救国的忠心。我们这些“神行太保”，借用了“智多星”的智慧，连夜将汽油桶扎成大浮桥，冒着风险，战胜艰难险阻，终于把军火运过澜沧江。这种奇迹般的运输，如果没有“抗战救国”火热的心，那是办不到的。

第四次，我在保山历险，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我驾车回保山，由于患上了“打摆子”，便在车队休息。当时，敌机一批九架来轰炸保山，我一时无处躲藏，只好跑到老百姓的菜园子里躺着。敌机丢下炸弹，就在身边不远处爆炸，巨大的气浪卷着泥土把我埋了半截，我用力将盖在身上的泥土掀掉，望着飞机离去远远的，才回到车队，不知怎么搞的，“打摆子”竟也“忘记”发作了，也许是给炸弹硝烟“治”掉的。

我一次又一次地历险，但战争的洗礼使我“不驱逐日寇出中国境，誓不回南洋”的决心更强。1941年，我调昆明受训之后，编入第五大队，主要任务是由曲靖运汽油到贵阳。不久，西南运输处改编为滇缅运输处，我们60中队部设在禄丰，运输任务更为繁忙。

1942年，我奉调回楚雄，还到畹町接一批雪佛兰新车，并装运军火回昆明。不久，缅甸沦陷，日寇入侵国门，我们撤回黄土坡。当时，无车又无汽油，只能改装一批“木炭车”。1944年，我参加川滇东路运输局，地点在曲靖，负责陆良机场由印度运来物资的装卸任务，一直至抗日胜利结束。

日寇投降了，被日寇侵占的大好河山又还于我大中华，海外赤子赴国难，救中国的壮志如愿以偿。我的心，比在领取“抗日战争胜利勋章”时还高兴。

杨保华是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的创始人、连任理事长，被云南侨界称为“国宝”。近几年来，南侨机工历史重新得到公正的评价，他和联谊会同志们的工作更加忙碌了。每当海内外热心人士来访，人们就高兴地通报：又有客人来看望“国宝”啦。因此，“国宝”也是人们对健在的南侨机工的尊称。试想：三十年代自愿从南洋回国服务的三千多壮士，在抗战中有一千多名为国牺牲，战后又有一千多人复员南返，留在国内历尽沧桑的，至今健在的只有近百人了，出于敬重，人们便尊称为“国宝”了。

1993年10月，杨保华率领南侨机工联谊会代表团应邀飞往厦门，参加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80周年庆典，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福建省以及厦门市党政部门领导亲切地会见他们；陈嘉庚先生家族代表与他们合影；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陈嘉庚国际学会会长李远哲教授与他们亲热情握手致意；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张楚琨先生与他们一起座谈；印尼华侨李尚大先生邀请他们到自己创办的安溪慈山学校作报告。更难以忘怀的是，他们第一次瞻仰了陈嘉庚先生的故居与陵园，并荣幸地出席了华侨博物院专门新开辟的《赤子功勋——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专题展览》。这个专题展览，以大量的实物、历史图片以及文献资料，生动地展现了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历史功绩，引起了海内外的热切关注。有关报社、电台、电视台作了大量的宣传报道，使这些幸存的南侨机工壮士们在有生之年倍感荣耀……

华侨博物院的同志们久闻杨保华深受欢迎的保留节目是唱《热心救国歌》，于是请他唱一唱。杨老酝酿一下情绪，便声情并茂地唱道：

**一**

**热心救国是应该，                                              做了汉奸臭三代。**

**有钱出钱寄国内，                                  无钱出力“将伊刣”（杀日寇）。**

**最后会胜利，                                                     最后会胜利，**

**最后会胜利，                                                     咱国的福气！**

**二**

**阿婶阿嫂阿姐妹，                                              莫要日瞑（日夜）抹胭脂。**

**当今国难的时期，                                              应该为国做“大志”（事情）。**

**最后会胜利，                                                     最后会胜利，**

**最后会胜利，                                                     咱国的福气！**

杨保华是广东人，却用闽南话演唱，而且语音纯正。加上他身材魁梧，体高一米八十米，体重八十多公斤，原以为他该是声如洪钟，歌似海嘯，可他却细声细调地轻唱，唱得那么有感情，那么有吸引力。大家惊奇他记性好，他却说：这歌是半世纪前从我们心坎里唱出来的，道出我们的心声，当然终生难忘。

回昆明后，人们笑着说：此次南侨机工代表团厦门之行，可真正体现出“国宝”的价值呢！杨保华听后笑了笑，他说：“国宝”就是陈嘉庚精神，就是爱国主义精神！

在云南南侨机工联谊会办公室里，我们再次访问了杨保华理事长。下面就是访谈记录：

我的祖籍广东中山，父亲20多岁时跟同乡到马来亚吉礁谋生，当建筑工，母亲理家务，兄弟姐妹共八人（四男四女）。由于大哥被蛇咬伤，花去很多钱医治无效，后来蛇毒发作而死，大嫂改嫁，家境越来越贫困。我只读了两年书就失学了，给一位银匠老板当学徒，每天天未亮就得起床烧水、扫地。老板娘生了个宝贝儿子叫阿狗，每天还得带阿狗玩，伺候吃饭。端午节那天，我才八、九岁，就要忙着杀鸡伺候老板一家。后来终于病倒了，发热发冷，躺在楼板上发抖。老板上楼，拿起鸡毛掸柄，噼哩啪啦地猛抽楼板，吓得我病更重了。母亲见我病成那样，瘦骨如柴，要接我回家。可是当学徒未满三年提前离开要赔伙食钱。母亲气愤地说：“病成这样还不让回去治病，走，赔钱就赔钱，人命要紧！”好在老板娘因我平时老实勤快而发了善心，说是治病走的，不用赔钱啦！

我在家养病约一两年，病渐好就闲不住了，到客外附近车场玩，熟悉了海外各帮人（闽南、潮州、客家等），听到各种不同的语言，觉得蛮有趣。车站招徕乘客很热闹，帮忙拉一个乘客还可得20%的报酬，我也学着招徕乘客，被称作“带鱼头”。学着各种方言招呼乘客，一天可以挣几角钱。有一次，我招徕一位50多岁的妇女，很有礼貌地喊：“伯母、伯母……”可她就是不理，使我摸不着头脑。旁边一位大伯指教我说，妇女怕人家说她老，你应喊嫂嫂。我改口亲热地用客家话喊道：“阿嫂，您回不回去？”她随即回头笑着问我：“你的车在哪里？”我就带她上车了。我尝到了语言文明礼貌的甜头，从此，更细心地学说各种语言，不仅学华侨的各地方言，而且也学当地的马来语等。在车场学，在车场用，在车场挣钱，结果，越用越熟练。童年时代的艰苦磨练，学会了多种语言，在后来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不同场合竟派上了用场，解决了困境中的问题。

我在车场帮拉客，和司机、售票员、老板都混熟了，就勤快地帮洗车、加水、打扫卫生等。有时，我坐在驾驶室里，学师傅的样子摹拟操作程序。师傅见了，顺便叫我来试试。我在13岁时第一次自己开动汽车。从此想开车简直入了迷，作梦也想当个驾驶员。

由于家里人口多，房子窄，我只好住到二姐家。二姐夫见我有礼貌，又勤快懂事，便对母亲说，小鬼在车场这样混下去没出息，倒不如买辆车让他去跟车，将来学开车。姐夫果然买了车子，我高兴极了。洗车时，我把车开进开出。姐夫一见大为惊奇，问我是从哪里学的。我说是悄悄学的，他还有些不敢相信呢。15岁时，我已能熟练地开车了。16岁就领取了驾驶执照。

“七·七事变”后，南洋华侨掀起抗日救亡热潮。有一次，我看到一本揭露日寇侵华罪行的画报，上面有一伙日本兵公然侮辱一位中国老太婆的照片，我气愤极了。日寇如此野蛮凶残，简直是一群披着人皮的野兽，我决心亲手杀死这群野兽，为祖国同胞报仇！因此，当陈嘉庚先生号召南侨机工回国服务时，我便积极报名回国打日寇。

报销的消息传开后，家里竭力劝阻，但劝不住我，就请来干妈帮劝说。干妈说：“‘唐山’很艰苦，抗日战场很危险，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要好好想想。”我接过话题与她摆道理：“日寇打咱中国，你不回去，我也不回去，一旦国家被灭亡了，大家都变成了亡国奴。那时，你即使再有钱又有什么用呢？我知道家里一向对我好，但为了救国，我还是应该回去！”干妈一时说服不了我，却暗地里想新招。

有一天，干妈拉着我的手说：“你的金戒指有点毛病，我取下帮你修一修。”我虽舍不得，但还是让干妈取走。她还向我要了一张相片。我盼着戒指早日修好，可干妈却送来另一个戒指说：“这个先给你带上，那个等修好以后再送来。”过些日子，干妈说我车子开得好，她要买辆新汽车让我开，果然买来了一辆“威力士”77型的。

另一天，干妈带来一位中年妇女，我还不知该怎么称呼，那人却指责我：“没良心的，刚与姑娘订了婚，竟要一走了之。”我莫名其妙，连声说我不知道。干妈连忙示意制止，原来是她暗中替我“订”亲。沉默了一会儿，老“岳母”通融地说：“你爱国要走可以，但应这么办吧：今天先结婚，明天你可走。”我想这不妥，过几天就要回国了，在抗战烽火中，万一有个意外，就会耽误人家一辈子啊。于是，我再三恳求：结婚之事还是等抗战胜利归来再说吧。

临出发前，未婚妻也来看我，使我很受感动。但为了抗日救国大事，我顾不了个人私情，我不能动摇，我要坚决回国抗日。我们约定抗战胜利之后再相会。启程回国之日，未婚妻一直送到码头，我们登船了，她与岸上欢送的人群仍不断地挥手，久久不愿离去……

我们第四批南侨机工回国的路线，与前三批不同，不是经安南转乘火车入滇，而是搭船到仰光，再乘汽车沿滇缅公路抵达昆明的。我被编入西南运输处第13大队37中队。中队的任务是在畹町、芒市至保山之间抢运军用物资。在此期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遇到暴雨，道路被冲垮，车队被困在芒市附近的荒山野岭中，连续挨饿受困一星期，尝到“山大王”的辛酸。过去每次出车只带三天粮食就够了，而这次可惨啦，粮早吃完，只得冒雨上山找野菜挖竹笋充饥。祸不单行，偏在这时候，我与几个机工战友又染上了疟疾病。这病发热发冷，有时热得像火烧，有时候则冷得像掉进冰窟里，即使盖上几件棉被仍然发抖。好容易出了一会儿太阳，大家歪三斜四地靠在车轮边晒太阳。附近虽有傣族村子，但人家好像有意避开我们，彼此语言不通，亦无可奈何。

熬到第七天，终于有两三个傣族小孩慢慢走过来，惊奇地看着我们说：“车人为什么不吃饭？”我听懂了意思，因为我在马来亚时，学讲一些泰国语，就与这话差不多。我赶紧振作起来，用傣语和他们打招呼：“小孩过来。”小孩惊奇地问：“大哥是傣族？”我连忙回答：“我是广东傣族。”他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过来与我们亲近交谈起来，问我们为什么不吃饭？我摊开双手说：“大米没有，菜没有，肉没有。”他们说：“等一下”，便跑回村去了。当他们回来时，各拿一小篾箩米饭说：“大哥您吃饭。”

一见米饭，十几个战友蜂拥而来，一人仅吃了几口。小孩同情地问道：“您没得吃啦？”我说：“我们个个都没得吃啊，你们回去给爹妈说说好吗？”不久，村里就来人了，他们说过去曾被当兵的抢怕了，买米买肉不给钱，有时只给一些没用的纸币，还打人呢。我告诉他们，我们是南侨机工，是从南洋回国来抗日救国的，买米买肉一定给钱。只是救济车未来，没有现金。于是，我从傣族村里借来了一些粮菜，断粮危机终于得到解决。后来当救济车赶来时，我立即把欠款送到傣家亲人手上，他们都高兴地说：“南洋华侨机工好！”

事情传开了，南侨机工的车队在傣族村寨附近一停，傣家男女老幼就高兴地围上来。后来，还有傣家姑娘与南侨机工恋爱结婚的呢。

有一次，我们车队到缅甸腊戍，每人可补贴几元零星缅币。可是，我去领回的却是一百元的一张，让我去街上换开再分发。起初未知当铺老板是什么人，我就先用刚学的几句缅甸语礼貌地说：“老伯，换点零钱。”没想到对方回答“没有啦。”我碰了钉子回头走，有个好心人指点说，老板是台山人，若讲台山话就好办。我想起在马来亚时，曾向一位家在白水老潭的友人，学讲一些台山话，就大着胆试试。我转回来亲热地说：“阿伯，帮忙换点钱。”老板一听到台山话，马上问我是台山哪里的，我说是白水老谭。接着老板又问：“你到过唐山？”我怕露出马脚，赶忙说是听我阿爸说的。老板高兴了，他说“难得他乡遇乡亲。你们从南洋回国抗日，真不容易啊。”不但立即换开大票，还热情地留我跟他吃一顿饭，并鼓励我狠揍日本鬼子，早日胜利回家团聚。饭后又送给我一个怀表，说：“跑车要准时，这个表对你更有用。”后来，这个表日夜伴随着我，成为我的亲密伙伴，接触它，耳边仿佛就响起了：“跑车要准时”，“狠揍日本鬼子”的声音！

1942年5月，惠通桥失守，滇缅公路中断，盟军供应中国的武器及军用物资，就只靠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印航线。这些军用物资必需从仓库运往机场。因此，印度丁江机场，急需一批汽车司机，盟军便在昆明招募华侨机工前往印度。我们这些刚从滇缅公路撤退下来的机工们都踊跃报名，我与50名战友被批准第一批赴印，领队是李卫民，于1942年8月乘美军飞机达抵丁江机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在机场跑短途运输。我们这些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和开过车，技术很高，因而受到盟军的赞赏。不时在印度机场搞运输，时常遇到日军飞机的空袭。每当拉空袭警报时，那些外国人都弃车跑到防空洞去了。有一次，空袭警报才响，日本飞机就已升到上空了，这时，一辆满载军用物资的大卡车刚开进机场，情况非常危急，万一被炸，会造成对机场的威胁，其后果不堪设想。这时，我们的这位南侨机工战友，并没有弃车逃命，而是调转车头往外直冲，目的是将敌机引往别处，以便保住机场以及其他车上的物资。车子加大油门呼啸向前飞奔，黄土尘烟滚滚象一条黄龙翻腾，敌机发现目标立即尾随追击。当飞机追上黄龙背后射击时，这位机工却来个急煞车，车停了，但黄龙却继续滚滚向前，飞机追着黄龙疯狂扫射，以为汽车已被炸个稀巴烂了。其实，司机又调转方向，把车开到路边的大树下，隐蔽起来。飞贼绕个大弯回来不见汽车踪影，以为得手了，就洋洋得意飞走了。由于这位机工的英勇行动，机场上的物资和人员都安然无恙。许多外国人看到这种宁可牺牲个人而保住其他人的英雄行为，都连声称赞。

我们在印度机场完成了运输任务之后，即乘搭美国空中霸王号，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回到了昆明。

春城虽温暖，我却举目无亲。我天天去找工作，终于碰到一位老乡，他正在美国陆军部队后勤部当采购蔬菜的站长。于是，我就与刚从印度回来的李卫民一起合伙经营蔬菜，总算有条谋生活路。李卫民对我说：你年近三十的人该找个女朋友啦。我说不行，我已订过婚了。他说“南洋沦陷，战乱多变，恐怕……”我则坚持待写信回家问问再说。不久，家中回信说，她已结婚了。李卫民一再动员我找对象，并介绍我认识一位小学教师，她叫韦碧茵，在重庆任教，正好放假在家。我登门去拜访她父母时，才发现韦老伯是熟人，在我去印度前就已认识了。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抗战胜利后，我们于1946年在昆明结婚，第二年生了大女儿。人多一口，我又失业，日子非常艰难。于是我帮一位老板开车去缅甸搞运输，积累了一些钱。后来，内战激烈，社会动荡不安，滇缅公路上土匪、强盗抢劫猖獗，车子难以行驶了。老板把车子卖了，回缅甸去了，我又失业了，留在昆明。日子熬到了1949年，物价猛飞涨，货币大贬值，喝一杯茶竟要几千元。我赴缅甸赚的钱，早已花光了，家里又添了小孩，生活就更困难了。南侨机工战友黄辉庭见我无米下锅，就叫我去他家拿一些米，一次又一次，老岳母还以为我在银行里尚有“存款”呢。

好容易熬到卢汉起义，昆明解放了，但南侨机工失业的问题一时还未能根本解决。在困难的时候，我想起了陈嘉庚先生，想起了抗战期间成立的华侨互助会，心里亮了，该给陈嘉庚先生写封信。

我走街穿巷，四处寻访连络机工战友们，还找到郊区村子，先后登记了40人，通知他们到原华侨互助会的会址——侨光小学聚会。开会那天，40个人都到了，真是一次南侨机工团聚会。难得的是缅甸归侨热心人士陈实甫先生，看到我们这么团结、这么齐心，他表扬我们，让我们以后开会就去他的“新厦公司”会议室。我们要给陈嘉庚先生写信，他就叫一位副经理帮我们写，直接寄北京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交陈嘉庚先生收。

我们没有想到，陈嘉庚先生收到信后，立即拍来急电给昆明侨务处。侨务处王一知处长到处找我。当时我仍忙于联络华侨机工，王处长三次没找到我，就让张同志再次到我家。我爱人看到背枪的军人来找，怕我已出事，不敢多。后来见我平安回家，以为无事了，就没说有人找。过了一个月，她才问起：“你闯祸了没有？”“没有啊！”“那怎么有个带枪军人来找你几次？”“咳！解放啦，背枪的是革命干部，与过去不同啦。”“人家说请你去侨务处，我怕你闯祸，才没给你说”“哎呀，这可是好事！”我哭笑不得，立即赶往侨务处。门岗说：别慌，先登记。当我写上“杨保华”时，他高兴地叫起来：“杨保华就是你！我们处长找你多少次啦，不用登记了，快进去吧！”

王处长高兴地对我说：“一个月前陈嘉庚先生就拍电报来了，非常关心你们南侨机工，指示说云南任何单位需要司机，首先要录用南侨机工。”王处长接着说：“我看你们生活确实太困难，先给你们一些救济好吗？”我说：“我们要就业，不要救济；救济只能救一时之急，就业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为了修建滇藏公路，资源委员会来云南招聘司机，我们40个南侨机工全部应聘。1950年9月，我们先集中到小团山集训，考试全部合格，然后奔赴滇藏公路工地。

我先分配到大理以北的牛街地段，运石头，修涵洞，公路不断往北延伸。后来，调洱源，到剑川，修到石鼓，再推向中甸。

1952年，我们车队合并前往修建昆洛公路（即昆明至西双版纳的打洛）。从峨山修到澜沧，修到勐海，苦战几年没有休假。只是在送民工、石匠回家过年，才顺便回一次家。昆洛公路修成后，改属第六公路工程局。

当进行肃反工作时，南侨机工遭到牵连。过去，侨务处常叫我们开会学习政策，讨论搞好工作。可运动一来，有人诬蔑，这是“开黑会”。于是，一顶“特务”的帽子突然从天而降，戴到我的脑袋上。我为啥突然成为“特务”呢？原来是这样：有个南侨机工叫郭六成（与我同为第四批回国机工），听肃反报告，没有弄清政策，他想坦白一下，可以立功，免得人家说我们“开黑会”，搞“特务活动”。就在会上说：“我郭六成是一号特务、杨保华是二号特务。”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没人肯相信我是清白的，就被送进“老虎队”，天天写交代材料，写了一叠又一叠，写了九个月，我的字也就练了出来。

九个月后，上级干部下来了解情况，看我写材料，天天写的都一样，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任何自相矛盾。找我谈话，说我记性真好。我说：我做的，我记得；没有做的，不能乱写。乱写会搅乱组织，反而给敌人钻空子。上级干部问保卫科长，经查问，严厉批评他乱来，万一出事，害人一辈子。最后，叫保卫科长给我扛行李，送我回车队。上级干部还说：阶级斗争很复杂，郭六成不懂，回去给他讲一讲，不要背思想包袱。

后来，我又调到昆明总站八车队，司机都是华侨，队长是南侨机工林新李。他工作做得出色，成为云南省劳动模范。记得我们华侨车队热烈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家一心一意投入祖国建设事业中，干劲冲天。我们小组的竞赛对手是黄步云（见图96）小组，他是省劳动模范，后又成为全国劳模，出席北京群英会，为我们南侨机工争了光。

1958年10月，我出车到永仁，忽收家信说妻子病住院，我立即赶回。我一家十几口，上有两老，下有七小，全靠她照料，她还要忙教书，而我四处跑车，难以分担她的重担。她病倒了，这个家怎么办呢？我到医院，只见她在哭。她说：已住好久了，什么病也不知道。当时搞“大跃进”，老师带学生下五家摊修路，冒雨苦战，她感冒、发烧，仍不下“战场”，终于得了伤寒病。老医生没敢告诉她，怕她急坏了。

为了赶任务，我不能多停留，交代老医生多加关照，就赶送一车货去芒市，然后装上空油桶回来。谁知道在最陡险的麦庄丫口突然抛锚，我迅速搭车赶回拿材料把车修好，继续赶路。车到羊老哨，实在太累了，车一停下，我就在方向盘上睡着了。天刚蒙蒙亮，我被修路工的泼水声惊醒，这时迎面飞来的一辆解放牌带拖斗货车，我赶快让车停到路边上，来车却急转弧弯，车斗一摆猛击到我的车头左侧，大梁给打弯了，我踩车的脚负了重伤，下不来了。后经医院包扎完，我忍痛要去医院看妻子，老岳母说：“不能去，她看到你这模样不更急死了吗？”还说她病已有好转，能起来走动，锻炼身体啦。我稍放心。没有料到才过几天，1958年10月24日晚上，老岳母突然从医院哭了回来，说“她死了！”天啊！我坐上三轮车赶往市人民医院，她已被送进停尸房。无灯，漆黑，摸着走，脚绊了一跤，擦亮火柴，是个孩子尸体。掀开纱罩，又是个长满胡子的老倌。再摸进去，才找着她。她面煞白，还睁着眼睛看我，我双腿一软倒了下去……

大姐赶来了，拉扶我回家。后经了解突然病故的原因：自从“反胡风”、“反右”到“大跃进”，老医生先后调离岗位去学习、接受批判、参加劳动，接手给妻子治病的年轻医生缺乏经验，说她卧床时间太长了，应该下床活动活动，出外面走走。她听医生的话，支撑虚弱的身子下了床，出病房外面散步，实在支持不住了，就慢慢走回病房，走到床前突然昏厥扑倒，腹部撞在床角上，伤寒重病的薄肠子受此冲击断裂了，终于抢救无郊。我的老岳母为女儿、为一群孙子里外跑，跌跤把脚掼瘸了，而我的儿女，最大的才12岁，最小的才九个月，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我想该给小孩买点吃的。想去富春街，却昏错沉沉地走到了西站。恰好被一个朋友碰见了，他见我痴痴呆呆地，把我送回家，叮嘱家里说：“以后老杨出去，一定要有人跟着。”

我家祸不单行，接下又碰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那可是艰难岁月。当时吃、穿全部定量，凭票证购买。我的脚伤养好了，头脑也清醒了，面对困难，想出办法，全家分工，共度难关。老岳父母总管家务，岳父的婶婶老太帮扶养最小年仅9个月的老七。老大、老二、老三上学去，老四带领老五、老六。我赶快去上班。车队长期补助我家30元。我是一级驾驶员，工资90元。全家同心同德齐奋斗。我的车跑山区禄劝、武定等地，拉活猪回昆明。屠宰站老板说，每次拉猪一头也未压死的，可将七、八元。我格外小心，从未压死一头猪，得了一些奖金。我告诉老板，不用给我奖金，给些猪肉好喽，老板一高兴，一刀砍了一大块，足有10斤重。当时每人每月定量肉只有2.4两，而我家吃肉却意外丰富。我们家渐渐走出了困境。

我也在苦难中，总希望有人伸出援助之手，而看到他人处于困难境地，我也主动伸出援助的手，助人一把。南侨机工汤耀荣（见图99）积劳成疾不幸病故，其妻潘女士抚养三个孩子，力不从心，磨难多年，只好重新组建家庭。潘女士决定从云南赴山西结婚，她说：“杨叔，三个小孩无法带去，怎么办呢？”“送来我家吧。”“你家已有七个小孩，韦姐比他走得更早，你负担太重啦，怎能再加重担呢？”“没关系，咱南侨机工是一家人嘛。7+3=10，可以组成一个班呢。”潘女士和三个小孩从此走出了困境。汤耀荣之女汤小梅回忆在我家幸福成长的情景，激动地告诉大家：“杨伯父对我们真太好了，每次从外面回来，都带给我们小孩子喜欢的东西，首先分给我们兄妹三人，然后分给他的七个孩子，他关心我们超过了爱自己的孩子。”后来，小汤恋爱结婚时，她告诉爱人说：“你真正的岳父老泰山，是杨伯。”

“文革”开始，大揪“牛鬼蛇神”。南侨机工抗战时期在西南运输处的那段经历，被当成大问题，大揭大批。我扪心自问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有人检举我，要我坦白交代罪行。他们天天审，天天问，就是要我交代“罪行”，查一个多月，仍无问题。最后，他们抛出了我的“罪行”。说我1948年在空军招待所开汽车，有一天所长叫我开吉普车到南屏街拉进步人士去黄土坡枪毙，逼问我拉几个，名叫什么。并说人证俱在，还不快坦白。我说根本没那回事，你们能拿出证据来，该劳动，我自扛行李；该枪毙，我站着不闭眼睛。第二天，集中了几百人开大会，会议主持人大声逼诃我，要彻底坦白交代。我仍说我没有罪。他大声喊：“褚秦真出来！”，当众问禇是否说过“所长派车拉人去枪毙之事？”“是不是杨保华送的？”禇说：“这事杨保华帽子不得！”全场几百人都听到了，会议主持人气急败坏地把禇推了下去。

问题解决了，我回车队，但又不让我开车了。叫我钻在坑道里换车梁钢板。人家问我现在干什么？我开玩笑地说：“在搞地下工作。”后来，见我工作细致，又叫我搞机务员工作。有人问我现在干什么？我说：“在桌子上工作了。”

1976年，粉碎“四人帮”，我光荣退休了，却又闲不住，车队留我继续工作，当教练指导。

1984年，我从玉溪车站回到昆明，与儿女、孙子们共享天伦之乐，经常与南侨机工战友们聚会。198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张智源（见图97）热心联络南侨机工战友，我积极参与活动，共联络了昆明20多人，举行座谈会。后来，张智源积劳成疾，医治无效病故，我牢记他的嘱托，继续组织机工联谊活动。当时大家最关心的共同问题，就是落实南侨机工的政策。我想昆明老机工多，生活有困难，认为应好好组织起来，于是写报告给北京全国侨联。1986年9月，“南洋华侨抗日时期回国机工云南联谊会”（简称“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终于正式成立了。

紧接着，陈共存先生率新加坡代表团访问滇缅公路南侨机工，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先生也从北京赶来接见我们，并与云南省领导商定建立“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1989年7月7日，正值南侨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纪念，“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终于在昆明西山正式落成。

今天，《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一书由中国华侨出版社正式出版，我们所有健在的南侨机工都感到无比欣慰。现在海内外许多热心人士称我们南侨机工是“国宝”，说句心里话，我们不是“国宝”，但我们心中确有“国宝”，名副其实的国宝是陈嘉庚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

在云南南侨老机中还有一位“年轻人”，实际上他也年逾古稀了。可为什么还称他“年轻人”呢？原因有二：一是目前幸存的南侨机工，大都年近八十或已逾八旬了，故战友们喜欢亲昵他为“年轻人”；二是他身体确实好，热情特高，思维敏捷，充满活力，联谊会的各种工作，他都抢着义务去做，干劲不亚于小青年，故荣获这一“美誉”。

这位“年轻”的老机工，就是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的副理事长王亚六（见图95、右二）。他祖籍福建莆田，现居昆明，我曾多次登门拜访，可是他每次谈得更多的都是机工战友逸事。他说，一些已故战友的事迹，如果我们活着的知情者不讲，无名英雄们的故事就难免失传了。当他将其所知的战友故事一一谈完之后，这次我出个题目，让他谈谈自己“在滇缅公路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他终于从自己谈起了：

我是参加第三批机工回国的。1939年3月27日乘“丰平轮”出发，4月3日抵达昆明。西南运输处派卡车把我们接到潘家湾司机训练所。初到训练所已是深夜，最深刻的印象是给我们三个“下马威”：第一个“下马威”是当夜寒流袭击，令人冷地发抖。我们是从长年炎夏的星洲来到大西南的，一下子急剧降温，挨冻的滋味是前所未有的，确实难受。不过，我们早有思想准备了，无人有怨言。因为大家明白，这次回国要到滇缅公路的深山野岭开车，要上战场，为的是运输救国，绝不是回来享清福的。第二个“下马威”是睡稻草地铺。我们在南洋都有舒适原安乐床，初来到训练所却无床无帐，用稻草打地铺。但大家以苦为荣，还津津东道地评价说：这稻草铺并不比弹簧床差到哪里去！次日大早起床，就集合跑步到潘家湾稻田水沟里舀冰冷的水洗脸、漱口。面对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冷酷”现实，我们彼此之间做鬼脸，开玩笑称：新鲜味呐！当时大家想的是抗日救国，因此，早就把一切困难踩在脚下。现在回想起来，“抗日救国”这四个字，字字千斤，真是战胜任何困难的法宝。第三个“下马威”是严格的军事训练。我们这群在南洋自由惯了的海外“游子”，一下子从老百姓变成军人。要成为真正的军人，得投入严格而紧张的军事训练。军训从“立正”、“稍息”、“齐步走”开始，非常刻板，大家都不太感兴趣。接下讲军事课，如战略技术、安全常识、伤员抢救及自救和防空知识等。记得教官说，碰上敌机空袭投弹时，应立即卧倒，两手曲臂放在胸前，撑胸离地面，同时张开口，这对于炸弹在附近爆炸，可以三防：一防被弹片杀伤，二防地面震伤心脏，三防声浪震聋耳朵。起初，我们讨厌军训，认为搞训练没啥用。但没料到，军训竟派上用场。有一次，我开车到腊戍火车站装货时，突遇日本飞机空袭，我立即跳下车，冲向田坎趴下，按防空要领去做。敌机炸弹就在身边轰隆一声巨响，多少“弹片”往我身上落下，我以为这下子可完了，但镇静一下，分明还活着，原来满身覆盖着的是泥巴。我庆幸自己按防空要领去做，确实好用，安全无恙。我领悟到，军事科学知识确实有用。后来，我曾在重庆亲眼看到防空洞闷死数万人的特大惨景，罪过当然是日寇的狂轰滥炸，但是当场的人们如果多掌握有关防空的科学知识，也许可以减少损失。

功果桥与惠通桥是滇缅公路上最重要的咽喉。为了在敌机狂轰滥炸下减少损失，守桥部队在桥头悬崖上挂上红灯笼报警：挂一盏灯笼，预示敌机将来空袭；挂两盏灯笼，告知敌机已临上空；挂三盏灯笼，则警告敌机正在空袭。同时，守桥部队配备高射炮，严阵以待，以阻击敌机，保卫大桥。

1940年10月，日本侵略者专门设立了“滇缅公路封锁委员会”，由安南河风频繁出动大批飞机，对滇缅公路的重要桥梁——功果、惠通两桥进行重点轰炸。

同年年底的一天，我们分队驾驶着15辆满载军火的大卡车从保山返回下关，途经功果桥时即遇到敌机空袭。我开第一辆，刚行驶到桥头，宪兵阻止前进，我看到已挂两个红灯笼了，立即跳下车。猫着腰钻进路边石崖下凿好的防空洞。霎时，功果桥那边由远而近响起了轰隆隆的爆炸声，短暂间歇之后炸声又响。原来是敌机27架分三批轮番轰炸，炸弹爆炸溅起水柱高达几丈，连江中的鱼也被炸死，翻起白肚浮在水面上。功果桥终于不幸被炸中了，桥身一边的铁索断了，整个桥面吊板往下坠。江两边的汽车也有被炸坏的，我那一辆的车头盖板亦被弹片射穿。

这次空袭，造成桥断，江两边堵塞的几百辆车子，排成了长龙。机工们十分焦急，个个义愤填鹰，切齿痛骂日本强盗。为了尽快设法抢修功果桥，机工们与桥工们积极出谋献策，联想到橡皮艇打气在水中漂起来的浮力原理，提出利用空油桶供替浮船使用。这个临时抢修渡江的施工办法很快决定下来了。同胞们个个奋勇，齐心协力，投入这场紧张的战斗，出现了一个沸腾紧张、激动人心的场面。保山汽车运输分处马上作出反映，派了一个伙食团赶来支援。

南侨机工和当地桥工连夜突击抢修，从附近仓库征集了几百只空油桶和大批板材，用钢索结，捆成一只长方形大浮船，上铺木板，船两头用钢丝绳拉到两岸的滑轮上，由两岸汽车轮流对拉钢丝绳，浮船便来回把两岸的汽车送过江。前后仅花几小时便可通车了。这确实是一大奇迹。起初，每次只拉一辆车，太慢了。随即进行改装，多搞几个浮船，连成浮桥，汽车通行就快了。为了防止敌机，浮桥还搞成活动式的，空袭时可将浮桥左右分开，隐蔽于两岸树木划丛之下，避免暴露目标。欲通车时，再拉出来连成一条浮桥。敌机炸断功果桥那天，日本电台曾幸灾乐祸地广播：“功果桥已被炸断，滇缅公路国际孔道，三个月之内没有通车希望。”可是，日本侵略者哪里知道，南侨机工个个是英雄汉。他们都有颗火热的爱国心，用火热的心筑成的运输线，是炸不断的。

在我的脑海中，至今仍铭记着追悼符气籫烈士的情景：符气籫是海南岛文昌县人，他在国立暨南大学肆业后，曾任上海公安局督察，后来返回南洋，曾任麻坡中华公学教员、新加坡育英中学教员。1939年，他是第四批机工团秘书，回国后任西南运输处第13队大队补充队少尉分队长。在拯救民族危难中，他一贯服务勤恳，工作出色，深为南侨机工战友所敬重，却不幸于同年11月在云南永平境内翻车殉职。

云南永平县筹赈会及各侨团的侨胞，特选定在1940年“五·九”国耻纪念日，为符气籫烈士举行追悼会。十四个侨团侨校的代表二百余人出席了追悼会，巴罗益群学校铜乐队吹奏哀乐，有关人士致了悼词。符气籫烈士73高龄的父亲符振弟老先生专程从南洋回国参加追悼会，他在致词中大声疾呼：“余生二子，俱为国牺牲，余希望各位侨胞应以国家为重，为抗日救亡而努力工作，出钱出力，打倒日寇，打倒汉奸汪精卫，争取民族的自由……”与会者对符老先生的爱国热情深表钦仰，纷纷表示，抗战不胜利，誓不回家！

“抗战不胜利，誓不回家！”这成为三千南侨机工的共同誓言与行动准绳，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上，镌铸了这一顶天立地的誓言，谱写了海外赤子的不朽篇章！

南侨机工回国，奋战在滇缅公路上，不仅是抢运军事物资，有时还得执行特殊任务。下面是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副理事长邓文聪讲述的一段经历：

“1940年10月，我被抽调到新组成的运输队，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运钞票。队长是李卫民（南侨机工），驾驶员都是从各大队调来的具有丰富经验和较高技术的尖子。汽车也都是崭新的道奇牌，车厢是经过改装的，像冷冻车一样封闭着。

“车队运载钞票的行动似乎很神秘，当我们开到新腊戍仓库里装车时，见到民工队在荷枪实弹武装人员的严密督察下，将一箱箱钞票搬上车，清点完毕，立即严封起来，每辆车都配备武装警士随车押送。早晨，我们从新腊戍出发，当晚到达我国边境小镇遮放，停车场戒备森严。我到附近的馆子里吃过饭，夜里就睡在驾驶室里。沿途经过保山、下关、楚雄等地，亦都食宿在车上。第五天即到达昆明。卸车时，亦是武装人员如临大敌，逐一清点核对。卸车之后，我们当晚到西南运输处报到，然后很快装上一批出口物资，诸如桐油、水银、钨砂之类，于第二天大清早启程回运，再经五天才返回新腊戊。每趟来回历时10天。我一共执行五次特殊任务，都顺利地完成，然后回国到第13大队继续抢运军用物资。”

据邓文聪回忆，他是1939年参加第五批南侨机工回国的，在昆明短期军训后，被编入西南运输处第13大队37中队。起初在遮放至保山地段，后在曼德礼到畹町段运输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还接送过许多新组装的各式卡车。当时，任务紧迫，不管多苦多累，他都争先接受，出色地完成任务。在枪林弹雨的考验中，他的驾驶技术越来越高，滇缅公路上再险再难也阻挡不了。由于他有熟练的驾驶技术，因此被选调执行上述的特殊任务。

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从事军事运输，人人要闯过三个严峻的生死关——险路关、瘴疟关及敌机空袭关。此外，还有一个无形关口随时在考验着，那就是能否有自觉性、纪律性、责任心和警惕性。若稍许松懈，马虎了事，那可就要出大漏子，或者坐牢，甚至送掉老命。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副理事长翁家贵（见图98）谈了他的一段亲身经历：

我是参加第五批机工回国的，分配在西南运输处第14大队。说起我在滇缅公路的惊险经历，尽管山路险峻，却被我一一战胜，化险为夷；倒是一次被指责为丢失一箱子弹的惊险风波，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0年春，我任分队长。有一次，负责带领六辆载着子弹的车队由保山来昆明。当车子开到楚雄时，队里张启麟的车子掉进路边沟里去，进退两难。如果等待下关救济车前来救援，也许还得等一两天。六车弹药在此荒山野岭过夜，万一出事可不得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只好将掉进沟底的那车子弹，平均分摊加到另外五辆车上，超载赶路，只留下一人看守着空车等待救援。

当我们五辆满载子弹的车队赶到昆明大板桥军用仓库卸货时，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清点弹药箱的人员突然说：子弹少了一箱。这还了得！我们早听说过，已经发生过因丢失子弹而被判坐牢的先例，横祸怎么突然即将降临到我们头上？可真令人不寒而栗。我再三回忆，这次发出一路上够小心的了，连在楚雄盘移装箱时也格外谨慎，那箱子弹怎么会不翼而飞呢？我们再仔细地清点一遍，还是少了一箱。这可急煞人，但光着急又有何用？只有冷静地思考：从出库、上路、过夜到这里进库，都没有任何疏漏，会不会是卸货搬移时放错了地方，或许还有其他原因？我警觉起来，立即找仓库负责人说明经过，然后继续里里外外仔细侦察，终于惊奇地发现仓库那边垒得整整齐齐的弹箱上面，高出了一箱，会不会正是这箱？然而，是这一箱又该有什么根据呢？当我走近认真察看，心中有数了，这一箱果然是我们的。仓库负责人问，弹箱都一模一样，怎么能说这箱是你们的呢？我请他仔细看：仓库原来的弹箱面上都有一层灰尘，唯独上面这箱无灰尘，与我们新运进来的一样，正说明这一箱就是我们的。他信服地点点头。我理直气壮地把这箱搬了过来，心上的石头才落了地。

一场虚惊终于过去了，但它留下的印象却是深刻难忘的。此后，我们奋战在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线上的南侨机工都保持了更高的警惕性和责任心。

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南洋华侨机工的爱国历史事迹，日益受到海内外各有关方面的关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厦门华侨博物院等特派人赴各地征集南侨机工历史文物，将这批珍贵的华侨史料作为形象的爱国主义教材，开辟专题进行展览，南侨机工联谊会的老同志，都把此事记挂在心，常说：翻箱倒柜发现当年实物史料，要赶快献出来。

不久前的一天，罗开瑚老人送来一件毛毯，展现在云南机工联谊会诸老面前：

毛毯呈灰色，上面有黑条格子，已经破破烂烂，四边的须条已磨掉了。当中破烂处，补上一块块方形、矩形的白布、针脚整齐。但由于年久月深，整件毛毯已磨得稀薄，到处穿洞，补不胜补了。

在场的老机工看了之后，异口同声地说：“这确实是当年陈嘉庚、南侨总会赠送给南侨机工的毛毯！”

“对！我领到的也是这样的！”联谊会理事长杨保华说。我则好奇地问：“罗老，你是怎样保管到现在的？”

罗开瑚老人笑着说：“它，已经陪伴我五十多个春秋了。”接着，他满有兴致地讲述这条毛毯的特别经历：

“1939年，我参加第八批机工回国。从长年如夏的南洋热带地区，一下子来到忽冷忽热昼夜温差很大的横断山脉高山地带，身体一时感到不适，时常感冒。正当我为如何度过寒冷的冬天发愁之时，陈嘉庚、南侨总会及时送来一批慰问品，其中就有寒衣和毛毯。这条毛毯质量很好，我一见就非常喜欢。从此，我开车在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军火，每逢风雨交加，特别是霜雪袭人严寒之夜，这条毛毯给我带来了无限温暖。如果没有它，我恐怕早就冻坏了。我深感陈嘉庚先生与南侨总会考虑得周到，也很实用。这件普通的毛毯，在抗战时期的艰难岁月中，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件宝贝。我把它装在提包里，随车带在身边，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

“1942年，我们车队奉命到仰光抢运，当时局势很紧张，日寇飞机日夜来空袭。由于那里没有防空洞，警报一拉响，人们只好跑进一座坚固的大厦里。这是一座政府办公大楼，钢筋水泥建筑，估计机枪射不穿，炸弹炸不跨。每次跑警报，我都提起装着毛毯的提包一齐跑，有时就在那座楼里睡觉。记得那天晚上刚躺下不久，突然有人催促大家起来，说日军已到郊区，新公路已断，只能走老公路，马上出发。我连忙将这毛毯提包带上车，与一位机工战友轮番驾驶着一辆军用卡车快速撤退。那位机工驾车过一座小桥时，不慎翻了车。我幸亏紧紧抱着毛毯提包，翻车时头部撞在毛毯上，安然无恙，而那个战友却负了重伤不得不留下住医院。我提起救命的毛毯，又搭乘另一机工的车脱险回国，而那留在医院的战友后来却被日寇杀害了。据说日寇屠杀南侨机工时，不问青红皂白，只看你风吹日晒的黝黑脸庞，如果额头上有一条因戴军帽而留下的白色皮肤，便立即枪杀。因为有了这段难忘的经历，我更加珍惜它——南侨总会赠送的毛毯。”

“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日子确实越过越好了，可算步入‘小康’了，家中的日常生活用品或有关家具，也都不断进行‘更新换代’了，可是，我就是一直舍不得把这件毛毯扔掉，我把它装进皮箱置于衣柜里，因为它是一件珍贵的纪念品。”

“这次把它捐献出来，一来是响应捐赠南侨机工历史文物的号召，二来我想，我迟早是要去见陈嘉庚老先生的，故先与毛毯老伙伴告别，把它送往该去的地方——历史博物馆，这样算来，我俩就各得其所了。”

战后留居在昆明的南侨机工汤耀荣，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五十年代就英年早逝，可是认识他的人们仍在怀念他！

**悄悄回国**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抗日救亡的热潮席卷南洋。为拯救民族危难，汤耀荣恨不得马上奔赴抗日前线，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国境。可是，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同庚好友回国参战，自己却没能报名。这到底为什么呢？原来他不忍心辞别无依无靠的年迈祖母。

汤耀荣原籍广东南海，三岁之时由母亲带往南洋，寻找在槟城谋生的父亲。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病灾袭来，父母不幸相继病逝，小小年纪的他成为孤儿，幸得靠老祖母抚养成长。家庭的不幸变故，生活的艰辛磨炼，使小汤比同龄孩子过早地懂事了。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汤为了减轻祖母的负担，进了一家汽车修理厂当学徒。由于他刻苦耐劳，勤奋好学，逐渐掌握了一手熟练的机修技术，十几岁就以熟练的修车技术远近闻名，二十出头就当了师傅招收学徒。他一向尊敬祖母，当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之时，孝顺之心与日俱增，在南侨青年报名参加回国服务团时，他多么愿意把自己的开车与修车技术报效于祖国。但是，一看到白发苍苍的老祖母需自己来伺候，他就不忍心断然离开这相依为命的老人家。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到了第九批时，听说这是最后一批了，再踌躇就报国无门了。怎么办呢？他悄悄地走了三步“暗棋”：（1）悄悄地筹赈会补办报名手续，并特别交代不能公开登报宣扬，以免让亲友们知道。（2）悄悄地向几位好友与徒弟谈了心里话，请他们今后多关照老祖母，预计两年之后就胜利归来。（3）悄悄地写下一封敬请祖母原谅的信，准备在启程前才留给老人家。启程那天，他天未亮就悄悄地出了家门。忽然心酸起来，转身跪在大门口，长叹地说：“奶奶，忠孝不能两全，原谅我吧！”说完，悲郁地踏上了征途。

**熟练地修车**

回到祖国大西南，汤耀荣被分配当机修技术员。由于他有高超的技术，颇受机工战友们的欢迎。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回来个王文松，槟城回来个汤耀荣。在遮放，汤耀荣与伙伴们投入紧张的抢修工作，成绩显著，曾受到上级的表扬。对于汤耀荣的修车技术和为人。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但仍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现居在昆明的南侨老机工许年回忆说：“1939年秋，我与汤耀荣同在西南运输处第10大队，后来编为华侨先锋大队，我任第二中队的班长，负责督促全班车子的检修。有时候修理工解决不了，就去找汤技术员，经他检查、指点之后，原以为难以排除的故障，很快就能解决。当时，找他的人很多，从10大队到华侨先锋队，可说无人不识汤耀荣。因为找到他，再难的机修问题，都可以迎丸而解。”

**巧妙地撤退**

1942年，日军经泰国拦腰插入缅甸，局势紧张，汤耀荣与许年、朱松胜（见图100）奉命一起开车撤退。为了避免新车及汽油，弹药落入敌寇之手，他们还肩负了破坏汽油库等特殊战斗。他们先猛力挥动长柄大斧头砍破汽油桶，让汽油流出来之后，再开车撤退到一段距离，然后回头开枪射击，结果一打就燃烧起来。当他们巧妙地完成了这一特殊任务之后，随即沿着滇缅公路撤至惠通桥。此时，桥的两边已布满炸药包，守桥工兵已将炸药引线安装完毕，情况十分危急。汤耀荣果断地与战友火速地通过惠通桥。闯过不久，惠通桥就引爆炸断了。后来，机工队伍被解散了，汤耀荣才与战友们分了手。

**默默地奉献**

新中国成立后，汤耀荣调到云南汽车运输公司当驾驶员。他善于总结保养引擎的经验，总结了十条，在公司推广，产生了良好的效应。据他女儿汤晓梅珍藏的1953年云南省生产竞赛劳模大会的《劳动模范手册》有一文：《公司一级劳模汤耀荣——创引擎行驶里程新纪录》，专门记述他创造木炭车行驶里程的新纪录，超过中央指标175.66%的先进事迹。

汤耀荣保持与发扬了南侨机工的光荣传统和干劲，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力量。他常说：“我所想到的就是如何把工作搞得更好，报答党对我的培养教育。我要用实际行动争取入党。”他说到做到，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以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凡事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由于他拼命工作，结果积劳成疾，被送入医院，终于抢救无效而逝世，享年仅四十来岁。上手术台前，他说：“我回国抗日，青春无悔，遗憾的是未能最后再见祖母一面！”

南侨机工史料选

1937

* 7月7日 - 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
* 8月13日 - “八·一三淞沪抗战”。事变当天，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发出元电，翌日发出寒电，呼吁全世界华侨紧急行动起来，支援祖国抗战。
* 8月15日 - 新加坡华侨召开大会，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被选为主席。
* 8月24日 - 云南省主席龙云赴南京参加国防高级军政人员紧急大会，从抗战时局发展的需要出发，首次提出即刻着手修筑滇缅公路的建议，为国民政府当局所采纳。
* 10月 - 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简称西南运输处），属准军事机构，在国外称西南运输公司，新加坡、仰光、河内、香港等地设有分处，由广州市长曾养甫兼该处主任，后由宋子良接替。（南侨机工回国参战，大部分编入西南运输处从事抗战军事运输工作）。
* 11月20日 - 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称为陪都）。
* 12月13日 - 南京沦陷。日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达一个多月，中国军民被杀害30多万人。消息传开，激起海外侨胞的极大民族义愤。

1938

* 元月 - 滇缅公路西段开始动工修筑。

**【按：滇缅公路自云南昆明至缅甸腊戌，全长1146公里（中国境内960公里，由畹町至腊戌186公里）。全线分东西两段，东段从昆明至下关，长412公里，原是中缅交通骡马古道（俗称“毛路”），1935年由云南省政府改为公路；西段由下关经保山、芒市至畹町，仅有缅甸华侨梁金山1933年出资修建的惠通桥（吊桥）及一些毛路，此时应抗战急需而动工赶修公路，该段长548公里，仅8个月即竣工。】**

* 8月 - 滇缅公路中国境内路段建成试通车，全长960公里。
* 9月 - 由于日寇进攻广州，西南运输处由广州迁至昆明。
* 10月10日 - 南洋各属45埠华侨代表168人在新加坡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南洋八百万侨胞要“精诚团结”，为祖国抗战作后盾。
* 10月27日 -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陈嘉庚以华侨参政员身份，从新加坡发来“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电报提案。尽管会议的当然主席汪精卫“议长”饰词狡辩，但大会仍以大多数赞成而通过这一提案（惟将文字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名记者邹韬奋在《抗战以来》一书中评论说：“这寥寥的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939

* 1月10日 - 滇缅公路正式宣布全线通车。
* 年初 - 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致电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请代招募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同时还特派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主事人宋子良专程南往新加坡向陈主席面商事宜。
* 2月7日 - 南侨总会发出第六号通告：《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
* 2月10日 - 新加坡机器行响应南侨总会号召，特发出通告：“窃思我星岛机工不少忠贞爱国之士，具此两项技能者，实繁有徒。际兹国族凌夷之日，正好男儿报国之时，况吾侪平时每感向往有心，请缨无路者，对此国际需才孔亟，当可联袂而起为国服务，共肩民族复兴之责，以尽国民之天职也。本行为此特行通告，凡我机工同业，具有司机或修机之技能，而愿为国家服务者，请来本行报名，以便进行也。机工乎，良机勿失，盍早来乎！”
* 2月17日 - 陈嘉庚主席在怡和轩接见第一批回国服务机工（80人），并发表演讲：“新加坡、峇株巴辖华侨机工放弃在海外的职业，愿回国服务，不但利益减少，工作亦较辛苦。然以青年有志具此牺牲精神，足为全马来亚之模范，感召所及，不但劳动界可增加出钱出力之意念，就是其他商学各界，更当有绝大之感奋，尤其是资本家看到诸君此种伟大牺牲之精神，应当更加出钱，庶可以对诸君而无愧。”
* 2月18日 - （农历除夕）第一批南侨机工“八十先锋”由新加坡搭乘法国邮轮安打拉文号启程回国。这批机工是由新加坡（32人，白清泉为领队）和峇株巴辖（48人，廖国雄为领队）两地机工合计80名组成，即由南侨总会统一组织遣送的首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 2月22日 - 陈嘉庚致函各埠筹赈会征募机工并随函附送《组织法及其手续》及《登记表与介绍书》。

|  |
| --- |
| **《司机回国服务之组织法及其手续》**  **甲、组织**  **一、每队以五十名为限（如不足队数可来星洲凑足之）。**  **二、 队内举正副领队各一人，文书一人，财政一人，宣传一人，负责管理全队事务。**  **三、 正副领队须具有相当学识及判断能力、服务精神者，方可领导全队为国努力。**  **四、 队员训练须注重忠诚为国、肯牺牲、能耐苦、有恒心等精神教育。**    **乙、手续**  **一、每名队员须拍照像八张，两张贴于入队登记表（一表存于当地机关，一表交新加坡西南运输公司，转缴国内运输处），三张贴于护照，另三张用于华侨登记证（如已有华侨登记证者可免）。**  **二、各埠队员来星之前，（一）须先派人将名单登记表及护照应用之照片等，先于五日内来星办理；（二）并于事先十日内通知总会，以便向中国旅行社接洽船期。**  **三、回国航线概由安南河内登岸再转祖国，旅费以散舱票及火车输送，约费叻币五十五元，另队员每名给予需用五元，制服一套，雨衣一套，御寒卫生衣一领，牙刷、嗽口杯、毛毯、面巾各一件，约合叻币计八十元左右（由内地来星火车费概不计在内）。**    **丙、本队之简则**  **一、须具有熟练技术有当地政府准证者。**  **二、须体魄健全略识中国文字。**  **三、须热诚爱国具有牺牲精神者。**  **四、年龄在四十以下，二十以上。**  **五、无不良嗜好如烟酒等类。**  **六、须有相当店铺代为介绍。**  **七、每埠暂以□□名为限。**  **八、旅费悉由各埠机关负责供应。** |

* 3月13日 - 第二批南侨机工207人搭乘丰庆轮由新加坡启程回国，钟运熙为总领队。
* 3月27日 - 第三批南侨机工594人搭乘丰平轮由新加坡启程回国，刘贝锦为总领队。
* 4月5日 - 由于接到昆明西南运输处来电，第四批部分机工决定经仰光入滇，以便他们到缅北筹设机厂及在仰光装新车。由仰光登岸的机工（首批）一行于5日由新加坡搭乘丰庆轮启程，黄锦坤为总领队。
* 4月10日 - 第四批经安南入滇的机工一行由新加坡搭乘丰庆轮启程回国，连文瀛为总领队。
* 5月22日 - 第五批南侨机工535人由新加坡搭乘丰庆轮启程回国，钟椿祥（五峰）为总领队。
* 6月19日 - 第六批南侨机工124人由新加坡搭乘丰庆轮启程回国，经安南入滇，叶子英为总领队。
* 7月3日 - 第七批南侨机工117人由新加坡搭乘丰平轮启程，经安南入滇，廖萍为总领队。
* 7月16日 - 第八批南侨机工335人由新加坡搭乘丰庆轮启程回国，黄景镇为总领队。
* 8月9日 - 陈嘉庚主席派出南侨总会机工征募处主任刘牡丹回国视察机工生活并考察滇缅公路与运输情况。随行的还有《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张楚琨与陈戈丁。
* 8月14日 - 第九批南侨机工507人由新加坡搭乘丰庆轮启程回国。
* 10-12月 - 一批南侨机工参加南宁战役、昆仑关战役的火线军运工作。
* 12月 - 南侨总会为改善南侨机工生活待遇，购置了蚊帐、毛毯、工作服、卫生衣、羊毛袜、运动鞋、奎宁等慰问品，平均每个机工可得九件，于12月底备齐送至昆明。据了解，部分南侨机工未能如数或领不到应得的慰问品。

1940

* 2月1日 - “华侨机工互助社”在昆明成立，直属西南运输处，社长由宋子良兼任。
* 3月 - 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亲自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慰问抗日军民。在回国慰劳期间，陈嘉庚还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主席等中共领导人会见，并两处赴滇缅公路慰劳南侨机工。
* 3月 - 西南运输处组织“华侨运输先锋第一大队”，该大队人员200多名，除了大队部的会计、政训员和各队的炊事员外，全部是南侨机工，刘贝锦（麻坡华侨）任大队长。
* 4月12日 - 下午9时许，遮放军火仓库发生强烈大爆炸。其时，经南侨机工从滇缅公路抢运的军火物资已积存日多，仓库暴满，4月初又遇交通部运来筑路用的烈性炸药数百吨堆放在露天，突于是日发生爆炸，守库员工和附近居民被炸死伤者为数众多，损失惨重。
* 4月26日 - 南侨机工代表张达等三十人前往慰劳八路军负伤将士，并在《新华日报》公布发表华侨机工《慰问八路军负伤将士》的慰问信。
* 7月16日 - “华侨运输先锋第二大队”正式成立，詹忠浩任大队长，连文瀛（莆田籍南侨机工）任副大队长。
* 7月18日 - 英国执行绥靖政策，在东京签订英、日协定，关闭了滇缅公路的缅甸段通道。
* 10月18日 - 滇缅公路关闭三个月（1940.7.18---10.18）之后，重新开放。
* 10月 - 日寇仅占安南之后，专门组成“滇缅公路封锁委员会”，以河内机场为基地，重点轰炸滇缅公路。据不完全的统计，自滇缅公路重新开放后（1940.10.18），至日军入侵缅甸前，日机共出动60批639架次，还有29批架数不详，对云南各交通要道进行狂轰滥炸。仅滇缅公路上的“咽喉”----惠通桥和功果桥，就各遭炸坏20次以上。
* 11月底至12月初 - 陈嘉庚在结束“南侨慰劳团”考察工作后，不顾劳累，亲自再沿着滇缅公路进行视察并慰劳南侨机工。同行的有李铁民、庄明理以及交通部的二位工程师。陈嘉庚对改善滇缅公路军事运输工作提出了重要意见。
* 12月中旬 - 陈嘉庚视察滇缅公路后到达仰光，任命庄明理为南侨总会常驻滇缅公路的代表，交涉实施滇缅公路等事宜。

1941

* 1月 - “皖南事变”发生，在国内外引起强大反响，各地华侨掀起了反对分裂摩擦运动。
* 2月5日 - 国民参政员陈嘉庚致电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及全体参政员并转国民党中央，痛陈皖南事变是“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恳切主张“弭止内争，加强团结”。
* 3月 - 南侨总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陈嘉庚再次被选为主席，庄西言、杨启泰为副主席。大会特发出包括改善管理滇缅公路在内等九项通电。
* 11月 - 西南运输处被撤销，改组成立“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中缅运输总局”（简称“中缅运输总局”），由军委会后勤总部部长俞飞鹏兼任局长。
* 12月8日 - 太平洋战争爆发。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致电林森、蒋介石请迅即对日正式宣战，以示与英、美、澳及其他同盟国共同对敌。

1942

* 1月14日 - 中国国民政府令第5军入缅支援英缅军作战。从此时起，由第5、第6、第66军共10万人组成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陆续进入缅甸对日军作战。南侨机工奉派运送远征军入缅。
* 2月 - 新加坡沦陷，陈嘉庚辗转避难于印尼玛琅等地，前后长达三年多（1942.2 - 1945.10）。在避难期间，陈嘉庚冒着日寇搜捕的危险，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以惊人的记忆力，写出30多万字的《南侨回忆录》。
* 3月8日 - 日军占领仰光。
* 4月30日 - 滇缅公路缅甸境内段终点站腊戌沦陷。
* 5月3日 - 日寇攻入云南国门畹町，并沿滇缅公路长驱直入。
* 5月5日 - 中午 日寇沿滇缅公路攻至怒江咽喉---惠通桥。国民党守桥部队炸毁惠通桥，将日军阻止在怒江西岸，滇缅公路断绝了。
* 8月 - 滇缅公路主管部门三易其主，“中缅运输总局”又撤销，改组成立“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滇缅公路运输局”。南侨机工竟被裁员，生活陷入困境。
* 8月 - 盟军在昆明招收第一批南侨机工50人，赴印度机场从事军事运输工作，李卫民任领队。
* 12月15日 -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救济回国华侨机工》，陈述华侨机工失业流浪的悲惨处境，要求政府救济机关及赈济团体，应该认真地使归国侨胞各得其所，万万不能敷衍了事，推诿延迟。

1943

* 年初 - 又一批南侨机工（200人）奉盟军派遣，参加远征军赴印度从事抗日军事运输工作。
* 5月 - 中英两国政府商定组成敌后工作队，由林谋盛、庄惠泉负责，隶属于东南亚盟军总司令所统辖的一三六部队，在马来亚日占区从事地下抗敌工作。部分南侨机工参加一三六部队。后林谋盛在马来亚被日寇逮捕，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1944

* 1月20日 - “云南华侨互助会”假昆明福建会馆举行成立大会，推举侯西反为理事长，理事会下设总务、文书、救济、交际、教育、设计、调查、编辑等八个组。该华侨互助会着重于收容失业南侨机工及救济难民等。经侯西反呼吁，得到有关单位和人士同情，拨款50万元救济难侨。
* 2月 - 贵州交通公路总局运输人员训练所设立“华侨机工整训班”，收容华侨机工110余人。维持至年底，该训练班被撤销。
* 4月 - 盟军总部从南侨机工中选调部分精干人员，派遣潜往东南亚日敌占区从事地下抗日情报工作。南侨机工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作出新贡献。
* 11月10日 - 南侨总会常委、云南华侨互助会理事长侯西反，为救济南侨机工事，由渝飞滇，不幸在昆明市东郊九门里坠机罹难。

1945

* 1月4日 - 我军攻克畹町，收复滇西失地，打通滇缅公路。
* 1月27日 - 滇西中国军队攻克芒友，与缅北的中国远征军会师，中断两年多的中缅印公路恢复贯通。
* 8月15日 -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亲身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与国内各地民众一起欢庆胜利，狂欢达旦。
* 9月至10月 - 抗战刚一结束，为南侨机工复员事，庄明理曾向政府当局提出八项要求：

1、办理各线华侨机工总登记；

2、设法安置失业机工，或将其遣送南返；

3、办理华侨机工分别登记，有工作可做而不愿南返者，请政府保障他们的生活，失业者应从速收容，并作复员工作之准备；

4、向英政府办理机工南返手续；

5、在交通恢复后，给予机工南返的优先权；

6、发给南返机工服装；

7、发给机工奖励金，一方面可作为奖励，另一方面可作为南返生活费；

8、发给服务证明书，并通令海外华侨优先任用机工工作。该提议经侨务部联合行政院、救济善后总署、外交部、交通部、公路总局、后方勤务部等举行联席会议，即席通过。但迟迟未能得到落实解决。

* 10月至11月 - 10月6日，陈嘉庚结束避难生涯（1942.2----1945.10），安全回到新加坡，受到500个社团的联合欢迎。11月8日，重庆各界团体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主席赠送条幅，赞扬陈嘉庚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1946

* 1月至2月 - 南侨机工进行复员名册总登记，计登记1203人，而后来获准遣返、享有奖金及服务证书的实为1114人。
* 3月 - 华侨互助会特派常务理事白清泉、总干事邱新民携带总登记后的华侨机工名册前往重庆交涉办理复员事宜。
* 5月 - 华侨互助会派了白清泉、邱新民、袁阿喜、龙历文等“四机工”代表前往新加坡交涉办理复员之事。
* 6月初 - 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在雪兰莪福建会馆举行马来亚各区筹赈会初步联席会议，商议机工复员之事。
* 6月16日 - 马来亚各区筹赈会联席会议假吉隆坡福建会馆召开，陈嘉庚任会议主席。会议作出5条议决，协助解决机工南返。
* 6月19日 - 陈嘉庚、庄明理、陈可用、蔡伯祥与何炽祥等5位代表会见了伍伯胜总领事，提出机工南返的三点具体办法，伍总领事当场表示赞同，并愿尽力促其实现。
* 8月30日 - 陈嘉庚再次致函伍伯胜，指出“倘国内政府未能急切遣送，或至遣送徒成具文，应请阁下代表侨民回国交涉”。
* 10月 - 经过多方交涉，特别是南侨总会陈嘉庚先生和云南华侨互助会的努力，战后拖延了一年多的南侨机工复员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民发出通告，根据云南省华侨互助会的机工登记名册，转呈行政院核准发给奖金，每人美金200元，分别在重庆侨委会办事处、昆明侨务处及贵阳侨委会登记站分发。
* 10月至11月 - 南侨机工胜利复员南返。回国服务的南侨机工以昆明为“大本营”，抗战胜利后机工复员也是轰动昆明的大事，云南各界举行热烈的欢送大会，并向全体机工赠送了“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会后，第一批复员机工219人，眷属202人（共421人）由昆明西站出发。接着，第二批机工71人，眷属85人和第三批机工177人、眷属129人，分别于11月15日和11月29日启程。机工南返，既有整批的，亦有零散的，据不完全的统计，陆续有一千多人（包括部分眷属）几经辗转返回南洋，约占回国机工总数的三分之一。至此，三千多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战这一壮举，总算有始有终，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在华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    ＊    ＊

* 1955年11月 - 陈嘉庚在庄明理、张楚琨等陪同下，到云南、贵州等地慰问南侨机工。看到留居西南的南侨机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都已安居乐业，陈嘉庚甚感欣慰。
* 1986年9月3日 - “南洋华侨抗日时期回国服务机工云南联谊会”在昆明成立，推选杨保华、王亚六为正、副理事长，邓文聪为秘书长。
* 同年11月4日至14日 -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嘉庚之侄陈共存先生率新加坡考察团，在全国侨联、全国政协等有关单位的支持和陪同下，赴滇缅公路访问南侨机工。在此期间，陈共存、庄明理与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等商议在昆明建立“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事宜。
* 1989年7月7日 - 正值南侨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1939—1989）纪念之际，为缅怀南侨机工的历史功绩，表彰和发扬华侨的爱国精神，在海内外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云南省人民政府特在滇缅公路的起点---昆明，建立起一座雄伟庄严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上面刻着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赤子功勋”，这是对南侨机工为祖国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历史评价与高度赞誉。

南洋华侨回国抗日服务机工名册

**逐一核实，恢复了按原始档案的机工名单顺序排列，并对《侨务志》中机工名册的若干错漏（上百处）作了补正。各批机工档案名单之后所附的带队任职职务，是根据当时《南洋商报》公布的名单。本名册可说是迄今为止综合海内外最完整的南侨机工名册，但仍难免有缺漏，望知情者提供资料，以便补充。】**

* 于南侨机工回国服务的人数，据《星洲十年》一书所刊录，1939年共分九批回国，总数达3192名，这个数字是历来被普遍接受的，兹将统计数字列表如下：

南侨机工档案选编

案奉主座二十七年十二月渝艳代电第六项内开 ：华侨如有志愿回国驾驶汽车者，应尽量罗致。等因。遵与本埠华侨筹赈会几经洽商 兹由该会派送第一批回国司机六十八名，修车机工十二名，共八十名，由廖国雄、白清泉率领，于本月十八日由新加坡启程，经海防转昆明赴钧处报到，听候分配工作。查该司机、机工等均系身世清白，意志纯洁。所有回国旅费均由当地筹赈会供给，服务待遇，暂由筹赈会规定各月给国币叁拾元，自在新上船日起算，此后视服务成绩再行酌加。理合开列全体名单，备文交该司机等，赍呈钧处，谨祈鉴核示遵。谨呈

总经理处

附名单一纸（略）

新嘉坡分处处长陈质平（公出）

总务科科长夏日校（代行）

昆明西南运输公司宋子良先生鉴：梗代电悉。修驶员第二批二百二十名，元日起程。第三批二百多名，感日起程。余续募共可一千名。陈嘉庚叩。蒸。印。

径启者：此次机工回国服务人员计有二百0八名，其中有印籍王亚龙【能】一名，马来籍马亚生一名，均由太平埠筹赈会转派前来。查两个外籍人均能操中国语言，又能初识中国文字，因其从幼即与当地华侨一地生长，对中国抗战甚表同情，故此次亦愿参加华侨青年回国服务。经由该地筹赈机关详细调查，除同情中国抗战外，并无其他企图，如不许以前往，未免使其失望。又修机领队王文松君每月薪水国币壹佰元，其余每名月薪五十元，经前次接洽时当面应许。除请西南运输公司代转一函外，特再修函奉达，谨希查照是荷。此致

昆明西南运输处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新加坡译转陈嘉庚先生勋鉴：蒸电敬悉。先生领导侨胞热心救国，薄海同钦。此次协助本处罗致修驶员回国服务，充实抗战力量，尤深感佩。续募人员起程日期仍乞电示。谨电申谢，请祈察照。宋子良叩。寒。滇。

香港宋主任：心密。兹接陈嘉庚先生致钧座蒸电开：梗代电悉。修驶员第二批二百二十名元日起程，第三批二百多名感日起程，余续募共可一千名。等语。除复电致谢外，谨电钧察。弟遂、琢叩。寒。滇路车。印。

昆明西南运输公司宋子良先生鉴：寒电悉。第三批四百多名感日可起程。贵处应需驾驶车修机修电池各若干名，乞电示，庚当积极鼓励精熟工手志愿投效者急往。陈嘉庚。铣。

新加坡陈嘉庚先生鉴：铣电奉悉。查司机除第一二三批外，请再添招驶车300名，修机工100名，修电工30名为荷。弟宋子良。马。印。

昆明西南运输公司宋子良先生鉴：马电悉。第三批五百八十名决感（甘七）日往。第四批一百五十名，可再往否？此次募一千名，乃陈质平君所诺，如何？急电复。陈嘉庚。梗。印。

新加坡陈嘉庚先生：梗电敬悉。第四批仍请派来，马电请续招机工100名、电工30名，并请速募，径赴仰光与陈质平接洽。弟宋子良。有。印。

顷接筹赈总会陈主席嘉庚来函开：本会此次派遣第三批机工计五百九十四名，业经于本日上午乘轮赴越转昆，内中有印籍王亚能一名，系第二批机工，因手续关系，故延至此次始行参加，敢请贵公司迅即航邮呈报昆明运输处。等由。准此，查第三批机工回事事宜，已于昨日备文交机工带呈钧处在案。查该印籍司机投效，业经婉谢，此次该会又再派送，实难坚拒，拟请钧处准予录用，理合呈请鉴核示遵。谨呈

总经理处

新加坡分处处长陈质平（公出）

总务科科长夏日校（代行）

查奉命招募华侨机工回国服务，业已先后遣派三批经越转昆赴钧处报到在案。兹因仰光分处急需机工，屡电函催请去仰。第四批机工决改经缅甸回国。第五批机工约一百六十余名，约于本月十日起程，仍经越赴昆。前奉主座梗日港秘第五七二0号代电节开：“据河内分处呈，以机工经河内因食宿不便，车辆缺乏，请饬每次以五十名为限等情。仰即知照，并婉请筹赈会照办”等因。当即函请筹赈总会知照。惟该会以第五批机工定期回国，已请星埠总领事馆并托中国旅行社将一切过境及轮车票等手续办妥，并已函托越领馆及旅行社照料，一切可无问题，决按期起行。待离星时再行详呈。查第四批机工，为便得起见，分由星、槟两地于四月六、七两日先后登丰庆轮起程，经缅转昆赴钧处报到，听候分配工作。其中星埠八十二名，吉隆坡一百余名，槟城一百六十余名，合共三百五十余名。计机电及修补车胎技工共约百名以上，余均为司机。吉槟两地机工，因径在槟上轮，名单迄未送到，故确实人数尚未知悉。所有星缅船费仍由筹赈总会支给，每人并发给叻币十三元作为缅滇路费。至于薪金，仍照前三批所规定数额发给。理合将星埠机工名单乙份，寄呈鉴核备查。吉槟两地机工名单，待送到后再行呈奉。谨呈

总经理处

附星埠机工名单乙份（略）

新加坡分处处长陈清文

昆明宋子良先生鉴：蒸日第一批赴仰修、驶各半，共三百四十四名。除星、仰船费外，另汇仰运输公司助滇缅旅费每名二十盾，计六千八百八十盾。特闻。陈嘉庚。元。

径启者：查本会所募机工共四批，统由安南入口外，另一批承仰光西南运输公司陈质平君嘱，专选修机者赴仰，经于本月十日由槟启航，计三百四十四名，因程途邻近关系，其中修驶各居其半，陈君请另补助由仰至滇一段旅费。经决定，每名助以缅币二十盾，共六千八百八十盾，即日由中国银行汇去。除电陈君外，经另电尊处告闻，想已达尊览矣。以上所有办理经过情形，相应函请查照并盼惠复。又，各地侨胞应募机工自愿投效者，仍风起云涌，如尚有所需，亦请电示，当代续募，俾资效用为荷。此致

昆明西南运输处宋主任子良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昆明总经理处钧鉴：查星洲华侨筹赈总会选送第四批司机、机工共三百四十四名，业于本月十二日乘丰祥轮抵仰，现暂寄此间华侨中学校。膳食由本处供给，计每名每日膳费缅币五安托，由商会代办。现腊戌、仰光两装车厂亟待开设，须工殷急，该项机工拟即留缅使用。业经电奉主座核准。其余司机等拟俟日内新车装竣一部分，即行驾驶入滇。复查该批司机等由星至仰船票、护照等费已由筹赈会代办。另由该会拨汇六千八百八十盾（每名二十盾），交由本处转发，以充自仰光赴滇旅费。届时如感不敷，拟由本处酌量资助，当否，理合检同该批司机、机工名册报请鉴核示遵。仰光分处。旱。

昆明总处：密。星侨司机等三百四十四名文（十二日）抵仰，内机工（150）名，奉准留缅庇余驾装竣新车回国。该员等抵滇后愿先受训。乞核夺。职平。巧。

据本处新加坡分处转来贵会三月十二日大函敬悉。贵处领导侨胞返国服务，增强抗战力量，热心爱国，良深感佩。此次承招修机人员王文松君等二百零七名，已于三月二十四日到达昆明，经送本处运输人员训练所编队，稍事训练，即行派任运输工作，相应奉复。即烦查照为荷。此致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西南运输总经理处印

呈为呈报事。

查第四批机工共一百五十八名，由总领队连文瀛率领，于四月十日乘丰庆轮经越转昆。所有一切详情，业经于四月十日坡发字第311号呈文呈报在案。兹有仰光第二批机工八人，宝于本月二十一日搭丰平轮经仰转昆赴钧处报到，听候遣派工作。所有旅费，仍由筹赈总会发给，月薪拟请仍照前数批所规定发给，理合开列该批机工名单，并行备文交邮呈寄钧处，敬祈鉴核备查。查职处委托筹赈会招募机工，先后已派送经昆四批，共计为一千零三十九人。又经仰转昆一批计为三百四十四人。此间现已停募，筹赈会以该工人等热心为国，又以人数不多，决予遣派，特将派送原因，一并呈明，敬备鉴查。谨呈

总经理处

海防宋主任钧鉴：密。寒港电敬悉。归国华侨司机待遇一律国币36元。除径复后勤部外，谨复。弟遂。哿。路车。

令新加坡分处。

呈悉。第三批技工已到昆入所训练 。印籍技工王亚能经予录取，仰转知录用。此令。

密。星洲司机过境，越政府以治安关系，每批不得多名。经迭电知照，闻本月将有五百名赴滇，西贡登陆转车及河内住宿均无办法，若有意外，职处不能负责。恳迅电星洲，务必分多批送来。（0011）。支。印。

新加坡分处陈处长：越政府限制大批司机过境，且在西贡登陆，转车河内住宿均无办法，嗣后务分多批送滇。（1111）。歌。滇总。印。

窃查第四批回国华侨（按：由安南入滇）一五八名，除五名点编时未到场，迄今亦不见来所，实到一五三名。经于四月二十日点编为第六大队第十七、十八队。第十七队七五名，第十八队七四名。内赖耀清等四名调教务科工作。原领队连文瀛、黄玉田、刘传授、符气簪等四名分别擢升为队附、分队长试用，以示激励而资熟手。又，刘金祥一名，有三十五岁及二十七岁者。已将后者改名为刘必成。以上各缘由，理合检呈各项名册，呈请鉴核备案。谨呈

主任宋，副主任龚、吴、刘

附呈第四批回国华侨花名册一份，第六大队新编第十七、十八两队学生花名册一份（略）

接奉大函，敬聆一是。查本处目前所有机工暂敷分配，容俟将来不足或须增补时自当电请再募。迭函贵会代募回国服务之华侨机工，技术俱臻优良，并能遵守纪律。现在各地侨胞复能踊跃自愿应募，足征热心祖国，国家大有可为。抑亦征诸先生之力不□此。本处令人感佩之余，并为国家前途庆幸。相应函复，籍布微悃，即烦察照为荷。此致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主席嘉庚

宋子良谨启

窃查第一、二批回国服务华侨编队情形业经呈报备案在案。至第三批回国服务华侨五百九十六名，除二名留星未来，二名半途潜逃外，实到五百九十二名。经于四月五日连同庇能返国机工三十一名合编为临时大队。第一队二百十一名、第二队二百零五名、第三队二百零六名，调编第六大队一名。旋以临时大队各队人数过众，管教困难，乃于四月十五日改编为第七、八大队。计第七大队二百二十一名，第八大队二百十一名。奉命遣赴腊戌工作者五十名，遣派各运输队工作者五十名，遣赴保山工作者三十四名，调属所教务科工作者二十七名，调路运组工作者一名。又于改编时先后潜逃□名。以上各生编调情形理合造具清册，备文呈报鉴核备案，指令祇遵。谨呈

总经理处主任宋，副主任龚、吴、刘

附呈名册十二册（略）

呈为呈报事。

前奉钧处本月歌电，饬将回国机工分批遣送，以免经越时发生困难，当即将该电抄送筹赈会查照办理，尚未得复。兹有筹赈会交来返国机工名单五百二十四人，定于今日下午二时乘丰庆轮经越转昆赴钧处报到，听候遣派工作，所有旅费仍由筹赈会发给，月薪拟请仍照前数批所规定发给。至于该批机工名单，本应交该批机工总领队钟五峰带呈钧处，以备鉴核，但因筹赈会送来名单乙份，势须暂留职处抄录后另行邮寄，理合呈明，敬祈鉴核。谨呈

主任、副主任

新加坡分处处长陈清文

宋子良主任：第五批五百廿九名昨出发，经越，希准备。又，谢侠逊与征募机工无关。中央社电传昆明将开会欢迎，殊可异。陈嘉庚。漾。

窃查第五批（按：应为第四批，由仰光入滇）回国华侨一百十九名，除甘潭胜在下关失踪，郑昌因病留医腊戌，陈锦全（泉）病留保山外，实到一百十六名。经于五月十六日分编为第二十五、二十六二队实施训练。为此，附呈原来名册及编队名册各一份，呈请鉴核备案。又，萧学在一名，系随队前来，携有畹町分处乘车证，现着编入二十六队受训。理合一并陈明。谨呈

总经理处主任宋，副主任龚、吴、刘

附呈名册四本，乘车证一纸（略）

昆明宋子良先生：后方勤务部托招汽车司机二百名，修机可否兼收？电复。陈嘉庚。有。

桂林、贵阳探转后方勤务部俞部长樵峰兄：准陈嘉庚电，以贵部托招司机200名，技工可否兼收？转请电示。弟，宋子良。宥。滇密。

宋子良先生：请复有电，修机兼收否？陈嘉庚。东。

新加坡分处转陈嘉庚先生：有、东两电敬悉。俞部长复称：优良技工可兼收。弟宋子良。歌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本处经陈嘉庚先生介绍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先后到处者，计一、二、三、四、五批共1,397名。现第六批529名，不日又将到达。陈先生热心爱国，不辞劳苦，诚属难能可贵，拟恳钧座电令嘉奖，以励来兹。是否有当，敬候钧裁。职宋子良。有。

案查马来亚回国华侨一百零四名，除萧学在系于五月十六日随第五批侨生先到，并经派往路运组第十一大队工作。又，余亚三因病留医腊戌未来，林德和在腊戌奉调他处服务外，计实到学生一百零一名，经于本月二十三日编为第二十七队，理合抄呈编队名册一份，备文呈请鉴核备案。谨呈

主任宋，副主任龚、吴、刘

附呈名册乙份（略）

窃查第五批（按：应为第四批，由仰光入滇）回国华侨第一次到一百十六名，第二次到一百零一名，第三次到九十四名，均经分别呈报在案。查前因病未到学生陈锦泉已于五月十五日到所，编入廿六队受训。甘谭胜于五月廿六日到所，编入第廿五队受训；余亚三于五月廿七日到所。编入第廿七队受训；王家财、彭海于六月二日到所，编入第卅一队受训。理合备文呈请鉴核备案。谨呈

主任宋，副主任龚、刘、吴

案查第六批【按：应为第五批】返国华侨计五百三十一名，经于五月三十日莅所。除李濂、李福霖、陈有儒、石毓才等四名，另女性陈娇珍、白雪娇、朱雪珍等三名因不谙技术，未予编队外，余分编为第廿九队，计百名，属第一大队。第三址队，计百名，属第二大队。第三十一队，计百名，属第五大队。第三十二队计九十八名，属第六大队。第三十三队六十二名；第三十四队六十二名，属第九大队。理合抄附名册六份，备文呈请鉴核备案。谨呈

主任宋，副主任龚、刘、吴

附名册六份，共一帙（略）

西南运输处：虞滇路车电奉悉。承示华侨技工待遇与本部所定略同。除前托招收司机二百名外，请转恳陈嘉庚先生代为招收修理工四十名、电工十名。并赐复为祷。筑。俞飞鹏。已寒。管甲。

新加坡分处转陈嘉庚先生：俞部长来电，除前请代招司机200名外，并托代招修理工40名，电工10名。请惠办电复。弟宋子良。筱。滇秘。

呈为呈报事。

兹由星洲筹赈会交来代后方勤务部俞部长所招机工名单一份，共计机工116人，并声称该机工定于六月十九日下午乘丰平轮经越转昆，由总领队叶子英率领赴钧处报到，再由钧座转咨俞部长遣派工作。所有旅费仍由筹赈会发给。另有学生七人同行赴昆。除另备呈介绍该生等晋谒钧座外，理合开列该批机工名单，并行备文交该机工等带呈钧处，敬祈鉴核备查。谨呈

主任、副主任

附后方勤务部所招机工名单一分（略）

新加坡分处处长陈清文

昆明西南运输处：机工一百二十四名皓搭丰平轮来越。陈嘉庚。

西南运输公司宋处长子良兄勋鉴：前奉委座三月感川侍参代电，抄交陈嘉庚先生敬电一件，并电示：如需用此类技士，可与宋子良商办可也。等因。当经转电各机关学校去后，兹据交通司案呈交通机械修造厂五月哿代电，附呈技士类别，数量、待遇简明表三份。等情。相应抄同陈嘉庚先生敬电一件，修造厂表二份，电请查代洽办理并见复为荷。渝。何应钦。巧。交汽。印。

抄附陈嘉庚先生敬电一件

（衔略）西南运输处宋子良君托募驶汽车修机、修电计一千人，资送到昆明。经募足数，而热诚赴义之人尚多，未悉军用处有未需否？倘待遇可如昆明，各需若干人，由何处入口，抑仍宋君办理，乞电示。庚当鼓励应命。陈嘉庚叩。敬。

呈为呈报事。

查星洲筹赈会代后方勤务部俞部长所招机工一百十六人，已于六月十九日乘丰平轮由总领队叶子英率领，经越转昆前赴钧处报到。业经坡发字第585号呈文呈请钧转咨俞部长，遣派工作在案。兹由筹赈会送来代招机工名单一份，共计一百一十七人，由总领队廖萍率领，定于今日下午乘丰庆轮经越转昆。据筹委会声称：此次所招机工内，一部分为代后方勤务部所招，其余机工系代钧处所招。敬祈钧处于该批机工到昆后，即由钧处转咨后方勤务部将其所招机工遣派工作，所有旅费仍由筹赈会发给。除电知海防分处给予照料外，理合备文并检同是批机工名单面呈钧处，敬乞鉴核备查。谨呈

总经理处

附机工名单一份（略）

新加坡分处处长陈清文

案查第七批【按：应为第六批】华桥机工一百二十四名经于六月二十八日抵所，其中温贵华、陈文基、陈平波、王云锋、叶文来、苏邵耕、余学慈、古乾贤、李永炳等九名，原系归国投考大学者未予编队，其余一百十五名编为华侨第六队，隶属第六大队，理合抄附名册一份，呈请鉴核备案。谨呈

总经理处主任宋，副主任 龚、吴、刘

附呈名册一份（略）

径启者：现本会征募之第八批机工三百四十名已于今日搭丰庆轮起程赴越返国。查此次机工具有特殊技能者计有两位。一为总领队黄景镇，一为槟城队田穗九。黄君在此间马来亚摩多车厂任技师职，月薪二百元，其人与前批王文松同一具有优良技能，今次亦弃职回去，请特予拔擢，以资鼓励。田君系热血男儿，富有机器电器常识，曾于广九铁路、粤汉铁路、香港汽车工厂、太古船厂、北婆罗洲火车工厂历任装置火车修整机器电机各职，经验丰富，皆有任职证明书以资验证。今激于爱国热诚，情愿弃职自备资斧返国服务。如此热诚，实属难能可贵。敢请贵处甄别选用，以展其才，而遂其愿，实为至望。此致

西南运输处处长宋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昆明西南运输处：筱（17）由越第八批机工三百三十七名。陈嘉庚。巧。

窃查第七批华侨机工一百十七名，业于本（七）月十一日抵所，着由第六大队接编为华侨第七队，经由该批华侨领队廖萍交来新加坡分处嘱转呈钧处之坡字第六七四号一件，附名单一纸。籍悉该批华侨内一部分亦系后方勤务部请代招取者。除将名单抽存备为编队参对之用外，理合检同原呈一件暨编队名册一份呈请鉴核备案，并恳转咨后方勤务部迅来接收，实为公便。谨呈

总经理处主任宋、副主任龚、吴、刘

附呈新加坡分处原呈一件，编队名册一份（略）

径启者：本总会数月以来，募应祖国机工二千余名，原以责在征募，其他事项全未参与。乃其中有少数意志薄弱不堪部勒，竟复潜逃南返，以惧社会罪责，反而造谣惑众。浮言所及，难免影响续募。查此辈恶劣分子，有方在受训者，有甫出服务者，遽尔潜逃，深恐以后散遣各地工作，效尤更甚。又查滇缅公路，开辟未久，长途千里，设备容有未周。海外侨胞关怀祖国，对此抗战国际运输关注更切。为此种种，不能不作实际考查，俾得依据实情，公布侨众，以释疑虑，而利征召。用特遣派本总会机工征募处主任刘牡丹，由仰回国，沿途考察滇缅公路一切运输设备状况，以至昆明访询运输管理待遇各情，回报本总会，籍资考镜。相应据情函请执事于刘君抵谒时，赐予面洽指导为荷！此致

陈质平先生

主席陈嘉庚

径启者：案查贵总处托募机工，除各批募往外，尚需一百七十名。兹经决定于本月十四日搭丰庆轮由越前来，其中尚加有百余名，原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所托募，要由仰光入口。此间认为长途跋涉不便，故概由安南入口。请贵总处兼收训练备用，就此批截止，以后贵总处无再委募，便不复遣派。其他军政部所委募候车各种机工尚欠数十名，待募足后再行遣派回国。相应函达，即希查照是荷。

此致

西南运输总处主任宋子良先生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昆明宋子良先生：寒赴越机工四百余名，希准备。陈嘉庚。蒸。

昆明宋主任子良兄：（2814）电敬悉。密。承代招华侨机工226名已于东日到筑，由本部汽车管理段点收编队，谨电奉复，并致谢忱。筑。弟俞飞鹏。未元。辁管甲。印。

径启者：此次军政部托募机工八十三名，截至今日止，仅募得□□名。兹列一单呈览。其他欠额待后续募。但能否足数，未敢预定。第九批返国机工（连同军政部所募在内）已情趣今日（十四日）乘丰庆轮首途由越北返，总计五百零九名。除贵处嘱募外，约加二百到三百名，此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所托募，因各处筹赈会事前多未来报，迨至近日始行参加，故其名额突涨。务希贵处尽量收纳，以应他处可也。至此批机工约有百余名，平昔系司机助手再加训练者，经验不甚丰富，论理不便派往。无知从外埠集合而来，且爱国热情可嘉，故特声明，请为注意训练。查蒸日曾电告此轮有四百余名，请预备一切，计邀台察。现此间对于征募机工事，若国内各机关无再来征募，从此已告一段落，实行结束矣。以上所有经过情形，相应备文函达查照为荷。此致

西南运输总处主任宋子良先生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昆明宋子良主任：寝日电悉。第九批508名请全收训。贸委会办法游移，可取消。经转募仰复兴300余名。陈嘉庚。俭。

径启者：昨由本坡西南运输公司转来台发寝电，询第九批机工五百名有无贸易委员会所募之额在内，曾立复一电云：寝电悉。第九批五百零八名请全收训。贸易委员会办法游移，可取消。经转募仰复兴三百余名各情，计承察照。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六月间来函，托募五百名，由越南往广西明江受训。此间方着手征募，旋又来函嘱转由仰光前往，时适仰复兴商业公司亦来托募，系欲就地驶车入国。鄙人以入广西明江者，应由越南入境为宜。仰光路程遥远，长途跋涉需时耗费，诸多不便。终因其办法游移不定，故即取消。而将已募来者悉数遣赴贵处受训耳。仰复兴所募，计三百五十名左右，因到地立须工作，故所遣派皆为多年经验之工手，约九月尾可以全数派完。至本月止已往半数矣。敝处尚有半熟技手，再经训练毕业者二百名。其他有执照而富经验者，虽未来报，谅亦不少。如须征募，每月或一百名至二百名，大约必无难事，至少或可至三百名。未悉贵处尚有需要否，即希惠复为荷。此致

昆明西南运输处宋主任子良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令运输人员训练所。

查由新加坡来昆第九批机工五百余名内，本为贸易委员会托代招募。惟该会现不愿接收，经本处询，准陈喜嘉庚先生电复：该第九批机工请全收容，贸委会办法游移，可取消。等由。准此，合亟令仰该所，即便将该批机工全部予以收容训练，仍将名册列报备查为要。此令。

案奉钧处滇路字第九零二六号训令，以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函告第九批返国机工五零九名已首途返国，特饬知照。等因。复奉钧处转示海防分处马电开：“星机工五三八人马午由河内慢车到昆，请派接”。等由。奉此，职所当即从事准备，并逐日派员赴车站接候。兹该批机工已于八月二十三日到昆，经接运入所，计共五三七名，其中贸易委会托招之机工，曾经职所派员前往接洽，请其派员接收。该会以缺乏设备关系，未予接收。现由职所一并收容考核技术优劣，分别给以短期训练。奉令前因，理合将该第九批华侨机工回国入所情形备文呈请钧处鉴核备案，并请转函筹赈总会，人数已足，毋庸继续募送，实为公便。谨呈

总经理处主任宋，副主任龚、吴、刘

案准贵处滇路字第八七三四号公函，以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来函，此次搭乘丰庆轮来华机工，内有百余名系本会托募，嘱于该项机工到达时派员前往贵处运输人员训练所接收等由。准此，查本会复兴公司前因驻缅运输工程处需要司机、机匠，经委托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主席陈嘉庚代为招募司机三百六十名、机匠四十名，共四百名，并应请随时分批送仰以便派赴工作，据报现已多批到达仰光各在案。此外，并无托募机工经安南来华之事，或恐系他机关所委托。除转函南洋华侨筹赈总会陈主席外，相应函复 ，即希查照为荷。此致

西南运输处

主任委员陈辉德、副主任委员邹秉文、卢作孚

案查前准贵会八月八日及十四日两函，以续募第九批华侨机工二百余名，及贸易委员会托募百余名，于十四日搭丰庆轮由越返国，嘱查照接收训练并转批各等由。当经令饬本处运输人员训练所遵照收容，并请贸易委员会派员届时赴所接收在案。兹据本处运输人员训练所呈报，该批机工于八月二十三日到昆，共计五三七名。其中贸易委员会托招之机工，该会以缺乏设备，未予接收，一并由所考核技术优劣，分别施以短期训练。请鉴核并转函筹赈会等情。相应函达，即希查照为荷。此致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西南运输总经理处

昆明宋处长：虞路车电敬悉。密。除饬交通机械修造厂克日派员前往接收外，特复并谢。渝。何应钦。马。交汽。印。

接准八月廿九日大函，详示代贸委会招募技工及取消情形，并以现在尚有半熟手及富有经验技工征募非难是否需要，嘱查照见复。等由。准此，查第九批技工到达后，业经本处遵嘱接收训练。现在各修车厂及运输车队机工均已满额，目前暂不需要补充，应请停止征募。准函前由，相应函复，即烦查照为荷。此致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主席嘉庚

西南运输总经理处

查汽车运输队华侨义勇总队第十五大队已由运输人员训练所编组完成，并派杨碧湘为大队长，于十月一日正式组织成立，所辖两中队，已先于上月二十九日出发同登接运车辆。兹将该大队官佐士兵名册另行签报外，理合将该大队组织成立日期先行签报，敬祈鉴核备查。谨呈

总经理处主任宋，副主任龚、刘、吴

公路运输组兼组长吴琢之、副组长饶竞群

径启者：兹据华侨机工第九批第一队军政部重庆队队长翁辉春自昆明函称：本队自星洲选编为军政部重庆队于八月廿三日抵昆明西南运输处人员训练所，瞬息两月余，尚未有派赴重庆消息，曾数次呈询本所长官，均复以须候重庆军政部派员接领。等语。本队以在所等候，遥遥无期，曾开会议决，由春呈函重庆军政部请示外，并请赐示进止办法，俾资遵循。等情前来。查该队既经编为军政部重庆队，似应派赴重庆听候军政部调用，以遂其回国服务之志。据函前情，未知为何延搁，相应据情转为函请查照，希即迅予遣派，前往重庆，以资国用。倘有其他缘由，应俟何日即得派出，亦希径告该 队，并即惠复为荷。此致

昆明西南运输总处主任宋子良先生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径复者：十一月三日来函据称：到昆明已两月余，尚未奉派开赴重庆服务，请转函查询缘由等由。已悉。查此间已即日据情函请西南运输总处从速派往重庆，听候军政部调用矣。据函前由，相应函复查照为荷。此致

华侨第九批第一队、军政部重庆队队长翁辉春先生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接准贵会十一月十九日领字第六一三号笺函，以据华侨机工第九批第一队军政部重庆队函告；该队留昆明运输人员训练所已两月余，尚无赴重庆消息。在所等候军政部派员接领，遥遥无期，请示进止办法等情。转嘱本处派重庆听候军政部调用，以遂回国服务之志，并嘱将延搁情形见复等由。准此，当即令饬运输人员训练所查复并电军政部及军政部交通机械修理厂迅派员来昆接收各在案。兹据运输人员训练所呈称：查该队学生六十六名，云云。抄至——但该厂派员何日到达，尚难预卜，究应如何办理，迅赐核示。同时复准军政部机械修复厂函复略称：云云。照抄至——现已抵筑候车转昆等由。除指令训练所转知重庆队外，准函前由，相应函达，敬希察照为荷。此致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

窃职队第一批一行22名经定于今天下午动程赴星，第二批57名约迟数天亦可南返。至所余7名中，除黄华才一名因病留腊及陈荣、阮润松二名自动呈请留仰外，尚有许礼丰、福记、钟金水、李添福等四名因护照问题须较迟方得南返。又附队七名除贝友胜、詹行嶷、柯玉彬、郑大成四名径先回南。朱南粦今天亦随队南返。此外有苏振怀因病留医，吕金祥因护照未妥，故须稍待。惟该附队各员之船票护照等费概经职先行付与中国旅行社，是以特此具报，恳请钧长察核，准予第二批动程后，即着孙同志克镛回滇。至所余三批数名，因护照未能同行者，统祈代为办理遣送，俾节公费而利国家，是为公便。谨呈

仰光分处副处长陈

南洋队领队马牛呈

查第二批南返三十二人经奉批准南返，并派本社助干李卫民率领于四月一日首途，由仰光转口南返在案。诚恐沿途发生困难，敬希赐洽指导予以方便，或因特殊情形需要费用之援助者，得由该员陈明理由亦请准予酌借。相应函请查照为荷。此致

仰光分处

军委会西南运输处华侨机工互助社

窃职处于本月二十二日欢迎南侨慰问团参加车队检阅，业已马电简报在案。兹将是日欢迎情形及该团主席陈嘉庚、团长潘国渠、海外部部长吴铁城演词另纸录呈。敬请钧察，谨呈

主任宋，副主任龚、吴、刘、陈

附呈欢迎南侨慰问团记事乙纸、陈嘉庚等演词三纸、答词一纸

重庆分处处长汪英宾

本团此次回国慰劳抵渝，承蒙贵处两次热烈招待，前两天因时间关系未能与诸位谈话。至于说训话，实不敢当，不过有此机会需要与各位说两句。第一点要向各位提出报告的就是此次侨胞组织慰劳团之意义。本团五十余人系南洋各属一千二百万侨胞推选之代表，回国向各长官致敬，并慰劳前方抗战将士及后方努力抗建以及出钱出力诸同胞。二、去年二月间南侨方面得到宋主任函，知滇缅路完成通车在即，嘱代招侨胞返国服务，前后陆续自愿抛去原有的优美生活以及父母妻子，热烈返国参加抗战工作者已达三千余人，均系抱抗战热情而来，可以说没有一个是无工作无办法借此返国而求生活者。而且前数批均系技术方面有深刻的研究及经验者。虽则后一二批略有少数经历差点的，而大多数的技术还是精良，惟对于军事训练较为缺少。因在海外生活安定，无所拘束，故在人数众多中难免无一二品行不端的分子夹杂在内。希望国内同胞决不可因少数不肖者影响到多数，对于侨胞便发生不良印象，那就决【绝】对错误了。要知道滇缅路在抗战时期各路国际线多被封锁之际，确为一最重要的国际路线，在该路中有数千尺以上之山岭，道路弯曲，徒坡特多，行车不易。服务此路者，若非有精良技术，特别胆量，决难负此重任。现在侨胞机工既有数年或十余年之丰富经验，胆量亦大，始有绝对的把握到滇缅路去服务，确属得当。故一年来成绩颇好。现在本人可以代表各华侨机工尚有数种要求。因为他们一向在国外，生活是很优美的，每月所得之金钱亦很多，回国是为抗战救国，决不是金钱的问题。所以要求国内管理者对于他们衣食住以及医药问题要特别注意。其次则为新闻报纸应多多的供给他们阅览。但是我提出者决不是过分的要求，是求其适当，就是衣能暖，食能饱，居住地点能合乎卫生，使他们白日工作，夜间可以安息，则他们工作自可发挥莫大的成绩。今天在贵处所看见的队伍，服装、排列、精神均极整肃，惟今日参加侨胞不多，我希望在滇缅路服务之多数侨胞都要与今天所看见的一样，我们要大家抱定爱国热心，努力完成抗建目的，以求达到最后胜利，则可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再有一点，希望各侨胞要知道我们中国是很贫穷的，此次回国我所知道的可向各侨胞报告。现在前方抗战士兵的生活是更苦，每月所得的只十元，除去六元伙食，只得四元。少尉官长亦只有二十八元。还有青年服务团团员多系国内外大学专门或高中毕业生到前方去服务，每月只有十五元。现在我们回国侨胞最少者都有三四十元，比较他们已经好多了。由此我们应认清国内对我们的待遇实在是提高不少。我们回国服务是为抗战，不是为金钱。所以我们收入只三五十元就应该节省，要抱刻苦耐劳的精神，不要浪费金钱。如果不知节省，就是三五百元亦属不够。总之，侨胞之回国服务，首先要看清，目标是抗战救国，民族复兴，不是来享福过优越生活的。再有一点报告，就是此次回国晤见冯玉祥先生问本人，此次对于战时首都的感想如何？后来晋谒蒋总裁时亦是同样的询问。当时我很诚恳的答复，本市市政建设种种均极满意，惟感觉有一缺点就是不问大卡车、小包车、黄包车等等多是不清洁，一方面既不卫生，一方面又不经济。我们知道，此项车辆多系用外汇购来，如果保养不得法，则机件易于损坏，寿命减短。希望负管理之责者，对于清洁保养应多加注意。外国城市里对于交通上如发现一部不清洁车辆就要立刻扣留，必要清洁者才准在路行驶。当蒙蒋总裁记下，近数日来重庆市内不清洁车辆已少发现。今天最后希望在此数十位侨胞将本人所说的转告贵处。其他三千侨胞都要抱定回国参战是为国家是为民族增加抗战力量而来，不是为个人的利益而来。

令运输人员训练所。

查运输第十大队业经撤销，所有官佐士兵已饬向该所报到，薪饷至六月底止。仰即接收编为华侨运输先锋总队第二大队，自七月份发给薪饷。除分令外，仍仰将办理情形具报备查。此令。

西南运输总经理处

蒋委员长钧鉴：支庚两电均经奉悉。庚一行业于文日抵缅，关于滇缅路视察结果，谨陈如次：公路工程，近已多处改善，殊堪满意。惟一部分路面狭窄，转弯未顺，坡度过高之处，鄙见仍宜改进。近有载重五吨卡车比前加大，路面狭处，失事颇多，须加宽至一等标准九公尺为度。功果桥、惠通桥经各于上下流添造便桥摆渡，敌机来炸，亦不虞运输有阻。政府禁令，在紧急时期自上午九时至下午三时，不许车辆通行，原属安全策划，惟实际上在此六小时内，将来往车辆停塞于两桥前后，如遇轰炸，牺牲更巨。桥之两旁危崖数千尺，如非白日行车，其危险性殊大，得失比较，似以照常开放为宜。又此路交通重要，沿途未设电话，情报难通，非常时期，相需益急，故电话亦应赶设。至于运输管理方面，松懈如前，毫无改进。车辆失于保养，开运仅一年余，业已近半损坏，经常停修，现用只有半数，运量自难增加。鄙意拟委华侨侯西反、庄明理二君暂住该路，协同兴革，籍收臂助。侯、庄二君对此略有经验，可尽义务。西南运输处陈代主任体诚在缅晤谈，欣然同意。如蒙钧座核可，请另电饬各主管机关遵照办理，并予侯、庄二君以事权上之便利。所有上陈各节，运输编制局刘组长传书，交通部赵工程司履祺此次偕行，所见一致。回渝复命，必较周详。谨祈钧夺施行为荷。陈嘉庚叩。删。（仰光）

重庆陈代主任：密。据陈质平寒电以据腊处潘其武电称，据报华侨司机因不满改编遣散事。认为本处不要华侨，并派至腊煽动，拟就星洲南侨总会四月东日大会之前，派代表携案赴星报告，以致人心浮动。除由潘副处长向各队长负责解释外，转请妥为安置等情。兹事关系重大，似应切实声明，以正闻听。除电复并分饬腊、遮、保各处妥为解释外，敬祈迅赐径电陈嘉庚先生设法开导，以释疑虑为祷。弟吴琢之。巧。秘。

西南运输处宋主任勋鉴：据报，该处华侨司机因不满改编遣散，曾倡西南不要华侨服务之口号。芒市华侨先锋第一大队长刘寒【贝】锦曾派分队长林清会赴腊戌，致电陈嘉庚并怂恿驻腊华侨司机响应，嗣以电费过昂未果。现驻腊之第二大队亦奉令再行缩编，人心不免更形浮动等情。持电知照，即希注意。中正。马。川侍六。

蜜。奉军委会办四二养代电开：据西南华侨司机谭荣耀等三月十一日由昆明新村华侨互助社报告略称：窃侨等无故奉总处命令退回训练所，该所复以未奉总处命令，不予收留，致流浪昆明，无家可归，食宿一切难以维持，恳请设法解决或送返南洋以免漂流异乡等情。兹据前情，特电希迅将该华侨司机等失业情由查明，并妥筹救济办法具复。等因。奉此，特电查照，仰即将上项实在情形查明具复，以凭转报为要。运输统制局。寅有车。印。

顷准缅甸华侨救灾总会三月十九日来函（上略）据称：贵处近有令饬所属华侨机工重新填具志愿书，按其表格似有令华侨机工离职或中途解职之举。该会为华侨机工服务前途计，函请本会核办等由。准此，查军委会嘱托，本会募集机工原为服务祖国，帮助抗战事业早日完成义举，倘有临时更调，或着其离职时，应先通知本会，以便通告各机工家属知照，兹准前由，相应函请贵处着各机工重新填具志愿书之愿旨见覆为荷。此致

西南运输处昆明总算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窃职此次奉命护送南侨慰劳团受伤代表蒋才品先生南返，并代钧座慰问，等因。谨将护送经过及与南侨会接洽情形缕陈如左：

（一）查蒋氏于二月一日乘中航机离昆，次日抵仰即送往当地中央医院，并电新加坡南侨筹赈会派员来仰会送。准电复，仍请职护送，并经钧座电准在案，即于二月二十七日趁轮，三月八日抵新，当即送入南侨会延医诊治，惟病势颇剧，恐难获痊愈。

（二）关于南侨会捐款事项，经与陈嘉庚先生多次洽商，据称：

1、捐本处卡车百辆、救济车拾辆，约值叻币二十余万，惟目前英政府统制外汇，无法将上项价款汇出。

2、关于滇缅路铺设柏油事，经与交通部张部长电洽，是项价款估约需叻币贰百万元，款经筹妥，亦以统制关系，无法汇出。

3、南侨会尚有捐款伍百万叻币，亦因外汇统制，无法汇出。

以上各项捐款，除陈嘉庚先生已电请中央与英政府洽准汇出外，并嘱职将所述情形报告钧座暨陈处长质平，再电呈政院设法将上款汇出。

（三）关于职此次出差旅费另案答呈核销。

谨呈

主任、副主任

职顾树立 谨呈

谨呈者。职此次护送蒋才品先生返新，谨将此行见闻分陈如左：

（一）南侨对于政府之印象：查陈喜庚先生此次返国观光，似不满闽政，曾在报端公开批评指谪。又此次解决新四军事件，侨胞认为系内部分裂，内战之开端，舆论界均表不满，责难政府。推其原因，似系共党活动及侨胞认识不清，我中央又未派员至该地作下属工作所致。据新总领事高凌百先生面告，以南洋商报本系陈嘉庚先生之机关报，目前似已左倾……

（二）对于本处之批评：南侨会招待席上公开责问三点：

1、车辆问题：捐赠本处汽车，行驶不及半载已毁大半，所存者虽可行驶，惟已破旧。

2、运量问题：本处系唯一西南公路最大之运输机构，而其运量适成反比例，牵至车辆保养问题及管理问题。

3、管理华侨问题、司机管理问题牵至不爱护华侨司机，据问以：

（1）身亡之司机直至一年后南侨会始得消息。

（2）机工互助社之调查工作成绩毫无。

（3）司机之待遇不足。司机每日奔走于公路，膳食皆无定处，每餐皆至饭馆，至少平均二元，则每日伙食费须五六元，又杂费等均须二、三元，每月每司机至少须二百元左右始能过活，而目前待遇过低，皆质当其行装以求生活，或行法外之事，而得收获。故出走之司机颇多（职出差滇缅路时，司机不满意者颇多）。推其原因，事实上本处应负之责亦有……

（三）查马来亚侨胞占该半岛人口总数之五分之三强，经济权亦操纵于我侨之手，惟我国过弱，国际地位不均等，我侨胞受殖民地政府之压迫，无法反抗，深望祖国日强。故革命之完成与此次抗战，侨胞尽力筹赈……抗战以来，回祖国服务之华侨多在本处，又捐赠本处车辆亦多。本处除负有军运之责外，尚应注意及侨胞问题，盖本处系与华侨发生直接关系之机关也，故似应注意及下列问题：1、司机的教育。2、司机的管理。3、司机的待遇。

又查华侨机工互助社似应普遍成立分社，注意及调查统计及福利诸问题。至福利社之组织亦属重要，似应请拨专款组织之。福利社包括下列数种福利事业：1、浴室，2、膳堂，3、宿舍，4、图书室，5、康乐室，6、储蓄，7、其他。

又查本处既系与侨胞发生直接关系之机构，供职本处之华侨多系由星洲而来者，故新加坡分处已撤销……与华侨接洽事项，并可协同领事馆作调查工作及宣传工作。

以上各点谨请核夺。谨呈

主任宋，代主任陈、副主任吴

职顾树立

案据本会昆明侨务局三十年六月五日呈略称：近据服务西南运输处之华侨司机多人来局声称，因奉令缩编，致无工作，加以生活压迫，不得不脱离原有职务，请予救济，或资助重返南洋。等语。当于本年四月二十二日函请西南运输处将编余司机名单，及编遣待遇办法查明见复，旋准函复，此次车队改编，并未遣散华侨司机一人，仅编队施以短期训练，一俟新车到达，即可分派工作，请代为开导着至指定大队报到。等由。复查华侨司机到该大队报到者，不及三分之一，余皆散处各地，迹近流浪。其所以不愿报到之原因，实由待遇太低，不足维持生活。今若不详加调查，指导及救济，则风声所播，诚足影响侨胞内向之心，而为敌伪所快。恳请准予转函西南运输处交涉，除机工原有薪饷外，应在可能范围内，尽量给予生活补助费。其无意重返工作者，宜给予南返川资，另谋职业。等情。查华侨司机，抛弃原有职务，回国参加抗战工作，其拥护党国之热诚，至深且切。乃近常发现华侨机工，衣履破烂，困苦堪怜。此种不幸现象之所以造成，实因每月所得，不足维持生计。当此抗战已达最后关头，凡属国民，固应各尽所长，为国家努力服务。但服务机关亦宜顾全其生活，俾可安心工作。如人浮于事，不感需要，似当资遣南返，俾得归宿。本会前据陆军辎重兵汽车第三团第三营第八连全连华侨驾驶兵呈请救济，亦经转函军政部请酌予加给生活补助费在案。诚以华侨机工系属专门技术人才，似不宜以普通士兵看待也。除令行昆明侨务局详细调查流落各地之华侨机工，予以抚慰，晓以大义，婉劝前往预备大队报到受训外，据呈前情，相应函请查照核办，并希将办理情形见复为荷。此致

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总经理处

侨务委员会长陈树人

昆明总处钧鉴：案准陈嘉庚先生八月十六日函开：接六月二十一日大函暨名单乙纸谂悉。乙是华侨司机回国服役，原属服务报效性质，与资雇不同，且回国期间已逾两载。当时系彼等爱国情殷，踊跃投效，原无约定在役年限。如贵处有相当待遇，料不至有他图。间有一二自由向他公司任职或系为生活问题，贵处应委婉劝其继续为国效劳，似不可加以逃走之罪，致远道传闻，滋生误会是荷。等因。查六月二十一日函并非本处所发，理合电请鉴核示复，俾便转复陈嘉庚先生，并恳妥慎处理，免伤侨望为祷。仰光分处陈质平叩。陷。总午。

慎余吾史大鉴：华侨机工人数统计训练所与前公路组所列颇有出入，互助社成立在后，无案可查，难得确数。弟向各批回国华侨查询，参考各方名册，得三千人之数，亦不敢言确实也。近日编余若干人，向预备大队报到者若干人亦无案可查，请就近向管理组一查可也。专此祇颂

分绥

华侨机工状况一稿遵命拟就，不知足供参考否。附呈。

弟郑琦叩

**西南运输处之华侨机工**

**本处华侨机工之起源及来源**

本处之有华侨机工，起于民国二十七年。当抗战开始，南洋侨胞激于爱国热情，多自动愿回国服务。当时槟城机器工会，曾遣送侨工两批回粤，其中一批三十二人，即服务于本处。同时本处既感于侨胞之热诚，且正在需用驾驶修车及电工等技术人才，特请托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代在南洋招募此种侨胞回国服务。于是马来亚各地华侨，闻风而起，纷至新加坡请求参加，为国效力。遂于二十七年十月遣送第一批，以后继续办理，至二十八年冬，计共遣送十批，约二千九百名——第一批八十名，第二批二百零六名，第三批五百九十六名，第四批一百五十五名，第五批五百三十四名，第六批三百四十九名，第七批一百一十七名，第八批三百三十二名，第九批五百零九名。时该处殖民政府禁止南侨筹赈总会继续办理，第十批遣送事发生阻碍，而热心者仍暗自活动，潜回祖国，故是批只得十二名，十批合计为二千八百九十名。又有暹罗华侨多人，原于抗战以前自动回国服务，及抗战后，本处组织成立，彼辈又向本处投效，以及抗战后自费回国，由海外各地帮会专函介绍来处，请予考试收容者，约计百名。总计此三千华侨，均先后在本处司机训练所及运输人员训练所分组训练，毕业后皆分派在本处各运输队及各厂站等担任驾驶或技工等工作。

**本处华侨机工之现状**

三千华侨机工服务本处，三年以来，不独平时多能忠于职务，对于历次抢运，如广东、广西、同登、滇越、滇缅诸役，尤忠勇奋发，不畏艰危。在敌弹射击轰炸之下，冒险工作，间有深受重伤，仍不退缩，终能达成其任务者。其劳绩尤足纪录。惟近年以来，因内地物价飞涨，本处因限于经费，对于员工薪给，未能增加，待遇莫由改善，生活日感困难，少数不良分子及志气不定者，不免有犯法之事。适值各处商人经营运输事业者日多，即以腊戌一地而言，新组运输公司多家，需用司机至二三千名之多，尤喜用华侨机工，其待遇均较本处机工高至数倍，颇多招引本处华侨机工者。加以本处为军运机关，员工犯法，当按军律处置，不若商民之宽纵。以故此辈华侨机工，内受生活之压迫，外受种种之引诱，渐生外向之心。又值本处因车辆日少，司机太多，为求撙节计，乃将各运输队加以改编，责令各队对机工加以甄别，另设预备大队收容编余机工，着在队听候，俟有车时再行编队，另派工作。编余机工，心益外鹜，颇多至腊戌方面为商车司机者。查本处此次缩编，编余华侨机工计□名，现向预备大队及送赴训练所重施训练者计□名，离开本处者已有□名，虽经本处严令，以后不得擅自离队，否则以弃职潜逃论罪。但对于业已离处者，因限于经费，不能增加其薪给，既与商车及其他机关司机待遇悬殊，若此，欲一时将彼等招致来归，办理殊感困难也。

**特殊情形**

华侨机工皆闽粤人氏。南侨筹赈会遣送回国者，第一批至第五批，对于驾驶或修车等技术，十九有相当经验。以后各批，收容较滥，但亦多技术精良。言其性情，则爽直而热烈，言其举动，则活跃而放浪。且久居热带海岛之地，又因殖民政府但求供其劳作，此外不加苛求，平时故与放纵，不加管教，文化水准因之低落，久习于放浪自由之风，多有好勇斗狠之气。性情习惯言语生活，皆与国内不同，以视国内近日曾受本党及新生活等严格整齐之训练，更相枘凿。一旦归国，为国服劳，与内地军警人事自不免时生龃龉，互相摩擦。但彼辈回国初衷，确为激于卫国抗敌之情，牺牲其职业，离别其家庭，万里归来，为国效力，其热情至堪嘉尚。各队长官，倘能知其习性，略迹原情，赏罚严明，甘苦与共，言行以身作则，使其心悦诚服，则一旦有事，激发其忠勇之天性，信能慷慨赴义，视死如归，诚可用之材也。

《南侨回忆录》有关南侨机工史料（节选）

为通告事，本总会顷接祖国电委征募汽车之修机人员及司机人员回国服务（修机者按数十人），凡吾侨具有此技能之一，志愿回国以尽其国民天职者，可向各处华侨筹赈会或分支各会接洽，并注意下列各条方可。

（一）熟悉驾驶技术，有当地政府准证，粗识文字，体魄健全，无不良嗜好（尤以不嗜酒者），年龄在四十以下二十以上者。

（二）薪金每月国币三十元，均由下船之日算起，如驾驶及修机兼长者，可以酌加，须在工作时，审其技术而定。

（三）国内服务之地，均在云南昆明，或广西龙州等处，概由安南入口，旅费则由各地筹赈会发给。

（四）凡应征者，须有该地妥人或商店介绍，知其确具有爱国志愿方合。

（五）本总会经函达各地筹赈会负责征募，各筹赈会如经征取考验合格者，计有若干人数，须即列报本总会，至应募者前往安南路程。如能由所在地筹赈会办妥手续，直接出发，固妙，否则可由本总会设法办理。

事关祖国复兴大业，迫切需要，望各地侨领侨胞，深切注意办理是要，此布。

中华民国廿八年二月七日

我国抗战后，海口概被敌侵占，外货可入口者，只靠香港、安南两路而已。滇缅路甫在开创尚未通车。及广州失守后，香港存积货物军火二万余吨，我政府乃将西南运输办事处移设新加坡，名曰“西南运输公司”，总机关设在昆明，主事宋子良君。香港存积货物大半移往仰光，由滇缅路入口，其余则由安南入口。滇缅路将通车时，缺乏驶车机工，且新路多崎岖，驶车者非老经验必多蹉跌。宋君来电托代雇司机及修机工人等回国，往滇缅路并西南等省服务，除薪水外膳宿衣服医药概由政府供给。南侨总会乃出通告，并致函马来亚各属会鼓励，数月之间，热诚回国者三千二百余人。经安南往昆明者居多，经仰光者三百余人。有一修机工在洋十余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诸机工到昆明须经军训两个月乃出服务，其训练多属军式礼节。实行服务后有少数人逃回。寄来之通讯亦云，“待遇甚劣，不依照所约办理，如寒衣宿舍医药均缺乏，各站办事人乏精神，手续麻烦，迟慢，站段无车屋，救济车及修理器具不备，辛苦难以言状，常有货车损坏停于山地无人处，车上机工饥寒至两日之久”云。

余闻悉滇缅路办理及待遇司机不善事，难免寝食不安，乃举派代表由仰光入口往昆明，沿滇缅路视察事实。且度所传如不虚，或由路甫开竣未瑕设备，或限于经济因陋就简。若限于经济，南侨总会可以代筹。余按滇缅路由宛町至昆明九百余公里，可分作六段，每段一百五十余公里，当设七个停车站。每站建几个停车亭，可容货车三百辆，面积五六万方尺，每方尺建筑费国币一元半共约八万元。工人寄宿舍伙食房阅报室医院二万方尺，每尺以二元半计共五万元，合计作一百万元，申坡币二十余万元。就使再加十万八万元，亦容易办到。乃详列此项计划交代表带去，并嘱沿途考察，逢站特别留神履勘，作事最患乏金钱，金钱如便何事不成。如此设施非但为华侨司机工人计，亦为抗战军运成绩计。该代表于民国廿八年秋起程，沿途来函报告果如前闻，“所经各站设备极形简陋，并不敷用，所遇各华侨机工等多面无血色，带病含泪，目不忍睹”。迨至昆明急向龚主任提议，将余所计划条件呈交，请其赞同从速兴工，并交涉改善他事，该主任答伊无权主张，待备文往重庆请命。代表不能久待归来，余函电昆明均未得确实消息，并电重庆军事委员会，告以滇缅路车站设备不周，办理不善，请速改妥，虽屡蒙覆电嘉奖，第不过官样文章敷衍而已。

七月卅一日，余往西南运输办事处，见主任袭学遂，请备一辆汽车，后天早为余坐往下关医院，看前慰劳团员蒋才品翻车受伤事，蒙应承准备。余问“敌侵安南海防，闻我国损失军火原料七万左右吨，是否事实？”答“实情，但有一部份赶往新加坡约一万吨，又一部分在机房，请美商挂牌作其货物，如能保亦有一万余吨。”又问“前日在滇缅路某路栈房爆炸，损失军火甚多，并死数十人有是事否？”答“亦事实。损失价值约香港币二百余万元。死伤五十余人。”又问“为何因炸发？”答“中央已派专员查勘，结果认为自行爆发，非被人有意来炸者。”又问“滇缅路我国界内等站，计积存有若干军火原料未曾运往内地？”答“未有。然自前月未禁时，日夜极力运出缅界有两万多吨。”又问“未禁以前逐月可运若干吨？”答“四千左右吨。”又问“汽货车现存可用者若干辆？”答“原置三千辆，现可用者约一千辆，两三百辆在修理，余者概已损坏矣。”

八月一日，为昨天龚主任约往参观运输车栈，余复到其办事处问“前敝代表曾提议滇缅路各站，应添建货车停宿栈，又司机工人宿舍膳所等，如政府欲节省此费，南侨总会可以负责，后来如何解决？”答“当时计划预算须三百多万元。财政部不准，故尚搁置。”又问“余当时预算六七站，至多不上一百万元，何须加许多倍？”答“报告财政部时，系连贵阳桂林各站合算故须许多。”余云“如此误事，实出我意料之外。”又问“华侨司机数月来服务工作如何，疾病减少否？”答“工作较前顺利，且在此设有华侨司机互助社，俾可联络感情，遇事容易通融，拟待日后复设分社于各站。至疾病事此前减去不少，各站均设有医院，如较重者则移往下关总院，因设备较为完全。”余云“互助社如有精神办得好，医院能多设，则运输受益不少也。”

龚君导余参观车栈，在该栈办事处楼上座谈。一华侨司机前在新加坡任某医生司机者，入门见余等即举手立正行礼，又向龚君亦然。辞出后，少顷因事复来，见坐中有续来某君，复向他举手立正行礼。此种礼节之繁，为在洋及回国后未曾见。延安无阶级固勿论，便是重庆及各省县亦未见过。岂西南运输处在昆明所特有者乎？又一华侨司机告余，伊是新加坡李某（与余久相识）之孙，“为爱国服务而来，在此再受训练数月，毕业后已经半年，终日赋闲无工作，虽政府供腾膳宿及半薪，然非我志愿。”托余向龚主任疏通，早给伊工作。余问毕业无工作者若干人？答百五十余人。余转询龚君，答“三四个月未有工作可给，又逢滇缅路封禁，现正查询别条路有无需要，料不久便有缺可工作也。

余问龚主任，“华侨回国诸司机，多系久有经验，来此须再训练何项？”答“军人化管理法及其他等。”又问“若久卒业？”答“两三个月。”问“全校学生几多？取何程度？”答“二千左右人，除华侨外，国内多系小学毕业，初高中生亦有。”问“教职员及经费若干？”答：“教职员及工役计五六百名，经常费每月廿二万余元。学生现分两校，一校一千二百左右人，又一校八百左右人。”又问“贵机关及分处，逐月经费若干？”答“二百余万，多从香港汇来。前日因国内汇出不便，某处又汇来不及，由宋子良君私人向香港汇丰银行担保，借七百万元来接济。”又问“宋君现在何处？有来此否？”答“现在香港。前月为调查爆炸，及英国封禁事，曾来监督赶运十数天，已回去香港矣。”（前日李宗仁君在老河口云，宋子良被蒋委员长扣留不确）

余不向筵中诸人辞别，即戴帽执手杖先行，侯李杨随后亦来。出门再行半里许，方到停车处，登车即行。余告杨君云“运输安能有成绩。以下关站之重要，而委此腐败主任。昨晚余辞医士设宴，彼已闻知，早间又吩咐简便午饭，彼乃复设三酒席，骗余为大理绅商所备。已食两点钟久，尚再购来两判若两瓶酒，再迟一点钟或未毕席。余原按午饭后，往市店参观各贩卖店之石器，兹为赴筵所误竟不得往观。昨晚与交通部长订约午后参观其工厂，西南运输工厂亦须往观，现虽赶往，恐到时多已停工，晚后各机工又将开会，岂不迫促乎。西南运输委此腐败之人，有意如此开消，彼必呈报昆明机关，欢迎某某费去至少千元，其实为他舞弊，且误余工作。回到昆明可向龚君言之。”杨君云“均是一丘之貉，如昆明机工互助社，专为华侨而设，理应任华侨司机妥人为主任，他则不然，委用其私人月薪至三百余元，社内职员卅余人，每月费款八千余元，无裨华侨司机实益，其腐败如是，所云欲继设分社，不外增委私人已耳”。

近晚到下关，参观交通部，及西南运输等停车场，及修机厂，尚有其他如中国红十字会、经济部、银行、及别机关，统计汽货车客车等，有六七部份，各自立门户，如添油站、办事所、停车场、修机厂，各独立创设，若货车少者，则未有修机厂。均为政府公用车辆，而机关林立，不特多占地方，多用许多人员，多加费用，且各部份人员互生意见，如某部份缺何物品或汽油，别厂虽存许多，亦不肯借用。甚至医院亦如是，除西南运输处车多人众设有医院，其他均未有。西南运输处货车有一千余辆，交通部货客车数百辆，其他百余辆或数十辆。机关愈多，设备愈简，损坏及停修者亦愈多。运输成绩当然减少。此概为不统一所误，若能统一主持机关，不但逐月可减许多用费，设备亦可完善，损失定可减少，运输必较有成绩也。

晚餐后，赴华侨司机及修机等人之会，到者百余人。多有问客年南侨总会惠送机工等衣被鞋每人若干件？余答由仰光入口者有洋毡被一千八百件、蚊帐二千件、棉背心二千件、卫生衣二千件。由香港寄安南转昆明者有卫生衣一千二百件、纱内衣三千二百件、胶鞋三千五百件、袜子七千双、二南衣裤三千二百套。洋毡被按分送第一批至第四批为止，若第五批起自新加坡已有购送。蚊帐与背心，系分送在滇缅路服务者。计每人多者九件，少者六件，即减蚊帐，背心、毡被、三件而已，诸司机云：“余等亦略知应得数额，然多领不足，领得九件者只有极少数人，如重要之洋毡被，甚多人领不到，蚊帐亦然，其他亦多领不足。”余在洋时曾闻被公务员取去不少，今日闻诸人言始信之。有人问缅甸经禁出口，现虽有我国界内可转运工作，若运完将如何？余答封禁只限三个月，到限英国定必开放，可免介怀。并勉励努力服务，敌人气力已衰退，抗战最后胜利必属我也。

昆明至下关四百余公里，此段路线未抗战前已开辟，但稍狭，未铺石子。按世界路政阔度分三等，即七公尺，九公尺，十二公尺。滇顷缅路为九公尺，抗战后开足尺数，路面加铺石子。沿路多高山。今日行时，见中间路边树立一碑名“天子庙坡”，高由拔海算起，八千二百余尺，为全滇缅路最高之处。时虽初秋，见不远之高山上白雪如云，满罩半山之上。沿路石山虽不少，然能生产之土山亦甚多，水田农园到处多有，远胜西北及贵州诸省。若日后政府能改良农业及水利，则云南此一部份之生产，定可增加数倍。如由滇缅路再开无数支路，则由可生产之山地及矿物，更可获无穷利益。且气候温和，不甚寒亦不甚暑，雨水颇足，在西南诸省中，实不我得之乐土也。

八月三日，余等四人离下关，乘汽车回到楚雄，约下午四点钟，仍寄宿中国旅行社，嘱车夫明早六点起程。车仍驶到西南运输站寄停，时货车尚未来。越早余待至六点半，车夫尚未到。侯君亲往探视，回报被后到各货车数十架阻塞不得出，而最后到之货车夫，不知寄宿何处，车之钥匙被带去，现方派人寻觅。待至八点余钟，各车夫来始将货车驶出，乃得起行。车站陋习如此，西南运输安有成绩可言。如非余急需汽车，则数十辆货车，俱须待最后到车夫来开车，方得驶出，一日之中已空费两三小时矣。自去年派刘代表来视察。便知货车停栈无秩序，不但阻碍运输，连修理及清洁咸都不便。车夫无宿所，任其散处外间，难免嫖赌怠工等弊。精神既差，危险易生，此为必然之势。当此军运紧张，而当局冥顽无知如此，可胜叹哉。

余等由楚雄回昆明，日尚未晚，顺途先往某温泉浴室沐浴，及到，见其设备甚简陋，且秽杂不洁，大失所望，即回旅行社。越日往见龚主任，告以沿途各站所见以及楚雄汽车遇阴事情。自前年刘代表报告，迄今经年绝无改善，汽货车安得不多坏，运输安得不寡少。龚君答伊虽负责主持，然重要机关人员，多是宋子良君委派，逢有不法当革辞者，虽屡告亦无效。余见龚君是诚实人，非狡诈圆滑之流，所言可信为事实。然余不得不再进忠告，冀可挽救多少。“（一）货车到站栈，段排列有秩序，留空路使各车可自由出入。（二）货车到站栈排列后，须雇定工人洗净泥污。余曾见放在车身底下之副车胎，染泥土如燕巢，足知许多或始终未洗除。若南洋司机之管理法，日日必要洗净。（三）货车到站后，若机器稍有不顺，司机人应即报告修机司，立即修妥，明早方可出发，如此可免途中停顿损失。以上简单三件事，普通管理人都晓得，只在当局命令监督实行而已。非挟泰山超北海做不到之大事。”余又言“余至渝无多天，蒋委员长问到此观感如何，余答政治原不晓，工厂尚未往参观，唯见市中人力车汽车甚不洁，满涂秽泥，令人憎厌，不但其车易坏，而观瞻上亦不好，影响所及，即有不卫生之弊。若南洋市政管理甚严，各车日日须要洗净，否则科罚。蒋君立登记随身手折，后十多天便见人力车大异前日，多已洗刷清洁。”龚君云“决接受君所言三事，一个月决实行改善各处车站。”又约余明天赴西南运输训练校，及司机等联合欢迎会，余应承之。

八月八日，西南运输训练校及司机等，开欢迎会，主席龚学遂致词毕，余答谢，并言“我国为世界最落后，及最贫穷之国家，故敌准备侵略之初，仅按数月便可吞灭我全国。然抗战于今三年余，敌人不但计划失败，而最后胜利且当属我。余此次往首都，及西北河南湖北各省，亲闻各战区司令长官、参长总司令等报告，我国民气日旺，军力日强，而乱则气力均退降，故咸都抱乐观景气。虽然如此，仍要靠万众一心，耐劳耐苦。如在前线与敌人赌生死之军兵，每人每月薪金伙食合计只十一元半，排长仅卅二元，上将原定八百元，现仅领三成二百四十元，中将原六百元，现领二百元，少将原四百元，现领一百五十元。又如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多系中学毕业，或修业者，大学生亦有，多自动参加，有步行两三个月而来者。训练期间不定，二个月至四个月，便往战区服务，向军民宣传联络感情，鼓励合作团结，并教士兵识字，或代写家信。每月薪金伙食仅一十五元，近因米贵津贴多少米价而已。自抗战迄今，毕业往战区服务者已有四万余人，成绩堪称满意。以上系白副总参谋长，及陈政治部长同时告余者。又余至青海省，该处厅长薪俸每月仅卅八元，闻贵校人员，及司机等，薪水百元以上至二百三百元者不少。比较上言诸人工作，安危及劳苦相差甚远，而薪俸则更优。应当如何努力，和衷共济云云。”其勉励与褒奖各项，与在重庆西南运输会所言略同。

廿八日早，余离贵阳将往昆明，是早在途中觉甚寒冷。越日午后车机忽坏，不能再行，幸距离西南运输车站不远，延至晚后乃坐运货车来昆明。来时已近午夜，仍寓前之旅舍。越日为十二月一日，往西南运输处，询政府气派有委员到未，龚主任答，重庆派来两位已到，一为造路工程师赵君，一为统运局委员刘君，而西南运输处要派一人未到，大约今明天可到。乃约定再三天同行，余即通知昆明同乡会，约定明晚开会，又往见建设厅长张君，问云南对田赋有无增加，答前月省参议会，接主席提案开会，讨论结果决议，待新年增加，要加若干待春季决定。又问数月来对省内运输，有无统制，答无有。又问有向民众派买军米，及兼营贸易货物乎，答亦无有。余乃告以闽省可苛政，张君言此间概无有也。

十二月三日，余与中央所派两委员及西南运输所派一委员，会议此次沿路进行视察等事，并订明早同车起程。而西南运输所派之人，即前下关主持人李某，余以此人前次欺蔽浪费，心甚不满，不可与共事。乃告龚君另委他人。答现无别人可委，拟电保山主持人，待余到保山时参加，余应承之。余即定明日早将起程，则再发一电文与蒋委员长云“余明早将同委员沿路视察，从此出国敬辞。前日在赣州、泰和、桂林呈上三电文，想均收览，迄今未蒙覆示。查黔、滇亦无如闽苛政，是则南方各省，独闽民最惨酷，故不能忍心坐视。至战时统制虽需要，如有好公务员则有益，若我国人窃以为有害无益。故不论何省，万祈勿轻施统制，只须严禁囤积，及平安物价，要视官吏肯否奉行。谨贡愚诚，希良裁。”余虽明知屡言无效，然爱省爱国之心不能自已，再心最后之忠告，成败均不之计也。  
滇缅路运输，自十月十八日英国开放后，敌机时常来轰炸，闻两个大桥多被炸坏，军火减运不少，每天仅可行半日而已，余甚为忧虑。适龚主任请往其家午饭，遇陈君体诚亦在座，他系代理宋子良君之缺。宋君为西南运输主持人，因告假往美国医病，故全权付陈君负责。余问陈龚二君，两桥被炸损坏如何，答一功果桥，一惠通桥，功果桥较无紧要，惠通桥则甚有关系，因用钢索吊造，若该钢索被炸断，则不能通行，然已被炸断两三条，眼前尚可维持。余问钢索有余存可续否，答恐无之，经电美国办买，但敌机尤注意惠通桥。蒋委员长已下令，每天自上午九点钟起，至下午三点钟止，均禁止通过。余闻后亦以为甚严重，因敌机时常来轰炸，非达目的安肯干休，陈君云渠近日将往缅甸。余问乘车或乘飞机，答乘机。

四日早余等与两委员，坐两汽车由昆明起程，余及赵工程师李秘书同一车，侯西反庄明理及刘委员同一车，余告庄君等注意沿路，如见某处欠阔或弯不妥，抑或有危险性，均要登记，待停车或到站互相查对，是否相同，并告知赵工程师。然沿路所记载，须改善者大都相同，赵君亦承受修改。是晚寓楚雄中国旅行社。越早复启行，午后到下关。余复往医院视蒋才品君，仍不能起床，乃与议定不日由医车运送至仰光，经医院长应承，并要派一医生同行。余等复起行，是晚到水平，寓旅舍。越早复启行，近午至功果桥，该桥长二百余尺，系用钢索吊造，其江水颇浅。自敌机来炸，已在上流距离半公里，江水更浅，江面更狭之处，再造一新桥，将竣工，以作预备。此桥免用钢索吊造，系用桥柱，工程极容易，故不惧轰炸也。

十二月八日，鸡鸣时离保山将来芒市，因惠通桥上午九点钟起，禁止通行，故须赶早起程。至桥时八点半，余等下车步行桥上，详细视察桥之两端，近处俱是高山，大约高可五六百尺，敌机来炸许多次，因山高不便低飞，所下炸弹不下千百个。桥边屋舍尽行倒坏，山下各处炸弹痕无数，桥中虽有炸坏，然非要害修理一两日便竣。唯钢吊绳在右桥头，炸断两条，计该桥两边各用二寸径钢绳九条，虽断两头，尚有七条，据赵君言，如有四五条尚足通行。桥长仅八十公尺，桥下江水缓流不急，自水面至桥板，高卅英尺。余问赵君江水涨落相差多少？答终年如是，相差少许。又问流水急慢如何？答亦不甚急激。自敌机来炸之后，交通部经鸠工从两桥头开斜路至水面，拟用渡船运货车，可免专倚靠该桥。以卅尺高之斜度，便至水面。路途不过半公里外。若有渡船可通，该惠通桥纵或被敌机炸坏，亦无关紧要。而敌人极力轰炸许多次，尚未甘休，亦是愚笨，所可怪者，西南运输处两要人，但知桥坏有运输不通之危险，竟不知虽炸坏，绝不至阻碍运输，有何危险可言。而身负抗战军运之重任，不曾到地履勘，昆缅往来只坐飞机从天上过，安能知晓实际状况乎。

惠通桥两边均立碑揭示蒋委员长严令，禁止各车辆非时过桥，每天由上午九点钟起，至下午三点钟止，并说明该时间防敌机来炸，故须停止通行。距离桥头两端数百步，并设有闸架，查其原因，为恐敌机常于该时间内来炸，货车适运到桥上有被炸之虞。然该桥长仅八十公尺，运货车瞬息即过。且车夫如闻机声，定驶往树下可闪避之处，何致在桥上被炸，此乃普通人所能晓，兹乃禁止该时间内通行，未免致使两端货车连接许多辆在路上等候。如敌机来炸，岂不更觉危险，无乃安危倒置乎。况该段路程甚崎岖，夜间不便通行，日间又减少半日，阻碍军运不少，真乃一举两失。我国人常识浅陋，而负责人亦如是，妄报上峰下此禁令，可胜叹哉。

昆明龚主任，前次对余应承，改良运输三件事，准在一个月内各站实行。余此回沿途所见，仍旧腐化绝无改革一件。是晚在芒市，与中央两委员，及保山运输主持人等开会。余言沿途视察已告终，明天将离别，对于改善路政，若干处路面须增阔，又若干处弯曲，亦须修妥，及某某处有危险性诸项，赵工程师逐一接受，云当积极改善。至管理运输腐化事，此条龚主任既食言，希望刘委员回渝报告，设法改善。余待到仰光，电请蒋委员长，如获同意，则留侯西反庄明理二人，尽数月义务帮忙改妥。又各运输处各立门户，同为政府服务而不统一，不但人多费大，所需各物不相周转，甚至互生意见。车夫亦无一律牌号，由各机关自编号码，如西南运输之车，自行列号，交通部之车亦然。凡途中相撞触，发生争执无从裁判。车夫既乏相当惩戒，更任意不守路规，故翻车冲突损伤等事，无日或免，损失之巨何只数倍。西南运输两年间，置新货车三千辆，现仅存可用者不上一千辆，每辆平均仅用六个月而已。若南洋货车，每辆至少可用五六年。虽无乌油路面，亦不应如此速坏，此完全由管理无方所致。予并将管理腐化各亲告知刘委员，请其回渝报告当局。

有一华侨车夫，非其罪而被西南运输处拘禁暗房已三天。侯君闻知往交涉，始放出来见。乃潮州青年人，系新加坡华侨，为爱国而来。时天气寒冷约五十余度，余重裘尚觉冷。该车夫似非劳动界，身上只穿一领单布衣，余问“你衣何如此单薄？”答“前在南宁服务，衣服一切均在南宁，失陷时适赶运军物在外，致所有衣物尽行失陷，当局云要赔补，迄未见赐，数月来衣服甚贵，无钱可买。”又问“禁在暗房，有被席给你否？”答“无有。”余伤感之余几为下泪。因余在南洋多方鼓励诸机工三千余人回国服务，今亲见些景况，并忆其他类是者，不知凡几，故不免自咎，且代为伤悲。乃送他五十元为买衣服费。又问“被禁因何罪？”答“有某司机是余朋友，余因暂停未有工作，帮助该友驾车，该友犯罪逃走，故当局捕余往禁耳。”侯君西反将回昆明，与余握别，余付他千余元，托其沿途到医院，慰问华侨车夫，每人赠一二十元。后余回新加坡，接侯君来函报告分赠完毕。

十二月九日上午，余离芒市来宛町，入市午膳。见西南运输车场，有数辆货车，均名华侨先锋队。视该车甚陈旧，似乎已用过数年，然该车系本年春初，始由西南运输处请求，并电行政院同意，由南侨总会捐买一百辆，费新加坡币二十余万元，对英政府声明系在缅界内需用，故免由逐月义捐汇款内抵扣。四月杪在仰光交车，添造车斗至六月间完竣，开始运货。迄今仅五六个月，何得如此陈旧。至先锋队之名，乃西南运输处所编号，前曾函渝告余，故知之。该车后来多有运至昆明者，不但行缅甸而已。庄明理君同余至仰光，即将回昆明，余嘱其沿途调查此华侨先锋队，一百辆车现存若干辆。一月后接庄君自昆明来函，云仅存可用者廿三辆，其他七十七辆有损坏者，有乏附属品可修理者。又其年秋间复买赠货车一百辆，计是年共赠二百辆，而后来之一百辆不知下落如何。南洋华侨募捐款项，多由零星凑集，如百数元，或十元八元一元两元，辛劳工作积少成多，非是同资本家一呼便集之容易措办。而彼辈公务员，则视若泥沙，上峰复委任不晓事，不负责之私人主持此抗战重要之军运，可胜叹哉。

十二月十二日早，余离缅京来仰光，近晚已到，仍寓曾君和衷行内。越日即发电蒋委员长云：某日两电均悉，余与委员视察滇缅路已毕，路中凡太狭及弯曲危险者，经与赵工程师酌妥速改。近来新到五吨货车，比前三吨者加大，故非速改不可。西南运输管理无方，车机易坏，运输减少。前龚主任许速改善，迄今数月仍旧腐化。经与刘委员商酌，留侯西反、庄明理在各站三数月，帮助改妥，以尽义务。如蒙赞同，请电示昆明龚主任，俾两人有权可督促各站负责人。至其他各运输，多设机关，各立门户，而不统一之害，经详告刘委员，希待改善。路中功果桥、惠通桥，任敌机如何轰炸均不能阻碍我运输，因免经该桥，尚有车船可渡。现每天禁半日不许通车，实极错误，不但减少军运，且反使货车均停于桥之两端，更觉危险，希取消勿禁较妥。余再五天往槟城。”

华侨机工在滇缅路——西南各省实地视察记

抗战的炮声，使海外数百万中华儿女，渴一般地惦记他们的祖国，那些没有看过祖国的侨生，尤其急于回到“祖家”，看一看锦绣的河山，并为保卫锦绣的河山而奋斗。

滇缅公路需要大批熟练机工，运输军火去，这是华侨青年投效报国的最好机会。于是从槟城、怡保、太平、马六甲、吉隆坡、芙蓉、新加坡、砂朥越、泗水以及马来亚许多角落，涌出了数千个热血的机工，在筹赈会的号召下，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些热血可嘉的机工，有的丢了职业，有的离开了新婚未久的妻子，有的和家庭大闹革命，有的变卖了个人的私产，因为他们可以到可爱的祖国了，他们将运输军火打鬼子去！

于是从今年（1939）春起在西南的山国里，在高黎贡山与澜沧江之间高原上，开始出现无数英勇的华侨机工，以熟练的技术，驾着载满了军火的汽车驰骋！

这些华侨机工，无论从海防登陆的也好，从仰光登陆的也好，一律要送到昆明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运输人员训练所，受短期的训练。

这一个训练所，设在市郊，原是昆明师范的校址，有幽雅的花园，广大的操场和高耸的洋楼，我们的华侨机工便是在这里受训练的。

他们的生活是很紧张的，五点钟就得起身，训话、吃饭、上讲堂、操练。下午也不得空。午饭完了，又是上操场，又是训练。

科目有政治、驾驶、军训、修理、驾驶实习、军事学、构造、供养。

出操自然是苦的，一向过惯了自由主义的生活的华侨，忽然要受军事训练，起初不免有些那个。然而当他们知道自己所负的运输责任和普通运输并不相同，他们是“驾驶兵”，而不是普通的司机，他们必须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才能负得起这个大责任，他们就积极地学习了。

训练所有一间涂满血迹的房间，最能激起华侨复仇的情绪。那是去年（1938）的事了，敌机狂炸昆明，一百多个广西学生，正在受司机训练，住在训练所的一个宿舍里，二三颗炸弹把这些热血的学生的生命毁灭了。他们的眼睛多半没有闭，他们的血溅在墙壁上，溅在木柱上，老洗不掉，华侨机工每一次看到这些殉身者的血，他们仇恨敌人的心便加强了一分。

这一间血房，现在是干部训练班学员的宿舍。

第一、第二批的华侨机工训练了两三个星期就出发了，因为许多军火待他们运，第五第六批也是很快的。

他们出发的时候，长官送他们旗子，上面写着“保卫祖国”。同济大学、西南联大来慰劳他们，因为他们将负起保卫祖国的重担。

他们多么高兴啊！一辆辆从美国买来的新车在遮放、腊戌等他们接收。他们唱着出发歌，高呼口号，坐在数十辆大卡车走了。

**车在我们的手上，**

**血在我们的胸膛，**

**我们来捍卫祖国，**

**我们奔赴沙场。**

**统一意志，集中力量，**

**冲，冲没了一切恶势力，**

**干，干澈了领袖的主张。**

**抱定杀身成仁的决心，**

**发扬中华民族的荣光！**

离开训练所的机工，便过着“道路为乡车为家”的生活。

云南的山是高的，水是深的。高黎贡山、雪盘山、点苍山，海拔都在六千公尺以上。她们的山峰往往隐在云雾里。澜沧江、漾濞江，奔流于崇山峻岭之间，峡谷之深达数千尺，人跌下去是找不着尸体的。

然而滇缅公路就绵亘在高黎贡山、雪盘山、点苍山的山岭之下，就蜿蜒在怒江、澜沧江、漾濞江的急流的旁边，而且横截了它们。

车整天在荒山里奔跑，越过一道山，又是一道山，层峦叠嶂好象永远走不完似的，车路沿着数千尺的悬崖峭壁前进。这一条黄色的长蛇，穿过无数的密林，越过数百个桥梁与涵洞，有时且消没在白云里，淌若司机没有耐性和毅力，到了目的地说不定会发神经病。如果精神差，眼睛看不准，随时便有滚到山下与水中的可能，而这些山不，用句机工同志的形容词，它的深是“初一跌下去，十五未到底”。

车常常是数百辆一起出发，象一群灰色的甲虫，在高山里悄悄地爬着。我们英勇的华侨司机，镇定地操纵这些甲虫的方向。他们的眼底永远是无尽止的山，是无边限的树林，是无尽头的路。这些山、树林、路，便是他们的家乡。

现在我们的机工同志，对于这条蜿蜒的公路，已经非常熟悉了，他们知道跑了几百里路可以到某一城市，跑了几十里路可以到某一分站；转了那个弯，便有某一条水，越过那一道山，还有某一个高峰；那里有大石头，那里有崩溃的坍土；什么地方路狭，什么地方路宽，他们全明白，因为这是他们的家乡。

他们有没有宿舍？有的，腊戌、遮放、芒市、龙陵、保山、永平、下关、楚雄，都设有宿舍。有的用竹盖的，有的就庙宇改造的，但是我们的机工同志们，大抵不睡在宿舍里，而睡在车厢里，因为如果所载的军火没有卸，他们夜里必须照顾军火，如果军火已卸，他们也得防备零件被偷。

机工同志对于车是很爱惜的。他们不能忘记那条标语：“汽车是我们的生命！”正如士兵珍惜枪一样，每一个司机有空便揩他的汽车，揩得雪亮，汽车如果损伤了，在他们是顶伤心的事！一个司机告诉我：“汽车是用民众的血汗换来的，国家相信我们，把民众血汗换来的汽车交在我们的手里，我们不加爱惜，怎对得住国家和自己呢？”

每一个机工同志，都穿着运输处所颁给的制服，而最吸引人注意的是，胸前一律挂着“一等驾驶兵”的符号。

“一等驾驶兵——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二等和三等驾驶兵？”我问一个司机同志。

“技术熟练的，才能当一等驾驶兵。技术差一点的，就够入二等或三等驾驶兵。华侨差不多都是一等驾驶兵，而‘辣椒头’（华侨称外省人的号）却几乎全是二三等驾驶兵！”

华侨机工技术的高明，确很使国内同胞惊叹。他们靠着丰富的经验，常常把自己从危险中拯救出来。半年来他们驾车失事的只有二人，而国内同胞失事的却不下五十余人。滇缅公路确实很难走，全路有三分之一是沿着悬崖走，路宽不过二丈，狭的则仅容许一辆车通过。路又是环山筑成的，有许多地方，在一分钟内，要兜五六个大圈子，在转弯时候，处处只能看见深谷和峭壁，等到回转过去，这才发现并非绝路。在这样险的路上，华侨机工却十分从容地行驶着，他们极富有机动性，偶有不幸翻车，往往能够随机应变救活自己。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曾腾光，是第十三大队的驾驶兵，驻扎在遮放。他在离保山二十公里的地方（那是一个有名的悬崖）翻了车，但是他死抱住方向盘，任汽车翻筋斗，滚到了底下时，他抖一抖身上的泥土，碎石和草刺，开了车门爬出来，一点没有受伤。陈克已，十四大队的驾驶兵，驻扎在下关。他在功果桥附近来个倒栽葱，当时曾有两个“辣椒头”，人和车滚到澜沧江中，什么也找不到。可是，他滚到半路，即从车内跳出来，让自己跌倒在斜坡上，结果只闪坏了一条胳臂而已。我们到下关时，他的胳臂已经复原，第二天就驾着车走了。黄顶兴，那个十九岁的潮州少年，他同我们由遮放一起出发，在龙陵附近他不知怎的忽然“左倾”，幸得刹车刹得快，车撞在一棵树上，没有翻筋斗！

不但华侨机工的驾驶术高明，就是修理术也十分熟练。他们修理汽车，不必看书，在极短时间内，可以把极难的工程完成，训练所的讲师和教官，学历大抵很高，理论有余，经验都比不上华侨机工。腊戌装车厂，有二十个华侨机工，六人可以装置四辆车，宋子良主任称为“模范机工”。

滇缅路的汽车，分新旧二种，新的是□□牌，机器好，修理工具也完全，旧的是□□牌，机器差，工具全丢了，大家自然都喜欢驾新车罗！可是公司却把旧车交给华侨驾驶，为什么？因为华侨技术好，旧车在华侨手里不会出岔子。

有一次，芒市华侨机工和储藏库库员发生冲突，吴琢之副主任对库员大加训斥：“你们要知道，国家要培植一个机工是不容易的，请一个库员马上就有，你们如果再有对不住机工的事发生，我一定不宽恕！”张炎元教育长亲自对我们说：“滇缅公路如果没有华侨机工，过去半年几乎通不成车！”由此可见当局如何重视华侨机工了。

我在遮放碰到十三大队的一个班长，叫做陈恩仁，他是个执性的少年机工，要回国的时候，他的母亲老放心不下，不让他走。他去躲在同济医院一个月，坚决地走了。

他看到我们很高兴，他报告许多他们的生活状况，在他心灵上印象最深的，是十三天“山大王”的生活。

“山大王”这名词使我想到绿林好汉，我很奇怪我们的司机同志怎样会做起“山大王”来。

“喂，好好的司机怎么会做起山大王来？”

恩仁知道我误会了，他对我解释“山大王并不是做绿林好汉的意思，在我们的行车中，有时路崩，有时车坏，不免在荒山里抛锚了，没有房子，没有同伴，偌大的山，只有我们一个人，所以叫做‘山大王’。”

“那一次，一百多辆车从遮放出发，”他开始叙述那最可纪念的十三天，“走到距芒市一二十里的地方，忽然发觉前方的桥断了，我们的车停住，大家都很着急，前进既不能，退后也不得，那样小的路是无法转弯的。我们希望救济车来，可是救济车来也没有用，它不能修桥。我们又希望交通部公路局赶快派飞班来修，可是那时又碰到雨季，桥一时不能修好，我们知道绝望了，只好准备做‘山大王’。我们没有带米、带盐，只好向老百姓买点盐。一百多人在荒山里要找饭真不容易，我们要跑几十里路才找到一顿饭吃，一百多人要分几次出去觅食，因为不能一块儿离开车辆，车上放着军火，如有半点差错，谁也担不了责任，因为种种困难，我们每天只吃一顿饭。雨下得讨厌，白天愁坐在车头里，夜里也睡在车头里！我们过着很寂寞的生活！”这位执性的孩子，说到这里，眼眶里有点儿湿。

“你们为什么不想法子消遣呢？譬如在夜里，月亮上来了，你们可以围在一起，开座谈会，或举行一个小小的音乐会，会唱歌的唱歌，会吹口琴的吹口琴，那不是好得很！”

“不知怎的，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着，大家只想快点通车，早上醒来，希望今天桥会修好，可是失望了；我们希望明天，然而明天又失望了，明天复明天，这样我们一直等了十三天。”

“当我们听到桥修好时，我们的喜欢是不能形容的，我们象飞脱出了笼的鸟，象遇到大赦的囚犯。自然，我们为国家吃苦，并不怨叹谁，只有救济工作实在做得太差，路实在修得太慢。”

“做山大王的事常发生吗？”

“怎么不常发生？我们的机工同志几乎有半数以上做过‘山大王’，成群的还不算苦，独个儿那才要命！一个人，又要看车，又要找食，冷清清在山里住他三天五天，你道那味儿是怎样的？”

啊，英勇的机工们，你们是无名的英雄，你们为民族忍受最大的痛苦。

华侨有一个普遍的性格：就是刚强鲁直，如同李逵一样。机工同志当然不能例外，他们好打抱不平，到处闹事。三句不对劲，便用武力解决——打！

华侨机工的刚强，在昆明、下头、保山、芒市、龙陵是很出名的。市民和警察大都对他们存着“敬而远之”的态度。最轰动一时的是今年六月金碧路的事件，一华侨机工和当地警察发生冲突，甚至把军士机关枪都缴了过来，幸得及时解决，才把这场风波平息下去。保山也因华侨机机工和饭店、理发店闹蹩扭，停市了好几天。至于和老百姓的事，在芒市、下关、遮放，更是层出不穷。探其原因，当地人把华侨当成“蕃客”，普通人买盒香烟四毛便够，华侨却非五六毛不卖，故意涨价，加上语言不通，于是全武行便常常演出了。

在演全武行的时候，机工是非常团结的，他们只要一个人喊道：“某某被人打了。”大伙儿便涌出去报仇，弄得警察、商人听到华侨二字便头痛。

这自然是我们的不对，即使当地人如何可恶，如何不讲理，打绝不是“好方法”，这只有使他们怕和恨，而不能使他们觉悟和了解。开导民众，自然是一件艰苦的工作，但被一般人看做“革命之母”的华侨，却不能不负起这艰苦的责任。

对内，要“避免摩擦”，要“动口不动手“，怎么愚蠢，都是自己的同胞啊。

我们沿路对机工同志这样说。

华侨机工有不少漂亮的青年，他们体格好，富于情感，会唱动人的英文歌和马来歌，此外有一张棕色的健康的脸。

摆夷女郎，这些多情的女郎，就往往把我们的机工当作丘比特的对象，那些未出嫁的“菩抬”，有一条梳得发亮的辫子盘在头上的，最高兴和华侨机工眉来眼去，在那公开调情泼水节，有若干机工被泼了水——被泼了水，就说明你已被爱。

在黄昏时候，遮放、芒市的女郎，纷纷到小河边洗浴，上胸裸着，神情十分活泼。而我们最爱冲凉的机工，往往同在那里洗浴，于是虽非一年一度的泼水节，泼水的热闹不减泼水节的盛况！

听说芒市的土司养着许多美丽的女郎，其中好几个爱上华侨机工，甚至和机工恋爱，可是我调查了好几个人，此说尚未证实。

那些好女郎虽然美丽，终究是异域的花草，也许我们的机工同志如此想吧。

我们到腊戌，便看到侨胞机工，踏进祖国的境界——畹町，便更多了。在路上，在荒山里，在茶馆里，在各分站的停车厂内，每一角落，都有他们的活动。他们以极快乐的神态欢迎我们，如同见到久别的兄弟一样，亲切极了。在荒山里，他们停车，跳下来和我们握手；在每一站，他们攀在车旁，坐在轮盖上，问长问短；在旅馆里，他们黑压压挤了一房间，争先恐后报告生活状况。

我喜欢他们，他们是热情的，豪爽的，鲁直的。

王亚能，太平的孟加里，现任十一大队的分队长，在遮放我碰到他。他的胡子乔刮得光光的，他会说福建话、广东话和国（华）语，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中间写王亚能，下面是“印度班邑”。

“王亚能，是你原有的名字吗？”

“不是，这不是我的名，这是我最好朋友的名。”

王亚能在队上很能获得上下层的好评。他肯干、苦干。有一次，坍路下来，大家都懒洋洋不大理会，独有他拼命撷土填路。他是中国最好的友人。

张天赐，工商校友会校友，在遮放修车厂当机工。他是一位耿直的富有正义感的青年，在训练所的时候曾干一椿轰轰烈烈的事。四月十四日，同济大学慰劳团到训练所慰问华侨机工，演“放下你的靴子”，他提议从伙食钱节下三十元，丢上台上，作为献金，大家同意了。结果所献的金，除了三十元外，还有许多自动丢上去的，达四百余元。他和他们一块儿到昆明，他对我发表了若干对人对事的批评，我觉得很中肯。

“修理机器的生活，是否苦一点？”

“苦没有关系，回国就是准备吃苦。”他答。

在若干机工中，我觉得许成瑞是一个优秀的干部。他是第三批的副领队，现在保山十一大队当副官。他最好抱不平，常常挺身而出，替人说话。在路上，他老问我应该看什么书，他说他正在看一本“思想与训练”。他很勇敢，常常把长官的腐化行为报告上峰，这使若干长官又怨他，又怕他。

他喜欢表现自己，他是英雄主义者。

甘锦寿（现名甘锦秀），表现得不错。他是新加坡一个富家子弟，英文念到九号，生活舒适极了。可是他不愿逸乐，他离了家庭，回到祖国的怀抱来。我们在下关附近碰到他，我问他“想回家不想回家？”他耸一耸肩头笑道：“这里就是我的家。”

我对于陈亚来和郭成珠有着极温和的印象。他们见了人，老是笑笑的，成珠还只结婚了两个月就自动回国啦！他们已渐渐学会了国语，他们准备说国语说得象福建话一样流利。

我们碰到马来人马加森，是在保山的招待所。他到招待所来，对于长官的傲慢态度极表不满。我们安慰他一下，牡丹拿四十块钱给他。

他是个出色的武士，下关徐站长告诉我，他常遣派马加森抓那些偷东西的人，勇敢而且迅速。

洪传咸，是晋江会馆的会友，我们在星常常碰头。这个硬汉子，在昆明为打抱不平，被关了四十天，可是他，还是一样快乐安闲。

在龙陵合作社，我遇到南洋商报的排字工友陈秀碧，他亲切称呼我，他算“投铅从戎”了。

蔡仁德的脚踏车表演在昆明轰动一时。北平有一个冠军斗不过他。每逢各界举行游艺会，准有他的份。西南运输处当局为着便利他的表演，特地到河内买脚踏车。他现在和陈桢万（他表演大力士）等四人代训练所体育助教。

有许多学员升为长官。刘贝锦、林贵奇、林已茂、钟伟兰、陈剑如等十余人均升为分队长。

在这里薪水最高的是王文松（昔为新加坡□□公司工程师，每月约叻币二百五十元，他自动买棹回国服务），现任总厂的工程师，每月仅一百四十元。我们在下关的一个小酒店看见他，穿着一条虎皮短衫，很有礼貌地招呼我们。后来他又带队到昆明来，他没有李逵性格，他是有知识分子那种文质彬彬的风度。

——《南洋商报·晚版》1939.9.28-10.2

考察滇缅公路报告书

笔者在大学时期专攻修历史，因此对有关历史史迹特感兴趣。

1937年“七·七”抗战后，陈嘉庚先生组织南侨总会，领导全南洋华侨支援抗战，并号召以星马为主的海外华族组织总数三千二百人的卡车司机，在1939年分九批前往滇缅公路赶运军需品支援抗战。

由1939年至今已四十七年，此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尚未有正式的记载，成为抗战史上的一段空白。时过境迁，这些无名英雄的事迹竟被遗忘。吾人认为这段历史事实是一个最宝贵的历史教材，可以矫正年青一辈颓废的思想，教导海内外的华族，各为其个别国家，为社会作出贡献。

1939年春，笔者前往昆明继续升学，时值第一批华侨机工抵步，特往访问。当时看到这批机工既无寒衣，亦乏住宿的设备，以稻草席地为床，苦不堪言。当时曾写一信向陈嘉庚先生报导实际情况。笔者在那年一月到达昆明，四、五月间离开，以后的详情即不甚了解。但是当时的印象，虽事隔数十年犹历历在目，未能忘怀。抗战胜利后由各方面得到片断的报导，但不完善。《南侨回忆录》虽有述及，可是也甚为简略。

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大力提倡记载海外华族创业的历史及抵抗日本侵略的史迹。由此动机乃引起笔者对这一段华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日工作历史的重视。于是就与我国多位历史学者谈起这个问题，他们都表示非常有兴趣。经过共同研究后，认为初步的工作须组团前往昆明，到滇缅公路实地考察，收集资料。因此乃致函当时曾代表南侨总会在滇缅公路工作的庄明理老先生，跟他取得联络，并且得到庄先生热烈的反应，代为安排在昆明会集。考察团的组织新加坡方面是以魏维贤博士为首，团员包括林孝胜和崔贵强二位先生及我四人。中国方面是庄明理老先生及他的秘书牛石林先生。会集的日期是1986年11月4日。庄老亦预先安排云南省政协、侨办、侨联、机工联谊会等有关单位协助。

1986年11月5日全团十多人，包括医生及保安人员等，浩浩荡荡由昆明出发，中午在楚雄午餐，当晚到达下关，行程四百公里。六日与三位机工会谈。七日续程往保山，行程约二百公里。八日由保山出发，凭吊滇缅公路咽喉“惠通桥”，然后往松山参拜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傍晚六时许到达芒市，行程均二百公里。九日由芒市出发往畹町，随后继续往瑞丽，一直到达中缅边境。当日赶回芒市，来回约二百五十公里。十日由芒市出发，在保山午餐后，赶往下关。十一日由下关出发，当晚到昆明。前后六天，总计来回行程约一千八百五十公里。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全面抗战，在一年半之间，沿海各省均告沦陷，军援断绝，因此乃抢修滇缅公路，这是美国军援的唯一途径，山路险峻，军事运输非有熟练机工不能胜任，一时要训练这种人才，远山救不了近火。因此乃由西南运输处宋子良云电南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要求派遣机工回国，以救燃眉之急。因此在1939年三数月期间内即派九批，约三千二百名机工往滇缅公路服务。

当时宋子良所提供的条件：衣、食、住、医药等一概由西南运输处负责，月薪三十五元。筹赈总会根据这些条件宣布招募机工，限定年龄为二十岁至四十岁之间，除了要有卡车驾驶证或维修机器证明文件外，并须征得家庭同意，始适合资格。

考察团此次的访问，除了在大理和保山访问九位机工外，十一月十二日在昆明再与三、四十位机工开座谈会，综合要点分为八段，概述如下：

1、当时青年爱国热忱，极为高涨，报名参加者至为踊跃，有些青年实际年龄仅为十八岁，乃虚报为廿二岁而报名参加，有的瞒着父母秘密参加，有的已经结婚有妻儿者，亦抛妻弃子而投奔祖国，有的放弃了待遇优厚的职业而参加队伍，形形色色，不能尽述。

2、1939 - 1942年在此段期间内，热爱祖国的机工夜以继日，在崇山峻岭、道路崎岖的滇缅公路来往奔驰。当时由于山高路窄，深谷万丈，而致翻车丧生，或因敌机轰炸扫射，饥寒交迫，瘴气患病而为国殉难者不计其数。但是这些机工却前赴后继，绝不畏缩。他们的生活虽然千辛万苦，险象环生，但是为了抗敌，精神上有所支持，心理上亦有所寄托，尚能度过。

3、1942 - 1945年太平洋战事发生，缅甸失守，日军攻入云南，直达惠通桥。滇缅公路交通断绝。西南运输处保留小部分机工外，其余全部遣散。这些机工突然间成无业游民，不但生活困苦，加上精神上的空虚，身心都受打击，有的机工甚至沦为乞丐。在些段期间，因生活无着、贫病饥寒两相交迫，而致死亡者为数不少，总计在1939年至1945年这段期间中，为抵抗侵略战争而牺牲性命成为无名英雄的机工约占三分之一，人数在千名以上。

4、1945 - 1949年抗战胜利后，这批参加抗战工作的南洋机工，政府当局理应负起复员责任，但却无人理会。当时陈嘉庚先生曾向政府交涉，并宣称如果政府不愿负责的话，南侨总会将派船只前往中国口岸迎接。陈老因恐怕原本为参加抵抗外来侵略战争的机工被迫参加内战，所以据理力争。但当时政府方面却为了避免这批机工回南洋以后宣扬他们所遭受的惨痛经历，有损政府的声誉，因此不甚合作。不过由于陈老的力争，有机会复员回返南洋者，据闻只有九百多人。其余因种种原因流落国内者达千人以上。在此段期间内，内战烽火再度爆发，遗留国内的机工流离失所，无所适从。其经历的苦难，唯有身受者始能了解，并非吾人所能想象者。

5、1949 - 1956年中国解放后，全国人民万众一心，重建家园。遗留在国内的南洋机工认为有机会参加重建祖国的工作是一件光荣和有意义的工作。物质生活虽然苦，但是精神上重新得到鼓舞，把前程寄托在建国事业上。

6、1956 - 1966年在这段期间中，中国把建国大计束诸高阁，而全力进行多项的政治运动。机工们在这种错综复杂连续不断的政治风暴中，彷徨困惑，无所适从，所受到的冲击，不减当年。

7、1966 - 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南侨机工们更因海外关系及参加抗战工作被红卫兵认为是国民党的走狗、反革命分子，十年灾难，史无前例。他们一肚子的冤屈，无处倾诉，精神上更受到致命的打击。

8、1976 - 1986年文革后厉行务实政策。近年来遗留在国内的机工逐渐得到照顾，但是仍有部分尚被忽略者，亦在所难免。我们希望全体都能雨露均沾，安度晚年。

上述八点是此次访问昆明和滇缅公路的简略报告。所接触者不及五十人，晤淡中有的人涕泪交流，泣不成声，有的怨气膺胸，慷慨陈辞，甚至有的埋怨陈嘉庚先生当时发动招募机工回国服务，以致连累他们遭受数十年的苦难。这种怨言也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

据闻除流落在云南的数十名机工外，在四川及贵州也有数十名。南侨机工的原籍绝大多数是闽粤人，据说有一小部分已回返他们的原籍地了。据估计自1945年抗战胜利后，留在国内的千名机工，经过四十年漫长的岁月，尚侥幸生存者恐不及四分之一。他们的年龄最小的也近七十岁，而大多数已经七、八十岁了。这一群被历史所遗忘的抗日英雄，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突然间得到海内外关心人士组团探访，其心情的冲击和感受，悲喜交集的表情，诚非笔墨所能形容者也。

考察团有责任把考察所得的资料记录下来，编写成书，发行中外，更希望中国方面也能重视此段史实。如果能够将此段史实编写成书，而且更进一步摄制为一部电视剧或电影，必能轰动国内外，同时也可以成为历史最好的教材，启发年青一辈的爱国思想，扬弃颓废、消极、腐化和自私的行为。也给这一群海外赤子、抗战遗孤，心灵上有所慰藉。

最后笔者要对北京和云南主管的领导及干部们的衷诚协助，表达万分的感谢。假使没有他们的支持，这次的考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有了他们的合作，这段可歌可泣的史实才不致被埋没，永远成为历史的空白。

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碑文

七·七事变爆发，日寇猖狂入侵，神州大地，烽烟四起，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全国同胞抗日怒潮汹涌澎湃，气壮河山。海外华侨敌忾同仇，义愤填膺，积极参加抗日，广泛开展义演、义卖、募物、捐款等救亡活动，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波澜壮阔，四海翻腾。

一九三九年，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三千多名热血奔腾的南洋华侨机工，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民族责任感，毅然离别父母亲人，远涉重洋，回到祖国，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救国服务工作。

当时，沿海港口均已沦陷，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国际通道，世界各国和海外华侨支援我国抗日的军需物资均赖此路输入。南侨机工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弥漫的战火，夜以继日地抢运军需辎重及兵员，组装、抢修车辆，培训驾驶、机修人员。滇缅公路沿途山高谷深，地势险恶，道路崎岖，设施简陋，加之敌机狂轰滥炸，路塌桥断，险象丛生。南侨机工沐雨栉风，披星戴月，历尽千难万险，确保了这条抗日生命线的畅通，被誉为“粉碎敌人封锁战略的急先锋”。在执行任务中，有一千多人因战火、车祸和疫疠为国捐躯。在滇黔、滇川、广西、湖南公路以及印度阿萨姆邦丁江机场，南侨机工也担负抗日军事运输任务，勋劳卓著。他们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抗日战争胜利后，约有一千名南侨机工复员回到南洋；留在国内的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继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半个世纪过去了，南侨机工的伟大献身精神一直鼓舞着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统一祖国而努力奋斗！

为了表彰南侨机工的光辉历史功绩，并激励来兹，特树丰碑，永志纪念。

云南省人民政府

一九八九年五月

纪念碑的重建及其他

1989年7月7日，是中国人民抗击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52周年纪念日，也正好是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服务的50周年。这一天上午，昆明西山公园的景色格外秀丽，骄阳妖艳，人流如织，纷纷汇集到公园的山坡上，为“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落成，举行隆重的剪彩典礼。云南的老机工和来自海南、福建、湖北、贵州、四川、香港和缅甸的老机工代表，以及云南省、昆明市的领导人和各界人士数百人参加了庆典。

笔者受命陪同全国侨联庄明理副主席，专程从北京前来参加庆典。当年，庄明老在南洋是积极支持南侨总会陈嘉庚主席的号召，并参与组织南侨机工回国抗日服务的爱国华侨知名人士。

在典礼上，云南省委普朝柱书记在致词中，以宏亮的话音和庄严的语言赞颂了南侨机工的爱国历史功绩，并号召要用这一段光辉历史，教育和激励海内外炎黄子孙，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祖国的振兴、繁荣、富强和统一而共同努力奋斗！

在典礼上，庄明老显得心情非常兴奋和激动，因为重建南侨机工抗日纪念碑，是他多年来蕴藏在心底的一个夙愿。可惜，他这时已80高龄，且患有语言障碍症，致词已发生困难，力不从心，因而不得不由站在他身边的我代为宣读致辞。

这座雄伟庄严的纪念碑，高达12米，耸立在西山公园的山坡上，俯瞰着烟波浩渺的高原明珠——滇池。碑身是选用汉白玉石镶嵌而成的，迎面镌刻着镏金碑名：“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碑座选用黑色大理石砌成，迎面也镌刻着苍劲而雄浑的四个镏金大字：“赤子功勋”，金光夺目。碑座的另三面，镌刻着近八百字的碑文，颂赞南侨机工的历史功绩，读来令人凝思万端，情感翻腾。

像这样专为纪念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日而立的如此之雄伟纪念碑，至今尚属全国所独有的。据了解，抗战胜利前夕，在昆明东郊郭家凹，曾立有用毛石垫基的“南侨回国服务机工殉职纪念碑”，较为简陋。“文革”期间已被毁，遗迹已荡然无存。

南侨机工抗日纪念碑何以在此时得以重建？笔者拟就曾参与有关此事的经过及其他，做此回忆记下来，作为这一历史篇章的结尾史料，供读者参阅。

事情得从“文革”后拨乱反正回忆起。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中国人民结束了这十年的灾难。1977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同年9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参加国庆的侨、台、港、澳同胞旅行团的讲话中，开始提出：“……侨务工作，要提到日程上来，准备恢复过去的侨务机构”，要“先把庙立起来”。同年10月2日，邓小平在接见利铬泽夫妇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关系（指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这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他还提出，对“这种错误政策一定要纠正过来”。1978年1月，中央正式批准成立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行使“文革”前原华侨事务委员会的职能，并任命廖承志为主任。同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廖承志的署名文章：《批判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反动谬论》和社论，批判了“四人帮”破坏侨务工作的罪行，并提出了要把他们颠倒了的是非彻底纠正过来。同年4月，全国侨联也恢复了活动。同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侨务会议和全国侨联第二次全国归侨代表大会。会上，推举廖承志为全国侨联名誉主席，庄希泉为主席。

1980年2月，中共召开了第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任总书记。国家在侨务工作中的澄清是非和拨乱反正，在胡耀邦的关怀和大力推动下，更呈现了一派盎然生机。

1981年11月，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有关学者和侨务工作者在北京召开了成立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大会，推举廖承志为学会名誉会长，庄希泉为会长，陈翰笙、费孝通、梅益、洪丝丝等为副会长。当时，笔者受命参与创建该学会的筹备工作，在学会宣告正式成立时，被推举为学会首届副秘书长，主持学会的日常工作。正因这一工作关系，学会办公室不断收到定居国内的一些原南侨机工或其家属写来的申诉信。这些信件，多是由各有关部门转来的。

他们在申诉书中，陈述了在过去历次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曾因南侨机工这段历史，而被说成是“在外失业而回国谋职”，是“为蒋介石卖命”，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等，蒙受冤屈。他们因有“海外关系”，被说成是“反动的社会关系”，受到了严厉的审查、批斗，以至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他们中，有的人曾因莫须有的罪名而判刑，甚至有的人刑满还留队多年，后因年老被清退到社会上，生活无着落而又无人过问。有的人，因被错误地下放到农村，仍然未矛以回城镇落户。他们的历史旧案和冤假错案的档案材料，仍然未予以清理等等。他们要求落实政策，平反其冤假错案。他们要求予以恢复南侨机工抗日救国的光荣历史，还历史的本来面貌，并承认他们个人的这段光荣历史。

他们在申诉书中，申辩说：他们在南洋原居地本是有家有业和有丰厚的经济收入的；他们当年是怀着满腔热血回国为抗日救国服务的，根本不存在“在海外失业而回国谋职业”的问题，更不存在“为蒋介石卖命”、“国民党的残渣与余孽”的问题。他们说，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国内国共两党已形成了合作抗日的历史时期，国难当头，为了推动蒋介石共同抗日，中共以周恩来为首的一些领导人也到国民党政府的军政部门去任职；中共领导的中国红军也接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协同作战。这些历史事实，不正说明举国上下，一致团结抗日，根本不存在谁“为蒋介石卖命”的问题。

熟悉南侨机工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1939年回国服务的南侨机工总数为三千二百多名，其中在滇缅公路因车祸、敌机扫射和病疫等殉难者近千人；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南洋者千余人；因各种原因而定居国内者亦约为千人。定居国内的这部分人，多散居于西南各省，特点是云南境内，也有少部分人是返回闽粤琼原籍家乡定居的。这部分人尚健在的已不多，且大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中的多数人，是在五十年代重新安置工作的，退休时因工龄短，加上在定其工资级别时偏低，因而家庭生活困难。如有的人住房有困难，有的人因子女没有工作还要负担其生活费，有的人年老多病无子女在身边照顾等等。他们要求予以关心和妥善解决其家庭生活上困难的问题。因此，每当阅读这些申诉书时，总令人心情十分沉重。我们虽然已多次向有关领导部门反映了原南侨机工的上述申诉情况，并建议应予以重视和妥善处理，但苦于一时仍难于有结果。

1985年8月初的一天，庄明老见到我说：“陈共存先生来了北京相约会见，要谈南侨机工这段历史。”他邀我陪同去相见。第二天上午，我随同庄明老来到北京饭店会见陈共存先生。陈先生谈起四十多年前“七·七”事变后，陈嘉庚先生领导全南洋华侨支援祖国抗日运动的往事。他着重谈到了当年陈嘉庚先生是如何号召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日服务工作的事。他说，当时南洋华侨青年的爱国热情十分高涨，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报名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抗日服务者至为踊跃，有虚报年龄的，有女扮男装的，有瞒着父母和亲人报名的，有的已结婚有妻儿，却自愿放弃了丰厚的经济收入和温暖幸福的家庭毅然应征的。他为到这些南侨机工回国后，是如何不畏艰险、不顾个人安危，为国殉职捐躯的英勇事迹。他还谈到了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攻入滇西进逼惠通桥，桥被炸，滇缅公路中断之后，南侨机工被裁员而失业，无以为生，沿街乞讨的悲惨情景等等。他对定居国内的这部分机工十分关心。接着，他表示说，近年来，新加坡政府提倡撰写海外华人的创业史和抵御日本侵略的史迹。因此，他认为原南侨机工的这段可歌可泣的光荣历史，包括他们后来蒙冤遭难的实况，应予撰写成史，载入史册，以教育后人。他提出，为了撰写这段历史以填补空白，打算组织新加坡若干华人学者赴滇缅公路考察，并访问尚健在的原南侨机工，希望中国有关部门予以鼎力支持。

在交谈中，庄明老也谈了他当年在槟城是如何通过成立汽车司机公会来组织南侨机工报名，后来因被英当局以“危险分子”为由驱逐出境。在沿滇缅公路回国时，受陈嘉庚先生委托了解机工回国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此外，他还谈了1940年陪同陈嘉庚先生视察滇缅公路，解放后1955年陈嘉庚先生前往昆明和贵州等地探望原南侨机工的情景。当时，散居在西南地区的还约有二、三百人。陈嘉庚先生很关心他们，鼓励他们努力参加新中国建设。

在这次交谈临结束时，庄明老对陈共存先生提出拟组织考察访问团一事表示欢迎，他并示意要我谈一谈看法。我本来是不准备说话的，只好开口了。我心里想，如果能促进访问团的到来，也许有助于解决原南侨机工所申诉的问题，但又不便明讲。于是，我只概括表示：“撰写南侨机工的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希望访问团能成行。”“建议陈先生回新加坡后来信，正式地提出这一意向和行程的具体计划，以便向有关方面反映。”此外，我也介绍了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成立的宗旨，并说明学会拟组织和推动撰写海外华侨华人诸方面的历史。同时，也谈到了不久前，在云南省成立华侨历史学会的大会上，我在致词中也已提出了应组织力量撰写南侨机工的历史。尔后，又安排了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向云南省华侨历史学会提供六千元的资助款项，作为搜集和编写南侨机工史料的经费。

离开北京饭店，在回程的车上，庄明老以不寻常的心情对我谈了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完成三件事：一是收回在“文革”中被占云的北京“华侨大厦”，归还全国侨联；二是实现在北京建立“华侨博物馆”，以完成陈老（嘉庚）的遗愿；三是解决好定居国内的原南侨机工的问题，包括重建南侨机工纪念碑。

1985年9月的一天上午，庄明老将他刚收到陈共存先生的来信拿给我，并要我随后到他办公室商议此事。

陈共存先生在信中写道：“七七事变后，新加坡曾组织技（机）工回国服务，人数达三千人，其中有半数可能已成为无名英雄。此段可歌可泣的史实，可惜无人整理。陈嘉庚基金会愿意支持此事，拟组织一队人员前往中国考察，撰写有关此事的史料，届时希望中国也能大力支持此事，给予考察团以交通和住宿的方便。”

几天后，我在全国侨联办公会议的一次例会上，汇报了陈共存先生在约见时所谈的意向，以及他来信的内容，并提出建议应积极促成考察团来方的想法。这次办公会同意我的建议，并决定以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和云南省华侨历史学会联合名义接待来访，具体工作主要依靠云南省侨办和侨联，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给予协助。办公会议还责成我拟草《关于接待新加坡“华侨机工考察团”的请示报告》，报有关领导部门。1985年9月7日，请示报告呈上后，有关领导部门很快就批示，需与云南地方领导部门商定。

在与云南省有关部门联系的过程中，省侨联、省侨史学会和省侨办态度非常积极，并认真地做了许多工作。因此，接待的准备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后来为了增强接待力量，也请了全国政协华侨组（华侨委员会的前身）和云南省政协共同来负责这项接待工作。

1985年12月初，经与有关部门联系和研究，决定由庄明老复函陈共存先生，正式表示欢迎新加坡陈嘉庚基金会派考察团来访，并请他们通过我驻新商务代办提出申请，行期由他们决定后通知我们。

考察团最后通知，定于1986年11月4日飞抵昆明。我受命陪同庄明老于11月1日先行飞抵昆明。同行的还有著名电影演员项堃夫妇和全国政协工作人员牛石林。

11月4日上午，陈共存夫妇及随访的王素月女士（陈济民之夫人）、余惠贞女士等四人，自上海飞抵昆明；同是下午，考察团成员魏维贤、林孝胜和崔贵强先生等三人，则是自香港到广州转机直飞抵昆明。魏维贤博士时任新加坡工商银行董事会主席、南洋学会会长，林孝胜是新加坡国家口述档案馆的负责人，崔贵强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讲师。当天，以庄明老为首的主要接待人员，到机场迎接贵宾的到来。

七位贵宾和庄明老等主要接待人员，被安排下榻在云南最高级的震庄宾馆。

11月5日清晨，陈共存、魏维贤、林孝胜、崔贵强四位客人和庄明老等主要接待人员、医生、保安人员一行十余人，分乘三辆车，自昆明出发。

新加坡三位随方女士因不宜远道劳累，留在昆明市游览参观。项堃因高原气候反应不适，留昆明住医院，未能随行。

出发的当天，车子跑了近四百公里路，迄晚上七时许才到达下关（白族自治州首府）。当晚下榻于大理州政府宾馆。

六日上午，与住在下关的三位原南侨机工座谈，请他们谈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生活情况，并对他们表示慰问。下午，安排了游洱海公园、苍山脚下的三塔和大理南诏国旧址等。晚上大理州领导人宴请洗尘。魏维贤先生因另有公务急需赴伦敦，故在宴席未散前，由我送他上车当夜返回昆明。我和魏先生是在这次首次见面认识的。在推动研究海外华侨问题上，我们有较多的共同语言，故我们畅谈得颇知己。1985年5月，我们能携手共同推动在厦门鼓浪屿观海园举办战后海外华人国际研讨会，亦是以此为联系的开端。

七日清晨八时许，从下关出发，继续沿着崎岖陡峭的盘山公路前进，下午一时许抵达保山，行程约二百公里，途径澜沧江上的永保桥，下车摄影留念。永保桥是解放后建造的大铁桥，以代替当年的功果吊桥。当天下午，与当地六位原南侨机工座谈。其中一位名叫孙其文的机工噙着老泪哽咽地说，他在当年是隐瞒着父母和妻儿报名回来的。不久前经辗转托人与在马来西来的妻儿云了一封信，却遭到妻舅回信痛斥，说他无情无义，拒绝再作通信。陈共存先生十分关注此事，当即向他问清了通信地址，表示回去后要协助做其妻儿的工作，以求得谅解。

八日清晨，自保山继续出发，午后抵芒市。行程亦约二百公里，途径怒江上的惠通桥和松山戴安澜将军抗日阵亡纪念碑址时，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下车凭吊为国捐躯的烈士。

芒市是傣族自治州首府，当晚下榻芒市宾馆。宾馆是一座不久前盖成的傣族建筑形式的竹楼。下午安排与当地的几位老机工座谈，其中有一位是已定居在缅甸境内，特地赶来相见的。

九日清晨，从芒市出发，十时许抵达边界终端边陲市镇——畹町。在边防人员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以河流为界的畹町桥上。陈共存先生还走到桥中的中界线上，跨着双脚风趣地说：“我现在同时踩在中缅两国国土上，是多么了不起的啊！“在畹町市镇上，边贸市场十分活跃，街上摆满摊位，海鲜、瓜果和日用品应有尽有。随后，我们又沿着边界河的公路来到瑞丽渡口，登上边防海关楼上眺望河对岸一片朦胧的田野景色，好象在宁静地迎候着乘小木船过境的边民。边民早来晚归，多从事边贸。在瑞丽县政府的招待会上，遇见了一位印尼归侨，他是几年前自北京首都医学院毕业后分配来此地的，现在已成为当地名医，深受少数民族兄弟的尊重。

午后，又自瑞丽返回芒市宾馆过夜。原计划于11日自保山乘小飞机回昆明，由于连日下雨，飞机停航，只好仍坐车按原路回昆明。

10日大清早，冒雨从芒市出发，马不停蹄地赶路，当晚七时才抵下关过夜。第二天大清晨，又从下关赶路，当晚六时许，终于顺利地回到昆明震庄宾馆。两天的回程，走完五天的去程，苦了驾车司机，乘车人也不轻松，幸好座车机器性能有保障。

滇缅公路中国段，以昆明为起点，要途径安宁、楚雄、南华、祥云、下关、流氓、漾濞、水平、保山、龙陵、芒市、畹町等十余城镇。这条公路，在解放后重修时，路段长度有所缩短，已全铺上柏油路面而成为高级的公路。但是，公路仍然要盘旋高山，翻越横断山脉、怒山和高黎贡山，要飞渡怒江、澜沧江和漾濞江，道路仍然险恶。由此而令人联想和怀念当年在这条险恶公路线上驾车驰骋的南侨机工，是有着何等的英勇献身精神和高尚品格！

回到昆明第二天，即12日上午，陈共存先生在圆通饭店与在昆明及从其他区县赶来的三十多位原南侨机工老人座谈、合影留念，并设千宴招待。当晚，又宴请云南省侨联、侨史学会、侨办和政协领导人及接待工作人员，以对东道主热情接待表示由衷的谢意。

13日上午，接到云南省委普朝柱书记于当晚宴客的请柬。此事使我油然想到几天来，庄明老多次谈到重建南侨机工纪念碑的事，正苦于无从着手。中午从餐厅陪同陈共存先生走出来，在漫步的小道上，我有意识地谈到晚上普书记要接见并宴请的事，紧接着就着重谈了纪念碑的事。陈共存先生会意地表示，这是个好办法也是个好机会。

午休后，我陪同庄明老到庆云街省侨联会所。庄明老同关平，阮咏棠等侨联负责人，再次着重谈到重建南侨机工纪念碑事，并急切地提出要以省侨联名义向省政府写申请报告，同我坐在一边的阮咏棠秘书长便当即向庄明老说：“已遵照您老的指示拟好了申请报告，准备这几天就呈上去。”但与此同时，阮秘书长又转过头来向我说：“报告如送上去，恐怕也难以办到……”这时，我就对他说：“报告暂不急于完稿送上去。”又说：“我已同陈共存先生谈了这件事，正好今晚普书记要接见，这件事会谈到，我会见机行事，将重要的谈话记录下来，抄给你们补进报告书上。”这时，庄明老露出了满意的神态，连声道：“好，好，好！”

果然，当天晚上在震庄宾馆一号楼会议室，普书记等领导人在宴会前亲切接见了贵宾和主要陪同人员。在交谈中，陈共存先生主动向普书记说：“海外华人对抗战时期回来的南洋华侨机工的这段历史很尊重，也为他们建立了纪念碑。在昆明如果要为他们重建纪念碑，我希望给我一个机会表示一点心意，愿捐一万元人民币供建纪念碑，我希望给我一个机会表示一点心意，愿捐一万元人民币供建纪念碑用……”这时，我就赶紧将事先准备好的几张照片递给普书记，并略加说明：“这是马来亚华人分别在雪兰莪、槟城等地为殉难南侨机工所建立的纪念碑。”普朝柱在接过照片，仔细地翻看后说：“好，做个纪念！纪念碑对青年很有教育作用，所以政府搞一个纪念碑很有必要。”在座的省政协主席梁家也支持说：“省民族博物馆正在筹建，该馆周围将建立一张纪念碑，如果南侨机工纪念碑能安排建在这个范围内更好。”

根据预先所考虑的，我在笔记本上，一字不漏地记下了交谈的上述原话。翌日，将记录下来的几段原话抄下，送给阮秘书长补进请示报告的文稿上。

请示重建南侨机工纪念碑报告，于同年11月27日送上。不久，便顺利地批下来，同意着手重建。接着，由省侨联和政府各有关部门派员，正式组成纪念碑筹建办公室，推动此项工程的兴建。值得一提的是，筹建工作刚开展不久，却赶上国务院下文严禁各地正在兴起的建纪念碑和纪念馆热。于是，要建南侨机工纪念碑的工作也受到冲击，有关领导机关内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遵照国务院禁文下马，取消建碑工作；另一种则认为，筹建工作不能取消，应如期完成，理由是，筹建工作是在国务院下文以前已开始，而且，重建南侨机工纪念碑事，不同于国内一般的建碑热。同时，它也关系到省领导人已向海外朋友许诺的事，不能说了不算数。幸亏如预先所考虑到的，在请示报告书上，录有普书记在接见考察团时所说的上述那段话。此后，经省主要领导人出来干预和表态，重建南侨机工纪念碑事才幸免夭折。

在重新确认建纪念碑立项后，筹建办公室就积极进行建碑地点的选择、设计、造预算和申请调拨建材等项工作。其间耽搁了一些时日，迄至1989年7月才竣工。

建碑工程共耗资十余万元。其中除五万元捐款外，其余大部分为云南省政府拨款。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也向建纪念碑工程捐了一万元。

如当初所意料的，促成新加坡考察团的到来，也促进了原南侨机工所申诉问题的解决。据1986年调查的情况，仅以机工定居较集中的云南省情况看，当时尚分健在的77人中，年龄最大的86岁，最小的66岁。来自马来西亚41人，新加坡24人，印尼和泰国等12人。原籍广东、海南的61人，福建16人。

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云南有关部门为上述77人解决了以下几件事：

一、清理机工档案91份，其中包括已故的14人。

二、纠正冤假错案10件，其中包括撤销原判而宣告无罪的、撤销因“海外关系”而被“内挂”的、并对因被批斗搞臭而予以恢复名誉的，等等。

三、补发因被错降级而扣发工资的五人。

四、解决住房困难的15户。

五、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供应商品粮等）。

六、发给生活困难补助款的31人。

七、协助调动子女工作的4户五人。

此外，就面向全国各省尚健在的原南侨机工而言，中央有关部门曾于1986年12月8日专门下达《关于给已退休的原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成员生活补贴费的通知》。根据通知规定，对原南侨机工现居国内人员，由现支付退休金的单位每月发给定额生活补贴费；其补贴款数以补足其在退休前的标准工资总额为限。换句话说，他们每月所领取的退休金额，是其退休前标准工资的百分之百。

应该指出，当时由于国家实行低工资制，加之他们的工资定级偏低和近年来物价指数上涨，这补助仍显得微薄，但却也是一件令人宽慰的事。

从全国各省来看，在解决原南侨机工所存的问题上，要数云南省地方落实得比较好，这与云南省领导人的重视和关心分不开。同时，新加坡考察团的到来，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南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在昆明重建，对教育后人继承和发挥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意义。同时，它也象征着对南侨机工这段光荣历史的最充分、最崇高的赞扬。在参加纪念碑落成剪彩典礼上，站在我身旁的一位原南侨机工老人，感情非常激动，他以深沉的感慨话语对周围的人说道：“今天碑已建立了，我们别无所求，只希望祖国没有忘记我们，只希望我作古后的骨灰撒在这座纪念碑周围的，以了却我矢志报国的夙愿。”当年，南侨机工有一个共同的美好愿望，即盼望在滇缅公路沿线上择一景色幽美的地点，为那些以身殉国的烈士造一公墓，以便将来侨胞回来凭吊时，好有一个慰藉之处。而今，“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的落成，当是在更高的基点上实现了他们当年的夙愿！

后记

三千多南侨机工毅然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是半世纪前华侨史上轰轰烈烈的一大壮举。然而，世事沧桑，岁月流逝，南侨机工的事迹竟渐被遗忘了。为再现南侨机工可歌可泣的真实历史面貌，经数年几易其稿，《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一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陈嘉庚先生之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前会长陈共存先生的鼓励与资助，是他大力支持我赴滇缅公路及西南各省实地调查研究，还亲自审阅书稿，给予指导，并在百忙中惠赐序言。还应感谢母校老师、华侨博物院副院长陈毅明女士的提携扶助，多年来她对本课题时时加以关切指导，为本书的编撰工作及联系出版事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且热情为本书作了序言，勖勉有加。还要感谢原中国华侨历史学会郑民副秘书长，他在应聘任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所长期间，及时地伸出援助之手，为促成本书的如期完稿提供了保障，具体指导并审校了大部份书稿，花费了许多心血。

本书撰写、编辑与出版过程，得到责任编辑、泉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林树丹，北京新华社主任记者、《半月谈》杂志主编林双川，厦门大学林进川、华侨大学苏连成、著名作家陆昭环、著名电影作家洪永宏、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顾问刘宝全及泉州退休教师协会林开基、林飞龙诸先生的热情支持与鼎力相助。

非常荣幸的是，本书承蒙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陈嘉庚国际学会会长李远哲博士，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张楚琨先生等惠赐题词；著名教育家、书法家、澳门侨联总会主席梁披云先生惠题书名，使本书增辉生色。本书的出版，还得到陈嘉庚国际学会、陈嘉庚基金会、厦门星集有限公司蔡光明董事长、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诸同仁的关心与支持，并得到华侨大学科研处的资助。

云、贵、川、湘、闽、粤、桂、琼等省各级侨务部门，云南档案馆及南侨机工联谊会，曾为本书的采访等工作提供多方的帮助。

上述海内外知名人士、良师益友及有关部门团体，惠我良多，在此一并谨致崇高的敬意与由衷的谢忱！

由于本人阅历和水平所限，有关史料的掌握也还不够全面，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祈广大读者，特别是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予以批评指正。同时，恳切地期望海外南侨机工及其家属、亲朋好友继续提供有关资料，以便本书的姐妹篇——海外续编早日问世。

中国泉州 林少川谨志

1993年12月于华侨大学

  陈嘉庚，福建同安人，1874年生。9岁入乡间私塾，1890年出洋至新加坡助父营商。

       1904年自立门户，创设新利川与日新黄梨（凤梨）罐头厂、福山黄梨园及谦益米店，1905年增设日春黄梨罐头厂。1906年着手橡胶种植业，又与友人合办恒美米厂，1908年改为独资经营。1910年加人同盟会。同年，被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六届委员会协理、道南学堂第三届总理，是为致力教育事业之始。1911年，于曼谷设黄梨厂。同年十月，武昌革命军兴，住坡闽侨组织保安会，被举为会长，筹款救济闽省及维持治安。1912年，返国于故乡集美（今厦门市）创办制蠔罐头厂失败，改与友人合作，另组   大同罐头食品公司。同年，兴办集美小学校。1913年，再赴新加坡。

       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转营橡胶、航运及白铁业，开始获利。战后专营橡胶业，先后于南洋各地增设橡胶厂。又陆续在新加坡创设南洋华侨中学，在集美开办幼稚园、中学、幼稚师范、普通师范、商科学校、女子师范、农林学校、水产航海学校，在星洲倡建南侨女中及爱同、崇福等学校。1921年，更斥资创立厦门大学。1924年，于新加坡创刊《南洋商报》，并手订“拥护南京政府为首要目的”作为办报规则。翌年，橡胶价格大涨，获利近八百万元。于马来亚、荷印等地及香港、上海等大城市设分行、分店三十余处。总资产逾一千二百万元，是为其企业之极盛时期。1929年起，受世界经济大恐慌影响、企业损失巨大。1931年，被迫接受银行条件，将企业改组为陈嘉庚有限公司1933年，《南洋商报》被迫出让。1934年，公司歇业。1936年，将厦门大学交由教育部接办。

       抗战爆发后，领导南洋侨界筹款，抵制日货，并动员南洋侨界参与抗日运动。1940年，率侨团返国，至各地慰劳考察。访问延安期间，备受中共影响，认为重庆“虚浮乏实，绝无一项稍感满意”，延安则“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1941年，先后任南洋闽侨总会及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主席，并创办南洋华侨师范学校。1942年，于新加坡沦陷前，避居爪哇。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由爪哇返回新加坡。1946年，致电美国政府，吁停止封国民政府之一切援助。同年，发刊《南侨日报》。1947年，又创办《南侨晚报》。

       1949年10月以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至1961年，先后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常委，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副主席，1961年病逝于北京。著有《华侨领袖陈嘉庚救国言论集》、《住屋与卫生》、《南侨回忆录》、《我国行的问题》、《陈嘉庚言论集》、《新中国观感集》、《五万里路祖国行》等。

   余天资素钝，九岁入私塾，十七岁夏塾师谢世，辍学出洋。时已有简单之日报，余仅一知半解。在洋就商之后，对学问事不知求益，抱憾不少。而生平志趣，自廿岁时，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诸事，颇具热心，出乎生性之自然，绝非被动勉强者。念无甚成绩可纪，故生平未当记载。此回忆录盖原为纪念华侨参加抗敌而作。我国此次国难，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南洋千万华侨，对祖国之贡献如何，不但今时国内外多未详知，而此后必更消声灭迹矣。抗战胜利后，我国史书即有记载，亦不过略提海外华侨曾捐助慈善救济费若干已耳。至于我南侨如何辛苦募捐，同仇敌忾，抵制敌货，严惩奸商，牺牲若干，数年如一日，以及祖国战时所需金钱与华侨有如何密切关系，当然无由得知；而后人或难免以为当国家存亡关头，千万华侨不思回国报效，尚在海外逍遥也。余忝任南侨总会主席，所居新加坡为南洋最重要商埠，且曾回国慰劳，对国内政府及战区官长多有接触，对南洋各属侨胞筹款会，更有往来，所以知之甚稔。自新加坡失陷，避匿爪哇，闲暇无事，乃思写此“回忆录”，不但使海内外同胞知南侨对抗战之努力以及对祖国战时经济之关系，亦可免后人对今日侨胞之误解也。为记述南侨对抗战之工作，故并余以前些少服务社会之事及南侨概况约略记之。书末复附个人企业追记一篇。全书计三十万言，最大部分为记录南侨襄助祖国抗战之工作，次则为余服务社会之经过，再次为个人以前之营业状况。所以补记个人之事，则因先有营业而后能服务社会，继而后得领导南侨襄助抗战工作也。要之余书虽属记载性质，而材料亦甚繁多，然其中固有一贯之根本意见，非杂凑而成书。兹请撮其要点，申述于此，以作导论。

       祖国前受制于清廷，政治腐败，国弱民贫。迨光复后军阀专横，官僚贪污，农村破产，百业落后。日本乘危打劫侵占东四省，继将进而并吞华北各省。幸英国派员助改币制，统一财政。然所有国内白银，多被政府没收，输往外国，而代以纸币，复于数年间发出巨额公债票。唯因外强中干，债票在市面价值仅五六成而已。政府财政之困穷，社会民众之贫苦，毋庸多赘。

       我国各业既落后，洋货复自由入口，清朝时每年已入超数万万元，民国光复至七七事变廿余年中，入超近百万万元。我国既不能出产金银，其所以免致破产者，端赖海外华侨逐年外汇输入现款二三万万元，故能抵塞漏卮。外国人以货品出口换金钱，而我国则以华侨人身代之也。

       战争之国最需要者人力与金钱。外国逢有战争需要金钱，多是发行公债，向国民息借。我国政府亦不能例外，然政府素乏信用，民众又患贫穷。抗战后发行首次救国公债五万万元，虽如何极力推销，总不能达到半数。如闽省由中央政府分派八百万元，经省政府悉力强逼，甚至捕人封屋，竭泽而渔，经年以后，结果仅销四百万元。其他各省可以想见。然政府每年发出公债两次，每次五万万元，至民国廿九年，抗战已三年半，共发出公债券三十余万万元，除首次外未尝再向民间募债，而完全由政府银行负责。银行何以有此能力？此则利用华侨汇款做纸币基金耳。

       抗战第四年（民廿九年）春，据何应钦部长在国民参政会报告，客年全年战费共开出一十八万万元，而同年海外华侨汇归国币十一万万元，义捐交政府约十分之一，余为私人寄家用者，从中南洋约占十分之七有奇，余为美洲等他处。按华侨外汇之款，概是现金，照世界银行发行纸币公例，有基金一元便可发出纸币四元，其信用便可称稳固。政府如以十一万万元现金，存中外银行做纸币基金，便可发出纸币四十四万万元。除十万万元交还侨眷家费，尚可存三十四万万元，除抵补是年战费十八万万元以外，尚有十六万万元也。

       我国自抗战以后三四年中，俄国借助我军火值三万万美元；英国自初开战时，借我现款五百万金镑，以维持国币基金；美国以货物交换，借我值四千五百万元美元之物品！除此而外，未有其他现金资借也。

       我国战费及政费，所需金钱，既与华侨有密切关系；华侨应如何竭诚努力，以尽职责，大可以救祖国之危亡，次可以减将士之死伤。然若考究其实，则遗憾甚多。南洋侨胞虽号称有一千一百万人，其中暹侨五百万人被当地政府压抑不得公开援助祖国，而各属侨生约一百万人则多乏祖国思想。此外，尚有五百万人之众，其中殷富侨领不少，如肯努力提倡，义捐及增寄家信，至少可加一倍。然或以领导不力，或袖手旁观，致成绩有限。故祖国虽遭此空前危险关头，而南洋华侨既众且富，义捐及私家汇寄，犹未及在洋资产十分之一也。

       自敌南侵（民卅年十二月）后两三个月，南洋各属地都归失陷，华侨汇款概行告绝，其他美洲等侨汇，亦因香港失守，机关欠灵，阻碍不少。自民卅年以后，我政府既无侨汇现款，可作国币基金，而银行纸币，仍旧增发，以抵政府续发之公债券。加以政治不良，污吏奸商舞弊囤积，由是货物昂贵，战费大增，而政府又不得不增发纸币，以资周转。纸币愈多，价值愈贱，物价亦愈膨胀，此皆由乏相当基金存于中外银行之故，由此更可证明侨汇与祖国之关系。

       自民廿九年夏，法英战败，敌乘机侵人安南，美国已逆料世界大战不能避免，而东亚方面，中国为战线要冲，将来中美必须联络，在人力上中国负有相当责任，而金钱与军械，则赖美英供给。故美总统屡派代表，或借名中国顾问，与我政府磋商，其最重要条件，即是财政公开，政治民主化，避免国内分裂，方能一致对外。经历有年，结果无效。迨至日本南侵，美英当然更积极要求，而我政府反视为奇货可居，以为大敌日本，已有美英可代我负责，而眼中钉之中共，使可乘机制裁，即转一部分军力封锁其边界，由是美英诚爱莫能助矣。

       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与各领袖长官，社会名人，报界记者接触，并至延安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此次世界空前未有大战后，各国政体必多改革，民治化势力蔓延，决不容野心独裁盘踞误国。我国惨遭战祸时期最久，而战后之幸福亦必最大，所获利益亦必最多。兹举其大者而言，对外如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百年来所丧失之国土与各租界，及没收敌人在国内所有业产，至于以前所负不平等外债，亦可脱卸；对内则改革政体，实行民主政治，兴办交通，振兴工业，改善农村，提高文化，注重卫生，以上诸事均为我事事落后之中国所独有也。

       我国经大战之后，民治政府百端维新，而卫生端在首要之列。卫生事项虽多，而最困难最重要之根本，则为住屋问题。我国自来人民生死未有登记，设有登记，其数必甚多。余住新加坡五十余年，自初到时当地政府对卫生已有相当设施，而市民每年死亡率，每千人平均廿四五人。迨至近今廿多年前，（民国十年间）市政更大改革，将全市总计划，凡新建屋宅，须照政府计划办理，旧者则逐渐改建，其要点为留街路，留空地，开门窗，留天井等事，目的在使日光空气可以畅达。十余年间改革完竣，而市民死亡率，遂减去十分之一有奇，每年每千人平均仅死十五人而已。余前者回国慰劳，经历十余省，所见城市之住屋街路，大都不合卫生，认为此事极关重要，于民族前途大有影响。各地城乡曾为战区者，其住屋之破坏固无论，即未沦陷之地亦多有遭炸毁者。乘此战后复建之际，各地方政府应就全区通盘计划，颁布合于卫生之建筑规则，使人民遵循。新者全照规定，旧者逐渐改变。从此一劳永逸，他日无须重拆，则卫生之基本已立矣。此事有时间性，逾时即不及，故余特印行《住屋与卫生》一小册，以宣传之，并组织回国卫生观察团以提倡之也。该小册亦附于本书内。

       此次胜利国诸大领袖，均有伟大善愿，欲措世界各国于长期和平之前途。然欲违此目的，必须监察既往，揣度未来，以公平道义为根据，消除不平及无理之旧状态，方能熄灭战争之导火线，而达到弭兵之期望。就东亚言，安南为我国属土，已有两千一百余年历史，不幸为法国占夺，此乃我国之奇耻大辱。苏美英诸领袖果真有长期弭兵之诚意，必须将安南之法国政权取消，方能拔除战争之祸根也。本书末附中国与安南一文亦即发挥此意。

       此次世界大战后，苏美英诸领袖，既欲以道义造福人类，当然对于不平等苛政，不仁义权利，必须铲除或改善。华侨亦在联军之列，战时共同遭受惨苦，战后各属居留地政府对于华侨，不宜仍照以前苛待，而应改善待遇。例如以前各属地之限制华侨人口，征收人身税，禁止土地权，限制教育，及其他不平等条件，以及鸦片公卖等陋政，必须消除或改善。本书中亦常提及此等事。

       要之，本书虽属事实之记载，然其性质颇有关于社会风化，立身人格；对于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嫉恶好善，爱乡爱国诸点，尤所服膺向往，而自愧未能达其万一，深愿与国人共勉之也。

       本书节数五百余，头绪繁多，且系按时间先后记录，非按事件之性质，故粗观目次，不能明其内容，按其性质略分为以下诸项：

一、福建光复时本坡汇款接济及孙总理回国事。

二、集美、厦大两校经过，及南洋华侨教育事。

三、福建救乡会及“济南惨案”及其他社会事件。

四、七七抗战后南洋各属筹款会及南侨总会工作经过。

五、机工及慰劳团回国，及余亲历十余省见闻之状况。

六、陈仪祸闽及余抗议事。

七、余与蒋委员长、毛主席及各战区司令官长等人恳谈之语。

八、日寇南侵华侨抗敌动员及沦陷事。

九、战后补记附《住屋与卫生》《中国与安南》诸文。

十、个人企业追记。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于新加坡怡和轩

  余二十余岁时，在新加坡见友人珍藏一本药书，名曰《验方新编》，云某友赠送，无处可买。其时上海书局尚未印售。书内注云，版存日本横滨中华会馆，任人印送。据友人所言及余自己经验，其方颇有应效，故余甚为注意。窃念吾闽乡村常乏医生，若每村有此书一本，裨益不少。乃备款托香港友人汇往日本定印，每本三角，前后数次，共印六七千本。书面标明“同安集美陈家奉送”。最后一次定印五千本。其时余适回梓，约半年之久，尚未寄到。余及港友屡函日本该会馆查问。据复久已寄出，迨后港友查悉，该书在日本托出口商店代寄，该店寄时适倒闭，致失手续。运到香港日久，无主向领，致被船栈拍卖，料该书必散在广东矣。其后多次与该会馆交涉无效，不但不肯认错，且完全不负责任，由是不能继续印送，不胜遗憾之至。

       自该帮药书被误后，与该会馆遂绝来往，由是有怀莫展。过后多年乃思向上海书局定印，并拟广集国内及南洋经验良方，以增补该书之不足。不但余义务印送，而公开与印刷家售卖，亦可推广。故不惜报费，在天津、北平、汉口、郑州、南昌、长沙、济南、安庆、南京、杭州、上海、福州、厦门、香港、广州、梧州、汕头，及南洋各大埠，登报日广求云，“凡存有经验良方，乞勿居奇守秘，请惠示济众，将药方及住址写明寄交余商店或报馆代转”。并言“予系要印送而非图利，凡有惠寄者待印就时当赠送一本”。月余之间，中外惠寄者千余方。编辑既就，拟托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

     新方编竣未寄，适上海世界书局派代表来洋招股，乃向其定印二万本，国币五千元。将新征各方抄一份，及验方新编一本，备交该局代表带去。数月后如数印就。除分送诸赠方者及余国内诸分行取去赠送外，约存一万本。以半数在闽省分送，半数寄来南洋应各处需求，已存无几。后接厦门某君来函云：“前日寄赠某方，其中某味药只重二钱，而所印书作二两，关系至重，请查谁错”。余乃急查原方单及书稿均为二钱，始知系世界书局印错。乃请人将全书查对，又觉印错不少，事关人命，抱憾无似。虽欲收回，然分散各处无法办到。即向世界书局严重交涉，只有认错而已；若认真计较，或需兴讼公堂，亦非余所愿，由是该书遂复失意停顿也。

       余原拟定印二万本，后以闽省各乡村如分发普及，须再印若干本，计全省作二万五千乡，小乡一本，大乡二三本，五六万本便可普赠，费款仅一万余元。不图前为日本中华会馆运寄失误，而后复为世界书局印错所沮，使余志愿末达。然终不能去怀，乃思重编自印。遂雇一略知医学之人及一书记，专工将新旧方斟酌校对，历经数月全书修正。交本厂印刷部经理陈辉煌君付印。乃挨延日久，及至余有限公司收盘，印刷部被南益购去，而所编书稿陈君竟失于保存，增余无限遗憾。再后战事发生更无暇计及，战后力能办到者，决重行登报征求编印，以遂宿愿也。

 余年三十七岁，即民国光复前一年春，剪去辫发，与清廷脱离关系。是年新加坡道南学校举余任总理。其时校中理事三十余人，后来改理事为校董，总理曰董事长。向黄仲涵捐款一万余元，购置校址。余乃提倡向闽侨募捐四万余元，建筑新校舍。其时国内学制虽已改革十余年，而南洋学校寥寥可数，新加坡只有广帮之养正学校，闽帮之道南学校，潮帮之端蒙学校，客帮之启发学校，琼帮之育英学校而已。女学校仅有广帮一校，余均未有。时社会甚幼稚，侨民只迷信鬼神，爱国观念、公益观念均甚形薄弱。

我国旧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即新历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民国光复。时闽省于近日间亦闻光复，其时中外消息尚乏灵敏，唯新加坡路透电有传报。住坡闽侨乃在天福宫福建会馆开会，组织保安会，举余为正会长，筹款救济闽省及维持治安。即发电福州问黄乃裳君：“闽省是否光复？都督何人？此间已成立保安会，筹款救济，复。”越日黄君回电云：“全省光复，都督孙道仁，需款急，请速汇。”即汇去国币二万元，并电云：“厦泉漳素多匪，乞维持治安，款可续汇。”越日孙都督回电云：“款收，漳泉已派某大员负责安全，请再汇巨款以应急需，至感。”月余之间，计汇去二十余万元。盖光复初，库空如洗，民心动摇，二万元收后，立即宣传“南洋新加坡汇来二十万元，尚有百万元可接续汇到”云云。由是民气更形兴奋，各处地方安定如常。至全省光复，只福州小有纠纷，立即平息，死伤甚寡。时南洋华侨爱国风气未开，故他埠闽侨未有响应捐汇。孙中山先生自欧洲回国，途经新加坡将赴上海，曾言到国内时如私人需款可否帮助，余许筹五万元。其后来电告予，将赴南京需费，予即如数汇交。

民国光复后余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自量绵力，回到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及经营海产罐头蚝厂。故就新加坡筹备全副机器，并向日本聘一海产技师，民国元年秋回梓经营罐头厂，数月无效（见附录）。集美社始祖自河南光州固始县移来，已历二十余世，男女两千余人，无别姓杂居，分六七房。各房办一私塾，男生一二十人，女子不得人学。各房分为两派，二十年前屡次械斗，死伤数十人，意见甚深。兹欲创办小学校，必须合乡一致合作，将各房私塾停罢。幸各房长听余劝告，于民国二年春所有子弟概人集美小学校，校舍暂假大祠堂及附近房祠堂开幕。学生一百五六十名，分五级，应聘校长教员七人，而同安全县师资连简易科毕业者仅有四人，一人改从商业，尚余三人，乃聘来两人。查同安全县人口二十余万人，只有县立小学一校，学生百余名，私立四校，学生三百余名，连集美共六校，学生不上七百名。师资既缺，学生亦少，成绩更不足言矣。

      余此次出洋十余年，对本省改革教育事，成绩如何多不知，及回梓办学，始悉教育不振之原因。如同安县立小学校，学生一百余名，十余年未有一班毕业生。其原因为权操县长，由彼委一绅士任校长，教员学生全由该绅招来，若更动新县长，则别委他派绅士为校长，全校更动，教员学生均散去。十年余间县长更动许多次，而该校逐次随之改组，故未有一班毕业。学制改革初期，以县立小学为模范领导全县，乃自身如斯腐化，不但无毕业生可升师范中学，且影响全县小学校成绩，其贻误可胜言耶！

 同安师资缺乏，闻他县亦多如是。而全省师范学校只福州一校，办十余年，在校学生三百余名，经费充裕，闽南学生甚难参加。漳州虽有一校，甫办末久，经费困乏，学生仅百多人，成绩鲜闻。余乃往福州查问师校成绩，及闽南学生如何难入。乃知自来腐败，迄今仍旧。该校自学制改革时，设立已十二年，学生常三百余名，学膳宿等费均免，奖励学生优厚，未毕业时声誉崇隆，似前清秀才风度，四年毕业后，约当举人资格。由是求学者争先恐后，每年招生二班八十名，多不公开招考，盖官僚教师及城内富人豪绅之子弟，早已登记占满，闽南人焉能参加。所收学生既无执教鞭之志愿，又非考选合格，程度难免参差、学业勤惰更所不计，只求毕业文凭到手，谁肯充任月薪二三十元之教师。故闽北虽有此校，而小学教师仍形缺乏。即使每年七八十人肯出任教师，亦是杯水车薪，况其中多属膏粱子弟，教职非其所愿。不知小学教师一职，唯有贫寒子弟考选后经过相当训练，方能收得效果。乃当局违背此旨，师资安得不缺乏。学制改革已十余年，以前之旧学先生日减，乡村私塾大半停歇，新学师校则腐败如此，吾闽教育前程奚堪设想！余常到诸乡村，见十余岁儿童成群游戏，多有裸体者，几将回复上古野蛮状态，触目心惊，弗能自己。默念待力能办到，当先办师范学校，收闽南贫寒子弟才志相当者，加以训练，以挽救本省教育之颓风。

余自省垣福州回梓里后，决意建筑集美小学校舍。然集美乡住宅稠密，乏地可建，且地形为半岛，三面环海，田园收获不足供二个月粮食，村外公私坟墓如鳞，加以风水迷信甚深，虽欲建于村外亦不可得。幸余住宅前村外之西有大鱼池一口，面积数十亩，系昔从海滩围堤而成。乃以二千元向各股主收买，做集美校业。从池之四围开深沟，将泥土移填池中，做校址及操场，高五六尺，俾池水涨时，免被侵及。即鸠工建筑校舍，可容学生七班，及其他应需各室。夏间完竣，全校移人。

民国四年天津水灾，新加坡华侨筹款救济，开游艺会及募捐，举余为主席，计募二十余万元。此为华侨开始不分南北畛域，及对祖国义赈破天荒之成绩，乃光复后民气进步之效果。回忆光复前数年，新加坡闽侨初拟办一小学校，在天福宫开会，资本家及富商多到，议捐开办费及基金，诸富侨咸都踌躇互相推诿，观望不前。有普通店东谢君有祥自动倡捐一千元，大众多仰其慷慨，盖自来捐助公益义风未振，许时之一千元不亚现在万元。于是资本家及富商不得不跟同认捐，最多者二千元，先后共筹三万余元，该校即道南学校也。民国光复之年，余任董事长，做第二次募捐建筑新校舍，筹四万余元，遂成立今之校舍。

民国二年秋余复南来。不久欧洲战事发生，余因租轮船及购置轮船，并因黄梨厂树胶厂颇有所获，故决意创办师范及中学等。民国六年春商遣舍弟敬贤回梓，负责建筑校舍，并函托上海江苏第二师范校长代聘全校校长教职员等。定期新春开课，师范生三班，中学生二班。至课室校址，则从鱼池地小学校舍后方及左右起盖，礼堂膳厅宿舍操场等，购鱼池后田地，填筑兴建。自此之后，所有以前风水迷信，及居奇阻挠各事概已消泯。凡学校所需地皮，比通常地价加倍给还，公私坟墓亦然，且酌贴迁移等费。故初时校舍多建在低田卑地，而后来则概在坡上。东与集美乡村毗连，西与岑头、郭厝二村相近，北多田地尚可扩充，南虽有坡地，然临海，不宜建筑，恐碍观瞻。

集美师中学校初办时，收师范生三班，中学生二班，中学生只交膳费，学宿费均免，师范生膳费亦免，各生不拘师中，所需被席蚊帐，概由校中供备，以资一律。至新招师范生，因鉴于福州省立师校偏僻，故力思改革，以期普遍。又恐殷实子弟志愿有乖，毕业后不肯服务教职。乃函告闽南卅余县劝学所长，请于每一大县代招选贫寒学生五六人，小县三四人，共一百廿余人，并烦注意人选，详填履历，到校时加以复试，凡违背定章或不及格者决不收容。经如此严格取缔，故各县选来诸生大都相当不错。再后逐期招师范生仍依此例，数年后已无须防弊，始取消此规例。至南洋华侨小学毕业生，如有志回国升入中学者，则由新加坡本店予以介绍函，概行收纳，到校时如考试未及格者，则另设补习班以教之。此为优待华侨派遣子弟回国而设，此例永存不废。

民七年夏初舍弟不得已亲往上海别聘校长，其他教职员亦由该校长负责聘委，准秋间来校接办。秋季开学后，冬初接舍弟函云，“新校长及教师比前好些，但教师尚有缺点。校长自承认仓促托人聘来，故有此失，待年假伊回上海亲自选聘”云云。余则认为不妥，复函舍弟云：“聘请教师非同市上购物，可以到时。选择校长若能用人必及早行函往聘相知，如脑中乏此相识者，则函托知友介绍，非充分时间不可。况年终时稍好教师设有更动，早被他人聘定，决无待价而沽之理，希告知之。”迨元月校长回来，云好教师难觅，并通知暑假辞职，嘱我及早别聘校长等情。

余既鉴于闽南师资缺乏，而中等教师想更困难，且素居南洋，与闽省教育界绝不相识。兹欲办师范中学，需用校长教师多位，不得不托人由外省聘来。素闻江苏学校发达，教育称最，南洋小学教师多向该省觅聘，如本坡道南学校教员，亦由上海聘来。乃往询道南某教师，彼由何处何校出身，答上海江苏第二师范学校。余即修函托该校校长代聘校长及教职员，准民七春开幕，蒙复函接受，即派筹备员来集美筹备一切。开学后觉教师多不合格，办理上亦多失妥。缘与集美小校十数教师比较，优劣易知，幸立约仅试办半年耳。

余接舍弟函告后，适黄炎培先生南来，不日将回上海。黄君为江苏教育会副会长，在教育界鼎鼎有名，曾办一职业学校，余认捐一万元，故颇相知。教育事业为彼最注意之任务，南来视察原非他事，余故将集美学校经过详情面告，且告以欲急进扩大规模，求其代聘校长教职员，承蒙许诺。余又告以再后两三月将回梓里。黄君约到厦门时可电知，彼或亲来集美参观。余又致函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查询“本学期贵校闽省籍有何科毕业生若干人，肯来集美服务否？”蒙复知有五人。五月间余回梓立电知黄君，黄君招同学友陆君来见，云校长未聘，教师聘定二人。而集美已定六月一日放假，相距只数天，全校教职员大都辞退，秋季又拟再招新生三班，统算全校教职员须四十余人。余不免情急，乃转商黄君，校长仍托彼代聘，其他教职员可就地尽量聘请。黄君赞成之，于是将旧教师选留二十余人，并电北平聘请五人，又托人就本省内再聘数人，尚缺六七人，即电上海黄君访聘，八月杪开课，黄君仅聘到一校长及教师五人耳。

 新校长为浙江人，系北京高师毕业，曾留学日本，原籍泉州，故能说泉州话。到校后余告以“现尚缺教师数人，新春拟续招新生两三班，省内教师已乏，请于省外预早谋聘”。迨将近年终，余讶其无何表示，复提两次亦无确息。不得已乃托人代觅数人，由校长聘来者仅两人而已。余见彼才干庸常，办理校内事无何可取，对外聘请教师又短绌，此种人才若任一小规模学校或可维持，若集美学校日在进展，绝非彼所能办。余由是优虑焦灼，不可言喻，盖未及两年已三易校长，外间难免讥评，而不知当局负责苦衷。但虽焦虑萦怀，亦未便轻向人言，再觅校长既无相知人才，屡屡更动又恐不合舆论，惟含忍静待而已。乃至春未，彼竟来函云至本学期终愿辞职，其原因为顷间与国文主任发生刷烈争诟，意见既深，难以共事，余复函婉劝而不挽留也。

由上述经验，渐觉集美校长从外省聘来实属错误。盖校长既用外省人，教师亦当由外省聘来，本省虽有良教师，校长亦不能聘用，从外省觅聘许多教师，又甚觉困难。好教师多不肯离乡井，间有愿来者，多不待期终回去。原因多端，或思恋家乡，或被旧校或母校函电催返，此为两年来常有经验。故虽诚挚如黄炎培先生，亦爱莫能助。余既明白了解此弊，今后绝不复向外省求聘校长。拟待本省有相当人才，然后慎重聘请，否则虽暂时虚位，亦属无妨。故秋季仍添招新生积极筹备，并托人于省内外预聘教师，新校长虽未聘，余心颇宽舒无甚焦虑。迨暑假既近之日，适安溪叶采真先生来厦，因友人介绍初次识面，同余来校参观，余又送其回厦。在电船中往返言谈，已略识其才干，并认其有负责气魄，即聘为校长，校中一切信任办理，余绝不干预，集美学校从此安定矣

余以本省海岸线长，渔利航业关系非尠，故拟办水产及航海学校。乃致函上海吴淞水产学校，托代聘一二位教师，据复函云，水产教师国内无处可聘，伊校亦甚需用仍付阙如。现有两位高才生本届可毕业，如有意，可资以经费往日本留学，两年后便可回来任教师。余即回函应承。故民国九年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得以开课。并向德国购全副机器，在厦门造渔船一艘，为全班学生出海实习之用。此种学校闽粤均未有开办，恐招生不易，故待遇同师范生，学膳宿均免。四年将毕业时，念该生等恐乏出路、特向法国购捞鱼轮船一艘，来厦捞鱼，成绩不劣，每次来回数天满载海产物三百余担，多系大鱼，素所罕见。第以厦岛销路短少，他处交通不便，不但售价廉宜，尚须约十日方能售完，冰块尤贵，每吨十五元，不唯乏利且须亏本、余原非为自家营业计，系出于提倡之意，原拟如有利，则招各鱼商组织股份公司，扩大渔业，不图竟无利可获，乃将该船驶往上海捞鱼。其后水产航海学生毕业后，均有出路，而尤以航海为易。然每年毕业仅一班二十余人，其原因为本地渔利未畅，故向学者少，或志愿不坚畏怕风浪，致未毕业便去也

  我国素称以农立国，然因科学落后，水利未兴，改良无法，故收获不丰，民生困苦。本省虽临海，农业实占一大部分，尚乏农林学校，以资研究改良。余对于农科尤为注意。民十二年函告叶校长，在天马山或美人山麓择地开办，土质虽欠佳，可以肥料补助。此事筹备建设等费去十余万元。开课后疾病频发，尤以疟疾为酷，历年如是。虽学生热诚向学，而阻碍非轻。且自开办以后数年间，闽南治安不良，盗匪纷乱，校内物畜屡遭抢劫，阻挠学业，亦一原因。否则农校毕业生更有出路，各县需用不少。兹拟待战事后，极力设法消除毒蚊，冀可挽救而谋进展。

美学校自民国九年，添办女师范及幼稚师范，其待遇与男师范同，又办商科，待遇则与中学同。唯小学校规定不收客生，盖小学校应鼓励各乡村自办为最要，集校如收纳，不但不能容多人，如外乡有钱子弟多遣来学，便失在乡提倡之义，反有损无益，且能占去中学生寄宿位。若南洋侨胞有意遣回子弟就学，以及教职员家属，则尽量接受之。余曾往厦门参观日本人一间小学校，学生百余人，大半我华人，校长教师三人为日本人，余教师则华人。校中玻璃橱内陈列山海各种标本不少，余询从问处购买，校长答概系件与两日人教师在本地采取制成，只玻璃橱为购得者。伊等三人各任一部从其所好，如海产诸物、陆上动物及矿产等。每星期日自动负责采取，校内裁花不少，亦系学生工作。余见此情形异于我国教师乏自动性，颇生感想。余在新加坡所识美教会那牙校长，连分校学生数千名，终日事务丛脞，而星期日倘招一班学生补习，彼则义务亲教之，其自动负责勤劳如此。我国教师任务既异外国人，而学生又风潮时起，全国汹汹效尤，尤以民国八九年至十四五年，此七八年间为甚。教师既如此，学生又如彼，社会报馆不辨是非，政府机关得过且过。私人负责办学既属少数，或认捐多少钱为己尽责。若余亦何独不然，虽明知其弊亦无法改善。转念质虽欠佳，而量则愈多愈妙，所谓聊胜于无。余既明白了解斯义，故一意热诚致力，毫无反顾，绝不因学生罢课，校事乖舛，财项有些差弊，便即缩手灰心。窃度民国初基，政局未定，质虽有差，量不可无，如水太清则无鱼，欲速反不达。华侨一富商住居鼓浪屿，在故乡南安办中等学校一所，甫办未久，因钱财有何差错，曾对余叹息曰：“吾侪前云赚钱难，今日方知用钱更难也。”后竟停办。盖立志不坚，且不了解过渡时期之应有困难，难免不因噎而废食也

 余为提倡及改善闽南教育计，派人调查县立小学办理不善者，助费改善之，或另设模范小校为领导。泉州有一私立中学，系诸学界人苦心创办，成绩颇好，后因经济困难，将停止，余念泉城为文化之区，不忍放弃，故捐资维持。同安本县华侨在南洋众多，富商及中等商人不少。余乃提倡全县十年普及教育，按每年创办小学二十校，每校平均至多助费一千元，十年二百校，从中富侨自己创办者按五十校，尚缺一百五十校，十年之后每年十余万元。以同侨财力一人可以负担，况富侨百数乎。乃将此计划函告新加坡同侨征求同意，捐资分特别捐及常月捐两种，待进行顺利后，推及马来亚及荷印安南缅甸菲岛等处。由民国十年至十一年两年创办四十余校。而新加坡同侨认特别捐三万余元，常月捐每月数百元。迨收款经年之久仅二万余元，余多互相观望或推诿，除极少数营业不佳外其他亦拒绝不交。为此当然不便推广续捐，而在乡增设学校亦即停止矣。

民国十年秋厦门市政会将开彩票，事前各日报未有登载，余亦绝未闻知。是早余往观厦大建筑校舍，忽见市街上贴一大张广告，标题曰“奖券”，详视乃知是月杪将开彩票，距离只二十余天。此系最初次开彩，售票四万元，再后每月定开一次，可增至若干万元，则视销路而定。其广告中极力宣传，如“大公无私”，“主持者概系厦中名人”，“费少利大，利权不致外溢”，极力鼓励推销。余乃往见各日报负责人云：“此种彩票乃大赌博，将来贻害闽南非少，况厦门台人横行，更有所借口。市政局系欲利益民众，兹乃首启祸端，请贵报著论驳斥。”越日，各日报绝无一言。余不得已乃致函市政会（办事处设总商会内），劝其取消，并请答复，越日亦无消息。余复致函其主任，告以日期已迫，请速复，亦不理。余不得已乃作文将其广告中逐条驳斥，并详述将来利害，月月增加，可售至数十万元，吸收全省膏血，贻祸至大，而尤以贫民为甚。劝民众勿被欺诈，以消弭惨祸，该局如不从劝告取消，余当别筹对待之法云云。此文缮就后送各日报发表，另印多张分送市民及市政局董事。余意此文发表后，再看几天，如无相当表示，拟召集厦门民众大会，讨论彩票利害。如未达目的，则再召集学界，或鼓励学生示威反对，或待其开彩时破坏之，缘彼要开票必须在公众场地，任人参观，以昭公允，而扬声价也。不意该文发表后，不但无人续购彩票，而前日已购诸人且纷纷退回，两三日内退回者大半。盖彼系托厦市各钱店销售，十余日间已售出七八成，再数天立可售完。方自鸣得意，谓厦门一埠如此易售，将来普及全省定可增许多倍，视余之反对置之度外，不图各钱店纷纷将彩票退回，于是急召集市政董事开会，全体三十余人齐到，为该会破天荒之盛举。董事中多有住厦门之南洋富侨者，结果无法支持，唯开办费四千余元，由某富侨负责收场。可见我国政府社会豪绅虽坏劣，若遇事肯见义勇为，出而公开纠正，则民众定不盲从，少却许多苛政祸害矣。事后余因建厦大校舍用料，往厦门海关查询税饷。该关主事英人，见余甚表敬意，云伊前日阅报见余逐条驳斥彩票之害，深为感佩。余云实出于不得已，非故欲开罪于许多绅豪。渠云西哲有言：“当为人模范，勿模范于人。”君实堪为贵国之模范人物云云。足见洋人之乐善，虽异国事亦能表同情也。

民国八年夏余回梓，念邻省如广东江苏公私大学林立，医学校亦不少，闽省千余万人，公私立大学未有一所，不但专门人才短少，而中等教师亦无处可造就。乃决意倡办厦门大学，认捐开办费一百万元，作两年开销，复认捐经常费三百万元，做十二年支出，每年二十五万元。并拟于开办两年后，略具规模时，即向南洋富侨募捐巨款。窃度闽侨在南洋资财千万元，及数百万元者有许多人，至于数十万元者更屈指难数，欲募数百万元基金，或年募三几十万元经费，料无难事。而校址问题乃创办首要；校址当以厦门为最宜，而厦门地方尤以演武场附近山麓最佳，背山面海，坐北向南，风景秀美，地场广大。唯除演武场外，公私坟墓密如鱼鳞。厦门虽居闽省南方，然与南洋关系密切，而南洋侨胞子弟多住厦门附近，以此而言，则厦门乃居适中地位，将来学生众多，大学地址必须广大，备以后之扩充。然政府未必肯给全场地址，故拟向政府请求拨演武场四分之一为校址，乃在厦门开会发表此事。

政府既许拨演武场四分一为大学校址，乃托上海美国技师绘校舍图。其图式每三座做品字形，谓必须如此方不失美观，极力如是主张。然余则不赞成品字形校舍，以其多占演武场地位，妨碍将来运动会或纪念日大会之用，故将图中品字形改为一字形，中座背倚五老山，南向南太武高峰。民十年五月九日国耻纪念日奠基。左右近处及后方坞慕石块不少，大者高十余尺，围数十尺，余乃命石工开取做校舍基址及筑墙之需，不但坚固且亦美观。而墓主多人来交涉，谓该石风水天成，各有名称云云，迷信之深难以言喻。余则婉言解释，至不得已则暂停工以顺其意，迨彼去后立再动工，因石众多，两三天大半都已破坏，虽再来交涉亦莫可如何，惜然回去。数月后拟再建其他校舍，不得不迁移坞墓，为屋址，乃将演武场后诸公私冢墓，立碑标明，限日迁移，并在厦门登各日报，如不自动迁移，本大学则为代迁，并规定津贴迁移费。且在数里外之山腰买一段空地，备作移葬地位。从此顺序进行，依限自迁或代迁，绝不致再发生交涉，或其他事故矣。演武场地界面积约二百亩，下系沙质，雨季不湿，平坦坚实，细草如毡。北负高山，南向洋海，西近厦港许家村，东系山坡及平地。昔为阅兵场，自厦门与洋人通商，兼作跑马场，后来阅兵与跑马均废，被洋人辟为“哥耳夫”球场，厦大建筑时概已收回。教育事业原无止境，以吾闽及南洋华侨人民之众，将来发展无量，百年树人基本伟大，更不待言，故校界之划定须费远虑。西既迫近乡村，南又临海，此两方面已无扩展可能。北虽高山若开辟车路，建师生住宅，可作许多层级由下而上，清爽美观，至于东向方面，虽多阜陵起伏，然地势不高，全面可以建筑，颇为适宜。计西自许家村东至湖里山炮台，北自五老山，南至海边，统计面积约二千亩，大都为不毛之公共山地，概当归入厦大校界。唯南普陀佛寺或仍留存，或兼作校园，至寺前田地，厦大需用时，则估值收买之。厦门港阔水深，数万吨巨船出入便利，为我国沿海各省之冠。将来闽省铁路通达，矿产农工各业兴盛，厦门必发展为更繁之商埠，为闽赣两省唯一出口。又如造船厂修船厂及大小船坞，亦当林立不亚于沿海他省。凡川走南洋欧美及本国东北洋轮船，出人厦门者概当由厦大门前经过，至于山海风景之秀美，更毋庸多赘。日后如或私人向任何方面购买上节所言校界范围山地，建私人住宅，则当禁止或没收之，以免互相效尤，因私误公也。

 汪精卫在新加坡原与余相识，民国九年来漳州访陈炯明，余邀到集美参观。回去后来函告予愿任厦门大学校长，余复函应承，其夫人亦来住鼓浪屿。然不久因粤军回粤成功，彼便来函辞职，谓将回粤办政治无暇兼顾。由是厦大乃组筹备委员会，举蔡元培、郭秉文、余日章、胡敦复、汪精卫、黄炎培、叶采真、邓萃英、黄孟圭等为筹备员，在上海开会，举邓翠英为厦大校长。邓君即派郑贞文、何公敢两人来集美筹备一切。时厦门厦大校舍未建，拟假集美校舍开幕。民国十年四月六日，厦大在集美正式开幕。适美国杜威博士游历上海，故请来校参加，邓校长亦于近甫日到。学生一百二十名，闽生约占半数。闻邓校长开幕后即将北返，彼原为北京教育部参事，当筹备委员会公聘时，关约声明须辞去教育部职务，然彼未有辞印，故欲急回，而厦大校长居然由他挂名，校务交郑何二君。此种挂名校长虽他处常有，若厦大当然不可。郑何二君知余意志，力劝彼暂留勿回，迨至月杪邓君接学生无名函，骂他无才学且欲作挂名校长，若不自动辞退，不日诸生联名攻击，列首名者即是我，邓君于是来函辞职，余亦不留也。

邓君既去，余即电新加坡请林君文庆担任校长，林君于秋间开课前来到。开课后召诸生口试英语，问你从何方来，不能答，复问何姓名亦不能答，而尤以闽省诸生为多。当时中学为四年制，故大学新生须先读两年预科，厦大新生当然在预科两年，然后升入正科。依部章中学生四年毕业，英文已有基础，兹乃粗浅英语尚且不晓，其程度可知，虽读二年预科何能及格升入正科。细考缘由，闽省诸公私中学，对英文教授，多不认真，虽厦门省立十三中学亦然。其原因多为经济关系，盖英文教师每月薪俸八十元，月终便要支清，不似中文教师薪少且可拖欠也。厦大为即此函告闽省各公私中学，从速改善免致贻误青年，此为厦大甫办，影响闽省教育之初步也。

厦大开办时，南洋富侨回居厦门鼓浪屿者颇多，资产千万元以上者三人，百万以上者更多。有某教育家素与富侨交游，屡告余伊拟向某富侨募二三十万元，厦大当然不能专赖君一人负担。余答向富侨募捐，余于开会倡办时，已有明言，惟现下时间尚早，机会未到，君意虽佳，勿作无益要求。后复余言伊经向某君提议，或有相当希望，然结果终成泡影。民十一年春厦门厦大校舍一部分完竣，厦大由集美移来。不久余复南行。约近年终有一位荷印富侨，原籍同安县灌口区，自前年移居新加坡，富冠全侨，资产称万万元以上，是年获糖利二三千万元，余与相识后认为此机不可失，乃写一长函送他，其中详述本省教育大概，及厦大之重要，并云西哲有言，“言凡人有诚意办公益事，当由近处作始”，君祖同安，厦岛前原属同安，请捐五百万元为厦大基金，否则多少随意，抑捐办医学一科，以为君纪念。彼接函后只嘱其商行经理用电话告余该函已收到而已。渠虽侨生，但曾略受过我国文化。其后余托友查询，回报绝无意思，不久竟谢世矣。时厦大开办已近两年，余始敢向该富侨劝募，不意此乃为第一次之无效也。

民十三年春，余因树胶制造厂扩设分行，往游荷属爪哇各埠，先到吧城次至万隆。在万隆商会内遇一富侨，原籍漳州，自少来洋，年近六旬，余早耳其名，闻其资产二三百万盾，惟系初与相识。越日邀余到其住家午饭，亦颇诚恳，并言平生经历及家运不好，无亲生男儿，在梓里伊兄弟送一侄为嗣，养至去年十九岁而夭，现存一女寡居，拟续觅一佳婿，伊年纪已老，将遗业付托了事云云。余回旅馆后复萌为厦大捐款之想，即托人向该富侨请捐建厦大图书馆一座，多者十万盾（其时国币与荷币略同），少者六七万盾，一年中陆续汇交。伊兄弟在厦门开钱庄，林文庆校长亦其知友，该款绝不至落空。图书馆可标伊姓名捐建，既可永作纪念，亦可作厦大募捐提倡之例。自开办已四年，余捐输开办等费百余万元，未有标余姓名一字。伊如有意认捐，余当面陈较详。越两日回报无效。又十余日余复到万隆，别托一人重向该侨提议，或降减额数亦可，盖为此机若失，余不复来，结果徒劳往返。此为余代厦大向富侨募款之第二次无效也

余离万隆埠往东爪哇泗水，侨领多来相访，有一位富侨原籍同安城，年四十余岁，甫自梓里复来两三月，对于集美、厦大两校规模他当亲身历见，因其为出入必经之地也。彼原为泗水富侨，是季复大获咖啡净利数十万元，闻资产可三百多万元，亦无亲生儿子，惟螟蛉两人尚幼。余不因万隆募捐失望而灰心，而尽为厦大奔走之责任，冀可达目的。乃托一闻人向该侨劝募，所提之事，如在万隆，不意亦竟拒绝，不数年已身故。南洋富侨以爪哇为最多，而爪哇巨埠以吧城、三宝珑、泗水、万隆、四商埠为最富庶。吧城余已经过，富侨除侨生外，乏相当可劝募者，三宝珑富侨已在厦门及新加坡试验矣，兹复经万隆、泗水亦不济。不但希望向富侨募捐数十百万元为基金归于失败，而仅此十万八万元或四五万元建图书馆尚困难如此。所可怪者我国人传统习惯，生平艰难辛苦多为子孙计，若夫血脉已绝，尚复代人吝啬，一毛不拔。既不为社会计，亦不为自身名誉计，真其愚不可及。此为第三次向富侨募捐之无效也。

余为厦大向荷印富侨募捐既如上述，至于马来亚闽人富侨远逊荷印，资产上千万元者未有，百数十万者却不少，若向其募捐巨款绝无效果。余不但筹之熟且知之稔，故不作无益请求。如粤籍富侨上千万元者有数人，然不免有省界畛域之见，况闽籍富侨袖手，彼必更可借口，故我更毋庸问津。余回忆前年倡办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曾同粤侨数人向一富侨募捐，希望可惠数万元，结果空手而回。该富侨近年谢世，遗产新加坡币六千余万元，被当地政府新增遗产税，抽去四千万元。至他属如暹罗、安南、缅甸、菲律宾等闽人富侨亦属不少，以尤富者数人而言，余早略知其志趣，比较荷印富侨如五十步与百步。余自倡办时即宣布待两年后规模既具，余牺牲二百万元，即向富侨募捐。迨时机已至，实践前议，则到处碰壁，自恨以前之理想失败，夫复何言。余上所言系民国十五年以前之事。自十六年之后，世界景气日非，悲惨之象日深，富侨破家荡产难以数计，其他虽可维持，损失亦多，对于厦大募捐巨款事，更觉灰心无望矣。

  余之营业自民十五年起，至二十二年终，此八年间如江河日下，不但无毫利可长，且逐年亏蚀及支出百余万元。计有四项损失，货物屋地降价，厦大及集美校费，银行利息，每项每年三四十万元，合计八年一千余万元。马来亚事业之荣枯，关系胶锡两物产，而尤以树胶为重要。民十四年树胶每担价二百元，逐年递降至民国十九年，每担价十余元，后再降至七八元。当市景繁盛时，马来亚政府发出流通纸币一万万七千万元，迨民二十年后降至五千余万元。居民比前加多而枯竭凄惨不可言喻。外国银行因余侵欠巨款告予停止校费，余不可，故民国二十年秋改作有限公司，银行亦参加，并举多人为董事，规定校费逐月坡币五千元。（申国币七千余元）然厦大逐月尚需二万五千元，集美一万余元，共三万余元。除国府补助五千元，其他收入二千元，有限公司七千元，共一万四千元，尚不敷二万二千元。至民国二十二年终，有限公司收盘，计二年余用去六十余万元，此系由马六甲曾江水亲家捐十五万元。叶玉堆先生捐五万元。（两条申国币三十万元）厦门厦大校业变卖十余万元，集通号（在厦专理两校财政）向人息借二十余万元，此乃余极力维持两校之实在情形也。

 自有限公司收盘后，余即函请厦大校长林文庆来洋募捐，数月后结果，新加坡募国币十万元，马来亚十五万元，然催收经年，马来亚仅十余万元，余作罢论，共实收国币二十余万元。而厦大经费已缩至每月二万元，集美六千元，除国府补助及其他收入，逐月尚不敷二万元。集通债款又须陆续清还，幸灰余红利（前生胶厂租人订抽红利）上半年颇好，故聊可支持得过。民国廿五年买树胶园四百英亩，成本十六万余元，拟作厦大基金，每月入息约二千元，该款系向李光前、陈六使各捐五万元，陈廷谦一万元，李俊承五千元，不敷由余凑足之。民国廿六年春，余念厦集二校虽可维持现状，然无进展希望，而诸项添置亦付缺如，未免误及青年。若政府肯接受厦大，余得专力维持集美，岂不两俱有益，此乃出于万不得已之下策，乃修书闽省主席及南京教育部长告以自愿无条件将厦门大学改为国立。过后未有消息，适孔祥熙院长将往欧洲贺英皇加冕，轮泊新加坡，余下船送行，彼对余云厦大事，行政院已通过。再后接教育部长来函，并委派萨本栋君为校长订暑假时接收，余即函知林校长预备交卸，交卸后而七七战事已发生矣。厦大自民十年开办，迄余公司收盘，适十二年足，及至交卸共十六年有奇，余支出款项，适与当时认捐四百万元数目相符，其凑巧如是。每念竭力兴学，期尽国民天职，不图经济竭蹶，为善不终，贻累政府，抱歉无似。回忆古语云，“善始者不必善终”，亦聊以自解耳。

英属马来亚以新加坡为首府，初时对教育甚形敷衍，如历史、地理、化学，与及诸开化智识极少教授，学校教科书只教服务公役书记。迨后美国教会学校开办较为提高，故政府学校亦不得不改善多少，但对于地理及化学等，虽中学生亦无由问津，比较菲律宾美国人之设施相差远甚。民国七年美教会校长那牙君来访余云，马来亚乏一大学至为可惜。该教会久欲倡办，碍于本坡捐款困难，故目的未达。如有坡币一百万元绝可成立。在美国教会机关愿捐半数五十万元，当地亦须捐得五十万元方能成事。渠筹谋已久，坡侨富人多推诿不肯先捐，恳余首捐十万元，渠自有办法，余即应承，但声明以该大学须兼教中文科，所捐十万元做该科基金为条件，渠亦接受，乃由律师立定合约做十年交清，每年交一万元，约字中声明如办不成，须将原款及利息交回，由其主教与余签押作据，即交去首期坡币一万元。美主教与余签约字后，该校长转向他侨募捐，个人认五万元者已有数人，甚他两三万元者亦有多人，不久之间五十万元业已募足。考其成绩如此优异之故约有数端：一、大学设于本坡侨生必多获益；二、主持者为西洋人信用素著；三、美教会办中小学已久，成绩规模为全马冠，富侨子弟多其学生。有此三项故目的易达。于是积极进行，一面向当地政府请注册开办大学，一面在市区外购置地址数十英亩费十余万元，即绘图拟建校舍，据言一年后即可开幕。不图英政府对注册事拖延年余，始驳回不准，云大学事英政府欲负责创办。盖认为最高学府容外国人设立，于国体有关，不似我国政府社会茫不知耻也。美教会遭此意外，逐打消计划，所收捐款应当交回。余已交三万元，乃来询可否将母利捐送其中学做理化基金，余应诸遂不收回。

新加坡英政府既不许美教会办大学，欲自行开办，当然有相当之筹备，庶不使民众失望，乃延至民国十四年始克成立。迄兹几二十年，所办仅文科理科学生不上百人，且理科多为医学之预备生。该大学无论其质如何完美，然对于量之设施，及扩大收容，必非其立心本意，第不过敷衍塞责了事，维持其殖民地教育本来面目焉耳。当时若许美教会开办，必能推诚积极多设学科，宽容收纳如菲律宾诸大学之进展。至于经费问题，美国方面既负担半数，而南洋诸富侨及该校学生，既感其培养成绩，亦必有相当协助，可惜失此良机，否则；迄今二十余年我华侨人才不知将养成多少矣。

民国光复前清学制变动后，南洋华侨学校寥寥无几。光复后略有进展，概属小学校，马来亚未有正式中学。民国七年余乃招多位侨领，在新加坡倡办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募款五六十万元，向上海聘请校长教师，越年春开幕。自是之后，南洋各处不但中等学校继起设立，而小学校亦更形发展，几如雨后春笋。前年统计约三千校，学生男女数十万人，较我国内地任何地方为普及。其经费概由侨胞募捐，绝非政府帮助。迨至近年马来亚政府始有择校津贴，每生全年不上十元。至能如此发展原因，约有数端，有因各地方或各会馆互相竞争比较者，亦有因校内校长教师发生意见另行创设者。至于经费问题，则受厦大、集美之影响，亦较前容易募捐。加以教师易聘，与民国十年以前大不相同。本省华侨所办学校，多用本省人，不复如前须向上海远聘。校内教授则用国语，现下南洋国语到处可以流通，较之祖国某省学校，尚有用方言教授者大不同矣。

 南洋华侨最多为暹罗，次则为英属殖民地，再次为荷印。暹罗华侨设立学校原本落后，后受各处影响，及民国光复，民心内向，颇见进步，故对中文教育亦知注意，于是热心创办校者日多。数年后暹政府嫉忌心生，多方取缔，校长教师须用识暹文者。再后亲日派操权，愈增苛例。及中日战事发生，更因媚日而虐待华侨，所有学校尽行封闭矣。荷印自来以不平等条例虐待华侨，荷政府所办学校，不许华侨子弟参加，唯许侨生入学。民国光复后，我侨创办学校日多，始取消禁例，然对我国教师入口颇多刁难，故学校之进展，不免受其阻碍。英殖民地对教育方面则较形宽放，虽校长教师须经注册承认，若无不法行动，却亦无何干涉，且时常派视学员到校视察，对卫生上甚加注意，唯三民主义书籍不许教授。至于经费近年来颇有择校津贴，有相当董事及办理良好者方得享受。故马来亚华侨学校比他属更多。法属安南华侨教育虽稍逊英属，然当地政府无取缔之苛例。美属菲律宾政府重视教育，一律待遇，有教无类，其诚意优待为南洋冠也。

南洋华侨教育既如上述，量数虽略有可观，质的方面不免尚差，其原因不外各自为政，泛而无统，或董事校长任用私人，或因陋就简，种种弊端，颇为不少。盖无教育会之机关为监督领导，亦无我国政府视学员为之纠正，且各校经济概系自筹，既无资助财力，虽有教育会亦等于无。至我国政府虽鞭长莫及，若责委所在领事馆何尝不可。无如我政府既无此远图，而素来领事官大都不满人意，不但不能称职，尚多露出丑状，贻华侨羞。间有一二称职者，则不能久于其位，唯能敷衍应酬，虚伪浮沉者乃得久任。外交官僚既如上言，不但不能改善华侨教育，且有反生陷害者。新加坡有一中正中学已办两年，学生五六百名。“中正”二字校名系倡办人托林君文庆，呈请重庆蒋委员长同意。而校内一位教师为总领事高凌百内亲，被校长辞退，总领事不满，则电请蒋公取消校名，云该校专为造成共产机关。取消电文既到，立即送交各日报发表，以为该校便即瓦解。不图以此事妨碍当地提学司名誉，致提学司甚为不满，董事长亦以被诬拒绝取消，教师学生更形坚持，仍旧开课，其贻羞国体为何如耶。

民国十七年夏，蒋委员长将兵北伐，日本恐其成功，借保护日侨为名，派兵入济南，阻挠北伐军，并惨杀外交官蔡公时及许多民众，占据济南城。新加坡发起筹赈会召集全侨大会，名为“山东惨祸筹赈会”，举余为主席。两三月间筹捐国币一百三十余万元，概汇交南京财政部施赈。自筹赈会成立后，新加坡树胶公会议决，每担抽一角交筹赈会助赈，每星期汇交一次。初时依期来交，迨后则迟延日期。及日寇退出济南，筹赈会将结束，树胶公会存款六万余元，任催不交，盖因掌财务者两三人不能一致之故。其后蔡公时夫人来新加坡募捐，拟为公时办一中学做纪念。余乃召集大会通过。将树胶公会未交款数，捐作公时中学基金。再后多月树胶公会尚未交出，适华北豫陕甘旱灾，新加坡总商会组救济会，因负责者不善办理，成绩甚少，乃异想天开，谋取树胶公会存款移作救济。竟不明向余等磋商，私写约章运动数位胶商盖印承认。由是盲从签同意者七八十家，踌躇未签及反对者五十余家。首谋诸人扬扬得意，谓大半赞成便算有效。余乃登报声明该款乃山东惨祸筹赈会存款，业经某月日大会议决，捐作公时学校基金，已登报表明在案，树胶商无权擅移别用。倡谋诸人尚不甘休，屡向树胶公会迫取，该公会乃传集诸胶商开会解决，结果通过仍交还山东筹赈会。越日树胶公会开和丰银行支票一纸六万余元来交，余即转交和丰银行登入山东筹赈会来账（筹赈会始终系与和丰银行来往，树胶公会亦然）。迨至越日和丰银行始将该支票驳返，余则将原票送回树胶公会。该会主席向和丰银行交涉无效，乃以法律控告和丰银行于案，涉讼多月，和丰银行败诉，然尚不休再行上诉，后又失败。至此已拖延两年之久，树胶公会再开和丰银行支票仍旧将六万余元来交了事。此场讼案和丰银行经理在公堂被原告律师鄙辱至于无地，以为经理银行资格，复以感情作用，捣乱商业程序。盖银行可越日驳回支票，系甲银行与乙银行之例，若同是该银行出入，因故要驳回支票只以本日为限，若越日则不可也，此乃银行普通条规，稍有常识者皆能知之。然和丰银行董事长及正副经理等，非不知此粗浅常规为逐日出入支票常例，第因受人嘱托，感情用事，竟置法律于度下。闻系其夜董事及经理受对方友人要求，乃不顾损失颜面。华侨如此程度，莫怪被洋人轻视也。

和丰银行既败诉，将款交还山东筹赈会，对方等复挣扎不休，唆使某树胶商延律师阻止该款，不得汇祖国，须留存本坡，其理由谓济案已息，不需救济，且不得捐作别用。余由是不得不以法律解决，讼案由粤侨总务员负责办理，兴讼经年，对方败诉，再行上控复失败，纠延三年余，最后该款仍由筹赈会汇交南京政府财政部了结。至公时夫人所办中学已停罢，故请财政部仍赈济山东难民。树胶公会管财人为拖延不交，致与和丰银行涉讼，继复弄出胶商与筹赈会涉讼，前后拖延五六年。和丰银行及胶商等开讼费四万余元，筹赈会亦费二万余元，诉讼目的物之该存款额数只供洋律师支尽。当和丰银行驳回支票之初，树胶公会将诉诸法律。一日“华民政务司”某君，与数位名律师在西商会楼上午饭。政务司某君言，树胶公会与和丰银行交涉案，渠将为斡旋了结。某名律师答“干汝何事，我侪方将开一金矿，尔勿破坏”云云。所可痛者，吾侨程度参差，好生意见，往往与无谓讼案，耗无数金钱与洋人，并遭受耻辱而不悔耳。

 “济南惨案”发生，蔡公时先生被日本惨杀，全国同胞异常悲愤，新加坡华侨组济案筹赈会已如上述。从中两次汇款六万元，给公时家属一万五千元，余分给同伴被难家属。又筹三万余元将在南京择地为公时立铜像。嗣后因公时夫人举动不端，学校既做罢议，像址及建造亦无可付托，故年复一年，至民廿五年存款除向德国购铜像四千余元（铜像现寄存新加坡三条巷南益胶厂），尚存三万元。适厦大购柔佛树胶园十六万余元，不敷三万元，保款人广客闽四人，同意借该园生息。后该园转归集美学校，民卅年将款收回，计母利三万七千余元，寄存中国银行后移交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收存。该会于新加坡失守时，尚存华侨及中国两银行十余万元。

 鸦片流毒我国，民众受害最惨，清末经与英及关系各国公约限期禁绝，我国雷厉风行笃著成效，适民国光复，军阀割据，故有多处种植鸦片，死灰复燃，此系国体改革暂时不幸之变动，南京政府成立后，即实行严限几年内概行肃清矣，南洋英殖民地马来亚，对禁绝鸭片事无意实行，仍旧公卖，每年获利千余万元，概系我华侨之脂膏，民十七年欧洲国际联盟会，特派与鸦片利益无关三国，每国一位计三位代表，来马来亚调查究竟，是英政府贪此利权，抑是华侨必需品，新加坡政府事前组一委员会，多方召诸烟民来问：“吸鸦片是有益或有害？”如答以有害，则反诘怒责，不数语便斥去，如答以有益，则欢颜问答不休，愈长愈妙，句句登记以做证据，此种立心不问可知。国际调查鸦片三代表到新加坡时，余则代表华侨开欢迎会，到者中西数百人，在筵中余详述南洋华侨受鸦片惨害，而尤以马来亚为甚，阐明指证，并要求国际联盟会诸代表以人道主义劝英政府早日实行禁绝，则无异美国林肯总统解放黑奴之功德云云。事后政府公卖鸦片，逐年缩减，然迄今仍存流毒未绝也，当筵宴未开时，政府某官员托闽粤两侨领，再三告余筵席中切勿提起鸦片事。然余自有主张，若无目的何必费此筵席。英人多有资格，凡谄媚畏怯之流，彼愈加鄙视，若热诚正义，虽非所愿，然彼衷心尚存敬意，国际联盟三代表往各处调查后，复到新加坡，余则以私人设宴送行，彼等对余甚形满意也。

马来亚各处地面，虽多山冈不似安南暹罗多平地水田可以种稻，然卑湿田地亦属不少。民二十几年不景气流行，男女失业日众，尤以华侨劳动界为最。当地政府为土人设想，改良水利，资助种稻，提倡粮食自足，竭力劝勉鼓励。然土人性怠志短，无甚效果。新加坡政府另设一官署曰“华民政务司”，中设议事会，名日“华人参事局”，局员三十余人，多系祖国来者，概由华民政务司选委，任期无限，多有终身者。开会时以华民政务司为主席。虽组织此议事会，亦不过形式上笼络而已。余亦曾任参事局员数年。当不景气之秋，土人既获水田权利，而华人则不能。然华人在马来亚占一半人口，欲图马来亚粮食自足，非华侨共同努力绝难达目的，余故提议请一视同仁。蒙赞成通过，由华民政务司向上官要求，结果无效，余即辞退该局职务。而华侨失业日多，除自有旅费自动回梓者外，其他月以万数，由政府资遣回国，足见其排斥华侨之深意矣。

民十八年，胡汉民、孙科、伍朝枢、傅秉常等来新加坡游历多日，晚间余在怡和轩设宴招待，计五席，同席林文庆（厦大校长告假南来）、薛武院（总商会长）、林义顺（中山先生住新加坡系他招待）并余共八人。时适南京政府初换国旗未久，有人通知胡君等总商会仍树五色旗。筵间孙科告胡等“总商会未换旗，明日我等勿往”。盖越日欢迎会有三处，中午和丰银行，下午二点总商会，四时南洋华侨中学校，薛武院坐余之右，林义顺坐余之左，薛君闻孙科言，告余云：“总商会未换旗为总领馆尚未换之故。”余则转告林君，其座位与胡君毗邻，乃转告胡君。胡听未详尽，误会总商会不换旗系总领事阻止，为其性素躁，即大声怒问总领事。时总领李事君在右席，闻声急来问故，于是就筵间与薛君议妥，明日总商会须换旗，胡君等应承均愿赴会。不意越日总商会门前旗杆空竖不升何旗，而挂新旗于门上。有人走告胡孙等总商会不升新旗，在和丰银行宴会时孙科即约诸人均勿赴会，而伍君谓恐失侨情不可，乃推伍君独往。总商会散会时，林义顺导伍君出会门将上一汽车，林君始觉伊车在该车后，乃转向后行。刺客立对伍君发枪数响，伍君逃脱，林文庆面被误伤。盖刺客原拟待伍君上车时，然后开枪准可得手，及见其不上车而返行，疑伍君已察觉将避，故急开枪，然伍君自出会门略有注意，故能走脱。刺客被拿，系琼州人，自香港与同志多人来，是日早党人会议，举三人负责各刺杀一人，即孙科、胡汉民，及伍朝枢，幸为总商会不升新旗，故均获无恙。

  世界各国之国旗必有取义，如英系三岛合国，故用三色，美为联邦合国故用若干星点。我国光复后孙总理在南京就职，公决用五色为国旗，系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立国之义，何等正大光明，宏伟美观。后来袁世凯野心称帝另有一样旗式，与五色旗无关。至军阀割据地方，仍用五色国旗，亦莫非遵守国徽，其胜败与国旗完全无关，此理至明无须多赘。乃自孙总理弃世后，国民党北伐胜利，南京政府成立，便即野心变更国旗，以为中华民国是国民党造成，应将青天白日党旗为国旗，俾国民党功勋永存，政权亦可永操。余深知青天白日党旗，系光复前孙总理在新加坡“晚晴园”议定，此系一部分人党徽，与国际无何关系。若国旗则代表全国国徽，对外对内关系至大，不但要取义适当，尚须参以美观及气概宏伟，三者缺一不可。试看该青天白日旗无一可取，言主义则泛而无据，言美观则非日非星，至若宏伟则炎光不展，气象短缩。自光复后，余对政府最不满者，首两件事，一为长衣马褂仍旧保存，一为青天白日旗换作国旗。前年余将回重庆时，曾将青天白日旗，托美术家将炎光修改，较有美术及宏伟气象，然经过数位研究，虽稍胜现状，终难满意。印百多张带至重庆。盖念国旗大事，改革至难，若但修改炎光，或可试探如何。迨至渝见诸要人情况，认为出我意外，遂作罢论。

      民国十七年南京政府成立，国内纷纷尚未统一，而外国则咸已承认为正式政府，南洋华侨亦未能一致。余则手订规则，交南洋商报经理，命悬挂办公处，其语为“拥护南京政府为首要目的”。其时余与蒋委员长尚未相识，亦未有信息相通，特念外国已经承认，国民应当服从。否则，如西南政府要人既多相识，又有消息来往，岂不与个人较有关系，第以此为私人之事，不得因私废公。汪精卫在德国，遥与南北诸不服从者煽动反对南京政府，余与林君义顺联名发电劝止无效。此为余主张应服从中央政府，而不顾个人交情之事实也。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当民八年开办时捐款六十余万元。余经手购市内洋楼两座为校舍，费五万余元，又购市外五英里武吉智马律大路边，前马来王别墅八十英亩为新校址，景地均佳，价八万元。余回梓后新加坡屋地业大涨价，董事会议决买市内四万方尺地，拟建店屋为校业，每方尺四十三元，计十七万余元，捐款未收者二十多万元，因商业欠佳均不肯交。所存现金十余万元，两年余经常费提用净尽，至余南来计已三年，校费已无着矣。余乃设法维持，并向认捐未交者，磋商酌衷折交。最巨者为富侨黄君十万元，渠言“实非怠交，当时系有条件，所捐系为建新校舍礼堂之资，不能移作经常费，如有实行建筑立即交出。”余念乘此机会若新校舍落成，可将旧校舍变卖以助校费，则一举两得。于是兴工起盖，除黄君交出十万元，复收旧捐六万元，前置市内四万方尺地仅售两万余元，复向华商银行借出六万余元，合计支出建筑费二十四万余元。礼堂可坐千人，课室膳厅宿舍等仅容三百余人，余如图书馆科学室等尚付缺如，而学生额已满，若有金钱尤须扩充诸校舍。希望热心教育者慷慨输将，俾可继续进展，此为民十五年以前之事也。余辞卸后更换数届校董，其中乃有某董事主席异想天开，提议临马路边建筑两校门，费由渠负担，董事会赞成之。校门造成后有人来告予，门柱标题某某姓名，如此则全校包容在内，将置以前捐款人于何地。余乃往视新建左右两门，相距约一千尺，为该校出入路口，颇堂皇美观，门楣上横书中英文“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右门柱为白石刻中文，直书“某某姓名捐资建筑”。左门柱亦用白石刻英文，字义与右柱中文同。不筑围墙，只此两门所费不过千余两千元，然以门上有字，观者必误认全校为渠捐建，而以前捐数十万元之数百侨胞全归埋没矣。然此事尚小，该地校址广大，将来可容学生数千名，现所占面积不及十分之一二，空地虽多，日后谁肯复捐资扩充，此则为大问题。余不得已乃告知该校诸董事，请将石柱之字取消，无效。后乃假总商会召开捐款人大会，到者百余人，举林君义顺为主席，全体通过石柱须拆卸，决议后负责无人，余乃派人办理。窃念教育关系后生极为重要，董其事者必以公忠热诚为主方能收效，否则，不免贻误青年，安得利用学校以为广告，无论中外此风诚不可长也。

  福建同美汽车公司，川走由同安城至集美，资本二十余万元，由新加坡同侨投资，于民国十年开办，通车后略有利益。同溪汽车公司，由安溪至同安城，资本三十余万元，由南洋安侨投资，因董事多意见，无利可获。倡办时集美校长叶渊亦参加。民十八年许卓然到同城见陈延香（同美董事）言拟代某民军筹饷三四万元，要向同美、同溪两车路公司息借，招陈君来集美与叶君商借款事。叶君答同溪车路公司重要董事住厦门。三人约定越早八点在集美下船往厦。许陈两人复回同城。越早两人均未到，叶君乃先行留一名片托车站人交许陈二君云，伊在厦门太史巷街丰益钱庄等候。约近午间许陈始到，渡海至高崎村转坐汽车，来厦至美人宫换坐人力车，到太史巷街口下车步行，陈君在前已入丰益内，许君随后。甫将入门，枪声连向，许君倒于门内，乃移往鼓浪屿医院，有顷而亡。陈叶二君均往探视，而凶手逃走无踪。丧家乃指陈叶二君为主谋，即控于法庭，所以致此者系同溪车路意见人，含恨叶君主动也。陈德麟，集美人，在师范科未毕业即来新加坡，在余分店管财，侵逃七百余元回梓赋闲。屡向叶君求职业，叶君知其在洋无状拒绝，由是对叶君无好感，乡校人多知之。许君被刺移往医院时陈德麟适在厦，亦到医院探视然后回乡。在电船中多人议论许事，陈德麟眩巧好言，谓该事伊知情，究实所谓知情，乃受伤后人医院等项而已。即有人往告许家，于是同安县派役拘捕，审问无据。其时许家主持人硬欲加罪叶君，然乏实证可据，不得不利用陈德麟为凶手，造作一篇供词，谓与叶渊同谋，伊任凶手等云云。严刑酷打极其惨苦，使不得不依词认罪。陈德麟既诬服后、移往漳州张贞处囚禁。张君时以师长镇守漳州，在闽南已炙手可热，与许卓然、秦望山为党友，故许案主持人张秦二人为主脑也。

 叶渊、陈延香均被禁厦门监狱，厦门司法官权属中央，张秦鞭长莫及，乃谋将叶君移漳州，借词审问，屡向厦官交涉引渡，实欲置之死地。余乃电南京国府胡汉民、古应芬二君，请急电厦法官阻止移漳，故张秦目的莫达。后胡君复令将案移至杭州裁判，于是叶君乃往杭州，余杭州分店为担保二万元得免狱禁，而陈延香、陈德麟亦均移杭。讼案判决复翻，纠缠两年余，结果三人均无罪释放。然对方复极力运动，利用军人势力，将再上控。迨闽人民政府发动后，又指叶君曾参加，于是叶君乃辞卸集美校务，而往广西任省府秘书。当叶君被诬时，余即电张君勿冤枉陷害，并“昔邓禹将兵百万，未尝妄杀一人，子孙兴盛”，至与秦君电，则以集美学校关系闽南及南洋教育，请勿诬害。彼等均置不理，更悉力钻营，且靠人势焰武必欲诬杀为快，余在洋适遭世界不景气，不能回梓设法妥人办理校务，致数年间集美学校如无舵之舟，乏人主持，成绩退化。所可痛者，同为闽南人，既明知叶与许风马牛不相及，必欲硬干到底，既不计冤诬必归无效，又不顾社会教育之损失，欲逞其昧良之心，致死友真凶竟逍遥法外也。

 广西省自北伐成功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三先生极力整理军政，对交通教育实业尤形注意。缘地方素贫，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乃派代表来南洋鼓励侨胞投资开发。广西侨民不多，富商又少，故代表不得不向闽粤人劝勉。数年间计派来多次，每次均曾访余。然余不能以敷衍报其诚恳，乃直言此事之无效。其理由有二；其一富侨决不肯单独运资亲往经营；其二如设有限公司，招股提倡者恐乏信用。就此公私两事而言，虽在闽省创办，闽侨亦未必响应，况非故乡更觉困难。有潮商某君等曾往广西应承，欲大规模招股投资，在新加坡成立机关，登报鼓励，结果经年，招不上国币二十万元，该公司由是搁浅不前。又有客籍侨胞在霹雳埠颇有资望，亦应承要招集百万巨款，在马来亚各报发表，经过吉隆坡、新加坡到处热烈欢迎，且在新加坡总领事馆宣誓就职。于是遂带秘书等同赴广西，不久回洋，亦是空雷无雨。叶采真先生任省府秘书，最后当局以彼为闽南人，且与余深交，备费数千元，派其南来招闽侨投资，先到安南十余日然后来新加坡。嘱余负责提倡，余仍如前言直告不讳，叶君不信，云经过安南已略有头绪，诸侨商咸言若余肯出倡办，就安南一地要招数十万元易如反掌，言之凿凿可据。余问某某富侨曾言此乎，云无之。余云其他不负责人安可轻信。叶君仍是不信，将往马来亚各埠及荷印宣布使命，计奔波数月将回国，复经新加坡云，某处表同情要筹得若干，某处亦应承拟组公司投资。余答君归去便知是泡影。叶君仍不以余言为然。最后余告叶君云：“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余与君交接十余年，君是否认余好妄言乎？”叶君答：“极相信所言必实。”余云：“既如是，何能信诸侨能投资乎？”叶君回广西后，如何复命，余虽不知，但广西政府从此灰心不复盼望南侨投资矣。余详载此段事，未免菲薄华侨轻诺寡信，抑或虚妄欺骗，虽非尽然，然亦颇多如此。我国内外同胞，若不觉悟过去虚伪错误，猛省改善，讳病忌医，华侨决不能投资救国。至详细理由可阅余在重庆，马寅初经济学社年会，演讲“华侨投资问题”便知。

 民国光复以前，马来亚华侨每年或每两年有一次迎神赛会，装作戏剧马队合棚弄狮弄龙弄蜈蚣大锣鼓旗帜等，而尤以新加坡为最。光复后此事稍杀，大不如前之愚迷。乃不知谁人作俑，将上言游戏娱乐之诸项参加于运柩葬仪之中，由是互相效尤，闽粤虽装饰不同，皆不免违背主哀之义。余每于途中遇见，为之羞愧痛心，无地自容。盖此地各国人民皆有，观瞻所系，为人鄙笑指斥，甚为国人之耻。又如死后不葬留柩多日，宴客赌博，热闹终夜，种种陋习为全球所未有。民十七年余主席福建会馆，乃传集开会，议决改革丧事铺张，及宴饮赌博；并规定死后不得留棺过七天。此乃侨民私约规章，非当地政府之法律。福建会馆无权干涉私人，唯有责成各区负责人，每逢丧事亲往劝诚，并登报劝告侨众，颁发规则贴于丧宅。从此以后颇生效力，全马来亚皆随而改良矣

民二十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四省，余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通过发电欧洲日内瓦国际联盟会，及美国总统请履行各种条约，维持世界和平，否则导火线自此发生，将造成将来世界纷乱。余明知开会发电虽无丝毫效力，然祖国遭此侵暴，海外侨民不宜塞耳无闻，自应唤醒侨民鼓动志气，激励爱国，冀可收效于将来。至联络抵制事项，出于不得已下策，任何激烈牺牲，亦往往不能持久，盖由居人篱下，当地当局不但不表同情，尚屡以法律裁制，或袒护对方也。日本有一家炭公司，在新加坡托华侨某君代理，销路颇好，“九·一八”发生后，我侨抵制日货甚形剧烈，该代理不得不取消定办之炭。日本炭公司代表南来，详述发动侵占东四省，完全为少壮军人主动，若诸老成政治家绝不赞成，恐将来引起世界大战。又谓山东归还中国，少壮派已生不满，后来复加以华盛顿会议，议定海军五五三限制，则更愤怒不堪，故主张缓和之政治家屡被暗杀。彼等急欲侵略中国，以破坏国际条约，第因前年日本东京大火灾，损失惨重，故暂中止，现已恢复原状，所以此辈，不顾将来危险遂发动此祸矣

民二十四年，福建漳、泉等处多水灾，而尤以泉州及近处为甚，于是泉绅等来电，求新加坡闽侨汇资救济。余乃以福建会馆名义，募捐国币八万余元，然将付托何机关或何人主持施赈颇觉为难。盖吾闽远不及广东，如粤属逢有灾难，因素有组织慈善机关，可立即备资救济，然后向中外募捐，信用成绩素著，负责劝募者可安心进行。若吾闽省则不然，福州厦门均无此种机关，前有一两次因灾捐款，而施赈方面多生弊端，为捐资者所不满，故闽省逢有灾难，南侨不能救济。此次付托之人不得不慎重，后不得已乃托驻泉李师长主持，并副以数位绅商共同办理。蒙李师长按灾情轻重酌衷支配，泉州居多。而泉州绅商意见不一，有主张将款计口施尽者，有主张灾情已过，将款办工业做工赈者，纷议莫决，结果不知用途如何。依理该款既为水灾劝募，应立即施尽于灾民，以副南侨捐资之义，不宜迟滞或转作他用也。

   闽南私立男女师范学校多所，自陈仪主闽政后，命令禁止不许开课，只留集美一校。其理由为程度参差，拟归省立办理。师校为教育基本，程度参差或不妥，省府收归统办俾可一律改善，实教育之幸。然省府不但要充分容纳生额，尚须各区分设，俾有志贫生不致向隅，方可裁止诸私立学校。否则，程度虽参差，岂不较善于无耶？然禁止后经过多年，而省立师范仍只福州一校，学生数百名，已属杯水车薪。而闽南师范学校仅有私立集美一校，民二十五年冬亦下令禁止。余函电请求保留无效，乃电南京教育部长详言理由，后来电准每年招生一班。此乃敷衍了事，余实无限愤慨。若言成绩集美绝不让于省立，若言普遍收纳闽南有才志贫寒子弟，则远胜于省校，况集美校又有关于南洋华侨学校之师资，重要如是，而乃加以摧残，是诚何心也。

七七抗战将发生之前，闽建设厅长陈君极欲尽其职务，欲兴办多项事业，农矿海利尤加注意，可惜素乏经验，难免反遭损失。余到永安时有人报告，前陈厅长任内曾在某处开矿，损失百余万元，现已罢歇，余颇信为事实。缘前该厅长曾向集美学校建议，由省府备资派遣是届水产学校全班毕业生，往日本留学。又欲租集美第二渔船，订期六个月，每月租金六千元，在闽南捞鱼。两事余均不许，并详告其原因。一为日本无意容纳水产留学生，即肯亦有名无实，徒费无益。前有日本高级视学官来台湾视学，并到厦大、集美参观，受集美校长招待，即要求容纳水产留学生与日生同课，后回复许可五名，仅此而已，再后要求续派，概行拒绝。至集美第二渔船每月租金六千元，比现在往上海捞鱼，可长两千多元，六个月共可长利一万余元，而省府逐月或须亏蚀七八千元。该船前在闽海经验两月，知之已稔。余不贪得一万余元，而使省府亏损四五万元也。闽政府自来委任建厅长政绩无闻，敷衍了事者有之，营私舞弊以政治做营业者亦有之，除是之外，则有上言计划错误者，岂非建设才难乎？

民十七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外国已承认。汪精卫在法国遥与南北诸不服从者，互相利用，煽动反对。余与林君义顺联名发电劝止无效。李石曾君将往法国，途过新加坡，余告以汪事，渠云，彼亦常劝其勿参加政治活动，谓：“依你性质，最好做一学者，若要参加政治，无异小孩弄火。”后来余每追念李君，真善知人矣。至汪之左右人物，如陈公博、褚民谊、陈春圃等，余知其皆属碌碌庸常，笨拙无价值可言。陈公博任实业部长有年，未见其做何有利民生事业。来新加坡时在会场演说，及对记者言，渠等如何辛劳服务，每夜工作至午夜后方得就寝。南洋商报记者来访，详述其所言成绩，余答：“此亦如前日山东省之梁国有，捐赠政府三千万元，各报多为宣传，究实乃不兑现。”记者发表后，坡中某报赴京报告，则寄一长函来此登载晓晓自辩。褚民谊来洋多次，余识之已久。在南京任行政院秘书长，地位何等重要，乃亲为女运动员执鞭，且拍照登载日报，谄媚妇女不顾国体，人格更觉可知。陈春圃抗战前与同伴七八人来新加坡，寄宿英旅馆，膳宿日费坡币百余元，无非浪费我国民膏血。某党员在怡和轩俱乐部设宴招待，陈春圃演说各项，不但极无条绪，且亦无何价值，彼乃认为关系严重，再三吩咐“切勿向外人言”，更足显其幼稚无知。汪精卫自身既奸庸愚昧，而主要徒党亦昏愦鄙陋如一丘之貉，结果自归惨败，无地自容，敌人虽利用彼等做傀儡有何益哉！

 王君正廷任我国外交高级官员多年，余久耳其名，尚未识面。抗战前南来始会见，云此次系私人来南洋游历，先到马来亚再往荷印，其目的要知华侨状况，如政府待遇、经济、商业、教育、社会状况等。及游荷印后将回国，复经新加坡，对报界记者谈话言荷印各埠华侨商会，近来将组“商会联合会”，以资团结，极赞其美举，谓：“我华人每被洋人视同散沙。荷印华侨既能联合团结，不但有益商业，其他各事当然亦可获益，希望马来亚华侨当如荷印华侨团结。”余乃往见王君，先述：“阅报劝告侨胞诚意，至深感谢。然王君此次虽私人南来考察，与政府社会方面定有关系。闻平素做事多务实，不似其他官僚常存敷衍。唯对南洋情形尚未深知，或有误会，无益此行，故特贡献所知，希望王君明白华侨底细，冀有补救办法，庶不虚此一行。兹就团结二字言，华侨所有组织大都形式上而已，若言内容实际乏价值可称。如各商会联合会，马来亚十余区自十年前已组织联络，按年轮流在某埠开会，至今已久，绝无实际利益可言，徒有形式上之应酬而已。荷印今始倡议，将来料不过五十步与百步。空言团结，仍属散沙，此则甚可痛耳。”王君云：“我不知侨胞如是泛散，要当如何方能达到团结？”余答：“余意甚难，所可望者祖国政府能治理良好，领导人民团结，为华侨做模范，则华侨当然响应。若祖国政府不能领导人民团结，欲望华侨先行，则无异缘木求鱼，希望先生回国后请政府改善，则华侨受赐无限矣。”

清灭亡我中国，为我祖先深仇大敌，将我祖制全发剃作辫发，服装亦变为长衣马褂，此二者均为清胡人制度，绝非我中华民族自来所固有。民国光复后辫发裁去，不恢复全发之古制，而与世界各国同属短发，诚属妥善。惟满制长衣马褂，则仍保留不改，甚至认为通常礼服，当局之气馁妄从，违背革命真理，保存亡国风气，其弊何可胜言。至改革服制式样，如不恢复古制，亦不尚法西洋，自可研究妥善体式，取其经济与便利，则耳目一新，可除腐旧。否则虏服仍存，丑态依旧，不但世界无此服装，为人指点讪笑，且依附阶级陋习，更非平等制度。如学校教师可穿长衣马褂，学生则不可；高级军官可穿长衣马褂，下级士兵则不可；店东职员可穿长衣马褂，而劳动工伙则不可。世界无论何国有是理否？民九年集美学校修理电机，该发动机不上百马力，乃该技师只令工人开视工作，自己全不出手，不一点钟完竣，留校午饭，余与校长伴食。回厦后则大不满意，谓受我辱待，与其工人同席。如此骄傲自高，莫非因其身穿长衣马褂乎？技师亦劳工之列，有何高贵可言也。后来新加坡余树胶制造厂中电力发动机二千余马力，凡有损坏请政府电气局总技师来看，每次单身自来，脱去外衣，亲手查验，盖亦尽其义务而已。若论新加坡电力厂与厦门电气局比较，则不啻小巫与大巫，余由是更感长衣马褂之遗害。民廿三年曾著论在上海《东方》杂志发表，并函请南京政府立法院限期禁除无效。民廿七年复向重庆国民参政会提议，又不蒙采纳。越后余到重庆，曾参加开会摄影，林主席蒋委员长均到，合诸参政员及各院部要人二百余人，服装有长衣马褂者，有单穿长衣者，有中山装，有西洋装，亦有西式礼服，有军服，及蒙古西藏等服，及其他便服等，真所谓五光十色，参差不齐。现政府及参政会对清长衣马褂，虽不与余表同情，然余深信必有一日可达目的也。

  我国妇女衣服，各处互异，政府既无规定，普通服制多由人民自由变更，故到处多殊，数十年来更常演变，大都由上海倡起，不久便风行中外，时髦屡易，损失之巨难以数计。自改服旗袍以来，身长无限，有至脚踵者，而袖由长变短，现竟变至无袖，长裤改作短裤，现亦有短至露腿者，不特美观未见，而且不耐寒冷，对卫生上实属有碍。若延安中共妇女服装，则短衣长裤，与男服略有分别，为其便于工作，及节约朴素。以我国人之贫寒，质朴勤俭最为首要。如苏俄革命后，耐苦十余年，穿破衣服，食黑面包，乃能成其富强。我全国妇女，如欲勤俭节约，则可短衣长裤，以苏俄为模范，此在乡村中可无问题。若城市殷裕之家，无须劳动工作，不肯短衣长裤，则可仿效西装，长衣束腰，袖长至肘，衣长过膝已足，裤长亦须过膝，若服裙者则衣短，而裙束在衣之外。妇女此种服装，既较经济亦更美观。若云何必模仿西装，是则所见未广。我国古代女裙亦束于衣外，况男子衣服已多仿西装，何必独限妇女，既不能恢复古制，则当取维新、经济、美观、大同、有恒五项为主要。民国光复后，希望政府对诸不良事项，实行改革，然诸多失望。即就男女衣服而论，政府当局亦应代民众设想，务求经济便利，朴素雅观，命令倡行，表示维新气概。余久欲向政府建议，无如前所提革除长衣马褂，不蒙采纳，故仍有怀莫达也。

马来亚前有青楼妓女，虽住市区内，然另有街巷，不与良家眷宅混杂，不特良家远避，而妓寮亦不敢杂溷良家住所。后来政府禁止青楼，至今二十余年，虽有暗娟，亦匿居偏僻处所，至于日间更不敢显露头面。自民廿几年顷新加坡开设一跳舞厅作俑，既往上海雇来舞女，又向本坡招诱华侨女子参加，俄而小坡跳舞厅相继效尤设立，由是大街小巷如雨后春笋，到处创立，而尤以“跳舞学院”最发达。政府放任而不取缔，坐视华侨腐败，以益市面繁荣。市中到处唯见唇红口丹之冶容，异服奇装之妖态，车水马龙，炫耀于道，堂堂皇皇，毫无羞耻。美其名曰“舞女”，夸其技为时髦。且住处多与良家混杂，泾渭不分，致令贫寒女子垂涎羡慕，合污同流，廉耻羞恶，扫地无余，良莠传染之害日甚一日。不但血气青年受其迷乱，便是中年老辈亦多乐此不疲，至以舞场为营业者之计划，则网罗周备，诱惑多端，夜舞、日舞、酒舞、茶舞，时时可舞，事事可舞。问津之人以其名称异于青楼，畏长惧内较免罪责，然而既入迷途，积重难返，轻则精神耗削，事业荒废，重则离异破家，囹圄亡命，种种恶果，日有所闻，不一两年全马来亚到处都有。余睹此情景，痛心疾首，挽救无术。闻菲律宾新加坡跳舞亦甚盛，然市内禁绝，凡跳舞厅须设于离市区五英里外。乃呈函坡督详述跳舞营业之祸害，请其设法限制，如不能禁绝，亦当效菲律宾办法，并禁止日舞、茶舞等奇祸。函呈后即接回札，云已收到，再后久无消息，约经六个月之久，复接一函云：“君某月日之函，政府现正考虑。”不久欧战发生，无复消息矣。或云：“跳舞在欧美已普遍化，若谓我国不可仿效，未免过于顽固。”然凡事当先论利害，若利害参半，或利多害少，取而仿效，尚有可言。若此跳舞营业，有百害而绝无一利，直是卖淫变相，为祸害青年陷阱。若必以欧美风化为比拟，无论是否变本加厉，且我之国计民生，未能望其项背，安可专学其娱乐，如胎毛未干，便欲学毛羽丰满之高飞，其遗害岂胜言哉！又如法国巴黎人，常在大庭广众中，男女互抱，狂吻特吻，几同无知鸡犬，是亦欧俗之尤，我国亦当取而效之乎？至于苏联社会主义，男女自由，为全世界最平等及最新国体，如互抱狂吻之风，鸨业跳舞之害，绝不通行，我国民何不取而之效乎？

 吾闽自李厚基任督军时代，孙总理在广州委任闽人党员八司令官，组织民军，以闽南人居多。由是各组机关，树旗招兵，所需军械粮食都系就地征派。始则善意劝募，为保护治安经费，后则强迫硬派，无复情理，所招军士又多属无业恶徒。迨至意见发生，则各立门户，抢劫勒赎，割据地方，强抽捐税。且强迫种烟，按亩重征，若不举行，则每亩硬收烟税若干。由是民穷财尽，地方纷乱，盗贼如毛，尤以闽南为甚。民十二年冬菲律宾闽侨发起组织救乡会，派王泉笙等三人为代表，来新加坡见余云，本人代表学界，彼两人一代表报界，一代表商界。其使命系向英荷等属各埠闽侨请组织救乡机关，然后择期举派代表，到香港或菲律宾开会。现全菲闽侨均同意进行，彼特到新加坡征求组织，然后往马来及荷印同样举行。余问其是否拟定救乡办法条件，及带来何项手续。据云都未有，要如何办法，须待各代表开会时议决。余云，贵处既热诚提倡，且距故乡较近，必先有调查状况，及计划拯救办法，譬如需财若干，需人办理抑或他项，从何方面起手，略具条件，再待各代表开会修正。兹若虚泛无绪，茫无把握，但欲各处先组机关，授权代表赴会，恐多未明白，难收实效。因代表远途赴会，侨领恐不能亲行，愿往之人则未必有决定之全权。王君等不以余言为然，辩论不休，余则告以此系余个人见解勿怪。此间有福建会馆，主席及司理某某希往请他办理。迨后召集开会竟乏效果。王君等往马来各埠，据日报登载多有组织救乡机关。后几月余往荷印，适与王君等相遇于泗水。及王君回菲，订期约各处派代表到菲律宾开会。闻马来亚及荷印均无举派，到者概系菲属而已，至于救乡事则空雷无雨耳。

 民十七年马来亚槟城埠，某惠侨倡议救乡，在槟城先开会，举派若干人为代表来新加坡。动身时电知新加坡闽侨诸会馆，故多派人往码头迎接。并预告马来亚诸埠闽侨，均派代表约期同来。假怡和轩俱乐部三楼开谈话会，强邀余参加。诸代表有主张训练乡团若干人者，有主张与民军合作者，亦有主张造铁路利交通，兴实业，开矿产，则民生有赖，盗匪自消，方是根本解决者。所言各有理由，而不计事实能否办到。余则云：“凡事言之非艰行之维艰。顷所言练乡团及与民军合作，以闽南之广，不但不能普及，不能满各乡侨之意，反恐画虎成狗，增添许多匪徒。试问华侨有何忠诚人才可负职责。至于兴办各事业，谈何容易，不但无许财力，亦缓不能济急。以余鄙见吾侨果有救乡真诚，则负担相当金钱，按马来亚闽侨力能办到者而行，办法极简单而有效。依光复时经验，现南京政府已成立，可发电或派代表磋商，请派若干军队驻闽南清乡治匪，订若干月可以肃清，每月吾侨补助若干军费，如此较靠得住。若要实行此事，必须筹有相当金钱，方可向政府商议。余按如需一师兵，每月补励至多国币十万元，至迟一年治平，计一百二十万元。政府如实行及治理有效，我则逐月汇交，否则，停止汇寄并与交涉。此款数目可由马来亚闽侨担认。”然诸代表不置可否便散会，余从此不再与闻，余早知倡起者骛名，非实事求是。盖槟城代表来新加坡，何必分电各会馆，往码头迎接，其虚荣心可以想见。续后数月各埠代表回去，复来开会数次，纷纷不一，结果咸归泡影。而巧妙收场之议决案，则转归新加坡福建会馆办理，其理由新加坡为马来亚首府，福建会馆为闽侨各会馆领袖。余时任福建会馆主席。然救乡事大，公义所在不得不承受，即乘诸代表未归召集开会。余言：“贵代表数月来开会多次，救乡无妥善办法，故移责本会馆，究竟诸君是欲卸责任，抑欲与本会馆合作？”诸代表云：“系请贵会馆领导合作。”余言：“既如是本会馆无他权能可以领导，唯有如前谈话会余所主张，侨胞负责出钱，要求南京政府派军兵负责治安而已，如同意赞成方有办法。”于是全体赞成，乃议决募捐坡币一百万元，新加坡卅万元，槟城十五万元，余分摊各埠至足数。余云：“此次救乡系由槟侨爱乡热诚提倡，目的若达，功德无量，然不可如前菲律宾空雷不雨，不但贻笑中外，反致有误家乡。各埠认捐数目应限期募足，请由槟城先行劝募，至迟两星期内起手，一个月募足，成绩如何来函报告。本会馆立即传达各埠及新加坡同时举行，均于一月内募捐足额，再传集开会选派代表赴南京。”全体代表均举手赞成。越日各代表回去，过后十余日槟城绝无消息。余乃致函查问，亦无确实回答，并不见报纸登载募捐工作，余复行函责问，竟复无价值了事，此为第二次救乡之结果也。

 民国廿三年，南洋闽侨救乡运动死灰复燃，其时闽南匪氛已大减少，唯安溪及内地尚有骚扰。提倡者为新加坡闽侨，素志阴险，人格不讲，每利用时机欺人扬已，不察者则受愚罔。盲从之流，不但坠其术中，并不计将来利害，附和奔走，举动若狂。余曾向两三位热心人忠告无效，或且以余为破坏救乡，盖反对者独余一人耳。至倡议条件，不但救乡，且向中央政府要求闽南十县做自治区，创建设银行兴办各种实业并模范村，计划确是伟大可观。新加坡各日报均用大号字标题，并详细登载，由是南洋及闽南诸日报多有转载，谓此回闽侨确能造福桑梓，闽南民众多有额手称庆，眉飞色舞者。在新加坡传集马来亚各区代表，开会两次议决，派三位代表，槟城、马六甲，新加坡各一位，并筹旅费一万余元。中外报纸既先宣传，三代表及秘书随后前往，先到南京请愿，然后回闽视察，如安溪铁矿、龙岩煤矿，均有查勘，闽南有名城市均往游历。到处空巷欢迎，爆竹震耳，荣耀得意莫可言喻，历时数月方始回洋报告，此一回之救乡责任便已告一段落矣。过后多月复召集马来亚闽侨开会，为建设银行募股，按实备资本国币五百万元（时坡币七十余元申国币一百元），新加坡举多位代表向全马劝募，经过月余未达数额。再后气衰志馁，日形无味，前后纷纭两年余，结果归于解散。此为南洋闽侨第三次救乡之效果也。

 南洋闽侨三次提倡救乡，无益而反有损，盖每次都为虚荣心所误。语云：前车覆，后车鉴，深愿华侨无论为国为乡，若虚荣乏诚，决定失败。兹余按次述其失败原因如下。第一次救乡失败之原因，盖由于提倡者拟自居盟主地位，且未考察真因，计划办法，任其无根之理想，轻率欲招集远处英荷等属派代表参加，此其失也。第二次救乡亦成泡影，则为倡议人好名乏实，初时轻于传集开会，后来既无办法则捐资请政府负责，实至善可靠办法，彼首倡者既有财力，若肯以身作则，先认捐两三万元何事不成，无如诚意不足，素非慷慨，故归失败耳。至第三次倡议救乡已乏价值，唯办法与前异，而以要求自治及模范县模范村，建设银行，振兴实业，夸张虚构欺蒙同侨，存心原本狡诈，立意为己名利，绝无实事救乡之念，只欲炫已才干，愚弄他人，其失败固无待言。此第三次闽侨救乡，较前两次同为无利而加有害也。所痛者多位有财力侨商，对银行均有承认购股。曾告某友可认三万元，该友答我安有财力，彼云免兑现名誉可得，社会之坏即在明知其非而不谏止，甚至助桀为虐之乡愿耳。海外闽侨逐次对救乡热烈举动，若不贻误桑梓，损失尚属无妨，无如虚荣影响易招外侮，如陈仪之轻视闽人亦即由是也。余阅报载陈仪在某处演说云“闽人希望南洋闽侨运资发展，利益民众，迄今年久，究有何效，多属空雷无雨，他省免倚靠侨资，其民生更形安定云云”。审此足见陈仪藐视闽侨，而鱼肉闽民之有因矣。

集美学校创办时，余原意不求外助，迨至民廿二年不得已乃向相知者请其补助，李光前逐月坡币六百元，陈文确国币五百元，七七抗战后集美距离厦门隔海数里，飞机大炮时常来炸，损失之巨无须多赘。民廿八年余乃主动在洋拟向集美诸学生，募捐国币二百万元，按八十万元做修理费，余做基金，定每生最少捐国币一百元，坡币十发五元，不向外人募捐，而巨港校友，竟向商友捐几千元，结果共捐国币二十三万余元。陈六使（集美人，亦集美学生）捐公债券一百万元，系托上海华侨银行代购，利息每年六万元，做集校基金。余至重庆知战事。未易解决，集校修理尚迟，乃将捐款参加“中国提炼药厂股份公司”国币二十五万元，全年本息六厘，做集美学校基金，该公司资本一百万元。李光前所认月捐至民廿九年春停止，换捐坡币五万元，系麻坡及实吊远胶厂押款，逐月可收利息坡币三百七十五元为集美校费。

 集美师中等学校，自民国七年开办以来，南洋华侨学生前往肄业者不少。集美系乡村学校，不但与城市远隔，不染繁华，而自来校规严格提倡朴素，禁止学生浪费，虽距厦门市不遥，然学生无故不许请假离校。为此缘故，间有富侨子弟，生性好动，或被人招诱，或不耐拘束，转学上海及其他繁华城市者亦属不少。其转学原因，必有相当理由函禀其父兄，该父兄身居海外，虽被欺骗多无由知悉。至上海华侨学生之浪费，有月开数百元者，若百数十元可算为俭省。有某君之子留学上海，不到一年费款两千元，及知其浪费亲往召回，须再清还校费旅费衣服费等数百元。其浪费最烈者即是跳舞。跳舞之祸害甚于毒蛇猛兽，我国抗战胜利后，内政方针第一件须禁绝跳舞，否则，执政之腐化庸污，无建国精神可知矣。我南洋侨胞如要遣子弟回国就学，尤希格外注意为幸。

  民廿五年西南将异动之前，陈济棠派某财厅长林某，来南洋探访侨情意向。新加坡总商会特开欢迎会，会长谄媚演说，称广州政府为父母官长，该代表满意回报。秋间发动叛变，余乃联络各界假总商会开侨民大会，表决趋向，结果大多数反对异动，拥护南京中央政府。于是余乃以大会主席名义，发电劝广州陈济棠，广西李白黄以“外侮日迫，万万不可内讧”等语。陈复电辩论，余复去电责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至广西复电甚长，约三百字，亦多解释理由，余回电仍善意婉劝忠告，请勿与贪吏叛逆陈济棠合污。彼等苦心治理广西十余年，誉隆全国，万万不可轻弃。敌人得陇望蜀，应共筹抵御不可自生内战等云云。

   同年秋蒋公五十寿辰，南京发起捐资购机祝寿。我国驻英大使电新加坡总领事，劝马来亚华侨捐飞机一架，国币十万元。总领事向余提议，余云：“居留政府对募捐例须请准方可进行，况飞机属军械品能否许可未可知。窃思如蒙许可，须联络全马来亚，庶小埠市不致向隅。”乃向当地政府请求，即获准许，出余意料之外，由是感觉英政府对我国方针已变，心中无任欣慰。总商会传集各界会议，举余为主席，宣传驻英大使电，按全马捐十万元购机一架。余按马来亚诸大埠俱能独捐一架，其他小埠不免向隅，余经请准当地政府，联络马来亚各埠合作。即决议成立“购机寿蒋会”，登报并通函全马十二区侨领，到吉隆坡开会，计捐国币一百卅余万元（其时坡币约六十余元申国币一百元），概汇交南京购机。

   民国廿六年七月七日事变，马来亚华侨多埠发起募捐救济祖国难民。新加坡爱国侨胞，自余询问以落后为言，余答：“战事尚未显明，若可息事则无须筹款。如成战争，关系国家民族存亡，事体极为重大，期间亦必延长多年。开会筹款当有相当计划，不宜急切轻举贻误成绩。可将此意告总商会，预向当地政府接洽，许可于必要时开侨民大会。”越至八月十三日战事已发动。即由总商会登报传单，订十五日开侨民大会，捐款救济祖国伤兵难民。十四日英政府华民政务司佐顿君邀余谈话。问“明天赴会否？”余答“赴会。”“将举汝为主席否？”答“不知。”佐君又云：“经与总督议定，此会当由你负责，因本坡华日侨民众多，政府甚为关怀，并附带四条件为明天会场要旨。（一）不得表明筹款助买军火，此乃中立国应守规例。（二）不得提议抵制日货。（三）款须统筹统汇，不得别设机关。（四）款汇交国内何处，由总督指定。”又云：“总督经发电询驻华英大使，待复告知。”余归后即电南京外交部长，速与英大使接洽，款切须交政府机关，华侨方能信任多筹，全马侨胞亦可统一汇交不致分散生弊也。

 八月十五日侨民大会开会，举余为大会临时主席，余即将昨日华民政务司佐顿君所示四条宣布，言我侨如要筹款有成绩，当注意遵守。即通过本会名称曰“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规定委员三十二名，闽十四，潮州九，广州四，琼州客帮各二，三江一，由各帮自选。大会授权委员会行事，再由委员会选主席及各职员，议决后余即宣布：“今日大会目的专在筹款，而筹款要在多量及持久。新加坡为全马或南洋华侨视线所注，责任非轻。然要希望好成绩，必须有人首捐巨款提倡，此为进行程序所必然。昨经叶玉堆先生自动认义捐国币十万元（时坡币五一五申国币一百元），余则承认常月捐至战事终止，每月国币两千元。”

越日召开委员会，举主席及职员，举余为主席，议决办事处设怡和轩俱乐部。所有捐款概作义务捐送，不收政府公债券，不得另设其他筹款机关，凡募捐款项，概汇交中央政府行政院收赈（此系总督接英大使复告）。至募款分特别捐及常月捐两种，各帮自动极力进行，并于市区外劝设分会三十余处，以期普及侨胞。规定坡中三大游艺场，每两三个月为筹赈事轮开一次，其他复有演剧、游艺、捐箱、卖物、卖花、报效、游海等等募捐手续。特别捐每年复向华侨捐一次或两次，每次降减甚多，亦有不肯续捐者。至常月捐除较成宗外，若月薪甚麻烦，店东多不负责，越久越稀故成绩无多。抗战经年之后，常月捐大半靠货物捐，树胶每担一角逐月三万余元，他如米、糖、鱼、枋木、什货等约五六万元。特别捐、常月捐、演剧、游艺及各分会八九万元，共每月义捐坡币十七八万元。论输款，闽侨较有成绩，诸募捐员及出资之人，往往以他帮为言，及闽侨开会，余常告以闽侨应多捐理由。抗战重要在出钱出力，我闽省出兵力不及他省，我闽侨应多出钱，以补省内出力之不足，劝捐员务希以此勉励。至于抵制日货事，成绩颇佳，剧烈且持久，此系另一部分热诚侨胞负责工作，虽身入囹圄不辞。然英政府大不似前严格对待抵制工作者，又如各货捐实犯其法律，我侨虽私相授受，而彼知之甚稔，且全马仿行多年如是，不但未有禁止，亦绝未来干涉，其特别优容，使余铭感无任也.

马来亚原分十二区，抗战后各区均组织筹赈会，然无总机关领导，不但筹汇不能一致，亦无可比较及激励成绩。各区侨领能原谅同情者虽多，而偏忌自高者不无其人。故对于召集开会事，余不得不慎重考虑，但求能一致进行，绝不计是否领导名称。故思变通办法，函请各区会准国庆日，派代表到吉隆坡（该埠为全马中区）作谈话研究会。议题为：（一）“所筹款项是否概作义捐？”因南京政府宣布汇款概给回公债券，菲律宾已接受，马来亚诸区亦有接受者。（二）至本年终，全马按捐筹若干，各区如何分配承认。（三）所筹款项是否一律汇交行政院？（四）不组织总机关及举临时主席。计四条议案。及开会时代表百多人各区均到，多数主张须举一临时主席，正式开会，乃举余为临时主席。余言义捐不应换取公债理由，“如可取公债，则资本家及稍成数者将免损失，大多数劳动界捐出一元数角，则白牺牲，其他演剧、游艺、捐箱、卖物、卖花等杂捐零毫碎如何办理，故新加坡筹赈会经通过，概作义捐不取公债。至公债事项待后另行劝募。此次抗战救亡为有史以来最严重之国难，国民须尽量出钱出力，海外华侨只负出钱一项而已，若不作义捐而贪取公债，出钱之义何在，且何以对祖国同胞？”于是全体决议不取公债。第二项认捐数目案，决议至年终坡币一千万元，新加坡负担三百万元，余各区分摊。第三项决议概汇交行政院。第四项诸代表谓虽不设总机关，亦当设一通讯处，俾可与中央政府及马来亚各区会通消息，乃举余为马来亚各区会通讯处主任，余将离新加坡来吉隆坡时，已知孔祥熙院长由欧回国，国庆日可抵新加坡，即留函报告：“马来亚义捐，至年底可募国币二千万元，救国公债须待新年方能进行，至多亦二千万元。”彼接函后即发电来吉隆坡祝开会成功，并谢侨胞热诚义举。

南京政府对敌抗战后，首次拟发救国公债五万万元，按新加坡四千万元（包括全马），付交余及其他两人函件并证书。余按此办法不妥，必乏成绩，盖三人均闽侨，而粤侨未有，且以新加坡一处领导全马亦不可能。余即复函开释缘由，提议“新加坡须添增粤侨某某三人，马来亚分十二区，除新加坡外他十一区各有筹款机关，领袖某某请各直接寄交诸手续”云云。总领事闻知余接公债证书消息，即与新加坡、吉隆、霹雳侨领暗中联络，一面向本坡政府要求立案，成立马来亚募公债机关，一面电告南京政府，云余不肯负责募公债，他等以为募数千万元公债易如反掌，其意要居此虚荣功。政府即派广东交涉员刁作谦南来帮助，向坡督及华民政务司运动，结果拒绝要求，仍委筹赈会由余负责办理。盖彼等如何努力向当地政府运动，余绝不与闻，念均属义务，甚愿相让，无如坡政府不肯。可叹者我外交官及数侨领，在此国家危险时代，尚不自量力而犹醉心虚荣也。

  民二十七年春，政府复派募债员南来，其时余亦以首期义捐已办妥。应进行劝募公债，然仍必由新加坡发动较为有效。但须先觅有人认购巨额，方能影响本坡及全马。乃向数位富侨提议未遂，余不得不自己负责。于是召集侨民大会，宣布募债缘由。“政府发出五万万元救国公债，分配马来亚四千万元，余按不能如数办到，然至少亦须接受半数二千万元，庶免过负政府期望。以二千万元核计，新加坡区应负担六百万元，此项巨款非全侨努力不能足数。余经济有限为诸君所知，然为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愿购十万元（汇水坡币五十一元半申一百元）。”于是在场认购二三十万元。再后积极进行，至秋间结束仅五百余万元。而马来亚诸区虽有进行，或观望不前，或成绩不佳，后经政府及余再三催促，延至年终截止约一千余万元。统计全马一千五百余万元。盖我国政府公债，前时未曾推行海外，而上海市公债时价，每百元常行五六十元，南洋华侨银行素不肯典押我国公债，有此种种阻碍，故推销困难。况义捐劝募逐月进行亦一原因。回忆暹罗华侨对公债事，因南京政府托某银行办理，该行在暹京无何势力，又不自量力，不让总商会接办，致诸侨商袖手观望，故无成绩可言。缘许时暹政府尚未排斥华侨，若付托得人数百万元或可办到也。

 七七抗战后冬月，闽省府派数代表来，系闽南人，萨镇冰亦同来，云：“要筹款二百万元救济闽省，否则，夏末青黄不接，惨状难言。”余告以“现下绝难办到，理由有三，抗战后侨民大会及本坡政府约定统一机关，凡所收款概须汇交行政院，一也。国庆日全侨在吉隆坡开会，决定义捐坡币一千万元，限本年底筹足，新加坡数额须三百万元，现尚推筹未足，二也。中央政府责成马来亚华侨，须认购公债四千万元，余按至多承受二千万元。在吉隆坡开会时，余主张待新春开始劝募，而各区代表多欲同时与义捐并进。然俗语云针无两头利，新加坡公债须负责五六百万元，必待新春开募，且不知若干日月方能筹足，三也。以上三件事均系全马议决在先，万万不可违背失信，私为闽省筹募，此乃最易知明白事项，望诸代表原谅”。而诸代表有不明白之人，纠缠月余不休，且听人怂恿，谓闽侨另筹确有效果，余告余既负总筹赈汇交中央政府之责，无论如何在新年夏季内绝无办法，他闽侨言可另筹，汝可请他另立机关劝募，何必纠缠不满。后诸代表往吉隆、怡保、槟城，到处如新加坡应酬招待，各埠均许筹国币五十万元，系股份式做兴办农业之款（时坡币五十五申国币一百元），并有侨领同诸代表来新加坡，要余赞同亦认五十万元，共二百万元，使诸代表不致空手回去。余云：“做事须务实，若轻诺寡信，他日空雷无雨，反贻害本省，此等事余决不效尤。试问贵区会议定救国公债额数过期数月已募若干？”该侨领答：“尚未起手。”余则驳以“何故迟延，可见未有把握故尚迟廷。新加坡应摊五六百万元，开募月余仅二百余万元，尚欠之额不知须延迟至何时，且大半靠闽侨负责。贵区迄未动作，兹又欲增加省款，非至两败俱伤不已。在平时对故乡事犹当脚踏实地，何况抗战严重期间，已许中央筹募公债战费，安可迟误失信。无论如何必待数月后公债募有把握，方可筹及省项”云云。该侨领无言可答，而诸代表中难免有含不满之意者，及余回国尚有余言也。

    七七抗战后，菲律宾李君清泉来函，言：“南洋华侨应在香港或新加坡，组一筹赈总机关，领导募款。”余复函谓：“新加坡乏相当之人请转商香港较妥。”越后又接荷印吧城庄君西言来函，嘱余在新加坡组南侨总会，所言目的与李君同样，余辞以乏相当才望，不敢接受。越年（民廿七年）夏末，忽由新加坡总领馆转来重庆孔行政院长电，云：“吧城庄西言先生建议，应由君在新加坡组筹赈总机关，领导各属华侨筹款。本院已委外部，电知南洋各领馆，通知各属侨领，派代表到新加坡开会，希筹备一切。”余以国府命令当然接受。于是登报并通函英属香港、马来亚、细甸、婆罗洲、荷属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西里伯、美属菲律宾、法属安南、及暹罗等处各筹账会、慈善会、商会，订十月十日国庆目，派代表来新加坡开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代表大会，并限定大埠十二名，次八名，又次六名，旅费各自备，附列重要议案，（一）总会名称；（二）地址；（三）举主席及职员；（四）各埠会承认常月捐义款每月若干；（五）各代表提案。须于开会前七天交到本筹备处。

南洋各属华侨代表到者一百八十余人，唯香港及暹罗代表最少。其原因香港粤侨十居八九，自抗战以来年余，尚未组筹赈机关，故无举派代表参加，只有闽侨一部分派两代表而已。至暹罗商业最盛者为暹京曼谷。华侨亦最多，其时暹亲日派执政，禁止华侨捐款汇寄祖国，故代表无法选派。唯暹京外诸埠秘密派人参加。新加坡华侨无相当大会堂，乃假距市五英里“南洋华侨中学校”礼堂为会所。布置颇堂皇，并拍有声电影。祖国重庆及各省主席，或战区司令长官，多来电祝贺。开会时举余临时主席。各处代表演说后，越日正式开议。对第一条名称决议曰“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次办事处地址在新加坡。三举余为正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四各埠会承认常月义捐国币四百余万元（规定坡币三十元申国币一百元）。又议决一条谓政府如派任何官吏南来，须先征本总会主席同意，由主席函知各属会方得招待。其他议案及规则颇多。

      本年五月中旬，寇陷厦门，难民逃鼓浪屿。鼓浪屿中西各界即组国际救济会，电请南洋各地华侨筹款协助。而福州救济会陈肇英、陈培锟、林知渊等君来电要求华侨电请中央派兵援闽，并筹汇赈裁，当时庚曾复电云：“华侨不便过问中央军政，请自行设法，至救济事，待必需时当即进行。”旋接菲律宾李清泉君函电，倡议召集各埠侨领在香港或新加坡开会，讨论援救华南事宜，吧城庄西言君亦来函表示此意，而集议地点则主张以新加坡为适中。庚对李庄二君之征询，概用函复：同意集议研究加强筹款，而不同意牵涉军事政治。至以新加坡为集会地点一问题，庚鉴于马来亚情形之复杂，及过去召开联合会之经验，深感诸多困难，未敢接受。此函复后，即未有再通消息。事隔两月，至七月三十日，忽接孔院长自汉口来电，文云：“陈嘉庚先生，庄西言建议，在星组织华侨领导机关，此项组织，有无必要，环境能否许可，如何组织，始有成效，盼核复，电谕，孔祥熙世。”庚即电复如下：“重庆孔院长鉴，来电悉，菲荷各属，前曾对庚建议，集星组织机关，意在请求中央援闽，及研究筹款成绩，然关于军事，庚不赞同，若筹款则可，环境无问题，如以国府命令电各属埠，集星组织机关，研究有益筹款，庚甚欢迎，并可资以激励督促，如赞成，乞电示奉行，陈嘉庚叩世。”除来函电而外，又复沉寂，约廿日，高总领事过访，称接孔院长电，委查召集各属侨领来星开会事，庚乃将经过情形一一详告，数日后高总领事再接孔院长电，通告各驻地领事，传知南洋各属侨领来新加坡开会，其范围包括菲律宾、香港、安南、暹罗、缅甸、苏门答腊、爪哇、望加锡、婆罗洲、马来亚等，于是庚忝居新加坡筹赈会主席，分属东道，乃负责筹备一切，并订双十节日为开会日期，虽日期仅余三十多日，唯南洋各地侨胞均早已闻讯，有意奉行我政府命令者，选派代表参加，自不至如何逼促也。大会之期既届，最先到者为菲律宾代表。其他各埠代表相继奔临，至为踊跃，暹罗因环境关系，未便公然多派代表，然暹京、暹南、暹北，亦均有人出席，香港华侨财力，以粤侨为最，不意粤侨出席者竟无一人，苏门答腊各埠参加，独首府棉兰与其近属，乃反放弃，查系前时各设机关，未有联络，迨大会前夕，方组总机关，故不及举派代表，其他数处来函，称因事未便派代表，唯愿拥护大会一切决议案，并愿加入总会为会员。至于上述暹罗一地，因环境所限，爱国侨胞不能充分显示其精神，然此后抗战前途愈呈光明时，则该地环境自能随以转变，以该地侨胞之众，将来筹款成绩当不至逊于马来亚。他如香港粤侨，去国最近，观感最切，富庶又为华侨冠，今后亦不能多所贡献，另有若干地方组织欠完善或事阻未克参加者，尤希速谋改进，加入总会，以通声气而收宏效，此次出席代表，计四十五埠，凡一百六十八人，实南洋华侨史上所未有，亦云盛矣。大会既告闭幕，此一次南洋华侨大团结之空前盛举，已成为历史上不磨之记载，会中重要文件，兹已编成报告专书，爰将经过情形，摘述梗概，以弁简端。廿七年十一月。

    吧城庄西言君前向孔院长建议：南洋各属侨胞应推派代表集新加坡开会，组织最高救亡领导机关，使筹赈购债汇款及其他救亡工作得收统一行动之效，而加速进展。菲律宾李清泉君亦持此主张，二君曾先后以函电询庚，帷间涉军政问题，故庚未尽赞同。日者，庄君重提此议于孔院长，孔院长乃电征庚意，并承高总领事过访面商，庚即以集会目的如在研究筹赈购债汇寄信款及国货问题，当甚赞成为答，现此事经拟进行，至领导机关云者，乃各侨领集思广益，组总会以相联络，而非操事权于少数人或个人，各埠侨胞自应明白此义，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前提，服从政府指导，而体庄李二君之意，俾斯会得告成功也。南洋各属包括香港、菲律宾、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安南、暹罗、缅甸、马来亚等地，以地理位置言，新加坡实居中心，以华侨人口言，马来亚亦居多数，庄李二君所以主张召集各属华侨代表会议，组织最高救亡领导机关于新加坡者，盖即以此。自卢沟桥战事发生，我南洋八百万侨胞，奔走筹款，不遗余力，而时至今日，义捐公债成绩，合计不过国币六千余万元，平均每人负担七八元而已，视敌国国民“七七”一日献金四千余万元，相去霄壤，能不惭愧！以吾侨财力与敌侨较，盖远过之无不及，而国家遭遇之痛苦，又十百倍之，乃物质上为助于祖国抗战者若是其微，则中间显有许多亟待改善之缺点，此我南洋各属侨胞不能不集会研究者一。敌自一九零五年战胜俄后，跃为一等国，欧洲大战又假以造成富强之机会，于是黩武穷兵，蓄志侵略，积极谋我，垂数十年，“七七”变起，敌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夺我华北，我最高领袖，蒋委员长鉴于最后开头已至，毅然发动全国长期抗战，一年余来，愈战而我之人力愈强，愈战而我之物力愈充，最后胜利属我，已为理势所必至，列邦所共许矣，然最后胜利云云，究非时间所能倖致。而宜以长期抗战争取之，此欧美军事专家所以有“时间为日本之敌，中国之友”之论也，是则今后敌我兵连祸结，历三年五载而不休，或亦意料中事，而欲支持我之长期抗战，并保证最后胜利之属我，则军事上之机械部队，尤当加紧整顿。国防建设，尤当充分完成，凡此种种，皆有待于后方国民之协助，华侨安居海外，独免流离转徙之苦，天职所在，更宜感愤惕厉，黾勉有加，使输款益臻普及，而无复见不出钱之人，此我南洋各属侨胞不能不集会研究者二。南洋侨胞逐月内汇寄家之款，总计不下千余万元，间接增厚国家经济力至大，数月前敌陷厦门，扰及潮汕，闽粤海疆，受制益甚，而各该地原有银行或缩或停，一部分民信局则乘机取利，抬高手续费，于是吾侨寄汇信款，颇感困难，幸中国银行负起责任，遍设办事处于闽粤内地各城市乡村以谋补救，款无论多寡，地无论远近，路无论通塞，皆乐予收汇，而汇水又甚低廉，近月来我侨胞远处乡国之父母兄弟姐妹，得如涸鲋获苏于勺水者，泰半恃此，然中国银行仅设分行于新加坡，其他南洋各属尚付阙如，则除新加坡及其附近各埠外，他处侨胞寄汇信款之困难，仍未解决，是项困难不及早解决，直接固足以影响吾侨故乡之经济，而内汇锐减，间接亦足以影响祖国抗战之前途，倘新加坡成立一相当机关以通南洋各属侨胞声气，而金融亦设法由此流转，使僻远侨胞同感交通之便利，则于国于家，皆有大益，此我南洋各属侨胞不能不集会研究者三。抗战军兴，我政府迅集巨大人力开辟西北西南等省交通线，铁路公路，双管齐下，期使内部脉络相连而远达邻境，以解除敌人锁海之威胁，及今战区难民内移者达数千万人，而丰富资源亦得赖以开发，奠建国之基于风雨飘摇之日，启复兴之运于河山破碎之时，操心弥苦而抱志弥坚，努力愈大而收功愈著，将来寇氛一扫，转贫弱为富强，特俯仰问事耳，吾侨爱国，素不后人，则于建国复兴之大业，何可袖手旁观，而不速图自效耶？此我南洋各属侨胞不能不集会研究者四。综上四端，实有召集南洋各属华侨代表会议组织最高救亡领导机关之必要，孔院长所以深致关怀者，盖亦同感，现各大埠由孔院长或领事直接通令准备，其他政令难及之区则由庚代为传知，并订本年国庆日为开会日期，凡已正式成立筹赈机关之大埠，应请从速举定代表以便来会。而该埠辖内之各小埠分会或支会皆属之，不必另派代表，例如马来亚分十二区，每区有一筹赈会，大会仅承认各该区筹赈会推派出席之代表，其余各该区内诸小埠之筹赈分会或支会如另有代表，则大会不能接受，若各埠会不能推派代表参加者，则其所属之分支会便可直接派代表出席，其职权概与各埠会代表同。此外若干不相统属之小埠或偏远孤僻之地，应请迅自组织机关与大会直接联络，除修函奉达外，特另文刊登各埠报纸，如函有未达，仍希自动示悉，并举代表依期参加，至大会议程及其他有关文件，经交托各驻地领事馆代发，请就近询取，或函索即寄。

**一 孔院长来电垂询三问题**

本年七月卅日接汉口孔院长来电称吧城庄西言先生建议在新加坡组织领导机关，电文中提出三问题征询兄弟意见。

* 领导机关有无组织必要；（乙）环境能否许可；（丙）如何组织始有成效

兄弟对此三问题，抱如下见解。

第一条，兄弟认为组织领导机关，确属必要，因为世界上任何事业，若有组织，能合作，当然有益无损，若无组织，不能合作，则散沙之弊，实所难免。以兄弟经验而言，如前年马来亚购机寿蒋运动，若无组织总机关，不但成绩将减弱，而且各区内之小埠亦将不能统一区会机关，其领导者何人，所筹款数若干，亦皆无由得知。又如抗战以来，若非在吉隆坡举行联合研究会，组设通讯处，则各埠汇款亦不能统交行政院，义捐亦不能概免换公债券，义捐公债数目不得而知，全马组十二区筹赈会及领导者何人，国内政府亦必不能获悉。政府既不知若干区会及领袖为谁，则劝募公债事宜，无从委托，或委托不得其人。种种弊端，势且因而发生。若全南洋各属华侨，能推诚合作，共同设立总机关，则其收效之宏，更不待赘。故兄弟认为领导机关，必须组织。

第二条，属于环境问题，兄弟接孔院长电时，曾先用口头通知当地政府，后复写函正式奉告，已不成问题。

第三条，如何组织始有成效，此条兄弟有两项见解，一、若由政府命令侨领组织，当然较有成效；二、各属侨领集会如何组织，方有成效，对于前者政府已命令各驻地领事召集，兄弟不过负责筹备而已，对于后者则端赖今日到会诸领袖贡献高见，兄弟识见有限，惟望大家集思广益，俾组织周密，办法妥善，以完成抗战后方任务，而尽国民天职。

以上所言，即兄弟对孔院长来电所提三问题之见解，兄弟复孔院长电及对高总领事面商内容，除军事政治不谈外，当然承认组织领导机关有必要，反过来说，兄弟若复电认组织领导机关为无须，将不免有三失误。

甲、悲观畏缩，见义不为，如富人有钱不出，减少抗战经济力量，于祖国为不忠。

乙、除军事政治外以必要而欺为非要，对政府郑重垂询为不诚。

丙、妄自菲薄，误认海外华侨无觉悟心，无团结力，以自侮辱，谱位试设身处地，究竟可否放弃此职责，而设词推诿了之乎，兄弟知在座各代表必能共体此意，而不轻易放过此机会，至会后有成效无成效，完全视我各代表之精神态度为转移，按南洋华侨八百万人，而出席代表不出二百人，则每人实代表四万余人，我侪所负责任，不外指导宣传出力工作，增加筹款效率，事轻易举，不难办到，绝非挟泰山超北海之类也。

**二 从利害研究有无组织总机关必要**

凡事无论大小，必须先审利害，以为进退，如害多利少，当然不可干，如利害参半，则放弃亦可，如明明利大而害小，甚至有利无害，乃欲借故反对，意气用事，在国家无事时，尚且不宜，况今日何日，今事何事，稍能爱国者，何忍出此，致蹈违反政府之命令可乎？今次大会所损失者，不过诸代表须花费多少耳，然所费无多，平日备资游历，尚可增长见识，况目的乃为祖国服务乎！至成立总机关后每月应开之费，除报纸多能尽义务外，余者该处自能负责，亦免支取筹赈会分文。

**三 大会筹备之经过**

甲、孔院长电高总领事请各属侨领集星开会后，本筹备处立即印发通启秩序议程及其他有关文件，托由各驻地领事转寄各埠侨领，如菲律宾、香港、安南、爪哇、苏门答腊、望加锡、婆罗洲、暹罗、缅甸、马来亚等地，亦有一部分由本处直接寄交各埠商会或筹赈机关，共计五六千件，想各属侨胞均已接到，不至遗漏，此外并在各属埠登报通告或七八天或十余天。

乙、敝埠华侨未有相当地点，可为此次大会会场，故假座华侨中学礼堂，因距离坡中较远，各代表来往实较不便，请原谅，至略事布置，一为尊敬国家政令，一为各属侨领聚首一堂，机会至为难得，故外表上不能不稍求隆重，至所有物料多属假借或报效者，工作人员亦多自动尽义务，所费实属不多。

丙、筹备以来，前后，接到我国府林主席、蒋总裁、汪副总裁、孔院长、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之训词，及各省主席，各处机关之贺电，计若干件，容请总领事及兄弟并记录宣读。

丁、各属代表共列报一百七十余名，填具履历者虽多，而未填者亦属不少，凡已填者本处俱依报制表，至未填者则无法代填，亦希原谅，如函件遗失或本处疏忽误漏，希即通知，以便补入。

戊、各属代表最先到者为菲律宾，其他或舟或车，络绎不绝，亦有本早方到者，因时间无定，或事前未有通知，又寄寓旅馆多处，到本处招待欠周，深失东道天职，无任抱歉。

**四 大会之意义**

我海外华侨寄人篱下，所有行动应受当地政府法律限制，若对我祖国政府，则绝对自由，因我国政令不能施行于海外侨胞，凡集会结社，无论何人肯否遵行，均可自由主张，故此次代表大会，虽由我行政院孔院长命令召集，而通过何项议案遵行与否，总机关实无权干涉，惟抗战严重期间，凡我侨胞自应精诚团结，集思广益，俾能加紧出钱出力，增强后方工作，此为召开大会之第一义，为欲求达此目的，故须组织机关为之领导也。

**五 华侨捐款及公债**

抗战迄兹，近一万万元，每月扯七百多万元，加以寄家信等每月千余至二千万元，合计每月可二千余万元，前日吴主席在香港演说，有云我国战费每日二百五十万元，即每月七八千万元，如此则我华侨对战费几负担三分之一，莫怪我政府重视华侨之助力与最后胜利，大有关系，我侨既知此义，更当增加奋发，源源接济，以达到胜利之目的。

**六 华侨不应对祖国政府随便干请**

我祖国政府自来优待海外华侨，凡事多可直接用函电向国府省府往来，若在国内人民，则情有所见制，级有所必经，当然无此权利，但我政府既特别优待华侨，我华侨自应慎重从事，不可苟且，此尤兄弟所深自警惕者，况抗战时期，军事政治问题，千头万绪，非我海外华侨所能明识，若轻信人言，随便干请，必至动多失宜，在我政府既重视吾侨财力之贡献，遇有请求，不许则有失侨胞之意，迁就则或有损无益，所以吾侨机关如不慎重从事，随便干请，实使政府左右为难，今日举行大会开幕礼，总领事及各位代表，尚有许多宝贵意见要贡献，兄弟不敢多费时间了。

 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建议于荷属华侨庄西言，经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孔院长同意而召集。大会目的在谋组织领导机关，增筹赈款，推销公债，以救济中国抗战中之难民，并协助政府完成建国大业。军政问题，概不讨论。各属参加者有香港、菲律宾、爪哇、苏门答腊、西里伯斯、婆罗洲、安南、暹罗、缅甸、马来亚等地代表，凡四十五团体，一百六十四人。此华侨史上之空前盛会，蒙新加坡居留政府赞许，得于本年十月十日开幕，大会同人谨先鞠致恳挚之谢忱。

       中国立国五千年，夙以和平正义昭天下，不幸邻邦日本，军阀专横，妄图吞并中国以为征服世界之准备。民国四年二十一条件之提出，十七年济南惨案之发生，特荦荦大端，世所共闻者，其他无理压迫，非法要求，擢发罄竹，难以具举。二十年“九一八”日本更挟其坚甲利兵，攫夺中国东三省，继以占据热河。翌年，“一·二八”，又惜不启衅于淞沪。中国自念加入国际联盟，且为九国公约、非战公约之签字国，懔于盟国之尊严，惕于和平之神圣，不得不负重忍辱制愤抑悲，勉循外交途径，以求合理解决，而冀日本之觉悟。乃侵略者野心未戢，变本加厉，转鹰瞬为虎瞰，舍蚕食而鲸吞。去岁卢沟桥炮声，盖世界和平与国际盟约之丧钟，中华民族与人类公理生死存亡之警号也。中国政府鉴于最后关头已至，毅然发动全面全民长期抗战，将以争取领土主权之独立完整，将以争取国家民族之平等自由，故中国之抗战，实为御侮而战，实为自卫而战，实为维护国际盟约而战，实为保障世界和平而战。中国国民政府乃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共同信赖唯一政府，中国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乃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国民政府之主张，即中国全国国民之主张，蒋委员之意志，即中国全国国民之意志。大会同人，集议伊始，用首次决议通电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抗战到底。

       同人于此，愿更揭举数义，为我南洋八百万侨胞告：

       其一，抗战十五阅月，敌财消耗百万万元，敌兵伤亡七十万众，我之物质损失虽巨，敌之物质损失亦巨；我之国土，虽涂满黄帝子孙之血，亦涂满三岛丑夷之血；惟我有无限之资源足以支持，我有无穷之人力足为后盾。忍万屈以求一伸，拼千输以搏一赢，艰苦奋斗，义无反顾，否极之后，终有泰来。敌则资源有限，人力易穷，踵决肘见，百众不安，时间愈延长，危机愈逼近，墓由自掘，祸由自取，行见鼠窜而败，鱼烂而亡耳。故当前领土之沦敌，无关大局，最后胜利之属我，绝对可期。此种理势，吾人必须认识；此种信念，吾人必须坚抱！

       其二，华侨素有“革命之母”之令誉，爱国精神，见重寰宇。“七七”以来，输财纾难，统计不下一万万元，南洋方面，占十之八。此在道德的义务上，可谓已尽；而在国民天职上，究有未完。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能止，则后方之刍粟一日不能停。吾人今后宜更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使国家得借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得借吾人物力一报九世之深仇。而吾人之生存与幸福，亦庶几有恃而无恐。大会开幕之日，我国府林主席之训词曰“急难轻财，护兹祖国”，我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训词曰“财力增厚，即战力增强”。林蒋二公，语重心长，凡我侨胞，宜皆铭诸肺腑，奉为金玉。而各代表所报告，今后常月捐义款，总计每月约近四百万元，尤当分别依其自定标准，努力求其实践。

       其三，南洋各属华侨，山海修阻，云天遥隔，声气欠沟通，感情失联络，常时犹病其不可，非常时更何能集中力量，效劳国家？大会同人，有鉴及此，爰议决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于英属新加坡，期使筹赈购债之效率，得以增强，抗战建国之功业，有所补助。是项组织实现，不特各属筹款机关，可密切联系，而冶于一炉；即全南洋八百万侨胞，亦可精神团结，而化为一体。吾人既共成之，既共有之，则吾人必须养之育之，予之以生命，赋之以灵魂，俾能发挥活力，为国家用。敢假借此组织以遂个人之私图者，固为吾人所不许；敢破坏此组织以快个人之私意者，亦为吾人所不容。

       其四，吾国丰于矿产，啬于产品，故建设难以进步，贸易难以发达。今欲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借自力之更生，谋自强之不息，则开发矿藏，推销产品，实不容缓。唯政府专力御侮，未遑兼顾，海外侨胞，应速分负其责。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之设立，于此亦将加以注意，务使国产品深为侨胞所认识，永为侨胞所乐用，以振我工商业，而厚我经济力。更拟组织公司，开发祖国富源，维持难民生计。凡此加强战时经济机构，奠定战后复兴基础，皆属至急之要图，为我国内外同胞所当尽心尽力以求之者。

       其五，南洋各属当地政府，平昔爱护华侨，不存歧视。此次吾国发动抗战，各属侨胞，本慈悲之怀，为救济之举，当地政府皆能深表同情，予以协助。凡我侨胞自应致其敬佩与感谢，然各属环境不同，法律不同，我侨胞宜各顺适环境，遵守法律，屏叫嚣而尚沉着，崇理智而制感情，步伐必求其齐，路径必取其正，使各方获好印象，而利我进行。吾人须知，吾人之敌，只有一个。敌以外皆吾人之友，吾人应以左手拳挥以击敌，应以右手伸掌以握友，然后足以孤敌困敌，然后足以加速博取最后之胜利。

       以上五端，为吾人之态度，亦为吾人之方针。本此态度，循此方针，以求达目的，则在乎大会全体代表与南洋全体侨胞之共同努力，大会同人谨乘休会之时，更郑重致意曰：惟精诚始足以言团结，惟团结始足以言力量。精诚充，则团结未有不固；团结固，则力量未有不宏。愿我八百万同胞自今日起，充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为我政府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鞠躬陈词，幸相与勉之。

       中华民国廿七年十月十六日

       谨依据代表大会决议：“总会应行订定各种筹捐赈款办法之细则，及其方式，通告各属会尽量采用。”一案特草拟本文筹赈办法举要，都为十二种类，以供各属会参考，而采用之，在此十二种类之外，各属会如有更切实有效之办法，亦得举报本总会分达各处。

**一 特别捐**

甲、每若干月相机出捐一次，视地方景况而决定之。

乙、逢大纪念日，可倡行献金运动。

丙、采用国内新发生某种灾难名义，即同时进行特捐——例如黄河水灾等类。

丁、国内有何种倡捐，在时间上急需者——例如劝募寒衣等类。

**二 常月捐**

甲、各行店公司应捐认者。

乙、各店员伙伴应捐认者。

丙、自由职业应捐认者。

丁、劳动界应捐认者。

按此项常月捐在都市而外，并应推行各山内、乡村，以求普遍，办法应雇员催收，如各地方有热心家负责催收更妙。

**三 货物助赈捐**

甲、出产品或入口货。

乙、如与环境有关者，应设法避免干涉。

丙、此项货物助赈捐，如办理得妥时，实惠而不费，最可持久。

**四 纪念日劝捐**

甲、一月一日开国纪念，及旧历正月初一、二等日（约阳历二月间），可借此年节劝侨胞节省各费助赈。

乙、三月十二日总理逝世纪念日及三月卄九日黄花岗烈士纪念日择一举行。

丙、五月九日国耻纪念日。

丁、七月七日卢沟桥惨案纪念日。

戊、八月十三日抗战纪念日。

己、九月十八日暴敌入寇东三省纪念日。

庚、十月十日国庆纪念日。

辛、十月卅日蒋委员长寿辰纪念日。

壬、十一月十二日总理诞辰纪念日。

癸、十二月廾五日云南起义纪念日。

按每逢纪念日劝捐办法，或口头劝募、或演剧、或卖纪念品、或卖花，均可随时地而决定，其中唯卖花较为简便，若距离月余或二个月举行一次，虽颇麻烦，然以国难严重关头，出力出钱，固应勉为其难，爱国侨胞，当能原谅，而乐表同情，若逢一月之间，有两纪念日者，可以就地变通，观局打算，总求加强筹赈成绩是也。

**五 卖花卖物捐**

甲、每逢纪念日组织卖花队出发，向各行店及个人劝售。

乙、要以广大队伍普及劝售，求成绩之伟大。

丙、卖花而外或兼售别种纪念品物，如蒋委员长像章等类。

蒋委员长像章铜质每个大宗六占余，镀银约近一角，镀金约近二角，如需要可代介绍购办。

**六 游艺演剧球赛捐等**

甲、此数种之中，各有不同且多属娱乐性质，虽每月多举几次亦属无妨。

乙、场内卖票，多出游客自由购买，若场外买票，则须用工作鼓励，方有成效。

丙、场内货物，多用征求义务捐助者。

丁、场内卖物，亦有当场鼓励顾客加价之效率。

**七 舟车小贩之助赈捐**

甲、舟车小贩等应经若干时日，请报效一次，须察情形而定，但应派员鼓励，方能有效。

乙、每次给以救济箱，收来若干，应为之表扬，俾互相观感。

丙、报効之日应大书特书，挂布表扬，俾买者更不计值，而多捐助。

**八 迎神拜香演戏捐**

甲、迎神等虽近于迷信，然习惯难除，便宜利用，有此机会宜劝诸当事人节约开费，移款助赈，此举甚有效果。

乙、旧历七月盂兰盆会（俗称普度），此项习俗，耗费更巨，若能设法利用，鼓励其节资移赈，收入定必不少。

丙、各社神诞香火热闹，人山人海，彼等虽为迷信诚心而来，倘乘机组队，卖花卖物，亦可收巨效。

**九 设救济箱于公共场所**

甲、制木柜高二尺余，尺余方，柜后面墙枋高出约十寸，绘一伤兵或写标语，以引致观感。

乙、该木柜安置于公共出入场所，或任何大机关门户口，托其所内人员兼管。

丙、该木柜应加封锁，按若干时日，由筹赈会派员会同所内人员公开核算，得若干赈款即给收据，并表扬之。

**十 宣传有效方法**

甲、多设阅报室，及壁报，任人观阅。

乙、另拟白话文告，隔若干时日，印发一次。

丙、利用世俗各种纪念日，做演讲会，会场或借戏台一半小时便足。

丁、通俗演讲，意在感化文盲，切勿多用文言，宜用乡土浅白之语句，能令男男女女家喻户晓者为要。

戊、通俗演讲，每人不过半点钟，讲时应简短，及能感动者为合，并多招演讲人员，每次集会，至多一点余钟，至二点为限。

己、注意在市区外各山芭村落演讲，俾能普及出钱。

**十一 各处应多设筹赈会分支会**

甲、各埠市区之外，所占地域更广大，应派员向各内地乡村鼓励，组织分支会。（语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无论何处，吾侨定必有热心家，可负其地方之职责）

乙、分支会若有成立则其常月捐或何项特捐，定有多少可以增加收入，在组织初期，应宜派员指导。

丙、乡村内地如多设分支会，则必互相观感互相竞进，盖不甘后人，不甘受不爱国之恶名，此乃我民族之特性，但期各埠会领袖，尽力设法领导为要。

**十二 各埠会常月捐应求有进无退**

甲、各埠会对此次大会报告之常月捐额数，此后当求增加，不可减少。

乙、要达到所期之目的，势必用心用力，勤事工作，然救国筹赈，责无旁贷，所望负责筹赈会领袖，与同事人员之努力。

丙、本节所谓各埠会常月捐乃包含各埠会逐月收入一切捐款而言，非仅指各类捐款中之一类常月捐而已。

暴敌扰粤，广州告陷。在时间上，可谓意外；在情势上，实在意中。吾侨切于爱国爱乡，难免骤受刺激，然不宜因而丧失意志，更不可因而动摇胜利可期失地可复之信念。盖抗战初发，我最高领袖即已立定三大策略曰“焦土抗战”，曰“全面抗战”，曰“长期抗战”，以对付暴敌。此三大策略果能坚持到底，则暴敌虽有世界一等军备，亦终必失败。兹谨为我全南洋侨胞陈之。

       （一）焦土抗战，所谓焦土抗战者，将不惜糜烂若干领土，使敌于偿付重大代价之后，纵有寸进，终无所得。敌虽有飞机大炮之轰炸，使我田园庐舍，悉化灰烬，然不足以惧我、屈我；敌虽肆其劫掠屠杀之手段，施其恫吓离间之伎俩，然不足以阻我、挠我。反之，我之团结日以坚，我之力量日以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成仁而死、不忍辱而生；宁以焦土葬敌、不以净土资敌；我虽失败于一时，敌必失败于最后。此种策略，实出敌意料之外，而足以碎敌之迷梦也。

       （二）全面抗战，所谓全面抗战者，将精诚团结，举国动员，使处处抗战，人人抗战，不致示敌以弱点，予敌以个别击破。目前敌虽占我江海边地，繁华城市，铁路交通线，然每省被占之地，至多无逾十分之一，其余全在我国手中。我政府更派员组织游击队，而民间壮丁队又从而附益之。无论城市乡村郊原山野、皆有其踪迹，神出鬼没，夜袭昼狙，毙敌日以千百计。如华北之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虽被占最久，被祸最甚，然境土十分之九，仍在我统治下。平津近郊，屡受我游击队威胁。仅此数省，敌须经常留兵二十万左右，犹且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故此后无论敌能再占我若干省，我之游击队壮丁队亦必随之增加，以陷敌于四面楚歌之境。试问敌有若干兵力可分驻许多日，而逐月伤亡盈万，更将如何补充？由是以观，可知敌多占我一省之地，则多损彼一臂之力，似此人力财力有限之小国，而欲妄图吞并地广人众，决心全面抗战之大国，其最后胜败之数，盖不待卜而知矣。

       （三）长期抗战。所谓长期抗战者，将养我之兵，耗敌之力，坚持到底，义无反顾，使敌速战速决之野心，悉成画饼，而逐渐暴露其先天不足之病征，自召政治经济之总崩溃。民二十年敌占东四省，易如反掌，遂得陇望蜀，拟于客年再吞华北，敌初按六星期至三个月即可得手，迨我蒋委员长发动长期抗战后，其狂谬计划遂完全失败。抗战以来，十六阅月，敌于华北尚不能占一全省，况华中华南华西之区域较华北广大十数倍，而能尽为吞没乎？稍有常识之人，当能明白此理，而了然于泥脚之敌终不能久立矣。然敌固自知久战必败，故狡图速战速决。当南京被陷时，敌即请求友邦与我商谈和平条件，为我最高领袖所拒绝；占徐州后，复施此策而无效，最后乃谋急夺广州汉口，以胁我采择和平之一途。观此即知所谓和平计划，即敌之逃死计划，绝非蒋委员长三大策略所能容。故无论何城何镇失守，皆我抗战中难尽避免之过程，于我抗战前途，实不发生恶劣影响，吾侨唯有信仰领袖，拥护政府，尽后方出钱出力之责职，以与战事相终始，则最后胜利属我，期在不远耳。

       抑更有言者，敌占我东四省，已阅七年，费款卅万万元，死亡士兵十余万众，至今仍时时受我义勇军攻击，不得安居乐业。我东四省人口不过我全国国民十分之一，自沦丧以后，无我政府机关为之领导，军械又甚缺乏，财物又甚枯竭，而民心依然未死，民气依然甚盛，相率振臂揭竿，且冒万险，以与强仇抵抗，使其损失与时俱增，而无法解免。今我战区各省人民众多，组织周密，供给领导，日臻完善，抵抗力量视东四省加十余倍，岂容入寇之敌一日得安寝食耶？

       我国地势，河北山东诸省多平原，乏高山深谷可以藏守，尚能遍组游击队，到处活跃。其他诸省，高山深谷，所在皆有，尽为游击队绝佳战地。进可以杀敌，退可以保身。敌之机械部队，更何所施其技。长是与敌周旋，终以使敌消耗巨大，而趋枯竭也。

       我国地大物博人众，居世界第一位，特科学未昌明，实业未发达，故宝藏于地，不能富强。今抗战建国兼筹并顾，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则最后胜利之日，即民族复兴富强之时矣。美国独立战争，初期失败，名城尽失，要地多丧，余众不过万人，卒以华盛顿之坚苦沉毅，百折不挠，长期抗战至七年之久，而博最后成功。今日我国抗战情势，持较当时美国实远胜之无不及，最后成功之希望必更容易实现，断无疑义。一时之胜败，一地之得失，岂足转移我同胞之心乎！愿相与共勉淬励，以加速民族解放之日之来临，幸甚，此布。

中华民国廿七年十月廿七日

 战后补辑

       余写《回忆录》动笔于民国卅二年三月，脱稿于民国卅三年四月，迨日寇投降后，余由爪回星，抵星以后数月来，因事务丛脞，未遑补记。兹因付印在即，特补数则，并将报章所载及余近所撰诸文件附辑于此。  
   民卅四年四月初，日本内阁首相小矶倒台，改以海军上将年已七十九岁之铃木继任，识者已知其将败降。盖自来大权属于陆军，今乃归海军，且以老大之人负此重任，其将屈伏，不待智者而后知。五月初其盟邦德国已完全崩溃，而日本之延迟日子者，无非要求联军减轻投降条件而已。至八月十二日果闻日寇已屈伏投降矣。

       日寇自去年知将战败，乃鼓励印尼土人许以独立之筹备，反对荷人战前对殖民地之虐待。于是土人宣传日广，城市乡村普遍集会，日甚一日。日寇投降后，尚须负责地方治安，以待联军来接收。然传闻纷纷，或云此月内，或云来月初，究实相差甚远。九月半间，风闻土人将抢劫华侨，余乃移住玛琅市。至廿八日接吧城前新报经理，洪渊源君来电，告予如要急回新加坡，有飞机可乘。余复电不日起程。十月一日，余与校友黄丹季等，坐汽车来泗水，午间赴各界欢送会。下午五时搭火车将来吧城，送行者颇众。一等位火车每辆八位，蔡钟长君自费包租惠赠，诸校友伴行者，为黄丹季、郭应麟、陈新盘、林昌平、黄奇策。车行半小时后，有一洋装印尼人来坐在椅边。校友告以包租事，彼答伊“奉其最高领袖令，来此保护华侨领袖，到某站，即换他人”。沿途果转换数次，足见其鼓动独立，只敌对荷人，而对我华侨尚有好感也。

十月二日至吧城，寓于庄西言君住宅，三日厦大、集美诸校友开欢送会，各界参加者数百人。主席致词后，余答谢，并略言厦大、集美两校经过大概，及战后本省及南洋师资必大缺乏。其原因为本省教师素乏，复加以台湾收复，所需更多，而南洋教师为战事改业，及久客思归者亦不少，侨生愿读中文者必多，准是推之，教师必大缺乏。鄙意祖国如有良好政府，则集美学校现移在安溪、大田、南安三处，仍旧勿迁回，而将集美校舍借给政府，专办师范学校，可收学生二千余名，格外优待，在南洋可招初高中毕业及未毕业诸贫生数百人，省内亦然，如此则一年后陆续毕业，可以补救师资之缺乏。余言终，有某校友发言：抗战告终，建国方始，希望校主领导华侨襄助祖国建国云云。余答言，“乏此才力，实不敢当，至祖国现延安毛泽东主席来渝，国共表面上似有妥协之可能，然根本上则背道而驰。不知者只认国内两派不和，究实中央政府方面，将官亦甚复杂。各派均言要行三民主义，究竟谁是谁非？华侨果欲帮助建国，必当分别是非。诸君如要知详细，明天尚有福建会馆一会也。”

       十月四日，早间庄君告余，今日如开会勿道起国共事。有顷郭应麟君告余，伊受郭美丞嘱托，劝余在会场勿言国共事，因侨领等多党人。两郭均为校友，余答：“余不能失信，会场发言亦不能受人限制。且起因出自主人，既不能信仰，何必开此欢迎会，不如取消为愈。”郭君等见余如此坚决，与诸侨领聚商，至午饭时尚未表示如何。迨至开会时将届，不见庄郭等君，有他校友招余同车赴会。抵时各界男女侨胞到者甚众，座位皆满，郭君等亦在场，闻甫欲宣布解散，而余适至，遂即开会。主席致词庆祝余安全脱险及勉励领导华侨襄助建国云云。余答谢云，“余乃侨民逃难一份子，奚敢当此盛大欢迎？适贵主席顾爱奖誉，并勉余领导华侨，对祖国战后帮助建国等项，余实愧不敢当。然既蒙在盛会中表示，余亦不得不发言，鄙意会场中发言有三种：一、漂亮话；二、敷衍语：三、老实话。漂亮话余平素不会说 敷衍话，难免使诸君失望；若言老实话，恐为一部分人不喜听。如此则深无言可说，但既不能不说，又不得不言多少。

       “今请言‘爱国’两字。然爱国范围甚广，姑从抗战建国与我华侨之关系言之。抗战需要金钱，而建国必先认清是非，如是非不先认清，则政治上一切建设，都无从谈起。余于民廿九年春，率同慰劳团回国时，在重庆曾问孙院长及财政部，去年（指廿八年）华侨外汇若干？答十一万万元，其中侨胞家信寄款十万万元，义捐一万万元，此数南洋各属占三分之二，美洲等地占三分之一。据世界公例，国家银行发行纸币，每一元基金可发纸币四元，如此其纸币基金便算稳固。华侨汇回国内，尽是现金。政府如依十一万万元之数目尽量发出纸币，可得四十四万万元。除发交侨胞家信十万万元外，尚存三十四万万元。又据何应钦部长在参政会报告，去年（民廿八年）战费支出为一十八万万元，如将上述三十四万万元之数，再除此一十八万万元，尚存十六万万元，可以供作政费及党费。其时抗战已经三年。余询白崇禧、陈诚两将军：兵士每月每名发给粮饷若干？彼答十一元五角，近因米贵每名另贴米价三元，共四十元半云。查当日每担米价为四十余元。及至南洋失陷后，侨汇断绝，纸币增发，百物昂贵，民不聊生，米价亦由百元升至一万余元，殆由于国币缺乏基金之故。”

       “至于南洋各属义捐，自南侨总会成立，以迄沦陷，计三年余，所有捐款及药品以新加坡币一十五元申为国币一百元计之，更用各属华侨人数平均，成绩最佳者为菲律宾，彼地侨胞十三万人，每月每人捐出五元。次为马来亚华侨二百三十余万人，平均每月每人一元七角半。又次缅甸侨胞四十余万人，平均每月每人一元二角。又次荷印华侨一百五十万人，平均每月每人一元。成绩最弱者为安南一地，侨胞四十余万人，平均每月每人五角。若论自祖国来，而个人又拥资最富者莫如安南，该地富侨黄某为同安人，资产有千余万元，惜以领导失力，群情散漫，捐款成绩，致落人后。抗战已属过去之事，此后全国要集结总力，从事建国，余以为首须认清是非。以国民立场言，若不明辨是非，对国事必模糊不清。古语云，无是非之心，非人也。金钱非人人所有，力量不大，是非之心则人人皆有。我侨在海外有千余万人，既富有金钱势力，若能加以认清是非，对此后建国贡献，比之以前抗战贡献，必更伟大。”

       “我国不幸在抗战时，内部尚未统一，重庆、延安，俨然对峙。双方领袖均系南人，两党名称虽不同，而其所云推行之三民主义则一。（延安言他们是行三民主义，其说详后。）然主义既同，何故不能合作？盖重庆指延安为‘赤’，延安指重庆为‘腐’，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以余观察，战后则必多一中立派。中央、中共、中立适成三中。大都势均力敌。中立派虽未结成团体，其人物则约略可知，如阎锡山、傅作义、李宗仁、张发奎、薛岳、余汉谋以及宿将冯玉祥、白崇禧等是，彼等虽隶属中央，实则貌合神离。三派人物，俱言奉行三民主义，在抗战时，亦尚可勉强合作，此后三民主义必各有其形态，谁是谁非，殊难认清，要在各人肯运用良心与否耳。”

       “余前年回国慰劳，深深注意，国共两党，能否团结抗战，抑或分裂内战，以及两党政治措施究竟如何？故决定既到重庆，亦必亲到延安，以求得知事实。兹先言重庆，重庆政治，可不具论，我华侨都属闽粤人，如已知闽粤两省之政治如何，则亦不难推知重庆之政治状态也。至所谓中立派者，如阎锡山将军，中央许其有十八师军队，但他扩充至三十师，军费不足，自发省币。余告他国共摩擦事，经白崇禧将军拟具调处方案，划定双方界线，各守范围，合力抗战。阎云此非根本办法，须国民党自已把政治弄好，政治好共产党自然没用，否则虽无共产党，亦有别党，可起而反对云。傅作义原属阎将军之部下，自然与表同情，他两人握有军队四十余万。李宗仁虽反共，而与中央亦非十分契洽，蒋委员长之个性，彼知之甚深，对余曾表示过批评。是时李君亦有军队四十余万人。张发奎虽任战区司令长官，然与中央无一贯因缘，未为中央所倚信。薛岳前系张之部下，余汉谋亦与彼等有默契。以上诸人，在抗战时，固然拥护中央，一致对外，而战后拥有百余万兵力，数量实不减于中央。至于中央之正规军虽上百万人，而民主势力已遍布各省内地，统辖游击队二百余万人。故余以为此三者，已成鼎足之势。国共果能真诚合作实行三民主义，则中立者可无问题，设不幸仍旧背道而驰，则三民主义必能露出真伪，谁是谁非，我侨不可不分别认清也。

       蒋委员长待余极厚，虽宴全体参政员，而首席客位则以让余。最后在黄山别墅设宴饯行，筵终适来警报，主客均下山数百步，入避防空壕，警报解除，复再步行上山。蒋公见余未执手杖，乃将自己手杖强让与余，他与蒋夫人携手同登，深情厚意，余终身不忘，然此属私人情谊，至于国家大事，公私应有分界。余甚望蒋委员长更使政治良善，庶以成其不世伟业，保持其无上荣誉也。余自入延安界廊县甘泉县，便注意道旁所经各田野，见其陇头阡陌，一一仍旧。窃思彼等若已实行共产政策，必废阡陌，而成为集团农作，今则田园旧界仍存，心中颇觉疑惑。又见农夫及路人衣服亦颇完好，不似甘肃人之破烂残污，恍似另有天地。

       抵延安之越日，参观女子大学，乃首次与朱德将军相会，将回时，李秘书头部突受车伤，入医院七天，此时期一切参观，李秘书概未参与。延安教育大中小学校均免费，男女大学生衣食住皆政府负担，每月复给零用费一元。公务员每日工作外，须读党义二点钟，每星期上一大课，坐在露天地面。公务员、学生、民众常数千人，听名人演讲。

       “农民产业权仍旧自由，各新垦荒山田园，业权亦属私人。抽税每人每季不论收成何种物品，上四百斤者抽一斤，加收一百斤者，加抽一斤半，至多抽至七斤半为止。新垦田园首年收成免税，民众负担纳税，只有此条义务而已，并无其他捐税。工业如机器厂只有政府创设数家，甚形幼稚，人民仅有多少手工业而已。

       “商业在延安城外，只一道街。延安全城内前住二万多人，被敌炸作平地已无人居。大小商店百余家，均为私人经营，营业自由，政府绝不干预。全年亦无抽税。

       “南洋男女学生及闽南人在延安者颇多，财政长、医院长、司法院长均龙岩人，宣传部秘书陈伯达，惠安人，为集美学生，司法院长亦为厦大学生。

       “余既查明后，问何请共产政治？彼答‘是行三民主义，而非行共产政策。前在江西亦系如是。又自西安事变时，与蒋委员长所立合作条约，更坚守不变’。余问条约内容可得闻否？答‘蒋委员长在西安事变时所议定者（一）日本如侵入华北必须抗战。（二）划陕甘十八县宁夏三县，共廿一县为边区自治政府，直属中央管辖。（三）中央承认共产军编成三师。（四）中央逐月供给军政费国币六十八万元。（五）如与日本开战，中央每月供给枪弹八百万发。（六）以上各条在手续上须经行政院通过，并宣布全国，而共产党须实行三民主义。故自该约成立后，彼已实行三民主义云’。

       “据朱德将军言，彼等‘照约实行三民主义。而中央政府对所约各条件，未尽举行，行政院虽已通过，却未宣布全国，致国民绝不知情云云’。

       “余上言三中鼎足，或者有人以为此乃余之杞忧，余亦乐受不辞。若此次国共会议能真诚合作，实际推行三民主义，建国不难成功，诚我国家无穷幸福。设或不幸分裂，则三民主义又将如何？料不致均为徒托虚名，最低希望，亦必有一方面能真实行三民主义者，战时虽黑白难分，若在战后，无难水清鱼现矣。

       “我海外侨胞，对国内任何派别，只有义务，而无权利。惟有极望国内政府实践三民主义，庶能达到建国目的。欲求建国目的之达到，尤必须先认清是非也。我国政治如能办好，华侨人人心理中之愉快，比之霎时获资数十万元，当更狂喜。何以言之？国家政治不良，回国投资无路，故资本家不论其如何辛苦，积血汗资千百万元，仍与祖国无丝毫利益关系，而在南洋将资本遗子孙，亦每每不逾一世而亡。新加坡闽侨，余所知者，五十年来百万以上之富翁十余家，其身后不坏于无知之妇妾，则毁于不肖之子弟，家破产亡，门庭冷落，声名狼藉，言之可伤。假如国家政治优良，儿女可受高尚教育，而己身投资祖国，机会尽多。中南航路畅通，故乡侨地，两可为家，随意而适。生前事业开拓，身后子孙贤能，令誉可以永保，其乐何如？然此固首赖祖国政治之优良，方可有望也。”

十月六日，上午由吧城乘飞机，午后到新加坡。直到怡和轩俱乐部，屋内修理未竣，用具及各物损失无余，盖被敌占住三年余，方始交回，重整未备。少顷诸旧友接踵来访，相庆脱险平安，及闻侨胞遭难惨况，则悲喜交集，真有不胜今昔之感。

星洲沦陷后笔者经华侨检证之浩劫，幸得脱险。当时甚欲知日寇对于华侨之意见，一日于一小摊购得日文旧书一册，书名《华侨研究》系日本企画院——按此想系日本政府所设，专为计划侵略他国之机关——所编，一九三九末出版，洋洋巨帙，详述南洋华侨之种种情形，以及其抗日工作，事事皆甚明晰，较之华文书报所自述者尤详。日寇大约即用此种报告为根据，以对付我华侨者，阅之不禁毛竖。中有一段专论陈嘉庚先生，可见日寇对于嘉庚先生之注意，先生能安然渡过此长期逃亡之难关，可谓天幸。于兹日寇屈膝，先生归来，侨胞举行欢迎大会之际，笔者欣然释锄，译而刊之，以与侨胞共申庆祝之意。该书第五章抗日诸团体之活动第一节陈嘉庚，所述如下：“若将此人除外，不但马来亚之抗日运动，即凡其他华侨社会活动，均不得考究矣。彼为福建出身，在世界恐慌前，其经济力唱霸全马来亚，发挥绝大势力。（中述嘉庚先生之营业，从略。）其后受世界恐慌波浪所袭，经济上遂致失败，然其昔日之势力仍不减少，其社会地位及声望依然‘独步’，对全华侨有强大之影响力。彼现为星华筹赈会之主席，又为抗日及排斥日货之主动机关，难民救济会之主席，‘奔命’于抗日之运动。一时传闻彼欲辞职，然此系误传，实则彼仍旧在抗日阵营中指挥工作。彼早于一九一三年（应为民十三年）特为排日之目的，而创办《南洋商报》，置言论界于其势力之下，现今其销行额约一万份。去年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双十节，全南洋华侨代表开大会于星洲，任此会之主席者即为陈嘉庚。彼抑制一部分华侨之盲动，而指导之以从事冷静而有秩序之大运动，实一不可侮之人物也。去年七七纪念日，彼在星洲大会中演说，告诫华侨应遵守当地之法律，勿破坏中英之友好关系，而为敌国所笑云云。华军虽屡败，然彼仍不停其怒号。汪精卫脱出重庆以前，曾发表和平愿望之谈话，彼立即电汪云：‘和平谈话将使华侨误解为无继续抗战之意，应排斥和平，坚持强硬态度，彻底抗战救国，以振奋人心’。（译者按此照日文直译，下仿此。）汪复电云：‘我国固反对侵略，然对于国家之生存无害之和平交涉，亦不必拒绝。’陈再打一电表示不满云，‘际此国难，民气愈盛，生而屈辱，毋宁玉碎’云云。其后汪由重庆遁出，发表对日和平宣言，新加坡之华侨遂视彼为叛逆，致强硬通电于蒋介石，请其发逮捕令，此电亦正为陈嘉庚所发起也。其后维新政府电陈嘉庚，劝其赞成和平亲日，陈不过以一笑置之。如上所述，彼陈嘉庚者实为南洋之排日货及抗日之巨头，其风貌态度手腕及‘抱拥力’，正可谓为蒋介石之南洋版也。”

 日寇投降后，余在爪哇即发出通告如下：

      “南洋各属不幸沦陷敌寇三年余，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尤以马来亚新加坡为甚。他如缅甸菲律宾华侨较少，然地当战区，损失必更酷烈。至于爪哇侨胞，遭难虽次，但既受土人抢杀，复被敌寇劫掠物资，几至竭泽而渔，工厂没收或拆毁，略有声望侨胞，多遭拘禁集中营，酷虐待遇，苦不忍闻。其他侨众，虽获些少自由，然拘捕任意，朝不保夕，一入囹圄，释放无期，酷刑虐待，非死则伤。加以公务人员，狐假虎威，助桀为虐。人民疾病伤亡，难以数计。兹幸联军胜利，领土恢复。侨胞损失虽重，然经此困苦难关，追念前昔泛散，此后应有团结组织，亲爱互助，协力同心，俾于两三年内，克复前业，效力建国，实践侨民天职。至于沦陷间，敌寇权威之下，或迫于压力，或困于生计，不得已在营业上与敌交易，不足为怪。若以此为罪，则许多人员为敌服务，政府将如何处置。惟有为虎作伥，任敌走狗，谄媚无耻，利己害人者，此辈虽可恶，然谅极少数，政府必有相当之处置。除此以外，不可居心嫉忌，吹毛求疵，造作构陷，互相排挤。当知侨胞来此，多为谋利计，虽或有积货居奇，料属少数，而大多数人损失，当加百十倍。黄台之瓜，岂堪再摘？倘有获利侨胞，对于救济援助，捐输教育，尤希格外慷慨，因富成仁。至于侨胞惨被敌寇酷刑虐杀，迫取金钻，掠劫货物，应当严惩报复，及请追回，或求赔偿。各处侨领宜速组调查委员会，呈请中外政府，务期达到目的，此为战后侨胞首要之任务也。此布。”

  “万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苏加尔诺先生鉴；鄙人前由爪哇返星，在爪哇时深悉足下所领导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与人民，对中华人民采取友好态度。鄙人兹特向足下表示感谢。惟目前苏门答腊有若干地方，中华与印度尼西亚两民族间感情尚未臻融洽。鄙人以华侨领袖名义，已通知该地华人，务须与当地印度尼西亚人保持最密切之友好关系。兹请足下对各地印度尼西亚人亦作同样通知，以期中华、印度尼西亚两民族间之睦谊愈益增进，无任盼祷。陈嘉庚自新加坡。”

（转录各报记载）

       星华筹赈会，自星洲沦陷后，会务便尔停顿，至今已达四年矣，主席陈嘉庚归来后，觉该会有许多事务，急待继续办理，爰定于本月十五日（星期一）下午二时假座中华总商会举行委员会议，议程如下。

一、报告本会在沦陷期间账单及器物各种损失。

二、报告民国卅一年一月廿九日存在中国及华侨两银行之款项数目。

三、报告沦陷前，曾代英政府雇工垫出三万余元之款项数目。

四、本筹赈会之名义，是否暂再保存，如须保存，各帮委员缺额是否须加补充或更动。

五、敌寇入境惨杀华侨，及检证时被其捕去，与及后来累次掳杀，生死存亡不可胜计。是否须另组华侨机关负责调查，抑由本会办理，以便汇集报告，呈请中英两国政府严惩凶犯，及处置敌国。

六、敌未入境时，侨胞各商店存积物资，多或数十万，少亦千百元（叻币）。迫被占领，非遭武力掠夺一空，即为伪币剥夺以去。现今英政府对于伪币价值若不予相当承认，则吾侨几等于全部破产，损失惨重如斯，前途奚堪设想？又如各工厂原有规模悉被破坏，是否应限期征求各侨商造报工商业物资损失，及所存伪币数目，以便呈请中英两国政府筹划补救补法，并责敌国赔偿。

七、临时动议。（《南洋商报》十月十三日）

       “星华筹赈会为调查敌寇占领马来亚时，吾侨生命财产之损失，特组织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昨假总商会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到会者卅余人，主席陈嘉庚，纪录李铁民。（一）制定调查表格案，议决，分作财产损失及所存军票，（再分商店与个人两种）及人命牺牲，依照所拟格式表通过。（二）调查办法案，议决，分区进行，大坡四区，小坡四区，由全体委员会及襄助员参加工作。大坡推杨缵文为召集人，小坡推李亮琪为召集人，如人数不足，另行增加。至于市区外，仍由筹赈分会负责。（日内召集会议）”（《星洲日报》十月二十日）

       “星华筹赈会调查委员会，已发动大规模调查吾侨在敌寇占领时代，人命财产之总损失。其中如敌寇之宪兵部，特高科以及各种军警机关，逮捕无辜民众，加以种种酷刑迫讯，惨无人理，如所周知，灌水、灼电、灸香、灸香烟头、碾腿、跪玻璃屑等，任意施刑，不胜枚举。该调查委员会为欲制成表式，以便详细调查，兹特征求各界侨胞，凡所身受，或耳闻可靠者，请将其酷刑种类，一一列出，函报“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调查委员会”收，俾便汇集填入调查表格之内，望我侨胞，深切注意，就此数日内，径函报告云。”（《星洲日报》十月十八日）

**南侨总会通告第二号**

       “自敌寇南侵至于投降，南洋各属华侨生命财物，损失惨重。各处若不妥备手续，分户调查，则不能知确实数目，既无确实数目，何以造报中外政府，严惩敌寇，责偿损失。至于办理调查之机关，如由七七抗战后各地组成之筹赈会慈善会等，亦甚相宜。其中如因战争解散，回复为难，则由当地侨胞之新成机构，或原有公团如商会者，负责主持，当无不可。查英属马来亚原分十二区，各区原设有筹赈会。现新加坡区经组成调查委员会，推进工作，按一个月内可以竣事，其他十一区因交通不便，未悉情形如何，是否应行变通办理，最好就地解决。兹付去新加坡区调查表格四种，凡未举行诸区，可以参考，并希从速举办，最迟尽本年内调查完毕。统报本总会，以便汇集转行呈报英政府及我祖国政府，依照公意，请求办理，为死者谋伸冤，为生者谋救济，或不至全无希望也。此布。

    新加坡各社团欢迎会于十月廿一日开会，主席总商会长连瀛洲致词毕，余答词言：

       “余乃侨民逃难者一份子，未曾随同诸君在本坡沦陷区内痛受敌寇凌虐之惨苦，内心无限惭愧，奚敢当此盛大之欢迎！无如报纸已将欢迎事情发表，屡辞不获，再却又恐不恭，只得敬谨接受。

       “适才大会主席要余说话，余首先欲言者，为抗战与建国。抗战之起因，乃由于九一八之事变，九一八罪魁为‘土肥原’，继而七七战争，七七之罪魁为‘近卫’。近卫宣言，欲将中国打至屈膝而长为日本之附庸。其最初计划，按出兵十五师团，三个月占领华北各省，此事世界咸知。又继而敌寇南进，其罪魁为‘东条’。自敌寇败降后，联盟国对敌寇严加处置，首重惩治战争祸首，故土肥原、东条，均已捕禁待审，而近卫则逍遥法外，且仍为高官，居尊处优，威势煊赫，不逊平时。虽美英苏等认七七事变，非其战争主要，而我政府对此深仇大敌，竟亦默无一言，殊觉可异。南侨总会拟于近日致电我政府，主张严惩此寇，以谢我国。”（以下如在吧城福建会馆欢送会所言，见上文，不赘。）

 “陈嘉庚先生赐鉴，暴敌投降，公莅星岛，消息传来，万众腾欢。顷由十团体发起庆祝大会，本月十八日举行，贺辞满壁，到者盈门。会上公决，奉电致敬，祝公康强，为国宣力，和平永奠，端赖老成，盼赋归欤，群情所企。海天万里，无任神驰，谨电奉闻，诸维垂察。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公叩，印。”（十一月八日）

附转载十一月十九日《重庆新闻报》：

       “陈先生，即嘉庚，对人好，谋国忠，一言一动皆大公，闻已返旧居，远道得讯喜难名’这是冯玉祥先生为庆祝陈嘉庚先生脱险所作的一首‘丘八诗’，挂在十一月十八日重庆所举行的庆祝会的会堂中，特别为人所欣赏。

       “会场中还挂得有很多人的祝词，包括各方面的人物，譬如说陈立夫和青年团送了些对联，毛泽东也送了一幅‘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单条，周恩来、王若飞的祝辞说：‘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

       “大会主席是邵力子，到会的人有五百多，郭沫若、黄炎培、柳亚子、陶行知、沈钧儒和海外部副部长赖琏都来了，正如黄炎培所说的，来参加的人都是自己来的，不是被拉来的。

       “邵力子先生说：‘陈先生的一生就是：兴实业、办教育、勤劳国事、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不敢为。’黄炎培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

       “郭沫若被请起来说话，他是代表文协来庆贺陈先生的安全的。‘陈先生是建设的人物，另一方面还有些破坏性的人物存在着，陈先生是坚决地反对有破坏性的人物。’郭先生开始了他的一篇有血有泪的呼吁。‘陈先生是诚实公证的人，能为老百姓多说几句诚实公正的话。我们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水够深，火够热，我们决不容许再使水加深，再使火加热。陈先生现在是在庆祝个人的安全，同时正在忧虑全国人民的安全呢！我以良心来庆祝他的健康，庆祝全中国人民自己免掉内战的健康！’多少鼓掌，打断了他的话，台上在呼吁，台下也发出吼声。

       “最后柳亚子提议于大会后致陈先生贺电中，加上请他和他的朋友快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以制止内战的意思。台下又发出爆炸似的吼声‘好，好！’但是没有成功。邵力子说贺电中有：‘和平奠定，端赖老成’的字样，不必再加。后来主持筹备的人也不肯，郭沫若、柳亚子、邵力子都离席了，接着一些参加的人都纷纷离席。

       “这次庆祝会中，潘国渠先生提出了两句话：‘南洋一千一百万华侨的心预备供献给祖国，祖国如何来接受他们的心呢？’

       覆庆祝大会电：

       “重庆大学转庆祝大会诸君公鉴。印电敬悉，敌寇南侵，侨胞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尤以新加坡为甚。庚避匿爪哇，未同诸侨分苦，实深抱愧。竞蒙过爱，集会电祝，愧感无任，谢谢。陈嘉庚沁。”（十一月廿七日）

  余徇总工会所请，敦请本坡各厂家推派代表，于十一月十日假中华总商会，举行座谈会，协商复工办法，同时并请各帮侨领为调解人，莅会协商。发出小启如下：

       “昨日本坡各业工人，联合总工会主席卢君，及代表四人来告，总工会已经成立，且已经过各途工友多次集合，授权各代表与总工会接洽复工问题。故彼等托庚向资方劝促举派代表，共商复工条件，俾得早日复业，双方均蒙利益。庚窃以新加坡虽为出入口转运商埠，然工厂林立，劳工实居多数，尤以我华侨为最。对于阁埠工商营业，民众生活，与及治安繁荣，实有莫大关系。然自战前劳资纠纷，早已无法消弭，扰攘已达极点。基本原因，为劳工非但无总工会可以领导，而各途工友亦乏相当代表负责人。兹者各途工会既产生实权代表，复由各实权代表组成总工会，是则劳工方面，既有具体团结，遇事自有全权代表可与资方接洽。所以彼等特于今日来告是项缘由，并托代向资方促派代表协商复工办法也。此举纯为双方均等利益着想，资方谅必共表同情。庚以社会公利所在，不避僭越，谨订本月十日（星期六）下午三点钟，假中华总商会，开各途资方代表，及调解员联合座谈会。每途请即推派代表二人至四人，前来赴会。如该途尚未有团体组织，请会集同业商议，酌派出席之人。”

     余著有《住屋与卫生》一册，赠寄国内各省当局，贡献住屋与卫生之意见，并拟组织“南洋华侨回国卫生观察团”，征求团员及书记三十二人观光祖国，到各省府县城，实地考察报告，并由总会发行月刊贡献祖国，促当局注意各点改革事宜，此为中华民族将来健康之大计，民族生存扩展之要务，兹录通启原文于下：

       “径启者，南洋千万华侨素以家乡为重，自民国光复后，热心爱国，进步甚快，逢有灾难，悉力救济，不分省界，以国族为前提。七七事变，同仇敌忾，热烈救亡，捐资助饷，数年如一日。惟寄人篱下，限于自由，故不得不借慈善机关救济会等名词，成立机关，以避阻挠。此不但新加坡为然，全南洋诸筹赈会，亦莫不皆然。兹者抗战告终，各处未汇捐款，必有多少。若仍汇交国府行政院，以助政费，犹如沧海一粟，无丝毫价值可言。如请为某项救济，虽政府能实行，亦不过抵减国库极微之支出，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也。余为此事再三考虑，若变通办理，存款汇归祖国，用途则择其确可有益民众者。言外汇则绝无差异，言救济则更可实施。不宁唯是，如办有成绩，将来可以继续捐输，再行推广，以期普及全国县市。至所拟办法，为组织‘南洋华侨回国卫生观察团’，其简章及任务，另印付阅。盖祖国城市乡村之不合卫生久矣。影响所及，至为重大。战后建设伊始，亟应乘兹计划改革。予已印有《住屋与卫生》小册，邮寄祖国各省市当局，供其参改，并请迅速实行。兹复拟组织此观察团回国调查视察。查新加坡筹赈会存在银行十六万余元，若将此款移作观察团经费，足可支持两年。他处如表同情，日后更可推广。借考察于观光，借调查而促进，我侨任务，唯此为宜。或云祖国方事内战，观察恐生阻碍，应暂迟一步，然此所谓因噎而废食。盖国内虽不幸而发生政争，然军民多明是非，谅不致延长糜烂，阻碍建设之进行，况我侨完全为促进卫生建设起见，绝无党派政治意味，可免过虑。兹付上《住屋与卫生》一本，及观察团规则一通，希予惠览。不日拟传集开会解决此案，特此通告。”

南侨总会通告第五号

“本总会成立于祖国抗战发生之后，组织法与普通会社不同，因常务及诸委员多住外埠，故授主席以特权，如第十四条‘主席主持一切任务及策划应兴应革事宜’，除领导各属会增加外汇金钱外，凡有裨抗战有益国家民族之事项，本主席当尽其职责，庶无负侨胞之委托。兹者，抗战告终，各处筹赈会或慈善会应当结束。然尚有未了之事，则以华侨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调查造报，义不容辞。他如爪哇、安南，兵戈未息，迁延何时，尚不敢知。为此之故，本总会虽欲召集开会，办理结束，亦不可能。且以抗战虽终，建国方始，华侨任务，更形重大。本总会在未结束之前，略尽绵薄，责无旁贷。审时度力，实事求是，认卫生为建国首要，考察有促进效力。华侨贡献任务虽多，易收效果无逾乎是。故倡组‘南洋华侨回国卫生观察团’以期襄助建设于万一。舍此以外，无其他更有把握者可以提倡。职责虽重，贡献无术。爰拟将筹赈会存款，拨作此项经费。至前汇交政府之用途，确实用于救济者不过十分之一二。盖华侨每年义捐虽达国币一万万余元，救济会长许世英言，中央每年仅限拨救济费，二千万元而已。然华侨义捐之目的，多在襄助战费，故不问政府用途如何。兹者战事告终，剩余微款，似以完全充为慈善建国之费为宜。或云国共政争剧烈，内战难免，恐致交通阻梗。然兄弟阋墙战区有限，与外寇侵略，绝对不同。我侨不宜因噎而废食。设不幸延长扩大，双方必能尊重局外民意；况华侨，为襄助建设而回国，定必更加优待，决无意外之虞也。为卫生观察团事再予说明如上。中华民国卅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侨民大会赞同（转载《南洋商报》十二月十七日）

星华筹赈会于前星期六日下午三时，假中华总商会召开侨民大会，计讨论筹赈会存款十万余元移交南侨总会作华侨回国卫生观察团经费事，到会侨团代表及筹赈会委员计二百多人，由陈嘉庚主席。开会时，首由主席宣布开会理由，大意略先追述南侨总会组织宗旨，及和平胜利后，因环境关系，故一时尚难办理结束，而星华筹赈大会亦以抗战后责任未尽，继续为国家社会服务，进行各种工作等由。次即宣布此次组织回国卫生观察团，藉他山之名，裨益祖国战后建设上之进步。对卫生之注重与否，与民族之健康，及死亡率之比例，有重大关联，阐明甚详。继称抗战胜利后华侨欲贡献国家，舍此无较适切之道。渠于避难荷属之时即曾慨念及此，且曾周详计划，乃著作《住屋与卫生》，将观察经验，及智力所及，撰述成帙，印刷三千册寄交国内各省当道，请其转致属下市县，以备新兴建设之参考。最后言明回国卫生观察团之组织，业经星华筹赈会委员会赞成通过，兹为移款手续慎重起见，本日特召开侨民大会，请诸君对移筹赈会存款充作南侨总会办理卫生观察团经费，是否赞同予以慎重表决云。主席致词讫，继起发言者有周献瑞、连瀛洲、庄奎章、李竹友、郭珊瑚等君，对主席倡议卫生观察团，原则上均表赞同。惟连瀛洲先生对团员遴选建议重物色技术人才，而庄奎章君则请扩大观察范围，卫生之外，进而考察国内政治、教育、经济、建设诸问题。最后再由主席解释，该会之召集，只在讨论移款问题，请到会代表就此种意义而表决之。结果由李竹友君正式提议，将星华筹赈会存款移给南侨总会作为组织华侨回国卫生观察团费用，多数举手赞成通过，遂告散会。

南侨筹赈总会，拟编辑及印行《大战与南侨》一书，由余发出总会通告第三号征求稿件，文云，“自七七抗战以来，南洋千万华侨，对祖国捐资助饷，不遗余力，其经过情形，余已记于《南侨回忆录》数月后可以出版，俾今后人知我南侨拥护祖国抗战之实况。其后敌人南进，造成世界大战，既据越暹，复陷英美荷各属，使我华侨无量数之生命财产，均在其淫威掌握之中，俘捕刑杀，奸淫劫夺，牛马奴隶，任所欲为，损失之大，难以数计。兹者大战告终，胜利已达。此后中外各国战史，必多记述。然各国各有立场，编述各有所重，欲求其详载我华侨之惨遇与牺牲，永为后人观感之资者，料不可得。纵吾侨另有私人记载，恐亦囿于见闻，一地之情况尚恐未周，况全南洋地域广大，网罗更为不易。本总会有鉴于是，爰拟集合此项记载，编辑成书，名曰《大战与南侨》。特在南洋各埠登报，广求爱国侨贤，将前后见闻，确属事实，堪留传记以为信史者，撰成文章，寄交本总会。征文内容：计分（甲）军事（乙）贪污（丙）刑杀（丁）奸淫（戊）奸贼（己）损失（庚）政治诸项。”

**南侨总会通告第四号**

       自日寇七七启衅至南进为止，我侨对祖国筹赈救亡工作，余已详述于《南侨回忆录》。迨日寇南进后，南洋各属沦陷，侨胞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大战告终，我侨遭难经过，不应无所记载。本总会爰拟集合此项文字，编成一册，名曰《大战与南侨》特登报广求爱国侨贤，将前后见闻事实，堪留信史者，撰文惠交本总会。征文内容，分军事、刑杀、贪污、奸淫、奸贼、损失、政治七项。详述地方一切或一二项情形均可。详细说明，另印散张寄存马来亚各区筹赈会分会、苏门答腊中华商会。要者请向贵处机关索取，或来函索寄。至截止期，马来亚限至本年终，苏门答腊限至明年一月终，此布。

  余鉴于英军接收后，华校复办者寥寥，众多儿童，失学流荡，民族文化，前途可忧。爰倡议筹募教育经费，择地开创学校。经派人与大世界娱乐场商定于明年阴历元月十六十七两夜举行游艺会，以资筹款。十二月十五晚召集福建会馆本届执监委员会商讨办法。余报告此次筹募目的在开创新学校，非为供应原有三校。本会馆办学，一向注意普及，所收学童，不分省籍。例如道南学校，本季所收学生，闽籍以外者，即占百分之六十以上。故此次在大世界游艺筹款，亦望全侨各界，能予尽量赞助。至于此项筹款，亦非经常所有，不似以前筹赈时代，各世界娱乐场每间数月即举行一次。所以尤望侨界有资财而热心兴学者，视此为荣誉之捐款，踊跃解囊云。旋即进行讨论办法，决定组织委员会负责办理，名称定为“福建会馆筹募教育经费大世界游艺委员会”。越数日举行职员联席会议，余之致词录印如下：

——金钱如肥料撒播才有用——

       “本会馆自多年前，已鉴于本坡侨胞日众，儿童失学日多，而各帮创办诸小学校，大都囿于市中，校舍狭小，每校仅能容学生数百名，后虽复设分校，亦限于局部少数生额而已。至于失学儿童，每年有增无减，约略计之，非仅数千，或且近万。为此之故，拟作一具体计划，于市区近旁择相当地点，至少有若干英亩，建筑学村，收容学生可万名。而本会馆所辖塚地，最适宜者，莫如恒山亭及新恒山亭等处。屡向政府要求，自行备费迁塚以作校址（当时地契只限作塚地），交涉许久，不蒙许可。乃转求政府安祥山空地，蒙提学司等努力襄助，以为目的可达，聘绘图师设计，复延多年，终被拒绝。不得已拟将羔丕山坟塚余地建筑，呈请政府批准（该地原系先侨献作塚地），亦不可得。前后十余年，所有计划，均成泡影。兹者本会馆既无其他余地，若复要求政府供给，实无异于缘木求鱼。为此之故，唯有出资购买，方能有效。然欲达此目的，必须筹有相当巨款。按如买地作十万元，每年建平屋式之校舍，容纳五十班，每班平均建筑费三千元，预筹两年建筑费三十万元，设备费十万元，合计须五十万元，可收容学生一百班四千名。两年之后，再作打算。或云本坡民主政治将实现，咨询会屡向政府建议实施平民教育，如有实行，毋须我之代庖。然此种见解，恐未明了殖民地之根本立场。设政府能采纳此项建议，亦必首重英校。若我华校至多每年每一学生加贴些少校费而已。至于为我侨胞计划经营校舍，普及教育，谈何容易？本会馆此次借大世界开游艺会筹款，目的在实现上言计划。自敌寇南侵后，迄今四年，义捐久停，仅此复见。窃度此后两年间，必无再事义捐巨款之机会。本会馆鉴于侨教扩大之必需，不得不负责作大规模之提倡。且以同属侨胞，有教无类，更无地域意见，省籍区别。如道南学校本届学生，福帮五百卅人，广帮二百廿四人，潮帮二百零四人，琼帮一百八十二人，客帮九十六人，三江帮七人，共一千二百四十三人，其中福帮学生只占四成而已。此次筹款扩充教育仍抱此旨。西哲亦有言‘金钱如肥料，撒播方有用’况祖国抗战告终，建国方始，教育重大，尽人都知，出钱出力，责无旁贷。愿我殷实侨胞明白此义，格外解囊，其他各界多买入场券，慷慨玉成，并望各募捐员及干事售票员，与各界负责诸君，踊跃努力共成义举。前者敌寇入境，余公司厂内所存橡胶二万余担，被抢一空，仅存厂小部分而已，然天职所在不敢推诿，愿买名誉券一张，银一万元，以资提倡。中华民国卅五年一月七日。”

余由爪哇回星之日，顾爱诸君出示印就简章，言为促进华侨团结起见，拟组织马来亚华侨总公会，经小组筹备会议，尚未完满，适闻余平安至吧城，乃暂搁置，待余取决云云。余以兹事体大，自度才力不能办到，谨辞不敢参加。其后本坡外坡屡次函促，咸认团结为战后华侨最重要任务。然余再三考虑，仍无把握，故不敢造次。近日各报屡有专论，又蒙顾爱诸君惠临见教，无非促余领导团结，关心之切，错爱之深，可敬可感，余非木石，敢置度外？惟念把握毫无，故尔再四踌躇。然而长此缄默，亦恐不知者误以余为消极独善，置侨胞公益于不顾，故亦略抒鄙见。夫团结二字岂易言哉！姑无论南洋及全马之广，只就本坡而言，能否团结，未敢肯定。盖所谓团结，空言无补，必当有事实之表现。先语其最明显，最易行者，如各帮学校应统一办理，各帮大小会馆及无数同宗会，亦须减少合并。此两事如能解决，方可进及其他。兹略举此两事之具体办法如下：

**一 教育统一**

       设星洲华侨教育会，总办全坡华侨教育，统筹全坡华侨教育费（各帮公举若干董事参加管理），设立师范学校，高中初中若干校，高小学校若干所，国民学校若干所，均分配于适当地点。各帮所有校舍概归教育会管理，其他产业基金不在此内。各帮学校基金，丰啬悬殊，以后应一律公平办理。按每学期每一学生须补助校费若干，由该帮会馆负责，按该帮学生额筹补。每学期招考男女学生，以程度高下依序收纳，多设贫生免费名额，依一定规则公平办理。

**二 裁并会馆及同宗会**

       每帮各留存会馆一所，如福建会馆、广州会馆、潮州会馆、琼州会馆、客属会馆、三江会馆。至于一府一县之会馆，可合并于以上之大会馆。同宗会取消，所取消各会馆及同宗会等之屋业，概归教育会管理。除作校舍外，余可收租，以补校费。其他产业不在其内，亦可自动捐于教育会。按本坡各会馆及同宗会，至少有七八十所，如以三分之一作校舍，每校按收学生百余人，计可容四千余人，余者每所收月租按七八十元，每月可收租金三四千元。我华侨各会馆及同宗会之多，系由于昔时封建时代之陋习。以前提倡者每美其名曰联络感情，促进团结，究实每多相反。若言办事，则终日无事可办，徒花无谓用费，空置堂皇会所。我侨果能觉悟团结，必先合小群为大群，化无用为有用，否则未免徒托空言耳。

       以上两事，不过我侨团结之第一步而已。然只就福帮而言，无论谁人开口，必遭碰壁。唯此系余个人之蠡测，或者广潮琼客三江等帮，其学校会馆及同宗会，不似福帮之杂，且较有团结之热诚，亦未可知。希望提倡团结诸君，请向各帮诸机关试探如何。若能一致，则福帮或不至于自外。果能如是，余敢不附骥于诸君之后也。

 敌寇占领马来亚三年半，华侨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当地政府未有挨户切实调查，虽市民咨询局曾招人民往报，余恐不识英文者及市外较远人家，定难往报，家无余人者更无从报。况所报只人命而不及财产，亦有不足。故余在筹赈会结束之前，组织市内及市外调查委员会，印备调查表，沿户分送，限日收回，汇集统计。至新加坡以外十一区，则由南侨总会通告各区筹赈会仿新加坡办法或酌衷办理。迄兹数月只有新加坡及柔佛南界一部分已获结果，兹附列于左。

新加坡市区内被害人数二千四百九十三名。

又市外被害人数一千七百九十五名，然尚有一部分未报，因多在偏僻地方，大约至多不上一千名，共计约二千数百名。

市区内外二条合计约五千名。

又受非人道酷刑者三百九十三名。

财产损失个人方面，叻币一千一百七十八万一千四百元，又日军用票一亿四千六百九十四万八千元。

又商店方面，叻币共五千五百八十三万六千八百元，又日军用票一亿二千三百八十七万四千元。

合计叻币六千七百六十一万八千二百元，日军用票二亿七千零八十二万二千元。

       但关于人命损失，绝不止此数。据政府咨询局报告，失踪及死亡者三千余人。合计之亦不过七八千人，与前所传数万人相差甚巨。虽前者系属风闻，然调查未周，或全家遭难或被难者原属单身，或大人被难只余童稚，均无从填报，或认为无甚用处，不欲填报，故遗漏自所不免。至财产损失，亦有以为赔偿无望，而军票已成废纸，不肯费手续填报者亦属不少也。

       又据咨询局报告，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八日至廿二日“大检证”之役，全坡失踪者二千七百廿二名，该局负责人称必不止此数，而望市民复往投报，盖定有不欲报，及乏人可往报，以及不知往报者，当然不少也。

       至当时被检去之人，据确实可靠消息，概被敌寇残杀，有林崇鹤君之子失踪，要求台人黄堆金（为敌走狗最有势力者）代为寻觅，据言“无希望，昨天亚历山大地方，枪毙六七百人，巴实班让亦枪毙三四百人云”。亚洲保险公司经理李亮琪君，被敌拿去，其汽车为敌军官取用，其车夫爪哇人仍为服务，言亲见被检去之人，每日上午运四货车，下午亦四货车，每车约五六十人，在丹戎百葛海边枪毙落海，如有浮水而未死泅近岸边者，再用铁枪刺杀，计三天约杀死千余人。伊所驶汽车，即敌寇监刑者所用。然惨杀之次日，伊恐惧过甚，几不能司机，敌人乃命将汽车停歇于廿二号货仓，其他如运往加东及淡申律枪毙者，亦有人见之。至柔佛，仅柔南一部分华侨仅数万人，而调查所得，被杀者即有三千二百九十九人。

 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委员会，创自民廿六年八月十五日，迄今八年余。兹者敌寇投降，战事告终，调查本坡侨胞损失亦已告竣，尚存余款拨交南侨总会，作回国卫生观察团经费。余乃于本月三日召集委员开会，报告调查损失数目，并讨论建碑事项。盖此次祖国抗战，及世界大战，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南洋华侨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亦从来所仅见，本坡为南洋最重要及繁盛区域遭遇损失亦最大，故须择地建一堂皇之永久纪念碑，既可追悼死者，又可警惕后代之侨胞，故余有此提议。结果全体赞成授权于余向政府请地，并订至本年三月终将筹赈会结束，另组织建碑委员会。

  此次世界空前未有之大战，皆由于侵略主义国家贪欲无厌之结果。近世以来战争频临，无数十年得和平宁息，忧时之士，力图弭兵良策，在海牙设立国际和平会，然不免于前次世界之大战。战后设立国际联盟会于日内瓦，冀可久息干戈，长享太平之幸福，乃不廿年，东西侵略国又相继异动，遂造成此次世界空前大惨剧。今者大战告终，联军胜利国领袖，定必亟反前非，以道义为根本，认侵略为罪恶，究祸水之来源，消火线于净尽，移其独忠于国之心，扩而兼忠于世界，如此则长期之弭兵可达，人类之幸福无穷，而俄美英三领袖，丰功伟烈，堪称空前绝后，流芳千古矣。诸领袖果欲达此目的，则就东亚而言，法属安南殖民地，应归还中国，或为中国之自治领，最低限度亦当使之独立，其他香港澳门等小部分之地，更无问题。至安南关系东亚和平之重大，谨将其理由胪列于左：

（一）安南一地，自秦始皇时代，已属我国领土，置吏治理，再后历朝二千余年，大半为中国地，较其他附属诸国，如朝鲜、暹罗、缅甸等，一时入贡者不同，不能引以为例也。

（二）安南人民，与中国古时闽浙两粤（粤即越）之人民同属越族，而闽浙两粤之越人即为构成汉族之一要素，故安南人与中国人为同种。且安南之文化亦属于中国系统，即在今日经法国统治数十年之后，犹不能改变其素质，语言极相类，中国文字犹存在，其衣冠犹保存明代以前之大汉古制，较之国内三百年来之改从满制为尤胜，其他风俗习惯亦多相同。故从民族及文化言之，安南与中国亦最为密切也。

（三）安南与法国无论在历史上、民族上、文化上、地理上，均为风马牛不相及，绝无丝毫理由可以为继续占领之借口。

（四）法国人口仅四千万，在欧洲已占有优美国土五十五万方公里，平均每方公里仅七十三人，德国人口六千六百万，国土四十六万方公里，平均每方公里一百四十余人。德国无殖民地，法国不但本国住民宽松，尚有国外殖民地比本国加至二十三倍，计一千二百余万方公里。若安南仅七十一万方公里，不过十余分之一，法国减此小部分，实无关乎国计民生。

（五）此次发生世界大战之惨祸，法国亦难辞其咎。当“九一八”日本侵占东三省时，“日内瓦”国际联盟会执牛耳者，系法英二国。若履行誓约，加以制裁，亦可警诫德意之效尤。法国政府不但袖手失职，其各机关日报更大吹特吹，都用特大号字登于第一版，不啻同意日本之侵略。迨后欧战发生，德国攻法不上五十日，全国瓦解投降，俄与美本非其盟邦，若非此二国及英国之力，则法国至今尚在亡国之际。欧洲本土尚不能保，更何有于远隔之殖民地？今国土恢复，应当深感联军之再造，尚敢重占昔年侵夺我国之领土，欲为世界和平之阻碍乎？

（六）俄美英三国领袖既以爱国之道义，推广兼爱世界，必须深谋远虑，铲除将来战争之祸根，乃能达到长期和平之目的，其千绪万端非吾人可能道其万一，惟据我人所知者，则安南必须归还中国，此为拔除祸根之一法，如或不然，试问安南人是否情愿复受以前不平等之统治，而中国民族岂肯长期放弃其弱小兄弟乎？

总而言之，安南与中国万万不得割离，其密切关系既如上述。欧洲列强前昔之侵略主义，今须觉悟改善，世界和平乃能持久，俄美英领袖大功亦克告达，此实天经地义必然之至理。余为此语，不专为安南与中国而设，亦为保持世界长期和平而言也。

**附列 中国与安南在历史上之关系**

       安南人既与中国人为同族，自然从古即有关系，周初越裳氏即来朝贡，见于载籍，自秦以来，关系更为密切，摘录历史记载如下：

       汉高祖乙巳十一年五月，立故秦南海尉赵佗（河北真定人）为“南越王”。初秦南海尉赵佗，乘秦乱聚兵诛秦吏，击并桂林（广西）、象郡（今安南国）自立为南越武王，至是诏立以为南越王，使陆贾授玺绶，与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无为南边患害，贾至说佗令称臣，奉汉约归报，帝大悦拜贾为大中大夫。

       高后吕氏戊午五年南越王赵佗反，庚申七年遣将军周灶将兵讨南越，会暑湿大疫回军。

       孝文帝壬戊元年遣大中大夫陆贾使南越，南越王佗称臣奉贡，孝武帝已巳五年（纪元前一一九年）。南越相吕嘉杀使者发兵反，秋遣将军路博德将兵讨南越。庚午六年路博德平南越以“交趾、九真、日南” （今安南国）置为三郡。

       东汉光武帝十六年交趾（今安南国）女子征侧征贰反。

       十七年以马援为伏波将军讨交趾，十八年春，马援与征侧征贰战，大破平之。

       梁武帝壬戌大同八年交州（今安南国）李贲反，梁主遣交州刺史武林侯谘，与高州刺史孙同 新州刺史卢子雄将兵讨之。

       梁戊辰太清二年交州司马陈霸先，讨李贲，平之。

       唐太宗戊子二年遣卢祖尚镇抚交趾（今安南国交州府）。

       又癸卯十七年贬杜正伦为交州都督（今安南国交州府）。

       又高宗丁巳二年贬褚遂良为爱州刺史（今安南国清化府爱州）。

       又高宗辛未二年王勃父为交趾令（今安南国国交趾）。

       周武氏壬辰九年流御史严善思于欢州（今安南国人安府欢州）。

       唐玄宗壬戌十年秋安南乱遣内史杨思勖讨平之。

       宋太宗辛巳六年田锡请罢交州屯兵（今安南国交州府）。

       又仁宗皇祐元年广源州蛮侬智高反（今安南国谅山府广源州）。

       又仁宗皇祐五年正月，狄青大败依智高，讨平之。

       又神宗乙卯八年交趾反，丙辰九年以郭逵为安南招讨使，败交趾兵于富良江，李乾德降。

       又理宗壬戌三年封陈光昺为安南王。

       明永乐戌四年秋七月击新城侯张辅率师讨安南（安南王陈日焜为其下所弑）。

       又丁亥五年五月，安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县二百八十、户三百二十万，设布政司于交趾。

       又丙申十四年命丰城侯李彬镇交耻（今安南国）。

       清康熙五年封黎维喜为安南王。

       乾隆五十一年安南乱，遣粤督孙士毅及提督许世亨讨平之。

       诏封黎维祁为安南王。

       又五十五年因黎维祁失位，阮光平入朝赐冠带，封为安南王。

       嘉庆七年封阮文惠为安南王。

       光绪九年法国兵侵入安南，清政府遣云贵总督岑毓英、两广总督、张树声、提督冯子材，统大军入安南，击败法国兵，而法国乃派东洋舰队来攻台湾入闽江，击败清海军，并陷宁波，于是英使巴夏里出为调停，割安南与法国，此为光绪十一年，即一八八五年之事也。

附录 百年来我国领土及主权之丧失

一八四二年林则徐在广东烧英商鸦片，英军来攻各海口。

一八四三年与英订立南京条约，割香港及赔款与英国。

一八五六年英法联军陷大沽，复在天津立条约，赔款并准许领事裁判权。

一八五九年英法又陷北京，订立北京条约，赔款及割地，是年俄国因调处之功，迫清朝立瑷珲条约，割黑龙江以北边区境地。

一八六〇年俄又因调停英法事，复迫割乌苏里江以东之地。

一八八五年法国侵占安南。

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割台湾及赔款。

一八九七年德国籍山东曹州教士案，占胶州湾及山东铁路权，并许可开采各矿产。

一八九八年法国占广州湾，并订两广、云南三省优先权及铁路权，英占威海卫及九龙半岛。

一九〇一年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北京，除惨杀、奸淫、抢劫外，复赔款母利十四万万元，订三十九年逐年交还母利。

一九三一年日本占领东三省，自日本未占领以前，在帝俄时代，列强各划定范围，俄定长城以北，英定长江流域，法两广及云南，德山东，日福建。

一九四五年我国与美、英、苏四国联军打败日本，称为“大战胜利”收复台湾及东三省，然因国内政争，竞失去外蒙古全部，及旅顺、大连主权。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八号**

       径启者：本总会曾为南洋华侨于祖国抗战期中所组织，虽出侨民建议，亦我国民政府所命令，其任务为出钱出力以救国。成立以后，黾勉从事，出力虽远逊祖国，出钱则有过无不及。至于救国之目标，无非求领土之完整，主权之恢复，不平等条约取消，人民得自由幸福，达到总理临终之遗嘱也。

       抗战时最重要之牺牲，为人命与金钱。我华侨资助祖国，不但义捐而已，其他私人汇款，亦为战时军政费所利赖之资源。然所寄血汗巨资，今日已同乌有。至于日寇南侵后，华侨人命牺牲之惨重，亦由抗战爱国而致。如各处侨领全家遭害者难以数计，较之祖国贪污官吏金钱逃存外国，家属安居内地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然华侨为救国而牺牲金钱与生命，若能达到救国之目的，固无所悔恨。今者敌寇已失败，胜利已属我，然而华侨牺牲救国之目的，是否果已达到耶？本总会为爱国天责起见，不能缄默无言，谨举所见如下：

       鸦片战争，失去香港；中法之役，失去安南；甲午之败，失去台湾；三败之辱，失地八十万方公里。今日战胜收复台湾，仅数万方公里，而反失去外蒙百万方公里及旅顺大连主权。互相比较，战胜与战败如何分别？

       菲律宾之预备独立，出于宗主国特别美意，然军权、外交仍不轻放弃。印度之要求独立，为统治国不平等待遇，与我国各民族平等共和政治，大相悬殊。且凡属土要求独立，系自动对母国而发，绝未有邻邦为之代庖，有之，惟野心国日本，要求朝鲜独立而已。

       外蒙古土地，大过两江闽粤四省，为我国西北藩篱，与内蒙、满洲有唇齿关系，旅顺大连则为满洲门户。兹者藩篱已撤，唇亡齿寒，门户为强邻占据，东省内部，何能长保安全？虽以国弱乏力抵御，然如不承认，尚有国际机构，可以投诉。目的纵未能达，久后终有收回之日。我国历史记载，祖宗土地，尺寸不得让人，反是则为国贼也。

       近日出版《中国之命运》第一章云：“以国防的需要而论，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统，如有一个区域，受异族占据，则全民族全国家，即失其自卫上天然屏障，河淮江汉之间，无一处可以作巩固的边防，所以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无一处不是保卫民族生存要塞，这些地方的割裂，即为中国国防撤除。”今乃自相矛盾，竞因内部政争，将外蒙旅大全部甘心割弃，冒历史上所未有之大不韪。

       甲午战败仅失台湾数万方公里，今日战胜竞失去外蒙旅大加至十余倍之多。呜呼！战胜乎？战败乎？凡真诚爱国者视全国当如人之一身，拔一毛而知痛，何况去其股肱哉！

       今日挽救之法，只有全国民众一致声明否认，指斥其非法授受，违背三民主义，破坏五族立国，对内则实践政归民主，奋志图强，庶可取消伪约，保全国土，方有胜利可言。本总会追念华侨生命财产损失之惨重，坚持达到抗战救国之目的，特此通告声明，永不承认中苏非法之条约及外蒙之割弃，此布。

中华民国卅五年二月廿一日

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 陈嘉庚

 余居南洋新加坡五十余年。初到时市政局已规定生死登记，对市民卫生甚为注意，如自来水、防疫、除蚊、清洁、屠宰管理，均已有设备；每月派人视察市民屋内是否清洁；公共沟渠街道垃圾逐日清扫，运往市外销毁。此在现今我国诸城市，多尚未有也。而每年市民死亡率，平均每千人死廿四五人；疫病虽常发生，然迅速消灭，不至蔓延。以上所言，尚系一九二一年，即我民国十年以前之事。从彼时起，市政更大改革，将全市通盘计划，凡不合卫生之住屋，逐渐改建。至近年新加坡未失陷时，市民死亡率，每千人仅十五人，比较二十年前减少十分之四，而疫病亦已罕有，此盖为改善住屋适合卫生之效果也。闻之卫生之根本有三项：空气、日光，与清洁；其他次要者虽多，较易解决。余前年代表南侨回国慰劳，经十余省，所历城市乡村以千数，见其街衢及乡村屋宅之卫生状况，比较新加坡二十年前尚远为不及。市区街屋，虽略有改造，街路仍狭，店屋只整饬门面而已；至于乡村屋宅，建筑更多不善，又乏窗牖，有之亦甚小，且常关闭，有等于无。其他厕所、沟渠、垃圾，更形污秽。我国人民生死无登记。若其有之，每年死亡率，当更多于新加坡市政未改善时也。

       余自离延安及抵金华，沿途见诸繁盛城市，被敌机烧炸惨重，有化为平地者。每逢开会，余必报告新加坡廿年来改善住屋，有益卫生诸事实，且言日后重建，应当取法，不可仍前由业主任意自建。并呈函蒋委员长，请下令被炸城市，“今后重建须合卫生，俾可转祸为福”。虽蒙覆电嘉纳，恐亦徒有具文耳。兹者大战告终，交战各国，破坏之后，重新建筑，势必益求最近代化，以适合卫生。我国政府自来放任，人民亦不注意公共卫生，损害健康，促短寿命，莫此为甚。

       际兹不平等条约取消，无谓外债免还，所有战时借款及其他债务，自有敌人赔款抵偿而有余；加以人力物力之丰富，海外华侨汇款之巨额：若有民主的良好政府，则交通发达，工业勃兴，城市繁荣，乡村发展，皆指顾间事；而改善住屋促进卫生之举，当然不致忽略。凡全国各城市，不论被炸与否，均应预为全盘计划。至于乡村亦当从易于办到者着手改善。谨将所见所闻，贡献于政府社会以资参考。

       我国地大物博，人民众多，城市大小数千处，然除上海、北平、天津、汉口、广州外，其他开发尚未达十分之二三。此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必多兴革，力求进步，而尤以卫生为最注重。我老大不振之中国，关于维新兴革诸事业，应比他国更多且更紧要。维新之道，莫重于卫生，人民身体之强弱，寿命之长短，与国家之兴衰，极有密切之关系也。

       新加坡市区，在民十年以前，住民不及五十万人，华侨约占三分之二，余为印度人及土人，欧美人甚少。每年死亡者一万二千余人，平均每千人死廿四五人。及至近年间即民卅年顷，住民增至七十五万人。每年死亡者仅一万一千余人，平均每千人中死者不及十五人，比较廿年前减死四成之多。其原因大半为改善住屋适合卫生之效果也。

       新加坡在民国十年以前，诸旧式屋宅，多尽地建筑，无论屋身长若干尺，均不留空地。屋后多相接，不但无巷路，甚至乏窗户。屋内虽有天井，然或太狭小，或用光瓦遮盖。房间既多，窗牖寡小，空气日光不能通达。沟渠既长，清扫困难。据卫生家言，水、空气、日光，为生命上最重要之三元素。空气少到，氧气自减。屋内无日光，则细菌及害虫发生益盛。水不但有关饮食，于洗澡及清洁亦甚重要。

       新加坡自民国十年起，将全市计划改革，规定某街若干呎阔，后巷亦若干呎阔（至少八九呎）。某处作政府及公共机关，某处作公园、运动场、游憩所，某区建工厂及货仓，其他商店住宅亦各有规定区域。至市内店屋、住宅地址，限长八十英尺，至多一百英尺。若前已建旧式屋宅，凡过限者概须拆卸。剩余空地，不得复建小屋，均由市政局管辖，改作儿童游戏运动场，或草地花园等。

       规定新式建筑法，不论商店住宅，如地址八十呎，屋身只可建三分之二（地址不足亦然），即五十三呎，前后两房均须开窗；尚剩屋身后二十七呎，以一半建厨房、浴室，厕所等小屋，余一半作露天空地，不许用任何物遮盖。如地址长一百呎，屋身准建七十五呎，然中间须留天井十方尺，不得遮盖；如作三间房，各房均须开窗；尚余空地二十五呎，照上言以半数建诸小屋，半数作露天空地。违者拆卸并加科罚。无论建大小屋，或更动修理，均须先绘图呈市政局批准，开工时由市局派员勘定基址，方得兴工。至公寓别墅工人宿舍其他建筑物等，则另行计划，总以适合卫生为标准，沟渠概造明式，易于清洗。污水从后巷路流出，水沟既短，自免积滞。

       楼上下各房间，每房至少须开窗一个，每窗至小高四呎阔三呎。窗上墙壁或他处，须再开通风洞数个，方圆或扁形均可，每个约若干寸，不能容人出入；此系备夜间窗户均闭时空气不致隔绝；若雨季怕冷不耐，则可用物塞之。至窗门日夜须洞开，不可常闭。总而言之，全屋不论厅房，必须有相当窗户，可多不可少；使日光易于照临，空气易于流通。

       屋内逐日所有垃圾，扫置桶中（桶由市政局列号供给），每早置于门口，市政局派役运往销毁。厕所如非阴厕（近发明阴厕，积粪自能融化入土，可十余年不须清除），市政局供给粪桶，每早派役换取并代洗扫，用户逐月缴还市政局役费。市内不许饲养家畜，须在市外设棚畜养，并须领有市政局许可执照。街路边卖食物亦严禁，须移往屋内。

       市政未改革以前，所建不卫生诸旧屋，有长至百余呎以至二百呎者，此种屋不论屋后彼此有无相接，均须依新定图式改造。凡屋身过长逾限者概须拆卸，除留后巷（约八九呎至十余呎）外，余地概作公共游息场，或花园草地，然以全市之大，非短时间可能办到，第分别较有关系者，先后办理，以及每逢修理或火灾时，均须依照新图式改造，十余年间咸已毕改。且初时旧屋虽未遽改，而屋内天井遮盖，亦即严令拆卸。

       自市政总计划颁布后，各处前街后巷均照规定改阔；横直有序，整齐美观，逢有火灾，容易消灭。然美中阔近百呎，即旧屋诸街无论如何扩大，阔度尚感不足，直街不过六七十呎；横街三四十呎而已。不若新市区直街阔近百呎，两边兼有人行道，并栽种佳树，横街阔五六十呎，各屋宅门前酌留空地，或围短墙栽种花草，令人见之悦目开怀，似有园林之胜，精神为之爽快。居民既安，健康少病，医药、迷信、保险等费终年省却不少。市区日益繁盛，业主亦因之而收桑榆之利。

       欧美十年前，城市住屋已经改善者，其死亡率，英国伦敦每年每千人死十四人，法国巴黎每千人死十三人，德国柏林每千人死十一人，美国纽约每千人死十六人，芝加哥每千人死十五人，西雅图（系新开埠仅数十年）每千人死九人。尚有未改善之纽奥伦，每千人死廿一人。伦敦市亦有贫民区，人口十余万，住屋未改善；据医官统计报告，死亡率每年每千人中死廿余人至卅人左右；婴孩死亡率更大，即能成人，身体亦少康强。我国各城市住民，生死无登记，设有之，其死亡率之多，必可惊叹也。

       我国人住屋不卫生，以乡村为尤甚。盖自来建屋，原不注意空气与日光之需要；习惯又多畏风，故屋宅大都户小窗乏；不但空气不足，日光更难到达；厕池到处多有，沟渠不清，垃圾积滞；水井无栏，或距离厕所仅数十步；各种弊端为甚烈。然屋宅改善，大非易事，若从简便着手，可多开窗户，使空气日光能通达，厕池尽量缩减，并改良筑造，令蚊虫不生，沟渠垃圾委工人负责按日清毁；水井筑栏，且须距离厕池有百步之远；他如湿地池塘蚊虫易生，或填塞，或开沟以通流水。如此则卫生基本已立，收效定属不少，而费钱无多，任何穷乡贫户都能办到。然清扫屋舍之事我国人常专责妇女，男子多不闻问；欧美人则不然，屋内外男子亦共同负责指导或帮助之。我人对改善卫生事，果欲提倡实行，男子更不可不努力也。

       十余年前，欧洲卫生家研究世界人类寿命长短，以人数最多之三区域民族比较，即欧洲、中国、印度各区人寿平均，欧洲人每人五十四五岁，中国人每人卅九四十岁，印度人每人廿八九岁。然此为十余年前之事，据后来欧美医学研究会，断定将来不久，欧美人平均可达七十岁，足见其卫生科学日臻进步。印度人寿命之短促，虽因早婚之害，我国亦有早婚，第不如印人之甚，其实重要原因在乎住屋不卫生居多。或云食物滋养料亦有差别，中印人主要食物，远逊欧美人。此语似是实非，如新加坡市民自来食米，何以前后廿年间，死亡率相差许多。若以欧美人多食肉类，我国青海省人三餐以羊肉作饭，何以不能如欧美人之长寿。或云自来水亦有关系，然新加坡自七十年前已有之，绝非改良市政而始设，水固重要，然非仅由水一项也。

       人自出生，艰难培养以至成人，须廿多年。若论其能振作事业，普通人当在卅岁以上，再加以阅历经验，亦须有相当年纪。虽或天资出类，才干超群，如此次大战俄美英三领袖年俱六七十岁，亦须四十余岁甫始知名，复过多年经验阅历，方能轰轰烈烈，造福民族，闻名世界。推而至于模范乡党领导社会，服务政府之人，亦何尝不然？可见国民身体强弱，寿命长短与国家最有密切关系。若我国人之弱质，年未五十，老气横秋，安得不事事落后也。

       前年德国柏林，举行国际运动会，为全世界所注意，我国为此事，曾费去廿万元巨款，集诸有名运动家，第一次演身手于国际体育比赛之舞台，在我国历史上亦一件可纪念之事。然其结果乃饱吃鸭蛋而归，考其原因，各种比赛非由技艺不精，实因体力不足，故致全归失败。国民体格之健全，要在平时有素养得来，非短少时间之训练所能速成。故对卫生根本问题，必须彻底改革，不但体力可以增强，而长寿当然亦可期矣。闻苏联鼓励青年培养强健身体，检查合格者给以奖章，亦有见于人民健康之重要也。

       据外国科学家研究我国土地与人民，谓自北方沙漠至南方热带，土地肥沃美丽，不论上下级社会男女都有强壮骨骼，天赋独厚，体格优美，活泼聪明，勤奋耐劳，所差者无良善政府与社会之负责领导，致事业不振疾病丛生，而蒙病夫之讥诮云云。前年江西熊主席告余，本省自七八十年前，已有人民二千五百万人，自太平天国乱后，降至现在仅存一千六百余万人。其锐减原因，在于疫疾时发，死亡相继，而数十年来，疟疾为尤烈，遍处多有。言间不胜唏嘘。余答以此种惨况，他省亦多有，或以江南等省为甚，所见人民多面无血色，尪弱可悯，此莫非起居不合卫生之害也。

       健身之术，运动洗澡亦有关系。余少时未受新教育，对体育绝不注意，迫年逾六十，身体常觉困顿。由是每早（约黎明五点钟后）在床上运动（展转数十次稍稍用力），起后续行普通运动，计床上下运动约十余分钟。洗澡廿余分钟，用毛巾擦全身数次，温冷水随意。是后无日间断，自觉补救不少，于今十余年裨益实多，若少年能知行此，其健康定胜于今。寒季人多怕冷，怠于起床，若在床上运动，则寒气减而热气生，洗身后精神益清爽，不怕寒冷矣。如能出门行数千步，并行深呼吸一二分钟，既可吸新鲜空气，亦可运动内部，更为有益也。

       药物与卫生亦甚有关系，余非医生不敢妄谈，惟推荐身所经验之一种于此，此药即“五香丸”。余自四十余岁染胃疾，延及盲肠，中西名医诊治无效，乃阅《验方新编》得之于内外备用诸方，据载“此方善能消食、消积、消痞、消痰、消气、消滞、消肿、消血、消痢、消虫、消隔、消胀、消闷、消痛。药料平常，功效甚大，每服一钱，姜汤送下，早晚一服，其效如神。其方为五灵脂八两，香附子八两去净毛，水浸一日，黑丑一两，白丑一两，共研细末，半以微火炒熟，半生用，和匀醋为丸，如萝葡子大”。余照方采服，立见功效，据所言可消治十四种，若以余及朋友经验数十年，尚不止此。凡胃腹疾痛，服之多效，盖疾病多因胃肠积滞而起，无论何病，若感觉胃腹不快，服之屡效。又晕船晕车，胃苦欲呕，服之立可消化，晕吐俱免。遇病服药，最患在无效而反有害，若此方则绝对无害，余因论及乡村住屋卫生，故并载以告同胞；亦因医少病多，乡村为甚，若备此药，费款无几，自救兼可救人也。

       全世界各事业，最落后者莫如我国，此事尽人都知；然此后建设最多者亦为我国，此亦时势必然。就交通言，各省县都市乡村间铁路网之敷设，虽未能于数年内普及；然若有民主良善政府，积极进行，各重要干路不难完成，其他支路虽迟亦属不远。若无铁路，亦必有电车路，以利便城市与乡村。此非神经过敏之理想，欧美诸国及印度南洋已行之久矣。至于汽车路我国现下各省虽可交通，而各县市及乡村间尚付阙如，然此项较易办到，不久以后不但可望普及，即乡村内小车路，亦可望到处多有，唯西北西南边境，如外蒙新疆西藏各种道路之建设，或须稍迟一步。至与南洋方面之交通，则云南汽车路已通缅甸，铁路亦将完成；广西铁路及汽车路已达安南，经暹罗而至马来亚矣。他如国际公路及铁路，至少有三条干路可通欧洲：东北西伯利亚铁路虽通，汽车路尚未；西南由云南至印度，汽车路已通，而铁路尚未，将来更可由印度而达土耳其。至西方中路，则由新疆经中亚细亚而达莫斯科。此三条国际之大干路，无论铁路、汽车路，不久必能实现。我国战后交通空前大发展，必能促进将来各城市之繁荣；城市愈繁荣，则其住屋问题更不可不讲也。

       英美人民不及我国半数，而英京伦敦，美国纽约，市民各八百余万人，又芝加哥市百年前仅有一千人，现今增至三百余万人，我国百数十年后，交通中心各城市，其繁盛如伦敦纽约者，必有多处，如芝加哥者定亦不少。至于县城小镇，偏僻市区，将来交通发达，工业兴盛，繁荣随臻，数万人或数十万人聚居之象，可以到处都有。试思前此蒸汽电力发明未备，欧美城市即能如此发展，现下已大不同，繁荣之可以速臻，毋须多赘。故宜乘兹放大眼光，将全国各城市筹备测划，预定市图，街路须横直整齐，前街后巷，阔度相当。目前先建筑二层三层楼屋，后来可以改建十层八层高楼。至公共应用地方，如政府机关、菜市、民众教育机关、运动场、游艺场、公园等等，须精密预计。若较广大城市，并加人行道及种树。工厂住宅须分区。欧美凡已改善市区，屋宅占市地面积至多半数，余者即是街路、人行路、树木、公园、运动场、草地、花园等。我国市屋既密，街路狭隘，近来虽略有改革，然除街路稍扩外，他项尚未着手。所有屋舍，稍壮观者唯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少数城市有之，其他建筑费无多。若乘兹规定改合近代化，则市内损失既少，市外尚未开辟。毅力进行一二十年之后，全国城市皆有园林之胜，居民获寿康之福矣。

       市内稍大之区，街名多复杂，探寻不易。如新加坡市住民仅七十余万人，街名多至九百余；有一条街长不上二英里，街名至有三四名目，若较偏僻之街，虽本地人尚难悉知，外来之客更难问津。如我国上海市区广大，街名必加多数倍，探寻尤觉困难，更无论将来无穷发展以后。美国纽约，缅甸仰光，整饬市区街路之办法，系以数目为名称，直路曰“路”，横路曰“街”，如第一路第二路等类，设须分别者，则曰天字第几路，至横街则曰第几路第几街，故无论商店住家，寻访极易。仰光市直路虽用数目排列，而横街则否，未免美中不足。我国将来城市发展，街路之多，屈指难计，若乘兹将全市通盘计划，街路以数目代名称，其利便岂浅鲜哉！

       以上所言各地死亡率相差之远，世界人寿长短不同，运动会失败之原因，江西人口锐减与疫疾之关系，我民族天赋骨骼之优美，乡村城市不适合卫生之诸点，住屋改建之办法，市区改建之方法，如市内空地应留半数，街路以数目字为名，诸重要事件，希望政府社会注意，决心毅力改革。如美国新兴市区“西雅图”，真可谓后来居上。我国各城市平屋居多，有楼亦一二层，建筑费不多。能从兹割爱积极改善，损失无多，而收效甚巨。欲获得无穷之幸福，不得不牺牲眼前少许之代价也。

       （附言）有人认为此种建议，尽可呈送政府，何必公开发表，然此所谓“可使由，而不可使知。”贡献政府固属当然，第公众卫生之重要宜使人人明白了解，俾可服从政府，协助地方，不致反生阻挠。若得全国同胞，咸知住屋卫生能致病弱与高度死亡率，而猛省戒惧，则无论城市乡村，改善住屋之目的不难达到也。属稿既毕，更为通俗短歌以晓民众。

寿命长短在卫生，科学进步理益明。

无知顽迷委天数，欧美中印信可征。

星洲市政改住屋，日光空气助洁清；

二十年前死亡率，于今减少达四成。

乡宅无窗似衣箱，日光空气闭不容，

微菌丛生到处有，厕池露设在村中。

沟渠垃圾多积滞，蝇蚊成群各逞凶。

不知卫生最首要，健康寿考乐无穷。

富家儿子尚早婚，为扬家声急饴孙；

不图见小反失大，所生多弱或愚蠢。

血气未定焉能戒，健康失去草无根。

维新政府宜规定，适当年龄方准婚。

世界比较人年寿，美欧平均五五右，

我华仅登三十九，印度三十尚难就。

中印年龄何短促？卫生不讲仍守旧。

政府同胞当猛省，寿夭有道应根究。

  余本无意记录个人企业上之事项，故《回忆录》只选记与大众有关之事。然以个人营业与所从事公众之事件，有密切关系，且此《回忆录》颇似个人自传，缺其前一部分亦不完备，故补记于此。

  余生于福建泉州同安县集美社，与厦门岛仅隔十余里海港。九岁入私塾，至十七岁夏师亡辍学。性钝惟颇知勤学。旧例塾师来一月余，即回家一月或半月。所读三字经及四书等，文字既深，塾师又不解说，数年间绝不知其意义，俗语所谓“念书歌”是也。至十三四岁读四书注，始有解说，十六岁略有一知半解，既限于天资，又时读时辍，故虽就学许多年，识字甚少。十七岁秋始出洋来新加坡，在家君所营顺安号米店学商业。该米店系向暹罗、安南、仰光诸米行采买，然后售于本坡零售米店，及外水商行。其时家君久不直接管此业务，住眷在顺安三楼，午间始下二楼，吸烟、看书、接友，及办理硕莪厂并地皮屋业等事。顺安米业系交族叔经理，兼管财政。硕莪厂财项亦由顺安出入，然银关甚困，每月买入米款二万余元，账期市例卅天，普通多加十天清还，而顺安常延至五六十天。所以能维持采米者，为有德安复安两号合买分来，该两号原亦家君倡办，与友合股，并归伯父儿子名下。余十九岁族叔回梓，米业及财项交余料理。是年家君又加作黄梨罐头厂，名日新号。在此两三年间，地皮屋业略有获利，硕莪厂亦有利，米店每年之利约五六千元，合计实有进步。资产除欠账外，大约存十余万元。然顺安之财项亦不宽，还米账须在五十天左右。家君在洋娶一侧室颇好，不幸早逝。后复娶一妾苏氏，性极好赌，虽畏家君，然每乘机往外，或招外间妇女来楼上，其癖性生成，终年如斯。螟一子尚在幼稚。余廿岁秋承家慈命，回梓完婚。自来洋及回梓三年，守职勤俭，未尝妄费一文钱，亦无私带一文回梓。执权两年，家君未尝查问。在膝下三年，终日仆仆于事业，亦未曾撄其怒也。

  余廿岁冬完婚，廿一岁在家复从塾师补习多少。廿二岁夏复南来，仍在家君顺安内服务，公忠守职。廿四岁冬家慈不幸谢世，停柩在堂。家君以营业无人替理，不许奔丧。其时顺安诸营业多有进步，而尤以地皮及屋宅价值日高，逐月可收屋租二千余元。然除还借款利息及政府牌税外，所余无多。硕莪厂已承顶与人，黄梨厂则在柔佛加开一所，并经营黄梨园数区，共数百英亩。各业虽有进步，而银关仍困，还米账常近五十天。然其时米业比前规模加扩。家君逐月规定准苏氏支家用一百五十元。彼因赌性难改，常要加支，如属少许余或与之，若多则拒之，因其赌友妇女常由商店出入，余甚觉其不便也。

廿五岁秋余回梓，择地葬先慈灵柩，地师言正穴方向不合，须待至两年，乃权厝于穴之侧，并从俗为之延僧作佛事。廿六岁春带眷复南来，此为余第三次之出洋，仍在家君顺安内服务。至廿七岁冬因慈柩合正葬之年，故决计回梓。而此几年来，各业均有进步，亦以屋地业为最，其时屋租逐月可收三千余元，大约堪值六十余万元，而典押借款约卅万元，利息牌租逐月近二千元，按该业可存实款卅余万元。顺安米业兼营外埠逐月比前又更增不少，银关还米账在四十余天，为十余年最宽松之景。且加营两号，一为九八店名金胜美，一为庆成白灰店，均为友人情面承作，资本支去三万余元，后来失败多由此两号为祸根。盖苏氏螟子已十六七岁，金胜美财款系他支掌，向洋行收黄梨羔项，亦常由他往领。余默思此人得志，则其母赌资可任意支取，为害非少，然不便向家君谏阻。其时将建住宅，原按至多一万余元，计该时家君诸营业，顺安米店资本四万余元，黄梨厂及园六万余元，金胜美二万余元，振安铁店一万余元，庆成灰店一万余元，共十五万余元，屋地业除押款外存卅余万元，合计四十余万元。而借款除典押固定卅万元外，其他向印人流动借款，只系信用而无抵押，约九万至多十万元，此系多年如是，利息每月近一千元。再除此条外，实存资产卅五六万元。余如德安、复安、竹安、新开茂四号股份额，约五六万元，系余先伯父儿子之业。又源安米店股份数千元，则为该螟子名下。余将回梓时所知之大概如是。至余原抱公忠尽职之心，无论在洋回梓，均不私蓄一文钱，家内亦不许有金饰。顺安财款仍交族叔管理，余即带眷回梓。

余廿七岁冬初回梓，改葬先慈后，适厦门市遭火大烧一日余，焚去店屋千余间，倒塌砖土堆积满街，高可十尺，乃积极挑移，往填海口之提督打铁两码头海滩，未及一月已填平三数万尺实地。有人介绍向厦官厅购买一万元之地，可建店屋数十间。余以有利可图，乃函禀家君如肯承买，其契据可作该螟子之名，盖余原非为自己起见也。函去后不久回示可行。由是兴工建筑，按先建半数卅余间，费款二三万元，一年至年余完竣，然后出洋。不意有台湾籍民，野心倚势，图占一部分，乃与打官司，经年方结案。计前后时间两年余，建筑费三万余元，连买地及填筑合共四万五千元。在洋顺安执事族叔，未尝来函报告银根困迫，借债增多，及诸号侵款事，只有一两次遇相识之人归家，吩咐嘱余速往，言为家费浩大而已。余转念设每月被苏氏加支赌款千余元，三年不过四五万元，入息抵补有余，无关营业大局，故亦不甚关怀也。

  余卅岁夏末，厦门建筑事完竣。七月初作第四次南行，甫入顺安店门，即感觉状况大形衰退，各事凌乱不堪，似无人管顾。则往住宅拜见家君，又睹其神色久别相见，亦无欣容快意。少顷辞出，回顺安米店，见族叔身染麻木之疾，神气丧失。余问以流动借款，比较余归时增减如何？答加增。又问加增若干？答不知。余即查核账簿，其数目至三十二万元之巨，比较余前年将归之际，增廿二三万，余甚惊惶。又阅屋地业押款，仍前卅左右万元无加减。乃复问此三年间，有加置何业产否？答未闻。又问有多营何生意否？答无有。又问还米款须若干久？答须六七十天。又问流动借款既加借许多，银关又奇困，则此巨款为何业何人侵去？答不知。余是夜几不成寐。越日在楼上检查各来往数目，半日之间已明白大概，计黄梨厂侵欠七万余元（时黄梨季甫完），厂内货底统存不上一万元，庆成灰店侵欠六万余元，金胜美侵欠五万余元，家费三年支四万左右元，建住宅支三万余元，还支流动借款利息约三年九万余元，汇厦门四万余元，合共约四十余万元，扣去金胜美、庆成灰店余未归时原欠三万元，实支出三十七万余元。而顺安被黄梨厂所欠之款，一部份是原料，如白铁糖枋，尚欠人未还五万余元，又顺安米业资本前四万余元尽罄，尚不敷一万余元，流动借款加廿三万元，三条合计三十三四万元，尚差四万余元，系三年顺安米利及向振安复德安等支来者。现下银关已大困乏，欠市面白铁等款五万余元，米款一万余元，共约七万元。

余既查明三年间支出数目，则抄列一纸，午饭后复往住宅见家君。问此三年间有无增购屋地，及加营何事业？答无有。又问何加借至廿余万元之巨款。答汇厦门数万元，余为利息加重，及不时垫去之故，今已惨矣。又问黄梨厂三年结算得失如何？答未曾结算，大约可得利万余二万元。余乃将所抄数目呈阅。家君方知被各号侵去之多，及尚欠白铁糖枋，并米项许多未还。乃复叹曰，“我以为屋地业大降价，当损失廿余万元，料不能维持，不图复增欠市面许多项。”盖该时不但借款已穷，而诸流动借款，每单限期多系五六个月，到期有欲收回，或要加重利息者。前余未归时，信用借款利息平均一分，迨至后来加借之款，多非信用，系将屋地业作次等抵押，利息升至一分三四。诸借款主互相效尤，由是信用遂失，既被家人舞弊十余万元，复加借重利之损失，又遭屋地业大降价，亏损更巨，三者并至真所谓祸不单行矣。

    顺安号三年间被诸号侵支如许巨款已如上述。其中如黄梨厂设使乏利，当不至克本，不意损失许多，因所有向洋行收款，概由螟子之手，故易舞弊。金胜美亦然。庆成白灰店系小营业，何至亦侵巨项，据其经理言，大半为苏氏母子取去。住宅照估值不过一万余元，而加支二万余元。家用三年亦加支大半。此数条被二人侵支十余万元。该螟子常于醉后侮辱店员，故好人亦变坏矣。家君平生俭素，除染洋烟外，别无花费，数十年来住家即在顺安米店楼上，故家用亦省。余在顺安服务十余年，所有流动信用借款，初时由数万元增至十万元，乃由屋地及营业扩充而添借，借单每张五千元或一万元，订期四个月至六个月，利息九厘至一分。每当银关稍困时，余则禀知家君，须再借若干来济用，家君常惜耗利息迟延多天，始择较廉者借贷。有时盘问何必再借之故，余则列单呈阅，某时或某单若干，或某号因何故暂侵若干。绝非任意侵借也。常叹言，屋地业如有相当价值，拟售出一部分，可长十万八万，清还此流动借款，庶免如此纷繁云云。乃不幸在此两年余间，逐月添借近万元，而绝未查考用途，余至为不解。至顺安经理兼管财项之族叔，身既染病，终年未曾见家君一面，借款等概由螟子与家君直接，彼似抱不干涉主义。余多次往住宅与家君谈话，在厅中相距约十余尺，见家君目中似有白点，如翳疾状，然明知无此目疾，复注意细观，白点仍然，乃起行近前则无之，余心甚异之。回念其神气衰变，故致如是，毋乃气数使然乎？

 余自到店之后，家族叔日日要将事权及财政卸交，余不肯受。彼时余大有进退维谷之慨。盖全盘核算，所有屋地业原典押卅万元，流动借款抵押卅二万元，合计六十二万元，现因降价按可值四十余万元，除后不敷约廿余万元，顺安欠米账五万余元，又欠洋行白铁等五万元，按至年终六个月，利息须还三万余元，流动借款到期要收，按还一万余元，共十五万余元。而可收入之额，顺安被人欠米项四万余元，黄梨厂承顶于人，按二万元，金胜美、庆成、振安等收盘，按四万元，共十万元，除外尚不敷五万余元，合计押业及生理共不敷廿五万元弱。厦门屋地业不但难于变卖，且非余名字，故踌躇不欲接受。然转念不能脱离家君而他去，况在此艰危之际，逐月再被苏氏母子支取数千或万元，则无须三四个月决不能维持。不但屋业押款无着，而欠市中米白铁等项亦无法清还矣。乃接受之，并禀准家君，逐月只许苏氏支家费二百元。立即预备将金胜美、庆成、振安等，尽此数月内结束。黄梨厂因出产期已过，无款可收，则由家君觅人承受。柔佛厂承顶与人，收一万余元，本坡厂招潮商黄梨贩合伙，资本一万二千元，彼出七千元，余出五千元，商号称日新公司。生意由彼经理。至顺安米业不便停顿，故仍旧经营。唯较次之客不放账，俾款容易收取。两月之后还米款仅须四十余天。又幸有客承买一段空地，除还押欠外可剩五万余元，故白铁糖枋之欠款亦概还清。虽黄梨厂承顶与人，金胜美等收罢，市面中西商人绝不知内容，多谓因乏利不欲滥作。于是无欠货账，只有米款数万元而已。顺安名誉转隆，交冬之后，米业减作，劣账迫收，延至年终米款尽行还清。被人欠尚有一万多元，按有半数过年可逐渐收回，从此即一概停止。所未清者，只有产业抵押两种之款。第一款则固定卅万元，此条产业价值虽降，尚可值约四十余万元，无丝毫损失，唯次押之流动借款，计欠卅一万余元，如除产业剩余之十万元外，尚不敷约廿余万元。家君一生数十年艰难辛苦，而结果竟遭此不幸，余是以抱恨无穷，立志不计久暂，力能作到者，决代还清以免遗憾也。

 余卅一岁春，顺安既停罢，念不可赋闲度日，乃在距坡十英里汫水港山地，建筑黄梨厂。按从简起手，用木料茅草造成，并买旧机器，一切按两个月完竣，应夏初黄梨产季开始工作。共费款七千余元，名曰“新利川”。至活动资本可免需，因各原料如白铁糖枋均可向市面华洋商赊取。数日间黄梨罐头造成，即交洋商便有款可支也。而春末日新公司伙友潮人逝世，照英律当截止其股份，全盘归余一手，然余不忍举行，往商其家人营业股份照旧，但经理权须归余执掌。他不许可，余于是依律通知，并核结一切账目，计自客年冬初合伙，至来春末半年间，实得利一万八千余元，他之母利一万七千余元，须留待向政府请求领出遗产，至速数月后方得交还。日新公司既归余自办，时适夏季之初，黄梨甫在出产。盖生黄梨每年出产两季，冬季约产四成，夏季约产六成。是季由四月起至六月终止，此三个月日新厂核结得净利近三万元。新利川净利得九千余元。在此短促时间，两厂获利近四万元，为初出茅庐极好机会。合前日新公司母利一万余元，又收顺安账尾及货底亦一万余元，合计已有资本近七万元。故自夏初加开一米店，号曰谦益，资本二万元，除米业外兼为两梨厂收支机关。而新利川厂则扩大工厂及机具，以备冬季应用。

  余前在顺安服务，但经理米业及财项而已。至于黄梨厂如何经营，则不闻问。其时售黄梨罐头，只与两三家交易，多系洋商，由家君直接经办。每次数千箱或万箱，每季或作数次，先期售完，制出概属普通庄头，甚形简单。余既未曾参加，绝不知该业利害。及亲营此业，并由前日新公司半年获利之巨，乃知此业极需有才干思想。若能精于核算，用心选择制造出售，每箱可多获五六角之多。其时同业有十余家，其能干者，即与余合伙之潮人已死，其他多乏精明之流，故余得独占大利。欧美加拿大诸洋行，有经营此业者，约十余家，除星期日外，三两天必有来电，采买黄梨罐头。计所采各庄，不下五六十样，如条、块、四方形、整个圆形、成片刻花，或加糖、或仅水、或各半，等等式样。最大宗为条庄、方庄、枚庄，约占八九成。全年新加坡诸厂出产一百七八十万箱，各色杂庄数十样，仅一二十万箱而已。每箱比较普通庄，多获自两三角至七八角之利。每次成盘只数十箱至数百箱，非如普通庄，每次可售千箱至万箱者。余与一副手叶君，每日上午九点余钟，分途到洋行探询，有无电信？采何庄？故凡诸杂色庄头，大半被余售去。他家或嫌少数零星，或不晓核算，或恐制不合式，致日后须赔偿，故少竞争，此向外人售货与同业不同之也。至于厂内最重要在采买生梨，及工人剖梨损失。余每天清早及下午到厂视察费数点钟工作。各厂采梨例系算枚还价，诸梨贩来售大小不定，有每百枚两三元者，亦有一元余者，不特大小有关，亦须看成熟与否，并须察看有无坏烂等事。既非按重量还价，但凭眼力而已。他厂多系每季停工时，然后核计得失。余则不然，系逐日核结得失。凡该日所采生梨，概令制完不使混杂，明天罐头装妥，便知得失。既可以为采估梨价之标准，又可研究剖工损失。比较前日新公司潮人之办法更进一步矣。若言资本则少许便可作。盖全箱原料最多为白铁片，向洋人采办系二个月还款，其次如白糖枋箱向华商交易，四十天期还款，工资半月还清一次，只有生梨须用现款而已。普通市价每箱生梨占四分之一，至多三分之一。生梨入厂三四天制就，即运交洋行，便有款可收。为无须大资本故，新加坡并柔佛共有廿余厂，竞争剧烈多乏利，全年获利一万余元者仅数厂耳。

 新利川近处，黄梨园颇多，全年可制卅多万箱之额，大都运到坡中由梨贩经售，余恐数年后生产退化，采买困难，乃思购地栽种，则于距离数英里远车路边，购空芭地五百英亩，每亩价五元，共二千五百元。积极砍芭种梨，按一年内完工，加两年全园可生产二万余箱，名曰福山园。然自各家开种黄梨园以来，至多二三百亩，或作二三年栽种，未有如福山园于一年间完成之多。是年冬季日新、新利川两厂，得净利二万余元。因黄梨膏价稍降，故利益稍不及前。谦益米店得利八千余元，计余卅一岁之年，除伙伴红利外获实利六万余元。

 卅二岁夏季，余两黄梨厂得利三万余元，秋间又在新加坡梧槽港口租屋，创办一黄梨厂，兼制煮冰糖，号曰日春。该处收采外地运到生梨，为最好地点。相距至近，早晚免待海潮均能运到。至冰糖厂，系从坡中向爪哇糖商，买白糖来煮成冰糖，还款账期三四十天，而过煮成冰糖仅八九天，并装配下船至多十五天。若有信用汇票往支，免廿天便可收款。不但免出资本，尚可先期收存款项。计坡中有冰糖厂七余家，概系潮侨。然他等均用大锌锅，燃料用柴薪。所煮冰糖多寄香港托售，上海则甚少。余之煮法则不同，系与黄梨厂同用蒸汽炉，而燃料则用锯木屑，煮锅系内铜外铁，比较燃柴每担成本可廉二三角。每日煮二百余担，计可便宜数十元。制成大半寄香港托售。是年冬季黄梨厂虽加日春号，而得利仅一万余元。全年三梨厂得利四万余元。谦益米店得利八千余元。合计五万余元。除伙伴红利外，余获实利四万五千元。

  余卅三岁春，则每念家君前顺安号为屋业，所典押一等二等诸借款，除一等外，二等卅余万元，尚不敷约廿余万元，而屋业此两年来无何升降，若愿与债主折减还清，以消遗憾，亦须半数约十余万元，至少亦当八九万元。本夏季黄梨厂如能获利四五万元，便可议还，此为余最念念不忘者。不意黄梨膏价自去冬已稍降价，至本年更形冷淡，甚至经月乏人问津。迨近夏各厂争售，每箱降至一元左右，诸杂庄亦大减消。又他人加设两厂亦能核算竞争，由是乏利可图。福山园初出产，适逢败市亦不见利。是夏梨季三厂仅获利一万余元，除各伙伴侵支，实得约一万元。统计余营业此两年半，获实利十一万元。又前日新公司及顺安二万余元，共十三万余元。家费及义捐等约二万元，实存十一余万元。而各营业垫去资本，谦益米店二万五千元，三间梨厂资本四万余元，冰糖厂免资本，福山园垫去一万五千元，合计八万余元，尚剩仅三万余元。

是年马六甲埠，陈君齐贤卖一丘树胶园二千英亩，价二百万元。该园初时为林君文庆得英人报告，乃向陈君倡办，资本多由陈君支出，先后垫出廿余万元。其时南洋人种树胶尚未发达，所有者不外百余亩，仅几处而已，亦未曾刈胶见利。故英京无人注意。及陈君种此大规模之胶园，英人即组股份公司来承买。西报虽有登载，而华文报则绝无言及。余虽闻人言亦绝无注意，且与陈林二君素无交接。约在夏间在某洋行一英人告余，陈君售胶园获巨款事，劝栽树胶可获厚利。余始查探陈君有树胶子出售，乃向买十八万粒，价银一千八百元，运往福山园栽种。在黄梨边，每十五方尺开一窟栽之，对黄梨无伤害。全园两个月栽完，此为余经营树胶园之始也。

 是年冬初，谦益米店左邻，有一间米店恒美号，兼租在芽笼桥头印人一白米厂，每日可绞出白米一千余担。然所作是熟白米，而非生白米。其制法系将粟落水池浸两天，然后加热气蒸熟，在砖庭晒干运入厂用研磨机磨净壳糠。此类米概销印度。时每担比较生米加价一元之外，算来甚有好利。适其股伙多人发生意见，愿由该经理另招别股，余乃招一友人承受，与原经理合作，仍用恒美字号，专营熟米而已，资本六万五千元，余出四万元，经理及友人各一万二千五百元。然因晒粟砖庭不敷用，尚欠半数，故每天不能出充分白熟米。余与合伙后，熟米价又升，乃急购一段地距米厂不远，在大港边，兼有淡水可用，价四万元，交还一万元，余三万元典欠利息七厘。积极铺砖庭三四个月后大半完竣。逐日可以充分出米矣。冬季黄梨厂获利仅一万余元。冰糖厂因竞争剧烈，香港代售行甚靠不住，各冰糖厂多乏利有亏损者。余度此业难取利，营业经年即停止收罢。是年三梨厂得利二万余元，谦益米利九千余元，福山园长利五千元，共四万元。除伙伴红利及支侵，余实利约三万余元。

卅四岁夏季，黄梨膏市复降，普通庄每箱仅三元半，比前年减价二元余。自新加坡制造黄梨罐头以来，绝未有如此落价者，半由欧美多出生果，半由新加坡黄梨罐头增产，如前年仅百六七十万箱，本年增至二百余万箱。本季三厂获利仅一万余元，同业多有亏本或至倒闭者。恒美熟米厂自客冬入股以来，米价常好，每担实利六七角，每天增出至七百余担，每月实利一万多元。余以恒美有利，自秋后则与前顺安号，产业抵押债主，开议清还之事。所有产业由他承受，不敷若干然后折还。计开议数月，或因主人回印，故延至冬间始议妥，计不敷约廿万元，折还九万元完结。从中交现款六万元，余三万元限期四个月还清，并坐还一分利息。彼此在律师处立约，并登报存案明白。是年终各项生意核结，恒美公司计十四个月，实利十六万余元，余得十万元，黄梨厂得利二万余元，谦益米利一万元，福山园五千元，共十三万余元。除伙伴红利外，余实利一十三万元

卅五岁春，恒美公司所租印人之米厂，租期已到不肯续租，硬要出售价十六万元，典回十二万元，利息七厘率，须还现款四万元，不得已承买之，买后不两月熟米大降价，每相实利一角余，而合股之经理料难获利，便欲抽出，无法挽回，即就年终核结数目，抽去母利红利四万余元。由是银根难免稍感拮据，幸他抽去后熟米价复转升，每担三四角，故递月可得数千元入息，年终核结得利六万余元，三黄梨广全年得利一万余元，谦益米利八千余元，福山园六千余元，合计九万余元，除恒美股快及诸红利外，余实利约七万余元。

卅六岁春，福山园左右有旧黄梨园数处，亦兼栽树胶，仅年余，而园主以老园乏利可收，故不耘草，廉价出售，共五百余亩，每亩五十元，买后将黄梨及草清除，专培树胶，由是福山园之树胶已有一千英亩矣，是季胞弟敬贤回梓完婚，不数月适遭家君不幸谢世，余因营业所缠及银根关系，不能奔丧，但遣妻妾儿子回去，丧事由胞弟料理归土，又数月而祸不单行，恒美厂竟遭回禄之灾，货物无保险，仅机器保四万元而已，然货物损失不过数千元，急复兴工积极办机器兼建筑，并扩大规模，至年终告竣。是年恒美公司因火灾乏利，黄梨厂得利一万余元，谦益米利七千余元，福山园六千余元共三万余元，除伙伴红利外，余实利二万五千元。

  卅七岁，自客年秋，恒美厂遭火，保险赔四万元，交还典主（原典十二万，现存八万元），而恒美厂重新建筑，及置办机器计费款六万余元，逐日出白熟米较多，流动资本亦须增加，银根甚形困迫。时适树胶市日奖，每担由二百余元升至三百余元，树胶园及股份，亦随佳市而活动，故于去冬将福山园，抵押广益银行七万元，然为谦益恒美侵支。至本年春将福山园，与陈齐贤君等立约，许他至年终为止，按价三十二万元实收，任他经手转售，所加之价归他所得，届期如售不出，则合约取消。然由立约起他须借余八万元，利息七厘半，限期两年，又不拘何时，广益银行如要讨回七万元，陈君须代清还，期限与八万元同。计两条十五万元，均为垫于恒美厂之事。自与陈君签约后，胶价复升，未及两月，陈君便将福山园售与英人，价三十五万元，订三个月内找清。至秋间如数交清，除还广益七万元，陈君八万元外，尚剩十七万元。然自夏间胶园卖成后，余立即向柔佛觅地两处，复开芭种植黄梨与树胶。是年恒美公司得利四万元，黄梨厂得利一万元，谦益米利八千元，共五万余。除恒美股伙及红利外，余实利约四万元。

余自卅一岁春自立营业起，至本年卅七岁止，计此七年间，恒美公司及黄梨厂米店，共得实利约四十五万元。福山园收黄梨三万余元，树胶园除买地种梨雇工等七万余元外，得利廿五万元。合共三条得实利七十三万元。除还顺安债款九万元，恒美公司因熟米降低且暹罗有多家新设利源日退，而厂身及砖庭资本已乏相当价值，应须折减。前逐年只添置及修理开销，而成本却未曾折扣。计厂身原本十八万五千元，折减八万五千元，砖庭原本十万元，折减五万元，两条十三万五千元，余之款应为十万零数千元。又七年家费及义捐等八万余元，合计廿八万余元。除此之外存款约四十五万元。至往柔佛开垦之树胶园，一在笨珍港，名曰祥山园，拟栽树胶兼树茨，一在老谢港，距新加坡较近，拟栽树胶兼黄梨，名曰福山园，每月按开一百五十英亩，垫本五千余元。

   卅八岁春，余往暹罗曼谷，系专为恒美厂采粟而往。拟就曼谷溪边租栈房，买粟配来新加坡。以前系向暹行采办，颇不利便，故拟直接在暹自买。不意除米厂外，栈房难租。有友人告北柳港黄梨甚多，供全国生食之需，余即坐火车经数点钟前往视察。在北柳港有一所米厂，乃假其小火船游内港，果见黄梨园甚多。略探大概，按采三分之一，则每年可制梨罐四五万箱。其时黄梨市价已升，因新加坡数年败市，出产减少，而暹地未有人制造。又北柳地方产中下等粟亦多，正合作熟米之用。若在此设厂制梨罐，并采粟，诚一举两利。而加两个月生梨便盛出，余即买地赶建，机器由新加坡及在暹购置。按夏初完竣。并建采粟码头栈房，兴工月余将竣，号曰谦泰，余乃回新加坡。

  余往曼谷寓友人泰源行内，他介绍往见一侨生闽人，行号鸣成，富有数百万元，在曼谷及北柳均创有米厂。余到北柳参观其米厂，于近年始兼作熟米。其砖庭御雨蔽粟，系用活动可进退之屋盖。庭股边安轻便铁路，出入湿干粟及屋盖，均从铁路运载甚为便利。余一见之后，深敬服其机智，而抱恨自己愚拙。彼近间始经营此业，真所谓后来居上也。若恒美之砖庭遮粟系用竹叶制成之帆席，湿干粟出入均用人力挑运。如湿粟散在砖庭上未干，逢阴雨及夜晚则用竹扫聚积庭股上，遮以帆席，待日出再开散曝晒。常于一日间散合两三次，不但工人须多，如逢降雨多天，乏日可晒干，则臭烂损失不少。鸣成厂活动屋盖之妙处，在于湿粟既散开庭上，逢降雨及夜时，只将屋盖运来遮御，未干之粟可免聚积一处，不但可受空气助于，又俭省许多工人，终年不致有臭烂损失。然此法须有加倍空地，以容纳活动屋盖之退藏方可，然恒美新创粟庭可以办到。余回新加坡，立即照此办理并办轻便铁路，改作数月完成，约费去近二万元。至新加坡诸黄梨厂廿余家，为数年来多乏利，亏本倒罢及收盘者近半。余即招两三家来合伙，余约占三分之二。是年恒美公司除新造庭盖等费以外得利二万余元，黄梨厂得利二万元，谦益米利八千元，共五万元。除伙友及红利外，余实利三万元。

  余卅九岁，为去冬我民国光复，极欲回梓，一为略尽国民一份子职责，拟在集美社创办制蚝厂，及集美小学校，一为出洋已近十年，思乡甚切，故拟于秋间言归。即在新加坡筹备制罐机器，及火炉等，计费七千余元，并函在日本友人，代雇一熟悉制海蚝罐头技师，月薪国币二百元，订冬间到厦。至蚝之罐头，余在新加坡曾买外国货运来试过，原质气味，虽不及生蚝之佳，然每枚比较集美出产尤大，余意其过于老大，若集美之蚝势必较佳。及至秋间回梓，冬末开制，则完全失败。其原因有二，集美之蚝在海中仅八九个月，不耐高热度，煮久缩小约存十分之六七，形体大变，此其一。而该技师亦乏经验，试制仅十余天，多已变臭，此其二。以此完全失败。后乃闻外国罐头蚝，其蚝身在海中年余或两年，达相当老大，乃能耐高火度，而不变其形体，盖火度不高，则易变臭也。计亏损四千余元。乃将各机器估八千元，与厦门友人合伙招股份公司，名曰大同罐头食品公司，余入股约五分之一。是年恒美公司得利二万余元，黄梨公司得利二万余元，谦益米利七千余元，合计五万余元，除伙友及红利，余之额三万余元。  
  四十岁秋，余复南来，暹罗所创之谦泰黄梨厂，计经营已三年，约得利五万余元。迨至末季因北柳港水变咸，经理人不知预防，致损失三万余元。由是承顶与人，机器屋栈均廉价卸去，采粟则移来曼谷，租一小米厂经营白米，并为恒美公司采粟。而新加坡有两黄梨厂不利，招余承盘，由是全新加坡黄梨厂制出之罐头，余公司约居半数之额，年可七八十万箱。然因市价不佳，竞争亦烈，故虽占许多数，而不甚有利。在柔佛笨珍港所开树胶园，因地方多病，及其他不顺，上年间费去五万余元，不得不放弃。是年恒美公司得利二万余元，黄梨厂公司得利二万余元，谦益米利八千余元，合计五万余元，除伙友及红利外，余实利三万五千元。

    余四十一岁秋，欧洲战事已发生，黄梨膏近奢侈品，政府对船运认为次要，限制颇严，洋行不但停采，而前所定诸期货亦不肯领。时适黄梨季甫过，厂内积存数万箱，不能支配，致银根日形困迫。再后运熟米亦无客可受，因乏船运所致。复加以德国一艘战舰，自东亚逃去，在印度洋攻击许多商船，故船运更形恐慌。存栈万余包，洋行及印商前时采定之货，既不肯领，要求先交款十分之一亦分文不还，咸云银行汇票及抵押不通，故无款可交。黄梨厂虽停工，然欠市账未还及工资厂费，恒美厂亦然，银根困苦不可言喻。市账虽可停还，任其催逼，而各厂费及工人生活，则不能置之度外，艰难维持，度日如年。延至冬间，黄梨膏及熟米，因船运稍松，稍稍来领，及至年终存货略已售清。是年恒美公司得利三万余元，黄梨厂得利二万余元，谦益米利一万余元，福山园黄梨虽可收成，尚不垫全年之费，净得利六万余元，除伙友及红利外，余实利四万五千元。

  余自卅八岁至四十一岁，四年得利共十四万余元，而开支及损失数目，计祥山园五万五千元，家费三万余元，义捐及制蚝损失二万余元，建集美小学a校舍及两年校费二万余元，共十四万余元，出入相当，无可见长。当前年胶园卖出时，存现款十余万元，而新开柔佛福山园垫去十五万余元，大同罐头公司股份一万元，暹罗白米厂资本三万元，共廿余万元，故银根无时宽舒，常侵欠银行多少款项。

 余四十二岁，自客年欧战发生，至冬季火船载位虽稍宽些，然较前时实有相当困难，如要在安南暹罗配粟，甚不利便，各船局多不愿运粟，为其量比白米占位较大，而运熟米往印度亦常乏船。故自新春来熟米虽能合销，而原料缺乏，巧妇难作无米炊，不得已乃租赁两轮船。一艘立约两年，可载一千三百吨，名万通；一艘立约一年，二千五百吨，名万达。租后敷月颇顺利。再向香港租两艘三国船，每艘二千吨，订约一年，计租四船。所以敢如此放胆者，因曾为英政府承运枋木片，往波斯湾，每次来往须一个月，虽无多利可获，然日期可由我自定先后两个月。如运往他处较有利，我可尽先往他处；如乏利或限期已届，然后运枋木往交。以此算来全无危险。是年租船得利廿余万元，黄梨厂甚少作，而定采全年白铁，转售得利廿余万元，恒美公司得利四万余元，谦益米利一万余元，共五十余万元，余之额约四十五万元。

 四十三岁，余为客岁租船有利，乃自置轮船一艘，可载三千吨，原名东丰，价卅万元，所租之船三艘，已到期被讨回，仅存万通一艘，时租金已提高，故不复他租。而熟米一途，因暹罗仰光诸产粟原地，增设许多厂竞争剧烈，新加坡既不产粟，更难与争，已现乏利气象，前程亦甚悲观无望矣。黄梨厂自客年集合在加笼区为一所，每日能制出两三千箱。然自欧战后，销路甚短，减去不下十分之六。所定采白铁片，价值日升，转售于人更胜于裁制罐头。前有一梨厂在土桥头，各机器概已移去，只留火炉而已，乃改作树胶厂，添置各机并建吊栈，并加热风气，费款五万余元。先代他家作绞工，每月可绞五六千担，得实利一万余元。是年轮船得利卅余万元，黄梨厂得利廿余万元，树胶厂得利五万元，谦益米利一万二千元，共得利六十余万元，余之额五十余万元。

 四十四岁春，不幸发妻谢世。恒美公司熟米业已完全不可经营，乃将米厂改为树胶厂，而对面砖庭建平屋安机器，原有栈房，则改建四五层以吊胶，并添置热气，费款廿余万元，号曰谦益。自买湿胶片来过绞为胶布，在本坡售诸洋商。适有一美国广告公司经纪人，来新加坡招登广告，乃托其介绍美国胶商来交易。渠回美时，即介绍于胶业协会经理人。由是绞出胶布大半直接售于美商。秋间复购轮船一艘，三千七百五十吨，原为澳洲客船，可行十四海里，价四十二万元，名曰谦泰。余以两年来有利，乃思前年获悉闽省师校之腐化，师资之缺乏，若力能办到决在集美办师范学校，兹正其时矣。秋间即商遣舍弟回梓，建筑校舍，可容寄宿生三百人，并函托上海江苏第二师范，代聘校长教师，准新年元月开幕。冬间将所置两轮船，谦泰东丰租与法国政府，租金每月新加坡币十二万元，除用费及修理外，按可长五六万元，立约至战事终再加六个月满期。是年轮船得利五十余万元，黄梨厂仍得白铁利廿余万元，谦益胶厂得利十五万元，恒美公司无利，米店得利一万余元，共一百万元，余之额九十余万元。

四十五岁春，东丰船在地中海被德国击沉，保险赔款实收五十万元。秋间谦泰船亦在地中海被击沉，赔款七十万元，而船业已不能再谋利矣。为收得保险等款，乃买在柔佛高踏丁宜路，胶园一千英亩，又空山二千英亩，价四十万元。又买本坡马珍律港边空地，卅万方尺，价卅二万元。黄梨厂自欧战到今四年，销路甚小，获利无多。唯白铁片每订采一年之用，初战时买每箱六元，第二年买九元，第三年买十二元，第四年买十六元，大半转售出去，首年兑十二元，次年兑十五元，第三年兑廿元，第四年兑廿五元，故四年间得利近一百万元。然因经理人怠于管理，致腐漏甚多，损失及赔还洋行廿余万元。是年战事告终，谦益胶厂得利八十余万元，两轮船扣原本外得利六十万元，黄梨厂得利十万余元，米店得利一万余元，共一百五十余万元，余之额一百四十余万元。

余自冬间欧战息后，便思回国久住，以办教育为职志，聊尽国民一份子之义务。而对南洋社会关怀之事，则为新加坡未有华侨正式中学，乃首倡捐资，招全侨合办。营业如黄梨厂，因数位伙友兼经理多不认真，恐有危险，乃卸去一切，归他等承受，而保留谦益树胶厂及米店，并与他人联财在新加坡参加裕源公司、振成丰公司、槟城树胶公司等。彼时计谦益胶厂资本二百余万元，直接与美欧商交易，按逐年中平均可获五六十万元。裕源、振成丰、槟城三公司，亦均营树胶，余股份约三分之一有奇，资本五十余万，每年亦按可分利十余万元。福山园计栽树胶二千余英亩，已七八年，黄梨已除去，专顾树胶，再两三年便有利可收。新买一千英亩胶园，亦将近收利。空山二千英亩，则开始栽树胶，按年余可完竣，每月垫本一万余元。计自四十二岁至四十五岁，四年间获利轮船一百六十余万元，黄梨公司实额六十余万元，树胶厂一百万元，米及恒美七八万元，又三公司得利卅余万元，福山园估得利四十万元，前原存五十余万元，合计四百五十余万元。而支出数目，集美学校建校舍及开办，并全年经费，三十余万元，义捐十余万元，家费五万余元，共五十余万元，除后实存资产约四百万元，从中谦益胶厂活动资本二百余万元，三公司五十余万元，承恒美厂及添置约四十余万元，树胶园一百余万元，买地卅余万元，米店资本七八万元，共四百卅余万元。所加之款系买地押欠及侵银行者。

 四十六岁春余既决意回梓，乃请舍弟南来接理，时为民国八年。余于五月回乡。秋间接舍弟函告，马珍律所买空地左邻，尚有廿余万方尺要售，因地较次可便宜些，按廿余万元，余复函承买之。计马珍律两次所买空地，近六十万方尺，买价五十余万元，过后陆续填平空地，再费去四五万元，共六十余万元。该地在新加坡河港边，数百担驳船可出入，为适合建货栈之地。自余归后屋地业月月升奖，因新加坡币日小，而南洋各处获战后巨利者，多来置业，有升至两三倍者。冬间舍弟与友人，合买马珍律对面空地数万方尺，每方尺价至四元。若相比较，则马珍律之地，至少可值每方尺二元半，最低亦二元，则值百万元有奇。是年谦益树胶厂获利九十余万元，米店得利五六万元，除红利外，余实约九十万元，而汇水须二百余元方可汇国币一百元

   四十七岁余在梓里。新加坡币复缩小，盖亦为上海香港等处多存款之故。最高时坡币三百元，方得汇国币一百元。余因急于尽教育义务，故仍依计划奋进，不以汇水而退缩。其时新加坡屋业价尚好，舍弟与友人所买空地，亦积极赶建，意在建后售出可获多利，然原料亦多升价矣。而土桥头之树胶厂，余则函告舍弟改为树胶熟品制造厂。又在三条巷粟庭隔邻有远利火锯厂将拍卖，余寄函以廿五万元收买之，兼营黄梨厂。而裕源公司经理兼股东，自余未回梓之时，屡向余言合伙营业已久，有如人老须更换少年，盖早有独立之意。及本年来则下决心，存树胶五千余担暂停不售，成本每担九十余元。不久适胶价大降特降，及至售出每担亏本五六十元，计亏去卅余万元。又一胶园成本廿余万元，估计五万元归他自己承受。洋货店及账目及招牌亦归他。因诸股东念多年伙友，故不与计较。余母利原廿余万元，仅抽得饼干厂股份及屋业，可值四万余元而已。至槟城树胶公司，因股东兼经理变更售法，将一部分胶布，托洋行往美国代售，款先支八成，前后托售五六千担，亦值胶市屡降，亏损廿余万元，在地亦亏本十余万元，共卅余万元，将公司资本一切弄空，营业停罢。振成丰公司股伙中，有五人共理事，因一客籍伙侵款及私营他业，他四人便与发生意见，余函劝须念多年伙友勿复计较，他等不肯，遂致折散，振成丰公司归他承受，余原本收回。计此数月间，裕源、槟城、振成丰三公司俱失去，亏损卅余万元。是年胶市虽大降，而谦益胶厂得利九十余万元，米店得利二万余元。除各伙红利外，余实利九十万元。

    四十八岁新加坡屋地业，自客年上半年已升至登峰造极，至下半年则大降特降。舍弟与友人合建之栈房，垫去廿余万元，虽要亏本售去，亦无人接手。而所营之树胶熟品制造厂，及火锯厂黄梨厂，亦垫出许多资本。树胶园则因胶价降跌，亦停止采刈，新旧园逐月须垫去三万余元。集美、厦大建设及校费逐月亦数万元。虽有胶厂之利，出入仅略相抵，而利息及诸垫本，须多侵银行数十万元。其年谦益树胶厂得利约一百万元，米店火锯梨厂得利四万余元，余实利一百万元。

四十九岁春初舍弟因病回梓，余不得不复南行。本拟数月后再回国，及到坡之后见树胶营业，已有数家出为竞争，彼亦直接与美国胶商交易，致利益已不如前。而厦集二校，均在扩充，所需经费多赖此途之利源，故不得不转变方针。其时因两年来胶市告败，马来亚各埠小规模胶厂，大都亏损，或停罢或半作，多欲卸去。余乃往各处视察，向其收买全厂栈机一切，计峇株巴辖、麻坡、巴双、答株牙惹、怡保、江沙、实吊远、太平、霹雳九厂，卅余万元，逐厂扩充吊栈热房，及改善机器，费去十余万元。槟城厂停闭两年，复修整扩大，费数万元。俱于年内完竣，逐月可绞出胶布三万余担。制造厂亦加垫十余万元，是年各胶厂得利一百零万元，其他制造厂、米店、梨厂、火锯厂等，得利十余万元，合计一百十余万元，余实利一百一十万元。

 余回梓里及再来洋，计此四年间所得利三百九十余万元，而支出及业产降价事，计集美、厦大两校，设备及经费二百二十余万元，利息六十余万元，火锯地皮栈房按跌价五十余万元，三公司损失卅余万元，树胶园垫出卅余万元，因胶市降估减，又义捐十余万元，家费六万余元，共四百一十余万元。出入抵后不敷廿余万元。比较四十五岁时资产减去此数，而树胶园许时可刈者，已有三千英亩，新园二千英亩。尚有一坵亦在柔佛二千英亩，与梨厂伙友合种，名曰三合园，余得一半，后一友抽去，故余得四分之三，一千五百亩，已栽六七年之久。此园原本甚轻，初时只还讨山费一万余元，招客籍人百余人栽种黄梨，每亩津贴十余元，黄梨收成，分得梨利来抵津贴费已可相当，又兼栽种树胶，彼等当兼顾。此时黄梨已收五年，再迟一年余已将尽矣。合计余之树胶园六千五百英亩，每亩只估值一百零数元耳。

五十岁，陈君延谦招余一任职人合伙，经营树胶厂号曰信诚。其时竞争剧烈之家，以振成丰、通美、信诚等为最，陈君出而提倡合作，通美不甚利害置之，只谦益、振成丰、信诚三家，每采湿胶一担抽利一元，谁不实报每担须赔十元，逐月抽利若干作十分均分，在律师处立约三年计谦益得六分，振成丰二分半，信诚一分半，并公租坡中他人之胶厂五间，关闭不得开工，办事所附设信诚楼上，书记由他兼理。其初四个月谦益采胶较多，逐月支出一万余以还两家得利，再后经三个月未闻核算。时谦益办理人系李光前，余催其速结，则该三个月，振成丰、信诚二家须支出二万余元还谦益。而振成丰疑信诚减报，要查其账部，信诚不许，但承认减报五千担，振成丰则以就此当罚出五万元，渠欠谦益之账可以抵还而有余，由是两家应出之款均置度外。再延三个月，两家应再出四万余元，合七万余元当还谦益，更难交出矣。而信诚竟唆弄振成丰，将公租一胶厂作私家复业，余则以约章阻止之。彼即控余于法庭，欲破三年之约。振成丰伙伴四人，前均任余职务，其中一叶君者良心上自过不去，奔走要求总商会长薛君，力为斡旋。余云彼欠七八万元既不还且又见控，上堂打官司事，余素不愿，欠款不还置之就是。而薛君等强为要求，取信诚五千元来作了结。余素抱宁人负我宗旨故即了事。是年谦益胶厂得利九十余万元，其他得利卅余万元，除红利外，余实利一百廿万元。

    五十一岁，是时树胶厂营业扩充已足，树胶园新旧相抵，免复垫本，市价稍转，逐月有利可长，则注意扩充树胶熟品制造厂，此后简称“制造厂”，对各种车轮胎，及各日用品、医生用具、胶靴鞋等，均筹备试制，由是扩大厂屋机器。然货物出产既多，销路未通，寄人代售则难靠，盖资本家以我为新品，销行未畅，不愿代理推销，非资本家则乏信用，不得已须自设分店，俾可推销。故先在马来亚及荷印诸大埠，开设十余处。是年谦益各胶厂得利一百五十万元，其他得利卅余万元。除红利外，余实利一百七十余万元。

 五十二岁，为英政府限制树胶出产，其时荷印出产无多，未有参加。限制后胶价每担由卅余元逐月升奖，至冬间竟达二百元。自秋初三合园售于英人每亩七百元，余得四分三，实收一百万元。由是大为买入，计买五六处，在柔佛七千余亩，新加坡一千余亩，每亩平均二百余元，共二百廿余万元。制造厂又分设商店于香港、上海等国内大都市十余处。自树胶限制出产后，每担卅余至五十余元。将本厂全年所需胶款，采入足数，故有多利。至在马来各树胶厂，因价高厂寡，乏人竞争，亦有厚利。是年谦益各胶厂得利四百余万元。胶园共有一万五千亩，每亩估值按最少价三百元，可值四百五十万元，固本三百廿万元，可得利一百卅万元。又三合园得利一百万元，制造厂得利一百五十万元，其他得利廿余万元，合共得利八百零万元，余实得七百八九十万元。

余此回再南来，则由五十岁至五十二岁三年，为一生中登峰造极，得利最多及资产最巨之时。依上言三年计得利一千零七八十万元。而支出之数，厦大、集美两校建设及经费二百七十余万元，因胶价高及多买树胶园，故多侵银行。计还去利息七十余万元，义捐十余万元，家费五万余元，共三百六十余万元。对除后三年中可长来七百十余万元。若论其时树胶园价，每亩至少堪加估一百元，可加值一百五十万元。又前年估存资产三百七十万元，共一千二百多万元。从中各项财产所占数目，树胶园为最多，计一万五千亩，每亩四百元，共六百万元，谦益各胶厂机器及厂栈估一百万元，活动资本四百万元，制造厂机器并厂一百五十万元，活动资本一百五十万元，空地及栈房估五十万元，火锯梨厂米店等五十万元，合共一千五百余万元。故尚侵支银行近三百万元。

五十三岁，树胶制造厂复在南洋及祖国设分店十余处，再垫出数十万元。余对制造厂不惜垫资扩充者，以廿世纪为树胶之时代，日本小国尚有大小胶厂四百多所，以我国之广大竟无一相当树胶厂。新加坡系产胶区域，政权虽属英国，所需男女工人概我华侨，对于化验制造各机器，可臻完备，出品种类亦多，可以训练职员工人，如师范学校之训练学生，俾将来回国可以发展胶业。愚于个人营业之外，尚抱此种目的，故不惜资本，积极勇进。至谦益胶厂为去年有厚利故，多位职员欲自出经营，外间亦有羡慕诱出合伙者。然自新春之后，胶市日降，各胶厂无利可图。前拟办一造纸厂，办机器交定廿万元，见市势已不好，即取消不敢进行。自春至冬，树胶价降如流水就下，由每担一百七八十元而跌至九十余元。各厂不但乏利，尚当亏损。由是厦大校舍已下手建设者，使至完竣便止，而集美建设则于冬间完全停止。虽建筑近半之工场亦不敢继续，此乃出于不得已之苦衷，而经常校费，则如旧进行。是年谦益胶厂亏损卅余万元，利息支去四十余万元，厦大、集美支去九十余万元，办纸机取消廿万元，其他均无利，共支出一百八十余万元。

   五十四岁，前承接裕源公司之环球饼干厂系股份公司，余之股额，系一部份，他人尚占大半。因经理人与股伙生意见，余诸股东多欲售出。乃承买一切，加以改善，并扩充新式机器，垫款十余万元。夏间树胶园卖与英人五干英亩，每亩五百元，计二百五十万元。而谦益树胶厂两年间、请职员出去合他人经营同业者，计有志成、益和、南益，连前振成丰、信诚五家。洋银行及华银行被侵支至七百余万元，多将厂栈货物抵押，并有银行买办暗与联财，此乃举其大者。至于马来亚诸厂职员，出去作同业者亦有多人。由是竞争益形剧烈，各厂绝无毫利可图。自欧战后十余年来，入息多靠此途营业，兹乃如是变迁，前程甚为悲观。而胶园及别途亦无好景，逐月应支出厦、集二校经费及利息十多万元，衷心苦况难可言喻。然尚希望制造厂后来有利，故复增设分店十余处，推广销场。是年谦益胶厂，及制造厂、胶园等均无利，饼干厂及火锯梨厂米店等得利数万元，只足供义捐及家费，所余无几。厦大、集美支去经费七十余万元，利息四十余万元。共一百二十万元。

 五十五岁春，复售出树胶园六千英亩，每亩四百元，共二百四十万元。夏间我国为北伐故，日本派兵入济南，发生惨案。新加坡开侨民大会，筹款救济，举余任主席。其时华侨抵制日货甚形剧烈，余所办之《南洋商报》揭载某商家，由某轮船运到某货品若干件。由是衔恨，雇人下毒手放火焚余树胶制造厂，计毁去屋机货品近百万元，除保险外损失五十余万元。是年谦益各胶厂仍无利，制造厂为各物品降价亦乏利，又受火灾之损失。其他火锯梨厂饼干米店等得利几万元，只足供义捐及家费。而厦大、集美虽缩减经费，亦须汇去六十余万元，利息四十余万元，加火灾损失五十余万元，共一百六十余万元。

  余自五十三岁起至五十五岁，此三年均在退步境遇中，虽幸两次卖出树胶园四百余万元来抵额，尚不敷支出之数目。计支出最多者，厦集二校经费二百二十万元，利息一百卅万元，火灾五十余万元，胶厂亏损卅余万元，卖胶园佣资二十五万元，纸厂机廿万元，义捐六万五千元，家费四万五千元，共四百九十万元。饼干火锯梨米等得利十余万元。对除后尚支出四百八十万元。按诸业及厂机降价损失，树胶各厂按五十万元，地皮栈房廿五万元，火锯等廿万，胶园十万元，共一百零五万元，合计两条五百九十五万元。至估存资产制造厂机厂二百万余元，活动资本二百万元，谦益胶厂活动资本二百万元，厂机五十万元，胶园存四千亩估一百万元，火锯饼干厂等六十余万元，共八百一十万元，合两条共一千四百零万元。故尚侵支银行三百余万元，仅存资产实额五六百万元耳。

 余五十六岁至五十八岁，此三年为全世界发生大不景气之年，各物产均大降特降，树胶每担降至七八元，园主多停止采割，然不忍完全放弃不加管顾，只留一部份工人，采割之额只抵工人生活费，每日每人仅二角余，工人亦甚困苦，须加勤方有此数。至于其他失业到处多有，政府津贴川资遣送华侨男女回国甚多。胶布鞋前每双一元外，降至二角余。凡各原料及成品诸物莫不降落大半。余制造厂分店八十余处，及厂内所存生熟品，跌价不下百余万元。谦益胶厂亦无毫利。饼厂火锯等获利无多，只供义捐及家费。利息及厦集校费支出仍巨。制造厂又垫去七八十万元，致加侵银行一百余万元。至秋间银行乃商余改作股份有限公司，利息愿酌减，厦集校费亦裁减大半，每月仅限叻币五千元，余不得不迁就之。于是核结一切，计此三年支出最多者为利息一百廿万，次为厦集二校经费九十余万元，制造厂垫去七十余万元，共三条二百八十余万元。除侵银行外，余数十万元系抽谦益胶厂之活动资本。而树胶园估值六十万元，须亏四十万元，制造厂亏本七十万元，利息及校费二百一十万元，此四条共三百廿余万元。前年结存资产六百万元，除后可存二百余万元，估作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亦有加入少许。凡余名下一切动产与不动产，概行并入。此后余个人不负债责，银行举三四人为董事，一人任副经理，余任正经理，月薪各一千元。此为民国廿年八月间改组之事也。

 五十九岁之年，世界不景气仍深重，美国富人甚至有不能维持生活，降至为乞丐者。譬如存有业产及股份一百万元，而将此业抵押四十万元，尚存价值六十万元，是一富翁也。然遭世变降至值卅余万元，债主代为售脱尚不敷数万元，无力清还，安得不破产报穷乎。马来亚出产只有树胶及锡为大宗，直接间接多视此为荣枯。工人除失业及回籍外，留存有工作者每日工资至多两三角为极优，苦况难以形容。至于园主如有久债，及无力可还利息地租者，多被政府或银主拍卖，每英亩四五十元，亦有十余元者，南洋资本家破产者难以数计。是年虽校费仅支六万元，利息可减十余万元，然因物品价值复降，各业无利可长，致利息亦不能清还。

 六十岁春，新加坡及槟城两胶厂，因乏活动资本经营，乃租于南益公司。迨至夏间似有否极泰来之象，在马来亚尚有小胶厂八九所，已略呈转机。然六月间本有限公司董事会见客年下半年，各厂核结数目或无利或亏损，则议决将各胶厂停止出租，又议将外地如祖国荷印英属等分店，概行收罢。余虽力劝以分店要收必大损失，至多收回两三成而已，又胶厂已转机有利，不可造次出租，彼均不肯。计尚存答株、麻坡、巴双、怡保、江沙、太平、实吊远、峇株牙惹等处胶厂。余不得已乃将巴双厂租南益，订资本由他出，利息扣后，有利分半数为厦集校费。麻坡厂租于益和，利息扣后，有利全数充集美校费。怡保、太平等厂，则招诸经理人合租，余亦参加，订明有利，抽三成助校费。峇株厂租于宗兴公司，条约亦如是。以上系各胶厂转租之事实也。

本年五月间，英国为数年来不景气损失，对前时入口货少征税事，不得不改变税则，乃通告英辖各属地，派代表到加拿大开经济会议，增加入口税。如树胶靴以前每双征税二角半，兹加至二元，胶布鞋每双七占，加至七角半，由七月一日实行。新加坡为英殖民地，然入口不加税。前英京有八家向本厂采办靴鞋，逐月无多，现因日本及他国税重难往，故自此议案通过后，来办者大增特增。余按本厂逐月可出胶靴五万双，每双可得利一元半，逐月有利七万余元。此物香港未能制造，全数可以销清。杂色胶鞋逐月可销十万双，每双得利三角，逐月有利三万元。此为各采办家之式样，至于普通庄有多处竞争，每双得利一角余，每月亦可销十余万双，得利一万余元。合计每月可得利十二万余元，一年之后，本公司各业可以复兴，深以自慰。不意八月间英京忽来一魔商，执有汇丰银行介绍函，向新加坡汇丰银行运动，要求将本厂所出品靴鞋为他一手专卖，并运动诸董事同意。该魔商原系八家之一。余极力反对，彼等则硬要接受。余警告云，若如此必至两败俱伤。最后汇丰银行经理，则不客气言，我英国之利权不容他国人染指，所交易其他七家，系犹太人及别国人云云，此语无异暗示我华侨在内。余仍拒绝不肯签合约，而诸董事竟代签许。所欠七家之货交至十月完了，以后由该魔商一手承揽，不但定采之数大减，余亦灰心办理，与诸董事大生恶感。自秋初因定货多，立向欧美采办许多原料，兹销出既少，存栈如山积矣。

  自秋间英京魔商来后，银行诸董事与余意见日深，除制造厂有意保存，以供该魔商之需外，其他饼干厂、黄梨、火锯、米店，概欲收罢。余亦料制造厂寿命不久，故交冬后或收罢，或承顶于人。饼干厂营业额不劣，年年有利，乃招李光前承受，订明资本由他供出，利息公开，得利三分一补助二校经费。在新加坡树胶厂，原租商益一年将届，次年仍续租，亦与订明资本由他供出，利息公开，得利十分抽二，及月租加一千元，补助二校经费。而魔商逐月来定制靴鞋，不但无多，价钱亦廉，每双靴得利不上一元。余以后望已绝，更灰心办理，且料不能持久，故于阴历将终之前，核查尚欠市面七万余元，若公司一旦收盘，决无清还之理。于是通知各货主或原物领回或取制品抵额，一切交还清楚，此后如有再需些少用料，则以现款交易。银行诸董事见余灰心消极，乃延至阴历十二月终，全厂停闭，由银行公举收盘员，全权核结收罢矣。

  余自卅一岁春，经营商业及工厂，种植黄梨树胶，计前后创设商店百零处，各项工厂卅余所，垦树植胶及黄梨园万余英亩，雇用职员工人常达数万人，对于居留地政府及侨胞，略有相当裨益。至十余年间牺牲教育费，坡币八百余万元，实亦按部就班，非自已无相当根底，而只出于孟浪之举。所经营诸业，以树胶园、树胶厂、制造厂三项为大宗，其他则无关轻重，尤非专营投机者比。当四十六岁倡办厦大时，己存有资产四百万元，至五十二岁增至一千二百万元。而两校设备及经常费，年开八九十万元，自度决无过限，岂意再后树胶价大败特败，复加以职伴多人出作同业竞争，三年间无毫利可入，而校费及利息货价支出至五百余万元，然尚存有资产六百余万元。校中设备费早已停止，经常费每学期缩减，至常年费三四十万元。不幸一波未平，一波复起，适逢世界大不景气来临，仿似避贼遇虎惨况。有人劝余停止校费，以维持营业，余不忍放弃义务，毅力支持，盖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少，影响社会之罪大，在商业尚可经营之际，何可遽行停止。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若命运衰颓，无挽回可能，原属定数，不在年开三几十万元校费也。果不幸因肩负校费致商业完全失败，此系个人之荣枯，与社会绝无关系也。当公司收盘之时，分店八十余处，货物家私存二百余万元，制造厂机器厂栈房除逐年折减外，尚估值二百卅万元，原料存在栈内者六十余万元，生熟品数万元，共五百余万元，树胶园可值一百万元，胶厂四十万元，饼干厂及火锯等廿万元，地皮栈房廿万元，合计六百八十万元。而收盘最大损失为分店及制造厂机器，收回不上三成。自有限公司成立至收盘计卅个月。厦集校费每月不敷一万余元，共四十余万元，系将厦门校业变卖十余万元，及由集通息借卅万元，来维持耳。

中华民国卅三年六月卅日陈嘉庚于爪哇晦时园避难中

余自民国成立后，对于中国前途，抱热烈希望。虽军阀内哄，战争不息，总念国家改革，乃能达到幸福目的。迨民十七年，北伐成功，南京政府成立，更希望能如苏联之彻底改革。乃历过多年，绝无实现，只是独裁欺诈，媚外害民，消除异己。至七七事变后，抗战多年，民生惨苦，而独裁者仍不悔悟。其时，蒋介石等尚属中年，且历行教育党化，预作永久独占政权地步；余意设使天佑中国，降生忠诚建国人才，不知须再延迟若干年之久方能代蒋氏掌握政权，以救国救民，况今世尚未闻有此人才，故忧虑悲观，无时或已。民国廿九年代表南侨回国慰劳抗战军民。至重庆，见国共磨擦严重，似有剑拔弩张之势，如不幸破裂，抗战何能胜利，余知国民党方面，对中共仇恨之深，非轻易可以解释，但未识中共方面之意见如何，乃决亲往视察，俾略知其究竟，庶回洋时可报告侨胞。及到延安后，关于国共磨擦事，据该方表示，愿极力退让忍耐，避免分裂，以枪口一致对外为目的。时彼强此弱，余相信其所言系事实。除此项之外，余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军事则与民众合作，联络一气，同甘共苦，推诚相待，已将军队扩充至二十余师，使敌人在华北势力，仅占交通线及若干大城市而已。至政治方面，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整然，优待学生，慎选党员，民生安定。其他兴利除弊，都积极推行。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莫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回到重庆时，国民外交协会邀余演讲，定讲题为“西北之观感”。余对军事一字不提，对政治方面，颇详述见闻各事实。国民党报对余演讲词，俱不登载，独新华报登载甚详。国民党人由是对余大不满意，蒋介石之不满更形露骨，以何应钦名义电令江南诸省当局注意余之行动。及余入闽，查出陈仪徐学禹祸闽惨重，电请蒋介石撤废闽省苛政，但结果被拒。余经西南各省，召集福建同乡会，图团结救乡，出国后至南洋各埠亦然。从此之后，蒋介石及其军政机关等即与余断绝来往。

       民国卅一年，日寇侵陷新加坡，余避匿爪哇，乃著《南侨回忆录》、《我国行的问题》及《住屋与卫生》。民国卅四年十月，余回新加坡。在其时国人对国共会谈妥协合作事，多抱乐观，余独不以为然，盖君子与小人，断无合作成功之可能。及全面内战发生，美国政府极力帮助蒋介石，增长其内战之野心，甚至驻海陆空军我国土，余乃发电致美国杜鲁门总统及参众两院长，反对美国助纣为虐及驻军，并警告多行不义必败，请彼等以日本德国为鉴戒。因此，马来亚各处国民党人机关及报纸，对余百方攻击。或公开集会，函电交驰；或匿名谩骂，遍贴标语，惟全马诸民主派，及劳动界，妇女界，青年人等，愤恨不平，在各处亦召集大会，拥护余之通电，其他侨民表同情者亦众。荡动月余，国民党人及党报乃消声。详情载在《南侨正论集》。当时新加坡南侨日报尚未开办，所有各报多偏于国民党人方面。吠影吠声，势所难免。及南侨报开办，全面内战正剧，余故屡发表意见，以告侨众。现蒋政府即将倒台，全国即将解放，革命大功瞬将告成，余乃续著一书，名《民俗非论集》，以贡献我新民主政府，兹当回国观光前夕，爱将三年来发表意见汇印，名曰言论集。

大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五月一日

陈嘉庚

    东方杂志三十周年纪念要我作一篇自传。自维一介侨商，非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贡献宗邦事业，愧不敢当。乃荷续函催寄，语重意诚，过却恐涉不恭，谨书稍关实业教育及侨情数者，聊以塞责。

我为福建同安县人，世居集美社，距离厦门水途数海里。九岁入私塾，十七岁第一次南来新加坡，随同先君从商，二十岁首次回梓完婚，二十二岁第二次南来。二十五岁第二次回梓。二十六岁第三次南来。二十八岁第三次回梓。三十岁第四次南来。三十一岁始自经营米谷，号曰谦益；同时并创设波萝罐头厂。三十二岁买山地五百英亩，种植波萝，逐年入息不过二万元。其时南洋橡皮业甫在萌芽，乃觅购种子二千元，插种于波萝之边。三十三岁向印度人租一制造熟米厂，日出米数百担，专售印度，年余获利十余万元，乃承购该米厂二十万元。制熟米之法，系将谷用水先浸至透湿，然后炊热，落厂栈磨去壳后，印度人食米多用此法。南洋华侨前多脚气病，若食此米，则脚气可愈。三十五岁熟米厂遭回禄之灾，重新建造，损失数万元。

       三十六岁剪去辫发，示与满清断绝关系。时适橡皮价昂，将所种之橡皮园卖给英人三十五万元，复购置山地数千英亩，仍垦植橡皮，每年垫资本十余万元。三十七岁任新加坡闽侨首创之道南学校总理，加入同盟会。是年秋满清政府推倒。在福建会馆开闽侨大会，倡办保安捐，筹款资助闽省光复，被举为会长。三十八岁第四次回梓，在集美大祠堂传集乡长，告以创办集美两等小学校。及建筑校舍之要义。议定即托友物色校长教员十余人，始知同安全县，仅有师范简易科毕业生四人，除一人转营商业外，尚有三人，即聘其二。查同安县人口四十万人，仅有县立小学一校，私立四校，学生总计不满六百名，其文化如何，可以想见矣！

       我在南洋将归之前，曾购办制造罐头机器。运回集美设厂制造海蛎，并聘到日本人任技师，结果成绩不佳，将该厂移设厦门，改作大同股份有限公司食品罐头厂。

       三十九岁春二月集美小学校开幕，夏集美小学新校舍告竣移居焉。我于夏秋之间，出游同安各处乡村，目击儿童成群嬉游赌博，衣不蔽体，且有赤裸全身者，询之乡长有无设教，咸云旧学久废，新学师资缺乏，经费奇重，无力创办云。我听其言，深感闽南数十县，同安如是，他处可知，若不亟图改善，恐将退处于太古洪荒之世，岂不可悲？顾以能力有限，时萦脑中而已。是年秋第五次南来，扩充波萝厂，四十一岁适欧战发生，船运不便，货物积滞，大感困难。几乎有停业之虞。四十二岁租期限轮船四只，川走南洋及印度等处。四十三岁购置轮船两只七千吨，出价一百万元。航行欧亚，曾往浦口载运华工往法国。秋将一部份波萝厂。改作生橡皮厂。并命舍弟敬贤回梓建筑集美师中校舍及创办女小学。四十四岁复将熟米厂改为生橡皮厂，规模扩大，并直接推售美国，较之就地售于洋商，获益不少。

       四十五岁春集美师中学校开幕，夏秋所置两只轮船，因欧战关系，沉没于地中海。收回战险赔偿费一百五十万元，冬购置橡皮园一千英亩，出价四十万元。并购拓山地数千英亩，垦植橡皮，复在霹雳邦之太平埠及槟榔屿埠，设生橡皮分厂。同时倡办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

       四十六岁集美商科及幼稚园开办。是年本拟长住桑梓，致力办学，不复南来操心商业，故南洋商务稍事收束，计其时如除还债务外，剩资产四百万元。按逐年入息，尽数提归办学之需。秋五月第五次回梓，七月假厦门陈氏大宗祠，传集各界倡办厦门大学。其目的系要求最优美适宜之演武场官民山地为大学校址。

       四十七岁集美女师及水产学校开办。夏聘定汪君精卫任厦门大学校长。迨秋间因陈总司令炯明，由漳州领粤军回粤。汪君乃来函告辞。十月我往上海邀同余日章，郭秉文，李登辉，黄炎培，胡敦复，邓萃英，黄孟奎诸君，开厦大筹备委员会议。

       四十八岁四月六日。厦门大学假集美校舍开幕成立。五月九日，厦门大学校舍奠基。秋驰函新加坡将第一生橡皮厂改作橡皮熟品制造厂。

       四十九岁二月厦门大学移入新校舍。建造集美第一渔船，为水产学生实习，费款三万元。三月第六次南来，原拟稍住数月，重行回梓；迨抵埠后，鉴于生橡皮厂同业竞争之剧烈，不得已取消来意，即往马来亚橡皮出产地，创设分厂九处。大半系承购旧厂改革，同时并扩充橡皮熟品制造厂。

       五十岁集美女中并幼稚师范开办。是年新加坡寓有同邑人爪哇大富某侨，拥巨资数千万元者，因代厦门大学向他捐募，不纳。五十一岁往游爪哇。创设分行数处，在万隆泗水二埠，遇两位乡侨，各积有资产数百万元。年纪已大，皆无子嗣可继承其业，然我恐曲高和寡，不敢奢望，但请捐建厦大图书馆舍一座十万元，亦竟无效。

       五十二岁集美农林学校开办。向法国购集美第二渔船一只三百余吨，价七万元。是年英政府限制橡皮出产，价值大涨。乃卖去第二次橡皮园二千英亩，银一百四十万元。转购入数段七千余英亩，银一百五十万元。其年生橡皮厂获利四百万元。冬间函告厦大集美二校长，新年可增加经费，扩充设备，并拟捐建厦门福州上海三处图书馆。计其时除债务外，剩有资产可一千二百万元，拥有橡皮园一万五千英亩，每亩现年可入息一百元，姑如减至五十元，全年亦有七十五万元。其他营业人息亦属不少，自以每年担负教育义务一百多万元，不为过举也。

       五十三岁春复购橡皮园一千英亩，出价六十五万元，其地距离新加坡市区仅六英里，又创设牛皮厂肥皂厂，造纸厂。（纸厂不成耗去定购机器银二十万元）夏秋之间，橡皮市价大跌。上半年各途营业又多失利，审度时势，绝无乐观之希望，不得已停止集美校舍工程，驰函取消图书馆之筹备，此为我一生最抱歉，最失意之事件。

五十四岁卖去第三次橡皮园五千英亩。价银三百五十万元。虽获此巨款，然不敷两年来之支出，故难免处于困难之景地。

       五十五岁济案发生。倡办山东惨祸筹赈会，被举为会长。其时全侨抵制日货至为剧烈，我所办之南洋商报，因登载某家某日到有大帮仇货，对方竟以此含恨，致橡皮制造厂重要部份，突遭其回禄，损失六七十万元，更以抵制日货之故，日人大肆报复，有组织之同类物品，贱价竞售，受创尤大。

       五十六岁卖去第四次橡皮园六千英亩，价银二百六十万元，除还债外，所剩无几。从此之后，橡皮价值日败，橡皮园乏人承手矣。

       五十七岁至今四年间，各途营业更形惨败。土产败市，产业贬值，不景气之严重，自有新加坡以来所未有，亦世界所未有。损失之巨，毋待赘言。

       自五十三岁迄兹八年，江河日下，入息毫无。盖诸营业中，唯生橡皮厂最为有利，而前服务诸伙友十多人，相继离去作同业之经营。各银行更供给款项，至七百多万元。故资本宏厚，竞争剧烈。致数年来优美之利权，完全丧失，至银行何以容易相信彼等而投资，因凡许售欧美橡皮，买客当由银行认来信用票，银行以票利厚，故争相放款耳，竞争诸旧伙，大半已于前年失败，银行损失亦甚巨，现存数家，亦曾经过困难，但因价值低廉，资本短小，难期发展，然在马来亚市场上最活动者，莫非旧时伙友也。

       我办学之动机。盖发自民国成立后，念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以一平凡侨商，自审除多少资财外，绝无何项才能可以牺牲。而捐资一道，窃谓莫善于教育，复以平昔服膺社会主义，欲为公众服务，亦以办学为宜。更鉴于吾闽文化之衰颓，师资之缺乏，海外侨生之异化。愈认为当前急务，而具决心焉。集美师中初办两年，四易校长，外人不知中间苦况，每多误解，且或讥为商人见异思迁，然敷衍潮流，较之实事求是，相去悬殊，故不得不彻底改革。我在厦门鼓浪屿，遇一富侨在其乡里办一小学，附设师范科两班，甫仅数月，纠纷枝节，告我曰：“唉，吾侪当时以为赚钱难，今日方知费钱更难也”。

       集美中等学校，开办时系注重师范，次及中学实业等科；因鉴于全闽师资之缺乏，及严求师范生毕业后人人须能实践教职，故首期招生，不便造次，乃函商闽南各县劝学所长，请各保荐合格贫生，及志愿将来任教席者五名，其待遇则较政府所办者为优。如此设施，经数期后，师范生在学者数百名。

       闽南地瘠民贫，海多田少，对于水产农林，故特加以注意。其初拟先办水产学校；民国六年，资送吴淞水校考取第一名学生，往日本留学，毕业后服务集美水产校。开办后又恐毕业生无出路，乃向欧洲购买集美第二渔船一只，使其出海捞渔，三四天后满载而归，成绩甚佳，所得之鱼多为帆渔所未见，迨开市发售，每次须七八天方能卖完，缘闽南交通不便，不能急运内地消售，而厦门一隅销路短少，供过于求，且冰块昂贵，利不及费；不得已，乃令该渔船驶往上海渔捞。厦门大学创办之起源，为鉴于闽省中等师资之缺乏，盖小学师资既有集美学校可负责，而中学师资，则尚付缺如，然大学要办理稍完备，需款浩大，非千万元以上不为功。窃以南侨之富，若有宏愿者出，则三数人之力已绰有余裕，且百尺高楼从地起，要彼先筹现款，而后创办，度今之势，无日可成，故我不计成败利钝，勇往进行，最初准备三年内，捐输开办费一百余万元，待规模稍具，引起侨界信仰，然后奔走南洋各埠，筹募巨款，以闽侨之富，目的不患不达也。

       向人募捐办学，势有不同，如办中小学，可以沿门劝募。半由情面，半出本意，多者千百元，少者数十元，结果筹有数万元，或多至一二十万元，便是最佳成绩。可以作基金，可以抵多年校费，至于大学募款，则似不然。凡殷富之家，须了解人群责任，及社会义务，才能自动慷慨，虽出于厦门之劝募，亦当由本身热诚乐输，如此则少者数万元，多者可至数十万以至百万者，则规模方能远大，倘其人不解国家社会为何物，人群天职为何事，拔一毛亦难，况巨大捐款乎？

       厦大集美两校，十余年间，我各捐去四百余万元。集美从未向人募捐。厦大前年曾由林校长文庆，向黄君弈住捐办图书册三万元，又曾君江水捐建图书馆一十万元，又叶君玉堆捐款五万元，又北平文化基金委员会，年补助理化科三万元，国府于民十八年秋，按月助款五千元。自东北事变以来，所交不及半数。去年厦门之厦大协进会，并林校长来南洋捐募。合计约募得二万元。

       南洋华侨素称爱国，然对祖宗庐墓所寄之桑梓，理宜更加注意。西哲有言：“凡有诚意为公益者，必须先近后远”，查闽南富侨，在南洋未遭不景气之前，约可千家以上，若每人能在其故乡办一小学校，或数人合办一校，按年每校津贴费至多不过一千元，则闽南何患教育不普及；而事实上乃等于凤毛麟角！民九我在集美倡设同安教育会，其目的在图同安小学之普及，而向南洋同侨筹募年捐，按每年增办三十校，十余年间全县可以普遍，甫办两年，成立四十余校，每校年约补助费六百元，在新加坡募有年捐二三万元，他埠尚未进行，迨收款时，成绩则不及半数，或完全推诿，或交不及半，于是巧妇难作无米之炊，原定计划，终成泡影。

       橡皮熟品制造厂之创办，我亦为一种理想之提倡。二十世纪称为橡皮之时代。欧美之盛，固不待言，岛国日本亦已设厂至数百家，独我国则尚未萌芽。新加坡为橡皮出产地，且距离我国不远，男女侨胞数十万人，若能设备大规模制造厂，不特可以利益侨众，尤可以为祖国未来工业之引导。如化学，工程，技术，机师，人才等等。须经长时期之训练，为教育之造就师范生，应有发展林立之可能，故锐意进行，当时聘到东西洋技师多人，教练工作，凡各种车胎，靴鞋，雨衣，及其他用品，无不研究制造，前后垫去资本银八百万元，雇用男女工人六千名，分设发售处八十所，乃遭不景气之损失，及日货贱价倾销之竞争，致一切皆遭受打击，陷入困难之境地。

       我在此三十年间之经营，统计所入赢利，米业约五十万元，波萝厂一百万元，轮船一百五十万元，橡皮园四百万元，生橡皮厂一千二百万元，共一千九百万元。至支出之数，厦大集美两校八百万元，利息五百万元，橡皮制造厂亏损四百万元，牛皮，肥皂，造纸，枋木厂损失七八十万元，地皮产业亏折一百万元，共一千八九百万元。我之个人家费，年不过数千元，逐月薪水足以抵过。在集美建一住宅，值不上一万元，他无所有。今日资本实力丧失迨尽，而校费极力缩减，现状尚可勉强维持，善后问题，则茫无把握矣。或谓我当时校费若早缩减，可免今日困难。语虽近情，然我则否认是说，盖自不景气来临，平素较我殷裕者尚多，既无如我之负担，乃现下之困难，固亦不减于我，且更有甚者，又何说焉。自古英雄豪杰，何尝不遭艰危落拓，况我乃一庸愚侨商，安敢妄事怨咎，美国汽车大王有言曰：“正当之失败，无可耻辱，畏惧失败，才是辱耻”其言足资警惕。愿国人勿引我之困阨为口实，致阻公益事业之进展，陷我于罪人幸甚。

 闽南华侨不下数百万人，不亚其他繁盛区域，何以闽南社会仍属衰落，民生仍属艰难，乡邦事业，实际似无裨补，推究其实，殆有三种原因，一则此间乐不思蜀，绝无祖国观念，及身如是，后辈可知。一则入只供出，或所人有限，无资可以寄归。一则固富有资财，不忘乡梓，虽挟资回里，不过建华屋，蓄婢仆，锦衣玉食，交结权贵，阔费大豪侈，导变风俗，或则放钱债，高利息，购良田，独善其身，无民生之观念，无社会之利益，且田地有限，原为农村生命线，一归大地主，则农民不能自存，至贫民借债人手，多作不正当之开销，结果财产俱亡，其流弊酷烈，转出富侨之所赐也。

       过去华侨在祖国称可获得荣誉者，缘华侨较之国内居民，资财比较丰裕，故对于义务捐输，亦比较容易，逐博得爱国荣名，几乎华侨不归，如吾闽何。自民国成立后，各界同望华侨运资回国，振兴实业，大利民生，而尤以吾闽人为甚。若究其实，虽不景气未来之前，亦如画饼充饥，徒拥虚名而已！盖少数义捐，集腋成裘，乃普通人容易做到之事。对于精神上，营业上，绝无关系。较之倾家产，运巨资，归祖国，舍熟就疎，艰难辛苦、与新事业奋斗者，殊有天渊之别。至华侨拥有资产之人，现下可分两种：一种侨生承先人遗积，富者尚在不少，此辈久已忘祖，安有祖国观念？一为年在四五十岁之老客，经久年辛苦奋斗，始成艰难缔造之事业，多属不动产，或商场货账，虽有现资不过十之一二，使其热心祖国，亦仅衣锦回梓，省视庐墓，或稍息尘劳，或游历观光，目的不过如是而已。谁肯舍半生在南洋已成之事业而另图未必有利之新事业耶？

       我久客南洋。对于侨情颇知底蕴，既不欲祖国空费无益之期望，亦不愿侨众辜负国人之推荣。故凭我良心上坦白无隐，据实倾诉，功罪均不之计。虽然，华侨之于祖国，亦非绝无乐观之可能，以我鄙见，约有三事，若能达到，则华侨决不负国人之希冀！

（一）政治纳人正轨，地方秩序良好，无军阀劣绅土豪之欺凌。

（二）交通略已发展，利便新事业之建设。

（三）独资创办或组织股份公司，成绩稳健，利益优厚，则利之所在，人必争趋，而华侨之投巨资归祖国，势如水之就下，即平昔乐不思蜀之流，亦必倾资而乐于归化也。

**新加坡华校历史沿革**

**星洲道南学校三十周年纪念会上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9.11.1936**

       潘校长、各位教师、各位董事、各位来宾，本人对于新教育，为一门外汉。惟本校为福帮所办，本校历史，则所深悉。“有教无类”，办学而分帮派，本可勿须。而事实上本坡华校，则殊分帮办理。此中底细，少年人或未详悉，老年人多能道之。查本坡各帮学校，率皆创办于三十年之前。故本人今日，愿与诸君一言三十年前本坡各帮创办学校之事。

**华校历史**

       前者，国人所读，不出四书五经。读书场所，率为书房，亦称私塾。每处所读，不过十人左右。至如今日学校集数十人或数百人于一堂者，曾未之见。而于授课时间，则自上午六时半至下午五时左右。当日训蒙，着重道德。至于科学，如历史地理之类，则付缺如，盖复偏守一隅，故有所言，尽于“天下”，殊不知有世界各国。是以当时读旧学而知爱国少，受欧西文化陶冶，不在此例者，亦有可见。

**满清变政**

       再言满清，满清时节，禁锢民智。教育虽极要紧，自亦不与我人提倡。及至甲午，中日战争后，痛定之余，乃思变政。于是废科举、兴学校，稍稍振作，然皆取法日本及西洋也。

再言旧学，学校振兴之时，唐山各处，固有书房。唯于南洋，则殊罕见。即有设立，亦仅设于僻巷偏远之处，迨至学校兴设，数年以后，南洋乃有纠集同志，兴办学校者。当时办学，固有出于先知先觉，然亦有出于顾全一帮体面，或出于他帮所设学校，不收异帮子弟，此则分帮办学最初现象也。

**最初学校**

       当时本坡各帮，所办学校，广府有养正，客有应新、启发，潮州有端蒙，福建有道南，琼州有育英。育英之创，时间较后。至于道南之名，则陈宝深南来招集铁路资款时所取。

       当时华校，由各帮自由筹划，分帮筹划入手较易，此固分帮办学之原因。惟当时各帮，难于联合，亦事实也。世言学校得失者，率别质量。惟今日言学校之办理得宜或成绩优异者，则多以量为凭准，至于质则未加注意。

       华侨教育，至今尚未负我前人之望，岂不宜哉！华校组织则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彼此之间，不相联络，更无所谓统一行政。夫无组织则无钱，无钱则难指挥如意，此乃必然之结果。而使之然者，国民程度太低有以致之也。若言合作，华侨中学事实上固各帮所合办，惟举董事，各帮中则有举而不认，认而开会不到，有事不管，经济拮据不瞅睬者。故知国民程度太低，欲事团结不可能也。卅年前，侨教即加统制，其结果料亦不能与华中有异也。

**侨团近况**

       总而言之，华侨社会，卅年来，实无进步。至于官僚政客，过星受人欢迎，必以“团结”之义，最我侨众。团结一事，又岂开一欢迎会即可实现耶！

       若言团结，外人霜业纸业、胶锡业之联合，始终如一，成绩卓著。反观我人，则又如何？有人谓此次马华联合寿蒋，可谓团结。实则此次所以有一百三十万元之成绩，一则出于华侨之爱国；二则出于彼此之比较；三则出于西南倒台，全国之统一。若此可谓团结，则结婚生日与夫送死、迎棺之聚集，亦可谓团结矣！今日国政上轨，建设进步。同侨于此，切宜洗心，则于自省自治之下，侨教自有通盘筹划之可能，团结一致，方有实现之一日。

**集美学校风潮与高小毕业生升学之将来**

**原文载新国民日报18.7.1923-20.7.1923**

       鄙人承校长邀请对诸学生训词，鄙人非教育家，安能承领。惟集美此回风潮真相，谅为诸君所愿闻，爰报告大概，愿诸君有以教之。以鄙人之意，高小毕业生有志升学者，第一，安当有毅力求学。第二，凡事当审慎是非。第三，自己有主持能力，否则难免时势之潮流而趋于嚣张妄从之弊。吾侨子弟肄业集美者不少，凡学父兄为以邻人之言为是，请于家庭之责任勿度外置之。

       集美学校；此回风潮，其缘由为少数学生不喜校中规则严谨，阻碍其志气与男女社交之自由，乃倡设学生会以对抗学校，发周刊骂中学部女师范部主任与管理员。不数日复以“五一”、“五四”自由停课，全体到厦游行自鸣爱国。五月九日唆使童子军违抗教师命令，于是校长既忍无可忍，乃开全体教职员会议，革除为首两名，于是罢课风潮遂起，而集矢于校长，以为校长若罢，则不满意之教职员亦可一网打尽矣。

       集美学校教职员一百七十余名，学生一千九百余名。在校寄宿者约一千四百名。建筑部工人五六百名，校役百余名，合计近三千名，概归校长管辖；而校中最困难之事当推寄宿生为多务，与通学生大相悬殊，盖通学生除数点钟上课外，他非教师所干预，且上课时教授讲演面会谈譬，师生感情，较为浓厚。若寄宿生者另有专员管理，虽兼教授时间无多，故不驯之生易生恶感，其管理之规则如下：

早五点半鸣钟当离床

六点赴操场列队早操

下午课后运动别订规则

九点息灯安睡不闲谈

帐被要整齐室内要清洁

每日三餐管理员陪食

晚钟七点须自修功课

往厦须向管理员请命

       他如关于社会风化卫生嗜好，管理员认为不妥与越出范围，或干涉阻止，或示戒记过。鄙人但知其略，未谙其详。究此规则有无严酷，如认为适当并符部章，则难免无诚意求学之生之恶感，盖父子兄弟间或尚有其人，况师生乎？

       不宁唯是，而寄宿生亦以中等学生为最参差。若小学生年纪幼小，任教师如何指挥训导，莫不遵命服从。否则当为大学生年纪，程度阶级较高，设有少数乏诚学之生，或狂谬过激之辈，同学中自有辩其是非能力主持，决无相率妄从。唯此中等学生，既失家庭之教育，复乏良好之小学，立基不善，办理惟艰。加以血气未定，自由误解，以罢课为爱国，以不敬为勇敢，既无尊师重道之念，安能爱家爱国之行。不晓权限，不计是非，乏主持能力，复以不同为耻，故一唱百和，重以劣社会不明真相，推波助澜，是以一发而不可抑止也。

       自风潮发生后，鄙人屡接多处教育社、勤学所并素不相识之人来函讥刺，谓甘牺牲千余学生而不肯去一校长相诘责。嗟乎！此语或出自他界，尚可有原，不意乃出自教育界中人，且为一方之领袖，可不叹哉？现集美校长办理三年，鄙人在家与共事者两载，深知其道德毅力学何，足以长集美而达我将来之目的。其成绩为何，为学多焚。然教职员百七十多人，系经过三年中罗致多措之精锐，而非一郡之所有。此回风潮，不讲是非曲直，而以多少数比拟，即罢校长，诸教职员，其谁不解体乎？势必重新组织，无论鄙人不能复居家求贤，含弟病躯未愈，设托人介绍得贤如现校长，亦必再压三年乃无此现状。则该三年中务退阻进，其牺牲为何如耶。况贤能校长将何处觅，鄙人曾受多次教训矣，不幸不得其人，则集校前途，奚堪设想，恐其牺牲或当十倍于此回也。

       至于牺牲千余学生之说，更觉谬妄。盖彼辈若甘自废学，作乏程度之国民，虽留之集美奚益，或即足以捣乱耳。若果有诚意求学，试讲闽南中何校可容其不来者几希，就使有者，均属教育，何牺牲之足云。若果如来函与某报馆社会之言论，当依多数学生之意旨更动校长，以迁就之，则校中规则亦当任学生可否；而教师当奉迎听命于学生，管理员可以免役，此后学生便可趾高气扬实行自由之目的，而校中可以省许多经济，鄙人何愚而不从。弟恐失教育之真相而负学生父兄之信仰，否则更动校长，为鄙人之惯技。集美开办未及三年，四易校长。厦大成立，仅一月便辞校长，兹何劳学生之要求社会之推波助澜哉？总而言之，教育非仅读书识字，而尤以养成德性裨益社会，且不忍血汗微资，贻害青年，并问我之天良与实事求是耳。

       附录前电如下：

       校长鉴：请主意便是或商敬贤。

       校长鉴：仍如前年罢学生，决无许先生辞职。切盼毅力支持。如果出于不得已时，仍提前放假。

       校长鉴：过度时代，蜩螗嚣张潮流难免。吾侪职责创造兴革安可轻弃？请宽怀视为常事。余意逐生诘去留，愿去听来秋招生，取缔保金三十元，勿以生多为意。

       校长敬贤均鉴：曩数易校长，前车可鉴。若轻易更动，集美恐无宁日。我兄弟又未暇兼顾，况权操学生，教育何在，余绝端反对。

       校长鉴：任学生如何嚣张，各界如何推波，本校但以冷静处之。秋季来生愈寡愈妙，余虽不能迁就，深愿彼辈转学他校以达目的。请将前后中文登报以明决心。

**陈嘉庚筹办南洋华侨中学演词**

**原文载国民日报18.6.1918-20.6.1918**

       南洋华侨中学，亟应筹办之要义，前既迭发通告，谅早在诸君洞鉴矣。回忆数年前鄙人曾具意见书，倡办中学无有之者。嗣复有人，提倡此举，鄙人又首先签名赞成，乃竟徒托空言，不久仍无声无息，心灰意冷，亦只徒唤奈何耳。迩者同德书报社请君特举代表，重以此只徒活那人，而鄙人欲偿夙愿，遂不顾棉薄，毅然为之那不辞。然恐经济无着，未敢冒昧，爱先谋之同志，得万余元，合诸国风幻境演剧捐助万余元，共得五万元之款，乃遍询各校总理，佥得同意，故敢登发通告，召集大会。今日蒙各界诸君踊跃惠临，不吝雅教，鄙人无任欢迎。所谓谋得同志之款者，鄙人亦参与其列。兹将认款诸君，按名报告。计马六甲埠曾君江水壹万元，小坡新协兴钟水泮二千元，恒利号暨林义顺、叶大炮、叶玉桑、邱国瓦、陈先进、张顺善、薛武院诸君各捐壹千元，鄙人凑捐壹万三千元，合国风幻境壹万七千元，共计五万元。至中学应合办之理由，试略言之。若小学兼办中学，无论能力之办到与否，弟以鄙人梓里所历办学校之经验观之，断然不合，盖中小学两部分，教员之资格既有等差，而学生之年龄，又相悬殊，种种困难，不胜枚举。两校不宜混合，必须距离，方为两便。不宁惟是，中学生如仅有一二班，每生年须垫款百元，其经费之浩繁，岂得支持长久，此南洋中学尤不容不合办也。诸文明国教育，除幼稚园外，七岁入小学，十三岁升中学，四年毕业，至是十七岁。即不人专门，其智识技能，亦足自营生活于世界。乃吾人不注重中学，是无异培养子弟至十三岁止，而欲责令自立，勿论无此能力，倘非最贫苦之家，其父兄决亦不如是之忍也。

       至南洋小学之不甚著效者，以无总机关为之比较耳。苟中学成立，使其有所进步，浸假而改良之，则小学之获益实非浅鲜。或云小学毕业入中学者殊罕，是亦莫怪其然。诚以前此华侨子弟多半幼年失学，十余岁始入小学，迨毕业已十七八岁，故鲜有中学以上之志。今则勿虑及此，盖迩来小学生在十龄之内者几居过半，就本坡而言，可在千人以上。此后按年毕业是有百人之外，吾侨如不早为之所，其贻误后生，奚堪设想。美教会近已实行筹办英华大学校于本坡矣，校中兼设华文一科，他日我华侨中学毕业生，有志升入该校，纵英文不及格，亦可先入预科，或我中学增设英文科，抑要求该大学特聘华文专门师为教授。以该校之设，我华侨捐资为最多，且有多人参董其事，来日方长，尚多前途希望也。谚言：“有财不乐则愚”，其语似有价值。然以鄙意度之，要当以国势为判断，在吾侪丁此存亡之秋，忧国之不遑，奚遑娱乐，故有财宜输教育为急务。诚以救国既乏术，亦只有兴学之一方，纵未能立见成效，然保我国粹，扬我精神，以我四万万民族，亦或有重光之一日乎。日本某杂志云：“英美德法诸国男女不识字者百人中不满十人，日本新进国百人中不满三十人，我中国的人中则占九十六人，识字者仅百人中四人而已。”呜呼，此人格欲立国于世界而求免天演淘汰，其可得乎？诸文明国教育，除却政府注意维持外，而个人社会捐资倡设者，其数尤巨，且多有倾家捐助办学者，故其教育界能收美满之效果，非全倚靠政府也。我国政府既不注意教育国民，复自顾私利，视财如命，互相推诿，袖手旁观，以致教育不兴，实业不振，奄奄垂危，以迄于今日，此诚堪痛哭流涕者。我侨胞久慕文明，号称爱国，而富商巨贸又不乏人，万勿放弃天职，坐待沦亡也。

       昔日本之兴也，提倡教育，亦不过数人耳。幸勿谓海外侨居，与祖国全无关系也。有志者更当再希望进一筹，他日于相当地点，续办专门大学，庶乎达到教育完全之目的。世界无难事，唯在毅力与责任耳。夫公益义务，固不待富而后尽，如欲待富而后尽，则一生终无可为之日。况属救亡图存，而可不猛然省悟乎？设输出百余之五，或百余之三，试问何损于富。财既由我辛苦得来，亦由我慷慨输出。公益义务，能输吾财，令子孙贤，何须吾富。同侨君子乎，须知贤而多财则损志，愚多财则益过，儿孙自有儿孙福，勿为儿孙作马牛。古人之言，岂欺我哉。以鄙人久客本坡之观察而言之，华侨中以三数人之力，输出百余万元办一大学，或以个人之力，输出数十万元，办一中学，尚且绰有余裕，况合众人之力而仅办一中学乎？惟在我华侨肯为不肯为耳。现虽筹有五万元，然以之供开办费，并两年维持费斯可也。若更谋伟大之建筑，则必购数英亩之地营宿舍讲堂数十座，容生额数百人或近千人，核其经费者在二十万以上。似此区区，以内外各埠侨胞之踊跃捐输，实不难咄嗟立办。倘误视中学已经成立，便可卸却仔肩，则误矣。至于常年费问题，按每学生除收学金外，每年补垫六七元，若五六百生徒年须垫出校费四万余元，设要筹捐基本金收息抵额，非更捐六七十万元不可。许多巨款，实难办到。然以鄙意计之，果能变通办理，则有恃而无恐。何以言之，敝帮道南学校，此次有月捐，年可二万元。福建会馆之天福宫余利半数，年可得三四千元，除道南年费八千之外，尚可存款万余元待请诸认捐者。按年酌量拨助一半或三份之二，抑或全数，想其乐捐教育费必不限定中小学，而乐于赞襄也。其次则本坡一公众社会产业数十万元，逐年入息万余元，亦可要求按年输助数千元。以公共积贮之财提出公共重要之费，想该会同人热忱公益定当赞成。又次尚有贵粤帮并外埠侨胞，若不作一次捐助巨款，则仿道南学校之办法，按年认捐若干，俾得永远维持，似此众志成城，尚可忧常年费之不足耶。同侨诸君，若不以鄙人之言为过当，请各抒毅力以图之。他日者莘莘学子，进步有期，上足以谋国家之福利，下足以造社会之体祯，是则鄙人所昕夕馨香而祷祝之者也。

**陈嘉庚筹办同安教育**

**原文载新国民日报31.1.1920;2.2.1920-3.2.1920**

       延谦、金练、淑恭、大炮、仪卿、俊秩暨同邑列位先生大鉴：近阅叻诸报悉，诸公热诚公益认捐巨款拟重设南洋公学于我同城之内，弟无任感佩之至，兹就吾同教育状况及将来计划条列如下：

       吾同教育之现象，现小学校全邑只县立一所，集美一所，阳翟、曾营各一所，崇文一所，共五校。崇文、曾营生徒无几，县立腐败均无成绩可言，阳翟已建新校舍并经费大半由弟帮助，及集美两校略有些成绩可言，杯水车薪，正为是言也。前灌口凤山学校，马巷原有之校，炳州、曹蟳、藩涂、板桥、高浦及他约有十余二十多校，迄今停闭迨尽，其中多云经费不充。以弟所知不尽乎，此大半关于校董之初意不善，无注重实际，故聘来教员与同款宗旨，设有好教员亦不肯任此无实际之校，况好教员难觅者乎。推其致败有三，首为董事，次教员，三经济，全邑数十万人而学风如是可悲之甚。

       教育会：弟意诸公如果以桑梓为怀，现下政府切不可靠，贵吾民自奋发为要，立一教育会，然后逐渐扩充推广。凡我教育会补助者，必服从我指挥，听我调度，而我必时常派视学员考察，如此统一调理，庶几有一线之教济希望。倘蒙同意则前日在功诸公倡筹南洋公立学之指款并入教育会，再行推广募捐。缘题目较大，属全邑命脉，劝同邑诸侨胞鼎力加捐，而弟愿首为之倡。则以弟并含弟名义，认捐开办费一万元，常费逐年五千元。教育会暂附于敝校或他处，由诸公指定。

       新加坡董事部：捐款概用同安教育会名目，凡同安辖下之商店人家，必要向捐开办费并年费，收入之项，积存于叻埠生息，待教育会告汇应用若干，然后寄归。教育会逐期当列表报告，其章程乞从叻诸公订示。

       补助费：不分畛域按谱补助，若城镇许从会中开办学校，除收外不敷，概从会理足。若村落社里则用补助法按每班补助或每生补助，由教育会视其成绩酌衷，或贫富为标准，此为不得已之补助。若其社有热心家或殷实家自担得起，不愿会中补助更幸。按应开校费国民级每班年三百元至三百五十元，高等级四百五十元至五百元。每校八十名，约开一千至一千二百元。按补助五百元至六百元，学生每名收四元，即三百二十元，不敷二三百元，令自筹。

       校舍：教育会决不能代建新校舍，且亦乏许多项，唯各就其庙祠修理暂用，此乃必然之势也。若其社能自筹建果属不敷，会中拟补若干，由叻董事部议其可否。

       捐款用途每校修葺开办费约成千元至千余元，设三年内能筹三四万元，不外创办二十余校至三十校，照现下汇水须八万元。至年捐补助费，每校五百元叻银一千元，若三十校年捐须有三万元。

       小学教员：堪膺校长教员论理须有师范毕业生，吾同现下算甚缺乏，故本年难于实行，若来年便可着手。因敝校本年秒可毕业四十名，除学生自敝社需用外，按作三十名，可以分配十外二十校。每校如用教师三人，尚欠之数，可从他县觅聘或中学毕业并旧学者是也。再后逐年敝校师范生毕业尤多，俾得逐渐推广。一年如得增十校，十年可增百校矣。若无教育会为督理机关，则如叻校之涣散，要望成绩优良甚是难事。如办理得法，则吾侨赞助必无限量，此举关系前途匪轻，盖小学如发达，其毕业生则入敝集美师范中学必能特别提携，异日更可选入大学，其关系非细。倘蒙不弃，弟当力负责任以尽天职。

       交项之日期：募捐可从近间实行，并分推各埠鼎力认股。如开办费大都本年秋后方有需用。凡认捐之人，作一次交或作两三次交均可，总订至迟秋末收清。至逐年年捐，或由本年七月交起，则先收半年以作基本。如何之处，乞为良裁并侯。

       公安

弟陈嘉庚谨启

九年一月十号

**陈嘉庚筹办厦门大学演词**

**原文载新国民日报30.11.1920;1.12.1920**

       鄙人之所以尽出家产，以兴学者，其原因有二。（一）尝观欧美各国教育之所以发达，国家之所以富强，非由于政府，乃由于全体人民。中国欲富强，欲教育发达，何独不然。（二）南洋实业，日益发达，其进步之速，实有一日千里之概，而土地又大，未开垦之地颇多，各国人侨居于斯数，首推中国。则中国欲发达实业，南洋实为重要之地。乃反视在南洋之华侨，广帮余不知，不敢言。请言闽帮，余乃抱悲观。每见许多华侨，多不愿回国者，虽有回国者，亦不过拥巨资作安逸之富家翁，专从事于种种奢华。在福建曾见华侨嫁女，乃费至千万之多，实为奢华之极；而对于实业教育各问题，反置之不问。故余谓长此以往，华侨财愈富，具有害于中国尤深，因之乃每欲设法援救之。援救之方法无他，惟有身先作则，创办数事，以警醒之。兹出家财之半，或十分之三四，恐仍不能动其心，故将所有家财尽出之，以办教育，并亲来中国经营，以冀将来事或成功，使其他华侨，有所感动也。至于现在尚在初办，究竟对于前途，为“功”为“罪”不得而知，盖事或成功，则无论矣。假使失败，则定绝其他华侨后来之路，则非但无功之可言，且将有害于祖国。是以对于前途，觉得非常可怕。故惟有谨慎从事，努力前进，以冀成功，以免有害于中国，此则甚望各省教育家之指教也。

       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今就中国而论，据鄙人所知而言，鄙人家住福建同安，同安教育自废科举以来，办学二十年，而今毕业者仅二班，观此岂非愈趋于退化之境。同安如此，即就福建全省论，每年师范毕业生，不过千人，平均计之，每县每年仅得教员三人。查福建人口有三千余万，平均每县有三十四万，则得学龄儿童，至少有十万，每年当有毕业生六千人。今欲以三教员教人，如何能办？故平均计之，福建人之受教育，每百人中不过一二人耳。福建如此，他省当亦如此，则中国尚有强盛之日乎？虽然，鄙人前二月在福建，遇教育厅长，将此番意见为之呈说，乃得答话云：“省之师范学校之毕业生，尚无处安插位置，”岂非奇之又奇？鄙人于未见福建教育厅长之前，以为身为教育厅长，其见解之高，对于教育计划之周，必有高于人者。乃既见之下，实毫无见解之人耳。因此一人，乃误尽福建三千万人民，岂不可哀？其所以致此者，不外“私”与“不认真”二事耳。福建如此矣，除江苏外，其他各省，不知如何？江苏教育，可谓发达矣。然平均而论百人中至多亦不过十数人受教育，即多至百之二三十。若与欧美较，则仍远甚。然如何而救济之，则惟望于各大教育家耳。一国之强，必先受一种之痛苦，此为过渡时代，必须经过。但鄙人对中国前途甚抱乐观，何也？因中华共和国纪念日为十月十日，此四字合成则含有“朝”字。则中国之前途，犹如“朝气”蓬蓬勃勃之现象。我人既生于此时，可不努力前进，以达此落蓬勃勃地位乎？

**华侨中学开学仪式（改组后）之演词**

**原文出南洋商报2.3.1931**

       华中此次改组，因苏维埃共产党想在华中活动，教职员及学生一二人受到共党机关金钱。俗语说：钱能使鬼通神。苏俄有钱便可利用一二不良的教职员及学生为非作歹，捣乱鼓动风潮，多数学生不知，卒被所利用。

       制造学潮及不良学风的罪魁是学生会。学生会的罪状有四：（一）不承认中华民国。国庆时，学生会竟不参加庆祝典礼；（二）谩骂董事，侮辱教员，这可从过去学生会所创办的墙报看见；（三）种种无理的要求。新董事就职尚未数月，学生会的要求竟达七八项之多。所要求的大半事实上无办到之可能；（四）煽动本坡男女各小学校，组织与其性质相同之学生会，以与各校当局为难，有危乎本坡华人之教育。本来华中校风之坏，并非始自新董事接任之日。此次学潮，固有错误，但却不能负完全之责任。

       学生之跋扈无理，及其行为均有违当地之法律。董事本身事前曾加警告，但所谓学生会之领袖，竟视若耳边风，嗣后卒发生不幸之事，良可痛心。

       今后学生应专心念书，抱定宗旨做有益社会的人，切不可再有过去不端之行为。学生会为制造罪恶之机关，学校不能再允许其存在。如学生有谁敢再倡办学生会，既立刻开除。

       学校之经济目下十分困难，来华中做董事并无权利可言。董事多半负着筹集款项，维持校务之责任。学生所交之学费，是不够学校之开支。学校要再为每个学生负担一半。学校负担如此重大，学生如再不努力求学，似乎太对不起一般出资维持学校之侨胞了。

       最后一句话，就是居留政府已声明，不能再容许华中发现第二次共党活动的事。如再发现，那时学校生存将受绝大打击。此话我姑妄言之，诸君亦姑妄听之，信不信由诸位。

**本报开幕之宣言（注一）**

**（实业与教育之关系）**

**原文载南洋商报6.9.1923与7.9.1923**

       鄙人倡办本报时曾有宣言，谓实业与教育，大有互相消长之连带关系，虽略陈梗概，尚有未尽鄙怀者。爰于本报开幕之日，谨将所蓄之意，冒昧陈言，罄而就正于阅报诸君子。尚祈勿吝教，锡以针砭，是岂特本报之幸，抑亦实业与教育前途之大幸也。

       鄙人未研究商学，何敢言商，又非教育家，更何敢言学。惟内观国家过渡时代之艰危，外鉴列强文明事业之焕发，未尝不咨嗟太息，独怀生感，而弗能已于言者也。

       夫文明国之所谓商者，既能经营天产之原料，兴厂制成器物，复益以航业之交通，银行之便利，保险之信用，发行机关之完备，凡诸商业上种种之原理，又莫不洞若观火，而具有世界之眼光，故其物品优良，大促供社会之需要，博国际之欢迎始是以居商战之地位，执其牛耳矣。其经济上势力与精神，尤能辅助国家，以培育无量数之人材，而使其互相利用获益者，盖商战也，而学战已寓中其焉。

       反观我国人之所谓商者，不特对商业上各种原理，茫然不知，即对于商业上各种常识，亦付缺如，而徒拥虚名，听天由命，因人成事，甚至一身命脉，均操纵于外人，而不克自振，此固无可讳言者也。似此资格，何足与言商，何足与言商战，更何足与言商战中之寓夫学战哉。我国商业之不振，推原其故，地非不大也，物非不博也，人非不敏也，资本非不雄且厚也。所独缺乏者，商人不知商业原理与常识耳。

       吾人深知此弊，以为补救之法，莫善于兴学。然我国兴学至今已二十余年，用心不可谓不专，为时不可谓不久矣，而乃环顾国中各校，成绩有何可观。且有感触现状，咎新学之误国，而反加厌恶之者。吁！良可慨矣。

       兴学缺乏成绩之原因，大都因于经济之缺乏。盖经济缺乏，则教材不足，教材不足，则成绩自无可观。当前清改革学制之初，如能从根本上统筹预算，全国教育成绩，定必蔚然可观，又何至今日之幼稚哉。

       何谓根本？科学是也。今日之世界，一科学全盛之世界也。科学之发源，乃在专门大学。有专门大学之设立，则实业教育政治三者人才，乃能辈出。以教育言，有良好之大学，自有良好之中师。有良好之中师，自有良好之小学。譬植树焉，不培根本，枝干何处发达，理势然也。

       当前清改革学制之初，财政尚不困难，即一省设一大学，每省年费数十万，亦属不难。即就国中分区，设立数大学，统计年费不外数百万元，乃当局不此之务，徒斤斤然以选派学生出洋留学为事。殊不知每生留学，年费当在二千元以上。国中自立大学，每人年费不出三百五十元。舍近图远，去少就多，漏巵至今，不知凡几，可胜歎哉。

       时至今日，我国中之所谓大学，除外国教会所办者外，只有北京国立大学，至今垂二十年矣。年费至数十万，生额二千余（注二）。所有科目，几称完备。而各项科学之重要试验物，成立较久尚付缺如，不特学生不能实受科学上之精神，即教师自身，亦多历久而失其固有之学问。盖学问与时俱进，研究无穷，进步亦无限，教师尚且如是，况学生乎？民国以来，时局蜩螗，日滋扰乱，军阀伟人，地盘权利迷其心，更何暇注意兴国之根本。夫当局诸公，既不足与之言兴国，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当急起直追以尽天职，何忍袖手旁观，一任教育前途之涂炭。且兴学即所以兴国，兴国即所以兴家。世之积金钱以遗子孙者，莫非为兴家计，既要兴家则对于兴国之教育不可不加注意焉，爰将厦门大学之预算，胪陈如下：

       厦门大学，现时生额五百人，此生分作三期。设备，每期以五年为度，首期五年，每年添招新生三百，至第五年，在校学生可二千人。经常与设备等费，每年一百万，共五百万元，为苟合计划如下：

（甲）经常费二百零二万元

（乙）建筑费一百五十万元

（丙）科学实验设备费一百四十八万元

       次期五年，每年添招新生五百，至第十年，在校生可四千五百人。经常与设备等费，每年二百万，共一千万元，为苟完计划如下：

（甲）经常费五百一十七万元

（乙）建筑费二百五十万元

（丙）科学实验设备费二百二十三万元

       三期五年，每年添报新生八百，至第十五年，在校生可八千五百人。经常与设备等费，每年四百万，去二千万，为苟善计划如下：

（甲）经常费一千零二十五万元

（乙）建筑费四百万元

（丙）科学实验设备费五百七十五万元

       统计十五年，经常校费一千七百四十四万元，建筑费八百万元，科学实验设备费九百五十六万元。倘或未能达到充分之预算，而欧美各名厂，每有其发明之机器，必尽先捐助以资试验，亦未可料，由此一笔也，为数亦属不赀。再后五年，距今二十年，前后毕业生，可达二万余人，俱属各省优秀份子，合而陶铸诸一炉，其资格程度，较之留学外洋，何多让哉？以二万余人专门大学之毕业生，分配于各省重要机关，如农工商学政议各界，各要职，纵未能充份布满，较之今日人才乏缺何啻天渊之别。且其时民智更开，实业与教育，愈益进步，人民有自治之能力，何军阀伟人之足道哉。以上之统筹预算，为期延至一二十载，为资不过数千万元，以少数人之力，自觉靡易，合多数人之力，亦觉不难。况按期分年，增高继长，进行由于积极，并非一蹴而成也。虽然，树人之难，古有明训，若无多年之筹备，虽一时拥有现金千万，亦难免无欲速不达之虞。今我国人，不求根本之解决，而徒希望实业之发达，教育之进步，与夫政治之改良，其又何时可得耶。纵此而观，教育之必需经济，经济之必赖实业。实业也，教育也，固大有互相消长之连带关系也明矣。我力至微，而望乃至奢，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与其苦心孤诣，一意独行，何如大声疾呼，广招群应。我南洋侨胞乎，我南洋资本家乎，其有关怀我祖国，欲求兴国之根本乎，对于厦门大学之前途，其将作如何之感想乎。

**闽省教育**

**欢迎厦门男女篮球队茶会上致欢迎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14.8.1933**

       前日工厂中职员陈当来君告余，谓贵队诸君泰半为厦大集美两校学生，欲与余会面，余以厂内办事处地方狭小，故约定假座怡和轩俱乐部相会。今日彼此相见，余至引为欣幸。

       余此回南来已十有二年，未克回梓，此为余一生南来最久之期。虽寝食思乡，无时获已。无如时势不顺，心与愿违，致与厦集两校师生，久已无缘一面，未能一表衷曲，然余固念念不忘于厦集两校之师生也。今日幸诸君为球赛南来，辱临相会，谨略表衷怀所积，籍资谈助：（一）关于创办厦集二校之缘由及经过之景况，以备诸君回国后同学中有询及时，资以转白；（二）凡为闽人应注意吾闽教育；（三）诸君均属青年，前程万里，且与厦集颇有关系；对于南洋社会之接触，必有许多感想。余亦不忍缄默无言，顺进所见。上列三者为所欲言之大旨，以大概括言之，不逐条列举焉。

       余之经营商业，不过聊以度日。初非素封之家，惟自来抱社会主义，愿为公众服务，却为一生不移之宗旨。又念社会事业，当随时随力，积渐做去。如欲待富而后行，则无有可为之日。平生尤最服膺美国汽车大王之言曰：“正当之失败，并非耻辱，畏惧之失败，才是耻辱”。

       民国光复后回梓，创办集美小学，始觉吾闽教育之颓废，教师之缺乏。全省师范学校，仅闽漳两所，学生不上三四百名，且毕业后多非服务教育。就同安一县而言，亦仅有师范简易科毕业生三四人，小学校仅有数间，学生不上几百名，而师资已甚形缺乏。同安如是，则闽南各县可想而知。

       余曾于暑天时，往游各乡村，见儿童裸体成群、或游戏、或贴博，询之村人，咸谓私塾久废，学校又无力游办。余思此惜形，如不改善，十数年后，岂不变成蛮野村落者乎？此为余办学之动机也。民国七年，余因欧战机会，入息稍丰，乃创办集美师范学校，附以中学及水产学校等。然兴办后，乃觉更苦，盖中等师资尤为缺乏，故于民国十年再创办厦门大学，此为余办学之经过也。大学欲稍事完备，非千万元巨款不为功。余意待兴办两年后，略有规模，则向南洋富侨劝捐巨款，不料同志乏人，未能如愿；而数年来复遭不景之损失，致经济困苦，至于极点。对于厦集二校，虽能勉强维持，然进步毫无，大负初衷，惭歉之怀，真有不胜为诸君道者。乃于不得已之中，恳求南京政府月补助五千元。自九一八后，发给不及半数。最近虽有省政府补助月款五千元，未知能否照交。至厦门热心家，提倡厦大协进会，其组织宣传，虽甚热烈，迄兹闻仅筹得四千元。杯水车薪，窃叹无裨于事。夫广东中山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年费各百余万或至二百万元，而厦大年费仅卅万元，巧妇难作无米之炊。维持尚苦，安能更言进展。至吾闽本省原属地瘠民贫，既无出产，更无伟大工业，较之广东，不啻天壤。百十年来可以维持者，端赖侨客南洋寄资回国之一条出路。数年来不景影响，现已波及省内。余接省内各店报告及集美校董来函，谓两校新生大减，深恐此后日甚一日，其苦况更不堪言喻。吾国国运危如累卵，存亡未可预卜。然吾民族赖以维系于不堕者，统一之丈化耳。今日一人之文化，则他日可传千人万人之文化。昔波兰为强邻所灭而今日得以复国者，为能保存其民族之文化故也。

       吾闽事事落后，惨不胜言。民国初年在未有闽人治闽之前，则希望闽人治闽之得享大福。迨闽人治闽而后，希望尽违，痛苦尤甚，更思反求外省优秀者之来治。呜呼！是何因由而致于此，莫非教育不振，人才缺乏所以造成者耶。诸君身在宗邦，必能详知底细，而思有以挽救者乎？

       至于体育运动为教育中一重要之科学，虽主旨在训练健康，然对于道德精神，关系更为密切，此皆重体育而忘道德之现象，深可慨叹者也。

       南洋华侨之教育与社会之风气，较之祖国，或优或劣，余未便妄加臆断。若以教育言，则当向祖国优劣如何？盖各教师多由祖国聘来，种子好则根芽亦好。故祖国教育良窳，影响于南洋教者至巨。祖国教育界所负之责任，其重要可知，此尤愿诸君深长思之。以言南洋社会风气，既较十数年前，已大不相同。不但生活程度高奢，而生活程度以外无谓之消耗，尤形加多。如娱乐场所，近年以来，社会上之地位列于何等，诸君想已明白，无待费词。若以学界体育之尊贵及体育人员之高尚言之，无论何国，亦当公认。设或误被利用，或自身用之不得其当，变为营业性质，流与江湖卖艺者为伍，其损失为如何？一入其中，同流合污，黑白难分，影响于队员身心纯洁之修养，关系尤大。例如报纸之鼓吹，观众之热烈，跳舞场之欢迎，娱乐园之招待，或更有意外特别之报酬，以意志未定之青年，受此积渐薰染，结果未有不被虚荣所惑，而走入歧途者。习俗误人，至为可長；须知人心放纵易，收拾难。脱疆之马，难期就范。诸君多在学业青年，甫来南邦，凡所接触已极耳目声色之愉快，回梓后能否影响学业，鄙人尤难免鳃鳃过虑，而愿为诸君一陈，更期诸君之能善于自处也。逆耳之言，是否有当诸君之视听，固未敢必，惟诸君谅之。

**依赖外人出资兴学最为可耻**

**陈嘉庚先生在欢送厦门大学校长**

**林文庆博士回国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7.3.1935**

       本晚为本会馆欢送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博士回国，谨设薄酌并请列位先生光陪，荷诸君宠临，本会馆至为荣幸。本会馆自改组以来六七年，开欢宴会者，连今晚只有两次，首次为前年丁超五先生奉国府命南来，本会馆曾设宴会欢迎，至其他个人或团体非奉公而来者，本会馆则未曾为此以示欢迎或欢送，即如林博士本人前年亦曾南来多次，本会馆对之未尝有何项之表示。独此回林博士专责为厦大募捐而来，事出于公，不但关系全省，而且关系全国，所以本会馆曾开常务委员会议，决定于本晚设宴会欢送，一以表致敬爱之诚，一以显示公私有别也。

**一、捐款之目的未达**

       林博士此回劝捐之目的，报纸经有宣布，毋庸多赘，计所捐的款核国币约三十万元，折新加坡银仅十八万元而已。若依近日之汇水仅存国币二十余万元矣，（款寄本坡银行未曾随收随汇），较之兼办医农相差近半，然林博士本不辞劳苦，拟往爪哇吕宋募足四十余万元，故自前月先函吧城及吕宋闻人征求同意，然后敢往。不料两地均来书谓市景恶劣，缺乏成绩，未便应承，为此之故，林君已定近日回国。

**二、本省无第二间之大学**

       此回募捐仅国币二十余万元，添办医科尚恐不敷，何暇计及兼办农科。念两科若不能实现开办，关系吾闽至为重大，而尤以我闽南为甚，盖本省无第二间之大学，虽闽北有一间教会办者，然其性质恐与本国人所办者不同。且教育事业，若依赖外国人出资来办，无异自家子弟求外人代还教育费，其可耻可羞为何如耶。一九一八年时，本坡尚未有大学校，有美国教会学校校长那呀氏，提倡在本坡创办大学，拟定一百万元可以开办。据言在美国教会中，经应承助款半数，无论本坡能捐若干款，彼可出全力募足之，然最好本坡能捐得五十万元，于是鄙人首先认捐十万元，分作十年交清，已在律师馆与美教主立约，所捐之款系作汉文科基金。嗣后那呀氏更向本坡他方面捐三十多万元，且已一面呈请本坡政府注册，一面买实叻门屋并地数十英亩，价十余万元，以为校舍，后因本坡政府拒绝，事遂不行。而本坡政府乃创办现时武吉智马之大学，由此事观之，可见英人认外人来其属地办大学为可耻，古人云：“知耻近乎勇”，由此勇气之激发，故自开办大学古训昭然，吾人讵可不引以自励。况我闽南半省三十多县，人民千余万人，全靠此厦门大学之造就人才。盖有完备之大学，然后方有好的中学及小学之希望，譬如坡中最需要之自来水，必先建筑一清洁卫生而储蓄充分水量之大水池，然后可以便利大众之需要，了无疑义也。

**三、科学卫生进步与人生寿考**

       医农两科关系吾闽之重要，鄙人前日在吾庐俱乐部经有说过，斯时希望捐款能达到预定之目的。今日结果如斯，殊未能悉惬初望，故鄙人今晚尚不能已于言，希望日后资本家自动乐输巨款，以发抒储材救乡之诚意。前日鄙人所言卫生科学之进步，人类死亡率日减，则寿命当然长享，昔人有言：“人生七十古来稀”，此乃千年前之情形。然此语已为今日欧美科学所打破，此后诸文明国上寿或可至百岁之上，中寿或八九十岁，下寿亦可享六七十岁，而少有五十岁内之夭寿者矣。据外国卫生家调查世界人类之享寿，欧美人平均有五十四五岁，中国人平均卅八九岁，印度人平均二十七八岁。诸君试思凡人出世，经父母艰难辛苦抚养成人，且并受有相当教育，其牺牲如何巨大。至能服务社会，其人当已在廿多岁，加以十年八年之经验，与机会之寻获，至少将近三十余岁至四十岁。如以卫生家统计观之，印度人早已成塚中枯骨，至我华人亦已行将就木，即其不然，所余年限能有几多。夕阳虽好，已近黄昏。而欲效忠国家建功立业，与文明国家竞存于世界，何异缘木求鱼哉，至印度人短寿原因，鄙意不出数项，一早婚（印人多十余岁结婚），二乏卫生，三失相当之教育，四x国之害。今日我国人对上言四项危险；若从兹猛醒，尚未为晚。若但先图利己不为整个民族设想，结果唯有遗害儿孙促其短寿，何福之有耶？

**四、医农招生各学之分配**

       农科急办之需要，鄙人前日吾庐俱乐部已略言开办三年之经费，今晚所言系普及闽南办法之计划，盖若筹有充分之款项，其招生之法，可仿集美初办师范时，减费优待贫家优秀子弟，按县分配人额。譬如首期招生三班百二十名，半耕半读，每县托教育局考取保荐二名至六名。（以大小县规定）如此处置，则他日毕业生可以回乡服务，遍布闽南各县，实践学以致用之旨，或创办该县农林试验场，或指导农物农作之改良，十年之后定有可观，民生问题无难解决。至于医科如筹有充分款项，其招生亦当仿此办法，毕业后方能回去乡梓改革卫生，服务社会。盖招生若不按县支配，则所招必多城镇儿童，或膏梁子弟，拜金主义，充斥脑筋，毕业后，多居繁华市场，谁肯往乡村吃苦耶？

**五、医农两科均可独立**

       医农两科，均可独立创设，免用厦大名义，亦免附设于厦大。譬如医学校可附设于厦门中山医院，或另行独设亦可。在理化科未设之前，首两年学生可在厦大肄业，至第三年然后入医专学校。如现时本坡至完备之医学校，其学生亦有首两年从武吉智马律大学而来者。至于农林学校，鄙人前日经已说过，须择地漳州为适宜，既距离厦门稍远，更免用厦大名义，可以独立一帜，无论个人负担，或众人捐资创办，均可，免附属厦大无妨。至于人才问题在十余年前鄙人创办集美及厦大时，诚较困难，不但校长难聘，就是教师亦感不易，故须多方请托外省物色，以致屡屡易人，若现下已大不同，本省人才已有多少把握，可免如前之困难。至于招生亦比前容易多多，若肯少收学费，选择贫寒优秀子弟，目的亦易达到也。

**六、厦大之成绩**

       报载某君，昨天在吾庐俱乐部演说，谓上海某大学较厦大迟办，而现下学生已千余人之多，厦大仅六七百名，反为落后云云。经林博士解释地方之大小不同，若以鄙人所见，尚有许多异点如下。

       甲、某校名为大学，学生千余名，然中间附设初中与高中，若大学生则不过数百名而已。

       乙、大学中间又当视所办何科，如文法等简单科，免用种种仪器，仅有教科书及讲义已足，不但生数易招，且经费亦省。

       丙、又当分别寄宿生与通学生，如寄宿生，须代备宿舍，膳厅伙食房，沐浴室，以及特派舍监等等，事既麻烦，费尤奇重，一人寄宿生之校舍，须加于通学生数倍，厦大概属寄宿生，教师则住校内，不似上海师生多住校外之简便也。

       丁、厦大学生本省居多，潮梅大埔温州次之，为地方附近之关系。其他十余省之学生，当然以上海广州之大学为便利，盖厦门属偏僻地方，况其繁华远不及上海广州，除非特别缘故外，他省学生定无舍近而就远以来至厦大者。

       戊、厦大初开办时，按招新生三班百二十名，本省按半数，余招外省。迨考试完局，（彼时教部定入大学须开预备班二年故所取程度系现高中一而已）本省学生及格者不足二十名况后来教部取消预备科，须有高中毕业方得人大学，故招生更为困难，若非厦大成立此十余年，各中学提高程度，则每年要招取十余名也非容易。

       当林博士到校时，曾以粗浅英语，试问许多学生，问汝何姓名，不但不能回答，且听不懂，再问汝由何处来，亦不懂。夫大学教授多用英文，乃以科学书籍多由发明国著作，不得不学其名词。（如我国出产之茶，世界亦日茶之类）譬电灯一件，其中各物均有名称，就该玻璃球而言，我国人或云电珠，或云灯球，或云灯胆，若非沿用原来英文，何能一律了解，依部章规定高等小学，便兼读英文，若至旧制中学四年终，则英文可有六号之程度，乃以粗浅文语，竟完全不懂，可见前本省中学之简陋，可悲亦属可怜。自厦大成立后，吾闽各中等学校，既显露其缺点，故无论公立私立中校，大都感觉不能如前之敷衍。有厦大光明之照镜，则其无形中之进步成绩，可云半由厦大成立以后互相激励而来。

       厦大兼设高中之原因，乃以吾闽虽有中学数十校，大都小中居多，虽南洋各中学亦然。要求其办好高中，至为难事，因生少费多，势必因陋就简，故厦大不得不负责创办，乃能集中多量学生，庶可为大学造就基础，否则何能升入大学也。至厦大收生严格，亦与上海不同。就鄙人所知而言，本坡华中前年有两学生，一为某君之子，在华中二年级，虽经某君介绍到厦大，经教师考试，只可在高中作旁听生，待程度及格，然后升入，可见厦大不为情面而破格超升，两俱不便。其他一生文凭，原系一年级，到上海人某大学，私将一字改为三字，变为三年级，亦经该大学试验收纳。该生乃来函告知华中某君，请求遇该大学函询时，须照三年级答覆云，可见其他等处招生之随便，或规定程度之浅低，而厦大则不然也。去年春间，南京政府鉴于国中技术人才之缺乏，欲鼓励各私立大学校，扩充设备等，于是教育部专派调查员，向全国各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考察成绩，分别补助款项，迨调查结果，计有卅二校，教育部规定每年助款七十二万元，除留五万元外，余六十七万元分别补助。厦大得最多数为每年九万元，可见厦大对技术科之成绩也。

**七、厦大财政之独立**

       厦大自民国廿年，财政已自独立，并组织财政处自与银行直接来往。鄙人规定补助款，则逐月依数备交而已。当前年建筑设备时，有年开至四五十万元者，迨后逐年减少。凡每学期预算费，须经校务会议，及鄙人赞成，方能决算开支逐月列表报告关系人，鄙人亦得一份。然末向社会捐款之前，不但无机缘可宣布，且亦被人笑我器小而自炫也。

**八、厦大前未多举董事之原因**

       普通学校，无论规模大小，多先组织董事部，董事有多至二三十人者。以厦大之规模，而董事仅有三人，此问题社会上多有不解者，今日鄙人谨表明原因有二。

       （甲）不拘各界，若有忠诚维护或赞助厦大之人，厦大甚愿推举为董事；

      （乙）如经费是向社会捐募，当然要推举多数董事组织董事部，如此回之募捐是也，为以上原因，故前时未便多举，而与普通学校一样，且厦门政局屡有变动，得彼失此，尤当审慎。至资本家方面，畏厦大如蛇蝎，谁敢参加，其他挂空名无裨事实，更非厦大所宜。最当注意者，恐董事中受人嘱托，屡介绍教员或学生，职员及其他等等。若不接受，则恐发生恶感，如接受，则最高学府机关，权限不明，贻误非轻。自厦大开办迄今十余年，鄙人未曾介绍一位教职员，或保荐一位学生。此回自林君到叻时，鄙人即与林君商定，现将正式募措，则董事部须扩充多人，先就本坡拟定陈延谦李俊承二君，（并即举他签押银行支款）其他待捐务结束时，并行推举。此种大意，且已十天以前由鄙人函知吉隆坡关系人洪进聪君矣。

       现名誉董事已举定六名。新董事已举定九名，连旧董事林文庆君及鄙人一共十一名（名誉董事及新董事名单待后日发表）。

       待林君回校后，当备正式明文，请各先生费神参加。将来厦门如开董事会，在洋各位可指派代表。至进支款项，逐月厦大当然分送各董事。倘有个人要独出巨资，指办何科，譬如医科，或他科，抑建筑何校舍，可直接与厦大磋商条件，要经董事会可，免经董事会亦可，厦大当然欢迎，必须达到捐款人之目的使其满意也。

**九、国民对教育应负之义务不可专责之政府**

       前日鄙人所预算，办医农两科二十四万元，现捐款竟不能达到，况所预算之规模，亦属小数。窃吾人每开口便推责政府，不肯全担负担之不是，其大意似乎教育事业，不关国民义务。吾人正因为此错误观念，所以未能慷慨多输，有之亦勉作情面而已，不知政府自身何能生利，所倚靠者全属国民之财源。今日吾闽政府财政困难，入不敷出，若格外抽捐，更非所宜，故爱莫能助，至国民应负私立学校经费之义务，乃民族之天职，世界除苏俄共产化外，其他列强，凡教育或慈善诸费，大半出之国民私财。事实甚显然也。

**十、希望此后自动义捐**

       林君既不日回国，则对于募捐之事，已作一段落矣。林君亦非一年半载就再南来，不但无成绩，恐反为人讨厌。无如是，则医农乏财力可办，对于救乡根本之办法，未能进行，至为可痛，然鄙人尚有三项希望。

       （甲）本省不久成一新福建，百政维新，政治略就轨道，匪祸消灭，则吾侨内向信仰，而赞助厦大必较形慷慨；           （乙）资本家凡有数十万，或百余万元者，敏悟救国之义举，其收功在于大学教育，捐出十分之一二。则目的不患不达；

       （丙）吾侨在南洋营业进步，入利较丰，则捐出之款，亦必较易也。以上三项俱为赞助厦大之乐观，而冀医农等科，可以实现，勿作消极之悲观。吾侨多与种植树胶有关系，鄙人请举一譬喻，照旧式普通胶园，每英亩至多每年产胶五百磅。自科学驳枝胶树发明后，每英亩每年产胶可至一千五百磅。今日鄙人已失力，希望侨胞继续兴起，亦如天然树胶须用科学驳枝更可大加发展也。

**为筹备建立南洋师范学校（注一）**

**致各帮侨领函**

**原文载南洋商报31.3.1941**

       迳启者，庚此次回国，考察抗战情况，教育事业亦在注视之中，闽粤二省华侨最多，尤所萦系。据中央教育部颁布命令，由民二十九年起，五年内全国普及教育，每保一百户，须设一国民学校，每三保须设一中心小学（即高小学校），依此推算，对于师资问题，定须先期积极准备。庚所历各省，虽无精确调查，但都在推进之中，则尚可信，唯闽省对师范学校，不但不扩充，且将前时私立学校，概行禁止，致弄出现下教员荒之气象，更遑论前途之普及。广东省当局，虽在积极进行，然因沦陷区多，无法充分兼顾，实势使然。总之，闽粤二省，在省内所办师范学校，不足供给本省之需要，既如上述，而南洋方面，我侨胞人口，不亚于国内一省，侨务委员会既未筹备及此，将来需用教师之多，势必复向闽粤内觅聘，物稀则贵，非仅教育经费须额外激增，且尚恐有顾此失彼之虞。

       庚自考察后，曾派代表请教部，速在闽粤创设华侨师范学校，又向国民参政会提案，请政府施行，虽蒙接纳通过，惟官场办事，向来迁缓，且往往不尽如人意。如云南保山之华侨中学，为教部直辖，学生四百余人，庚由滇缅路经该处南归，有许多侨生前来报告，开课三个月，上课只有一个月，且有非用国语教授者，该生等失望之极，欲归不得，哀悔难言。庚所提议，虽参政会通过在案，但能否成为事实，尚不敢知，纵教部果决采行，然校址之适当与否，以及规模之大小，精神与设备，人事及管理等问题，是否不至如保山之使人失望，亦尚不敢知；因此，庚乃倡议在南洋另办一师范学校，假使国内能积极进行，办理妥善，规模相当可观，学生各省以千数，将来足以敷足海外侨胞之需要者。而南洋所办之师范学校，成立以后，他日毕业生亦足供应本地时，则国内毕业生，当可免尽数出洋，留供省内之需，是则更为幸事矣。况国立师校，以过去情形言之，亦难望如许发展，近年中央为提高党权，凡学校校长、教务、训育各员，概须以党员充任，无如全国有党籍者，百未有一，人才不敷分配，势必降格任用，苟如用非其人，则成效更难期矣，南洋师范学校，不得不积极实行赶办，此诚最大缘由也。

       师范学校乃专门教育，教员要聘有相当学识与经验，学科要分门训练，图书仪器化学要充分设备，学生要招收贫寒而有才之子弟，应加以优待，由此种种，故其规模必大，经费必巨，而筹款必多，方足以措置裕如。

       国内对教育方面，既多使人失望，海外侨胞关怀教育，当然不忍坐视，凡可设法补救者，应当披发缨冠以赴之，故在新加坡创立大规模完备之专门师范学校一事，似不容缓举矣。

       南洋侨胞一千一百万人，每年须用教师当数千人，国内教师既如是枯竭，海外学校，尤正在蓬勃滋长，若不及早设法，一旦急用，必无所措。抗战以来，文化界出洋众多，故一时有供过于求之象，近年教师被政府注消名籍者二百余人，各机关需用知识分子，又多从教界觅聘而去，由是已感教师难觅，反成供不应求矣。

       南洋师范学校创办后，毕业生虽未能回国服务，然可免如前之向国内争聘，况侨生受祖国文化，比较国内尤为关要，在国内之国民，虽终身不学，到老还是中国人，若侨生失学，则难免外化，且并其父兄遗弃，亦同遭损失；现在本坡侨胞，最殷富者当有数十人，在南洋教师之恐慌，若不负责领导，见义勇为，将来南侨文化，必缺乏领导之人物。若能慷慨牺牲，作大规模之计划，则侨胞青年，多受薰陶，家乡政治，亦必并知关切。以我侨胞众多，资财宏厚，平时对抗战后方，已多助力，然对抗战输财外，其第二重要莫过于培养后生，灌输祖国文化。南洋吾侨教师，在学科上素称最缺乏者，即为“数理化文史地及英文”各种，马来亚英文八九号位失业待职之侨生虽多，然国语不晓，教法不知，故不合格。现下拟办之师范学校，当将上言各类，更加注意，以应各校之需。而办学首要者为校舍，在此战争期间，物料昂贵，建筑非易，当地政府，对卫生甚形关切，故欲觅一适当大规模校舍，可容学生千名，更非易事。恰有李君光前，在金炎律置一巨屋，初时置本五万余元，今愿捐为校舍，再增捐大银五万元，作修理及开办等费，合计认捐一十万元有奇，经召匠赶修，按本夏季可以竣工，秋初便可开课矣。

       师范学校，在国内优待学生向例，学、膳、宿、书籍、制服均由校中供给，盖所收概属贫生，俾毕业可达其担任教师之目的。在南洋对于优待事，庚按学、宿、书籍由校供给，伙食、制服学生自备。每班校费全年按叻币三千元，首期按招十五班，全年须费四万五千元，此十五班学额，共六百名；马来亚拟招三百五十名，荷属按一百五十名，缅甸婆罗洲合按一百名，不分省界，但规定贫寒子弟有才乏升学能力者为合格，且须该埠社团负责证明，至分地考试各手续，可赶于本年六月内办竣，俾便预聘教师，筹备一切也。

       上言拟办此“南洋华侨师范学校”，本拟待南侨总会开会时提作议案，乃有昧良之流，本人既不出席，且向当地政府企图破坏，其意谓南侨大会只限筹赈而已，本坡当局，已接受其要求，虽未正式表示，顾庚则以为此校之成否，本坡数十位资力宏厚之侨胞，自可解决，然后推进全坡及全南洋各属，不分省界，共襄盛举，当一样可以成功。

近者，庚经向福帮多位热心家接洽，多承同意，且认捐巨款，兹特致函各帮殷实领袖，请求鼎力赞助，以抵于成。

       先生热心教育，夙所钦慕，倘蒙慨诺，然后再逐渐推行各属。务祈集中全侨力量，共成盛举，谨此奉闻，佇盼明教，顺颂德祺。陈嘉庚谨启，三月二十八日。

**注一：**南洋师范学校开办于一九四一年，而在一九四七年改为南侨女子中学。

**文化与国家关系**

**星福建会馆举行改组四周年纪念会上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17.3.1933**

       此日为本会馆改组后第四周年纪念，并为选举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之日。（按下月三届执盟委员即为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产生）余（陈君自称）忝任连续两届主席之职，在任职期间，对于会务之进行，诸多与希望未克实现，故成绩毫无，内疚殊深。甚希望下届被选新职员，同心共济，以图将来之发展；更希望能实事求是，凡事不可拘诸形色，应注重于实际工作，以实现本会同人之夙愿，对祖国则应如何补助国家，维护教育。对当地之工作，应谋闽侨之福利，赞助华侨教育之普及，联络侨团之团结力量，努力倡除华人不良之习俗等。

       吾侪心理，谁不具有上述种种之希望，但本会改组后，瞬经四载，许多事件，多落于空言无补之憾，仅有维持三校之一事，稍可留为纪念者，从前本会之计划，对于本坡闽侨各校，均设法津贴。以期普及，无奈因不景气之巨潮，影响及本会经济，致津贴闽侨九校半途停止，而一切经已按序促进之计划，亦告中辍，至今尚未能恢复，以偿夙愿。

       至于道南爱同崇福三校，年需费二万元，如果非适为本会改组之重新整理，恐三校遭际此时不景气，或者早告停办，否则必出诸敷衍了事，焉得有努力日谋扩展之机；对此点更觉三校之维持，更非容易之事也，而南岛之不景气，日趋严重，故希望将来新职员诸君，更应齐心协力，最低限度，对于三校之前途，应继续进展，不可因经济困难问题，驯至中途搁浅，或因陋就简焉。

       因本日言念及三校问题，顿觉我国教育现状，发生无限感慨。忆自逊清废除科举制度，迄今三十余年，我国教育，居城市者，当然比较进步，然于乡村之内，反成退化。此种原因，在事实之所指示吾们者，盖从前不论乡僻小村，亦遍设书塾，儿童就学，每年仅须数元，便可了向学之愿。而现在则不然，因学校之经营浩繁，于乡村之地，甚少设立学校；而城市之学校，欲求学每年非数十元不够，致平民界因限于经济问题，失学儿童，遍地皆是，顽劣万状，令人不胜感慨系之。且城市之间，许多学校，其经济之来源，或由地方之税项，或为教会所设立，或由华侨汇款之补助，方克维持者，甚少有基金之学校，得以独立无虑者。城市之教育，尚且如此，乡村教育之现状，可得以推见矣。是故吾人，对于我国文化前途，应加注意，吾在事实上曾告诉吾人，如俄灭波兰，并亡其文字。当时波兰之人民，虽于强俄压迫之下，民间对于波国固有之文化，不忍放弃，多冒险私授波文，午夜深更，尚且父母教其子女，兄长教其弟妹，孜孜不倦。今波兰之复国，多有归功于其文化保存之力者，可见国虽亡，而固有文化尚未灭亡，终以文化之力量，而得恢复其祖国也。就以我中华民族而论，考诸历史，我汉族亡于元清之手，两度之恢复，亦全赖于文化之重力，故我人如果试一默思，教育于国家之关系，岂浅鲜哉？

       我国际此危如累卵，虽连日来报章之宣传，长城战事，迭告胜利，但胜利云何者？我国土地，失而未复。且当今之世，战争侧重科学化，敌寇以犀利之枪械飞机大炮，坦克车等军用品，其炸力之雄无力复加，如果徒以血肉之躯、与敌拼命，恐终归于失败耳。故欲抵抗强寇，必万众一心，于物质之外更求救国保种之道，各尽其能，方有济也。然侵略者得以灭人国家，占人土地，终不能灭人之固有文化。世界任其如何变动，我国固有之文化精神，万不能残缺，此理甚明也。故吾侨之责任，对国家之义务，应如何补助，对教育之维护，应如何尽其力量，我国前途，方有一线希望也。

       且中日问题，前途险状殊多。如日前李顿爵士在巴黎和平社之演说，称“将来中国是在‘如何’‘何时’及‘由何人’等问题，以求领导使此优良民族，可以团结其国民之力量，其惟一之问题，则为莫斯科，或‘日内瓦’。目前中国选择日内瓦，但如日本仍坚持其目前之政策，而日内瓦调解失败，其选择无疑的，将反覆”。

       如照李顿氏之见解，日本如果仍抱侵略野心，国联无法调解，则中国无疑的向“莫斯科”云。

       最近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氏，抵香港时，向香港大学学生之演说词，曾谓“将来经过二十年之后，世界变共产化”，又谓“在二十年后之人类，如果由二十岁起，至五十岁之中，不能作革命事业，可谓无用之人，但若其为四十许之人，尚能实行革命，仍不能以无用视之”。盖萧之言论，乃有感于国际现状，及将来之见解耳。然总而言之，将来世界如何动，祖国当局，无论走那条路，亦须保留我国文化，乃能维持民族精神，盖今日一人能保存文化，即他日千万人之文化，赖以保存，而传播于无穷也。故际此千钧一发之时机，我辈对固有文化，岂可不思保存，对教育前途，岂可不思维护乎。

**复兴民族与服制**

**原文载南洋商报14.1.1937**

       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民族复兴问题”征文，计有“复兴民族的基本方策”，“今日之民族问题”，“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民族复兴与法律”，“复兴民族与服制”等五篇。著作者，顺序排列为冯玉祥、孙科，李宗仁，居正，与新加坡大实业家，中国大慈善家，厦门大学创办人，集美学校校主陈嘉庚先生，兹将陈先生著作介绍于读者。

       衣服盖以蔽体彰身也，而式制所存，则一国之文野系焉，见其人，审其衣服，而其国政俗教化之高下，固已昭然若揭，无待足践目击而后知。红种人之衣服，不同于黑种人之衣服，黑种人之衣服，不同于棕种人之衣服；棕种人之衣服不同于黄种人衣服；黄种人之衣服不同于白种人之衣服。代与代异，国与国别，此其间若梯之有阶，声之有度，上下高低，了不可混；而文化之水准，亦于是乎取征，故谓衣服为文化最显着之代表物，无不可也。

       吾国开化最早，黄帝时已备衣裳之制，舜观古人之象，绘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于衣，绣宗彜藻火粉米黼黻于裳，“以法乾坤，以昭象物。”其设思之妙，取式之巧，有非后人所能及者。后有所谓“深衣”之服。其式则“衣裳相连，被体深邃。”其用则“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其法则“……应规矩，绳权衡，短毋元肤，长毋被土，续袵钩边，要缝半下，格之高下可以运肘，袂之长短反誳之及肘，……制十有二品，以应十有二日，袂圜以应规，袖裕如矩以应方，负蝇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蝇抱方者，以直其正方其义也……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槟相，可以治军旅……”一见马氏文献通考一一此种“深衣”，裁作简便，动合礼法，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可服之，可谓服制上一大进步。而后世苟有服之者，非以诡异贻讥，则以儒缓见晒，良可慨也。降及秦汉，品秩之界愈严，阶级之分愈著，衣服之制遂亦因之而愈杂，崇名黜实，去朴趋奢，五光十色，不可究诘，其于先圣俭约之旨，盖渐失而渐远矣，然最繁缛无谓者，莫如清。

       清之时，皇帝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端罩，衮服，朝服、龙袍，常服褂、常服袍、朝珠、朝带；又有雨冠、雨衣、雨裳、皇子之服，约如其父，而稍异其式，亲王，世子，郡王，贝勒，贝子，亦各有其朝冠，有其吉服冠，有其端罩，有其补服，有其蟒袍，有其朝珠，朝带，下至公、侯、伯、子、男，一品官至九品官，亦各有其所谓冠、所谓服、所谓褂、袍、所谓珠带。他如祭祀舞生，祭祀执事人，乐部乐生，卤簿舆士，以至军、民、吏、员、奴仆、优伶、皂隶等，亦莫不视其尊卑而各有其服。女性自后妃以下，其冠若袍、若裙、若帨若祺、若约、若珠饰之属，亦各各有别。此其为制，举名指已不胜屈，状貌则曰罄且不能尽。而在衣袖，取形马蹄，曰马蹄袖。褂也，亦竟马之，缎以长辫，摇曳若尾巴，遂真如犬如马，与禽兽无择。呜呼！斯诚匪夷所思之怪制，而极古今天下之奇观也。

       中山先生倡革命，覆满清。其于清时遗制，革除惟恐不尽。衣服一端，亦深切注意，不肯苟且；故一生罕着长衣马褂，自馀革命同志，光复后亦多主废清服，重新规定。然国人每易安于现状，忸于旧习，长衣马褂，犹是人时之装，驯至今日，建国二十许年，复以此物为民国礼服。虽曰割尾去蹄，稍减丑态；而与傀儡伪满，空无锱黍之差。嘻嘻！清服可存，清旗何独不可用？观瞻之所在，则心理之所系，精神之所趋，庸可忽也？

       故吾人以为欲谋民族之复兴，一切改革必须力求其彻底。大而一国之政体，小而一身之衣服，举凡悖理之法，失时之制，皆宣以大刀阔斧，斫伐而铲剪之，务使全部皆呈新气象；然后“复兴”二字，始有足言。长衣马褂，定为礼服，虽若小节细事，而影响则甚巨。窃期期以为不可也。

       或曰：长衣马褂，美观便利，不可废。此狂言也！以云穿着，则重钮叠扣，形同作茧；掣肘裹足，状类拥被；身失自由，主为宾夺，束缚已甚，安见便利？以云体式，则如枇襄。如布袋，褂开前而惟恐其不短，衣开侧而惟恐其不长；支离错综，缠夹臃肿，拙陋已甚，安见美观？抑美观云者，固因时因地而异，原无一定之标准。野蛮人之所谓美，文明人不必以为美；古代人之所谓美，今代人亦不必以为美。特风会所趋，相仿相效，得其宜者迎于众，于是群从而美之，失其宜者弃于众，于是群从而恶之。民国初年，觉悟之士知尾巴不可有，马蹄不可留，争为割尾去蹄之事，一班遗老遗少，犹以是物甚美，爱护备至，如宝家珍，今则何如者，昔日士子，好养长指甲藏垢纳污，不以为丑，而以为美，今则如何者。是故习随时移，欲随境变，移爱无已，进步亦无已，吾能因时制宜，重定新服，尚何美丑之足虑。

       或曰，废长衣马褂，于国货有损，此说太糊涂滑稽。兹所谓国货，当指丝绸布类而言，然长衣马褂，服之式也，丝绸布类，服之料也。废长衣马褂，是所废在服之式，初与服之料无涉。置料于此，吾欲方则方之，吾欲圆则圆之，吾欲西装则西装之，吾欲汉装则汉装，料以成式，式固不能移料，理至浅显，无待费词。果政府能安定相当制服，宜于富，亦宜于贫，宜于丝绸，亦宜于棉织品，要以不失俭约之旨为依归，以不失国布之用为原则，则说者之忧疑，当可焕然冰释矣。

       或曰，衣服乃仪礼之所托，不可轻改，所谓礼不忘其本也，此其说足以欺庸众，不足以欺通人。夫一切仪礼制度，悉人为之，便于古不必便于今，利于一时，不必利于百世，当其利见而弊隐，则此仪礼制度可以存，当其利失而弊著，则此仪礼制度可以废，人为之而人废之，凡所以求利于人，有何不可？君主时代，三跪九叩头，礼之大者，居今而行之，非狂则妄，是亦忘其本也乎。君主时代，国为君有，制之大者，今则国为民有，无所谓君，是亦忘其本也乎。且如长衣马褂，乃清服遗制，非吾先代所固有，今说者遽尊之为本，是真忘本之尤者矣。

       此岁以来，政府公务员、学校教师、学生，皆同受严格军事训练；平民壮丁队亦严行组织，不遗余力。良以复兴民族，必植基于全国武装之精神，惟有全国武装，全民军化，然后人人能国尔忘家，公尔忘私，然后人人能爱国族，能知责任。今公务员若教师，学生，既须并受军训，军训服装，自非长衣马褂。如曰：长衣马褂乃用于军训时间以外，则军官于非操练时间可服，士兵又何独不可仿效？学校教师于非军训时间可服，学生又何独不可仿效？必曰军官可，士兵不可；教师可，学生不可；则是蔑视平等，妄生阶级，揆之情理，岂能安者？

       夫吾国以文弱之风，而贻“病夫”之诮，服制失宜，抑亦要因，今发奋我雄武，兴我民族，洗从前“病夫”之辱，启后来强盛之机；则于服制问题，可不再三致意？愚失学，不能文，东方杂志社来函征稿“民族复兴”，忘其无似，草此塞责，引玉抛砖，斯区区之微意耳。

**陈嘉庚抗议闽种烟苗之演词（注一）**

**原文载新国民日报30.10.1922-31.10.1922**

       前之禁种，全持民气，而现在人心，以为权利在军阀之手，无可奈何，种禁由之。民八五月，弟回国时，几乎将绝，后何以发生，亦国民八之间，地方方乱，民思种之，强者行之在先，各乡随之而起，于是乎烟苗遍地皆是矣，而地方官不但不禁，反从旁而赞助之，得以中掬饷，每斗种八元十元十二元不等。同安一县，光明收入的，每年九十万元，浙军分得一份，北军一份，绅士亦一份；尚有暗的六十万元，为乡绅等等与送与李贼厚基者，此一县已至一百五十万元，不可谓不巨矣。而军阀更预算民九，应掬光的一百五十万，暗的一百万元。此区区同安一县，负担至二百五十万元。广东为富裕之省，尚知禁赌，此县何能担二百五十万之烟饷乎？弟觀此情形，为国家民种计，起而假座青年会开会，到者百余人，宣布烟苗宜禁之种种理由，众赞成者通过，举弟为正会长，林文庆君为副会长，及四干事员，越日往见道尹陈培崑，他云今年如不能禁，后来必达目的而后已。再见臧致平（注二）臧云我乃外省人来此，不能益地方，应当竭力赞成禁种烟苗。时已八月，正下种时，急则治其标，赶印十余万张禁烟宜言，颁发各乡，乡人多怀观望，不敢即种。急再开会，举弟与黄廷元君为代表，往福州。在北京有拒土总会故福州有拒土分会，正会长英领事，副会长美领事，弟等到该会，甚荷欢迎。派代表同往见李厚基，李甚为招呼，满口应承，云一切手续如备，即当令各县实行禁种。代表云，现下种时，宜速致电各县，李亦允诺，开筵请代表，不赴且强之。余等回厦，全无消息，再待十余日亦然。往问陈培崑云寄有些少告示，再七日始见城门头有禁种告示标出而已。再过两星期，亦是如此。后询武官，云如无上司命令，吾人何敢禁种。虽然民九此年，为受十余万传单之力，始不敢种，后虽再种，已减少一大部分。弟意谓地方官及臧致平李厚基的许禁种，不顾如何，驰电北京、福州、南洋各处要人社团，布告形色上之禁种，实际上仍进行，于是乎内外攻击起，故军阀预算民九同安一县，烟税二百五十万元，经此反对，而失效力，大概收入不及一半。

       在太平洋会议中，口口政府代表，提出议案，云当派员到中国监督禁烟，顾维钧耻之，声言担保今年禁绝，故北京派王大贞到闽查察，王南下之时，便谣言四起，云带随员八人，各皆费几千元买来的，于是闽人打电与他，云不可如尔兄之行为，若然，当打尔死。故王声名之坏，皆从其兄从前之劣跡而来。而王大贞到闽之后，就不敢作乱。斯时烟苗已长，实行铲除，乡民不遵命令的，且被拿禁不少。今日之事，弟虽与洪晓春为友，亦不能为之盖其愆。洪为厦门总商会会长，先前却为好人，后更与贼为伙。同安绅士，向北军包马巷烟饷一十二万元。在马巷绅士，谓如一斗种八元，可掬三十万元，尔等许纳北军一十二万元，我可自掬。于是同安绅士，计谋不成，含怨在心，唆使浙军干涉。云北军得一二十万，浙军亦当得六万元。马巷绅士，处于淫威之下，不得不许。他又向北军云马巷又掬至三十万元，北军又来干涉，后不论团长、旅长、营长皆要，所掬约二十七八万元，难应军人之需要。故不得已，洪晓春被迫走香港，复回厦，将自己之款私填二万余元，方能了事。

       但此款却可向马巷收回，然一时实难收入。后军款掬马巷烟税，马绅不敢接洽，北军不得不找旧路，寻洪晓春，许洪前填二万余元，以扣还。洪允再行担任，该年马巷掬至七十余万元，但洪却是好人为财变恶。今又为李侵蚀福建银行七十余万元事，期将死的烟苗复活抽税作抵。现商会会长如此行为，吾人岂无军阀与绅士何。况乡民不敢自种，商会更为之提倡。至种烟之害，何乡能了。我乡应担五千外元，找寻二三家长，而各私其私，至今账目不能结，乡乡如是，乱如纷丝。而兵头则与兵约，我令出则行。待烟税收后，每日辛饷当发二十元，后自食其言，只发四元而已。民九年贼厚基一人之私入便百万元。至若间接受其烟害，米粮每担八元，猪肉每斤五角，种种之害，君等皆知，毋庸多说。或云烟利极大，可裕生计，但此指无吸之家，若半吸半售，自害亦多。且余烟并非卖之外国，所卖者自家人耳。弟记了，今不愿放弃天职，况现在事事重民气，不重武力。满洲之倒，李厚基之走，皆民气之力也。内地受武力压制不敢言，在海外岂不能享此权乎？故请闽侨到此，大胆用弟之名传单，皆事急迫不及待。因加种一亩，则受一亩之害，诸君如何打算，请讨论。

**新加坡福建会馆筹办闽南水灾游艺会开幕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9.9.1935**

       闽南此次大水，灾情至为惨重，我人因此进行筹赈，筹赈之法，率有三途：一为自由捐题，二为出发劝募，三为举行游艺会。三项以第一项最为方便，盖可不费手脚也。第二项则须十人八人，出发劝捐。第三项较第二项尤为不同，第三项每须数百人至千余人参加工作，且须筹备。惟举行游艺会筹备，实亦罕有。论成绩，我们当视市情之如何以为断，我人固不可以劳动大众而获蝇头为可怪也。

       前次天津水灾，本坡举行游艺会从事筹赈，其时游艺收人多至七万，捐题十余万，其得款二十万。此次捐题至今，仅得二万余。市情不同，成绩亦异。事实如是，夫复何言。此次闽灾，最惨痛者首推安溪。此次闽南，被难者十万人，住屋夷为平地者千家，流离失所者六七千人，死亡实数，尤不可知。我人试思，大水以后，灾区难民，生活无着，设不加以救济，弱者当成饿殍，强者必为盗贼。大凡救灾，一推政府，二为富庶之区，今闽南则多一华侨。现时中央政府，国库空虚，自顾不暇，何况华中灾情亦重，安有舍彼救此之理。至省政府，此次福建省府，对闽南水灾仅出万元，其经济之如何，于此可见。至于富庶之区，首推厦门，厦门亦当视华侨积蓄之如何以为断。厦门华侨纵有积蓄，如其不与赈助，亦属无法。风闻厦门至今仅捐一万数千元，将来至多亦不过一二万元。各区灾民生活费每人每月至少亦须三四元，则此二三万元，安得有济，故所望者华侨而已。南洋商情虽则冷淡，惟数十万赈款，似尚不难罗致。且南洋多金之士，为数甚多，如私人乐出为善，则一人之财力，以足甦无数之涸鲋。惟私人不肯出钱，我人亦不必引以为怪。我人应自动赈救，力量较大者多出，较小者少出，则救灾之目的亦可以达。

       现时安南、吕宋、爪哇各地，读报告捐题十万八万已有可能，其他为本坡。本坡至今亦只捐得一二万元，希望此二日游艺会之举行，将来可弄得二三万元亦不可料。至于怡保、吉隆坡、槟城，将来或者亦可捐得四五万元，统计南洋至多不及二十万元。惟亦只得如此做法，一元可活一命，数之亦可救得数命，希望各位一致努力。

**陈嘉庚倡建闽南十年计划（注一）**

**原文载南洋商报30.4.1937**

       启者我今日修此函与诸君，有效时，关系闽南何等幸福，则此函自有许多价值。失效时，则为废纸，不但无价值，且或笑我为多事，而慷他人之慨也。先哲云一言为智，一言为不智。我今日不计乎是，盖吾侪生逢国体改革之时代，国家至危急之秋，救亡图存，匹夫有责。以吾闽之贫穷，远过邻省，所有富人属之南侨，以马来亚言，而尤以在诸君身上为最。我知而不言，则责在我，言而能否有效，操在诸君，谨列陈于下：

       一、厦大集美为我创办，无论为公为私，虽尽人都知，然名义上不免有多少连带。兹此函所言则与厦集二校无关，虽然亦须先白二校，此后状况。厦大现有月费二万元，足资维持，免至停顿关门，而此次所谋置胶园七百英亩为基金，如能成为事实，尚欠十左万元，无难募捐应付。是此后厦大每年可增经费国币十左万元，自有相当之进展。至于集美学校，现月费一万零五百元，若每月再加数十元，便可恢复旧观，利益贫生不少，此条我度以后，能力可以负担，准此计划。故谓今日，此函绝对不关厦集二校之事也。

       二、我性迟钝又失学，民国未光复之前，尚不明爱国真理，迨光复后猛省勃发，刻刻不去于怀。窃念份子天职，欲实行报效工作，尤以乡梓需要为急务，故不计成败，痛下决心，实事求是，以文化为基础，热忱勇往，有进尺无退寸，抱定破釜沉舟之志也。盖深信国体改革，纷乱政争，乃必经之程序，至多二三十年，自有光明安泰之来临。若不乘时即下种子，以备十多年后之收获，未免临渴掘井。近者全国统一，政治已就轨道，前途乐观，为世界所公认，国家兴隆计日可待。现我闽中人才文化，服务各界，多有厦集二校出身者，其他影响可以免论。由此而言，是我之目的已达，所有个人牺牲与失败，或亦气势之使然。古语云：善作者不能善成，善始者不能善终。明乎此，安有丝毫悔念耶。惟当年有议我者，非笑我孟浪，则讥我轻财然，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三、南侨可以巨资报效祖国，以我鄙见，当具有五项资格：

       （一）身为国产来自桑梓者；

       （二）晓识中文略知民族历史者；

       （三）国家兴亡时存注意者；

       （四）在社会上不愿失声誉者；

       （五）富有财产数十万至百万以上者。

       若无完备有此五项，而欲与言牺牲，则无异与虎谋皮，或对牛之弹琴。所以南侨富人虽多，而乏可告之人，良由是也，先生等资格完备，故我今日不得不进言忠告。圣人云：四十五十而无闻，则乏可为之日矣。盖及身不为，留待后辈，或儿女众多，不但乏此资格，而此间乐不思蜀，先侨许多富翁，其后嗣对祖国如何，可以车鉴。至为损为益可以免计。总言之，身由梓里而来，一生千辛万苦，手中得来金钱，不能分一部分以救家乡，困穷族类，留作子孙乡梓之纪念，而必多多益善，稽交后嗣，我敢武断曰，已与祖宗脱离关系矣。

       四、吾闽贫困尽人都知，少壮者侨客南来，老弱者则留居乡梓，人才缺乏，民生困苦，故人丁日减，生计日蹙。虽此后政治维新，建设可期，势必由闽北起手，近水楼台，何时波及闽南，就现下教育费言，每月全省规定十一万元，而省垣已占去六万元，其余五万元则分摊六十余县，每县不上一千元，杯水车薪，其他可以想见，故文武人材，与及出洋学生，几如凤毛麟角，人才既乏，地土贫瘠，教育不兴实业不振，加以政府鞭长未及，而吾侨拥巨资，若坐视不救，以开化如先生等，问心何以能安，至集资援救之法，当取牺牲与事实，不外教育事业之初基，约述如下：

       （甲）矿产，吾闽矿产虽多，然未闻有何项开采，亦未有实在彻底查探造册报告。

       （乙）农林，农夫株守古法，改良无术，若非有大规模之农务，实验场与农业学校之教导，终无发展之日。

       （丙）工业，吾闽土产原料缺乏，交通不便，工业一项，更无可言。

       （丁）海利，吾闽海岸线虽长，若以集美水产校经验，则尚乏相当把握，可以报告诸君。

       （戊）人才，人才须赖教育，吾闽除莆田一县外，其他寥若晨星，故如军政要人，必须外省来治，其他可以知道矣。

       五、欲开发吾闽之矿产，与及吾侨将来之投资，必有相当之牺牲。聘到经验矿师，分队查探。至少二三年，积极遍查，详细造报，按费国币一百万元，勿要求政府苛利条件，所开销之项，如收回固妙，否则作义务牺牲，以吾闽名矿如安溪之铁，龙岩之煤，要开采，须浩大资本，实难办到，若探得其他别种矿物，资本较轻，为吾侨个人或合公司财力能干到者，则利源一开，影响必大，许时利之所在，势必争先恐后也。

       农林，吾国素称以农立国，然因乏农校之研究，故改良无由，水利不修，畜牧放弃，兹急宜在漳州创设农业学校，与实验场。按国币五十万元，作十年之开销，工业吾闽虽乏原料出产，然不能因噎废食，且其他如测量绘图，建筑电学机械及别类等等，为吾闽最需要者，不知凡几，应在厦门创立工业专门学校，按国币五十万元，作十年或七八年之开销。

       教育，闽南数十县儿童，失学者十居七八，如每名学生，补助国币五元，以一万名计，每年开销五万元，按十年之费计五十万元。

       留洋学生，为造成专门人才，重要如选择有经验优秀青年，资助其出洋留学，每名至毕业，按助费国币一万二千元，每年约选派成十名，五七年间约五十万元。

       六、上言各项共国币三百万元，按作十年或七八年开销，以我国今日之财力薄弱，万万不能仿效富裕欧美，须先筹足充分基金，方敢下手，若果事事如此，虽本坡侨胞之富，要开办一间小学校，亦不可能，故凡事虽因时权宜，治本治标，酌计而行，十年之内，按有相当经费，已足十年之后或免待至十年，自有无限机会来临，如诸君志愿有加，慷慨乐输，或者数年后财产比现下增多数倍，则目前所计划，仅区区小数耳。

       先生等现下财产已在千万元之上若肯捐出十分之一，或捐出一年或半年之入息，则比二百万元国币，相差无几，尚可再向他侨及外埠闽侨筹捐一百多万元，料无难事。如何之处，希良裁为荷，并请

大安廿六，四，十五日

**福建会馆新委员就职典礼上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18.3.1929**

       今天为福建会馆新委员就职典礼之盛日，主席且略述本会馆之源泉。初并无福建会馆之名称，人只知有天福宫（注二）。顾天福宫之性质，不外每岁举行伟大之迎神赛会而已。距今十余年前，天福宫之外表修理得巍峨华丽，且每次迎神皆耗金巨万，备极奢侈。有心人士觀此情形，乃出手参预，始悉天福宫并无设立章程与注册，于是才有章程。及福建会馆之产生，积十余年来，会务未见若何发达，颇呈颓唐之象，斯非特福建会馆耳，即其他华人团体，又何莫不然。同人等不能任全闽侨所属之总机关长此萎靡不振，爱有改组之提倡。现在委员会已告正式成立，可谓焕然一新，堪引为幸。惟是吾侪已受全闽侨之委托，务须立些功绩，以副吾侨之期望。所以，本席愿诸君对于会务须有责任心，切莫推诿。假使每个部员推诿主任，主任推诿主席，而主席则推诿其他，大家互相推诿，一切事业，皆无成功之可能。吾故谓当认真负担而忌放弃。其次，目前亟待整理者，厥为教育问题，而教育之命脉系于经济。如经济处理得法，即易而解决也。再者，教育一层，非仅反映海外方面，祖国方面尤须注重，不可使有所重轻。总之，教育慈善诸事业，本为吾人应尽之天职，如有力者出资，无力者则从事宣传，量力行之。较有资产之家切莫待有余款时始作公益，盖金钱是流动的。譬如掘井得泉，今日抽出，明日则依然流满，用之不竭。设置之不用，则为腐泉，善于利用金钱与否，亦犹是也。再其次，希望本会各委员，此后举凡分科或分股诸会议，宜一律依时到会，毋拖延时间而失却精神。此职位虽然是尽义务不支薪水者，但吾人当视比其他一切有代价之职位更为重要、更加努力。

**福建会馆会员大会上报告会务**

**原文载南洋商报5.8.1930**

       今日之会员大会，是福建会馆改组后，委员会成立以来，第一次之大会。委员会如照三月十六日宣誓就职之日算起，到了现在，已有年余，若按照新旧移交手续计算起来，最多只有十个月而已。今日开会目的，最重要者，为各科主任工作之报告，及本会馆章程之通过。各科工作之报告，为了使会员诸君明瞭本馆会务进行怎样，章程是规定本馆会务进行的方法。一经规定，我们就将受约束；里面如果有不妥处，希望诸君尽量提出，加以修改，俾本会得有一尽美尽善之章程。

**会务**

       今日开会，本人实有无限感慨，本会馆全体会员，新旧统计，共四百二十余名。内中旧的为三百九十名，新的仅卅名而已。所谓旧的，系本馆职员未选举以前就加入，新的是委员会成立以后，经会友之介绍始加入。新加坡的闽侨，最少亦有数万，而会员加入，仅三十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东道不好，侨胞对此种会社，无心参加，另一方面，亦是我们委员会办得不好的缘故。关于此点，兄弟觉得很惭愧。

       新旧会员，总共有四百余名，虽然不多，但为数亦不少。今日一年一次的会员大会，在我们的理想中，以为到会者，将不知有多少。最少这间会所，总要挤满才是。然而今日到会人数，竟出我们意料之外，仅仅几十人而已。到会人数这样少的原因，不出二项：（一）东道不好，无心参加；（二）国内扰乱，一般会员，专心国事，以为国家不安，社会事业，参加亦无用。以上二原因，我们希望在最短期间，可以消灭。那么，会务就可以蒸蒸日上了。

**馆址**

       本会馆办公处，我们所以暂借怡和轩，经济占最大的原因。因为如将办公处，设在本馆所主办的崇福学校，课室不足，将另租房屋为课室，结果每月总要百来元。他如职员杂役、茶水、灯火等等费用，总共计算，每月最少要二百余元。这二百余元，会馆不能不出，然而我们如暂在恰和轩各种费用如房屋、灯火等，都是现成的，这笔款便可节省，在经济困难的馆务，不无少补。

**募捐**

       本会馆基金并不多，改组后，各种开销又较多。常委员会成立后，预算另筹特别捐与月捐加以维持。可是将近一年，尚未进行。不进行的原因，无非因近年来，各途生意，极端惨淡。经商者，都有入不敷出之慨。种种困难情形，皆足使委员会无法进行。这是一种苦衷，并非委员会放弃责任。但是到了最近，因为津贴七八间学校，经常费特别重，使各委员不能不本着以前募捐的议案进行。现在我们已细察街市中生意较无影响，而对于社会事业较为热心者，向之进行募捐，成绩虽然有些少，但是还看不出什么，总之，欲解决本会馆之经济问题，全视乎我们做职员的及会员的态度。倘是我们本身不肯多多捐款，怎好再劝其他社会人士出钱呢？这似乎说不过去。

**计划**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新加坡的华侨教育能够统一。但是欲统一全侨教育，第一步，要先从统一闽侨教育着手。统一闽侨教育，最要紧的，是经费问题。我们如果没有经费，去补助所有闽侨学校的话，我们办学的人，绝对不会听我们的指导，绝对不会按照我们的计划去做。

       自本馆改组后，我们统一闽侨教育的步骤，第一步是接办道南、爱国及崇福。其余的，是津贴八间学校。种种所进行者，离我们的理想还远，将来经费充足，希望能本着预定的计划进行。

**迎神**

       禁止迎神演戏事，现在已算解决，没有问题。本来阴历十月的迎大伯公，是种迷信事情，我们一定要破除，不能再举行。自改组以来，我们曾与各股头商量，已得他们之同意。但是对于关帝爷生辰、妈祖婆生辰、天公生辰的演戏，我们并未加禁止。这一年来，天福宫连众佛生日，都没有演戏。其原因，总不出下列二途：（一）生意冷淡，不易捐缘。倘是不足，做股头的欲自负担，亦感不足；（二）或许他们当事者，亦觉得演戏费钱是不好的。所以自行废止。

**倡设中华会馆改造中华总商会雏议**

**原文载南洋商报4.2.1929**

       鄙人以吾侨为一大团体，足领导全侨，进行一切兴革事业。回溯民国十数年来，侨界地位，绝无进展。由此之故，今当祖国革命成功，建设伊始，百事维新。海外华侨，亦宜乘时奋起，作有组织有秩序之大团结。一方面严守当地法律，表现华族之文明，一方面创设公共事业，增进侨界之福利。而初步着手，应从“倡设中华会馆改造中华总商会”始。爰述管见，分为八则如下：

       （一）总商会本届选举，闽帮之新董事，照原订十三名选出，其中选者，几乎完全签辞，虽有承认，亦极少数，乃缴征诸候补员，而候补员亦多有不承认者。现方罗掘票数寡少诸人，冀以勉强成数。然截至今日，尚未达到半数。即潮帮签认，亦尚未备。此种现象，诚自有总商会以来所未尝见。似此，设可勉强签足抵额，而将来会务，能否发达，至为可虑。各人于此，觉责任所在，殊不容放弃矣。

       （二）总商会常年规定阴历十二月十五日，开新董事会复选正副总理及各职员。兹者过期多日，不惟职员不能选出，而初选名额，尚缺乏几半，是此次选举之效力如何，当为众所共喻。其应存在与否，更无俟赘言矣。

       （三）总商会创办迄今二十余年，尚无正式章程。现所有者，仅为初办时之试办章程，久为大众不满。况现下制度，对于旧式之董事制，亦与采用委员制之国民政府，精神上显有抵触。其应速开大会，改革研究，更不容缓。

       （四）均属中华民国国民，而总商会分别省界府界，议董名额，亦以地域分等差，甚至总理有闽粤两省之轮流，不惟选不择才，且地方主义，封建色彩，浓厚至极，更觉不妥。

       （五）本坡我华侨各业各界社会会馆林立，而无一总会机关，以司枢纽，遂致数十万华侨，难免有一盘散沙之弊，失大团结之力，滋为可惜。兹宜联络各界全体华侨，创设一中华会馆于最适宜之市区，其关系我侨地位之进展，实非浅少。

       （六）公共图书馆、体育场、游泳池，足以开化智识，健全身体，又足以供给公共娱乐，杜绝不正当之游玩，其有益于青年，至为重大，此数者急于兴办，而以附于中华会馆为最宜。

       （七）总商会会址，为本坡最适中之地，其面积至数万方尺之多，大半久置空闲无用，若拆卸重建新式楼屋，则大礼堂、结婚室、图书馆、总商会、中华会馆、体育场、游泳池，莫不可以次而创立其间，诚一举而数善备焉。

       （八）查总商会试办章程，并无规定会友请开大会之人数，是则不拘会友多少，便可请开大会，征集众意，重订章程，再行选举，以备改革建设上列各条所呈事项，爰集会友若干人，签名函请总商会，择日传单登报召集大会。

**新加坡全侨大会讨论创办中华会馆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13.3.1929**

**与14.3.1929**

       列位先生，今日假座总商会开全侨大会，乃为筹备中华会馆，及拨前山东惨祸筹赈会余款，救济豫陕甘三省旱灾事。查创办中华会馆之议，系发源于本年一月廿八日山东惨祸筹赈会董干联会讨论结束时所倡议。原筹赈会目的，非如此短期便要结束，其希望本在长期之努力，奈因未向政府注册，有碍本地法规，故不能长期生存。虽为全体公认之团体，究因未曾注册之故，不能不于一月二十八日宣布结束。当结束时，全会会员，因不忍吾侨终无一个总机关，以承办全侨事务，故一致表示愿合力组织中华会馆。但觉在中华会馆未成立之先，凡发传单等事，必须负责有人。筹赈会结束，名义已不适用，乃授权与弟个人，可以随时集众开会。二月五日，曾以弟个人名义函请原任筹赈会董事干事讨论一次，结果对于倡设中华会馆事全体赞成，并当场推举筹赈会全体董事为筹备员，成立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一切进行事宜。其所负责任，乃限至总商会开会时为止。当时所以函请总商会开大会者，以商会地址甚大，中华会馆建筑，大可与商会合作，及一部分商会会员关于商会之选举事，既而商会签辞之董事，重再追认。选举既无问题，大会乃亦未开。合作与否，商会虽未明言，但其不同意之处，亦可略见一斑。时至今日，中华会馆之组织，盖已当另起炉灶矣。原与商会合作之本意，在于商会有广大之地址，可资大规模建筑之用。中华会馆所占面积应估价还值（约十万余元）非不名一钱，可擅侵占。今商会既未同意，关于地点问题，自当设法觅购。惟尚有一希望，中华会馆为全侨一大团体，或可请求当地政府给地，亦未一定。至中华会馆应要组织之理由，在座侨众，早已明瞭，毋待赘述。

       鄙人尚有不能已于言者，则全侨之团结，关于爱国心理之演进者甚大。溯在民国未成立之先，吾华族受满清专制之桎梏，爱国观念，甚为薄弱。自光复以来，国内外同胞，爱国程度，进步极速。据弟鄙见，爱国与人民团结，实有至大关系。要爱国必须团结，既团结尤要爱国。何以言之，爱国而无团结，则如一盘散沙，力量奚以集中。既团结而不爱国，则团结亦属空泛。国内外之团体，到处都有矣。然而能集中力量以赴爱国事业者，恐不能到处而皆有也。此何以故，盖凡有团体未必悉以爱国心为基础耳。吾人诚能从兹努力，则爱国心理之普遍养成，以及爱国力量之总集合，虽或不能及今而见其效，然二十年以后，其庶几乎。其次，人民爱国心理，每亦有随政治局势而转移者。近日国内政界消息，颇觉险恶，必难免因而大抱悲观者。然吾人须知凡一国家之建设，本非可一蹴而成，此项困难诚为必经之阶段。如法美之革命，曾经长期间之痛苦。德废专制，亦经一度欧洲大战而始成，其苦痛犹今未泯。况以中国之大，较法美德等十有八倍，历十余年之痛苦未可谓久。即不幸而须再加几年，吾人亦认为革命过程中不能幸免之事，实无可奈何者。吾人万不能因事局之恶化，而遽冷退爱国心。况在几月前关税未达自主时，侨胞爱国，何等热烈。今自主已成，是宜益加努力。诸君须知华侨与祖国，关系甚为密切。祖国政府及国内民众，亦甚重视华侨，尤以吾星洲因地理上自然形势，更为优异。华侨人额几千万，足跡遍全世界，就南洋而言，亦有马来半岛、暹罗、缅甸、爪哇、越南、菲律宾等之分。惟历次国府代表暨学者名流等至南洋，必过星洲，即可见我星洲地位之重要。顾星洲无一华侨总机关，甚为缺憾。按槟城则有平章会馆，荷属各地到处皆有中华会馆，我星洲岂可久任其无。此一月廿八日各团体代表在前筹赈会开会时，所以一致倡设中华会馆。今日大会开成，鄙人无任欣慰，从此可正式选出筹备委员进行组织。中华会馆组织成后，则其他如华侨教育会、图书馆、大礼堂、运动场、游泳池等，皆可以次设立。教育会可特设视学员，请国府委派才望优越者充之，以收华侨教育行政统一之效，而策其前进之功。图书馆可增进侨民智识，并以改良侨界青年公余不正当之消遣。其余大礼堂、运动场等，于侨化教育皆有最大关系，不能不兼行并进。或谓一事未成何能做得许多，鄙见以为凡事如认为应做，则百万金俄顷可集。如不愿做，则一钱亦不易取。诸君尚全体努力，即纵十倍重大于此者，当易易耳。愚见所述，浅陋之极，望诸君不吝指教。

**陈嘉庚建议在星洲建筑中华大会堂（注一）**

**原文载南洋商报2.2.1939**

       本人深以星岛一地，为欧亚航道交通枢纽，处东方商业重要地位，侨胞寄跡于此，数达五十万人有奇，而竟无建筑完备之中心侨团，实属憾事。甚至侨民大会，尚须假借游艺场或学校举行，故本人认为适应今后华侨之需求，实有从速建筑星洲中华大会堂之必要。近闻槟城方面，亦有继雪霹之后兴建一大会堂之议，足见扩大华侨团结之组织，已为各地同胞所重视。关于重建星洲华人大会堂办法，本人意见，主张由现存之中华总商会会所或以华人网球会场地，为重行改建之地点，盖取其位处市区中心地，大会堂之建筑，因建有“中华”名义，兼为增进有关方面之联系起见，应将我驻星总领事馆并合在内，此外并须设立一规模完善之中华图书馆，藉为辅助社会教育之推进。盖教育为强国之本，公共图书馆之设立，实属提高民智之要素。内欲求华侨教育之普遍，尤赖于有充实之公共图书以为推进之工具。又者，尚能以华人网球公会为建筑场地（按华人网球公会，在初级法庭之后，同济医院对面），则更可以此大会堂，兼容侨生公会于内。因该网球公会场地，乃数十年前巨商章芳林氏捐赠与当地侨生作为公共团体者，由是而南渡之侨胞亦可与侨生获一更密切之联络矣。一举数得，法善意良，莫此为最。至于会堂之内，至少应有一足容千人集会之礼堂。照此计划建造，需款当在二十万元之间。吾侨富商，为数不少，如能各献些许资力，众擎易举，事之必成，当无问题。

       本人相信，我之抗战，其必获得最后胜利，为期当在不远。观乎欧战之时，德国军备，世无与匹，但卒未及五十个月而告败。今此外强中干之日本，经我十有九月之抗战，已趋崩溃途中。其必不能支持四十阅月，乃意中事也。故此中华大会堂告成之后，尚有两大意义，一则以为抗战胜利之纪念，一则以为华侨团结之集体表征。且抗战胜利之后，吾侨将进而从事襄助国家建设之大计，其时负此领导之任务者，已非星华筹赈会，而乃应归诸最高之侨团也。故今日之中华总商会，必需早作完备建设之谋，乃克以当斯巨任。

**陈嘉庚谈总商会应取消分帮制**

**原文载南洋商报11.2.1941**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为各帮商人集合团体之最高机关，宗旨在求增进同业利益及襄助社会福利事业，成立迄今，凡三十六载。创设之始，原由闽粤两帮，分选正副总理一人及议员协理二十四名为共同负责职员。及至民国三年，乃依农商部颁布规定商会之第十条文，改为会长制，增设会董三十二名，任期二年，会董限额，为福帮十三名，广帮五名，潮帮九名，琼帮二名，梅埔及三江一名。每届正副会长，例由闽广二籍人士分任之，但不能同籍连任原职。历届正副会长，闽粤互调，原因在此，此例相沿，及今未废，社会帮别，因以存在。迨及抗战军兴，海外华侨，团结救亡，呼声洋溢，曾有提议取消商会之分帮制度，以为同侨团结之示范，嗣以狃于习例，一仍旧贯。记者昨以商会分帮制度问题，征询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氏，陈氏对此，发表意见，据谓商会会董人数分帮限额，与及正副会长不能同籍连任，此种制例，始于数十年前，当时因风气未开，各省侨胞之畛域观念甚深，故不得不以此方式，适应该时华侨社会之特殊情形。今则华侨文化程度，日高一日，各籍侨胞，合组商店或联合举办社会福利事业者，不胜枚举，省界观念，已渐消除，实为同侨团结之良好现象。商会为全星商人集合机关，似可不必于会董中划出帮别，亦不宜于会长不能同籍连任，凡具有担任会长能力及资望，并为当地政府所信赖者，无论何帮均得选任。犹忆去年欧战发生，当地政府为预防金融外溢，爰有统制外汇之颁布，该会为吾侨商人及政府便利起见，乃商诸当轴，准由商会设立统制外汇办事处。又如最近政府实施人息税，倘政府能准在若干资额以下由商会代办者，则于政府及侨商，亦将便利良多。商会欲取得此种联络及许可，必须负责主持人，为当地政府所重视，余之谓会长不但宜具社会资望，而且应为政府信赖，即此故也，至于废除商会之上述帮制，其法甚易，只须召开会员大会，经多数会员之同意，将原定章程，加以修改便可矣云。

**福建会馆改良丧仪宣传会上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6.4.1936**

       列位同胞，今日为福建会馆丧仪改委会第一次宣传演讲。福建会馆改良丧仪之事，报纸上迭有记载，本委员会亦曾发表宣言。所以再在总商会演讲者，一、以报纸销数有限。二、以本委员会分六宣传区派员演讲。出发时，先应在适宜地点开一演讲会。三、以做人既以决志改良丧仪，则亦应有工作。四、则在此演讲，听者甚众，亦必可得多数人之帮忙。数日前闻洪宝植先生言，彼预一妇人丧事，丧家照例设席，彼以于理不合，不肯就食，并请丧家勿尔，时在座潮籍侨胞多位，曾与同情，不肯就食。是以，我人希望各位同志，能如上述潮籍侨胞，实行帮忙。

**丧仪今昔观**

       关于丧仪，四十年前，较铺张者，惟富人耳。时本坡有甲必丹，为陈金钟及章芳林，大富商则有万兴号等。惟其时热闹亦不过以轴随棺，锣鼓和尚继之而已，殊不若今日之怪形怪状。昔者，最有钱仅如此，余者不及，今则家资近三四千元者，即大吹大擂、彩阁、弄狮、弄龙、装戏，光怪陆离，无所不有。有时即以友谊，思往相送，亦无不因此而折返，然此风起于迎神。昔者，本坡分五股头，依例迎神。三年一迎，五年二迎。至三十余年前，众以有关国体，因在天福宫集议废除，谓以后若欲迎者，仅能迎一香亭云云。夫迎神人尚认为公事喜事，而复以其有关国体，集议废除。今复用于私事喜事，不知其可。

**丧仪与爱国**

光复以前，知爱国者少。今日知爱国者多，此学校报馆兴起之故耳。惟爱国应遵守国家颁布规条，蒋委员长以民尚奢侈，因倡新生活，以礼义廉耻为纲。礼义廉耻四字，因先贤之遗教，蒋委员长特倡之耳。然则今日之丧仪，合乎此耶？以言礼，人子之于父母，生事之以礼。今日之丧仪，合乎礼乎？以言义，义者宜也。今日之丧仪，合乎义乎？以言廉，廉为贪之反，即妄与妄取，安得为廉。只顾一已私利，不虑社会祸害，又何足为廉？至于耻，前已言之，此殊要紧，无耻则不足为人。因个人之体面，使国家蒙耻辱，人知不可，我知爱国者，必不忽略礼义廉耻四字耳。

**丧仪与自立**

       爱国自立，必先使民自立。国难严重，于今为极。昔者我国先亡于元，再亡于清。元灭中国之时，与辽金并进，中国疲于应付。乘危而起，事出有因。清灭中国之时，叛者吴三桂引狼入室，自侮人侮，理固当然。今敌图我，毫不假借，明目张胆，一何可恶。今日之日，岂元清灭我之日可比哉？抑尤进者，元清文化远不及我，灭我之后，存我文化，开放政权。我人前后二次亡国，同得光复，信非偶然。今敌一旦灭我，政权将无由开放，教育将立与消灭。现东三省之烟厕林立，毒物流行，甚至于雇用年少貌美女招待，以资引诱，则知人种亦与以消灭。今日国难之严重，又岂昔之可比耶。自助而后人助。……我人于此，全仗人固不可，全仗已亦未能，故须仗人，亦须仗己。仗己则全仗政府亦不可，仗政府亦须仗人民。年来政府已大振作，如有犯法，枪毙者既不乏人。鸦片禁绝，去年闽省已不复种。他若公路之开辟，长十余万里。教育之强迫，亦已见诸实行。调查户口，行征兵制，亦均一一实施。至于广西，人已目为模范者，此皆列位之所知，毋待赘述。惟仅靠政府，亦殊不可，故须全民振作，而后乃可共禦外侮。且敌人图我，良以（一）视我如散沙；（二）世界将大战。今世界和平渐有实现之象，大战已见不复爆发。苟能全民振作，敌将奈何？他若我侨在外，试问将自承为中华国民否乎？然则我人对于国家之服务，又觉如何？我人行此侮辱国体，妨害进步之丧仪，何异登大广告反对祖国政府？窃思即以电影宣传，亦不若此之甚也。我人爱国家，而不废除侮辱国体、妨害进步之丧仪可乎？

**原文载南洋商报13.6.1936**

       婢女考团经于前日由港抵星，侨社人士，对该团此来任务，颇甚注意，良以婢女生活，每甚离奇，人权关系，尤为重大也，记者为此，曾于昨日，往晤陈嘉庚先生，询彼个人对新加坡婢女问题意见，兹就陈先生所称各点，分述如下。

**婢女制度存废问题**

       记者问，婢女制度应存应废，言人人殊，大抵主张废除婢女制度者，无非以婢女生活，有乖人道，故尔云云，至于主张保存婢女制度者，则谓刻下农村破产，农家子女，无法生活，以此卖出为婢，亦委屈求全之计也云云，先生于此，意见如何？陈先生称，此一问题，关系甚大，亦至复杂，本人于此，未有成见，是以亦无任何意见，可供发表，大概婢女调查团此来，目的当在调查当地政府婢女保护律例实施情形，调查婢女保护律例施行至今，究竟已至何地步，婢女本身，究竟有无得其实惠等等，若然，则余将有言。

**星洲婢女保护律例**

       新加坡现行婢女保护律例之本身，本人尚觉满意，本人以该律例若能切实施行，婢女生活，必得改善，一切惨无人道之虐待情事，亦可减免，惟政府对此律例于实施上殊未得一完满结果，盖实施方法，尚有待乎改善也。

**忆参议局讨论情形**

       记得当日参议局讨论此项律例之时，本人适为参议局议员，当时本人曾提议政府每年至少须在华字报上刊登此项律例实施办法广告数次，以广宣传，当时本人以蓄养婢女者，多为华妇，若政府仅将此项律例在宪报上公布一次，殊难使人周知，律例公布既未使人周知彼不知有此律例者，势必不知虐待婢女为于犯法律之行为，则欲其幡然悔改，已不可能，何况此项律例施行之后，对于虐待婢女之取缔，又不严厉，是以此项婢女保护律例施行至今，婢女生活即有稍加改善者，要亦限于局部，大多数婢女，当仍在悲惨世界，渡其岁月也，当时本人在参议局所作上述的华文报刊登广告提议，曾获通过，惟事实上又未见诸实践，不知如何，总之，律例虽好，若不切实施行，亦复无补于事。

**主妇文盲提醒匪易**

       陈先生叙述至此，谈及文盲问题，陈先生称，事实上政府施行此项律例，在华文报刊登广告之外，尚须再觅适宜途径，帮助推行，若仅登报，效力亦复有限。目下新加坡读报者少，而读报者又往往未必蓄有婢女者，其读报而能以婢女保护律例告诸蓄有婢女者尤千不得一，至普通蓄婢女者，每多目不识丁之妇人，彼等既不知有婢女保护律例，又未阅报，是欲彼等之不依旧虐待婢女，不亦难乎，故谓除登广告之外，尚须寻求适宜途径，以资推行也。

**未行登记婢女生活**

       在今日婢女保护律例施行情形之下，蓄婢而行登记者当然甚多，蓄婢而未登记者，相信亦当不少，蓄婢而行登记，所蓄婢女已得相当保护也可知。蓄婢而未登记，所蓄婢女生活情形，又可想见，相信此等婢女之被虐待者，当必照旧备受虐待。俟至一朝逃出，投报警局，彼身受之痛苦已不知几许，斯时政府即将虐待者判罪入狱，在此文盲遍地之今日，相信如此亦徒使监狱之内，增一犯人而已，于社会将无影响，惩一儆百，更难言矣，故除登报以外，再觅适宜途径，以资推行，亦为当务之急也。

**蓄养婢女不行登记**

       至于蓄养婢女而未进行登记者，相信其中必有一部份出于从未知有婢女保护律例，故亦未能觉知其当履行登记手续者，同时亦必有一部分出于藏匿不报，明知故犯者。前者，若能广事宣传，即可减免，后者则当详细侦查，无使疎漏，若能于若干住宅或若干街巷设侦查一人，以资督察，尤为有效。总之，须政府有意严格推行，事方有济。

**养女生活应与注意**

       婢女保护律例实施之后，蓄养婢女者，势非履行登记手续不可，惟其中藉言养女，规避法律责任者亦复不少，究竟养女与婢女性质有殊，藉言养女，阴行虐待，事实上与虐待婢女同出一辙，欲免此弊，政府自宜注意养女生活，最好于养女一项，亦有一种管理方法，或于某一特定期间内，派人前往巡察一次，使彼狡猾之辈，无从施其毒手，诚能如此，于事实上想亦有所补助也云。

**体育与运动会**

**为天津水灾筹办运动会上之演词**

**原文载国民日报4.12.1917**

       弟非学界，对于教育，茫然无知。惟运动一科，闻关系卫生为至大，故又称曰体育。世界文明国不但学生重视体育，为人毕生亦未敢放弃，且属尚武精神，对于国家，尤为重要，学界诸君，知之最稔。惟学生父母，多未明白，指为游戏而反对之。至于运动会，洋人视之尤切，年必开一次，以比较之。优者益勉，负者振奋，故能咸臻完美，而有益于身于家于国。若闭门自矜，安知鸟之雌雄，势必日退而后已。况属同侨比较，可互相勉励，优负不足为荣辱。数年前菲律宾发起远东运动会，集中，日，菲三国健儿，运动比赛。第二次会场，设于上海，两次日本均失败，其选手致书全国谢过。国人引以为耻，于是留心奋励，悉力研究。本年会场轮设，日本竟占极优，而我国最居末后，贻笑全球。闻日本有不上分数之人，终日哭泣不食，自怨贻国家羞。其民气如此，实在可敬。我国学生父母，爱子如金，至一闻运动会，则生反对，其阻碍体育为何如哉。兹适学界诸君发起救济天津水灾游艺会，愿集阖埠学校开运动会筹赈之场，弟知到时各侨胞必争先恐后而来，所谓一举两得。深愿学生父母猛然省悟，作有益之爱为幸。尤有进者，则希望部长及各校干事员，和衷共济，格外筹备，庶秩序整齐，竞争有法，岂徒学界之光哉！

**国术、道德与救国**

**陈嘉庚在怡和轩欢迎张馆长及国术**

**南游团会上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30.1.1936**

       张馆长，国术南游团诸先生，诸位来宾，本俱乐部今晚开会欢迎张馆长暨国术南游团诸团员，蒙诸位光临，实在荣幸，小弟于此，用特代表本俱乐部对诸位道谢。张馆长这回来叻，和以前宣慰专员，特派专员，以及过往政客不同，张先生感觉国家需要体育，尤其需要国术，因此乃于前年在京招集各方能人，举行国术考试，以资提倡，张先生不惟考试提倡，还率队到各省去表演宣传。当时曾到广东，有来南洋消息，我们正在欢喜，讵未果行，张先生这遭来此宣传国术，使人人知道祖宗传下的国术，现在已经复活，并且，不久就要完全恢复，何等称心。

       张先生所做的事，小弟仅知一小部份，而已洞悉张先生所为，均为实事求是，所以今晚，小弟用不着客气，随便在这里说几句话。南洋华侨有个习惯，就是对国内派来专员，每每开会，欢迎，颂扬备至，以前如此，最近也是一样，华侨一边恭维，专员们一边夸耀，彷佛功劳太大了，了不得了。国内专员到南洋来如此，南洋华侨到国内去，也往往没有两样，无非是彼此铺张，相互颂扬，这应该说是国人公有的习惯，其实，大家就尽点义务，也都是职务份内应尽的事，何况事实上大家都没有实在的工作。

       张馆长此次来叻，小弟也曾会过几回，张馆长不喜欢恭维，小弟素来也不善恭维，至于今晚所说的彼此铺张，相互颂扬的话，原非捕风捉影，大抵都有根据，我们先说对于华侨这方的根据：

       孙中山先生提倡革命，当时国内难以立足，所以到南洋来，南洋华侨因此多所接触，这本来是事实，可是，华侨一回国内，便往往可以听到：“华侨为革命之母”这句话，以华侨对国家有极大功劳，说这话的人，大概以为革命，只推倒满清便足，不须其他了。可是，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宗旨，革命一事，殊未如此简单，工业需要革命，文化也需要革命，还有更重要的一项，就是心理的革命和人格的革命。如果人人人格不加改革，心理不加改革，就是满清推倒，袁世凯打倒，军阀弄倒，也是无用，不惟无用，地方更要纷乱。我说，革命可分公私二种，工业的革命，文化的革命，政治的革命，这是公的，心理的革命，人格的革命，这是私的。公的革命个人做不来，不能做，可以让别人去做，至于私的革命，如心理的革命，人格的革命，这些不能让别人去做，应该自己来做，孙中山先生遗嘱里头说：“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看这几句话，就可以知道革命应该人人能够共同奋斗，事方有济，遗嘱中又谓：“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这段说的，是革命尚未成功，朝野上下，就须人人奋斗，继续努力，如果处处敷衍，不务实际，不惟不配称同志，也还是革命的罪人。事也如是，又何足称为革命之母。

       对于华侨不务实际的事实已如上述，对于政界中人，如部长，厅长，师长，每言每日办公时刻多少，成绩如何，说得天花乱坠。可是，实际上，中国农村破产，经济破产，一些应做的重要工作，都未做到。轮船，飞机，汽车，不惟不能造，而且不能用，大逾千吨的轮船，已经无法开到南洋，飞机无论空军空邮，自己也都不能驾驶，动辄聘用外人。至如汽车，欧美竞赛，每小时开行二百余英里的，我们那个开得，这些这些，朝野上下，应该引为奇耻大辱，而后乃足以言改革。

       又如广东来说，粤汉路是中国交通上的脊骨，全线不过一千多里，满清时代，筑成甚多，所余也属无几，却是迁延至今，尚未造好。试看苏联，苏联从黑海到西伯利亚铁路，长七千余里，三年之间，居然完成，等到通车，才向世界宣布，能做事的，每每不尚多言，吾人何堪比拟。至于福建，闽南有一师长，在职五六年间，不惟未为一善为闽人福，甚且迫闽南百姓，栽种鸦片，自己也自经营鸦片，共产党一来，他又不能抵抗，不能抵抗就要走。走时，别的顾不得，倒管到自己一大堆鸦片，用几十辆汽车运走一大批鸦片。

       这师长也还借着航空救国的名义，从百姓身上剥了几十万块钱，说是要买飞机，结果几十万块钱，仅仅买到一架。共产党来了，顾不得，连这一架也给共产党拿去了。

       当时小弟有间分行，估值三四万元，在官兵退走，共党侵人，纷乱之际，被人抢去，抢的虽不是共党，但连我的也都被抢，足见其时全城商民损失之惨了。

       记得当时前数月间，共产党曾一度侵入湖南长沙，当时兄弟也有分行在长沙，可是，长沙的分行却没有损失。论共祸之烈，湖南政府衙门及教会礼拜堂均被烧毁，其情形殊不次于闽南。可是湖南因官军为有秩序的退走，所以商民也就未有任何损失。

       闽南这位师长对闽南百姓的蹂躏无以复加已如上述，可是，当这师长到英荷两属游历时，师长依然大摇大摆，大吹大擂，到处夸耀，而英荷两属的闽人，也到处开会，到处欢迎，而且照例颂扬备至，恭维极点，师长所为固无足论，试问华侨所为有价值么？华侨又有是非么？今晚为欢迎张馆长及国术南游团，小弟说了这些，原甚不对，不过，张先生实事求是，小弟有感于中，也就按捺不住。总之，小弟希望英荷各属欢迎张馆长及国术南游团，千万不要和过去欢迎政客专员一样的欢迎，张馆长此来为提倡国术，小弟已知一二。记得我国数十年前，也有一度国术化，其时小弟年少，闻长者言，乡里之强弱，夜晚往观，即可了然，入强乡，可以听到三种声音，弱乡则否。三种声音是什么？一为读书声，一为打拳声，一为弦管声。小弟生于集美，少时集美尚有余绪，未行全绝，近数十年，此风已不可复有，有的是吸烟（鸦片）声，赌牌声。小弟谓提倡国术，应先打倒鸦片，张馆长过去，曾为全国禁烟委员会主席，小弟知道张馆长深知提倡国术，必先打倒鸦片。中国年来，禁烟认真，说不定三年五载，即可禁绝，所以张馆长此来提倡国术，殊称及时。

       张馆长此来，弟闻有人谓国术现在不适，不能抵敌飞机大炮，现在张馆长于此已有解释，且报纸上也经有人代为辩白，社会已经明了。记得前此，有个朋友自南昌来，据称南昌空校招生，须中学毕业乃有投考资格，当时六百人投考，结果，及格录取的仅八九十人，其实既经应考，其自觉资格相当，自意中事，而竟未能如愿以偿，想因身体孱弱，五官发育不完全以致落第，也未可知。及至其后，此被选之八九十学生，又退去几十人，仅存三四十人，直到毕业，我想当不出十人，由此看来，足见体格不完全，飞机就不能驾驶，大炮无从驾御，小弟适才所谓根据，就是这些说。兄弟对于国术，有三见解。

       第一，国术和国文一样重要，国有文武，文是国文，武即国术。国文不可废，故今日以本国文字为主，外国文字为辅。国术也不可废。国术亦当取本国武术为主，外国体育为辅。

       第二，国术不惟关系体育，而且关系卫身，日本除柔术之外，并取我国武术，所以对武士道极重视，现在人家正拿了我们的国术，我们却来丢了国术，这怎可以？

       第三，国术可以用于消遣，消遣原极重要，青年人空闲之日，不以国术为消遣又将何为。并且，人的好歹，决于十余岁至二十岁之间。在此期间，工作之余，既不能将之关在屋内，不以国术为消遣将何与？说到消遣，对于业已发达的外国，花样自然很多，譬如体育场，图书馆，电影戏以及新发明的播音机，说也不尽，可是，上述数者，不惟我们乡间未有，即城市也都未能全备。我国乡居人民较住城人民为多，如此，不与一正当消遣又那里行，张馆长提倡国术的意义，今晚道及的，想不及二三，未道及的又不知多少。总之，小弟对张馆长提倡国术，有三感想，第一是张馆长既已彻底认清这是应该提倡，值得提倡，急需提倡的事，就该和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一样，一心一德，锲焉弗舍。今后若有什么院长，军长，省长或更佳位置，也都勿就，专心致志，提倡国术。第二是联络各省，并赴各省表演。第三是多培养人材，为各省用。

       弟阅报知张馆长此来，与本坡中华总商会接洽，此举诚是。新加坡华人最高机关是中华总商会，荷属则为中华会馆，张馆长前此曾来函本坡中华总商会，这遭又与中华总商会接洽，承认中华总商会为华人最高机关甚是。弟阅报知张馆长除在本坡宣传国术外，兼欲筹募国体学校经费，表演办法，已详报载，筹款办法却未见到，总之，际兹不景时光，大款虽难筹措，尽心而为，当不至使张馆长失望。小弟希望商会会长及董事，能为此事尽力。相信商会会长及董事能尽力去做，必能得到各帮商家团体的拥护及帮助，如果大家真能为此事诚心努力，将来新加坡即可为各处模范。小弟以华侨对祖国能帮助的不外二三项，第一出钱，第二出力，有钱出钱，无钱就须出力，第三，出钱出力之外，还须诚意。

       弟以世界各种族，对于各人的国未必都爱，对于各人的家，大抵都晓得爱。总之，爱家的，无不爱其子孙，爱子孙的又无不爱其子孙强健长寿，有好道德。既然如此，也就应该叫子孙学习国术，自己也就应该出钱。如果荷包不打开，子孙又那里能够得到幸福，如果有人怕出了钱，不能益到自己子孙，倒益了别人的子孙，其实如果这样，也复甚佳，因为别人的子孙好了，我们的子孙环境一好，也就可以变好，岂不一样。

       最后，弟引一言为证。古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是怎么说法？这就是说，积善之家必能辅助子孙，使子孙得到幸福，所以我们要子孙得到幸福，应该辅助子孙，辅助子孙，又莫善于出钱提倡国术，今晚的话，就到这里，现在请张馆长指教。

**筹赈山东惨祸全侨大会上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18.5.1928**

       诸君，今日侨胞各团体假总商会开山东惨祸筹赈大会，举弟为主席，弟实不才，未敢承受，无如诸君过爱，屡辞不获，故勉任其难。查山东不幸，客岁惨遭大灾，难民数百万人，无食无衣，苦惨万状，不可言喻。虽远邻如美国尚筹款一千万元，以资赈济。古人之所谓救灾恤邻，原属慈善性质，不分畛域，一视同仁。换言之，即全世界人类所应尽之义务。顾日本虽与我国毗邻，且属同文同种，而从来未闻其捐助一文钱，救济一粒米，所谓救灾恤邻之义何在。乃今且更进一步，侵略我主权，惨杀我同胞，无异乘危抢劫，落井下石。其野心凶暴，险恶蛮横，实全世界所未有。今我国势虽弱，然人心未死，公理犹存，必筹相当之对待。

**总不外两项办法**

       对待办法不外二项，第一就是抵制，第二就是筹款。抵制之事，当守居留地法律，切不可轶出范围。若或轶出范围，是破坏抵制也，故应行文明办法，实行经济绝交。吾民族若能群策群力，坚持抵制，不难驯服其野性也。惟是抵制之事，十日来坡中已屡发现传单，报纸亦屡有登载，吾侨已经实行。故今日本会可无须讨论，请到会诸君注意，至荷至感！

**我们是和平的**

       今请言筹款问题，筹款用途，弟意亦有二种，即助战费与赈难民是也。然以我国之弱，万无开战之可言，譬如有一巨室，人口虽多，大都妇孺童稚，而突来群盗，各执利器，任意抢杀，试问诸君应趋避乎？抑与死斗乎？吾知诸君必以趋避为宜，故今日我国民政府只有退避，而无开战之准备。夫宣战既不成问题，则助战费之事，本会今日亦可免加讨论矣。

**应当讨论筹款救济**

       今日所应讨论者，就是如何筹款救济。如死者未葬，伤者未医，逃亡离散者无家可归，若能捐筹巨款以救济之，则伤者可医，散者可聚。以我民族之众，知识日开，定有雪耻之一日，故弟意救济难民，即是惩治强暴之初步，未悉诸君以为如何。今日本会之组织，弟意有数条应加讨论：（一）举正副会长、财政、董事及募捐员；（二）本会之名称；（三）赈款应汇交何等机关，但此问题尽可由董事部从长计议，目下毋须提及。唯恐诸君急欲知其大概，弟敢以所知奉告。现南京政府谭、李、蔡诸委员，已命令组织直鲁赈灾委员会，设仁济善堂于上海，委员长为许世英。本会之款，大致不外汇交南京政府所设立之此等机关也。

**主席之希望**

       （四）此回筹款，与平常不同。既望诸君踊跃，尽力捐输；又望诸君急速将认捐之款交出，以便汇赈，万万不可如前，每次捐款，催收至数月，尚未清楚也。诸君爱国热忱，毋须鄙人多赘；（五）捐除意见，缘已往多次之慈善组织，虽筹款原无权之可言，而亦屡屡发生枝节，或设多处机关，或立另一名目，互相倾轧，甚至街头巷尾，张贴标语，毁骂当局。此种行为，实足阻碍进行。夫慈善原属义务天职，已如前言。故吾人应深明大义，遇功勿居，见义向前，庶散沙可合，意见可消矣；（六）本会完全为筹赈山东难民而设，诸君凡有指示发挥，请认定此旨，勿过事激昂，涉出范围，当恪守居留地法律，勿干例禁，实为万幸！况此会场系假自总商会，万一发生事故，未免阻碍后人之提倡慈善事业也，故弟于此再三致意云云。

**山东筹赈会各社团代表大会上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23.5.1928**

       列位代表诸君，今晚之召集此大会，即属各团体代表之第一次大会。查本会之成立，原承各团体来函发起，于十七日假座中华总商会，开全侨大会时所成立。计当日由公众举出正副会长两名，及董事三十二名外，其余一切任务及进行办法，悉委托董事部妥议进行。当晚（十七号）经即召集各董事，在本办事处开会，继续讨论是日大会未毕之议案，并承大会之委托，举定财政查数文牍庶务等职，协同办理。嗣又曾开董事会议两次，讨论各项办事细则。但此次各务以赶急进行之故，而召集全埠各社团代表大会，又须筹备种种手续之故，所以延至今晚，始能召集此第一次之代表大会。至本会各职员之组织法，本席今仅简单将组织之财政委员团六名，为诸君言之。查所举定之六名财政，其中以一人为主任，余为委员。此五名之委员，每晚轮值一人驻会监收各处交来之捐款，各有专职，斯各有专责，如此组织，是已缜密之极。

**事虽慈善关系国民极巨**

       今进而言本会之性质，及今晚之开会。在本会虽属慈善事业，但关系于国民极为重大。微本席言，在座诸君当亦共悉，今旷观数十年来，凡办理各种慈善事业，有劳力工人，不须鼓吹，不须提倡，而自动捐资加人，有如此次之踊跃者乎，毋亦由店东或资本家出而办理已耳。且今番不独各劳工自动奋起，即妇人孺子，亦多自动捐输，如昨日大埔黄暖娘女士之到会拔钗助赈，及其稚孙之捐款五元，均足以征此次国民爱国之热忱。想各因得闻此次东邻恃强压逼之甚，故有如是血诚之表现。由此观之，近十年来，我国人不独男界智识已有进步，即女界智识亦已大有进步耳。又查本会本非怡和轩同人所发起，亦非恰和轩所召集，盖由各人各以良心上所感触，联同发起而成立本会。

**办事切要统一**

       今各团体代表诸君既如是热忱，投函加入，愿为本会之发起人，在本会今既得庆成立，则自应视本会为办理此次赈务之统一机关，何能又人各将款自向祖国政府汇付。该使人各将其捐集之款汇去，不特国民政府莫明此处筹赈之情形，抑亦令国民政府中人忙于应接，手续綦繁。就以对外而言，外人久已讥我国人为一盘散沙，倘于今次之赈款，仍然各自为政，岂不益贻散沙之诮，而蒙同侨莫大之羞耻乎？查当日召集之传单，原就已知其已有团体者而发，其外之未有正式社团，及查访未周者，因未及派以传单。弟今日所要求于诸君者，诸君须明白怡和轩，亦不过本会会员中一份子，其主体仍在百余个之社团。在本席个人之意见，本会之成立，实系一大公无私，无偏无倚之机关。况当日大会选出之正副会长，系由大会公举，卅二名董事，亦由大会按照商会组织法分帮举出，由众通过。其余各事，亦悉由大会委托办理，已力求完满上进行。今本席得闻有人将款自汇回国，且汇款者又属本会之发起人，设人人如此，又将自置于何地。虽曰彼自将赈款自行汇付，与本会无关轻重，其如贻人讥诮，谓我小小之事，亦不能统一进行何。况今之经济绝交，原是一最文明出于良心上之举动，设众志亦如是不能统一，是即破坏经济绝交文明举动，可不慎歟。唯一之鹄的，毋出于范围之外。就今晚所会议者，唯一目的，则在筹款汇赈，此外均不理其他。至承大会举出之正副会长，及各董事，诸君须知此中人均非无业之闻人，然以既受公众付托后，如正副会长，财政查数文牍庶务十余人，每晚均到会办事，自甘牺牲其本业本职而尽力于此。但除此专职十余人每日到会办事外，尚有董事十余人，初拟举任外出募捐，嗣恐难于普及，故今晚特召集各社团代表出任本会之各位干事员，开此大会，讨论各自负责，自向其社团募捐，以求普及。设尚有在于到会各社团之外，而为各社团代表募捐力所未逮者，本会自应再举未受专职之各董事出面募捐，祈尽全侨而普及之，至到会诸君，对于募捐进行，有何伟划，请示教之。

**山东筹赈会最后一次联席会议上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29.1.1929**

       山东惨祸筹赈会，自成立以来，已历九个月之久。论其成绩，昭昭在人耳目。昨晚该会开董干第四次联席会议，亦为该会最后之会议。当晚到会者，董事部二十四人，干事六十四人，妇女部四人，总共九十二人。八时开会，先由李铁民君用闽语宣读上期议案，继由李亮琪君再用粤语翻译，然后主席陈嘉庚君宣布，谓今晚之董干事会议，早已在报上及传单上说明，为本会之最末一次会议，欲将前九个月半之工作，作一结束。现可分为三层说明：（一）山东惨祸筹赈会结束之理由；（二）报告总收人及总支出之账目；（三）讨论结束后所有未完手续应如何办理处置。

**一、山东惨祸筹赈会结束之理由**

       按照第二次董干会议中所报告，本会结束之日期，最少须在中日济案完满解决后，然后结束。照目下情形观之，本会似不应就此停止工作，因我等之初衷，还未达到。但处于居留政府之下，我们不得不尔。盖华民政务司，曾数次传问，要求一确定结束之日期，故乃以本月底对。设诸君质问政府有无正式公文通告或有无命令于本月底结束，弟可直言一字“无”。盖政府当局对于本会，极表好感，彼不过以个人之感情，用口头上之通告。在去年八月间，华民政务司即以个人之私情，询问山东惨祸筹赈会，究竟于何时为止。当时但答以特别捐至九月底，当不再进行。月捐尚未收清者，当再收清。及至十月底，华民政务司再托人及本身问弟，质问结束之确定日期，仍以本月底对。但自十月至现在，虽中间已有三个月之久，然终未在诸君面前详细发表。此种苦衷，诸君当能亮察。适才谓政府对于本会颇有好感，而华民政务司之所以急于知本会之结束日期者，总括言之，最少亦受有三方面质问。（一）某西报对于本会之不满，每将本会每次所开会之记事，翻译成文，送交华民政务司；（二）某领事之再三向华民政务司交涉；（三）政府探员之报告，故当时弟曾对警察厅及华民政务司坦白说明，谓本会对于地方治安，最低限量，当予以帮助不少，政府答覆亦属至理，盖本会未曾经过合法手续，在政府注册。政府不过暂时作情，焉能作为长久，且加有三方面之攻击，故不能不询问，彼三方面人之攻击。其最重要者有二点：一、本会未经过注册手续；二、即是经济绝交。在第一点我等当得承认本会与居留政府法律有抵触，因目下本坡各种社团，无论其为大社团小社团，若不经政府合法之手续注册，政府即视为私会，可以将该社员尽数拘捕。再者已注册之社团，其人数亦有规定，如树胶公会只限于树胶商，硕莪公局，只限于硕莪商。现本会乃集合商学工而成。所以在第一条，我们当得承认。至第二项因为各人之行动，乃各人之自由，何况属于爱国之事。比如邮政局，为英人所建造，其所用之铁器洋灰以及其他，必定采用英国货。英国人如此，他国人何独不然。设有中国人，不购某国货，而购中国货，此种举动，是否为违法，稍有知识者，当不假思索，而必答曰：不属违法也，于居留地法律上实完全不相抵触。故今晚本会之所以宣告结束者，乃因素来缺乏一种相当之公共会所，有以致之也。

**二、报告总收入及支出**

       收入

       一、对捐来赈款总共一百一十六万八千五百三十一元一角五占。

       一、峇株改造蔡公时铜像三千元。

       一、马六甲，同上，二千九百元。

       计三条共一百一十七万四千零三百一十一元五角。

       支出

       一、对十二次汇交国府申银一百二十五万元折叻银一百零七万三千一百二十五元。

       一、对汇蔡公时申银六万元，折叻银四万九千六百一十八元七角半。

       一、对和本银行存叻银四万五千一百六十二元四角半。

       一、对庶务员去叻银八百三十七元一角八占。

       一、对日清尾存叻银二百三十元一角三占。

       一、对电费去叻银四百五十八元七角半。

       一、对车税去叻银二百一十七元四角六占。

       一、对购置去叻银三百九十一元二角半。

       一、对什费去叻银一千二百七十一元五角六占。

       一、对辛金去叻银二千七百二十八元六角二占。

       计十条共一百一十七万四千零三十一元一角五占。

       以上所报告乃至昨为止。月捐册总发出七千六百余本，现尚有三千七百十二册未收。特别捐册共发出七千六百余本，尚有三百外本未收。至于特别捐、月捐、货捐、演剧筹款，收足时，可在一十万元以上，所有开支账目大概如此。

**三、结束后所有未完手续之处置办法**

       从上面之收入及支出观之，我等可知尚有一十万元以上未收之款，银行有四万余元，日清尾有二百余元，此种未完之手续，我等此后势不能开会讨论，因我等须自守信用，亦不欲使政府当局有不满或干涉之事发生，故深望诸君加以讨论，俾本会有较为美满之结果则幸甚矣！

**陈嘉庚为日本突然毁弃济南惨案**

**解决条款致中国外长电文**

**原文载南洋商报11.2.1929**

       王外长先生鉴：日兵未退，先许言和，让步已极。乃日本无厌反覆，损失不赔，事关国体，万万不可迁就。况民气初盛，抵制正剧，乘兹国货振兴，愈迟愈效，利害关头，欲速不达，务希毅力坚持，铭感不尽。

陈嘉庚叩尤

**陈嘉庚对日问题之检讨**

**原文载南洋商报4.1.1932**

       欧战而后，各国鉴于战争之惨剧，乃深思远虑，为防微杜渐计，期有以消灭第二次大战之发生，故有华盛顿九国条约之签立，国际联盟之组织，凯洛克非战条约之订立，其联络不为不周，设计不为不全，历年适逢有一国争执，多赖国际联盟会裁处，莫不化干戈为玉帛。此次日本平地风波，乘中国天灾人祸之惨，无故攻占东三省，既占我领土，复杀我人民，又藉词以欺国联，希图蒙骗全世界，然国联安能受欺，故屡次决议，促其退兵，还我领土，乃日本不但不退，且口是心非，视国联如无物，跡其贪狼野心，实不在德皇威廉之下。

       彼所以轻视国联，演成此种暴行者，毋亦以为今日之列强，如英则财政困难，美亦失业者众，法可引为挚友，捨此数者，其他更不足道，然此多出乎武人之眼光，以为良机可乘，实践田中之遗策，以餍国人之大欲，国联其奈我何，不知英国所谓财政困难，乃一时对付失业工人之经济，与军政消费之奢靡，欲藉是裁减其供给，至其商民之富裕，胜过日本十倍，何关大局，若美国之财富，甲于全球，又何关乎工人之失业，日人竟视为良机可乘，真井底之蛙耳。至于法国虽可引为好友，然当论其举动是非，若如此凶恶强盗，荒谬残忍，自欺欺人，人格已濒破产，而欲希望文明友邦，不顾公理正义，同其作贼，岂可得耶？

       凡最无人格之行为，莫甚于荒谬与无耻，盗者窃肉于市，只知有肉，而不见有市人，荒谬至极，无耻至极也。今日日本之举动凶贪狠毒，世界皆知，尚欲反指鹿为马，设词遮饰，何异于窃肉之盗，岂尚有国家人格耶，然其全国人士，对于占夺东三省之见解，亦未必一致，以余之观察，至少有下列数派：

       1.饭碗派：为此次发难之主动者，武人也。武人恐裁减海陆军备，危及自身饭碗，故主张对外侵略，以巩固其地位权利。

       2.霸王派：主张积极侵略，实行田中政策，先占满蒙，继占中国，然后鲸吞全太平洋群岛与印度。

       3.贪狼派：以东三省偌大富源，若得归入其版图，则人口不患过剩，子子孙孙，可享万世无疆的幸福。

       4.侥幸派：颇知灭环绝伦之举动，大亏世道，虽中国一时不能抵抗，任其为所欲为，而列强或不甘坐视，前途荆棘，无如一见肥肉，垂涎三尺，冀可行险侥幸。

       5.悲观派：此派稍有智识与良心者，莫不知乘危抢劫，落井下石，为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愤，况背约弃信，以一国之力，欲敌全世界，何异以卵击石，其覆败决不旋踵，然犹因循犹豫，噤不敢言，恐蒙不爱国之罪责。

       6.革命派：共产党，社会党，平素明争暗斗，出没起仆，无时不思推倒帝制与军阀，惟机会甚少，未克如愿，此时正利其国家有事。全神外注，彼乃得行其革命之目的。

       以上数者，各有其见解之背景，故利令智昏，荒谬狠毒，如惨杀我旅韩华侨数百命，冀可激我之报复，以遂其野心，又如藉词人口过剩，积极对华侵略，皆此种复杂荒谬之见解所促成，不知防止人口过剩，惟有节制生育，方为正当办法，譬如贫人欲多蓄儿子，而行凶劫夺他人之财产，谓以供其教养之资，可乎？

       孤行必败，古训不诬，日人若能悔过遵国联之劝诫，知难而退，其损失或不过名誉上而已，若不然，必待国联第二步封锁经济，自处绝境，然后摇尾求和，其损失已不可胜计。再不然，果一意横行到底，不计成败，侵吞满蒙，又占我沿海各省，或攻击国联商船，撕开世界第二次大战争之战幕，则其结果之失败，当成为德国第二，可断言也。

       我国处今日列强均势之时代，国力虽弱，亡国亦须有理由，东三省若亡，全国必与偕亡，此理势之推测也。但中国有不亡之理在，何也，若外侨不能保护，国交失于妥洽，如甲午庚子之妄启衅端，至于丧败覆亡，此何足怪，若仅仅政争不息，内乱纠纷，教育废坠，国民程度参差，此乃一国政治在改革过渡时代所必经之程序，决无亡国之理由，今日之幸灾乐祸，欲乘此而亡我，岂非缘木求鱼耶，况二十年来助长我内乱，暗施其纵横捭阖之术，谁之罪乎，日本不当负此全责耶。

       九月十八夜不抵抗之失策，我国人大都归咎于政府当局，然我国财力军备之优劣，外国人莫不详知之，独我国人反昧昧然，呜呼，此国之所以弱也。其次，如我国在国际地位，素为列强所轻视，固然为讳，每逢交涉，无论理由如何充分，而结果莫不归罪于我，如五三济案，是非之判，明如观火，外人尚有不直我之言，此回事变之初，设极力与之抵抗，不唯中日人之奸计，而外国人是非莫判，必反疑我之不是，况与抵抗，亦决失败，所差仅迟早间耳，凡忧时之士，能为国家全局利害计，当然表同情我政府之主张，况显示曲直，大白日人暴行于世界，引起国联公意之重视，利害所关，又岂微细。否则，所谓一失足则千古恨矣。今者，国联等咸已明瞭日本之野心，情势与前大殊，是非原已大白，而我政府负有守土之责，明知虽战必败，亦必抵抗，重大牺牲，在所不惜，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国联非有爱护于我，此固人所共知，惟国际联盟会之组织，订有严重规律以制裁会员国之纠纷，故无论国之强弱，咸当守此公法，我国为会员国之一，故必诉于国联之公判，况国联而外，更有华府九国公约，凯洛克非战条约，凡会员国又当恪守而遵行。国联既负有维持条约尊严之义务，凡有负约，必有相当对待，苟国联条约及华府凯洛克等约皆告无效，则全世界之道德法律，全人类之公理良心，皆已破产，祸变所极，又岂仅我中国而已，夫复何言，且英美与我国，在商业上更有密切关系，彼二国者，皆以我国为大市场，将来发展，未可限量，如我国可亡，则香港马来亚缅甸印度澳洲菲律宾檀香山等地，岂独能安枕耶？

       世界兴衰之循环，必无一成不变之理。数百年前，中国之富强，冠于全球，迨后则转而至西欧大陆，继而至于南北美。近数十年来，东至日本，以此类推，循序循环，将复至我中国，此乃已往事实之确证。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系根据三代而言，孟子而后，有秦始汉高之盛，汉之后有隋文帝唐太宗。唐之后，有周世宗宋太祖，宋之后，有元世祖明太祖，史迹循环，更番而盛，历历不爽。明之后，于今五六百年，孙总理之革命已开其端，不过如秦皇隋文，资以过渡，必待有汉高唐太者出，始成全盛之局，在此国体改革过渡时代，其多难多险，乃时势所必经也，日本自维新以来，历六十年之顺境，每逢甲年必兴，如甲午中日之战，甲辰日俄之战，甲寅欧洲大战，均助彼之大发展，迨至甲子（民十三年）其运已竭，不但不能再获机会，且近甲之癸，已遭大地震之败，兹者癸又将到矣，或者前运之兴，逢甲必胜，今运之退，逢癸必败，若云天数，虽知，近于迷信，而书不云乎，恶有恶报，种恶因必不能结善果，又曰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请拭目以俟之可也。

**陈嘉庚谈抗敌必须联俄问题**

**原文载南洋商报9.4.1937**

陈嘉庚先生答南洋商报记者问称：

       关于国共联合问题，个人以为国共殊无任何联合之足道。惟共产军若无条件归中央改编，在中央指挥之下，共成救国伟业，于中央，亦殊应与以接纳。所谓无条件，并非指联俄，抗敌，及不应保存共产军队而言。夫敌之当抗，此乃必然之事。共产军若有抗敌真诚，斯固义之正者，安得指为条件，至于联俄，欲抗敌必须联俄，是亦势所应尔。相信中央之所以不轻言联俄者，殆仅戒于口耳。共产军果有抗敌真诚，联俄何能谓为条件。以言保存共产军队，共产军队，果能归我中央政府改编，真诚谋图，则彼有可用之材，可战之兵，中央政府诚宜利导善用。相信中央政府接纳归附，亦必无悉数解散共产军队之理。然则，保存共产军队，亦未足谓为条件。总而言之，时机危迫，非可敷衍，况箕豆相煎乎，共产军之无条件归中央改编固其时矣。

       至于中央经济提携，日本侵我东北察热及冀东，中国与日本万无成立经济提携之可能。中国与日，即有任何经济提携之标榜，相信亦必出于敷衍不有实际也。

**星华筹赈会成立之侨民大会上的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16.8.1937**

       今日之会，本人被推为主席，事关国家民族，不敢推辞。大会召集宗旨，首在救济难民及前线死亡者家属。彼等为国牺牲者，可爱可敬，请到会者起立，静默二分钟致敬。

**中日战争有关国家存亡**

       今日大会，到会诸君应当注意者有二。前者关系整个国家及民族，后者关系当地政府。寻常对外战争，战败亡国，今日若战败，则非只亡国，实将亡族。过去我国虽亡于元，亡于清，但我政权教育权尚在，文化保存，不致亡族。若观日本目前毒害中国，足知其旨在灭我种族，故意义特别重大。至于当地政府，在目前本认时局严重，因居留人民，华人最多，日人次之，政府极望各民族和洽，不致发生事端。且中英向来亲善，故于中立之间，尤为留意我侨行动，不愿发生事端，致人有藉口。今日之会，曾经政府允许，共有五项条件。所以有五项条件，实因吉隆坡发生一种不幸事件，被当地疑为劝募军费，致本坡被其牵连。当局曾拟禁止全马来亚华侨募捐，前此总商会及百余团体开会之期改变，一方面因时局和缓，同时亦因此事关系。本人所以不能不提出报告，实使列位知在居留地之行动，应格外审慎也。大会开会一度延期，嗣经设法疏通，极力说明本坡集会，旨在救灾。

**侨民大会旨在救灾**

       侨民大会，旨在救灾，并非劝募军费。当地政府，应亦了解，认为救灾可无问题，但恐轶出范围之外，乃请总商会会长，前往谈话，谓欲开会，当征得华署同意。滬战发生后，商会会长乃往见华民政务司，承示应守条件，同时亦嘱本人到署，面告一切。在开会前，总商会曾约同各帮代表在会晤商二次，讨论以下政府提示应加注意各点：（一）捐款应以救济为目的；（二）不得强迫捐款；（三）所捐款项只许由一机关收汇；（四）开侨民大会时会众发言，不得涉及抗日、抵制日货及捐款购买军火等项；（五）开会时应守秩序，勿有越出范围以外之言论及行动，因一方面而政府固不愿意，一方面华侨立有失体面也。关于此条，会中如有发言，应加注意，不可有任何可引起纠纷之言论，如抗日，捐助军需，或抵制日货等。华署提出此条件后，曾谓如何许允，须于昨日上午十一时答覆，方可开会。总商会及各帮代表乃于昨日上午九时开会，对政府提示各项，全部同意，即行答覆，此事本由总商会代表接洽，华署所以特召本人前往者，察其意向，似以如此，较为妥贴也。本人曾保证称侨胞程度已见进步，一切当守秩序，今后进行，亦可遵照原则办理。华署许以今日之会，若由本人出任主席，维持一切，则当地政府，较为放心。此系当日情形，敬此报告。

**星洲组织募捐迟缓原因**

       查此次星洲组织募捐，较为迟缓。当华北事变发生，各地纷纷发动筹款，星洲独为落后，谅甚引起侨胞之疑问。此会本由总商会提倡，但本人虽非董事，亦曾从中参加讨论。主张不急即开会者，本人亦其一人。因中日此次问题，极为严重，与从前内部问题不同，亦非短时间可了，说不定须数月或数年，华侨对于此事，不能随意题捐。譬如购机寿蒋，星洲区捐卅余万，此次希望对此数有十倍或数十倍之增加，各地随便集会捐款，每有欲速不达之弊，本人所以极不赞成也。查星洲为马来亚首府，应为各埠模范。去年购机寿蒋，星洲与当地政府磋商，得其同意，故进行顺利。此次各地不候星洲发动，遂发生此次吉隆坡事件。且本人所以不主张急开会者，有三原因：（一）欲先对政府疏通；（二）俟战局显明；（三）拟先向有力者疏通，首捐巨款，以为模范。以此事系长时间之事，战局末了，本会即应继续工作，使义捐源源而来，将来应分为特别捐、月捐、分期交纳捐等。目前时局严重，捐款性质，非仅慈善，亦非义务，乃系本乎个人良心，事关国家存亡、民族存亡，除非良心已死，否则必当努力捐输。

**泗水日侨**

       最近泗水来客，谓该地日侨节衣节食，以收入之半，捐助其国家。星侨尚良心未死，即不能如日本人之爱国输财救难，亦应有相当限量，且不应偶遇军事失败，或地方丧失，即行灰心。假定如是，即谓之无坚忍、无毅力。即令南京失、汉口失，退至川陕，亦应继续努力。目前战事，仅系发端，将来范围或且扩大，最后胜利，乃在我国。但欲国际情势变化，我国应先牺牲，绝无事变初起，便有外国助力之理。试观当此国势孱弱之秋，英美法荷各国，即知经过一定时间之后，我们打倒敌人是必然的。因此，我们同胞应注意坚持二字。譬如星洲侨胞四十万，假如有半数可以捐款，每人每月一元，即有二十万。每人每月二元，即有四十万。平时人人言爱国，目前并无亲临前敌之必要，只是输款：是以生为国民应表现真正爱国心，如不出钱，将来报纸或征信录披露，即可明白。

**叶玉堆君捐十万元**

       此会已经政府同意，眼前战局严重，战区灾情又甚紧迫，本人顷以征求叶玉堆君首捐十万元，以作侨胞模范；其次由叶君介绍一人，亦已答应十万，但有人拟再请其增加，故名字暂不发表。又其次周献瑞、蔡汉亮、林文田三君各捐二万。本人现无力量，无论战局延长至何时，每月出月捐二千元。又总商会定每人发言至多五分钟，此刻有欲发言者，请注意发言范围。

**陈嘉庚在南侨筹赈会成立会上之开幕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11.10.1938**

       总领事，各位代表，各位来宾，今日适在我国国庆日举行此会，蒙推兄弟为临时主席，兄弟忝居东道，亦不客气接受。两月前得孔院长自汉口来电，拟邀各属侨领集星开会，组织领导机关，其最大目的在增加筹款效率。今日诸位踊跃光临，足见大家奉行政令甚诚，要求团结甚切，将来群策群力，加强后方工作，必有良好收获，可以断言，现在谨将经过各情，约略报告一下。

       （一）孔院长来电垂询三问题

       本年七月卅日接汉口孔院长来电称巴城庄西言先生建议在新加坡组织领导机关，电文中提出三问题征询兄弟意见。

       （甲）领导机关有无组织必要，（乙）环境能否许可，（丙）如何组织始有成效，兄弟对此三问题，抱如下见解。

       第一条，兄弟认为组织领导机关，确属必要，因为世界上任何事业，若有组织，能合作，当然有益无损。若无组织，不能合作，则散沙之弊，实所难免。以兄弟经验而言，如前年马来亚购机寿蒋运动，若无组织总机关，不但成绩将减弱，而且各区内之小埠亦将不能统一区会机关，其领导者何人，所筹款数若干，亦皆无由得知，又如抗战以来，若非在吉隆坡举行联合研究会，组设通讯处，则各埠汇款亦不能统交行政院，义捐亦不能概免换公债券，义捐公债数目不得而知，全马组十二区筹赈会及领导者何人，国内政府亦必不能获悉，政府既不知若干区会及领袖为谁，则劝募公债事宜，无从委托，或委托不得其人，种种弊端，势且因而发生。若全南洋各属华侨，能推诚合作，共同设立总机关，则其收效之宏，更不待赘，故兄弟认为领导机关，必须组织。

       第二条，属于环境问题，兄弟接孔院长电时，曾先用口头通知当地政府，后复写函正式奉告，已不成问题。

       第三条，如何组织始有成效，此条兄弟有两项见解。一，若由政府命令侨领组织，当然较有成效。二，各属侨领集会如何组织，方有成效。对于前者政府已命令各驻地领事召集，兄弟不过负责筹备而已。对于后者则端赖今日到会诸领袖贡献高见，兄弟识见有限，惟望大家集思广益，俾组织周密，办法妥善，以完成抗战后方任务，而尽国民天职。

       以上所言，即兄弟对孔院长来电所提三问题之见解，兄弟覆孔院长电及对高总领事面商内容，除军事政治不谈外，当然承认组织领导机关有必要。反过来说，兄弟若覆电认组织领导机关为无须，将不免有三失误。

       （甲）悲观畏缩，见义不为，如富人有钱不出，减少抗战经济力量，于祖国为不忠。

       （乙）除军事政治外，以必要而欺为非要，对政府郑重垂询为不诚。

       （丙）妄自菲薄，误认海外华侨无觉悟心，无团结力，以自侮辱，诸位试设身处地，究竟可否放弃此职责，而设词推诿了之乎？兄弟知在座各代表必能共体此意，而不轻易放过此机会，至会后有成效无成效，完全视我各代表之精神态度为转移。按南洋华侨八百万人，而出席代表不出二百人，则每人实代表四万余人，我侪所负责任，不外指导宣传出力工作，增加筹款效率，事轻易举，不难办到，绝非挟泰山超北海之类也。

       （二）从利害研究有无组织总机关必要

       凡事无论大小，必须先审利害，以为进退，如害多利少，当然不可干，如得害参半，则放弃亦可，如明明利大而害小，甚至有利无害，乃欲藉故反对，意气用事，在国家无事时，尚且不宜，况今日何日？今事何事？稍能爱国者，何忍出此，致蹈违反政府之命令可乎。今次大会所损失者，不过诸代表须花费多少耳，然所费无多，平日备资游历，尚可增长见识，况目的乃为祖国服务乎。至成立总机关后每月应开之费，除报纸多能尽义务外，余者该处自能负责，亦免支取筹赈会分文。

       （三）大会筹备之经过

       （甲）孔院长电高总领事请各属侨领集星开会后，本筹备处立即印发通启秩序议程及其他有关文件，托由各驻地领事转寄各埠侨领，如菲律宾、香港、安南、爪哇、苏门答腊、望加锡、婆罗洲、暹罗、缅甸、马来亚等地，亦有一部份由本处直接寄交各埠商会或筹赈机关，共计五六千件，想各属侨胞均已接到，不至遗漏，此外并在各属埠登报通告或七八天或十余天。

       （乙）敝埠华侨未有相当地点，可为此次大会会场，故假座华侨中学礼堂，因距离坡中较远，各代表来往实较不便，请原谅。至略事布置，一为尊敬国家政令，一为各属侨领聚首一堂，机会至为难得，故外表上不能不稍求隆重，至所有物料多属假借或报效者，工作人员亦多自动尽义务，所费实属不多。

       （丙）筹备以来，前后，接到我国府林主席、蒋总裁、汪副总裁、孔院长、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之训词，及各省主席，各省机关之贺电，计多件，容请总领事及兄弟并纪录宣读。

       （丁）各属代表共列报一百七十余名，填具履历者虽多，而未填者亦属不少，凡已填者本处俱依报制表，至未填者则无法代填，亦希原谅，如函件遗失或本处疏忽误漏，希即通知，以便补入。

       （戊）各属代表最先到者为菲律宾，其他或舟或车，络绎不绝，亦有本早方到者，因时间无定，或事前未有通知，又寄寓旅馆多处，到本处招待欠周，深失东道天职，无任抱歉。

       （四）大会之意义

       我海外华侨寄人篱下，所有行动应受当地政府法律限制，若对我祖国政府，则绝对自由，因我国政令不能施行于海外侨胞，凡集会结社，无论何人肯否遵行，均可自由主张。故此次代表大会，虽由我行政院孔院长命令召集，而通过何项议案遵行与否，总机关实无权干涉。唯抗战严重期间，凡我侨胞自应精诚团结，集思广益，俾能加紧出钱出力，增强后方工作，此为召开大会之第一义，为欲求达此目的，故须组织机关为之领导也。

       （五）华侨捐款及公债，抗战迄兹，近一万万元，每月扯七百多万元，加以寄家信等每月千余至二千万元，合计每月得二千余万元，前日吴主席在香港演说，有云我国战费每日二百五十万元，即每月七八千万元，如此则我华侨对战费只负担三分之一，莫怪我政府重视华侨之助力，与最后胜利，大有关系。我侨既知此义，更常增加奋发，源源接济，以达到胜利之目的。

       （六）华侨不应对祖国政府随便干请

       我祖国政府自来优待海外华侨，凡事多可直接用函电向国府省府往来，若在国内人民，则情有所限制，级有所必经，当然无此权利。但我政府既特别优待华侨，我华侨自应慎重从事，不可苟且，此尤兄弟所深自警惕者，况抗战时期，军事政治问题，千头万绪，非我海外华侨所能明识，若轻信人言，随便干请，必至动多失宜。在我政府既重视吾侨财力之贡献，遇有请求，不许则有失侨胞之意，迁就则或有损无益，所以吾侨机关如不慎重从事，随便干请，实使政府左右为难。今日举行大会开幕礼，总领事及各代表，尚有许多宝贵意见要贡献，兄弟不敢多费时间了。

**南侨总会组织经过**

**原文载南洋商报30.3.1941**

       本年五月中间，寇陷厦门，难民逃鼓浪屿。鼓浪屿中西各界即组国际救济会，电请南洋各地华侨筹款协助。而福州救济会陈肇英、陈培锟、林知渊等君亦来电要求华侨电请中央派兵救闽，并筹汇赈款。当时庚曾覆电云：“华侨不便过问中央军政，请自行设法；至救济事，待必需时当即进行。”旋接非律宾李清泉君函电，俱议召集各埠侨领在香港或新加坡开会，讨论救济华南事宜。巴城庄西言君亦来函表示此意，而集议地点则主张新加坡为适中。庚对李庄二君之征询，概用函覆：同意集议研究加强筹款，而不同意牵涉军事政治。至以新加坡为集会地点一问题，庚鉴于马来亚情形之复杂，及过去召开联合会之经验，深感诸多困难，未敢接受。此函覆后，即未有再通消息。

       事隔两月，至七月三十日，忽接孔院长自汉口来电，云：陈嘉庚先生，庄西言建议，在星组织华侨领导机关。此项组织，有无必要，环境能否许可？如何组织，始有成效？盼核覆，电渝。孔祥熙世。庚即电覆如下：重庆孔院长鉴：来电悉。菲荷各属，前曾对庚建议，集星组织机关，意在请求中央援闽，及研究筹款成绩。然关于军事，庚不赞同，若筹款则可，环境无问题。如以国府命令电各属埠，集星组织机关，研究有益筹款，庚甚欢迎，并可资以激励督促。如赞成，乞电示奉行。陈嘉庚叩世。

       来往两电而外，又复沉寂。约廿日，高总领事过访，称接孔院长长电，委查召集各属侨领来星开会事。庚乃将经过情形－一详告。数日后高总领事再接孔院长电，通告各驻地领事，传知南洋各属侨领来新加坡开会，其范围包括菲律宾、香港、安南、暹罗、缅甸、苏门答腊、爪哇、望加锡、婆罗洲、马来亚等。于是庚忝居新加坡筹赈会主席，分属东道，乃负责筹备一切，并定双十节日为开会日期。虽为时仅余卅多日，惟南洋各地侨胞均早已闻讯，有意奉行我政府命令者，选派代表参加，自不至如何逼促也。

       大会之期既届，最先到者为菲律宾代表，其他各埠代表亦相继贲临，至为踊跃。暹罗因环境关系，未便公然多派代表，然暹京、暹南、暹北，亦均有人出席。香港华侨财力，以粤侨为最，不意粤侨出席者竟无一人。苏门答腊多埠参加，独首府棉兰与其近属，乃反放弃，查系前时各设机关未有联络。迨大会前夕，方组总机关，故不及举派代表。其他数处来函，称因事未便派代表。惟愿拥护大会一切决议案，并愿加入总会为会员。至于上述暹罗一地，因环境所限，爱国侨胞不能充分显示其精神，然此后抗战前途愈呈光明时，则该地环境自能随机转变。以该地侨胞之众，将来筹款成绩当不至逊于马来亚。他如香港粤侨，去国最近，观感最切，富庶又为华侨冠，今后亦必能多所贡献。另有若干地方组织欠完善或事阻未先参加者，尤希速谋改进，加入总会，以通声气而收宏效。此次出席代表，计四十五埠，凡一百六十八人，实南洋华侨史上所未有，亦云盛矣。

       大会即告闭幕，此一次南洋华侨大团结之空前盛举，已成为历史上不磨之记载。会中重要文件，兹已编成报告专书，爰将经过情形，摘述梗概，以弁简端。

民国廿七年十一月

**陈嘉庚主张持久战以抗日**

**原文载南洋商报22.10.1930**

       针对路透社昨传日军进犯广州，陈嘉庚氏告诉记者称：我国对日抗战，贵乎持久。所谓焦土抗战，盖即表示持久之决心也，是以一地之失，无须牵虑及之。吾侨目前最大之救亡任务，乃在各尽天职，加强输财。抗战之最后胜利，决定于国家经济之巩固。即使广州一旦被劫，吾人更须引以激奋，加深同仇敌忾，我持久战必可败日，绝无疑议。本人对于目下之时局，不日将本此信念，作一详述。

**购机寿蒋与国防**

**陈嘉庚在新加坡购机寿蒋会**

**游艺筹款会上开幕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5.9.1936**

       列位同胞，今日我人假大世界跳舞厅举行此礼，盖为购机庆祝蒋院长寿辰游艺筹款会开幕礼，至于本游艺会之举行，一因市情不景，藉此添加购机款额，一则藉此唤醒同侨，使知国之当爱。至于购机寿蒋一事，为三数月前，国内军政界之所提倡，外洋从无动静，视极平常，未见有倡导者。至七月半，本坡侨民大会在中华总商会举行之时，刁作谦总领事乃以提倡一事，与弟言之，盖得伦敦郭大使之来函也。时弟以侨民大会之举行，目的仅在制止内战，提付讨论，殊有未合，因谓之曰：此事是否既得当地政府之许可，若然，则函总商会，请其发起可也。及后，闻商会因领馆来函，召开会议，以人数不足流会，终改开侨团代表大会，侨团代表大会举行之前日，刁总领事谓事有攸关，君必出席，当晚福建会馆举行执监会议，又举弟代表福建会馆出席，弟本不就，嗣以过却不恭，故尔迁就，中间，弟并拜托华民政务帮办孙崇瑜先生，探求华民政务司意见，看其是否同意马来亚华侨联合举行。总商会团体代表大会举行之日，孙先生即于午前答覆消息，称，华民政务司经予应允，惟捐款不可出于强迫云云。以是，总商会侨团代表会议举行之顷，弟即以此报告会众，并谓，当地政府既经应允，吾人可以放心进行，且应联合全马来亚侨胞，一致为之云云。及至本坡购机寿蒋会成立之后，亦遂函请各埠，举行联合，至于联合进行之好处，弟谨顺为诸君报告一二。刁公使言，购买飞机，每架需款十万元，我人试思十万元购机，此于大埠，自可如数捐足，小埠则否。如此，小埠捐款之不及一架者，势须谋与其他小埠联合，则所购飞机，应书何种名目，实有问题，而况与人合购，亦非甚易为乎？若牺牲小埠，不使捐款，则其所失，亦殊大，设与联合，即无问题，此购机寿蒋之不可以不联合一也。购机一架需款十万，不行联合，大埠捐款亦将受阻，何则，飞机购买，既不可购买半架，尤不可购一架许或一架半。如是，能力可捐至十余万之大埠，势必捐至十万即止，若行联合，则无论其为十五万、为十六万，均可尽量劝捐，免受阻碍，此购机寿蒋之所以不可以不联合又一也。总而言之，购机寿蒋，举行联合，不特物质上有利，精神上亦复有利，盖使各界人士，于此知建设空航，人人均有此一义务也。弟此次与周献瑞，李亮琪二君，出席小组会议，对于小组会议经过，顺便报告一二。此次小组会议之举行，到有六七州府代表，该会议举行二三小时，现象极佳，并无一人反对联合。弟此次出席小组会议，得与各州府代表晤谈，对各方捐款情形，较为明瞭，大概本坡可至国币卅万至卅一万，柔佛区各方合计，可至十万以至十一二万，马六甲目前已及万余，将来可至三万，森美兰，芙蓉，可至五万左右，雪兰莪可至廿五万以上，吡叻可廿五万，槟城可至十五六万，其余各处，一共可至四五万，统计将来可至国币一百廿万左右。我侨将来即捐至一百二十万国币，购买飞机，亦称甚微。至于国内，又将不及。我国民穷财尽，一省之数，想亦不及此间也。总之，我人即捐一百二十万购买飞机，所买亦不过一十二架，为数殊少，然此可谓为教员机而非学生机，何则，航空人才难得，须加训练，则此十余飞机可教学生数百人，与全国购赠飞机合可达一百余架，则此一百余机，可训练学生数千人。又此种飞机为飞机母，我人希望其能多生儿子，相信我国有航空人才千人以至万人，则我虽无力，友邦必将助我，彼野心勃勃者，孤立无援，我则至少亦有强国三四为友。二次世界大战，果告爆发，可无疑义，则一国助百架，三四国助三四百架，一国助五百架，三四国助千余架，俗语云：“自助者天助”，我人固须自己有人才而后人乃得而助我，若无人才，望人助人助机，全盘负责，则又谈何容易。抑尤有进者，数十年前，作战仅靠海陆二军，今则空军为重。论海军，我国海军幼稚，发展又为能力所限，今可用以自卫者厥惟陆军。而陆军又须有空军掩护，陆军无空军掩护，等于无用。今我空军初创，谓无空军也可，无空军是无陆军，无陆军是无国防，国而无防，其不等于亡国也乎。是则购机使为机母，急不容缓，均有力者至宜出力，得添一机二机，均属可喜。

       列位同侨，弟今尚欲有片言，此言实为不幸之言，不幸之言，原可不必言，惟弟终不得不言者，盖以关系之大，非仅及弟一身，而实关系全新加坡，全马来亚也。侨民大会举行之后，寿蒋委会成立之前，即有人以匿名信寄弟，内中所书，多有对弟个人不利之辞，甚有书于墙壁之上者。寿蒋委会成立之后，再有同样事情发生，此大约为反蒋派西南派之所为也。投匿名信，弟以无关大体，即在墙上书写标语，亦无关系。怕数日前本坡一有力言论机关，登载反对文字，措辞与前述匿名信所言，觉甚相似，此无非为反蒋派，西南派之所为，弟本不欲有言，然终不能无所解释，彼等指责开会何故不在商会而在怡和轩，究竟开会在怡和轩有何不可，即有不可，此亦为第一次委员会议之所决定，并非偶然。至言怡和轩，三四十年前，孙总理南来，计划革命，当日孙先生亦与怡和轩会员接洽，即福建光复时之保安会，及后来之国民捐，亦均由怡和轩所发起，他若济案及其他事故捐款，亦为怡和轩所发起，所捐亦每至数十万，然均圆满进行，并无弊端。记得十年前，潮州八邑风灾，商会发起筹赈，当时由林义顺君任主席，捐款者最多二千元，弟不分畛域，亦捐二千元，惟二周后，即有纠纷发生。有人在外，另设机关筹赈，林君被人大骂，事固受阻。五六年前，水灾募捐，亦由商会办理，捐得多少，弟殊不知，惟终发生弊端，有人假单，不知捐去多少，然终破获，拘入警署，中间有人拟使入狱，有人以如此一来实属不雅，其后如何，不复记忆。于此可见此次委员会在怡和轩召开二次会议，至三十余人，不及全数委员之三分一，论者谓为地点不合，改在商会举行，盖望出席人数增加。然弟所知，商会会员五六百人，年开会员大会一次，出席者不过四五十人。又，商会董事三十二人，开会时，出席者亦不及全数之三分一，有时亦至流会，若谓怡和轩为俱乐部，须知我人献机与南京励志社，励志社亦蒋院长所组织之俱乐部。实则，以此种种，皆因国民程度低下，有以致之，与地点曾无关系。

       又有一事，言之不恭，惟望诸位原谅，盖即彼等对弟捐五百元一节冷讥热讽是也。弟以无力，捐五百元殊少，对会不住，对诸位也不住，惟谦益饼干厂所捐二千元为何人所出，弟连此二千元一总计算，亦然不见得太对不起。惟弟困难，弟对集美，厦大，每月尚须负担五千元，此为不可少者，其中三千元为直接替集美负担，二千元则间接替厦大负担。所谓间接，即前因此间公司为有限公司，每月仅能津贴五千元，厦大不足开支因由专理厦集校务之集通号代借一十余万，以资应付，此款今日须还，母利已还大半，目下每月拨还二千。厦大前在本属捐款，共得二十七八万，即收得者约二十万，其余看已无法鸠收。然此二十万元，维持厦大经费，不足二年，又安有余资清偿债项。至弟维持二校，自知甚是笨拙，其目的一为使华侨知重教育，一为发展闽南教育，事虽笨拙，惟笨拙愿望，亦每有一二分可以达到。民元至今，纷乱不已，惟弟有一信念，即信中国纷乱，为过度时之必然现象，二三十年后，国家必可发达……。

**西安事变电陕请保蒋氏安全**

**原电载南洋商报15.12.1936**

       西安张汉卿先生伟鉴：贵部哗变，蒋院长身失自由，消息传来，侨情惶惑。以为张先生与蒋公交谊至深，且共患难，今遽出此，当非本意，尚望尽力设法，迅释蒋公，推诚合作，以复国仇，毋为摇及国本之事，而启纷乱割裂之机，国家幸甚！民族幸甚！临电不胜迫切之至，盼覆。

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陈嘉庚叩

**西安事变星洲侨民大会上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24.12.1936**

       各位，本日之侨民大会，筹备不过数日，请参前发起发出之函，计一百四十封，接得覆函一百零三封。参加者多于西南异动，及购机寿蒋两次侨民大会。有人以为大会为怡和轩俱乐部召集，似乎不当，依理应由华侨总机关召集云云。记得距今三十年，光复以前，新加坡尚无所谓中华总商会，或其他相当之机关。所有救国之事，多由怡和轩为之。光复以后，怡和轩乃本初志，继续办理。所谓见义勇为，不敢客气是也。再如槟城有平章会馆，有中华商会，惟救国之事，则多由阅书报社为之。若言总机关，怡和轩部友，向无省界帮派之分，盖亦一总机关也。此次西安叛变，轰动全世界，事之严重，民国以来无出其右者。今日之事，诸君应加注意之事有三：（一）此事发生，南京来电，三番五次。私人方面，如张永福、萧吉珊、李振殿先生等接得国府电报，十次八次，报告一切。昨日京方来电新国民日报，至有着我人开会表示拥护中央者。查华侨散居海外，多至千万，而以南洋各处为最多。新加坡则为华侨中心。来电三次五次，十次八次，盖为重视新加坡之华侨。而我华侨岂可将所有来如雪片之电报，置诸不闻不问，而不有何表示耶。（二）我国至光复至今，凡廿五载。此次西安叛变，最为严重。大凡变政之初，必有一度纷乱时期，则群雄逐角，你争我夺。经过长久之纷争后，十年或二十年，优胜劣败，能为吾人之领袖者，乃渐可见，所谓叛荡识英雄是也，足见得一领袖殊非易易。而今吾人认其有足为吾人领袖者，则惟蒋委员长而已。蒋委员长，不但为吾人所尊重、敬服，世界各国，亦莫不称许。当此国难方殷，外侮日亟，张学良倒行逆施，劫持蒋委员长，又岂可使各人缄口无言乎？设若此也无言，彼也无言，则国民行见失去人性，尚何国家之足道。设能彼此宣言，声罪致讨，彼学良虽虐，想亦可以稍稍敛跡。国民之责任，亦于是可以言尽。若言国民责任，记得德国赛尔投票，一居上海之年老德妇，因欲亲投一票，不惜远道返国，其尽忠国家，又何如乎？（三）古人谓“多难兴邦”，多难之所能兴邦者，因能发奋图强也。多难而反不能发奋图强，邦又乌能兴哉？此我人今日，应为警惕者也。此次张学良所提条件，抗日容共联俄，俱极荒唐，万万不能办到。在不说明此事之可能与否，应先叙述蒋张之关系。距今七八年前，北伐军抵济南，为日所阻，时张作霖逃出关，于途中为日人炸毙，张学良闻耗，乘飞机返奉天坐镇，乃得安然。张作霖死后，羽党分亲日与拥中央二派，杨宇霆即亲日派，张学良突然枪毙杨宇霆之后，表示拥护中央。日人思与制止，但张之志已决，卒换青天白日旗。不久蒋张阎北京会议，驱逐苏俄，引起黑龙江中俄之战。时俄兵不过一万八千人，飞机亦仅十八架，东北军数逾三十余万，俄军卒能将东北军杀得落花流水，足见东北军之不能战。东北军既无力胜俄，谓其有力抗日，此殊滑稽也。夫日之强横，俄犹让步，彼谓抗日，岂非欺人自欺之语耶。至于容共，更为笑话。设所欲容之共，若为真正共产，则犹自可。其实中国目前共产党，均为土匪，全属土匪之共产党谓有可容，岂非笑话。至于联俄，更觉荒唐。俄与日虽亦处于敌对之地位，惟对我态度则有殊。日每乘我内乱，兴兵人寇，俄则望我强盛，而后共立一条战线，联合对日，苏俄方望我发奋图强，岂望我即战日耶，则张之高唱抗日容共联俄，亦不过骗人耳矣。

**陈嘉庚电汪精卫请拒绝与日言和**

**原电载南洋商报23.10.1938**

南侨筹赈会主席陈嘉庚，因鉴各报所载外电，传汪精卫氏对路透社记者发表和平谈话，昨急电询汪氏，其原文如下：

精卫先生勋鉴：敌暂时得意，终必失败。路透社电传先生谈和平条件，侨众难免误会无抗战到底决心。实则和平绝不可能，何若严加拒绝，较为振奋人心也。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叩养

**西安事变星洲侨民大会上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24.12.1936**

       各位，本日之侨民大会，筹备不过数日，请参前发起发出之函，计一百四十封，接得覆函一百零三封。参加者多于西南异动，及购机寿蒋两次侨民大会。有人以为大会为怡和轩俱乐部召集，似乎不当，依理应由华侨总机关召集云云。记得距今三十年，光复以前，新加坡尚无所谓中华总商会，或其他相当之机关。所有救国之事，多由怡和轩为之。光复以后，怡和轩乃本初志，继续办理。所谓见义勇为，不敢客气是也。再如槟城有平章会馆，有中华商会，惟救国之事，则多由阅书报社为之。若言总机关，怡和轩部友，向无省界帮派之分，盖亦一总机关也。此次西安叛变，轰动全世界，事之严重，民国以来无出其右者。今日之事，诸君应加注意之事有三：（一）此事发生，南京来电，三番五次。私人方面，如张永福、萧吉珊、李振殿先生等接得国府电报，十次八次，报告一切。昨日京方来电新国民日报，至有着我人开会表示拥护中央者。查华侨散居海外，多至千万，而以南洋各处为最多。新加坡则为华侨中心。来电三次五次，十次八次，盖为重视新加坡之华侨。而我华侨岂可将所有来如雪片之电报，置诸不闻不问，而不有何表示耶。（二）我国至光复至今，凡廿五载。此次西安叛变，最为严重。大凡变政之初，必有一度纷乱时期，则群雄逐角，你争我夺。经过长久之纷争后，十年或二十年，优胜劣败，能为吾人之领袖者，乃渐可见，所谓叛荡识英雄是也，足见得一领袖殊非易易。而今吾人认其有足为吾人领袖者，则惟蒋委员长而已。蒋委员长，不但为吾人所尊重、敬服，世界各国，亦莫不称许。当此国难方殷，外侮日亟，张学良倒行逆施，劫持蒋委员长，又岂可使各人缄口无言乎？设若此也无言，彼也无言，则国民行见失去人性，尚何国家之足道。设能彼此宣言，声罪致讨，彼学良虽虐，想亦可以稍稍敛跡。国民之责任，亦于是可以言尽。若言国民责任，记得德国赛尔投票，一居上海之年老德妇，因欲亲投一票，不惜远道返国，其尽忠国家，又何如乎？（三）古人谓“多难兴邦”，多难之所能兴邦者，因能发奋图强也。多难而反不能发奋图强，邦又乌能兴哉？此我人今日，应为警惕者也。此次张学良所提条件，抗日容共联俄，俱极荒唐，万万不能办到。在不说明此事之可能与否，应先叙述蒋张之关系。距今七八年前，北伐军抵济南，为日所阻，时张作霖逃出关，于途中为日人炸毙，张学良闻耗，乘飞机返奉天坐镇，乃得安然。张作霖死后，羽党分亲日与拥中央二派，杨宇霆即亲日派，张学良突然枪毙杨宇霆之后，表示拥护中央。日人思与制止，但张之志已决，卒换青天白日旗。不久蒋张阎北京会议，驱逐苏俄，引起黑龙江中俄之战。时俄兵不过一万八千人，飞机亦仅十八架，东北军数逾三十余万，俄军卒能将东北军杀得落花流水，足见东北军之不能战。东北军既无力胜俄，谓其有力抗日，此殊滑稽也。夫日之强横，俄犹让步，彼谓抗日，岂非欺人自欺之语耶。至于容共，更为笑话。设所欲容之共，若为真正共产，则犹自可。其实中国目前共产党，均为土匪，全属土匪之共产党谓有可容，岂非笑话。至于联俄，更觉荒唐。俄与日虽亦处于敌对之地位，惟对我态度则有殊。日每乘我内乱，兴兵人寇，俄则望我强盛，而后共立一条战线，联合对日，苏俄方望我发奋图强，岂望我即战日耶，则张之高唱抗日容共联俄，亦不过骗人耳矣。

**陈嘉庚电汪精卫请拒绝与日言和**

**原电载南洋商报23.10.1938**

南侨筹赈会主席陈嘉庚，因鉴各报所载外电，传汪精卫氏对路透社记者发表和平谈话，昨急电询汪氏，其原文如下：

精卫先生勋鉴：敌暂时得意，终必失败。路透社电传先生谈和平条件，侨众难免误会无抗战到底决心。实则和平绝不可能，何若严加拒绝，较为振奋人心也。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叩养

**关于和谈与抗战到底问题陈嘉庚**

**再忠告汪精卫副总裁**

**原电载南洋商报27.10.1938**

精卫先生勋鉴：有电计达，顷接国内可靠消息，先生主和甚力，事虽绝不能成，难免发生磨擦，淆乱视听。今日国难愈深，民气愈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继续抗战，终必胜利，中途妥协，实等自杀。孰利孰害，彰彰明甚。若果和平，试问谁肯服从，势必各省分裂，无法统摄，不特和平莫得实现，而外侮内乱，将更不堪设想，坐享渔利，惟有敌人。呜呼！秦桧阴谋，张昭降计，岂不各有理由，其如事实何哉？先生长参政会，犹记通过拥护最高领袖抗战到底之议决案否？倘态度骤变，信用何在？二次之会，又何必开？海外全侨除汉奸外，不但无人同意中途和平谈判，益且闻讯痛极而怒，料国内群情亦必如是，今万乞俯顺众意，宣布拥护抗战到底，拒绝中途妥协，以保令誉，而免后悔，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叩十月廿六日

**陈嘉庚在第二届参政会议之通电提案**

**原文载南洋商报18.11.1938**

参政员陈嘉庚提案为：在日寇未退出国土之前，公务人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注一）

**请通缉汪归案**

**南侨筹赈总会主席致电蒋委员长**

**原电载南洋商报1.1.1939**

       按南侨筹赈总会陈主席，昨晚为报载汪精卫所发狂谬汉奸宣言，特急电重庆蒋委座，请宣布其罪状，通缉归案，以正国法，其原电文如下：

       重庆

       蒋委员长钧鉴：汪精卫甘冒不韪，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跡，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我公庐山宣言，抗战到底，全国拥护，已成抗日铁案，中途妥协，等于灭亡。汪固深知此义，最近参政会决议公务员中途言和，即为汉奸国贼。汪身居议长，岂竟充耳弗闻，乃敢弃职离都，背党叛国。殆谓南京傀儡，已首席高悬，非彼莫属耶。此而不诛，何以励众，更何以根绝效尤。敬乞我公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八百万华侨，拥护抗战到底。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叩世（卅一日）

**闽省光复与新加坡福建保安捐**

**原文载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上册页二**

       我国旧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即新历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民国光复。时闽省于近日间亦闻光复，其时中外消息尚乏灵敏，唯新加坡路透电有传报。本坡闽侨乃在天福宫福建会馆开会，组织保安会，举余为正会长，筹款救济闽省及维持治安。即发电福州问黄乃裳君“闽省是否光复？都督何人？此间已成立保安会，筹款救济，覆。”越日黄君回电云“全省光复，都督孙道仁，需款急，请速汇。”即汇去国币二万元，并电云：“厦泉漳素多匪，乞维持治安，款可续汇。”越日孙都督回电云：“款收，漳泉已派某大员负责安全，请再汇巨款以应急需，至感。”月余之间，计汇去二十余万元。盖光复初，库空如洗，民心动摇，二万元收后，立即宣传“南洋新加坡汇来二十万元，尚有百万元可接续汇到。”云云。由是民气更形兴奋，各处地方安定如常，至全省光复，只福州小有纠纷，立即平息，死伤甚寡。时南洋华侨爱国风气未开，故他埠闽侨未有响应捐汇。孙中山先生自欧洲回国途过新加坡将赴上海，曾言到国内时如私人需款可否帮助，余许筹五万元。其后来电告予，将赴南京需费，予即如数汇交。

**陈嘉庚在槟城与吴铁城专使谈闽省政治**

**原文载南洋商报26.12.1940**

       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于廿日由仰抵槟，而奉命宣慰华侨之吴专使铁城，则于二十一日抵步。陈吴两氏，均受槟城侨胞热烈欢迎，情形已志前报。陈主席已于廿二日晨离槟，前往吉打属。当吴专使抵槟之首晚，陈主席曾先以电话告知吴专使，旋晤吴专使于桂林庐（林连登洋楼），十时晤面，坐谈约一小时。其间所谈述者系关于闽省问题，陈氏关心闽民之疾苦，是以异常注意闽政之能改善。其与吴专使之谈话，当为一般侨胞所欲知者。兹为纪述如下，以告关心闽省情形之读者。

       陈吴会面时，互相寒暄，陈氏谓与吴氏相别，迄兹三个月，称赞吴氏之精神更佳，彼此均甚客气。继而开始谈话，陈氏称，本拟由港返星，嗣因滇缅公路有需要改善，及再经一番之视察，曾得蒋委座之同意，饬派工程师，交通处等部人员，到滇缅路共相磋商一切，故改由仰光乘轮返星。

       吴专使问 陈主席此次返国考察，观感若何？何省最佳？何省最坏？

       陈氏答 本人所经十四五省，费时约九阅月，考察所得，各省均有相当进步，情形甚佳，惟福建一省印象最劣。

       吴氏问 所谓最坏者，究为人事上做不到歟？抑系时间上所不允许歟？

       陈氏答 全非时间上问题，亦非人事上做不到。例如加重田赋，统制运输，设立贸易公司与民争利，及抽调壮丁之不得其法，凡此既非积习，欲加改善，殊非困难。田赋本为每年六百万元，于本年十一月一日起，实行加至七八倍，达四千余万元之巨，使民叫苦连天，不知死所。

       吴氏问 此种增加，如何收法？

       陈氏答 本人亦莫明其妙。

       关于统制运输事，吴氏谓或恐资敌，不得不尔。

       陈氏答 既非边境之区，自无资敌之可言。且统制运输若是严酷，虽利用牛马挑运，人力挑运均不准许，如一人挑运五十斤重之货物，欲过一乡，亦被目为犯法。吴氏对此，亦为默然无语。陈氏继称统制一事，在战时非为不可，然政府之设有运输队，亦在辅助人民之不及。他省运输等等，政府不加干涉。独闽省人民，并人工之挑运，亦在被禁之列，此为本人所亲眼看见，亲历其境者。

       吴氏问 陈先生此次入闽，曾否与省主席陈仪晤及？

       陈氏答 已会过矣，然所提及要求改善之事，如统制运输等，陈仪认为非若是统制不可，是其无诚意接纳，可想见矣。关于徐学禹之为人，据吴氏所称，情形亦略知之，陈氏谓以徐某一人，一身而兼十二职，怎怪闽民之痛苦哉。

       吴氏谓 由本省人而任本省职务，较为妥善，盖有乡党制裁，俾可范其行为耳。

       陈氏答 闽省政要，都为外省人。

       吴氏称 陈氏与蒋委员长来往电文，概有阅及。则在数处开会之演词，亦有寓目。吴氏并谓蒋委员长既云地方之政情，如有所见，自可直接向中央报告，最好此类之言，不必对外发表，期免对于筹赈方面，有所影响。

       陈氏答 倘政府能予接受，有所效力，则本人今日，亦何须再多提及之乎？至于筹赈工作，绝不因而受影响。本人每次发表谈话，特别声称，请各界应更加努力捐输，切勿因此而灰心馁志，盖救国捐输，乃为公事，而福建只为局部问题，暂时使人满意，终有改革之一日。故对于整个抗战前途甚抱乐观，在最后胜利尚未达到之日，我人必须加倍努力，必不因是而停止应尽之天职也。

       陈氏复谓 福建种种，确难使人满意，岂能强不好而妄说其好乎？

       吴氏称 或者因侨胞对于国内政治之希望过奢，故对闽省情形，而感失望。若大体上不错，其他失妥之处，自可渐求改善，盖为政者非一朝一夕可能做到也。

       陈氏坦然答曰 我人对政府不敢过事苛求，惟望政府当局，体恤海外闽侨之关切家乡，在可能范围，对于不善之处，加以改善，俾海外闽侨，稍得安心，已感满足矣。

       吴氏称 彼本人亦曾电达陈仪，提及此事，并谓对于陈氏在泉州、桂林、及槟城三处所发表之谈话，均阅及，但觉甚为难过耳。

       最后谈及关于滇缅公路事，陈氏谓该处设有五个公司办理交通事务，未免多费人员及费用，若由一个公司办理，岂不较佳。最后吴氏询陈氏抵星日期，因吴氏来星时，仅晤代督，故决再到星洲，拜会总督汤姆爵士，当再与陈主席在星从长讨论关于闽省之种种改善问题云。

**回国考察观感**

**新加坡各侨团欢迎会上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6.1.1941**

**一 考察经过**

       本人此次归国，乃以南侨总会主席地位，代表全南洋华侨对最高领袖致敬，对军政长官及全国军民致慰劳，除在重庆分配慰劳团出发，与创设制药厂而外，此行最关心者，尚有三项，一、军事，二、政治，三、团结问题。军事方面，向蒋委员长，何参谋长，白副参谋长，及各战区正副司令长官，参谋长总司令访问。政治方面，向中央各院部及各省行政长官社团领袖，报界记者等访问。团结问题，则在重庆访问国民党领袖而外，又往陕北延安会见中共领袖毛泽东先生、朱德将军，并其他重要人物。以上三事，本人在未回国之前，原已留意及之，如以未曾宣布者，恐战时交通不便，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兹者，愿望已达，谨将一切经历，概括报告如次，其中所述，虽曾在南回途中，如缅京、仰光、马来亚各地发表，惟时间匆促，略而不详，且本人非专家，所见难免肤浅，而风尘仆仆，走马看花，又多疏漏，但较一般报纸记载，或出于道听涂说者，自度当较真确。顾考察原非易事，立言尤贵忠实，一、须自尊人格，二、须无党派关系，三、须无权利企求，庶能作公平之评断，而不负侨胞之期望。军事方面，全国兵员，比较抗战前，已增加两倍，军械配备亦比前充实，机械化部队，更甚完备，其中详细状况，各处演讲，报纸多有登载，今日毋须多谈。各省自抗战以来，征调壮丁七百余万人，逐日训练，所到各城市触目皆是，桓桓赳赳，生气蓬勃，各战区将领，精神饱满，绝无已往军阀气习，类此现象，实令人无限感奋。政治方面，各省分别言之。

       四川 新兴工厂林立，矿业勃兴，如煤炭产量，比较战前已增十倍，矿盐产量，前每年仅五百万担，现可增至一千万担。农产品更形发达，其他如交通，治安，禁烟，均成绩卓著。教育方面，民廿八年全省教育费支出五百万，廿九年预算增至一千万元，本年度按再增至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元，教育部规定由廿九年度起，五年内普及全国教育，而四川则拟缩减于三年内完成之，其进步可以想见。前军阀时代，所有地方军人势力，现经收归中央，拥护抗战到底。

       甘肃 抗战前全省岁收七百万元，鸦片税占五百万元，其他仅二百万元。近年以来，鸦片税取消，而提倡生产，整理赋税，根绝中饱，民廿八年收入一千二百余万元。甘省宗教信仰，虽各不同，然民情融洽一致，信赖省府，拥护中央，故地方安堵。他如教育交通，工业农产，亦有相当进步，抗战后征调壮丁，办理得法，服务前线，极其踊跃，其政象之佳，可以概见。

       青海 自马主席步芳接任以来，对财政颇多整理，吏治亦尚修明，各县公路电话均可通达，民风淳朴，官吏廉洁，拥护中央抗战，备见忠诚。全省民众仅百余万人，回教徒居多，抗战以来，调赴前线骑兵，已达三师之众，该省素称产马区，现正大规模训练战马，以备补充。本人行抵青海，已在午间，当局召集各界于翌晨六时，在省府大操场开欢迎会，时间甫届，军民鹄立者五六千人，秩序整齐，精神活泼，边区有此佳象真是可敬。

       陕西 该省烟患极深，民众怠惰，生产衰退，百业凋残，近年以厉行禁烟，生产渐进，百业渐兴。汉中各地，向多土匪，历久未能肃清，抗战后亦已销声匿跡。乡村民众生活，素多穷苦，十来岁男女，无裤可穿，近则稍足自给。交通事业，亦称进步。上述禁烟剿匪及交通各端，皆为中央势在必行政策，而战事推行尤力，所可惜者，省府行政长官德望未孚，难资表率，西安市虽密迩前线，而奢侈娱乐之风仍炽，醉生梦死，似乎不知国难之当头。

       陕北延安，为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前时延安域内，亦颇繁荣，居民二万余众。抗战后，敌机屡来轰炸，全城夷为废墟，现已无人居住，城郊四面多山，遂从山下或山麓间，开辟马路，穿凿土洞，以为住屋，每洞深约三四十尺，阔十多尺、高亦如之，所有政府机关以及医院学校居民，概在其中，敌机无法轰炸，故亦久不再来，民众安居乐业，衣服亦尚整洁。西安事变，蒋委员长曾允准划定陕甘宁边区二十一县为中共治理地，仍归中央统辖，而中共即取消原有政策，奉行三民主义，边区民众产业仍属私有，三年间新垦荒地，三百余万亩，亦系私人产业，商人贸易自由，市肆繁盛，与其他各省县同，卫生教育各费，概由政府负担，公务人员士兵学生，每年由公家发给寒暑雨季衣服各两套，上下一律，绝无等差。长衣马褂，唇红蔻丹，旗袍高跟鞋，则绝跡不见，风俗质朴，生活简单，宴乐应酬，更谈不到，婚姻自由，男女有别，县长民选，公务人员舞弊上五十元革职，五百元者枪毙，每天除工作外，须读党义书籍一点钟，每星期千人集合露天“上大课”一次，听取名人演讲，闻其收取党员，亦颇慎重。

       山西 该省在军事上所处地位极其重要，敌人初意吞併全省渡过黄河，直迫陕豫，威胁川鄂，卒以第x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极力死守，在高山峻岭中开洞驻军，出没无常，使敌人不敢正视。省内市镇，虽多沦陷，然敌人势力，不能越出城郊及铁路线之外，各处民众，于协助杀敌之余，均能努力生产。

       河南 该省征调壮丁，约在百万人以上，为全国冠，本人沿路所见壮丁，日以千计。第x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身经百战，战无不胜，保卫中条山声威尤振，有福将之誉。卫则甚自谦逊，谓临事谨慎而已，每一阵地，必亲临察勘，大而一山一水，小如一池一石，均不疎忽，谋定而动，故所向有功。河南田野广大，农民勤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尚觉安定，该省近出纺纱机，一人工作可抵三十人，各县皆相仿制，纺织业故亦甚盛。洛阳为古代九朝都会，古蹟名胜，触目皆是，前吴佩孚练兵于此，植树四万万株，郁郁苍苍，令人可爱。

       湖北 本人由洛阳坐大卡车往湖北老河口时，途经博望坡及南阳，在卧龙岗午饭，参观三顾堂诸胜蹟，沿途桥梁车路，多已破坏，乃别从间道驶过。其时襄燮宜沙，战事剧猛，虽风声鹤唳，然民心安定如恒，其他教育生产，事业亦多进步。第x战区李司令长官宗仁，渡河来会，欢谈竟日。老河口系汉萧何封邑，居武汉上游，为豫陕鄂货物集散地，商业颇称繁盛。

       云南 前盛产鸦片，每年烟税可收三千万元，禁烟后，烟税取消，别征消费税，年入一千七百万元，近来中央亦令停止，改予补助。该省土地广大，农产丰富，新辟滇缅公路，两旁山地，亦皆种植，其农业之进步，可以相见。矿产如锡，盐铜煤等，力事开採，产量日增。教育大中小学校林立，沿海著名大学，亦多移此，商业繁荣，蒸蒸日上。抗战后出兵杀敌者十余万人，而后方在训练中者，亦数万人，滇缅公路开工时，征发民工十五万人，七个月完成，中外赞叹，近因敌人进据安南，我国乃以边境陈兵三十万，待机出击，由龙主席兼任指挥。

       贵州 该省政治措施，颇重实际，省参议会开会，议员质问时，态度轩昂，有拍案者，省当局和颜接受，不以为忤。省参会所组织县政访问团，出巡各县，省府亦甚予以便利。贵州原属贫省，前惟盛产鸦片，年收税款千余万元，禁烟后，农产增多，人民安定，交通教育及工业，亦多进步，提倡节约，禁止宴会，其努力求治，有足多者。

       广西 广西，前有范模省之称，七七事变，出兵二十余万，李白黄，和衷共济，埋头苦干。黄主席旭初，清勤正直，虚怀若谷，极为僚属民众所拥戴，在任之久，为全国各省主席冠，布衣淡饭，家无仆役，黄夫人每清早亲到市场买菜，十年如一日，其治家朴俭，甚为人所乐道。广西自抗战以来，征发壮丁，全数达六十余万众，而省内农产品，仍有剩余，可供广东一部份之需要。普及教育，提高文化，兴办水利农林，及其他各种实业，著有成绩，交通事业进展亦速。自广州南宁失守，空袭警报，几于无日无之，而军民合作，精神极佳，此次南宁收复，驱敌人于境外，实收功于空室清野，尤为难能可贵者也。

       湖南 湖南，土地肥沃，农产丰富，水陆交通，战后虽多破坏，各种事业，仍然迈进，长沙焚毁，衡阳惨炸，南昌失守，敌人野心勃勃，视该省为俎中肉，然第x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攻守得宜，敌卒不逞，人民依然安居乐业。其他教育文化，亦有可观。秋潮涨时，敌人扬言将再以战舰大举来犯，而薛长官严阵以待，结果敌人阴谋，竟无法实现。

       广东 民物富庶，然自广州失守，邻邑亦多沦陷，粮食缺乏，敌机威胁，一日数惊，损失之大，为西南各省最，民众颠连困踬，触目伤心。自第口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省主席李汉魂，通力合作，军事政治，相辅而行，遂于前年造成粤北大捷，人心稳定，各种事业，逐渐恢复旧观，革故鼎新，且见蓬勃气象，杂粮食品供应，全年尚欠两个月，经省府鼓励生产，由去年九月一日起，公务人员，自省主席以下，每星期亲下农田耕作一小时，以资倡导，并订九月半起，禁食白米，而食糙米，据建设总长预算，如此做去，本年春后，广东粮食，便可自供自给，不虞缺乏。

       江西 前为共军所据，连年烽火，糜烂不堪，人民死亡，财产损失，不可胜计，熊式辉主席就任以来，悉力整顿，兴利除弊稍稍恢复，建设厅长杨绰菴，在职年余，创办工厂三十余所，本人最注意者，如麻袋厂，所出麻袋，品质优良，不亚于印度米袋，又如染料厂，已化制成功，每天可出数担，此两种出品，为全国所未有，将来利益之大，莫可限量。教育文化，相当发达，中小学而外，普通师范学校，亦有八所，中正大学，经已成立，农产以米为大宗，可以兼供闽粤，熊主席虽为军人出身，然温文儒雅有学者风度，殊难得也。

       浙江 东南富省，浙亦其一，沦陷九县，县城虽失，而城外仍在我掌中，各县县长依然在职。农工商业，比前更进，文化亦不失战前状况，交通事业，除原有舟车外，省府更特备人力车五六千辆，每辆可载重四百斤，以辅助汽车之不及。沿途所见妇女肩挑农作，一如男人，为数不少。抗战前省库每年收入不上三千万元，财政所有时仅存款十余元，战后一经整顿，如民廿八年增收至五千余万元，财政厅经常存款四五百万元，其进步可知。敌人虽封锁我出入口货物，间亦有人投以私利，而得自由转运汽车煤油，敌舰且可私售。

       福建 现驻国防军口师，自金厦沦陷，海道而外，内地则甚安全，剿匪亦颇著功效，惟沿海渔船，惨遭焚炸，损失不少，而民气旺盛，拥护抗战，实不后人。无如年来苛政百出，民不堪命，为各省所无，征发壮丁，则用捆绑押解，如上刑场，前后征发一十五万人，逃走死亡，无数目可考。省营贸易公司，与民争利，一物之征，如旧式账部，亦仿制二十五万本，图向南洋推销。更在上海香港，开设和济商行，私营外汇，运输公司统制全省运输，自挑数十斤之货物，亦属违法，三日路程，而寄运两月尚不能到。百物昂贵，米粮尤甚，藉名军粮，贱买贵卖，月获巨利百万元以上。田赋改征实物，折合米价，平均价加七八倍，以前每年收入六百余万元，自去年十月一日起加征，突增至五千万元，公务员营私舞弊，相习成风，了不愧畏，苛捐什税，指不胜屈，教育文化，如普通师范学校，全省仅设一所，学生八百名，不足一县之分配，其政策乖谬如此。

**二 总观感**

       中央官吏清廉苦干者固多，而尸位素餐营私舞弊者，间亦难免。以我国数十年政治积弊，欲期一日澄清，自非易易。去年四月二十六日，全国经济学社举行年会于重庆大学，主席马寅初先生邀本人演讲南洋华侨投资问题，本人略言国内盼望华侨资本家回国投资，所以空雷无雨者，实因未明侨情。以本人见解，华侨资本家当分两种，由拥资数十万元以上者言之，一为侨生，一为国内来此久居者，侨生多未受中国教育，国情未谙，何肯回国投资，至国内来者，能成为资本家，年多四五十岁以上，欲望其投资回国，重新奋斗，亦为人情所难。但抗战决能胜利，建国决能成功，则华侨回国投资问题，实不必悲观，盖华侨能回国投资者，非惟资本家而已，一般中产阶级，尤为可能，如家产在十万元以下或略积数千元数百元者，全侨每百人中实占九十九人，每人如投资国币二千元（新加坡币三百元），一万人可二千万元，十万人可二万万元，全华侨至少数十万人，有此资力，其成效岂不宏伟。然欲依此吸收华侨资力，须有健全股份公司之组织，犹忆晚清时代，福建有漳厦铁路，广东有粤汉铁路两股份公司，经营失败，华侨损失数千万元，由是华侨对祖国投资，遂视为畏途。今后抗战胜利，华侨爱国热情，必更增进，投资建国，必更踊跃，但须政治良好，社会安定，无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阻碍进行，始能达到目的。马氏闻言，似有所感，再上讲台，痛陈国家在此国难严重之时，而管理外汇当局，尚且私营外汇，逃避资金，不惜危害国家猎取私人利益，纵加获数千万元，无非留贻子孙买棺木耳。言时悲愤填胸，几于声泪俱下，近日报载，马氏曾揭发中央政要某人在银行存款若干万万元之事，想系张大其词，按之当日马氏并未作是言。国民党领导全国抗战建国已三年余，内外拥护，转危为安，最后胜利，确可属我，绝无问题，唯建国前途系于政治，未有政治不良，而建国大业得以完成者。国民党创造之中华民国，伟大功绩，永不磨灭，若孜孜不已，修明政治，兴利除弊，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党誉更隆，党权更固，发令施政，无往不利，民心悦服，如水就下矣。中共自西安事变后，已放弃其共产政策，奉行三民主义，顺民意之所向，推诚合作，审国情之所宜，改弦易辙，抗战以来，军队由三师增至二十余师，所辖区域，由陕北二十一县扩大至河北全省及山西山东江苏安徽各一部，虽属沦陷区，然敌人势力不出城外，其区域之广，自有中共历史以来所未有。唯无军械厂，军火缺乏，内不能制造，外不能输入，据朱德将军言，所有军火除中央供给外，一部份夺自敌人，一部份得诸民间，然军械虽乏，组织民众，运用宣传，力量亦不减于枪炮也。据陈诚部长所办青年团训练青年服务战地，约十万人，受训者，多出自动，中学毕业生，或大学生，皆有之，训练期间，两三个月不等，受训完毕，即派往战地鼓励士兵，组织民众，团结抗敌，并进行识字运动，每月俸给十五元，膳食在内，刻苦耐劳之精神，殊堪钦敬。胡宗南将军所主持之军分校，学生二万余名，亦皆自动入学，资格最低为高小毕业，或同等程度，生活简朴，训练严格，成绩优异。举此二者而言，足见今日祖国青年，咸具牺牲之决心，在此抗战期间，一致枪口对外，虽肝脑涂地，亦所甘心，如欲枪口对内，谁肯服从乎？全国各级将官精神无不奋发，公忠诚恳拥护领袖抗战到底，国共间失感者，不过少数人，但枪口对内，自相残杀，则绝对无人。各长官员，除陈仪一人外，其他大都奉公爱国，领导民众，奋发图强，至可敬佩，阎锡山将军言，国民党政治如办得好，共党自不足虑，否则，寻瑕抵隙者，当不止一共党也，金石良言，令人铭记不忘。本人代表全南洋侨胞回国考察，凭良心说公道话，愿与国人共勉之。

**福建内幕**

**陈嘉庚在新加坡闽侨大会上报告**

**原文载南洋商报20.1.1941**

       今日用本福建会馆名义，假座商会召开闽侨大会，以便本人报告考察福建详情，凡我闽侨，均可参加，假座总商会者，因本会馆礼堂太小，此外更无相当场所，恐人多难容耳，此会只限于本人报告，而非欲有所讨论，如要求改善福建政治，当再看多少时间，国内情形如何，有无改变，然后打算，因本人前日已接重庆蒋委员长之覆电，林主席之覆函，且已将案交行政院及监察院办理，故须稍待也。

       在未报告之前，我要声明两件事，一为我前之同情陈仪，乃以其出于中央，蒋委员长所任命，其时亦未深闻其对闽省政治有何苛刻害民之情事，且反对陈仪者，按其言论，不外责其访问台湾，（编者按陈仪于民国廿四年秋乘舰往台湾，庆祝日本併吞台湾四十周年纪念）雇用日人探矿，（编者按陈仪于民国廿四年冬雇用日本参谋本部测量队廿七名测量福建全省公路矿山港湾水利及军事要隘）残杀张超（编者按军事委员会福建特务负责人张超因反对陈仪压迫青年妨碍抗战被陈仪枪杀虽经军委会来电制止不顾也）三事而已，海外未明真相，自不便随声附和，一为考察报告，当以实事求是正大光明为怀，如不顾事实敷衍塞责，不负责任，趋附权势，想诸君必不同情。本人负代表责任，归国考察，今既南返，不能缄口无言，言则当不违良心，不贬人格，期不负同侨之希望。本人此次回国考察，不仅注意闽省而已，他省如有此苛政，亦要报告中央，请求改善，惟其他各省，则尚未闻有如闽省之民不堪命也。

       本人三月廿六日到重庆，分配慰劳团出发后，于五月五日离重庆往西北各省，七月尾回来，又往西南东南各省，九月廿四日，始由江浙入福建，闽省府及绥署已于事先派大小汽车两架，招待员两人宪兵二十人入浙江龙泉迎候，是晚宿浦城，越日至南平，会见陈仪主席，只问本身自抗战以来，征调壮丁多少，他答二十五万人，问逃走及死亡若干，答无登记数目可考，旋乃请转达各县，凡本人所到各处，但求节省耗费，切勿铺张欢迎，他亦许照办，在南平数天，已得各方报告，闽政苛惨，民不聊生，举其尤重要者，如虐待壮丁，视若囚犯，贸易公司则与民争利，企业公司则损害农工，运输公司则虐及挑夫，又如假军米为名，贱买贵卖，改征田赋，由三四倍加至十七八倍，摧残教育，施行愚民政策，贪官污吏，遍布要津，什税苛捐，多如毛发，在上海香港，开设和济商行，营私资敌，削弱外汇等，更不胜枚举，然本人犹未递信，乃转往闽北各县考察，经建阳时，见路旁死尸两具，一则全身裸露，同行者言，此即壮丁，因病死而弃，或病不能行而被击毙者，又往崇安，（武夷）邵武，折回建瓯，古田，而至福州，沿途所见，及在福州所知，更为详尽。十月十一日由福州南下，经长乐而后，一路乘轿自福清，涵江，莆田（县城），枫亭（仙游县境），惠安，而至泉州，稍住数天，沿途查访及闻见，又深知各种民间惨况，至此入闽已近一月，所经已十四县，人物接触，多系报界记者，厦大集美师生，社会名流，商界领袖，至舆卒挑夫等等，认为种种事实，可与南平所闻，互相印证。闽省苛政虽多，而本人用函电恳请陈仪取消者，只提统制运输一项，以此事害民最惨苦，而革除却比较容易，若有实效，然后再及其他。廿日离泉州往南安永春，沿途复多有观感，即亲笔函告陈仪，复列七条事实，皆为运输公司害民惨况。本人至南安某处，始悉同行陈延进（省科长）到泉州时，立打电话告知南安县长，令其转戒欢迎人员，勿对本人谈地方疾苦，事缘南安县长拟派四人来泉欢迎，而延进又将他去，故有此嘱。本人在永春致函陈仪，谓贵科长陈延进电告南安县长，冀以蒙敝本人耳目，然本人到处，自有各界来告，何须查问地方官所派之人。函去后，陈仪亦不敢否认陈延进之行为，非出彼意。廿五日过安溪，（集美初高中学校在焉）留三天下同安，至集美，去国十九年，回乡仅此一宵。越日，又经灌口至漳州，一度绕往海澄石码，复回漳州，复将所见所闻，续发三电一函，痛陈运输公司销售，如烧火之柴，每百斤原市一元，统制运输后，升至四元。十一月六日往南靖县，入龙岩，以抵长汀（厦门大学在焉），陈仪派代表三人前来招待，并邀往永安，谓各事可从长计议，乃于十一月经连城到永安，第二度会见陈仪，谈一时许。翌日，参加全省工商品展览会开幕，并应欢迎会欢宴会，本人在各处演讲中，将沿途观感，及民众惨苦，扼要略述，惟已觉陈仪缺乏诚意接受，因在本人将到永安之前一二日，他已在纪念周及报纸上表示统制运输绝对不能撤消之意见。十三日在大田县（集美水产农林商科各校在焉），十四日又回永安，十六日乃由长汀出省境，故乡甫返，又告别离，民生维艰，补救无术，欲依阿取容，则良心实难泯灭，欲批击逆鳞，则家乡不能再入，却顾徘徊，忧郁不堪言状，计回闽已五十余天，历三十县，兹将眼见者八项，耳闻者四条，报告如下。

       （一）虐待壮丁 征调壮丁，因待遇不善，视同囚犯，恐其逃走，乃用绳联缚每队数人或十数人不等，此乃本人在仙游枫亭所亲见者。

       （二）贸易公司与民争利 如南洋商家所用之旧式账簿，竟亦仿制二十五万本，值国币百余万元，本人在福州时，贸易公司主者来见，询如何物色新加坡代售人，要赶旧历年底应市，此物之微犹如此，其他大宗商业更可知。

       （三）企业公司 安溪茶叶。每担採制工资五十余元，而政府定价收买不上五十元，农民屡次亏损不堪，多将久植之茶园，忍痛掘除，改种粮食，而武夷山之茶园，亦因价贱焦荒者不少，乃企业公司反设示范茶叶工厂于武夷山下，人员数十，设处办公，开辟新茶园，触目皆是，闻将栽二万亩，其摧残民生，虚靡公帑如此，此亦为本人所亲见者，其他没收工厂，藉名改善之事，不胜缕述。

       （四）统制运输 贸易公司为与民争利，深恐不胜，乃由省令设运输公司，将全省运输统制，虽挑数十斤自用之物，亦须交运。以一机关而要包揽全省货物运输，法制人事，诸多未备，当然不灵，故阻滞运程，不啻十倍之久，三天货运，两月尚不能到，以故百物昂贵，米粮尤甚。本人于同安路中（英埭头市口海边），见米船五只，每只载米约一百担，系由鼎美社运来，水途仅半天可至，而停留在船已十余天不能起卸，此亦为本人所亲见者，其他利用青红帮情况，另有详文附列于后。

       （五）加征田赋 闽省特创田赋改征实物办法，而各县米价不同，最低须加三倍，最高须加十七八倍，平均全省须加七八倍，全年可增收四千余万元，已自旧年十月实行，大田县人口十一万，素非股实，当时本人与县秘书及商会长等谈田赋事，据谓以前每年五万元，战后加附捐七万元，共十二万元，若照此次增加，全年须增至六十万元之巨云。查征收田赋，手续繁复，经收人最易乘机舞弊，如折银元及大串小串等，颇不易算，故人民每以粮胥之算盘为“圆算盘”，且负担不平，闽省产米区多在后方，米价低，负担自轻，缺米县份皆在沿海，米价高负担重。抗战以来，建筑砲垒，破坏公路，拆毁城堡，就地征料征工，所有义务工作，多属沿海诸县。

       （六）各县加捐 自米粮腾贵，各县公务员原俸不足赡家，乃由省府津贴米资，名曰米津，由县长向民众推派，名目加多，贪污更甚（省内六十余县，县长大半外省人），此外尚有其他各种捐款，本人查诸沿途轿夫及民间所言，每人每月当纳还各种捐税一元三角五分至一元五角，若全省统计，其数之巨，几及二千余万元。

       （七）网罗周密 查省银行在各大城市多设中南旅运社，布置美洁，官民称便，岂知是项组织，特务情报各员，满布四周，所造政治成绩图表，及宣传刊物，到处多有，凡中央及其他机关委派视察人员来闽，大都受其蒙敝。本人入闽数天，便发觉本人言论行动，已有人暗中报告陈仪，本人以责问招待员陈延进，（省府委派），他云是中南旅运社经理所为。

       （八）愚民政策 闽省自民二十五年将私立师范学校，概行禁闭，统归省办，迄至今日仅有普通师范学校一所，学生八百名，每年毕业一百余人，杯水车薪，何能应全省之需求，至于高级中学，省立亦仅三校，初中卒业之有志青年，无路更求深造，其设此愚民政策，以降低吾闽教育文化之程度，用心之毒可以想见。

       以上八条，皆为本人亲身接触之事实，凡拥护陈仪代陈仪声辩者，可将不实之处指出，以明是非。

       （九）贱买贵卖 贸易公司最大营业与最大利益就是军米，凡产米县份，莫不藉採办军米，每担定价十六元，廉宜大半，由省府限额责成县长收买，而县长乘机加派委责区长，区长又委责乡镇长，乡镇长又委责保甲长，层层增加，相率渔利，由是舞弊成风，无米之家，须以钱代。

       （十）政治变作营业 省银行各客户存款三千余万元，发出纸币三千余万元，合计七千万元，贸易公司利用此项资力，积存货物一二千万元，上海香江，更设和济商行，大作投机营业，侵蚀外汇，舞弊资敌。

       （十一）计口授盐 查全国行此法者，仅两三省，虽属中央财政部管理，然地方官长亦应酙酌民情，免民受害，闽之计口授盐，乃出省府与中央盐务局之设计，自计口授盐以来，盐子店未能遍设，产盐之区，反无盐可买，农夫制咸菜时，亦无可能多买，公务员及盐子店则舞弊居奇，民食不足，莫不叫苦。

       （十二）徐学禹之为人 徐前在上海电话局任内，私设新电公司，利用职权，包揽交通部购料贸易，每年获利十余万元，事被上官发觉，受停职处分二年，限期未满，陈仪反加重用，现一身兼十二职，省委而外，如省银行，贸易公司，运输公司，企业公司均任董事长，建设厅财政厅亦由他一手支配，厅长反若其私人记室，大权在握，灸手可热，有太上主席之称。

       以上四条，则为庚所耳闻者，有无多少出入之处，须待详查，然大致无讹，则可置信。

       抗战后全国出兵数百万人，虽青海边区，人口不多，亦出骑兵两三师，独我闽省以前无军事基础，乏军官领导故未有一师一团之名义可以出发。虽已征壮丁二十余万众，乃练成之后，多多少少，则尽送往前线各师团作零散补充，而无整个吾闽兵团。他日抗战胜利后，历史记载，吾闽不免逊色，然出钱如有相当量数，亦不减于出力。南洋闽侨，对于抗战出钱素称踊跃，在此胜利日近之际，尤望更加努力，他日战史记载，可以补我闽省出力之不足，此为吾海外闽侨，应当深切注意者也。

       本人对国家事，向少过问，惟曩年西南异动，背叛中央，攻击陈济棠，近年又以和平妥协，卖国求荣，攻击汪精卫，兹则以苛政如虎，率兽食人，攻击陈仪徐学禹，此岂本人之好事哉，良心上出于不得已耳。

**斥吴铁城高凌百祸侨阴谋**

**陈嘉庚在南洋闽侨大会中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3.4.1941**

       刚才西言先生发表意见，略谓这会是救乡救家的会，是很重要的，兄弟要来补充几句，兄弟觉得这会的确是很重要的，小弟到梧州桂林等地时，晤见福建同乡，他们都感觉到国未亡而省已先亡，小弟觉得这话很对。福建不是亡于外国人的手里的，而是亡于陈仪派手里的。小弟觉得他们要亡福建，是开始于三四年前的，当时陈仪下令取消私立师范学校，集美学校亦被取消在内，a理由是办理不善，小弟就去电教育部向王世杰部长交涉，无效，后来就在廿五年起被取消了，现在全省只有一间师范学校，学生不过八百多人，每年毕业不过百多人，造成福建教师缺乏的恐慌现象。其次全省重要机关，均由陈仪派把持，可以说福建是陈仪派的天下，南洋各埠，相隔遥远，自然不知其详，兄弟以前亦不知其详，所以回去了以后，我才发觉出来，陈仪派是准备亡我省的，他们亡我省的手段是比外国人要来亡我国为更毒辣的。

       今日我们这个会，是很严重的，重庆方面，乏人会帮忙的，虽说有一位林主席，但他不便说话，就算有人说话，亦无甚效力，至于省内更无人敢说，致令福建父老长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国未亡而家先亡的情形，谁不痛心？我们侨胞虽远隔重洋，但这里终究是客居，谁不想于将来回到故乡去，更有谁不对故乡这种惨痛情形而亟思所以拯救他们呢？小弟于离开福建时，曾先后发电呼吁，只觉言微力轻，无济于事，诸位今日应看到南洋商报专电，中央派员入闽审查，是由陈仪电请的，小弟以前累次请令，但至今事隔多月，毫无下文，而陈仪一请便发生效力，足见小弟的力量是有限的。可是诸位要注意，“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的意义，中国决不是属于一省的人，福建不是陈仪派的，福建是福建人的（热烈拍掌），福建土地肥饶，森林畅茂，地又靠近海滨，小弟曾走过十余省，多是牛山濯濯，地多不毛，可以说比福建差得多，而且福建华侨大量寄款回去，他们早认为最理想的殖民地，要是我们不把陈仪派打倒，我们是无法救家乡的，诸位代表，诸位记者，我们须知道今日要救福建，只有我们挺起胸膛，彻底严厉对付他们，不然的话，福建是不会有希望的。我前日在南侨大会中的演说词，内中有说关于高凌百拥汪亲德的话都删削了去，这是不该的，这里小弟要报告的，就是弟于去年春代表南侨总会，到国内慰劳与考察，我曾到西北去，到过山西，到过陕西又到过延安，后来又转回重庆，记得在七月间，国民外交协会派人请我于七月廿五日前去演讲，题目是“西北之观感”，我就本我的良心和我所知道的来说实话，外间传说都说共产党是怎样实行共产并公妻制度，但事实上并不如此，在那里私人做生意的照常，人民土地在耕作私有的地方，秩序亦好，一般生活非常朴素，既没有小偷，也没有叫化子。弟曾对该地当局询有无实行共产政策，据答谓自西安事变，即废止而奉行三民主义，在重庆计有十一家报馆，而完全不登我的演词的，计有五家，还有五家仅登一小部份，另有一家则完全登载。因此，就有人向委员长报告，说我是被共产党包围了，我对这件事并不认为介意，也没有解释的必要，但以后弟到东西南八省考察，就有人打电报给各省长官，说我是同情共产党，但我所经过地方，有人向我提起这事，经我解释，均明白对我同情。其他想运用外交势力，来压迫我，但没有效果，前日我有辞去一切职务的启事，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次南侨大会开会，承诸代表好意劝勉，只好打消辞念。吴铁城在星洲时，对记者谈话，大骂特骂“汉奸”，“口是心非”，他骂的不是别人，正是骂我，只要懂得看报纸的，我想都会明了的，小弟明明知道，但只好容忍，为的他是代表蒋委员的，因恐失国体，不然，我一定给他丢了脸子回去，他当上海市长，薪俸几多，而他居全国财富第九位，陈济棠还在其次，这话是否事实，我不得知。而我所知道的，吴在重庆嘉陵新村新建一所大厦，估计至少在数十万元以上，这钱究竟从那里来的呢？非贪官安有此巨资焉？在战时县长失城逃走，照国法应处死刑，若身居一省主席，于不数日间失去广州省会，反得逍遥法外，大作其官，这又何说？前日高凌百在南侨大会开幕演词，大骂“口是心非”，“挂羊头卖狗肉”，“无党无派是倒行逆施”，这些话在说谁呢，无疑的是针对我和大会代表说的，最卑劣的骂人的话。诸位代表，当然也难堪，我今日要讲的话是有凭有据的话，这里是殖民地，是有法律的制裁的，我所说的话，如果不对，我愿负赔偿名誉的责任，今天迫不得已才说出来的，我说高凌百是“拥汪亲德”的，我这话是有证据的，当汪精卫发出和平妥协，我去电反对，他覆电回护，我又去电劝戒，他又来电不纳，我预备第三电指他为张昭秦桧奸谋，电尚未发，高凌百就来阻止谓，切切不可再电责汪，务必从此停止云云。其拥汪可知，若云该时见事不明，何乃复经一年之后，英德宣战，我认为华侨应表示真实态度，曾发表通告拥护英国正义抵抗，反对德国侵略，高凌百又来表示反对，说我国对德国友谊未断，不应该发此通告。以上两事，居心何在，不问可知。他骂我挂羊头卖狗肉，究竟谁是挂羊头卖狗肉呢？还有一项就是关于中正中学撤消校名的事，据说是高凌百介绍其私友在中正任教，后因不守师道，被学校停职，高凌百含恨，乃冒报中央，捏称该校“办理不善”，予以撤消校名，该校卒不受命，就此一事而言，又岂非大失国体者乎。

**斥高凌百阻碍筹赈募债**

**四月三日南洋闽侨大会中演说**

**原文载南洋商报9.4.1941**

       闽侨大会在四月三日会场中，因菲律宾代表王泉笙自开会数天，未来出席，主席即派代表二人，前往邀请，据王君言，因当地高总领事不参加会议，与菲岛开会体例不同，他故不能出席云云。主席团陈嘉庚氏闻言，则当场表示怀疑王君之说，并宣布未请高总领事参加原因，翌日报纸记载不详，兹将当日陈嘉庚氏所言补录约分为下列各段：

       一、如照王君所述，菲律宾吾侨，凡有开会，必有领事官参加指导，方克成会，则全菲律宾群岛，为吾侨居留较多者，不下数十岛，每岛凡有开会，如无领事官到，则不生效力矣，事实真相，是否如是，此庚不敢置信。

       二、过去马来亚侨胞开会则不同，有如新加坡筹赈会，年开许多次会议，概未尝请领事参加。大凡作事如认为有益者，当然欢迎之，否则，何必画蛇添足。前日南侨筹赈总会开会，固曾请高总领事来参加，乃其致词狂悖荒谬，对大会无益而有损。且自抗战起后，高君对于筹赈及募公债各事，屡有阻挠破坏，故更无须再请其参加，兹庚请以事实言之。

       甲、廿六年八一三沪战发生后，新加坡总会及各社团，请准当地政府，订是月十五日在总商会开侨民大会，先一日，当地政府约庚谈话，告以此次华侨筹赈，庚当负全责，且应统筹统汇，不得另设其他机关，并告此为侨民之事，勿须贵国官员参加，盖中立国政府，自宜遵守中立国规例，以免发生意外之交涉。迨开会时，众举庚为主席，致词后，高君便要发言，庚婉谢之，彼竟悻悻而去，留下其秘书某君，登台发言，广引国内种种开会情形，纠缠一二小时，几致开不成会，尚幸日近昏晚，故得收束了事。

       乙、是年九月间，报传我政府拟发救国公债五万万元，分配华侨一部份，高凌百便来告余，谓伊明日要往马来亚各处招售救国公债。庚即阻其不可，以马来亚义捐，至十二月止，可募一千万元，现仅半数，须暂待来月募足，方可提起公债。他似不以为然。庚便不客气云，今日国家时局严重，凡事勿作儿戏，君前要推行新生活运动，庚劝君谓居留地政权不在我，难收效果，君不听，今何如耶？又某君倡捐集二十万元建领事馆，君极力挽庚参加，庚以为徒劳，君亦不信，今又如何？夫劝募公债，实非容易，今日所急在筹赈，公债稍慢何妨，且公债之详细手续未到，当地政府未准，若贸然举行，不但成绩无，且恐阻碍义捐。高君于是同意而退，乃不三天，霹雳方面，便有人用长途电话来询，谓高总领事鼓励组织公债委员会，劝侨胞买公债，现义捐进行未完，究要从何项先办。

       丙、在该时期，适上海宋子文先生，托李玉书送来聘庚为公债委员之执照，同被聘者，尚有李俊承胡文虎二君，并庚共为三人。阅其计划，当负责全马来亚一切劝募责任，庚寻思依此办法进行，决无成绩，即修函告宋君云，所委三人，均为闽籍，尚未足以代表新加坡，何况全马来亚，最少在新加坡须加添广帮林文田，潮帮陈振贤，聘书请直寄总商会交之。又告新加坡既不能代表全马来亚，现全马分十二区，除新加坡外，其他十一区侨领某某等君，亦请直接聘委云云。岂知高君一闻庚等被聘，立即在吉隆坡另行召集怡保吉隆坡新加坡数人开会议决在新加坡成立公债委员会，向当地政府请求注册不达，适刁作谦君亦因公债事南来，复代向当地官长疏通，结果当地官长表示，谓兹事体大，何不仍委陈嘉庚办理，而乃要新立门户，刁君于是来见庚，详述原委，后数日当地官长便来函嘱庚接办，庚于是仍分十二区，平均负责，实行劝募。

       丁、新加坡筹赈会，即遵行统筹统汇原则，便不容在同地复设第二机关，妇女部原亦参加在内，已有月矣，乃高凌百夫人，中途竟自组一机关，且任主席，所有妇女部份捐筹，概由她主持，然该会对新加坡妇女募捐工作，未能进行普遍，前后所筹，不外数万元而已。庚恐破坏统筹统汇，违背当地政府约言，或者由此作俑，再生出别个机关，故修函向高君交涉，后始作罢。

       以上数事，可以证明高凌百对新加坡及马来亚，关于筹赈劝募公债事，是有益或有损，是否开会须请其参加，盖侨民爱国，捐资救济祖国难民，乃属侨民之事，毋须领事官参加，此为新加坡社会之惯例，而菲代表王泉笙，竟以此坚执不出席本大会，本大会当然亦不能迁就之，诚以一人之出席与否事小，而全局所关，得失所在事大，不能不斟酌损益于去取之间也。

**陈嘉庚斥贪官污吏罪恶**

**星洲大世界五届筹赈游艺会开幕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3.5.1941**

       今日为本筹赈会主办大世界第五次游艺会开幕之日，欲以所筹之款，寄汇祖国，救济伤兵难民。查自前年欧战发生，英政府限制马来亚及婆罗洲义捐汇额，每月限坡币五十万元，而逐月义捐收入，约七十余万元，故积存在银行未汇，有三百余万元。迨自本年四月起，逐月准加汇二十五万元，即每月可汇坡币七十五万元，然自本年元月以来，各处义捐，收入比前较减，本席希望侨胞，此后出钱出力，更加踊跃，否则，不但银行存款不久汇完，就是逐月七十五万元，亦恐不能汇足，此则望本坡及马来亚婆罗洲诸侨胞注意为要。

       自廿六年祖国抗战，本会成立以来，迄今将近四年，开会亦已百数十次，其间除攻击汪精卫，及招待机工回国而外，则以鼓励侨胞出钱出力之事件为多。至于祖国政府如何，固未曾闻问。海外侨胞，亦属国民一份子，奉行三民主义，较之国内，当无逊色，而于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则不特抗战后如是，在抗战前亦莫不如是。致而对民权问题，亦当研究运用，不便放弃，唯凡事必取合乎正义，且有实据者而言，不能轻举妄动，以作无益及非理之干涉，本人受全侨之推托，负南侨总会主席之责任，对祖国抗战后，方应尽之义务，当然要负责鼓励，而对政治方面，在民权范围之内者，亦不能缄口无言。抗战以前，西南异动，背叛中央，我召集侨民大会，攻击陈济棠，抗战后卖国贼主张和平妥协，我攻击汪精卫，回国后，在国内，我复攻击西南运输处之腐败，攻击保管外汇之人侵逃外汇，以及西安恶吏，福建陈仪徐学禹之苛政等。回洋后又攻击吴铁城及高凌百，我所攻击者，前后计九人。呜呼，此岂我之好事哉，出乎良心上之不得已耳，兹复略述其大概如下：

       （一）陈济棠不但背叛中央政府，且极贪污，误省误国，尽人皆知，今则竟在中央，任农林部长，我国以农立国，对农业何等重大，而乃以此等任之，天理人事，是否适合。我国科学未发达，水利未振兴，农业之丰歉，半由人力，半由天功，若果有天意，见此贪污误国之人，定必不满。

       （二）汪贼卖国求荣，罪恶之大，莫可比拟，我首发其奸，军人莫不称快，今乃反有利用汪贼来诬我者，其居心可知。

       （三）西南运输处管理腐败，因之阻碍抗战军运，亦非常重大。中枢保管外汇之大员，贪黩营私，其有害于抗战经济，关系之大，更无待言。西安省会，与中共边区邻接，主政不良，使共党愈加侧目，此亦均与抗战前途所关至大者。

       （四）陈仪徐学禹祸闽至惨，不特闽民水深火热，而摧残民众，斵丧国力，全面抗战，受其牵累，整个大局，难免动摇，故其残民暴政，未可视为局部问题。

       （五）吴铁城及高凌百煽动党派分裂，破坏华侨团结，不特阻碍筹赈会常捐义款，且使侨胞发生极大恶感。近日有所谓海外部代言人者，更替吴铁城命领事馆在某报发表其谈话，而吴铁城本人亦公开其私人书信，谓省主席理民政，失地不负责，巨富无根据，重庆巨厦非已有，兹我答覆如下：

       （甲）广州失陷之速，出于全国人意料之外，且觉无限痛心，苟非平日文恬武嬉，绝无戒备，何致如是，当时粤侨领袖多人，疾首悲呼，而就商于本人请发电询问蒋委员长，要求严惩弃城逃走之大员。本人为恐有碍蒋委员长之尊严，颇觉难于下笔，乃婉商由该侨领等写稿前来拍发。至云省主席任民政，不负责失地，若然，则县长岂非任民政，何以律当枪毙者乎。

       （乙）国内贪官巨富，吴君列在十名以内，此乃香港富有身家之某粤商向我言之。以陈济棠之富，仅列在第十一者，吴君竟驾而上之，其言是否详实，固未敢知，唯我最不解者，公务员不拘文武，如吞款至五百元，律当枪毙，而厚拥千百万者，不但逍遥法外，尚可高官厚禄，依然自在。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其斯之谓歟！

       （丙）重庆嘉陵新村吴君新建之巨厦，距离我寓所不过二百尺，据中央组织部招待人员告我，该屋即吴部长所建，我寓居是处三十余天，旦夕恒见吴君前来巡视该屋工程，其时一部份仅在筑墙，一部分甫设基石，如为预租之寓舍，而非已业，何不惮烦至是。

       （丁）往事可免多论，单就吴君此次在星经过事实言之，中正中学被高凌百向蒋委员长诬告，致来电取消“中正校名”，该校董事以全非事实，拒绝命令，不愿取消。过后数月，吴君啣命来星，该校校董林文庆，李振殿，谢荣西，林师万，郑古悦等联袂往见，陈述冤诬，并请吴君到校视察。吴君诺之，至时竟拒绝不往，谓渠此来，只代表蒋公，宣慰侨胞，不便干涉学校事云云。但数日后，吴君则又召集中正学校诸董事，告以校名如不取消，尔等应即辞去董事职务，以免担负干系。中有几人，卒为威势摄服而辞，按诸董事多为坡中闻人，社会前辈，且多亦为忠实老党员，而以屈于权威之故，非特冤诬未雪，且反被迫辞职。尤可怪者，吴君明知中正学校无故被诬，竟不为昭雪，复从而助桀为虐，以党部大员威临其忠实老成之党员如此，则其对待党外人可知。以在海外竟犹不分黑白，同流合污如此，在国内之党同伐异，则更可知。以待侨胞纯为国家牺牲而无利禄企慕之人犹如此，则在国内之武断曲直，鱼肉民众，制造磨擦，当更可知。

       （六）我在国内九阅月，历十五省，参加演讲会者几百次，所到国人，大都希望华侨回国投资，且要知南洋特产之树胶情形如何，我恒以实情告之。如投资者，前已言之屡屡，今日不复再赘。至树胶问题，我谓南洋土地之面积，不及我国新疆一省，而树胶一物，逐年出口价值，比较我国前年总出口尤多。在限制期间，每年出口至少一百万吨（系指去秋），值新加坡币八万万元，申算国币可为六十万万元，以征税为例，每百元按收五元，六十万万元，可抽三万万元。查我国抗战前，全国出口抽税，尚不及此数，树胶利权既如是宏大，我国人定要注意，至栽树胶之法，当分两时期，第一时期为砍伐芭树，待数月后，放火焚烧，烧未尽者再燃一次，此为第一时期之工作，第二时期为种植树胶苗，此时期比前尤须大用工夫，要除净恶草，防治白蚁，无令为害，则树苗方可长成，再过七八年，便可收利矣。

       鄙意我国现下抗战建国亦如种树胶者，当分为两时期。抗战最后胜利之属我，可无问题，此如栽种树胶者之砍伐芭树及烧芭。至第二时期，则为建国，属于政治问题尤大。如树胶苗之落地后，必大用工夫，除净恶草，防治白蚁，所有害物，概须铲除，有如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宜驱而去之，则建国方能成功云云。本人在国内所言如此，今日凡我华侨之有树胶园者，谁不欲其树胶之茂盛，收成之丰富，而对恶草白蚁，绝不留情，庶可达其愿望，祖国之抗战建国，何莫不然。本人亦希望祖国树胶（政治）之繁荣滋盛，故不能为恶草白蚁而留情，诸君爱国，必不后人，愿共勉之。

**陈嘉庚电林主席斥吴高祸侨阴谋**

**原电载南洋商报7.4.1941**

       重庆国民参政会请分送林主席蒋委员长冯副委员长钧鉴，何总长白副总长暨各院部长官勋鉴：南侨筹赈总会会员大会及南洋各属闽侨代表大会，近日均在新加坡开会，到英荷泰非越团体百余单位，代表四百余人，会议一星期。一致拥护领袖，拥护抗战国策，声讨汪逆，加强筹赈工作，又设立南洋闽侨总会，呼吁改善闽政，团结闽人，庚加以公意谬膺赈总闽总两会正主席，两大会呈电中央八通均托总领馆代发，不悉有无达览。侨胞拥护抗战，一秉至诚，出钱出力，以无党无派为最巨，苟以党派为号召，则无异屏弃无党无派者于圈外，岂非自截手足以求强身。自吴铁城来南洋，利用宣慰名义，暗植党羽鼓煽分裂，驻星总领事高凌百更仰承鼻息，变本加厉，阴谋操纵报馆学校社团各机关，以遂其破坏团结毒计。长此以往，恐将造成上海第二之纷乱情况，当地英政府已深表不满。吴君在星时对记者诬毁鄙人无法不至，以念其为委派专使，恐伤尊严，隐忍不较。高君以为懦弱可欺，益肆狂悖，竟在此次赈总大会中大放厥词，斥骂无党无派者为倒行逆施，为破坏抗战。庚认吴高等辈荒谬绝伦，无可再恕，始揭吴贪黩误国，高拥汪亲德各实据。至于陈仪徐学禹苛政祸闽各端，经大会电请撤惩，务祈採纳，临电不尽欲言。参政员陈嘉庚叩虞。（四月七日）

**陈嘉庚主张团结息争通电**

**原电载南洋商报5.2.1941**

       国民参政会转中央政府钧鉴：全国军政长官全国同胞公鉴：去岁春间，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代表海外一千一百万华侨，率领慰劳团回国慰劳，并考察战时军政现象，民间情形，以及经济生产事业，语其大旨，不外两端：一则藉觇祖国抗战，实情如何，最后胜利，有无把握。一则搜寻各种进步实证，携回宣传，鼓舞侨胞，加强捐汇。自春徂冬，阅时九月，西北高原，东南濒海，足跡所经凡十五者，而耳目所及，士兵则艰难苦战，不顾死生，民众则踊跃效劳，不惜血汗，爱国精神，真足使人感奋，惟政治不及军事，贪污尚据要津，喷喷人言，亦无可讳。所幸领袖贤明，举国拥戴，强敌虽然未退，胜利确有可期。此及南归，据实报告，寸心亦无爱憎，片言绝不扬仰。海外华侨捐资救国，纯为热情所驱，不以有党而增，亦不以无党而减。推倒满清，翼赞民国，救济灾难，捐输教育，数十年如一日，千万人同此心。当地法令，共产党既不许潜藏，国民党又未能活动，百十人中，有党籍者，一二而已。多数华侨，咸能明识大体，发挥正义，不分党派，爱护国家。抗战之初，获闻国共两党统一对外，莫不踊跃欢呼，不意中途磨擦，谣诼繁兴，遇至热望冰消，义捐停缴，咸且疾首蹙额，骇汗相告。庚总侨团，义难坐视，乃于回国期中，分谒渝延两党领袖，垂涕而道，苦劝息争，用以顾全大局，蒋委员长表示优容，毛泽东先生托述拥戴，庚闻之良慰，且亦以此引告国人，期勿相惊伯有。乃南归未逾一月，危机又遍国中，值此敌焰犹张，国仇未雪，如复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民族惨祸，伊于胡底，华侨无党无派立场，无利害私见，觀兹异象，弥切杞忧。庚久处炎荒，罕闻政治，人间名利，视若漠然，党派异同，更非所问。兹逢第二届参政会开幕，猥以愚擒，谬厕一员，爱举所怀，以告同感，尚祈一致主张，弭止内争，加强团结，抗建前途，实利赖之，天海非遥，愿闻 明教。

陈嘉庚叩歌

（三十年二月五日新嘉坡发）

**重庆与延安三则**

**此三则皆转录自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上册**

**则一出自该书页一百六十二，**

**则二页一百六十二，则三页三**

**一、重庆与延安**

       余到重庆所见，则男长衣马褂，满清服制仍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染红指甲，提倡新生活者尚如是。行政官可私设营业，监察院不负责任。政府办事机关，除独立五院及行政院厅辖各部外，尚有组织部、海外部、侨务部、及其他许多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交际应酬互相征逐，汽车如流水，需油免计核，路灯日不禁止，管理乏精神。公共汽车客车人力车污秽不堪入目，影响民众卫生，报纸为舆论喉舌，责在开化民智，则箝制严密，致每日仅出一小张，何能模范各省。其他政治内容非余所知。弟就外表数事，认为虚浮乏实，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迨至延安则长衣马褂，唇红旗袍，官吏营业，滥设机关，及酒楼应酬，诸有损无益各项，都绝跡不见。如云陕北地瘠民贫，政府局部甚小，故不宜如首都，应有尽有者，亦属有理，然余所不解者，重庆诸人之奢费，金钱从何而来？是否民脂民膏？余以不官不党居第三者地位，故不能已于言耳。

**二、所闻与所见**

       余在重庆时，常闻陕北延安等处，人民如何苦惨，生活如何穷困，稍有资产者则剥榨净尽，活埋生命极无人道，男女混杂人伦不讲，种种不堪入耳之言，似非为宣传而来，又是略可靠之人告余者。然彼或闻诸他人，或阅印刷册，信以为真亦莫怪其然，凡未到延安区之人，谁能辨其真伪，余亦是疑信兼半，所以必要亲往。亦有劝止者谓往恐不利，余则置之度外。及到延安界特注意前所闻数事，如民众生活惨苦，则所见所闻都未有。资产剥夺，则田园民有，商店自由营业。至于男女不伦，如行路来往，坐谈起居，咸有自然秩序。常有一二南洋学生，在招待所留晚餐后，将回校须十左右里，余问夜时有无关碍，答绝对无关碍，此处风俗甚好，一人原常夜行，此为余所见者。至于所闻，虽男女同坐，无人敢戏言妄语，非法举动，都能守分。如有互相恋爱，可自由结婚，只向政府处，签押注册，简便了事，盖无论男女，谁敢行动非为，即免惩戒，亦受大众鄙视。男女衣服均极朴素，一律无甚分别，女衣较长些，人人如是，设有一两人粉装华丽，锦衣特色，不但被人视同怪物，自己亦羞愧不能自然。又如无谓应酬，浪费交际，亦无从开销，虽有资财竟同无用耳。然陕北地贫，交通不便，商业不盛，地方非广，故治理较易，风化诚朴。设共党若握着东南富庶市场，区域广大，不知能如此廉洁，兴利除弊，为人民造福如延安之精神乎？

**三、向往延安**

       自民廿九年夏，法英战败，敌乘机侵入安南，美国已逆料世界大战不能避免，而东亚方面，中国为战线要衝，将来中美必须联络，在人力上中国负有相当责任，而金钱与军械，则赖美英供给。故美总统屡派代表，或藉名中国顾问，与我政府磋商，其最重要条件，即是财政公开，政治民主化，避免国内分裂，方能一致对外。经历有年，结果无效。迨至日本南侵，美英当然更积极要求，而我政府反视为奇货可居，以为大敌日本，已有美英可代我负责，而眼中钉之中共，便可乘机制裁，即转一部份军力封锁其边界，由是美英诚爱莫能助矣。

       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与各领袖长官，社会名人，报界记者接触，并至延安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陈嘉庚对所得税问题发表言论（注一）**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特别会员大会上的演词**

**原文载国民日报29.11.1916**

       庚为十三名会友请召开此特别大会之一，然庚之愚见，不在建议以何项抵入息税，惟有一防护耳，防护者何？以十八位之立法议院议员，华人中仅得数人，实占少数；际此商战之秋，应当筹有大公之策，万不可改人息税之抽，而加诸劳动家。况劳动家多属华人，直接则在劳动家，而间接则甚有碍于工厂。如前孟买人大会，讨论结果，以树胶及人身税鸦片加饷等件，试思其用意，明眼人不难明白，故庚深愿本会立法议院议员，格外注意。

       至于乐捐一事，万万做不到，亦实无价值之讨论。而庚忝在会友，与商会董事无干；但闻本会讨论纷纷，意有未合，于是在敝怡和轩公馆建议云，除最公平良好之入息税外，第二策任求不得，无已加抽门牌税，足以抵额。譬如如敝附近诸商家，一年扣还三千六百元这屋栈，而获利可一万元，除花红有账外，实存作七千元，若抽五巴仙入息税，即三百五十元，将此款加入门牌税，仅十分之一，似较请别项为便利，政府抽款即足抵入息税之额，而其费且可省却无数。庚此论系指生理屋而言，余如住家及戈里间（Coolie Keng),不在此内。至于抽诸业主，抑或加之商家，政府自有公平之办法，产业家无劳藉是纷纭。庚此意系前在敝公所愚见，若今日大会决不认提作建议，望诸君见谅。

**树胶之运命**

**原文载新国民日报11.1.1921-12.1.1921**

       树胶一物，初为野生，继以种植，十年以来，发达最速。欧美资本家投资数百万元，于南洋热带一地，委任少数西人，指挥数十万亚人为之服役，开辟百余万英亩。其锐意进行者，不特因获利之厚，且兼其寿命之长，下种数年，可成大树，市佳即採液，失败则停止，不至重招损失也。而我华侨暨土人，亦开辟数十万英亩，大抵寄身异地，拮据经营，以求成功；其势力虽不及欧美资本家，而宗旨则同也。

       十年之前，每年产出不上万吨，迨至客岁，增至二十万吨之多（南美及锡兰岛年出数万吨不在此内）。其骤增之由，虽为树胶长成，取液及时，然亦因欧战后，神经敏捷之实业家，视其为奇货可居，故收买日盛，价值日高（上胶每磅新加坡银一元二角，下胶九角），有未及时之树，亦贪目前之利，而从速割取。虽然，迟早不过一二年，此后旧树益大，新树日长，逐年可增之数，不减数万吨，若非近来市价大败，再后三年，或可产达五十万吨以上，可云巨也。

       然出产仅限于热带区域，而需用遍于全球。制成之品，日新月异，最大宗之用途，则车轮居其大半，或且谓树胶之需要，与铁无异。将来供不应求，价值之高，可增数倍。斯言非无理由，何也？无论海洋大陆，无不用树胶，尤以文明国尤甚。即东亚而言，交通路政，方在萌芽，他日需用之巨，实意中事。乐观之说，几为世界所公认矣。

       採办之国，美居三分之二，机厂林立，商贩十百，资本多寡均可经营，竞争剧烈，莫可言喻。按年买卖，较之实数加至二十倍之多，至于出产地之南洋，机厂虽寡，若商若贩，则有如南亩农夫，几乎居斯土者，以不营斯业为愧，故其竞争更甚，而事实上能否得利，在所不计也。

       然而盈极则亏，泰极则否，殆或时势使然。本年以来，胶市日降，其原因虽我世界财政恐慌牵累所致，而实际上则出产过盛，供过于求之弊。商家不察，视如常市之升降，蓄积居奇，甚至买空卖空，希冀侥幸，不计其来源，如水非竭涸，不能止流。迨近年来，乏力抵御，袖手旁观，致一败涂地（上胶每磅三角半，下胶一角八占），于是，破产者多，势如火燎原，不可防遏。市况到处萧条，不堪回首。而最可伤者，尤以劳动家为甚。从南洋第一大宗土产，直接间接，痛痒相关，受其影响，奚啻数百万众。市佳则百物流通，市败则到处凋弊，其关系岂浅鲜乎！

       易曰：跛者不忘履，眇者不忘视。今种植家，并诸商贩，咸盼望胶市之起色，冀收桑榆之效，于是种植会，联合研究各种补救之法，其结果议减工价，节少出产四分之一。据欧美及各处报告，并出产地调查，积滞之胶，三十余万吨，足供现状一年之用而有余。其已制成之品，美国一巨厂，论积存车轮，至一百万个之多。于是工人退职者，不下半数，其他可以想见。准此计核，虽出产减半，仍恐供过于求，欲望起色，无异河清之难俟也。

       今日种植家，如拘执成见，不能毅然解决，而欲望胶市之恢复，何异负薪以救火，扬波以清流者乎？何以言之，积底之厚，销路之短，即完全停採，绝其出产，尚不知再历几季，方有转机。乃诸种植会不此之图，尚守故策，与销货家相持，冀卜不久之胜利；或鸡肋难舍，虽售价仅供工费，而心存希冀之念，仍不敛手待时，是犹欲止其流，而不肯塞其源，目的乌可达哉。

       虽然，欲实行善后之策，有一困难之问题在焉，即採液之三十万工人，应如何安置是也。果行前策，则马来半岛许多数工人，能无失业之恐慌乎？吾人不得不为之代筹方法；或与政府磋商维持之策。或尚半数，给以便宜工资，使之除草修树，辟路开沟。他日胶市再腾，不患召集之难。其他半数，或津贴川资，听其回乡，或令其自谋别业，此虽出于下策，然不如是则出产仍供过于求。种植家以艰难多年，经营宝贵之树，供无益之採割，而工人亦仆仆辛苦，费血汗之劳，竟不能维持自身口腹（前工人每日工资一元之外，除伙食五角，尚可以仰事俯畜，现每日仅得二三角），两败俱伤，悲观无穷期也。若能毅然绝止出产，以避此恐慌时代，则不出一年，无难恢复原状，不特种植家与劳动界均受大益，而政府亦蒙其利；否则，挽回无术，吾更不知乐观之日矣。

**不景气之历史观与南洋华侨**

**当前应採之策略**

**原文载南洋商报26.4.1933**

       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之前，欧美日本等国，各种工业虽觉制造发达，转运灵敏，竞争剧烈。然生产尚在有限，世界供求颇略相当，加以欧洲列强经济昌裕，各方竞致力于霸权之争持，军备之扩充，故绝未露何项物品之过剩，以及工人之失业者。盖战前之世界，尚在繁荣之时代也。

       大战开始之后，交战诸国，凡正当生活用品，不唯不能制运出口，即其国内所需，恒且反求诸外。缘各项工业厂，多临时改造军器，而一部分工人更以驱赴前敌，死伤残废，日以万计，筹防设备，更事纷繁耳。

当时美国日本及数小国，多乘他国忙于战争之际，扩充自国工业，大收渔人之利，举凡农务矿产、实业工厂、商舶渔船，军用器械一切等，经营制造，昼夜兼程，出品之多，不可偻计。以三数国之力，供全世界之需，至于五六年之久。

       大战告终，各交战国，室如悬罄，野无青草，颓垣败屋，废垒荒壕，触目皆是。建设改造，工程浩大。而农业矿务，重张不易；工厂实业，典作尤难。斯时各参战国家，多感极端之痛苦，卒以经多年积极之筹备，大战经验之所得，科学进步，器械新奇。建设愈臻完善，出品日见精良，而且成本便宜，不唯免赖舶来之品，且可源源输出，其刻苦迈进惨淡经营之精神，亦良是使吾人惊佩不置者也。

       欧美日本各国，既咸积极扩充其生产制造物品，对于需要原料，似有求过于供之势。故原料价值日高，获利日厚，因厚利而增加出产，或从事科学与机械之制造，或力图交通与开垦之发展，各种事业，莫不随工业而俱进。

原料既充分应求，出品复日形膨胀，日积月累，各货充斥于世界市场，于是形势一变，供过于求，销途日塞，问津有限，物主乃不得不贬价求售，一以活动银关，一以维持工作。一地然，各地皆然。一国困，各国皆困，安得不大败特败，至于不可收拾。物品价值既败，各原料当然与之俱败。凡直接间接，莫不受其牵连影响。如工资之降削，工人之失业，商贩之损失，市肆之冷淡，运需之消减，银行之紧缩，生活程度之低落，江河日下，竟无止境，此世界所以趋人于不景气之重围也。

       数年以来，不景之风，普及世界。举世人类，嗟叹悲痛，咒诅惨沮，何可胜言。若一考究事实，亦颇令人费解。试问今日世界缺乏何项乎？以食物言，米麦糖果，各种食物，莫不洋溢丰盛，绰有余裕。以衣料言，棉丝毛羽，纺织新奇，充满市肆。至于住所，则空屋毗连，到处皆有，高楼广厦，更其堂皇，宜乎欣鼓腹，咸庆盛世，而反悲惨苦痛，咸叹不景，岂不怪哉！

       或曰不景者，非属于日常生活之物质，乃属于流通市面之金钱也。然金钱何往乎？既非如食物之能消化，亦非如衣服之能腐坏。出产有增无减，流通非彼则此，毫无损失。何以前裕而今竭，此期间盖有故焉，盖因主持金融之机关，非受财阀之把持，则遭银行之垄断，以至金融困闭，社会无以流通耳。然主持者之限制流通，亦实迫不得已，盖与其放出而危险，毋宁贮积而乏利。

       金融困塞，百物滞销，工人失业，商贾疲敝，不景气之严重形势，由是而生；世界之恶运，由是而烈。关心世运者，以为挽回危局、恢复繁荣，或在一两年间，或断定两三年后，迄兹期限将届，不特毫无影响，尚且日败一日愈来愈险，重峦叠嶂，奇险重重，前路光明，不知何在？

       工业国如日本，乘不景之际，复积极扩充其出品。银价工资、运输保险等等，莫不大降特降，以最低贱价，倾销于各国，更增加他国工人之失业。故凡关税能自主之国，当然不能坐困待毙，由是而高树关税壁垒，以保护己国之工业。凡自国内所短缺诸物，有利可图者，无论国民或外侨，莫不自行制造，以抵外来。如英国新建设之工厂，不下数百家，将来增多无数之出品，可以想见。

       农业矿务，出产最富之国，首推美国。棉麦油钢，且有自动限制生产。而苏俄则方积极筹备，机器新式，科学进展，设备完善，规模之大，不可思议。将来生产之丰富，岂在美国之下。五年计划成功后，其国内之重工业极力设备，方兴未艾，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输出国外，亦已稍露头角，惹起列强严重之注目。

       不景气未露之前，及已露之际，其原因皆由生产过剩，已如上述。工人失业之多，欧美诸国，将达三千万人，几占同业三分之一。而英俄等国，复积极扩充生产，虽该二国工人失业，可以补救，而他国之失业工人补救无术者又将如何？况于生产过剩之中，而复增以无限之来源，则其将来过剩之过剩，更将如何以处置？此为研究失业问题及不景气之因果者所当注意也。

       挽回不景之法，其希望目的，莫非以工人不失业、生产不滞销，则金融可以流通，商业可复繁荣。然生产过剩，既如上言，工人失业，又如是多。姑勿论英伦两国之扩充生产，单就现下尚未充分出产之际，胃力已不能消纳言之，已觉痛苦，而况益增失业三千万人工作之出产，而欲求达消除不景之气，无乃矛盾太甚者乎？

       近者欧美列强，提倡军缩。虽在若即若离，然以美之牢握战债财权，英之举足轻重，其成功确有可期。唯能实行与否，须视太平洋和战为标准。假如全世界加入军缩，则一切国防之裁减，凡直接服务，及间接工作之人，则必因此裁减而增多失业，当不只千万人而已。

       综上推测，不景之气，全由生产过剩。生产之过剩，则概由科学进步，成本廉宜，机器发达，出品大增，替减人力之工作，故增多工人之失业。此种坚确不移之现象，不啻天然造成必经之潮流，任何智能财神、伟人博士，而欲挽回危局，恢复繁荣，无不感觉缘木求鱼，势必无望。

       鄙见所及，欲救不景之希望，只有两事，非战争则口口（注一）。战争属于治标，口口可以治本。然治标或可较易见的，唯非根本之解决，徒演人类之惨剧。至于治本，虽生效较迟，然目的一达，则世界大同。平均工作，则工人既免失业。工作至多四小时，衣食无缺，老幼疾病，公共负责。既无私业之竞争，复免患得与患失。尧天舜日，真人类无穷之幸福也。

       南洋属原料出产地，工业既无价值可言，而同遭不景之气，其苦况不亚于诸国。无论将来治标治本，欲恢复前状，实属难期。以治标言，界在太平洋之间，与前欧战远距离不大相同。以治本言，则殖民地性质，亦必远落人后，安有乐观之日？今日吾侨欲求立足地，唯有极力省俭，裁除耗费，恢复三十年前之生活程度。能如是，庶乎可避淘汰之列矣。若不未雨绸缪，必至噬脐莫及。一得之见，聊责侨胞，如有大雅卓论，深愿互相切磋也。

**由劳资纠纷谈到本坡华侨工业**

**原文载南洋商报30.7.1938**

       近数年来，本坡劳资纠纷，屡见不一，甚至服务社会公共工作者，亦发生磨擦，双方损失，以及关系吾侨劳工方面前途至为重大。鄙人久居此地，鉴往思来，为吾侨工业计，为劳动界幸福计，实有不能已于言者，而尤以祖国际兹倭寇侵略，全民族展开长期抗战之时，海外侨胞负后方重责，出力出钱，挽救危亡，为至高无上之神圣任务，万不能再生他故而自阻进行也。鄙人生平以服务社会为职志，不敢居资本家地位，自信发言不偏袒任何方面，惟根据事实，审察情势，本其愚诚，提出管见，略为我劳动界同侨陈之。

**星工业概况**

       一、本坡工厂经营较久，规模较大者，当推黄梨罐头厂，胶品制造厂。次则铁工厂、饼干厂、印刷厂，其他规模虽大，而人工不多者，如生胶厂、木锯厂、油厂、冰厂、肥皂厂、砖厂等。又如手工业之五金，裁缝、剪发、皮鞋、洗衣、建筑等，则工人虽多，而场所不大，此为本坡吾侨之工业大概情形也。

       二、黄梨制罐运销欧美，迄今五十余年。初时概用手工制造，每年出品仅数千箱，其后制罐改用机器，产量逐渐增加，客年出品遂多至二百余万箱，以鄙人所知，三四十年来前后改名易主之厂家，不下四五十，倒闭者，收盘者，负债者，时有所闻，情有重轻，失败则一，现存数家皆由近年新股东支持，不但毫无赢利，且亏许多血本，至胶品制造厂，历史不过二十年，虽厂家无多，而工人则近万众，资本尤为雄厚，时至今日，亦陷于进退维谷之地步矣。

       三、铁工厂，吾侨经营者多至百数十家，然规模不大，多属修理补造工作，厂东十九由劳工界出身，虽乏大利，尚可维持，盖无外来竞争之患也，饼干厂前仅一家，颇可获利，十余年来多家竞争，加以添置新机，建设新厂，垫款甚巨，现只供过于求，营业日见退化，收回血本未可预卜，前途至为悲观，印刷厂方面，则得失均有，善经营者亦仅足维持而已。

       四、生胶厂规模较大，工作简单，工人新旧无甚关系，自胶厂限制以来，原料大减，此条营业有属过去时代，枋木火锯，自来成败均有，目前尚可存在，近时外埠新厂林立，颇受威胁，而所用工人，小部份虽技巧娴熟，其他亦属简单工作。此外如油厂、肥皂厂、冰厂，更为简单，工人不拘新旧，皆可胜任愉快。

       五、手工业如裁缝，剪发，金银铜锡器等，均日常所必需，不患外来竞争，资本既非雄厚，工人生活亦较稳定，唯劳资间相互要求须有限度，始可存在，建筑业方面，人数亦够，一部份重要工人须熟练有素，其他助手则随时随地可以招雇，此项工作印度人亦能胜任，虽动作迟慢，而工资低廉，吾侨应知注意，万勿视为可以居奇地。

       六、关于服务社会公共工作者，本坡人种复杂，工资不一，大都视工作之烦简及技术之高低而定，除欧籍人外，若我侨工资当不在他籍人之下，前清道夫概用印人，去年因罢工而改用华工，吾侨宜时时以此为鉴。

**本坡工业失败原因**

       综上各途工业而言，除少数资本家外，其他多不能长久存在，原因约如下述：

       （甲）本坡工业品无关税之保障；

       （乙）当地政府无限制开设工厂；

       （丙）本坡银价，比中国、香港、日本、安南、印度等处为高；

       （丁）同业缺乏团结互助之精神。

       有此四因，故投资工业艰于获利，由于设厂不加限制，稍一有利，即增设新厂以相竞争，而同业团结互助之精神，遂益消失。由于本坡银价高于他处，工人每日工资五六角可抵他处一元以上，致成本较贵，难与他处竞争，而外来工业品，又免纳税，得以自由推销，再使本坡工业感受重大威胁，故本地资本家因经营工业而破产者指不胜屈，发财者则鲜有所闻，一班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者，大多由购地皮及经营土产而来，与工厂无何关系也，吾侨明识之士，一方面应知工业谋利之不易，一方面应为当地政府着想，遇市景不佳，工人失业，须劳当地政府多方设法帮助，若市景稍佳，则各项工潮又接踵而来，甚至发生轨外行动，触犯法律，而遭当地政府干涉，当地政府鉴于吾侨劳动界过去情形，乃颁布命令，限制吾侨入口，吾侨若不觉悟，遵守规律，以后所处地位必更困难。至市景佳时，物价腾贵，欲求改良待遇，当以和平手腕出之，适可而止，毋持之太过，俾双方同感满意，免留不了遗憾，而智识界诸君尤宜放大眼光，善加启导，使我抗战建国之后方工作，不致间接受恶影响，则幸甚矣。

**半斤八两**

       台湾人民六百万，闽人占三分之二，多为闽南人。因距离厦门水途不远，帆船一日夜可达，火轮尤为快速。甲午以前，闽南妇女纺织业，无家不有，大半运销台湾。所需米粮，则由台输入。其他物产，交换亦夥。人民往来，如现下南洋一样。自割让日本后，不但人民来往困难，而布米等物品交易，完全为日本夺去。闽南民众生机，几遭断绝。

       日本占领台湾之后，尽力改革，兴利除弊，而尤以发展交通，改良农业，建设水利，禁绝鸦片诸端为尤著。数年之后，生产增进，民生安适。唯民族思想，遭受压迫，主奴阶级，判若天渊，人民自由，剥夺无余，故台民自我辛亥革命以后，企盼祖国之收复，不啻农夫之望岁。抗战胜利，目的已达，台人欢忭欣幸，莫可言喻，以为从此可出水火而登袵席，由黑暗而睹光明矣。

       陈仪治台之日，带去公务人员数百人，其选择组织，大部分当然为前治闽诸僚属，故闽人亦有参加者。下车不上两月，台民大为失望，或贴标语，或绘图画，指为“狗去猪来”。盖以日本为狗，尚能护主，而陈仪为猪，仅能饱食而已。不满陈仪，于此一事可以想见。

       闽省原非富裕，加以抗战数年，民生困苦，而陈仪苛政，层出不穷，任用乡亲及私人，营私贪污，勒索敲榨，无恶不作，而闽民以抗战期间，遭受压迫，虽如何悲惨，亦惟有忍受饥饿，或则投江自杀，不敢挺而走险。加以特务横行，言论统制，故外间鲜能知之。今台湾则经日本数十年之经营，物产丰富，工业繁盛，不亚南洋膏腴之地，陈仪等如饿虎见肥肉，安肯放松。闽省苛政，故态复萌，甚且变本加厉，为势所必然也。

       昨日报载，美合众社电，台民反对陈仪苛政，死伤近万人。又美联社电，政府委吴铁城，继陈仪任台湾行政长官，如系属实，则可见台湾变乱影响甚大，如陈仪不去，将无法收拾，故以吴代之。然吴铁城之人格，与陈仪不过半斤与八两。言营私积产，陈不及吴。言任省长不负责逃走，吴则尤甚于陈。言年龄品性，残忍狡诈，则无分轩轻。陈去吴来，无异以虎易狼。台民何不幸乃尔！若台人果能一致行动，坚持到底，将贪污官吏，尽数驱逐，则民众虽受重大牺牲，亦可获得代价。如其不然，乱事不过暂时平静而已，欲望其拨乱反治，是缘木而求鱼也。

       人性善恶，出于天成，行年四十以上，向无改移之可能。吴氏年届六十，平时所亲信所接近者，皆佥壬之流。贤达之士，决不愿同流合污。物以类聚，薰犹不同器，此之谓也。今陈仪之羽党虽去，而吴铁城之爪牙又来，相差不过五十步与百步而已。余前著之《南侨回忆录》，台人由厦门购阅，知闽人早已饱受陈仪之虐政。至吴铁城之行动，在余书中亦有所纪述，惟未若陈仪治闽事迹之详细。呜呼，此岂特台人之不幸，抑亦我闽人之不幸也。以陈仪祸闽之罪，万死不足以谢闽人，乃当局与之朋比为奸，同恶相济，忠佞不分，是非倒置，古语云：“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今居高位者，竟无是非之心，我民族安得不遭受惨痛，于陈仪乎何尤？

（三十六年三月十日）

**美借款与我国纸币**

       国共不能妥协，内战不能避免，凡与两方要人有接触经验者，不待智者而后知，故余早断其谋皮于虎也。内战既不可避免，胜负亦非易解决。大战后我国物资枯竭，生产有限，加以政治腐败，贪污横行，军费浩大，政府财用专靠印币机为资源，基金毫无，每日要印行数十万万元纸币，向民众流通，换取物产，致通货膨胀，降跌，此又不待智者而后知。

       执政诸人，以为人民可欺，以为数月内可以解决内战，农业国不怕纸币滥发，美国海陆空军火及军人用品，可以源源供给，故当风狂走，凶暴残忍，发动内战，不顾民众之饥饿死亡，国权之削弱丧失，保存其专制独裁之野心，惯行其自欺欺人之狡诈。

       就现下国币言，日趋降跌，全国民众咸知将来必成废纸。数星期前，政府规定美金一元，值国币一万二千元，每万元申叻银一元八角，近日降跌半数，每万国币值叻银仅九角，若再跌五六角，则每万值叻银三四角，五百元以下旧纸币，均作废纸矣。

       新印万元之币纸，价值既贱，每个士兵每月平均至少需五十万元，前后方按五百万人，每月须二千五百万亿元，而广众流通所需，当加千百倍。印钞机虽如何灵敏，恐亦供难应求。纸面价值愈巨，滥发又愈多，则总崩溃亦当愈速。

       士兵作战之需要金钱，如汽车行走之需要汽油。不但粮食衣服，而公私费用，运输补给，悬赏奖励，冲锋陷阵，间谍冒险，贿赂对方，及其他种种巨费，均非钱不行。民众对纸币既失信仰，士兵交易必生阻碍，影响作战之利害，必须多赘。尚有一说，则强征强取强劫，勉作维持，如此则国军变成国匪，可哀也已。

       报载政府将向美国借款现金五万万元至十万万元，余意此种无稽之空想，非画饼充饥之骗局，即缘木求鱼之妄想。自敌寇败后，向美国借款若干，未有公开宣布，然所借数目，系军火及军事用品，此乃大战后美国剩余无用之物，藉此废物利用，既可握债主权，又可助长我国之内战，一举两得，其处心险恶，世界咸知，若贷借现金，则同水花泡影，徒供马歇尔特使之玩弄耳。

       大战时及战后，美国剩余军火，如飞机大炮，战车枪弹，积存在太平洋诸岛屿，不可胜计，及倾收日寇所有，更形山积，若全数供我国内战，非数年可能用尽。其他军用品，积存亦夥，第恐未能尽合我国军人适用。就新加坡弹丸之地，战后运来者，仓栈皆满，迄今年余，虽消去一部分，尚存数千万元之多，虽廉价尚乏人承受。而大部份为糖精，泻盐，剃刀，肥皂，饼干，罐头，及其他物品。美国在太平洋同样之存积，不知要加许多倍，数目当在几万万元以上，姑彼慷慨任我国赊欠，一如军火之供给也。

       除上言军火及军人用品两种外，若借贷现金，乃人民脂膏，原非政府所有，以我国现下内战之状况，政治之腐败，贪吏之如毛，美国人黄金虽多，欲领填此无底壑，又谈何容易。

       或云义借之款，非尽现金，而大半为助我国建设，交通及工业器械。果尔，则对于挽救纸币之崩溃无关，况许多重要铁路桥梁交通，且遭破坏，何暇计及建设新事业。即使借来半数之现金，以美钞专供军政之维持，亦不过几个月时间而已。总而言之，欲望美国借出若干万万元之现金，救此病入膏育，濒于崩溃之纸币，而解决内战者，真无冀缘木而求鱼也。

（卅六年四月卅日）

**论潮州大学**

       阅报知刘侯武先生，此次为创办潮州大学南来，经与潮帮侨领妥议，成立筹款委员会，进行募款。

       潮州与闽西毗邻，并与嘉应海陆丰接壤，地广人稠，人口千万，尚未有一大学，诚属憾事。世界文明诸国，大学林立，姑置不论。而教育最落后不振之我国，尚有大学及专门学校百余所，以人口平均计，四百万人可有一校也。

       潮州僻处南疆，然与东南亚交通至为便利。潮洲创办大学，非但为潮州之大学，乃中国之大学，不但为中国之大学，将来亦可为东南亚之大学，盖有教无类，乃教育之目的，惟近水楼台，经营缔造，自不得不先由当地人士负其责也。

       创办潮州大学，其目的为造就专门人才，培植民生幸福之基础。百年树人，成绩虽难立见，惟影响所及，收效必然不少。当民国十年厦大初办时，闽省中等学校四十余间，每年毕业生一千余名。当时中学学制为四年毕业，故大学设有二年预科。厦大初办预科三班，生额一百二十名，招闽生半数六十名，余为他省生，及考试，闽生及格不上三十名，可见中学办理不善，致程度如此低劣，其原因为向无大学人学试验，课程漫无标准也。

       自有厦大之后，闽省中等学校，多自奋进，以后招考新生，略见成绩。不幸自民二十年之后，为经济所困，勉强维持，呼吁无门，抱憾无已。至二十六年，余以厦大集美势不能兼顾，乃请求政府，无条件接收厦大。交卸甫毕，七七战事发生，全校内移，虽困难甚多，在质与量方面，成绩亦略有可观。新加坡未沦陷前，报载全国大学生会考，厦大生占第一位。其原因厦大内移时，仪器图书等大部分，尚可迁去，而华北上海等大学，多在沦陷中损失，故厦大特占优势也。

       至就量而言，去年秋季，厦大招生，考试及格者，四百余名，闽生占大半数。本年招新生五百余名，大约相差无多。就此比较，厦大开办二十余年，大半在遭遇困难期间，而促进中等学校之进步，成效已属不少。中等学校成绩优劣，既受大学之影响，大多数之小学校，当然亦必随中学而进展。夫如是，则今日潮州大学之创立，岂仅为造就专门人才而已耶。

       西哲云，金钱如肥料，散播乃有用。以马来亚潮侨之富庶，倘慷慨解囊，要捐百余万二百万元，绝无难事。又如存积公款之多，潮属亦为各帮冠。潮州小学校多积有基金，故学校经济不受市况影响。反之，福建会馆所办各校，学生五千名，基金无有。潮侨在本坡尚有重要地产百余英亩，现下堪值坡币数百万元。化无用为有用，谁曰不宜。论公论私，要捐助潮大创办费，并数年之经常费，实易如反掌也。

（卅六年八月十三日）

**论美国救蒋必败**

       本年夏季以来，蒋政府在军事经济政治各方面，败象日益显著，颓势无可挽回。其爪牙孙科等，竟乃异想天开，欺人自欺，初则捏造苏联接济中共，继复就蒙疆边界冲突事件，作夸大宣传，以为如是则可促成美苏大战，而使美国不得不以全力援蒋。其计谋之笨拙，见解之卑鄙，诚无以复加矣。

       我国政府要人，发表言论，往往缺乏常识，中外传为笑柄，例如抗战中国民党中央常委王泉笙等十八人提案，竟主张召回驻英大使，不通知理由，以促英觉悟。其愚妄无识，余曾在南侨回忆录中，加以揭发。最近侨务委员长刘维炽发言非难马来亚宪法，竟不知马来亚民主同盟为何物，而主张停止马盟活动，致闹出一场大笑话。更可谓荒唐已极。

       余尝以为我国教育未能普及，文盲十居七八，以故政府官吏，多为庸材，缺乏常识，殊不足怪。余所不解者，美国民智发达，教育普及，专家学者，多如过江之鲫，然其政府要人，国会议员，如马歇尔，布立特，祖德等，竟亦蠢如鹿豕，与孙科辈，可谓难兄难弟，则诚非意料所及也。

       当日寇败降之初，美国积极援蒋，冀于数月内消灭中共，消灭不成，乃托词助华复员，并派特使来华，假意调停国共争执，其设计不可谓不周，用心不可谓不苦，然终至完全失败，马歇尔扫兴而返。何以故？则以美国始终不明国共内情故也。

       在抗战初，中共局处陕北，地瘠民贫，内受威胁，外无奥援，赤手空拳，抗战八载，蒋政府不给一支步枪，不发一粒大炮弹，独能在华北华中内蒙各省，建立解放区，解放农村，十居八九，动员民众，亿千万人，使敌寇仅能扼守据点及交通线，不敢越雷池一步，此非有卓越之军事政治才能，断不克致此。至于中共统治区内，吏治之清廉，民心之归向，较诸蒋政府统治地区，又有天渊之别。就蒋部下嫡系将领而论，大多为懦怯之庸才，每战必败。其他非嫡系将领，对蒋政府，或则貌合神离，或则敷衍恋栈，故国共双方，未及交绥，成败胜负之数，固已属前定矣。

       布立特，魏德迈，祖德之徒，昧于中国实情，竟复呼号叫器，主张美国正式声明，对蒋政府，作大量军事援助，并派麦卡瑟帅驻南京，如夕岁在太平洋指挥对日作战然。质言之，彼辈不以金钱军械援蒋为满足，而要求倾美海陆空军之全力，以来华助战，如仍无济于事，则虽以原子弹炸平全中国，亦所不惜。此其狼子野心，较诸夕昔之日寇及希特勒，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然弄枪者毙于枪，玩火者毙于火。原子弹秘密，已非美国所独有，姑直不论。若大量军事救蒋，果能挽救蒋政府崩溃乎？果能贯彻美国侵略之目的乎？试择要论之。

       （一）过去两年，美国以大量军火及贷款援蒋，举凡飞机，大炮，坦克车，战舰，喷火器，各种新型武器，应有尽有，益之以美国顾问，参预戎机，美国军官，编练军队，结果完全失败，反令中共获得若干师之美式装配与美国器械。军火及物资援助，无济于事，业已甚明。

       （二）布立特等主张派海陆空军由麦卡瑟元帅统率，以实行救蒋侵华，此等于美国对华不宣而战。然中国为大陆国，惟陆军作战，方能决定最后胜负。日寇陆军以强悍耐苦著称，然中共以数万之众，尚能坚持抗战，至八年之久。美国陆军虽设备较佳，而其质数则远不逮日本。目前中共实力已超过抗战时十百倍，则美国欲求制胜，其可得乎？

       （三）美国所恃以征服全世界者，惟原子弹而已。原子弹炸力虽大，亦不能炸半县之面积。我国土地有二千余县之广，纵令美国日夜赶造原子弹，每枚原子弹落入中国土地，竭一年之力，亦只能炸灭廿余县，欲炸平全中国，则需时百年而后可也。

       （四）以原子弹作战，虽然损失巨大，但未免玉石俱焚。中共解放区与蒋管区犬牙相接，无法划分，且内战为民主与独裁之战，为贫苦大众与豪富贪污之战，如以原子弹助蒋作战，则势必使蒋区军民亦遭牺牲，试问蒋所统辖之军队民众，能甘心忍受乎？

       （五）今日内战，胜负决于乡村，而不在乎都市，与夕昔军阀内战及对日战争，迴不相同，夕昔战争，重要都市失陷，或如广岛原子弹一下，执政者为保存自身生存，可立即投降屈服，然民众为自身自由幸福计，决不惧任何牺牲及威胁。忆抗战初期，我国缺乏空军，致全国城市，任敌自由轰炸，我国损失虽巨，然因民众始终不屈，最后日寇国土遭受盟军狂炸，卒致败降，今如欲恃武器以征服中国，其最后结果亦如是也。

       （六）美如派兵参战，将使中国内战，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诚有可能，然纵令美国甘为戎首，英法意等欧洲强国未必甘心追随美国之后，共同作战。观诸最近法意两国迭次大罢工，加拿大工人反对军火运华，如美国一旦发动大战，各国民众势必群起反抗，即美国大部份劳工，亦未必甘心为资本家充炮灰，而况此次战争，师出无名，与上次之为反法西斯战争，意义尤大不同也。

       （七）军事救蒋既无效果，徒然自取败亡，则以贷款救蒋，自更属无济于事。即令蒋政府获得数亿美元借款，如填老鼠洞，如打吗啡针，最多不过使蒋政府苟延数小时之残喘，而欲挽救既定之局势，贯彻美国之野心，则断不可得也。

       故余以为美国以任何方法救蒋，终必惨败，马歇尔，布立特，祖德等人呼号叫器，其愚诚不可及矣。

（卅六年十二月廿五日）

**新岁献辞**

       今岁为民国纪元三十七年，实为我国历史上巨大变革之年，或亦竟为中华民族大革命胜利成功之年。

       我中华民族立国垂数千年。今日我国幅员之广亘，人口之众庶，国际地位之重要，国际关系之复杂，实为旷古以来所稀有。然而独夫专政，卖国丧权，一党独裁，营私舞弊，贪污横行，上下争利，凭藉外力，残杀同胞，狼虎当道，饿殍盈野，内战惨祸普遍深入，实亦开史所未有之先例。

       予于九年前，代表南侨，返国慰劳抗战军民，亲见独裁政府，贪污专横，残民以逞，而中共局处西北，生聚教训，发愤图强，固知分裂无可避免，变革已成定局。兹值岁序更新，时局动荡，独裁命运将终，民主胜利在望，故复不避重复，就过去之回忆，当前之瞻望，一抒所见，以就正于海内外先进之士。

       民国建立以来，军阀角逐，互争雄长，此仆彼起，内讧不息。掌握政权最久者，厥为袁世凯与蒋介石二氏。倘以袁蒋两相比较，袁为帝制野心，不惜勾结帝国主义，承认二十一条约，滥借外债，广植羽党，穷兵黩武，祸国殃民。蒋为巩固独裁，不惜割弃外蒙领土，旅大主权，与苏联签订卖国条约，复与美国订结丧权辱国之商约及航空条约，将全国国防秘密，交通主权，工商优惠，经济命脉，拱手奉送外人，使中国成为菲律宾第二。此其存心与袁氏如出一辙。然袁氏所承认之二十一条从未实现，而蒋氏手中所断送之领土主权，不可以数计，所借外债数额，尤十百倍于袁氏。不宁惟是，蒋氏认贼作父，卖国固权，罪恶昭彰，较之石敬塘，秦桧，吴三桂，汪精卫，犹有过之。日寇败降两年以来，余揭发蒋氏窃国罪状，向中外人士声讨，已历多次。盖自作孽，不可逭，自古已有明训，断未有卖国贼而能长治久安者。余为国家民族前途计，亦为公理正义计，故不能苟安缄默也。

       蒋氏以下，螃据党政要津，朋比为奸者，如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吴铁城，王世杰，陈仪，孙科，于佑任，戴季陶，张群辈，非贪污即无能，贪污必致乱政，无能惟有尸位。陈仪为祸闽罪魁，而复令继续祸台，张群治川多年，毫无建树，而令其掌握中枢。至其他诸人，声名狼藉，更无论矣。

       再就蒋军将领论之，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刘峙，蒋鼎文，胡宗南，张治中，汤恩伯，朱绍良，杜聿明均属蒋氏嫡系。何胡在八年抗战中，未曾亲临前线。顾祝同胆小如鼠。刘峙则一饭桶而已。蒋鼎文汤恩伯以数十万大军守洛阳，竟令未及十万之敌军，长驱直入，如鹰逐雀。及未两月，湘桂俱告陷落，国土数万方里，沦陷敌手。至于陈诚，自诩为国民党内之战略家，若据军事专家杨杰将军之批评，则仅能胜任一营长。杜聿明初到东北，民众欢迎，盛况不减于台湾人民当初之欢迎国军。曾几何时，腐败贪污，劣迹著闻，将骄卒怠，终至失败而去。蒋军十城如此，余子碌碌，更不足道。

       蒋嫡系以外之将领，如阎锡山，傅作义，张发奎，薛岳，李宗仁，白崇禧，余汉谋，罗卓英等。或则迷恋禄位，或则迫于淫威。大率与蒋貌合神离，互相猜忌，尽人皆知。近顷蒋介石军事挫败，嫡系部队多被消灭，故不得不将华北军权，付诸傅作义，将华中军权，付诸白崇禧，以期集中兵力，挽回颓势。傅作义本为晋阎旧部。阎曾语余：蒋介石如政治办得好，共产党自然无用处；政治办得不好，虽无共产党，亦必有别党起而反对。此为由衷之言。今日蒋政府好坏，阎非不知，徒为地盘及金钱军火接济，故不得不与蒋同流合污耳。广西李白，对蒋历史关系，颇与阎傅相同。李宗仁曾坦白告余谓：蒋委员长做事甚偏。夫偏则不正，不正则无是非。古语云，无是非之心非人也。白崇禧则称，彼与共产党无恶感，如共区政治修明，彼甚表同情。至于中共用兵，有神出鬼没之奇，彼尤极口称扬。今日解放区政治较诸蒋区优劣如何，白氏知之甚审。乃竟贪恋付总参谋长与国防部长之虚位，至不惜助桀为虐。其或韬晦待时，投机取巧乎？则欲冀其临危受命，以挽救蒋军在华中之颓势，必不可得也。此外如张发奎薛岳，早已消除兵柄，徒然备位素餐。罗卓英主粤无能，贿赂公行，今欲责令挽回东北危局，于事何补，由是观之，蒋介石剿共戡乱，转成为被剿被戡之势。军事崩溃，可计日而待矣。

       次就经济而论。国币汇率仅最近一年中，跌落一二十倍。国家岁出，八十巴仙以上，作内战军费，以至工商凋敝，农村破产，竭泽而渔，民不堪命，尽人皆知，无待词费。民国以来，海外华侨汇款，年达叻币二三亿元，先后合计近百亿元。核算美金为四十亿元。自政府发行法币，换取民间白银，不下美金十亿元，今此五十亿元之现金已无复余存，而泛滥全国者，则为万元十万元之大钞。据魏德迈调查，我国人存款美国，总数达十五亿美元，存在南美及欧洲者尚不计在内。此多四大家族及蒋府官僚剥削所积累之私产，其他人民所有者，则为数甚微。至今国家经济濒于破产，华侨损失与年俱增，孰令致之，固已洞若观火矣。

       共产主义之最终目的，在于将财富资产，收归政府统辖，然后公允分配，使民众咸享康强乐利之生活，而免社会发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畸形现象。然兹事体大，非咄嗟可期。苏联立国三十载，亦尚未达到共产主义之最终目标。至若我国，自属言之过早。就余所知，中共虽提倡共产主义，然在解放区所力行者，则为改良政治，铲除贪污，平均地权，复兴农村，振兴工业，整顿交通，安定民生，普及教育，凡此与孙中山先生所主张之三民主义，并无二致。至于真正之共产主义，则据中共人士称，或当期之于数十年之后耳。反之，蒋介石名为奉行三民主义，实则挂羊头，卖狗肉，独裁专制，残民以逞，有甚于暴君，则非孙中山先生之叛徒而何？

       抑民主与独裁原如薰莸不同器，水火不相容。曩岁国内举行政治协商，以期国共合作，成立联合政府，余即断定其为与虎谋皮，断难获得成功。盖秉政者或倾向于民主，或倾向于独裁，均系出自本性，断难率尔变更。如独裁与民主可以合作，则将成为“独民政府”；贪污和廉洁可以共事，则必产生“贪廉政府”而后可。试问天下安有所谓“独民”或“贪廉”之政府乎？至于美国过去名为调停国共，实则别有用心，不过欲假调人名义，暗中助长独裁内战，以遂其趁火打劫之愿望已耳。最近美国国会议员声明，美国宁愿有一贪污无能之中国亲美政府，而不愿有一廉洁清明之中国反美政府，此语将美国之对华野心，暴露无遗。当马歇尔所谓调停尚未失败之际，中共诸君亦明知调解无益，第在表而上不得不虚与委蛇。余则在当时早已断言独裁民主无法合作，一切惟有决定于战场也。

       今者国内局势几已大定。东北华北人民已获解放。华中华南到处民变纷起。中共解放军大举南下，所向披靡。独裁终至灭亡，民主终必胜利，已不待蓍蔡而后知。近闻得尚有人主张调停国共战争，实行两党合作，则不啻痴人之说梦也。

       抑自民国以降，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吾国所受创伤不可谓不巨，吾民所遭惨祸不可谓不重。值兹时局剧变，胜利在望，自应集全民之力量，毕革命之事功。一切惟有根本解决，以为一劳永逸之计。至若姑息苟安，养痈贻患，民主革命，功亏一篑，则再历三十六年，恐亦无宁息之日。一旦革命军事胜利，民主政府成立，尤应首先宣布取消各项非法条约及借款，没收四大家族及贪官污吏财产，以救济饥饿流离之民众。我国地大物博民众，内外恶势力铲除以后，复兴建国，突飞猛进，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贫为富，指瞬间事。民国三十七年其或为由黑暗进入光明之转变年，亦为我中华民族大革命胜利成功之年乎。回首故国，余企望之。

（卅七年一月一日）

**如何追悼侯西反**

       近日听说若干人发起替已经逝世三年多的侯西反君举行追悼会，我颇有几点感想：

       一个人死了，亲戚朋友哀悼他是私情，社会哀悼他是公谊，公谊的哀悼，说明死者对这一社会曾经有过道德上，或者学术上，或者事业上的贡献。如果死者有贡献与世界，整个世界都该哀悼他。西反君正象其他的人一样，总有他的短处，但他却有很可钦佩的长处：好义，嫉恶，刚直，勇敢，任劳任怨。他卖尽力气于排难解纷和公益慈善事业的募款工作，这两点无论从精神讲，从成绩讲，至今华侨社会中绝少人比得及。他遭诬陷，遭新加坡政府驱逐，是为公；他在祖国东奔西走，救济华侨机工，由成都飞昆明失事而死，也是为公。他对华侨社会确有贡献，他的死确是华侨社会的损失，大家要开追悼会，非常应该，毫无疑问。我本人和他有数十年友谊关系，公益慈善事业，关系尤切，对于他的死，私情公谊，更没有谁甚于我的悲痛！

       奇怪的是：这些人要举行追悼会，何以等到西反君死了三年多的现在？又何以发动于这一届中华总商会福建董事竞选剧烈的时候？如果说西反君死的时候，南洋群岛还在日寇蹂躏下，无法获得他死的消息，获得他死的消息也无法举行追悼；那么，盟军收复南洋群岛已经两年多了，何以不早点举行了呢？死者之骨已朽，才忽然涕泣滂沱地说要追悼，是诚意吗？西反君未遭逐以前，恶势力集团日肆侮辱谩骂，花大量金钱，收卖教育界败类，虚构事实，控告他；使他不得不为自卫为正义负担一笔可观的诉讼费，现在主持追悼他的人，当时究竟有谁给他精神上或物质上一点援助？西反君被限令三天出境，数千劳工界男女老少，亲戚朋友，云集飞机场，火车站送别，现在主持追悼他的人，当时究竟有谁参加？西反君出境以后，南侨总会，新加坡筹赈会，几次开会，责政府不公，为西反君的冤抑抗辩；现在主持追悼他的人，当时究竟有谁敢发一言？从西反君出境到新加坡沦陷这中间两年，近则他的家属远则国内他自己，现在主持追悼他的人，当时究竟有谁肯去慰问或者寄一封信？

       我以为大家如果真有诚意哀悼西反君，第一，要认识西反君的长处，记住他而且学习他；第二，要了解西反君家属的处境而予以直接间接的支持。

       西反君的全部产业是：

       住宅一所。

       彭亨和人家合伙经营的树胶园数百亩。

       大世界娱乐场十余年的租利权，每月一百元。

       南洋商报股份四千元。

       除上以外，亚洲保险公司顾念西反君对于该公司功绩，曾有一个时期，每月致送西反君家属优待费一百元。惟优待时期，恐已届满。至娱乐场租利权，自日寇南侵也已经一钱不还；后来经过屡次交涉，去年才以九千元一次清偿，取消原约，损失不下半数。南洋商报一本数倍之利，仅以原本抽出。彭亨树胶园，合伙者把持，无一利可分。

       上述情形看来，西反君的家属，正一步一步踏近饥饿线，大家忍心吗？视若无睹吗？说到这里，我仅作以下呼吁：

       一、希望亚洲保险公司破格继续拨优待费。

       二、请大世界娱乐场尊重原约，足数付出租利权。

       三、请南洋商报尊重股东权益，照得利分配。

       四、请彭亨树胶园当事勿欺死者，公平归割，或托人承买。

       如果大家不从学习西反君的长处，支持西反君的家属，去追悼西反君，则所谓追悼，完全没有意义。如果有所争，而不惜拿死人做工具，则“诸葛亮哭周瑜”，连瞎子都骗不了。

（卅七年二月廿一日）

**从未来世界大战形势**

**论美国不敢以军事援蒋**

       近日李宗仁对美记者谈话，陈纳德向美国会要求，均主美国应立即以军事援蒋，不然，则中国共产党势必胜利，以至统治全亚洲，而美国对华，将处完全失败之地位矣。

       曩者孙科布立特之徒，亦尝大言不惭，以为美国如予蒋介石以军事援助，则必可扑灭共产党，进而击灭苏联。此其所言，即属愚鲁，抑且谬妄。然兹李宗仁，陈纳德所言，则与孙科布立特，又有不同，中共终必胜利，美国终必失败，此确为亚洲未来之事实。惟所谓“共产党统治全亚洲”，究亦近于谬妄。盖中国决不若日美之野心勃勃，诈伪奸险，损人利己，助桀为虐。中国一旦民主胜利，断不欲统治亚洲其他民族，惟当领导其他国家，解放一切被压迫民族，使人类咸享自由平等和互助之福利，此则大势所趋，沛然莫之能御也。

       南京政府诸卖国贼，美国诸野心家，狼狈为奸，扩大中国内战，残害中国人民，亦既两载余。虽军事经济政治，走头无路，独裁者日暮途穷，覆亡在即，犹复哀求美国，出兵援助，敢为石敬塘，吴三桂而无所顾忌，彼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原已垂涎欲滴，而对军事援蒋，犹复聚讼纷纭，迟疑不决何也？盖军事援蒋，将不免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世界大战一旦来临，美国绝无胜利把握，甚且等于自掘坟墓，故有所惮而不敢遽作决定也。

       假定美国出兵中国，实行军事援蒋，因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则其前途若何乎试申论之。

       第三次世界大战，为反民主与民主之战。反民主阵营与民主阵营，双方人力悬殊，至若武器配备，资源生产，除原子弹外，双方约略相当，然原子弹秘密，现在非美国所独有，而仅恃原子弹亦不能征服全世界，其理甚明，姑置勿论。就战略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胜败决于海上与陆上各半，至第三次世界大战，主要为苏美之战，胜败必决定于大陆战场，至于海军仅用于保护海岸与军事运输，将无重要之作用。

       大陆战场，以欧洲为主，而亚洲次之，盖美军欲直捣莫斯科，必取欧陆，断不能迂迴西伯利亚，作万里之远征，亦甚明也。

       欧洲战场，法意两国，内部分裂，与中希无殊，所不同者，法意今尚未发生内战，一旦世界大战爆发，两国尚不能保持中立，内部必起剧变，恐不必俟苏军进入国门，国内已起革命。此外英、比、荷、土等国，人口不过八千万，除海空军及内地警卫部队外，可供调遣作战之陆军，最多当不过三百万人，美国人口一亿四千万，上次大战动员兵力亦不过五百余万，除用以防卫国内变乱及留驻日本者外，陆军可调往海外作战者最多四百万人，倘以半数开往远东，则在欧洲大陆作战者不过二百万人，合计不过五百万人。

       至于民主阵营方面，苏联人口二万万，男女多受军训，除海空军外，最少可出陆军一千万人，加以东欧及巴尔干方面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等国，人口一万万有奇，可出陆军五六百万，合计即有千五六百万。

       民主阵营与反民主阵营相较，不但兵力超过三倍，且苏联与东欧各国，国土毗连，农产丰富，政制统一，民心一致，且为正义而战，为保卫民族生存而战。若美国等僻处海外，运输困难，西欧国家，陆地偏小，粮食缺乏，加以阶级分裂，民心涣散，师出无名，劳苦大众，供数十家富豪牺牲作炮灰，非所甘心。以此不仅前方兵力，众寡悬殊，而后方随在有变起萧墙之虞，设令土耳其一隅失利，非洲亦难保存，地中海虽有天险，亦难固守矣。

       次论亚洲战场，美如出兵援蒋，对中国不宣而战，必须以半数军队，准备侵欧，其能调往中国作战者，最多亦不过陆军二百万人已耳。假定美国陆军战斗力，可与日本陆军相匹，则最多不过如抗战时期，占领我国沿海城市及若干点线而已。美军断无占领中国广大乡村及内地城市之可能，反之，苏联陆军可顷刻占领朝鲜南部，势如潮涌，虽日本本土亦难防御苏军之进击。若以二百万美军，入据中原，与数千万有组织有训练之中国民众为敌，势将不战而自溃，加以美国国内贫苦劳动群众，群起反战，爆发革命，则世界局势，将起空前巨变。华盛顿诸战争贩子，华尔街诸富豪财阀，恐将无藏身之地。虽欲为沙皇倒后之白俄而亦不可得矣。

       总而言之，世界非复昔日之世界，而中国亦绝非前世纪之中国，南京卖国贼至死不悟，其哀求美国军事援蒋也固宜，然华盛顿战争贩子，华尔街富豪财阀，则非不知世界大战之不利于己，其色厉内荏，举棋不定者即以此。反之，华盛顿倘竟无所顾忌，以军事援蒋，作孤注之一掷，则行见美国命运将迅即随蒋介石而同归于尽。“多行不义必自毙”，此之谓也。

（卅七年三月十五日）

**蒋介石表示不要做总统**

       伪国大开幕后，蒋介石突然表示不做大总统，愿将灸手可热之元首地位，让给别人。其原因何在？中外人士纷纷推测，莫衷一是。有谓蒋氏系半推半就，故意作态。有谓蒋氏乃以退为进。亦有谓总统并无实权，故蒋氏宁愿退就行政院长一席。

       以余所见，则殊然，盖蒋介石掌握军政大权，独裁专断，已成习性，伪宪条文，视等弁髦。不论蒋氏就何官位，政由季氏，祭则寡人，固无人能加以争竞，亦无能加以干预，此理甚明，无待多赘。其所以表示不做总统者无他，军事崩溃，人心离贰，败局已成，无可挽救，美既不能派兵参战，而第三次世界大战，更属遥遥无期。故蒋氏为自身打算，总统高位，不敢自居，亦不能自居，请再申论之：

       国共战局，在东北方面，大势已定，国军仅余长春沈阳二城市，楚歌四面，摇摇欲堕。残存部队，虽欲撤走，亦无路可退，迟早必全军复灭，损失官兵，当有四五十万之众，此其一也。

       东北战事，一旦结束，则共军最精锐最英勇之部队，至少六七十万人，长驱入关，有如狂风扫落叶。内蒙及晋冀一带，国军所占地区，或仅存走廊，或成为孤岛，本已不堪一击，如人关大军加以猛扑，则华北五六十万国军，亦成瓮中之鳖，此其二也。

       大江以北，鲁豫皖鄂苏诸省，国军现有实力，亦约六七十万人，遭陈毅刘伯承部牵制袭击，早已失去主动。倘华北丧失，则势成孤军，虽欲撤至江南，亦恐已晚。长江虽曰天堑，亦无法阻止共军之大举南渡矣。此其三也。

       西北地广人稀，防务空虚。河西国军虽有十余万人，然延安洛川，早被包围，西安亦受威胁。观诸胡宗南氏之匆遽赴京，可见西北已成垒卵之势，胡部纵能退入川境，当亦不过少数。此其四也。

       长江以南，川康湘赣云贵闽浙粤桂及鄂皖苏之一部分约计人口二万万。地广民稠，遭受虐政，最为惨烈。目前国军不过二三十万人，分散各地。虽有地方保卫团，则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职是之故，现在各省民众，大多不堪苛政，纷纷揭竿而起，有已激成巨变者，亦有在酝酿中者。不待共军之渡江，反独裁斗争，固已成燎原之势，此其五也。

       去年七月共军发动大反攻以来，各处战场，主动权均操诸共军之手。东北、西北、内蒙、华北、华中，国军望风披靡。不及一年，国军二百余万人，折损四分之一。即今所存不及百五十万。就上述情势，今后国军即作最后之挣扎，亦无异螳臂之挡车。此为历来未有之军事悲剧，国军土崩瓦解，固可计日而待也。

       民国初年，袁世凯妄思称帝，后知为民众所不容，故自行取消帝制，悔恨而死，遗臭万年，为天下笑。今蒋介石倘不做总统，断非有其他用意。盖独裁到底，则无佛朗哥之幸运；自刎乌江，则乏楚霸王之勇气；若赴华盛顿，作流亡总统，则徒为世人所讥笑。故计惟有牺牲总统之地位，以作日后之退步也。

（卅七年四月八日）

**蒋介石的“最大错误”**

       据报载廿八日美联社南京电，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结束的会议上演说，认为他的最大错误，就是在抗战时期容纳中共。他说：“我在那几年中有很多错误，但是最大的错误，就是容忍共产党。我容许他们参加国民参政会，并且给予他们以特权，以致造成我们今天的处境。”

       前年九月七日，余致电美国杜鲁门总统，其中云：蒋介石等“就本人多次接触，深知其昏庸老朽，头脑顽固，断不足与言改革。”今美联社所传蒋氏之演说，则益证余言之不谬矣。蒋氏行年六十余，其一生奸诈独断，专横腐化，祸国之惨，害民之众，史无其匹。今则天怒人怨，众叛亲离。行见身败名裂，遗臭万年。乃复不知悔悟，竟诿为容共抗战之失计。其自欺欺人，恬不知耻，竟至于斯极。余故再举事实数端，闢而正之。

       （一）二十五年西安事变之发生，实由蒋氏主张先安内后攘外，不愿抗日，故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谋实行兵谏。当时中共在陕北，已有民众基础，非武力可消灭，惟为委曲求全，息争御侮起见，故与蒋氏立约，如敌侵华北，即全面抗战。此在中共，志在挽救国家之危亡，可谓仁至义尽，苟其不然，蒋氏安有生存之理耶？

       （二）抗战开始，中共所部属万众，在晋北浴血抗战，蒋氏从未有一枝步枪，一粒炮弹之接济。当抗战初年：每月亦仅拨给些许枪弹，嗣后则完全停止。抗战八年中，八路军将士，出生入死，为国献身，从无一人之擢升。而蒋氏嫡系部队，无功受奖者，盈千累万，此为中外咸知之事实。今蒋氏竟谓误在容忍中共，其谁信之？

       （三）二十九年，余自西北返渝，蒋介石探询，在晋时阎锡山将军曾向余作何语。余质直告之：余曾告阎，国共磨擦，经白崇禧将军调解，双方划定驻防界线，从此可免发生严重冲突。但阎将军则云，此非根本办法，根本办法，须国民党政治行得好，共产党自无能为力，否则纵令无共产党，亦必有其他党派，起而反对政府也。余以阎将军此语，极为中肯，故率直转陈，冀再采纳。孰知蒋氏闻言色变，竟向余破口大骂共产党，谓：“抗战若要胜利，必先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不消灭，抗战决难胜利。此种事在外国已多经验，必消灭国内反对党，对外方可获得胜利，我国亦不能例外。”语时面红气促，声色俱厉，蒋氏继又称：“此等语我从未向人说，今特对汝说。”蒋氏对中共，仇恨之深，于此可以概见，今竟谓于抗战时，容忍中共，则非自欺欺人而何？

       （四）自蒋氏向余大骂共产党之后，不及数月，即发生江南新四军被屠杀惨剧。蒋氏嗣又自抗战前线调精锐部队十万至西北，包围边区，杜绝其对外交通，惟仍无法加以消灭。若谓抗战时期，未及消灭，系属错误，则在抗战前，蒋氏曾亲赴西安督战，以期灭共，然共未能灭，而本人则被囚蒙难，蒋氏何以健忘若此乎？

       （五）抗战八年中，中共不获政府接济，大敌当前，而能自力更生，愈战愈强，在晋省作游击战，牵制敌军数十万。当时如无八路军，则晋阎军队，必被迫撤至河西，不但山西全境沦陷，川陕亦难苟全。在抗战时期，以日寇之强悍凶猛，尚不能消灭中共，时且不能阻止中共之发展。今蒋氏竟乃大言不惭，谓当时容忍中共，系最大错误，岂不谬哉！

       （六）蒋氏谓容许中共参加国民参政会，亦属大错误，更属谬妄之至。盖国民参政会包含参政员二百人，国民党员占其大半，中共参政员尚不及十人，不过备位而已。况参政会为一虚设之机关，军政大权，操诸独裁者一身，人民无权过问。故邹韬奋先生在其所著《抗战以来》一书中，称国民党参政员为被请之客。纵使中共参政员名额增加十倍，亦并无裨益。蒋氏竟谓容许中共参加参政会，系大错误，诚欺人太甚矣。

       总而言之，蒋介石处心积虑，谋消灭共产党，实较消灭日寇，更为迫切。在抗战之前，抗战初期，中期，末期，以至抗战之后，蒋氏固无时无刻，不作消灭共党之想。然中共不但未见消灭，转且日益强大，以造成今日之局势，此非蒋氏不欲消灭中共，实则其力断不能消灭中共也。蒋氏谓容共系彼最大之错误。究其实，蒋氏从不甘心容共，其所谓容忍中共，非出不得已，即属虚伪诈欺，则所谓错误更自何而来？故余以为蒋介石错误不在此，而在于不接受阎锡山将军之言，反诿过于中共，时至今日，末日临头，而犹中风狂走，至死不悟，则皆咎由自取也。故曩昔余屡言与蒋介石谈民主，等于谋皮于虎。而余致美总统电文亦称，蒋介石其人，断不足与言改革。观诸今日，则余所言，益信而有征矣。

（卅七年三月卅一日）

**中国内战何日告终**

       日前报载：南京国防部长何应钦，在立法院秘密报告国共两方军队实力，谓太平洋战事告终时，国军有三百七十余万人，步枪一百六十余万枝，大炮六千余门，共军则有三十余万人，步枪十六万枝，大炮六百余门，迨至现下（按当指五月底，因何应钦报告系在六月中旬。）国军仅存二百一十余万人，步枪九十余万枝，大炮二万一千余门，共军则增至二百六十余万人，步枪九十余万枝，大炮二万二千余门。

       又报载纽约通讯，谓军事评论家威尔纳，在纽约下午报发表一篇论中国战局评论，中云：“反蒋的中共军队必须重视，他们显然已在打胜内战了。无论在数量上和组织上，他们都胜过南京军队。蒋军在数量上的优势，到今年已经过去了，数量的优势不再是蒋军的了。据审慎的估计，共军现在有正规军一百五十万人，单位较小的游击队，也有一百五十万人，共三百万人，还有解放区大后方训练的大量后备军，而蒋军实际参加作战的部队，不会多于一百五十万人。”

       余意何应钦秘密报告，当接近事实。而美国人威尔纳之评论，亦当有其根据。威尔纳所言蒋军数量，比何应钦所言，减少至七十万之多，或有两项原因：

       （一）国军每师每旅素常不足其兵额，如减一成或二成，则少去三几十万人。

       （二）威尔纳所言，当指直接参加与共军作战之军队，若华西华南，如新疆、四川、西康、云贵、湘赣、闽浙，两广及苏南等十一余省区，至少亦有国军三几十万人，以防地方之民变，而非可直接参加与共军作战者。

       除去上述两项六七十万人外，威尔纳所言蒋军一百五十万，与何应钦报告，无何相差矣。

       国共两方实行大规模内战，系自前年七月起，至本年五月止，计二十三个月。在此期间，国军由三百七十余万人，减至二百一十余万人，损失达一百六十万人，平均每月损失七万人，而共军由三十余万人增至二百六十余万人，计增加二百三十万人，即每月增加十万人。如今后国共两方军队之增减，亦依照此种速度，则再过一年，国军当减少八十余万人，仅存六十余万人，可在前线与共军作战，而共军可能再增一百二十万人，共达三百八十余万人。其时，力量将更悬殊矣。

       前者，共军寡，军械少，故遇大队蒋军，则退避三舍，不愿轻作阵地战，而常相机进行运动战与游击战。共军在此种情况之中，尚能逐月消灭蒋军许多。及至近月以来，战事已大有不同。共军对于蒋军大兵团，已可与之分庭抗礼，不但可作普通阵地战，且可对若干大城市实行攻坚之战。尤可注意者，为共军在若干战场上均操有主动权。如此则今后逐月所消灭之蒋军，可能较以前更多。据新华社之报告，五月份消灭蒋军十三万余人，六月份十五万余人，七月份或可至二十万人以上。假定今后蒋军除补充外，平均每月尚须损失十万人，则由六月起至年终止，七个月将消灭八十余万人，而在前线将仅存七十万人。以七十万人之蒋军，而欲抵抗三百余万之共军，则无异螳臂之当车。除美国助以原子弹或举世未发明之特殊军火，免用人力作战，或可以制胜共军外，否则，中国内战告终之期，可以想见矣。

（卅七年七月十七日）

**国共决无和平可言**

       近日报载：北平谣言甚盛，谓国共再谈和平，周恩来到北平与张群及李宗仁秘密会议云云。南京方面虽指其为无稽之谈，不足置信，但据云有少数军界人士，则认为某种事物在酝酿中。事虽属于谣言，然古语云：“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李宗仁凯觎政权，正盼政局变动，无庸讳言，绝非无风生浪也。

       然国共合作事，果能实现乎？自日寇败后，经年之内，全国人士热烈期望和平，俨似目的可以达到，惟余个人之见解，则绝对不敢苟同。在吧城及本坡两次对余之欢迎会中，余均断定国共之间无和平可言，并认为当时所谓“还政于民”之呼声，实谋皮于虎，余敢如此断言者，系根据本身之所闻，所见，与仅凭阅报与风闻而揣测者不同也。

       余前代表南侨回国慰劳抗战军民，到重庆后，因国共磨擦似有剑拔弩张之势，故决意亲到延安考察中共情况。余对中共最注意者三项：

       一、政治如何说施。

       二、抗战是否积极。

       三、其地区之民生与治安何如。

       在考察中，知中共所实行者尚非共产制度，而为三民主义，其抗战之积极以及陕北一般情形，均令人满意。及回重庆，国民外交协会邀余演讲，定讲题“西北之观感”，余乃将所闻之事实报告，而党人则大不满，谓余代中共宣传，即派吴铁城南来，破坏华侨团结。加以陈仪祸闽惨重，经余加以攻击，由是中央政府当局对余更形痛恨。迨至放弃外蒙，丧失旅大主权，与苏联订立不利于国家之条约，以巩固其独裁政权。余复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发出通告，指为卖国，主张不承认其条约，后又反对其与美国订立丧权商约，及许其驻军国内，并电请美总统勿助纣为虐，助长中国内战之惨祸，由是新加坡及马来亚各党报，及准党报，对余大谩骂，而若干会馆或商会，亦多起而效尤。盖新加坡及马来亚诸大会堂，总商会，商会，会馆以及其他有势力之社团，多在党人之手。余明知孤立乏援，然为良心所驱，义不能辞。对于误国行为，余当然不能缄口也。

       国家与社会虽不同，然关于同作一事，则有类似之情形。辟如有人视蒋介石为天皇神圣，是非不讲，而余则认其为误国误民，是非要明，彼此意见无殊水火，决无合作之可能。国共之必然分裂，各走极端，亦若是也。余自民二十九年到重庆及延安，与国共各领袖接触后，早已判断两方终无合作之可言，时至今日，更毋须多赘矣。

（卅七年七月廿八日）

**再论中国内战前途**

       前日报载新华社社论，谓“中国人民至少要准备三四年时间作艰苦斗争，才能最后解放全国，并在民主基础上，统一全中国”。又云：“保证内战的第三年中，取得更伟大的和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就此两段而言，末段所言第三年中取得更伟大，和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其含义之深，至堪玩味。至首段所云，至少还要准备三四年作艰苦斗争，或未免使若干急性乐观者，感到失望。然实事求是之士，言信行果，固常谦虚慎重，不发不能兑现之诺言，不似孟浪之流，动辄得意忘形，谓三个月就可打败敌人，六个月就可消灭异己也。

       我海外华侨，对于祖国军事政治，虽多门外汉，而报章之传载，又多宣传作用，然欲知国共将来谁胜谁败，亦有历史义理可稽。在政治方面，须视民众之向背；在军事方面，当视有生力量之消长。审此二项，当不难预断谁家胜败。国共两方在政治上之设施，已历十有余年，谁好谁坏，凡身历其境，与及经常注意书报记载者，当不能指鹿为马，毋待详论。至军队实力之消长，余于七月十七日在本报所发表之专论《中国内战何日告终》一文，已略有谈及。该文所言数字，系根据国防部长何应钦及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所言。回忆前年七月蒋介石氏未发动全面内战之前，报载国军原有二百七八十万人，收编伪军九十余万人，在后方训练六七十万人，合计四百三四十万人。加上美国海陆军之声援，及美国在水陆空运输之助力，殆以为投鞭可以断流，大有灭此朝食之概。而当时共军正规军传仅有四五十万人，游击队七八十万人，只有国军四分之一耳。据前月何应钦在立法院报告，共军现有正规军二百六十万人，游击队多少未有提起。然游击队在共区亦甚重要，当然不能加以忽视。据威尔纳言，共军游击队有一百五十万人，兹如以半数七八十万人计，合正规军可有三百三四十万人。是则内战两年，国军由四百余万人，减至二百一十余万人，损失超过半数，每月平均减十万人；共军由一百三十万人，增至三百余万人，每月增加十万人。今后两方有生力量，如照以前之速率消长，则内战胜败决定之时期，可以想见矣。

       据新华社报告，内战二年，消灭蒋军二百七十余万人。想蒋军两年间征抽壮丁，约有一百万人左右，其中死亡及逃走亦属不少，所以仅存二百一十余万人耳。

       现下蒋管区人民，除回教徒藏族及苗夷等族，不能征兵外，至多约存二亿五千万人。以粤省征派壮丁数目言，上半年要五万人，限期虽届，实征不上三万人。按粤省人民三千万，全年要征十万人，即每千人征三人有奇。以二亿五千万人计，应征八十余万人。前日报载上海市欲征壮丁六千余人，届期征到者不上二千人，而逃亡者又不少。敝乡集美人口千余，上半年被征二人，征去后不久即逃走一人。由是观之，全年欲征八十万，除去不能征足及逃亡数目，可征实额每月恐不上四万人耳。新华社报告去年七月至本年六月，一年间消灭蒋军一百五十余万人，平均每月约十三万人，除去新兵补充四万人，旧兵每月尚须消灭九万人，此后战区愈广，战斗愈烈，其损失恐有增无减矣。

       鄙意国共两军再经相当期间显著之消长，实力当更悬殊。最后蒋氏或可退守上海与天津等大埠。如沪津等失守，则蒋府虽移到任何区域，以图苟延残喘若干时间，大局便是已经失败，对国际上无可再代表国家之资格矣。

       新华社社论谓内战结束，至少须再经三四年，系指全国完全解放统一而言。以我国幅员之大，边区之广，情形复杂，交通不便，如绥远宁夏甘青新疆西藏川康云贵及台湾等，难保无野心军阀割据，至于倔强将领，畏罪逃亡，盘据挣扎，加以美帝国主义野心未死，利用我蝥贼，摇动我边疆，尚有可能。故须以一二年或二三年间剿抚肃清，乃能完成统一。想非腹地大局胜利，亦须如边疆拖延多年之谓也。

（卅七年八月九日）

**徐州大会战与全局决定性**

       日前报载：美国斯克里浦斯霍华德报纸说，蒋政府三个月至六个月将倒台，并责华盛顿白宫，不能于一年前坚决援助之错误。又希望杜威当选执政时，局势未坏到不能挽救之程度。我国古语所谓“利令智昏”，正为此种美国人之写照。美国援蒋之必无效，余前年九月致电美总统及参众两院长，曾对彼等提出警告：“任何外来金钱武器对中国之压迫，决无效果，勿误信武力可灭公理”。再后复著论“美国救蒋必败”，及“从未来世界大战形势，论美国不敢军事援蒋”。此为去年及在今半年以前之事。以彼等美国之军政大员，及有权威之名记者，时至今日，尚未了沏当前局势，而立言竟荒谬至此，岂非利令智昏耶？

       至谓蒋介石三个月至六个月将倒台之说，能否实现，固未便臆断，惟回忆数月前，国防部长何应钦，在立法院秘密报告国共两方军队数目，当时余曾依据两年间双方军队之消长情形，著为“中国内战何日告终”一文，计至本年终，蒋军与共军实力之比较，即无异螳臂之当车。兹再就何部长报告后，各战场演变之经过述之。本年六七八三个月，据新华社报告：蒋军损失五十万人；九十两个月，济南锦州两大战役，及长春投降，按其损失，应在四十余五十万人之间，合之六七八三个月损失，共为一百万人左右，何部长报告时，蒋军计二百十八万人，数月来之补充兵，除军中逃走病死外，约有二十余万人，共二百四十余万人。此数之中，除留在华西华南防止民变者廿余万人以及数月来上述之损失外，剩余不过一百廿万人。而此一百二十万人中，分配在西北廿万人，在东北华北五十余万人，其可在华中分布于鲁豫鄂皖及苏北者，仅四十余万人矣。如此广大地区，尚须留防青岛，豫西，鄂省，至少应十余万人，则其能集于徐州四郊以作会战之孤注者，只三十万人耳。共军陈毅、粟裕两将军指挥下者，约有四五十万人；刘伯承将军所部亦不下四十万人，纵抽半数以防制豫西鄂省，参加徐州大会战者，亦可有二十万众以上。计此次鲁南豫东苏北皖北四省区域，范围广大，战线数百里，两方军队几及百万人。飞机、大炮、战车，美国式机械化部队，应有尽有，诚为我国有史以来，对外对内战争规模之最大者。此为一决定性之战役，在此两个月内，胜负可能解决。尔时若犹未能决定，蒋方可再由江南倾调其新练之十万至二十万人来助战，而共方则由东北华北，可再调廿万至卅万人来参加。如此则日子延长，战争更烈，战士伤亡及人民损失之大，当亦为前此所未有。或云蒋军兵员不只上述之数，但据前月报载，其军事家切实调查，蒋军在各战场共计一百四十五万人，如除去九十两月损失四五十万人，所剩不过一百万人左右，则更少矣。徐州大会战之后，全局胜负如何，不难由此决定矣。

（卅七年十一月一日）

**辨匪论**

       匪字解释为寇盗。强暴抢劫谓之寇，偷窃假冒谓之盗，此乃人类中最卑鄙凶恶，无人格如同禽兽者。在我国内战中，蒋政府及国民党人等，每指中共为匪，共军为匪军，共党为匪党，内战为剿匪。彼等应查中共有为匪之确实根据，始可加以此最不名誉之恶名，否则系诬蔑耳。

       强暴抢劫及偷窃假冒之流，均为自身及私人利欲起见，每贪污无厌，除浪费外复积蓄财产。余前年到中共所统治之延安多日，所见所闻，已载在《南侨回忆录》。虽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绍禹及其夫人等之生活均简单朴素，与乡村平民无殊。若酒楼舞馆，唇红口丹，则绝迹不见。公务员生活费，由政府定例供给，绝对不能别营私业，故无奢侈浪费，更无积蓄财产之可言。高级官吏以身作则，安可容下属越轨行为？夫如是指斥为匪，余所以不得不辩也。

       民国光复后，军阀割据，迭起内争，贪污官吏虽多，浪费而外，积蓄或属有限。政府印发纸币及公债券，多有相当限度；经济上无巨大之出入，故鲜有官吏寄存外国巨款也。南京政府自民国十七年后，年年发出大量公债券，及实行“币制改革”，严令没收全国银圆为国有，更源源印发纸币，由是四大家族之财富，日渐增进，而孙科吴铁城及其他要吏，亦得共同染指，抗战事起，巨宦军阀，财源更广进。闻上海产业税，何应钦列居有数地位。民国廿七年冬，香港议政局员冯香泉先生来晤，余询人言陈济棠巨富，在港置业甚多，是否事实。并言国内官吏巨富，陈济棠仅列在第十一名耳。

       四大家族及孙科吴铁城何应钦等，在民国十七年以前，或恐无立锥之地，虽有资产，想亦有限。而十余年间，除浪费及国内资产外，复寄存美国美金若干万万元。此种暴富，若非剥削民脂民膏，则系盗窃国库，否则从何而来？民国廿九年夏马寅初先生在重庆大学演说，云国家处境何等危险，而保管外汇之人，尚再逃走外汇，获利五七千万元，是要留为子孙买棺木。言间几于声泪俱下。其时重庆官吏，应酬浩繁。酒楼菜馆，车水马龙，摩登妇女，唇红口丹，与所谓战时节约，大相迳庭。福州万寿桥上，饥民投江而死者千人，而酒楼菜馆，终夜辉煌热闹，与重庆无殊。所有阔客，大部份为公务人员，及与官僚资本有关系之豪绅。此外，特务遍布全国，国民党机关人员，贪污勒索，陷害无辜，草菅人命，罄竹难书。至为金钱而被利用为鹰犬之徒，且不限于国内而已也。

       当南洋各属将陷沦于日寇之手，华侨汇寄款项回国，不下数万万元，多被扣留不交，任侨眷贫寒凄惨，置之度外。迨日寇败后，国币降跌九十余巴仙，银行及权威机关，始迫侨眷收领。如陈六使先生托余由中国银行电汇七百万元，交闽南集美学校收，而重庆总行及政府，藉词推诿延宕，不肯照交，虽百方交涉，犹拖延经年，至国币价值已降跌大半，始在渝交还。由渝汇闽，须亏汇水六十余万元，合计损失五百余万元。余在此向中国银行交涉年余，一文不肯赔补。以学校公益之款，尚且巧取豪夺，其他可以想见矣。

       去年李宗仁孙科争选副总统，每人开支运动费数十万万元。此种巨款，若非抢劫人民，则从何处而来？八月十九日实行所谓“改革币制”，蒋经国对四大家族及权威文武官吏，不敢过问；对诸商家及人民，则威胁百端，几于竭泽而渔，寇盗之行为，或用心，或用力。以阴谋巧取之豪夺，其罪恶每甚明显之抢劫也。以上各情，均为中共所无，独为蒋政府所有，乃反指中共为匪，国民党人若稍具天良，抚心自问，必能明白谁方是匪也。

       蒋政府近因军事失败，在京沪大封船只，将所有南京上海公共重要物资，运往台湾，作为己有。他日再败，则运逃往外国。南京上海，不日解放，新民主政府即将成立。其时反动派若据台湾为地盘，则更无异叛逆之匪类，所有战舰飞机商船，当为匪舰匪机匪船，余去年曾论，蒋介石将作流亡总统，若如此，“流亡总统”之外，尚当增加一头衔。所谓四大家族，当称为四大匪族，乃能名称其实也。

（卅八年元月卅一日）

**领袖与诚信**

**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欢迎尼赫鲁大会演讲**

       印度民族领袖尼赫鲁先生！中国总领事暨诸位来宾先生！本晚余以南洋华侨筹赈总会名义，代表南洋千万华侨，欢迎印度民族领袖尼赫鲁先生，先生此来为视察战后印度侨民生活状况，我华侨得以相见，实为难得良好机会，先生非印度之大官，亦非印度之大富翁，而本会之欢迎者亦不在乎是，而在乎先生之伟大人格。盖先生平生受尽艰难困苦，为印度民族求解放，为数万万人民谋幸福，早为全世界人类所同情，亦为我中华民族所敬仰也。

       余以为历史上凡能成伟大领袖者总不能离去“诚信”二字。就普通平民言，若无诚信，已失其作人之资格。我国古云，“不诚无物”又云人无信不立。自数千年前创造中国文字时即有此意，如诚字拆开为言与成，意谓所言必成行方谓之诚。又信字拆开，即人与言，谓人言必信是也。然世界中有堂堂大国及一国中有权威之领袖，对诚信二字，完全放弃。如许人独立，往往食言；又如开口屡言民主，实则行独裁专制，历过已十余廿年之外，多是自欺欺人。但潮流所超，时至今日，如复执迷不悟，后悔恐将无及也。

       贵印度数万万民族，脱离苦海，而登袵席，有赖于先生之领导。我中华民族，亦希望确有诚信伟大之领袖，出而拯救四万万人于水火之中。我中印的民族之外，希望他国亦有真正人道主义之领袖出而合作，领导全世界人类均获大同平等之幸福，尼赫鲁先生除领导而外，亦领导世界之数人中之一也。

       近因当地节约限制，本晚宴会菜物淡薄，未尽欢迎之意，尚希原谅。

（民国卅五年三月十九日）

**关于纪念国庆的纠纷**

**——在新加坡福建会馆致词**

       ［民国卅六年十月六日南侨日报新闻］关于庆祝三十六年度双十节，新加坡华侨均正热烈筹备庆祝。甚多侨团因为不愿向独裁者致敬，既不愿参加中华总商会之庆祝会，更不愿参加国民党所包办之庆祝会，故多决定分别庆祝，以表示华侨真正爱国之精神。

       新加坡福建会馆筹备庆祝国庆，及报告本年八个月收支账目，特于昨晚七时半假恰和轩俱乐部召开第八届执行委员第六次会议，结果议决按照去年办法，联络会员及福建会馆属下南侨，道南，崇福，爱同四校员生及学生家长，于十月十日在爱同学校举行庆祝会，并决于是晚参加爱华音乐戏剧社主办之提灯游行，属下各校校车三辆，亦载学生参加游行。一切事宜，决由教育科主持办理。此外决不参加其他任何“庆祝大会”。

       昨晚会议期间，主席陈嘉庚即席发表演讲，痛论华侨分裂问题。

       兹将陈氏演词录下：

       新加坡马来亚华侨，自民国光复后，所有国庆纪念会，多由中华总商会或商会召集，领导庆祝，至由总商会召集领导之原因，为各处华侨社团之总机关，若省县会馆，则偏于一方，唯有商会为侨众所组织，且各帮多有参加，故凡华侨对祖国及居留地，有重要事项，非由商会召集，亦多假商会为会场，可见总商会被公认为最高机关，负责对内对外，领导团结，联络情感。当其事者，必公忘无私，直道而行，庶可问心无愧，有益侨胞，了无疑义也。

       自民国卅年，吴铁城南来，掀风作浪，分裂华侨，破坏团结，致南洋各处侨胞，有党派与无党派之分，意见日深。迨日寇败后，祖国国共内战，影响华侨派别更甚，尽人都知，致客岁庆祝国庆，不能合作，殊为遗憾。

       本年国庆纪念日，各华侨均希望总会对往事引为前车之鉴，预行计划，以期联合举行，不意不但不能联合，有人反且预造鸿沟，蓄意分裂。前月在吉隆坡，开马来亚各地商会联合会，竟通过一议案，致电南京政府，赞成所谓“戡乱”总动员令。查总动员之目的虽多，其重要者有两事：第一，要大征壮丁送往战场作炮灰，而国民年龄在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均列为壮丁；第二，要征粮征财，甚至竭泽而渔，使家破人亡。政府此种行为，关系华侨家乡子弟生命财产，惨无人道，痛心莫可言喻。而领导华侨机关之商会联合会，竟火上添油，助纣为虐。彼岂不知如此举动，必使华侨益趋分裂？明知而故犯，非有意破坏团结而何？总动员令出于独裁政府，刀落头断，施行已有日月，商联会今表示所谓赞成，实为画蛇添足，与实际风马牛不相及，无丝毫价值可言。何必多此一举，以增加华侨之分裂，此次各处总商会开会，对庆祝国庆发生纠纷，商联会诸代表不能辞其责也。

       但是商联会既负责领导职责，果热诚拥护所谓总动员令，不宜只发一纸电文就可了事，应实地总动员，庶出力出钱，方能名副其实。尤当以身作则，派遣其子弟回国赴敌，庶不徒托空言，问心无愧。否则未免违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古训矣。

       关于此次新加坡总商会，对开会庆祝所引起之纠纷，党人原在岗州会馆开会，谋领导若干社团庆祝国庆，而广东会馆主席，拒而不肯参加，诿谓应尊重总商会领导方为得体。在表面上观，似属至公无私，有拥护总商会真情实意，而不惜牺牲其党人之合作，究其实，其然岂其然乎？彼之不肯与党人合作，为不甘受“小子无知（此四字出其人之口）之领导，故藉尊重总商会为辞。设岗州会馆开会时举他为主席，则感激不暇，安有反对退出耶。

       盖彼之地位，在国为参政员，在洋曾为商会长，在社团为省会馆主席，在党为红员，口是心非，声名四溢，小子无知，竟敢冠履倒置，真不自量也。

**祖国光明在望**

**在新加坡福建会馆职员就职典礼中致词**

       ［南侨日报三十七年三月廿八日讯］新加坡福建会馆，昨日上午十时，在直落亚逸该会馆礼堂，举行常年会员大会及旧职员交卸，新职员就职典礼。席间，陈嘉庚氏致词，用坚决态度，指出在此届新职员任期之二年中间，中国良好政府必能建立起来。此良好政府必能对华侨教育事业，以及对华侨回国从事种种事业，予以保障。

略称：“此次承同侨过爱，举为常务主席，而弟在每次被举时，均予接受。其原因，一方面不欲客气，另一方面则感并无事做。

       “关于无事做一点，不但福建会馆如此，南洋各省县会馆亦多如此。其原因乃华侨社团之知为国家社会服务，乃仅民国成立以来三十余年之事。在三十余年前，中国人国家观念甚薄，更不必说要为社会做事。甲午之役，满清战败于日本，割让台湾，无异福建被割去一臂，但其时大家仍不知苦，虽知清朝之黑暗而不知设想。其最大原因，在乎缺乏爱国教育，盖当时在满清压迫之下，读书人无法获得自由研究，而在海外地方，也只能学些做奴才用的知识。在民国成立以前，新加坡只有三数华校，每校学生不过三四百人，及至民国成立，才渐渐进步。因国内政府腐败，政治不良，同侨回国居住，尚且住不得，投资建设，则谈不到。结果，除在南洋办学校外，其余之工作则呈松懈。

       “福建会馆所办学校，学生数由一千而达二三千，四五千，希望今后能继续发展。但一切力量，均为经费所限。一般资本家未能了解教育问题之重要，仅认子弟长大，以寻求职业谋生为重，殊不知教育关系国家之强弱。现在属下四校，每年所收学费，仅足供补贴费用，并无余款可供扩充。目前福建帮子弟受教育，学校虽不十分欠缺，但须知教育之事，决不应限于某一帮派之间。封建自守，故步自封，乃系错误者。福建会馆不但自己不应有此种观念，而且应该做了以后影响其他。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希望祖国早日获得良好的政府。一旦祖国建立了好政府，福建会馆不但不会无事做，甚且必定多得做不完。因为，如果有了好政府，派来好领事，这好领事就再也不象现在这种敷衍从事的领事了。到那时候，好领事就会自动的设立指导促进华侨教育的机关，既不必我们侨胞计较，又不怕帮派对他不服从。

       “现在一般社会富家，遇有婚丧寿庆，即大事宴客。本坡每日费于此种无意义之开销者，达数万元，平均每月数十万。苟能将此无意义之开销，抽出十分之二，充作教育经费，则何愁乏款？过去本会馆曾经提倡节省此类无谓开销，并曾自己实行改革。如果中国有了好政府，派来好领事，规定合理之婚丧礼仪，节省无谓浪费，以办有益事业，相信各帮各派，均必服从。

       “到了祖国成立好政府以后，在福建广东等处地方，当多设立师范学校，及中等学校，收容华侨学生，训练一般华侨教育适用之人才。同时，必能对华侨回国，予以适当保障，届时华侨回国投资，当不致有亏损之虑，如有亏损，希望政府予以补偿。

       “比如苏联，内乱一平，在英明的领导者领导之下，经过十余年之经营，终于成为最强盛之国家。虽美欧数国当初对之采取包围政策，但结果此种包围之企图，终于宣告失败。

       “中国在此战争以后，亦决不怕外国之侵略。美国援助腐败政府，图害中国，实际上并不能达其目的百分之一。在不久之将来，光明的日子就要到来。相信在本会馆第九届职员任期二年之内，光明必定能够出现。”

       陈主席继对宣誓之意义，加以分析。渠称：“宣誓者宣誓之后，如果不照执行，必受到相当的责罚，像国内那般腐败官员，一天到晚举行宣誓，但却不切实执行，到最后，请看那有好结果？所以，我们今天举行宣誓就职，就应该切实负起责任。”

**从历史经验证明蒋政府必倒**

**在新加坡福建会馆庆祝双十节大会演讲**

       今日为我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国庆纪念日。当前年庆祝之时，蒋政府军队及其所收编伪军计有四百余万人之众，加以美国军火等物资及海陆空运输之助力，军容之盛，气焰之高，殆属空前，故尝谓三数月就可消灭中共。中共在抗战时所占之四百余县城，曾被蒋军夺去约三分之一。两方疆土军力，相差悬殊。而本席前年在纪念国庆之致词中，即断言蒋军内战必败。盖根据历史经验，凡背信义不道德之人，虽一时炎威赫弈，终必失败。想当时参加庆祝诸君，当不健忘。今日蒋府之势力比较前年如何，已为众所周知，无须多赘。现本席欲复引证数十年来欧亚多国背信义道德而失败之史实。

       一、距今约五十年，我国发生团匪之乱，外国联军入北京，清太后及光绪逃避陕西，议和后外国军队概须退出我国土，独俄国军久据我东三省不退，且积极增辟交通，作长久计，视条约为废纸，被日本战败，酿成大革命，俄皇全家惨死。此事在五十岁以上之人，咸都亲见。就是青年人，凡关心国家社会者，亦能知之。

       二、德皇威廉第二，陆军威势，原冠于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惜破坏比利时中立约章。初以为比利时国小且不设防，经过比利时进攻法国，即可迅速占领巴黎，法国立当屈服，安知比利时坚决抵抗，阻其前进，力战多天方失陷。德皇由是目的莫达，终至战败，且倾覆皇朝，逃死异邦。

       三、世界第一次大战后，各国设立国际联盟于日内瓦，立约尊重各国领土完整，互不侵犯，倘有发生国际纠纷，应由国联处理，或由国际法庭裁判，谁敢违背条约，应受各国制裁，乃约仅十二年，日本因世界遭不景气之影响，以为有机可图，背约占领我东北四省，再进而欲吞灭我全国，故有七七事变，造成世界第二次大战，结果日本一败涂地，日皇虽未倒台，而日本殆已等于美国殖民地。虽美国欲扶助其旧势力，然国际地位，已降为下等国。

       四、日内瓦国际联盟成立之后，执牛耳之欧洲列强，若能秉公依盟约制裁日本，则日本虽狂悖跋扈，决不敢与世界为敌，况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曾主张制止日本侵略，而握国联大权之欧洲列强，竟不维持国联尊严，致有世界第二次大战之惨祸，全欧亦难幸免，此亦失信背约之结果也。

       五、意大利首相莫沙里尼，步日本之后尘，撕毁国际联盟约章，出兵征夺阿比西尼亚，及阿尔巴尼亚，并力助西班牙内战，复参加希特勒所发动之战争，结果莫沙里尼战败惨死，意王亦倒台。

       六、德国希特勒于夺取捷克后，与苏联立互不侵犯十年有效条约，则进攻波法，其目的为恢复前次战败所失领土，连战皆捷，波法屈服，英受威胁，目的可以达到，若能知足和平，化干戈为玉帛，则德国可获胜利幸福，自身英名亦垂不朽，彼乃利令智昏，得陇望蜀，背信毁约，出兵进攻苏联，结果身死国破，贻国民无限之悲惨。

       七、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美英苏在莫斯科开外长会议，声明不得干涉中国内政，所有美英苏在华驻兵，皆当撤归，此为全世界所知者。然美国竟野心背约，马歇尔久驻中国，假仁假义，名为调解国共纠纷，实际则帮助蒋政府对付中共，凡海陆空运输，军火以及其他物资，无不极力援蒋，驻军亦不撤归，并派遣许多军事干员，在蒋军中服务。经年之后马歇尔失败而归，然野心未死，复屡派政治经济人员，助长我国内战，迄今未已，其计划之失败绝对无可挽回。美国此次背约援蒋，不但无功耻辱而已，除其帝国主义政府倒台外，否则，我国人世世子孙，必不忘美国之野心。百余年前美国离英独立，与英国开战多年，得法国帮助，美国人迄今不忘旧恩，故对法国有特殊好感。恩怨分明，乃理之常。惟今美国竟在中国埋种仇恨种子，殊可哀也。

       八、蒋介石执政二十年，背民主而独裁，断丧国权，纵容贪官污吏，违诺反信，屈指难数，如在前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答应消除内战，组织联合政府，未及三月，食言毁约。再后更公开发动全面内战，但知利己独裁，不顾民族惨祸，其罪恶比较上言诸人，有过而无不及，天道至公，安能免于败亡？楚歌四起，不过时间问题耳。

       昔贤论人事与天道，有一文曰“深虑论”，乃明朝大文学家方孝孺所作，论秦汉唐宋建国诸帝王，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深思熟虑，原冀帝位可以世守，然虑出于此，而祸兴于彼，盖知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即不可以强违天理。鄙意社会及个人，亦不能例外也。

（卅七年十月十日）

**南侨报任务与中国前途**

**——在南侨报二周年纪念会致词**

       诸位来宾及本报同人诸先生！今日为本报二周年纪念日，假此大世界舞厅，薄具茶点招待诸君，荷爱华音乐队惠临奏乐，及中艺剧社参加表演助兴，蒙诸位玉临参加，本人谨代表本报向诸君道谢！

       本报创办在祖国内战剧烈之秋，于今两年。创办之目的，系为社会服务，与一种党报及营业谋利者不同。出版以来，屡遭党人特务百方阻挠，幸能渡过难关。关于报馆任务，无论抱何目的，多谓为领导社会，开通民智，果欲奉行此旨，则消息必须确实，否则若捏造是非，欺人自欺，未免反误社会，罪恶非小，本报对此，常存戒懼，每自勉也。

       常有人言，本报为共产党报，窃此项名称，有好意与恶意两种。从好意方面言，国父孙中山先生谓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英国人大文豪萧伯纳言，共产主义意义，非平常人可能了解；如此则共产道义之高，可以想见；本报对于此名，愧乏资格可受。就事实言：（一）本报同人，无论股东职员，未闻有被中共承认为党员者；（二）本报资本四十余万元，无一文钱由共产党人参加者；（三）本报自创办以来，未直接与中共通一字消息。如此，安有资格可受此名义？从恶意方面言，蒋政府之特务，每以红帽子作诬良工具，毒辣阴险，陷害无辜，擢发难数。凡言本报为共产党报者，其为好意或恶意，明眼人自能了解，无须多赘。

       现下华侨受内战影响，与辛亥年武昌起义，满清将倒时相仿佛。前次革命，为推倒帝制；此次革命，系欲消灭独裁。前次顽固派，初时亦占多数，迨满清倒台后，尚有一部份人仍忠诚拥护，辫发不愿剪去。窃意蒋政府倒台后，亦必有其人，虽无辫发作标记，然每逢大日子如国庆或五月廿日纪念，当电南美或北美致敬，以表忠诚。至于报馆居领导地位，责任较重，更当坚持到底。党报可免言，若准党报编辑部，当不以美金消长而改变论调，股东应不以贪利而屈膝投降。

       俗语谓“百闻不如一见”，此句话本人认为不错。前年本人将往重庆时，有人告以四川峨眉山风景甚佳，不可不看，及到重庆复闻多人赞美，迨到目的地，则知除数十座陈旧枋木庙寺外，别无其他名胜可观，失望而返。又本人往延安前多年，屡见报载中国共产党凶恶残忍，甚于盗贼猛兽。及到重庆，所闻更觉厉害，谓中共无恶不作，横行剥削，无人道，无纪律，男女混杂，同于禽兽，且有人劝我勿往，以免危险。及到延安，所见所闻，则完全与所传相反。由是多留数天，多历陕北城市乡村，多与社会领袖及公务员接触，凡所见闻，与延安无殊，即民生安定，工作勤奋，风化淳朴，教育振兴，男女有序，无苛捐什税，无失业乞丐，其他兴利除弊，难于尽述，实为别有天地，大出我意料之外。自出延安后，有人访问，则实告之，回到南洋亦然，近年间报纸或社会，宣传中共凶恶事，已罕闻见，惟复造出惊人新闻，谓中共如胜利，我国将沦为苏联附庸，失国家主权。蒋政府人员无中生有，努力宣传，中外不免有被其迷惑而谈虎色变者。然自内战以来，尚未有确证，足以证明苏联有一人参加，一枪或一文钱帮助中共。时至今日，稍有常识者，当不再受其欺骗，作无谓之杞忧。百余年前，法国政体改革，废帝制为共和。后来欧美许多国家仿效，亦成立共和国，岂为法国之附庸耶？其政体虽同，主权则仍各独立。我国地土广大，民性强烈，人数多苏联大半，而谓能甘自放弃主权，附庸于人，有是理乎？

       有人言中共如胜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发生，此亦为反动派之捏造。实则我国此次革命成功，可以促进世界和平，避免第三次大战。现下美国为征服全世界，在欧洲已占德国一部份作根据地，复以物资引诱欧洲诸国，欲以欧洲人力物力为其牺牲。在亚洲除占日本及南朝，且以青岛等处为基地，并以金钱军火利用蒋政府，欲以中国有生力量为其效死。以为胜利可以统霸全世界，失败则美国免多牺牲，缘其海军无人可与对敌，其空军可以轰炸他人，陆军则有欧亚诸国代劳。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陆军死亡不及盟军百分之一二，且国土处在西半球，敌国难于威胁，损失甚少。难怪其现欲遣派司令官高坐将台上，指挥欧亚人民相惨杀，以收渔人之利。此种如意算盘，欧洲诸国何尝不知，第处在经济穷困时，表面上勉与敷衍而已。若我国革命成功，美国在亚洲方面计划，当完全失败；欧洲局势，亦可能有转机。故世界和平，与我国革命成功大有关系也。

       现下徐州大会战，与全局有决定之关系，此问题本人日前在本报已发表意见，此次名谓徐州会战，其实范围甚广，非但关系徐州一城，与济南锦州之战大不相同。在胜负未决之前，双方均可由远省运到军队。解放军可从华北调来，蒋军不但可倾江北五省兵力会战，尚可由江南等省，倾输新旧兵作孤注一掷。本人尝言二个月内如未能解决，可再延长多少日子。若不幸在过短时间内解决，蒋方不但倾出江南新旧兵力作孤注，而从江北尚可撤退十余廿万军队以保守江南诸省，如此不但战争延长，而苏浙赣闽粤诸省，必惨遭糜烂，人命财产损失，当比较在徐州会战，拖长日子解决胜负为更甚也。

       我海外华侨千余万人，为祖国政府腐败，财产损失，客死异域，难以数计，尤以南洋华侨为甚。以本人所知，单就新加坡闽侨方面言，五十余年以下，廿余年以上，卅年间资产称百万元诸富翁，约有廿左右人，迄今只有一家能保存，余者都已破产，甚至有家风败坏，贻羞社会，虽有少数人遗些产业，而大体上远不如前。至中下级资产侨众，与职业界劳动界，损失更大。其致此之由，大半为祖国政治不良，不但投资无门，且视桑梓为畏途，裹足而不敢归，再世后已忘祖矣，若祖国政治良好，华侨两地为家，子女可回国受教育，辛苦血汗资财，不难建基立业，免如前时无家可归，孤注掷于海外也。

       民国光复前，华侨学校及报馆甚少，爱国心薄弱，迨光复后，学校增加百十倍，如云慢，则比较前进步许多；如云快，则比较先进国尚有不及。进步之快慢，须视祖国政治之良否。本报在此数月内，逐日或每隔数日必有内战重要确实消息，报告爱护本报诸侨众。内战解决后，新中国政务之设施，福国利民，兴利除弊，当为蒋政府统治廿年所未有，近则闽粤江浙侨胞之桑梓，远则全国区域，势必日新月异。其时本报所传可惊可奇之确实佳音，可为我侨注意者，料不亚于现下之战讯。本报当更努力奋勉，以副侨胞之雅望。

（卅七年十一月廿一日）

**华侨中等教育之重要**

**——在新加坡华侨中等学校董事联席会议演讲**

       ［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十九日南侨日报讯］华中、中正、南洋、南华、中华、育英、公教、南侨等八间华侨中等学校董事，昨日下午五时，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行星马华侨教育史上空前未有之联席会议，一致议决拒绝接受本坡教育当局所提津贴华侨中等学校之新方案。八校董事将于日内派出代表，联合向教育当局表达此种意见。

       出席昨日会议者，有八校董事陈嘉庚、李光前、黄奕欢、陈清吉、梁元浩、杨惶华、李伟南、林师万、叶玉堆、李振殿、张建金、孙炳炎、符致逢、郭珊瑚、柯进来、洪永安、李铁民、颜耀鹏、叶怡煎、傅无闷、杨赞文、刘立卿、黄信满、崔信延、陈作民、许桂荣、林庆年、李亮琪、杨溢舜、黄镜波、李源章、王吉士、罗喜生、黄胜白、洪丝丝、黄叶生、谢荔圃、庄不唐、林邦彦、许逸君、黄复康、黄德文、胡文钊、符国峇、黄正本等四十余位。华中校长郑安仑，中正校长庄竹林，南洋女中校长刘韵仙、南华女中校长杨瑞初，中华女中校长汪玉聪，育英学校校长王昌稚，南侨女中校长杨振礼，公教中学校长姚国华，及华中事务主任天贝，亦列席参加。主席光前。

       陈嘉庚、柯进来、谢荔圃、李振殿等，即席发表意见，认定应负起促进华侨教育任务，为不愿始作俑，而影响华侨教育前途起见，决不可接受此可能对华侨教育有所限制之方案。尽管教育当局解释此方案之用意纯为减低学生家长之负担，及调整教职员之待遇，但大部份到会之董事，仍对教育当局提出此方案之动机与用意，深表怀疑。彼等多主张此种情况之下，政府如不加任何限制而予华校以补助，吾人当表感激，至如以此新补助作为引饵，企图作种种限制，则吾侨应该自力更生，集同侨资力，教育同侨子弟。

       陈嘉庚氏出席发表长篇演说，力陈华侨中等教育之重要，兹录其演词于下：

       “新加坡华侨自有中学校，系由民国八年起，创办南洋华侨中学校，于今卅年之久。初办时学生不上二百名，后来增至七八百，现在全坡中学生多至三千余人。若非日寇来侵，沦陷四年，则中学生决不只此也。”

       “中学校最好设备科学馆及丰富图书室，供学生实验参考。然本坡各校多付缺如。本坡未失陷时，南洋华侨中学校，对科学馆，图书室，设备略有可观，不幸被日寇毁灭无余。现下各校但求其量，不计其质，此种程度学生，无论毕业与否，如要回国升学，在政治不良时代则可，若在良善政府时代，则恐不能适合也。”

       “此后中学生日多，而校中设备如此贫乏，真所谓因陋就简。其致此之由，莫非经济困难，资本家多不捐输，董事并乏注意。此种中学生程度之低落，毋庸讳言。兹如欲并此亦不顾，素称侨领诸董事，欲安逸独善，观望卸责，致使之节省经费，裁去科学课程，降低教师待遇，增加其辛苦工作，势必更影响学生程度，了无疑义。如此下去，与我国将来新教育难免相距更远。”

       “本坡各中学校，无论全体或一二校，若欲避劳安逸，放弃职责，将为始作俑者，不但本坡他校效尤，恐全马来亚或全南洋各属亦能仿效，事关华侨教育至为重大，其罪责当为，外所不满，而无可避免也。”

       “南洋华侨中学生，回国升学之多少，及造就之成绩，大都视祖国政治之良否。若政治良好，第一学校设备完善，第二严选教师，第三优待学生，如此则父兄必定争先恐后，遣其子弟回国升学。我国以前政治如何，毋须多赘，难怪中学生回国寡少。此后新民主政府成立，与前必大不相同。学校之设备，及教师优良，虽未可一蹴而达，至待遇学生定可大大改善。若干中等以上学校，不但学费免，就是衣食住书籍，亦应由政府供给。盖非如是不能普及贫寒子弟也。”

       华侨初高中学生，毕业或未毕业，如无相当程度，何能回国升学？又小学毕业之男女学生，或年仅十二三岁，未忍远离回国，势非暂入此地中学不可。因以上种种缘故，吾侨对培养中学生，应当极力设法提高其程度，万万不可反使之退步也。”

       “本坡各帮对于私立学校，筹募经费，甚形踊跃，数十年如一日，而对公立中学难免或有观望，致经费发生问题。余意如变通办法；各帮学生，由各帮会馆介绍入会，辟如福建帮学生，由福建会馆介绍，校费除收支外，每月不敷若干，照学生分摊，由该帮会馆支理，如此则中学校董无筹款之困难矣。”

       “华侨所办之中学校，其教学系照国内学制，应设有科学馆，图书馆，教员每周授课十八点至廿点，不但教其识字而已。其他如智识、思想、能力、品格、实验、体育、园艺、音乐，以及其他课外活动，均须注重，与正课相辅并行，所以逐月设备及杂费，亦须多开。兹若照当地政府规定，学校设备及杂费每生仅三角钱，则课外活动，势常停止，仅读死书，如机械一样耳。”

       “华校比较英校不同，英校只重英文，功课单纯，教学较易。中国文字艰深难学，为世界所公认。英校全年休假日子亦多。若比较马来校，印度校，则更形不同。故他等教员每周可教课至二十六点钟，薪俸亦廉宜，而华侨中学校教员则不可耳。”

**新中国必能兴利除弊**

**在新加坡福建会馆常年大会演讲**

       ［民国三十八年三月十七日南侨日报载］新加坡福建会馆，昨日上午十时，在直落亚逸该会馆礼堂，召开常年会员大会，即席通过取消该会馆原来之豁免注册社团注册，而保留非营业有限公司注册。

大会临时主席陈嘉庚即席致词，坚信新中国政府成立，必能切实兴利除弊，新中国前途呈现无限光明。兹录陈氏演词于下：

       “今日本会馆开常年大会，除各科主任报告去年工作外，另有一件要案。本会馆在社团注册官注册时，原为豁免注册之团体，而于产业保管及其他，另注册为非营业有限公司。兹据律师意见，谓两种注册，可留其一。然须大会解决，方合手续。此案待少顷表决之。”

       “本会馆除办理四间学校外，甚少其他事务工作。祖国桑梓方面，自民国光复后，军阀内哄，继以抗战及内战，民生惨苦，地方多故，归侨视为畏途。本会馆虽如何关怀，然无法补救其万一。兹幸内战将终，新中国政府成立，必能切实改革，兴利除弊，前途无限光明，而救急与兴建，或速或迟，当能次第实现。关于除弊与兴利，鄙意有十二项可述。”

       “除弊方面：（一）三征惨酷，多年来严征实物，壮丁，金钱。（二）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不能枚举。（三）各处县市，既设有官吏，又增设党部与特务，争权夺利，无恶不作。（四）贪官污吏，互相袒护，吸收人民脂膏，等于竭泽而渔。（五）花天酒地，奢侈淫逸，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六）箝制舆论，封闭报馆杂志，残害文化界青年。以上六种苛酷凶恶，祸害至为剧烈，新政府必能加以改革。此种改革，既免费用金钱，亦毋须技术人才，时间可极短促，三数月就可拯人民于水火之中，咸使安居乐业。”

       “兴利方面：（一）教育普及。（二）注重卫生。我国人对卫生事，素不重视，世未有不卫生而能健身长寿，亦未有人民孱弱，而能富国强兵。明乎此，当知卫生之重要矣。（三）土地改革及振兴农林水利。（四）整设水陆交通。（五）振兴轻重诸工业。（六）开发矿产与海利。以上六项重要事业，需要巨大资金，技术人才，及相当时间。若能积极实行，由小而大，由近而远，五年十年之后，当略有可观，再加二三十年，无难与欧美先进国并驾齐驱。我国地大人众，土地改革后，合众人之力，团结一致，无寡而得均，生产进步，诚无限量，或可居世界第一位也。”

“新中国实现后，本省人负责办本省事，此为必然之理。现在本省内恐怕缺乏才干之人，未悉中共区早有训练闽人之准备乎？至于政治略就轨道后，华侨投资，鄙意按有两种：一为资本家私人个别投资；一为创立各种事业，组织股份有限公司，招侨众投资。然私人资本家，能备数十万元至百万元以上，亲往经营者，在近年间恐不可多得，设有亦极少数；至创立股份有限公司，若素乏信用，亦非易事。过去所谓华侨投资，甚多为空雷无雨，欺人之欺，此后则不可复尔。鄙意新政府兴办某种事业，如需要华资投资，可由政府负责组织股份有限公司，政府得若干股，余则向华侨招募，并担保每年有若干本息，及该公司不至蚀本，如不幸蚀本，不干华侨股之事，订若干年原本交回。此种鼓励华侨投资，比较公债券更为有利。盖新政府初步，非如是恐不能收效也。”

       “本人自十余年前，决意回国作长期游玩，每年或于严寒时南来一行，不意为抗战及内战所阻，致有怀莫达。兹幸内战将终，待上海解放后决即回国。对本会馆职务，余经已辞卸。自本坡光复后，余所倡办本会馆游艺会及募捐，并其他三社团进支数目，自当公布。今乘大会之便，先撮要报告如下：

       一、本会馆民国卅五年春为买校地及拟建校舍，向闽侨募捐，及开游艺会，计得三十七八万元。虽极力催收，拖延年余，收到不上三十万元，余七八万元无希望可收，应从兹结束，已印征信录五百本，分送诸交款人。如有未收到及已交款而无登录者，请到本会馆办事处查询为荷。

       二、闽侨总会在日寇未南侵前捐得四万左右元，除办刊物《民潮》及各项费用，至本坡光复后，存款一万六千余元。本拟续办刊物，因未得负责人，存在银行无利息。至去年末，转寄存亚洲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一万五千元，利息周年四厘。

       三、前南侨师范学校战后存款一万六千余元，为不能续办，故与南洋华侨中学校前任校长薛永黍先生议定招一两班师范生，学宿费每月每生十余元，由此存款补助。于今年余，虽应补助原不上十万元，因该中学校需款，最近已全数支去矣。

       四、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本坡光复后，存款二万余元。又星华筹赈会存款十五万余元，经侨民大会议决，移交南侨总会，作提倡祖国卫生费用。又总会存阿士百灵药片三千磅，除大半寄赠祖国多省，在马来亚托卖一部份，计售款约三万元。又星华体育促进会，捐助机工复员费七千元。又其他捐来一万余元。合计廿三万余元。

       支出方面，复员机工支去六万余元，印刷费约四万元，广告费约一万元，薪金及其他费用一万余元，寄存亚洲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七万元，存银行及现款与被欠约三万元。合计二十三万余元，待不日在余未离星之前，当将各条进支数目付印，分送各社团。至印册费，《大战与南侨》一书，除收入外，尚不敷一万余元。《住屋与卫生》一书，前托上海陈维龙君印各县市五万本，费去八千元，迎在本坡订印三十万本，约须费一万二千元。至寄存亚洲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之款，利息周年四厘。

       此次再印《住屋与卫生》三十万本，待不日祖国邮政通达，就可陆续寄去赠阅，以广对于卫生之宣传。每县平均不上五十本，拟托县长送交区乡镇，参议会送交社团，教育局送交学校及图书馆。若论宣传普及，当无异杯水车薪。此书除贡献政府外，希亦使民众了解住屋不卫生之祸害。各省县若能将此书翻印宣传固幸，否则如须本会再印者，则将来或可在天津上海，或托各省机关印赠百万本至二百万本，费款十万八万元，或将书中摘要，在全国有名城市百余处之日报，刊登宣传，每处按广告费二三百元，其计开消四五万元，浅见者或将指为浪费，其实卫生一事，关系及于国计民生，若每年能减少若干万人命损失，则多费数万元至十余万元何妨？关于此事，待余到国内观察后再打算。欧美诸国，医科学校林立，医生众多，平均数千人中有一医生。医学上之重要任务有二，首为卫生预防疾病，次为医治疾病，我国医学校寡少，医生数微不足道，数万人中尚乏一人，尤以乡村为甚，虽有些少中医，殊不应付社会之需要。且民间对于曲突徙薪之卫生方法，绝少注意。此后新政府对医科学校，虽能积极兴设，然非短促年岁可能普及收效。惟先进邦域之卫生设施，多有充分效验。如殖民地中华侨最众之新加坡市，其卫生设施，即值得吾人取法仿效。余所以主张大量印赠《住屋与卫生》一书，意即在此。至《民俗非论集》一书，虽关系较小，如在国内亦须再印赠与及登报宣传，应费数万元，亦当进行。以上数事，按费十余二十万元，除南侨总会存款外，不敷多少，余当垫补之。如或不足，则请二三富侨捐助。此为余之理想，至收效如何，不敢逆料。贤者每劝人只顾耕耘不问收获，区区十余二十万元宣传费，或难奢望伟大收效。所最希望者，政府能表同情，则事半而功倍矣。至南侨总会之机关，应留存与结束，须经过召集南洋各属埠侨团代表开会解决。然自日寇败后，荷印安南缅甸地方多故，加之祖国内战未终，所以迟迟未能举行。此事当待至明年春召集会议解决之。”

**明是非辨真伪**

**在福建会馆与怡和轩欢送会演讲**

       ［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廿九日南侨日报载］本报董事长陈嘉庚先生，将于最近回国观光，本报董事暨全体同人，中华总商会会长杨溢粦等，已先后举行欢送会，各情已志前报。福建会馆及怡和轩，亦于昨日下午六时，在怡和轩开会欢送。主席陈六使氏。兹将陈嘉庚先生演词录下：

       “本人联任福建会馆主席二十余年，对本坡闽侨及祖国桑梓，无有益贡献，至深抱愧。顷主席褒奖实不敢当。新加坡为南洋最繁盛商埠，侨民亦最众，而福建会馆尚未有一间正式会所，本人难辞其责。若早募捐若干万元，建一堂皇会所，甚易办到，第念空挂一招牌，实际上乏事可作，故自来未曾雇聘办事员及专责书记。盖如要聘两三位相当干员，每月至少须开费数百元。若每日有数点钟事务可供工作，亦属无妨，而事实就是一两点钟，亦未必有。为此缘故，所以自来办事处，附设怡和轩。

       本福建会馆在本坡方面，只有办理数间男女学校。对贫苦学生不敢多收学费，对教师有相当待遇，俾生活费无缺，能专心服务，逐年须不敷五七万元。本会馆诸委员，应负责捐筹，此乃当然义务，万万不可放弃此职责，而将不敷数额，加诸贫苦学生身上，或薄待教师，此为本人自来抱定之主旨。

       对祖国本省方面，本人未尝不关怀念虑，作些有益桑梓事业，或如何筹划，以加强侨民之乡土观念，勿久客遗忘。虽有理想，而实际丝毫不能办到。其最大原因为二十余年来，祖国多事，政治腐败，加以抗战内战，民生惨苦，侨胞视为畏途，故有怀莫达。至于务虚失实，空雷无雨，炫已愚人，欺人自欺，对海外侨民，阻其将来内向企图，对桑梓同胞，无异画饼诱惑，贻害实非浅鲜。如提倡救乡，要求自治，组织大公司，建设大事业，投资数千百万元，本会馆过去不但不敢提倡，亦绝对不敢赞同，以为时机未到耳。本省山多田少，海岸线绵长，陆上交通未便，海利未兴，土产稀少，故工业未能发展。唯出入口方面，如厦门水深港阔，数万吨巨船，可以直泊堤岸。将来铁路网完成，可居全国重要地位。因内省如江西湖南广西广东及本省，或全省，或一部份，货物亦必多少从本省出口，又如造船业之地位，在全国各沿海，亦难与厦门比拟。将来发展，当无限量。至于其他各种矿产，海洋生物，及农业，与及轻重工业，定必随之勃兴，了无疑义。

       华侨为革命之母，孙国父说此话，对华侨似有伟大之荣誉，而华侨中亦有人引以自豪，误认当时华侨有许多财力，帮助国父之成功，实则未必尽然。我国前被满清窃据，有志之士，倡起革命，恢复国土，如郑成功及太平天国，前仆后继，虽败亦荣。再后我闽南人起义不成，逃避南洋，在华侨中保存多少反清之余绪，故当时满清政府，曾有不承认华侨为国民之说。

       民国光复前，我闽俗例，男子将完婚之日，坐在稼萝上（竹器圆形，直径约五六尺，系农民晒物用具），家长为之理发，训诫今日已成人，勿忘祖宗仇敌（俗语称上头）。新娘出轿时，新郎手提米答（筛具）及笠，遮于头上。以上两事意义，就是足不履其地，头不戴其天。又人死入棺时，须用一白布盖面，其意为国土未复，无颜见先人于地下。可见先世被满清征服时，仇恨之深也。

       孙国父提倡革命，多次到新加坡及马来亚。当时生活费廉宜，如搭船往欧洲，二号位仅一百余元。孙国父虽辛亥武昌起义后应中外电邀回国，所搭之船，亦坐二等位。为生活费廉，华侨每次捐助，常为两三千元而已。唯最后经新加坡，到上海来电，嘱捐助私人用费，即由闽侨保安会，汇去国币五万元。

       怡和轩俱乐部，成立于今五十年，曾负责招待孙国父。系已故林君义顺及其他多人所倡办，及武昌起义，闽侨组织保安会，亦由怡和轩会友之提倡。民国光复后，本坡华侨对祖国屡次负起工作义务，亦多由怡和轩发起。可见怡和轩俱乐部与祖国关系不少。此后祖国革命成功，与外华侨关系更形密切，本俱乐部更当积极负责，继续负起应尽之义务。

       我华侨在民国光复前，爱国心甚为薄弱，比较现下相差甚远。迨民国光复后，爱国热情逐渐提高，大半由于学校林立，教育及报纸与社会之鼓励，而尤以抗日战起，同仇敌忾之激动。至对于祖国方面之感想，本人未往延安之前，每忧虑我国难如苏联之发展。苏联革命后，内部纠纷仅四五年，政治便已逐渐进步。而我国则不然，军阀割据，战争十余年。自民国十七年，北伐成功，南京政府成立，至七七抗战事起，已有十年之久，国计民生，毫无进步。甚至教育党化，上下贪污，特务横行，政治腐败，比前尤甚。以前余意在蒋政府执政下，既无改善希望，而彼等尚在中年，政权尚可久操，设使天佑中国，产生建国人物，其人现未知名，不知将延至许多年中国始可得救。迨民廿九年，为慰劳抗战军民到重庆，亦抱如此思想。至于中共，据其时各处宣传，有如毒蛇猛兽，凡闻其名，几似谈虎色变，故余亦未加以重视。

       因为国共磨擦，关系抗战严重，故本人曾亲往延安观其究竟，不图乃出意料之外，所见所闻，感觉其政治良好，上下勤奋，几如别有天地，衷心无限欣慰，深自了解前时忧虑建国人物未有其人，实属杞忧。今日已如拨云雾而见青天，故认定中共将来必定胜利，而兴建我中国。或谓余有眼光，能早知必分裂内战，结果国民党必败。然究其实，余无所谓眼光，只有辨明真伪与是非，君子与小人而已。至要辨明此数字，自己必忠诚公正，庶无错误耳。

       主席奖余兴学。若言起此事，余无限惭愧，及对陈六使先生无穷铭感。为何惭愧？如创办厦大，难免虎头蛇尾，终累政府接办，每抱有始无终之遗憾。为支持集美学校，六使先生曾助余霹雳胶厂营业。日寇南侵时，经理人不明大势，积货满栈，致欠陈君五十余万元，结果货物被日寇完全抢去，损失百万余元。六使先生又因欲助集美学校，由中国银行汇国币七百万余元，申叻币八十万元，被该行延迟经年，至国币已跌价三分之一，而始交还。新加坡光复后，六使先生又资助余霹雳胶厂复业，计四十余万元。为马来亚动乱，几损失无余。余自创办厦大后，社会顾爱诸君，有奖余为毁家兴学者，其时余颇腹非其言。因余尚有许多资产，不图今日竟成事实。余住宅被日寇焚炸，仅存颓垣残壁而已。集美学校校舍被炮击轰炸，损失惨重。复员于今三年余，费款于集美学校共三十余万，修理与学费各半。至倒塌数座校舍尚乏力重建。若重建住宅，所需不过二万余元，虽可办到，第念校舍未复，若先建住宅，难免违背先忧后乐之训耳。

**召集马来亚各区筹赈会**

**代表会议通告**

**为讨论筹款资助机工南回办法事**

       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以回国机工及眷属，约一千七百余人，渴欲南返，但祖国政府迄未有具体办法，爰订于六月十六日（民国三十五年）在吉隆坡召集马来亚各区筹赈会代表，商议资遣机工南回问题。该会主席陈嘉庚氏发出通告，订十六日上午十时为开会时间，但地点则未决定，届时每区应派代表一人至二人出席大会。议程拟定十余项，其重要者为（甲）各区应否负责设法机工南返经费，（乙）机工在国内眷属南来经费问题，（丙）每人需旅费若干，（丁）应筹款项，各区如何分配，何时筹毕，（戊）各区所筹款项，是否集交一机关保管，（己）各区举代表若干人往昆明与互助社协商，分批到港及沿途照料一切，（庚）为救急计，应否由某日起，每月先汇若干款项交昆明互助社，维持失业者生活费，兹录该会通告如下：

**南侨总会通告**

       自七七事变后，我国各海口，受敌人封锁，国际运输，几于断绝，除安南一部份外，全赖滇缅一路为生机，该路长千余公里，不但高山峻岭，崎岖险恶，且工程甫毕，路基未固，国内司机素乏，新训练者亦不便服务。我政府运输机关，函电本总会，代招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本总会乃出通告，鼓励爱国机工回国服务，从事救亡工作，前后踊跃参加者，三千余人。其后缅甸失守，一部份二百余人，随联军入印度。敌寇败后，除有职者外，余已陆续回来。其他大部份在国内诸路服务。惟据昆明华侨机工互助社报告，自胜利后华侨机工失业日多，登记欲南返者日众。最近所报，急欲南返一千一百余人，其中完全失业者约四百人，已娶妻室三百五十七人，生有子女者二百八十人，合计一千七百余人。据本年初回国慰劳团长潘国渠自渝来函报告，屡与政府交涉，最后应承由政府免费运至缅甸。本总会以为若能如是，由缅甸回星费用，我侨当完全负责。然至今数月，政府不曾实行此事。近日庄明理白仰峰等由渝回星，详述数月来屡向政府呼吁，恳请救济及遣回事，或敷衍延缓，或藉词推诿，最后仅发救济费国币一百万元，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或以未闻本总会发电向最高机关如蒋委员长、军事委员会，或行政院，要求机工复员为言，然自廿九年冬本会陈嘉庚先生报告陈仪祸闽之后，中央政府即与本总会断绝消息，虽曾汇款数千万元，发去其它函电，不下数十次，一字绝不回复。迨日寇失败后，陈主席回星再试亦然，故知虽本总会要求亦无效也。至诸机工原为爱国而前往服务，亦由各处筹赈会鼓励而成行。今日战事已终，目的已达，其父母妻子，忍苦盼待七年于兹，政府已不资助南返，我侨安能卸责坐视？计每人由昆明至香港，须费叻币一百六十元，再由香港至星费一百二十元，共二百八十元。如以一千一百核计，须三十万元有奇。至于家属尚未计及。兹将各区，机工登记欲南返者人数列后，另将各区各人籍贯姓名，待六月十日付交各处筹赈会及商会若干张，以备其家属亲戚取阅，并订六月十六日请各区筹赈会派代表至吉隆坡开会，讨论机工南返办法。此布

主席陈嘉庚

**各区机工人数**

       新加坡三百三十人（内粤二百二十六人；闽一百零七人）妻子一百七十六人

       柔佛九十七人（内粤六十六人；闽三十一人）妻子六十七人

       马六甲二十九人（内粤二十二人；闽七人）妻子二十六人

       森美兰三十四人（内粤二十四人；闽十人）妻子十二人

       雪兰莪一百零七人（内粤七十七人；闽三十人）妻子六十七人

       霹雳二百三十七人（内粤一百七十三人；闽六十人）妻子一百四十九人

       彭亨二十四人（内粤二十四人；闽四人）妻子十六人

       吉兰丹一人

       槟城一百二十一人（内粤六十五人；闽五十六人）妻子五十二人

       吉打五十一人（内粤三十六人；闽十五人）妻子三十一人

       暹罗二十三人妻子十二人

       苏门答腊二十九人妻子十六人

       婆罗洲三十八人妻子十人

       以上共计机工一千一百二十人，其妻子六百三十五人。

**（附载一）致伍总领事函**

       伯胜总领事先生大鉴。敬启者：本坡昨日晚报及本日早报均载贵领馆电请政府遣送机工南返事，该稿闻系贵领事馆发出云。贵领馆系政府代表，对于机工复员事既肯负责，自系最好之事。不但机工，即庚亦甚感荷。惟尊稿言“中央曾设法救济，并办理遣送事务，惟因交通工具困难，未能即时南返”，据潘国渠及诸机工来函与近日庄明理白仰峰等报告，并所举来渝昆诸文件，则情形甚有不同。兹将最近在渝机工十九名来函及庄明理报告转陈于下，以供参考。自民国卅二年缅甸失陷后，机工失业颇多，由赈济会许世英拨出廿五万元，其后未有再获一文。去年秋日寇败后，国渠明理等除口头向政府各机关交涉要求外，再用公文呈送行政院，侨务委员会，海外部，外交部，交通部，公路总局，军事委员会，善后救济总署等机关。十一月中旬侨委会召集上列各机关联席会议，无结果。十二月底在海外部再开会通过议案，（一）请行政院拨专款救济；（二）呈请行政院会同公路局、交通部、后方勤务部，安插失业侨工；（三）由外交部与有关方面，洽商办理侨工出国手续；（四）函善后总署，筹办遣送工作；（五）其他有关事项，由侨委会斟酌情形与各有关机关洽商办理。尊稿上文所云，或尚有为庚所未知者。除上文所述未实行者外，中央尚有其他实行者否？如有，请将负责机关，在何处救济，自日寇败降后，发出救济费若干次，数目若干，交何团体收去，请列明示知，不但可以安慰机工之家属，庚亦可在吉隆坡开会时作极好之报告材料，至荷至慰。尊稿又云“办理遣送，因交通困难，未能即时南返”。据客年潘国渠报告，向政府交涉时曾由郑介民先生应承将在昆机工五百名免费运送至缅甸，然口惠而实不至。按由昆至缅仅七百英里，货车最迟七日可到，每辆车如运载卅人，十余辆车作一次便完。若作一两月运去，有五辆车专运已足。就昆明一处政府之货车客车，即不下数千辆，何困难之有？南洋各属沦陷时，逃往祖国者，以缅侨最多，不下数千人，现几已完全回缅矣。以政府之权力，迄今多月不能遣返机工一人，其谁信之？又如政府人员以及个人免费或自费由国内到印度及南洋者，何止千人以上。其他如由政府运往广州香港上海南京者，则以数万计。运返少数机工，在政府系力所能及之事，并非夹泰山而超北海，端在肯与不肯耳。

陈嘉庚

三十五年六月八日

**（附载二）再致伍总领事函**

       敬启者：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会，为商讨华侨机工复员南返事，曾于本月十六日在吉隆坡开会。佥以前日各报所载总领事发表援助华侨机工南返办法，极为妥善，甚为感佩。用特成立决议，即依据总领事馆所提办法，请求总领事阁下专责办理，使在国内欲南返之全部华侨机工及其家属，并于两月内由中央政府饬令下，尽数遣回。其中失业流落昆明之数百名，尤希提前遣送。在遣送之前，生活困苦或疾病者，请先予以救济。此外或有少数机工，因故羁陷囹圄，情实可悯，亦请谅其当年回国服务热诚，分别予以减刑，或即省释。以上决议，与日前总领事馆所示大旨，原无异致。故即席推举南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暨各区筹赈总会代表庄明理，陈可用，何炽祥，蔡伯祥等五人面达公意，请即迅赐办理。倘在两月之后，未见端兆，为显示总领事阁下肯负责任，受信侨众，更望躬回南京，切实向我政府请求，以去就力争，务期必达遣返机工之目的而后已。兹据前由，除五代表趋前谒见外，相应备函奉达，敬烦查照并希赐予面洽为荷。专此渎陈。

       即致

       中华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伍

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会援助华侨机工

复员代表大会主席陈嘉庚

卅五年六月十七日

**关于机工复员事**

**新加坡华侨筹赈**

**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十一号**

       敬启者：本总会为回国机工复员事，经于本月十六日在吉隆坡召开马来亚各区筹赈代表会议，议决各案列下：

       一、机工南返事，本总会拟在吉隆坡开会发表后三日，新加坡总领事馆即投稿各日报，对机工南返表示愿负全责办理，于是各代表开会时，全体一致议决托由总领事切实负责妥善办理。

       二、代表大会推举代表五名，持函送新加坡总领事馆，并面述各议案，请切实有效办理，及用大会名义电请蒋委员长宋行政院长速遣机工南返。

       三、机工南返事，请总领事求政府两个月内办理完竣，其中流落昆明及他处失业之数百人，提早遣送，在未遣送之前，一切生活费无着者应先救济。

       四、少数机工因故尚在狱中者，请政府减刑或释放，机工有家属者，请准予随同出国。

       五、在两个月满后，政府遣送机工如未见端兆，应请伍总领事躬回南京交涉，并以去就力争，以示决意负起发言之责，取信侨胞。

       六、以后发出函电及办理其他会务主持者之名称，定为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会援助华侨机工复员代表大会。此布。

主席陈嘉庚

民国卅五年六月廿六日

**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

**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十四号**

       为通告事，本总会系于民国廿七年秋由行政院命令南洋各属筹赈会举派代表来星开会组织，其任务在领导筹赈支援抗战，故凡当时政府所有关于筹赈抗战各项命令，本总会当然奉行，至各属会举行与否，系各属会之自由，本总会未便干涉。有如义捐公债，不拘所募多少，均由各属会自行汇交行政院，本总会概未接收款项，亦未向何处募捐，故新加坡沦陷时，本总会无存款，即以此故。

       查民廿八年滇缅路将通车时，政府电本总会，需要机工回国服务，本总会即通告各属会征求爱国机工自动参加，当时并无附带任何复员条件，盖此为政府责任，毋须预有规定也。抗战胜利后，在国机工久未复员，历经潘国渠，庄明理诸君交涉无效。本年五月间，庄君回洋，本总会据报，乃于六月三日，发出通告，订六月十六日请马来亚各区筹赈会，推派代表，赴吉隆坡开会，商议捐资援助机工南返。讵两日后，新加坡总领事馆忽投函各报，谓救济机工及复员事件，政府已负责办理。言外之意，不问可知。由是吉隆坡开会时，马来亚各区会，除新加坡、槟城、彭亨、峇株巴辖，巴生有正式代表到会外，雪兰莪及霹雳两区，以依据报载总领事馆消息，该区要自行设法，使其区内机工复员，拒绝参加会议。其他各地咸多以是为词。到会诸代表，于审度当前事象之余，佥谓新加坡总领事馆，既谓政府要负责遣送，故决议此案应完全信赖及督促政府全责办理，并派举代表五人备函送达新加坡伍总领事，请其力求政府于两月内办妥救济及设法遣送全部机工南返。否则请伍总领事亲往南京，以去就力争，务达目的，吉隆坡会议迄今五阅月，本总会除依案执行外，别无他道。兹闻政府已托联总机关办理，运送机工到新加坡，上岸后并备食宿，再转原住地，沿途车费亦由该机关供给。如是处置，诚为爱国服务诸机工及其家属所愿望。机工复员之目的既达，如尚有其他要求事项，自应向原派区筹赈会商量。本会对于机工责任，于焉幸告完毕，曷胜欣慰。合将办理经过，普告侨胞，以明真相。此布。

中华民国卅五年十一月廿六日

**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

**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十五号**

       为通告事，自本年六月，新加坡总领事馆发表华侨机工救济及复员事均由我政府完全负责之后，近日华侨机工将陆续南返，余乃查询总领事馆，关于机工抵星后状况及处置，据谓香港救济联总署已托本坡福利部负责一切，迩邝领事告知福利部来函如下：

       嘉庚先生大鉴：昨日余接香港联总来电，谓另一批计四百二十名之机工，乘丰庆轮将于本月廿八日抵星。此批机工目的地系星洲及马来联邦，但每地若干名则尚未得详讯。常例凡由联总遣送之机工，其所乘轮抵岸后，在未各归其家前，一切膳宿均由福利部免费供给。此致并颂 大安

新嘉城政府福利部秘书TPF尼密士上

十一月廿一日

       查华侨机工之复员，既由我政府与救济联总合作，到新加坡则由福利部招待膳宿，再转原住地，沿途车费亦由该机关供给。如是处置，诚为爱国服务诸机工及其家属所愿望。机工复员目的已达，如尚有其他要求事项，自应向原派区之筹赈会商量，方为适合也。此布。

主席陈嘉庚

中华民国卅五年十一月廿七日

**为荷兰惨杀华侨并夺船**

**货封锁贸易事**

**召开新加坡侨民大会通告**

       巨港为苏门答腊南部物产最盛之出口商埠。日寇败降后，荷兰与印尼分区管理。新旧物产丰富，商业繁盛，多属华侨经营。不意竟遭荷兰忌妒，于新年一月初，藉词对印尼军事行动，专向华侨市区炮击、轰炸、扫射、焚烧、惨绝人道，连续五日，致引起印尼暴徒乘机劫杀，死伤华侨千余人，烧毁店屋数百座。损失物资千余万元，而荷兰及印尼人双方死伤只数人而已，别无其他损失。由此而观，可知此种惨案完全为荷兰军有计划之行动所造成。其居心恶毒，路人皆见之矣。近乃复变本加厉，颁布其荷印进出口法令，封锁进出口货物，虽由印尼政府辖境运出，亦在中途拘押没收。这种政策，直是完全以华侨为对象。查爪哇与苏门答腊进出口贸易，大半为华侨所经营，关系重大，毋待絮述。故前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开侨团大会，组织保侨会，公举李光前君为代表与荷兰交涉。荷兰欺我海外孤儿，四无援应，置诸不理。

       一月廿九日，诸侨团函请本总会召开侨民大会公议对付办法。本月三日保侨会诸委员复联袂辱临，请本总会主席出面主持。本总会念保侨护商，义难坐视，复以我国政府鞭长莫及，若不团结自救，任人鱼肉，后患奚堪设想。用是勉徇公意，起而负责。

       兹订本月十六日（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假中华总商会召集新加坡侨民大会，共议进行。事关马来亚与荷印四百万华侨生机命脉，幸勿漠视。侨团代表，社会贤达，希均依时玉临。此布。

**附议程如下**

       一、此次大会，特为荷兰惨杀华侨，劫夺船货，讨论对付案。

       二、仍托保侨会，限日再与荷兰交涉，如无效，则推行以下本日通过之各案。

       三、交涉既无效，本大会将用何项方法以资对付案。

       四、应否通电国内外请赐声援案。

       五、本大会对外名义是否用本总会，抑另议别名称案。

       六、大会职员如何推举案。

       七、大会可否授全权与会中实际负责职员案。

       八、如何募捐款项以应进行等需要案。

中华民国卅六年二月十四日

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

**（附载）新加坡侨民大会开会情形**

       ［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南侨日报载］

       昨日下午，天气阴沉，凄雨霏霏，我“海国孤儿”满腔热血，敌忾同仇，齐赴中华总商会，参加侨民大会，为被难同胞伸冤，为货物船只被扣留者声援，为华侨今后生存而奋斗。这中间，已由集体力量，结成坚强之国民外交，以挽救华侨经济之危机，提高华侨地位。昨日之侨民大会，为一转折点。

       是日出席者共百余人，包括各帮商业团体，各社团代表。

       大会开始，先请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氏致开会词。陈主席首先说明南侨总会召集此侨民大会，系应各社团及保侨会之要求，因群情愤激，义无容辞，故勉力而为。次述荷兰弱而无能，竟不自量，违背大西洋宪章，统治印尼，摧残我侨生命财产之种种暴行。最后强调如发动抵制，可使荷兰每月损失五六百万元叻币，我侨必可获得最后胜利。全体代表，频频报以热烈掌声。

       演说者有周献瑞等多人。

       嗣因时间关系，即进行讨论提案。关于抗议荷兰暴行，决议仍由保侨会进行交涉，限一星期，荷方如无完满答复，即实行经济制裁，有如以前对付日本，关于对荷交涉对外名称，是否仍用南侨总会名义，抑另定名称案，全体赞成仍用南侨总会名义，得因经费来源不同，决议：在南侨总会之下，设立对荷交涉委员会，推各有关社团为委员，对于支持抵制运动之经费，亦经妥议具体办法。会议至下午五时一刻，在融洽空气中闭会。兹将大会演词及决议案志之如下：

       主席陈嘉庚演词云：

       “自日寇南进，我华侨在荷印人命财产，损失惨重。及日寇败后，印尼政府独立，印荷双方战争，有意及无意波及众侨之战祸，不可胜计。近乃变本加厉，如巨港之惨案，完全为荷兰所造成。近日来复在海面捕船劫货，枪毙船员，并颁布法令，封锁出入口货物，竟以华侨为唯一对象。前日报载印尼政府，宣布美国派一艘九千吨轮船到井里汶运出橡胶及白糖，至其入口何物，虽无宣布，当然是其所需要之供应品，试问荷兰对此，敢否过问。”

       “东印度为印尼领土，昔被荷兰占作殖民地，吸尽土人脂膏，养尊处优，日寇入境，论其守土有责，理宜悉力抵抗，以卫民众。凡享权利者，应负此义务，况其拥有完整之海陆空军数十万人，实力雄厚，竟乃闻风奔逃，争先恐后，为余亲闻亲见者。日寇登陆，兵不血刃，不数日间，荷兰全部文武官员屈膝投降。其卑怯懦弱，贪生怕死有如是者。”

       “此次世界大战，乃法西斯帝国主义与民主阵线二者之战争。故大西洋宪章，规定战后各殖民地应得解放，而东亚各民族，应有独立自治权，今日荷兰既怯弱无能，丧失领土，论事论理，皆无统治殖民地之资格。而印尼政府之独立，乃为恢复失地之光荣，适符大西洋宪章民族独立之规定。乃荷兰野心不死，妄藉其自订之殖民地法律，硬指印尼辖内某种货物，系其旧存，故在海面横行，肆意劫夺没收。今举一例，试问如台湾前被日本占领，今为我国收复，所有日人货物，权属伊谁？日本人得藉口抢回否耶？物资附于领土，有如毛之附皮，皮既不存，毛将焉附？况东印度自日寇入据，物资转卖民众，几番易手，现在货主，多非当年直接承买之人。”

       “查荷兰人口，不上五百万人，而印尼则多至六千左右万人，与日本相差无几，较之朝鲜及安南民族各多大半。若比菲律宾及暹罗缅甸，则各多四分之三。现东南亚各民族，纷纷独立。履行大西洋宪章，亦即此次民主主义胜利之目的。”

       “蕞尔小国如荷兰，竟敢当风狂走，重起殖民地野心，鱼肉印尼，欺侮华侨，视同奴隶，何不自量乃尔！查在其势力范围内，如婆罗洲及他处，莫不极力剥削，垄断独占，如树胶一物，每百斤还价不上叻币十五元，比较新加坡价，廉宜过半。由此可见其剥削之凶，其他各物可以想见。”

       “荷兰夺船劫货，谓苏岛出产之苧麻葛丝，系荷人独有产业。然如树胶一项，则各色人都有，本坡新业公司被劫之树胶，乃竟于劫取搬运时重印其唛头，冒认为荷兰之出产。此外如爪哇所出产之树胶，亦各色人都有。余前年避难爪哇，匿居陈泽海君树胶园内时，陈君已拥有千余英亩胶园。至茶园糖厂，华侨亦所在多有，非纯为荷人所有之业。”

       “假定如荷兰所言，苧麻葛丝为其园内出产，然自他弃守苏岛之后，已属印尼经营，所有货品，新旧都有。至在爪哇之树胶及糖茶，既为各色人出产，何从分别谁家之物？就现下存货估计，苧麻葛丝约二万粒，每粒值八十元（出口费除外）计值叻币一百六十万元。”

       “爪哇之树胶，在地用途甚广。如鞋类、幔裤、脚车轮、马车轮等，除幔裤须配料制造外，其他概系生用，故消耗特多。按所存不外一万余吨，若荷兰有权以半价强买，每吨廉宜叻银四百元，虽作一万吨算，计四百万元也。”

       “至于茶糖均在内地，由印尼政府管辖。若华侨不能经营出口，彼除一部份可售与美国外，其余印尼留以自用，荷兰虽为此垂涎亦不能染指。准此推算，荷兰封锁华侨之上言两项贸易，任其独占利权，亦不过可得五六百万而已。”

       “现下荷兰川走我国轮船四艘，客货每月至少可收叻币二三百万元；川走南洋之轮船十余艘，每月亦可收二三百万元，共五六百万元。其他由欧美来之巨轮，尚未计及。我侨若能一致对付，荷兰所得不足偿其一月之损失，不患彼不屈服也。”

       大会决议案：

       一、此次大会，系特为荷兰惨杀华侨，劫船夺货，讨论对付方法。

       二、全体通过再由保侨会于一星期内继续交涉，逾期不能解决，则推行以下通过之各案。

       三、全体通过保侨会交涉无效。应即实行对荷兰经济绝交。

       四、全体通过应行通电国内外，请赐声援。

       五、全体通过对外用南侨总会名义，对内用南侨总会对荷交涉委员会名义。

       六、对荷兰交涉委员会职员由海星协进社，米业运输工友会，沿海部工人联合总会，海员联合会，机动船业联合总会，摩多舢舨联合社，轮船落起货工友会，驳业工友联合会、职工联合总会、巨港华侨筹赈会、星华保侨会、总商会，福和客栈商务会、海员工会、码头工友会、土炭工友会、出入口商公会，暨被夺船货人之代表一人，连同福、广、潮、客、琼、三江，各代表二人组织之。

       七、大会应授权与会中实际负责之职员。

       八、所有进行用款，巨港方面担任十分之三，被劫夺船货主人方面担任十分之三，其余十分之四由大会筹捐补足之。

**宣布独裁政府罪状**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十五号**

       自我国抗战以迄南洋各属沦陷，华侨为爱国故，牺牲生命财产，不可胜计。然果能博取最后胜利，永固国基，而贻子孙无穷之福，则薄海讴歌卡舞之不暇，尚何足惜。

       日寇夹强大兵力，志在鲸吞我国，蚕食全球，于是激起我英美苏友邦公愤，组成联军，而终召覆败，此盖联军共御之力也。

       战争胜败之义，质言之，即领土及人民财物三项之得失。人民财物附在领土，虽遭一时之牺牲，乃可逐渐恢复生产。唯领土则有限定，领土失，不但居民为奴，财物为夺，而他省份子孙，亦乏移植发展之余地。故古今中外战争之后，一方面为领土扩大，一方面则为领土削减。扩大者，主权膨胀，削减者，或至于沦亡，无有例外焉。

       此次，我国战后，收复台湾土地三万余方公里，割弃外蒙一百五六十万方公里，对抵之后，土地损失，相差五十倍之多。我国领土不过一千万方公里，竟损失百分之十五。其他旅顺大连之形同割弃，及与美国所订若干丧权条约，尚不在此。此种战后牺牲，不但我国历史所未有，亦古今各国历史所绝无，而国人称曰胜利，岂不误哉？

       以我联军胜利国言，苏美英之扩大领土及主权，几遍及全球，独我国反无限损失，表面上同为胜利，而实际上则为失败。今以失败为胜利，以耻辱为光荣，崇名黜实，欺人欺己，贻患将来，可胜言乎？

       国父孙先生推倒满清，建立中华民国，主权属民，为世界各国所公认，今不幸权操独裁者，与苏美妄立非法条约不知取消，领土主权，无志收回，国家前途，尚何堪设想。

       惟有痛定思痛，追究事实，万众一心，卧薪尝胆，以候政治实行民主化，凡非法条约，一律取消，届时方有胜利可言，而免愧对我后代子孙。

       战后世界，民生困苦，饿殍载道，疾病死亡之数，我国不但首屈一指，即合各国统计，恐亦不及我国之多，论者往往归罪于抗战太久，及国家太贫，实则二者关系非大。若政治修明，内战不生，虽富庶不及他国，亦断不至惨酷如此。兹分析其因，约有三点：

       一、官僚资本，除现金逃存欧美外，国内所积不动产及货物，数量之巨，不可胜计。

       二、自政协失败，内战发生，城市乡村，咸知纸币日贱，终成废纸，稍有资力者，莫不贮积货物，黄金及外国钞票，以大众之力，储蓄之多，更难计算。

       三、水陆交通阻滞，运费奇昂，统制居奇，种种阻挠，有无不能相通，出口不能便利。

       以上事实，凡稍留心国事者，类能知之，至现政府所辖省份，民众不过三万万人，而饥寒无告者约十分之一二。上举三因，如得其一，以为救济，则饥者尽饱，寒者尽衣，准此而言，我国民今日之悲惨实乃人为，而非天生也。

       古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今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迫我国民转死沟壑者，皆贪官污吏。

       若一旦独裁政府崩溃，政府实行民主，贪污官吏财产，概予没收，移救饥饿濒死之民众，已绰有余裕。至于商民积存货物，以及交通运输，自能立随政治而改善。诚如斯，则我地大物博人众之国，五年十年后，必一趴而为东亚之模范矣。

主席陈嘉庚

卅六年六月九日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十六号**

       本总会成立于抗战初期，国家正在危急存亡之秋，千万华侨为援救祖国，以求抗战胜利，领土完整，不惜牺牲金钱与人力，以尽侨民天职，所以成立本总会，领导吾侨救国之运动。及南洋各属沦陷，敌寇痛恨华侨之爱国工作，屠杀酷虐，抢夺洗劫，生命财产，损失惨重，然华侨为救国而牺牲，若能达到所期之目的，固无所悔恨。迨敌寇失败，胜利属我，华侨牺牲救国之目的，果达到否？凡我爱国侨胞，关怀时局，恐不免于痛哭流涕。本总会爱为申诉如下：

       战争之胜败，除人与金钱之得失外，尤有关领土之增减。甲午战败，失去台湾三万余方公里，而此次战胜，反损失外蒙古百余万方公里，及旅顺大连之主权，继复与美国订立商业，航空，及其他各项辱国丧权条约，甚至允许美国驻军，诚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夫失土丧权，惟战败国有此义务，绝未闻战胜国之失地丧权有如此者。战败国之丧权失地，系出于敌人威胁，不得已屈服忍受之。兹次我为战胜国，绝不受任何国之威胁，何以如此狼狈牺牲？我海外华侨闻之，岂但痛哭流涕而已耶？

       为因一党专制，一夫独裁，遂不惜媚外卖国以巩固地位，消灭异己，较之石敬塘秦桧吴三桂汪精卫诸贼，有过而无不及。本总会前曾发出第八号通告，不承认蒋政府之各项卖国条件，为将来取消之预告。兹者x国大代表，所举x总统，所立x宪法，与前专制独裁之作为诈欺，毫无二致。此后再有与任何国成立任何丧权卖国条约，仍属无效。特此通告。

主席陈嘉庚

中华民国卅七年五月一日

**关于建立华侨死难纪念碑**

**致新加坡民政长官麦加伦函**

       ［民国三十五年三月槟城现代日报载］关于请拨武吉智马前日军“忠灵塔”地址，建筑吾侨死难者纪念碑事，前日陈嘉庚氏已获麦克伦旅长复函，各情经志前报。兹悉，陈氏昨复上书当局，文云：

       来书敬悉，尊意拟立诸民族死难公共纪念碑，余原甚赞成，但窃以为尚须顾及两事：

       一、死难最多者为华侨，将来移骨骸往葬其地，除无处寻觅者外，或有二千人左右。

       二、华人习例，对死者纪念，每年至少有四次，即死日、清明节、阴历七月半、冬至日，各有特殊哀吊之手续。今若联为一纪念碑，则华人之上言习例，与他族大相悬殊，必致两者不便。先生必明白，毋庸多赘。兹惟祈折衷办理，除华侨死难者埋骨地址外，并请于该山适当地点，另划一处为华侨自建纪念碑之地位，较为适合也。

       此致

       新加坡区民政长官麦加伦旅长公鉴

陈嘉庚敬启

卅五年三月五日

**电请杜鲁曼停止援蒋**

       ［现代日报讯］陈嘉庚先生因痛愤国内独裁专政，凭藉外力进行内战，故特电美国杜鲁曼总统，美参众两院议长，驻华特使马歇尔及美大使司徒雷登，劝告美国应立即撤退驻华军队，停止对国民党政府一切援助，以免蹈日本企图分裂中国自取败亡的复辙，该电由路透社合众社于九月十一日在新加坡发表，兹从英文转译如下：

       华盛顿白宫杜鲁曼总统，美国国会参众两议院议长，南京马歇尔特使，司徒雷登大使鉴：中国人民一向信奉孙中山先生革命遗教，主张建立民主国家。不幸军阀内讧，加以日本乘隙而入，以借款军火助长中国分裂，卒致有世界大战之惨祸。日本此种损人利己之企图，征服世界之野心，最后仍遭失败，可见上帝有灵，报应不爽。查蒋政府执政二十年，腐败专断，狡诈无信，远君子而亲小人。其所任用官吏，如孔宋内戚及吴铁城、陈立夫、蒋鼎文、陈仪等，贪污营私，声名狼藉。以致民生痛苦，法纪荡然，为中外所咸知，贵国人士亦了如指掌。抑蒋政府要人，就本人多次接触，深知其昏庸老朽，头脑顽固，断不足与言改革。贵国传统政策，对各国人民公允友爱，不事侵略，信誉昭然。今乃一反其道，竟多方援助贪污独裁之蒋政府，以助长中国内战，长此以往，中国将视美国为日本第二。此于中美两国人民之感情，大有损害。本人曾经亲访延安中共辖地，民主政府已见实施，与国民党辖区，有天渊之别。且中共获民众拥护，根深蒂固，不但国民党军队不能加以剿灭，即任何外来金钱武器压迫，亦不能使其软化。职是之故，本人代表南洋一千万华侨，特向贵国呼吁，请顾全国际信誉，以日本为前车之鉴，勿再误信武力可灭公理，奸谋可欺上帝，务望迅速改变对华政策，撤回驻华海陆空军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蒋政府以使中国内战得以终止，人民痛苦可以减少，则贵国将为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所拥护，而上帝必佑贵国矣。

南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

陈嘉庚

一九四六年九月

**电参政会响应学生运动**

       ［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廿九日南侨日报载］最近国内学生运动日形扩大，情形至为热烈，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昨特致电国民参政会吁请响应学生正义主张。原电如次：

       “南京国民参政会，并转全国同胞公鉴：国民党当局，假宪政之名，行独裁之实，任用贪污，滥发纸币，加以发动内战，更使民不聊生。京沪平津各地青年学子，迫于义愤，呼吁和平，竟遭惨杀，甚至以军法镇压学潮，封闭报馆，侨情愤激，特向钧会及各界同胞吁请响应全国学生正义主张，认为惟有恢复言论自由，切实保障人、权，方足以平民愤，以挽危机，临电不胜迫切待命。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叩”。

       另讯：星洲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简称民联会），特于昨日（廿八日）假座怡和轩，开执行委员会，讨论国内学生运动，由陈嘉庚主席，结果议决：于本月三十一日（星期六）下午三时，假座维多利亚纪念堂（即大钟楼会堂）召开星洲华侨各界代表大会，讨论国内学生运动。届时陈嘉庚将亲临主持大会。华侨各社团及各界之欲参加者，可于本日（廿九日）下午一时起至三十日下午六时止，向该会办事人领取入场证。领证地点为怡和轩，南侨日报社，及密驼律一四九号新民主文化服务社三处。

**抗议白思华报告书**

**致英国陆军部备忘录**

       ［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十三日南侨日报载］自马来亚前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关于马来亚战役之报告书发表以后，本报社论首先加以批评，认为对华人部份殊欠公允。其后中华总商会亦决定组织小组会，加以研究批评。昨日侨生领袖前华人义勇军队长叶平玉亦投函本报，表示意见。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氏在战时曾领导华侨，协助英政府，从事各项抗日工作，对于白思华报告书，尤极感不满，特搜集各项事实，于本日向英国陆军部提出备忘录。用航邮迳寄伦敦，该备忘录对白思华报告书中关于华人各节，提出事实，加以纠正，并要求修改道歉。本报兹向陈嘉庚氏抄录备忘录原稿，发表于下：

**为白思华报告书内关于华人事上英国陆军部备忘录**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进攻马来亚后，鄙人曾受新加坡总督汤玛士之命，领导华侨，协助英政府，从事抗战工作。至十二月廿八日，复奉总督命组织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由欧人领导，直至新加坡沦陷前，始停止工作。光复以后，鄙人缄口不提此事。惟读英国陆军部发表之白思华报告书，对于战争中华人援英抗日之若干事迹，竟加以抹煞，且对当地华人作极不公允，甚至错误之批评，显然欲藉此推诿战之责任。为此，鄙人代表当地华人，不得不提出下列各项事实，以对该报告书，作重要补充和纠正，并对报告书及白思华中将本人，表示不满与抗议。

       事实如下：

       一、一九三七年欧战爆发前，政府为预防安南暹罗米不能运来，即鼓励当地人种稻，但不允许华人参加。政府以法令限制华人汇款国内，援助其祖国对日抗战。政府又禁止华校教师学生参加筹赈工作，禁止华人抵制日货并将华人抗日爱国重要干部多人驱逐出境，其最著者如新加坡侯西反，槟城庄明理等。此等事实，说明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英政府对日采绥靖政策，故设法制止华人抗日行动，此为后来马来亚防卫战失败之一重要原因。

       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旬，战争爆发后，鄙人奉新加坡总督汤玛士之命，动员新加坡华侨，开掘防空壕，在全市动员华人数千，于一星期内完竣。

       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八日，鄙人奉新加坡总督汤玛士之命，组织华侨抗敌动员会，当时华侨各党派无党无派及侨生领袖，均参加工作。其中较为重要之工作为：（一）组织华侨义勇警察，以维持治安及消极防空，日夜服务者三千余人；（二）征募劳工，每日集二三千人，从无短缺，其工资先由华人方面筹垫，政府然后偿还；（三）组织宣传队，在街头及工厂宣传援英抗日。

       四、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英军决定弃守槟城，当时在城英人男妇六七百人，悉数平安撤退。新加坡总督且亲自到火车站迎接慰问。但当地华人及各族人士，则被当局拒绝使用交通工具，不能撤退。对政府此种不公允之措置，华人方面曾表示不满与愤慨。

       五、一九四二年一月卅日英军炸断柔佛桥，在军港内施行破坏，并将市中心高射炮撤移，保护退聚后方诸军兵，可见当时英军已无意死守新加坡，政府在平时，并未给予华人以普通服兵役之机会。但至二月一日，英政府突然发给步枪一千枝，交华侨青年（即所谓“打里军”）执中国旗帜，开往林厝港，防守海岸。此外又令新加坡华人义勇军三百余人苦守前线，英军于准备新加坡弃守时，始将防卫工作委诸临时草草编成华人队伍，因此使敌人更痛恨华人。新加坡沦陷后，日军令华人分区集中，加以屠杀，新加坡柔佛各地，华人因此遭惨杀者数万人。

       六、吉隆坡未沦陷时，华人青年即组织游击队，在山林里阻挠日军行进，其后扩大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英勇抗敌，光复前始行复员。此为众所周知之事，兹姑从略。

       七、战前政府对于华人加入义勇军，限制綦严，对欧亚籍义勇军之间，显有差别待遇。华人义勇军建立历时五十载，而华人几无一人升至连长者，由前华人义勇军队长叶平玉在本年三月二日马来西报所发表之投函，可以作证。政府对华人义勇军之政策，说明政府从未信任华人以令其担负当地之防卫责任。

       查白思华报告书，对于上开各项事实，均未有所指陈，对于当时政府对华人政策措置错误所引起之责任，故意加以掩蔽。反之，白思华中将竟认为亚洲人“趋向较有力之方面，深恐战线后方之破坏现象促使彼等协助敌人多过于协助我等”。所谓亚洲人者，其中当然包括华人在内。就我华人观点，认为此种见解，不仅全不正确，且系恶意之诬蔑。华人尚确系“趋向强有力之方面”则中国能有八年之抗战，马来亚在沦陷时间，有成千成万之人民抗日军以与强敌周旋，其又将如何解释乎？

       为此鄙人代表当地华人一般之意见，对白思华报告书中有关华人之各节，表示严重之抗议，并要求在其报告书中作忠实之修正与道歉，以平息华人之愤慨。否则华人为保留马来亚战争之真相，亦必作一部报告书，以纠正白思华之错误。要之，已往之失败，即未来之教训。战争虽早结束，和平尚待努力。而欲保卫国土，首先当重视人民力量。若平时加之重重桎梏，一旦有事，始释其缚，而驱之赴前线，则未有不遭惨败者。今日马来亚，政制变更，聚讼未已。甚愿殖民地当局，惩前毖后，放大眼光，与民更始，勿使复辙相寻，噬脐莫及，则鄙人所厚望焉。

**（附载）白思华之答复**

       ［民国七年三月廿四日南侨日报载］白思华将军之马来亚战役报告书，对华人有诬蔑之批评，与事实不符，故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曾列举华侨援英抗日之种种事实，予以驳斥，并郑重提出抗议。其他侨生界领袖，如林汉河爵士，陈振传，叶平玉，叶玉堆等，均相继发表声明，指摘白思华报告书歪曲事实，抹煞华人抗日卫马之功绩。兹据本坡海峡时报伦敦电讯，白思华将军对华侨之抗议，曾发表书面谈话，一面承认华侨之抗议，其内容乃千真万确者，一面则推诿抗议各点，不包括在报告书之范围内。白思华称：“关于华侨领袖所提出的抗议，我的唯一的批评，就是他们的争辩，毫疑问许多地方是正确的。但这些争辩的课题，并不包括在我所撰的报告书范围内。”

       白思华将军阅读本坡海峡时报刊载华人之批评，及该报社论后，以书面答复该报伦敦通讯员称：“诚如贵报所言，余撰述此报告书之时，欲试图将其超越纯军事报告之普通标准之上，而欲引述在英国领土内作战所得之教训，以为未来之警惕。余认为在既往吾人不幸对此事之经验甚为肤浅，吾人应乘此机会对吾人目前所得之经验，善为利用。”

       “余必须声明，吾人所得之教训，不但仅实施于马来亚，亦同时可实施于不列颠各民族联邦之内。”

       “关于报告书应分民事及军事两部之提议，余赞成此项建议，亦宜以在吾人领土内之战役为限。”

**向白思华质问三点**

       ［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廿七日南侨日报载］前马来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近发表马来亚战役报告书，对于吾侨之协助英政府参加抗战种种事实不但未提只字，且诬蔑亚洲人“趋炎附势”，站在敌人方面；并谓吾侨缺乏中心领导者，抹煞一切，是以引起吾侨愤愤不平。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特上书英陆军部提出严重抗议。日前白思华中将致海峡时报驻伦敦记者之书面意见，答复陈氏之抗议。各情迭见前报。顷悉，陈氏对白中将所答，仍认为不满，爰致函海峡时报，请其转向白中将质询，如白中将不愿修正报告书且承认错误，则我华人必采取适当步骤，加以对付。兹录原函如下：

       海峡时报主笔大鉴。顷读本年三月二十四日贵报登载白思华中将致贵报伦敦通讯员之书面意见，就鄙人前送英国陆军部之抗议书，有所答辩。其中对于鄙人抗议书所陈事实，认为“多数系属真情，无可置疑”，但白思华报告书系属军事性质，而鄙人所陈事实则属民政，故不在该报告书范围之内云云。

       兹鄙人拟再向白思华中将质询三点：

       （一）以下事实为鄙人所忆及者。即（甲）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旬，战事爆发后，鄙人奉总督之命，逐日代雇工人二千余至三千人，到飞机场，军港及前方，挖掘战壕及任其他劳作，屡遭敌军轰炸，仍冒险工作不辍。（乙）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白思华中将命令素受政府训练之华人义勇军守最前线，嗣后伤亡逾六十巴仙。（丙）英军当局于二月一日以步枪一千枝发给华人青年，令防守林厝港海岸，嗣后死伤过半。（丁）英军投降前，华人即在吉隆坡组织抗日游击队，在森林中作战，参加者成千成万人，后为人民抗日军，冒千辛万苦，不屈不挠，三年余如一日，至敌降后始止。以上事实果属于军事范围否乎？何以白思华报告书竟加以抹煞乎？

       （二）白思华报告书内称：“亚洲人站在强有力方面”，彼恐亚洲人“见到后方受破坏，彼等帮助敌人更多于帮助我等。”试问亚洲人究在何处助敌，其人数有若干？是何种族？且助敌有何种事实？应请白思华中将明白说出，断不能以莫须有之说，诿败降之责于亚洲人士，并以欺蒙全世界人士也。

       （三）日军抵占新加坡岛时，作战二三日中，华人青年及义勇军，在前方伤亡已近千人。英军投降后，新加坡华人遭敌屠杀约万人左右。白思华中将或以为此种牺牲尚不算多，则请宣布英军在新加坡防卫战中死伤究有若干，投降后英人遭屠杀者究有若干。就余所知，恐尚不及被难华人十分之一也。

       以上希望贵报驻伦敦通讯员转向白思华中将质询。如白思华中将不愿修正报告书，且承认错误，则我华人必采取适当步骤，加以对付也。

陈嘉庚启

**与毛泽东主席来往电四件**

       ［民国卅八年二月十日南侨日报载］陈嘉庚氏于本月八日致一电与中共主席毛泽东氏，主张严办订立卖国条约之战犯。在此以前，陈氏曾接到毛氏一电，邀其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陈氏复电自言为政治门外汉，“冒名尸位，殊非素志”云云。兹将来往电文披露于次：

       毛泽东来电：“嘉庚先生，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盛望，众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毛泽东，一月二十日”

       陈嘉庚复电：“毛主席钧鉴：革命大功将告完成，曷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蒙电邀参加新政府协商会议，敢不如命。惟庚于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冒名尸位，殊非素志。千祈原谅！陈嘉庚”

       主严办卖国战犯：“剑英将军转中共毛主席钧鉴，阔别十年，时切驰念。革命大功，瞬将完成，欣庆何似。敬祝新民主政府百事顺利，公等政躬康泰。战争罪犯中，卖国贼当为首恶。史书记载，虽有孝子贤孙，百世不能改一字。如蒋介石、宋子文、王世杰、孙科、张群等，订立卖国条约，及求美国军事援助，罪大恶极，绝对无可宽恕也。陈嘉庚叩齐。”

       四月九日陈氏又致毛氏电如下：“毛主席钧鉴：南洋各属华侨失业日多，不景气日重，前途悲观，今后回乡者必众。日寇侵陷时，侨汇断绝，加之内战三征，苛政百出，闽民贫惨，莫可言喻。抵选择贤能闽人，训练多士，俾福建解放迅速，兴利除弊。庚万十恳切盼祷之至。陈嘉庚叩”

**与朱绍良等来往电**

**致闽朱绍良电**

       朱主席台鉴：兰州厚待，感激难忘。闽民经陈仪虐政，及抗战内战，征拿壮丁，有去无回。日寇侵陷南洋，侨汇断绝，生计艰困，悽惨莫可言喻。近闻先生征丁征粮，更形严厉。然内战谁方胜败，尽人都知，助纣为虐，等于自杀，请以陈仪为鉴。造惠桑梓，亦可为自家善后计，敬为闽民请命，祈卓裁！陈嘉庚叩佳。

（三十八年三月九日）

**致何应钦电**

       应钦先生台鉴：临别前夜，辱蒙缱绻，铭感难忘。蒋介石背叛国父主义，狡诈无信，神人共愤，惨败当然。国共谁方胜败，尽人都知。四大家族，有美国可逃，先生等将逃何处乎？请速接受中共条件，勿误再误，公私均利，否则遗臭堪虞！陈嘉庚叩寒

（三十八年三月十四日）

**致李宗仁电**

       宗仁先生台鉴：老河口厚待，感激难忘。而示蒋介石作事甚偏，偏则无是非，损人格。先生竟与同流，良可婉惜！国共谁方胜败，尽人都知。四大家族可逃美国，先生等将逃何处乎，一误安可再误，请速接受中共条件，公私均利。否则遗臭千古，后悔不及矣！陈嘉庚叩寒

（三十八年三月十四日）

**致白崇禧电**

       崇禧先生台鉴：临别前夜，辱蒙缱绻，铭感难忘，蒋介石无是非，惨败当然。先生一误安可再误？国共谁方胜败，尽人都知，四大家族有美国可逃，先生等将逃何处乎？请速接受中共条件，公私均利，否则遗臭堪虞。陈嘉庚叩寒。

（三十八年三月十四日）

**朱绍良复电**

       新加坡中国领事馆，请转陈嘉庚先生，佳电奉悉。密。暌违有日，驰念素殷，载拜佳言，钦迟曷极！吾兄爱乡情切，至希时锡周行，藉匡不逮。特电布复。弟朱绍良。

**电悼冯玉祥将军**

       ［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南侨日报载］冯玉祥将军在黑海船上遇难逝世，各方多表示悼惜，顷陈嘉庚氏探悉冯夫人尚暂居于莫斯科，特发出一电托塔斯社转交冯夫人，以表吊唁之意。原电如下：

       莫斯科塔斯社转

       冯玉祥夫人礼鉴：惊闻冯玉祥将军及令爱噩耗，至深悼惜！冯将军爱国爱民，对于革命事业多所贡献。不幸遽尔云亡，实为中国人民之损失。尚望节哀顺变，共同完成冯将军之遗志。

陈嘉庚叩咸

**评蒋鼎文之谈话**

       ［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南侨日报载］蒋鼎文在美发表谈话，称蒋介石、毛泽东、陈嘉庚三人为中国伟大人物，希望此三人合作云云。记者偶赴怡和轩向陈嘉庚先生叩询对于蒋鼎文谈话作何感想，陈先生答称：

       人生大病在不自知，我虽年老尚有自知之明，安敢与蒋毛二公相提并论？第人之品性往往不同。二公所能者，我则绝对不能；而我所能者，二公均能之，唯肯行与否耳。我自信所能者仅为“诚信公忠”四字，其他军事政治则全不谙。蒋委员长与我绝对相反，我知之最深。若毛主席与蒋委员长，更大不相同。其为人言信行果，经纬才干，我国无出其右者，此亦我之所知也。至谓蒋毛合作，便可使国事安定，为此说者，其眼光思想，可谓十分简单。缘蒋毛二人存心各不同，思想互相参差，意见甚于水火。我早断协商无结果，内战难避免，虽有美国最新式武器之援助，大量物资之供给，以为种种利诱威胁，蒋亦必终归失败，岂待今日而后知耶。

**辞谢行总协修集美校舍**

       ［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廿五日南侨日报载］陈嘉庚先生创办之集美学校校舍，抗战时期被敌寇炮击，飞机猛炸，致数十座屋宇，无一完好。加以多年荒废，自然损坏不堪。去年八月敌寇投降后，即从易于修理之一部分赶修。至本年去秋，费去八千余万元。若现下工料昂贵，非数万万元莫办。计修竣诸校舍，仅可容中学学生千余名而已。其他破坏较重之部份，若要修竣，须工料费二万万元。又延平楼及其他数座，倒塌更甚，几需完全重建，按费须三四万万元。陈氏昨接集美学校董事长陈村牧来函云：行政院救济总署厦门办事处，近决用工赈办法，补助修理受敌炸毁小学校舍；其办法，材料费学校自行筹措，工费则由行总拨发面粉补助；集美校舍应修理一部份之费二万万元，其中工资占八千五百万元，由行总补助之，其他材料费，则由本校自理。各条件经与厦门行总办事人议妥，故来函征询可否接受。据记者探悉，陈嘉庚先生已复函辞谢。该函大意谓：国家不幸，遭抗战之损失，战事告终后，不能奋志自立，以图强盛，反而依靠外国救济，政府如是，社会如是，华侨机工复员亦如是，甚至教育机关亦如是，其可耻可悲，可羞可痛，为何如是耶！号称胜利国五强之一，人民之众，居世界第一位，列强中谁如此卑劣？素称“礼义廉”者，果如是乎？可哀也已！

**与美记者谈我国新局势**

       ［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廿三日南侨日报载］美联社星洲分社主任马斯特逊氏，昨日赴怡和轩俱乐部，访问陈嘉庚氏，畅谈中国问题。陈嘉庚即席对马氏表示：只要美国改变其对华政策，新中国人民，将会原谅美国人民的，因为中国人民充分了解，坚持目前美国对华方针的，是美国的执政者，并不是美国人民的意见。

       马斯特逊为前美联社驻华记者，在中国居住达三年时间，对中国情形有深刻之观察。彼对华所见蒋介石统治下中国人民之饥饿痛苦，极表同情。当其于数月前离华来星时，即对记者及友人断言蒋介石政府两个月必倒，而今此种预言已成为事实。

       马氏密切注意新中国政府对外通商问题。并认中共在握有政权之后，应以中国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之利益为依归，且应有对社会之责任感，如果仿国民党之腐化政策，即将重蹈国民党之覆辙。

       兹将席间有关中国问题之谈话录下：

       马氏问：“陈先生准备回中国吗？”

       陈氏答：“上海解放后，就要回去。”

       问：“依陈先生看法，预料上海何时可解放？”

       陈氏笑答：“这，你比我看得更清楚了。”

       问：“陈先生曾经会过毛泽东吗？”

       答：“是的。一九四〇年回国时，曾会过毛泽东。”

       问：“毛泽东是个好人吗？”

       答：“是。”

       问：“他是一个好领袖吗？”

       答：“是的，他和蒋介石的为人，完全不同。”

       问：“陈先生认为中国的政局，将来应该如何处置，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包括中共，民盟，以及李济深等各方面人士联合组成的联合政府？”

       答：“是的。”

       问：“在这联合政府中间，国民党可以参加吗？”

       答：“除了国民党反动派以外，当然可以参加。”

       问：“在新的联合政府中间，谁将握有控制之权力？是中共，民盟，或是某一其他方面？”

       答：“当为中共。因为他们具有十数年之丰富经验，对中国实际情况有充分之了解，而且拥有甚多优秀的人才。”

       问：“中共在获得胜利以后，是否有办法将中国目前之残局改善？如果会，需要多久的时间？”

       答：“这在我看来并不难，相信中共胜利之后，最多不过一年余，就可将中国局面改善。”

       问：“陈先生对中国复兴，有何计划？是否准备参与一部分工作？”

       答：“我对政治问题，素为门外汉。”

       马斯特逊氏说：“这并不是单单政治问题。中国目前最主要者，乃经济问题，而商人对经济复兴工作诚可出一部分力量。”

       陈氏答称：“中国资源丰富人力充沛，在中共胜利以后，中国在经济上必不成问题，只要地方治安良好，交通恢复，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衣食住问题能得妥善解决，中国即能步上复兴之道。”

       马氏问：“照陈先生看，中共可在几个月内肃清国民党残余？”

       陈氏答：“除散布在台湾，以及新疆、西康、西藏等边僻地区之部份外，散在其他地方之大部份反动武力，相信在今年内肃清。在四五个月中间，解放军将可解放中国之大部份重要地区。”

       问：“在国民党反动分子肃清之后，新的中国联合政府，如留有职位请陈先生回去协助建立工作，先生准备接受吗？”

       陈氏又简单的答：“政治我不懂。”

       问：“那么，陈先生对新中国政府的兴趣，主要者在哪一点？”

       答：“我准备回到祖国各地游历，看看新政府如何谋新中国的发展，如何改善新中国。”

       问：“陈先生在抗战期间，曾经协助蒋介石，为其筹募赈款，协助抗战工作，后来为什么又反对他呢？”

       答：“因为在我回国的时候，看到了中国政治的真象。有几次，我在意见上和蒋介石抵触。第一次，余亲赴延安之后，曾在重庆称赞中共地区之良好政治，蒋介石当然不满。第二次，余在福建，见陈仪政治败坏，提出反对，并电告蒋介石，促其改革，但蒋竟偏袒陈仪，对余反对陈仪之举，表示不满。其后余经国内各地，到处号召反对陈仪暴政。返南洋时，又到处召开福建会馆会议，斥责陈仪。抵星之后，亦屡次对陈仪治闽劣迹，提出攻击。”

       问：“照陈先生看法，蒋介石有再登台的机会吗？”

       答：“余早已见及蒋介石无可能保持其政权。前年余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即曾指出蒋介石政府乃无希望之政府，盖蒋介石乃一不顾信义，经常不遵守诺言者。即余个人亦曾数次受其骗。”

       马斯特逊氏继称：“余在中国，曾与中共方面人士接触，而今，仍有一问题未能彻底清楚，即中共控制中国以后，中国是否将继续与英美及欧亚各国通商？”

       陈氏称：“如果欧亚各国都能以平等原则对待中国，则我们当然欢迎他们跟中国通商。”

       问：“新中国不致只跟苏联来往，而不跟其他国家发生商业关系吧？”

       答：“中国是不会如此的。”

       问：“有许多人说，中共受莫斯科指挥，先生以为然乎？”

       答：“这是国民党反动派那一般人所说的。可是，我到延安时，即未见到有苏联帮忙中共的证据，迄今，亦未尝见有苏联帮忙中共之迹象，只是，根据当时国防部长何应钦报告：中国抗战期间，苏联曾经以三万万美元之巨量物资，帮助中国抗战。却未闻苏联曾以军器私下帮助中共。”

       马斯特逊对于此点，表示颇有同感。渠称：有名的美国记者，如《西游漫记》作者史诺氏等亦如是报导。而他个人，亦未尝见到有任何苏联个别帮助中共之迹象。

       陈嘉庚说：“以毛泽东之为人，不但不愿与友邦发生恶感，就是他个人对于蒋介石，本亦无特殊恶感存在。当余将离延安返重庆时，毛氏即曾嘱余对蒋介石表示态度，强调其本意纯为造就中国之良好局面与光明之前途。”

       马氏问：“在中国抗战期间，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为中国政府筹募之款额，共有多少？”

       陈氏答：“共达当时国币四万万元，占华侨汇回祖国款额总数之十分一。其时汇率平均为叻币十六元折合国币一百元。根据财政部之报告，一九三九年华侨汇回祖国之总额，达国币十二万万元，其中十巴仙即为侨胞捐款。而根据何应钦报告，同年所用战费，共达国币十八万万元。”

       问：“陈先生对李宗仁之看法如何？”

       答：“李宗仁前与蒋介石一样，亦曾在我面前大骂中共，但现在，也许‘变了’。他不满意蒋介石。”

       问：“照你的看法，李宗仁参加在联合政府之中吗？”

       答：“我想，中共不让其参加。”

       问：“孙科如何？”

       答：“孙科根本是个庸材，是一个愚夫。”

       马氏问：“照我的看法，中共要攻占南京上海，是随时可以办到的，可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进攻呢？”

       陈氏答：“这一方面也许是看看局面是否可以和平解决；另一方面，也许是渡江的准备工作，如船只等等，还没筹备妥善，相信再过三数星期，这种渡江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就可作大规模进攻，那时，渡江的解放军，将不仅是数千数万，而是成百万浩浩荡荡开到江南各地来的。”

       这时，马斯特逊停一会儿，大家喝一口咖啡，转变话题，谈起陈嘉庚氏过去曾资助厦大，及至今赞助集美学校的事情来。接着问道：“陈先生目前在中国有事业吗？”陈氏说“无”。马氏继而问起陈氏的年纪，陈氏告诉他今年七十六岁了。马氏闻言，对陈氏精神，表示格外钦敬，自谓他如果到了这种年纪，将远不如陈氏对一般问题之清楚了解矣。

       陈氏继请马氏根据其居住中国数年之观察，发表对中国前途之看法。马氏首先声明其所发表之意见，系与各方人士谈论后汇集之结论。继称：

       “余认为：中国要繁荣起来的。而中国的繁荣，是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繁荣分不开的。”

       “中共如果把握了中国政权，就应该有一种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感，应该以全国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之利益为依归，而不应该为了自己，或为了其他小部份人的利益着想，如果象国民党那样只是自顾私囊，而置人民死活于不顾，必将重蹈国民党失败之复辙。”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曾经得到中国人民之拥护，如果能保持过去的荣誉，走向为国为民的正当道路，当可备受中国人之敬佩。可是，他却和一般右派的极端分子搞在一起，造成无可挽救的大错。于是，跑上失败的道路。”

       “中国人民的要求，实际上非常简单，他们只要有一锅饭，一碟菜干，就可以过日子。执政权的，就不应该忽略了人民这种起码的合理要求。”

       陈嘉庚对马氏上述见解，认为正确。并称“中国局面之艰难，实由于执政领袖之败坏，如有良好贤明领袖，起而领导，中国实不致陷入苦境。”

       马斯特逊说：“余曾走过中国甚多地方，会见国共双方人士，知国共双方，均有甚多好人，如果他们能抱定为人民谋利益宗旨，破除一切政治成见，真诚相见，团结一致，则中国前途，必然是光明的。”

       陈嘉庚说：“照余所知，国共双方握有权柄之领袖，绝无合作之可能。因两边领袖之性质，根本完全不同。一方真实做事，而另一方面却是欺骗人民，所以，我几年前就认定，双方要打，决无妥协之余地。中国今后，已不可能有如过去军阀割据，像阎锡山、傅作义，自拥地盘而后谋联合之现象。”

       陈氏继称：“毛泽东的确是一个有远大眼光的人。这充分表现在西安事件之释放蒋介石。可是蒋介石却充分表现其一惯不守信义之作风，如果毛泽东落入蒋介石之手，恐怕就没有保全性命之希望了。”

       “西安事变，中共主张释放蒋介石，只附以五项条件：一、以西北廿一县为自治边区；二、允许中共练兵三万名；三、每月发给中共军政费用六十八万国币；四、如在对日抗战时期，每月须供中共枪弹八百万粒；五、日本占领华北，须即发动抗战。最后，言明上述五条，须正式提交行政院通过，并向全国公开宣布。”

       陈氏指出：“但蒋介石对最后一点，却不守诺言。所有五条件虽曾交由行政院通过，但全未公开宣布。这事情直到朱德将军对我当面提起，我才知道。”

       马斯特逊继问：“现在中共方面，充满热烈之反美情绪，将来如果中共控制中国之后，这种情绪，是否将继续存在？”

       陈嘉庚答：“如果美国的对华政策改变，这种情绪，当不致继续。因为我们充分了解，坚持目前美国对华方针的，是美国的执政者，并不是美国人民的意见，中国人民会对美国人民加以原谅。”

       马氏听过了这种话，也对陈嘉庚说：“是的，我与军调部叶剑英，曾有多次之来往，也发觉了中共一般领袖，与美国实仍保有良好之感情。”马氏继称赞一般中共领袖，如周恩来等为好人，只是表示对李立三印象不好。他也称赞吴国桢，可是陈嘉庚不同意对吴国桢的称赞，谓：吴国桢是一丘之貉。（下略）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

      中国的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持续走向繁荣富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重视历史的学习与研究，注意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这是中国的一个优良传统。毛泽东讲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他还多次发岀过“学一点历史”的号召。邓小平指岀，“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江泽民提出，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胡锦涛也说过，要“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习近平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中学生、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生力军，为了肩负起建设国家的责任，必须了解华人的祖籍国的国情，不仅要了解中国的今天，还应当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对于我们来说，不论今后将从事何种专业工作，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都是很必要的。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中国高等学校本科生必修课之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当达到什么目的呢？主要是要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了解中国历史、国情，深刻领会中国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

      具体说来，应当达到以下的目的与要求：

      一、了解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及其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了解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项历史任务；懂得必须首先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能为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开辟道路，认识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进步性；自觉地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传统，进一步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而进行艰苦探索、顽强奋斗的历程及其经验教训；注意比较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治方案，懂得旧民主主义革命让位给新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原因；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增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自觉性。

      三、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内外环境，了解中国人民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了解实行改革开放和搞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联系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懂得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正确性；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一步树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深刻认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自觉地以之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五、紧密结合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实际，通过对有关历史进程、事件和人物的分析，进一步明确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懂得珍惜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习近平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这是党和人民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风雨前行的资格。”要警惕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历史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一）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

      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国，位于亚洲的东部，土地广阔，人口众多。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岀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约在五千年以前，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等地区已经岀现早期文明社会的要素。四千多年前，是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尧、舜、禹时代。公元前21世纪开始形成王朝国家。早期的王朝是夏、商、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后经历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西夏金、元、明、清等朝代。两千多年来，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交流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都作出了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中华文明尽管也历尽沧桑，却始终绵延发展、传承不绝，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丰富多彩、灿烂辉煌。古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古代中国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典籍文献浩如烟海。古代中国的文学艺术高峰迭起，美不胜收。这些是古代中国人民勤劳、智慧创造的结晶，也是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文明交融、汇合的产物，又是中外文化交流、互鉴、融合的结果。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还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优良传统的民族。

      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中国封建社会由昌盛到衰落**

      自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代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封建社会前后延续了两千多年。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经济占主导的地位。封建统治阶级从皇帝、贵族、官僚到一般地主拥有最大部分土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很少或者没有土地。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交纳高额的地租。

      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这三者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封建政权还向农民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和摊派徭役。农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生活极端贫困。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帝国开始，历朝统治者不断加强皇权，以统制人民，并加紧对地方官员的控制和监督。

      自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还与佛教、道教相互吸收、融合，共同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封建统治者同时吸收法家思想，严刑峻法，实行专制统治。

      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其核心是宗族家长制，突出君权、父权、夫权。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一方面巩固和维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另一方面也使其前进缓慢甚至迟滞，并造成不可克服的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出现过一些“盛世”，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清代的“康雍乾盛世”等。这种局面通常岀现在一个朝代的前中期。当时的君主吸取历史的教训，能居安思危，政治较清明，轻徭薄赋，励精图治。但是，随着政治腐败、土地兼并等的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发展逐渐陷于停滞状态，直至迫使农民不得不为求生存而举行起义。这些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腐朽、黑暗的统治秩序，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期，但同时也走向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到了鸦片战争前夜的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衰相尽显，潜伏着许多危机，而且闭关自守，故步自封。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殖民扩张**

      16世纪至19世纪初，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兴衰更替之时，西方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发展，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也随之向外扩张。

      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历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至18世纪，继英国之后，美国、法国等先后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和提供了政治上的前提和保证。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从英国开始然后迅速推广到欧美各国的工业革命，使大机器生产取代了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殖民主义是适应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而产生的，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而发展，是西方列强对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地区人民的剥削、掠夺和压迫、奴役。它是为资产阶级剥削国内外人民、建立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服务的。

      在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资本输出成为殖民剥削的重要形式。殖民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由少数帝国主义强国主宰的更完整的世界体系。

      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步使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历史。西方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但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来到东方，并不是为了使东方国家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为了把它们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成为自己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附庸。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向东方的殖民扩张，使古老的中国遇到了空前严重的挑战，面临着极其深刻的生存危机。

**二、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一）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重大转折。

      19世纪初，英国已经基本上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国家，建立了号称“日不落”的殖民大帝国。在亚洲，继占领印度之后，中国成为它的主要的侵略目标。

      英国对华贸易长期处于人超状态，英国工业品遭到中国自然经济和闭关政策的顽强抵抗，销量不大，而英国商人却需要用大量银元购买中国的茶叶、生丝等商品。于是，英国殖民者以走私毒品鸦片作为牟取暴利及改变贸易逆差的手段，强迫其殖民地印度种植鸦片，再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收购、加工，然后走私到中国贩卖。据不完全统计，鸦片战争前40年间，英国运人中国的鸦片约有40万箱，从中国掠走了3亿至4亿银元。

      1825年和1837年英国发生了两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和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英国政府迫不及待地要发动一场侵略战争。

      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蓄谋已久。1835年，林德赛致函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子爵，建议对中国发动战争，而且提岀了具体的作战方案和所需的兵力及时间、路线等。在华鸦片贩子、伦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曼彻斯特商会和利物浦印度协会等，都曾经上书英国政府，要求动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

      英国的鸦片走私不仅造成了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和财政危机，还导致银贵钱贱，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并且直接毒害了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清政府实行禁鸦片措施，特别是钦差大臣林则徐于1839年6月在广东虎门销毁所收缴鸦片的行动，完全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正义行动。英国政府更加紧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1840年4月，英国国会通过对华战争的决定。同年6月，英国侵华舰队封锁了珠江海口和广东海面。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派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接着，1843年10月，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美国、法国等西方列强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如1844年7月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10月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

      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英国等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了大量侵略特权。如：割占香港岛，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外国船舰可在中国领海自由航行，破坏了中国的领海主权；外国人在华不受中国法律管束，享受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协定关税，则破坏了中国的关税主权；等等。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逐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就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二）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就是认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是认识中国近代一切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依据。

      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及其与中国封建主义势力相结合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一种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畸形的社会形态。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其一，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其二，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半封建的中国。

      为什么说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

      这是因为，鸦片战争以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等，并一步一步地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中国已经丧失了完全独立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被殖民地化了。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但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大国，特别是中国人民顽强、持久的反抗，同时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间争夺中国的矛盾无法协调，使得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征服中国，也使得它们不可能共同瓜分中国。这样，它们才没有能够如英国在印度那样，对中国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而是通过其代理人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帝国主义势力与中国的封建势力、买办势力相勾结，共同压迫、剥削中国人民，镇压中国革命。因此，近代中国尽管在实际上已经丧失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的地位，但是仍然维持着独立国家和政府的名义，还有一定的主权。由于它与连名义上的独立也没有而由殖民主义宗主国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尚有区别，因此被称作半殖民地。

      为什么说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封建的中国？

      这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门户，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之中。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洋纱、洋布等商品在中国大量倾销，逐渐使中国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分离，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了产业工人的后备军。一批官僚、买办、地主、商人投资兴办新式工业。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

      然而，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并不容许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利用获取的政治、经济特权，在中国倾销商品，经营轻工业和重工业，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而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外国资本及依附于它的官僚资本居于主要和支配的地位。在中国农村中，地主剥削农民的封建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依然占着显然的优势。这样，中国的经济既不再是完全的封建经济，也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了。

      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逐步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日益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

      第二，中国的封建势力日益衰败并同外国侵略势力勾结，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

      第三，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在广大地区内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障碍。

      第四，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已经产生，并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它的发展很缓慢，力量很软弱，而且它的大部分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第五，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和间接统治之下，加上中国地域广大，以及在地方性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近代中国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后来，帝国主义列强还分别支持不同的政治势力以分裂中国，使中国处于不统一状态。

      第六，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后来还加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其特征，是随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扩大，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结合的加深而逐渐形成的。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而且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有所差别。在某些时期，中国的某些地区甚至沦为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三）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

      随着近代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不仅旧的阶级发生了变化，还有新的阶级产生出来。

      旧的封建统治阶级即地主阶级继续占有大量的土地，掌握着国家政权，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不过，地主阶级本身也发生了某些变化。由于近代城市的发展、农民战争的冲击和乡村社会的动荡，有些地主从乡村迁往城市成为城居地主。一部分地主将土地剥削获得的货币投资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的附股外资企业，有的入股洋务企业，有的直接创办或参股民营企业，转化为资本家。不过，大多数地主仍主要依靠地租剥削生活，一些城居地主也往往兼营土地、高利贷和工商业。

      旧的被统治阶级即农民阶级，仍是近代中国社会人数最多的被剥削阶级。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不少自耕农失去土地，向贫农或雇农转化。有些农民破产或失去土地后流人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的后备军。近代中国的农民由于社会地位低下，受压迫、剥削严重，生活状况极度恶化，所以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但是，由于其作为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性，农民单凭自身的力量不可能求得解放，更不可能把反帝反封建斗争引向胜利。

      近代中国诞生的新兴的被压迫阶级是工人阶级。它的来源主要是城乡破产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中国工人阶级最早出现于19世纪40至5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企业中。因此，它是先于中国的资产阶级而产生的。在19世纪60年代后洋务派创办的大型军用工业和民用企业以及70年代以后的中国民族企业中，又雇佣了一批工人。早期中国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却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它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三重压迫，工资低、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受剥削最深，革命性最强，而且它还有组织纪律性强、集中、团结、与广大农民有着天然联系等优点，因此是近代中国最革命的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也是近代中国新产生的阶级。它不是像欧美国家那样，在原有手工业工场比较发达的基础上，由手工工场主和包买商等演变而成，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和刺激下，主要由一些买办、商人、地主、官僚投资新式企业转化而成。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民族资本兴办的新式企业逐步发展起来。

      中国资产阶级的来源不同，构成比较复杂。其中有一部分是官僚买办资本家。他们是利用政治特权和与外国资本的紧密联系，在剥削劳动人民和挤压民族资本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资产阶级的另一部分是民族资本家。他们经营的企业由于原始积累不足，大多数规模小、设备落后，并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发展缓慢，始终未能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民族资产阶级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工业不发达，商业畸形发展，工业资本家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主体。有的资本家同时在农村占有大量土地,兼营封建剥削。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表现岀两面性。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既有矛盾、斗争的一面，又有依赖、妥协的一面。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或者在斗争中保持中立，但是没有革命的彻底性，不可能引导中国的民主革命走向胜利。

**三、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

**（一）两对主要矛盾及其关系**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呈现岀错综复杂的状况。其中有：中华民族与资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派系的矛盾，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争夺的矛盾，等等。在这些社会矛盾中，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对主要矛盾及其斗争贯穿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始终，并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对主要矛盾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勾结、扶持封建势力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除了帝国主义割占的地区和直接管理的租界、租借地以外，它们主要是通过中国政府当局和各地的官僚、军阀来统治中国人民。

      一般来说，当资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中国内部各阶级，除一些叛国分子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外国侵略。这时，民族矛盾特别尖锐，阶级矛盾暂时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例如，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反帝运动，都有过这种情形。而当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结成同盟，用战争以外的形式共同压迫中国人民，尤其是封建主义统治特别残酷的时候，中国人民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盟，而斗争的矛头主要直接地指向中国的封建政权，这时阶级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例如，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辛亥革命，就是这种情况。当国内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资本—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时候，外国侵略势力甚至直接岀兵，镇压中国人民，援助中国的反动派。这时，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统治者完全公开站在一条战线上。例如，太平天国后期，清政府向外国侵略者“借师助剿”，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属于这种情况。

      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和演变，是上述两对主要矛盾互相交织和交替作用的结果。近代以来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主要矛盾及其激化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两大历史任务及其关系**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本国残酷的封建压迫以外，更遭受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残暴的民族压迫。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中国人的心头。近代中国人民的斗争，主要是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出发点的。

      近代以来，世界上的主要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曾经欺凌过中国；而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从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直到抗日战争以前，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其根本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说，“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正因为如此，为了使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为了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必须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这两大历史任务，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这样被历史地提岀来的。无数的志士仁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正是为此而进行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斗争。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个任务，是互相区别又互相紧密联系的。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经济技术的进步，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创造前提，开辟道路。这是因为：不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第一，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改变它们控制中国经济财政命脉，利用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压迫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局面；第二，就不可能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专制政治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扩大民族工商业的国内市场；第三，就不可能达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从而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幸福。

      近代以来，一些爱国人士提出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主张，并为此进行过努力，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在民族不独立、国家不统一、人民无权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这些主张并不能从根本上给濒临危亡的中国指明正确的出路。由于这些良好的愿望在实践中不断碰壁，他们中的许多人终于抛弃了这些幻想，毅然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道路。

      怎样才能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必须首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决不会自动放弃在中国攫取的特权，封建主义势力也决不肯自动放弃自己控制的政权，所以，以改良的方式是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统治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近代中国曾有不少人希望通过改良的途径挽救中国的危亡，如维新变法运动和立宪运动等，但统统行不通。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等，也是在进行改良的努力归于失败、对当权者幻想破灭的情况下，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事实上，只有通过革命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后，中国人民才有可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逐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从而使无数爱国志士和革命先驱为之献身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真正成为现实。

**第一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一、军事侵略**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首先和主要的是进行军事侵略。它们依仗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或者进行武力威胁，或者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干涉中国的内政，甚至直接出兵镇压中国革命。这种军事侵略是逐步升级的，从骚扰、蚕食中国沿海、边疆，到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甚至企图瓜分中国。

      发动侵略战争，屠杀中国人民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在历次侵华战争中，外国侵略者屠杀了大批中国人民。例如，1894年11月，日军在甲午战争中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在4天内连续屠杀中国居民2万余人。1900年7月，俄国入侵中国东北时，先后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沙俄军警把中国人居住的村庄烧光，把数千居民枪杀，或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同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仅在庄王府一处，就烧死和杀死义和团团民与平民1700多人。

      侵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每一次战争之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都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攫取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特权，劫掠中国的财富，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1860年，又通过中英《北京条约》，割去香港岛对岸九龙半岛南端和昂船洲。

      1849年，葡萄牙武力强占澳门半岛（葡萄牙人在明末就已经开始用欺诈手段借居澳门）。1887年，胁迫清政府订立《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允许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

      俄国利用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于1858年胁迫黑龙江将军奕山与之签订《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领土。I860年，通过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去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领土。1864年，强迫清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西北44万平方公里领土。1881年，通过《改订伊犁条约》和5个勘界议定书，割去中国西北7万多平方公里领土。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俄国共侵占中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

      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去中国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

      1898年，德国强租山东的胶州湾，把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沙俄强租辽东半岛的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以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强租山东的威海卫和香港岛对岸的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及附近的岛屿（新界），以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1899年，法国强租广东的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把广东、广西、云南作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也声明把福建作为其势力范围。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还运用武力或欺诈手段，霸占中国通商口岸内的土地，设立完全由外国直接控制和统治的租界。1845年，英国租得上海外滩附近837亩土地，设立上海英租界。以后直至1911年，英、法、美、德、日、俄、意、比、奥等国，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福州、重庆等16个城市，设立了30多个租界。租界里的一切都由外国殖民者管理，中国的法律在这里不发生效力，俨然是“国中之国”。租界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和外国侵略中国的据点。

      通过侵华战争，帝国主义列强还获得了在中国领土上驻兵的特权。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外国军队有权在北京使馆区和北京至大沽、山海关一线包括天津、唐山等12处“留兵驻守”。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攫得租自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他有关权益，在旅顺设置“关东总督府”，并派兵驻守上述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这支军队后来被称作“关东军”，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突击队。

      勒索赔款，抢掠财富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发动战争来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并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造成中国严重的财政危机，直接破坏和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如，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就强迫清朝地方政府交纳广州赎城费600万元（银元）。其后，更通过《南京条约》攫取赔款2100万元（银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各得赔款800万两白银。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迫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再加上“赎辽费”3000万两，威海卫日军“守备费”150万两，共2315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日本用中国的巨额赔款，继续扩充军备，海陆军扩充费及军需工业费等费用占赔款总数的85%，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迅速膨胀，很快地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应支付的赔款额竟高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近10亿两之巨。这些赔款，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实行的公开掠夺。

      不仅如此，列强在侵华战争中还公开抢劫中国的财富，肆意破坏中国的文物和古迹。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前，首先抢劫清朝皇帝的离宫圆明园内的金银珠宝、瓷器绸缎、文物古籍，拿不了的就加以毁坏，最后还放火焚烧了圆明园和附近香山、万寿山、玉泉山的殿阁建筑。参加抢劫的英国军官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皇宫以及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等禁苑里的无数金银财宝、珍贵文物古籍遭到他们的肆意劫掠。日本侵略军还从户部银库掠去300万两库银。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元帅瓦德西承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这些自称“西方文明传播者”的侵略者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充分地暴露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践踏文明的野蛮本性。

**二、政治控制**

      为了统治中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上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控制中国政府，操纵中国的内政、外交，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

      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在鸦片战争时期，外国侵略者还只是通过中国内部的妥协派贵族大臣如琦善、耆英、伊里布等人，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清王朝统治集团中不少权贵大臣仍对外国侵略者抱有疑虑、恐惧乃至敌对的态度。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法，在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同时，表示愿意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终于使清政府基本屈服。

      《天津条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当时西方列强的公使，是以战胜者的姿态进入北京的，他们不是普通的外交官，而是清政府的“太上皇”。美国公使田贝说过，他们经常教训清政府的大臣，什么事要做，什么事一定不许做。这就是说，外国公使可以在北京直接向中国政府发号施令。

      1861年，在外国公使驻京前后，中国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即“北京政变”（又称“辛酉政变”），恭亲王奕和慈禧太后掌握政权。奕等人由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与列强进行交涉并签订《北京条约》，而受到侵略者的赏识。英国公使普鲁斯向该国政府报告说:“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还享有领事裁判权。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在通商口岸，中国人如与英侨“遇有交涉诉讼”，英国领事有“查察”“听诉”之权，“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更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即所有美国人在华之一切民事、刑事诉讼，“均由本国领事等官询明办理”。从此，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横行不法，中国政府却无权干预。

      把持中国海关，是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政治的重要手段之一。近代中国海关的职权范围，除了征收进出口关税外，还管理港口，主办邮政，甚至涉及与外国人交涉的各种事务。中国海关的高级职员全部由外国人充任。海关总税务司俨然成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最高顾问，而各通商口岸的海关税务司则成了各地地方政府的高级顾问。英国人赫德自1863年任总税务司开始，直到1908年回国，掌握中国海关大权达40余年之久。他曾向清政府提岀《局外旁观论》，教训中国政府必须遵守不平等条约。他还帮助英国诱迫李鸿章签订《烟台条约》。

      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还勾结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们不但向清政府供应军火、船只，而且派外国军官组织并指挥“洋枪队”，甚至直接动用陆海军，对太平军作战。当中国人民掀起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即发生所谓“教案”时，外国侵略者便指使清政府屠杀中国人民，惩办对人民镇压不力的地方官员。如1870年发生天津教案后，法、英等国军舰聚集天津海口进行军事恫吓，迫使清政府判处20名民众死刑，流放天津地方官吏25人。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后，美国公使康格公开要求清政府派所谓“强有力”的人物袁世凯去山东进行镇压。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后，立即采取血腥手段屠杀义和团团民。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帝国主义列强还强迫清政府作出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对它们的组织的承诺，并规定清政府各级官员如对人民反抗斗争“弹压惩办”不力，“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扶植、收买代理人为了控制中国的政治，把中国政府变成自己的驯服工具，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注意在中国政府中扶植、收买自己的代理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得到列强支持的奕䜣、文祥等满族贵族掌握了负责对外交涉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中外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列强又扶植曾国藩、李鸿章等湘系、淮系官僚，并帮助他们购买、制造洋枪、洋炮和练兵。曾、李后来分别担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和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实行对外妥协的方针。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在《辛丑条约》签订前夕，甚至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末，帝国主义列强看中握有军权的袁世凯，支持他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建立北洋军阀政权。袁世凯死后，又分别扶植皖系军阀段祺瑞、直系军阀冯国璋、奉系军阀张作霖等各派系军阀首领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支持他们割据地盘与进行混战。

**三、经济掠夺**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方式，除了强迫中国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外，主要是利用其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岀，进行掠夺和榨取，逐步把中国卷人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

      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一地贸易，而且必须经过官方指定的公行即“十三行”进行。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5个港口城市为通商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又规定，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10个口岸。1860年《北京条约》又规定增加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陆路方面，清政府还向俄国开放伊犁、喀什噶尔等商埠。在这些通商口岸里，外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享有种种特权，控制当地的工商、金融事业，甚至设立租界，实行殖民统治。这些通商口岸大多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

      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关税自主权是国家重要的经济主权。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率，清政府均宜“秉公议定则例”。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将英商进出口货物的具体税率，用中英协定形式固定下来。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进一步规定，倘中国以后要变更税例，必须得到对方“议允”，正式把协定关税的条款订入条约。中国逐步丧失了关税自主权。1858年的《天津条约》还规定，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其商品不需要重新课税。洋货只需在海关交纳2.5%的子口税，就可以在中国内地通行无阻，不必像中国商品那样“逢关抽税，过卡抽厘”。外国廉价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倾销，排挤中国工业品和手工业产品，并获取高额利润。从19世纪50年代起，外国人逐步控制了中国海关的行政权。中国海关不仅不能起到抵制外国商品倾销、保护民族经济的作用，反而成为外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政治控制的一个重要工具。

      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种种特权，把中国变成了它们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取得廉价原料的基地。这些都是在中国丧失了独立主权因而处于与外国不平等地位情况下进行的。中国的对外贸易，从长期出超逐渐转变为大量入超。1890年至1894年，每年平均入超达到770余万海关两。洋货的大量倾销，使得中国民族企业的产品和传统手工业品受到排挤。直到19世纪末，鸦片依然占据进口货物的重要地位。

      外国资产阶级还直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洋行，垄断性地经营进出口贸易。到19世纪90年代，这一类洋行已达500多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英国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沙逊洋行，美国的旗昌洋行，德国的礼和洋行等。它们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还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在中国自由开工厂、办银行、修铁路、开矿山等，获取超额利润，压制中国微弱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895年以后，由于《马关条约》规定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外国资本家争先恐后地涌向中国投资。外国资本家经营的工厂资本雄厚、规模大、技术先进，民族资本家经营的企业无力与之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在中国的投资，相当部分并非由国外输入中国，而是利用战争赔款等方式掠自中国。

      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不可能在独立的基础上与外国发生经济往来。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发生经济关系，不是为了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是为了控制中国的经济，为自身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在中国的近代工业中，外国资本很快形成了垄断地位。1913年，外国资本占机械采煤投资总额的79.6%,占新式采铁和冶铁企业投资总额的100%,并且控制了41.2%的纱锭和49.6%的布机，使中国民族工业难以独立发展。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勒索中国的赔款，而且迫使中国举借外债来偿付这些赔款。它们还通过贷款，来支持中国反动政府镇压人民革命。中国政府举借外债，主要是以关税和盐税为担保的。这两项收入，是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清政府的这两项税收每年为4000万至5000万两，大部分用于偿付外债，自己只能得到一点“关余”“盐余”。外国列强直接控制了这两项税收，就等于扼住了中国财政的咽喉。

      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是它们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岀的枢纽。外国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银行是1845年进入中国的英国丽如银行（又称英国东方银行）。以后陆续开办或在中国设立分行的重要外国银行，有英国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等。这些银行不仅经营存款汇款业务，而且进行商业投机、工业铁路矿山投资、高利贷贷款、发行纸币、操纵汇价等。它们凭借各种特权及雄厚的金融实力，逐步地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成为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还控制了中国的现代交通运输业。中国境内的铁路绝大部分由外国资本经营。1911年，全国9618.1公里铁路中，由外国控制的达8952.5公里，占93.1%;而中国自主修筑的铁路只有665.6公里，仅占6.9%。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对中国铁路的控制，不仅攫取巨额利润，获得铁路沿线的许多经济权益，而且还由此从政治上、军事上取得对这条铁路及其沿线地区的控制权，确立和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外国资本还控制了中国沿海和内河主要航道的航运业。据海关报告，在各通商口岸进出的中外轮船的总吨位中，1877年，中国占36.7%，外国占63.3%；到1907年，中国只占15.6%，外国占了84.4%。1911年长江航线轮船吨位中，外资的太古、怡和、日清三个轮船公司就占了83.8%,而中国的轮船招商局仅占16.2%。至于远洋航线，则几乎全部为外国轮船公司所垄断。

      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不仅阻碍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的农业经济也造成严重破坏。外国商人依仗特权，低价收购中国农副产品作为其工业生产的原料，如生丝、茶叶、棉花、大豆、烟草、羊毛、皮革、猪鬃等，还通过垄断价格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进行不等价交换，获得超额利润。同时，他们还在国际市场上限制、打击中国传统岀口农产品，使它们价格低落甚至失去销路。这一切，也加速了中国传统农业的萎缩和衰败。

      总之，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中国在经济上也丧失了独立性，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成了西方大国的经济附庸。除了沿海、沿江少数城市的经济得到畸形繁荣以外，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经济都濒临破产。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导致了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贫困。

**四、文化渗透**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对中国实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的同时，还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其目的是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资本—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比如，1832年德国基督教传教士郭士立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以传教为掩护，在中国沿海进行过长达几个月的间谍侦察活动，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并竭力鼓吹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鸦片战争期间，他不仅担任英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在英军占领浙江定海县时担任“民政官”，还参与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和谈判。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向俄国公使和英法联军提供了有关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况和详细的北京地图。在I860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法《北京条约》时，担任翻译和文件起草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甚至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私自添上条约的法文原本上所没有的“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外国传教士由此获得了在中国各地城乡租买土地和盖房的特权，为外国教会在中国内地霸占地产、遍设教堂提供了根据。

      19世纪60年代后，外国传教士大批来到中国，并进入内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他们中的一些人，采用欺骗讹诈、强迫捐献、压价购买、强占垦地等手段霸占土地，建造教堂，剥削佃户，出租房产。有的还包揽词讼，包庇教徒中的不法分子，或者强迫中国教民抛弃中国传统礼俗，甚至公开干涉中国内政。这些传教士从事的不法活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和反抗。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各地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并不是偶然的。

      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外国教会中的某些势力还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制造舆论。它们在中国所办的某些报纸、杂志，所翻译、岀版的某些书刊，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态度和要求。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是广学会。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的指导思想是“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企图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如该刊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发表的《印度隶英十二益说》，竟然鼓吹英国统治印度有12条好处，主张把英国的殖民统治制度搬到中国来。广学会翻译、岀版的书刊，也常常美化帝国主义的侵略。如李提摩太在他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序言中说，“泰西各国素以爱民为治国之本，不得不藉兵力以定商情”，“然闭关开衅之端则在中国，故每有边警，偿银割地，天实为之”。

      帝国主义者为了制造侵略有理的舆论，还大肆宣扬“种族优劣论”。他们攻击诬蔑中华民族是愚昧落后的“劣等民族”，应该接受“优等民族”白种人的开导和奴役。19世纪末，欧美帝国主义者还炮制了所谓“黄祸论”，即中国威胁论。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甚至亲自构思了一幅《黄祸图》，让画家克纳克福斯画成油画送给俄国沙皇。西方还出现了一批关于“黄祸论”的文章和专著。有的“黄祸论”鼓吹者竟说，“一旦千百万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他们宣扬中国等黄色人种对西方白色人种构成威胁，企图以此论证西方列强侵略压迫中国有理。但是，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刺激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促使中国人民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第三节  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一、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及其原因**

      从1840年至1919年的80年间，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这些斗争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但是，历次的反侵略战争，都是以中国失败、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的。其原因，从中国内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一是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前者则是更根本的原因。因为正是由于社会制度的腐败，才使得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

      社会制度的腐败1840年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中国的清王朝，从皇帝到权贵，大多昏庸愚昧，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御敌之策。许多官员贪污腐化，克扣军饷。不少将帅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他们大多害怕拥有坚船利炮的外国侵略者，甚至为了自身的私利，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们尤其害怕人民群众，担心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以后可能危及自身的统治，所以，常常压制与破坏人民群众和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在这样腐败、无能的政府领导和指挥下的战争，怎么可能不失败？

      鸦片战争中，禁烟抗英有功的大臣如林则徐、邓廷桢等被革职查办，甚至发配充军；而主张对敌妥协的琦善等人反而受到重用。钦差大臣奕山到广东，竟然把人民群众诬蔑为“汉奸”，主张“防民甚于防寇”。清政府特别害怕战争持续下去，会引发农民起义，因而急于向英国侵略者谋求妥协，为此不惜割地、赔款。

      在中法战争后期，1885年3月，爱国将领冯子材指挥清军在中越边境前线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和谅山大捷，使法国侵略者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茄费理内阁还为此而垮台。可是清政府当权者却力主避战求和，接受法国条件，签订《中法新约》，并下令前线清军停战撤兵。中法战争最终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而告结束。

      中日甲午战争时，清廷为筹办慈禧太后六十岁生日庆典，除要求各级官员报效外，还提用户部饷银和边防经费，甚至挪用海军军费。大小官员考虑的头等大事不是如何抵抗外敌，而是给皇太后送什么礼物。11月7日慈禧太后寿辰，恰好是日军攻陷大连之日。慈禧太后却照样在宫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还让皇帝与大臣们陪坐听戏三日，不问国事。指挥战争的李鸿章为了迎合慈禧并保存自己控制的北洋海军和淮军的实力，消极避战，积极求和。清政府还下令不许接济和支援台湾军民的浴血抗战。在这种情况下，中日甲午战争最后只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开始以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守旧派虽然一度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与列强讨价还价及排斥异己，实际上却一直在背后牵制、破坏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官兵与八国联军的战斗。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及亲贵大臣们西逃。1900年9月7日，她在逃亡途中发布镇压义和团的上谕，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非痛加铲除不可”，并命令各地文武官员对义和团要“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同时，她又派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向八国联军乞降求和。此后，清军便公开与八国联军勾结起来，一同屠杀、镇压义和团团民。

      很明显，正是腐败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阻碍了中国人民群众的广泛动员和抵抗，这是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经济技术的落后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的落后。

      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经过工业革命，经济和技术飞速发展，封建的中国已被远远抛在后面。

      以鸦片战争为例，当时，清朝常备军包括绿营与八旗兵有80万人，而当时英国全国军队不过20万人，侵华远征军最多时仅2万人。但是，双方的武器装备、军队素质、综合实力却相差悬殊。

      就武器装备来看，多数清兵尚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火器也不过是用火绳点放的鸟枪、抬枪，炮台所用大炮有些还是明末制造的。而英军则普遍使用步枪，大炮则可打霰弹、开花弹，杀伤力强。

      鸦片战争的情况是这样，其他反侵略战争也有类似的情况。

      指出经济技术的落后是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并不意味着经济技术落后的中国就不应当进行反侵略战争或在战争中一定打败仗。因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而当时的中国，不仅武器装备等很落后，而且反动统治阶级实行错误的方针、政策，并压制人民群众的动员。这样，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一再遭到失败，才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二、民族意识的觉醒**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早期的维新思想受到鸦片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中国官吏和知识分子中少数爱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注意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总结失败教训，寻找救国的道路和御敌的方法。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被道光皇帝派到广东领导查禁鸦片和进行抗英斗争时，就组织人翻译西方书刊。在广州，他主持节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一书。该书叙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等情况。林则徐后来把自己收集的资料和《四洲志》书稿交给好友魏源。魏源在1843年1月编成《海国图志》，其内容除包括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以外，还有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论述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翻译西人论述的《夷情备采》及西洋科技船炮图说等。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以期富国强兵，抵御外国侵略。

      19世纪70年代以后，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要求吸纳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具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外国侵略、追求中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以及具有一定程度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如郑观应在所著《盛世危言》中提出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制度等主张。这些主张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的意义。

      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还只是少数人有朦胧的民族觉醒意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时，中国人才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对中国人的刺激极大。梁启超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接踵而来的瓜分狂潮，更使中华民族的各阶级、各阶层普遍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

      康有为1898年4月在保国会的演说中把这种民族意识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还在1895年，严复就写了《救亡决论》一文，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在甲午战争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1898年正式出版）。他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为这种危机意识和民族意识提供了理论根据。他在该书按语中指出，世界上一切民族都在为生存而竞争，“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中华民族也不能例外。中国如果不能改革自强，就会“弱者先绝”，亡国灭种。《天演论》对中国人无异是振聋发聩的警世钟。1898年有人绘制的一幅《时局图》，更是形象地表现了当时中国面临的瓜分危局。

      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发扬和升华。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孙中山1894年11月在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时就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由此，他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近代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正是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变革意识，历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去探索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的。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进一步的觉醒。

**第一节 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

**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的建立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社会各阶级都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国家的岀路进行探索，先后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和方案。

      农民是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主要的压迫对象和反抗力量。长期以来，中国广大农民在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下，过着极其贫困和不自由的生活。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为支付对列强的巨额赔款，同时也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清政府加重了赋税的征收科派。各级官吏在征收钱粮时往往浮收勒扣，横征暴敛，农民的负担更为沉重。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鸦片贸易在战后进一步泛滥，导致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现象更加严重，又额外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迫使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群众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1842年至1850年间，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在百次以上。清政府调兵镇压，但群众斗争彼伏此起，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反抗。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1843年，洪秀全撷取原始基督教教义中反映下层民众要求的平等思想和某些宗教仪式，从农民斗争的需要出发，加以改造，创立了拜上帝教，并利用它发动和组织群众。

      1851年1月，洪秀全率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随后，太平军从广西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一直打到江苏，席卷6省。1853年3月，占领南京，定为首都，改名天京，正式宣告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建立。

      太平军所进行的战争，是一次反对清政府腐朽统治和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正义战争。太平军在进军的征途中，坚决镇压和打击官僚、豪绅、地主，焚烧衙门、粮册、田契、债券，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统治秩序。太平军纪律严明，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散给贫者……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这使太平军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先后进行了北伐、西征和天京城外的破围战。到1856年上半年，除北伐失利外，太平军在湖北、江西、安徽和天京附近等战场都取得了重大胜利，控制了大片地区，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它确立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即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将土地按亩产高低划分为9等，好坏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凡16岁以上的男女，每人皆可分得一份数量相同的土地，不满16岁的减半。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希望通过施行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所以，《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是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

      《天朝田亩制度》的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体现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是对以往农民战争中“均贫富”“等贵贱”和“均平”“均田”思想的发展和超越，具有进步意义。不过，它并没有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它所描绘的理想天国，仍然是闭塞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又是一个没有商品交换的和绝对平均的社会。这种社会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性质。实际上，《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平分土地方案即使在太平军占领地区也并未能付诸实行。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后期颁布的社会发展方案。1859年，洪仁讦从香港来到天京。不久，他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它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方面，主张“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并学习西方，制定法律、制度。在经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银行等事业，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制造，尤其是提出“准富者请人雇工”，对穷人“宜令作工，以受所值”，这就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生产力的领域扩展到生产关系的领域，即开始提倡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了。在文化方面，建议设立新闻馆，“以报时事常变”，破除陈规陋俗，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在外交方面，主张同外国平等交往、自由通商，“与番人并雄”，但严禁鸦片输入。对于外国人，强调“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镑国法”。

      《资政新篇》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洪秀全看到后，几乎逐条加以批示，对其中绝大部分条款表示赞同，并下令镌刻颁布。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付诸实施。

从天京事变到太平天国败亡太平天国起义者们想要建立一个以“天王”为首的农民政权。但是，在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分散的小生产的基础上，虽然可以建立暂时的劳动者政权，但它最终还是会向封建专制政权演变的。

      在太平军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太平天国内部潜在的矛盾和弱点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1856年9月，发生了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的天京事变。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率部出走败亡。天京事变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军事力量，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为重整纲纪，挽救危局，洪秀全提拔了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具有军事才干的青年将领，1859年又封洪仁讦为干王，总理朝政。但是，这已经无法从根本上挽回败局。洪秀全本人的保守和迷信思想也越来越严重。当天京被湘军包围时，他拒绝了李秀成提岀的“让城别走”另辟新根据地的建议，坚持死守天京。

      1864年6月，洪秀全病故。7月，天京被湘军攻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

**二、农民斗争的意义和局限**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这次起义历时14载，起义军转战18省，并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各地各族人民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如南方和东南沿海各省有天地会及其支派的起义，北方有捻军起义，西南、西北有各族人民起义。天京失陷后，太平天国余部仍坚持斗争达4年之久。这些斗争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过程。

      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岀来。《资政新篇》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这反映了太平天国某些领导人在后期试图通过向外国学习来寻

      求岀路的一种努力。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太平天国起义也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

      太平天国起义还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贸易。尤其是当中外反动派勾结起来向太平军举起屠刀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同英、法军队和由外国军官组织和指挥的“常胜军”“常捷军”进行英勇的斗争，使侵略者“呼救无人”，“梦魂屡惊”。

      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义是其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动摇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有力地打击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显示了农民阶级的反抗精神和战斗力量，然而，其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深刻的。

      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缺乏科学思想理论的指导，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

      太平天国后期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滋生，领导集团的一些人在生活上追求享乐，在政治上争权夺利。太平天国诸王在建都后不久就大兴土木，建立豪华府邸。天王洪秀全“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东王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诸王与部将及广大士兵关系逐渐疏离，诸王之间更是“彼此睽隔，猜忌日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这些都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向心力和战斗力。

      太平天国军事战略上岀现了重大失误，比如，没有解决好与捻军这一抗清斗争主力的关系，没有同他们结成同盟，以致丢失了在北方赖以发展的良机，使北伐军艰难支撑直至失败；在天京被围困的情况下死守孤城，拒绝“让城别走”，导致太平天国的最后覆灭。

      太平天国是以宗教来发动、组织群众的，但是，拜上帝教教义不仅不能正确指导斗争，而且给农民战争带来了危害。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甚至认为“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梦想以虚幻的力量代替农民起义者自身的努力。

      太平天国也未能正确地对待儒学。他们开始时把儒家经书笼统地斥之为“妖书”，后来虽主张将“四书”“五经”删改后加以利用，但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儒学中的封建纲常伦理原则。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不承认不平等条约，这是很正确的。但他们不能把西方国家的侵略者与人民群众区别开来，而是笼统地把信奉天父上帝的西方人都视为“洋兄弟”，这说明他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还缺乏理性的认识。

      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它自身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第二节 洋务运动的兴衰**

**一、洋务事业的兴办**

      洋务运动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

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首先是为了购买和制造洋枪洋炮以镇压农民起义，同时也有借此加强海防、边防，并乘机发展本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意图。奕认为，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是“心腹之害”，俄国是“肘腋之忧”，英国是“肢体之患”，所以“灭发（指太平天国）、捻（指捻军）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具体怎么办？奕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

      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他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从19世纪60到90年代，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有三方面：

**（一）兴办近代企业**

      洋务派首先兴办的是军用工业，这些企业都是官办的。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个：1865年，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的福州船政局（附设有船政学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厂；次年，崇厚在天津建立天津机器局；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湖北枪炮厂。

      洋务派还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这些企业除少数采取官办或官商合办的方式外，多数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都是李鸿章筹办或控制的。这些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虽然受官僚的控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

**（二）建立新式海陆军**

      19世纪60年代，京师和天津、上海、广州、福州等地的军队纷纷改用洋枪、洋炮，聘用外国教练。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湘军也是用洋枪装备的军队。

      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中国台湾，清政府筹办海防、建设海军之议随之兴起。从19世纪70到90年代，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其中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拥有舰艇20多艘，这支舰队一直归李鸿章管辖。

**（三）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主要有三种：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一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一为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军人才。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先后派遣赴美幼童和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

**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失败**

      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洋务派提出“自强”“求富”的主张，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同时也试图“稍分洋商之利”，发展若干民用企业，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但是，洋务派兴办洋务新政，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与此同时，还翻译了一批近代自然科学书籍，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使人们开阔了眼界。

      洋务运动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重本抑末”等观念受到冲击，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对一部分人来说，西方的各种技术和器物不再被当作“奇技淫巧”受到排斥，而是被视为模仿、学习的对象。这一切，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

      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虽然办起了一批企业，建立了海军，但却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甲午战争一役，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

      首先，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企图以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达到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充分地发展起来的。他们既要发展近代企业，却又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民族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又不愿改变封建科举制度。

      其次，洋务运动对列强具有依赖性。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清政府已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正是依据种种特权，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它们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起来。而洋务派官员却一再主张对外“和戎”，其所兴办的企业一切仰赖外国，他们企图依赖外国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无异于与虎谋皮。

      再次，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洋务派所创办的一些新式企业虽然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其管理基本上仍是封建衙门式的。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由官方控制，经营不讲效益，造出的枪炮、轮船往往质量低下。即使是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其管理大多也是由政府“专派大员，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商人没有多少发言权，还要承担企业的亏损。企业内部极其腐败，充斥着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官场恶习。

      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贫弱找到出路，也不可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

**第三节 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一、戊戌维新运动的开展**

**维新派倡导救亡和变法的活动**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甲午战争的惨败，造成了新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而站在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前列的，正是代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知识分子。他们把向西方学习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不但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人们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日本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迅速传播开来，逐步形成为变法维新的思潮，并发展成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了下列行动宣传维新主张，即：（一）向皇帝上书。如康有为曾多次向光绪皇帝上书，他在1895年曾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共同发起“公车上书”。（二）著书立说。如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写了《变法通议》，谭嗣同写了《仁学》，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三）介绍外国变法的经验教训。如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了《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等书。（四）办学会。著名的有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五）设学堂。重要的有康有为主持的广州万木草堂、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的长沙时务学堂等。（六）办报纸。影响最大的有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严复主办的天津《国闻报》以及湖南的《湘报》等。维新派以各种方式宣传变法主张，制造维新舆论，培养变法骨干，组织革新力量，而重点则放在争取光绪皇帝及其周围的帝党官员的支持上，希望通过他们自上而下地实行变法主张。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当时，封建守旧派和反对改变封建政治制度的洋务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对维新思想发动攻击，斥之为“异端邪说”，指责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于是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要不要变法。

      守旧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有的人甚至主张“宁可亡国，不可变法”。而维新派则根据西方进化论的观点，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们提出，“变者天下之公理也”，“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只有维新变法，革除积弊，才能挽救中国所面临的危亡局面，以图求存和自强。

      第二，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守旧派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维新派则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作了批判。谭嗣同指岀：“君末也；民本也。”严复甚至认为，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隶”，而专制帝王则是“窃国者耳”。维新派还认为，“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即首先要为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士绅争取政治地位；只有君主立宪制度才是当时中国理想的政治方案，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是“治国之大经”。

      第三，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

      守旧派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斥之为“奇技淫巧”。洋务派虽认为西方的军事和技术可以学习，但坚持封建的政治制度、科举八股，尤其三纲五常绝对不能触动。而维新派则痛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因此要救中国必须废八股、改科举，办学堂、兴西学。严复大声疾呼：“民智者，富强之原”，“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针对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口号，维新派驳斥道：“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因为体用是不可分的，把中学之“体”和西学之“用”凑在一起，就如同要让“牛体”产生“马用”一样荒谬。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这场论战，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论战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进一步开阔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们长期受到束缚的思想。通过论战，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戊戌变法运动的帷幕随之拉开。

      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由于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在维新派的推动和策划下，富有爱国心、想要有所作为但又无实权的年轻的光绪皇帝也希望通过变法维新来救亡图存，并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手中夺取统治大权。1898年6月11日，他颁布了“明定国是”谕旨，宣布开始变法，并在此后的103天中，接连发布了一系列推行新政的政令，史称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其内容归纳起来，包括下列数端：

      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撤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政；提倡向皇帝上书言事；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取消他们享受国家供养的特权。

      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和交通采矿业，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与铁路矿务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提倡开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注重农业发展，提倡西法垦殖，建立新式农场；广办邮政，修筑铁路；开办商学、商报，设立商会等各类组织；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决算。

      军事方面：裁减旧式绿营兵，改练新式陆军；采用西洋兵制，练洋操，习洋枪等。

      文化教育方面：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在各地设立中、小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派人出国留学；奖励新著，奖励创办报刊，准许自由组织学会。

      “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各项政令大多是接受了维新派的建议而制定的，旨在开放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使资产阶级享受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戊戌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但是，在光绪皇帝发布的新政诏令中，并没有采纳维新派多次提出的开国会等政治主张。这些政令和措施并未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所要推行的是一种十分温和的不彻底的改革方案。

      维新派试图通过光绪皇帝推行的这种改革方案，遭到了封建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光绪皇帝所颁布的新政命令，由于中央和地方守旧官僚们的抵制，大多未能付诸实施。聚集在慈禧太后周围的守旧势力力图对维新派进行反击和镇压。经过密谋策划，守旧势力于1898年9月21日发动政变，慈禧太后以“训政”的名义，重新独揽大权，将光绪皇帝软禁于中南海瀛台，同时下令搜捕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海外。谭嗣同则拒绝了要他出走日本的劝告，坦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6人同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临刑前，谭嗣同悲壮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表现了为变法维新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1898年的“百日维新”如同昙花一现，只经历了103天就夭折了。除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被保留下来以外，其余新政措施大都被废除，维新派人士和参与或同情变法的官员，或被囚禁，或被革职，或遭放逐。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扼杀维新变法的政变，史称“戊戌政变”。戊戌维新运动宣告失败。

**二、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

      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仍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要求通过变法，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维新派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不仅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第二，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维新派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主张用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戊戌维新运动虽然未能成功地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其颁布的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若干措施也未能生效，但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制度。

      第三，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自由平等、社会进化观念，批判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从而把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壁垒打开了一个缺口，有利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在维新派的推动下，“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史学革命”等相继而起，形成了广泛的文化革新运动。以维新运动为起点，资产阶级新文化开始打破封建文化独占文化阵地的局面。在教育方面，维新派主张采用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兴办新式学堂，这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维新派在改革社会风习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如主张革除吸食鸦片及妇女缠足等恶俗陋习，提岀“剪辫易服”的主张，倡导讲文明、重卫生等。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主要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当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还十分微弱，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相当狭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维新派的势力更是非常弱小，很多人自身还保留着封建士大夫的痕迹。他们既没有严密的组织，也不掌握实权和军队，更没有去发动群众。这样，他们就只能把自己实行改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又怎能不失败？

      维新派本身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不敢否定封建主义。他们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只是幻想依靠光绪皇帝“以君权雷厉风行”，通过和平、合法的手段，实现自上而下的改良，让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代表参加政权，逐步实现君主立宪。在经济上，他们虽然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却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思想上，他们虽然提倡学习西学，却仍要打着孔子的旗号，借古代圣贤之名“托古改制”。

      其次，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虽然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却又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维新。维新派尖锐地揭露了俄国侵华的事实，却幻想依靠与英、日结成同盟来抵抗俄国。有人甚至建议聘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中国任维新的顾问。英、日帝国主义虽然表面上同情维新派，但实质上只是为了乘机扩大在华侵略势力，并寻找它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同时也是为了与俄国进行争夺。因此，在戊戌政变前夕，维新派分别乞求英、美、日公使的支持，结果都落了空。

      最后，惧怕人民群众。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他们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惧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康有为在每次上书中，都反复提醒光绪皇帝不要忘记人民反抗的危险，强调“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如果不实行变法，下层群众将会起来造反，使皇帝及其大臣们“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正因为没有人民力量作为后盾，所以当他们得悉守旧派要发动军事政变时，只得打算依靠掌有兵权的袁世凯，结果反被袁世凯出卖。而一旦守旧派操刀反击，维新派也就没有丝毫抵抗的能力。谭嗣同慷慨就义前的临终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正反映了这一点。“回天之力”存在于亿万民众之中，这是维新派的志士们所没有认识到的。

      戊戌维新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竟失败得这么快，这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戊戌维新的失败再次暴露岀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与顽固，“戊戌六君子”流血的教训促使一部分人放弃改良主张，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此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进一步发展了起来。

**第一节 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是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是当时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前赴后继顽强斗争的集中体现。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迫使中国签订《辛丑条约》以后，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扩展在华经济势力。外国在华投资规模急速扩张，包括扩大设厂规模和给清政府大量高息贷款，而铁路、矿山的利权更成为帝国主义掠夺的重要目标。1903年至1904年，英国派兵侵人中国西藏地区。1904年至1905年，日、俄两国为了争夺在华利益竟然在中国东北进行战争。清政府却宣称“局外中立”。经过一年多的厮杀，日本战胜俄国，俄国将所攫得的中国东北南部所有一切侵略特权“转让”给日本。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了。

      为了对外支付巨额赔款等，十多年间，清政府的财政开支激增4倍之多。在清朝的最后几年里，各种旧税一次又一次被追加，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更是层出不穷，各级官吏还要中饱私囊，致使民怨沸腾。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正是在中外反动派的严重压迫下，20世纪初，各阶层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从1902年至1911年间，各地较大规模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其中包括各阶层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农民、手工业者的抗租、抗捐、抗税斗争，工人的罢工斗争，商人的罢市斗争，少数民族与会党的起事等。同时，还发生了拒俄、拒法、抵制美货等爱国运动以及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等。在一些运动中，资产阶级开始成为主要的角色。

      这些情况说明，随着晚清政局的演变，人民群众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

      清末“新政”及其破产革命酝酿之际，正是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之时。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同时也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国内要求变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此后，陆续推行了一些方面的改革，包括：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裁撤象营，建立新军；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鼓励留学，颁布新的学制，并下令从1906年起正式废除科举考试。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又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一个仿效日本实行君主立宪的方案，但又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

      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正如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在回国后的奏折中所说的，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这正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目的。为了巩固皇权，清政府迟迟不答应资产阶级立宪派提岀的关于立即召开国会的要求，还镇压了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同时却不断借立宪之名加强皇权。1911年5月，在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成立的责任内阁里，13名大臣中满族就有9人，其中皇族占7人，被讥为“皇族内阁”。这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而分崩离析。

      事实表明，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这一点，连有的在华外国人也觉察到了。1911年5月，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在信中写道：“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发动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据统计，1895年至1911年间，新设立的资本额超过万元的民族资本厂矿达800家，资本额超过1.6亿元。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它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明显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阶级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这些青年学生接触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其中不少人在民族危难加深、群众自发斗争高涨形势的推动下，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当时出国留学成为一种潮流。中国留日学生最多时达近万人。有些人还远渡重洋，赴欧美留学。他们在国外更多地接触到了西方的政治思想，而且对世界大势与国内民族危机有了更敏锐的认识。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

      孙中山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从根本上说，近代中国的革命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逼迫出来的。中国革命的许多先驱者早年也曾尝试采取和平的手段来推进中国的变革与进步。1894年，孙中山北上京津向李鸿章上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可见，孙中山也曾寄希望于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把发展工业、教育等，当作“治国之大经”“富强之根本”。但是，李鸿章并没有重视他的意见。孙中山在北上京津的过程中，发现清朝的腐败比他原先了解的要严重得多。这时，他确信“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决心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朝的统治。同年11月，孙中山到檀香山组建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1895年策划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继续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04年，孙中山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岀只有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这表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踏上革命道路之时，就髙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并选择了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方式。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根本不同之处。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历史进入20世纪，随着一批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1903年，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观点，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强调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邹容写了《革命军》，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热情讴歌革命，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陈天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痛陈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揭露清政府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号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

      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在各地次第成立。从1904年开始，出现了十多个革命团体，其中重要的有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等。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力量。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在日本东京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公举为总理，黄兴被任命为执行部庶务，实际主持会内日常工作。同盟会以《民报》为机关报，并确定了革命纲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三民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后被称为三民主义。

      （1）**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一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改变它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二是建立中华民族“独立的国家”。孙中山指出，民族主义不是简单的排满，不是针对一切满人，而是“要将满洲政府所有压制人民之手段、专制不平之政治、暴虐残忍之刑罚、勒派加抽之苛捐与及满洲政府所纵容之虎狼官吏，一切扫除”。也就是要结束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及其媚外政策。

      但是，同盟会纲领中的民族主义没有从正面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当时的革命派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害怕帝国主义干涉，甚至幻想以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为条件来换取列强对自己的支持。同时，他们也没有明确地把汉族军阀、官僚、地主作为革命对象，从而给了这部分人后来从内部和外部破坏革命以可乘之机。

      （2）**民权主义**

      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政治革命。

      政治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民国。《军政府宣言》指岀：“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孙中山强调，政治革命应当与民族革命并行。民族革命是扫除“现在的恶劣政治”，而政治革命则是扫除“恶劣政治的根本”，从而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集国内民族压迫与封建专制统治于一身的清政府。

      不过，民权主义虽然强调了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却忽略了广大劳动群众在国家中的地位，因而难以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真正的保证。

      （2）**民生主义**

      民生主义在当时指的是“平均地权”，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孙中山主张核定全国土地的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革命后的增价，则归国家，为国民共享。国家还可按原定地价收买地主的土地。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诸多社会问题，其根源在于未能解决土地问题，因此他试图探讨一种一劳永逸的办法，既使中国富强，又避免产生贫富悬殊的现象，避免社会危机。为此，他希望“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但是，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主张，没有正面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在革命中难以成为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的理论武器。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初步描绘出中国还不曾有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一个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的提岀，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四、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广泛传播、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坚持走改良道路，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这个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投入这场论战的还有其他十几种报刊。

      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这是双方论战的焦点。改良派说，革命会引起下层社会暴乱，招致外国的干涉、瓜分，使中国“流血成河”“亡国灭种”，所以要爱国就不能革命，只能改良、立宪。

      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指出，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鹰犬”，因此爱国必须革命。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免瓜分之祸”，获得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

      革命派还进一步驳斥了改良派认为因革命要“杀人流血”“破坏一切”而不可革命的说法。他们指出：

      第一，进行革命，固然会有牺牲，但是，不进行革命，而容忍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中国人民将长期地遭受难堪的痛苦和作出更大的牺牲。“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由于害怕流血牺牲就否定革命，“是何异见将溃之疽而戒毋施刀圭?”革命虽不免流血，但可“救世救人”，是疗治社会的捷径。

      第二，人们在革命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乃至作出的牺牲，是以换取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孙中山说，“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这就是说，革命本身正是为了建设，破坏与建设是革命的两个方面。

      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改良派认为，中国“国民恶劣”“智力低下”，没有实行民主共和政治的能力，如果实行，非亡国不可。因此，只能实行君主立宪，这才是中国政治的现实出路。

      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指岀，不是“国民恶劣”，而是“政府恶劣”。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拯救中国与建设中国都必须取法乎上，直接推行民主制度，而不能以国民素质低劣为借口，搞君主立宪甚或开明专制。只有“兴民权改民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中国国民自有颠覆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能力。

      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改良派反对土地国有，反对平均地权。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组织优良，土地问题不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不存在社会革命的可能。社会革命只会导致中国的大动乱。他们还攻击主张平均地权是煽动乞丐流氓，主张土地国有是危害国本，并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宁死不让”。

      革命派强调，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地主强权”“地权失平”的现象。必须通过平均地权以实现土地国有，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实现社会革命，才能避免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的岀现。

      这场论战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对于这场论战，《新民丛报》在1907年也不得不承认：“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立宪党人则“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

      但这场论战也暴露了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弱点。比如，他们主张推翻清政府，但对“革命是否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的问题不敢作出理直气壮的正面回答，只是希望通过“有秩序的革命”来避免动乱和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所说的“国民”，主要还是指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而不是广大的劳动群众。他们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否应该改革的问题也是语焉不详，并且反对贫苦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这些理论和认识的局限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

**一、封建帝制的覆灭**

      武装起义与保路风潮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不仅提出了革命纲领，而且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相继失败，但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11年4月27日举行的广州起义。是日，黄兴率敢死队120余人在广州举行起义，大部在激战中牺牲。其中72位烈士的遗骸被葬于黄花岗，故是役史称“黄花岗起义”。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与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国有”名义把铁路利权岀卖给帝国主义，同时借此“劫夺”商股。这激起了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保路风潮，其中以四川为最烈。清政府在铁路利权问题上采取的政策，进一步激起了民众的愤慨和反抗，加速了革命的爆发。立宪派本来主张把保路运动限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之内，但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枪，造成“成都血案”。广大群众忍无可忍，在同盟会会员的参与下，掀起了全川的武装暴动。

      武昌首义与各地响应由于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湖北新军中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在武昌举行武装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驻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军一夜之间就占领武昌，取得首义的胜利。革命军在三天之内就光复了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

      武昌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打开了清王朝统治的缺口。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在一个月内，就有13个省以及上海和许多州县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

      在武昌起义和各省政权更迭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既表现出了革命性和勇敢精神，又暴露岀了软弱性和妥协态度。在一些地方，开始是由革命派发动新军或会党举行武装起义、宣布“独立”的。可是当反动势力反扑时，他们却不敢发动群众保卫已经夺得的政权，致使政权落到了立宪派或旧官僚、旧军官的手里。例如，湖北革命党人起义后，认为非找一个有地位的人物出来主持政务不可，于是把原清军协统（旅长）黎元洪硬拉出来当了都督。结果，黎元洪与立宪派结合起来把持了湖北军政府的大权。又如，湖南革命党人起义夺取政权后，最初由革命派焦达峰、陈作新任正、副都督。部分立宪派与旧军官发动政变，将焦、陈杀害，推立宪派首领谭延闾为都督。在一些省份，旧官僚和立宪派实际上改头换面地维持着旧政权。有的地方虽是革命党人掌权，但这些人很快蜕变为新军阀、新官僚。这就意味着，革命是很快地发展了，但它的基础并不牢固，在它的内部和外部都潜伏着深刻的危机。

**二、中华民国的建立**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1911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独立”各省的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并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个政权中占有领导和主体的地位。除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拥有统治全国和统率海、陆军之权外，陆军、外交等重要部的总长和所有各部的次长全由革命党人担任。在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会员也占多数。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集中代表和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相当程度上也符合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例如：扫除种种封建弊端，保护人权；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倡兴办工厂、矿山、银行、垦殖事业等；宣布禁止刑讯，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等；宣布改革文化教育制度，否定忠君尊孔教育，废止小学读经，禁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各种教科书等。

      南京临时政府也有它的局限性。例如，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告友邦书》中，就企图用承认清政府与列强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清政府所欠的一切外债，来换取列强承认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也没有提岀任何可以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政策和措施，反而以保护私有财产为借口，去维护封建土地制度以及官僚、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和财产。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行使立法权，参议员由各省选派。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称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法院行使司法权。参议院有权弹劾大总统和国务员。

      《临时约法》还规定，中华民国国民一律平等，享有人身、财产、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诉、考试、选举与被选举等民主权利。

      这样，《临时约法》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毛泽东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在这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再也不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从而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二，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帝制时，均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

      第三，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自古以来，皇帝被看作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如今连皇帝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辛亥革命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禁锢思想进步的闸门。

      第四，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促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振兴实业为目标，设立实业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随后的几年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革命政府还提倡社会新风，扫除旧时代的“风俗之害”。如：以公元纪年，改用公历；下级官吏见上级官吏不再行跪拜礼；男子以“先生”“君”的互称取代“老爷”等称呼；男子剪辫、女子放足之风迅速席卷全国等。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社会风气，也有助于人们的精神解放。

      第五，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第三节 辛亥革命的失败**

**一、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形成**

      袁世凯窃国，辛亥革命流产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以失败而告终。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便夭折了。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从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以武力压迫革命派，并命其党羽联名通电，宣称“若国民会议竟决议采用共和政体，吾人惟当奋力战斗，至死不承认此政体”。帝国主义列强调动军舰在长江游弋，为袁世凯助威,并攻击孙中山“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在革命高潮中附从革命的立宪派、旧官僚等则从内部施加压力，大造大总统职位“非袁莫属”的舆论。一些革命党人甚至也主张只要袁世凯能逼清帝退位，就应该让他当大总统。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拥护共和，就可以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他。袁世凯在得到这些许诺后，即加紧“逼宫”。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第二天，袁世凯致电临时政府，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同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岀辞职咨文，但附以南京为首都、总统在南京就职、遵守约法三个条件，力图以此制约袁世凯。袁世凯不肯离开其北京老巢，指使部下在北京发动“兵变”，西方列强也调兵进京配合，以迫使革命派让步。革命派再次妥协。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卸去临时大总统职务。随后，临时参议院议决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的果实之后，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

      首先，在政治上，北洋政府实行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大力扩充军队，建立特务、警察系统。他们制定《暂行新刑律》《戒严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剥夺《临时约法》赋予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种政治权利，任意逮捕、杀害革命党人和无辜民众。

      当时的中国，从形式上看，有了约法，有了国会，有了众多的公开活动的政党，似乎有点像民主共和国的样子了。实际上，全部政权都操纵在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不能容忍的。1912年8月，宋教仁在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其他几个政党，组成国民党。它在随后的第一届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多数席位。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希望由此组织以他为首的责任内阁，在中国推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心腹收买刺客暗杀了宋教仁。7月至9月，又以武力镇压了南方七省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同年10月，在总统选举中，袁世凯指使军警、流氓包围国会，强迫议员投票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接着，他又撕下“拥护共和”的假面具，攻击国会是“暴民专制”，妨碍国家统一，于1913年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议员的国会证书、徽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1914年1月，他又停止参议院、众议院两院议员的职务，遣散议员。5月，袁世凯公然撕毁《临时约法》，炮制了一个《中华民国约法》，用总统制取代内阁制。不久，他又通过修改《总统选举法》，使大总统不仅可以无限期连任，而且可以推荐继承人。这样，袁世凯不仅可以终身独揽政权，而且还可以将其传子传孙。至此，中华民国只剩下一块空招牌了。

      军阀们为了实行专制统治，不惜投靠帝国主义。袁世凯统治时期，岀卖路权、矿权，大肆借款，并签订众多不平等条约。他未经国会同意，与列强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用盐税作抵押，使列强实现了控制和监督中国财政的愿望。1915年5月，为了让日本支持复辟帝制，他竟然基本接受日本提出的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要求。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时，也投靠日本，向日本借款扩充自己的势力，准备武力统一中国。这些借款以东北金矿、森林，东北、山东铁路，国家烟酒专卖利润等为担保，便利了日本进一步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和其他原料。

      为了达到专制独裁的目的，袁世凯公然进行帝制复辟活动。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发表接受帝位申令。第二天，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31日，下令以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在元旦举行登基大典。帝制复辟活动遭到举国反对，袁世凯从1月1日到3月23日只当了83天皇帝就被迫取消帝制和洪宪年号。1917年6月，前清官僚张勋率“辫子军”北上，拥废帝溥仪复辟。这一次复辟的时间更短，仅12天就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失败了。

      其次，在经济上，北洋政府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军阀、官僚本身就是大地主，他们还以各种手段兼并土地。袁世凯在河南彰德等县占有的土地就有4万多亩，奉系军阀张作霖在东北占地150万亩。许多自耕农和半自耕农陷入破产和丧失土地的境地，变成佃农和雇农。北洋政府还通过“清丈地亩”、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等手段，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

      军阀与官僚还借助于政治势力，组成官僚买办资本集团，操纵、垄断财政金融和工业、运输业。如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集团，控制了铁路和交通银行。交通银行具有代理国库、发行纸币的特权，为北洋政府经理外债、内债和税收，还直接控制了一些工矿企业。

      最后，在文化思想方面，尊孔复古思潮猖獗一时。1913年6月，袁世凯向全国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不久，又命令全国恢复祀孔、祭孔典礼，恢复跪拜礼节，中、小学恢复尊孔读经。一些清朝遗老遗少、保守分子纷纷组织尊孔复古团体，发行尊孔刊物。他们攻击民主共和，宣传封建伦常，甚至要求将孔教定为“国教”。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也鼓吹孔教是“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只有尊孔才能避免“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

      袁世凯当权时，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在形式上是统一的。在1916年袁称帝败亡之后，连这种形式上的统一也维持不住了，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局面。这种局面之所以形成，其深刻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主要是地方性的农业经济而没有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另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采取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这些割据称雄的各派系军阀之间，或者为了争夺中央政权，或者为了保持与扩大自己的地盘，进行连年不断的纷争，引发多次的战乱。军阀的专制统治和割据、纷争乃至混战，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使经济遭到极大破坏。

      总之，北洋政府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思想上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全面的反攻倒算。中国重新落入了黑暗的深渊。孙中山本人沉痛地说过，当时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盛，人民困苦日甚一日”。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破灭了。

**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

      挽救共和的努力及其受挫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也发生了分化。

      一些革命党人以为，推翻封建帝制、建成共和政体，革命大功告成，从而丧失了革命意志。他们中有的人热衷于追逐个人的官职和利禄，甚至投靠军阀，迅速蜕化为新的官僚、政客；还有的人意志消沉，隐遁山林，或者移居海外，以逃避国内的政治斗争。

      孙中山也一度受到袁世凯的欺骗，表示“十年不预政治”，以修铁路、发展实业为己任。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他开始看清袁世凯的真面目，毅然发动武装反袁的“二次革命”。由于北洋军阀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而国民党方面缺乏兵力和财力，内部意见又不一致，结果只坚持了两个月就失败了。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坚持反袁武装斗争。由于中华革命党提不岀能够动员群众的革命纲领，入党者又必须宣誓绝对服从孙中山个人，带有强烈的宗派性，严重脱离群众，因而参加的人数很少，社会影响不大。

      1915年12月25日，即袁世凯准备“登极”前一周，蔡锷等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宣布“独立”，很快形成席卷半个中国的护国运动。次年3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忧惧而死。

      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后，变本加厉地推行独裁卖国的反动统治，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在这种局面下，孙中山举起了“护法”的旗帆。但“护法”的口号在群众中缺少号召力。由于孙中山既没有足够的实力，也不掌握军队，遂不得不依靠与皖系军阀有矛盾的西南军阀。而西南军阀则企图利用孙中山的声望对抗北洋军阀，扩大自己的实力。1917年9月，在广州成立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护法军政府，并出师北伐。不久，西南军阀与直系军阀勾结，擅自实行停战，并且排挤孙中山，改组军政府。1918年5月21日，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去上海。护法运动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想依靠南方军阀来反对北洋军阀，是行不通的。

      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具有顽强的革命精神，他首先喊岀“振兴中华”的口号，不断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并始终坚持奋斗，不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先行者。他在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建立了历史功勋，是20世纪初期推动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主要代表。

      但是，孙中山并没有找到中国的真正出路。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陷入绝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再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前进了。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

      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尽管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真诚地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帝国主义决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自己失去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剥削、奴役的对象。因此，它们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财政等各种手段来破坏、干涉中国革命，扶植并支持它们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政权。帝国主义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

      毛泽东说过，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这个历史教训是很深刻的。

      这场革命之所以失败，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错误。主要是：

      第一，没有提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他们只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并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致使一些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也混人革命的营垒。受当时政治局势的左右和妥协退让思想的支配，革命党人最后甚至还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后来，孙中山在回顾辛亥革命的历程并总结有关教训时说过：“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

      第二，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不敢依靠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群众。在革命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也曾经联合新军（多数是穿起军装的农民和学生）和会党（以游民和破产农民为主体的秘密结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动员了群众的力量，但在清政府被推翻之后，他们便把群众抛弃了。他们不但不去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反而指责农民“行为越轨”，并派兵加以镇压。正因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没有被动员起来，这个革命的根基就显得相当单薄。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第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同盟会内部的组织比较松懈，派系纷杂，缺乏一个统一和稳定的领导核心。甚至有人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有的还另建党派，自立山头。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错误，根源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却没有能够改变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的统治基础，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岀路。

      尽管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的业绩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永远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对于他们的缺点，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

      经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们对革命的继续追求也绵延不绝。接受过这场革命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和中国人民继续顽强探索民族复兴的道路。辛亥革命之后十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后来陆续参加中国共产党或成为共产党的忠诚朋友，这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并把它推进到了新的阶段。

**综述翻天覆地的三十年**

      在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人民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后来又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农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发展了起来；而工人阶级则代替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

      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一、中国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世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当时，欧洲是世界的政治中心。外国在华侵略势力中，英国占主要地位。

      在帝国主义时代，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激烈争夺，引发了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的后果之一，是欧洲走向衰落（德国战败；英、法虽为战胜国，但受到削弱）和美国、日本的兴起。当欧洲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时，美国尤其是日本的对华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迅速增加。大战结束后，英国势力又卷土重来。其后，日本侵略势力日益构成对中国的主要威胁。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1919年3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宣告成立。它积极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先进分子创建共产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逐步觉醒，开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

      191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就是在上述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下展开的。

**（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其胜利**

      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一场世界性的严重的经济危机。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德国、日本先后确立法西斯统治，成为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策源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的。1931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随之武装侵占中国东北。1935年10月，意大利军队入侵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1937年7月，日本蓄意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开始。法西斯侵略者给世界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中国是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国。

      中国是首先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它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时中国守军的奋起抵抗，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中国人民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对于法西斯国家的野蛮侵略，世界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开始互相配合。1942年元旦，由美、英、苏、中4国领衔，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决心互相合作，结成反法西斯联盟。苏联红军在同年7月至1943年2月进行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取得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性的转折。1944年6月6日，美、英盟军发动诺曼底战役，开辟了欧洲的第二战场，德国法西斯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对于日本的侵略，亚洲各国人民在长时间里进行了英勇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国军民是在亚洲大陆上抵抗日本侵略的主力。1944年，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全面展开攻势作战。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4日，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和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引起了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后的世界政治形势，出现了三个重要的新情况：第一，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彻底打败；战胜国英、法也被严重削弱；美国则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第二，苏联经过战争考验，成为足以与美国抗衡的世界一流强国。欧洲东部、中南部和亚洲东部、东南部出现一系列由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冲破一国范围在多国赢得胜利。第三，占世界陆地面积2/3、人口3/4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南太平洋地区，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许多原殖民地、附属国争得了或正在争取政治上的独立，殖民主义体系急剧瓦解。在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影响显著增长，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

      战后世界政治形势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原来以维持欧洲大国均势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格局被美、苏两极格局所取代。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分别以美、苏为首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的对立。美国一手拿着金元，一手拿着原子弹，竭力向全世界扩张。控制中国，成为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美国政府采取了扶蒋反共的政策。这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一个严重的障碍。正确制定应对美国的政策和策略，成为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1946年春，美国等日益加紧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一些人还鼓吹“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人过高估计美国的力量，惧怕爆发新的世界战争，主张为了实现美苏之间的妥协，被压迫国家的人民应当随之实行国内妥协。毛泽东认为，关于反苏战争的宣传，是美国施放的烟幕。其目的是为了在反苏的名义下向美苏中间的辽阔地带进行扩张，即为了控制欧洲国家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美苏之间在一些问题上是可能妥协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必须和必能克服。但是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正是按照这种科学分析，当蒋介石集团依仗美国政府做靠山，发动全面内战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并且赢得了胜利。

**二、“三座大山”的重压**

      在这个时期，中国人民继续受到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后来又增加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这三者，就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中国反动势力的政治代表，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的一个时期，主要是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的北洋军阀政府。

      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就是以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为直接的斗争目标的。国共合作后建立的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开始进行北伐战争，在人民的支持下，基本上击溃了北洋军阀的主力。

      取代北洋政府统治全中国的，是国民党控制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都没有改变，不仅封建压迫继续存在，而且半殖民地化程度还进一步加深了。

**（一）外国垄断资本在中国的扩张**

      北洋政府是以外国帝国主义列强为靠山的。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它不惜岀卖国家利权，从而使外国侵略势力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扩展。

      国民党政府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建立的。蒋介石集团上台之后，即宣言“要联合各国共同对付第三国际”，公开站到了国际帝国主义阵线一边，不过，他们在口头上仍标榜反对帝国主义。1928年6月，南京政府发表“修改”不平等条约宣言，要求与外国列强“重订新约”。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项，并非要求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一切特权，如外国在华的租界、租借地和驻兵、内河航行等特权。按照国民党政府同一些国家订立的条约，中国对外国进口货物除原定的值百抽五以外，可增收5%~30%的附加税。这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某些积极作用。但中国并没有真正取得自定关税的权力，而且中国的海关也仍然由外国人控制，长时期内总税务司一直是由外国人担任的。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在长时间里并未付诸实行。直到抗日战争后期的1943年，中国政府才与英、美订立新约，废除了包括领事裁判权在内的英、美在华特权。但是，1946年10月成立的中美商务仲裁会，规定美国人在中国犯罪交美方裁判；同期签订的中美宪警联合勤务议定书，规定在华美军肇事须由美宪警处理，中国警局仅有旁听权而已。这就在实际上把领事裁判权变相恢复了。

      从根本上说，国民党统治的建立，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是为外国侵略势力深入中国进一步敞开了大门。

      从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十年间，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在中国得到进一步扩展，并且牢牢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抗战前夕，在重工业方面，外国资本即控制了中国煤产量的55.2%，新法采煤量的77.4%，冶铁工业的95%,石油工业的99%,发电量的77.1%。在中国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中，外国资本占到了71.6%。外国银行资产也比华商银行多1/3。外国资本不仅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交通运输业，而且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以及若干主要的轻工业。

      在国民党全国统治建立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中国主要是美、英、日等国互相争夺的对象。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中国东北。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中心城市，占领了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的大片地区。中国的这些地区，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独占殖民地。日军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抢掠，无恶不作。中国人民遭到了极其野蛮的蹂躏。在其占领区内，日本侵略者实行了竭泽而渔的政策。他们肆意掠夺中国的资源，残酷地压榨中国人民。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

      抗日战争胜利后，控制中国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蒋介石集团之所以敢于发动反人民的战争，很重要的因素是依恃美国政府的支持。作为接受美国援助的交换条件，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和协定，使美国在中国享有了种种特权，美国资本迅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了支配的地位。大量美国剩余物资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市场。美国战后对中国的投资超过了1936年前各国在华投资的总额，占当时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80%0国民党政府的“国营”企业和官僚资本的私营企业，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垄断资本的影响和控制。美国垄断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的统制，把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推向了绝境。

      正因为如此，反对帝国主义，打破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就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实现的首要任务。

**（二）占优势地位的中国封建经济**

      这个时期，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优势地位的，仍然是封建经济。

      封建剥削制度是以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把土地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借以收取地租、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为基础的。在中国，大部分的土地为地主及旧式富农所占有，只有少部分的土地属于农民。地主和旧式富农将土地出租给农民，向他们收取苛重的地租，主要是实物地租。据1934年的统计，实物地租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一般为45%左右，有的地区甚至高达5成、6成乃至7成以上。地租剥削不仅侵占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侵占了他们相当一部分的必要劳动。与此同时，农民还受到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剥削。

      政府当局在运用自己的权力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的同时，还通过征收苛重的赋税等直接对农民进行掠夺。首先，是征收田赋。田赋名义上是向田主征收的，实际上田赋加重，地租也随之加重，这种负担归根到底还是落在农民头上。其次，是征收盐税。农民是盐的主要消费者，因而也是盐税的主要负担者。再次，是征收各种杂税。1929年至1933年，全国农村共有188种不同名目的捐税。1937年，杂税名目达到1756种。最后，是强迫农民服劳役（如修筑公路、碉堡等）和服兵役。

      在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下，中国农村的经济日益陷入绝境。由于农业生产水平的低下，农村无法为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等条件，这就从根本上严重限制了中国工业的发展。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许多人不得不吃糠咽菜，遇到天灾人祸，乃至用树皮、草根等充饥，更有大批农民被迫卖儿鬻女，流落他乡，直至冻饿而死。一些农村区域岀现了“土地荒芜，路断行人，家有饿妇，野无壮丁”的惨象。

      正因为如此，反对封建主义，进行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就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

**（三）官僚资本的急剧膨胀**

      中国人民在受到封建地主阶级压迫的同时，还受到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

      中国的资产阶级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外国垄断资本的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后来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即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系较少并受它们压迫的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

      1927年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建立以后，官僚买办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买办资产阶级发展成为官僚资产阶级，控制了全国政权。

      官僚资本是中国的垄断资本。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除国家垄断资本外，官僚的私人资本也属于官僚资本。而掌握着官僚资本的阶级，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即中国的大资产阶级。

      官僚资本的垄断活动，首先和主要的是在金融业方面开始的。国民党政府通过落入“官股”、改组有关机构等，将原北洋军阀的两大金融支柱即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控制起来。随后，又成立了“国家的”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它们被赋予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铸发国币、经募内外公债等项特权。以“四行二局”（二局为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托局）为中心的金融垄断体系，不仅完全主宰了全国的金融业，而且直接操纵着全国的经济。

      发行“法币”，是四大银行完成其金融垄断的有决定意义的步骤统一币制，本来是有必要的。但在长时期内，无限制地发行纸币，一直是国民党政府解决财政危机、发展官僚资本的主要手段。滥发纸币，造成了通货的恶性膨胀和物价的急剧上涨。人民手中持有的货币也就由此一天比一天贬值。到全国解放前夕，物价飞涨已如脱缰的野马，甚至一天之内要上涨多次。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不仅使广大人民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洗劫，到了无法生存下去的地步，而且为官僚资本家进行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制造黑市以及吞并其他企业等项投机活动大开了方便之门。

      官僚资本集团在垄断金融的同时，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依靠雄厚的金融力量，从事大规模的商业投机活动。官僚资本实际上主要是商业投机资本。外汇和对外贸易，是由他们垄断的。如孔祥熙家族独资经营的祥记商行专门贩卖匹头、煤油、颜料等洋货；宋子文家族经营的华南米业公司享有洋米进口免税、垄断洋米运销的特权。他们借助于国民党政府实行的贸易统制政策和专卖制度，控制了大量商品。他们以低价收购，又以垄断价格出售，从而获取高额利润。

      官僚资本集团还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工业实行垄断性的掠夺。1935年国民党政府成立的资源委员会垄断了全国主要的重工业和矿业。它下属的厂矿一部分是接收的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僚资本企业，一部分是依靠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的贷款和技术新建的企业。由官僚资本控制、支配的以“民营”或“官商合办”形式出现的工业企业，大多是通过兼并民族工业而来的。1937年9月，国民党政府又成立了工矿调整委员会，其任务是：扩大官营工业；以“适应非常时期生产上的需要”的名义，对于原有或新设之民营厂矿，采用接管或加入股份的办法，“由政府统筹办理或共同经营之”，即兼并民营工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接收了日伪工厂4411家，其中发还原主或标卖的仅10%,其余绝大部分成了官营企业，或者化“公”为私，成了官僚资本家的私产。新中国成立前夕，官僚资本已经占到整个工业资本的2/3、工业运输业固定资本的80%。它拥有全国电力的67%，煤炭产量的33%，水泥产量的45%,纱锭设备的40%，织布机设备的60%,糖产量的90%,轮船吨位的45%，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的100%。

      总之，官僚资本不是在正常的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而是官僚资产阶级利用超经济的特权，主要在从事金融和商业投机的过程中，在充当外国帝国主义的买办的过程中，通过掠夺广大劳动人民和兼并民族工商业而发展起来的。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碍。

      正因为如此，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就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

**（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艰难处境**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经营的，是中等规模和小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占主体地位。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碍。

      首先，是外国资本的压迫。由于外国资本在中国实行商品倾销并直接投资经营企业，致使中国的市场被它们的廉价商品所占领，民族工业由于规模小、技术设备落后，其产品在市场上很难与之竞争。

      其次，是官僚资本的排挤。由于官僚资本在国民经济的许多部门占据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在资金、技术、设备、原材料供应等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优势，民族工业也很难与之抗衡。

      再次，是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由于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仍然受到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束缚，农村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村购买力极其微弱，由此也就使得国内市场狭窄，轻工业原料供应不足，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最后，是军阀官僚政府的压榨。由于反动政府征收苛重的捐税,实行经济统制政策和通货膨胀政策，更使得经营民族工商业获利困难,而陷入严重危机。

      正因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艰难地生长起来的，它也就具有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它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1936年，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8%,加上工场手工业产值占20.5%;1949年,现代工业产值也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加上工场手工业是23%。而在这少量的现代工业中，民族资本经营的又只是非主体部分。民族工业资产净值，1949年时也不过20.08亿元，其力量之微弱，于此可见一斑。

      第二，在民族资本中，工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小，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的比重大。全国抗日战争前，民族资本中80%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只占20%。

      第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技术、设备以至原材料方面不得不依赖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1949年，在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只占18.5%,其中，机器生产只占1.4%;消费资料的生产则占81.5%。中国工业只不过是装配工业（即以外国零件装配成机器）或加工工业（即以外国原料加工制成日用品）。商业资本因无强大的国内工业，它所经营的主要是批发外货和趸卖原料以供外国资本主义企业。这类情况，明显地表现出中国民族资本缺乏独立性。

      第四，民族资本所经营的工业，规模狭小，经营分散，技术设备落后，劳动生产率低。多数工厂没有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为手工业工场。这种情况，使得民族工业的产品成本高，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面对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力，民族资本家力求通过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挣扎图存。这是他们害怕工人觉醒和革命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势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当一部分民族资本家的前身是官僚、地主。由于经营工商业没有获利的确实保障，一些民族资本家还用经营工商业所获得的利润，到农村去购买土地，然后出租给农民，从而兼有资本家和地主这样两重身份。正因为民族资本家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关系相当密切，他们也就不敢提岀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政治纲领，从而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去动员和组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的力量。

      上述情况，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而在另一个时期，就有跟在买办资产阶级后面，成为它的助手的危险。

      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经济实力不强，但在政治上有着很大的重要性。他们具有爱国的立场，不少人还掌握着发展生产所需要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以这个阶级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的。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出身于这个阶级，或者与这个阶级有比较多的联系。这个阶级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现代工业，形成了民族市场，同时传播了资产阶级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它逐渐形成为民主革命的一种政治力量。

**三、两个中国之命运**

**（一）三种政治力量，三种建国方案**

      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时期，中国存在着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量：一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1927年后形成为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是反动势力（有时称顽固势力）、民主革命的对象。其政治代表先是北洋政府，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二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是中间势力、民主革命的力量之一。其政治代表是民主党派的某些领导人物和若干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进步势力、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其政治代表是中国共产党。三种政治力量分别提岀了三种不同的建国方案：

      第一种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方案。

      在长时间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他们同广大人民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因而主张继续实行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首领蒋介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制度，都是不能行之于中国的。他主张，“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族”，“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而法西斯主义即为“统治最有效能者”。他们就是据此实行反革命军事独裁统治，来维护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的。

      第二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方案。

      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他们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使资本主义得到自由的和充分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尽管辛亥革命的流产已经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个方案重新提了出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和若干无党派人士更大力鼓吹过“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企图在国民党坚持的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主张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之外，另找一条道路，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这种方案，对于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现实是一种批判，但在实际上却并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

      第三种是工人阶级和其他进步势力的方案。

      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动力和主要依靠。他们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人民应当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并且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

**（二）两种基本的选择，两个中国之命运**

      尽管在长时期里，上列三种建国方案始终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由他们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去作出选择，但是，从根本上说，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并不具备现实性，可供中国人民选择的方案主要是两个：或者是继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或者是创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之所以行不通，是由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所决定的。

      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发展它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对于它们来说，政治上、经济上不独立的中国，乃是理想的倾销商品的市场、投资的场所与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o如果中国成为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就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这是它们不能容忍的。它们既不愿意失去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更不愿意看到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它们的竞争对手。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五四以来的情况，仍然是如此。

      民族资产阶级是真诚地希望中国通过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走上独立、富强之路的。但是，它的力量过于软弱。它没有勇气和能力去领导人民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从而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扫清障碍。代表这个阶级要求的中间派，由于提不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的纲领，无法动员农民这个最广大的群众；由于不敢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根本不掌握军队。因此，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很大的分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把实现民主政治的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让步这种幻想之上。而中国的反动统治者由于自身社会基础的极其狭窄，其统治是十分残暴、同时又是十分虚弱的，它不能容忍、更经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它绝不会对中间势力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作出原则性的让步。某些中间党派、中间人士虽然一再声称自己要“以民主的方法争取民主，以合法的手段争取合法地位”，反动统治者还是不断地用暴力对他们施行迫害，直至取缔他们的组织，监视、逮捕以至杀害他们个人。严酷的事实教育了他们，使他们逐步放弃了走中间路线的幻想，站到了拥护共产党主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来。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作岀了自己的贡献。

      总体上说，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方案由于违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唾弃，他们的反动统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方案由于脱离中国实际，也没有得到中国广大群众的拥护，连提岀这种方案的多数人最终也承认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方案，逐步地获得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乃至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拥护，由此成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选择。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岀：“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段话，是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它揭示了广大中国人民在长期探索、艰苦奋斗的基础上共同确认的一个历史性的真理。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一、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的潮流**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近代以来，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在实践中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更使人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之中。

      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们决心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以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岀来。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

      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开始的。1917年1月，爱国民主主义者、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至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参加编辑部并成为主要撰稿人。《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陈独秀在发表于《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的通信中说过：“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不过，在政治斗争中，他们并非旁观者。他随后讲过，他们之所以把主要注意力倾注于清除旧思想方面，是由于他们认定“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国民性不改造，“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他们说：“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他们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他们以犀利的饱含感情的笔，去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去刺破旧中国的脸，去揭穿旧道德旧教条的丑态。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等对封建礼教的有力揭露和控诉，使反对“吃人的礼教”成了许多人的共同呼声。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主张，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

      《新青年》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即所谓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

      民主和科学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在陈独秀看来，民主，既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制度，也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科学，则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他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可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罗素的新唯实主义这类用某些自然科学成果装饰起来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当时在他心目中也被认为是科学。他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为了实现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即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目标。

      孔学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进入民国时期，北洋军阀政府仍然把孔学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去信奉。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教条式的。这种情况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制了民族的生机和创造力。

      由于孔子所提倡的是“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与“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的目标不相适应，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定，为了提倡民主和科学，给发展资本主义扫清思想障碍,必须对孔学进行批判。为此，他们大声疾呼：“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吁!”

**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是切中时弊的。正因为如此，这两个口号在当时即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赞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当封建主义还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提倡，在客观上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这些启蒙思想家，是敢于向两千多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礼教进行自觉挑战的第一批不妥协的战士。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并没有因为批判孔学就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首先，他们指岀，孔学并不等于全部国学。“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其次，他们并没有否定孔学的历史作用。李大钊说，“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再次，他们也没有把孔学说得一无是处。陈独秀就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这样的话。他们批判孔学，是为了指明它在根本上已经不适于现代生活，是为了反对孔学对人们的思想禁锢，是为了动摇孔学的绝对权威的地位，从而使人们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去进行独立思考，以求得“真实合理的信仰”。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股潮流冲决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而这个闸门一被打开，各种新思潮的涌流就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无法遏制的了。正因为如此，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

**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的局限**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也存在着一些弱点。

      第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从根本上说，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有效的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去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

      第二，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但是，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要根本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是不可能的。

      第三，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们中有的人看问题很片面，坏就是绝对的坏，好就是绝对的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影响了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

      事实上，在当时的先进分子中，有的人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就已经开始对它有所怀疑和保留了。比如，陈独秀1915年在赞颂法国文明时，把创立社会主义（指空想社会主义）看作是法国人对于近代文明所作的三大贡献之一，认为这是“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李大钊在1916年5月即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毛泽东在1917年8月说过，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他们之所以对资本主义持某种程度的怀疑和保留的态度，是因为：

      第一，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陈独秀指出：“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

      第二，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李大钊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中国人是否应当对欧美文明亦步亦趋，当然成为问题了。

      第三，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屡遭失败的事实，更使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疑问。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怀疑，推动着他们去探索挽救危亡的新的途径，为他们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合宜的土壤。

      这样，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就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如李大钊等）继承了它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另一部分人（如胡适等）则沿着资产阶级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了。

* **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探索之后所作出的一种选择。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以后，在长时间里，其影响主要限于欧洲。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等人也曾提到过马克思主义，不过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

      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它昭示人们，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永恒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一旦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岀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崭新的社会制度。由于这个革命发生在中国学习西方的努力遭到失败、中国的先进分子陷于彷徨和苦闷之中，它确实使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李大钊说，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

      十月革命是怎样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呢？

      第一，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人的一个启示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自己走向解放之路。

      十月革命发生在其国情与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因而对中国的先进分子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他们感到，中国国情“皆与俄国相近”，所以中国“须有同类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青年毛泽东认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第二，十月革命诞生的社会主义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李大钊指出，近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摧凌的中国，“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一些人由此产生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1919年苏维埃俄国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放弃沙俄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更引起人们很大的震动。《新青年》刊登的读者来信即提出，我们要由此跨进一步，去“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它“所根据的真理”。

      第三，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广泛发动并由此赢得胜利的事实，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

      这样，在十月革命以后、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就产生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形成一股有相当影响的思想潮流。

      不过，在开始时，人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正如瞿秋白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观点，在各种报刊上纷然杂陈。起初，在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占着优势。中国的先进分子是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是李大钊。

      李大钊是从爱国的立场出发，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十月革命以后，他于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认定资本主义文明“当人盛极而衰之运”，“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在同年11月、12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中，他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确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9月、11月，他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并且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与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形态，而且作出了基本正确的阐释。这表明，李大钊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三、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的爆发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个运动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首先，是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壮大。在1914年至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进一步成长起来。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00余万人。这样，五四运动就获得了比以往的革命斗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次，是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受到这个潮流影响的年轻一代知识界，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骨干力量。

      再次，是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在当时，陈独秀就说，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毛泽东也说，俄罗斯以民众大联合打倒贵族、驱逐富人的事实，使“全世界为之震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在1919年上半年召开的巴黎“和平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希望和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这个由几个西方列强把持的会议，竟规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会议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侵人北京时被德国掠去的天文仪器而已。北洋政府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学界的宣言呼吁：“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学生的爱国行动受到北洋政府的严厉镇压。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六七万工人为声援学生先后自动举行罢工。工人罢工推动了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随后，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扩展到了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

      五四运动开始时，英勇地出现在斗争前面的是学生群众。这时，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斗争的主力由学生转向了工人，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了上海。

      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28日，中国政府代表也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得到了实现。

      五四运动的历史特点由于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具有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不具备的一些特点。主要是：

      第一，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认识的阶段，这典型地表现在义和团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即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这表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了。

      第二，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之一，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第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五四运动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还只是李大钊这样个别的人物。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才在中国传播开来的。

      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有力地打破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幻想。对于五四运动，瞿秋白当时就说：“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而在这些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中，一些人经过比较，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

      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显示了伟大的力量。工人在斗争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事实，给予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真切的教育。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告同胞书中说，“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正如邓中夏所说：“‘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那些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他们发挥了某种先锋和桥梁的作用。而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这样，五四运动就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正因为五四运动具备了上述新的历史特点，它也就成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与中国共产党诞生**

**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知识界中得到传播。

      在李大钊等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下，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逐步划清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主要有三种类型：

      首先，是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其代表除李大钊以外，就是陈独秀。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给陈独秀上了严峻的一课，促使他开始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的态度。1920年9月，他发表《谈政治》一文，指出由少数资本家所把持的共和政治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乃不可逃的运命”，公开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这表明，他站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来了。

      其次，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泽东等。

      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阶级斗争》（考茨基著）和《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

      广东的杨匏安早年留学日本，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1919年11月、12月，他发表《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包括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等，作了比较确切的阐述。它的发表几乎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可以说是该文的姊妹篇。

      湖南的蔡和森于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他在1920年8月致书毛泽东：“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他“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书籍，供自己和他人阅读，成了中国留法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

      天津学生领袖周恩来说，自己到欧洲以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到1921年秋，终于“定妥了我的目标”即共产主义。他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再次，是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为董必武等。

      董必武回忆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读了许多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后，才“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于是就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吴玉章、林伯渠等也有类似的思想经历。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主要是由以上三种人组成的。其中李大钊、陈独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等五四运动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

      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特点为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需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这个运动一开始就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明确地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

      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尽管还不深入，但他们对当时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并且对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联获得了基本正确的理解。

      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的严重对立。中国的先进分子对于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采取了明确的批判态度。陈独秀说，马克思修正派的学说“是我大不赞成的”，“像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该当作前车之鉴”。毛泽东说，“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蔡和森也表示，自己对修正派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

      这说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和正确方向。

      第二，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岀发，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的先进分子一旦学得马克思主义，就主张运用它去研究和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一方面肯定这个理论“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具有普遍意义；另一方面又认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不可以不考虑我们的环境，“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他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当人们以一种理论“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这种理论“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即在运用中得到发展。他并且指岀，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

      这说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实际上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应当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尽管当时还没有这样明确地提出这个命题。

      第三，开始提出知识分子应当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

      李大钊指出，“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忠于民众、作民众的先驱者。他不仅重视工人，号召“把三五文人的运动”变成“劳工阶级的运动”，而且还重视农民，号召先进的知识分子去做“开发农村的事”。他主张知识分子“向农村去”“到民间去”。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北京大学的邓中夏等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

      尽管当时到工人中去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多，但这毕竟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它预示着先进的知识分子应当遵循的新方向和应当走的新道路。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并没有抛弃而是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赋予它们以新的含义，使它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发扬。民主不再指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指多数人的民主、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民主。他们强调，必须铲除少数人的特权，改变“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这种“不合乎4德谟克拉西’的状况”。科学，除自然科学外，就对社会的研究来说，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了。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没有中断或取消五四运动以前开始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工作。中国的先进分子以唯物史观为武器，从反对封建思想人手，进而提出必须反对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制度；把反封建思想的斗争的立足点，从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扩展到争取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的高度；把反封建的斗争方式，从少数人进行的思想批判，逐步地发展为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启蒙者的弱点，把反封建的启蒙运动有力地推向了前进。

      如果说，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那么，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步地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发挥指导作用了。

      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步传播，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在工人阶级政党产生以前，中国国民党及其前身在中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辛亥革命以后，许多原先的革命党人有的消极退隐，有的甚至蜕变为军阀、官僚、政客。五四运动时，国民党并没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蔡和森感叹说，这个趋势很可以说明国民党已“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它的主观力量了”。成立新的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1920年1月，有人在报刊上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一文，呼吁“劳动团体应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

      同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他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介绍苏俄和俄共情况，并说中国可以组织共产党。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最早的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建立的。时间约在1920年8月，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首次会议决定，推陈独秀为书记，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这标志着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来了。

      同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1月，将其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都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日本、法国留学的中国先进分子，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

      在建党过程中，陈独秀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在上海创建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着重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开始着重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始学习列宁的著作。他们在《新青年》杂志（此时成了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以及《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

      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公开出版。同月，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中译本也公开出版。之后，还陆续出版了若干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马克思资本论人门》《唯物史观解说》等。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斗争。

      还在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前，针对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李大钊在1919年8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指出，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1920年底，张东荪、梁启超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他们口头上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同时却强调中国产业落后，“真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因此也不具备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他们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穷，解决的办法是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样主张振兴实业，但指岀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情况来说，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他们还指岀，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存在，而且受压迫极深，因此，“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尽管当时还不懂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第一步应是民主主义，第二步才能是社会主义，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岀路只能是社会主义，主张中国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个时期，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还同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论战。

      无政府主义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任何组织纪律，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等。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迎合了那些不满社会现实、陷于破产境遇的小生产者和在政治上感到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绪，一度在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从而使国家消亡；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会使得工人阶级不能集中为强大的力量，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前，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社会的经济秩序就要弄糟了”。

      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的斗争，帮助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推动他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第二，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认识到，组织共产党，“离开工界不行”。“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与工人阶级的距离很大。因此，首先应当同他们加强内部联系。”为此，他们提出了“请钻进工场去罢”的口号。

      为了能在工人群众中有效地开展工作，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如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成员俞秀松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工厂做工。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成了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

      各地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创办了一批专门供工人阅读的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刊物。如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等。同时，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邓中夏在北京长辛店、李启汉在沪西小沙渡分别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开办学校，是党的早期组织对工人做工作的人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

      经过宣传教育，觉悟的工人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1920年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长辛店成立工人俱乐部（工会）。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工人也相继成立工会。工会开始发动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工人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在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第三，进行关于建党问题的讨论和实际组织工作。

      1920年11月，党的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述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这个宣言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作为收纳党员的标准。

      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对建党的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如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岀：“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党必须“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岀发点”；必须严密党的组织和纪律，“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等。这些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1920年1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其后，北京、天津、武汉、长沙等地也成立了团的组织。各地团组织通过引导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造就了一批后备力量。

      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进行的这些活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来；同时，一部分工人由于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而提高了阶级觉悟。这样，就形成了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中国创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基本具备了。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其间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房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这条游船后来被称为“红船”。

      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他们来自7个地方，代表50多名党员。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东京）。陈独秀、李大钊因分别在广州和北京有事，未出席会议。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岀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

      大会在讨论实际工作计划时，决定首先集中精力组织工人。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以陈独秀为书记。

中共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或稍后，与党的上海发起组没有联系的一批先进分子也在独立地筹备建党。1921年夏，利群书社的成员在湖北黄冈开会，表示“赞成组织新式的党——波（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要组织的团体叫作‘波社’”。当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恽代英立即号召其成员落入中国共产党，并结束利群书社的活动。1922年夏，吴玉章、杨阇公等20余人在四川秘密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发行《赤心评论》。其后，中国青年共产党宣布自动取消，并令其成员个别地申请落入中国共产党。这些事实说明，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成为中国最先进分子的共同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特点和意义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

      一方面，它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遭到破产之后。它所接受的，是没有被修正主义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者、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具有坚强的革命性。在这个阶级中，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基础。而且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他们不可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抱有期望。

      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是一个区别于第二国际旧式社会改良党的新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中国人民从来就勤劳勇敢，富于斗争传统。他们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这种局面就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人民由此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自身解放的光明的道路，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建党时期的“红船精神”，即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一切反动势力感到深深的恐慌。这个运动在萌芽时即被斥为“过激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压迫，以致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就不得不处于秘密状态。在以后的一个长时间里，‘它不仅遭到御用文人的恶毒攻击、特务的残酷迫害，更受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但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是迎着种种诬蔑和压迫，不可遏止地成长和发展了起来。当年，它只有几十个成员；28年以后，它就成为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了。这个事实说明，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在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又比较年轻，许多工人不久前还是小生产者。在党内，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党员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因此，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同时，它是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自己的活动的。因此，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不经历一个曲折的探索的过程，一个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基础上逐步积累经验的过程。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要胜利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切实地、不断地加强自身的建设。

**第三节  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一、制定革命纲领，发动工农运动**

      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中国革命就展现了新的面貌。主要是：

      第一，第一次提岀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岀了明确的斗争目标。

      分清敌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以往的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对于这个在长时间里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给予了一个基本的解决。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明确地指岀，加给中国人民“最大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这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在当前阶段的纲领应当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

      第二，开始采取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采取过、也不可能采取的革命方法，即群众路线的方法。

      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是关系革命成败的一个大问题。以往的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未能充分地发动群众。这种情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不久，也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

      中共二大就指岀：“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这个党不仅“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而且“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都“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

      发动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推动下，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中国掀起了第一个工人运动的高潮。在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了包括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开溁五矿工人罢工等在内的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者在30万人以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孙中山正是从这个斗争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新兴的、生机勃勃的革命力量，因而下决心同它进行合作的。

      通过领导工人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密切了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党的自身建设也由此得到了加强。在工人斗争中涌现岀来的一批优秀人物，如苏兆征、史文彬、项英、邓培、王荷波等先后落入了党的队伍，后来成为重要的领导骨干。党在工矿企业的基层组织逐步建立起来。1924年上半年，650名党员中，工人党员占到40%。次年1月，已占到50%以上。

      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从事发动农民的工作。1921年9月，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浙江萧山县衙前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开展反抗地主压迫的斗争。1922年6月，彭湃来到家乡广东海丰县赤山约，经过艰苦的工作，成立了农会。次年元旦，召开海丰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全县范围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这种新式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也是不曾有过的。

**二、实行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高潮**

      国共合作的形成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罢工遭到北洋政府的血腥镇压之后，中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中国共产党由此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虽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所以在二七惨案之后，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大体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尽管这个党在几经挫折后，并没有多少实力，并且成分复杂，严重地脱离群众，但是，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因此首先应当争取同国民党进行合作。

      关于合作的方式，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先行邀请国民党召开代表会议，经协商后，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各革新团体，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即实行“党外合作”。而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落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的主张，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马林提岀来的。同年8月在杭州召开的会议上，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开始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但马林说服了到会的人。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

      孙中山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晚年实现了伟大的思想转变。他把中国共产党人当成亲密朋友，欢迎共产党人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毅然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内容，强调对外实行中华民族的独立，同时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应为“少数人所得而私”；把民生主义概括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后来又提岀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并提出要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一致，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孙中山在大会上说：“现在是拿岀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大会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这样，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就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大革命的准备与进行国共合作的形成，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1924年，工人运动开始复兴，农民运动也有了初步开展。国共合作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为未来的革命战争准备了军事力量的骨干。

      1925年5月，以五卅运动为起点，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胜利的广东战争，征讨地方军阀陈炯明、邓本殷，统一并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同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随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5万人。全国人民痛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方面。

      当时，北洋军阀统治着全国大部分地区。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着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直隶（河北）保定一带，约有兵力20万人；由直系分立岀来的孙传芳盘踞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约有兵力20万人；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有兵力30多万人。他们与南方的国民政府相对立，同时彼此之间不断地明争暗斗。

      1926年7月，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的北伐战争开始。国民革命军在工农群众的支援下，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摧毁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革命势力发展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响彻了大江南北、大河上下。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中国形成了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运动。以湖南为中心，广大农村掀起了大革命的风暴；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涨；国民政府进行了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的斗争；上海工人更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受到严重的打击。

      1925年至1927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比之以往任何一次革命，包括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群众的动员程度更为广泛，斗争的规模更加宏伟，革命的社会内涵更其深刻，因此被称作大革命。

      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是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没有国共合作，不会在短时间内掀起这样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共产党起着独特的、不可代替的作用。没有中国共产党，不会有这场大革命。这是因为：

      大革命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口号下进行的。而提出这个口号的，正是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下进行的。而中国共产党正是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周恩来说:“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

      大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空前广泛而深刻的群众运动。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人民群众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经过共产党人的深入细致的工作，一向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的力量逐步地组织起来、凝聚起来。1927年4月中共召开五大时，它领导下的工会共拥有280万会员，产业工人基本上组织起来了。农会则拥有972万会员，由于一个农户一般为五口之家，而人会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所以农会联合的农民实际上达数千万之众。这就为国民革命的发展、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大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革命战争。共产党人不仅帮助和推动了国民革命军的建立，而且在军队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积极提高国民革命军的素质，增强它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共产党员在战斗中更是身先士卒，起着先锋作用和表率作用。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共产党员叶挺任团长的第四军独立团，是一个突岀的例证。独立团在北伐中战功卓著，使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此外，共产党人还建立了一定数量的工农武装（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等），配合正规军作战，而上海工人的起义武装更是充当了解放上海的主力。

      中国共产党对于大革命所作的独特的、重大的贡献，是当时人们所公认的。

      大革命的意义、失败原因和教训北洋军阀势力的迅速崩溃，使帝国主义列强感到震惊。它们在中国集结兵力、制造事端，企图以武力相威胁，阻挡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同时开始把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看作国民党内的“稳健派”，进行拉拢。周恩来说过，蒋介石“虽曾组织黄埔军校，指挥北伐，但他的军阀思想和投机思想却与他‘参加’革命相随而来”。在大革命初期，他“起了一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作用”。1926年3月，他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他的立场就转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后，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猛烈炮轰南京，使中国军民遭到重大伤亡。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步伐。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以“清党”为名，在东南各省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年7月15日，当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并在其辖区内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搜捕和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最终失败。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方面来讲，是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是由于资产阶级发生严重的动摇、统一战线出现剧烈的分化，是由于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被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拉进反革命营垒里去了。从主观方面来说，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大革命遭到了失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没有经验，缺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深刻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所以，右倾机会主义在大革命后期才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落入共产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当时直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虽然对这次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所出的主意有些是正确的，但由于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那些错误的指导思想。这对酿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直接影响。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它的历史意义仍然是不可磨灭的。这场失败了的革命，实际上是未来胜利的革命的一次伟大的演习。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同时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步提岀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并且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汲取了严重的历史教训，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正是由于经历了这场大革命，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武装。所有这些，为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战争阶段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第一节 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一、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1927年七一五政变以后，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仍然互相对峙。经过几番周折，实现了宁、汉合流。在此基础上，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武汉国民政府不复存在。其后，国民党政府的军队继续北伐，于6月进驻北京、天津一带。奉系首领张作霖在退回关外途中，被日本人预埋的炸药炸死。其子张学良于同年12月29日从东北发出通告，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北洋军阀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继续存在。这样，国民党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已经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是变成了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不过，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然被这个反动集团所控制、所领导，但有一部分领导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受到这个集团的打击、排挤和歧视；它的不少党员、干部并不满意甚至反对这个集团的领导；在国民党及其统治的军政机关里，都有不少民主分子。就是这个反动集团本身，也不是严密的统一体，而是派系林立，不断进行着明争暗斗，直到兵戎相见。它的“统一”是表面的和不稳定的。即使在蒋介石集团确立了在国民党内的主导地位之后，这个集团内部以及这个集团与其他集团尤其是与地方实力派之间，也仍然矛盾重重，冲突不断。

      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依然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同北洋军阀的统治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由于国民党曾经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面旗帜和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一度对它作出过一两项表面上的让步（如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允诺取消领事裁判权），一时使人认为它仍在维护民族权利；由于它在形式上暂时地统一了中国，因此，这个政权曾经在一个时期之内，使一些人尤其是民族工商业者产生过幻想，以为中国可能由此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1928年至1929年间，中国民族工业有过短暂的繁荣。1928年注册厂家就有250户，资本额达1.1784亿元。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以至文化教育事业等也在这段时间内有所发展。不过，在1927年反革命政变时附和过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民族工商业也并没有得到自由的发展。所以，不久以后，这个阶级中的一部分因为自己的利益，开始逐步形成蒋介石政权下的在野反对派。他们对这个政权表示不满，但又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他们发起了一个改良主义运动，想另找一条有利于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国民党所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规定“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其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以“政治会议行之”。这样，北洋政府时期还在形式上存在的议会制度也被彻底废除了。

      国民党政府是怎样实行一党专政的军事独裁统治的呢？

      首先，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据1929年3月的官方材料，“全国军额达二百万”。实际兵员数远不止此。国民党还大力加强地方反动武装。各县民团统称保安队。广大人民被置于国民党武装的严密控制和监视之下。

      其次，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如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和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其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运动，绑架或暗杀革命者和异己分子。1935年11月，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在南京“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

      再次，为了控制人民，禁止革命活动，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分设甲长、保长。保甲内各户要互相监视、互相告发，“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并从事“碉楼堡塞或其他工事之筹设”和交通干线之“保护”等；国民党政府的征税、摊派等，许多也通过保甲来进行。自1934年12月起，保甲制度在全国普遍推行。广大人民被禁锢在保甲制度之内。

      最后，为了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国民党还厉行文化专制主义。大批进步书刊被查禁，许多进步作家被监视、拘捕乃至枪杀。

      国民党政府主要就是通过这些方法，来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巩固自身统治的。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要争得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就必须同这个反动统治作坚决的斗争。伟大的爱国者宋庆龄在当时说过：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环境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改变。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城乡。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国民党统治集团将捕杀的罗网张遍了全中国。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遭到严厉镇压。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加入共产党成为最大的“犯罪”，共产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被捕、被杀。据中共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000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重要活动家先后牺牲。在白色恐怖统治下，一些不坚定分子动摇了，他们纷纷声明脱离共产党、共青团；有的甚至公开“忏悔”，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据1927年11月统计，全党党员人数由1927年5月中共五大时的57900多人锐减到10000多人。革命的工会、农民协会等也到处被查禁或解散，工农运动走向低落。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敢不敢坚持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楷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投入战斗了。一些追求进步、向往真理的人士，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年逾半百的教育家徐特立，文学家郭沫若，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过领导职务的贺龙、彭德怀等，都在这时落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尽压迫的工农群众，重新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逐步聚集起来。在黑暗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独立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

      但是，怎样坚持革命，即坚持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长时间的艰苦的探索。

      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在革命的危急关头，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枪杆子的思想，强调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还提出了“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八七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长沙的计划受挫后，起义部队决定南下，向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农村区域转移，并于10月7日抵达江西省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发动了又一次英勇的反击。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

      总之，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十年内战时期。蒋介石是靠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上台的。但是，他上了台，反而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正是他的屠杀政策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促使他们拿起武器去进行战斗。毛泽东就讲过：“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反帝反封建的事业而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是必要的、正义的、进步的。

**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为了坚持中国革命，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进行武装斗争。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究竟是应当指向城市，还是指向农村呢？这个问题，只有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予以回答。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革命工作应当以城市为中心，这是一个时期内全党的共同认识。中共中央继续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中心城市。但是，所有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都经过摸索，逐步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农村区域，在那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工农政权。除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及时转移到井冈山地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外，南昌起义余部一部分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会合，主要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移到湘南农村，在那里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的途径，后来也上了井冈山。广州起义余部一部分也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农民会合；一部分后来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另一部分则从广州西北郊转入农村，后来参加了广西左右江起义。客观环境迫使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革命者深入到农村区域去坚持革命斗争。

      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依据“找着新的道路”的要求，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也初步提出了相机占领某个县或几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岀：在中国，找不到一个经济力量能够统治全国的大城市，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同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更指岀：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1930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署名信件，明确提出共产党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认为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这样，革命必然可以得着胜利。

      这些事实说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早在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就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同时还科学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1929年4月，针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斗争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随着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还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思想。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表现了毛泽东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岀，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这次会议史称古田会议。会议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担负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的任务，必须加强政治工作。决议案强调，必须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决议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党组织和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环境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入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这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对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和坚持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到1930年初，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1930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在刊登介绍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时指出：在瑞金独立政权中，可以见到许多宝贵的经验。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是未之前见或未之前闻的。大家应向这些经验学习。

      反“围剿”战争与土地革命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当局感到震惊和恐慌。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1932年底，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也取得重大胜利。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同土地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开展土地革命，就是要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得到翻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

      1931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总结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发布公告，明确规定农民已经分得的田归农民个人私有，可以自主租借买卖，别人不得侵犯；生产的产品，除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外，均归农民个人私有，任凭自由买卖。毛泽东还和邓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的指引下，根据地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军参战的积极性。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条件下，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坚持和发展，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了农民，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革命。

      在根据地军民进行军事上反“围剿”作战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界人士还在文化战线上开展了反“围剿”斗争，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化运动。左翼文化工作者的一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音乐等）和社会科学论著及译作，对于传播进步思想、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鲁迅的杂文，瞿秋白的评论，茅盾的小说《子夜》，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等，都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鲁迅，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斗争中成了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第二节  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也都得到了发展。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令、劳动法等法律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首先由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乡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召开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在此基础上，逐级召开区、县、省和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区、县、省和全国苏维埃政府。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其他根据地也相继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着重发展农业生产，努力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在许多青壮年参军参战的情况下，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群众自愿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成立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合理调节人力、物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努力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增加农作物产量。

      苏维埃政府注重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各种夜校、半日制学校、补习学校或识字班。中央根据地还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列宁师范学校、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着力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专门人才。工农群众开始获得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

      苏维埃政府认真加强廉洁从政的教育，坚决开展反对贪污腐化等的斗争。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还作出了“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等规定。苏维埃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真正廉洁的政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所呈现岀来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同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根据地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它使身陷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一线光明和希望。

      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大革命失败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由于对中国情况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中国共产党党内开始滋长一种“左”的急躁情绪。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

      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

      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陈绍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其主要错误是：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

      这几次“左”倾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

      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内屡次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以外，主要的原因在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一句话，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王明等人虽然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但是不懂得中国的实际。他们颠倒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以为只要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词句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就可以指挥中国革命。王明甚至提出过“对共产国际百分之百的忠诚，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保证”这样的口号。按照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办事，就不能不在实践中碰壁。

      对于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等进行过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中共中央主持工人运动工作的刘少奇也多次提出过反对冒险主义的主张。但是，王明等人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党内民主，大搞宗派主义，对坚持正确意见的或不对他们随声附和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委员、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这就剥夺了毛泽东对中央根据地红军的领导权。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1933年初，由于白区党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临时中央政治局无法在上海立足，被迫迁到中央根据地。为了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政策，他们在福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其矛头实际上都是对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

      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

      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又深刻的。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项英、陈毅等率领中央根据地留下的部分红军在南方坚持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

**二、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遵义会议历史的经验表明：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人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转移，开始长征。其后，1935年3月、4月，红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长征。同年11月，红二、六军团（后组成红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长征。

      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与共产国际有关系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强渡湘江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他们明显地滋长了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一些支持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如张闻天、王稼祥等，也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样，当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并在占领黔北重镇遵义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为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遵义会议表明：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在领导中国革命全过程的某一个时期内，由于经验不足以及其他原因，党和党的领导人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但是，错误有两重性。它一方面损害党的事业，损害人民利益；另一方面又从反面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到遵义会议的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经验和挫折、失败的教训，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使自己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从而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坚持下来并推向前进的。

      红军长征的胜利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同5月初离开川陕根据地实行转移到达那里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中共中央又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了贯彻北上方针，红军经过茫茫草地，历经艰险。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先行北上，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初，在甘泉地区同在陕甘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会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有了新的落脚点和战略基地。至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的长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毛泽东说过：“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这些保存下来的力量，?经历了千锤百炼，是党和红军的极为宝贵的精华。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这支队伍作基干，使革命力量逐步恢复、发展、壮大，直到取得全国的胜利。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三、总结历史经验，迎接全民族抗日战争**

      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队伍中奋斗的人们，都是要革命的，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认识是一致的。在一定时期内，一部分领导人之所以犯了全局性的、严重的错误，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为了纠正错误，必须端正思想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去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共产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

      1935年12月，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判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1936年12月，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1937年夏，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评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深入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阐明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所进行的理论工作，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进行了拨乱反正，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满怀信心地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第一节 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及其实施**

      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渐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进一步控制本国政权，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张。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宣示了《对华政策纲要》，企图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彻底分割出去，并决心为之诉诸武力。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主张：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日本成为亚洲的战争策源地。

      1929年10月，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了摆脱危机，日本军国主义者决心加紧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的一小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当即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接着，驻扎在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军队分别向沈阳城内和长春、四平街、公主岭等地发起进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日本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阶段由此开始。1932年2月，中国东北全境沦陷。日本侵占了山海关至黑龙江之间相当于日本本土3倍的11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面对日本的大举侵略，国民党政府一再退让。蒋介石在1931年7月已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日本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这种态度，使日本侵略者更加无所顾忌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以后，随即开始入侵中国华北地区。1935年，日本在华北制造一系列事端，向中国政府提出使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中国政府在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华北成为日军可以自由岀人的“真空地带”。接着，日方又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两市（北平、天津）“防共自治运动”，制造傀儡政权。这就是华北事变。

      日本是亚洲的帝国主义强国。它对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并经过精心策划、周密准备。国民党政府却将其军队的主力用于“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对日本实行妥协退让。国际联盟和英、美等国政府则采取对日姑息、纵容的政策。这就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计划步步得逞。

      卢沟桥事变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华北事变后，日本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部署。1936年8月，法西斯军人控制的广田弘毅内阁制定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先打中国”的侵略计划。11月，日本同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欧亚两个法西斯国家打着“反共”的旗号结成了反动同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当夜，驻丰台日军一个中队在卢沟桥以北举行军事演习。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炮轰宛平城，向卢沟桥的中国驻军进攻。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动员几乎全部军事力量，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向华北、华东、华中地区发起战略进攻。日军相继占领了北平（今北京）、天津、太原、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一大批城市。

      由于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日军在1938年10月占领广州、武汉以后，被迫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日本调整侵华政策，实施“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策略，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占领区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本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占领2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这是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

**二、残暴的殖民统治和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

      日本在其占领区的残暴统治日本的大举进攻，使中国的大片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这些地方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

      早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就开始了在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日本在台湾设立总督府。日本驻台总督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于一身，并负责指挥驻台的日本军队。总督府主要官员都由日本人担任。他们建立了一整套警察制度和保甲制度，掌握着台湾人民的生杀予夺之权。日本还在台湾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攫取台湾的资源和财富。他们推行“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殖民经济模式，使台湾成为日本的稻米供应地。殖民当局还竭力推行奴化教育和同化政策，开展“皇民化”运动。

      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开始了对东北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1932年，在日军扶持下拼凑的伪“满洲国”（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两年后改称“皇帝”），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复辟残余势力相结合而催生的一个怪胎。伪“满洲国”在“日.满共同防卫”的借口下，确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中国东北三省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军策动、拼凑了一些地方性傀儡政权。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前后，日本加紧诱降活动。1938年12月，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降日本。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关内占领区，日本军国主义者允许“中华民国”国号的存在，但是，这些地区实质上仍然是日本的独占殖民地。

      侵华日军的严重罪行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和在中国部分地区的殖民统治，犯下了空前严重的罪行，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

       首先，制造惨绝人寰的大屠杀。1937年12月，日军占领中国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后，展开烧、杀、淫、掠“大竞赛”。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体射杀、火焚、活埋及用其他方法处死者达30万人以上，无数妇女遭到蹂躏残害，无数儿童死于非命，1/3建筑遭到毁坏，大量财物遭到掠夺。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日军在其他许多地方制造的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不计其数。相持阶段到来后，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开展大规模的“扫荡”，实行“杀光其居民、烧光其房屋、抢光其粮食”的“三光”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在晋冀鲁豫、山东、苏皖等7个根据地，中国军民被杀戮者即达318万人，房屋被焚烧达1952万间。日军还悍然实行细菌战、化学战，对中国军民实行惨无人道的人体活体试验。从1940年下半年起，’日军的731部队等开始将带有霍乱、伤寒、鼠疫等病菌的投掷器投放到中国许多地区，造成大量中国居民死亡。日军还在其占领区掳掠和残害中国劳工，强迫一些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

      其次，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与财富。在东北，在“日满经济一体化”的口号下，日本的垄断资本独占了全部重工业和铁路交通，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肆意掠夺矿产资源。在关内，按照日本“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原则，被毁的中国工厂约占当时工厂总数的37%，其余除少数内迁外，大都为日本侵略者所占夺。华北煤产量的65%被运往日本。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占领区的土地及农产品。他们对农产品实行严格的统制和垄断，强迫农民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廉价出卖给伪政府，除保证侵华日军的需求外，大部分粮食被运往日本国内。

      再次，强制推行奴化教育。日本侵略者按照“思想战”的方针，在其占领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企图以此达到泯灭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维护其殖民统治的目的。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按1937年的比价，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

**第二节 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

**一、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进行了长达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与当时国民党当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在九一八事变后，9月20日，中共中央即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目的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共中央发布一系列文告，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进行民族的自卫战争。党的各级组织要求每一个党员必须发挥自己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地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成为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的先锋和模范。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

      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极参加和推动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共中央以及东北党组织先后选派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i东北，加强中共满洲省委及各级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力量。中共满洲省委派出大批党员、干部到抗日义勇军中工作。1933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先后在东北各地崛起。1934年，各抗日游击队先后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2月以后，又陆续改建为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同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二、抗日救亡运动和共产党人与部分国民党人合作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广大的工人、农民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上海、天津、广州、北平等地工人纷纷举行反日大罢工和抗日示威游行，组织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募捐。冀东农民开展打游击等斗争。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大中学生举行罢课、示威、街头宣传等活动。各地学生还到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东北，收复失地。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也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与民更始”，变更“剿共”政策，“全国一致对外”。

      国民党军队中的部分爱国官兵自发进行了抗战。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同这部分国民党官兵的抗日合作。

      在东北，中共满洲省委同以原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日义勇军进行合作。其领导人李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奋起抗击进攻上海的日军，中共中央号召各界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发动沪西日商纱厂工人罢工，以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日作战。

      1933年5月，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谋求同共产党合作。在同盟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约有300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吉鸿昌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同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以及国民党内爱国人士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州发动反蒋抗日事变。这就是福建事变。此前，第十九路军代表同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代表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事变失败后，共产党人同李济深、蔡廷锴等爱国人士继续保持着联系。

      1934年4月，由中国共产党提出，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领衔，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名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在纲领上签字的群众达几十万人。

**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一二·九运动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在中国共产党关于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喊出“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就是一二·九运动。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之际，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还在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同年10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岀版的《救国报》发表，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在抗日的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重建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1936年5月，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下，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民主人士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共产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日本对中国华北的扩大侵略，进一步威胁到美、英等国的在华利益和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及内外政策发生了某些变化，并开始着手整军备战工作。他还开始试探“政治解决”共产党和红军问题的途径。国共两党通过国外、国内的不同渠道开始接触，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初步磋商。1936年5月，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了反蒋的口号。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岀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调整。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当时，蒋介石还没有根本改变对日本的态度。他仍然准备组织力量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新的“会剿”。他于1936年12月初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攻打陕甘的红军。12日凌晨，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对蒋介石“哭谏”无效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毅然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这就是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岀发，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确定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并参加张、杨同南京方面代表宋美龄、宋子文的和平谈判。蒋介石被迫作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为了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如果国民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意实行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上述主张，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抗日派的赞同。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许多人联名要求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全会表示同意国共两党进行谈判，并在会议文件上第一次写上了“抗日”的字样。

      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四、全民族抗战开始**

      国共合作，共赴国难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日军的进攻。中国开始奋起进行全民族抗战，在东方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8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不久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等协议。八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O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共4.6万人。接着，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全军1.03万人。9月，原陕甘宁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陕甘宁根据地仍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

      全民族同仇敌忾，奋起抗战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是一场正义战争。全国各界民众以不同形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投入了全民族抗战。

      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积极投入抗日洪流。华北农村一位名叫邓玉芬的妇女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民族工商业者踊跃为前线捐赠钱物，一些人还不避艰险，把工厂迁往大后方。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一致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宋庆龄接受中共中央建议，从上海移居香港，于1938年6月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呼吁世界人民援助中国抗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影响下，各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一起，以各种方式投人抗日斗争。如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就进行了大小战斗870多次，歼敌3.76万余人。许多台湾同胞还来到祖国大陆，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岛内的高山族等台湾同胞则坚持不断地发动抗日暴动，组织抗日义勇军（台湾同胞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抗日斗争中，共有65万人壮烈牺牲）。香港、澳门同胞也积极支援内地的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同胞更在内地抗日武装的支持下，开展打游击等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

      海外华侨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他们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的抗战。如在亚洲，新加坡成立了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其分支机构遍及东南亚各国。仅在全民族抗战的头三年，海外侨胞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3辆、救护车1000余辆，物资总数在3000批以上。大批海外华侨还回国投身抗战，仅粤籍归侨参军的就有4万多人。

      在祖国存亡危急的关头，中华儿女表现了空前的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

**第三节      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

**一、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中国抗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

      在战略防御阶段，日本侵略者以国民党军队为主要作战对象。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担负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国民党军队组织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会战等一系列大战役。1938年3月，李宗仁等部进行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歼灭日军1万余人。

      国民党军队的爱国将士，表现了空前的民族义愤和抗战热情。在北平南苑的战斗中，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先后阵亡。在淞沪会战中，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附谢晋元率孤军据守四行仓库（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四家银行共同出资建设的仓库），被上海市民誉为“八百壮士”。

      在这个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其政策的重点还是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但是，正面战场除了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外，其他战役几乎都是以退却、失败而结束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客观原因，是由于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日军占很大的优势；主观原因，则是国民党战略指导方针上的失误。蒋介石集团在决心抗战的同时，却又害怕群众的广泛动员可能危及自身的统治，因而实行的是片面抗战的路线，即不敢放手发动和武装民众，将希望单纯寄托在政府和正规军的抵抗上；在战略战术上，没有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而是进行单纯的阵地防御战。这就使得大多数作战未能给敌人以更大的消耗，并在短时间内丧失了大片国土。

      1937年11月，日军攻占上海，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中国西部大部分地区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实际管辖区，人们通常称之为国民党统治区（又称大后方）。

      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实行过若干有利于抗战的政策。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聘请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同年6月，国民参政会成立。国民参政会虽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而是受国民党控制的最高咨询机关，但它的成立还是为各党派、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可以公开发表政见的讲坛。国民政府对庞杂的经济行政机构也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整，只是机构膨胀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东部沿海地区一批重要工厂企业迁移到内地，为西部地区经济开发、支持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分别由北平、天津迁往昆明，合并组建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平、上海等地还有其他一些大学、中学、专科学校迁往西南的重庆、遵义等地以及西北的一些地方。爱国师生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坚持进行教学和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二、战略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在重申坚持持久抗战的同时，其对内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还将抗战到底的含义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标志着国民党政府逐步转变为消极抗战。

      日军在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的同时，为了巩固占领区，继续对国民党军队发动过若干次进攻性打击。国民党军队也进行过几次较大的战役。国民政府大体上保住了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1939年12月，在桂南会战中，以第五军为主力的国民党军队曾攻克昆仑关，消灭日军4000余人。1940年5月，在枣宜会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激战中殉国。但是，这个时期国民党对抗战在全局上逐渐趋向消极，基本上实行保守的收缩战略，以便保存实力；同时又抽岀相当多的兵力用来限制、打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制造了多次的反共“摩擦”事件。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美、英对日宣战。不久，由美国方面提议设立中国战区。为了配合英、美打击日军，国民政府命令各战区发起攻击。1942年元旦发起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曾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日军死伤5万余人。同年2月，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对日作战。陆军第二OO师师长戴安澜在缅北殉国。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敌后战场开始局部反攻的有利条件下，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却日益下降。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军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在这次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遭到大溃败。军队损失50多万兵力，丢失拥有146座大小城市、6000万人口的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在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统治集团一方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中国经济，一方面又在实际上扩张官僚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一方面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一方面又在实际上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豫湘桂大溃败则成为大后方人心变动的重要转折点，越来越多的人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失去了信任。国民党统治区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陷入深刻的危机。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一、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

      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路线如何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这是必须首先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确信，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坚持抗战，并使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与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主张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这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存在，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为此，必须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必须改革政治机构，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并适当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会议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

      在中国，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进行人民战争，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深入敌后，发动和组织广大的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创建抗日民主政权，逐步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为先进的革命阵地。中国共产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敌后农村，在新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条件下，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采取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是一场弱国对强国的战争。战争的基本走势究竟怎样？应当坚持什么样的战略方针？这是必须作出回答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1938年5月至6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总结抗战10个月来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系统地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

      毛泽东指岀，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一方面，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强国弱国的对比，决定了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另一方面，日本是小国，发动的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失道寡助；而中国是大国，进行的是进步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得道多助。中国已经有了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在政治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人民军队。因此，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

      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胜日本的侵略，必须进行人民战争。

      毛泽东还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即：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关键的阶段。只要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将在这个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毛泽东阐明的持久战战略思想，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和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的战略方针，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游击战争的发展及其战略地位**

      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为了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决策。

      八路军刚开赴前线时，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1937年9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多辆，取得全民族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接着，又参加忻口会战。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在雁门关以南伏击日军，第一二九师还以一营兵力担任主攻，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毁伤敌机20多架，削弱了当前之敌的空中突击和运输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八路军在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先后开辟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山东和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新四军则挺进长江南北，开赴苏南、皖南、皖中地区，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多次,毙、伤、俘敌5.4万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到近20万人。到1940年底，人民抗日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还建立了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根据地（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豫鄂边、山东、皖东北、皖东、皖南、皖中、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东江、琼崖），加上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拥有1亿人口。1944年春季，敌后战场人民军队转入攻势作战。他们已经抗击着全部侵华日军的64%。

      在敌后军民的艰苦抗战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他们中有在作战中以身殉国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等抗日将领，以及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日联军八位女战士等英雄群体。他们伟大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民族气节，鼓舞了全国军民，连敌人也为之震惊。

      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和中期，游击战被提到了战略的地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在战略防御阶段，从全局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是主要的，敌后的游击战是辅助的。但是，游击战在敌后的广泛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迫使敌人不得不把用于进攻的兵力抽调回来保守其占领区，从而对阻止日军的进攻、减轻正面战场压力、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抗日作战方式。日军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以保持和巩固其占领地。1939年至1940年，华北地区的日军出动千人以上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就有109次，使用的总兵力达50万人以上。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人民军队在有利条件下也进行过运动战。如1940年8月至12月初，八路军总部调集100多个团共20万人，对华北日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以破袭敌人交通线为重要目标的进攻战役。这就是百团大战。但是，人民军队在大部分时间里所进行的，主要是游击战。削弱敌人、壮大自己，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为实行战略反攻准备条件，这个任务主要是由人民军队进行的游击战来完成的。

      在1945年8月反攻阶段到来前夕，人民军队已经发展到120万人、民兵扩展到220万人，抗日根据地达到了19块。敌后军民的大反攻，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在全民族抗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领导全国人民，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等全国各地的革命抗日武装力量，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为坚持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永远辉耀史册的贡献。

**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由于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参加抗战的目的不尽相同，实行的是不同的抗战路线，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所以，全民族抗战一开始，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立。为此，共产党必须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必须坚持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必须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取得的阵地，尤其是为了发展这些阵地，以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使自己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这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以后，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团结抗战的局面逐步发生严重危机，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针对这种情况，1939年7月，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坚决揭露打击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降活动，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抗日。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队侵犯陕甘宁边区，并在山西、河北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人民军队给予了坚决的还击。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皖南以8万余兵力包围袭击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多人（除约2000人突围外，一部分被打散，大部牺牲或被俘）。蒋介石还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这就是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对于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倒行逆施，中国共产党采取军事上严守自卫、政治上坚决反击的方针，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1943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策划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由于中国共产党及时进行揭露和斗争而被制止。

      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扩大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总结反“摩擦”斗争的经验，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进步势力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抗日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为了发展进步势力，就要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放手发动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人民武装，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全国民众的抗日运动。

      中间势力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争取中间势力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是共产党要有充足的力量；二是尊重他们的利益；三是要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

      顽固势力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即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他们采取两面政策，既主张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并摧残进步势力。为此，共产党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付他们，即贯彻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斗争不忘统一，统一不忘斗争,二者不可偏废，而以统一为主。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上述原则和方针的提出和贯彻实施，对于坚持全民族抗战到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抗日民主根据地是认真贯彻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抗战和争取胜利的坚强阵地。1941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全面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根据地建设的基本方针。

      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设加强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的、根本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提出，根据地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边区（省）、县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也是立法机关；边区、县、乡抗日民主政府是行政机关；边区高等法院和县法院是司法机关。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1/3。这样做，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代表，团结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各阶级、阶层。

      抗日民主政权普遍采取民主集中制，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的领导人都经过人民选举产生。抗日民主政权努力发扬政治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等还专门通过有关保障人权的条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抗日的基本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试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岀发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创造。

      毛泽东在回答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岀“其兴也浮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历史兴亡周期率的问题时讲过：“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各地抗日民主政权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根据地内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普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地租，按原来租额比例，减低25%;战前借贷，以15%为计息标准），以减轻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提高他们的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实行交租交息，以利于联合地主阶级抗日。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抗日民主政府动员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动农民组织劳动互助，提高劳动生产率；帮助农民改良耕作技术，推广优良品种。

      为了克服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发岀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等亲自参加生产。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造成为“陕北江南”。抗日民主政府还厉行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根据地军民终于战胜了困难，农业生产和工商业都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文化建设与干部教育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大批知识青年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奔赴延安。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创办起来。各根据地还创办了大量的中、小学校，吸收农民子女入学。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也得到重视。1940年8月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门机构。

      抗日根据地政治民主、政府廉洁、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同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吏治腐败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当时美国驻华使馆的人员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也承认：“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受到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占有确定的和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命运不属于蒋而属于他们。”

**五、推进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

      抗日民主运动的开展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是在敌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也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促进团结抗日等方面的大量工作。

      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先是通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具体领导。1939年1月以后，由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具体领导。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各界人士要求国民党实行抗战民主。1939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中一些党派的代表发起宪政座谈会，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宪政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普遍开展起来。

      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无法在重庆公开活动，即派人到香港开展工作，得到中共南方局所属中共驻香港办事处的支持,并于同年9月创办了盟报《光明报》。

      中共南方局还直接对大后方的工商界人士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当时说：1944年，不仅小资产阶级，连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了我们。

      1944年9月，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由此朝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岀现了新的高涨。但是，蒋介石公开反对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内战的反动方针。

      抗战文化工作的开展全民族抗战开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文化界各抗敌协会相继成立，成为文化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重要标志。

      1938年初，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以后，掌管宣传工作的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由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在周恩来、郭沫若的参与和领导下，团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爱国人士，成为扩大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文化工作的重要阵地。第三厅组织了包括儿童剧团在内的十多个抗敌演剧队、宣传队，分赴各个战区进行抗日宣传，慰劳抗日将士。

      武汉失守前后，一大批文化界人士迁移到重庆和桂林、昆明等地。中共中央南方局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具体领导大后方的进步文化工作。文化界提岀“抗战、团结、民主”为文艺创作的三大目标。抗战文化在斗争中得到新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及时宣传党的主张，鼓舞和激励群众的抗战热情。

      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是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一条重要的战线，对于激发大后方人民的爱国民主意识、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支援抗战前线、积蓄革命力量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六、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为了胜利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密切地联系着党的政治路线，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他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关于中国抗战应该依靠国民党的指示精神，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毛泽东等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苏联，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抗战情况、国共两党关系及中共所采取的路线和政策。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

      1938年9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岀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命题。他强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大声疾呼：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他向全党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并给以批判的总结和调查研究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的任务。

      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针对国民党借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的时机，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等论调，中共中央进行了有力的批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他们“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明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为了将丰富的中国革命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以便更好地指导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毛泽东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重要的理论著作。

      毛泽东首先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特征，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革命发生及发展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他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而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民主革命，已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政治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济上,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个体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文化上，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明，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这个理论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极大地增强了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整风运动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的发展。广大新党员有很强的抗日精神和革命斗志，但是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老党员要适应新形势，也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来，党的路线已经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的清理。这就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总结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此，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

      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整风运动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进行。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普遍展开。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

      主观主义的实质是理论脱离实际，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当时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内反复出现“左”、右倾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表现出了幼稚者的蒙昧。所以，毛泽东提岀，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的同志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解放出来。

      克服主观主义，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个成语作了新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的实际情况岀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样，实事求是就成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通俗而又生动的表述。

      调查研究是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毛泽东强调，加强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岀《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各中央局、区委、省委或工委也成立相应的调查研究机构。调查研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制度被确立起来，调查研究在党内蔚然成风。

      在整风运动中，全党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党的整风运动文献，联系党的历史，联系个人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端正了思想路线，增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自觉性和能力。

      在这期间，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全面总结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深      刻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为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他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确立了起来。

      1945年4月20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岀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同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七大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制定了实现政治路线的正确的纲领和策略；七大总结了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七大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创造的理论成果，正式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并将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同年6月19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第五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原因和意义**

**一、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4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包括中国解放区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5月上旬，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国法西斯投降。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8月上旬，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猛烈攻击日本关东军。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中国人民军队对日军的战略反攻全面展开。

      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中、美、英、苏等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在东京湾美军军舰密里号上举行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代表、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128万余人向中国投降。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根据波茨坦公告，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以及澎湖列岛，由中国收回。这成为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标志。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中国抗战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即已开始。从1937年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到1939年9月大战在欧洲爆发之前，当英、美、法实行绥靖政策的时候，中国人民孤军奋战，英勇抗击了百万日军的进攻。中国的抗战牵制和削弱了日本的力量，使之不敢贸然北进，从而使苏联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德国，避免东西两面作战；同时也推迟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并使之在发动和进行战争时由于兵力不足而不能全力南进，从而减轻了美、英军队受到的压力。

      中国坚持持久抗战，抗击和牵制着日本陆军主力，并为同盟国军队实施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跨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苏联元帅崔可夫说：“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

      中国作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还为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

      总之，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抗击日本陆军的80%左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仍抗击日本陆军的半数以上。从1931年9月至1945年9月，中国军民共歼灭日军150余万人。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对中国的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

      苏联是最早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援助的国家。1937年8月，中国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大量的物资援助，并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抗日战争后期，苏联红军开赴中国东北，同中国军民并肩作战，加速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进程。许多苏军官兵在中国东北战场上英勇献身。

      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后，美国对日本一度奉行绥靖政策。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美国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另一方面又向日本大量出口战略物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美国采取了支持中国、联合中国共同抗日的政策。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军官陈纳德还曾组建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来华参加对日作战，并为帮助中国运送战略物资而冒险开辟驼峰航线。

      英国及法国等国也向中国提供了经济援助或与中国进行了军事合作。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以及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日本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1939年11月，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抢救八路军伤员时被感染，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

**三、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和意义**

      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人民为什么能够战胜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赢得胜利呢？

      第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是中华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岀来。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掸，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篇章。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国共合作，建立、坚持和发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各爱国党派团体和广大人民一起，共同维护团结抗战大局，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第三，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提出并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的战术战法，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

      第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以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

      第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中国人民用自己的顽强奋战和巨大牺牲，迫使日本归还甲午战争以后从中国窃取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神圣领土,桿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

      第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人民为最终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作岀的历史性贡献，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一个以弱胜强的范例，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1945年4月，中国同美国、英国、苏联共同发起旧金山会议，共商建立联合国。随着《联合国宪章》正式岀台，中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

      第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经历抗日战争锤炼的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主张，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继续奋斗，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这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但是怎样去实现这个目标呢？中国共产党曾经希望通过和平的途径对中国进行政治社会的改革，逐步向新中国这个目标迈进。因为，中国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争之后，有和平建国的强烈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当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这种愿望。同时，由于人民力量强大，加上其他条件，中国共产党估计，造成国共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努力争取中国出现这种局面。

      还在1945年5月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就提出，对蒋介石拟采取“洗脸”政策而不是“砍头”政策。8月24日，毛泽东根据时局变化进一步指岀，抗战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中央正考虑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对时局的宣言中明确提岀“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

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为了争取和平民主，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于8月28日偕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10月10日，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政协会议）在重庆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38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密切合作，同国民党当局认真协商，推动政协会议达成五项协议。

      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政协协议规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改组后的政府为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的任务。协议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的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中央政权的这种体制相当于英国、法国的议会制和内阁制。这对于蒋介石的独裁政体是一种限制。协议又规定，中央同地方分权，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可以制定省宪等。这对于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保障。

      政协会议的上述协议及其他协议，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是有利于人民的。它激起了亿万善良的中国人对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热烈期望。协议较多地吸收了中间人士的意见，这使他们尤其感到振奋。在一个时期内，是否忠实履行政协协议，成了人们衡量政治是非的重要尺度。

      维护和破坏政协协议的较量中国共产党是准备严格履行政协协议的。在政协召开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全党应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新中国而奋斗。政协闭幕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指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全党要“准备为坚决实现（政协的）这些决议而奋斗”。同时，中共中央也指出，英美和中国大资产阶级中还有许多阴谋，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注意“阵地的取得和保持”，做好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而“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统治的社会基础极其狭隘，这决定了它既不能容忍、也经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后来艾奇逊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国民党存在着维护特殊利益的集团，它“愈来愈流露这样一种信念：追求统一和民主的中国，他们将丧失一切”。正因为如此，国民党统治集团从来没有准备去履行政协协议。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命令他的追随者对政协协议“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他以扩大内战的行动，使政协协议成为一纸空文。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方针是，先接收关内，控制华东、华北，而后进兵关外，以便独占东北。所以，它计划先在关内大打，而后在关外大打。待它认为相应的准备已经完成时，就全面彻底撕毁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

      国民党统治集团既然扼杀了全国人民对于和平建国的热切愿望,它也就把自己放在了全国人民的对立面。

      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尽管最终未能阻止全面内战的爆发，但是，它使得各界群众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懂得了什么人应当对这场战争承担责任。这在政治上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中共代表团在返回延安时，代表团成员李维汉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同时，经过努力，中国人民毕竟争得了将近一年的和平的暂息时期。这也为扩大和巩固解放区、做好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国民党发动内战和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

      全面内战爆发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全国性的内战。同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华北解放区重镇张家口。蒋介石于当天宣布11月12日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次年3月，国民党当局限期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代表及工作人员全部撤退。至此，一切和平谈判之门都被国民党关闭，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全面内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是极为严峻的。当时，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为430万人，它占有3.39亿以上人口、73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地区，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它不仅接收了100余万日军和数十万伪军的装备，而且美国还为它训练和装备了50万军队。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为127万人，装备基本上是缴自日军的步兵武器；解放区的人口为L36亿，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而且是被分割、包围的，在物质上得不到任何外援。正是凭着军力和经济力的优势，蒋介石声称，这场战争“一定能速战速决”。

      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清醒地估计了国内外形势，坚决认定，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

      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会被断送。

      毛泽东又指出：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和美国的援助，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而蒋介石发动的战争的反人民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在这方面，我们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

      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为了打退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指岀，在政治上，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必须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

      在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一年的时间里，人民军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战争主要在解放区进行。

      从1946年6月至10月，国民党军侵占解放区城市153座；解放军则收复城市48座、歼敌29.8万人。从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国民党军侵占解放区城市87座；解放军则收复和解放城市87座、歼敌41万人。国民党军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而改为对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从1947年3月至6月，解放军经过4个月的内线作战，努力打退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并在东北、热河、冀东、豫南等地开始局部反攻。解放区虽仍有95座城市被敌侵占，但解放军同时收复和解放了153座城市，并歼敌40余万人。

      战局的发展，从根本上粉碎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速战速决计划，并使他们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难以逃脱遭遇灭顶之灾的命运。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经过人民解放军一年的作战，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47年7月，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430万人下降为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下降为150万人。由于战线延长，它的大部分兵力用于守备，战略性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且士气低落，官兵中充满失败情绪。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127万人增加为195万人，其中正规军近100万人；部队的武器装备也因大量缴获而得到很大改善。由于不需分兵守卫后方供给线和城市，机动兵力大大增强。

      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之不能持久的方针，中共中央作出出人意料的决定：不待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将主力打到外线去，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

      1947年6月底，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它们调动和吸引国民党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于自己周围，迫使国民党军处于被动地位。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由此揭开。

      仍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包括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谭震林、许世友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野战军，徐向前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等，也在同时加紧发起攻击，渐次转入反攻。同年夏季，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反攻，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局。

      各个战场上的攻势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

      提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因为这时，不仅老百姓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这个口号的提岀，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和全国人民的斗志。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毛泽东指岀，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随后,他进一步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牢牢掌握党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必须十分注意政策和策略，注意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善于把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行动；必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以便把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地向前推进。

**二、土地改革与农民的广泛发动**

      从“五四指示”到《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同时，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毛泽东指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前夕，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决定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此之后，通过开展清算斗争等，到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即有2/3的地区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

      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为了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进一步激发他们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1947年7月至9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个大纲指引着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群众，将自己的力量汇入民主革命的洪流。

      土地改革运动的热潮全国土地会议以后，解放区广大农村迅速掀起土地制度改革（习惯称“土改”）运动的热潮。尽管在土改运动广泛发动之后，一度发生过侵犯部分中农利益、侵犯某些民族工商业等的“左”的错误，但中共中央一经发现，便立即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纠正，使运动迅速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到1948年秋，1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广大农民分得土地并在政治上获得翻身以后，其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在“保田参军”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踊跃参落入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成立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组织，担负战争勤务。他们还广泛建立和发展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

      土地制度改革，是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封建制度根基的社会大变革。土改运动的发展表明，解放战争在胜利推进的同时，中国的社会变革也在深入发展。经过这个运动，中国最主要的人民群众——农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自身利益的坚决维护者，因而自觉地在党的周围团结起来。这就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三、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危机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民主运动也迅速地发展起来，成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国民党政府由于它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官员们的贪污腐败、大发国难财，抗战后期在大后方便已严重丧失人心。在抗战胜利时曾经对它抱有很大期望的原沦陷区人民，也很快对它感到极度的失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官员到原沦陷区接收时，把接收变成“劫收”，大发胜利财。巨额敌伪资产转归官僚资本集团控制的部门占有，其中很大部分被官员个入侵吞、隐匿、变卖。连一名国民党接收官员也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了民心”，其结果将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后来也说过，国民党“从其执政伊始就容忍了各级官员的贪婪受贿、懒散无能、搞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一句话，那个被它所推翻了的腐朽官僚制度的一切弊病它全都有了。抗战胜利后，为了集中军队和秘密警察的力量去摧毁共产主义，那些弊病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了”。

      国民党之所以迅速失去民心，主要是由于它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执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为了筹措内战经费，国民党政府除了对人民征收苛重的捐税以外，更无限制地发行纸币。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已比1937年全民族抗战前增发47万多倍，而物价暴涨了725万多倍。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飞涨，使人民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洗劫，使民族工商业走向破产。国民党统治区的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国民经济遭遇深刻的危机。1947年，工业产量较1936年减少了30%。失业人数陡增，工人和城市居民濒临无法生存的境地。同时，农村经济急剧衰退。1947年，农作物总产量比1936年减少了33%~44%。广大农村饥民遍地，饿殍载道。1947年，各地饥民达1亿人以上。公教人员和学生群众的生活也陷入极度的困境。

      这样，国民党当局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置于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除此以外，再无岀路。

      学生运动的高涨针对国民党当局积极从事内战的准备，1945年底，昆明学生发动了以“反对内战，争取自由”为主要口号的一二·一运动。这个运动扩展到了许多城市。

      在全面内战爆发半年后，1946年12月30日，为抗议驻华美军强暴北京大学先修班一女学生，北平学生高喊“抗议美军暴行!”“美军退出中国！”的口号，举行示威游行。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运动（史称“抗暴运动”或“一二三〇运动”）由此掀起。截至1947年1月10日，12天内，抗暴斗争扩展到14个省26个城市，参加罢课、游行等的学生总数达50万人。

      1947年5月20日，南京、北平等地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史称“五二〇运动”）。随后，这个运动迅速扩大到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60多个大、中城市，学生罢课、游行同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等各阶层人民的斗争会合到了一起。

      在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1947年10月以后，爱国学生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抗斗争的浪潮。由于他们愈来愈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面,学生运动的主要口号便由“反饥饿、反内战”改为“反迫害”了。

      1948年，美国的对日政策发生逆转，开始由促使日本非军事化和整肃右翼，转向扶持日本，重新武装日本，打击左派势力，以期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依靠重点。爱国学生提出“反美扶日”“挽救新民族危机”的口号。6月5日，上海学生举行反美扶日大游行。这个运动很快扩展到全国。

      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前夜，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派出请愿团去南京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时遭到当局指使的大批暴徒围殴达5个小时，团长马叙伦和代表雷洁琼等多人受伤。

      1947年间，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中，先后有120万工人举行罢工。5月到6月，饥饿的城市居民的“抢米”风潮席卷包括江苏、浙江、安徽、四川等省的40多个大小城镇。

      在农村，农民不断掀起反抗国民党当局抓丁、征粮、征税的浪潮。1947年1月，民变地区扩展到300多个县。中共地方组织还在广东（含海南岛）、湖北、安徽、福建、江西等一些地方的农村中，恢复和发展人民武装，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

      1947年2月28日，台湾省台北市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抗议反动军警屠杀市民，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2月底3月初，台湾各地汉族、高山族人民纷起响应，夺取武器，举行起义，并攻占台中、嘉义等城市。国民党当局从大陆调来大批军警、特务，对起义群众进行镇压。3月14日起义失败。二二八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作为全国人民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它有力地显示了台湾人民的革命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

      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并于1945年建立革命政府。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派出代表团同三区革命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并于1946年1月初签订11项和平条款。但是，它很快就推翻和平条款，加紧镇压新疆人民革命运动。新疆各族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斗争。

      1947年初，内蒙古东部大部和中部部分地区获得解放。中共中央提岀“内蒙成立统一的民族自治政府问题”，强调“内蒙自治政府非独立政府，它承认内蒙民族自治区仍属中国版图，并愿为中国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之一部分”。同年4月，在乌兰浩特举行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等。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乌兰夫为主席。内蒙古人民的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人民民主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这些事实表明，不仅在军事战线上，而且在政治战线上，国民党政府都打了败仗。这个政府已经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指出：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准备建立新中国的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进行的。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一、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

      中国各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民主党派，少数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多数成立于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1947年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及其他国民党民主派酝酿成立联合组织，宋庆龄表示支持。同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第一次联合会议在香港召开。1948年1月1日，会议宣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民革中央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诞生。黄炎培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不久，改由张澜任主席。民盟由6个组织联合组成，它们是：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以及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为便于更多的民主人士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1945年12月，由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和与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发起在重庆成立。黄炎培、胡厥文等当选为常务理事。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1945年12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组成人员一部分是马叙伦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岀版工作者，另一部分是王绍鍪所联系的部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会务由马叙伦负责。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1928年，谭平山、章伯钧等酝酿成立中华革命党，并开始发展成员，开展活动。1930年8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宣告成立，邓演达当选为总干事（后被国民党当局杀害）。1935年11月，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1947年2月，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任主席。

      中国致公党。1925年10月，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成立致公党总部。1947年5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李济深为主席（对外未公开），陈其尤为副主席。

九三学社。1944年底以来，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经常在一起举行座谈会（一度称“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3日，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宣告正式成立。许德珩等当选为理事。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二二八起义失败后，为团结台湾各界人士坚持斗争，1947年8月，谢雪红等在香港酝酿成立政治组织。11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正式成立。

      中国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它们所联系和代表的不是单一阶级，而是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们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基础上的联合，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在它们的成员和领导骨干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少数共产党人。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主党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比较活跃。

      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政纲不尽相同，但都主张爱国、反对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在这些方面，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纲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它们从成立的时候起，大多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并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地发展了这种关系。

      在战后进行国共谈判和召开政协会议时，民主党派作为“第三方面”，主要是同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和平民主而奔走呼号的。它们为政协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还为维护政协协议进行过不懈的努力。在国民党当局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时，尽管参加民盟的青年党、民主社会党跟随国民党跑了，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大多数人，在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民大会”和虚假的“多党政府”以及反对国民党炮制的伪“宪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是同共产党站在一起的。它们还积极参加和支持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采取了积极的争取和团结的政策。

      无论是在举行国共谈判、召开政协会议期间，还是在解放战争的进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及时向各民主党派通报情况，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同他们进行协商，以便采取一致行动。中国共产党一贯鼓励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同时，又十分注意尊重和维护其应有的政治地位和合理的利益。对于他们的某些不妥当的意见，则善意地提出批评，诚恳地帮助其进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还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直接对他们进行工作。所有这些，都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奋斗，并在实践中不断进步，是各民主党派在这个时期表现的主要方面。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第三条道路的幻灭**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中国的民主党派并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正如周恩来所说，“其组织成分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而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由于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倾向，他们自身就不能不在克服某些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地求得进步和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某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曾经鼓吹“中间路线”。他们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这似乎为实行中间路线提供了千载一时的机会。周恩来在当时说过：“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

      中间路线的鼓吹者主张：在政治上，“必须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不准地主官僚资本家操纵；在经济上，“应当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但不容官僚买办资本横行。而实行的方法，则是走和平的改良的道路。他们所提倡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们所主张的，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道路。

      但是，中国在战后面临的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尖锐斗争。客观形势决定了人们没有走中间路线的余地。持有中间路线想法的人们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们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如前所述，青年党、民主社会党跟随国民党走了，民盟的大多数则是靠近共产党以至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党派的迫害国民党当局不仅极度仇视中国共产党，而且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也充满敌意。尽管民盟等一向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国民党当局还是不断以暴力对他们施行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遭暗杀之后，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民盟地方组织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屠杀，所办的多家报社也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年5月，国民党公布伪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公然诬蔑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组织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同年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在上海发表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

      新华社在为民盟被解散而发表的评论中说：“民主同盟是一个赤手空拳的组织，他们连‘一支枪也没有’，并且不打算有，他们的凭借是言论、出版，而这样的武器也早已被蒋介石没收了。”蒋介石不允许民盟这样的组织存在，这就“使在蒋介石统治下进行任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归于破灭”。

      民主党派历史上的转折点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解散民盟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明确宣告，民盟“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指出独立的中间路线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环境，是“行不通”的。民盟必须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集团、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人民的民主而奋斗。会议确认中国共产党“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表示“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站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来。

      与此同时，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宣布:“本会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自由、民主与和平。”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通过实际的教育，它公开表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其他民主党派也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国民党的反动政权陷入众叛亲离、彻底孤立的境地。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从当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接受中共中央邀请，分别从香港、上海、北平及海外，陆续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章伯钧等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意见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北平解放后，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在北平汇合。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于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恳切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个政治声明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自愿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同年春，毛泽东在同有关人士谈话时提出，民主党派应“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会议并将在新中国参政，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它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从此，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

      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正确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它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

**第四节  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一、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的阶段。

      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解放区面积达到235.5万平方公里、拥有1.68亿人口，并且基本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解放军的后方进一步巩固。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则由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其中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人，而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由于遭到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处境十分孤立。它在军事上不得不放弃“全面防御”而实行“重点防御”。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下，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援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辽沈战役自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1月2日结束，历时52天。东北野战军主力70万人在林彪、罗荣桓领导下，共歼敌47.2万人。淮海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6天。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以及地方武装共60万人，在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领导下，歼敌55.5万人。平津战役自1948年11月29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64天。人关作战的东北野战军、华北解放军主力与地方武装共100万人，在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的平津前线总前委领导下，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

      三大战役前后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154万余人，加上1948年7月至1949年1月期间在济南战役和其他战役中的损失，国民党军队共丧失兵力230余万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

      三大战役，无论是战争的规模还是取得的成果，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

      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企图借“和平谈判”之机争取喘息时间，布置长江防线，以便卷土重来。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分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谈判从4月1日开始。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长达1000多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一举摧毁国民党苦心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延续了22年之久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所部各路大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的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逃往中国台湾省。

**二、人民政协与《共同纲领》**

      为新中国绘制蓝图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了历史日程。

      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论述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体，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性。他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是不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新中国的政体，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他说，我们“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这套东西“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我们应当“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据此，他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胜利面前，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告诫全党，必须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不要在这种攻击面前打败仗。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做出不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等有关规定。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他把进北平比作“进京赶考”，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为了向全国人民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问题上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前夕，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指岀，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80%~90%。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他指出，我们还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

      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中共中央还进一步确认，中国同苏联国情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平等原则的实现。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向政协代表报告时指出：今天帝国主义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

      人民政协会议的召开与《共同纲领》的制定完成创建新中国的任务，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承担的。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共662人。

      新政协筹备会主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共同纲领》规定，在经济工作中，“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原则，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维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共同纲领》在当时是全国人民的大宪章，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备工作胜利完成。

      随后，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人民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

**三、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

      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了基本的胜利。

      中国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中国人民走上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伟大道路。

      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他们中间，涌现出了无数无畏的英雄和不屈的战士。随着斗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步向共产党靠拢，这种现象曾经被人称作是“开万国未有之奇”。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华侨等，都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伟大的爱国者宋庆龄、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国民党左派何香凝等，即使在最艰苦的年代，也始终坚持革命的立场，与共产党站在一起。邓演达、李公朴、闻一多等，还在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爱国侨领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也都先后成了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没有广大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参加和大力支持，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它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制定岀适合中国情况的、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中国人民的斗争指明正确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始终英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8年间，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无数的优秀战士。它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苏兆征、彭湃、陈延年、恽代英、赵世炎、张太雷等，许多杰岀的将领，如方志敏、刘志丹、黄公略、许继慎、韦拔群、赵博生、董振堂、段德昌、杨靖宇、左权、叶挺等，也都在这个斗争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人以行动表明了自己是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察民情并依靠群众的坚强的革命者，从而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所确认的客观真理。这一点，甚至也得到了来自国民党营垒的一些人士的肯定。1949年6月26日，留在北平的原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张治中在他所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中说：“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岀新的希望。”他说：“我以国民党党员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赢得胜利，同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毛泽东说过，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没有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斗争，堆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可能胜利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些国际友人还直接参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有的已经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它所提岀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曲折的斗争，逐步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毛泽东指岀：“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第一，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由于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严重压迫，在中国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是十分广泛的。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坚持和发展革命的政治基础。

      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有时还包括与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暂时的联盟。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辅助的，同时又是重要的。必须坚决依靠第一个联盟，争取建立和扩大第二个联盟。

      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关键，是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为此，必须率领同盟者向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必须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必须对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第二，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形式。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

      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和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的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才能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

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革命，必须建立一支在工人阶级政党绝对领导下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支军队必须实行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第三，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在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建设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密切地联系着党的政治路线进行的，注重在端正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中国共产党首先着重党的思想建设，要求党员用工人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培育和发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等。

      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毛泽东建党学说，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成为了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成为了全国各族人民拥戴的领导核心。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史道路时指岀：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

      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长期以来，官方与民间对海外华人人数的统计数字，存有巨大的歧异。有学者估计，全球海外华人高达3975万余人1；但也有以下不同的估算：2426万余人2；3402万余人3。其间的差额落差甚大。而国别的海外华人之统计数字，则更是纷呈杂沓，使人难以适从，以印尼为例，就有以下不同的数字：500万人4； 600万余人5；450万余人6；及1千万人7。

       海外华人统计的欠缺准确性，因素复杂，举其荤荤大者有以下数端：A. 除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欧、美、澳、日若干先进国家的较具精确统计外，其他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区都缺乏精确的统计。原来人口普查是项重大的课题，涉及庞大的人力、财力与物力，须作科学性的调查。而在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华人零星散布各地，穷乡僻壤，穷山恶水，无不有华人的足迹。尤其是20世纪8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放宽移民条例，华人移民偷渡浪潮汹涌澎湃，华人新移民无孔不入，流动性甚大，难以追踪，因而影响到调查的正确性。B. 海外华人居留境外，天长地久，已适应了海外的生活，把异乡视为家乡，并世代相传，已入籍当地成为居留国国民，有些人甚至不承认自己为华人。而近二三十年的新移民，也利用入籍之便，有利于谋生之道，毅然入籍。这些入籍的新旧移民，在各国人口普查中，是“本国国民”呢？还是“海外华人”？不同的标准，大大地影响到统计数字。C. 几百年来，海外华人先民与当地妇女结合，世代繁衍生息，这些混血后裔无论在语言、血统、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与形态上，已完全同化于当地，融入主流社会。各地具有华人血统的混血儿，都有不同的名称，人口普查的归类标准，也影响到海外华人人数的多寡。

海外华人之被称为“华侨”，大抵滥觞于19世纪80年代。随着革命浪潮的澎湃，尤其是邹容著作《革命军》的广泛流传，以及孙中山与其支持者的普遍使用，一时“华侨为革命之母”的呼声传遍各地，广大人民也以“华侨”自居，并引以自豪8。在此之前，中国的官方文献及民间著述，多以“唐人”、“汉人”、“华人”、“华民”、“华工”或“华商”等名称称呼海外华人。或有意更正确指出移民的地域性，多用“闽粤人”、“闽人”、“粤人”、“漳泉人”、“广府人”或“潮州人”等。“华侨”的原意是指短期侨居海外的中国人，终有一天落叶归根，回归故土，中国才是华侨的祖国。

       自推翻清朝帝制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加强内部组织，以巩固中国的统一，并增设中央党部海外部，积极笼络“华侨”的民心，取得一定的成效。

       战前的国民政府，对海外华人的国籍，一直奉行“血统主义”的原则，即“凡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不论他出生于何地，父母是何人，都是中国籍民。”国民政府尽量设法提高华侨的爱国意识，维系华侨对祖国的向心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适值日军侵华时期，华侨出钱出力，回国参军，抗敌救国，高度发挥了华侨的爱国精神。

       战后几十年来，“华侨”一词仍被国民政府所沿用。首先是自1949年国民政府溃败退守台湾后，困守孤岛，挣扎图存，并以此为基地，争取海外华人的支持，以图有朝一日“反攻大陆”。为了笼络华侨，积极推动（华）侨（事）务。直至今天，台湾国民政府仍奉行“血统主义”，把海外具有中国血统的人视为“华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萧规曹随，沿用旧有的华侨政策，本着血统主义的原则，视海外华人为中国籍民。不过这也给中国带来很多麻烦，“华侨”常被诬指为中国的“第五纵队”，制造纷乱与麻烦；也被指为盘剥者与寄生虫。为了缓和与邻国的种族矛盾，以突破外交上的孤立，中国政府毅然放弃了血统主义的原则，1955年与印尼政府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标志了中国政府国籍法的改弦易辙。在该政策下，中国政府鼓励居留地华人参与当地政治，成为当地籍民，今后不再是“华侨”身份，而改变为“华人”。倘若不愿加入居留地国籍，则保有中国国籍与侨民身份，须遵从当地法律。所以中国官方及民间学术人员，已经对“华侨”与“华人”作了明显的界定，所谓“华侨”，即指居住在海外、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华人”则是指入籍居留地，成为他国公民的中国人。不过尽管“华人”是指入籍居留地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但就其血缘及文化而言，仍然是倾向中华民族属性及中华传统文化9。

       以上的不同称谓，都是以“中国人”为核心，与“（外籍）华人”的身份并不完全吻合。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经过了长期繁衍与成长，其思维、价值观及国家认同等方面，与中国境内的中国人大相径庭。为进一步区别起见，官方文件及学术界又创立了“华裔”一词。“裔”是“后代”、“血统”，其涵义较明确，涵盖面也较“华人”广泛，一般上指入籍的华人，及第二、三、四代或更长远的华人移民后裔，他们是具有较淡薄、或完全没有中国意识的族群。所以我们说“华裔美国人”（Chinese American），即具有美国籍的华人；“华裔新加坡人”（Chinese Singaporean），即指拥有新加坡国籍的华人。他们与中国境内的中华民族不同，王赓武教授甚至说这些人是“不再认为自己是华人的华人后裔”10。此外也有用“华族”（Ethnic Chinese）来泛指“广大华人族群”的。构成“华族”的成员是出生于当地，加入居留地国籍，并全盘认同于居留国的华人。也有人给“华族”下了如下的定义：由保持华人意识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稳定群体，是当地族群之一，构成当地国家民族的组成部分。

       再谈谈“海外华人”一词的称谓。有人认为该词是以中国为核心，“海外华人”有依附中国而存在的寓意，与海外华人的身份与独立性不相吻合，似乎把海外华人边缘化，具有贬义，因此建议用“全球华人”或“世界华人”来取代，但这又使人联想到包括“中港台”的中国人，容易引起混淆。不过“海外华人”（Chinese Overseas）一词已被学者广泛采用，泛指中港台以外的华人。

 海外华人是个庞大而复杂的族群，他们在不同时期到全球各地移殖、定居，并世代繁衍下来。他们来自中国各省各县，口操各地区不同的方言，南腔北调，彼此不易沟通。他们受到传统思想的浸濡，尊崇儒道释的宗教信仰，祭拜关公、妈祖及地方神祇，并延续中国的传统习俗。不过由于经过数个世纪的繁衍，时移境迁，潜移默化，已经有不少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受到当地的同化，中华族群意识淡化，其中华文化的传统也日渐消失了。

       战后十余年间，中国与世界局势，都发生了风云激荡的剧变。在中国，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政府剑及履及，雷厉风行，推动了一连串翻天覆地的大改革：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跃进及人民公社运动，消急传来，是也非也，海外华人茫然不知所措，从而亦动摇了多年来“落叶归根”的意念。至于在海外华人的居留地，民族主义运动激昂澎湃，殖民地要求独立的呼声响彻云霄，争取自治独立。不幸的是，大多数主导独立国的政客，抱持着狭隘的种族主义思想，以土著利益至上，推动排华运动，企图从政治与经济上置华人于死地。在这危机四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华人挣扎求存之道，便是入籍居留地，成为当地公民，寻求法律保护的权益。入籍居留地的前提，便是华人须改变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观念，从认同于中国改变为认同于居留国。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掀起入籍的序幕以来，经过了数十年来奔走与波折，才完成了华人的心愿。

       华人的入籍居留国，在不同的国家，其境遇也不同。大抵而言，新马较顺利，大约50年代末即已解决。印尼与菲律宾则满途荆棘，由于官员的刁难，繁文缛节诸多麻烦，所以华人必须利用旁门左道，破财消灾，通过贿赂的手段，才能完成心愿。直至80年代，入籍问题基本上才迎刃而解。至于泰国华人之入籍，鉴于两族历史渊源的深厚以及长期以来的种族和谐相处，因此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中印半岛的国家如越南、柬埔寨、缅甸与寮国，到了80年代，也基本上解决了入籍间题。

       另一方面，不同的东南亚国家，其文化认同的程度不一。有些国家如新马，华人分别占了全部人口的76%与25%，族群意识强烈，所以维系了以华文为核心的文化认同。有些国家，华人人数虽多，但占整个人口的比例小，如印尼与菲律宾，长期以来受到执政者文化的摧残，华社与华教备受压制，以致华人同化程度较深，相对地中华文化日薄西山。不过近年来由于中国的崛起，影响所及，中华文化有绝处逢生、扭转乾坤的态势。

       另一类型的海外华人，则是完全同化的混血华人。经过了数百年来的异族通婚，生儿育女，语言相互吸纳，生活习俗融化，其后裔已被当地土著融化，血统上呈现大混合，在形貌上已与汉人大异其趣了。

       混血华人普遍存在于东南亚各国，在新马称为峇峇娘惹（Baba Nyonya），在印尼称为土生华人（Peranakan），在菲律宾称为中菲混血儿（Mestizo），在泰国称为洛真（Lukjin），在越南称为明乡（Minh Huong）。新马、印尼、菲律宾等地的混血华人，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与社会上，都高居重要地位。

       混血华人也普遍存在于南太平洋地区。如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大溪地与西萨摩亚，他们有的在经济上崭露头角，有的在政坛上出人头地，如新几内亚的陈仲民爵士，就曾经两度荣任总统。

       混血华人也散布在印度洋各岛及非洲，如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留尼汪岛及南非等地。至于南美洲的秘鲁、墨西哥、古巴、智利、洪都拉斯及巴西等国，也无不散布着混血华人的足迹，其人数之多，社区之广，较之其他发展中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公元前221 - 206年）、汉（公元前202 - 公元220 年）时期，中国人已通过海路与陆路，与中亚、东南亚及东北亚发生联系与交往。此后历经唐（618 - 907年）、宋（960 - 1127年）及元（1271 - 1368年）, 前往海外的中国人络绎不绝，他们大多是商贩与僧侣，也有官方使节。而中国沿海一带，也崛起了泉州与广州等国际商港，商船辐辏，万商云集，形成了一幅繁华的景象。明（1368一1644年）清（1644一1911年）之际，尽管官方明令海禁，禁止人民移民海外，但利之所在，移民海外的浪潮仍此起彼伏。有的从此定居海外，与当地妇女成婚，于是东南亚各地如巴达维亚、马六甲、旧港、北大年、宋卡、马尼拉及堤岸等地的华人社区先后出现。

       从鸦片战争（1840一1842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年间，除了短期问受到客观因素的遏制外，中国移民呈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其间更出现了波澜壮阔、空前未有的高潮。

       鸦片战争标志了丧权辱国的肇始，在西方帝国的侵略下，中国小农经济走向解体，农民失去了土地耕作，手工业者也大量破产，导致失业浪潮澎湃。民不聊生，横尸遍野，广大的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另谋出路。而另一方面，西方帝国也在19与20世纪的长期间，加深了对殖民地经济的拓殖与剥削。在东南亚，随着港口的兴建，城市的发展，交通的铺设，亟需中国劳工。在美洲、非洲及澳洲等西方殖民地，随着亚热带经济作物如香料、咖啡与甘蔗的种植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庄园经济日益扩大，对劳工需求迫切。于是，广大的中国移民，以自由民或契约劳工的身份，从中国城乡往世界各地去服劳役。

       百年间经历过高潮与低谷。20世纪20年代是移民的高潮，30年代却陷于低谷。兹以新加坡与印尼为例加以说明。自1922至1930年间，作为转口贸易站的新加坡，因胶锡市价看俏而受惠，工商业繁荣，经济蓬勃发展，城市建设扩展，亟需劳工；加上中国政局动荡，民心思动，所以南来移民倍增。1926年，登陆新加坡的中国移民高达34万8593人，翌年更创下了35万9262人的纪录11。印尼亦呈现移民激增的趋势。20世纪20年代，印尼的经济蓬勃发展，造成华人移民蜂拥而至，介于1920年与1930年间，高达42万4175人12。然而，到了 1930年，全球金融陷入萧条，经济急剧衰退，胶锡价格暴跌，工商业不振，失业浪潮澎湃，民生凋敝，饿殍遍野。这期间，新加坡与印尼等地的移民都呈现负面的增长。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初期，欧、美、加、澳等国废弃了战前的限制移民政策，大开方便之门，广纳各国移民，以致在三十多年间，涌现了几股华人移民大浪潮。首先是在50、60年代，香港新界的客家人，大批迁徙到英国去。在 1967年英国4万5千名华人中，有约3万人是从新界移居过来的。新界的移民及其后裔，嗣后又辗转流落到欧洲其他城市去。

       与此同时，在印尼掀起了另一股移民潮。1949年印尼宣布独立后，一批又一批华人（多数是土生华人）相继移居荷兰。1959至1968年间，印尼爆发了多次排华运动，许多华人惨遭杀害，财物被掠夺，房屋被焚毁，华人成了惊弓之鸟，纷纷向外逃亡，有的逃到欧、美、澳，有的逃到港台与新加坡，更多华人逃往荷兰去安身。

       自1975年越南赤化后，境内华人惨遭迫害，难以生存，南越华人被迫沦为“船民”，投奔怒海，很多“船民”不幸葬身鱼腹，沉冤海底。欧、美、澳、加等国家基于人道立场，予以接纳收留。美国收留的印支华籍移民，估计有30 万至40万人。澳洲接纳了约4万人，法国收留了7万至8万人，英国、加拿大、荷兰、德国及意大利等欧美国家，也接纳了成千上万的印支华裔难民。

       此外，亚洲国家（如新马、泰国、菲律宾）、拉丁美洲、大洋洲等地的华人移民及其后裔，也纷纷以留学生与移民身份，再移民到欧美先进国家去，造成欧美各国的新移民人数激增。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西两大集团对立，中国在外交上陷于孤立，政府也严禁华人出国。另一方面，与欧美站在同一阵线的国家，反共抗俄，禁止中国移民入境，也不许华人返国省亲，因此50与60年代出国的移民浪潮基本上是处于停滞状态。

       然而到了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风云激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中国政府开始放宽出国条例。而随着中国的进入联合国，中美的僵局开始解冻，东南亚国家也纷纷与中国建交，打开移民大门。这期间出境的移民，大抵是以“家庭团聚”为由出境的，人数虽不多，但已开始涌动出国潮。1982年4 月，中国政府更宣布给予归侨、侨眷出境探亲特殊照顾，规定“只要对方不限制，我方应尽快批准”。而欧美国家也基于人道主义，并视移民出国是意识形态的胜利，因此国人多被批准出国。

       80年代以后迄今，中国移民又呈现了另一高潮，他们一批又一批涌向西方发达国家。他们有些是公费或自费的留学生，有的是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但更多的是农村及乡镇的群众，他们知识水平低下，又无一技之长，因此“要致富，就偷渡”，冒着生命的危险，受尽人蛇集团的盘剥，酿成了多少人间悲剧。此外，大批来自港台、东南亚及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也纷纷向西方发达国家进军。据美国世界移民报告估计，每年移往外国的中国移民超过40万人，其中美国、加拿大、欧洲及澳洲等发达国家是新移民的首选地；而南美、南太平洋国家则是转向发达国家的中转站。另据福建科学院的调查，1980至1999年间，大陆新移民由正常途径移居外国的超过100万人，其中移往美国、西欧、澳洲和日本的有90多万人。目前大陆新移民约为300万人，加上非法移民，估计人数已超过400万人。

       经过战后几十年新移民轮番大洗牌之后，原先华人的分布状况与各大洲华人所占比例与增长率也跟着发生了变化，倘若比较20世纪50年代与2005年两个不同的阶段，各大洲所占比例的变化如下：亚洲从96.45%滑落至78.7%；美洲从2.12%跃升至14.4%；欧洲从0.31%骤升至4.1%；大洋洲从0.81%晋升至1.7%；非洲则从0.31%晋升至0.39%。又根据一项统计显示，1980年代各大洲增长率如下：亚洲2.4%、美洲8.0%、欧洲3.2%、大洋洲8.5%及非洲2.1%。

  亚洲是海外华人最多的地区，总人口超过3000万。仅仅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就占了全亚洲华人总人口的90%以上，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菲律宾和越南的华人人口皆超过百万。

        最早定居在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大抵滥觞于15世纪初年。那时，在马来半岛、印尼群岛及印度支那的商港，已有闽粤移民建立起来的聚落，只是规模不大，聚落人数从数百人至数千人不等。华人大规模迁徙到东南亚，始于19世纪下半叶鸦片战争结束之后，鸦片战争标志了华人移民的分水岭。

        早期华人移民多来自广东省及福建省。广东省包括广府人、潮州人、客家人与海南人，福建省主要是漳州、泉州及厦门人。他们有的以自由移民的身份出国，凭着刻苦耐劳及坚韧不拔的精神，赤手空拳，闯出一片天；也有的以契约劳工（卖猪仔）的身份应聘而来，从事开荒拓土、修路开矿的工作，流血流汗，把榛莽丛林化为绿油油的农园。

        华人移民埋头苦干，克勤克俭，经营各行各业，创造财富。华人的经济活动，以商业为主，商业资本最为雄厚，也以经商的业绩最为辉煌。嗣后，华人资本家又把企业扩大到工业、种植业、建筑业、地产业、服务业与金融业等等。随着时日的推移，华人开始具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大大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大约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东南亚各国更冒起了不少华人企业财团，它们以雄厚的财力，展开跨国与多元化的业务，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如马来西亚的郭氏家族、印尼的三林集团及菲律宾的陈永栽家族等等，都是赫赫有名的华人企业集团。

        在战前，除了土生土长的华人外，绝大多数的中国移民都以中国国民自居，期盼有朝一日，便落叶归根，回归故国。但战后时移势迁，归国无期，华人不得不改变身份，代之以落地生根的观念。改变国家认同的思维，归化为当地公民。时至今日，大部分华人均已入籍，与当地人共存共荣。

        过去的华人“在商言商”，不过问政治。但战后以来，为了适应时势变迁，华人不得不参政议政。至于曾经盛极一时的华校、华团及华报，在某些国家里，一度被禁止和封闭。不过自中国崛起，尤其是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批中国移民涌入全球各地，亚洲的形势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华社注入了一股新生的力量，似乎有春回大地的迹象。

        在东南亚以外的亚洲国家，定居华人人数相对较少。除了日本有70余万华人以外，其他地区如南亚、西亚与中亚，在上世纪70年代前，只有零零落落的华人。70年代以后，港台、中国大陆掀起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情势才大大改观

新加坡

新加坡坐落在赤道边缘，平均海拔不到15公尺。这个集国家、首都、城市于一体的袖珍型岛国，得到上天格外的眷顾，不受火山、地震、海啸与飓风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它处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十字路口，为连接亚洲、大洋洲、欧洲和非洲的交通咽喉。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登陆占领后，锐意把新加坡发展为转口贸易站。由于它地理位置优越，水深港阔，适合船只的停泊及货物的搬运，加上后来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使远近各国商人蜂拥而来经商。

       1959年新加坡举行新宪制下议会大选，人民行动党以压倒性的姿态胜出，土生华人李光耀荣任自治邦总理。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成员包括马来亚、新加坡、砂拉越与沙巴。然而，因为政治理念的分歧，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之初，缺乏天然资源的新加坡政府面临难题重重，前途茫茫。原本已高达14％的失业率，在1971年英军撤退之后更为严重，如何养活200万人民，成了政府最头痛的问题。

       此外，错综复杂的种族问题也是国家发展的绊脚石。那时，新加坡各族之间的猜疑频生，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亦出现紧张的局面。同时面临内忧外患，新加坡政府当时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幸得李光耀等的精英领袖们运用过人的睿智，实施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加上全民同心，最终才化险为夷，迈向成功的大道。

       如今，华人与各族之间互相信任，和睦共处。经过举国上下40多年来的努力建设，终于成功将新加坡打造成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社会井然、民生安乐的典范国家，并先后被权威机构评选为亚洲地区最具竞争力，生活素质最高、犯罪率最低、及最适宜居住、工作和休闲的国家。占新加坡全国总人口超过四分之三的华人，也安享着这个花园城市的安逸与舒适。

* *新加坡是梵语“狮子”的谐音。据《马来纪年》记述，1150年左右，苏门答腊室利佛逝王国的一位王子乘船到此时，看见一头狮子，于是称之为“Singa（狮子）pura（城），后来也把它简作为“星洲”或“星岛”。*

   新加坡华人有积极向上、坚韧不拔的特性，他们所面对的压力越大，就越能发挥扭转乾坤的魄力，并且具有放眼世界的远大视野。新加坡的发展过程，同时亦是华人苦尽甘来的血泪史。

       早在14世纪中期，已有福建泉州人来到这里经商。元朝商人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一书中，将新加坡称为“淡马锡”（Temasek，马来语 “海城”之意），这个源自梵文Tamarasa的词，意即“黄金”，仿佛预告了新加坡将来势必欣欣向荣的前景。

       1819年，莱佛士乘船在新加坡河口一带盘桓，试图在印度与中国之间寻找并建立一个贸易站。独具慧眼的莱佛士，看准了当时还是沼泽地的新加坡有巨大的发展潜能，于是从柔佛统治者手里租下这片土地。 1824年，新加坡正式成为英属殖民地，并因地理优势而成为英国海峡殖民地（包括新加坡、马六甲与当年称为槟榔屿的槟城）的行政中心。

       莱佛士在这里设立贸易站的消息一经传出，便有华人移民从四面八方接踵而来。最早到达的华人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来自马六甲、槟城的海峡华人，男性称峇峇、女性则叫娘惹。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发展得非常成功，成为海峡华人中的商业巨擎，例如薛佛记、陈笃生、陈金声等人。而另一批受过英文教育的海峡华人，则成为专业人士，为殖民政府所用，是海峡华人社会中较有地位的一群，著名的有林文庆、宋旺相等人。第二类是来自邻近的马来半岛及印尼群岛的华人，他们企图到此闯出一片天。第三类则是来自中国广东和福建沿海一带，也是华人移民最大的群体。1821 年，第一艘载满自由移民及契约华工的帆船从厦门开抵新加坡，自此以后，登陆新加坡的华人移民源源不绝。

       在这一批远洋南来的华人移民中，以福建人居多，其他的是潮州人、广府人、客家人与海南人。殖民地政府把他们安置在不同的社区，如福建人聚集在直落亚逸 （Telok Ayer）和厦门街（Amoy Street）；潮州人在新加坡河畔；客家人在克罗士街 （Cross Street）落脚；广府人则聚集在现今已发展为唐人街旅游区的牛车水一带。

       直至鸦片战争（1840至1842年）之前，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可谓细水长流，逐年增加。1840年，岛上的华人已有约1万7千人，占了总人口的一半，成为最大的族群。但自鸦片战争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百年间，除了经济萧条或其他特殊原因外，掀起的一波波华人移民浪潮，其波澜之壮阔令人瞩目。尤其是1926年及1927 年，移民浪潮达致顶峰，每年入境的华人高达35万人。

从早期新加坡华人家庭的留影中，已经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融合，男性身穿西服，其妻则穿着传统服装。

20世纪40年代，由中华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所发出的“华侨登记证”。

       从华南来的移民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由移民，另一类是契约华工，亦称“苦力”或“猪仔”。自由移民是指那些自备旅费南来的移民，登陆新加坡后，对任何人都没有义务，行动自由，有权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是构成移民的主体。

       而契约华工，则是指那些来自农村的贫农或城市失业的贫民，受人利诱拐骗而来，如猪仔般被贩卖到农园或矿地工作，受尽折磨。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1845年到1875年之间，是苦力贸易的鼎盛时期，新加坡成了著名的苦力贸易中心，牛车水一带“猪仔馆”林立。

       早期，不同籍贯的华人有着不同的职业分野。福建人、潮州人多数经商务农，同时又在银行、橡胶业有所建树；广府人擅长木工、水泥工、矿工、造船、经营酒楼及杂货店；客家人则多是裁缝、鞋匠、铁匠；海南人先是从事农业，之后多为洋人包办伙食，或在洋人家庭里帮佣，他们多数对经营咖啡店颇有心得，海南咖啡更是远近驰名。来自广东三水,刻苦坚强的“红头巾”妇女是牛车水当年建筑业的主要劳工。她们头戴红头巾、身穿篮色碎花衣服及黑色裤子，出现在早期新加坡的许多建筑地盘里。南洋大学、文华大酒店及中国银行等宏伟建筑物，都沾染了她们辛勤劳动的汗水。“红头巾”三水妇女为新加坡的建筑发展付出了不少的血汗，闹市中立有她们的塑像。

       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超凡卓越的智慧，是华人能够在新加坡站稳脚跟的主要因素。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他们开始涉足橡胶、罐头加工、肥皂制造等轻工业及金融业。此后，华人的经济发展日趋完善，百花齐放。

       二战期间，新加坡曾被日本占领，华社遭到巨大的冲击，数以万计的华人被无辜杀害。战后，英殖民政府恢复了对新加坡的统治，实施严格限制移民入境的政策，移民活动宣告结束。不过，由于自然增长率所使然，新加坡华人在战后的十年依然激增，直至 1957年，增加了37万人，其中约30万人是当地出生的。

       新加坡建国后，政府深知人才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于是积极招揽精英。随着中国大大放宽人民出境的限制，及在1990年正式与新加坡建交后，大批中国新移民才陆续移居新加坡。这些来自中国的商人、科研专才、知识分子、留学生及劳工，成了新加坡华人的一分子，与土生土长的华人共同为社会作出了不少贡献。

*19世纪的华人移民以男性占大多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到了20世纪初期，新加坡的华人女性移民才逐渐增多。尤其是在1930年至1934年的经济大萧条期间，政府实施移民限制法令，严禁男性入境，妇孺则不受限制，于是女性移民激增，才使新加坡华人男女比例的差距日益缩小。*

      在那段凄风苦雨的华工移民浪潮期间，华人的祖辈们受尽了皮肉之苦，饱尝了精神折磨，为的仅是能过上安逸的日子，求得足以温饱的生活。

       他们或许曾梦想过，将来有这么一天，一个安逸而富足的福地会出现，并渴望自己有幸在这样的一个人间乐土上快乐地过活。他们万万没想到，当年自己不屈不饶的努力，造就了这个梦想——新加坡，一片大家打造出来的福地真的出现了。

       今日的新加坡，一般人民都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粮仓囤积了充足的米粮；每一天，都有形形色色的蔬菜水果从各国源源输入；超过80% 的国民都“居者有其屋”；交通系统四通八达，各类的公共交通工具更是日夜不停地川流不息；摩天大厦林立，展现了动感之都的魅力；全岛的绿化更让新加坡成为姹紫嫣红的花园城市国家。

       在此处，衣食住行样样都方便，这不就是我们的祖辈们，当年只有在梦里才敢想象的世外桃源吗？

       新加坡是两岸三地以外，世上唯一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在占全国总人口超过75％的华人人数当中，福建人约占40%；潮州人约20%；广府人近20%；客家人则不足一成。作为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虽然华人在人口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但无论在任何领域，每个种族都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华人依然在没有特权的情况下与其他族群公平竞争。

       尽管当年如猪仔般被卖到全球各地当劳工时，华人曾是受尽欺压凌虐的一群，但今日的新加坡华人，在努力打造了全球公认的安居乐业之地后，与他族共享这个人人向往的理想家园，为世人树立了一个宽容的好榜样。

牛车水的马来名称是“Kreta Ayer”（此乃古时的拼字法，若依现今的规范马来文则应写作“KeretaAir”）,意为水车早年的新加坡没有自来水供应，人们只好用牛车把安祥山（Ann Siang Hill）的井水运载到住在这里的各家各户，故华人惯称此区为“牛车水”。另一种说法则是，为了冲洗尘土飞扬的街道，当地居民每天都用牛车从远处把水运来，故得此名。如今，牛车水的老房子和金融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展示着新加坡的过去与未来。华人是新加坡经济的火车头，活跃于各个领域，也乐于和其他族群共同努力把国家经济一再推向高峰。

       独立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茁壮，新加坡华人的资本紧依政府经济策略的调整，从传统行业转向新兴科技工业。1968年新加坡成为全球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之后，华人的金融服务业更是突飞猛进，全速发展。旅游业则是华人多元经济领域的另一重要支柱。新加坡华人从事的职业无所不包，从祖辈的传统生意，到新兴工业都有华人经营。

       由于出色的经济发展，新加坡涌现大批财力雄厚的华人财团和富商，在世界富豪排行榜当中，新加坡华商至少有十位入榜，其中包括远东集团的创办人黄廷方、大华银行的总裁黄祖耀、城市发展的执行主席郭令明、银行界的翘楚邱德拔家族、华侨银行的前主席李成伟等，都是闻名的杰出华人。不少长袖善舞的华人企业家更进军海外，建立了家喻户晓的国际品牌。新加坡华资企业成功转型，也引领着更多年轻华裔创业家，从新加坡境内走向国际。

       新加坡有许多已属百年基业的华人企业，品牌深入民心，如“余仁生”传统保健品、“广祥泰”调味品、“美珍香”食品等，不仅长期占领国内市场，还成为知名的国际品牌。20世纪后期的高科技产业也羽翼丰满，纷纷在国外建立据点。如今，由华人经营的优质品牌在国外设立多家分店的新闻已是司空见惯。

       在多家华资银行当中，以大华银行和华侨银行的资本最雄厚，除了在新加坡国内有上百家分行外，其业务已扩展到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此外，近年来新加坡的中资企业已有2000家左右，是海外中资最为集中的地区。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也纷纷进驻新加坡，并在此挂牌上市。

       除了在商界发展，也有新加坡华人选择加入政府机构当公仆，为民服务。与其他国家的华人相比，这里有较多的华裔青年投身警、军界，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此外，在新加坡的华人专业人士也不少，包括医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等，齐心协力地为这个发展一日千里的国家付出，同时也为他们本身带来了美满富足的生活。

  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政府，其行政管理向来举世瞩目。政策对症下药，效率协调统一，也继承了中国古代“父母官”的作风，对国民的照顾就像父母待子女般，不分种族，从住房、医疗、水电补贴；到结婚、生育、养老各方面，凡事考虑周到。政府甚至细心地为人民充当红娘，设立专门替未婚男女介绍理想结婚对象的官方机构。生活在这里的华人，可谓受到无微不至的呵护。

       新加坡华人奉公守法也是举世闻名的。绿灯未亮，哪怕路上无车行驶，华人还是不会越过雷池半步；排队守序也是新加坡华人自小养成的好习惯。用餐时分，生活节奏快速的华人停下急促的脚步，耐心地排队等候入座。在文明修养方面，为世界华人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这里是个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多元的移民社会，“家和万事兴”，华人深知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促进族群融洽的重要性，从不因是第一大族群而恃势凌人。

       大多数新加坡人对政治不热衷，并非出于不关心，而是因为政府家长式的管理，早已为人民打点好一切，人民根本毋需为衣食住行等等的烦恼而操心，只需尽情享受生活。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取得今日的成就，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就是首任总理李光耀及他的优秀团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多少国家的执政者难以实现的“居者有其屋”理想，新加坡却做到了。这里逾80％的人民居住在政府组屋内，这是一种由政府投资兴建、价格大众化而设施完善的单元楼房。

       许多新加坡华人家庭都对组屋充满独特的情感。这种与熟食中心、各类店铺、诊所等连成一片的独特住宅区，有着外表看来朴实无华的房子，里面却宽敞舒适，楼房有两房、三房、四房及五房式，是不少华裔子弟诞生、成长和养老的地方。

       在“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下，政府极力发展组屋区，打破了早期的新加坡华人依籍贯聚居在不同地区的格局，把各种族、籍贯的人民安置在同一个屋檐下。政府还为选择居住在父母家附近的子女提供购屋津贴，鼓励子女发扬孝敬父母的优良传统。

       华人与各族人民在组屋区可享有优渥的福利和完善的社区设施，游乐场、托儿所、菜市场、小贩中心、休闲公园等设备一应俱全，且环境优美、鸟语花香。他们甚至可在组屋底层举办婚礼、丧礼或烧烤会。另外，同一个社区内的组屋之间都由有盖走廊连在一起，大部分还会连接到巴士站，让大家在出门或步行到巴士站时，不必日晒雨淋，非常贴心。

       不仅如此，组屋的底层还辟有“学习角落”（Study Corner），为那些喜欢清静读书的人提供了好去处。每个学习角落都有十来张桌椅，可以容纳二三十人。有的是供单人使用的桌椅，有的是两张桌椅连在一起，让一个小组的成员进行讨论。此外，学习角落还提供了电风扇、公共电源插座等设备，十分方便。

       在组屋的公园区内，还备有各型各类的简单运动器材和娱乐设施，有些范围较大的社区，甚至还有四五个不同球类的球场，力图让人们住得舒适、活得健康。难怪有些华人其实已经有能力住在高级公寓或独立洋房，却情愿与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住宅区“长相厮守”。

       然而，还是有一部分较注重隐私，又不介意多付一些生活费的华人，选择住在私人公寓。这是一种由私人发展商兴建、入口处有门卫把守的高层楼房；较为富裕的家庭，则住在独家独院的房屋。

       新加坡土地资源有限，却保留了52公顷的土地建设植物园，甚至在高楼组屋或商场顶楼也建有美丽的空中花园。这里葱笼苍翠，赢得了 “花园城市”的美誉。

       无需被混乱的交通状况弄砸一整天的心情，也是新加坡华人所拥有的幸福。这里的各类公共交通设施完善，快捷方便。华人经常挂在嘴边的“MRT”，就是新加坡地铁的英文简称，如今所设立的路线几乎遍布全岛，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的巴士往往准时抵达巴士站，误点几率超低；日夜川流不息的德士也提供了24小时的服务，即使没有私家车，华人出外也不会有任何不便。

       想要拥有汽车的华人，最关注的课题莫过于“拥车证”，这是根据每年淘汰车辆的数量所发放的证件，让有意购车者竞标，中标者才可购买汽车。华人时刻关注拥车证的价格，情况就如香港人每晚打开电视留意楼盘价格那般“紧张”。这些车主平日的话题也避不开俗称“ERP”的“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即为了控制车流量而在闹市设立的先进电子收费区。这两项措施让人口密集的新加坡，并没有其他大城市交通拥挤的烦恼。

       此外，华人缴付水电费、电话费以及其他杂费，完全不必赶在上班时间与他人挤在一块儿，因为全岛都有随时可办理付费手续的先进设备，就连租借电影光碟、购买邮票，也不必劳驾任何店员，即使是三更半夜也没有问题。新加坡华人的钱包内，多数也不会少了乘搭地铁所需的“易通卡”，定期给这种亦可在某些商店当作现金卡使用的小卡片加额，也成了本地人生活的一部分。

    能够生活在“亚洲美食天堂”，对民以食为天的头号拥护者新加坡华人而言，是一桩幸福美事。好些新加坡华人或不精通向旅客介绍当地的旅游景点，但是一谈及美食，肯定会忍不住说个不停，如数家珍。中文媒体也一直热衷于推广各项“美食运动”，几乎每份中文报章都缺不了美食专栏。

       这里汇集了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和欧洲的多种美食，各类菜系相互交织渗透，并且日益“新加坡化”，是岛国多元文化另一层面的真实写照。

       具有代表性的新加坡华人美食多不胜数，海南鸡饭、肉骨茶、粿汁、叻沙、鲜蛤炒粿条、蚝煎、福建炒虾面、沙爹米粉、炒萝卜糕、卤面、鱼丸面等，全部都远近驰名。新加坡四面环海，华人品尝海鲜的热衷程度自然是不在话下。海鲜的种类和吃法很多，如胡椒螃蟹、辣椒螃蟹、碳烤魔鬼鱼、醉虾、烧烤虎虾、奶油虾、龙虾沙西米、清蒸石斑鱼、铁板生蚝以及各种各样的贝类，其中辣椒螃蟹这道佳肴，更是华人向外国人推荐狮城特色美食的头号首选。

       此外，充满地方色彩、南洋风情的各式甜点也是独树一帜的消暑良品，如红豆冰、杂果冰、仙草荔枝冰、海底椰、文头雪、蜜瓜西米露、摩摩喳喳、红宝石，以及结合了本地特产的水果如榴莲、红毛丹、红毛榴莲的许多新旧口味甜品，都深受大家喜爱。

       与马来和印度同胞相处了好几代，华人也十分喜爱融合马来或印度风味的辣食，如咖哩鱼头、亚三叻沙等；一些娘惹佳肴及娘惹糕点——多数由椰浆、班兰叶、糯米、糖等食材制成的美食，五颜六色、小巧玲珑、风味独特。同时，各籍贯的华人也热衷将家乡小食进行改良，综合新加坡风味并发扬光大，成为新加坡的独创美食，如潮州人的水粿、客家人的酿豆腐等。

       新移民也带来了各自家乡的美食。如今，川菜、北方菜、湖南菜、台湾菜或上海小吃餐馆，如雨后春笋遍布各个角落，令新加坡华人拥有更多选择，大饱口福。

       有人说新加坡华人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这一点都不夸张。餐饮业在这富而小的岛国里发展蓬勃，除了餐馆，还有无处不见的熟食中心。无论是在观光区、办公区、工厂区、购物中心、社区中心或地铁站附近，华人都可轻易找到熟食中心，品尝不同风味而又价格廉宜的佳肴。因此，熟食中心里往往都可看见人头涌动的华人食客。身在富裕的社会里，进食对华人来说已不仅是为了充饥，而是一种生活的乐趣。

       碰上美食节，他们更是举家出动，热闹欢腾，常让外国人体验到新加坡人热爱美食的盛况。除此之外，常年轮流上阵的电器展、科技展、书展和旅游展，也是人山人海，热络不绝的华人往往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新加坡华人家庭的周末，永远不寂寞。

       购物、旅游，都是新加坡华人主要的消遣活动。新加坡华人消费能力高，每逢周末或假日，无论是售卖日常用品的商店或是名牌专卖店，都是人潮汹涌。如果碰上大型促销活动，更会出现全家总动员疯狂抢购的画面，因此有人打趣地把购物形容为新加坡华人的全国性运动项目。

       而华人人龙出现得最为频密的另一个地点就是投注站。生活在平静安逸的国度里，合法的赌博活动成了许多华人小市民喜爱的消遣。大彩、多多和万字票投注站无所不在，超市或便利店内也可见其踪影。在一些投注站，许多华人风雨不改地在固定时段排队下注。“小赌怡情”——许多新加坡华人的座右铭。他们盼望通过这小小的投资，使自己成为百万富翁的梦想早日成真。每逢周末，新加坡克兰芝赛马场也非常热闹，当然少不了华人的身影。

       新加坡华人很喜欢出国旅游，到外面去感受更广阔的天地。隔岸的马来西亚成了他们的主要选择之一，只要越过一条新柔长堤就可以到彼岸，尽情享受消费较低的吃喝玩乐及购物之旅。这里的旅行社也备有许多两、三日出国游的配套，让他们在无后顾之忧下享受出国游玩的乐趣。

       平日勤奋工作的新加坡华人很懂得慰劳自己，就算没时间出国，他们也会到东海岸或附近的岛屿，租间度假屋或搭上帐篷，游泳、滑水、烤肉，不亦乐乎。再不就三五成群到克拉码头（Clarke Quay）的酒吧一边观赏足球联赛电视直播一边聊天、去舞厅跳舞松松筋骨、结伴高唱卡拉OK，或到新加坡的旅游景点去消磨时光。

       新加坡华人与全球华人一样，对教育十分重视，更何况这里是竞争激烈的国际大都会，教育可谓是他们的人生大事。经济能力许可的华人家庭，送孩子出国深造是平常不过的事情。

       在这里，多数华人都懂得至少三种语言。早期的华人是以地方语言如福建话、潮州话、广府话、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兴化话或广西话为主，通马来语，初通华语，及少许的英语；现代的华人则方言、华语皆通，并懂得说英语。不只通一种方言者也大有人在，若是父母分属不同的籍贯，邻居或朋友又属另一方言群体，相互交流的日子久了，自然就懂得对方的方言。

       新加坡政府把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和英语并列为官方语文，但鉴于英语的国际地位及作为各族群消除语言隔阂的共同语，而给予高度重视，是所有学生必学的语言。同时，政府也注重母语教育，培育双语精英。许多国际名流选择把孩子送到新加坡来求学，正是看中了这里可以很好地掌握双语的学习环境。

       教育工作者洪丽环说道：“这里一般的学校从幼稚园到中学，都备有华文这一科目任华人选读，除非你放弃母语课，否则，是没有所谓华人在学校无法学习华文这回事的。”

       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有人讲华语的环境中，就算是平常较喜欢以英语来沟通的年轻华人，还是能说得上一口流利的华语。随着许多中国新移民的到来，华语更成了大街小巷最为普遍听到的日常用语。近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备受世人重视，因此把华语学好已成了新加坡华人的全民运动。政府也相当支持这类运动，鼓励大家多讲华语的电视广告片段、四处张贴的相关宣传海报从来没有间断过。

       尽管这里严禁学校或媒体使用方言，如把香港的粤语或台湾的闽南语电视节目和电影经过规范的华语配音后才可播放，但新加坡年轻华人依然能够向主要的方言使用群——他们的长辈讨教学习。香港和台湾流行文化的盛行，也间接有助于新一代掌握广府话及福建话。

       对于中华文化，老一代的华人都很珍惜。新生代尽管也不乏热爱中华文化者，但毕竟受西式教育的影响，难免还是有些洋化了。新加坡著名的文化人韩山元分析说：“大体而言，新加坡华人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受传统华文教育者，这都是一些老人，属于稀有品种；第二类是边缘人，他们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左右逢源。现今的大多数年轻人即属此类别，他们既懂中文，又通晓英文，具有很大的优势；第三类则是彻底洋化的华人，极其推崇西方文化，但这种华人还是属于少数。”

       现实生活中，在新加坡的任何一个角落，招牌、路标和广告上依然可以看到熟悉的方块字；在街头巷尾仍然能够听到亲切的华语。虽然英语成了主要的工作语言和官方用语，但是华语依然是最多新加坡华人使用的日常语言。然而，华人在各种社交场合还是体现出对其他种族的包容。只要有一名友族同胞在场，大家都会很自然地用英语来沟通，真正贯彻了社会大同、民族和谐的宗旨。

 很多人或许会认为新一代新加坡华人的生活过得舒适安逸，有高科技玩物伴随着他们成长，又不必为柴米油盐操心，必定觉得自己很幸福。其实，他们也有充满压力的一面，忙碌的学习生活构成了许多无形的压力，密密麻麻的时间表，不断催促着孩子们“赶场”。

       根据统计，约96％的新加坡孩子有参加各类的课外补习班。补习中心的布条、传单及广告满街招摇，招生广告日日见报，以致有人戏称“补习补习，不补没出息。”来形容这个状况。

       对新加坡华人家庭来说，课业补习不过是一顿孩子必进的“正餐”，许多华人家长还会为孩子提供学习绘画、音乐、舞蹈、书法、中国画、手工艺品等的“营养补助”，欲培养孩子成能文能武的国家栋梁。

       这群新华人身在可轻易购得新颖科技产品的大都会，加上处于资讯发达的年代，所以在勤读书、忙工作之余，也会把时间花在打电动、用时髦的随身听聆赏音乐，以多功能的智慧型手机与朋友上网聊天等等；有表演天分的则积极参加各项艺能竞赛，以期踏上明日之星的康庄大道。

       此外，许多华裔青年也活跃于义工活动、服务社会、或献身文化事业；各类大型的活动，不论是严肃的庆典，还是文化艺术表演的场合，他们都会帮忙维持秩序。双十年华的方洋，就是其中一名经常为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等单位服务的在籍女学生。她表示：“申请担任义工的过程很简单，只要到各主办单位的网站去浏览，哪些你感兴趣的活动有空缺，就在网上填写申请表格，非常便捷。虽然这类工作都是无薪性质的，但我们其实都只是志在参与，为能够替人文活动贡献一份力量而得到满足感、同时又结交不少朋友，这一些收获才是当义工真正的吸引力。”她的古道热肠，也证实了新加坡的年轻人并非都是只懂得追求物质享受的“月光族”。

       在专门提供给大众进行活动的广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一大群活力十足的华人子弟正在练习相声、舞蹈、演讲、舞台剧等。总体而言，新加坡的华人青年都是上进心很强的一群，无论在知识的追求与学习，或是创意的发挥，都能见识到他们的积极。街头上三五成群手提划桨等体育用具或大提琴等乐器的华人青年，兴致勃勃地赶往练习场的画面随处可见。

       老一辈华人，有些清早5点多就起身，邀约数名同好到小贩中心的食阁，叫上一杯香浓的热饮，聊一聊每日的新鲜见闻、或讲述过去的美好回忆，一聊就过了一个多小时。这时，俗称“巴刹”的菜市场内，各类摊档的叫卖声开始此起彼落，渐渐热闹了起来，老人们才言犹未尽地道别，前去巴刹采购当天所需，为上班的儿女准备餐点；有的还相约共饮下午茶，继续天南地北地享受聊天的乐趣。

       也有许多乐龄人士一早便到社区中心、公园或球场练习健身操，扇子舞、太极，甚至舞刀弄枪。清晨时分，他们动作划一地在齐心健身的壮观场面，朝气蓬勃，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新加坡华人在这里生活都深感有安全感，这不单是指人身安全方面，也包括心灵上的安全感。已经60开外的乐龄妇女林爱华坦言，身在新加坡，纵然年纪渐大却不会有感自己的晚年没有保障。“尤其让我欣赏的是，政府为选择住在父母家附近的子女提供购屋津贴，鼓励他们发扬孝顺父母的传统美德，令我们感到十分温暖。这里也有很多照顾老人的措施是很多国家所没有的。在新加坡，年老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语毕，林爱华还露出满足的笑容。

       这里几乎每个社区都设有“老年人活动中心”，里面有各类的娱乐设施，电视机、收音机、游戏牌、象棋、报刊杂志，更少不了爱唱歌的乐龄人士最需要的卡拉OK设备，应有尽有。一些社区甚至还有按摩椅，组屋旁则有公众使用的各类健身设备，适合给乐龄人士们锻炼身体。他们闲来无事，便相约到这里来聊聊天、打打牌，唱唱歌，乐不可支。也有一些身体比较健壮的乐龄人士到小贩中心、快餐店或购物商场从事一些能力所及的工作，有时不是为了生计，而是为了消磨时间，或不想与整个社会脱节、或希望能够自力更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

    通晓中英语是新加坡华人立足世界舞台的重要筹码，这优势促使新加坡成为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国际走廊，无数的文化活动或节日庆典也让新加坡绽放绚丽的光彩。至于华人传统文化与节庆，老一代的华人珍惜如昔，也保留得周全。

       为了鼓励年轻一代更为热衷了解各节庆的真正意义，新加坡华人民间组织和政府机构近年来积极推广各类华族文化庆典，并加入一些新加坡独有的本土元素，以期华族的传统文化与节庆得以传承下去。新加坡华人最为重视的节庆，就是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和中秋节。他们至今还保留着除夕夜吃团圆饭、派红包、穿着红彤彤的新装去拜年、舞龙舞狮等习俗。

       春节来临之际，新加坡可说是满城洋溢着浓厚无比的新春气息。每年元旦刚过，新加坡华人就开始置办年货，买新衣服。春节前家家户户进行大扫除，有些比较传统的华人家庭还要在门上贴春联、倒贴“福”字；除夕夜全家老小在一起吃团圆饭。有些家庭吃过年夜饭后，还会赶到牛车水年货市场，人挤人，凑热闹。到了午夜时分，家长们祭神拜祖先；有的则前往当地著名的两座寺庙——观音堂及天福宫上香祈福。

       张灯结彩、绚丽夺目的牛车水，是体验新加坡华人迎接新春佳节盛况的最理想地方。除了可以观赏年年有新意的春节装饰，那里更是最热闹的年货市场，到处是五颜六色的年花、色香味俱全的年货、五花八门的装饰品，琳琅满目。春节前的十几天，牛车水夜夜灯火辉煌、人山人海、欢腾的气氛有增无减。随著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去旧迎新的活动就越是高潮迭起，群众尽情选购、讨价还价、情绪亢奋。尽管过了午夜 12时，牛车水的年货市场人潮仍然没有减退，华人多如过江之鲫，忙着享受办年货的乐趣，将牛车水挤得水泄不通。

       大年初一，寺庙前一早便万头攒动，华人争先恐后插头柱香，场面极为壮观。华人在春节期间所吃的食物也很讲究，如鱼象征“年年有余”，年糕代表“年年高升”，发菜是取“四季发财”中发财二字的谐音，桔子表示“大吉大利”等。一些传统习俗如大年初一不能扫地也沿用至今。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华人拜年时有一个特色，就是携带两颗桔子，祝贺对方“大吉大利”，而对方也会礼尚往来，在你道别时奉上两颗桔子作为回礼。

       许多华人企业、社团和家庭在新年时也会一起“捞生”。“捞生” 是以鱼片、姜丝、萝卜丝、辣椒丝、袖子、花生、芝麻等拌成的七彩鱼生，大家用筷子把鱼生高高捞起，边捞边说吉祥语，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捞得风生水起，事事如意。

 在滨海湾举行的“春到河畔迎新年”，也是贺新春的重点活动之一。许多华人到这里猜灯谜、逛年货市场、品尝传统小吃，欢赏港台及本地艺人的歌舞和特技表演，到处人潮汹涌，洋溢着新春气息。    一年一度配合春节而隆重登场的“妆艺大游行”，除了是新加坡人一年当中最期待的节目之一，也是吸引外国游客特地前来观赏的重大盛会。这个与新加坡华人息息相关的艺术大汇演，为春节注入了现代与时尚的元素。随着夜幕降临，路上就像一个露天的大舞台，一辆辆装饰华美的花车鱼贯登场，各种奇装异服、曼妙歌舞轮番上演，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长达两小时的表演犹如一次梦幻之旅，演出结束之际，烟花绽放，彩带飞舞，人人兴高采烈地涌至马路上，现场瞬间成了公共舞池，将普天同庆的气氛推向最高点。

       农历八月十五是人们赏月吃月饼的中秋佳节。除了传统的莲蓉、豆沙、五仁等馅料的月饼外，这里的华人每年都创新不同口味的月饼，如绿茶、黑芝麻、冰淇淋、各类水果味等。然而，最受欢迎的终究是内含咸蛋黄的莲蓉月饼。中秋节当晚，华人会在组屋楼下或庭院内举办称为月光会的赏月会，泡上一壶热茶，品尝月饼和水果，欣赏花灯与月色，有的还会举家到新加坡河畔放河灯祈福。孩子们则提着造型特出的灯笼，呼朋引伴，欢欣快活地四处游行，洒下一路欢笑。

       在婚礼习俗方面，新加坡华人与其他地方华人的情形基本上大同小异，只是西方色彩比较浓一些。通常是未来新郎拜会未来岳父岳母，请求长辈将女儿许配给他，在女方家长答应以后，准新郎、新娘双方家长互赠首饰与佳酿等礼品。于大喜之日当天，新人会向长辈们一一敬茶，之后宴请亲朋好友。除了在酒楼宴客、行夫妻交拜之礼以外，狮城男女结婚的最大特色，是在婚姻局注册后便马上排队申请政府的组屋，共筑爱巢。

    新加坡华人大多信仰佛教或道教，他们在家里设香台，日日烧香祈福，初一十五还固守吃斋的习俗。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的也不少，而无神论者日益增长的现象亦愈加显著，约占华人人数的15%。

       民间信仰也深深影响着新加坡华人。早期华人经水路艰苦跋涉到此，因此新加坡大部分寺庙都供奉护航女神妈祖，譬如历史悠久的天福宫和粤海清庙。天福宫在19世纪初由福建人兴建，采用正统闽南建筑风格，主体建筑完全没有用到一根钉子。1973年，天福宫被列为新加坡国家遗迹，如今已是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而粤海清庙建于1827年，1850 年才扩建至今天的规模，前去祈拜的善男信女以潮州人居多。

       其他充满华人色彩的庙宇还包括了坐落在俗称“四马路”的奎因街（Queen Street）的观音堂。此庙常年香火鼎盛，每逢大年初一，信徒都涌往观音堂抢插第一柱香，希望来年鸿运当头。

       新加坡华人成长在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因多元种族的环境带来了多元宗教，但这里的回教堂、佛寺、道观、兴都庙、基督和天主教堂一直都融洽地共处。各族间也能更了解各个宗教及文化，避免愚昧的偏见和误解带来不必要的纷争，同时发挥有容乃大的高尚情操。所以，在小印度可以看到回教堂；牛车水可找到兴都庙；阿拉伯街亦设有藏传佛教场所，是难得的和谐画面。

       此外，华人至今仍保留着相当完整的华族丧礼和出殡仪式。如果有亲人过世，他们会在中文报上刊登讣告，有的则是好友至交为亡者刊登挽词，代表对亡者的追思。

       新加坡部分宗乡会馆拥有本身的义山，如福建人的咖啡山、客家人的双龙山和丰永大、海南人的海南山、潮州人的泰山亭和广东人的碧山亭。早期的义山只开放给同乡会员，到了后期才开放予各籍贯人士。

­       随着土地陆续被政府征用，大部分坟场已改建成安放骨灰瓮的灵塔。灵塔一般采用多层式设计，向高空发展，整洁美观。一些义山的设备也趋向多元化，如历史悠久的广东碧山亭建立了先贤碑、公所、安老院等，再经美化，成了寻根问祖的好去处。

 会馆原先是为了办理华人的身后事、或祭祖拜佛而设的。早期很多客死异乡的华人都是举目无亲的一群，因此需要成立理事会来管理坟场、神庙。后来，会馆的作用逐渐扩大到凝聚华人社群的力量。

       华人社团多以地缘、血缘与业缘为组织基础。来自同一乡县的地缘组织，有晋江会馆、花县会馆；同宗同姓的血缘组织，如台山黄家馆、四邑陈家馆；同一行业的业缘组织，如建筑工会、渔业公会等。此外还有许多文化团体，包括运动、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及校友会等；宗教团体包括孔教、基督教等；其他的华人社团还有进行消闲活动的俱乐部等。

       早期的社团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里扮演着维护和发展华人社会的角色，是早期移民的精神依托，也是凝聚华人的重要据点。在新加坡独立初时，这些乡团会馆曾经设立登记站，协助会员申请成为新加坡公民。

       今天的新加坡华人社团中，代表多数华人社团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是规模较大的一个。它成立于1986年1月27日，由福建会馆、潮州八邑会馆、广东会馆、福州会馆、南洋客属会馆、琼州会馆及三江会馆为基干，共有183名成员，几乎涵盖所有活跃的宗乡会馆；其宗旨包括：促进新加坡各宗乡会馆之谅解，推动文教和社交活动，及鼓励、赞助研究华人传统文化。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则是最具威望的华人社团，成立于1906年，是新加坡历史悠久的商业团体。总商会不但是当地华商最高的领导机构，在国际商业舞台上享有良好的信誉，同时也是世界华商大会的创办机构，并拥有广泛联系世界各地华人企业的商业资讯网站《世界华商网络》 （www.wcbn .com.sg）。

       社团是老一辈华人消磨时间的好去处，而管理工作也多由他们负责。新一代华人平时忙于工作、进修、运动，对参与会馆、社团活动并不热衷，导致许多会馆、社团面临青黄不接的状况。新移民对家乡的情感犹浓，于是成了这些社团、会馆的新生力量。近来更出现了不少新的会馆组织，如天府会、华源会、九龙会等，在新移民初到异域，人地生疏之际，及时伸出援手。

       时至今日，好些早期的华人会馆依旧屹立于原处，然而风雨飘摇，当年的盛况已经不再。尽管如此，它们作为华人曾经的依归，也见证了华人的移民史，仿佛是一部对华人子弟诉说着祖辈们的丰功伟业、光荣背后的辛酸血泪故事的播放机。

  阅读中文刊物是许多新加坡华人的日常习惯，新加坡中文报计有《联合早报》、《新明日报》、《联合晚报》、免费双语报章《我报》，以及十余种中文杂志如《I周刊》、《女友》等供选择。邻国马来西亚出版的中文报刊《新生活报》、《中国报》、《民生报》等，在新加坡也购买得到。主流报章《联合早报》每天的销量约有20万份，读者群主要是老一代华人，而新移民的出现，也给中文报刊带来了销量创新高的曙光。

       在新加坡，电视台华语节目的收视率高于英语节目。或许对华人来说，华语还是比较亲切的。华人家庭的餐桌一般都是对准电视机的，而许多华人经营的咖啡店也装上电视机，让食客们时时刻刻都能观赏中文节目。除了8频道及U频道，还有一些须付费的中文有线电视频道。新加坡的中文电台也不少，计有动力频道、城市频道、醉心频道等。

       有人曾批评新加坡重理轻文，是一片缺少底蕴的文化沙漠。的确，文化事业在新加坡不被视为经国大业，但却无疑是受到重视的。新加坡华人推广中华文化活动的努力向来不曾间断过，还将这些活动提升到国际层次，较为突出的有“妆艺大游行”、“新加坡华艺节”、“国际华文书展”、“端午节龙舟比赛”等。

       其实，在文化艺术方面，新加坡是人才辈出的，尤其是近年来，他们竞放异彩，使新加坡不再是文化沙漠，而成了一片绿洲，洋溢着十足的活力。如多元艺术家陈瑞献、戏剧家郭宝坤、享誉海内外的音乐指挥家朱晖、在海外发展的电影配乐师Ricky Ho、著作等身的作家尤今，都是脍炙人口的美谈。

上世纪80年代，一批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创出了清新质朴的“新谣”，不但开辟了一条属于新加坡华人独有的音乐道路，在全国掀起一股“新谣运动”，同时也崛起成为亚洲中文乐坛的一股新力量。当时的音乐工作者梁文福、许环良、黎沸挥、李伟菘、李思菘等，创作过无数耳熟能详的好作品，多数都在各国华人社会中传唱多年。至今，他们仍是中文乐坛举足轻重的创作人或制作人。

       歌手如孙燕姿、林俊杰、阿杜、蔡健雅也突破地域的限制，凭着悦耳的歌声、丰沛的创作力，征服了歌迷的耳朵，成为全球华人爱戴的新生代偶像。近年来，新加坡的乐坛更是新人辈出，不论幕前幕后都充满潜力，歌手因表现出色而到港台发展的新闻，己让人司空见惯。

       新加坡中文电影亦独具一格，大部分作品都反映了本地华人的心声，因此颇受大家的喜爱。尤其是由梁智强执导的作品，通过嬉笑怒骂的方式，赤裸裸地点出新加坡的社会现象和华人的生活面貌，一系列深受欢迎的电影如《小孩不笨》、《钱不够用》等，让观众在笑中带泪的剧情中找到共鸣。其中一部作品《我在政府部门的日子》，还让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一次发表演说时点名谈论。

       除了梁智强的通俗喜剧，文艺气息较浓的导演如陈子谦，曾以新加坡华人独特的七月歌台文化为题材，拍出了《881》电影而掀起一股热潮，引起年轻人关注中元节期间的歌台表演。其他出色的新加坡导演邱金海、唐永健等，一旦有新动向都会引起话题，并在国际间与各国电影业者有良好的互动，是新加坡中文电影界不容忽视的一股动力。另外，新秀导演们频频获奖扬威国外的消息也时有所闻。总体而言，新加坡华人不论在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方面都交出了漂亮的成绩，是华人的骄傲。

       热爱艺术的华人，一年当中总会赴上多场的艺术之约。每当翻开报章的活动介绍栏目，星空下的露天芭蕾舞、湖面上的大型歌剧、新加坡国际电影节、以亚洲各语言进行的剧场表演、热门音乐会不胜枚举，叫人眼花缭乱。经典歌舞剧如猫（Cats）、歌剧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也都曾在此上演。来自世界各国的顶尖流行乐手或古典音乐名家更是不在话下，几乎每周都有国际巨星到来献艺。

       现今的新加坡华人生活在文化气息浓郁的大都会里，这得归功于政府一直努力把它打造成一个充满艺术与人文气息的环境，以致许多超大型的国际艺术表演、一连串的盛大艺术节不断轮番上阵，而且一般免费供民众观赏，令所有华人艺术爱好者乐不可支。

       幸福的新加坡华人也活在一个注重文明建设的国度里，政府积极耗资建立博物馆、文明馆、美术馆及艺术中心等机构，以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又创立艺术学院及戏曲学院，培育更多艺术人才；成立了国家交响乐团及华乐团；而且，每年举办盛大的艺术节，为整个城市增添热闹的气氛。新加坡政府也设立古迹保存机构，不遗余力保护文化遗产。对于有出色成就与创意的文化人，还颁发文化奖，以资鼓励。

       喜欢阅读的华人必定对新加坡每个社区都有一间图书馆的安排，十分感恩。在这里，一家大小前往图书馆借书、参与读书会的热衷程度是令人鼓舞的。印刷业者傅佩佩透露：“新加坡的中产阶级平日的工作时间不短，在家陪伴孩子的时间有限，所以会非常珍惜在周末与他们共处的时光。最常陪他们到图书馆的原因，除了学习，也是因为新加坡的图书馆设有亲子阅读特区，环境的设计又那么地宽阔优美，而且图书馆当局还会常在报章上介绍每周上架的新书内容呢！那种鼓励大家阅读的服务精神，总是叫我万分感动。”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及各分馆中文书籍总数近200万册，占总藏书量的四分之一。目前在新加坡正式的中文读书会，共有20多个，而且还在增长中。至于中文出版社方面，数量虽然不多，但也算活跃，生命力颇强。

     独立40余年后的今日，新加坡仍续写着“华人移民史”，只要有才，移民厅的大门永远敞开。毕竟，对这个天然资源匮乏的国家而言，人才是它最大的财富。

       新加坡生活水平高，使一般年轻华人不愿多生育；加上新一代受英文教育为主，到西方国家发展并不困难，导致社会老龄化的现象进一步加剧。新移民的到来，刚好缓解了这一问题。国父李光耀、前总理兼国务资政吴作栋及多名部长曾异口同声表示，由于华人婴儿生育率偏低，新加坡若要继续发展经济，必须广纳外来人材。

       年轻、高学历、熟练的技能，是新一代移民的最大特征。拥有学术资格或特别技能的新移民，为新加坡各领域提供了较高层次的劳力资源；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健将如冯天薇、李佳薇、陶李等，如今已是新加坡体坛响当当的名字。

       激烈的就业竞争，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是新加坡华人和新移民之间急需解决的问题。尽管如此，对于新移民，大部分新加坡华人都抱着宽容友善的态度，而新移民也努力克服语言障碍、跨越文化差异，积极融入这个多元社会。

       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也被称为“跨国华人”，他们对祖国和居住国都有所贡献，摆脱了非“落叶归根”即“落地生根”的情感归宿，在两者之间游走，试图在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框架里取得平衡。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特邀研究员、联合早报《新汇点》主编周兆呈认为，在新加坡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中，移民只能说是一大批人的背景符号，并非是一个完整的利益社群，不必也无法结合成争取所谓权益或政治地位的特定群体。与其他来源地相比，这在某种程度上却又反证了中国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的有利环境。不过，如今的网络时代、交通工具的便利，移民与出生地的联络成本大大降低，联络机会和能力大大增强，造成出生地和移居地时空同步，在极为便利掌握中国动态的同时，对认同新加坡亦可能形成新的挑战。

       华人迁徙、打拼、融入的故事，在新加坡不断上演，昨日的历史和今日的生活纵横交错，丰富了这个岛国，也为华人社会注入更多元的色彩。

   李光耀是一位极富魄力、高赡远瞩的政治家。从上世纪50年代初参政至今，在政坛纵横60余年，直到2015年逝世前，仍在担任内阁资政，关心国事民痪。

       李氏祖籍广东省大埔县党溪乡，1923年9月16日出生在新加坡一个海峡华人的家庭。他曾以优异的成绩，考获英国剑桥大学法律系荣誉学位，1949年毕业回国后，取得律师资格。50年代初期，新加坡政治动荡，左翼工会势力庞大，工潮与学潮接二连三地爆发。这时的李光耀，经常挺身而出，为工人与学生辩护。

       1954年，人民行动党成立，李氏就任秘书长一职。1959年，人民行动党参加新宪制下的自治邦议会大选，在51个议席中赢得43席，组阁成立新加坡自治政府，李氏荣登新政府首届总理，时年35岁。

       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奈何之后又因双方意见分歧而退出。独立建国之初的新加坡面临经济、国防及民生等诸多难题，幸而在李氏40年的任职总理期间，在同僚的合作、以及广大人民的支持下，成功突破重重难关。他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使经济多元化；落实工业区，以吸引国外财团来投资设厂；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创立公积金制度、成立贪污调查局、解决人民的屋荒困境、进行教育改革，及进行环境绿化等各方面的努力，使新加坡成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今天新加坡的政府以高效率及廉洁而闻名，人民安居乐业，这一切都得归功于李氏率领的政府，创造了“新加坡模式”的奇迹。

       李氏于1990年11月辞去总理职务，自1991年起任总理公署内阁资政至今，仍然对政府的施政积极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卸下总理职务后的李氏，也一直担任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的主席，管理新加坡的政府外汇储备。

       李氏在国际上极负盛名，多位政坛名人如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均对他表示赞赏。李氏始终提倡“亚洲价值观”，认为亚洲国家不应全盘依照西方的那一套行事，西方民主不能强加于亚洲人民身上。2000年，李氏获香港中文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2005年，上海复旦大学授予李氏名誉博士学位，表扬他对促进中新两国关系所作出的贡献。

       综观李氏的一生，充满了战斗的色彩。50年代争取自治独立期间，他跟殖民主义者斗争；在治国的道途上，与左翼人士斗争；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后，他又与种族主义者斗争。他一生不息的斗争，显示了其倔强坚韧的个性。而他对新加坡不可磨灭的贡献，使他赢得“新加坡国父”的美誉。

       “没有李光耀，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这句话，相信没有人会反对。

      南洋大学是中国以外的全球第一所中文大学。1953年，当时的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倡议创办一所中文大学，还率先捐出500万元，并以福建会馆主席的身份捐献该会馆位于裕廊路的500英亩土地作为大学校址。陈六使的呼吁马上获得了华人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大学筹委会很快便成立，且将大学命名为“南洋大学”。

       当年7月，南大破土动工。新马各地的华人掀起了献捐热潮，短时间内就募得数百万元建校基金。南洋大学于1956年1月开始招生，首批录取的新生有330名。海外华人创办的第一所中文大学诞生了，这是海外中文教育史上空前的创举。至此，新加坡建立了一个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中文教育系统。

       1958年3月30日，由新加坡总督顾德爵士主持南大落成纪念碑揭幕礼，社会各界前往观礼者有十多万人，将通往校园的裕廊路挤得水泄不通。

       然而，南大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它是一所民办大学，在创办过程中受到殖民政府的多方阻挠；学生毕业后，学位得不到政府的承认、毕业生难以找到理想工作的境况一直困扰大学多年。但是，南大毕业生的杰出表现慢慢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南大的杜会声誉也越来越高。

       到了1968年，新加坡政府宣布承认南大学位，但仍未获邻国政府的承认。随着新加坡经济的迅速发展，华语人才的出路越来越窄，于是1975年在政府的建议下，南大开始将教学语言改为英语。1980年，南大与新加坡大学合并，共组新加坡国立大学。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就是在南大的旧址上发展起来的。

       南大开办25年，共培养了1万2千多名毕业生。这些人后来成为新马华文师资的主要来源，也有很多人在商界、政坛、新闻出版界作出了很大贡献。南大虽然消失了，但那份自强不息、逆流而上的 “南大精神”，成了海外华人捍卫中华文化的坚定决心与顽强意志的象征。

  每逢农历七月十五，新加坡华人将会庆祝中元节，与春节相比，重视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有二，一是被政府分置到不同组屋区的同乡可以趁中元节共聚；二是华人可藉这个节日举行募捐、办义卖会，展开公益活动。

       中元节与佛教的盂兰盆会重合，因此佛道两家都设坛拜祭，使得这个节日热闹异常。一向被世人冠以“清洁国家”的新加坡也不得不为这个节日让步，无论是繁华的市中心或是百姓的住宅区，都会看到华人焚烧冥纸祭品，致使满城灰烬飘绕，蔚为奇观。

       这段期间，华人还会在全岛各地举办超过500场的“歌台”表演，艺人们在台上使尽浑身解数，载歌载舞，流行曲、歌仔戏、诙谐表演悉数登场，以精彩的表演“娱乐”孤魂。通常，舞台下最靠前的一排空着的椅子，是特别预留给阴间“好兄弟”的贵宾座。各类表演除了在全岛的街边和操场唱响，一些社区还会搭起台子，让居民自娱自乐，唱方言歌，跳民间舞，演地方戏，欢腾热闹足足一个月。

       据悉，新加坡是中国以外，传统戏曲保留得最完整的地区。闽剧、潮剧、粤剧等的传统地方剧种和木偶戏，每一年都会把中元节当作展示和延续民俗文化的平台。

 就如看透新加坡社会精髓的著名海外华人研究专家王赓武教授所说：“在这里（新加坡）每个人都是典型的新加坡人，因为他代表这多元族群和文化中的一员；每个人又不是，因为从一个人身上，无法看到真正的新加坡人的全貌，要把很多人放在一起，才是多元。”新加坡华人，也力求达到多元精神。

       马来西亚位于赤道北缘，处于东西方航路要冲。全国分为东马来西亚（东马）和西马来西亚（西马）两个部分，两者之间隔着南中国海。西马半岛共有11州，北依泰国，南临新加坡。东马则有沙巴（Sabah）和砂拉越 （ Sarawak）两州，与印尼的加里曼丹和汶莱为邻。

       公元初马来半岛有羯荼、狼牙修等古国。15世纪初的马六甲（Melaka，中国古籍称为“满刺加”）是个强大的王国，也是个举世瞩目的贸易海港。

       自16世纪起，马六甲先后沦为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地。1874年以后，英国更把势力伸展到整个马来半岛。

       至于东马，砂拉越自19世纪中叶，便受英国人的拉惹王朝所统治，长达105 年。到了1946年才让渡给英国，沦为英国殖民地。另一方面，1870年英国的渣打公司，也先后与汶莱苏丹及苏禄苏丹签订割让条约，取得了沙巴的主权，并于1946年把统辖权拱手让给英国，成为英殖民地。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赢得独立，成立马来亚联合邦；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合了新加坡、砂拉越和沙巴成立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幅员辽阔，蕴藏着丰富的矿产和石油；还有延绵不绝的沿海区域，渔产取之不尽；境内覆盖的热带雨林，则提供了丰富的林业资源。它得天独厚，既无酷暑也无严寒，更无台风、地震、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的侵袭。而这里的人民也没有辜负上天赐予的一切，他们在肥沃的土地上开荒拓土，辛勤劳动，发展工农矿业，来建立美好的家园。

       马来西亚是多元民族国家，华人作为第二大族群，是除了中国和新加坡外华人比例最高的国家。华人在当地享受着温饱宽裕的生活，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和其他民族和谐相处，早已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了；但他们也依然坚守着从祖辈传承下来的传统习俗，可以说是海外最具中华文化特色的华人社会。

      华人最早移民马来半岛，大抵可追溯到15世纪初的马六甲王朝。 1408年，当明代航海家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他的随从费信曾载述道：“（满刺加）男女身肤黑漆，间有白者，唐人种也。”

       到了葡萄牙统治马六甲（1511-1641）初期，马六甲已有一个中国村（Kampong China）；而在荷兰人统辖马六甲时（1641-1824），由于华人人口越来越多，荷兰政府先后委任了七名甲必丹（Kapitan，指华人领袖或头目）来管理华人事务。那时候的华人，大多原籍福建漳州。

       打从那时起，华人已零星地移居到东南亚经商，有的还选择了长期居留。一些华人和当地妇女通婚，其混血后裔被称为土生华人 （Peranakan），或称海峡华人（The Straits Chinese）。土生华人男性也俗称“峇峇”（Babas），女性则称“娘惹”（Nyonyas）。这个特殊族群受到马来人、华人及西方人士的影响，具有驳杂的文化形态，如生活方式接近马来人与西方人，但却保留非常传统的华人风俗习惯，而语言也掺杂了福建话、马来语和英语。

战前的海峡华人，无论在商界、航运界、金融界或专业领域都出类拔萃。1960年代以前，峇峇娘惹在马来亚拥有土著身份，但后来被政府归类为华人。在二战后，华人与当地人通婚的情形大量减少，后来的混血儿也不再自称为峇峇。因此峇峇族群逐渐没落，迄今仅有少数居住在马六甲和槟城（Pulau Pinang）。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清廷锁国大门，贫穷和战乱迫使许多华南沿海居民离乡背井，远赴南洋谋生。而当时马来亚还是一个人烟稀少、荒凉落后的地方，英殖民政府试图开拓荒土，因此就从印度和中国输入大量的廉价劳工。有迹象显示，早在19世纪初，槟城已输入了中国契约华工。有人甚至被半哄半骗，成了“猪仔”被贩卖至这里。对于未知的土地与未来，这些自愿和非自愿的“新客”（早期定居者对后来者的称呼）只能寄托于命运。

       在“推力”与“拉力”的牵引下，马来亚华人移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高潮。据统计，1871年马来半岛的华人人口为10万5千人；到了1941年，华人已增至261万4千人。

       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移民来马才基本停止。此后，马来亚华人人口增长，完全依赖自然出生率，而非移民。

       早期华人移民一般先在种植园和锡矿场做苦力稍有积蓄后就转向零售业、饮食业、土产收购、加工业、矿产开发、种植业甚至银行业。当时华人的行业基本上是按籍贯来划分的：福建人多从事港口贸易；海南人一般开咖啡店和餐厅；潮州人集中于种植业及土产贸易；客家人则主要开采锡矿。

       锡与橡胶，曾经是马来西亚的经济命脉，华人在胶锡的种植、发展与经营上，一直扮演着先驱与策动的角色。当年，华人还一手开发了首都吉隆坡。

       早期，吉隆坡还是个人口稀少的落后小镇，直到一位来自广东的华人领袖叶亚来开发并吸引前来采锡的华人大批涌入后，吉隆坡才逐渐地发展繁荣起来，独立后更成为国家的定都之地。

       砂拉越的华人移民，大抵滥觞于19世纪初年。那时期，在西部的石隆门（Bau）散居着一些客家人矿工，他们都是从西加里曼丹华人金矿地移居过来的。后来受到英国人的武力镇压，华人不得不改行，改种胡椒、甘蜜维生。与此同时，在砂拉越河口的古晋（Kuching），也有潮州人种植胡椒与甘蜜。

       19世纪下半叶，随着英国人政权的巩固与疆域的扩大，吸引了更多华人移民的到来。境内几条大河流域，也由于华人的增加，经之营之，逐渐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城镇。如拉让江河口的诗巫（Sibu）等，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商埠，是得力于福建闽清人黄乃裳的开发。

       1900年，他与砂拉越统治者签定协约，从中国招募农工来开发诗巫。两年间，共有三批福州人1118名到诗巫拓荒垦殖。此后诗巫华人人口激增，市容面目一新，所以诗巫别称“新福州”。

       沙巴华人的大量移民大概始于1882年。那一年，“英国婆罗洲公司（简称“公司”）成立，试图在沙巴大事扩种烟草，需要大批劳工，于是从广东龙川、五花等地招募一批客籍人士到沙巴来，为数有96人，被安置在古达（Kudat）荒区垦殖。

       嗣后，又有广东东江紫金、惠阳、宝安、东莞及花县等地的客家人继续入境，华人人数因而激增。

       除了香港、华南及海峡殖民地以外，“公司”代理人更到中国北方招募华工，1913年，大概有430多名河北人抵达沙巴，定居在亚庇附近地区。“公司”除了给他们分配耕地外，还给予津贴金。因华工领头是山东人，所以他们的聚落也被称为“山东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公司”苦于劳动力严重短缺，因此制定许多有利于移民政策，以鼓励移民携眷前来定居，其中包括免费供应船票给有意前来的移民。此外，他们还可以获得耕地垦殖。新计划果然奏效，在1921年之后，有9千多名华人入境，其中绝大部分是客籍人，包括不少女性，他们大多被安置在东西岸的农地耕作。

       此外还有一大批自由移民入境沙巴。他们或在种植园成为农工，或在城市寻求工作，成为工匠或普通工人。1937年，自由移民的入境人数，就高达7912人。

       直到二战之前，远赴南洋的侨民和家乡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不只等待落叶归根的时机，还主动发起支持祖国的各种运动。当时，华人聚集地之一的槟城正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在海外宣扬革命理念的重镇。

       二战期间，日军侵占了马来亚，当地华人纷纷从戎投军。这段抗日岁月也成了马来西亚华人重要的历史事件。大难当前，华人也对眼前保卫的这块土地产生浓烈的感情，成为日后选择留居此地的一大契机。

       1945年，日军才刚投降，英殖民者又卷土重来。为了歼灭以马来亚共产党为首的武装力量，英政府实施了紧急状态法令，强制把华人迁入临时建立的480个新村里，并用铁丝网与外界隔开，严厉限制他们的行动。如今，除了城市地区，各个新村也是华人的集聚地，拥有浓厚的华人色彩，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957年马来亚独立、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大多数华人对这块土地已产生情感，他们都愿意落地生根，纷纷从侨民身份转变为当地公民。独立后百业待兴，华商们捉住了良好的商机，凭着高瞻的远见和刻苦耐劳的传统美德，逐步把投资扩张到制造业、食品加工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带动了国家经济发展，也为自己立下了稳固的基业。

       人口比例不低的华人在经济上的强大，招致友族的忧虑和猜疑；在一些居心不良的政客煽动下，终在1969年爆发了 “五·一三” 种族冲突事件。此后政府推出了“新经济政策”，试图平衡各族间的财富，增加土著的公司股权，使华人在经济发展方面有所限制。

       但大体而言，华人依然在种种挑战下寻求发展，至今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领域上的表现皆有目共睹。

* *孙中山于1910年11月间在马来亚的槟城开会，密议广州“三·二九”起义，史称黄花岗起义，而在这次起义中栖牲的黄花岗72烈士中也有不少是马来亚华人。此外，华人人口密集的槟城也出了一位兼通中英语言及文化的学者辜鸿铭，除了获得13个博士学位，也是将《论语》、《中庸》翻译到西方的第一人。*
* 马来西亚华人约占全国人口的25%。这里奉行出生地原则，多数华人已加入当地国籍。由于战后极少有中国新移民到来，华人现在大多是土生土长的第三、四代。他们早已落地生根把这里当成祖国，并热爱着这块土地。但他们也依然保持着鲜明的华人特色，其中以拥有大中华圈外最健全的华文教育体系，最为人所称道。
* 据研究所示，90%以上的西马华族，聚居在马来半岛西海岸的城镇，包括吉隆坡、槟城、怡保（Ipoh）、马六甲、新山（Johor Bahru）、芙蓉（Seremban）及巴生（Klang）。 至于东马的砂拉越与沙巴，也有同样的现象。砂拉越68％的华族人口，集中在古晋、诗巫与美里（Miri）三大县区；沙巴67％的华人，聚居在亚庇（Kota Kinabalu）、山打根（Sandakan）及斗湖（Tawau）三大县内。
* 当地华人的祖籍多为中国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四省，其中福建又以闽南人、福州人为主；广东则以广府人、潮州人、客家人最多。各籍贯华人的聚集地也非常明显例如半岛北部多福建人，广东人集中在吉隆坡、怡保等城市地区，而诗巫则是以福州人为主。
* 马来西亚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辽阔的土地，因此人民拥有广大的生活空间。在这里，人们只要肯努力，要谋得生计，糊口于四方，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倘若能把握机会，富甲一方也非罕见的事。
* 在这个新兴的土地上，华人挥洒自如，充分利用独到眼光和勤奋个性，填满了每一个发展空间。他们有建党结社的权利，并享有宗教、教育与言论的自由。华人可以礼佛拜神祭祖，也可以庆祝传统节日、舞龙舞狮，连春节都享有两天公假。虽然在某些方面不能尽如人所愿，但华人都以整个国家与全民利益为前提，发挥容忍与包容的精神，以达致全民团结、和谐共处的目标。
* 华人在马来西亚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涉足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其中以从商的人数最多，而商业中主要以零售业与服务业最为活跃。华人零售商经营的形式，包罗万象，从近乎绝迹的刻匾店、祭拜香店，到茶室、杂货店、中医药材店铺、汽车修理店，再到牙医诊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以及建筑师工作室等，无一不有。两家著名的华资银行——大众银行和丰隆银行，其分行遍布全国。不论是在喧嚣闹市或是穷乡僻壤，随处可见挂着华文招牌的商店。
* 在过去三四十年间，陆陆续续冒起了若干华人企业集团。目前在马来西亚的华人企业集团大约有40家，其中较大的有郭鹤年集团、林梧桐集团、丰隆集团、骆文秀集团、李莱生集团、陈志远集团、杨忠礼集团及郑鸿标集团等等。它们拥有浓厚的家族色彩及多元化业务，经营稳定后也逐步迈向国际市场，例如郭鹤年集团已将业务范围伸展到亚、欧、美等十多个国家。
* 砂沙两州，都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支柱，其中尤以棕油、橡胶、胡椒、椰子及可可等农作物，给国库带来巨大的收入。这些农作物的小园主，大部分是华族的小资产家。而受雇佣的农工，也以华人为主。
* 砂沙两州丛林密布，盛产木材，成为重要资源。两州的锯木厂，业主多是华人。其产品除部分供应国内市场外，也出口、销售国外市场。因经营伐木业而致富的华族资本家比比皆是，其中佼佼者有砂拉越的张晓卿和刘会干，及沙巴的郑昭明。
* 迄今，华人控制马来西亚经济命脉的说法已不太准确。在70年代初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试图重新分配各族间的财富后，大大地局限了华人的经济发展。不过华人企业家仍灵活地采取各种应对之策，积极投入新的产业，总体上还是获得相当顺利的发展。
* “马来西亚世界级的华人富豪不少，但那毕竟是少数。”拉曼大学中文系教授林水檺说，“总体而言，大部分华人在社会各阶层就业，收入高低皆有。不过，与其他族群相较，华人的经济确实比较优渥，大多都过着比较宽裕的小康生活。”
* “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华人仍有能力生存下去。不过我们依然希望可以争取到公平的待遇，因为这是人民的权利。”马来西亚七大乡团协调委员会前任会长吴德芳表示。名列马来西亚成功企业家之一的他不无自豪地说：“目前，华人是马来西亚缴税最多的民族。”
* 长期以来，华人对马来西亚经济的贡献一直备受肯定。槟城的开埠者莱特就曾写到，华人是政府唯一不必拨出费用和作出特别努力，便可以从他们身上增加收入的东方民族。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也称赞，全靠华人的奋斗与经营，马来西亚经济才有今天的活力。
* 除了经济，马来西亚华人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自抗日战争后，华人的政治意识不断提高。1949年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公会）成立，开启了华人涉足政治领域的新页后，几十年来参政的华人不计其数，他们多以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为目标。
* 马华公会在1955年与巫统、印度国大党结成联盟，参加大选获胜，组成执政政府，并向英殖民政府申求独立，立下大功。1972年，联盟容纳了更多政党后所组成的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参加历届大选均获胜利，长期执政。如今马华公会依然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政党，拥有多达110万名党员，是海外华社中数一数二的大型华人政党。
* 几十年来政坛上也出现了多个华基政党，如民政党、民主行动党（简称行动党）等。成立于1968年的民政党，原是反对党，在1969年的大选中夺得了以华人居民为多的槟城州政权。1972年加盟国民阵线，成为执政联盟之一员。在以后历届州选举中，民政党一直执掌槟州政权，长达40年，直至2008年，才被民主行动党所取代。
* 民主行动党成立于1966年，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主张种族、社会与经济平等。自创党以来，敢于仗义执言，扮演着监督政府的角色，因而获得一部分华人的支持。
* 至于沙巴，以华人为基干的政党有团结党、沙巴华人公会、沙巴中华统一党、沙巴华人党及沙巴进步党；砂拉越则有砂拉越人民联合党。
* 其他标榜多元种族的政党，也都有华人参与，如公正党等，共同构成华人在政治上一股重要的力量。在历届国会与州议会大选中，华裔的选票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不但华人基干的政党候选人，因华人的投票中选，即使是标榜多元种族政党的候选人，也得力于华人投票而中选。
* 在马来西亚2010年的中央政府，共有6位华人出任部长，9 位华人担任副部长，在政府决策中占有一席之地。
* 进入21世纪，华人参政的目的已不再是为华人利益代言。更多年轻的华人政治家抱着极大的政治热情，想要发挥华人优势，与其他民族一起共同建设马来西亚家园。
* 此外，马来西亚华团成熟而独立，也是华社一股重要的力量。百余年来成立的华人社团可说是多不胜数，它们在各个时代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早期华团多属地缘、血缘与业缘组织，如地缘组织有福建会馆、广东会馆、潮州会馆、番禺会馆等；血缘组织如槟城李氏宗祠、马六甲赖氏宗祠；业缘则有笨珍树胶商公会、吉隆坡布业联谊会等。
* 马来西亚华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再穷也不能穷教育”。他们说，那是先辈们长久以来坚持的教育理念。
* 虽然大部分早期华人移民都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但他们知道，教育是延续文化的不二法门，也可以使下一代摆脱贫困，所以筹办教育就成了一项时代的使命。自从在此地扎根以来，他们便致力发展华文教育事业。1819年，华人在槟城建立第一间私塾“五福书院”；而第一间现代华校则是创立于1904年的槟城中华义学。
* 自此在这块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华文教育就不曾间断过，百年来后代对于祖辈们的理念更不曾动摇。当地华社通过自力更生、坚忍奋斗，建立起一个从小学、中学到大专院校的完整教育体系，这在海外其他地方是非常罕见的。而这些大大小小的学校，全靠华社自主经营，其投入的心力财力之大，也属独一无二。
* 如今，1280所华文小学、60所华文独立中学、3所民办学院伫立东西马各地，是当地华人引以为荣的成就。他们骄傲地说，这是马来西亚华社长期力争，甚至不惜以血泪生命来换取的成果。
* “维护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是一件艰难的任务。由于华人群体庞大，文化底蕴深厚，让政府感到压力，进而推出了一波波的教育单元化政策，给每一个时代的华教发展造成巨大的阻力。”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前首席执行主任莫泰熙说。
* 然而，阻力越大，华人反弹力越强。他们众志成城坚守着华教，多年来毫不松懈。只因他们坚持，每个人都有选择母语的权利，也坚信语言乃是保持文化薪火不灭的种子。
* “所幸马来西亚宪法赋予人民选择教育的自由，可选择就读各语文源流的学校就读。据了解，90％以上的马来西亚华人都愿意把子女送进华文小学，接受6年免费的华文小学教育。”
* 仅在只有35万华人的沙巴州，就拥有华校80多间，在校学生近5万人。有条件的马来人、印度人也开始送孩子到华校读书。
* 但看似前景明朗的华文小学，其实也面对着许多棘手问题。
* 莫泰熙说：“华文小学的良好口碑，加上近来华文地位水涨船高，使其他族群的小孩也蜂拥报读华小。但华小却一直保持原来的数目，甚至面临关闭的命运。此外，师资、拨款不足也是一个华小长期面对的绊脚石。”
* 原来，华文小学虽被纳进国家教育的体制内，但政府对于华文小学的投资却极其有限。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华社唯有靠自己想办法，为筹资各尽其力。政府要关闭华小，华人就群起抗议，坚持华小一间都不能少。
* 小学毕业以后，华人子弟又要在华文独立中学、国民中学或改制中学之间作出选择，让他们陷入两难之中。
* 所谓改制中学，是60年代一些华文独立中学接受政府部分津贴后改制而成，除了每星期各8节的华文和英文课，其他科目的媒介语都是马来文。而在国民中学，华文则作为非正式的选修课，每周只上课一两小时，而且要求必须凑足至少25名学生方能开班。
* 以华文作为主要媒介语的独立中学，完全由华人社会自主经营，政府不给予任何津贴。由于独中学校不多，加上学费较为昂贵，许多华人往往只能选择国民中学和改制中学。目前，只有约15％华人学生在60间独立中学就读。
* 华文报刊也是马来西亚华社耕耘出来的一朵奇葩，是陪着华人在风雨中走过来的精神良伴。华人对华文报刊的执著，与坚持华文教育的理念是相同的——他们认为每份华文报都是一颗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种子，所以长久坚持保护它们。
* 目前马来西亚约有16家华文报章，其中《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东方日报》《光华日报》和《光明日报》6家影响较大。据了解，《星洲日报》是发行量最大的报刊，每日发行超过35万份，读者人数逾百万。
* 华人人口较少的东马，华文报章却异常发达，两州的华文报章多达十家，如沙巴州有《华侨日报》、《亚洲时报》、《晨报》等；砂拉越则有《国际时报》、《诗华日报》、《中华日报》等，这些报章都只在当地发行，地方色彩浓厚。
* 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一些华文报纸还发行到柬埔寨、汶莱、印尼、新加坡等周边国家，覆盖层面非常广。
* 中文日报多采用横排，版面整齐美观。中文报纸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地从繁体字转换去简体字。有趣的是，如今有报纸的标题还是用繁体字，内容却已全是简体的了。“繁简并茂”正反映了马来西亚华人对旧文化的不弃对新文化背负起了传承的使命。
* 资深报人古玉梁说：“一早醒来阅读华文报纸，已是大部分华人每天的生活习惯。报章是华人宣泄心声的平台，及联系华人群体的桥梁，也是华人关注国际的耳目。”
* 除了本国新闻，华文报章也特别注重与中国和海外华人相关的新闻。报上的评论也常以中国的时事为论点，因此大马华人对中国的脉动了如指掌。每当从报章中读到一些与中国或华人相关的事件时，无论悲或喜，当地华人都会特别关注，感同身受。
* “马来西亚政府规定，所有印刷媒体每年必须重新申请准证，因此中文媒体在言论上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尽管如此，华文媒体仍然守法经营，整体上茁壮健康地成长着，而且读者也还不断地在增长中。”对中文报章的发展了若指掌的古玉梁如是道。
* 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章除了像其他地区的报纸扮演着新闻报道和服务社会的角色外，也承担起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华文媒体本身也积极主办与传承华人文化有关的各种活动，如《南洋商报》主办十大歌星义演为华教筹款、《星洲日报》主办“花踪文学奖”等，都对当地华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为争夺华人读者市场，华文媒体之间也经常展开各种竞争。但在发扬中华文化、维护华人文化权利的基本立场上，它们却保持着一致。” 古玉梁说。
* 另外，华文报章的文艺副刊也是培养马华文学作家的主要媒介，可以说，华文文学在马来西亚得以发芽及成长，华文报章是最重要的推手。

 至于电子媒体方面，目前国营和私营电视台都设有华语新闻播报时段，还长时段播放华语、粤语和闽南语的电视剧、娱乐综艺及访谈节目。华人也可通过卫星付费频道，与中国大陆和港台等地区同步收看中文节目。此外，当地还拥有3个华语电台和两家华文新闻网站，为华人提供更多的生活资讯和时事知识。

* *《光华日报》为全球最长寿的华文报。1910年孙中山为宣扬革命而在槟城创立，初期为中国革命党人在马来亚最重要的机关报，并曾推动马来亚华人捐款中国协助抗日。目前《光华日报》为北马最畅销的报纸之一。*
* *马来西亚华社也出了许多出类拔萃、享誉国际的影视艺人和流行音乐歌手，其中就有闯荡好莱坞的巨星杨紫琼，还有广为海内外华人所熟悉的光良、梁静茄、李心洁等歌手影星，还有著名导演蔡明亮等，为世界华人歌影坛增添了缤纷灿烂的色彩。*
* 在强大的教育体系、华团和华文报章作为后盾下，马来西亚华人保存了相当完整的文化传统。他们保留中华传统节日之齐全，往往让人感到惊讶，一些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已逐渐消失的节日或习俗，在这里依然流传着。
* 从某个角度来说，马来西亚的人民是幸福的，各民族的隆重节日，都列为公共假期，大有普天同庆的味道。春节是马来西亚华人最重要的节日，更有两天的公假和浓浓的佳节气氛。佳节前夕，各商场人头攒动，各个车站都挤满了游子的身影，大街小巷上各种语言的祝贺布条及大红灯笼高挂，热闹欢腾的新春佳节气氛萦绕着整个国家。
* “除夕夜里，全家大小都会聚在一起吃团圆饭；过后，长辈还会根据吉时迎接财神。派压岁钱、舞龙舞狮、赌博更是少不了的春节活动。而且我们的庆祝活动将延续到正月十五的元宵节。”说及春节的热闹气氛，马来西亚华人不无自豪。
* 在马来西亚，元宵节也是华人情人节。这一天，除了吃元宵、观灯、赏花、猜谜，未婚男女还会在浪漫的夜色中，彼此抛柑和苹果，寻求如意郎君或温柔女孩。
* 春节期间，这里还盛行一种独特的活动叫“捞鱼生”，寓意新的一年能够“捞”得风“生”水起，步步高升。此外，各华团和政党也会举办团拜活动，并开放门户欢迎各族民众登门拜年，促进和谐关系。
* 除了春节，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当地华人也非常注重孝道，因此清明节祭祖、扫墓的风气历久不衰。“老一辈人以前会担心传统节日会逐渐消失，但看到清明节时路上车水马龙的状况，疑虑往往就一消而散。”马来西亚华社研究者陈亚才笑着表示。
* 此外，端午节、中秋节、中元节、冬至等大大小小的传统节日，在这里不但一个不少，而且华人都会遵循礼俗，欢度佳节，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过得非常热闹。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中秋节赏月提灯笼、中元节举办盛大普渡会等，都是这里常年不衰的节日活动。
* 随着时间过去，这些节日流传到下一代那里，不但不见消失，气氛反愈加浓厚。“年轻一代还赋予它们更深厚的文化内涵。例如端午节也是诗人节，文学团体会举办诗歌朗诵会；中秋节则延伸成亲子节，一家人会聚在一起吃月饼、提灯笼，一些华团也会在那天举行‘传灯’文化活动，象征文化源源不息。” 陈亚才如是道。
* 在这里，中华文化所散发出来的生命力源源不绝，民间自动自发、不计回报的力量，不但维持，还创新提升文化，他们的坚持让人感动。
* 马来西亚华人享有宗教自由，可以公开地信奉各种宗教。将近80%的华人同时信奉佛道二教或民间宗教。他们既到佛堂祈福，也在道观拜神，以及在家里祭祀祖先。至今，许多华人家里还摆设着神台，供奉菩萨、关公等神明，神台下面是土地公，旁边则是祖先灵位，厨房里还有灶神坐镇；此外，屋外还有天公神龛，这往往也是识别华人住宅的最佳标志。
* 在这里，拥有百年历史的寺庙也不少，有些还成了著名的旅游名胜地。马六甲的青云亭始建于17世纪，是马来西亚最早的华人庙宇，迄今香火不断。在一些华人集中的地区，如槟城、吉隆坡等，大大小小的寺庙庵观更是随处可见。信徒们除了到庙里祭拜神明、求签问卦，一些庙里头还驻有乩童神婆，为人们消灾解忧。此外，风水占卜、算命看相在这里也非常盛行。
* 九皇爷诞为当地华人，尤其是福建人所重视的盛事。每年农历九月初一至初九，信徒们都会坚持不杀生、吃素净口，并拜祭九皇爷来消灾解难。他们还会在海边设立祭坛迎神送神。九皇爷回天之夜，成千上万名信徒穿上洁净的白衣白裤，护送九皇爷绕境游行，场面非常壮观。
* 另外，农历正月十九到廿二的柔佛古庙游神，至今也已发展成10万人大游行。整个游神长达八九公里，气氛热烈，充分展现出中华文化历久不衰的旺盛活力。参与抬神游街的大部分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脱下平时时髦的装束，换上统一的服装，争相抬神，投入的精神不亚于他们的先辈。
* 一些台湾有名的宗教团体如佛光山、慈济、法鼓山等也在马来西亚建寺立院，开设道场，而且信徒众多。此外，在这里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华人也不在少数，约占15%，这国度西方风气浓郁，加上不少华人是接受英文教育，都是基督教和天主教在此盛行的主要因素。其余的华人有4％是穆斯林，1％的华人则信奉兴都教或其他宗教。
*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马来西亚华人的婚礼采取中西合璧的仪式。结婚时新人都穿西式礼服。在家里举行传统的仪式后，才到酒店宴请宾客。在婚礼中，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大妗姐，也叫送嫁娘。她是结婚当天新娘的“贴身保护人”，有时还会担任婚礼的主持人，把婚礼喜庆的气氛推到最高点。*
* *“拿督公”是马来西亚华人的本土地方保护神，神像容貌似马来人、穿着马来民族服装，本土色彩浓厚。“拿督”（Datuk）即是该国君主册封有功人士的封号，有部分拿督公更有马来名字，如也法、苏勿兰等。此外，拜祭拿督公的祭品也不可有猪肉食品。*

  在马来西亚的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看到马来人或印度人经营的小食档——又称嘛嘛档（mamak），深受华人的喜爱。一位华人青年说：“嘛嘛档的食物和饮料价格不高，而且营业时间长，有的甚至24小时不休，我们一班好友知己最喜欢夜来聚集在这里长谈。” 可以说，“泡嘛嘛”在这里的华社中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融合现象。   事实上，在数十年来与各族共处，接受多元文化的熏染下，这个坚持保留母语和传统文化的华社也有着其开放多元的一面。尤其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点滴中，既可见他们对传统的坚持，也可感受到他们高度融合的一面。

       “华人对自己的文化非常坚持，但也非常接受友族的文化，我们可以说已发展出一个独特的混杂文化，是马来西亚华人独有的。”致力于保护槟城古迹的文化人林玉裳说。

       相反地，华人本身的文化也渐渐融入友族的生活和文化当中。“例如华人春节会派红包，马来人和印度人也有样学样，只不过他们将之改成该民族的喜庆颜色，变成‘青包’和‘紫包’。”陈亚才表示。“此外，其他民族也将华人的饮食文化进行改良，变成符合他们文化习俗的美食，如包子、油条等。”

   生活在多元族群、籍贯的圈子中，当地华人随时随地都需要准备好几种语言去面对各层面的人事，因此除了华语和本身的方言外，他们也会说马来语及英语，一些人还通晓不少其他籍贯的方言，如福建话、客家话、广东话等。无怪乎许多人都把当地华人称为 “语言天才”。这也造成他们用语混杂的现象——讲华语时，掺夹英语、马来语和方言的词汇和语法，反之亦然。

       在一段话中多语并用，听起来固然新鲜有趣，有时候外人却难以理解其意思，不过，这恰恰成了该国华社的一大语言特色，被戏称为“罗惹”（Rojak，当地特色小吃，类似水果沙拉，在马来语中有“大杂烩” 的意思）。

       马来西亚的城镇已走上现代化，生活条件不错，衣食住行都令人满意。这里的屋价低廉，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房产；建筑风格各异，有中国式的楼阁庭院，构思美妙；有西式的洋房别墅，恢宏坚实，美观实用；更有中西合璧的建筑，兼具两者所长，蔚为奇观。

       马来西亚华人对饮食也非常讲究。他们除了保留很多中国南方闽粤的食物，还结合了其他种族的食物特色，创造出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食品，花样繁多，如巴生肉骨茶、槟城叻沙、罗惹等，都是叫人垂涎欲滴的美食。此外，华人也善于在饮食中融入南洋风味，如酸辣鱼、马来风光、印度式咖缠、泰式东炎等，都是华人的桌上佳肴。他们也因此养成了无辣不欢的饮食口味，例如香辣的马来椰浆饭、咖哩都成了许多华人的最爱美食。

       当地华人也有着混杂多元的服饰文化。他们衣着轻便随意，加上当地气候炎热，因此除了会在正式场合穿上西服外，T恤、短裤和拖鞋就是街头最常见的打扮。在许多正式与非正式的场合如宴会、各类仪式中，华人身穿马来或印度传统服装的情况也非常普遍；更有不少华人把舒适的纱笼（马来服饰）作为家居服来穿，图个凉快。

       在娱乐方面，华人也尽显自身的多元文化优势。他们既可赶场去看西洋乐队表演，也喜欢听本国歌星西蒂·诺哈丽扎（Siti Nurhaliza）演唱的马来歌曲。他们既爱观看好莱坞动作大片，也喜欢本地著名演员 P·南利的喜剧小品。

       当然，最让他们感到息息相通的，仍是自己的民族文化。

       在这里，粤剧、潮剧等传统戏剧不乏观众；而对于中文影视和流行音乐，华人更是如数家珍。中国大陆、香港或台湾各年代歌星演员的作品，在这块土地上都获得广泛热情的回响。此外，阅读如金庸、余华、张爱玲等中、港、台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是许多文艺爱好者的体闲活动之一。

       无论如何，对于通婚，华人却显得相当抗拒。

       的确，当地华人较少和外族人士通婚，一般都保持纯华族血统。尤其是出生即为回教徒的马来人，华人家长通常都不允许子女与他们通婚。因为一旦结为秦晋之好，华人将被强制变成回教徒，这样就等于要放弃自己的文化，甚至中文名字。“虽然华人可以通过通婚获得‘土著’身份，享有‘土著’的一些特权，但比起要放弃自己的文化，还是得不偿失。” 一名华人青年如是说。不过，在东马，与原住民通婚的华人就相对较多。一些原住民信奉天主教，因此华人比较容易接受。

       从通婚的多寡情况看来，中华文化显然还是当地华人最为坚持的一环。对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他们来说，忘祖弃宗可是一项严重“罪名”。

* *当地华人虽已进入第三、四甚至第五代，尽管许多人并没有真正去过自己的祖籍地，但大部分人对自己的祖籍都还很清楚。他们名字英语的拼写方式也是以祖籍地方言发音为标准，因此经常同一个姓有多种不同的拼法，可以轻易从姓氏中认出他们的籍贯。例如，同样是姓陈，广东人拼为“Chan”，客家人拼为“Chin”，福建人拼为“Tan”，福州人拼为“Ting”，潮州人拼为“Tang”。*
* 因通货膨胀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马来西亚新一代华人开始选择减少生育，家庭结构越来越趋于小家庭式。这促使华人人口日益趋少，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华人害怕他们的权益可能会受到侵蚀，因此人口问题成为当地华社的一大忧虑。一些华团为鼓励华人多生育，还曾推出多生有奖的活动。
* 这忧虑来自于何？若问起当地华人，往往可以在其言谈中感受到对当地政府的一丝怨叹。当年，华人人口比例也较高，在政、经、文、教等各领域的发展非常顺利。但随着人口的缩小和政治上的无能为力，加上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让华人觉得自己作为公民的平等权益遭到侵蚀。
* “不过华人也明白，这并非政策问题，而是执行的偏差所造成。” 陈亚才说。
* 在坚持保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当儿，华人也不断遭受到是否爱国的质疑；当地政府的偏差待遇更让年轻华人难以适应及困惑，有些人甚至发出“我爱这个国家，奈何国家不爱我”的感慨。“尤其来自独立中学的华人子弟，往往因被国家体制拒绝而有疏离之感，也导致他们和主流社会的鸿沟越来越大。” 陈亚才叹道。
* 有不少人选择离开，移民他国。如今许多国家如新加坡、台湾、澳洲、英国等都可以找到马来西亚华人的踪影，当中不乏许多精英在各界各业大放异彩；但有更多的人扎根已深，早己视马来西亚为一己家园。对土生土长的华人来说，马来西亚才是他们的家乡，他们热爱这块土地，并效忠于这个国家。只是在那血液里的“文化基因”，他们无法全然切断。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追求本民族文化的权利，而国家和文化认同可以截然分开，更可以并行不悖。马来西亚华人常常强调：“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的华人。”在他们强调身份之时，也正是他们寻找身份之时。如何在“坚持”与“融合”的天秤上寻找平衡点，成了马来西亚华人长期以来念兹在兹的问题与困境。
* 提起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就不得不提起林连玉。
* 林连玉1901年出生在福建永春，自上世纪20年代便开始投身杏坛教育耕耘，来马后依旧操持故业，为华文教育耕耘。他不但将毕生积蓄投入建校，还致力于维护华文教育，主张民族、语言平等，并推动了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和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的成立，成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及华人公民权益的代言人。
* 在出任教总主席的8年间，他面对一次次不利于华教的冲击却毫不退缩，以智慧和勇气保住了早期摇摇欲坠、花果飘零的华文教育。最后，他却被马来西亚政府褫夺公民权并吊销教师注册证。林连玉坚信，文化是民族的灵魂，而教育就是民族的文化堡垒。他也曾振臂高呼：“我个人的利益早置之度外，为华文教育牺牲永不后悔！”
* 他为马来西亚华社树立了一个不可动摇的精神典范，于是大家都尊称他为“族魂”。
* 马来西亚华人不但完好地保留中华文化和习俗传统，而且还不时为之注入新的元素，通过创新把华人文化发扬光大。除了传统的华乐、扯铃、茶道、书法、武术之外，他们最引以为荣的是自创的二十四节令鼓和高桩舞狮。
* 在没有二十四节令的国度里所创立的二十四节令鼓，可谓独创之举，也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智慧再现。其主要创始人是陈徽崇和陈再藩（小曼），宽柔中学二十四节令鼓队则是世界首创的队伍。他们在1988年为新山的”端午诗节” 及吉隆坡天后宫的“源之夜”演出后，1989为马六甲第六届全国华人文化节的序幕礼做了一次空前的露天演出，更是惊艳全场。
* 二十四节令鼓由二十四面单皮鼓和二十四名鼓手组成，每面鼓代表一个节令，表演融合鼓乐、舞蹈及书法艺术。鼓声、呐喊声与鼓手合为一体，气势振天，让中华文化焕发出无穷的活力，流传不息。
* 如今，除在原创地有超过5千名鼓手之外，它也传至新加坡、印尼、中国大陆、台湾甚至澳洲、欧洲等地，享誉全球。特别是在台湾的小学，二十四节令鼓已蔚然成风，甚至还有专门的暑假培训营。
* 作为传统中华文化的舞狮舞龙，曾被马来西亚政府明令禁止。“他们觉得狮子和龙怪异，要舞就舞马来西亚特产的老虎。”华人哭笑不得之余，反而更加坚持维护传统文化，不但在禁令下舞得更多更起劲，还精心专研中国舞狮，创出动作惊险、更具观赏性的高桩舞狮，在世界性的比赛是著名的长胜军。
* 如今禁令已除，舞狮不但获得各民族喜爱，在各场合中经常亮相，2007年高桩舞狮更被马来西亚政府列为本国50大国家文物遗产。它也北上中国，获得了国际龙狮总会的表扬，并推广到世界各地。

印尼

    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地跨赤道两侧，拥有1万7千多个岛屿，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 这里处处青山绿水、椰风蕉雨， 被誉为“赤道上的翡翠”；土壤肥沃、资源丰富，也为它赢得热带宝岛的美誉。

       17世纪初，荷兰殖民势力首先侵占爪哇，接着便向外岛扩张势力，到了20世纪初，整个印尼沦为荷兰殖民地。1945年，印尼宣告独立。独立多年以来 ，政局动荡，军人跋扈， 经济萎靡，贪污盛行，民生困苦。今天，政府极力推动改革措施，逐步导向正轨发展。

       华人移民印尼的历史悠长，他们曾用生命来捍卫这片土地，并与当地人共同参与艰辛的建国工程。奈何，政治变天，华人的性命、文化一度岌岌可危，但他们总是咬紧牙根，意志坚定地熬过连串排华事件。在血泪斑斑的苦难史迹上，印尼华人凭着不屈不饶的精神改善自己的命运，在荆棘满布的道路上走向光明。

 早在17世纪荷兰的势力伸向爪哇（Jawa）之前，华人已涉足印尼。据马欢（郑和随从）的《瀛涯胜览》记载，15世纪初，爪哇北岸的杜班 （Tuban）、锦石（Gresik)、苏儿把牙（Surabaya，即泅水）等港口已出现了华人聚落，有的聚落有千多户人家，都是广东人与漳州人。

       爪哇西部的万丹（Banten），16、17世纪时是个繁荣的商港，胡椒的集散地，各地商贾云集。当时的华人人口多达3千至4千人，当中有的耕种，大多数经商。

       到了1619年荷兰占领了巴达维亚（雅加达）后，积极发展，很多华人便被吸引过去。巴城华人人口迅速增加，1629年已达3千多人，他们的职业形形色色，有种植水稻及甘蔗等作物的农夫，有手工业者与劳工，有从事制糖业与酿酒业者，更多的是商人。

       早期爪哇的中国移民，绝大部分是男性，一旦有了稳定的生活，安定下来之后，便与当地妇女结婚。异族通婚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他们的后代便成了混血儿，世世代代繁衍下来，人数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族群，即所谓的土生华人（Peranakan），在爪哇的人数很多，势力雄厚。

       为了阻止华人经济实力扩张，荷兰从17世纪末开始，多次立法禁止华人入境，甚至于1740年谋划了“红溪大屠杀”惨案，怂恿当地人屠杀和劫掠华人，导致近万名华人被杀害。后来，荷兰发觉印尼的经济发展必须靠华人去推动，才废除了华人入境的限令。

       19世纪下半叶的几十年间，爪哇各地掀起了中国移民浪潮，中国移民所到之处，促进了地方的开发，城市的兴起与经济的繁荣，爪哇一系列的城市如万隆（Bandung）、三宝垄（Semarang）、茂物（Boyor）与玛琅（Mellang）等，都是因华人的涌入而发展壮大的。

       华人移居外岛，源远流长。据《瀛涯胜览》载述，东人陈祖义曾携眷逃亡旧港（Palembang，即巨港），沦为海盗，剽掠过客。郑和率领兵卒将他擒拿伏诛。那时，旧港也有其他华人流寓，他们多是广东人与漳泉人。17世纪的亚齐，是个繁荣的商港，中国商贾来这里经商，有些做完生意后，便扬帆归国；有些则定居下来。

       可是，一直要等到19世纪下半叶，才有大批契约华工踏足苏门答腊（Sumatera）。西方资本家已在苏岛投下巨资，拓殖发展庞大的种植园，栽种经济作物。他们首先在海峡殖民地招募华工，嗣后更打中国华工的主意。他们通过代理人，在香港、澳门、厦门、汕头及广州等地，用劝诱、拐骗及掳掠的手段，要华工签订合约。

       签约后，华工就被送往苏岛东岸的日里（Deli）的烟园去服劳役。据统计，在1930年，日里的契约华工有2万6037人。合约期满后有些华工回国，有些则留下来。华族移民的涌入，促成了棉兰（Medan，日里的首府）的崛起。

       18世纪之前，加里曼丹（Kalimantan，即婆罗洲）很少华人。直至18世纪中叶，华人矿工蜂拥而至，在三发（Sambas）及坤甸（Pontianak）等矿区组织了公司，进行采矿。矿工多属客籍，鼎盛时期多达好几万人。兰芳公司后来更扩展为共和国，组织严密，职权分明，独霸一方，公然与荷兰政权对抗。1888年，在荷军的猛烈围攻下，不幸被击溃，共和国遂告寿终正寝。除金矿工人外，这里的华人也务农，从事水稻、蔬菜等的种植，现在被誉为西加里曼丹的粮仓如邦戛（Pamangkat）、山口洋（Singkawang）等地区，都是那时开垦出来的。

       邦加（Bangka）与勿里洞（Belitung）锡藏丰富，18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获得了锡矿的开采权，便通过代理人，从华南招募劳工前来采矿。自18世纪中叶以后，前来的契约华工络绎不绝，至1921年，受公司雇用的邦加矿工已高达2万3400人，勿里洞的矿工也有2万865人。

       随着大批矿工的到来，商人亦接踵而至，华人聚集的地区，逐渐形成了喧闹的城镇。这就是西加里曼丹比其他地区开发较快速的原因。

       与早期的中国移民不同，19与20世纪的移民不仅掀起了巨浪，女性移民也越来越多，男女的比例逐渐趋向平衡，因此减少了异族通婚的现象。这些后期的移民，建立了华人的家庭，保留了中华文化与华人的传统习性，形成一个庞大的华族群体，就是所谓纯血统华人（Totok），纯血统华人除居住在爪哇外，尤多散布在外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内外情势的变迁，不再有中国移民入境，印尼华人人口的膨胀，主要是基于自然增长的缘故。而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华人又逐渐恢复过去的经济地位。不幸的是，他们渴望迎来安定的生活，却接连爆发排华事件。

       1960年，当地政府禁止华人在县级以下的地区居住，华人唯有涌进城内，造成50多万人失去生计；1965年的政变，华人更是遭遇了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印尼以铲除共产党的名义，滥杀了许多无辜的华人。那时有任何风吹草动，华人都提心吊胆。在几十公尺外听到‘砰砰’的关门声，华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把自己的店门也关上。”走过那场九·三十排华风暴的老华人，至今仍记忆犹新：“至少有30万华人死在那血腥的暴行中，多么惨痛啊，但我们又无能为力。”

       此后，华人走入了“被合法歧视”的黑暗时代。印尼华人的居民证上注有“非原住民”的记号，且经常被称作带有歧视意味的“支那”（Cina）。前印尼总统苏哈多所实行的强制同化政策，使得华人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受到诸多限制，包括禁止使用中文，中文学校遭关闭，中文刊物、招牌等遭禁，华人改用印尼文名字，不容许在军警部队和国立学校担任公务员，甚至不能公开进行任何中华文化活动。因此，华人大多从商，靠做生意累积财富。

       在战后的数十年间，印尼间歇性地爆发了排华暴行，尤其是1998年的“黑色五月”，华人店铺和住宅被抢掠及焚烧，华人妇女在光天化日之下惨遭侮辱和强暴，造成华人的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并构成难以磨灭的创痛。

       幸而在苏哈多总统下台后，印尼改朝换代，排华暴行逐渐消失，华人才得以喘一口气，重新振作起来。

* *在强制同化政策下，绝大部分华人都改名换姓了，有些不愿舍弃本身姓氏的，便把中文姓氏的发音融进印尼文名字里，如姓林的改为Salim，姓陈的改为 Tadjuddin，Tandjung， Tanto或Chandra，姓苏的改为Susilo或Sufeni， 姓许的改为Sunarko， 姓黄的改为Widjaja：或 Wantah，姓叶的改为 Yaputra，姓何的改为 Hondir，姓吴的改为 Soedargo或Gunawan，姓谭的改为Hamdami，姓丘的改为Hiunardy，姓颜的改为Gani或Gandraputra，姓古的改为Kusima，姓李的改为 Rusli或Liman等等。*
* 印尼华人人口到底有多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30年荷兰殖民政府做了一次人口普查，共有123万余华人，占总人口的2.03%，相隔70 年后才有另一次人口普查的统计，华人约有241万，占总人口的1.2%。据印尼研究学者廖建裕、Mary Somers Heidhues、陈怀东、《亚洲周刊》及《远东经济评论》等的估算，印尼华人人口介于500万至600万之间，约占总人口的2.6%。但印尼学者达哈纳（A. Dahana）认为有772万，而印尼报人李卓辉却认为已高达1千万。印尼华裔总会主席许世经甚至说：“到今天为止，我相信全印尼共有1500万华人人口，大概占印尼总人口的6％。”
* 落差之大，关键在于对“华人”定义的不同。混血的土生华人是否算是华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估算数据自然“高估”，否则就是“低估”。此外，在长期的排华环境下，为了避免麻烦，有些华人否认自己的“华人”身份，也引起调查上的混乱。
* 一般而言，福建人多聚集在爪哇各地、苏门答腊东部、西部与南部、加里曼丹东南部、苏拉威西与马鲁古等地；客家人多居住在爪哇、苏门答腊北部、邦加、勿里洞与西加里曼丹；潮州人多散布在苏门答腊东岸、廖内、西加里曼丹等地；广府人则多聚居在加里曼丹东南部、苏门答腊东部、邦加、苏拉威西、马鲁古及小巽他群岛。
* 印尼华人大部分来自中国南方省份，福建和广东各占约40%，海南、广西、江苏、浙江、山东及湖北等省籍者共占约15%。目前，90%以上的华人已入籍成为印尼公民。
* 印尼华社曾有过辉煌的岁月，可惜经历了多次排华浪潮，文化内涵已冲淡不少。近十年来，反种族歧视政策纷纷出台，华文学校、华文媒体、华人社团组织、华人文化活动接连复办，为华族文化的复兴掀开序幕。这里的华人，正整装待发，重新上路。
* “华人都很富有”、“华人是吸血鬼”、“华人控制了印尼70％的经济” 等以讹传讹的言论，让许多人信以为真，也成了排华的催化剂。
* 其实，印尼的华人社会，阶级分化，呈现金字塔形，下层阶级的人数最多，中层阶级成员居次，上层阶级的人数最少。上层阶级成员包括大企业家、金融家等，他们腰缠万贯，资产雄厚；中层阶级包括中小型企业家、商人、专业人士、服务业与运输业业主等，收入不错，生活舒适；下层阶级成员包括工人、农民、渔夫、流动小贩、店员与矿工等，散布在爪哇与外岛，地位低微，生活穷困。
* 从商是印尼华人经济最重要的一环，其中以经营零售业如百货、五金、电器、药材等占多数，也有的是从事入口贸易或开设餐馆。近年来，华人经营的超级市场，处处设立分店，引人注目。在城镇里，触目所见都是华人商店，使人产生错觉，以为华人控制了大部分商业活动。实际上，根据经济学家哈林·佐迪帕的调查显示，无论是大、中、小商人，原住民都要比华人多，说华人支配了商业，是站不住脚的。何况乡村的零售店，自1959年政府立法强制华人停业，全盘由合作社与土著接收后，华商在乡间便销声匿迹了。
* 曾几何时，华人在某些经济领域占尽优势，如纺织业、面粉加工业、成衣业、木材加工业等。1970年代以后，大型华人企业集团逐渐冒起，资产高达几亿或几十亿美元，较著名的有林绍良的三林集团、黄奕聪的金光集团、蔡道行的盐仓集团、李文正的力宝集团、彭云鹏的巴里多太平洋集团等。他们投下巨资设厂，经营银行、汽车、木材、水泥、房地产、纺织、塑料、食品、酒店等行业，数十家华人企业的年营业超过一万亿盾。可是，这毕竟是少数，而且跟国营企业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
* 国营的石油、天然气、邮电、大种植园、通讯、电力、铁路及航空，完全操纵在政府手中。根据印尼中央统计局发布的数字，90年代初印尼全国资产总额为2500亿美元，其中各类私营公司资产总额占12%，即300亿美元左右。即使这300亿美元资产中的一半是华人资产，所占比例也不过6%，说什么华人控制了印尼70％的经济，何以自圆其说。
* 华人的经济实力不如传言般雄厚，却在国家经济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减缓了当地的人口就业问题，并增加国家财政税收，为促迸印尼的繁荣与富强作出卓越的贡献。
* “印尼200大企业家排行榜里，有170个是华人。根据统计，华人大企业约有500家，中小企业则有30万家左右。不过，劳动阶层还是占多数，超过华人总工作人口的80%。” 印尼《国际日报》总编辑李卓辉说出了华社贫富悬殊的现象。“大多数华人还是得靠双手劳动，每天省吃俭用来维持生活的。有的华人还住在茅草屋里，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就会让女儿嫁到国外去，以改善家里的经济环境。” 出生于西加里曼丹山口洋市的林展理表示。
* 在后苏哈多时代，印尼已经没有可资垄断的行业，很多行业都有土著参与。目前仍由华人独领风骚的领域，可能就只有零销代理。许多国外品牌的电器、交通工具等，主要都是由华人引进代理销售。“华人凭着良好的商誉和勤俭、讲信用的美德，才能屹立不倒。” 班芝兰唐人街的玩具批发商黄耀鸿如是说。
* “华人在印尼的经济发展显得非常活跃，更在中产阶级中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 印尼华人研究学者廖建裕分析说：“华人的优势是住在城市，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接触更多外界资讯，加上与世界各地华人保持联系，让他们轻易在印尼建立起覆盖面广泛的销售网络，日常用品销路坚挺，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 华人踏足印尼，为的是寻求更美好的生活，至今他们仍然对这片土地怀着梦想。“这里资源丰富，市场庞大，劳力低廉，对脑筋转得快的华人来说，找生活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政治保持稳定，这个国家肯定前途无量，我们的未来也一样。”华人总是这样想。
* 普遍上，华人的平均收入比当地人高，物质生活也较为充裕，也正是这些差距，引起部分人心理上的不平衡。“华人要做好生意，也要搞好国家经济，更要积极参与印尼的建设。”印尼工业界闻人郑年锦语重心长地说。
* 为国家建立良好的经商环境，推动更多建设工程，协助土著创业，是印尼华人目前的首要任务，也是拉近与当地人距离的最佳途径。
* 印尼华人社会结构多元，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各具特色。
* 土生华人是早期华人移民与印尼土著通婚的结晶。他们只有印尼文名字，中文姓氏与祖籍或许已不可考，有的甚至会把自己归类为土著族群的一分子，生活中参杂了许多当地特色。他们大多已失去说中文的能力，平常以印尼语或当地方言沟通。会说中文的华人群体，就把这群和其他不懂中文的华裔称为“侨生”。
* 土生华人已没有使用筷子和汤匙的习惯，反而入乡随俗，像当地人那样用手来吃饭，食物口味也偏辛辣。有人形容，土生华人的生活习惯已接近土著，但依然传承了华人的传统文化。“虽然他们不知道很多习俗背后的意义，有些甚至已被其他地区的华人群体扬弃了，但他们还是完好无缺地保留下来，如拜堂和祭祖仪式等。”难怪有些土生华人会说：“完全看不懂Lian（春联），但每逢新年还是会请人来写。我们就是比其他华人更华人！"
* 纯华人和20世纪上半叶才移居印尼的新客华人，则是民族意识较强的一群，也是较常被提及的印尼华人社群。他们口操华语或家乡话，还保留着不少华人习俗。基于殖民制度，他们没能很好地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依旧活在华人圈子里。
* 比如一些爪哇以外的外岛华人，很多都是18世纪中叶招募到当地从事开采活动的华人矿工，后来矿源枯竭，他们转而耕作、当木匠或做小生意，与多数是商家的爪哇华人有别。他们散居各地，并保有更纯粹的华人传统文化。西加里曼丹的坤甸和山口洋市亦是如此，潮州话和客家话响遍耳际，栖身其中，仿佛在一个淳朴的华人小国里漫步。
* 苏哈多实行了30多年的同化政策，让许多新客华人的后裔，尤其是住在大城市如雅加达者，也逐渐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不过，即使入了籍、改用印尼姓名，他们当中有些仍保留着中文姓名；无法在当地接受中文教育，就把子女送到邻近国家学习中文；没有中文读物，就通过卫星电视或进口影碟重温中华传统文化。
* 随着中国崛起，国内政治气氛逐渐开放，印尼华人积极展开文化寻根之旅，坊间也兴起一股学习中文的热潮。
* *印尼住着300多个族群，文化交融的现象处处可见。在印尼语词汇中，Tauge（豆芽）、 Tauhu（豆腐）、Kuchai （韭菜）、Caisim（菜心）、Teh（茶）、Lobak（萝卜）、Beca（马车）、Bihun（米粉）、Bakmie（肉面）等，都借用了闽南语的发音。直到今天，土著还是习惯以“Jipak”（一百）、“Gohchap”（五十）来叫价。*
* 对华人来说，印尼既是地狱，又是天堂。每当发生排华暴乱，恶浪铺天盖地而来，转瞬间成了人间炼狱；雨过天晴，一切恢复正常之后，这里又是华人的天堂。
* “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家！”血洗的历史固然惨痛，但华人并没有带着仇恨和恨意，因为他们知道多数的印尼人并不赞成排华的恶行。“印尼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大多数印尼人都很善良，他们原本就很单纯、乐观，也没有坏主意，如果你对他们好，他们会对你更好。杀害华人并非他们的本意，只是有心人从旁煽动罢了。”有的华人这么说。甚至有人说：“华人在这里不是异类，我们是印尼人，是一体的。”.
* 这里交通秩序紊乱，只需花1千或2千盾，就有人替你开路，让你通行无阻；出门用餐不打伞，下雨也不着急，身边随时有人为你撑伞遮雨，每次酬劳大约5千盾。华人笑说：“在印尼有几千盾就可以获得如帝王般的享受。”
* 1998年爆发了排华事件之后，华人提高了警惕性，并从现实中吸取教训，体悟出一些道理来。“只要你摸索出一套生存之道，日子还是可以逍遥自在、无拘无束的。”这是印尼华人的生活体验。华人言行举止也收敛了不少，不再大事铺张，过着低调的生活。
* 一般来说，印尼华人的生活是较为舒适的。多数华人属小康家庭，都会聘请帮佣打理家务，如洗衣烧饭、搞卫生、带小孩，或充当司机，这样一来，华人便能心无旁鹜，专注事业的打拼。在一些大城市如雅加达，帮佣或许还不止一个。一些华人雇主坦言，失去了帮佣，他们的生活会变得一团糟，1998年骚乱爆发之际，也是这些帮佣站出来维护华人雇主。
* 纵使排华事件已经过去，但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 “心理上还是有些害怕，所以会选择住在华人居多的新村，并且聘请保安看守，晚上出门也会找人陪伴。”难怪许多华人住宅，都用高高的围墙区隔开来，大门铁栅至少有两公尺半高，上面还有锋利的铁丝。“以前做生意没有那么多顾虑，商品总是堆满整个仓库；现在由于担心暴乱重演，一切可能在瞬间化为乌有，因此经商手法变得保守，不敢存货太多。” 华人商家这样说。
* 不过，这一切都在改善中。
* 在苏哈多时代，华人丝毫不敢张扬，深恐泄漏了炎黄子孙的身份，会惹来飞来横祸；现在，华人可光明正大在屋外拜天公，甚至贴上春联或挂上红彤彤的大灯笼，再也不避讳了。
* 印尼华人终于可以踏上公众的舞台，毫无顾忌地唱起中文歌曲来。许多脍炙人口的中文歌曲如《月亮代表我的心》，都谱上印尼文歌词，这首歌也是许多大型晚宴指定的演唱歌曲。年长的老华人喜欢在聚会上载歌载舞，即使是不谙中文的年轻华人，也会以拼音的方式来背诵中文歌词。
* 在文化多元的印尼，华人的生活也显得多姿多彩。“印尼这么大，到处都有明媚的景色，闲来与家人在国内旅游是一种至上的享受。” 因此，不难理解华人家中为何总是有一台7个座位的多用途轿车。
* 提到未来的远景，印尼华人总是说：“突破华人圈子的围墙，与其他族群融为一体，创造和谐安宁的社会！"
* 在苏哈多时代，当世界各地的华人燃放鞭炮，敲锣打鼓迎接新年之际，印尼华人碰到亲友却只能偷偷拱手作揖，低声说 “恭喜恭喜”。
* “在苏哈多时代，华人到庙里烧香膜拜，大家都行色匆匆，不敢长时逗留，气氛不比现今热闹。那时候，庙里不得不取下有中文字样的牌匾，或用布遮盖，而印上中文字样的蜡烛，也得换上特别订制的印尼文蜡烛。” 历史最悠久、香火最鼎盛的金德院管理员梁佑益回忆说。
* 今天的情况却大异其趣。自2003年开始，华人新年被列为全国公共假日，而舞龙、舞狮等大型活动，也堂堂正正走上街头。在印尼，元宵节的热闹气氛更胜年初一，有说是因为当年政府禁止任何庆祝活动，华人在年初一只好低调地串门拜年，到了元宵节就能以宗教名义，抬着神轿出游，举办盛大庆典，让春节有个圆满的句号。每年成千上万的游客到山口洋观赏元宵庆典，就发觉到它的魅力有多大。

尽管农历新年被禁了30多年，但华人还是保留了一些过年的传统习俗。初一到十五都有特定的习俗，比如初五到墓园向死者拜年，初七要吃7样菜，初八到8间庙宇祭拜等等。当然，华人节日也参杂了一些印尼本土特色，比如在除夕夜，咖哩鸡（Kari Ayam）和沙爹肉串（Satay）就是饭桌上少不了的佳肴。

       农历新年以外，华人最重视清明节。就算是在外地工作的游子，都会趁清明时节赶回家乡拜祭祖先。另一个重要的节日是中元节，俗称 “鬼节”。

       华人节日如今不再纯粹属于华人了，印尼人也同时分享节日的气氛。

* *华人新年在印尼文中称为“Perayaan Imlek”，借用闽南话“阴历” 的读音，而印尼传统食品“Lontong”也打动华人的欢心，演变成“Lontong Chap Goh Mei"（元宵饭团）。印尼华人新年采用孔历计算法，即从孔子诞生的年份开始算起，如2009年，也是孔子诞辰2560年，庆祝的就是 2560年的新年。*

  1966年以前，印尼有大约2100多个华人社团，与数量庞大的中文学校、中文媒体，构成发展成熟的华社。在苏哈多时代，政府接连取缔华人社团，只保留少数以基金会（Yayasan）形式成立的华人团体，以及一些姓氏、慈善宗教社团。这一来，社团的华人色彩变淡，融入更多的本土元素，也有的社团改以宗教或慈善团体的形式，暗地里地从事社团工作。

       直到1998年以后，印尼华社呈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日渐式微的中华文化如同久旱逢甘露，华人社团也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可能情绪压抑得太久，政策放松了，大家组社团、办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转瞬间，印尼各地涌现了各种各类的社团组织，特别是雅加达、万隆、泗水、棉兰和三宝垄等华人集中的地方。” 但也有华人认为，无节制地组织社团，会减弱华人的凝聚力。

       大大小小的华人社团，散落在全国各地，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包括早操队伍、歌唱团体、学术协会等，保守估计有近千个。印尼客属联谊总会开办了崇德三语学校；一些原中文学校校友会、姓氏和宗亲会、地缘组织，购置会址充当活动场所；全国性综合社团如印尼华裔总会、印尼百家姓协会等，要求撤销种族歧视法令，并且积极争取印尼华人享有与其他民族同等的权益。

       经历了1998年的排华风暴，华人不再只是一味埋头经商，取而代之的是纷纷参政议政，以提升本身的地位。4个由华人主导的政党相继成立，即印尼融合党、中华改革党、印尼大同党和印尼佛教民主党。在1999年大选中，唯一获准参选的印尼大同党赢得3个国会议席，有8名华人当上国会议员，郭建义更当选为人民协商会议副议长兼内阁部长。

       “华人政党在印尼还成不了大气候，但华人参政为大势所趋，无论加入哪个政党，整个华社就是强力的后盾。” 印尼华裔总会和印尼百家姓协会创办人黄德新，鼓励更多年轻华人踏上参政之路。

       近年来，华人的政治表现可圈可点。2003年，西加里曼丹华人张锦坤当选为上候县县长；2004年的国会大选中，参选政党分别推举170名和130名华人为国会及地方议会议员的候选人，同年十月，冯慧兰被委任为贸易部长；2009年，约有1千名华人参与国会和地方议会的选举。

       走上改革道路后，印尼政府逐步改善当地华人与主流社会的关系，华人也以实际行动来落实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印尼华人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 *同生肖的华人也聚在一起成立联谊会，只要本身或配偶出生在该生肖年，就可以成为会员。现有属虎、属狗、属蛇以及属兔的生肖联谊会，其中威虎联谊会成立得最早，已有4年历史。华人社团活动，大多沿用华人传统仪式，如瑞狮迎客等，但致词或开会时，则主要使用印尼语。*
* 印尼有接近90％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有说当年把伊斯兰教传入这千岛之国的，就是中国的航海家郑和。然而，在这里生活了很久的华人，皈依伊斯兰教的却不多。
* 早期华人以民间信仰为主，由于当时福建人占多数，因此福建地区的民间信仰流传最广。大大小小的寺庙遍布全国各岛，许多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古庙，至今仍香火鼎盛。雅加达著名的金德院，早在1650年已建立，主要供奉妈祖、观世音菩萨、关帝等。华人居多的山口洋市，更被称为“千庙之城”，多是供奉大伯公的庙宇。
* “华人庙宇不纯粹是宗教场所，同时也积极投入社会慈善工作，有的设立西医诊疗所为人民看病；每逢初一、十五或发放救济品时，我们也不分种族、不分信仰地给予援助。”梁佑益说。
* 1965年印尼发生流血政变，华人担心被扣上“无神论者”或“共产党人”的帽子，纷纷饭依基督教或天主教，特别是受西方或中文教育的华人。据学者统计，1953年，在印尼华人中只有10%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但是到了1991年，人数已超过20%，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为了更容易融入主流社会，也有人曾呼吁印尼华人加入伊斯兰教，但华社的反应却相当冷淡。
* 可能原因有三。首先，基督教与天主教跟华人习俗的冲突比伊斯兰教小。其次，基督教和天主教自殖民时代沿袭至今，印尼有不少原住民都是信徒，华人也信奉同一宗教，意味着与土著达到某个程度上的融合。
* 另外，当年中文学校遭关闭后，许多华人家长把孩子送到教会开办的学校就读，而这些原本信奉佛教、道教或民间信仰的家长，对孩子宗教的转变并没有太大的抗拒。经过时间的推移，许多华人家庭已逐渐过渡到西方宗教信仰，印尼华人还凭着自己的力量，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华人基督教堂——弥赛亚大教堂。
* 曾几何时，印尼政府把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佛教，及以华人信徒为主的孔教列为国家的六大宗教。孔子的儒家教义、思想，受承认为国家宗教之一，这是东南亚地区乃至全世界罕见的现象。不过，后来基于政治因素，苏哈多政府以“妨碍同化”为由，宣布自1900年开始在印尼发展的孔教为非法宗教，使当时约有300万信徒的孔教转为地下和家庭活动。
* 1999年，自称有华人血统的瓦希德当上总统后，恢复了孔教的合法地位，他还出席了孔教会所主办的春节联欢会。会上所宣布的孔历华人新年，也推广到全国各个阶层，并沿用至今。继任总统也大力支持孔教会在春节期间所办的活动。
* “孔教会在全印尼大约有100多个分会，相信有超过几百万信徒，在侨生华人群体内流传极广。”雅加达近郊丹格朗（Tangerang）孔教庙的负责人罗伟源如是表示。
* 孔教庙每周日以类似基督教崇拜诵经的方式，进行祭孔仪式，不过，教义内容都是四书五经翻译成的印尼文版本。“侨生看不懂中文，但却十分了解传统习俗，教会还成立了舞狮舞龙队伍，以吸引更多的年轻华人参与。”
* “孔教不仅仅是宗教，也是人类生活哲学的最佳指引，以免误入歧途。”侨生信徒以印尼语这么说。
* 印尼建国宪法“潘查希拉”（Pancasila）的第一条就是“信仰神道”，即政府承认人民有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经历了接近半个世纪的磨难，华人在这里终于呼吸到宗教自由、多元化的新鲜空气。
* 中文报刊在印尼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但经历坎坷。
* 20世纪初，印尼华人自办的中文报纸陆续出现，有1901年创办的《理想》、1902年的《泗水新闻》、1908年的《泗滨日报》，以及《新报》和《天声日报》等。日本占领印尼并勒令所有中文报纸停刊前，大约有20多家在发行。
* 印尼独立后，中文报纸进入群雄争霸的发展阶段，主要分为亲中国大陆、亲台湾和标榜中立3类报刊，其中《新报》、《生活报》和《天声日报》影响力较大。后来，排华浪潮把印尼13家中文报刊卷入停刊寒流中；九·三十政变后，更是中文媒体走向衰落的开始。一声令下，中文报刊悉数被关闭，政府为了向只懂中文的华人群体传达信息，于是在 1966年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日报》8个版面中，保留了4版中文，成为中文仅存的活动空间。
* 1998年瓦希德上任后，中文报禁解除，新闻自由的尺度也变宽了。“现在的印尼，可说是东南亚区域新闻和言论最自由的国家。”住在这里的华人，都有这种感受。
* 自2001年台湾联合报系在印尼出版了首家外资中文报——《世界日报》后，陆续出现的中文报有《和平日报》、《新生日报》、《国际日报》、《印度尼西亚商报》、中文和印尼文互译的《华文邮报》及《千岛日报》等。曾经垄断市场的《印度尼西亚日报》于2006年与马来西亚最大的中文媒体星洲集团合作，易名为《印尼星洲日报》，改变办报风格及开辟电子版，继续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 由美国国际日报集团于2001 年斥资创办的《国际日报》，目前是全印尼发行量最大，也是唯一在雅加达、棉兰、泗水、坤甸 4个城市同时印刷发行的中文报纸，包括东爪的《泗水晨报》、西加的《坤甸日报》和苏北的《棉兰早报》。
* “全印尼的中文报纸发行量有十多万份左右，许多仍是亏损地经营着。不过，随着中文教育复苏，加上中国迅速发展，可以预见中文读者群将会不断扩大。” 业者大都对中文媒体的发展前景表示乐观。
* 无可否认，目前中文报业的发展还是处于过渡期。
* “经历了30多年的文化断层，中文人才严重短缺。许多中文报馆的员工其实对中文一知半解，排版员大多是不懂中文的印尼人。” 李卓辉感慨地说，《国际日报》就有四分之一的员工不谙中文。也有些报馆直接从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引进人才，以填补人力资源上的不足。“可能还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接上轨吧！” 有人这么认为。
* 不仅是平面媒体，印尼的中文电子媒体也面临相似的窘境。由于缺乏中文造诣较高的人才，广播时经常出现发音、语法等问题。这一切，都在慢慢改善当中。
* 启播于2000年的加科哇拉（Cakrawala）第一华语广播是雅加达首家中文广播电台，除了播放中文歌曲，也播报新闻，同时制作一些时事和清谈节目，深受华人社会的欢迎。这个初期只有老华人收听的电台，后来也吸纳不少年轻的听众，主持人甚至用印尼语与听众沟通，以拉近与新一代华人的距离。迄今，印尼仍未有覆盖全国的中文广播电台，发展空间不小。
* 中文电视台在印尼则仍是个梦，不过2000年启播的美都电视台（Metro TV），却开创了每天早上播报中文新闻的先例，惟播报时间不断缩减。
* 自禁令解除后，这个中文一度湮灭的国度，处处林立着中文招牌和广告牌。中文媒体也跟着浴火重生，期望有朝一日能百花齐放。
* 苏哈多统治时代，制定了法令禁止发行和销售中文报刊，没收并烧毁中文书籍，禁止中文的教授与应用，即使用印尼文拼出中文语音也不允许，似乎要把中文从印尼华人的脑海里连根拔起。
* 1965年以前，印尼原本有42万5千名学生在1600多所中文学校上课，后来在不同阶段被全面关闭了。“最后一天上课时，老师和学生都坚持把最后一堂中文课上完，即使那时校园已站满军人。我们心中其实并不害怕，只有激动，因为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中文教育从巅峰跌入谷底。”华人说，这是他们胸口永远无法痊愈的痛。眼见当年投下不少心血建立起来的华校，不是遭废弃就是任由破坏，更是令他们感慨万分。
* 查禁中文的年代，还是有一些教育斗士翻山越岭，冒着被捉和被打的风险，到华人家庭教导中文，继续传递薪火。“上课时只能默读，不能发出声音，担心引起左邻右舍的注意。”西加中文教育协调机构副主席陈惠珍，道出了当年华人对中文教育的坚持。有些华人，甚至把祖辈遗留下来的武侠小说当入门，自学中文。
* 1998年苏哈多倒台后，被禁了30多年的中文，终于重现曙光。可惜，中文教育已经断层多年，40岁以下的华人几乎无法掌握中文。李卓辉分析说：“爪哇岛内或许只有18％的华人说中文，懂得书写的剩下70 万人左右，全国也不过一百多万人。”
* 中文教育风光不再，但印尼华人没有气馁，自解禁后开始筹办中文补习班，并期许中文学校复办。1999年以后，民办中文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发芽，后来政府也把中文列为国立学校的外语选修科目。到了2007年，全国共有1万6千所中学开办中文课，吸引了近2千 万人来学习。
* “中文教育复办得相当快，但基础却没有了。国立学校每周有两节到五节中文课，由校长决定。从中学才开始学中文，成效可想而知。目前这个阶段，我们只能要求数量上有所增加，接下来再提升质量。我们要把中文教育塑造成不仅仅是华人，而是整个印尼民族的事业，如此才能长期发展下去。”雅加达中文教育协调机构主席蔡昌杰这么说。
* 印尼中文教育目前最迫切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它普及化。
* 这就是2004年雅加达中文教育协调机构成立的大背景。目前全国共有18个省份设有协调机构。“阻力虽然很多，但大气候已经形成，我们必须从这个缝隙努力扩展，争取其他国立学校也开办中文班。” 蔡昌杰说，从以前不准讲中文到现今可教中文，耳边传来孩童朗朗的读书声，是许多华人无法想象的画面。 “为了应付国内庞大的中文师资需求，印尼政府甚至提供师资培训资金，而教学大纲也是本地编写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勇于踏出第一步。”
* 印尼中文教育可分为三类：一是台湾商人开办的中文学校；二是国立学校开办的中文课程，把中文列为外来语；三是以印尼语、英语和华语来授课的私立学校、特殊学校或国际学校，开办幼儿班至高中课程，这也是当地华社所指的三语学校。
* 中文教育的大门虽然已经打开，但政府仍禁止设立华校，也未把中文列入国家教育体系内。不谙中文的印尼华裔人数众多，年轻一辈绝大部分已本土化，无法用中文写作或阅读中文读物。“这里的环境根本就没有机会说中文。”新一代华裔无奈地说。
* 中文要在这南洋翡翠岛国健康成长，显然并非易事。所幸，随着当局放宽中文政策，加上中国崛起，印尼也掀起一股中文热，让华人看到中文复兴的希望。
* “前路是曲折的，也是漫长的，但我们肯定会坚韧不拔地走下去，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经历过中文教育的兴衰，曾是中文教师的鬓白老华人坚定地说。
* 早在18世纪，华人曾在西加里曼丹（简称西加）建立起一个小国。
* 那时，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有许多华人来到加里曼丹谋生，大部分集中在西部沿海的坤甸市，他们除了种植农作物外，也开采矿产和煤炭。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华人也组织了会社。
* 1770年，广东梅县客家人罗芳伯在西加设立了兰芳公司，从会社发展为贸易公司，为当地商人或酋长提供服务。后来，罗芳伯在当地的势力大增，把“兰芳公司”改为“兰芳共和国”，全称为“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并担任大唐总长（相等于现今的国家元首）。以东万律为首都，并把立国之年定为 “兰芳元年”。罗芳伯还参照西方国家的法制，制定一套完整的行政、立法和司法系统，把地方分成省、府和县三级来管理。
* 不过，“兰芳共和国”的合法性曾引发争议。但若以当时兰芳拥有独立政府、民主选举公推的国家元首、人民、土地、法律、国防和钱币来看，似乎已符合一个共和国的成立条件。而荷兰史书上也曾记载过“Republic of Lanfang”这个名称。
* 这个华人小国后来遭到荷兰围攻，顽强抵抗后战败，最终于1888年左右灭亡，结束了一百多年的建国历史
* 印尼西加省华人精英多，出现了“黄门三杰”!
* 现年42岁的黄努山（Ria Norsan），于2009年4月13日宣誓为坤甸县首位华裔县长。出生于山口洋市的他在丹戎普拉大学毕业后，在政府部门工作了11年之久。
* 在山口洋市出生的第六代华裔律师黄少凡（Hasan Karman），于2007年选举中击败包括原任市长在内的4组候选人，在自己的家乡扬眉吐气，当选为全国首位华人市长。今年47岁的他毕业于印度尼西亚大学法律系，过后攻读生态环境博士学位。他从事过企业管理工作，并开设律师事务所、广播电台、餐馆等。
* 全山口洋市有20万人口，华人占了62%。“在全印尼华人比例最高的地方当选市长，背负的责任当然重大，想要达成的目标也很多。最重要的是全面整顿市政，把这里打造成一流的文化旅游都市。”黄少凡雄心勃勃地说。
* 第三代华裔黄汉山（Christiandy Sanjaya）于2008 年当选为西加省副省长，这是华裔在印尼担任省级地方行政长官的第一人。他与竞选搭档以超过40％的选票胜出。他大学毕业后在高中教书，投身教育界为他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后来曾任坤甸市地方议会代表。任期的5年内，他竭尽所能为西加省全体民众服务。
* 三 “长” 同姓黄，一时传为佳话，同时也提升了华人的政治地位。
* “印尼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园，只是偶尔有点脏。我们坚信，只要用心去打扫，最终会变得清洁明亮。”印尼华人如此形容孕育他们成长的国家。对于过往惨痛的历史，他们铭记于心，却也把它当成前车之鉴，如今努力回馈祖国，为印尼的繁荣作出贡献。
* 华人深信，这是个种什么都能生存的美好国度，而自己的根，早就牢牢地扎在这里，开枝散叶了。“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当然也要终老于这里。”身处印尼，华人深深了解国徽中的格言——“异中求同，殊途同归”。

菲律宾

     菲律宾位于亚洲东南部，西濒南中国海，东临西太平洋，是一个群岛国家，由大大小小 7107个岛屿组成。

       1542年，西班牙航海家来到这里，为了在亚洲炫耀西班牙帝国的“国威”，便按照西班牙皇太子菲力（Philip）的名字，把群岛命名为菲律宾群岛。自1565年起，西班牙在这里开始了长达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

       1898年，美国击败西班牙，占领并统治了菲律宾；1941年，日本入侵菲律宾；二战结束后，美国重新恢复对菲律宾的统治。直到1946年7月4日，菲律宾才终于赢得最后的独立。

       菲律宾天然资源丰富，有“西太平洋明珠”的美誉。因其地理位置接近中国东南沿海，长期以来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移民到这里打天下。今天，他们已成功在当地打造出一系列商业王国。

    早在西班牙人于1570年占领马尼拉以前，这里已经有华人的足迹。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之后，殖民政府因建设和贸易的需要，于是积极招募华人前来。此后，从中国抵达马尼拉的航船便络绎不绝，也载来了大批的中国商品和移民。在短短30年间，这里的华人人口激增，直至1600 年，菲律宾的华人已有2万人，他们主要聚集在吕宋岛（Luzon Island）的马尼拉。

       17世纪，马尼拉道路两旁已是华人商店林立，唐人街逐渐形成。那时，就连穷乡僻壤也遍布着华商所经营的菜仔店（Tienda de Sari-sari），贩售各式各样的日用品。殖民政府对华人可谓爱恨交织。刻苦耐劳的华人是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对地方建设以及经济发展的贡献甚大；可是，一旦华人人口膨胀，人数若是超过西班牙统治者，又令殖民政府深感不安。于是，殖民政府开始对华人加以限制和打压，例如强迫华商缴纳重税；限定华人居留在马尼拉城外的“八连区”（Parian），没有通行证不得擅自离开等等。此外，当时的殖民政府还经常找借口将华人集体驱逐出境。

       华人终于无法忍受而群起反抗，却遭致更为残酷的镇压。1603年和1639年，殖民政府对华人展开了大屠杀行动，当时受害的华人数以万计。之后，从1662年到1762年之间，屠杀华人的悲剧又一再重演。

       18世纪后期，由于殖民政府需要劳动力，便开始改变对华人的政策，不但将移民和居留法令放宽，还积极地招募契约华工。这一来，华人人口逐年增加，致使华人的足迹遍及各岛，除了马尼拉市以外，在帕奈（Panay）、那牙（Naga）、宿务（Cebu）、三宝颜（Zamboanga）等地都有华人聚居。

       到了美国统治菲律宾的40年间，殖民政府因为要笼络人心，不惜牺牲菲律宾华人的利益，实施了严格限制移民的政策。尽管如此，试图入境的华人还是千方百计以各种途径踏入这块土地，其中的一个方法便是冒充当地华商的儿子，正因如此，也导致了今日菲律宾华人在中英姓氏方面的混乱现象。

       1935年，美国予以菲律宾自治权，民族主义者以及政客于是大肆利用舆论来鼓动排华情绪，同时还滥用手中的职权，推行了好些种族性政策，以致种族关系日渐紧张。

       1946年，菲律宾获得了真正的独立之后，民族主义者的排华呼声更是响彻云霄。结果，国会通过一连串的菲化法令，华人首当其冲，被剥夺了多年以来经营传统行业的权利，只得另辟蹊径，委屈求全。

       独立之后的30年间，菲律宾华人，尤其是年长的一辈，仍然具有浓烈的中国意识以及故乡地域观念。但是进入70年代之后，华人的历史开始迈入新纪元。1975年，菲政府简化华人的入籍手续，许多中国移民才因此而入籍。

       今天，在菲律宾华人当中，有90％以上已经入籍成了菲律宾公民，他们基本上与当地人获得同等的待遇，且大多已融入主流社会，将菲律宾视为自己的家园。

*菲律宾国父何塞·黎刹 (Jose Rizal）和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Corazon Cojuangco Aquino）皆有华人血统。他们属于中菲混血儿（Mestizos)，这一个特殊群体在菲律宾的社会发展，尤其是独立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菲律宾华人人口向来缺少确切的统计，粗略估计大概有100万人。一半以上的华人聚居在马尼拉市，其他则分布在宿务、达沃（Davao）及三宝颜等城镇。

       来自漳州和泉州的福建人，占了菲律宾华人人口的85％至90%，余者则是原籍南安、惠安、同安和厦门的福建人，以及一些广府人。

       菲律宾华社主要由3个群体构成，即老华人、土生华人和新移民。老华人指的是50岁以上的华人。他们有的出生于中国，自幼南来；有的在当地出生，已是第二或第三代。

       土生华人是最庞大的群体。由于成长的家庭背景与所受的教育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各异其趣。那些在传统家庭长大、接受华文教育的华人，有较强的传统意识；而那些没有传统文化和教育背景的华人，则没有中文姓名，更遑论会说写中文。无论如何，这两个群体都已融入菲律宾社会，认同自己为菲律宾人。

       至于新移民，则是指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自港台及中国大陆移民过来的一群。港台的新移民大多是投资移民及技术移民；而近年来则有越来越多的大陆移民，据粗略计算，目前他们的人数多达10至20万，其中以福建人居多。这新一波的移民浪潮，其人数之多大大地冲击着菲律宾原有的华社，引来一丝忧虑。

    华人善于经商，福建人更是以精于营商之道而闻名。菲律宾华人在当地的人口比例虽低，但他们在菲律宾百年来的经济发展史上一直扮演着先锋的角色，对菲国的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菲华商人在东南亚国家中的人数比例最高。在16世纪西班牙建立殖民政权之后，中菲贸易随之展开与扩大，绵延了数个世纪。后来虽遭到殖民政府和独立后的菲化政策打压，华商命运几度浮沉，但他们凭着独到的眼光、勇气、勤劳和信用等营商“法宝”，在逆境中坚持下来，奠下了稳固的基石。

       “1950年代菲化政策禁止华人涉足零售业，华人被迫放下这传统的行业，转向批发业和工业。谁知坏事变好事，这种转型对华人来说反而是好的。它让华人可以进军更多行业，也因此出现了不少大企业家。”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陈本显说。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危机可能就是转机。菲华的经济至今还在持续飞速地发展，他们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经济，并且也赶上国际经济发展的步伐。

       如今，菲华商业触角延伸到各行各业。从木材加工业到钢铁制造业，从餐饮业到房地产业，从轻纺化工到进口贸易业、电信业、食品业、金融业等，都有华商涉足其中，并形成跨领域的经济模式。菲律宾首富陈永栽，就因其生意遍及不同领域，而被誉为“航空大王”、“啤酒大王”、“烟草大王”及“金融大王”等。

       在各领域执牛耳的菲华企业家还有“百货业大王”施至成、“食品业大王”吴奕辉以及“本土快餐大王”陈觉中等。他们经营的都是家族式的企业集团，资金雄厚的集团所涉及的领域包括零售百货业、房地产业、银行保险业、通讯运输业、制造业等。

       由陈觉中领导的 “快乐蜂”（Jollibee）快餐集团，更是一举打败了世界快餐业巨头麦当劳和肯德基，占据了菲国快餐市场65％的份额。

       当代菲律宾华商虽迈向现代行业，但他们的传统行业在该国仍是举足轻重，颇具分量。据菲华商联的资料显示，2001年涉足杂货及贸易业的华商已有8500多家。近年来他们更积极兴建大型商场，以满足广大的市场需求。

       菲律宾华商经营银行业也颇具历史与规模。在上世纪20年代，菲律宾出现了3家银行，即中兴、华兴及民兴；不过在3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以下，最后硕果仅存的只有中兴。如今，菲华经营的银行已超过十家，在菲律宾国内、香港、台湾及美国等地皆设有分行，逐步发展成为国际性企业集团。

       除了大型企业，菲华也是中小型企业的主力，尤其是纺织服装业。除了外销，在华人聚居的岷沦洛区（Binondo）也可以看到林立的服装店，林林总总的成衣让人目不暇接。该区也是流动商贩聚集的地方。每天早上6点多，辛勤的小贩（其中包括不少新移民），就推着货物到街上摆卖成衣和纺织品，一直到晚上8点才打烊。每逢周末，这里更是万头涌动，热闹非常，喧嚣的人声交织出独特的生活乐章。

       此外，华人经营的餐馆也比比皆是。走在马尼拉市，几乎每一条街道旁都可以看到华人餐馆和小吃店，供应各种风味的中华美食。

       新移民则多数以从事零售业为主，马尼拉著名的一路发商场，即是中国新移民做生意的主要场所。他们多贩卖价格廉宜的中国商品，和当地中小型华商形成新一波的竞争。此外，也有一些新移民在华文学校、报社和工厂等单位工作。

       土生土长的菲华青年通常都能口操流利的菲律宾语和英语，所以他们的发展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商业领域。他们多能顺应潮流，掌握经济脉动，进军银行、法律、会计、建筑、设计等行业。华人的生意也不局限在传统的岷沦洛区，而陆续迁至菲政府重点发展的马加地（Makati）商业金融中心。

打败快餐业跨国集团的本土快餐“快乐蜂”, 成为菲律宾华人的骄傲。

    今天，虽然绝大部分菲律宾华人已融入当地社会，而且多信奉天主教，但他们仍强调尊师重道的中华文化，并保留不少传统的习俗礼仪。

       不过，由于菲律宾长期处于西班牙和美国的统治下，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华人所保留的文化习俗也不可避免地打上西方文化的“烙印”。

       这种东西文化的交融，使菲华社有别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社会。

       每逢春节、中秋等传统佳节，菲律宾华人都会热热闹闹地聚集在岷沦洛大事庆祝。他们也非常重视圣诞节。出门在外工作或求学的华人，无论远近，总要在圣诞节赶回来和家人团聚，就像是中国人匆匆忙忙赶回家过春节一样。他们会在平安夜吃团圆饭，欢聚的热闹气氛丝毫不亚于除夕的年夜饭。

       此外，菲华依然保留传统的婚丧习俗，但也将本地人和西方的仪式融入其中。例如，华人婚礼一般会在教堂举行，但他们在家里依然遵循传统习俗，给聘金、过大礼、敬茶仪式等一件不可少。

       菲华裔青年联合会创会会长洪玉华也说：“菲律宾华人虽信奉天主教，但他们还是沿袭传统的葬礼习俗，为死者穿上寿衣，并焚烧元宝、蜡烛及纸扎物品等给往生者。”

菲律宾华人还有一句话：“死后的安息地要和生前的身分地位对等”，所以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为逝世的先辈建造一座住宅（俗称“阴宅”）。占地约54公顷的马尼拉华人义山也因这些造型各异的阴宅，而成了菲华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义山内分为土葬区、灵骨塔区以及吸引无数观光客前往参观的佳城区。所谓“佳城”就是墓宅，是以大理石砌成的房屋，用来置放灵枢，以让后人前来祭祀。

这些阴宅建筑风格各异，既有排屋式也有独立式，有西式洋房也有中式庭院，楼高一至两层，有的甚至3层，非常特别。据说，一些富豪墓宅犹如别墅，各种设施如空调、抽水马桶、电视机、电冰箱、沙发等一应俱全，平时还有佣人专门照料，与一般生人住宅无异。

建造如此壮观墓地之举，除了是后代子孙对先人的尊敬和爱戴，体现了“孝”的传统文化之外，其背后还有一个历史因素。一个已移民美国的菲华说，很早以前菲华被禁止购置屋产，但墓地却不受禁令的影响，于是华人就在这方面大兴土木，算是满足了“安家”的心愿。

除了祭祀先人，这一栋栋宽广的墓宅还是一个聚会的场合，有着凝聚家族成员的作用。

除了传统清明节，每年11月1日的万圣节，也是菲律宾人的“亡人节”，菲华称之为“番子清明”。菲人会在这一天到亲人墓地去献花悼念。但生性乐天的他们，不但会在墓前点上蜡烛念诵圣经，还在一旁野餐打牌、唱歌跳舞、通宵守夜，颇有与逝去亲友同乐的味道。

       菲华在文化上能兼容并蓄，在宗教上也体现出类似特色。事实上，一种把天主教、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融为一体的混合宗教在菲华社会中极为流行。

       因此，在许多菲华天主教徒的家庭或商店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同时供奉佛祖、菩萨和关公等；此外，在唐人街上，则可以看到人们对着缠满红黄绸缎的十字架烧香膜拜；在马尼拉华人义山的神龛上，圣母、耶稣和佛像也摆在一起供人祭拜。

       在不少当地华人心中，圣母和观音的形象已经融为一体。在巴当加斯省（Batangas）的塔尔镇（Taal），凯萨赛圣母（Virgin Caysasay）被当地华人视为妈祖化身来膜拜；而在加巴朗牙（Capalonga），黑耶稣（Jesus Nazarene）也被华人当作保王善士来供奉。

       菲律宾一些教堂建筑也隐约中具有中国风格。1587年，不少华人工匠参与建造了位于古马尼拉的圣奥古斯丁大教堂（San Agustin）。它融合了欧洲古典建筑风格和中国元素，教堂大门前和庭院内还各摆放了4 尊中国狮子石像。

* *闻名全菲律宾的“马面”（Mami），是当地华人马文禄所售卖的面食。食用时先把面放入沸水浸透，再盛进碗内加上鸡丝碎肉和鸡汤。起初，来自广东省的马文禄只是挑着担子在马尼拉街头叫卖，后来开设面店。虽然马文禄已去世30多年，因其面食在菲律宾曾流行一时，所以现在马尼拉，人们一般仍然把面食叫作“马面”。*
* 菲律宾的华人社团有上千个，它们当中多数是在美治时期，尤其是 20世纪20年代以后成立的。菲国独立后迄今，华人新社团仍继续出现。林林总总的社团包括地缘的同乡会、血缘的宗亲会、业缘的同业公会，以及慈善、宗教、文化、体育与娱乐等组织，其中有代表性的社团包括菲律宾华裔商业联合总会、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菲律宾华人体育总会以及马尼拉中华商会等。
* 于1954年成立的菲华商联总会，是领导全体菲律宾华人团结的重要机构。
* 目前仍活跃的团体约有两三百个，除了关注当地华人的福利与权益外，也与中国家乡有所联系。如中国发生自然灾害，华团便汇去巨款赈济灾黎，并且对家乡的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也无不慷慨解囊，全力以赴。
* 此外，菲华社团也协助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其中各华团所合力打造的“菲华三宝”，展现了华团积极融入主流社会的一面。所谓“华社三宝”，一般指的是“华团、华文报和华文学校”。至于“菲华三宝”，其独特之处则更意在融入社会：第一宝指的是，华商不仅资助华文学校，他们同样出钱出力捐建菲律宾农村的校舍，让菲律宾孩童拥有好的读书环境；第二宝是助人助己的华人志愿消防队，他们服务不分种族，只要有火灾和天灾都赶往现场施予援手，令当地人赞颂不已；第三宝则指的是深入穷乡僻壤的菲律宾华人义诊队。他们解决了各山地民族的医药需求，其悬壶济世的精神受到菲律宾人的高度敬佩。
* “这三宝不仅对菲律宾主流社会贡献良多，亦促进华人和菲律宾人的关系，化解了一些政客和异议分子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使排华的声音随之消弭。” 陈本显表示道。
* 此外，文艺团体如菲华作家协会等则有着文化传承的责任，例如，菲华作家协会自成立以来，不但广开门户，不囿于信仰派别，成为华文创作者的大家庭；更致力于培育华文文学新秀的工作，出版了许多文学丛书，被誉为菲华文艺界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及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承者。
* 但是时下不少菲律宾华人传统社团一直面对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窘态。这一点既表现年轻一代对传统活动不感兴趣，也反映出年青一代在民族意识和感情上的变化。
* 伴随着绝大部分华人的入籍、通婚和菲化运动，越来越多华人或主动或被动，逐渐融入主流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思想与价值观已经西化和本土化。他们不但拥有许多菲律宾人朋友，而且也有越来越多人参加菲人团体。“不同年龄和阶层的菲华在融入的程度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应该融入主流社会，包括政治、文化、思想意识和感情。”当地著名报人吴文焕如是说。
* 虽然对中年以上的华人而言，一时要他们完全放弃中国意识和中华文化，完全融入主流社会，似乎不是朝夕间能办到的事；可是对年轻人而言，融入主流社会不但可能，而且他们愿意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态度，加快融入的脚步。
* 上世纪80年代末，菲律宾发生经济危机，华人又差点成了代罪羔羊。在女中豪杰洪玉华的倡议下，一群来自各阶层的华裔青年，认为唯有促进种族间的了解、加强种族间的凝聚力，以及扩大华人的生活圈子，主动融入主流社会，才一是解决种族矛盾和促进和谐的关键，于是在1988年筹组了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
* 他们在《宣言》中这么表示：“我们把菲律宾当作是自己的国家，是我们世世代代生活下去的地方。我们决心融合到菲律宾大社会中去，同菲律宾人共同建设这个国家……我们感到有需要促进华菲之间的了解，改善华菲之间的关系，并愿意为此竭尽我们的努力。”
* 基于这个目标，联合会开展了各项活动，不断改善菲律宾人对华人的认知，致力减少彼此的隔阂和化解矛盾，这包括出版华文周刊《融合》与英菲文月刊《桥》，针对有关融入和社会问题发表意见，作为沟通种族的桥梁，并参与社会活动，以贯彻“华菲融合，亲如一家，共同建设美好的菲律宾”的目标。
* 位于古马尼拉，创办于1999年的菲华历史博物馆，也是菲律宾华人试图让外界更了解菲华移民史和奋斗史的一大桥梁。这个世界上少数由华人民间团体所创办的博物馆，通过展示华人如何在菲律宾艰苦奋斗、落地生根的历史，以“分享”作为主题，表现了华菲不可分离的共同命脉。
* 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菲华社会终于熬过最艰苦的时期，成功融入社会并有了今天受人尊敬的地位。然而，近一二十年来新移民的大量涌入，改变了华社的结构。由于语言的障碍、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使新移民往往自我孤立，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中，无法顺利加入当地主流社会，从而阻延了华人融入的进程。这是目前菲华社会普遍认为不得不面对的一项重大课题，他们担心菲华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华菲良好关系会毁于一旦。
* 于是菲华社积极展开沟通活动，例如举办新移民座谈会，向新移民解释本地的移民法和营商法令。此外，许多华文学校也为照顾新移民学生，还开办特别班教导新移民了解当地文化及学习英语，以方便沟通和融入当地社会。

在菲华历史博物馆里有一首名为《我是菲律宾人》的诗歌，透露着当代菲华融入社会的心声，也显示出他们的身份认同。     菲律宾独立后，菲政府推行华文学校菲化政策：规定不许注册新华文学校；现存的华校中文课只能作为外语教授，每天授课不得超过100 分钟；禁止采用台湾编印的教科书，中文教师也只能在当地聘请。

       华校菲化导致当地华裔学生的中文水平及对中华文化的认知程度急剧下降，但这也加强了学生对菲律宾的认同，加速融入主流社会。

       目前菲律宾有150多间华文学校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131间归属在菲律宾华文学校联合会旗下。虽然华文学校数量不少，但华人子弟学习华文的意愿并不强，再加上学费不菲，最便宜的也要每学期一万比索，最贵的则高达十多万，所以辍学率日益增加。

       据了解，在这几年里，华文学校华人学生的人数锐减30％至50％左右，发展情况令人担忧。

       虽然中国的崛起让菲政府开始致力提倡中文，然而，当地华人的学习热忱非但没有提升，反之每况愈下。大多数青少年会把学习菲律宾语和英语放在第一位，不重视华文的学习。加上商场上多使用方言和英语，在大环境之下，华语往往被放弃。

       因此，菲华商联总会、华教中心、各华文学校都竭尽所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菲华商联总会引进不少中国师范大学的志愿老师，捐建华校，创办华教中心的双联课程，修订课本，保送学生赴中国厦门进修，与菲律宾著名的雅典耀大学开办孔子学院等，期望把华文教育向前推进。此外，华文教育也获当地华人商会和不少校友热心支持，包括提供助学金和贫寒子弟奖学金。

       除了生源问题，菲律宾华校如今面对的问题，还包括教学语言问题：华校究竟应该用闽南话还是华语（普通话）来教学？

       菲律宾的老移民和新移民大都来自福建，他们会把闽南话放在首位，认为闽南话是华人社会的通用语言，也是菲律宾主要的商业语言，先学闽南话是理所当然。另一方面，一些家长和商界人士则认为，从中国崛起的长远发展来看，华语的使用范围会比闽南话来得广，所以各华校应该以普通话授课。也有人主张，在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用闽南话教学，小学高年级开始用普通话授课。

       这种情况在菲律宾各华文学校体现出来，可以看到课堂上语言的使用往往相当混乱，出现了闽南话、英语、菲律宾语和华语一起使用的现象。

       如何提高华人下一代对华文的兴趣，及用何种语言教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过从菲律宾华团、校方和各界人士的热心付出与参与中，可以看到在菲律宾华文的前途，仍透射出希望的曙光。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菲律宾华人的生活一度被绑架的阴影所笼罩。

       早期殖民政府长期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挑拨种族间的感情，加上后来种族主义分子和政客的曲意渲染，使菲律宾人相信华人是经济剥削者，或华人都是富有的一群，于是华人便常常成了被绑架的目标。

       在1993年至2003年期间，菲律宾治安不靖，令华人闻之丧胆的绑架案不断上演。单单在2003年8 月，当地就发生了约20起华人遭绑架案。令人费解的是，面对绑架问题的华人却鲜少报警，往往只是选择默默忍受。

       华人深怕自己成为绑匪的下一个目标，所以只好紧闭家门，足不出户，即使出门也得大费周章，要经常更换上班时间、路线和交通工具。华商的生意也因此大受影响。

       公民反罪恶行动组织主席，有“华社花木兰”之称的学者洪玉华曾带领菲华裔青年联合会等华团进行和平示威，除了呼吁政府正视绑架问题，也教育人们如何应对及报警的重要性。

       有鉴于绑架案日趋严重，总统阿罗约特别向华社做出承诺，加强军警巡逻并成立专门打击绑架罪犯的部门，也出动军队搜捕绑匪，解救人质。如今，在各方的合作下，菲律宾治安已日渐好转，华人的信心也逐步恢复。

       在历史的长河中，菲律宾华人备受排斥、歧视、驱逐与屠杀。但在劫后余生之后，华人移民往往又卷土重来，生生不息。马尼拉城因此成了华人的聚居地，唐人街上人潮汹涌，华人商店林立，华人在经济领域上独领风骚。

       尽管苦难深重，处境凄惨，菲华竟能凭着坚韧的意志逆境求存，屹立不倒；他们也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顺应时势，毅然入籍成为当地公民，并主动融入主流社会，成为菲律宾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他们向世人如此宣告：

       “我继承着我的华人祖先的遗产，有着我的祖先高尚的精神，我为菲律宾，我的国家服务……”

       “我是菲律宾人。”

（摘自菲华历史博物馆《我是菲律宾人》一文）

泰国

    旧称“暹罗”（Siam）的泰国，民风淳朴，是举世闻名的“微笑之邦”。最早的素可泰王朝（Sukhotai Dynasty）建立于1238年，现有76个一级行政区，是东南亚唯一不曾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君主立宪制下的政府主管国事，但泰王地位崇高，受到人民由衷的爱戴。

       这个盛产稻米、崇尚和平的“黄金佛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印半岛上重要的鱼米之乡，同时也是南传小乘佛教的重镇。这里有许多诱人的名胜古迹，又被一层神秘诡异的宗教氛围笼罩着，各地游客长年蜂拥而至，怀着一种期待的心情，急于揭开面纱看个究竟。

       踏上这块神秘胜境的人们，往往在僧云寺海中获得崭新体验之外，也为泰国人友善的目光，以及遍地是华人的境况，暗暗感到诧异。那一股无法形容的柔畅之风，伴随着仿佛亘古永存的祥和之气，缭绕在千尊佛陀的圣像之间。

       数百年来，华人和泰人早就“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一代代的华人，就在这祥和的土地上安居乐业。

    华人到泰国来谋生及定居的历史，已经达8个世纪之久。早在素可泰王朝时代，中国东南各省份的华人便已陆续移民泰国。

       那时候，克拉地峡（Kra Isthmus）两岸的春蓬（Churnphon）、六坤（Ligor）与素叻他尼（Surat Thani）等商港相当繁荣，以致南来的移民日渐增加。在15世纪初，有华人以逞罗使者的身份到中国去朝贡，而郑和下西洋的事迹就发生于阿瑜陀耶王朝（Ayudhya Dynasty, 1350 - 1767 年）的统治时期。

       到了16世纪，已有华人矿工开始于泰南建立基地。与此同时，中国的江洋大盗林道乾携同部众约2千多人到北大年（Pattani）落户，并与当地女王成婚，在当地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华人社会。

       16世纪初，阿瑜陀耶城就有了华人的聚集区。那时，华人和日本人、葡萄牙人展开了十分激烈的商业竞争，华商总是占上风，最终更成为皇家贸易的代理人。直至17世纪末，暹罗的华人人口约有十万人，他们多数来自福建和广东，属于商贸移民。

       在1767年，缅甸大军压境，并且攻陷阿瑜陀耶城，华人和当地人齐心合力抗敌。最终中泰混血儿郑昭率领部队突围出城，接着领来援军。成功击退缅甸大军。由于阿瑜陀耶城已经成了焦土一片，他就将首都迁往湄南河西岸，并建起吞武里王朝（Thouburi Dynasty, 1767 - 1782年）。

       郑昭的原名是郑信，母亲为泰国人，父亲郑镛则是广东澄海人，移民至暹罗之后才发迹。英勇善战的郑昭在战后全力削平其他势力，收复失地统一暹罗。在郑昭统治暹罗的15年间，极力鼓励潮州人前来经商或种植胡椒与甘蔗等。故此，湄南河东岸附近的王城处，出现了一个新的华人聚落。

       郑昭逝世后，曼谷王朝（Bangkok Dynasty, 1782年至今）成立，此后皇家贸易也空前繁盛。华商大批涌入，市场一片兴旺。国王拉玛一世在曼谷核心地带兴建了一个华人商业区。随着1850年代经济蓬勃发展，华人的移民步伐更是大大加速，加上大批劳工移民蜂拥而至，19世纪末时华人已遍布泰国各地。

       泰国大部分华人来自福建及广东。20世纪初，潮州人占了绝对的优势，总数的40%，其他是海南人18%、福建人16%、客家人16%、广府人 9%。潮州人之所以居多，除了因为郑昭当年的大力招揽，另一个原因是曼谷和汕头之间的海运往来频繁。

      要准确统计泰华社会的人口，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在泰国近6千万人民当中，约2千万人拥有华人血统。据估计，泰华的人口约有700万左右。

       除潮州人外，另外还有海南、客家及福建人等，多聚居在曼谷、清迈（Chiang Mai）或合艾（Hat Yai）等大城市里。

       泰国的每一步发展，都留下华人的足迹。华人在经济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主导金融、钢铁、汽车装配、房屋开发等工商领域，正大集团、盘谷银行、律实他尼集团等，更是平地崛起，成为一批跨行业、跨地区乃至跨国界的大企业机构。

       除了经济，华人在政治上的表现也非常突出，各党派人才辈出，其中不乏内阁部长及总理。在负责保家卫国的军警队伍当中，华人不在少数。

       多年来，华人广泛吸收泰国文化，并把许多中华传统融入泰国社会。与其说泰华社会被“泰化”，倒不如说它是中泰文化融汇的产物。

       曼谷的耀华力路（Yaowarat）一带是历史悠久的唐人街。在这里，中文招牌、中华美食、华人庙宇触目可见，整条街从白天喧腾到黑夜。走出这里，中文招牌少了，但遍地依然是华人的身影。如果不是耳边的泰语呢喃，或那些从身旁呼啸而过的七彩“Tuk Tuk”车，人们会误以为自己身在香港的闹市之中。

   在泰国政府的公平政策下，华人在此找到了归属感，自然将自己看作“泰国人”，并引以为荣，尽管拥有华人血统，却不会刻意提起。尤其是中泰通婚家庭中的混血儿，更是强烈认同“泰国人”的身份。

       泰国华人人数众多，大致可以分成四大源流：老华人及其后裔、泰北中国老兵及其后裔、中国大陆新移民及台商。这四大源流的华人，在泰国社会各具特色，形成一个多元的泰华社会。

       老华人及其后裔，是泰国最大的华人群体，以潮州人为主。他们在泰国生活了两三代以上，持泰国国籍，普遍与泰人通婚。第二、三代华人后裔的长相虽还具有华人的特征，但其他方面已经完全融入当地，与一般泰国人无异。

       泰北的中国老兵，是非常特殊的华人群体。国共内战后期，国民党部队93师被击败，退居泰北，后来协助泰国平定了北方的骚乱，获泰王颁赠泰国国籍，从此在泰北一带安居乐业，繁衍生息。他们以云南人居多，几乎都已有泰国国籍，不少人也与泰人通婚。泰北华人大多聚居在一起，因此将云南文化和特色保留得非常完整。

       至于台商和中国新移民，则是带着投资的动机移居而来。台商更早登陆泰国，大多投资于工商领域，如餐饮、旅游、科技业，或设厂发展制造业。中国新移民，则在中国开放之后，纷纷涌入泰国进行投资，涉猎领域相当多元，包括科技、化工和制造业等领域。

       不管是台商还是新移民，他们大多拥有不错的经济实力和文化水平，当初都是为了挣钱而来。但逗留的时间一长，他们往往爱上了泰国的多元与民主。许多人在此住了一二十年，始终舍不得离开，他们已渐渐将泰国当成一个避风港。有不少人干脆就在此安家落户，与当地人通婚，加入了泰华社会大家庭。

 从移民变成国民，有些华人的民族特质逐渐淡化，但社会地位却获得提升。在此开枝散叶的华人，一般以家族生意起步，凭血缘联系铺下商业网络，在东南亚创造了经济奇迹。难怪有人说，华人是泰国资本主义的先驱。

       泰国华人早期从事大米贸易，之后跻身新兴商人阶层，大大刺激当地的商业发展。凭着多年的从商经验和雄厚资金，华人至今仍在工商界扮演着主导的角色。

       全国十几家银行中，超过三份之二是华资银行，泰国规模较大的盘谷、大城、京华、泰华农民等银行，主要股东都是华人。此外，在商界呼风唤雨的泰华不胜枚举，包括曾获泰国一等白象勋章的金融大王、盘谷银行总裁陈有汉博士，以及碾米业大王黄作明、保险大王马灿雄、鳄鱼大王杨海泉、林业火锯大王陈卓豪及泰国橡胶种植业巨掌许心美等。

       泰华经济并非成于朝夕之间，而曼谷唐人街，见证了华人的经济成长和转型。

       曼谷唐人街是泰国最古老的商业区，由三聘街（Sampeng）、耀华力路和石龙军路（Charoen Krung）3条主要街道组成，外加几十条围绕着主街道的小街。这些纵横交错的小街，大多以行业来命名，如布街、童装街、米街、咸鱼街、蚊帐街、打锡街等。许多华人老店铺，都在这里经营了好几代，残旧的老屋诉说着华人走过的历史。

       密密麻麻的中文招牌、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摆满摊档的走廊跟络绎不绝的人潮，共同构成了唐人街繁华的景象。

       如今，唐人街的热闹依旧不减当年。耀华力街上，三五步就看到华人开设的金行，百年老字号比比皆是。泰人喜欢买金保值，从金行的兴旺便可以看出端倪。当时尚女性嫌黄金俗气，纷纷转戴白金饰物时，唐人街金行的人潮却依然络绎不绝。诸如金链、耳环、手镯、等金饰都深受欢迎。

       除金店外，唐人街还有数不完的华人钟表店、中药店、餐室、杂货店等。店铺大多保留了残旧的原貌，却焕发勃勃生机。华人店铺一般不大，货物从地面排到天花板，华人“物尽其用”的本色可见一斑。令人惊奇的是，老板总能在杂乱拥塞的环境中，第一时间找出顾客想要的东西。

       唐人街上许多店铺，都是老一辈华人奋斗多年的成果。如今，年轻一辈都已走出老街，足迹踏遍全国。第三、四代的华人，有些还传承父业，但更多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纷纷投入金融、科技、服务等领域。

       华人当中也不乏爱挑战、思创业的年轻人。这群新崛起的青年才俊，不像父辈那样，局限于家族生意或传统行业。他们另辟蹊径，积极投入地产开发、汽车制造、出口贸易、旅游、酒店、科技、零售等新型行业。

       另一些年轻人，则将家族企业打理得有声有色，通过先进的管理方式突破瓶颈，把企业重新定位，式突破瓶颈，把企业重新定位，携带巨资，往泰国设厂发展成衣、五金等制造业，均取得不俗的成绩。

       此外，泰华在政治舞台也很活跃，历任泰王总爱委任华人为大臣。担任过总理或副总理的华裔，计有阿南、差猜、素金达、披猜、挽限、川立沛及前首相达信等，曼谷几任的市长，也都由华人来担任。

* *泰国曼谷有一长约50公尺的“演说街”（Thanon Mangkon），为孙中山1908年到此宣扬革命思想的历史遗迹。*
* *华人每年的春节庙会活动，泰国公主诗琳通都会前来参加，操一口流利华语的她极受爱戴。此外，耀华力路口的 “圣寿无疆”大牌坊，也是由她亲手题赠。*
* 泰国各省都有华人居住，但主要集中在城市里。“动感之都”曼谷人口密集，超过半数的居民拥有华人血统。走在街上，迎面而来的多是熟悉的华人脸孔。纯华人一般拥有较白暂的皮肤，样貌相当容易辨认。中泰混血儿则有更多泰人特征，如皮肤较黝黑，华人特征较难察觉。
* 这是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对多元、新颖甚至奇异的文化都能兼容并蓄，但又遗存了亚洲社会的保守风气。
* 在这独特的氛围下，华人打扮时尚入流却绝不暴露，在公共场所的举止都很有分寸。华人平日多用泰语交谈，语气温和，与一般的泰国人没有两样。
* 泰华社会中，出身小康者居多，但家财万贯的富豪也大有人在。有人说：“泰国是块好福地，消费低廉，赚钱容易，发达的梦想绝非遥不可及。”只要肯努力付出，华人一般在十年之内就能住洋房、开大车，家中还有佣人服侍。泰国的房产价格合理，多数华人都拥有个人的产业。
* 几百年来，中泰文化早已水乳交融，连华人、泰人的家居风格，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泰国，人民对“全民偶像” 泰王极为尊敬，华人也不例外。他们家里未必会挂上传统的对联或山水画，但泰王的照片、海报，或其他印有王室徽章、肖像的装饰品却少不了。由于大多是佛教徒，华人也爱摆设佛像、佛珠，甚至会在风水方面下工夫呢！
* 与泰人家居有所不同的是，华人保留了供奉土地公及祖先的习俗。主人家是否有华人血统，一进门就能看出端倪。大部分华人家庭，对传统信仰、习俗都相当重视。他们一般会在客厅里安置土地公神龛，临近天花板处则摆放祖先的牌位，早晚按时上香。即使在海外生活了好儿代，饮水思源的华人仍希望子孙能通过种种传统习俗，如春节酬神祭祖等活动，牢记自身的根源所在。
* 对华人来说，泰国就是“美食天堂”。无论是泰国餐、传统中餐，还是各国料理，华人都无法抗拒。每逢周末假日，华人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身影闪现在泰国各处的大小餐馆。不管是洽谈生意、家人团聚、朋友聚会还是情侣相会，都少不了满桌的佳肴美馔。
* 受泰人饮食习惯的影响，当地华人的口味也开始变重。他们不但嗜辣，也对泰式酸辣冬炎汤、凉拌木瓜沙拉等酸咸滋味非常喜爱，就连吃起中餐，也不忘拼命加上辣椒粉或辣椒。不过，曼谷华人特别嗜甜，总是潇洒地在中式面汤或一般食物上，撒下大把白糖。此外，华人传统美食，如猪脚饭、清汤面、叉烧烧肉等几乎随处可见，作为高级食材的鱼翅和燕窝，更是获得华、泰人民一致认同的珍品。
* 在曼谷唐人街的三聘市场，可以很方便购买到中餐食材，选择也相当齐全。泰国的华人家庭，一般还是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规矩，由太太负责全家人的起居饮食。她们的烹调手艺，主要传承自母亲，因此保留了不少家乡风味的菜式，同时也会烹制传统的应节食品，如端午节的肉粽、中秋节的月饼等。

       在曼谷街上，中文招牌处处可见，会让人有一种中文十分通行的感觉。不过，当你真用华语跟当地华人交谈，却会迎来一脸的错愕。

       其实，泰国会说华语或能看懂华文的华人非常少，讲华语的大半是年过半百的长辈。华人早已经融入泰国社会，泰语说得比华语还溜。年轻一代的华人，多半对华语一窍不通，而第三、四代潮汕人，多数也已经不会说潮州话了。

       华语会在一代代华人的生活中消失，与泰国的教育政策息息相关。

       自1930年代开始，基于政治的因素，泰国禁止学习华文。原有的 300多所华文学校，在禁令颁布后无法公开教授华文，华人只好偷偷开办华文补习班。二战之后，泰国政府采取统一政策，推出泰语教育，以泰语为第一语言，英语为第二语言。

       在一片凄风苦雨中，华教在泰国没法修成正果，华文补习班几十年来，始终无法重振声威。直到1992年，中泰恢复友好的关系，华教才开始露出曙光。

      如今，泰国政府积极推广华文教育，华文正式享有与英、法、德、日等外语教育同等的地位。小学华文从过去的4年级，改成授课至6年级，华文也成为中学外文的选修科之一。国内著名大学，如朱拉隆功大学（Chulalongkorn University）等，都开办了华文专业，以作为招生的卖点，并培育了一批精通华文的硕士生。

      另一方面，华文补习学校也与日俱增，泰国76个一级行政区的华人社团所开设的华文补习学校、夜校、培训班、华文讲座等不胜枚举，其中东方文化书院的规模最大，属于个中翘楚。

      由于精通华文的人不多，致使泰国华教面临师资短缺的严重问题。清莱的皇太后大学（Mae Fah Luang University）成立了“泰国华教促进会”，举办华文师资培训班，并计划在曼谷开办一所华文师资培训中心，以期能彻底解决华文师资问题。此外，基于师资问题的急迫性，泰国华文民校协会也屡派教师赴中国培训。

     泰国华教能否扭转乾坤开创一片天，令人关注，毕竟在许多华人社群中，泰语已成为日用语言。尽管上了华文学校，但由于缺乏使用华语的大环境，许多毕业后的华人子女，华语还是不太流利。在这里定居多年，泰语早已取代华语，根深蒂固地渗入了泰国华人脑海深处。

      现今，除了大量增加的中国游客，数以万计的华人新移民，也为泰国华文教育带来新契机。如果华人新移民的人数不断增加，甚至超过泰化的华人人口，那么华文教育的重生指日可待。此外，华人家庭开始重视孩子的华文教育，对泰国华教发展而言，也是一次重要的转机。

* *直到今天，泰国的商家、政要主要还是潮汕人。据统计，泰语中的外来语，超过300个是用潮语发音，如“耀华力”、“新正如意”、“食斋”等。泰国潮汕人“称王入相”，举国上下充满“潮味”，堪称“海外潮汕”。*
* 过去，中文报刊是华人和泰国主流社会之间的沟通桥梁。
* 然而，随着华人逐渐融入泰国社会，中文报刊的存在价值备受考验。泰国目前拥有6家中文日报，即《世界日报》、《星暹日报》、《中华日报》、《京华中原联合日报》、《亚洲日报》和《新中原报》。这些中文报刊，大多拥有超过30年历史。除了《世界日报》将读者群锁定为新移民及台商之外，其余5份报纸的主要读者都是老华人。
* 这6家报章的总销量，目前大约只有6万至7万份。这么小的市场，同业间的竞争岂不是更激烈？大部分报人认为，竞争还谈不上，大家眼前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提升市场需求，让中文报继续生存下去。
* 当地的泰文报纸，都用国内新闻来当头条，而中文报章却以国际新闻为头条，弥补了泰国报纸内容上的不足，固定的读者几乎都是老华人。他们仍抱着落叶归根的心态，非常关注中国的动向，希望通过华文报获取更多相关信息。至于年轻华人，由于强烈认同“泰国人” 的身份，因此对泰国的关心甚于中国，一般只选择泰文报或英文报。
* 除了读者不多，中文报业也面临新闻从业人员青黄不接的问题。
* 华文教育停滞了数十年，导致中文新闻从业人员出现巨大的断层，报馆都靠老报人在把关操持。中文程度较高的泰北华人是报馆的生力军。
* 近年来，新移民不断涌入泰国，稍微缓解了人才短缺的问题，加上中泰密切合作，华文教育逐渐受到重视，必定进一步推动中文媒体的发展。报人们普遍认为，中文报业应该把握良机，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
* 华人和社团的关系可谓唇齿相依，华人社会的发展靠社团的扶持，而社团的壮大与否，又取决于华人事业上的成就。
* 泰国的华人社团很多，最久的达百年历史，但大多数都是在二战之后才成立的。它们大致分为5大类，即乡土团体、宗族团体、慈善团体、宗教团体和商业团体。
* 泰国九属会馆是一个团结乡亲、凝聚泰国华社力量的最重要的社团。它由潮州、客家、广肇、海南、福建、江浙、台湾、云南和广西9 个会馆组成，成立时间各不相同。历史最悠久的广肇会馆，已有超过 120年的历史；而最年轻的广西总会，成立还不足30年。目前，人数最多的潮州会馆，担负着领导九属的重任。
* 泰国中华总商会算是最高的侨团机构，负责推动泰华工商界的团结与合作，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除了老华人，新移民和台商也成立了不少组织。泰国华人青年商会凝聚了年轻有为的新移民企业家，彼此相互扶持以提升竞争力。台湾商人也成立了台湾总商会，促进台商在泰国的发展。
* 深受当地认同的华人慈善团体，更为所有需要协助的泰国公民，带来了无尽的温暖，其中以报德善堂、明满善堂为代表，积极推动慈善、公益活动。
* 尽管大部分华人已经同化，但泰华团体却想方设法培育出新一代的接班人，以继续维持、发扬中华文化与精神。
* 宗教信仰是泰国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泰华亦然。华人以佛教徒居多，基督徒和回教徒所占比例极少。曼谷的唐人街有一座著名的华人庙宇——龙莲寺，长年香火不绝，信徒无数。
* 此外，藏身于大街小巷中的华人寺庙如关帝庙、观音庙等，也有不少膜拜的信众。泰国的寺庙多如繁星，华人不怕找不到上香之处，只愁没时间走访所有的寺庙。
* 扶老携幼前往寺庙烧香拜佛，可说是华人全家参与的活动。在泰国的寺庙里，随处可见衣着前卫的年轻华人，携带着供品如鲜花水果、各色糕点、蜡烛、香枝和金银元宝等，虔心地在烧香礼佛。
* 每逢喜庆节日或佛诞，庙里更是香火鼎盛、人潮涌动，袅袅的白烟，缭绕着男女老幼虔诚的心。祈福的、还愿的、捐钱行善的人群，整日络绎不绝。
* 华人大多为佛教徒，但潮汕人由于受到祖辈影响，对传统的民间信仰也很虔诚。除了礼佛，他们也崇拜神明、神话或历史人物，如八仙、林默娘、孙悟空等。从商的华人一般供奉财神，祈求大发利市；有些则崇拜关公，希冀团结乡亲，把忠孝节义的精神传承下去。
* 泰华社会多元丰富，一方面融入本土的风俗人情，另一方面又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和习俗，真可谓百花齐放，特色鲜明。
* 在华人密集的曼谷，最热闹的日子并非在春节期间，而是在春节前一个月左右，大家开始办年货的时候。唐人街一带，放眼尽是排山倒海的人潮，以及琳琅满目的年货，诸如对联、金元宝、假红炮、十二生肖装饰品等，四处一片红彤彤，令人目不暇接。小贩们还售卖各色引人垂涎三尺的应节食品，如芦柑、糕饼和肉干。
* 办年货的人太多，唐人街经常被挤得水泄不通。
* 然而，春节前的繁华景象却在春节期间消失了。曼谷华人说：“虽然春节不是法定假日，但华人大多会休假，曼谷街头因此显得特别冷清！”留在当地过年的华人，则会相互拜年，举行家庭聚餐。
* 若身在距离曼谷北部约300公里的北榄坡（Nakhon Sawan），则更能够体会到春节的热闹气氛，因为这是华人春节习俗保留得最完好的城市。每年春节，这里都会举办游神盛会，至今已有七、八十届了。活动内容洋洋大观，有中国民间艺术表演、舞狮舞龙、武术表演等，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特色。
* 除春节外，华人也庆祝端午节和中秋节。在曼谷的唐人街，常年都买得到粽子，逢端午佳节更是不在话下；说到中秋节，早期唐人街一带，家家户户会在农历八月十五设好神坛，摆上祭拜月亮娘娘的供品，而如今在曼谷的各大商场，中秋前后都设有“月饼专卖柜台”，推出传统及其他口味的月饼，包装特别讲究。
* 话说回来，其实泰华社会，对泰国的传统节庆更感熟悉。许多土生土长的华人，从小就在当地度过大大小小的泰国节庆。例如元旦当天，华人会依当地习俗，前往9家寺庙去膜拜，水灯节也会一同到河边去点水灯祈福。但最热闹的，莫过于泼水节这个举国欢庆的节日。每逢其时，在炎炎的天气下，华人泰人不分你我，互相泼水祝福对方，体现出华人与泰人之间深厚的情谊。
* 在泰国北部，素有“泰国香格里拉”之称的清莱府一带，有一群华人在山林里居住超过半个世纪。他们是当年滞留于此的国民党93师军人及后裔。这里仿佛是一个中国云南人聚居的部落，村子主要由云南人组成。近年来，也有不少台商来这里投资和定居。
* 清莱府最有名的华人村叫美斯乐（Mae Salong），绿浪起伏的山头，种植着品质优良的茶叶和蔬果，人们不再需要扛着枪过日子，他们从事种植或旅游业，生活安定平静。跟城市华人相比，泰北华人大半仍过着清贫的生活，房子简陋。不过近几年，茅草房都改建成洋灰房，水电也已一应俱全。
* 邻里之间都说云南话或华语，中文在这里比泰文更通用，华人经营的店铺都有中文招牌。此外，泰北有80多所中文学校，孩子们可在闲暇时间，到学校提升自身的中文水平。尽管得不到政府的认可，但中文学校却在华人的支持下走到今天，造福了不少华人子弟。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往城里跑，掌握中、泰双语的他们很快就能找到工作，许多人当起华商的助理、翻译或中文报馆的编辑、打字员等。
* 泰北华人热爱中华文化，保留了大量的云南人生活习惯和礼仪。他们用碗筷吃着道地的云南菜，热烈庆祝华人的喜庆节日，并遵守传统的中华风俗习惯。富丽堂皇的云南会馆，正是他们自豪的展现。为了让后人记得祖辈的付出，以及泰王和国家对华人的恩惠，他们在美斯乐建立了一个泰北义民文史馆，让泰北华人的历史永远流传下去。
* 华人到寺庙烧香拜佛之外，另有一桩绝不会忘记的事，那就是捐款。行善首要在心意，善款多寡倒是其次。泰国崇佛的华人大抵相信因果，毕竟“须念世上苦人多”呀！
* 原本供人烧香膜拜的寺庙，也成了凝聚华人力量的场所。寺庙毅然办起了慈善事业，并逐渐发展为善堂。
* 报德善堂是泰国规模最大、声望最隆的慈善机构，成立至今已近百年。1910年，泰国侨领郑智勇与12名华人在唐人街共襄义举，购地修盖了大峰祖师庙，取名“报德堂”，后改称“暹罗华侨报德善堂”。早年来到泰国的华人普遍贫困，那不幸客死异乡的，死后甚至无人领尸，善堂便负起了收埋无名尸骨的责任，后来还开设了华侨医院，造福同胞。
* 报德善堂初期只用了2千泰铢注册资金，如今拥有的资产接近数十亿泰铢。善堂能有今日的规模，除了热心华人的支持，也不能不提第二任掌舵者郑午楼的热心灌溉。郑氏将企业管理的丰富经验运用到慈善事业上，将善堂办得有声有色。除了医院，还设有华人义山及华侨崇圣大学，大学还开办中文系。善堂的成就，赢来了当地一致的肯定和赞扬。
* 泰华拥有数百个大小不等的慈善团体，名声传遍东南亚各地。多年来，它们在泰国社会修桥铺路、创办学校、提供医药服务及筹募善款。这种无私的付出，不但令华族、泰族之间的隔阂消弭于无形，更促进了彼此的情感交流。
* 佛教的慈悲和宽容，似乎渗透入每个泰国人的心灵。八方云集的朋友，不分你我，安然共处于这片气氛和煦的土地上。
* 有人说，这里的华人已经被泰化。但从另一面来看，华人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影响力，何尝不是深入泰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曼谷，这个华人最密集的泰国城市，不正每天展现着华人社会强盛的活力吗？
* 当许多海外华人感叹孤儿命运之际，泰国华人，却已经在这“微笑之邦”中谱写出一段又一段美好的家园故事

寮国

* 寮国有“万象之国”的称号，北临中国，东与越南接壤，西以湄公河为界和泰国相隔。它是印支半岛上唯一的内陆国家，80％的国土是山地和高原，森林覆盖面积很广。如此地理环境，造成寮国交通不便，开发起来更是困难重重。因此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它较为落后贫穷。
* 不过，这里的人民却出奇地乐观知足，68个民族融洽相处，安居乐业。华人人口排在三大少数民族——越南人、束埔寨人和缅甸人之后，但他们对寮国的经济却贡献良多，并且与寮国人感情融洽，广受社会欢迎。
* 1997年，奉行社会主义的寮国加入东盟，逐步走向市场经济，吸引着世界各国的企业前来投资。为迎接2009年的东南亚运动会，它更是全力发展硬体设施，振兴经济。
* 寮国，似乎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根据记载，在数世纪以前，华人已经来到寮国。他们翻山越岭从中国云南以及广西边境进入寮国。

      那时，寮国境内经济不发达，只有一些被称为“马帮”的华人商队，每年2月会来到这里经商，通常只逗留一两个月后就离开。

      19世纪末，华商开始从越南及柬埔寨移居到寮国来，并且在琅勃拉邦（Luang Prabang）和万象建立家园。

      1893年，寮国成为法国保护国后，殖民政府为了开发寮国，于是颁布种种优惠政策以吸引华人移民前来，例如允许他们开垦土地、可自由出入境、出入口货物皆可免税等。当时不少本已离去的华人，因此卷土重来。

      二战过后，寮国于1945年取得独立。为了解决国内资金的问题，政府大力鼓励外侨投资。这时，华人移民的数量自然略有增加。

      然而，1962年寮国发生政变，不少华人所开设的工厂均被没收。稍后，华人重整旗鼓，并于70年代初达到了巅峰时期，估计当时的华人人口至少已达十万人之多。

      那时的华人大多数相当富有，他们主要居住在接近泰国的湄公河流域，过着安定舒适的生活。与此同时，华人社团纷纷成立，华文教育也迅速发展，当时共建立了20多间华校，学生人数少则数百，多则数千人；而华文报刊也随着出版。

      1975年到1984年之间为寮国华人社会发展的停滞期。这期间，由于寮国与越南结盟，1979年又跟随越南公开反华，导致中寮关系紧张。当时的寮国政府甚至没收华人的财产，封闭工厂及商店，只允许华人进行小本生意，华文教育以及华文报刊亦遭到全面禁止。

      当时有九成华人纷纷逃往泰国、印尼和新加坡，或转往欧美各国，其中不乏财力雄厚者；而留下来的，则大多数是幼童或中老年人。在大逃离事件发生后，华人人口遂锐减至5千多人。

      而今，每当提起这些陈年往事，寮国的华人总是轻描淡写。许多年长者觉得，寮国华人还算是幸运的，因为这里并没有发生过真正大规模的排华行动。即使是在中寮关系最紧张的时期，善良的寮国人与华人依然和睦相处。

      到了1986年底，中寮终于恢复往来，为当地的华人华侨带来了新希望。

      近20年来，随着两国之间展开亲密的邦交，许多中国的创业人士及企业家，纷纷迁移到寮国。

      此外，不少东南亚华人以及少数早年离开寮国的华人，也都选择到这里发展。华人人口的数量因而再度上升，使寮国华社又迎来了一个春天。

* *寮国华人多数为生计奔波，几乎无人愿意参与政事。有“华人之光” 称号的华裔凌绪光（宋萨瓦・伦萨瓦），是寮国政界凤毛麟角的华人之一。他曾出任寮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又当选为寮国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 寮国华人有这样的说法：万象以南，多为广东潮汕人；万象以北，则是云南人的聚集地。
* 除了潮州人和云南人，寮国也有客家人、广府人、福建人和海南人。据万象中华理事会登记在册的华人大约为3万人，其实边远山区的华人和流动性大的新移民却无从统计，确切人数不得而知，据估计全国华人人口超过十万。寮国华人主要居住在万象、百细（Pakse）、琅勃拉邦和沙湾拿吉（Savannakhet）等城镇。
* 如今，超过95%的老华人已经取得寮国国籍。他们和寮国人的通婚率高达90%以上，在第三、四代的土生华人中，半数以上都是中寮混血儿。寮国的经济发展缓慢，但大部分华人都过着安稳的生活。这里财力雄厚者并不多，华人多数是投资于中小型企业、经营小商店的小老板。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多在私人公司或政府部门任职。
* 1975年的大逃亡事件，使华人社会元气大伤。但留下来的华人，并没有放弃中文教育和中华文化，但同时也吸取教训，更开明地接纳当地文化，淡化了那浓郁厚重的华人色彩。
* 近几年，中国和寮国之间经济往来频密，中国在寮国投资的发展项目越来越多，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企业家、商人、技术人员陆续到了寮国，这个群体人数不断增长，当地人把他们称为“寮国新华侨”。他们不仅为寮国经济注入活力，也把丰富的中华文化带来这里。
* 万象是寮国华人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它虽为一国之都，看起来却像一个小城镇。这里没有摩天高楼，城中最讲究的建筑物就是庙宇。市内有许多老店铺，泛黄的招牌上偶尔可以见到熟悉的方块汉字。由于是内陆地区，万象有一股挥之不散的沉闷气息。无风的下午，一切看起来是静止的，仿佛连时间也睡着了。
* 没错，这是21世纪的寮国，但这里的人们，仿佛依旧过着上世纪的生活。寮国华人保持着一颗单纯的心和淳朴的生活方式。他们并不一定受过高深教育，但谈起生活，个个都是哲学家。他们走路悠然自在，脸上也常常挂着笑容。
* 近几年来，世界各地都在拼命推广“慢活”、“有机饮食”等健康概念，或许这群寮国华人不曾听过这些新颖名词，但他们却都是健康生活的实践者。一名华人说：“这里的蔬果都没有农药，牛羊猪等都是用天然饲料喂养，可以放心吃。我好几年都没生过病了！”
* 寮国医疗设备虽不发达，但华人一般都非常健康长寿。这没有污染和压力的生活环境，一直是华人深爱寮国的原因。
* 寮国华人虽不富裕，但日子过得写意；生活作息很有规律，睡得早，也起得早。一般华人店铺在清晨六七点开始营业，到傍晚六点左右打烊。睡午觉则是寮国人不成文的规定，不少华人商店也墨守陈规，在中午休息一段时间。因此，午后的寮国，总是特别宁静。
* 大部分华人的商店都是家庭式经营，因此休假时间较自由。一般的商店都会在星期日休业，但是有些华人商店在星期日也照常营业。
* 虽然寮国华人努力上进，却也甘于平淡，对物质不会过份要求。他们既不需要住大洋房，也不喜欢开大房车。永珍善堂的林主任说：“大部分华人像寮国人一样，骑着摩托车自由穿梭在大街小巷，遇到熟人便挥手打个招呼，或者停在路边闲聊起来。”
* 寮国华人社会中甚少出现年轻人不婚或不生育的现象。华人的家庭观念浓重，成家立业的秩序从不颠倒。寮华青年在25 岁左右，就开始组织家庭。生儿育女，打造幸福家庭是他们最大的志愿。因此，许多看起来还像个大学生的年轻男女，其实已为人父母。
* 寮国地价便宜，买房子或租房子的负担都不大。但孩子成家后大多都会与父母同住；经济能力较好的家庭，几乎是整个家族住在一起。
* 在繁忙的大城市，很多人只能在每年除夕和家庭成员团聚，一起吃一顿年夜饭。但在寮国，华人的家庭成员几乎天天齐聚在餐桌上；尽管吃的是粗茶淡饭，但他们享受的却是天伦之乐。
* 每逢周末或休假，则几瓶冰凉的寮国啤酒，就可以陪伴许多华人和寮国人度过一个悠长的下午。这里娱乐活动不多，年长的华人常常和三五好友一起喝酒、聊天、下棋或打球；而年轻人则喜欢相约一起逛街、看电影、唱唱卡拉OK。
* 许多华人的亲友在移民热潮时都已经移民到法国、美国、澳洲等地，因此每逢假期，一些寮国华人也不时会飞到国外探访亲友，小住一段时间。年届80岁的老华侨郭玉兰女士说：“虽然不少寮国华人都曾走访国外，甚至周游列国，但是他们仍然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寮国一样，让他们这么轻松地过日子。”
* 华人与寮国人通婚的现象，比一般华人之间结合的情况还要普遍。在华人的生活圈子里，他们与同族接触的机会太少。从校园到社会，华人身边接触到的儿乎都是寮国人。华人能说流利寮国语，彼此拥有同样的成长背景，加上寮国人天性热情善良，成了华人最好的朋友和人生伴侣。因而目前第三、四代在寮国出生的华人，多半是中寮婚姻的结晶。
* 在许多中寮通婚的家庭中，华人在饮食方面已融入寮国特色，他们的三餐都非常简单，以蔬菜为主。中寮混血儿许文华说：“只要一点辣椒，一些青菜，配上一点糯米饭，就是我们的一餐了。”虽然喜欢刺激的年轻人认为寮国菜比中餐更吸引他们，不过，年长的华人始终认为中餐更为温和可口。
* 早在移民初期，人数众多的潮州人就把许多传统的潮州美食带来这里。如今，不少华人后代仍然经营着祖传的潮州鸭肉面，或者售卖中式牛肉面、云吞面、叉烧面等等。华人的小食如包子、豆花和豆浆，也成了寮国社会最受欢迎的早点和夜宵。
* 寮国是一个佛教国，人民多为虔诚的佛教徒。这里的大街上佛寺林立，许多寮国少年都出家成为僧侣，因为寺院里会提供免费教育，这是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最需要的福利。他们大多在学满后还俗，利用所学专长，在社会上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 华人一般来自小康家庭，甚少人因为经济压力出家，不过他们依然像寮国人一样，尊比丘、礼佛像。每天清晨，不少华人会布施给托钵的僧侣；每逢佛诞等节庆，华人也会到寺庙浴佛。
* 除了佛教，华人也奉行传统信仰。在许多华人家里或店铺里，都可以看到置放在墙上的祖先牌位，而地面上则有土地公；此外，一些华人也供奉财神和泰国神像。
* 虽然寮国处处有佛寺，但华人依然建立了供奉传统神像的庙宇。这些庙宇的屋檐、屋顶、圆柱上，少不了龙凤雕刻等具中国风味的设计。在万象有两间华人庙宇——福德庙和伏波庙，平日前来烧香的人不多，但每逢节庆或者神诞，信徒们就会把庙宇挤得水泄不通。华人还通过庙宇发起了慈善基金、福利金等活动，来扶贫济弱，回馈社会。
* 提起华人传统节庆，当地人最熟悉的是清明节。寮国人死后一般都会进行火化仪式，之后将骨灰撒落河中或安放在寺院里，而寮国华人则遵行土葬。每逢清明节，华人总会扶老携幼，带着食物、香烛、纸扎等供品，到郊外的坟山祭拜先辈。仪式过后，一家大小便席地而坐，在先人的墓碑前，边吃边闲话家常。原本荒凉的坟山，这时候充满了生气。
* 除了清明节之外，琅勃拉邦的华人也仍坚持春秋二祭的习俗，只不过他们把秋祭改定在每年冬至。冬至的早晨，雾色还未散尽，琅勃拉邦的新旧义山已经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中华理事会引领着当地华人和寮国人一起进行公祭活动。虽然没有吃汤圆过冬至节，但他们却以另一种方式，和阴阳相隔的家人团圆。
* 在寮国，寮语是最通行的语言。另外，泰语在当地也非常实用，和泰国货币一样，在寮国处处通行，是寮国华人掌握得最好的第二语言。华语因在寮国使用的机会太少，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 不少50岁以上的华人，曾受过良好的中文教育。今天，虽然他们的华语因为少用而生疏，但是他们对汉字的热爱还是不减当年。这些爱看中文书、听华语歌曲的华人，都坚持把孩子送到华文学校学习。许多不谙华语的华人、寮国人和其他国籍人士，也乐意送儿女到华校就读。因此，有人把寮国的华文学校形容为“国际学校”。
* 寮国目前共有五所中文学校，大都创办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们是万象寮都公学、琅勃拉邦市的新华学校、甘蒙省（Khammouan）他曲（Thakhek）的华侨学校、南部沙湾拿吉的崇德学校以及百细市的华侨公学。长期以来，寮国政府对华文教育不闻不问，让其自生自灭。近年来，华人人数大量流失，要维持华校也不容易。
* 五所华文学校，全部隶属于寮国各省的中华理事会。从筹集办校基金、争取地方政府对华校的支持到解决师资或教材问题等大大小小的事项，都由理事会派专人负责处理。
* 这些学校中，位于万象的寮都公学较成功实行了华寮双语教育政策，学生人数多达千人，为五校之冠。学校里教授的科目包括华文和中小学的数、理、化和英文等科目，都采用中国中小学教材。与此同时，华文学校也教授寮国中小学的必修课程。
* 在寮国的中小学统考中，寮都公学的学生一直名列前茅。这骄人的成绩成了学校的活招牌，吸引很多政府公务员以及在寮国经商的外国人，争相把孩子送进寮都公学就读。
* 然而，华人人数不多，许多省份的华校都陷入生源短缺的困境。以琅勃拉邦的新华学校为例，校内近700名学生中，拥有华人血统的学生竟不足1%。
* 为了解决生源问题，学校只好对教学政策进行修改，教学媒介语从华语改为寮语。华文和英文一样，被列为外语课，每天各有一小时的学习时间。
* 一般寮国华人对教育都十分热心，愿意慷慨解囊来分担学校的经费。学校更为贫寒家庭的子女提供半免或全免学费，让他们可以安心学习，完成学业。
* 经济能力较好的华人家庭，多会在孩子高中毕业后，把他们送到西方国家学习。
* 近年来，到中国升学渐渐成了另一股风气，其中北京和广州是大部分学生的首选。华文学校也为成绩优秀的学生提供留学中国的奖学金，他们毕业后都会回返母校执教，将所学知识传授给下一代，也不断提升寮国华文教育的水平。
* 留在寮国的华人，野心不大。一盘小生意，一份安稳工作，已经让他们心满意足。
* 做生意，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寮国的华人，偏偏就少了“地利”的优势。寮国是内陆国家，山多又交通不便，让它长期以来都走不出经济困境。因此华人只能经营中小型企业，财力雄厚的大集团或机构寥寥无几。
* 1975年反华事件后留下来的华人，多半都是出于各种原因而无法离开。对于前景，他们虽感到仿徨无助，然而反过来看，市场上竞争对手已所剩无几，却也是一个大展拳脚的机会。许多原本住在万象以外的华人，都在那时候纷纷入城，伺机而动。
* 等到局势稳定后，华人或经营残存下来的小餐馆、谷物店与建筑公司，或投入新领域发展，比如汽车代理、电器代理等。许多后来成功的华人企业家， 就是在这期间找到了他们人生的第一桶金。
* 自1997年寮国加入东盟，走向市场经济后，华人再次控制了建筑业与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在摩托车进口业、木材加工业与家私业方面，均有不错的表现。
* 目前，华商大多数为小老板，经营着各类小生意。实力较雄厚者，则投资于各种行业，如餐饮、金银、服装、日用百货、土产、酿酒、碾米、木材加工、汽油零售、汽车及摩托车销售、电器五金以及机械维修等。
* 随着旅游业兴起，华人也开始转向银行、酒店等方面发展。泰国、越南、柬埔寨的不少华人，也纷纷到寮国来投资。一些寮国华人与外来华商合作开发天然资源，如伐木与锯木业，也联营纺织、化学肥料、橡胶树种植、酒店及银行业等。
* 如今，华人社会的结构，已经迈入一个全新的时期。
* 近年来，大批来自中国云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广西等省的新移民持着商业签证到寮国发展，估计人数已经突破十万人。新移民大多是由亲友引进，前来寮国做生意；他们中有的开档口做杂货买卖，也有的开店和办工厂。
* 在万象的三江国际商贸城和琅勃拉邦的中国市场里，触目所见的都是新移民商人。他们多数售卖衣服、五金、电器等商品，销售对象主要是寮国人和泰国人。他们一般都不算富裕，但三餐温饱。当中有些人已经在这里逗留了五年以上，但生活空间却只局限在市场里。
* 自寮国加入东盟后，旅游业成了寮国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原本万象市内只有几家门前冷落的潮州餐厅、泰国餐厅和越南餐厅，但随着旅游业的兴盛将市场扩展后，新移民赶紧把握时机，把各式各样的中华美食引进万象，似乎有意将昭阿努路和兴文路这两条华人商店聚集的唐人街，打造成中华美食天堂，以期让游客流连忘返。
* 除了那些售卖潮州鸭肉面和广式点心的老字号外，新移民更首创先河，将北京烤鸭带到万象唐人街，让吃惯烧烤鸭爪的寮国人，尝试鸭肉的新吃法。来自云南、四川和辽宁的新移民也陆续在寮国办起了餐馆，把过桥米线、田七气锅鸡、麻婆豆腐、重庆火锅和水饺等美食带进来。
* 中餐馆的主要顾客群，大部分是在寮国生活的华人、中国使馆人员、华人游客以及寮国的中上层社会人士。除了餐饮业之外，目前一些新移民也开始经营旅馆、卡拉OK厅和按摩院，发展日渐多元。
* 大部分新移民到寮国的目的都是为了创业挣钱，一旦赚够了钱就会离开这里，衣锦还乡。他们长时间拼命地工作，极少与寮国社会交流。
* 然而，寮国始终是一个会让人情不自禁爱上的地方。日子久了，一些新移民发现他们竟习惯了这缓慢的生活节奏，喜欢上这淳朴的民风。有些人更把一家大小接过来一起生活打拼，有些则干脆申请永久居留，正式加入寮国这个大家庭。
* *继泰国盘谷银行和农民银行在寮国设立分行后，澳、泰、港、台和寮国的华商，联合寮国政府集资一千万美元成立万象商业银行。该集团旗下投资的项目包括寮国芭莎大酒店、友谊大桥免税店、法国标致汽车、万象国际开发公司等，协助寮国走向发展大道。*
* 无论是华人结婚或中寮通婚，摆喜宴招待亲友，都是不能不遵行的礼仪。
* 寮国社会信奉小乘佛教，每年阳历11月末至1月之间，正好是小乘佛教的解夏节之后的宜婚旺季。这时候可谓请柬如飞雪，婚宴连场转，华人几乎每一天晚上都要赴宴。开店做生意的华人，都得提早打烊，以便准时赴宴。
* 一般寮国华人婚嫁，白天依然会进行接新娘、拜天地、敬茶等传统仪式，晚间则设宴招待亲友，宴会的仪式融合了华人与寮国人的文化。当地宴客少则数百人，多的话可达数千人，场面非常壮观。
* 寮国社会非常重视婚宴，宾客们都会盛重打扮。女士穿上传统寮国裙子，发型妆容和服饰搭配都费了不少心思。男士则穿上笔挺的衬衫或西装，皮鞋都擦得发亮。出席婚宴的男女老幼，个个都难掩兴奋之情，像是高中生要赴毕业舞会一样。
* 婚宴上最大的特色，就是少不了美酒、音乐和舞蹈，美食反而成了配角。寮国人是天生的舞者，全身细胞在音乐一响起就马上活跃起来。寮国华人对舞蹈的热爱和投入，更是令外人咋舌。当一对新人在众人的掌声中跳完第一支寮国舞蹈后，所有宾客便迫不及待地涌入舞池，在不停歇的现场乐队伴奏下，翩翩起舞。
* 华人通常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民族，不过在这里他们却学会了寮国人的豁达。他们不再含蓄，尽情地在舞池中释放热情。出席过寮国婚礼的人都可以深深体会到，寮国社会已经没有所谓的华人和寮国人之分。这两个族群已经相互融合，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华人离开寮国之后，许多华人组织都已经消失。
* 如今，在寮国华人集中的五个省份里，中华理事会是唯一的华人组织。除了团结当地华人，它也为华人提供文化、教育、福利等方面的服务和帮助。在中华理事会服务的华人都属义务性质，只谈奉献而不问回报。
* 万象中华理事会称得上是寮国华人全国性组织，也是各地中华理事会的“老大哥”。该会除了团结华人并热心社会公益，也致力促进中寮友好关系。万象中华理事会属下除了有寮华公学之外，也设有永珍善堂、伏波庙、福德庙、妇女会、少狮团、校友会等机构和产业。无论在经济、教育、文化等各领域，该会都积极发挥华人的力量，促进寮国的社会发展。
* 今天，万象中华理事会不但在华人社会中广为人知，它也成了寮国政府和华人之间的沟通桥梁，同时也是中国大使馆和华社紧密联系的管道。
* 寮国华人对居留地和人民，都拥有一份深厚的感情。许多在寮国生活了好几代的华人，虽然有能力移民到国外，但是他们却宁愿留在这个内陆小国，过着朴实无华的日子。也许只有在这里真正生活过的人，才能感受到寮国无穷的魅力。无论男女老幼，他们都希望在这里悠闲自在过一辈子。物质不一定是快乐与幸福的保证，寮国华人早已经悟出这道理。他们将快乐融入生活，让生活回归本源。

柬埔寨

 柬埔寨位于中南半岛南部，与越南、泰国、寮国毗邻。它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建立了扶南王国，公元10至13世纪，是柬埔寨文明最灿烂的时代，也称为吴哥时代。境内湖光山色，景色秀丽，富有艺术气息的佛寺与古迹，使它赢得了“东方巴黎”的美誉。柬埔寨于1863年沦为法国保护国，直到1953年才独立建国。

      自独立以来，柬埔寨的局势一直处于动荡的状况，政权更迭，战乱连年，直到80年代末才逐渐稳定。今天提起柬埔寨，除了马上令人想到举世闻名的历史古迹吴哥窟之外，还有骇人听闻的红色高棉恐怖大屠杀，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地雷场”。

      柬埔寨的天然资源虽然富饶，几年前还发现藏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可是多年战乱，使柬埔寨沦为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国家长期依靠外援，人民生活极其艰苦，教育水平低落。

      今天，这片正被开发的土地，充满着危机与商机。历经风雨的华人，能否如浴火重生的凤凰，展现其更为斑斓的羽翼呢？

      早在宋朝，就已经有华商到柬埔寨活动，那时候，华人被当地人称为“唐人”或“新唐人”。根据元朝使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 （1295年）所记载，当时柬埔寨境内已有不少华人旅居于此。

      1405年郑和首次下西洋时，也曾经抵达柬埔寨沿岸港口，往后接踵而来的华人越来越多。

      17世纪，为了逃离清政府的政治迫害，有更多的华南居民乘船南下来到金边。19世纪，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以及民不聊生的困境，人民被迫离乡背井，向南抵达柬埔寨。在柬埔寨成为法国保护国之后，亟需劳动力，因此吸引了大批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居民移居柬埔寨。20世纪上半叶，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军北伐、日军侵华等动乱，均是迫使更多华人移居柬埔寨的因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严格限制人民出国，移民浪潮才因此受到遏制。直到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政府允许国人出境，再次掀起了移民浪潮，涌入柬埔寨的中国移民至今未曾间断。

      柬埔寨现约有60万华人，首都金边有40万人左右，其他人口分布在公贡布省、马德望省、磅湛省、甘拉和茶胶等经济较发达的省份。金边市是华人口中的“潮州城”，那里有80％的华人是潮州人，潮州话是华人最常使用的方言。

      今天绝大部分华人已入籍柬埔寨，很多华人家庭已迎来第三、四代。华人与柬埔寨人和睦共处，他们说柬语、听柬歌、吃当地食物，生活随遇而安。虽然华人的根已深扎在柬埔寨，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仍保留中华传统习俗，代代传承中华文化。

      有人说，现在可算是华人处境最好的时期，因为机会处处，只要肯吃苦打拼，就能闯出一片天。

      柬埔寨华人总算苦尽甘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似乎可以在他们身上获得印证。

      华人在柬埔寨的处境，起伏跌宕，命途多舛。

      20世纪50至70年代，华人的处境较好，不过依然受到歧视，例如华人被禁从事某些行业。1970年，美国支持朗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政府，柬埔寨华人厄运正式开始。

      朗诺掌权后，便以“散播共产主义思想”为由将华校和华报关闭，还鼓动排华情绪，导致华人首次遭到高棉人杀害。

      1975年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后，展开消灭阶级和种族的行动，强迫城镇居民到乡下劳改。当时多是资产阶级的华人，惨遭拘捕和杀害，许多华人在下乡途中因饥饿、疾病、过劳而丧命。

      近十年的战乱，不仅摧毁了柬埔寨，也导致华人人口锐减。据调查，在短短3年8个月的红色恐怖中，华人死亡人数高达20万人，占死者总人数的一半。

      1979年红色高棉政权垮台，劫后余生的华人战战兢兢地回到金边和各省份重建家园。昔日繁华的金边市，那时已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鬼城，十室九空，路上汽车绝迹。

      历经连年战乱，华人成了惊弓之鸟，为求安全只好隐姓埋名，不敢张扬华人的身份，甚至不再说华语或方言，而一律使用柬语。

      华人就这样“销声匿迹”，在柬埔寨社会沉寂了约20年。直到1989 年，曙光才重新照射在华人身上。

      1991年，西哈努克以国王身份重回金边，取消所有对华人的法定歧视和限制，让华人享有跟当地柬埔寨人同等的法律地位。从此，华人重新回到起跑线，以勤勉耐劳的精神从小生意做起，参与国家重建发展。历经苦难折磨的华人，反而被淬砺得更加坚韧不拔，更努力打拼。

      一路风雨走来，这个国家曾经重重地鞭挞华人，在华人身上烙下伤痕累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昔日的伤痕逐渐消退。华人并没有瑟缩于过往那段令人战栗的“红色记忆”，而是紧跟国家经济发展的步伐，创造属于他们的未来。

      战后的柬埔寨，政局逐渐稳定，国家推行经济开放政策，百废待兴。从90年代起，华人的地位渐渐回升，他们活跃地参与各种经济活动。

      今天，华人在柬埔寨的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当地人眼中，华人往往具有“老板”的形象。八成的柬埔寨华人以经商为生，其中大部分经营传统的杂货铺和零售摊，大多是小本经营。他们有些在路边或市场里摆摊，有些则开设商店，售卖日常食用品。

      据说，当地不少成功的华商都是从市场摆摊中赚得第一桶金。“要在柬埔寨开店不难，营业准证很容易申请，营业税也不高。在中央市场向政府租用一个摊位，5年的租金不过是300美元。”在中央市场卖手表的林先生说。

      除了从事传统的零售、批发和进出口生意，华商的触角也渐渐延伸到金融业、制造业、房地产等行业。此外，金边的中餐馆也多是华人所经营。目前约有500家中餐厅遍布柬埔寨，其中284家就坐落在金边。

      不管开设的是零售商店、中药店、小吃店、餐厅，还是在市场里摆小摊位的华人，都是勤恳务实地工作。

      华人积极投入商业活动，使柬埔寨的经济一片欣欣向荣。近十年来，国家税收很大部分是来自华人公司、工厂和银行。

      柬埔寨政府意识到擅长经商的华人，是振兴国家经济的一大动力，也是连接海外华人的桥梁。于是，政府鼓励他们投入各种商业活动，同时联系海外亲戚朋友，吸引外资前来柬埔寨投资。

      处于建设发展中的柬埔寨，投资环境虽不及越南成熟稳定，但政府推出优惠外商的政策，加上低廉的劳工成本和适中的地理位置，还是吸引了不少中、港、台、澳以及马、新华商前来投资，投资的领域从加工业、纺织、电力、食品、酒店、农林产品到开设医院诊所等等。

      当地华人社会用以下的顺口溜来形容柬埔寨的华商：“香港人办贸易，台湾人炒地皮，大陆人搞机器，各行各业都有华人。”

      华商不断涌入柬埔寨投资设厂，制造了不少就业机会。外来华商需要透过通晓中柬双语的翻译员或中介，才能与当地政府和人民交流沟通。于是懂得中柬双语的华人，又增加了许多工作机会。

      华资建设的华夏大酒店、百乐大酒店，都成了金边市的重要地标；还有金边最大的苏利亚购物中心，最大的加华工业区，最大的加华银行等大型企业，都是华人心血的结晶。

      随着经济能力的加强，华人的政治地位也日渐提高。目前，柬埔寨内阁中超过半数的成员具有华裔血统，譬如现任国会议长谢辛、新闻部长吕来盛、国务部长占比塞，还有内阁部长索安都是华人。此外，还有不少华裔第二、三代也在政府行政机构担任高官要职。

    华人在柬埔寨的生活虽说不上大富大贵，却也三餐温饱，生活安稳。华人生活的节奏，可说是随着国家的经济轮盘而不停转动。

      “柬埔寨这几年的变化很大，我们必须紧跟国家的发展，才能及时掌握时机，获得成功！”在柬埔寨土生土长的黄永昌兴奋地说。虽然已经 50多岁了，但他丝毫没有退休的意念，仿佛是迈向人生的另一个起点。

      华人总给人勤劳可靠的良好印象。他们充分发挥刻苦耐劳的美德，辛勤工作，不放过任何机会。尤其随着中国日益壮大，到柬埔寨经商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柬埔寨华人明白现在绝对是他们拼经济的好时机。

      华人商店几乎起早摸黑就开门做生意，一直到日落天黑才打烊，而从事零售业、服务业或在工厂打工的华人，也都是早出晚归，先苦后甜，累积财富，为下一代铺路。

      华人都安于这种刻苦而平淡的生活，并不打算离开。“我们在这里有吃有住，家人亲戚也全在这里，还要去哪里呢？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让孩子们接受好一点的教育。”55岁的潮州人郑利群如是说，他在金边市开设中药店已有十多年之久。

      育有4名孩子的他透露，大儿子打算明年到当地的私立大学修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老实说，开中药店赚不了大钱，不过既然儿子想继续念书，我还有能力的话就会供他念下去。”这可以说也是大部分柬埔寨华人父母的想法。他们不求大富大贵，总想办法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

      由于多年的战乱，柬埔寨的娱乐比较少，不过中华美食倒相当精彩。

      在金边最常见的是潮州食物。在乌西亚和戴高乐街华人聚集区，到处都是售卖潮州食物的摊子，如各式肉丸、卤鸭肉、炸油条、炒粿条、炒面、粥品等，都可以在这里一饱口福。其中，粿条汤可算是最受欢迎的食物。不只华人，连柬埔寨人也爱吃这道美食，并跟着潮州人叫它做“goateo”。

      近年来，金边的治安问题虽然显著改善了许多，但持刀抢劫、抢摩托车的新闻仍时有所闻，所以入夜后华人尽量留在家里看电视，夜生活并不多。但年轻华人和新移民还是可以找到不少娱乐活动。

      华人日复一日过着这种忙碌充实又平淡无奇的生活。然而，一家人能够在一起生活，吃饭聊天、分享苦乐，不也是一种幸福吗？

      现在，华人受到政府宽容和公平的对待，政府也允许华人组团结社，推广中华文化。柬埔寨最有权势的华人团体——柬华理事会，就是 1990年在政府的鼓励之下成立的。柬华理事会是柬埔寨华人共同的骄傲。过去帮派林立、一盘散沙的情景，如今已不复见。

      “没有几个国家的华团，可以像柬华理事会，成为一个很有系统的组织。”柬华理事会副会长蒙美连自信地说。

      柬华理事会是由潮州、福建、海南、客属、广肇五大宗乡会馆的会长来兼任理事会的副会长或常务理事，并在各地设立分会，建立起一个由上而下的一元化管理模式。这样一来，柬华理事会就能够直接管理会馆、华校、庙宇与乡团，有效地凝聚所有柬埔寨华人的力量。

      柬华理事会目前有一百六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分会、四十余座庙宇和三十余个舞龙舞狮团。柬华理事会跟当地政府关系良好，还获授权处理涉及华人的事务和权益等相关事宜。

      华社领袖在柬埔寨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是华人与政府的桥梁。这些领袖在为华人谋福利之余，也尽量支援政府救灾和配合接待国家贵宾，为国家作一些贡献。

      潮州会馆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会员人数最多的华人社团，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自然不小。大部分会员不是从事商贸，就是经营企业，所以会馆的经济实力较强大。该会馆自成立以来，在社团福利、文教等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除了出钱盖学校，还建立了协天大帝庙、中华医院、潮州义山等。

      此外，当地华人也基于血缘关系成立了13个宗亲会，协助料理会员的红白事，并组团到中国寻根。随着中柬合作关系日益密切，华社也特别成立柬埔寨中华文化发展基金会，目的不仅是帮助华校发展，为华校筹款及开办华文培训班等，同时也举办文化活动，比如举行中国书画展览。

      “如今，三四十岁的华人都不懂华语。”一名当地华人甚感惋惜。

      在战乱的年代，华语被禁用，华校遭封闭，绝迹了二十多年，中华语文出现断层现象。随着国家逐渐开放，柬埔寨华人才不忌讳说华语及方言。

      内战结束后，为了让华人子弟可以接受华文教育，柬埔寨华社筹集了资金，把被柬埔寨人占为民居的校舍一间一间赎回来。

      “华文教育能在夹缝中生根，并且继续繁衍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全是华社凭着不屈不挠的精神换回来的成果。”端华学校李辉明校长一脸骄傲地说。这位年过七旬的老校长在谈及华教的复兴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是的，纵使日子再艰苦，大环境再混乱，如今华人总算还是保住了传承中华文化的根。

      后来，在洪森总理说了“懂华文，易谋生”以后，华文在柬埔寨的地位便大大提升。来柬投资的外商中，使用华文华语者占大多数，华语于是成为市场上及工厂里主要的沟通语言。打开报纸，各公司企业征求员工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懂得华语。

      对华族新生代来说，要在社会上立足，就必须掌握中、英、柬三语。如今在金边会说中柬双语的人才非常抢手，很容易便能在华商公司找到一份月薪约200美元的“好工作”，而柬埔寨人一个月的工资还不超过100美元。

      华人学子的学习生活是极度紧张而忙碌的。

      “早上到华校修读半天中文，下午再到柬校学习半天柬语，晚上还得到补习班学一小时英文。每天东奔西跑，有时候觉得压力很大。”对于紧凑的学习生涯，就读初三的张凤玲表示已习以为常，身边同学朋友大都过着相同的日子。

      年轻华人至少拥有华校小学六年级的程度，一般具备基础的华语水平，有的在家里还会跟父母说潮州话或广东话。但对很多年轻的华人来说，柬语才是他们的母语，是他们在生活中与家人、朋友沟通的语言，而华语只是工作上必备的外语。所以，他们认为华语只要具备基本听说读写的能力，便足以找到一份工资不错的工作。

      如今柬埔寨共有70所华校，近4万多名学生，其中80％是当地华人，其余是越南华侨和柬埔寨人。直属潮州会馆的端华学校，已有50多年历史，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华文学校，其学生人数共有1万3千人。

      这些华校多由乡团或是会馆直接管理，政府不给予津贴，柬华理事总会负责统筹学制、教材和师资调配。

      端华学校设有幼儿园、小学、初中和专修班四个等级，学制算得上相当完善。相等于高中的两年制专修班，教授中柬翻译、中英翻译、电脑和会计等实用课程，学生毕业后即能马上投入就业市场。

      随着全国柬文学校即将实行全日制，华校也实行全日制，半日教华文，半日教柬文，这样一来学生就无须每天来回奔走于华校和柬校之间，同时学生也可以多领一张柬文文凭。华校生拥有中柬两张文凭，等于多了一个优势。

      “这样一来，华校毕业证书一直不被政府承认的问题，也连带迎刃而解了。”李辉明校长表示，这对华校无疑是一项非常有利的教育政策，从而可以解决华校的困境。一旦文凭受到政府承认，加上华文日渐倍增的市场价值，势必为华校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力。

      华人一向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柬埔寨华人也一样，宁愿让孩子接受更多教育，很多家境好的孩子，中学毕业后就被父母送到国外读大学。最近几年，还有不少华人把孩子送到新加坡念书。不过，很多在海外留学的孩子毕业后还是会选择回国与家人团聚，同时帮忙父母做生意

华人虽在柬埔寨居住了逾百年，也融入了当地社会，然而他们仍保留着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

      柬埔寨华人社群依旧会过中国潮汕的“时年八节”，即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冬至、除夕以及春分、秋分二祭。而且，柬华也十分敬仰祖先，每户华人家庭通常会把祖先供奉在大堂正中央的位置，其他神明如观音、关公则供奉在祖先两侧，祖先在华人家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有的华人家庭还供奉土地公和天神，一些虔诚的信徒也供奉灶神。

      “华人对神明很虔诚，每逢初一和十五，鲜花、水果、奉香是必备的，遇上祖先诞辰及忌日、神明诞辰、华人节日等，更是为祭祀忙得不可开交。”一提起柬埔寨华人传统习俗，在金边生活多年的华文补习老师林美发，就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

      他透露，清明节对柬埔寨华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节日，各大华团还纷纷举行公祭，登报号召同乡参加集体扫墓，前往公共墓园祭祀先辈以及失去香火的无主孤坟。

      当地有三间香火特别旺盛的华人庙宇——协天大帝庙、天后圣母宫、保生大帝庙都有逾百年的历史，还有大大小小约50间华人庙宇遍布全国。庙宇是慰藉心灵的庇护所，也是维系华人传统、凝聚华人文化的媒介，且往往还是宗乡会馆，甚至是学校的所在地。90年代，端华、集成、民生等华校都是先修复庙宇再复校的。莘莘学子就在香烛袅袅的庙旁上课，快乐学习，茁壮成长。

      在习俗和宗教上，华人和高棉人这两个民族深深地互相影响。

      例如，在华人所开的商店里，甚至是一些银行门外，都一定会供奉土地公，以祈求经商顺利，招财进宝。慢慢地，一些做生意的柬埔寨人也依样画葫芦，在店里供奉土地公，希望生意兴隆。

      华人也跟着柬埔寨人一起过节日。在柬埔寨新年、亡人节、泼水节时，华人都会跟当地人一样到庙里拜祭，有的华人也对一些德高望重的柬埔寨僧侣相当敬仰。

      同样的，柬埔寨人在端午节和中秋节也吃起粽子和月饼，清明节则会去上坟扫墓。华人过春节浓烈欢腾的气息，连柬埔寨人也深受感染。虽然春节没有被列为公共假期，但很多政府机关在这期间根本没人工作，而华校则会放假20天，柬校、工厂也有至少三天的假期。可以说，华人春节在柬埔寨已变成了一个举国同庆的节日。

      “信奉佛教的柬埔寨人，性格质朴温和，包容性较强；而对华人来说，佛教虽不是大部分人的信仰，但也是为他们所熟悉的宗教；柬埔寨人跟华人一样喜欢相互拜访，所以两个民族在情感上比较能够接纳对方。”当地华人这样分析两族和谐，和睦共处的原因。另外，华人和柬埔寨人日益普及的通婚现象，也反映了两族融合的情况。

      拜同一个神、过同一个节日、吃同一样食品，甚至到通婚混血，两个民族在宗教和习俗上已经做到不分彼此。华人的根将在这里，继续繁衍壮大。

      32岁前，他是金边乡下一个小商人；39岁前，他是栖身在越南南部的华侨难民；50岁后，他是柬华社著名的慈善家。

      1974年12月14日，柬越边境即将闭关的消息已经沸沸扬扬。郑棉发携带全家族在这一天从南线逃往越南，赶在闭关的前一天成功进入越境。7年间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1981年，郑棉发带着家人，和近万华人难民一起沿湄公河返回满目疮痍的金边。他在奥林匹克市场附近摆小食品摊谋生。靠着经验和眼光，他迅速重建事业，在十年间就累积了一笔庞大的资金。 1994年，他购买土地，建起了品牌香烟生产线，产品出口到马来西亚等国，生意十分火红。

      郑棉发不愿意公开谈论自己的财富，但身家过亿的事实，让他成为华社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领袖。作为潮州会馆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进行慈善捐助时，却不局限在潮州帮内部。全柬埔寨80% 的华文学校和许多华人庙宇、金边孤儿院等都曾接受过他的捐助。

      1998年，郑棉发在金边被绑架震惊了华社，他在付出数十万美元赎金后获释，但绑匪一直逍遥法外。为此，郑氏以投资移民的身份移居澳洲。但大多数时间，他依然在柬埔寨管理家族产业。

      从难民到事业成功的商人再到慈善家，郑棉发可以说代表了柬埔寨华人从苦难人生走向美好将来的写照。

     对柬埔寨的老一辈华人来说，自由恋爱等同“伤风败俗”，会引来垢病，所以婚嫁惟有劳烦亲人或同事做媒促成。当地华裔男子的结婚年龄平均是24岁，但女子更早出阁。传统家庭的华裔青年在婚前，都会与交往对象保持相当的距离。

      但无论如何，随着游客大量涌入柬埔寨，带来了文化的开放，青年男女在街上的亲密行为日趋普遍．自由恋爱也不再招来异样眼光。

      如今，华人和柬埔寨人通婚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在婚礼习俗方面，婚礼一般采取中柬结合的仪式，先进行华人婚礼，再行柬埔寨的传统婚礼。

      婚礼开始是先通知亲友，然后在第二天早上，男方父母和亲友手捧礼盘，在家门前排成一行，由司仪、童男童女和新郎带领到女方家。结婚的礼盘装有猪脚、糕点、水果、酒，以及象征富有和甜蜜的龙眼，一般为88盘、99盘、144盘或更多（吉利数字）。礼盘越多、排行越长，女方越有面子。

      结婚当天，新人先拜天地，再给祖宗上香，告知祖先，后继有人了。华裔新人的礼服通常都融入了浓厚的柬埔寨特色，他们也会依当地习俗进行剪发、洗脚和拴绳仪式。婚礼全程都播放悦耳的柬埔寨歌曲，以增添喜气。

      在柬埔寨人习俗中，结婚后男方得住进女方的家，等于是“嫁”进老婆的娘家。有趣的是，华人也受到一些影响，一对新人结婚后要入住男方家或女方家，就取决于哪一方比较富有。

  在别人眼中，或许不解华人生活在柬埔寨这个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里，为何能够如此乐天知命地过日子？然而，当你经历过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痛失财产的巨大悲伦之后，就会深刻体会，平淡也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幸福！

      老一辈对安逸生活的渴望，年轻人对自由不羁的向往，华人都在这个贫穷的国度找到了。就算移民到先进国家，日子也不一定能过得如现在般舒服自在。认清这点后，柬埔寨华人放开了胸怀，迎接生命带来的各种惊喜。

越南

      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部，十世纪前，越南是中国的藩属，之后才摆脱中国，建立封建国家。1874年沦为法国殖民地。二战结束后，于1945年宣布独立。与此同时，法国势力卷土重来，爆发了抗法战争，长达 9年之久；1954年国家分裂为南北越；1959年北越又跟支持南越的美国展开战争。直至 1975年，北越才统一全国，正式成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战后二三十年来，越南烽火连天，兵连祸结，民生疾苦。孰料苦难尚未终结， 1979年又爆发了中越战争。

      跟美国和中国交恶后，越南在政治上陷于孤立的困境。长期的战争及与世界的隔绝，导致越南的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最终致使超过150万难民在70年代后期逃离越南。

      1986年越南推行改革开放，全力发展国家经济，逐步走向成功之路，并分别于1991年和1995 年跟中国和美国恢复邦交。改革后的越南，经济蓬勃发展，并于2007年加入了世贸组织。近几年，越南更被一些专家及媒体以“中国式的奇迹”、“亚洲新势力”等字眼来形容它的崛起，发展前景备受看好。

     在十世纪以前，越南与中国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宗藩关系，而早期华人移居越南，有些是中国官吏，有些是逃避战乱而来。

      华人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移居越南的现象：第一次是发生在明末清初的时期，一些不甘心受他族统治的明朝遗臣，带领部下、家眷以及老百姓逃往越南；第二次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有一部分革命志士因为受清廷追捕而流亡越南；第三次则是日本侵华之后，不少人从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地区南逃至越南。

      在越南定居下来之后，华人大多经营小本生意，也有一些华人从事农业、矿业、渔业或运输业。越南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商业发展尚未发达，对善于经商的华人而言，简直就是一块未经开垦的“宝地”，使华人有大展拳脚的余地。

      商业的发展使得越南的一些城市兴盛繁荣起来。对南方的开发，尤其是胡志明市（旧称西贡）的迅速发展，华人可说是功不可没。

      早在17世纪中叶，华人就已经跟越南人一同南下开发西贡与堤岸。到了18世纪，西贡已经是东南亚著名的繁荣港口，堤岸也逐步成为华人最大的聚集地。

      华人在越南的地位载浮载沉，几经风雨变迁。

      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中期，是华人在越南最为受到礼遇的时期。虽然被法国殖民政府压迫，但是那时期中越关系良好，因此越南人对华人也特别友好。

      “那时候，华人的社会地位比较高，部分华人甚至愿意投入抗法斗争的洪流，为越南独立而牺牲。”在堤岸居住了半个世纪的陈老先生，在遥想那一段华人最美好的岁月时如是表示。

      不过，那时候的华人还是抱着十分强烈的民族意识，多数人都持有中国国籍或者双重国籍。

      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越南一分为二。越南政府推行一系列不利于华人的政策，如强迫华人加入越南籍，限制华人从事屠宰、杂货、碾米和木材等11种行业，并且禁止学校使用华语教学，还解散侨团，关闭侨校以及侨报等。

      1975年，越战终告结束，越南新政府为了推行社会主义，诋毁华人资产阶级分子，没收他们的财产，并进行劳改，又把华人强行驱逐出境。不少华人或穿越莽林，或投奔怒海，逃离越南。这期间，不知有多少人死在逃亡路上。

      在投奔世界各地的100万越南难民中，有60％是华人。越南华人人口锐减，从100多万降至数十万。

      “那时候，能离开的华人都是有点钱的。而没钱的只能留下来听天由命。上了船，大家都已经有九死一生的心理准备。不是每艘船都能幸运地被搭救，也有很多人在船上因染病而死，或因为船只被大浪打翻而葬身鱼腹。”时过境迁三十载，忆起那段大逃亡的悲惨日子，逃到丹麦的越南华人马桂谊至今仍历历在目。

* *早期华人来越南，都是乘搭大中华商轮，这种船每次都是三艘船同时开航，越南人因此习惯称华人为“三船人”, 不过现已很少听到这类称呼。*
* 目前越南约有100万华人，他们大都已经加入越南籍；其中以广府人最多，其依序为福建人及海南人等，广东话在当地华人社区普遍通用。
* 如今，胡志明市是最大的华人集中地，约有50万华人。华人主要聚居在第五、六、八、十和十一郡，其中第五郡的堤岸区又被称为“中国城”。
* 80年代以后，越南推行改革政策，对华人比较宽容，并将华人列为 54个民族共同体之一，赋予他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经济上获得政府的扶持之下，华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生活逐步改善。
* 浩劫之后，华人走出悲情，积极融入越南社会。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共同生活，如今华越两族相处融洽，大部分华人已把越南视为永久家园，并为越南的建设做出各种贡献。
* 越南推行改革开放后，华人积极参与工商业活动，抓紧契机以复苏经济。
* 华人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早前被摧毁的经济基础，还急起直追，尤其是胡志明市的华人更是干劲冲天。在当地的50万华人中，大部分从事小工业生产和商贸活动 。他们已成为越南经济发展中的活跃分子。
* 胡志明市的华人在贸易领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涉足的行业很广泛，从制造业如成衣、纺织、食品、制鞋、塑料、五金、黄金首饰到饮食、建筑、旅游、金融、进出口贸易和零售业等，所经营的大小商店企业达5千多家。
* 目前胡志明市的华人企业大部分仍以中小企业为主。平仙集团、新强盛电线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商业银行等，都是越南规模较大的华人企业。
* “从1986年革新至2002年，短短的16年间，华人企业家的数量就占了胡志明市企业家总数的20% 至30%，也就是说，在全市两万家企业当中有6千家华人企业，而华人人口只占胡志明市总人口的 5.6%。”《西贡解放日报》的财经记者李伟贤说。
* 堤岸区的批发市场大部分也是由华人经营，如同庆市场、金边市场、陈政照市场、平西市场、安东贸易劳务中心、新城市场、东医药市场等，这些批发市场现已成了越南南部的货物供应中心。
* 华人在经济上的杰出表现，让政府看到华人的利用价值。
* 1995年，越南政府有意进一步借助华人善于经商的力量，推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于是颁布了“有关在新形势下加强华人工作”的62号指令，以鼓励华人更积极参与国家经济的发展。
* 在此指令下，华人得到有力的扶持。政府除了在经济上放宽对华人的种种限制，开放他们在商业领域的经营之外，同时也发还一些没收的华人产业，并允许创办小型企业，从事进出口和金融业务，还允许他们与外资合作。
* 在政府打下一支强心针后，华人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几年内经济快速起飞。在国家为华人创造的有利环境中，许多华人生产的品牌被视为 “越南优质国货”，还入选胡志明市的“工业生产支柱百强榜”。
* “几年前胡志明市公布了19项国家支柱产业，其中有六家是华人企业。华人再次以傲人的成绩，证明了他们的实力和努力。”李伟贤兴奋地说，言语之中难掩他为越南华人感到骄傲的心情。“华人很讲信用，做生意不用签约，只需口头协议即可。还有华商之间有着很强的网络，这是华人做生意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 不少华人企业家就这样凭着坚韧勇敢、克勤克俭的精神，在越南闯出了一片天地。
* 朱应昌是越南家喻户晓的华人企业家，就是最好的例子。1986年越南改革开放，他凭着独到的眼光成立了艺昌家具，将许多被人们弃如敝展、只当柴薪的木材，摇身变为一件件古意盎然的木制家具，从此打开了华人在越南从事古艺家具的响亮名声。
* “80年代时，我本来有离开越南的机会，但是我对政府的革新政策有信心，所以决定留下来。现在，事实证明我是对的。”一脸慈祥的朱应昌坚定地说，今天这番成就全凭他刻苦耐劳、敢打敢拼而来。
* 另一方面，越南政府鼓励外商投资，拟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力图将越南打造为进入东南亚市场的桥梁。以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为主体的亚洲华人资本，已成为越南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此外，近年回国投资创业的越南华侨也逐年增多。
* 如今，越南已成为亚洲经济成长第二快速的国家，连续几年的经济增长都达7％以上。2007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越南开始在世界经济舞台崭露头角。
* 随着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华人的经济地位势必水涨船高。然而，伴随迅速发展而来的，是激烈的竞争。华人必须更加拼搏，保持竞争力，才能在经济发展洪流中稳住阵脚。
* 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华人跟越南人已经融合在一起，分不清你我。
* “有些华人说起越南话，流利畅通与越南人不分上下。”一名越南人认真地说。再加上越南人的外貌、肤色近似华人，让人难以辨认两者之间的差别。在文化语言、生活习惯、教育背景甚或宗教信仰方面，两个族群也都已非常接近。
* 日常生活中，华人在外的举止言行，俨然就像个越南人，跟越南人也和谐相处。回到家中，又很自然地过着华人方式的生活，吃中餐、看中文电视节目，家庭成员之间也多以方言沟通，偶尔掺杂几句越南话，听起来格外亲切。
* 在饮食上，华人仍习惯吃中式料理。越南的街头巷尾满是兜售美食的路边摊，华人轻易就能品尝到地道的中国菜。不过清淡少油的越南菜也广受华人喜爱，许多华人已习惯在食物里加入鱼露（一种越南调味料）。说到越南最有名的河粉，华人跟越南人一样爱不离口，习惯每天最少吃上一碗。另外，用法国长棍面包制成的三明治，也是很普通的一种越南小吃，华人通常喜欢把它当作早餐或下午茶点。
* 同样的，越南人也喜欢吃中华料理，如海鲜羹、炒饭烩面、潮州糕点等，只要食物的味道好他们就照单全收。上茶楼吃点心，或在路边买珍珠奶茶、粤式凉茶，对越南人来说已成为家常便饭。华人区开满琳琅满目的饼家、食摊、酒楼、餐厅，吸引了不少越南人的光顾。
* 被法国统治近百年，华人也学会了几分“法式浪漫”，跟越南人一样爱泡咖啡厅。
* 胡志明市有不少咖啡厅和咖啡座，顾客多是男士。他们喜欢坐在咖啡厅外，一边喝着加了奶的冰咖啡，一边观看往来经过的行人，形成一幅有趣的街景。“一天喝上三五杯咖啡是稀松平常的事。咖啡厅的气氛轻松悠闲，点杯咖啡跟朋友聊天下棋，一个下午不知不觉就溜走。”一名当地华人笑眯眯地说。
* 华人也住在又长又瘦的越式房屋。屋子一般多是有两三层，若居住在临街的房屋，他们通常会把一楼充作店铺，不是自己做生意卖东西，就是出租赚取租金。屋子的空间不大，华人大都是一家人住一起，有的甚至住了几户人家。加上屋内还得停放几台摩托车，因此家居摆设通常极为简单。
* 与越南人一样，华人习惯在屋外活动，华人喜欢在屋外摆几张矮凳和矮桌，吃饭喝茶、纳凉休息、跟邻居聊天，都在这里进行。街道上，川流不息的摩托车熙熙攘攘地往来着。这在越南是最平常的一幅街景——匆忙之中，洋溢着一股无形的活力。
* 在越南生活了大半个世纪的彭世杞，很满意现在含饴弄孙的晚年生活。“我平时最喜欢收看有线电视播放的广东节目，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播报的新闻，更是每天必看。”在家里跟儿子媳妇说广东话，媳妇三餐也都煮中国菜给他吃，逗弄牙牙学语的小孙子更是他一天里最开心的事。
* 生活虽然简朴平淡，然而对于经历过战乱贫穷的彭老先生来说，却深切地明了平淡是福的道理。他说，只要一家人能生活在一起，衣食无忧，夫复何求？
* 30岁以下的年轻华人，没有经历过动荡不安的时代，是幸运的一群。他们多会说越语、广东话、华语及英语，与越南人相处得融洽友好。他们生活关心的重点是工作及玩乐，而不太在乎国家大事和世界时事。在他们身上，已看不到上辈华人的悲情痕迹。
* 经济蓬勃发展的胡志明市像个巨大的游乐场，娱乐形式多种多样，娱乐场所遍布各处。入夜以后，整座城市充满动感与活力，散发出自由的气味，蛊惑人心。尤其在经济繁荣的第五郡、第十一郡华人区，大街小巷到处都闪烁霓虹灯，在卡拉OK厅、咖啡厅、舞厅都能见到年轻华人的身影。
* “遇上心烦意躁的事，只要骑摩托车到街上兜兜风就一扫而空。” 少了父辈们认命的沉重感，年轻人的烦恼轻易就消散了。明日太阳升起，又是充满希望、崭新的一天。
* 国家的开放和全球化，也使越南年轻人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好奇不已，因此这里出国的风气很盛。不过，越南近几年的发展还是让不少人充满希望。“我曾想过要出国发展，但已打消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现在胡志明有让我发挥才能机会。”27岁的杨明龙对越南的前景抱着乐观的态度。
* 越南华人的会馆都是馆庙合一，既是宗乡会馆，也是抚慰华人心灵的宗教场所。越南目前有六大华人会馆，分别是穗城会馆、温陵会馆、二府会馆，义安会馆、海南会馆及崇正会馆。
* 华人会馆在越南华社起着很大的凝聚作用。各个会馆都相当活跃，尤其在发展华文教育、保存中华文化方面，向来都是他们首要的使命。例如，各个会馆每年必定会颁发奖学金或助学金给清寒华人子弟，让他们顺利升学。
* 在越南华社，热心公益，爱做善事的风气，也极为盛行。
* “在越南华人心里，‘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想法已经根深蒂固，热心公益已成为越南华社每一个人的优良传统。”年轻的成功商人林日民指出了越南华社的一大特色。
* 越南华人不论老少，都是抱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想法，透过会馆、宗祠或同乡会来表达爱心。除了帮助自己的同胞，华人每年也都会捐助大笔款项做善事回馈越南社会，只要政府呼吁人民救济天灾灾民，华人大企业大都会积极响应，协助推展社会福利。
* “很多华人做善事都是自动自发，不是为了名誉，而且不分种族。”林日民进一步解释，华人不遗余力地支持多项国家推行的福利慈善项目，如兴建情义屋、温情屋、奉养英雄越南母亲、参加贫穷病人辅助会、励学、消饥抚贫、帮助少数民族同胞等等。
* 华人积极投入慈善事业，赢得了越南人的尊崇。越南人一般认为华人是善良优秀的民族。这也是越南人不会仇视华人的主因。他们得到华人的友善对待和帮助，也会感恩图报。
* 越南华人借庙宇和会馆，维系中华传统习俗，为华人子弟争取受华文教育的机会，同时热心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利人又利己。在华人社区里，六大会馆将各籍贯华人紧紧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稳固的网络。
* 越南华文教育的发展，和华人的命运一样大起大落。
* 1975年越南统一后，三百多所侨校被勒令关闭。到了80年代，政府才放宽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允许华人在夜校和补习学校学习华语，之后华语的发展就一日千里。
* 胡志明市目前共有20多家华文中心及外语中心，学生人数约有3万名。其中，比较有名的华文中心计有：颍川华文中心、麦剑雄华文中心、陈佩姬华文中心、启秀华文中心、礼文华文中心等。
* 虽然政府允许华人学华文华语，甚至允许华人兴办大学，但毕竟越语学校才是正规学校，同时教育政策要求学生必须在学好越语的前提下才可以学习华文。最近几年，各华文中心学生的人数逐年减少，主要原因是越语学校的功课过于繁重，造成华人子弟学习的压力过重。有些学生因而无法兼顾学习华文。
* 近年来，中、台华商涌入越南投资设厂，中文的市场价值日益提高。越南的大公司主要都是外商投资的，需要懂华语的人才。土生土长的关裕华语带轻松地说：“我觉得生活在越南不错，机会很多，这里尤其缺乏翻译，其工作量和压力都不会太大，生活相对轻松一点。”
* “随着就业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多越南人学习中文，学习有关中国的知识。目前有八间大学开设中文系，学生人数约达1千人，大部分学生是越南人。”胡志明市社会人文科学大学东方学系的华语主任黎教授说。
* 早期华人父母不鼓励孩子升大学，认为拥有中学学历就已足够。那时候年轻的华人普遍懂华语，只要有一张越语学校的文凭，再去报读个会计或电脑技能课程，很容易便可以在台湾人或中国大陆人开的公司找到工作。
*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公司开始注重大学文凭，华人子弟上大学的人数也有上升的趋势。一些家境好的就到英、美、澳、纽、新加坡等国深造，但他们主要目的还是学习英文。
* 可以说，尽管华语很吃香，但其发展仍跟不上越南社会的需求。
* 胡志明市华文教育辅助会的彭秘书长感叹：“越南的华文教育仍处在‘打游击’的情况，华文中心始终不是正规学校，所开办的课程和颁发的文凭都不受政府承认。”他认为，由华人民办一间受政府承认的中越双语正规学校，是最有利于华人子弟的。
* 然而，目前的现实是，华人子弟必须拥有越语学校的文凭，才能在社会立足。一些华人为了获得更好的迁升机会，不惜牺牲下班时间，到夜校修读越校课程以考取越校文凭。26岁的黄宝燕每天下班后就赶到夜校上课，已度过了两年奔波的生活，再熬一年就能毕业。她说：“年轻时，不知道越校中学文凭的重要，现在只好半工半读，希望辛苦几年拿到文凭，那么工作的选择就会更多。”其实，像黄宝燕这样半工半读的年轻华人并不少，这些年轻人乐观地相信，有了文凭，未来的出路必定更加宽广。
* 总的来说，基于商业市场对华语人才的需要，越南学习华文风气尚算盛行，间接使得整体的华语水平有所提高。可以预见的是，通晓华语的人将会越来越多。
* 华人在越南享受很多中国传统节日，他们仍然十分注重传统风俗。越南有近千年是中国的藩属，越南人在文化上长期受到中国极大的影响，因此不管在民俗风情还是文化习惯上，华越两族都很相近。越南人对汉字并不陌生，很多越南寺庙和店铺都写有汉字。
* 春节是华越两族人民最重视的传统节日。春节期间举国欢庆，过节气氛浓厚。在越南还能感受到浓厚的广东风俗，春节前家家户户都忙着办年货，逛花市也是华人过春节重要的活动之一。不管华人还是越南人，过春节都有贴春联的习惯。不过，不同的是，越南人的春联是由越文拼音写成。
* “越南华人是幸福的，能在越南享受很多中华节日，而且越南人甚至还沿袭华人的节日，跟华人一起过端午、清明、中秋节。”当地华人说。实际上，越南人所过的传统节日跟华人的几乎相同。
* 长期受到华人的影响，越南人很欣赏中华文化，不断向华人学习，希望变得跟华人一样勤奋节俭。有鉴于此，越南华人益发珍惜自身的传统文化，致力发扬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 近年来，华人和越南人通婚的现象也非常普遍。
* 对于通婚，一般人持着开通的态度。一些越南父母认为华人拥有优秀的传统，华族男子对家庭较有责任感，懂得顾家，所以希望女儿能嫁给华人。
* 随着两族关系越来越融洽，华人新生代对越南文化产生了更深的认同感，培育起强烈的国家意识，血液里的中华民族意识则渐渐稀薄，最后名符其实成为一名效忠国家的越南人。因此，一些老华人对于年轻一辈不会讲广东话感到焦虑，担忧他们就此失掉华人的根。
* 随着对国家的认同感日渐深厚，有越来越多华人参与政治活动。政府也在华人聚居的胡志明市，设立专门处理华人事务的“华人工作处”，培养华人干部为华人和国家效力。胡志明市华人党员迄今有597 人，其中426人是在1995年之后入党的。
* 越南改革迄今20多年，华人对政府逐渐恢复信心，加强了华人对越南的认同意识。
* 经历过七十年代浩劫的华人，曾经活在巨大的阴影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往昔的悲情终将消逝。命运多舛的越南华人，始终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走出阴霾。
* 如今，苦了大半辈子的华人终于能安度余生，而新生代也在这里看见希望，国家意识愈益浓烈，相信努力就能出头。
* 越南华人最终摆脱了任人鱼肉的命运，迎向更美好的明天。

缅甸

* 位于中印半岛西部的缅甸，是中印半岛上最大的国家，东北与中国接壤，西边和印度毗邻。自古镶嵌于两个古文明大国之间的它，被一种浑厚而多元的氛围笼罩着。它拥有135个民族，以缅族为主（60%），掸族、克钦族等是法定少数民族，而华人和印度人则为非法定少数民族。
* 这个曾被英国统治，又被日本占领过的 “佛塔之国”，在独立之后有过一段辉煌时期。20世纪60年代，它是东南亚最富裕的国家，是著名的“鱼米之乡”。除盛产鱼虾、海蜇皮、丹老咸鱼、鱼露外，它还拥有丰富的农产，也一度被誉为世界最大的米仓。
* 1962年军政府执政后，推行一系列的“国有化”运动，反而打击了缅甸的经济发展。后来军政府打压民主运动，也导致以美国为首的欧美诸国长期对它实施经济制裁，使它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状态，发展停滞不前。
* 为了摆脱困境，近年来缅甸政府努力与世界各国重建友好关系，逐步走向开放。这些年来中国一直对缅甸伸出友谊之手，雪中送炭。这不只促进了中缅的经济合作，更拉近了两国人民的距离。
* 从当地华人随遇而安的祥和神色中，仿佛看到希望的曙光。

      缅甸自古与中国毗邻，两国之间的漫长边界绵延相连。长期以来，两国一直都有边境贸易活动。

      根据记载，首批定居于缅甸的华人，是数世纪前从云南省移入缅北克钦帮山区的玉石商家。此外，缅甸北部丰富的矿藏也吸引了许多华工。自18世纪起，每年约有5万名云南西部居民前来缅甸当矿工。

      1861年，第一个广东籍商人经由新加坡来到缅甸的曼德勒王朝古都。

      英国于1885年侵占缅甸，并把它纳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份之后，引起大规模的华人移民热潮。这些移民一般通过海峡殖民地由海路迁入缅甸，主要是两广和福建的劳工；另一批移民则是从云南陆路南下来到缅甸。

      到了20世纪30年代左右，缅甸华人移民人数激增。二战期间，华人人口约有二三十万人，占总人口的1%，当时，经商有道的华人个个都取得不俗的成绩，还创办了华校、华报以及华团。

      那时候，华人与缅甸人也浑然没有你我之分，彼此情感融洽，共享安居乐业的日子。

      二战结束，缅甸终于摆脱了英国和日本的殖民统治。缅甸政府鼓励华商转向工业领域发展，把外贸让给不善于经商的缅甸人去尝试。华人积极响应，全心投入，他们的工业投资在当时占了缅甸私人工业约 75%，经济发展可说是达到巅峰。

      缅甸分别在1958年及1962年爆发了两起毁灭性的政变，主导人物就是号称“铁腕军头”的奈温将军，从此改写了华人的命运。

      自1962年起，奈温开始推行“国有化运动”，把银行、商店、学校和媒体都收归国有，导致缅甸华人辛苦挣来的财富，一夜间化为乌有。到了60年代中期，缅甸共有1万5千个企业被“国有化”，许多华人商家濒临破产，导致一千多名华人被迫含泪离开，流亡到台湾、中国大陆或美国。不过，还是有不少华人仍然怀着期待留下来，没想到却等来了一场令他们家破人亡的暴乱。

      1967年6月，缅甸华人最黑暗的时期骤然降临！在一场激烈的排华暴动中，杀人放火的暴民们恣意践踏了好几个华人城市，仰光唐人街更是首当其冲。

      华人骤遭飞来横祸，然而老一辈的华人却决定稳守家园，只把孩子送往国外。许多父母和子女就此一别数十载，直到缅甸开放之后才得以重逢。这当中，不知上演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

      从政变到排华，整个过程当中共有十万名以上的华人离开了缅甸。暴动后，他们大多数移居澳洲、泰国、新加坡等地，其中有5万多名华人移居至澳门，在当地形成了著名的“小缅甸”。

* *19世纪后期，大批涌入缅甸的华人当中，福建人大多身穿长袖衫，自称“唐人”，而广东人则一般身穿短袖衫，自称“汉人”，当地人通常由衣著来区分他们的籍贯与行业。*
* 在华人眼中，缅甸如同一颗被沙土覆盖的宝石。曾在繁华盛世下生活过的华人，都见证过它慑人的光芒。老辈回忆起60年代的仰光，脑海中总是闪现出那些热闹、淳朴而人清味浓郁的场景。
* 今天，缅甸成了世界十大穷国之一，但留下的华人早已学会随遇而安，嘴上并无太多抱怨。华人说：“笑中千关过，愁内百事哀”，他们踏实而知足，只求三餐温饱，生活安定。无论住的是洋房、公寓还是木板屋，大家都安于现状，依照自己的经济条件去生活。
* 缅甸华社如今主要由云南人、福建人、广府人和客家人组成。当地习惯以“上缅甸、下缅甸”来划分华社：所谓“上缅甸”，指的是缅北地区，以曼德勒（Mandalay）为中心，另还包括腊戌（Lashio）、密支那（Myikyina）、当阳（Tangyan）及东枝（Toungyi）等，皆是云南人的集中地。“下缅甸”指的则是坐落于南部的仰光及其周边地区，这里是福建人和客家人的天下，而早期人数最多的广府人现已所剩无几。
* 在一派悠闲、对从商兴趣不大的缅甸人眼里，华人是勤快聪慧的商人。缅华大多都是小老板，生活虽称不上富裕，但却比一般缅甸人民过得更安稳踏实。当地人说，在战后缅甸的经济复苏上，华人居功不小。
* 在大力促进当地商业繁荣的同时，华人并没忘记在苦涩的过去与诱人的前景之间，播撒下中华文化的种子，默默推动华文教育和社团活动。老一辈华人对缅甸感情深厚，大多没有离开的打算，但他们却鼓励下一代走出缅甸，到外头去追求更精彩的人生。
* 缅甸言论自由有限，华人常笑称他们有“三不谈”的话题，那就是政治、“女人”和美元。
* 在奈温将军时代，不少华人积极从政并身居要职。物换星移，如今华人已无法在政治上大展拳脚，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变得异常冷淡，也不愿触碰政治这敏感话题。而所谓的“女人”，也与政治息息相关——她是缅甸的民主斗士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多年来为了缅甸的民主大业与军人政府抗争，成为政府眼中最棘手的政治人物。原本就不热衷政治的华人，为避免祸从口出，也尽量不提这“女人”的名字。
* 美元在近几年与缅元的兑换率浮动很大，严重影响了从商华人的收入，理应成为最受关注的对象。不过鉴于缅甸已禁止公民拥有和收藏美元，因此华人只能买金保值，导致他们只谈“黄金”，避谈“美金”。
* 对缅甸华人而言，也许经济上的富庶、生活的安稳才是最实在、也是最重要的目标。
* 1988年12月，中国和缅甸重新开始了边境贸易往来。这个划时代的政策落实后影响深远，致使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商家都纷纷前往缅甸投资，大大拓展了当地华人的商机。接着1989年缅甸开放经济后，许多华人的生活获得大幅度的改善，也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 如今，缅甸华人的经济地位，已逐步恢复到60年代国有化运动之前的鼎盛时期。他们带旺了许多城市地区，迎来生机勃勃的市场。在仰光或曼德勒的市中心，金行大多由广东人经营；福建人则从事土产或农产贸易；云南人掌握着玉石、矿产的开发和买卖；潮州人从事塑料袋生产、轮胎代理等与塑料相关的行业。此外，华人的中餐馆、药行及加工厂等也都不少。
* 在工业方面，华人主要的领域是机械修配、食品加工和成衣制造；商业领域则以杂货、餐饮和金饰业为主。据了解，全缅甸共有2万5千多家的华人杂货店。
* 随着缅甸旅游观光业的开放，不少华人也纷纷投资与旅游相关的行业，如旅馆、旅游代理或购物商场等。近年来经济蓬勃发展，部分华人已经走向经营大型企业，出现了不少成功的企业人士。
* 缅华兢兢业业地把家庭事业和私人企业办得有声有色，也为下一代铺平了道路。
* 华裔子弟一般都到缅甸大学深造，出路较好的医学和工程系，往往成为成绩优秀生的首选，因而造就了许多医学人才。但由于在缅甸从医的待遇不高，因此很多医科毕业生都考虑到国外去发展，造成人才外流。至于其他科系的毕业生，毕业后要在当地学以致用也并不容易。缅甸华商商会总干事苏天宝就指出：“华人可说是被逼着从商。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好工作，便接手父母的生意，或自行创业。”
* 尽管在经济上获取了不俗的成就，但缅甸华商在多变的政策中，仍是冒着不小的风险。亚景金铺珠宝商行董事长谭景铨回忆说：“缅钞有过3次被停用的记录，因此华商手中的血汗钱，有可能一夜之间就成了废纸。”此外，面对高达20％的营业税及为数不少的“茶水费”，华商亦只能默默承受。
* 缅甸还长期面对电力不足的问题，无论商店还是住家几乎天天都有电力中断的困扰。一些资本雄厚的商家，干脆就动用自备的发电机。这里的人们常苦中作乐笑称：缅甸就是“免电”的意思。
* 电力不足、电讯设施落后再加上法制的不健全，让有意前来缅甸投资的外商往往静观其变，裹足不前。
* 当外界对缅甸的经济内幕尚存疑问，而投资者也面临种种挑战之时，缅甸华商商会自然就成了沟通国内工商企业界，及海外投资家的主要媒介。
* 成立于1909年的缅甸华商商会，在缅甸的华社中拥有很高的地位和权力，共超过500名缅甸华人企业家都是该会的会员。他们不但是国内经济的强力推手，还积极向海外宣传、吸引以华商为主的外资。该会除了接待中资公司代表和中国政府代表团之外，也主办海外考察团，让缅华企业家开拓人脉网络并扩大市场，可谓贡献良多。
* *在缅甸，有不少高层人物都与华人通婚。早期社会党总书记、缅甸代总理兼国防部长吴巴瑞的夫人，就是一名姓陈的华人。此外，原缅甸革命委员会委员丁佩、原山友总统以及丹瑞大将军的夫人，也都是华人。*
* 缅华社会的华文教育，三代华人可说遭遇各异，也导致了他们拥有不同的思想情感和生活方式。
* 50岁以上的缅甸华人，多数接受过传统的华文教育，是缅甸华教辉煌时期的产物。他们的华文造诣较高，能说得一口流利的华语，对中国和中华文化也有一种强烈的认同和情感。
* 30岁至50岁的华人，则成长于缅甸华教的断层期。他们主要以缅语沟通，大部分不谙华语，顶多略懂方言。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与缅甸人接近，尽管在形式上仍保留不少中华文化的传统习俗，但灵魂深处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认知，是陌生且有隔阂的。
* 至于30岁以下的年轻一代，就有幸再次与华文教育接轨，从小就有机会学习缅语和华语。这使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还能掌握不错的华语。缅华社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当地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有着密切关系。
* 20世纪50年代，缅甸曾是东南亚的教育中心，华文学校在社团的支持和推动下蓬勃发展。当时全国拥有200所以上的华文小学及约300所的中学，课程水平极高，在东南亚华人圈中树立了一流的口碑，还吸引了其他国家的学子前来就学。例如，当时广为人知的南洋中学及华侨中学，培育出的优秀人才如今遍布国内外各领域。
* 然而，在60年代实施的“国有化运动”，几乎把华文教育给摧毁了。
* 华校全都收归国有之后，不但校舍没了，学生也不准公开学习华文。这个政策严重打击了华教在缅甸的发展。缅甸华人只好上下求索，心机费尽，在逆境中默默地维系着华教。许多老师在家偷偷开办华文补习班，为了避嫌，他们教学时多采用小班制，还不时更换地点。华文教育就在这种悲惨的状态下暗渡陈仓。但在强硬的政策下，其效果毕竟十分有限。久而久之，华人社会就出现了巨大的文化断层。
* 到了80年代末，缅甸政府调整内外政策后，才对华教放宽了限制。一些家庭补习班开始进行整合及扩充，华团则以补习班的名义开办华文学校，获得热烈反应。因此，尽管缅甸至今没有正规的华校，但教授华文的机构却不少。
* 从90年代开始，华教以多种不同的名义生存下来，最普遍的就是以宗教或孔学的名义来传授华文，设立华文补习班。此外，有些中心还设立了幼儿班，以及服务在职人士的华文速成班，以应付不同的需求。
* 在缅北地区，基于与中国的边境贸易需要，对华文教育的需求更高，诞生了许多非正规的华文学校，学生反应热烈。总体说来，上缅甸地区的华文教育水平，要比下缅甸来得高，成绩突出的学生还会到中国去留学。
* 2002年以来，中国国务院侨办每年派遣讲学交流团，到缅甸培训华文教师，当地也通过函授方式自己加以培育。昌华国际学院还与新加坡在课程上相配合，该院的毕业生能被保送到新加坡工艺学院去升学。
* 福庆语言电脑学校李祖清校长说：“如今，掌握了华文的毕业生前景相当乐观。根据就业市场的需求，一般缅甸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只懂缅语者月薪有2千缅元，掌握缅语和英语者则有3千多缅元，但同时掌握缅语、英语和华语者，月薪却可高达 5千缅元！"
* 为了孩子的将来，几乎所有的华人家庭都让孩子学习中文。他们通常会利用课余的时间，每周六天到华文班去上课。至于那些幼年时错过了机会的青年，往往也积极利用工余时间，到华文速成班去学习。现在，在清晨微凉的晨风中，或夕阳的余晖里，常常可以听到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熟悉的华语飘荡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 在上世纪的50年代，处于全盛时期的仰光曾号称“东南亚伦敦”。但近几十年来，缅甸与外界的联系却很少，予人一种在政治铁幕中，资讯十分封闭的印象。
* 前《缅甸阳光人民报》记者赖保罗感慨说：“当时华社兴盛，我们拥有四家华文日报和三家周刊。但国有化运动却使华文报章完全消失。”
* 直到1998年，缅甸才重新对华文报刊解禁。终于，经过几十载的等待之后，《缅甸华报》发刊了！当时，国内外的缅华无不对这难能可贵的消息感到雀跃。
* 遗憾的是，六年后政府又宣布禁止所有外文刊物的出版，结果《缅甸华报》也被迫暂时停刊。
* 2007年，终于又传来好消息——由缅甸政府出版的《金凤凰》华文月刊在2007年10月1日正式面世。缅甸华人都希望这一份华文报刊是一个美好的起点，除了作为缅华的精神粮食，还可以拉近华人和缅甸人民的距离，并联系起世界缅华同胞，积极推动回缅探亲、旅游和投资等方面的发展。
* 除了当地出版的报章外，缅甸华人若想阅读国外的报章或杂志，除了托人携带入境之外，还可以到仰光广东大街上的缅甸华侨图书馆去。这家图书馆大约有三万册藏书，华人都喜欢来这里借书、阅报、看杂志或卫视新闻。
* 图书馆馆长欣慰地说：“每日前来阅览的人数多达一百人左右。在这里，读者不但能找到新鲜出炉的缅文报章或泰国的《世界日报》，还能寻获一些过期的海外报刊，如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等。”
* 超过60年历史的图书馆显然有些残旧，多年来靠华社各界人士出钱出力，确保这个小小的知识库能够维系下去。
* 近年来，电子媒体的发展弥补了平面媒体的不足之处。自从几年前缅甸政府允许人民安装卫星电视后，一般经济良好的华人家庭，都成了卫星电视的用户，享有一百多个频道的选择。有了它，当地华人就能即时掌握国外的新资讯。最受华人欢迎的是资讯台，而年轻人则偏爱中、港、台的娱乐节目，举凡海外华人所有的流行资讯，他们可是一点都不陌生。
* 此外，年轻一代也通过网际网络跟世界保持联系，信息封闭或匮乏的问题已不复存在。缅华互助会更一马当先，创立了部落格，其理事长陈民昆说：“缅甸华侨散居在各地，如澳门、台湾、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心底仍关心着缅甸华社的状况，因此我们的网站成了最佳的信息和感情交流站。”
* 在前首都仰光，华人俗称的广东大街，以及附近几条街道所组成的唐人街，估计住了15万名华人。华人曾在之里推动了唐人街的繁华，至今他们所经营的店铺依旧布满了整条唐人街。
* 这里有高高耸立的上海国际商厦、通街川行的二手日本车、还有那看不尽的人潮盛况。
* 仰光市禁止摩托车及脚踏车穿行，于是汽车就成了华人家庭的代步工具。在缅甸，一辆车龄十年的日本二手车，还要叫价五万美元，简直是天价！但经济能力好的华人家庭，通常都会拥有一部汽车，以方便出行。而仰光地区以外，就是自行车和摩托车的世界。
* 在唐人街，华人的金店最是显眼，数量多达几十家。店铺虽不大，但闪闪的金饰琳琅满目，使人眼花缭乱。
* 由于汇率浮动的关系，缅甸人总爱把金钱兑成金子来保值。金店老板表示：“当金价一攀高，许多缅甸人就会拿金饰到店里来典卖，那时我们就忙得不可开交。”此外，华人也经营手表、服装、眼镜、中药和五金等店铺，在这里中缅文并写的招牌随处可见。
* 唐人街上也有很多茶楼，华人都喜欢聚在这里喝茶吃点心。其实缅甸华人的饮食口味非常多样，连当地人的饮食风格都加以吸收。除了华人的粽子、肉包子令缅甸人食指大动，华人也同样热爱当地的鱼汤面、椰汁面和咖哩鸡饭。因此这里街道两旁的小食档总是高朋满座，热闹无比。
* 由于缅甸长期电供不足，各地恶作剧式地轮流停电，让人哭笑不得。因此，发电机就成了民生必备品。每当夜幕笼罩，家家户户一齐开机发电，电油味八面扑鼻而来，“风味”十足！
* 华人家庭里一日三餐仍以中餐为主。逢年过节，必定杀鸡宰鸭来祭祖，大家也习惯在饭桌上天南地北闲聊，联络感情。传统节庆一到，妇女们也往往大展身手，让一家大小品尝传统的美味。
* 曼德勒华侨妇女联谊会主席寸守斌说：“在大城市，很多家庭必须靠双收入才能支撑一家人的生活，但在这里，物质要求很低，只要一个人工作就可以养活全家，加上房子便宜，三代人住在一起很平常，家里每天都很热闹。”
* 缅甸华人很重情义，逢工余或假期，他们就会跟家人朋友们聚在一起，或一起到茶铺去喝茶聊天。缅华青年也热爱各种球类运动，篮球、羽球、足球和藤球，都是他们喜爱的玩意儿。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在小巷里踢藤球，迎来大批围观者的欢呼助阵，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单纯的决乐。
* 缅甸华人说，这里淳朴的民风深深系住了他们的心；他们跟缅甸人也有着兄弟般的情谊。在长期的濡染和浸透下，他们都拥有知足常乐、随虽而安的温良个性。
* 尽管已经融入缅甸社会，华人大多还保留着传统的习俗和礼仪。他们一般都会在家里供奉祖先，门口还贴上红彤彤的对联。
* 在缅华心目中，春节还是头等重要的节日。除夕夜的团年饭外，春节期间各乡团举办的团拜活动及热闹的醒狮团等，都令大家万分期待。20世纪 80年代，缅甸慈善会还组织了缅华贺年团，从除夕到初九这段新春期间，派出花车和乐队，挨家挨户去拜年。收取的红包钱都作为慈善会的善款捐助给各界，以急人之难。
* 后来，贺年团改为室内团拜，大年初一在酒店开办一百多席，配合妇女会等单位呈现的文娱表演，大伙儿齐心合力，共庆佳节。
* 迈入新时代，缅华妇女也开始参与社会福利的工作。纷纷成立的妇女会，主要负责推动社会福利和文娱方面的工作。在缅甸，凡华人举办活动都不愁人手不足的问题，更不必担心遇上出席者寥寥无几的冷清场面。浓浓的同胞爱，就体现在含蓄而热切的氛围中，温暖了这块古老的土地。
* 除了春节之外，大大小小的传统节庆如清明、端午及中元、中秋等，缅甸华人也都欣然欢庆，毫不马虎。
* 每年的4月13日是缅历新年，俗称泼水节，华人也会与当地人一同欢庆，向路人泼水以示祝福，并享用风味独特的椰汁面和咖哩鸡饭。其他当地节庆，如瓦梭月盈节、点灯节，也少不了华人热心的参与。
* 缅甸的华人社团，多数是地缘性的宗亲团体。例如曼德勒就有著名的四大乡团，包括云南会馆、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及多省籍会馆。除了供奉祖先，会馆也是当地华人联谊的好去处。
* 此外，宗亲团也负责管理华人义山，协助会员处理丧葬事宜等。筹建会馆之外，华人往往也在同一块土地上兴建庙宇，以致馆与庙的数量成正比地发展，日益壮大。
* 缅甸全国佛塔林立，笼罩在一派佛光梵影的氛围中，被世人称作“佛塔之国”。长期在佛光的熏陶之下，缅甸人民大都有种善良淳朴的个性，在单纯的意念中，缓慢地度过悠悠岁月。
* 缅甸华人也是如此。他们的生活朴实恬淡，构建了一个重人情、爱传统的华人社会。生活在这治安良好、邻里守望相助的悠闲国度中，华人个个看来也都异常敦厚老实。
* 虽然这里也有基督和穆斯林信仰，但大部分缅甸人民，包括华人在内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华人佛教徒还有短期出家的风尚，他们一般会选在小乘佛教的大日子——泼水节期间出家，短则三五天，长则一个月，各完成其祈福、还愿的心意。
* 除佛寺外，缅甸也有很多华人传统的庙宇，其中不少还是超过百年历史的老庙，里头主要供奉观音、大伯公和土地公。在仰光唐人街就有两大著名的观音庙，分别是福建人建的庆福宫，以及广东人建的观音古庙。络绎不绝的信众带来鼎盛的香火与人潮，使它们成了旅游热点。此外，还有十方观音庙、十方极乐寺和中华寺等，也都各具特色，香火不衰。
* 在西方媒体的渲染下，缅甸成了一个封闭、专制又落后的国度。外界一般会猜想，缅甸华人一定也在苦难中度日如年。然而，如果亲眼目睹了当地华人脸上的憨笑，这印象将不攻自破。
* 尽管“自由”对缅甸华人而言，仍是遥不可及的梦幻，但他们早已学会如何在有条件的自由里悠然度日，随遇而安。
* 缅华用最低的生活欲望，成就了最善良的世界。发展的缓慢，让美好的华人传统都得以保存下来。浓浓的人情味，牵绊着多少华人离开的步伐。
* 然而，古城外有更精彩的花花世界在招手，不少年轻人终于咬咬牙，还是离开了。

文莱

     文莱在马来语中是“和平之邦”的意思。它位于加里曼丹岛的西北隅，北面临海，其他部分与马来西亚砂拉越州（Sarawak）接壤。文莱自1888年起成为英国的保护国，迟至1984年1月1日才取得全面的独立。

      自1929年发现了石油，寂寂无名的文莱顿时成了婆罗洲的一颗明珠。丰富的资源，使这个人口仅40万的小国人均年收入高达2万多美元，成为东南亚第三大产油国和世界第四大液化天然气生产国，赢得了“东方科威特”的美誉。

      文莱施行“马来、回教、君主”的政治制度，苏丹（Sultan，即君主）身兼总理、国防部长及财政部长，拥有绝对的权威，备受全国子民的爱戴。

      华人就在这富裕的和平之邦过着安逸的日子。

      文莱和中国交往的历史十分悠久，近年来，在文莱河出土的唐宋文物，即为最佳佐证。根据《明史・渤泥传》，文莱国王加那（Maharaja Karna）曾经远赴明朝朝贡而不幸病逝于南京，当时的永乐皇帝还给予厚葬，并且立下王墓。

      15到16世纪期间是文莱的黄金时期，其贸易发展的蓬勃，黄金矿产的丰富、还有胡椒以及香料的资源引来了大批华人。不过，定居于此的华人并不多，他们大半是往来两国的过客。根据第一次人口调查， 1911 年文莱仅有736名华人。

      华人移民大幅度增加，可追溯到1929年，那一年在文莱发现油田。丰富的油藏使这个小国备受世界瞩目，并且吸引了大批华人涌入。1931到1947年间，不少砂拉越、香港以及新加坡的华人技工前往文莱从事与石油工业相关的工作，使这个国家的华人人口激增。

      二战之后，文莱开始积极展开国家的基础建设，制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因此又吸引了一大批华人迁入。1958年，金门发生八・二三炮战，致使一批金门人通过亲属关系移民过来。

      从1947至1981年，华人人口增长的速度十分惊人，1981年，文莱已有了近4万名华人，几乎占当时全国人口的20%。不过，自此之后，移民人数就再也没有明显的增加。

      这些从华南来的移民，依旧习惯在他们本身熟悉的环境里生活。

      18世纪初，大部分华人皆聚居在一个名为甘榜苏丹拉玛（Kampong Sultan Lama）的水村中。由于那里有90%以上的居民都是华人，当地人后来便称之为“华人水村”。在兴盛期间，村内的住户多达250家，人口则超过两千人。

      村里的木屋一间挨着一间，住在此处的华人大多以闽南语交谈。在这里常能看见运载货品以及粮食的小舢舨在四处流荡兜售货物，摊贩与居民熟络地闲话家常，及小孩子在高脚屋下嬉水的情景。

      “逢年过节或邻家有喜事，华人一定给左邻右舍派送食品或礼品，彼此间感情融洽亲密，并且守望相助。”一名在水村长大的华人，对童年那段水上生活缅怀不已。

      华人快活无比的水村生涯，随着1981年一场无情的大火而结束，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华人水村也从此走进历史。而那些在水村从事流动贸易的商人，也只好逐渐将重心转移到陆地。

      文莱政府不轻易接受入籍，申请者必须在当地居住超过20年，并且通过马来文考试之后，才能成为合格的公民，而永久居民的申请条件也十分苛刻。

      “我们虽然有护照，但上面的国籍那一栏是空的，意即我们仍然没有国籍，很多华人住了一辈子都还是无法入籍。”一名持永久居留证的华人感叹道。

      国籍的问题，造成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批华人专业技术人才的流失。一些非公民华校留学生，毕业后也不愿再回到文莱。

      而今，四万多名华人之中，仅有大约23％是公民，另外一万多人为永久居民，其余的华人则是手持工作准证的临时居民。

      然而，华人也深深明白，除却无法入籍的缺憾之外，这里确实是一块营建理想家园的沃土。

* *当地华人习惯将文莱称作“汶莱”（读音同“文”），是因为他们相信“文莱”加“水” 会带来好运。*
* 文莱华社主要由福建人、广府人、客家人、潮州人与海南人组成。如今，超过60%的华人集中在文莱一摩拉县城区（Brunei-Muara），其中福建、金门人多聚集在首都诗里巴加湾，客家、广府及海南人则多分布在马来奕县（Belait）。
* 在这富裕的穆斯林小国，华人过着如鱼得水的生活。文莱马来人开放、开明的胸襟令两族之间相处和睦，未曾有过种族纠纷。华人也毋须信奉伊斯兰教，而只要效忠苏丹即可。除此之外，当地华人也享有组织社团、发展华教的自由，完好保存了华人的传统习俗、思想及语言。
* 华人多年来勤奋打拼，在经济上取得杰出的成绩。他们大多经营家族式生意，多从事杂货业、迷你超市及百货业。此外，华人社团积极参与国家活动，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
* 随着岁月的推移，华人对文莱的情感日益深厚，尽管大部分华人仍然无法入籍，但他们已将这小国视为终老的归宿。
* “这里很太平，步调不快，工作也毋须太拼命。”当地华人如此形容这小国惬意的生活。
* 文莱面积不大，85%国土为原始森林所覆盖。这里空气清新，生活安适，多数人毋须为三餐而忙碌烦恼，整个社会的氛围悠闲惬意。华人也渐渐习惯把步调放缓，平衡而健康地生活。与其拼命工作，他们宁可多花时间在家庭、运动、休闲及宗教上，以追求素质较高的生活。
* “我们平时会多花时间在家庭成员和亲戚之间的互动上，例如经常举办家族活动。”来自大家庭的林芳芳表示，由于文莱华人家庭的凝聚力较强，无形中加深了年轻一辈对华人身份及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
* 当地华人在生活上仍保持华人的传统习俗，以中餐为主食。虽身在回教国家，但华人并未被禁止吃猪肉，每天仍可吃到从东马进口的新鲜猪肉。
* 此外，华人也融入当地，都能接受辛辣味浓的沙爹、椰浆饭、马来炒面、烤鱼等马来食物。
* 当地的房屋面积一般都很大，宽敞的空间令人感到相当舒适。在洋房周围还有很大的空地以供停放多辆汽车。富裕的文莱人拥车率极高，每户至少有两部车子，当地华人常开玩笑说：“文菜的水比汽油贵，在文莱开车最划算了。”华人因此也习惯以车代步，还打趣说：“商店要是开在不便停车的地方，肯定要关门大吉。”
* 文莱全国禁酒，娱乐场所也不多，因此民风比较淳朴，但生活相对较为沉闷些。华人平时的娱乐就是收看卫星电视节目或看影碟，几乎家家户户都安装卫星电视，通过收看电视新闻，掌握世界各国的最新动态。
* 出了家门，华人不是逛街买东西，就是与家人朋友齐上馆子品尝美食，再不就到百货公司去吹冷气闲逛。华人兴致勃勃地说：“周末最大的娱乐就是跟家人朋友开车到邻国马来西亚的东部城市美里（Miri）或林梦（Limbang）去游玩，车程仅耗时一两小时，东西无论买的或吃的都很便宜。”
* 文莱地方不大，华人出门容易遇上熟人，彼此或多或少都有点亲戚关系，人情网络密实。此外，华社还有个有趣现象，即华人到餐厅里用餐时若碰上朋友或亲戚，彼此一定抢着替对方付账。这里还流传一种说法：“在文莱无论如何都不会饿死，因为一定有人愿意请你吃饭。”从中可体会到当地华人浓浓的人情味。
* 或许，正是这种亲切熟悉的感觉，迎合了华人心中对家园的向往。虽然国籍成问题，但他们懂得“有得必有失”，卸下了心中的疙瘩，眼前就是一片海阔天空。
* 和许多国家的华人一样，不少文莱华人也是由经商起家。
* 走出水村之后，华人涉足的商业领域很广泛，包括百货、医药、电器、机械、五金及钟表等。20世纪60年代，文莱大兴土木扩建基础设施，引进不少华人工程师、技术人员、机器技师、销售人员、建筑工人和经理等各方面的专业人士，扩大了华人的职业范围。
* 到90年代初，华人已在批发、零售、饮食、旅馆及建筑等行业占了重要的位置，还有一些人从事金融、保险、地产、投资与服务工作。一名开杂货店华人说：“1997年那一波金融风暴，令十几万名外劳撤出了文莱，消费市场陷入一片低迷之中。”在金融危机下，生意人自是首当其冲。
* 然而，华人凭着不畏艰苦的精神，以灵活多元的手法度过了难关。
* 天然资源是文莱的经济命脉，而其90％的物品包括食品、日用品都需依赖进口。由此，华人很快看出了市场的需求，并抓住商机，迅速在百货、杂货业中站稳脚跟。
* 华人的百货公司与超市遍布各城镇，而金门人所经营的，多属于家族式的传统杂货店、迷你超市等更占了当地市场的50%。无论在大街或小巷，这些百货公司、超级市场或迷你超市随处可见，相隔几条街就出现一家。
* 一名百货公司经理指出：“百货业的竞争很激烈，大家各出奇招，使出特价促销、抽奖送礼、产品区隔等策略来吸引客人。”大规模的百货公司财力雄厚，市场庞大，能从中港台地区大量进货，提供较低廉的价格。至于传统杂货店或迷你超市则难与竞争，生存的空间日益窘迫。
* 华和百货及第一百货，是文莱家喻户晓的华人百货商场，成为当地人购置日用品的好去处。
* 现年80岁的金门人林国民，是文莱著名的“百货大亨”。1947年，他孤身一人过来投靠叔叔，从杂货店助手做起，凭着勤奋刻苦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并于1976年在当地最兴旺的商业区施丽开设了第一百货。如今，集团旗下已有16家子公司，在主要地区都设有分行。
* 林老先生以闽南语总结多年打拼的心得：“拼搏、积极和勤俭，是我们华人成功的原因。此外在文莱不用交税，生意比较好做。”由于国库不依靠人民税收，政府实施免缴个人所得税、企业免收营业税的政策，这对开店经商的华人无疑大为有利。
* 然而，身处这过于安逸的环境，也使文莱人缺乏创业精神，因此未有大企业家出现。
* 政府在经济上还是以扶持马来人的发展为重点，规定某些特殊行业或重要经济行业只能由马来人经营。此外，唯公民才享有土地所有权和买卖权，华人从事各行都须与文莱公民共同经营。因此非公民的华人若想开店就得找个“人头”，而往往遭对方“吃掉”的事也就常常发生。这些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华人在当地的经济活动。
* 不少年轻华人到外国念大学，毕业后有两三成会留在国外工作几年，家长一般上也非常鼓励他们留在国外，他们认为：“文莱就业机会不多，先吸取一些外国工作经验后再回来会更好。”
* 那些选择回国的年轻人，很少会愿意继承父母的传统生意，而会从事会计、律师、电脑工艺等专业工作，另外少部分人也会选择自行创业。
* 文莱的种种福利是依靠石油、天然气收入来支撑。意识到石油终有枯竭的一天，文莱苏丹在十几年前提出了经济多元化的发展计划，近几年更积极鼓励外商前来投资，但收效仍不明显。
* “取诸社会，用诸社会” 的道理，文莱华人了然于胸。
* “一直以来，文莱华团都积极响应国家的活动，出钱出力，参与程度绝不亚于马来人，以此表达对国家和苏丹的效忠。” 诗里巴加湾中华总商会代会长林再云的这番话，显示了当地华社已主动靠向主流社会。
* 当地华人社团现有50个左右，以业缘、地缘性的团体为主，比较活跃的则约有十几个。其中，成立超过60年的诗里巴加湾中华总商会是少数影响力较大的团体，对内调解华社矛盾，对外则代表华人权益。
* 另外，成立9年的福建会馆则拥有最多会员，在华社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会员大多来自金门。除了给会员提供服务外，它还大力配合政府推行的政策，积极参与华社或政府举办的活动。
* 福建会馆主席林成国屈指算道：“会馆近期参加的活动有王储世纪婚礼、苏丹陛下华诞庆典、国庆日庆典、华社新春团拜、开斋节贺年、捐助国家孤儿基金会，以及参与文莱苏丹陛下登基25周年纪念碑和60诞辰纪念碑的筹建。”
* 华团和政府间每年都有互动，固定参加一些国家重要活动，如每年1月1日的独立日，福建会馆必全力配合皇室的庆祝仪式；7月15日的苏丹诞辰，则由中华商会承接烟花燃放等祝寿节目。平时皇室有什么婚丧喜庆，华团领袖也都欣然出席，以表关心。
* 除了先辈的努力，只有靠更多华人不断为国家付出，主动融入社会，他们始能为下一代争取更多的认同以及更大的保障。
* 华人以“凝聚我族，贡献国家”的方式融入文莱社会。对于国家，他们奉公守法，积极参与，尽力回馈；对于华社，他们维护华教，寻根溯源，肩负着重大的使命。
* 华团在支持华教、维护中华传统方面功不可没，大家都保持着“维护华教，支援华教”的精神，每年春节，不少华团都会颁发奖励金给会员的子女。
* 长期默默地付出，终于看到一丝回报。有九名长期为华社出钱出力，并对国家贡献良多的华人领袖，他们是林清注、方国珍、林德甫、方汶汀、黄迪福、温瑞祥、林玉成、吴景进和刘锦国，受到苏丹的表彰，被封为宫廷大臣（Pehin或丕显）。
* 只要能力许可，海外华人都会兴办华文学校，力保中华文化的根，文莱华人也不例外。
* 文莱目前有8所华校，其中5所是小学，另3所则同时开办幼儿园、小学部及中学部。为了配合国家教育政策，这些华校皆注册为非政府学校，但除了经费自主外，课程安排、教学时数及教员聘请均受教育部管制；小学、初中及高中毕业生，也都得参加教育部的统一会考。
* 这里的华校教学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大相径庭。除了华文及道德课以华文教学，马来文以马来语教学外，其他科目一律以英语教学，并且采用新加坡的英文教材。因此，这里的华校生都具备相当高的英语程度，毕业后只要考取剑桥A水准文凭，即可申请就读文莱大学或国外大学。
* 尽管目前华文已不是主要的教学语文，但由于学校前身是纯华校，学生也多为华人，因此华文学习的环境还算良好。下课后，学生多以华语交谈，学校的行政事务则以中、巫（马来语）、英三语并用。
* 汶莱中华中学许校长自豪地说：“华校生升学的机会与政府学校学生均等，甚至他们还多了一项优势——华文。”
* 如今，文莱华校生给当地社会大众的印象是：品学兼优。
* 华校重视课外活动，不仅要求学生拥有好的学业表现，还通过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组织及社交能力，使他们不仅在全国考试中脱颖而出，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一样可圈可点。醒狮、舞蹈、华乐等团体因表演水平高，多次获得政府和华团的邀请登台表演。
* 由于华校三语并重，并在政策上与政府相配合，加上华文的价值日益提升，如今华校的办学方针还得到了友族的认同。许多马来人、印度人及其他土著纷纷报读华校，学生人数日增。例如，2007年报读汶莱中华中学的马来人就有612人，占学生总人数的18%.
* 当地华校生能享有今日的地位，是靠前人一点一滴地争取而来。华校曾度过一段艰难岁月。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政府策划将中学改制为国民型学校。经八校董事部长达18个月的积极争取，才总算保住了它，但从此却失去了政府津贴，教纲也须依循教育部的规定。当时，董事会与华社出钱出力，一同捍卫华教，这薪火才得以传到今天。
* 一路走来，身为校友的许校长眼见母校的壮大，欣慰地说：“虽然每月要付一百多元学费，华人普遍上还是乐意将孩子送到华校来。部分孩子较多、学费负担较重的家长，也愿意让孩子读到小学毕业，奠下华文基础后再转到政府中学去。”
* 先辈们撒下的文化种子，如今都开成一朵朵艳丽的鲜花。随着中国的崛起，文莱华校也将拥有更多发展的契机。
* 尽管住在回教国家，华人依然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半数以上的当地华人信奉道教，家中一般供奉多尊神像和祖先。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人数也占华人人数的25%.
* 在文莱首都，至今仍有一座香火鼎盛的华人庙宇——腾云殿。这座重建于1960年的古庙殿内供奉多尊神明，包括广泽尊王、玄天上帝、关圣帝君及保生大帝等。除了每月初一、十五外，每逢华人传统节日或各个神诞，腾云殿的香客总是络绎不绝。
* “广泽尊王虽是福建人的神明，但在这里不同籍贯的华人都会来拜祭。我们相信腾云殿的神不光保佑福建人，也保佑全文莱的华人。” 当地华人如是说。农历八月二十二的广泽尊王诞辰是腾云殿最热闹的一天，会重金聘请国外的歌仔戏团到文莱表演酬神戏，祈求善男信女永保安康，文莱国泰民安。
* 文莱是少数将华人新年列为公假的国家之一。当地政府规定大年初一为公定假日，举国放假一天。为了表示对华人传统的尊重，政府于2008年还宣布解除长达45年的燃放爆竹禁令，让华人能在新春时节开怀欢庆，为文莱增添几许热闹的新春气氛。
* 当地华人说：“文莱的春节气氛并不怎么浓烈，市区街道比平时还要安静，因为大家都利用难得的春假举家出国旅游去了。”其中，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文莱人最爱的旅游景点。
* 中秋佳节的气氛反倒较为浓烈，各大商家推出各种造型及口味的月饼，还有五色斑斓、神采各异的灯笼，营造出浓厚的佳节氛围。
* 国小，眼界却不能小，文莱华人明白当一只井底之蛙的危机。
* 文莱当地虽没有出版华文报刊，但马来西亚的《诗华日报》、《星洲日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等华文报都在文莱设有办事处，每天发行文莱专版，一般在华人的书报社或茶室即能买到。
* 每天早上必到茶室喝早茶的陈先生，从手上的华文报中探出头来笑说：“一边吃早餐，一边看报纸，是这里许多年纪较大的华人的习惯。”
* 文莱华人每天都有阅读华文报的习惯，而且至少阅读一份，一些人家里还分别订购华文、英文报各一份。但一如其他国家的情形，这里的年轻华人也不太有兴趣阅报，多从电视、杂志及网络取得资讯。
* 有趣的是，这小国由于新闻不多，国民反而留意起邻国及世界的时事动态。譬如新加坡的华文报《联合早报》及英文报《海峡时报》，就有不少文莱的读者。
* 书报社老板透露：“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读者最多，因为资讯丰富，内容全面，是政府官员们最爱看的报纸。”此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发行的娱乐时尚或美食类的杂志也备受欢迎。
* 文莱的广播电台旗下，自1957年设立了一个中文台，至今开播超过50年，每天播放5小时的综合节目，丰富了文莱华人的生活。中文台的黎经理指出：“除了每天早晚各播出15分钟的华语新闻外，我们尽量制作较生活化的节目，提供实用的生活资讯，因此吸引了不少女性听众。”
* 此外，还有邻国马来西亚的国营中文广播电台“爱FM”和古晋中文台可供选择，让当地华人轻易就能收听到华语歌曲，并掌握邻国的最新动态。
* 说到网络媒体方面，则不得不提到[易华网](http://www.e-huawang.com/)。这是一个专为文莱华人开设的网站，集合了50多个华人社团的资料及杰出华人的成功史，让全世界轻易取得文莱华人的资讯。
* 多年来，文莱始终都有一批爱好华文文学的华人，在孜孜不倦地创作。虽然不如邻国马来西亚或新加坡文坛那般的成熟而活跃，但几名当地华人也凭着对华文文学的热爱，成立了“汶莱华人作家协会”，相互勉励。
* 该协会曾与厦门大学联合主办“第六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并于2006年在文莱承办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由此可见当地华人热爱华文文学的程度，并不亚于其他国家的华人。
* 文莱国情开明，这里的马来人对中餐的接受度非常高——这情况在其他回教国家相当少见。
* “马来人很爱吃中式料理，经常光顾华人餐厅，港式点心尤其合乎他们的胃口。”华人餐厅老板说。
* 为了吸引更多马来食客，一些华人还专门开设了清真式的中餐厅，采用符合回教规定的食材，以其他肉类取替猪肉，但菜肴仍保持中华风味，让马来人在兼顾教规的同时，也能品尝中华料理的美味。
* 例如，皇家汶莱饮食集团就在首都开设了几家清真点心茶楼，配合马来顾客的口味推出鸡肉烧卖，成了马来人最爱的点心。
* 2006年，是文莱华社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
* 华社与王室共庆农历新年，即始于2006年丙戌春节。自文莱于1984年取得独立以来，当地华人首次邀请苏丹出席华社举办的“华社新春联欢团拜”。
* 自2006年起，新春联欢团拜成了华社每年年初的重头大戏。为了将华族文化的精髓完美地呈献于苏丹和皇室成员面前，筹委们都尽心尽力，积极凝聚华社力量为此活动筹款，并精心安排节目。
* 除了一系列富有华人传统文化色彩的表演如舞龙、华乐及华族舞蹈外，筹委会每年还精心筹划一个以文莱华人为主题的展览。
* 2007年的“十二生肖”展览及2008年的“参与与奉献”图片展，加深了苏丹及皇室成员对华人传统文化的了解，以及华人从早期到近代对文莱所作出的贡献。
* 这项活动对华社意义极大，除了展现华社的团结及爱国情操外，更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了解与融合。

      从漂泊到扎根，华人对这个朴素、富裕的袖珍小国日久生情，渐渐爱上这与世无争、宁静和乐的生活。如今，虽身处安居乐业的顺境，华人的心灵深处却不忘居安思危，除了对文莱“贡献与参与”外，也同时壮大华族的实力，以期能继续享有眼前的好日子。

 东帝汶

 东帝汶地处东南亚努沙登加拉群岛最东端，西部与印尼相接，东南则隔帝汶海与澳洲相望。

        犹如世外桃源的东帝汶，却有着坎坷的身世。它自16世纪开始就被葡萄牙统治，二战期间曾遭日本入侵。1975年脱离葡萄牙之际，却被印尼的军队进攻占领，此后这里战火不断。1999年，人民公投决定自治，经联合国托管两年半后，于2002年正式宣布独立。

        饱经战火摧残的东帝汶，目前正处于重建阶段，社会和经济发展只能依靠外国援助推动。这里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却缺乏开采技术，超过70%的国民生活在贫困线下；咖啡、橡胶和紫檀木统称“帝汶三宝”，务农者超过总人口的80%，但粮食却无法自足。

        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苦，但这里淳朴的民风，秀丽的景观、洁净的海滩、苍翠的丛林和绵延的山脉，都叫人流连忘返。有些华人，相信亦是因此而留在此地。

   虽然帝汶岛和中国远隔重洋，来往不便，但是华人却很早就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南宋的赵汝适在《诸蕃志》记载了华人曾经到这个盛产檀香的地方经商：元朝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也提及泉州吴姓家族到东帝汶从事贸易活动的事迹。当时的华人大多数选在顺风时节扬帆南下，上岸之后就与当地土著进行交易。东帝汶的商品价格极低，商人们往往都能获得巨利而返。渐渐地，华人便开始在此定居。早在殖民势力入侵之前，华人聚落就已经成形。

        根据资料显示，1511年，有3名广东人到东帝汶的欧库西砍伐檀木。3年后，又有两名华工随葡萄牙商人而来到东帝汶，并把檀香木运载回国销售。

        华人最早靠岸的地点，相信是东帝汶以西的力帝山市（Liquica）。1800年，当这里的首都迁到帝力之后，从广东省前来东帝汶做生意的华人人数更是大幅增加。1816年，荷兰的科尔夫少校从荷属西帝汶来到葡属东帝汶帝力的时候，就看到许多华人在这里生活。

        在东帝汶的华人，也有来自澳门的。由于两地同是葡萄牙殖民地，当时不少澳门华商都到东帝汶寻找商机。

        此外，东帝汶也曾是澳门华人囚犯的流放地。根据居留澳门的东帝汶裔神父弗兰西斯科·费尔南德斯（Francisco Fernandes）的说法，因为澳门地小，在殖民时代，葡萄牙殖民政府每年都会从首都里斯本开出一艘大船到澳门，将一批囚犯送往东帝汶服刑。大部分囚犯在恢复自由身之后，都会选择留在当地工作，甚至和当地土著通婚，落地生根，形成了早期的华人社群。

        20世纪初是华人移居东帝汶较为频密的时期，这时前来的华人绝大部分是粤东闽西的客家人。华人社团、庙宇、学校和坟场也因而纷纷建立了起来，华商的身份和地位越来越高。根据统计，1935年这里共有3500名华人，占了总人口49万的0.71%。

        在二战期间，日军侵占东帝汶作为进攻澳洲的跳板，华人遂无辜地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死伤无数，也导致1950年的华人人口减至约3100人。

        1975年，印尼政府派军入侵东帝汶，这里的华人世界自此便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华人一直以来都掌握着东帝汶的经济命脉，可是在印尼入侵之后，华人的财产或被摧毁，或被没收。许多华人更担心会遭受排华行动的迫害，纷纷迁移至澳门、葡萄牙和澳洲；那些走不了的中低阶层，只好留在原地静观其变。

        直至1999年的20余年间，东帝汶的华人人数已从高峰期的两万人骤减到数千人。

        然而，华人的悲惨命运并没有就此完结。1999年，在东帝汶获得独立之际，印尼民兵进行了大规模的烧杀掳掠，帝力市超过90%的面积均烧成焦土，这对华商造成的冲击尤其巨大。许多华人即使后来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保护之下重返东帝汶，但是面对着满目疮痍的家园，重建之路并不平坦。

        独立之后，有些华人回来了，更有许多新移民从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文莱、香港、中国大陆以及印尼等地前来寻觅商机。

        2006年，东帝汶爆发内战，受波及的华人再度逃亡，只剩下大约3000名华人。直至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东帝汶并且平定局势后，华人人数才逐渐回升，帝力市的各行各业，也再次出现华人活跃的身影。

东帝汶华人失去了很多，但得到的也不少。尽管受尽磨难，他们对这片国土依然爱护有加，充满信心，有些甚至已经做好准备，决定要与它共同进退。

* *许多东帝汶土著至今仍然保存着中国的古钱币作为祭祀之用。这些钱币相信是在清朝时期，由来自华南沿海一带、香港或澳门等地的华人，到东帝汶来做生意时所留下来的。*
* 刚独立的东帝汶，百废待兴，在短短的几年里，各地华商蜂拥面来，雄心万丈试图在这里开创新天地，这些华人新移民，有的是来投资的，有的从打工到创业做生意，有的把这里当作跳板，住上一段时间就会称居到澳洲。
* 早期的新移民主要来自东南业各地，近年来则大多来是自中国大陆的鞋民，他们以福建人为主，其次是浙江人。在此开店经商的个体户，加上中资机构员工、私营企业外派和建筑工人等等，目前东帝汶估计有超过2000名新移民，大多居住在帝力市。
* 土生土长的老移民，有90%是广东梅县客家人。他们大多已在这里繁衍超过4代，有的甚至是第20代了。然而，超过90%的老华人，早在几次动乱中已移居国外，留下的10%，或许没有能力离开，又或许是为了不忍舍弃辛苦建立起来的事业而坚守至今。
* 3500名保留东帝汶籍的老华人当中，只有1000人左右定居于此，其余的则在澳洲和东帝汶两地之间来回穿梭。还有一小部分的华人，被老华人称为“新侨”，他们是在印尼入侵时代到东帝汶做生意的印尼华人，主要是客家人、潮州人和福建人。
* 中文学校、华人社团、中华文化，在印尼占领前曾有过一段辉煌时期，但这一切都在随后遭到严重破坏。复办中文学校仍在争取当中，而中华商会已重新开放为华人服务。对于华社的未来发展，华人还是相当乐观的。

        越乱的地方越多商机。许多华人秉持着这个信念，踏上这片土地。他们坦言：“这里使用的美金，看在眼里就是黄金了。”

        1999年经历暴乱后，东帝汶满目疮痍，犹如一座死城。灾后重建，物資严重匮乏，平常5分钱的泡面，那时竟然要价6美金。“一大货柜的物品，区区14天就被抢购一空。”来自马来西亚，经营Sunly贸易公司的何万财如是说。

一切从零开始，竞争小，吸引了大批新华人涌入，连土生华人也回返家园开创事业。脑筋转得快的华人，迅速控制该国超过90%的零售和杂货生意，大街上的店铺，几乎都是华人开设的。

        然而，他们今天的成就，却是冒着生命危险换回来的。

        2006年爆发内战，炮火连天，但有胆量留下来守护店铺的华人，都说那是最赚钱的好时机。New 88餐厅老板曾德源表示：“最乱的时候，滞留在东帝汶的联合国和大使馆职员都打电话来订购食物，然后系派配有手枪的人来领取。货源来得不易，食品价格当然也水涨船高。”

        如今，战乱时代过去了，局势渐趋稳定，华人经济如同枯木逢春。

手工、建筑、地产、贸易、零售业是土生华人的传统行业，他们大多开设超市、五金店、从事咖啡、布料等当地特产买卖。新加坡华人多数从事二手汽车以及汽车零件买卖生意，也有不少人在这里开餐馆和酒店。由新加坡华人经营的樱花酒店（Hotel Sakura）有5层楼高，为目前东帝汶最高的建筑物。新加坡华人也计划投资开设东帝汶首家购物广场，占地约19万平方公尺，并兴建拥有450间客房的酒店。

        大部分印尼华人经营电器店，而马来西亚华人大多开设杂货店和餐厅，杂货货源主要来自印尼，食品则经由新加坡和澳洲入口。生活必需品都依赖入口，这里生活水平之高可想而知。

联合国进驻东帝汶以后，常驻机构人员和驻军成了当地的消费主力。仅是维和部队的人数，就曾高达8950人，现今仍有数千人在当地执行任务。2000年至2003年期间，加油站数量一度暴增，而且大多张挂着中文招牌。后来，市场趋向饱和，加油站生意一落千丈，直到最近联合国驻军增加才有所回升。

        外资公司也是华人商家重要的生意来源。许多外国大企业都会在这里购入大量杂货，然后到贫民区派发给需要救济的人。

        在华人眼中，东帝汶就像是个新生婴儿，备受国际社会呵护，未来发展值得期待。为了进一步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东帝汶政府也逐步放宽移民政策。

        近年来到东帝汶探路的，以福建人占多数。帝力市中心内，超过一半是他们开设的日常用品进口、批发和零售店铺，甚至形成了几条华人批发街。这些新华人有部分最初是建筑工人，后来开始摆摊子做买卖，租借店面当老板。建立起生意基础后，他们开始把亲朋戚友接到东帝汶来。家族式的大批移入，使东帝汶华人群体日渐庞大。

        对黑眼睛黄皮肤的华人，东帝汶人也总是怀有一份感激之情，皆因中国政府一直对东帝汶施予援助，中国曾捐赠超过8000吨大米和50吨食油，以解决饥荒问题。此外，中国还为东帝汶政府援建外交办公大楼、总统府，并派遣医疗及维和部队到当地服务，协助灾后重建。

        此外，当地人相当信任中医疗法。“身体出了毛病，他们都不愿意动手术，而向中医求诊。”华夏专科门诊黄连心医师如是说。目前，帝力市共有3家华人诊所，兼售中药和西药。

        至于饮食行业、华人除了开设传统的中式、葡萄牙式、东南亚式餐馆外，也经营西式快餐店、售卖汉堡包、炸薯条等套餐，颇受当地人欢迎。

        如何区别老华人与新华人的商店，有两种说法：一，老华人和土著一样有午睡的习惯，中午吃饭后是不开店做生意的，开店的都是新华人；二，挂上中文招牌的一般是新华人，走在印尼华人为主的电器城大街，则几乎看不到一个中文字。

        东帝汶刚走上经济改革之路，新兴行业的发展空间很大。华人登陆东帝汶的故事，相信还会延续下去。

* *葡萄牙时期所使用的东帝汶纸币上印有手写的中文数字，反映了当时华人在当地经济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东帝汶土著有着乐天知命的性格。他们可以到海边呆坐一整天，肚子饿了就投入大海，捕捉大自然赐予他们的鲜虾活鱼当食物。物质生活不充裕，有的还住在家徒四壁的茅草屋，孩子在烈日当空下赤脚行走，必须走上好几公里路去上学。

        “可能是个性使然，有些土著比较懒散，每天无所事事，男人们也不出外工作挣钱。发薪后，他们会买酒畅饮，或到高级餐馆大吃一顿，两三天内就把工资花光，然后预支下个月的薪水。”及时行乐是他们的生活态度，这令许多华人老板感到不解。

        不过，也正因如此，华人在这里找到了赚钱良机。“土著售卖蔬菜、水果、海鲜，都是以一堆两堆或一只两只，而不是以重量来计算，结果成交价可能还不到实际售价的一半。”华人笑说。

        在思想观念方面，华人和土著也大不相同。以手机为例，华人是为了生活所需，而土著却只为了炫耀之用。

        东帝汶3家手机店皆是华人开设、华人说：“当地人对手机这玩意儿相当着迷，有的甚至不惜花上整个月的薪水来购买，可是却没有多余的钱买手机SIM卡。”对一些土著而言，手机仿佛不是用来联系沟通。而是握在手中的装饰品。

        土著爱面子，也可以从他们办喜宴的方式看出来。即使经济情况不允许，土著始终坚持以烧猪、烧鸡、甜品等葡萄牙美食来招待客人，最终换来一屁股债，但他们总是这样回应：“明天的事，明天再打算吧！”

        土著追求悠闲游哉的生活，但由于长期营养不均，加上缺乏医疗设备，他们的存活年龄一般不到60岁。

        退休后到东帝汶从事酒店管理的新加坡华人郑汶昇曾有过啼笑皆非的经验。他笑着说：“有个土著员工对我说，老板你好可怜呀，这么老了还没死，还得在这里辛苦工作，很可悲啊！我听了之后无言以对，真不知是好气还是好笑。”

        可是，跟土著相处久了，华人或许会爱上他们的善良和单纯。

        “他们非常介意别人用粗言秽语辱骂其父母。只要彼此以礼相待，凡事讲理和互相尊重，他们也会以诚相待，甚至以最好的方式回报你。”何万财贯彻这种相处之道，认养了几名土著员工当干儿女。

        面对思想差异的冲击，华人仍然努力寻找着最好的磨合方式。

        东帝汶法律制度仍欠完善，加上政局动荡不安，1999年到2006年间更接连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暴乱，留下来的华人心有余悸，只好把命运交给上天。

        “在帝力生存，必须要勇于面对现实。”这是许多新移民的心声。土著喜欢喝酒精浓度高的土酒，一旦醉酒就会行凶闹事，如向路过者抛掷石头、砸破车窗或闯进店铺抢劫等。“土著不喝酒时是好朋友，喝酒之后就翻脸不认人。”华人百般无奈，店铺打烊后只好乖乖呆在家中。

        庆幸的是，这里没有太多排华情绪，共同为国家打拼的精神反而更浓烈。

华人要面对的，还有致命的蚊症。据说，东帝汶70%的蚊子带有登革热（骨痛热症）病毒，其他的还会传播疟疾，令人闻之丧胆，但土著自有对策——以木瓜叶来治蚊症，尽管功效未经科学验证，但许多华人已纷纷跟进。

        东帝汶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华人说：“很多事情即使有钱都办不到，生活枯燥得像坐移民监一样。”多姿多彩的娱乐消遣是一种奢望，但是对一些华人说，只要能放开胸怀去感受这里的原始风貌与怡人景色，闲暇时唱唱卡拉OK、搓搓麻将，或爬山潜水、到海边烧烤、累了还可以飞到邻国的旅游天堂巴厘岛度假，日子过得还是挺写意的。

        这里年久失修的道路，华人开着四轮驱动车穿过坑坑洼洼的路面，电单车与贴上联合国标志的维和部队车辆呼啸而过，迎面而来的客货车挂满需要风干的海鲜，加上路旁猪狗成群，都是此处司空见惯的景象，也是华人眼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 *东帝汶华人大多数都在商界打拼，不过也有一些例外，这些华人则选择了投身政界，如基础设施部长黎世芳（Pedro Lay Da Silva）及旅游与商业部长Zil Aves*。
* 东帝汶中华商会成立于1912年，为当地首个华人社团，它后来还协助筹设当地唯一的华人义山及十多间中文学校等。除了商会之外，当时还有约15个不同性质的华人社团组织。
* 早期的东帝汶华人，中文水平还算不错，全国各县包括山区都曾开办中文学校。“那时，很多华人家庭一般有6个孩子，每个县平均有300名华人子弟学习中文，就连身边的土著朋友都会说上几句中文。”符孝勤如是说。最具规模的要数创校于1911年的帝力中华学校。它最初只是租用小房间授课，1962年通过募捐，合众人之力兴建校舍，全盛时期约有1000名学生。
* 当年的中文教育体系相当完整，可从幼稚园、小学读到初中、高中，毕业后还能到台湾深造。然而，1975年印尼入侵，实行同化政策，这一切便彻底被摧毁了。
* 印尼政府关闭中华商会及所有中文学校，并占据了会所与校所。中文教育不复存在，中文刊物也禁止流入东帝汶，华人子弟顿时丧失学习中文、传承中华文化的机会。此外，华人社团组织遭取缔，并终止一切活动。
* 随着东帝汶局势趋稳，中华商会于2003年重振旗鼓，开始从事一些文化及慈善活动，如在春节和独立日表演舞狮、捐赠救灾物资等，获得当地社会的赞赏。商会除了充当东帝汶经济发展的桥梁，也肩负着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并努力协助新移民融入当地社会。
* “这里华人社群不算大，几乎做生意的华人都加入了商会，大家互相认识，也没什么争吵和摩擦。新老华人文化大致相同，但老华人因曾在这里经历过种种艰辛，知道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得来不易，所以希望新华人多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尽量与土著和睦共处。”现任中华商会会长符孝勤如是说，可见商会任重道远。
* 经过多番争取，政府已协议归还商会会所的拥有权，但目前仍需租借给政府作办公之用。商会紧接着要做的，就是索回帝力中华学校的校舍，并出版当地首份中文会讯。
* 目前，商会每星期开办3堂中文补习班，下午5点半开始上课，为时1小时。学生一般是华人子弟，在家里大多以客家话交谈，在学校学习的是葡萄牙文、英文和印尼文，唯一有机会接触中文的，就只有在补习班。
* 中文教育经历了数十年的断层，如今东帝汶有整整两代华人不会说华语，对中华文化不甚了解。
* “我们要复办中文学校，唯有向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取经，引进大量的中文教师。这条路很漫长、崎岖，但我们抱持希望，一定会坚持下去。”符孝勤踌躇满志地说。
* 建于1936年、位于帝力市中心的关帝庙香火非常鼎盛。“庙宇每天早上7点开门，一直到中午12点关门，至少有20多人来上香膜拜。华人一般只会在初一、十五来上香，平常以土著占多数。”74岁的庙祝方良遂说。
* 土著膜拜关帝的虔诚，华人常常自叹不如。有部分信奉天主教的土著甚至天天到关帝庙求签烧香，祈求神灵保佑。
* 当地人称关帝为中国神，他们深信，关帝保佑华人的同时，也对当地人一视同仁。这里流传着一个说法：二战时期联军向关帝庙投下两颗炸弹，结果竟然都没有引爆，令当地人啧啧称奇。“纵使国家多次遭受战乱破坏，周遭千疮百孔，但关帝庙丝毫无损。”土生土长的方良遂以粤语说道。
* 1977年，关帝庙旁增建了观音堂，面积稍小，加上庭院共占地1000平方公尺。红墙绿瓦，在众葡萄牙式建筑中显得独树一帜，也是帝力市内仅存的中华特色建筑。
* 较偏远的力帝山市，仍保留着超过百年历史的关帝宫和观音宫。“以前这个城市住了很多华人，关公像和观音像都是先人在上个世纪从中国带过来的。后来大家都搬走了，目前这里只剩下五六户客家人。”73岁的钟奇甫一直守着古庙，兄弟姐妹早已移民国外，唯独他与土著妻子和子女们不曾离开过。
* 帝力市近郊有座华人坟场，占地十多公顷，矗立着约1500座传统样式的华人墓碑。最古老的一座建于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年），印证华来到东帝汶的悠久历史。
* 立墓碑者以黎姓、赖姓和杨姓居多，而较具规模的墓碑，不少是来自澳门的成功华商。“这里不分宗教，而且免费提供墓地，只要死者家属出钱立碑即可，因此每座坟墓的设计和大小都不相同。”管理员说，春祭和清明节期间，大批华人都会前来拜祭。
* 华人在保留自身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不忘欢度当地节庆，如元旦时举办派对和大跳西方舞蹈，圣诞节派发红包等等。
* 这里还是一个未定型的华社。
* 老华人大多眷恋这片故土，但年轻一代却伺机而动；有朝一日，老华人可能将跟随后辈移居他国。陆续到来的新华人，或许只是过客，又或许会像前辈一样，作长久居留的打算。
* 无论如何，华人依然细心灌溉，希望它茁壮成长，迎向更美好的未来，诚如该国所提倡的口号——“Goodbye the conflict, Welcome the develop”（告别纷争，迎向发展）。

 圣诞岛

    圣诞岛位于印度洋东北部，北距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约500公里，东南距澳洲的西北角约1565公里。四面环海，沿岸大多为悬崖峭壁，约70%的面积是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来自英国的威廉·迈纳斯（William Mynors）船长于1643年的圣诞节发现了这个岛屿，于是把它命名为“圣诞岛”。1946年起，它成为英属新加坡的领地；1957年，新加坡以290万英镑把它转让给澳洲，圣诞岛自此成为澳洲的海外领地。

        岛上族群由华人、马来人及欧洲人组成，多元文化兼容并蓄。早期华人远渡重洋来到这座孤岛，如今已成为该岛的最大族群。他们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习俗，在这里展开新生活，既逍遥又自在。

  根据记载，1898年有200名从广西来到这里的契约华工，和磷酸盐矿公司签了3年合约。当时，他们的右手背上都各有号码的烙印。

        在短短10年间，磷酸盐矿公司陆续从广东省以及海南岛引进更多华工，致使华人从最初的200人增至1100人。可是，由于物资匮乏，加上华工又长期缺乏营养，结果有超过一半的华工患上脚气病，客死异乡。此外，岛上的磷酸盐矿在1914至1918年间产量大减，更导致华工的人数急速下降。

        华工每天在日晒雨淋下以锄头和铲子挖掘磷酸盐，再以手推车将盐矿从山上运到山脚下，吃的是大锅饭，住的是茅寮，日子过得非常艰苦。在那个年代，岛上完全没有娱乐，只有随处可见的鸦片馆及赌馆，许多华工因而染上烟赌恶习，结果欠下了大堆债务由于债务缠身，合约只好一续再续，故而长期留下。

        来自海南岛的何达华于1930年踏上圣诞岛。根据他回忆，当时每天的工资是9毛新币，并被分配到一包米、4罐牛油、两罐牛奶，工作不算十分忙碌，生活也可说是颇为轻松。履行了3年合约之后，他便回到海南岛成婚，并将妻子接过来，之后的岁月都在这个岛上度过，从此再没有返回家乡。而今他已年过90，是岛上最年老的华人，口操流利的海南话。他的孩子则大多数已移居澳洲，只剩下幼女和他相依为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磷酸盐矿的开采工作被迫中断，员工受到战乱波及，也必须撤离到澳洲去。二战结束之后，磷酸盐矿的开采工程重新启动，盐矿公司开始通过代理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招聘大量华工。由于征聘启事列出优厚待遇，华人毫不犹豫便签下3年合约，决心到该岛打拼。

        抵步之后，华人始发现这个岛上除了磷酸盐矿外，就一无所有，异常荒凉。然而，合约都已经签订，后悔莫及，华人唯有硬着头皮留下来再作打算。

        华工们有的负责开车，有的推泥粉车，有的挖矿；而他们的薪金也有技术人员及劳工之分，前者每日有12元新币，后者则有8元新币。克勤克俭的华人在下班之后还兼职替人除草、煮饭、打扫等，希望能多赚一点钱。

        在这里，吃一顿饭只需要大约25分新币，加上根本无处可消费，华人要储蓄并不算太难。

        由于房屋有限，只有工头和技术人员可以申请房子，并获准将家眷带来；而劳工所居住的单身宿舍，则只有8平方米大的空间，能容下一张床及一个柜子，设备十分简陋，也没有热水供应。“当时我们每天用冷水洗澡，每天都是边跳边洗。”在岛上住了近40年的何胜光，对这一段过往的生活经历，好气又好笑。

        1970年代为移民浪潮的高峰期，岛上的华人约有三四千人，虽然人数很多，地位却非常卑微。当时白澳政策无孔不入，一些泳池和俱乐部都只限白人使用；华人只要一步入白人居多的银城（Silver City），警察就会前来干涉。此外，华人开车不可越过白人，华人与白人同工却不同酬，欺压华人的行为层出不穷。

        华人若是不慎逾越雷池，其工作证上便被盖上NTR(Not To Return，即不得入境）的字样，然后被遣送回国，永远不得重返圣诞岛。华人不想丢了饭碗，所以只能忍气吞声。

        直至1975年，圣诞岛职工总会正式成立，工人的权益才开始受到重视，经过许多次的罢工及谈判，华人终于得以享有同工同酬的待遇。之后，随着白澳政策的废除，圣诞岛才逐渐形成一个既包容又开放的社会。

        权益得到了提升，华人的生活也因此逐渐改善。但是到了1984年，磷酸盐矿公司减少开采活动，因而献议员工接受自愿被裁退的计划，自愿者每人将可获得2万3000澳元的赔偿金。当时，在澳洲购买房子只需要3万澳元，于是有许多华工都接受了这项献议，向一起打拼的工作伙伴告别，离开了这个生活多年的海岛。

        当时华工是分3批离开圣诞岛的，第一批有249人，第二批是百多人，第三批的人数最多，有500人左右。此后，就鲜少有新移民迁入，岛上华人人数有减无增的状况维持至今。

        圣诞岛华人从高峰期的三四千人下降至现今的400多人，其中以来自马来西亚的占多数，也有部分来自新加坡。由于少有新移民涌入，加上年轻一辈陆续移居澳洲，岛上华人人口老化的现象愈加显著。

        华人以打工为主，约200名华人在磷酸盐矿公司工作。经商的华人不过十多人，商铺屈指可数，只有3家杂货店、两家中餐馆、两家汽车修理中心、两家出租车公司、一家迷你市场、一家宾馆及一家建筑公司。另有华人在政府部门工作，包括两名华人警察及3名税务官员。

        圣诞岛地方不大，主要道路只有3条，华人每天不外乎上班、下班、休息，生活悠闲、有规律。华人社会就像一个大家庭，彼此常相约聚餐，见面总是寒暄一番，那浓厚的人情味弥漫在整个海岛，是金钱也买不到的亲情。

        部分华人已入籍澳洲，并在当地置产，为孩子教育及日后的生活作好安排；有些保留原有的国籍，落叶归根，有些则在家乡与圣诞岛两地往来穿梭，漂泊不定。

        华人说：“有福份的人才会来到这里。”的确，这里赚钱不难，存钱更易，毕竟消费的地方不多。更重要的是，这里治安良好，那份安全感，叫人乐以忘忧。

        圣诞岛流传着一句话：“打工比当老板好。”

        的确，磷酸盐矿工的上班时间从上午7点至下午4点，工作9小时，扣除喝早茶、吃午饭及喝下午茶的时间，每天工作不过6小时。工作轻松，年薪却最少有3万多澳元，加上每月的生活津贴、每年的调薪，收入相当可观。这种优差，当然比当老板好。

        高薪以外，福利也很吸引人：每年6个星期年假，另加两张免费的双程机票，可选择回家乡探亲或到澳洲探望留学的子女。这些福利令许多打工一族称羡不已，因此在同一个领域、同一家公司服务超过30年的华人比比皆是。

        在这里永远不会出现手停口停的状况。万一失业，华工依然可以领取失业金和福利津贴。单身者，双周可领取498块澳元，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每月则可以领取千多块。换句话说，失业者不单生活费不成问题，还有能力出国度假。

        没有穷困潦倒的忧虑，没有负担和压力，华人的生活过得轻松惬意。

        “快快乐乐，有工做工，没工找阿公（政府）。”王益瑞在岛上住了32年，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怡然自得。

华工的奋斗历程也不是一路平坦。1980年代末，澳洲政府曾以环保为由，关闭了磷酸盐矿区，后来在职工总会的斡旋下，工人们群策群力筹集了300万澳元，于1991年接管磷酸盐矿公司，并在热带雨林资源不受破坏的条件下恢复开采活动。1998年，磷酸盐矿公司与澳洲政府签订为期21年的矿产开发租约，直至2019年。

        当地华人说：“少了磷酸盐矿，圣诞岛就什么也没有了。”的确，磷酸盐矿是圣诞岛的经济支柱，也基于此，才延伸出其他经营项目。该岛的杂货店及中餐馆数量，刚好能应付岛民的需求量，少一家问题不大，多一家则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万一开采合约不获延长，华人或许会因失去工作而离开，并引发骨牌效应，导致中餐馆、杂货店结业。

        除了磷酸盐矿，圣诞岛其实还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那碧绿的印度洋、浩瀚的热带雨林、壮观的红蟹大迁徙、珍稀的野生动物，都有着过人的吸引力。

        每年11月尾至翌年2月，成群的红蟹从浩瀚的林海迁居到大海产卵，再从大海返回丛林的怀抱。千万只红蟹遍布岛上主要公路，宛如一张色彩亮丽的红地毯，蔚为奇观。当局为了保护红蟹，还特地建造一座桥让红蟹过路。

遗憾的是，该岛的旅游设施不够完善，往返该岛的机票价格高昂，始终无法招来太多游客。

* *圣诞岛早期移民多来自广东省，因此许多路牌都以粤语直译，如Tong Yan Loh（唐人路）、Xian Sang Loh （先生路）、San Mao Loh（山猫路）、Shang Zhai Loh（生仔路）等等，趣味十足。*

   起初，华人抱着淘金的心态到来，心想3年合约期满，挣够了钱就离开。或许是习惯，又或者是容易满足，合约续了再续，时间消逝，一晃眼黄金岁月都在这岛屿上消耗了，心里更衍生出一份归属感。

        “去到哪里都不习惯，还是回来了。”经营旅馆的陈森吉不是未曾离开过，只是这里的一景一物和人情味，让他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决定回来。“这个地方就是那么奇特，总是令人想念，来了就想待下来。”

        华人的休闲生活从下班后才真正开始。下午4点过后，有的华人相约打羽球、跑步、散步，晚上再到餐馆用餐，或者在家煮几道小菜。饭后，看看电视、串串门子、到酒吧解闷，或到半山公馆赌上一两把，生活清闲自在。

        纵使没有购物商场和娱乐中心，物质生活并不丰裕，精神生活却无比富足。

        “或许有人说我们和外界脱节了，不过，我们在这里一样看新闻，一样知道世界大事。这里生活平静、安全、无忧无虑、车子、房子不上锁，也从不担心。”杂货店老板娘黄梅心非常享受这里的生活，已把它视为第二故乡。

        周末，华人喜欢出海钓鱼、郊游、野餐、烧烤，节目非常丰富。也有的出席宗教聚会，洗涤心灵。聚餐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华人喜欢轮流请客，烹煮几道菜肴，邀约几个好友，边吃边聊，时间过得特别快。没有强大的竞争压力，日子轻松简单，胜过一切荣华富贵。

        华人、马来人及欧洲人在岛上和睦共处。这里没有冲突、歧视，大家尊重彼此的宗教、文化及语言。每逢节庆，各种族也打破藩篱，邀请友族同胞一同参与。

        身处在一个宁静的岛上，做事似乎不需要太急躁。在这里，工作气氛是轻松的，步调缓慢是可以被接受、被原谅。接到任务后，大伙都很有默契地等到第二天才去处理，不会赶在一天内完成。

“追不上时代的步伐，习惯什么事情都不紧张，还是留在本岛好。”家庭主妇谢水玉习惯了岛上的生活节奏，那清幽的环境更叫她难以割舍。

        圣诞岛四面环海，孤傲地伫立在海中央，华人形容它就像一座自由的监狱，可以在岛上自由活动，却不能随意离开，皆因该岛对外就只有班次有限的空运和船运。

        生活是自己选择的，享受与否在于心态，只要接受了，就会把它的优点放大、缺点缩小。在这座孤岛上，没有抢劫、没有勒索，犯罪率几乎是零，加上地方小，彼此互相认识，任你偷窃犯案，也无处可逃，最重要的是，大家丰衣足食，根本不必作奸犯科。难怪有人说：“警察只负责管交通就好。”

        生活素质好，不拘谨、不约束，烦心的事情不多，简简单单，华人感觉越活越年轻。“没有人能看出我们的真实年龄。”华人自豪地说着，眼神清澈，浑身充满活力。

        日子过得轻松自在，但由于岛上物资匮乏，吃的和用的都依赖进口，运输成本增加，导致物价高涨，消费水平甚至比澳洲还要高。

        进口食品主要靠空运或船运，不过，该岛的飞行航道短窄，降落时得花一番功夫，若遇上天气不好，可能须折返，致使食品无法如期抵步；至于船运的货品，偶尔也因浪大，船只无靠岸，而延迟交付。

        食品进口取决于天气，因此家家户户都有囤粮过日的意识。每逢星期一，飞机降落或货船靠岸后，大伙儿就一窝蜂涌到杂货店，选购新鲜的蔬果、肉类，以填满一星期的需求。进口的食品多来自马来西亚及澳洲，除了罐头食品外，都是一些冷冻食品，如包子、糕点、棕子、蔬菜、肉类等。

        人口少，消费市场小，摆在杂货店陈列架上的罐头食品有时候会囤放至过期、及时发现的消费者或许会要求业者退钱或换取其他货物，有些则把食品丢掉。基于此，华人购买食品或酱料时，都会特别留意生产日期及有效期限。

        位于半山（Poon Saan）的咖啡厅提供早午餐，是华人最爱光顾的地方。餐厅每天只卖一道面食作早餐：星期一咖哩面、星期二炒粿条、星期三云吞面、星期四卤面、星期五虾面；午餐是三菜一汤的套餐，每份十块澳元。没有眼花缭乱的选择，你只能选择吃或不吃。

        这里用餐按时按点，早餐从上午6点至11点，午餐从上午11点至下午2点，晚餐则从晚上6点至10点，岛民也因此养成有规律的饮食习惯。万一误点就得饿肚子，或者自己在家里烹煮。

        随着磷酸盐矿区重开，华人开始在当地置产，把原先租用的房子买下，以保障未来。华人集中居住在3个地点，分别是银城、半山及车头仔（Drumsite，又称山上）。

        银城是欧洲人留下的，设计具欧洲度假村格调，有前院、后院、客厅、饭厅、3间睡房、厕所，环境宽敞舒适；半山有3栋建于1960年代的组屋，具有新加坡特色，楼高3层，设计简单，内有浴室、厨房和两间卧室，空间虽小，但设备一应俱全；车头仔的独立式洋房，跟银城的很相像，只是可用面积较小。

        前院有神龛，摆放着一两盆富贵花，是华人房子的特色。客厅的天花板有一把大风扇转动着，墙上挂着日历，用金银饰品、佛像、中国结、扇子、山水画等加以点缀，即使换了新环境，华人还是依照家乡那套方式生活着。

华人出门习惯穿背心短裤，外加一双拖鞋，在气候干爽的海岛上，舒适自在的装扮最适宜。这里没有服装店，华人的衣物都是每年回乡或出国度假时购买的。

        圣诞岛的交通不方便，巴士每两个小时才川行一次，华人鲜少会顶着大太阳在候车亭等巴士。因此，每户华人家庭都至少拥有两台车。

        这些车都是澳洲的二手车，虽然有点残旧，但胜在价格廉宜，在岛内驾驶，问题不大。至于喜欢户外活动的华人，则必备一台四轮驱动车，方便开进丛林游山玩水。

        有人形容这是退休的好地方，也有人认为这里不适合退休生活，因为除了工作，就什么都没有。唯有长居于此的华人才明白，什么留住了他们的脚步。或去或留，他们早已心里有数。

* *圣诞岛盛产“山虾”（即椰子蟹），在岛上出世的孩子被称为“山虾仔”或“山虾妹”，老一代的移民则被称为“老山虾”，用来形容他们像山虾一样长居该岛。另外，山虾具有往后退的特性，比喻华人待久了，行为思想退化。*
* 圣诞岛社区学校，集学前预备班、小学及中学于一身，目前共有160名学生，其中华人子弟约占65%。一直以来，该校只提供初中课程，学生念完初中，必须到澳洲升学，或者转到岛上的技术学校就读；直到2002年，该校增设高中班，华人子弟可以在当地念完高中，才到澳洲升学。
* 学校按照澳洲教育体制教学，以英文为主，校舍面积虽小，但设施完善。由于华人学生众多，中文被列为外语，每星期共有两节课。
* 学习时间有限，成效不大，因此华人子弟大多只能掌握简单的中文字。相对来说，他们更重视到澳洲留学。“孩子以后步入社会，不懂中文，影响不大。”谢水玉在家和孩子以福建话沟通，认为孩子不懂得写中文没关系，会说就足够了，这也道出许多华人父母的心声。
* 即使孩子没受过中文教育，不少华人仍坚持在家中以华语沟通，和朋友交谈则以粤语或福建话为主。这里犹如马来西亚小镇的缩影，各种籍贯的人齐聚一堂，华语、福建话、客家话、粤语、潮州话不时会在耳际响起，既亲切又温馨。
* 为了方便孩子到澳洲留学，华人一般会在澳洲置产，母亲则充当陪读，同时替孩子打点家务。随着妻子及孩子离开，圣诞岛上也就出现许多“单身爸爸”。
* 这些“单身爸爸”留在岛上工作挣钱养家，为了孩子的前途，和妻子、孩子聚少离多，饱受思念之苦也在所不惜。一家团聚，必须等孩子放假或父亲请假，他们协议每半年往返澳洲或圣诞岛一次，为维系感情作出努力。
* 天底下也唯有父母亲，会无怨无悔为孩子奉献及牺牲。思念的煎熬化成前进的动力，苦尽甘来或许是华人所期盼的吧！
* 圣诞岛华人对维护文化传统及风俗习惯，可说尽心尽力。岛上十多家庙宇被打理得井然有序，华人传统节日深获重视。
* 春节是华人最重视的节日，而澳洲政府也把春节列为圣诞岛的公共假期，岛民可享有两天假期。另外，该岛也配合春节推出生肖邮票，那一枚枚精致的邮票，除了说明春节的由来，也显示华人地位受到重视。
* 春节期间，华人有的回家乡团圆，有的留在当地。每逢除夕夜，华人吃过团圆饭后，都会到庙宇供奉神明，祈求家人平安，度过丰衣足食的一年。大年初一，舞狮团队到每家每户拜年，锣鼓喧天，一片喜气洋洋。社团也会在这天举行大团拜，华人互相拜年。
* 清明节及中元节也是岛上非常热闹的节日。华人一般会在社团负责人的带领下到先祖的坟墓祭拜。华人公墓有两个，一个位于大路旁，另一个则在深山，必须穿过崎岖险峻的羊肠小道。
* 位于深山的公墓原是一个乱葬岗，早期华人患上脚气病去世，为了避免病菌传染，都被埋葬在这里。由于没有确切的死亡人数及名字，华人公馆在该处立下逾百个墓碑，碑上刻有“圣诞岛开埠先辈之坟”的字样，除了纪念先辈的贡献，也希望先辈安息。
* 中元节也称为“鬼节”，华人公馆每年都会举行中元法会，从外地邀请道士来诵经，普渡往生的先辈。长长的桌子摆满祭品，焚烧一袋又一袋的冥纸，拜祭仪式从下午进行至晚上，几乎全岛的华人都会出席观看这一年一度的盛事。
* 至于其他的节日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及冬至，华人也不会忽略。应节的食品及礼俗，华人都依照家乡的传统，有时甚至保留得比家乡更完整。
* 华人的宗教信仰非常多元，有民间信仰、天主教及基督教等。其中民间信仰者占多数，他们家中摆放着供奉神明、祖先的桌子，门外设有神龛；早晚上香，祈求神明保佑，农历初一、十五则到庙宇上香。
* 圣诞岛面积不大，可是庙宇数量之多，叫人大开眼界。全岛共有13座庙宇，据说都是先辈搭建的。在那个物资不充裕的年代，先辈使用仅有的材料，盖了一间又一间的庙宇，虽然简陋，但至少让精神有个寄托。
* 每间庙宇都有一个管理委员会，负责策划每年的节日庆典，并且定期清理庙宇。庙宇庆典是岛上的一大盛事，华人都出钱出力。而香火最盛的庙宇首推位于八厂的顺天宫，该庙历史悠久，立在偏远的车头仔，背山面海，环境优美，华人不辞劳苦，周末或农历初一、十五都会开车到来上香。
* 民间信仰略带迷信色彩，但作为华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如何保留和传承下去显得更为重要
* 华人人数虽然不多，华人社团却有好几个，包括妇女协会、华人公馆及半山公馆。各个社团形象鲜明，各司其职。妇女协会由各大种族组成，重点放在慈善及妇女福利上；华人公馆则着重文化传统的保留，带动华人参与节庆；半山公馆则以娱乐为主，会所设有赌桌，供人们消遣之用。
* 有趣的是，也许是人口少的缘故，一人分饰多角在华人社会是司空见惯的事。
* 华人公馆是最早成立的社团，前身是业余阅报社，早在1940年代之前就已创办，目的是让华人有个可以阅读报章、杂志及下棋的地方，以杜绝当时猖獗的赌风。
* 在那资讯落后的时代，书信都通过华人公馆传送，而华人也全赖家书，才得以了解故乡亲友的消息，即使是片言只语，也倍觉温馨。
* “前辈传承下来的活动，会依样进行下去，群众发起的活动则会尽量配合。”曾担任13年公馆主席的王益瑞如是说道。
* 随着时代的变迁，华人公馆不再局限于让华人读书写信。为了加强华社的凝聚力，它和半山公馆达成共识，每年轮流举办或联办活动，以免出现活动重叠、资源耗损或抢会员的状况。
* 半山公馆于1970年代成立，其前身是亚洲人公馆。位于半山区的会所里头，摆放着许多赌具，下午供打麻将，晚上8点后则有赌局。不少华人抱着小赌怡情的心态玩牌九，也有人纯粹到来凑凑热闹，在旁围观。
* 成立于1989年的妇女协会可算是目前最活跃的社团组织，也是一个集合3大种族的组织。这个社团成立前，本来是学习中心，教导妇女语言、烹饪技巧，久而久之，人数增多，资金充裕，就形成了社团，宗旨是为了维护妇女权益及开扩妇女的社交圈子。
* 早期，部分华人沉迷赌博，家暴案件特别多，妇女协会介入调解，把妇女从家暴中拯救出来。“社团工作吃力不讨好，为了社群，会员努力地做出成绩，才令人刮目相看。”该会主席表示，在协助妇女的过程中，曾受到男性的指摘，但她们始终不言弃，坚持到底。
* 妇女协会也经常举办慈善活动，募款捐助天灾的受害者。2009年初，澳洲维多利亚森林发生大火，该会通过义卖会筹款，获得各种族的热烈回响，其号召力可见一斑。
* 华人对参政也相当热衷，在9名市议员当中，华人就占了6名，足见华人的影响力。4年一次的选举，华人总是踊跃地出席投票，以履行公民的责任。
* “市议员就是市政府的左右手，负责审核商业执照、投资申请，以及规划圣诞岛的发展计划。”市议员李国民是岛民选出来的代表，每个月都会出席会议探讨各项计划。
* 当地有个国营的民众广播电台，每周安排两个中文时段，主要播放中文金曲及岛上的活动讯息。周六有“晨光选曲”，从上午8点播放至11点半，周日则是“与你同在”。两位主持人都属义务服务，分文未收。
* 在简陋的播音室里，主持人从选曲、主持、播报新闻，都一手包办，听众偶尔也会叩应点唱。这里没有现代化的数码选曲，主持人只好手动转换唱片。收音机传来一首首悠扬的粤语、华语及福建金曲，而忠实听众则在缅怀过去的美好时光。
* 此外，圣诞岛每月推出一份《岛民简讯》，薄薄的一份册子，概括了岛上的活动通告、广告、电视预告及巴士时间表等资讯。顾及岛民的多元化，内容同时以英文、华文及马来文3种语文来呈现。
* 华人赤手空拳到来，一步一脚印，努力打拼，换来了今天的成果。这里没有奢华的生活，反而突显出平淡中的那份踏实感。
* 留下或离开的念头都曾掠过华人的脑海，要不移居澳洲和家人团聚，要不落叶归根回到故乡，要不留下来做个无忧无虑的快活人。只是一切都还没定夺，华人沉浸在静谧的氛围中，继续展开精彩的人生旅程。

 蒙古

蒙古是中国北方的邻居，这里的人以放牧为生，以草原为家，蒙古曾经是中国最亲密的兄弟，也曾经是中国最顽强的宿敌。

        元朝时蒙古族曾统治过中国，但于明初失去政权退回塞外。清朝时，蒙古各部逐渐成为清朝的臣属，不过，漠南（即今内蒙古）跟中国关系较密切，而漠北（即喀尔喀蒙古，或称外蒙古），则和清朝关系较疏远。1945年，中华民国曾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蒙古通过公投决定独立。不过，1949年民国政府在联合国通过《控苏案》，再次表明不放弃对外蒙古的主权。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49年10月16日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1992年，蒙古推行多党制，实行议会制，国名改称为蒙古国。

        7、8月是蒙古美丽而短暂的夏季，到了9月，蒙古开始飘雪，进入漫长寒冬，温度达摄氏零下40多度，常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5度。在自然环境与民族文化的影响下，畜牧业一直是蒙古的经济基础。不过，蒙古辽阔的大地之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自从9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矿业成了蒙古主要经济来源，也吸引了大批华商涌入蒙古采矿。

        蒙古地广人稀，国土面积156万6500平方公里，却只有区区260万人口，首都为乌兰巴托。在1956年蒙古人口普查时，华裔占了总人口的1.9%，而美国于1987年的报告则推测华裔人口占了2%，即约4万人。来自《中国侨网》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在蒙工作的华人超过万人，多在建筑领域。

    中国与蒙古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渊源。早在公元544年，蒙古先民室韦就曾经遣使东魏。1206年，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使蒙汉两族的命运从此交织在一起。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之下，蒙古族建立了庞大的帝国。1279年，南宋最后一支抵抗力量全军覆没，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全面统治中国，一直到了1368年，才被明朝所取代。

        因为戈壁沙漠以北的外蒙古并不适合农耕，所以早期很少华人移居到外蒙古。到了1725年，清政府勒令汉族农夫到蒙古种地囤粮，以协助清军对抗北方的游牧民族，此后，外蒙古的鄂尔浑（Orkhon）、土拉河盆地以及科布多（Khovd）等地才出现了汉族的聚落。然而，在清代到蒙古去做生意的华商却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些华商大部分都集中在库仑（即今日的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及科布多。他们长期在中蒙两地间频繁奔走，有者还娶了蒙古女子为妻。

        在苏联的支持下，外蒙古于1921年宣布独立，蒙古境内的上万华人成了排华行动的受害者。

        之后，随着蒙古的局势逐渐稳定，开始有一些华人农民、商人以及手工业者再次进入独立后的蒙古谋生。这段时期过来的移民以河北人和山西人为主。与此同时，苏联的势力操纵着蒙古政局，蒙古开始了俄化的过程。

在1950年代，蒙古迎来了另一波华人移居热潮。那时，中国政府为支援蒙古建设社会主义，于是征召数万工人到蒙古去协助基建工作。这一些工人大部分来自靠近蒙古的阳原县，他们携妻带子定居于蒙古。

        从1957到1959年，是蒙古最多华人移民的一段时期。这时的华人人数多达8000人，他们大部分集中居住在名为“一百户”的地方。

        1960年代，中苏关系宣告破裂，而以苏联马首是瞻的蒙古，与中国的关系也日趋恶化。当时的蒙古人对华人大多抱以仇视的态度，导致华工纷纷逃离蒙古。

        上世纪的50年代之前，多数蒙古华人是手工业者，如木工、裁缝、鞋匠、钟表修理师或银匠等，此外，也有商人、司机或工人等。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情况有所改变，大多数华人从事建筑装修业，一部分人则仍旧从事裁缝、种植蔬菜、司机、木匠等行业。

        1983年，蒙古再度发生了严重的排华事件，当时的蒙古政府指华人为社会寄生虫，于是大规模地驱逐华人，并不允许华人住在乌兰巴托，还计划在偏僻山区建立一个农村，将华人都安置到那里去。华人过去考察之后，发现那里环境太差，根本就不适宜居住，便大举迁回中国。

        今天在蒙古境内的老华人，就是那些当年留下来的华人及其后代。排华浪潮过去之后，蒙古政府没有再坚持要华人迁离，于是他们就一直留在乌兰巴托。其间，虽然蒙古政府不断积极地游说这些华人归化蒙古，但他们大部分还是坚持保留中国国籍。

        中蒙关系在1987年开始逐步恢复正常，加上数年后蒙古又实行改革，华人社会也逐渐恢复活力。华人成为中蒙经贸往来的重要媒介，处境自然也获得显著的改善。在90年代，这里的老华人开始开公司、办企业，经济实力已经大为提高。

甘登寺的清朝古鼎，见证了中蒙悠久的历史关系        中蒙两国陆地边界线长达4700多公里，两国人民皆可轻易进入对方国境。近年来，随着蒙古改革开放，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进入蒙古的华人，多得难以统计。根据《蒙古消息报》2008年的官方资料，蒙古有1819名侨民及3万2272名临时居留外国人。而这当中，高达90%是中国公民。

        华人大部分集中于乌兰巴托，还有部分华人散居在达尔汗（Darhan）、额尔登特（Erdenet）等地。这些华人中，70%祖籍为河北省阳原、怀安、万全等县和张家口市，其余则来自山西、内蒙古和山东等省份。

        蒙古共有两个华人社团。由老华侨组成的旅蒙古国华侨协会，是蒙古最活跃的华人社团。另一个则是2002年由华商成立的中华总商会，会员多是新移民。此外，蒙古也有一所旅蒙华侨子弟学校，提供小学至中学完整的课程，并受到当地政府承认。

        蒙古广袤无垠的大草原，给了无数华人辽阔而美丽的想象。可是，抱着这种美丽的梦想到蒙古的华人，恐怕飞机尚未着陆，幻想已先破灭。当飞机进入乌兰巴托上空时，乘客往下看，都看不见城市，因为整个乌兰巴托，已经淹没在层层烟霾废气之下。

        这也预示了华商们在蒙古的境况——前景难测，却也充满机遇与变数。

        从机场到市中心，道路坑坑洞洞，触目尽是简陋的房子与蒙古包。冬天时，从工厂到蒙古包，都冒着烧煤产生的黑烟，这便是空气严重污染的原因。

        蒙古基础建设很差，经常断水断电。市中心多座雄伟的俄式建筑，多已老旧失修。市内道路缺少修缮，而且到处塞车。虽然破车旧车不少，但豪华车子也很多，而且有的驾驶座在左边，有的驾驶座在右边，颇为奇特。这些景象，充分说明了蒙古社会正在经历着急剧的变化，改革开放造就了新兴的富豪，但整个国家仍有36.1%的人生活在贫穷线下，贫富悬殊。这里一切百废待兴，欠缺严谨的市场规划与法律规范，于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犹如剽悍的垦荒者，来此赌一把运气。

        蒙古商机蓬勃吸引来的华商高达四五千人。这些新移民挟着雄厚的资本而来，在蒙古的经济发展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资料显示，蒙古的中资企业有700多家，投资额占外企在蒙投资总额的一半。

        其中，建筑业是华商在蒙古最耀眼的行业。蒙古经济近年突飞猛进，对建筑的需求大增，乌兰巴托看上去就像一个大工地，到处都是建造中的民房与商业区。一般估计，蒙古几乎80%以上的房子都是中国人盖的。由于中蒙地理靠近，劳务输出方便，因此，不管投资方是否是中国，到最后施工的总是中国人多。他们生活在工地上，极少机会到外头走动，所以走在街上，很少看到中国人的身影。

        曾经，畜牧与成衣业等是在蒙华人热衷投资的项目。近年，随着蒙古大力推行改革开放，华商转而关注房地产、矿业与石油开采这些大项目。矿业是个一本万利的行业，不少华商在此掘到宝藏而暴富。可是，花了上百万美元购买采矿证和探矿证却被骗得精光的案件，也时有所闻。

        “蒙古商场尔虞我诈。以前中国人欺骗蒙古人，后来蒙古人也学精了，倒过来欺骗中国人。中国人更是欺骗中国人。”现代房地产公司的副总经理马工说，“不过现在情况比较改善了，慢慢有了规范。”

        “蒙古很像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不确定因素很多，办事效率也让人很头痛。”在蒙从事采矿与房地产已经3年的中国商人王孟泳说。因为国内市场饱和，又听朋友说蒙古矿业有发展潜力，他到蒙古考察了半年，并用几百万美元买下采矿权。矿业取得成功后，他又进军房地产。政策稳定是华商主要的忧虑，王氏说：“我最担心的就是蒙古政策有变化。中蒙关系如果发生变化，对我们这些华商影响很大。”

        纵横在蒙古这片土地上，过人的胆识、有力的人脉、灵活的手腕，缺一不可。

        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在蒙古打拼，来自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也在蒙古发展的黄金时期前来分一杯羹。在蒙古登记的台资企业有40余家，不过，仍在运作的其实只有十余家，长期在蒙古生活的台湾人约30多名。

        为了更好地协助台商在蒙古进行投资，鼓励台蒙双边贸易，“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在乌兰巴托成立了乌兰巴托台湾贸易中心（以下简称台贸）。台贸现任主任为古裕梁。古主任指出，2005年以前到蒙古投资的台商多是卫星电视、电脑买卖、纺织品生产等中小型企业。可是，由于纺织品配额取消，在蒙古设纺织厂已经失去优势，于是台商纷纷将生意转向大陆。2007年后，开始有台商在蒙古做房地产与采矿等大型投资，台蒙双边贸易近来突飞猛进。

        另外，蒙古也有约15名新加坡华人。新加坡大专学府莱佛士大学（Raffles University）和著名的虎牌啤酒公司（Tiger Beer）都在蒙古取得不俗的成绩。莱佛士大学蒙古分校于2004年成立。刚开始时，学院只有100名左右的学生。短短数年间，学生已增加到300多名，英语部更有200多名学生。目前，学院共有9名讲师，其中3名是来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莱佛士大学把在新加坡办学的成功经验完全移植到蒙古，令蒙古多了一所现代化与国际化的高等教育学府。

        蒙古人好酒，新加坡著名的虎牌啤酒很早以前就进军蒙古，并且销量颇佳。有鉴于此，新加坡总公司决定在蒙古设厂，以确保在蒙古销售的啤酒更新鲜，还可节省运输费、2006年6月，虎牌啤酒动工建厂，隔年正式投入生产。目前该公司共有两名新加坡籍和一名马来西亚籍华人职员，其他职员全是蒙古人。

        20世纪50年代，蒙古的华人移民人数达到高峰。他们在蒙古繁衍生息，如今已到第三代，约有2000多名。这批人与他们的后代，被统称为老华侨。

        当年，第一代华人赤手空拳到蒙古讨生活，经历亲华与排华两个时期，在两国的恩怨夹缝中求存，并寻求继续保存自身文化与身份，却又能融入主流社会的方式。凭着勤奋踏实的民族特性，几经艰辛，他们的生活逐渐安稳下来。尽管收入比起当年已经大为提高，这些老移民仍然不住豪宅，因为他们深明树大招风的道理，尤其在蒙古如此局势不稳的国家。

        一些精明能干、洞悉先机的老移民，已经借着蒙古经济开放的浪潮先富起来。现任旅蒙华侨协会会长白双占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胆大心细，在蒙古还未掀起掘矿热潮之前，就看准了一块宝地，向蒙古政府买下采矿权，掘出金矿。此外，他也开设肠衣厂，生产羊肠制成的手术线及香肠，充分利用了蒙古丰富的羊资源。

        随着中国在蒙古经济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老移民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桥梁优势。他们有丰富的当地人脉资源，对蒙古文化了如指掌，更没有语言障碍，在商场上无往不利。有了他们牵线搭桥，中国公司到蒙古投资利得多。许多年轻一代也开始自己做起中蒙贸易，或是在中国公司当翻译。

        这些老移民对中国感情深厚，坚持不加入蒙古籍。中蒙关系不好时，蒙古政府曾找过侨界领袖，希望他们鼓励侨民加入蒙籍，但愿意入籍的华人少之又少。不过，一些老移民自小在蒙古长大，对蒙古同样充满感情。“我出国时想念的是蒙古。想蒙古的亲友、饭菜。我也习惯吃牛羊肉，不吃蔬菜了，到了中国，还要回过头来想念蒙古的饭菜。”在襁褓时期就随父母到蒙古的白双占笑说。

        比起父母，年轻一辈的华人更加认同蒙古。白会长坦承，许多蒙古年轻华人，到中国只是办公事，办完了就回蒙古，对中国感情没那么深。在蒙古，年龄层介于20至30岁的华人青年约有五六百人。和蒙古青年一样，华人青年大多早婚，18、19岁就结婚生子的大有人在。华人青年虽然和蒙古青年感情很好，却很少和蒙族通婚，结婚对象一般还是选择华人，近来也有一些华人到中国寻找配偶，华人青年白庆坤表示：“那是因为华人和蒙古人风俗、习性、生活理念等都不一样。我们从小看到许多和蒙古人通婚的长辈都离婚，妻离子散，因此引以为鉴。另外，我们父母也不会赞成。“

        老移民一般都认为，他们这个独特的社群还是会维持下去，不会被同化。“没必要完全变成蒙古人。我们现在更占优势，蒙古和中国两边通吃。”老移民们说。

        老移民在1950年就成立了一个旅蒙华侨协会，其会员主要是长期居留在蒙古，但仍持有中国护照的华人。会长白双占表示，他们几代人之间都互相认识，只要是蒙古华人，就自动是旅蒙华侨协会的会员。

        多年来，旅蒙华侨协会积极投入公益事业，发展华文教育，并负起沟通华人与中国驻蒙使馆，以及向当地政府传达华人心声与建议的责任。每当中国国庆、春节等节日，协会都会搞活动庆祝，夏天时也会组织郊游团，让大家联络感情。一些老弱病残的华人生活有困难时，协会也会伸出援手。

        许多海外华人社团都面临领导层青黄不接的窘境。可是，旅蒙华侨协会却一直积极培育下一代继承者。一年前，协会正式成立了青年会，让35岁以下的华人青年加入。

        另一个较为活跃，亦较有规模的华人社团当属中华总商会。商会于2002年成立，会长为张春山。中华总商会共有100多名会员，主要来自企业界。

        中文媒体方面，蒙古仅有一份华文报刊《蒙古消息报》。该报的前身是蒙古工会出版的《工人之路》。1964年，蒙古通讯社接管该报，并更名为《蒙古消息报》。《蒙古消息报》是蒙古政府机关对外宣传的工具，除了宣传国家政策，也把新闻焦点放在中蒙两国的互动上。除了中文版，蒙通社属下还有英、俄、日几个外文版本。

        《蒙古消息报》一周出版一期，每份400蒙图，一年订阅费2万800蒙图。目前，该报发行量为1500份，订户主要是中资企业以及学习汉语的蒙古人。此外，该报也有少量海外订户，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内蒙、台湾、香港，都是在蒙古有生意的华人。不过，当地华人很少阅读《蒙古消息报》，许多华人甚至不知道这份报纸的存在。

        该报报社共有5名职员。现任社长密·娜仁扎雅年方30，毕业自蒙古国立大学中文系。其余职员，包括一名责任编辑、两名翻译及一名排版设计也全是蒙古人。社长娜仁扎雅透露，蒙通社未来会为《蒙古消息报》建立网站，内容全面上网，不过上网阅读须缴费。

     真正在蒙古生活、定居的华人，只有区区2000多人。这2000多名华人，传承中华文化与中文教育的决心却坚如磐石。

        1950年代，蒙古有一所华校——培才学校。当时，中国大力支援蒙古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两国关系空前友好。中国送来大批华工协助从事铁路、公路等基建。为了让中国工人的孩子有个念书的地方，中国援建了培才学校。该校建设规模在当时可谓数一数二。学校共有5座大楼，宿舍、体育馆、教学楼、食堂、礼堂一应俱全，体育馆还是当时蒙古最豪华的体育馆。后来，中蒙关系转恶，培才学校于1973年被蒙古政府收回，现在成了蒙古国立大学经济系的大楼。

        相比之下，旅蒙华侨子弟学校当初的处境要艰苦得多。该校创办于1955年，赵廷源为第一任校长，现为蒙古唯一的华校。当时，该校学生全挤在一所四合院上课。在蒙古漫长的酷寒冬天里，学生必须带煤带柴到学校来生火上课。直到2001年，在国侨办、中国驻蒙使馆、香港浸信会联会、侨协等单位的援助下，才建成了一所1440平方公尺的新校舍。旧校舍后来成了旅蒙华侨协会的会所。

        1998年，江仙梅出任校长后，大刀阔斧改革华侨子弟学校。首先，因蒙古90年代初掀起汉语热，学校广收蒙族学生，招生不再局限于华人子弟，江仙梅乃将学校改名为旅蒙华侨友谊学校。

        另外，在此以前，华人子弟就读的学校没有向政府注册，学生毕业后，文凭得不到政府承认。江仙梅认为华人要融入当地社会，必须要精通当地语言，了解当地文化，因此把学校改为双语制。改制后的课程完全按照蒙古政府的要求，并以蒙文为教学媒介语，但每周仍有11至15节中文课。

        友谊学校的毕业生可分别获得蒙古与中国都承认的毕业证，出路更广。许多华人子弟毕业后选择到中国留学，有的学生还进入北大、复旦等名校，成绩骄人。至于蒙古学生则多数选择在蒙古念大学。

        友谊学校分全日制和周末班。全日制提供由小学至中学的完整教育课程。周末班则让在蒙古学校念书的学生上汉语课。目前全日制学生共有504人，周末班学生则有114人。有趣的是，友谊学校发展到今天，华人子弟只占全日制学生的10%，就连周末班也仅有半数是华人子弟，余者皆是蒙古学生。当地约有一半的华人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或蒙古学校，        另一半则把孩子送到友谊学校。送孩子到蒙古学校念书的家长，一般都把孩子送到周末班学汉语。

        蒙族学生的父母，许多都跟中国人有生意往来，知道中文的重要性，才把孩子送来。蒙族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会对中国产生感情。不难预见，这些学子将成为蒙族与华人友谊的桥梁。

        友谊学校的学费每年50万蒙图，在当地收费较高。可是，学校不获任何补贴，经费全由自己承担，学生缴交的学费，仅够付教师薪水及应付各项杂费。友谊学校还面临校舍不足的问题。因为课室不够，学生必须分为上、下午部，每年还得拒收30至50名学生。不过，江仙梅校长表示，华人学生一定优先录取。

        盖一座体育馆，成了江校长的心愿。“体育馆除了上体育课，还能办活动，如节庆、周会等。每次学校办活动，都因为地方太小，必须把学生分成几组。”江校长无奈表示。

        “我热爱中华文化，坚持办华文教育。我虽然没在中国受教育，但能说这样的汉语，已经该满足了，我会尽自己的绵力，给下一代创造机会。”江校长短短的几句话，说出了许多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者的心声。

      台湾儿童暨家庭协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家扶）隶属国际性非政府非盈利组织家扶联盟。蒙古是目前台湾家扶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直接服务当地社区的国家。

        家扶基金会蒙古分事务所代表李桂平介绍，家扶中心2004年在蒙古成立，共有22名工作人员，4名是台湾人，其余都是蒙古人。“在家扶工作的这些台湾人，都是志愿过来的。他们来到这块发展落后的地方，不是为了钱，可说全是为了一股热忱。”他说。

        家扶有两大工作，其中之一是社区工作，包括设立饮水器，让蒙古贫民有干净的水喝。他们也出资协助蒙古建立幼稚园，虽然家扶不参与直接管理，但却规定幼稚园只能录取贫穷儿童。此外，他们还建立了家扶村。村里有25个蒙古包，约100人左右，村民多是单亲妈妈。家扶给他们提供技能培训，等他们能自立后，鼓励他们向政府申请土地，并送他们蒙古包，让他们自力生。

        此外，家扶也进行经济扶助工作，每个月发放5000蒙图给贫童。约有4000多名儿童在这项计划下受惠。本来蒙古人对这些远道而来“到处派钱”的台湾人心存怀疑，可是，在家扶中心的努力下，他们疑虑渐消，相信这个公益团体，确实是真心扶助蒙古贫民的。

      蒙古对华人的政策随着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影响时有变化。蒙汉两族关系时好时坏，移居蒙古的华人，在历史的巨轮下颠簸前进，身不由己，唯有小心翼翼地活着。

         到了二十一世纪，蒙古华人的处境渐露曙光。虽然华、蒙两族之间的关系仍然有待改进，可是，随着社会的开放与发展，中蒙两国经贸上的合作，必定越来越密切。蒙古华人期望，偏见与仇恨，将如蒙古严冬的积雪，在夏天初升的旭日下，慢慢消融。

 尼泊尔

这个位于南亚的高原小国，境内岗峦起伏，地势错落，耸立着8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巍峨高峰，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就蜿蜒在尼泊尔和中国两国的边界上。

         作为古代亚洲主要的交通枢纽，它是商旅、香客们往来印度和中国的必经之路。今天，中、印文化仍深深地浸透着这块充满灵气的神秘土地。

         尼泊尔以农业为主，工商业发展缓慢而落后，属于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列。20世纪90年代，尼泊尔开始实行“自由、开放和出口型”经济政策，以吸引外资。然而，政局动荡、基础设施简陋，收到的效果却差强人意。

         目前，尼泊尔正积极推动旅游业，寄望那天赋的清奇胜景、幽古的人文气韵，再加上世界第一高峰的魅力，能招徕世界各地寻幽探胜的旅客，一同沉醉在古国的魅力之中。

 尼泊尔与中国号称千年友邦。尼泊尔的学者称，自6世纪以来，西藏便已是尼泊尔人进行商贸往来的主要对象，和中国的外交关系也极受重视。早在盛唐时期，两国之间的往来十分频繁，当时，尼泊尔的赤真公主千里迢迢地来到西藏和赞普松赞干布联姻。唐玄奘西行求法时，也曾经遍访尼泊尔各地，包括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之地兰毗尼。

         到了元朝时期，尼泊尔著名的建筑艺术家阿尼哥远赴元朝的都城大都，监造北京白塔寺，这不只让他官运亨通，而且还名留青史。

         200多年以前，尼泊尔王国成立首个外交部门，主要任务便是处理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后，尼泊尔也成了唯一在西藏的拉萨设有总领事馆的国家。

         1955年8月1日，中国与尼泊尔正式建交，使这一段源远流长的友谊更上一层楼。作为友好邻邦，从1965年开始，中国向尼泊尔提供了多次的无偿援助，且承担尼泊尔数十个发展计划的建设。中国的物资援助包括了卡车、无轨电车、粮食以及食盐等，这些慷慨义举，深入每一个尼泊尔人的日常生活中。在尼泊尔，那曾经举办不少大型国际会议的比兰德拉国际会议中心、农民浇灌庄稼的灌溉系统，以及加德满都最为重要的环城公路，都是在中国的援助之下营建起来的。

         长期以来，华人陆续到尼泊尔来投资，当中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商特别多。他们终日奔波于中尼两国之间，但是真正定居于尼泊尔的华人其实并不多。

         尼共总书记尼帕尔就曾经指出：“长久以来，尼泊尔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一直都是深刻、全方位并且扎根在人民心里的密切关系。”在当地人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家，而中国人则是最受欢迎的朋友。

         今后，尼、中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仍然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尼泊尔十分欢迎中国的商家们到这里来创建合资企业，让双方继续携手走向美好的明天。

   据官方统计，尼泊尔的华人有5万名左右。其中有九成多是持难民身份的藏族人。扣除了使馆和中资公司人员后，真正在尼泊尔生活的汉族华人只有1000名左右。他们主要来自青海、山西及四川等内陆省份，大多聚居在加德满都、博卡拉（Pokhara）这两个城市。

         当地华人主要从事贸易、餐饮、旅游、服装、中医、食品加工及建筑等行业，其中也包括那些在尼泊尔服务的华语教师、医师。跟当地人相比，华人的生活水平较高。

         在华人眼里，尼泊尔就像一颗未经雕琢的蓝宝石，有无穷的价值蕴藏其中。许多华人来此有一个明确的动机，就是挣钱，因此他们大半持商业签证逗留下来。经商之外，有些华人也在尼泊尔找到了另一半，于是在此安下了家，孩子也就在中尼文化的熏陶下长大。

         目前，仍处在发展阶段的尼泊尔华人，除了在经济领域小有成就外，其他方面的发展仍一片空白，在当地未成气候。不过，随着中、尼交往日益密切，来投资的华商越来越多，华人在尼泊尔的发展潜力令人瞩目。

   有部分华人，将尼泊尔视为进驻印度的一个驿站，在当地市场仅作牛刀小试，刺探行情而已。然而，有些华人却将尼泊尔当作生意基地。他们多数以进出口贸易开启尼泊尔的创业生涯。他们奔波往返于中、尼之间，在当地考察市场、经营生意。这个可能令他们发达的地方，却一般不会成为他们的家。个个华商心底抱定的想法是：生意能做就做下去，做不下去就卷铺盖走人，另谋出路。

         他们大多来自四川，在西藏樟木往往拥有稳定的家族生意。家人负责在樟木口岸把关，他们则到尼泊尔开发新市场。尼泊尔人谈不上富裕，但购买能力不错，渐渐地，也就留住了华商们的脚步。

         中国80年代开放初期，不少商人将中国的食品、杂货及电器等引进尼泊尔。近年来，竞争开始激烈，生意也越发难做了。许多与华人合作的尼泊尔人，在多次随同华人到中国去办货之后，自己也摸熟了贸易的门路，转而成为华商强劲的竞争对手。

         在尼泊尔耕耘多年，华商已成功开拓了庞大市场，中国电器如“美的”、“康佳”等品牌在尼泊尔非常红火，连当地人所吃的苹果、骑的摩托车等，都基本来自中国。近来，加德满都还开设了“中国商品城”这个大型的综合购物中心，占地一万多平方公尺。架上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大半源自中国。

         在当地，餐饮业是华人发展得最蓬勃的行业，入行的门槛也最低。随着尼泊尔的华人游客和投资华商逐年增加，无形中刺激了中餐的勃兴。其中，加德满都的金牛餐馆营业超过十年，吸引了无数中国使馆及中资公司的人员。如今，华人的中餐馆已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加德满都、博卡拉的大街小巷。

         讲究效率的华人老板，遇上了尼泊尔人这群慢郎中，往往叹息不已。大部分老板不是亲自掌厨，就是从中国招聘主厨。一名华人厨师洗、切、煮、炒都一手包办，20人的饭菜，半个小时便能利落上桌。若换作是尼泊尔厨子，客人可能要第二天才能用餐。

         随便翻开一本旅游手册，对尼泊尔总是满纸的赞叹，字里行间尽是迷人的描绘。然而，悠闲旅客的短暂陶醉，跟华商长期落脚当地所尝尽的滋味儿，完全是两码事。

         加德满都是尼泊尔华人最多的地方。十年前到达的前辈感叹，当时的加德满都悠闲从容、人口适中，是一个美丽的都市；今天，这里人口飚升了十倍，但基础建设却没有随之改善，结果它成了一个拥挤、脏乱的城市。

         尼泊尔并没有特定的华人住宅区，他们大多租赁当地人的房子，住在斑驳的木板、黯淡的石灰搭建成的房子里，屋内设施陈旧而简陋。一些经营旅馆、餐厅的华人，干脆就住在店里；经济较好的，则住在尼泊尔的高级住宅区里，错落有致的小洋房，精致而美观。

         生活在当地的华人，常常会受到种种困扰。这些困扰，渗透在生活小事当中，譬如洗澡。尼泊尔天气寒冷，有时达到零度以下。尼泊尔人可以咬咬牙，往身上浇淋冷水，或每星期只洗一次，但华人无法完全仿效，每当想洗个热水澡时，往往要大费周章。由于尼泊尔的热水供应器多用太阳能，如果当天不见太阳，家里也就只有冷水。虽有电热水炉备用，但因供电不稳定而经常无用武之地。

         提到尼泊尔严重的停电问题，当地华人往往大摇其头，心中万分无奈。他们对于当地的停电时间表，要比九九乘法表还要熟悉，否则生活作息必定大乱。除了停电，旱季还有停水的苦恼在等着他们，连用水也得小心翼翼，惜水如金。

         近几年，动荡的政局也扯痛了华人的神经，常有华人向驻尼中国大使馆求救。尽管外国人都不易在当地的动乱中成为代罪羔羊，但由此而来的担惊受怕，却是免不了的。此外，频频发生的罢工事件，也给华人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生活烦扰一言难尽。

         最显著的问题，就是罢工经常影响能源供应。加德满都及一些周边城市，常常一夜之间陷入燃料荒。汽油、柴油、煤气一下子都没了，路边停满了因缺油而瘫痪的车子，抢购燃油的人潮触目惊心。华人为了购买燃料，往往通宵大排长龙。经营餐馆的，煤气不可缺少，可怜的老板无计可施，只好将钞票大把地抛向黑市换取煤气供应，忍痛撑持着。

         然而，当地人友善、相敬如宾的态度，多少抚慰了华人于异域中的惶惑，烘暖了他们在忧患中受寒的心。

华人和尼泊尔人之间，虽无法完全跨过语言障碍和文化隔阂，然而一旦生活在一起，却总是守望相助、和睦共处。尼泊尔人的性情中，最令华人欣赏的就是温和及耐性，当地极少看到争吵、打架的场面。因此，尼泊尔政局虽然动荡不安，但社会治安却并不很混乱，华人终究还能拥抱一片和煦的安然，用心地生活。

         在这印度教盛行的国家，日常生活中有着形形色的宗教活动。华人的宗教观念虽然很淡，但好奇心却很浓。因此，初来乍到的华人，对于当地人友好的邀约，总是来者不拒。于是，他们不是天天忙着出席尼泊尔人的婚礼、宗教庆典，就是走访于尼泊尔大大小小的印度庙宇之间。

         不过，居住时间长了，初来的兴奋之情，就渐渐化为司空见惯的平淡。平日下班后，华人没有什么休闲活动。在没有卡拉OK、电玩中心等休闲场所的尼泊尔，他们的夜生活除了聚餐，就几乎没有其他娱乐。在这里，即使周末、假日，华人也没多少地方可去。

         除了日常生活的平淡，尼泊尔的华人圈中，也缺乏让大家热闹起来的喜庆活动。幸好，加德满都还有一家赌场，让华人在闲暇时还能去小赌怡情一番。否则，就只能邀三五好友，到家中打打牌、搓搓麻将，大不了再聚聚餐、逛逛街，或到当地的风景区去走走看看，生活可谓平淡如开水。

         然而，如果遇上了华人、尼泊尔人通婚的婚宴场面，就一定特别热闹。华人亲友白天出席尼泊尔式传统婚礼，晚上则参加人数过百的中式婚宴，宾主同欢共醉，往往兴尽而返。至于白事，尼泊尔华人一旦去世，家人会将遗体火化，将骨灰存放在家里，只有简单的仪式，并不张扬。

         即使最重要的春节，尼泊尔华人也没有盛大隆重的庆典，只会在过年期间，和亲友聚餐，简单地庆祝一番，华人之间也会轮流请客。一名华人说，每逢春节，他们一家人从初一到初八，都忙碌地出席朋友们的聚餐和联谊。身在异乡，华人的友谊变得更加真挚、更加牢固。其他节庆则是悄然地溜过。

         唯一值得欣慰的，就是每逢春节及中国国庆节、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都会举办庆祝活动和聚餐会，让漂泊海外的华人同胞，可以相聚一刻，共享丰盛的中式大餐，欣赏充满中华气息的文娱表演，在异地携手迎春

         尼泊尔华人总是难得与家人团聚在一起。为了教育，许多父母必须和孩子们分隔两地。由于尼泊尔的教育理念与华人大相径庭，华人父母多将孩子送回中国读书，交给亲友看顾，夫妻俩则留在尼泊尔打拼。

         华人对教育态度务实，强调按部就班及效率，希望孩子毕业后，能练就一身看家本领。尼泊尔的教育方式却很随性，孩子学习过程充满乐趣，但未必能看到具体的成绩。

         尽管对尼泊尔的教育不放心，但华人却普遍认同，这里是个学习英语的理想环境。英语作为尼泊尔的官方语言，使得这里几乎人人都能以英语沟通，塑造了一个广泛使用英语的大环境。

         至于中尼通婚的家庭，则多让孩子留在尼泊尔学习。在尼泊尔学校里，学生主要学习尼泊尔语及英语，华语则在家靠父母或补习老师的指导。由于缺乏完善的中文学习环境，因此有许多中、尼混血儿，即使能操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却往往一个华文字也不识。

         目前，正规的中文教育，仍在尼泊尔等待发展的机会。2005年，第一批来自中国各师范大学的志愿教师不远千里而来，走进尼泊尔各大中、小学校去教导中文。这些志愿教师，在教学上面对不少考验，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中文课本的短缺。学生们只能一字一句地抄写老师所教的内容。上课时，师生们在黑板及作业本上，认认真真，一笔一画地抄写。

         除了在尼泊尔开展中文教学，志愿教师们也联合一些当地团体，筹办许多有趣的文化活动，如“中国节”、“中国语言文化日”等，促进中华文化的普及，意义非凡。他们希望能在尼泊尔掀起一股汉语热潮，为尼泊尔人打开一扇通向中华文化的大门。

         尽管在尼泊尔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播不容易，但这群年轻的教师却不轻言放弃，有些还申请留任，继续奉献。他们被看作是华人和当地人之间的文化使者，在尼泊尔展开了不一样的人生。

有很多华人，一开始的想法都是挣够了钱，或在市场不景气时就马上走人。然而，尼泊尔也并非坏到呆不下去的程度，那些还过得去的华人，也就一年年的留了下来。只是，华商们始终抱着落叶归根的想法，往往认定自己是尼泊尔的过客，总有一天是要回家去的。

         能改变华人“归根”初衷的，或许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在尼泊尔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半，“归根”的定义，也就有所不同了。

         华人若在尼泊尔安了家，心也就在尼泊尔扎了根，从此不离不弃。

         由于种姓制度观念在尼泊尔社会牢不可破，因此中尼通婚不但罕见，也特别珍贵。目前，当地中尼通婚的例子虽然不多，但基本上家庭幸福、生活美满。这些通婚家庭，大部分都有了第二代，甚至已经三代同堂了。

         华人男子娶了尼泊尔太太后，多半都自组小家庭。在父亲的影响下，孩子往往对华人的文化、身份都有强烈的认同。然而，在生活习惯、语言方面，母亲的熏陶则有更重要的影响。

         尼泊尔语是孩子的母语，孩子从小就跟随母亲，参加当地的宗教庆典。耳濡目染之下，不少中尼混血儿尽管肤色、长相像极了华人，但言行举止、生活习惯和打扮等，却极像尼泊尔人。中华文化对他们来说，既亲切又陌生；可尼泊尔的一切，却是从小就融入了他们生活的每一天。

         不过，如果是华人妇女嫁给尼泊尔人当媳妇，情况就有所不同。尼泊尔家庭保守而传统，儿子要讨外籍媳妇，就仿若要闹家庭革命一般，是件伤筋动骨的大事。多年来，不少到中国留学的尼泊尔男子，虽与中国女同学谱出恋曲，但成功踏上红地毯的却不多。一般而言，只有那些教育程度较高的尼泊尔家庭，想法开通，较能用平常心去接纳华人媳妇。

         远嫁尼泊尔的华人妻子，几乎都要学习融入丈夫的家庭，与公婆同住。尼泊尔人家庭观念极强，即使结了婚，儿子们仍需与父母、兄弟姐妹同住一个屋檐下，十分热闹。于是，华人媳妇要面对的，往往就是这么一个一家老小济济一堂的大家庭。

         如果嫁到经济条件较优渥的尼泊尔家庭，华人媳妇就不需要为家务操心，家中自有佣人负责打理，且会为一家大小准备三餐。简单来说，华人媳妇最主要的任务，是学会如何与尼泊尔家人和睦相处，并快乐地生活在这个由尼泊尔文化主导的新家庭中。与此同时，举凡尼泊尔的大小宗教庆典、传统服饰及食物等，新成员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融入。

         在教育方面，华人母亲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她们一般会教孩子一些简单的中文词语，如果丈夫也曾在中国留学，那中文就有可能成为家人沟通的语言。逢年过节，他们也会为孩子添购一些华人的传统服装。在成长过程中，孩子因为受了母亲的影响，尤其能感受到自身中尼混血的独特身份，也对中华文化有了一份微妙的感情。

亚公原名叶孟新，来自印度的大吉岭，在尼泊尔度过了悠悠40年岁月。现年74岁的他，每天准时到自己开设的“亚公中国鞋店”工作。亚公回忆，1962年中印战争之后，印度富裕的华人都移民到欧美，囊中羞涩的他则因为太太是尼泊尔人，就带着妻小移居到这儿来。

         在尼泊尔小小的华人圈子里，一提起“亚公”的大名，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学徒生涯结束后，他开设了营业至今的“亚公中国鞋店”。鞋店规模不大，还保持着当年的模样，每天可生产十双手制皮鞋，月入两万卢比左右。一如典型的华人，他大部分时间都手脚不停地忙碌着。尽管过了退休年龄，亚公还是一星期做足7天，每天做足12个小时。

         忆起尼泊尔生活的点滴，他不但没半句怨言，还表示喜欢这里虽不富裕，却很安定的生活。善良淳朴的尼泊尔人，从来没有排斥过他，彼此结为好友的很多，一点也不寂寞。

         除了流利的华语，亚公的印度语、尼泊尔语也是很棒的。因此，“老叶翻译”是他的另一个身份，专为那些到尼泊尔投资的中国人当翻译。他乡遇见华人同胞，亚公总是非常高兴，彼此往来的信件他也一一珍藏。他偶尔也到佛教道场当翻译，让信徒能突破语言障碍，一同修行。

   在尼泊尔，一件不起眼的小东西，往往都有意料之外的商机。

         例如华人爱吃的豆腐，这种方方正正、白白嫩嫩的普通食品，在这里竟大有市场。尼泊尔人之前不知豆腐为何物，于是华人在此设厂，用简单技术制造出新鲜的白豆腐，如今已成为尼泊尔人的日常食品。在生意上，华人总是走在前端，除了引进新器材，更增制种类繁多的豆腐产品，把尼泊尔的这条商路继续深拓下去。

         此外，许多国外流行已久的小玩意，华人也陆续引进了尼泊尔。例如来自中国的大头贴机器，就摆在人来人往的商场中，受到年轻人的追捧。拍一次要价150卢比，约是在尼泊尔两顿饭的消费，但年轻的情侣、好友们花得毫不心疼。结果，一部小小的机器，竟曾创下一个月4万卢比的盈利，超过尼泊尔普通国民一年的收入，令人刮目相看。

         在加德满都，有两家华人经营的美甲中心。这个由日本人发起的美容热潮，是华人率先引进了尼泊尔。爱漂亮的尼泊尔妇女对美甲非常好奇，纷纷在尝试之后，深深爱上了它！华人美甲店所需空间小，设备也很简单，只提供基本的美甲服务，但天天门庭若市、顾客不断。如今，还有些当地女性要求老板娘开班授艺，亲自传授呢

   尼中两国往来日趋频密，在两国政府的友好合作下，似乎有更多的商机，陡然展现在华人的面前。

         然而，在这个高深莫测的国度里，华人老像是局外人。经济和生活上，总隔着一层无形的屏障。「永远都搞不懂他们的价值观，还有那宗教的热忱。」华人摊摊手，耸耸肩说。

         没人能预言，尼泊尔的华人社会何时才能形成。也许，中尼通婚家庭混血的新一代，将成为华人在这氤氲古国中悄然勃兴的起点。

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以下简称吉国）和中国的共同边境长达1100公里，两国之间虽然有高耸入云的天山作为屏障，却阻隔不了两国人民互相迁移。

        吉尔吉斯曾是突厥汗国的一分子。840年时，吉尔吉斯族攻灭回纥，建立汗国。他们曾与西藏和阿拉伯势力组成联盟，阻挡了唐朝势力入侵。10至12世纪，在黑汗国的统治下，伊斯兰教在中亚迅速传播。随着成吉思汗的崛起，中亚被蒙古人统治达数个世纪之久。直到1758年，清政府打败卫拉特蒙古人，此区域始落入清政府势力范围。

        19世纪，沙俄势力伸入中亚。1918年，苏联成立。1924年，在民族划界的政策下，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成立，加盟俄罗斯联邦。1936年升格为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91年8月31日，吉尔吉斯正式宣布独立，改国名为吉尔吉斯共和国。独立后，吉国政局仍然动荡不安，阻碍了经济与社会发展。

        吉国有四分之三的国土位于海拔1500米以上，畜牧业是主要产业；此外，农业也是吉国的经济支柱，主要作物包括小麦、甜菜、棉花、烟草、蔬菜及水果。吉尔吉斯有丰富的矿藏，唯缺乏石油和天然气。1990年代以前，98%的吉国产品出口到苏联其他地区。苏联解体后，吉国丧失广大市场，经济严重萎缩。1998年吉国经过经济改革后，加入世贸组织。近年吉国经济稍有好转，政府也意识到吉国山水优美秀丽，开始大力发展旅游业。

      有史学家推测，诗仙李白的出生地碎叶，就在今日吉国境内的托克马克（Tokmok）附近。碎叶古城是唐朝的安西四镇之一，也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丝绸之路南北两条路线，皆在碎叶这个地方会合。自古以来通过丝绸之路而进入吉国，就此停驻下来并成为当地一分子的华商，不知凡几。

        清朝后期，宁夏、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回民起义反清，被左宗棠采取强硬的手段加以镇压。回军于清廷的围剿之下节节败退，为免被赶尽杀绝，回民分三批出走中亚。1877年，回族将领白彦虎以及其他将领，带领了千多人至3000多人不等的陕西、甘肃回民，在楚河的两岸定居下来，吉国的托克马克附近正是其中一个主要聚居点。1878年，又有千余名新疆与吐鲁番的回族从中国逃了出来，并在吉国南部的奥什居住下来。

        1879年，4000多名回民由新疆伊犁区进入中亚，并选择在哈萨克斯担的阿拉木图附近，以及吉国的伊塞克湖定居。这些移居的回民后来被称为“东干人”。

        这些进入中亚的回民不但没有遭到驱逐，他们后来还得到了俄国国籍。然而，他们没有资产，加上语言不通，刚开始的时候，生活并不好过。所幸这些回民都是庄稼能手，他们从中国带来了不少蔬菜与农作物的种子，辛勤地开荒种地，不但丰富了中亚的蔬菜种类，而且还把相对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中亚来，贡献不小。

        此后，这批回民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从20世纪初中亚反抗沙皇的统治，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再到二战时期阻止德军入侵，他们都积极地参与。其中，由回民马三成所组成的东干骑兵团更是威名赫赫。他们已经被当地社会所接受，甚至被视为多元民族社会的一部分。

        近代，从中国移居到中亚的汉族、吉尔吉斯族、维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也不在少数。他们大部分是为了谋生而来到此处，譬如在沙俄时期、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就有大量的华人劳工进入中亚，修筑铁路、建设基础设施。1962年，中国的伊犁和塔城地区，有大批居民外逃至苏联，史称伊犁事件。当时出走的华人人数高达6万余，他们之中后来定居于吉国的不在少数，并且形成吉国早期的华人社会；他们遍布各行各业，他们大多从事农业生产，也有许多人从事买卖。

        与当地人民一样，早期华人在这个历经磨难的国家之中成长、壮大，对吉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吉国到底有多少华人？是个连驻吉国中国大使馆也说不清的问题。据中国大使馆表示，他们能掌握的数据，就是去年共有1万2000名中国人搭飞机入境，而从陆路过来的则更多，估计每年有2至3万中国人入境。他们多数只持有旅游或短期签证，却逾期逗留在吉国赚钱讨生活。在吉华人中，福建人占了约三分之一，河南与新疆过来的也很多，此外，东北人也有一些；非法劳务则以陕西人居多。中国大使馆的领事粗略估计，吉国约有4万名中国籍人士。

        如果加上早期即从中国到吉国定居，并已入籍吉国的回、维、吉等少数民族，那更是难以计数。有资料显示，维族、回族（即东干人）已达17万之众。早期过来的少数民族华人各自成一群体，维族居住在该国的11个维族村，回族散居托克马克、小葫芦（Sokuluk）、亚历山多夫卡（Alexandrofka）、肯北洛夫（Kenbelov）和密梁川等地。他们成立社团、自己出版刊物，早已把吉国当成他们的家园。

        近期赴吉的华人虽然也有活跃的华人社团，可是，对大多数新移民来说，吉国毕竟只是个赚钱的地方，并无长居的打算。

爆发郁金香革命。

        近几年，一切乱象渐渐稳定下来，吉国经济与和平渐有起色，随之而来的，正是滔滔而至的华商。

        时代的巨轮轰隆碾过，在吉国首都比什凯克留下了数不尽的时代见证。采颐大道（Chuy Prospektisi）上，阿拉图广场、国家博物馆、音乐厅等俄式建筑，还有比比皆是的铜像，气势恢宏。可是，市区内的建筑以及道路，却大多老旧失修。而且，这里通讯与其他基础设施差，断水断电是家常便饭。和距离区区180多公里的哈萨克斯坦城市阿拉木图相比，比什凯克显得落后许多。

        不过，2008年的比什凯克和数年前比较起来，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华人虎玉梅回忆1999年刚到吉国定居的情况时说，比什凯克当时非常落后贫穷，城里没有多少商店，商店里的货架全是空的，街上空荡荡，毫无生气。每逢星期六、日，市区更成了空城，因为市民多来自乡下，一有假日就全都回乡去了。

        如此生活环境难免寂寞，可是，却是个赚钱的好地方。吉国17年前刚独立时，新疆一名年轻人白玺眼见到中国探亲或旅游的吉国人，回国时必带一台冰箱回去，心里便琢磨吉国的市场肯定不错。亲自到吉国一看，那里果然物价高昂，无论从中国发什么东西到吉国售卖，利润都能翻倍。于是，他毅然跑到吉国发展，成了吉国独立后最早进入的中国人。他曾在吉国做钢材生意，也开货运公司。

        “这里做生意与居住的环境都很不错，华人来了之后都不想走了。”白玺笑说。1994年，白玺还开起了餐厅。目前，他的北京餐厅是吉国规模最大的中餐馆，也是当地中餐馆里唯一的一级餐厅。吉国举行六国会议时，江泽民、钱其琛都在这里用餐。

        像白玺一样最早进入吉国的华人掌握先机，都赚了不少钱，在吉国打下了稳固的基础。近年来，越来越多华人进入吉国，可说中国各省市的人都到齐了。吉国矿产丰富，许多大型企业皆被吸引而来。中石油、中石化在此进行勘探，最近，华为也进来了。中国的建筑公司也不少，此外，中国政府也在托克马克投资造纸厂。

        不过，更不可忽视的是众多勇于闯荡的民间华商。这些小商人有的在此把原材料出口到中国，有的从中国运货过来做贸易。2004年，哈萨克斯坦开始严重排华，大批华商转到吉国发展。曾经，哈国的巴拉霍可是中亚最火红的批发市场。如今，吉国的中海批发市场，已经取代了巴拉霍可的地位，邻近国家的小商人都前来中海办货。中海的华商高达2000人，他们在此批发各种各样的货物，从电器、药品、化妆品到装饰品，不一而足。中海附近的多利多义，则是服装批发市场，华商也很多。

        此外，吉国还有一个叫“大唐”的购物商场，也聚集了200家左右的中国商户，主要以零售业为主。很多在中海做批发的华商，都在大唐租个单位兼做零售。

        据新疆阿凡提物流公司吉国代表曾庆贺的统计，单是大唐就有五六家物流公司。而中海的物流公司更有上百家，由此可见吉国华商的盛况。此外，吉国南部的奥什市也有5000至6000华商，以福建莆田人居多。

        像沈玉贵这样跟着货物跑的华商不在少数。他们这几年在吉国确实赚了不少钱。然而，政治的不稳定，是华人最大的隐忧。2005年，吉国发生郁金香革命，总统被推翻，全国呈现一片无政府状态。不管是中国人、土耳其人还是其他外国人开的商店，一律被打、砸、抢。2006年，吉国两度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中海被迫关门3天。由于这层因素，许多中国大企业到吉国考察后，最后都决定不投资。

        “如果我是大老板，我也一样只会在这里做灵活、短期的投资。中长期的投资行为如涉及固定资产、厂房建设等的投资，我不会去做。因为这里不稳定，投资环境也对外国人不利。在这里投资啊，进来容易出去难。”曾庆贺语重心长地表示。

        近两年，华商开始抱怨在吉国经商利润越来越低，以前可赚30%，现在只能赚15%或以下，甚至面临赔钱危险。

        问他们是否会在吉国就此安定下来，他们全都摇头。明天会在哪里？回国，或是另一个天涯海角？他们不知道。也许继续跟着货物跑，哪里更有利可图，他们就会出现在哪里。当他们觉得累的时候，自然会找一处叫“家”的地方停靠。

在中亚五国中，唯有吉国的华人社团得以蓬勃发展。

        早在1991年，一群60年代到吉国、已经失去中国国籍的老华人，就办了一个吉尔吉斯华人协会。该协会当时共有会员300多人，成立至今，换过3任会长，第一任会长李德昇，第二任会长汪民昇，第三任会长石作山。由于老华人们年事已高，而年轻一辈的又不愿意接任，协会面对青黄不接的问题。

        2001年，另一个华人社团吉尔吉斯斯坦华侨协会成立了，会员是仍然持有中国护照，较晚期才到达吉国的新移民。2003年，会长白玺找上有丰富侨务与社团经验的华人

        虎玉梅出任常务副会长。虎玉梅为协会写章程，召开会员大会，并设置了各个机构，令协会正规化。

        后来，在中国大使馆的建议下，两个协会于2004年合并，成为吉尔吉斯斯坦华人华侨联合会。在联合会下，维、吉、回、汉、俄5个民族都有一个副会长，联合会会长由白玺出任。

        联合会在友谊宾馆租了一间办事处，虎玉梅天天在那里为华人处理问题。她表示，新移民还是以小商人居多，由于法律常识不足，常在吉国碰上问题，譬如护照被没收，被人欠货款、受骗，货物被扣押等等。

        为了提高新移民的法律常识，联合会每年召开两三次大会，请专人给会员讲解法律知识。联合会和中国大使馆配合无间，也是当地护侨工作做得特别好的原因。

        至于老华人，许多辛劳一辈子，老来生活条件还是不太好。联合会充分体现了华人孝亲敬老的精神，经常组织会员捐钱，给家境贫寒的老华人买油买米修房子，每年给贫困华人送救济金。

        联合会也曾经办过一份《华侨报》，请来一名当地老华人当编辑，再请一名留学生当采访记者。可惜，《华侨报》因为经费问题而停办。联合会后来曾和新疆《经济报》联办《华侨报》，由于对当地缺乏深刻了解，内容不符合侨民兴趣，因此回响不大。

        2005年12月，吉国发生了一宗震惊华社的事件。一名从伊犁来吉生活已有十多年的华人刘柄超，住在比什凯克附近的一个小镇，平时种地为生。由于该年农作物歉收，刘柄超到比什凯克买机票想把妻儿送回国，却被人打成重伤，送院不治身亡。刘柄超家境贫寒，连治丧的经费也无法筹措，刘妻于是找上华人华侨联合会，向虎玉梅哭诉其遭遇。

        虎玉梅立刻写了一纸文情并茂的文告，影印后找来其他理事、副会长帮忙分发，吁请华侨解囊相助。文告一发出去，马上有人打电话捐献，3天内获3700多美元捐款。“当时，连一名货物被抢、断了腿的小伙子也来捐款，虽然只有20多索姆，却是他一天的饭钱。”虎玉梅回忆当时情况时表示。

        联合会顺利为刘柄超筹办了丧事，买棺材，并把遗体运回中国。在追悼大会上，虎玉梅念了悼词，感谢与肯定华人团结互助的精神，场面动人，许多人热泪盈眶。吉国华人本来如一盘散沙，这件事可说是改变吉国华社精神面貌的转捩点。它大大刺激了吉国华人的自豪感，也把吉国华人团结起来，令大家领悟到，人在异乡，唯有发挥互助的精神，才能度过种种难关。

     在吉国的大地上，住着一批既谦卑又骄傲的回民。130多年前，他们为逃避清军的追剿而进入中亚。多年后，又有更多回民因为政治迫害流亡中亚。这批回民从最初的数千人，开枝散叶，发展到今天，已有6万人左右。虽然仅占总人口的1.1%，可是，他们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民族特性，并没有被主流社会同化而消失。

        在人口普查中，他们被称为“东干人”。有一种说法，指回民从前住在黄河东岸，因此东干是“东岸”的变音。可是，他们更喜欢自称回民。世世代代，他们思念着遥远的家乡，对故土仍然怀着浓烈而深厚的感情。他们对文化、语言、传统的坚持，更令人动容。

        今天的东干语，其实就是甘肃、陕西口音的汉语。而东干文，则是以斯拉夫字母拼写的陕甘方言。有趣的是，由于长时间与汉语世界隔绝，没有随着时代演进，今天东干语的许多词汇仍停留在清朝时代。他们管政府叫衙门，称警察为衙役。把商店称为铺子，把女人或妻子称为婆娘。近代新发明的事物，他们不懂得汉语如何称呼，因此，他们把飞机称为风船。至于电脑、冰箱这些东西，他们多依靠俄语、阿拉伯语或吉尔吉斯语的音译。不过，随着近年东干人和中国的联系越来越多，电视、冰箱这些新词汇也开始慢慢被东干社会接受了。

        许多逐渐失传的华人民间艺术与文学，东干人还保存着。他们爱唱曲子，如《孟姜女》、《绣荷包》、《高大人领兵》等等。口溜儿（顺口溜）、倒扣话（绕口令）、娃们的曲子（儿歌）、古今儿（故事）和猜话（谜语）等，更是一代代口耳相传。一句“千买卖、万买卖；不如地里翻土块”的口溜儿，传神地表达了回民早先重农轻商的传统。

        虽然城市里的东干人衣着和一般现代人的装扮无异，可是，去到乡下，还是到处可见扎着腿带子、穿着腋下开襟旗袍的女人。拉面、面片儿等等陕甘美食仍然是东干人的日常主食。由于受到俄罗斯族、维族等其他民族的影响，手抓饭、馕、罗宋汤，也成了东干人饭桌上常见的佳肴。不过，东干人也把拉面发扬光大，今天，在吉国任何一家餐馆，几乎都可点到拉面（Laghman）。

        “我们吃的和甘肃人吃的看起来是差不多一样，可是蔬菜种类不太一样。而且甘肃食物太麻辣，我们不会吃辣。”有个汉族名字的东干人王富英说。不同水土出产不同蔬菜，桌上的食物难免会有所变化，可是，华人饭桌上的标志——筷子，却从来没在东干人的饭桌上消失过。

        东干人婚嫁与传统节日的仪式，更是百年不变。新娘们穿的大红袍、高底儿鞋，仍然保留着清朝时候的样式。而新娘头上繁复的发髻“燕燕头”，在中国已濒临失传，吉国却还有老太太们会梳。开斋节和古尔邦节是东干人的两大节日。有经济能力的东干人会趁着古尔邦节到麦加朝圣，没能力负担昂贵旅费的则会宰牛宰羊庆祝节日。回族老先生哈琪哈赤曾去过麦加朝圣，不久又要再去一次。“到麦加朝圣的旅费一次就要2400美元，对我们来说是不小的开销。”哈琪哈赤说。哈琪哈赤有3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当司机，老二和老三在市场卖货，家庭不算太富有，可是还是坚持到麦加朝圣，由此可见东干人的虔诚。除了这些宗教节日，东干人也庆祝华人传统节日如端午节等。

        当然，正如其他国家，农村对传统民间文化的保存，总是比城市来得强。农村学校还有东干语课。反观比什凯克，年轻一辈都说俄语，有的甚至已经不会说东干话了。不过，近年中国在中亚越来越有影响力，年轻一辈又开始热衷学起东干语，甚至也有部分东干领袖主张开始尝试华语教学。

        跟吉国其他民族相比，东干人的教育水平相当高。他们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如今，大学毕业的东干人高达20%至30%。而东干人更遍布各行各业，不再局限于种地。目前，留在农村种地的东干人约占40%，其他的都开起公司。此外，东干人也出了很多科学家与学者。

        今天走到东干人聚居的村落，不难发现东干人的生活水准是相当不错的，家家有车有房。在通往东干村落小葫芦的路上，一群吉尔吉斯族少年蹲在路边。细问之下，原来这些吉族少年竟然是结伴到东干村来找工作的。刚在吉国定居下来时，东干人一贫如洗，只能给人干活、种地。今天，却轮到俄族和吉尔吉斯族给东干人开车、打工。

        东干人很少跟外族通婚。东干知识分子王洪山说：“家里管得很紧，不让年轻一辈和外族通婚啊。”问他为什么不鼓励年轻一辈和外族通婚，他解释说：“东干人很少。跟外族通婚，久了这个民族就消失了。”

        吉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的东干人聚居在楚河两岸，两国东干人来往很密切，而且通婚频频。“你的妹妹嫁到哈萨克，我的儿子娶了吉尔吉斯的东干人，大家都是亲戚。”王洪山笑说。

        对东干人来说，民族身份认同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国家认同。他们深爱着生活了多年的吉国，但心里还是认为中国是第二个家乡。“心里很想念，可是，也只能去走走了。”木哈麦说来，无限惆怅。

        回民坚毅的生命力，就如他们耕种的田地，春天一来，就长出了满地绿油油的蔬菜。

 1962年，家在甘肃的尤苏波夫一家被划入地主阶级，受到批斗。尤苏波夫爷爷带着几名孙子逃到吉国。“刚到吉国时，我们语言完全不通，不过，这里已经有很多回民，他们更早就到这里了，我们便给他们种地。父亲一定要我们上学。当时我只有16岁，因不懂俄语，只好从小学一年级念起。不过，我只花了5年就念完了小、中学。”尤苏波夫哈密说起往事，语气毫无辛酸，更多的是骄傲。

        如今，尤苏波夫哈密家里兄弟几人，都已学有所成。老大尤苏波夫哈密的汉族名字叫王富英，毕业自农业经济系。老二尤苏波夫拉西德，汉族名字王吉山，是比什凯克人文大学的教授兼顾问，教国际经济。老四尤苏波夫木哈麦，汉族名字王洪山，则是物理系出身，曾给苏联军队设计飞机、电脑等。苏联解体后，他开了家公司，提供工业设备及软件等。

        兄弟几人之前都没有出版刊物的经验，却共同出资，办了一份《回民报》，一份《回族》杂志，两份刊物都使用斯拉夫字母拼写的东干文。《回民报》乃半月刊，共有8版，主要报导吉国时事与当地回族社区的新闻。《回民报》有一名编辑，4名记者，另有一名美编负责排版设计。《回民报》的订阅费一年为200索姆。由于东干人口本来就不多，因此报纸的发行量只有1500份。虽然如此，《回民报》却办得相当专业，排版大方，印刷精美，而且内容充实，不是一份浑水摸鱼赚取广告费的刊物，创刊以来，赢得极佳口碑。

        至于《回族》杂志则每年发行一次，内容包括经济、农业、商业、运动、文学等等，记录了吉国回族的生活与感情。杂志一本150索姆，发行量约500至1000本。《回族》杂志的主编正是王家老二王吉山。课余时间，王吉山就在办公室里处理杂志的编务工作。而老四王洪山，则是《回民报》的技术编辑，负责印刷等技术层面的工作。老大王富英为退休人士，闲时喜欢舞文弄墨，投稿到《回民报》与《回族》。兄弟几人齐心协力，不辞劳苦，但求属于东干人的报纸与杂志，能延续下去。

        “我们每年都在赔钱。每印一份报纸、一本杂志，都要自己掏钱出来补贴。”王洪山说，“可是，如果我们不干，就没人干了。久了，年轻人连话都不会说了，我们的民族文化慢慢就消失了。”

        兄弟几人还印刷东干文课本，免费派给农村的学生上课。正因为有了这些人的努力，一个人口仅占区区1.1%的族群，却能一代一代，在异地把文化和语言传承下去。

     未来，吉国还须面对许多挑战：国营企业私营化、西方势力的扩张、种族问题以及悄悄抬头的恐怖主义。凡此种种，皆令华人担心吉国政局的变化，会影响他们在吉国的投资。

        不过，无可否认的是，吉国仍是中亚五国当中，对外国最开放，对华人最友善的国家。也因此，吉国华人在中亚五国里，人数最众，也最为活跃。如果吉国在各方面能再加以改善，华人也能多些回馈当地社会，那么，资源丰富、风景壮美的吉国，不难成为华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国度。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下文简称哈国）曾是强大的匈奴帝国的一部分，盛况维持了数百年。继之而起的突厥人也在中亚地区建立了许多汗国。11至15世纪，契丹人和蒙古人的铁蹄又踏入了这片土地。留存下来的突厥蒙古后裔信奉了回教，后来再分裂出乌兹别克与哈萨克两族。哈萨克汗国于15末世纪建立，分为大帐、中帐和小帐。18世纪30、40年代间，中帐和小帐被俄罗斯吞并。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当地于1936年以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名义加盟苏联，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才宣布独立，并改国名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长期归属苏联的历史，令哈国多了许多俄罗斯人；今天，俄罗斯族是仅次于主体民

        族哈萨克族（下文简称哈族）的第一大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此外，还有乌克兰族、乌兹別克族、德意志族、鞑靼族，维吾尔族等100多个少数民族。为了增加国内主体民族的人口比例，哈国政府曾呼吁世界各地的哈族回归故土，吸引了不少中国境内的哈族移入。目前，在哈国生活的华人不在少数，但是华人人口并没有被官方归入少数民族人口的组成部分。

        哈国天然资源丰富，石油、天然，以及煤、锰、铜、铅、锌等矿物，为国家带来庞大的收入，加上近年来政治稳定，该国经济成长高达8%以上，表现一枝独秀，成了中亚最富裕的国家。

     哈萨克和中国山水相连，一直以来，中哈人民在两地之间迁徙的情况，非常普遍。

        1877年，甘、陕、宁回民起义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余部被迫流亡至中亚，后来，他们在楚河两岸定居下来，逐步形成一个新族群，被称为东干人。

        清朝末年，民生困苦，有大批中国劳工远赴中亚谋生，其中以维吾尔族居多。1920年代，每年赴中亚的维族以及吉尔吉斯族就有多达2到3万人。而前苏联在这段时期所修筑的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就凝结着许多华工洒下的血汗。

        早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争爆发时，俄国曾强征哈萨克人做苦工，这引起哈人群起反抗。那时，至少有15万哈人死在俄国的残酷镇压之下，近20万人逃往中国。20世纪30年代，在苏维埃政权的强制集体化过程当中，哈国更有超过150万人死于饥荒，导致大量的哈族再度逃往中国，并且在中国落地生根，成了中国公民，却对故国念念不忘，为哈萨克斯坦于1991年独立后，大量中国哈族回归故国的情况埋下伏笔。

        在1966年前后，由于各种因素，不少中国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出走中亚，其中有一部分是回民。这些回族新移民在哈国受到早年过来的东干人照应，再加上本身的刻苦耐劳，他们很快便在当地扎下根来。在中国时，回族已是务农好手，来到哈国之后，因为语言不通，他们唯有以务农为生。哈族是游牧民族，因此对于农业不感兴趣，而回族人从中国带来大量蔬菜以及其他农作物的种子，大大丰富了哈国的农业生产。此后，当地菜市场的蔬菜，有60%以上都是回族人供应的。

        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些来自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哈国生活得越来越好，尤其是东干人以及维族的生活水平更是大幅提高。新一代东干人所涉足的行业遍布各领域，当中不乏工程师、教授等知识分子。

90年代之后，也有许多汉、满族人被哈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吸引，而来到这里经商。这些新移民的人数曾高达数万人。

   由于中亚存在着许多从中国移居过来的哈族、维族等少数民族，而他们中不少人以华人自居，因此，在谈到哈国的华人时，不能忽略了他们。

        大部分华人，特别是汉、满新移民，在哈国活得小心翼翼，连出门都能免则免，更别提参加什么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了。哈国的华人到底有多少，迄今仍无精确的统计。据推测，哈国汉族华人人数最多的时期有几万人，目前只剩两千多人。他们大多在批发市场里做贸易，或在中资企业里打工。华人绝大多数集中于哈国最大城市阿拉木图。此外，哈国首都阿斯塔纳也有一些中资企业的华人职员。

        来自中国的回族与维族，经过数代繁衍，人数比汉族多得多。至于来自中国的哈族，由于入境或定居都很容易，因此人口极其庞杂，再加上许多人都是中、哈两边跑，流动量也大，所以无法精确统计。曾有一个说法称中国籍哈族高达60万人。

     “来哈萨克斯坦太危险了，没事千万别来。”若有人想到哈国生活或旅游，向哈国华人征询意见，都会得到这样的答复。

        若是一定要到哈国，那里的华人会特别叮嘱：“没事别出门，出门别说话，以免暴露身份。暴露身份就完了。”

        哈国华人，就是如此胆战心惊地过着日子。

        哈国是中亚最富裕的国家。阿拉木图道路笔直宽敞，行人道上种满葱葱郁郁的绿树，空气格外清新。这个俄式城市很宁静，也很少看到随意丢弃的垃圾。但是，平静安宁的外表下，掩盖着哈国严重的排华问题。哈国华人说，哈国普通百姓对华人虽然谈不上友善，但至少不会拳头相向。

        走在街上，中国人总是小心翼翼，最担心的是碰上假警察。曾有华人被自称便衣警察的人拦住，要检查他们的护照，然后“警察”一口咬定护照是假的，把不知所措的华人推上“警车”，载到荒无人烟的地方洗劫一空。于是，哈国华人互相告诫：如果被警察查身份，要保持镇定，不要上所谓的“警车”，因为警察无权随便抓人。如果对方没有穿着警察制服，则更不要相信对方的身份。

        哈国自2004年开始出现大规模针对华人非法居留的扫荡行动后，华人就一直没有安宁的日子。这几年，华人成了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导致大批华商被迫含泪离开。今天，在哈华人（中国籍汉族）的人数，已经从2004年以前的数万人之众，锐减到两千余名。

   仍留在哈国的两千多名中国人，主要是中资公司的职员、在批发市场做民贸的华商，以及留学哈国的学生。

        在这3个不同的群体当中，中资公司的职员无疑是比较幸福的。中石油、中石化在哈国规模很大，都有常驻的中国籍员工。虽然他们也偶尔会遭受警察的骚扰，不过这些高级职员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清楚自身的法律权利，比较懂得如何应付。而且多数中资公司都有专门聘请的律师，中资公司职员若在路上被警察拦截，只要打通电话，律师就会过来帮忙处理。

        在大企业的保护伞下，中资公司职员不必心惊胆战过日子。在商场里，偶尔还能看见他们自在地闲逛。

        在哈国从事贸易的华商就没那么幸运了。华商大多数集中于阿拉木图市的巴拉霍可。那是一个长达数公里的批发市场，市场里有个亚联商场，曾是华商的天下。如今，到亚联商场转一圈，依然摆卖中国货；但店内，却已不再是中国人。

        问那些仍然留在巴拉霍可的华商生活过得怎样？“苦啊！苦啊！中国人在这里苦啊！”这是某个华商的第一反应。问他们既然生活与前景都不好，为何还留在当地？他们说每个华商刚到哈国时，都至少投资了几十万，这些都是他们的血汗老本，无论如何也要把货卖完才走，因此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呆在哈国。

        早在1990年代，就有华商进驻哈国。当时哈国排华现象并不严重，华商在此赚了不少钱。但自2004年开始，警察常到巴拉霍可不分青红皂白地捉中国人，搞得市场鸡犬不宁。“警察一来，中国人就跑。那场面啊！像拍港产警匪片。”一名华商说。

        现在，巴拉霍可只剩200名左右的华商。许多中国老板不敢露面，把货交给当地人卖，晚上才到店里收钱。如此做生意，终究不妥，当地员工偷货或卷款私逃的事件时有所闻。

        另一名华商则指出，当年巴拉霍可的华商有上万人，整个市场很旺，哈国周边国家的商人都慕名前来办货。随着华商的撤出，亚联商场的繁荣也一去不返了。

        在哈国，华商们成了走钢索的人，纵然危机四伏，却又无路可退，只能咬牙坚持走下去。

   同样是华人，持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护照的华人，受到的待遇却截然不同。

        哈国约有十名马来西亚华人和20多名新加坡华人，虽然同样必须面对其他华人所面对的困境，但是，新马华人至少没有受到粗暴对待。

        “哈萨克人确实不喜欢华人。我向哈萨克人介绍自己时，只会提自已是新加坡人，就算别人问起，我也会强调新加坡和中国文化不同，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一般都会接受。”新加坡华人郭国仲说。

        其他新马华人对此皆有同感，马来西亚华人甚至更感到自己在哈国受到礼遇。“我刚到阿拉木图那年，电视上经常播出有关马来西亚的新闻和纪录片。哈国政府把马来西亚视为回教国家的典范，有意朝马来西亚的方向发展。因此哈萨克人对马来西亚人很有好感。”马来西亚华人周惜珠说。

        新马华人人数虽少，却分布在多个不同的。哈国目前大约有5家新加坡公司，其中位于阿拉木图的新加坡科技电子有限公司（Singapore Technologies Electronics）、新加坡吉宝企业有限公司（Keppel Corporation Ltd），以及阿斯塔纳的新加坡科技工程有限公司（Singapore Technologies Engineering），都取得良好业绩。

        这些新资公司多聘用当地人，以新加坡科技电子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以培育当地人才为目标，平时只有两名新加坡职员，只有当进行大型项目时，才会短期外派十多名新加坡职员到哈国。

        新资公司在哈国展现了很强的企业责任感。“取诸社会，用诸社会。ST在哈国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因此也希望能回馈当地社会。公司有个奖学金计划，提供给哈国教师，让他们能到新加坡进修。”新加坡科技电子有限公司哈国分公司的董事长曾兆亮（Gary Chan）指出。

        这些到过新加坡的哈国教师，都对新加坡留下很好的印象。他们眼中的新加坡，科技发达、犯罪率低、人民礼貌、环境干净、办事有效率，建国短短40年，就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值得哈国借鉴。在新加坡的生活经历，开拓了他们的眼界，相信也许通过他们，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哈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

        旅居哈国的新马华人来往密切，对初来乍到的新马华人也特别照顾。大家经过互相介绍而认识，生活上互相扶持，并且常常举办餐聚以联络感情，只是缺少一个形式上的社团名称而已。不过，新马华人跟中国大陆华人几乎没有任何交往。新马华人坦言，他们和中国大陆华人文化差异较大，并且，也感觉大陆华人自我保护意识太强烈，难以接近。

        新马华人在哈国，并不全然以赚钱为目的。有一部分的新马华人，在非政府组织里工作。来自新加坡的郭国仲隶属神召会，在哈国当顾问。他很喜欢哈国：“哈国有一些新加坡已经失去的东西。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密切。”后来他还娶了当地哈族女子为妻，并育有一女。

        同样来自新加坡的黄来春，已经54岁了，却跑到哈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当社工。她在一家孤儿院服务，也在阿拉木图附近的一个小镇Taleykorgan办起一家让智障儿学习的学校。刚来时，她很不喜欢这地方，觉得当地人很傲慢、办事效率又低。可是，住下来之后，她却发现了哈族乐于助人、好客、善良、尊敬老人的美德，又渐渐喜欢上了哈国。

        还有一名香港女子卢淑英，在哈国创办了黄金种子公共基金会，宗旨是开启当地年轻人的视野，带给年轻人正面的影响。由于哈族青年酗酒问题严重，卢淑英希望通过教育，让他们改变坏习惯。她开办语言中心，让学生学习英语、俄语和汉语。中心还设有图书馆，藏书丰富。她的语言中心吸引了许多来自中国的哈族青年。他们在此学习俄语，互相鼓励，一起面对新的生活。

   上世纪前半叶，哈国人曾两次大规模逃往中国。他们在中国繁衍生息，后代都在中国出生、成长，且持有中国护照，是中国公民，但在心灵深处，部分人仍然认定哈国才是自己的家园。

        哈国独立后，总统号召全世界所有哈萨克族回国定居。于是，一场大规模“回归故乡”的运动就此拉开了帷幕。为了鼓励哈族回归，政府制订了《公民法》和其他措施，以优惠政策奖励哈族新移民，譬如回归家庭可申请生活补助金，一个人可得2000至4000美元等。条件是一个家庭里至少要有一个人放弃他国国籍，成为本国公民。

        哈萨克斯坦给了境外哈族一个玫瑰色的愿景。可是，海外归来的哈族，在哈国的生活却非从此一帆风顺。

        看似中性，其实带着贬义的词。回归者总爱对外宣称自己和本国哈族共享同一语言、文化、信仰，一切和本国哈族并无二致。可是，从思想、价值观，乃至衣着、口音和生活习惯，他们都和本国人有区别，很容易被一眼区分出来。

        另外，哈国哈族认为早年出走到中国的哈萨克人，都是民族的叛徒，国家有难时远走高飞，国家经济好了，就要回归。他们也不满回归者享受着政府提供的种种优惠和福利。

        在巴拉霍可市场卖胶带的波拉提夫妇，从中国迁回哈国已有十年之久。他们坦言在哈国受到歧视。波拉提无奈表示，很多出走中国的哈族家庭，当年都是因为受到政治迫害，才被迫背井离乡的。以他们家为例，当时被划为地主阶级，叔叔都被整死了，父母才逃到中国。

        虽然哈国政府近年大力提倡哈语，可是哈国的主要沟通语言仍是俄语，尤其在大公司及银行等机构工作，更必须懂得俄语。从中国移民过来的哈族不通俄语，因此很难找到好工作

另一方面、中资公司也不太愿意聘请回流的哈族。“他们认为自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工作不勤奋。”一名中国籍华人雇主说。

        移居哈国的中国哈族，多数都是从中国农村过来的，教育程度一般都不高。当地哈族人看不起他们，中国公司也不愿聘请他们。因此回归者在哈国求职常常碰壁，经常面临失业问题。

        于是，为了生存，他们在哈国多从事劳力工作，如在餐厅打杂、在乡区放牧等。不过，他们在哈国的收入比在中国时高，可是近年哈国物价暴涨，生活成本大增，很多人又考虑再回去中国。

        来自中国木垒县的哈族青年吴轩，举家迁来哈国已有6年之久。当初，吴轩父亲因为不希望下一代被汉化，另外也考虑到事业与孩子的教育等问题，抱着回归祖国的心态来到哈国。目前，吴轩父亲在学院教中文，母亲在政府部门打杂，而吴轩本身则在阿拉木图经济学院（相等于职业高中）就读。吴家的情况，已是回归者当中属境况不错的了。

        吴家只有吴轩母亲持哈国护照，其他人都还保留中国户籍。不过，吴轩也在考虑明年是否要入籍哈国。他认为哈国才是祖国，中国只是他成长的地方。哈国赚钱多，消费高，中国虽然发展迅速但竞争激烈。中国籍哈族在两个国家之间举棋不定，许多人保持观望态度，静观两国未来的发展。

        每年都有大量回归者从中国到哈国定居、打工。有的从此扎根哈国，也有许多人返回中国。在中哈两国，他们大多属于弱势群体。他们当中，有的更认同中国，有的却认同哈国，不过，大多数人都对自己的国家和身份认同模糊不清。也许，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友善、更平等的生存空间，比他们的身份认同更为重要。

        自建国以后，哈国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中国人前来淘金。在高峰时期，一百三十多万人口的阿拉木图市竟然涌进了数万名中国人。如此庞大的异族大军骤然压境，任何国家都会备感压力。

        其实，华人移民许多生活上的焦虑，以及哈国人对华人的一些负面看法，当中，是存在着不少有待斟酌的地方，只要双方进行更多的沟通，在彼此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之后，相信大家还是可以在这片美丽的国土上相处得更加愉快。

土耳其

  位于地中海与黑海之间的土耳其，领土横跨欧、亚两洲。它有97%的领土在亚洲，其余3%则在欧洲。

        土耳其一词由“突厥”演变而来，在鞑靼语中意为“勇敢”。它曾是东罗马帝国的中心。15世纪中叶，东罗马帝国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所灭，建立了奥斯曼帝国。16世纪末开始没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同盟国作战，战败后帝国瓦解。1919年爆发了革命，1923年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它拥有6500年的历史及13个文明的历史文化遗产，古迹星罗棋布。

        这里四季分明，三面环海，散发东西方文化的独特风情。灿烂的文化，明媚的风光，热情的人民，使它具备了充足的旅游资源，吸引了外国旅客的到来。

        土耳其资源丰富，农业发达，工业基础扎实，经济增长迅速，极具发展潜力，理应会吸引很多华人前来谋生与发展。但基于种种因素，目前只有约3000名华人居留在这个国度。

      据说，第一个到土耳其来的华人是一名祖籍上海，成长于香港的朱姓人士。现年已90多岁的他，仍然在当地经营羊毛衫以及皮鞋工厂。

        而第二个到来的华人恰巧也姓朱，同样来自香港，华人分别称他们作老朱和小朱。小朱是一名工程师，逗留的时间不算长，在当地娶了一名希腊女子后就随妻到希腊发展，已于多年前与世长辞。

        第三人则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刘炳汉，有个别名叫刘大麻子。毕业于黄埔军校的他是蒋介石身边的军官。在土耳其留学时，刘炳汉与老师的女儿共结连理，婚后两人返回中国。之后刘氏夫妇迁居数次，从南京到上海、香港，最后在台湾落脚，结果还是因为刘妻无法适应台湾的生活而重返土耳其。

        1955年9月，来自中国重庆的王曾善一家9口踏上土耳其的国土。身为中国与土耳其交换学生计划的首批学员，王曾善过去曾因中国动乱而举家逃至巴基斯坦，后来因为伊斯坦布尔的一名教授同情他的困境，邀他到伊斯坦布尔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和文化课程，王曾善欣然接受邀请，于是携带家眷而来。

        那时的土耳其仍然处于贫穷落后的阶段，不论电话通讯还是公共设施均不完善，加上言语不通，其生活之困窘可想而知。

        说得上一口流利土耳其语的王曾善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的生活，但对只懂家乡话的妻子和子女而言，却是个大挑战。如今，女儿王荷丽回忆说：“当时父亲只教了一句土耳其语‘什么’，让我们自个儿去学去问。我们便到家对面的水果档，指着各种各样的水果不断地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我们也常与邻家小孩一齐玩要，不知不觉就从完全不懂土耳其语到学懂了它。”

        王曾善一家儿女多，开销大，除了教书之外，他也开中餐馆以补贴家用，而这家名为“中国饭店”的小餐馆，正是当地的第一家中餐馆。那时的土耳其物资匮乏，中餐材料和酱料奇缺，太太马昌玉就在家里培植豆芽，自制豆腐与酱料。

        那时候，当地人对中餐可说全然陌生，马昌玉不厌其烦地引导食客如何享用中餐。渐渐地，土耳其人不但开始不排斥中餐，还爱上了中华美食。

        土耳其并非移民国，除了血缘或姻亲等理由，并不接受外来移民，居留审核也非常严格，限制又多。因此，在两名朱先生、刘炳汉以及王曾善一家之后，极少华人前来定居。

        在1980年代，土耳其采取了对外开放的自由经济政策，于是华人企业便开始前来开拓商机，到了这时候，从中国及东南亚过来的新移民才逐渐增加。

   土耳其对外来移民并不抱持鼓励的态度。

        这些年，华人大多是通过婚姻或工作而来，人数在3000名左右。他们主要来自中国浙江、安徽及东北，少数来自香港或台湾，多数聚集在首都安卡拉及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Istanbul）。

        当地华人主要经营餐饮业、小型杂货店、服装店及礼品批发等，有些则从事导游、翻译、英语或汉语教员等工作。然而，政策的诸多限制，令华人的生意无法扩大。

        华商之间甚少往来，言行谨慎。因此，部分通晓土耳其语的华人以当地人为主要社交对象。然而，过埠新娘们却保持着紧密联系，每月还通过自组的妇女会举办餐聚，闲话家常。

        当地只有一家网络中文媒体，让华人相互分享生活资讯及情报。此外，华人子女一般都在国际学校接受教育，对英语、土耳其语的掌握比汉语好得多。

        土耳其气候宜人，治安好，华人生活总算安定。尽管单调了些，但只要刻苦耐劳，三餐温饱并不成问题。

      早期，人数不多的土耳其华人主要以经营中餐馆为业。中国国营企业于1980年代末姗姗而来，开拓了商机，于是纺织业、机械制造业开始进驻市场，华人的经济活动才逐渐走向多元。

        然而，土耳其政府对中国纺织品的进口诸多阻拦，中国货品要打入当地市场并不容易。因此，从事这行的商家无法持之以恒，只好转而售卖中国礼品。

        土耳其是全球节日最多的国家之一，几乎两三天就有一个节日，民众都互相送礼庆贺。几名华人看准了礼品市场的潜力，就在伊斯坦布尔的Sark Han批发城内开设礼品批发店，无论精美的餐巾、桌布、吊饰或首饰等，都广受当地人喜爱。

        礼品畅销异常，华人也就一窝蜂地投入其中。这些批发商大多来自中国安徽，原本在当地零售店里打工，凭自身工作经验在中国组织货源，再批发到土耳其。

        刚开始，礼品批发生意本小利大，前景大好，有些人甚至连开两家分店。但后来礼品店越开越多，货品大同小异，市场趋于饱和，再加上熟悉当地市场需求的土耳其商人亲自到中国去办货，竞争日益激烈。

        “一个馒头两个人吃，还能饱，20多人分一个馒头，岂能饱？”批发商叶云打趣的比喻，清楚显示了礼品生意的前景。

        生意难做，批发商只好压低价格。另外，当地政府实行反倾销，针对进口的中国礼品征收标准不一的进口税，令生意成本激增。此外，日益高涨的店租更重重压在当地华商肩上，使他们失去了信心。

        伊斯坦布尔有50多家中餐馆，菜式以粤菜为主，其中糖醋鸡、酸辣汤、铁板牛肉及宫保鸡丁最受顾客欢迎。中餐馆的档次及价格都稍微偏高，最低消费13至50美金不等。

        然而，中餐馆生意因受到非典型肺炎事故及金融风暴的冲击，一度跌入谷底，许多撑持不住的业者纷纷倒闭。其中，设于伊斯坦布尔的中国国营企业——广州远洋饭店首当其冲，被迫歇业；余者则凭着一股顽强毅力，苦苦撑持，才熬过了低迷的谷底。

        激烈竞争下，不少中餐馆改为自助快餐店，顾客只须缴付十里拉，即可开怀大吃。这种超前的经营方式广受当地人欢迎，掀起了一股崭新的饮食风气。其中，东方大酒楼沿用了这种经营模式，分行开了一家又一家，如今有9家分店遍布各大超市。

        这里的华人，若想如欧洲华商一般赚大钱，几乎是不可能的。各行各业的华商们，都不愿眼巴巴看着辛苦经营的事业毁于一旦，再怎么艰难都想稳守岗位，撑持到底。

     “土耳其的政策，朝令夕改，使人难以适从。”当地华商怨声载道。

        大部分华人未曾入籍，一般持居留证。过去居留证每3年更新一次，2004年起，改为每年都要更新。而申请更新，往往不获批准，逾期居留者，常遭警方扣留。

        当局或批准了一家新公司的开业申请，但又以劳工保护条例加以约束，间接阻遏引进外国员工，业主不得不雇佣本地人，造成中餐馆员工多是土耳其人。

        这一切，都令华商对前景失去信心，不是有意离开另谋出路，就是回流中国重新发展。

        另外，过去只要跟当地人通婚，两年后即可入籍。如今条例较严苛了，结婚3年才能申请入籍，住满5年才能取得身份证及土耳其护照。

        也许少点抱怨，生活就能简单一些。尽管华人满腹牢骚，但这四季分明的国度，却以清新的空气、宜人的气候留住了他们的脚步。

     当地华人，无论衣食住行都自成一格，某种程度上仍延续着家乡的生活习惯。

        以饮食为例，华人三餐都以中餐为主，炖煮式的土耳其菜始终无法符合他们的口味。土耳其菜讲究繁复的烹调，加入大量番茄酱及酸奶酪，味道甜滋滋的，主食则舍米饭而取面包，也难怪华人不太欣赏。跟土耳其人十分讲究饮食不同，忙于工作的华人用餐较随意，饭菜全摆上桌后，便各自端盘用菜，各取所需，一般用餐时间也不过半小时左右。

        华人的早餐有中、西式两种选择。中式早餐为稀饭或面食，西式则有面包、小黄瓜、蕃茄、干酪、腌橄榄、小香肠及热红茶。至于午餐和晚餐，华人喜欢在家烹煮，一菜一肉一汤配上香喷喷的白米饭，简单的菜式吃得有滋有味。他们偶尔也想念家乡的小吃，心血来潮时会自制包子、馒头、饺子等中式点心。

        由于当地政府对房地产买卖有严格的限制，因此华人一般都赁屋而居，住在租来的公寓里。小型公寓空间狭小，只有一个设在卧室里的小卫生间；较大型的公寓则有两间卧室、一间客房、两间卫生间及阳台，相对比较舒适。三房一厅的租金从600到1000里拉不等，租金较低的则是设施简陋的地下室单位，连藉以取暖、烧饭的天然气都欠缺，但总算是个栖身之所。市区租金贵，低收入的单身华人一般住在郊区。

        华人也注重起穿着和仪容，在这个穆斯林国家里，女性的服装绝不暴露，一般领口不低于锁骨、不用透明布料，以宽松的上衣配搭长裤；至于男性，平日多以衬衫配搭长裤，出席较隆重的场合，则西装笔挺。

        拥车的华人不多，市区有地铁、有轨电车、公车或出租车服务，交通方便。

        华人每天辛勤工作，休闲时刻不多。充其量不过是到购物中心、餐厅、咖啡厅及卡拉OK歌厅去；或去郊游、旅行；或跟朋友聚会搓麻将及观赏数码影片。

         当地没有中文学校，华人子弟一般都选读国际学校，也有些到土耳其公立学校就读。土耳其的教育制度是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4年，公立学校提供免费教育，而国际学校每学期学费约1000里拉。接受当地教育的华人子弟，都只学习土耳其文及英文。

        台北驻安卡拉办事处，曾于1998年开办过中文班，约有十名华人孩子报读，每逢周六上课一次，教材由台湾侨务委员会提供。后来，中文班因缺少导师而停办。家长们只好自己在家里想方设法让孩子们学习中文。他们让子女观看中文影片及连续剧，从中学习新词汇。一些富裕的华人，也趁暑假之便，将孩子送回家乡去濡染中华文化。

        当地没有中文报章，自2007年元旦起才有了一个中文网络媒体——《T号外》，负责人为中国新移民。《T号外》与当地服务机构相联系，为打算前来土耳其经商、留学或旅游的人士提供一个信息平台，也为华人打开一扇了解土耳其的窗口。

        土耳其的官方媒体广播电视总局“土耳其之声”，一向以26种外语广播。该局于1981年7月1日增设中文部，每日下午两点广播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内容包括十分钟当日新闻、5分钟土耳其各报摘要，以及各种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人文、旅游及新闻等相关的介绍与评论。

        中文广播节目有5位工作人员，包括组长、副组长和3位编制人员。组长马赫穆德·费理哲是哈萨克族人，副组长是1989年移居土耳其的维吾尔族人，3位编制人员则分别由两名华人、一名土耳其人担任。

土耳其是个伊斯兰教国家，却奉行宗教自由的政策，因此华人可自由决定宗教信仰。华人以信仰基督教、佛教者居多，也有少数归依伊斯兰教的华人，部分则属无神论者。由于当地没有华人庙宇，华人佛教徒多半在家中供奉佛像。

        基督教在当地发展稳定。2005年，新加坡的基督宣教士前来土耳其传教，并租用瑞典大使馆隔壁的楼房作为会所。目前有50多名信徒，包括商人、小贩、厨师及留学生，其中以温州人居多。教会经费主要来自教友捐献；每逢星期日，教友们便齐聚一堂，吟唱诗歌，聆听牧师布道。

        华人的社团组织，有土耳其华商会、中土商人友谊协会、伊斯坦布尔妇女乡亲联谊会及安卡拉妇女乡亲联谊会。

        华商会成立于2004年，主要目标是维护土耳其华人的商业利益，并促进华商的联系。华商会也负起排难解纷的责任。中土商人友谊协会是一个新成立的华人组织，致力于为中、土两国的商贸往来提供咨询。另外两个妇女组织，成员都是过埠新娘。她们每月聚会一次，分享各自带来的佳肴，在谈笑声中，促进了彼此的感情。

      尽管土耳其并非长住久居的理想地，但华人既来之则安之，无论如何，华人都会坚定地走下去。

        或许，有一天蓦然回首，发觉前路不通，华人也将毫不踌躇地毅然离去，另找出路。

伊朗

今日的伊朗，在1935年之前长期被称为波斯，是一个具有四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曾创造了灿烂的波斯文化。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向东挺进，一路势如破竹，波斯被划入希腊版图。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希腊文化的影响很快消退，最后被安息帝国取代。萨珊王朝继安息王朝而起，被称为波斯第二帝国，奉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7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势力大举入侵，波斯成了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此后，波斯又先后落入蒙古人和突厥人手中。16世纪，伊斯兰教什叶派建立了萨非王朝，迁都依斯法罕，波斯成了中东重要的文化中心。

        到了近代，英、俄、德、土耳其逐鹿伊朗，以图控制波斯油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斯南部与北部分别被俄国与英国控制。1925年礼萨汗推翻卡扎尔王朝建立巴列维王朝。在美国扶植下，伊朗曾是中东强国。巴列维王朝推动白色革命，依照美国模式改革伊朗农业与工业，给予妇女选举权、工人参加分红并限制宗教势力等等。虽然改革初期工业产值大幅提高，但利益只被少数人掌握，导致贫富悬殊，又因经济结构不健全，最终经济陷入困境。

        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宗教领袖霍梅尼掌权，废除君主制，改国名为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教义贯彻政治与法律各领域，国家权力由阿訇执掌，议会的权力有限。从此，伊朗奠定了宗教治国的政局，与西方民主体制抗衡。

伊朗的石油储量占世界储量的10%，天然气更占世界总储量的16%，居世界第二位，可惜却因与伊拉克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以及受到国际制裁等因素，国力难以强盛。伊朗近几年经济发展较快，地毯制造业举世闻名，也是中东地区唯一还制造汽车的国家。

古时候的中国与波斯，同样都是历史悠久的强大帝国，两国之间长期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各自的文化在亚洲两端互相辉映。在《后汉书》等史籍当中，描述汉朝张骞出使西域时屡次提及的安息和条支，所指的正是波斯。在东西文化的交流史上，波斯可说是占据着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波斯的来往就更为频繁。根据《魏书》所述，波斯使臣曾经多次到中国去觐见北魏皇帝。到了唐朝，阿拉伯帝国入侵萨珊王朝，末代国王的儿子俾路斯还曾经逃到中国，并请求中国的皇帝出兵援救。

        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于元朝时期在波斯东北部建立伊儿汗国。伊儿汗国和元朝保持着密切来往，并且设置了驿站通道，使东西方的交通更为通畅，中国与波斯两地商人的往来也更加频繁。在这段时期，两地在科学、艺术和医药方面的交流，可谓空前兴盛。

        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期间，其船队曾经3次到达波斯湾的忽鲁谟斯，也即是今日的霍尔木兹（Hormuz）。而郑和在斯里兰卡所立的石碑上，也是以中文、淡米尔及波斯3种文字所写成的，足见当时中国对波斯的重视程度。

        这两个文明古国在当时交通极为不发达的情况下持续交往，从文化到物产，都深深地影响着对方。到了近代，两国之间却是越来越陌生，就连近代中国出现的移民潮也未将华人带到伊朗。

        1971年，中伊两国正式建交。这十多年来，两国扩大经贸合作规模，尤其是天然气以及石油领域。2005年末，中伊之间签署价值1000亿美元的石油合作协议，中国自此成了伊朗至为重要的石油贸易伙伴之一。

        此外，在伊朗境内的通讯、五金以及汽车等领域，都有中资企业的参与。在工程承包方面，随着中资公司标得地铁、铁路、公路、桥梁等多项基础建设项目，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中石化、中信等中资公司，皆成功在伊朗扎根。

        伊朗是个中东大国，总人口高达7000多万，而且和中国有着极深渊源，可是，华人却非常少。据了解，伊朗华人只有2000人左右，当中60%至70%来自中资公司，包括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工程师等等。不过，他们在此多是属于短期外派性质，很少人长期留在伊朗。

        个体经商者不多，大部分集中在德黑兰。自从霍拉姆沙赫尔（Khorramshahr）盖了一座中国商城后，又来了一批贸易商，目前商城内约有200户华商。小部分华人在伊朗公司及政府单位上班，这些通晓波斯语的华人一般负责翻译工作，接洽中国客户。

        嫁到伊朗的华人女性共有50多名，也有数名华人男性娶了伊朗女子。至于华人留学生，则介于150至200人之间。

伊朗有一家华语广播电台，隶属伊朗新闻部，电台内的职员大多数来自中国。

       伊朗在新闻媒体上总是和核子武器、恐怖分子、邪恶轴心国等名词扯在一起。政府扣留民运人士与外国记者的事件层出不穷；与伊拉克、以色列等周边国家关系紧张……种种负面新闻，都令人对伊朗望而生畏。

        可是，问任何一个在伊朗生活过的华人，他们都会说，伊朗并不如外界描绘般局势动荡、安全堪虞。虽然核武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但是，伊朗百姓的生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社会也没因此紧张不安。事实上，许多华人甚至认为，伊朗治安良好，生活平静，比起许多国家，都安全得多。

伊朗，就是一个如此让人意外的地方。

        8年的两伊战争，令伊朗百姓倍加珍惜和平，首都德黑兰的街上，没有到处持枪巡逻的警察，也不见神色木然、语气冷漠的路人。相反地，伊朗人热情开朗，对外国人尤其充满好奇与好感。华人不管是出外逛街、吃饭或搭地铁，常碰上伊朗人前来搭讪。

        伊朗人乐于助人，更是讲究礼貌的民族。中国南方航空德黑兰办事处总经理王歌帆表示，伊朗人最令他印象深刻的优点，就是特别彬彬有礼，待人接物让人很舒服。另外，德黑兰拥有1400万人口，却没有大都市常见的脏乱，卫生环境不错，这一点，也令许多华人叹服。

        德黑兰的伊朗女性一个个穿着合身及膝的外套，头上仅松垮垮地围一条五彩缤纷的丝巾，露出一张张高鼻深目的脸。身穿大黑袍，蒙着面纱，把全身严密地包起来的女性反而不多见。这一切，都和一般人想象中的极权宗教国家大相径庭。

        可是，阿曼、科威特、卡塔尔这些中东国家，虽然要求本国女性出门时要穿黑袍戴头巾，却不会把相同的要求强加于外国女性。而在伊朗的华人女性，则一律被强制要求戴上头巾，衣着也不许暴露，上衣下摆必须把臀部遮盖起来。换言之，伊朗人怎么穿，外国人也必须怎么穿，没有特别待遇。男女之间举止也不能过于亲密，否则很可能被宗教警察找麻烦。

        伊朗也没有过多的娱乐场所，只有一些小型俱乐部和咖啡屋。喜爱热闹的华人，难免觉得伊朗沉闷。不过，伊朗到处有青翠的公园，到了春暖时节，更是百花齐放，赏心悦目。久而久之，华人也养成了闲暇时间到公园散步运动的习惯。德黑兰北方还有厄尔布尔士（Alborz）山脉，峰顶白雪皑皑。冬季时，前往山上滑雪成了华人少不了的活动。

        华人与伊朗人和平共处。中华饭店的主厨王国兴表示，伊朗人常说中国和伊朗一样，是文明古国，因此对华人相当有好感。穷人基金会的范跃铭则表示，伊朗人对华人的普遍印象是勤快、办事效率高。另外，由于中国对伊朗没有劳务输出，在伊朗生活的华人，大都是中资公司的高级行政或管理人员，层次比较高，也普遍受伊朗人尊重。

        虽然对外国人友善，可是，伊朗人普遍存在”外国人的钱，就该多赚一些”的观念。不管是酒店、出租车或餐厅，只要不是伊朗人，顾客都要付双倍或更多的钱。令华人感叹，要在精明的波斯人的土地上讨口饭吃，还真不容易。

* *为了解决德黑兰的塞车现象，伊朗政府在1970年代便计划建造地铁。地铁后来因为两伊战争而搁置。直到1995年，伊朗政府才和中国中信集团合作，重新启动了地铁建设计划。德黑兰市民引颈期盼的地铁于2000年开通后，获得了普遍肯定，华人的形象在伊朗也相应提升。*

在伊朗2000多华人里，中资企业员工占了绝大部分，个体华商可说少之又少。德黑兰有千多万人口，中餐厅却只有3家，其中两家还是伊朗人开的，真正由华人开的中餐厅，只有一家。

        其中缘由，从4名华人青年在伊朗的创业故事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两年前，陈思远随父亲到伊朗考察市场，和伊朗客户交流后，萌生了在伊朗搞餐饮业的念头。“伊朗没什么娱乐，人们平时的休闲活动，就是到餐厅吃吃饭，因此在这里开一家有格调的餐厅，肯定可以吸引人。”陈思远说。不过，更主要的是，他想把餐厅当作一个发展平台，通过餐厅认识当地商界人士，建立人脉，寻找商机，以方便日后做生意。

        回到杭州后，陈思远向几名朋友提起这件事，大家都很感兴趣。于是，王晶解、张劢勋、沈弋、陈思远4名20多岁的年轻人，大胆地跑到伊朗，展开了创业大计。

        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一样，规定外资公司必须让伊朗人占51%以上的股权。不过，机缘巧合下，陈思远通过当地朋友，知道伊朗有个外商投资部门，能发出外商投资许可证。有了这张许可证，就可独资经营，不必找伊朗人当股东。要申请这张许可证，他们得向当局证明自己的生意对伊朗的文化和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并且对当地人的产业没有冲击。几个年轻人写了很久的报告，最后成功获得许可证。他们的公司，成了伊朗第一家中国人拥有100%股权的公司。

        虽然有了一个好的开始，不过在伊朗做生意，却没有他们想象中简单。单单是要找个合适的铺位，他们就看了四五十个地方。“有时好不容易找到合适的，价格都谈好了，和房东提出要将老旧的店面重新装修一番时，房东却不愿意。伊朗人不容易接受外来事物，总觉得自己的东西比较好。”陈思远苦笑。

        餐厅取名茶怡，装潢由中国公司负责设计，伊朗承包商负责执行，餐具等其他用品全从中国进口。餐厅的装修格调高雅，在伊朗算是相当高级的餐厅。茶怡初期投资成本高达300多万人民币，开了一年多，生意没有想象中火爆，不过总算收支平衡。

        王晶解表示：“在伊朗做生意最大的困难是租金太贵，而且每年都在涨。硬件软件都跟不上。办理清关速度很慢，办签证也很困难，请外国员工需要办工作许可证，一张许可证每个月最低要缴500美元，如果是经理级的，更要1000美元。”

        为了节省成本，茶怡餐厅除了一个烧得一手好菜的杭州厨师，其余都是伊朗籍员工。王晶解表示，当地员工比较散漫，需要特别花时间培训与沟通。茶怡还曾发生过因为开除表现不佳的员工，而被员工告上劳工部的事情。“伊朗人和中国人也有文化上的差异。伊朗人很友善，和他们谈生意，什么都说没问题。不过，接下来，问题就接二连三浮现。”王晶解说。不过，几名年轻人都乐观面对种种挫折，“在伊朗创业的这段经历，就当锻炼、学习。不管这里能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是值得的。”王晶解表示。

        除了餐厅之外，4名年轻人也在伊朗做起贸易，并且开始有了一些成绩。在伊朗的生活诚然没有中国那么舒适，可是，陈思远表示：“只要有钱赚，没生命危险，到哪里都一样。我们父辈都在做生意，影响了我们这些下一代，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干出一番事业。”这几个年轻人成长的环境比父辈优越，但华人飘洋过海打天下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并没有泯灭。

        伊朗的华人企业，不管是中资企业或民间华商，多集中在德黑兰。不过，自从阿巴丹市（Abadan）开了一家“伊朗中国商贸城”后，许多华商纷纷被吸引到这个地方来。

        阿巴丹市在两伊战争前曾是繁华港口，2005年，伊朗国会通过在阿巴丹市开辟阿尔万德自由区的决议，允许外国人在此经商，并给予工作许可签证。这项计划吸引了杨平源、陈志中等几名华商。他们知道伊朗的货物向来从中国进口，而且阿尔万德自由区和伊拉克又只是一水之隔，等于面对着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巨大潜在市场，因此决定在此建立一座商城。

        经过3年的努力，“伊朗中国商贸城”终于正式开业，经营期限为30年。这是一座集批发、仓库、物流、公寓、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商城。商场计划设1500个铺位，目前只完成了第一期，有500个铺位，已经入驻的商户约有200多家，他们多是来自江浙一带，或在迪拜、俄国有经商经验的商户。

        商贸城刚开张时，生意非常火红，而且利润很高，华商都赚了一笔。伊朗政府原本是将阿尔万德自由区划为保税区，可是，一段时间后，由于各种原因，伊朗政府取消了保税政策。如今，华商的货物要进入伊朗，都要缴付关税。伊朗的关税特别重，令华商压力大增。

        除了经常会因政府朝令夕改的政策而头痛外，在伊朗经商还需了解当地的文化。王歌帆分享他在伊朗设立公司的经验时表示，“伊朗因为受美国制裁，社会相对比较闭塞，规矩、文化也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伊朗很保护自己的市场，不是开放型经济。伊朗人自古即有经商传统，善于赚钱，团结对外。因此外国人在这里做生意，容易和当地社会产生冲突。”

        在经商文化上，华人重视口头承诺，因此常感伊朗人出尔反尔。王歌帆表示，“在伊朗，一切都要白纸黑字，仔细地设定条款。入乡随俗，我们既然到了伊朗，就要照这里的游戏规则去玩。了解当地的文化，是成功经营的基础，特别是在伊朗。”他说。

        层出不穷的问题让华商却步，因此，尽管中国是伊朗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前景看好，但在伊朗经商的华人依然不多。

* *中华饭店是伊朗第一家中餐厅。从巴列维王朝时期开始，这间餐厅就存在了，到如今已近50年。那时候，有很多港台商人在德黑兰经商，这些华商大都是中华饭店的常客。不过后来两伊战争爆发，华商都撤走了，中华饭店生意额大受影响。20多年前，对中餐情有独钟的伊朗人Morteza Talbi买下了中华饭店，一直经营到现在。中华饭店未转手前就在那里工作的香港主厨许福隆，在伊朗工作了34年，后来加入伊朗籍。许福隆几年前过世，享年75岁。*
* 伊朗政府深知自身国际形象不佳，因此近年努力通过媒体扩大对外宣传。隶属伊朗新闻部的伊朗华语广播电台，宗旨便是向世界解释伊朗的外交政策和政治立场，以及让全世界的华语听众都能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教义。
* 华语广播电台共有9名职员，其中7名是中国人，负责翻译新闻、播音的工作，此外也翻译一些时事评论。该台的新闻主要来自伊朗广电总局新闻中心，也透过路透社、新华社等新闻网获取新闻。
* 台长马生贵于1989年到伊朗留学，是第一批留伊中国大学生。在马什哈德（Mashhad）的大学毕业后，他继续在德黑兰大学研究所深造，学习伊斯兰和波斯的历史文化。原本他打算毕业后回中国找工作，碰巧当时伊朗有意委任他创立华语广播电台。于是，1995年，他正式上任为伊朗华语广播台台长。
* 这个电台也设有一个网站（http://chinese.irib.ir/index.php），内容甚为丰富，除了有新闻报道、时事分析、古兰经、领袖讲话、书籍园地等栏目外，也积极和听众交流，回答听众对于伊斯兰教和以巴问题等时事的疑问。
* 马生贵表示，还未办电台前，中国人对伊朗的了解很肤浅，只能通过西方媒体间接了解伊朗。“伊朗华语电台为中国人打开了通向伊朗的窗口。中国人曾经误以为伊朗支持疆独，对伊斯兰教不理解。通过电台，听众了解到原来伊斯兰教内部也有很多派别，疆独和伊朗没有关系，也逐渐明白穆斯林里也有理性、温和的，不全是塔利班那样的。”他说。
* 除了马生贵，在伊朗政府机构办事的还有穷人基金会国际旅游组织的范跃铭。这个组织负责开通伊朗与全球的旅游互动。近年伊朗意识到华人旅客市场的庞大，于是找上范跃铭创建了中港台组，负责伊朗文化宣传、旅游宣传、地接等工作。中港台组刚成立时，半年都接不到一个团。经过一番努力，中港台组业务今年大有起色，每个月平均有100个中国人到伊朗旅游。
* 中伊两国自古交好。今天，华人对世界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但是对伊朗反而生疏起来。许多华人热衷学阿拉伯语，但学习波斯语的，却少之又少。
* 目前，在伊朗留学的中国学生介于150至200人之间。他们选择到伊朗留学，一是因为伊朗许多宗教色彩浓厚的大学会给外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二是掌握波斯语的人不多，而中国和伊朗两国经贸合作又越来越紧密，因此许多华人学生都看好学波斯语的前景。据悉，目前在义乌批发市场，波斯语翻译员非常抢手，收入也很高，一天可赚200美元。
* 华人留学生大部分选修波斯语文学系，也有一些选择会计、音乐、艺术及神学系。来自河南的留学生王超是一名穆斯林，曾在中国学习阿拉伯语，目前在伊玛目霍梅尼国际大学进修波斯语。这所大学坐落于德黑兰附近的城市加兹温（Qazvin），大概有30名左右华人学生，以男生居多。
* 王超表示，在伊朗求学的日子，悠闲自在，除了学习没有太多的事做。由于这里没有太多的娱乐场所，所以留学生课余时间，就上网聊天、给家人朋友打电话，或是看看小说、打牌下棋，偶尔和朋友们逛逛街，到伊朗餐厅吃一些风味独特的食物。
* 有时候华人留学生也会组织一些活动，“在这里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第一次和学校里的中国人去山脚下烧烤。大家准备好材料，包车去那里一边抓螃蟹一边吃烧烤。那时我才刚到伊朗两个月，还没适应外国生活，这次烧烤会令我烦闷的心情舒缓不少。”王超说。
* “朋友们都羡慕我能够出国留学，但他们不知道在外求学的苦况。在这里两年，我学会了独立生活，原来在家里的陋习全都改掉了，毕竟在外求学凡事都要靠自己，只有学会独立才能不依赖别人而活。”王超说。
* 毕业后，王超打算回国，他说：“无论以后是打工或自己开公司，都不想留在伊朗发展。外国人在这里开公司受到很多限制，所以大部分中国人都选择回国。”
* 虽然中国留学生毕业后未必会留在伊朗，但这些在伊朗生活过的学生，对伊朗肯定有更深层的了解。他们将成为未来中伊两国间的桥梁，不论是中国人到伊朗发展，或是伊朗人到中国寻找商机，他们都将起着重要作用。
* 伊朗和中国在经贸上的合作越来越密切。在伊朗市场上，中国货占了很大的市场份额。遗憾的是，伊朗市场上的中国货，多由伊朗商人前往中国采办，或通过迪拜转口到伊朗。直接前往伊朗开公司的个体华商，相对来说少之又少。
* 进入伊朗的华商不多，但为了爱情而来到伊朗的华人女性却不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她们来到伊朗，重新认识这片古老的土地，并渐渐爱上这个热情而有礼的国度。回首千年风霜，这段由迢迢遥遥的丝绸之路串连起来的情缘，原来不曾断绝。
* 在阿拉伯文中，科威特意为“近水的城堡”。但是，科威特绝大部分国土被沙漠覆盖，国内全无河流，极缺淡水。夏季气温高达50℃，夏长冬短，炎热干燥，湿润多雨。
* 多年来，这个海湾六国中最北端的国家，一直强调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可是，夹在伊朗和伊拉克两大强邻之间，科威特注定难以独善其身，常保安宁。
* 7世纪时，科威特原是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1756年，萨巴一世（Sabah I bin Jaber）被推选为科威特第一任酋长；至今统治着科威特的酋长，就是萨巴一世的后代。1871年，科威特成为奥图曼帝国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沦为英国的保护国。1961年，科威特宣布独立，并于同年成为阿拉伯国家联盟和联合国成员国。
* 自1930年发现油田后，科威特的经济开始腾飞，成了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人均生产总值全球排行第四；截至2007年，科威特已发现油田的储存量位居世界第5。石油、天然气工业是科威特的经济命脉，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国家出口收入的92%。
* 科威特于1971年和中国建交，是海湾六国之中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两国之间的交流也分外密切。科威特一直都把中国视为重要的外贸合作伙伴，并于1980年代签订了一系列的协定，以促进两国的经贸关系。
* 虽然中国与科威特有许多方面的经贸交流，但是真正将大批中国人带入科威特的还是工程及劳务承包。早在1970年代，中国就已经有对科援建项目，以协助科威特建筑民宅。
* 80年代是中国工程及劳务承包在科威特的全盛期，中国公司的人力成本低廉，技术水平又良好，在科威特极受欢迎，当时来自中国的建筑劳务人数高达1万5000人。
* 至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在科威特的中国工程劳务承包公司至少有14家，所承包的项目以政府投资的普通民宅为主。当时中国公司并不是总承包，只是纯粹提供劳力而已。中国人盖起房子来又快又好，科威特的住房有75%以上都是他们所建。
* 科威特今日的繁华，说是由中国劳工的汗水灌溉出来的也不为过。
* 海湾战争爆发期间，外籍人士纷纷撤走，包括大部分中国籍及其他国籍的华人。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华人不得不留下来，在受到严重污染的科威特工作。
* 部分留下来的华人，由于受到贫铀弹的核辐射，加上其他不知名的化学武器的影响，结果患上了“海湾综合症”。海湾综合症的患者会产生染色体变异，神经、免疫、呼吸、内分泌和生殖系统等都会受到破坏。这些不幸的华人当中，就包括了从1989年开始便在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工作的孙渤。他在战时留在科威特，曾经帮助过240多名中建公司的中国人及时安全地撤离，并负责清理战场和搜集材料等工作。
* 海湾战争结束之后，来自中国的工程与贸易公司是国际间最快重返科威特，并参与战后重建工作的企业。伊拉克在撤退之前，纵火点燃科威特的多处油井，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也及时派出灭火队，给予科威特极大的帮助。
* 在海湾战争以前，中国工程以及劳务承包多数为低端承包。但是在海湾战争之后，因为西方公司不敢贸然回到海湾，中国工程和劳务承包公司便趁此时机，标到了许多战后重建工程的总承包合约。
* 由于中国工程承包公司已经发展到全方位及更专业的阶段，因此出现在科威特的中国人也不再是建筑民工，而是多了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建筑师、研究人员等专业人士。
* 美伊战争在2003年爆发之后，造成波斯湾一带人心惶惶。科威特与伊拉克的距离最为靠近，与伊拉克积怨极深，科威特华人无不担心美伊战争会波及科威特，因此能走的都走了。但是，一些到科威特工作的华人都已经签署了合约，若是合约未到期就擅自停工，多个月的薪水便将付诸东流，因此，这些华人最终还是决定继续留守。后来察觉局势并没有怎么恶化，离开的华人又纷纷回到这里。
* 科威特小国寡民，又曾经发生多次变乱，可是不管局势如何，华人始终对这个地方不离不弃，每一次危机过后，华人总是会回到这里重新开始。
* 科威特的华人人数，经几次剧烈变动，至今有5000人左右。根据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统计，科威特的华商约有150至200人左右，护士约20人，体育教练约25人，工程与技术人员约50人，大学教授与研究员等专业人士约30人，保健按摩与美容院从业者约150人，中餐馆从业者约60人，民营劳务承包公司的劳工约300人。这些来自民营小型公司和以个人名义到此打工的华人加起来不超过1000人。其余的华人，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国有企业及相关公司带来的员工及劳务人员。由于华人稀少，工作单位也各不相同，科威特没有明显的华人聚居地，在全国6省，都可找到他们的踪影。
* 和其他海湾国家一样，科威特不接受移民，甚至不发永久居留证。同样是宗教色彩浓厚的阿拉伯国家，这里禁酒、禁猪肉，也缺乏其他城市多彩刺激的娱乐生活。
* 快乐也许难以实物衡量，不过，有许多华人愿意把孩子接到科威特受教育，更多华人愿意长居于此，也愿意聚在一起分享生活，从这些实况可以看出，相较其他海湾地区的华人，科威特的华人似乎有着更高的快乐指数。
* 不久后的将来，科威特皇宫旁，将矗立起一座240公尺高的壮观新地标——科威特中央银行。作为科威特最重要的金融机构，科威特中央银行的图样也将被印在科威特的钞票上。而负责把这座地标性建筑一砖一瓦建起来的，正是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 科威特中央银行的合同总额高达4.06亿美元，这次获标，说明了中国工程承包公司已经开始进占高端建筑工程的总承包业务。除了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冶集团也成功获标承建奥林匹克大厦的结构工程。其他在科威特取得不俗成就的中资公司尚有葛洲坝集团、中交集团（前中中港）等。
* 这些规模浩大的建筑工程，除了需要大量的劳工，也把中国建筑、石化、工程等专业人才带到科威特。单是科威特中央银行一个项目，就引进了800至900人。不过，随着中资公司进军总承包项目，这些高端项目的建筑团队也越显国际化。科威特中央银行的建筑团队里，虽然从最低层的工人到最高端的管理阶层和工程师都有中国人，可是，外国籍员工也不少。中建总公司副总经理杨春森指出，在国际化的市场，一个多元化的团队有助中资公司在当地站稳脚步。
* 和1980年代中资机构初进入科威特市场时比较，现在中国籍的工程师待遇好多了。当时，中国籍工程师一个月薪水只有130多美元，而当地及欧美籍的工程师则享有至少1000美元的薪水。今天，拥有两三年工作经验的中国籍工程师有2000多美元的薪水，5年以上的则在3000美元以上，虽然仍然和外国工程师的待遇有一两倍的差距，但差距已明显缩小。
* 杨春森表示，中国籍工程师做事比较有系统，而且对建筑规范的理解很全面。可是，由于不了解科威特的惯例，跟业主打交道需要时间才能慢慢上手。“这些都是经验的累积；只要肯努力，中国工程师能比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做得更好。”杨春森表示。
* 中建总公司的工程师李彪抱着到国外学习的心态来到科威特。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一代中国年轻人勤奋好学，很得上司赞赏。对科威特酷热的天气，李彪不以为苦。“我们语言（英语）比较不行，趁着在国外的日子好好学，对将来有帮助。”李彪说。
*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人均收入提高，中国工人的薪水也水涨船高。不过，中国工人的工资虽相对较高，却比印度、巴基斯坦工人更有效率和经验，因此，很受劳力市场欢迎。此外，中国工人喜欢承包制，按量计算工钱，而印、巴籍及越南籍的工人，则习惯按日计算工钱。
* 中国工人在中东曾屡次发生罢工示威事件，不但延误在建工程的进展，也严重影响中资公司的形象。为了避免工人被不实宣传误导以及受到中介公司欺诈，中资公司近年已经逐渐采取直接面对工人，直接跟工人签合同、付工资的策略。而随着经验的积累，建筑公司也发现，输入工人最迟必须赶在三或四月份前，让工人逐步适应科威特的天气。如果工人六月才抵达科威特，一开始就得承受科威特夏天惊人的高温，又以为科威特一年到头都是这样的天气，难免怨气满腹，觉得自己被骗到人间炼狱工作，因此很容易闹事。
* 除了中资公司，来自中国的民营小型工程公司也在科威特取得不错的发展。这些民营小型公司多数来自江苏东海县，在中国是股份制的劳务中介公司。他们获得分包后，就自己组成建筑团队，从中国输入大批民工。
* 到科威特的工人一般都签两年的合同，两年能赚1万2000美元左右。许多中国工人都迫切希望，随着人民币汇率的上调，他们的工资也能提高，但这样的工资水平，从上世纪90代到现在都没有调整过。不过，由于赴科工作的手续费比较低，而且不必经过考试和培训，因此还是有不少中国工人愿意到科威特工作。
* 1997年就到科威特发展的民营工程公司代表葛宜兵表示，在科威特工作其实没有比在中国累，这里机械设备先进，所以工作起来没有太吃力。虽然科威特温度高些，但是，由于气候干燥，工人工作起来反而比较舒服。夏季时，也会避开最高温的时段，甚至改在夜里施工。工人生活的环境比较好，闹事的情况便也减到最低。
* 经过去芜存菁的过程，目前在科威特的民营工程分包商多是信誉比较卓著的，譬如马俊坤与葛宜兵等。葛宜兵表示，做工程就跟做生意一样，有时也会赔。但是，一定要维持信誉，以后才有做下去的机会。
* 在海湾六国中，科威特发展得比较早，保护劳动工人的制度也比较完善。科威特的建筑工人一天工作9个小时，每周休息一天。如果超过9个小时，资方需要征求工人的同意才能加班，并且给予双倍酬劳。科威特政府也会通过监理公司调查工人的施工与生活环境，风沙眼镜、安全帽等设备都要齐全，以确保工人的安全，宿舍里也要有冷气等设备。
* 中国建筑劳工在科威特的基本生活条件获得一定保障，唯一的无奈，也许就是生活比较单调。每周的休息日，他们的活动不外是洗衣、打扑克牌、看电视、逛超市。许多工人工作的工地，就在大沙漠中央，要上哪儿都不方便，生活的范围，就只有那窄小的宿舍。举目四望，滚滚黄沙无边无际，想到家乡妻儿，难免倍感寂寥。
* 每当沙尘暴来袭，人的身影在漫天风沙里显得格外渺小。可是，撑起科威特半边天，令这个沙漠上的富国得以持续繁华的，正是这些渺小的身影。

      除了中资机构和民营工程公司，科威特也吸引了不少华人专业人士。这些白领精英，主要分布在石油与电信服务两大行业。科威特人力资源非常匮乏，加上科威特希望在2020年可以增加一倍石油生产量，达到日产石油400万桶的目标，因此，在未来十几年内，科威特的工作机会还是很多。

        为了吸引全球精英，科威特提供优渥的薪金与福利予顶尖专业人才。可是，对华人专业人士来说，科威特最吸引他们的，其实不是工资，而是机会。

        很多华裔专业人士毕业自欧美国家的大学，他们在欧美工作所得工资和科威特相比，其实差不多。可是，在欧美国家，华人往往只被赋予执行与技术上的工作，要坐上负责“决策”与“管理”的职位，还是比较困难；来到科威特，他们却能进入公司高层，了解整个公司的运作。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事业上的突破。

        就算不想长期呆在中东，有了这些履历，他们以后在别的国家求职时，要坐上管理层的位置，也比较容易。比如从加拿大应聘到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工作的高级工程师叶林，不到两年内，在石油勘探分析领域里有新的突破，大为公司赏识，并加级奖励，成为其他华人白领们的楷模。

        相对其他国家来说，海湾国家的工资已算很高。而在海湾国家中，科威特的工资似乎更为优渥。大学生的基本月薪从600至700第纳尔起跳；普通小型公司的秘书也可拿到200至400第纳尔的月薪，大型石油公司的秘书月薪可高达600第纳尔；一般的行政级人员，月薪介于2000至4000第纳尔之间。如果是管理阶层或专业人士，薪水更是远远高于此数。

        此外，科威特尚有许多华人技工分布在全国各家工厂里，譬如在Al Meer石油天然气控制台生产与销售商工作了两年的苗俊昌与莫建龙。在Shamlan制管厂，也有6名来自中国的工人团队。

        这些中国技术工人虽然英语不好，可是，由于他们的工作属于技术性质，因此沟通不便对工作的影响不是很大。事实上，科威特的雇主对华人员工的表现一般都非常满意。工作认真是华人员工最大的特点，Shamlan制管厂的中国工人，有的因为气候不适皮肤长了肉瘤，有的被硫酸灼伤，可是，他们仍然坚持上班完成工作。

        Al Meer公司的生产经理Reda E.Ahmed对他厂内的两名中国员工更是赞不绝口。Al Meer厂内的大型精密机械购自中国，中国供应商委派莫建龙协助Al Meer使用与维修机械。Ahmed非常欣赏莫建龙的工作表现，于是向中国厂方强烈要求，把莫建龙留了下来。他表示，中国人从不请假，学习能力强，且非常聪明，总是能解决生产线上的疑难杂症，还懂得利用电脑来改善生产程序。

        和许多海湾国家的华人比较起来，科威特华人显然是对居留国家更为乐观。到其他海湾国家如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经商或工作的华人，都把妻小留在原居国，或把孩子送到欧美国家受教育，忍受两地分隔的痛苦。可是，在科威特的一些华人，却愿意把家人接到科威特，让孩子在科威特受教育。这一现象，不局限于领着高薪的专业人士，连当护士的、开小饭店的华人，都把孩子接过来。他们有钱的就把孩子送到英国人、美国人办的国际学校；没钱的，就把孩子送到菲律宾人、巴基斯坦人办的国际学校。

        在科威特国家科学院工作的赵永平，曾在美国生活多年。比较起科威特与美国，他认为科威特是个更适合家庭生活的地方，除了待遇好、免税，公司提供住房、孩子教育的津贴，生活与工作压力也没那么大。“科威特是个福利国家，隐形福利已经涵盖了生活的基本需求。在美国，太太需要工作，收入才能和在科威特的所得持平。”赵永平说。赵永平也和其他华人一样，忙着送孩子上才艺班。由于科威特是个富裕的小国，因此，要为孩子找到一流的老师并不难。在其他国家如美国，父母往往需要挤破头，才能把孩子送到比较好的学校及才艺班。有的父母甚至还笑说：“科威特诱惑少，不必担心孩子学坏。”

        哈萨阿布瓷砖加工厂的工人霍海营，在科威特生活了7年。除了收入不错，他在这里也有许多朋友，大家通过科威特伊斯兰教宣传中心及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办的活动认识后，保持良好关系，互相扶持。他每个星期五都到伊斯兰教宣传中心，还成了虔诚的回教徒。由于深深觉得科威特是个好地方，所以，他不但把妹夫、弟弟都接到科威特工作，不久前，还把大儿子也接到科威特来，并为儿子安排了一份按摩的差事。

        科威特没有五光十色的生活，但是，住下来后，许多华人家庭，渐渐喜欢上这里平淡安稳的生活。

* *成立于1983年的“孔雀餐厅”是科威特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中餐厅。它坐落于丽笙酒店（Radisson SAS），是整个中东地区最奢华，格调最高的中餐厅之一，顾客以科威特皇族与商贾为主，中国大使馆有时也会在此宴请贵宾。餐厅的招牌菜如炸虾土司、四川辣酱鸡、北京烤鸭等，陪伴许多科威特有钱人家的孩子长大。由于顾客对这些菜式都很熟悉，点菜时可以直接叫出这些菜式的号码，所以中餐厅的菜单一用就是20多年，不敢随意更换。*

       科威特的个体华商不多。他们多是夫妻档或由二三个亲戚，一同经营着微型贸易公司。其中，贸易商余美娟，已经是相当成功的玩具供应商。为了节省开支，余美娟没有租店面，甚至没有住房，夫妻俩和大伯一块住在仓库里，开着小货车到处卖货。由于看准在这里做生意的人不敢倒账，她是少数肯赊账给顾客的供应商。余美娟认为，科威特打击商业罪犯严厉，如果顾客倒账，只要发货单上有顾客的签字、店名、地址等，把发货单拿到警察局，对方就不能出境。由于她生意手腕灵活，经过磨合，跟科威特各路客人关系都很好。

        除了余美娟，床具贸易商王素霞和首饰批发商申志江也都在科威特闯出了春天。“在科威特做生意，规模很难做大，一个产品如果发两个货柜的货，肯定卖不出。所以别指望能发大财。不过，要养家糊口，不是问题。”申志江表示。

        对许多华商来说，科威特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而是出于偶然——碰巧有这样的机会，就过来姑且一试。申志江在科威特安定下来前，曾在俄罗斯做过生意，王素霞也曾在迪拜做过买卖，他们都深觉科威特不似其他地方政治腐败，商场凶险。这里没有苛捐杂税，政府廉洁，商场稳定，生意虽然很难做大，但竞争不至于太激烈，加上这里治安良好，生活有安全感，因此都爱上了这个地方。不过，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很多科威特的商家已经开始直接到中国订货，科威特华人进口商的生意，也越来越难做。

        虽然如此，科威特华商仍然不轻言放弃。伊拉克的局势已经趋向和平，重建伊拉克，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而科威特就是进入伊拉克的门户。这就是科威特华商的契机所在。只要守得下去，就会遇上这个契机；只要守住科威特，就能得到伊拉克这个大市场。科威特华商相信，终有一天，科威特会成为繁华商埠。

      科威特的华人是幸运的。有一群降临人间的天使，总会在他们碰上病痛时，适时出现，为他们解困。这群天使，便是科威特的华人护士。虽然只有区区20多名，华人护士却是科威特华人社群里的灵魂人物，他们大多数来自中国，来自港台的护士只有三四名左右。

        1990年，中国政府鼓励劳务输出，于是卫生部搞起护士劳务项目，从全国选派了35名护士到科威特。于玲英是这35名护士里的其中一人，回忆当时的情况，由于选拔后就碰上海湾战争，他们是等到科威特解放后，于1991年9月才到达科威特。当时，科威特黑烟熏天，不利一些慢性病如糖尿病、哮喘病等病人的健康，医院里病人很多，但许多外籍护士都还没回来，护士短缺，所以他们连培训的时间都没有，就直接上岗。那段时间，护士们工作非常紧张，上了早班又要上夜班，而夜班只两名护士，工作量非常大。

        今天，首批来到科威特的中国护士，只剩她一人。不过，此后陆续有许多批中国护士来到科威特，顶峰时期曾达到300多名，可是，他们大部分都在数年后选择到别的国家或回国发展。目前仅剩的20多名华人护士，散布在全国6个行政区不同的医院里。资历较久的护士，除了于玲英，尚有1995年到达科威特的刘芳和1996年到达的臧凤。中国护士在整个科威特护士群体里，还不到1%，他们绝大部分是通过国家派送到科威特的，只有极少数几个如刘芳，是自己来到科威特申请工作的。

        刚到达科威特的华人护士，英语明显比菲律宾、印度籍的护士差，由于面对语言障碍，电话响了不敢接，交班的时候，和其他护士也难以沟通。可是，经过几个月勤学苦练，他们都能克服语言障碍。有些华人护士如臧凤，不但练就了流利英语，还学会阿语。

        虽然语言能力不如其他国籍的护士，但华人护士却赢得科威特社会一致赞赏。阿拉伯人性子急燥，可是，当他们一看到中国护士，态度马上变得很好，不敢乱发脾气。医生对中国护士的态度，和对待印度、菲律宾籍的护士比较起来，也明显特别尊重。

        这是因为中国护士比较逞强，希望各个方面都做到最好，专业水平也最高。也因此，中国护士往往被挑到特殊护理病房去，病人要打针时，也常指定要中国护士代劳。刘芳表示，中国护士少，只要一出错，就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她们更要自强。

        不过，科威特却也不特别热衷聘请中国护士，第一，中国护士英语较差；第二，很多中国护士都把科威特当跳板，英语练好了，培养好了，就跑到欧美国家；第三，中国护士比较认真，医院或上级有什么不对，都会直接反映出来。也因此，在科华人护士的数量，大不如前。

        在科威特华人社群里，华人护士深受大家敬爱。这里看病手续繁冗复杂，医院又分区域和等级，从一个等级的医院转到另一个等级的医院，需要介绍信，因此有时看个病得拖上很久。许多华人英语不好，因此看病时备感困难。华人护士总是尽自己的能力，义务当华人病人的翻译，帮他们处理看病手续、拿报告等，甚至想方设法为经济有困难的华人筹款治病。许多华人一生病，不直接到医院挂号，反而先给护士们打电话。

        这群白衣天使虽不是有钱有势之辈，却是尽了他们的力量，守护科威特的华人。

  和海湾地区其他国家比较起来，科威特华人无疑更有凝聚力和归属感。而把科威特华人串连起来的，正是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这是科威特唯一的华人社团，比起邻国阿联酋的众多华人社团，在数量上虽较逊色，可是好的社团一个就够了。

        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成立于1997年，是一个由民间和官方共同创立的社团。当时，科威特的华人体育教练碰上一些麻烦，于是请来资深华人董泰康帮他们向大使馆反映困境。经此一事，中国驻科威特大使张志祥意识到科威特需要一个民间华团组织，作为大使馆和在科华人的桥梁，因此提议并协助董泰康成立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

        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创办人董泰康一直担任会长至今。十多年来，该协会办过许多活动，譬如2005年，与景德镇陶瓷工厂合办了中国景德镇陶瓷文化展览会，向科威特介绍中国陶瓷之美；非典、南亚海啸、四川大地震等灾难发生时，发动筹款运动等等。

        每年的春节联欢会更是科威特华社不可或缺的盛事。近年来，春节联欢大会由科威特华华人协会与科威特宗教福利部联合举办，2005年举行时，共有300人出席；到了2007年，人数已增加到600多人，出席人士上至科威特宗教部次官阿迪勒 法莱赫博士、中国驻科威特大使吴久洪，下至中资机构、华人华侨、留学生代表等等，一些当地科威特人士也应邀出席，科威特国王Amir特发贺电祝中国人民幸福。

        不仅出席率逐年升高，春节联欢晚会也办得一年比一年精彩。联欢会现场挂满红灯笼，丝竹之韵夹杂着噼里啪啦的爆竹声，春节气氛非常浓厚，远离亲人与故乡的华人在热闹喧嚣中，重新感受故乡的温暖人情。中国驻科威特使馆文化处曾经在一个晚会现场举办一个以“春节”和“窗花”为主题的展览。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还特地请来新疆杂技团，为嘉宾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演出；而生活在科威特的华人华侨子女以及科威特阿拉伯俱乐部的青少年朋友，则表演了歌曲、中国功夫等节目。当晚的“年夜饭”，是一顿丰盛的饺子宴。晚会结束前还有中科友好关系知识竞赛和幸运抽奖。

        春节联欢晚会获得科威特国家电视台、科威特通讯社、舆论报、消息报等当地媒体报导，说明了这项晚会已经受到当地社会重视。春节联欢晚会除了让平时难得聚首的华人得以共聚一堂，更提高了华人在科威特的知名度，让科威特人得以体验华人春节的喜悦，促进了中科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

        不过，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成为在科华人心目中一盏明灯的原因，并非这些官方活动，而在于协会会长与理事们对会员私底下的帮助与付出。该协会的理事来自各个领域，包括医护人员与熟悉当地法律的公务员等，举凡华人碰上困难，无论是生病、签证出现问题、遇上法律麻烦等，协会的理事们都会尽量帮忙。十多年来，部分理事足迹走遍了当地警局、监狱、法院及机场，为近600多名华人排难解纷，捍卫着华人在科威特的正当权益，甚至坚持数年为突发车祸而丧身的侨民家属争回应得社会索赔或保险费用。

        除了大型活动，协会也常常举办茶会，有时邀请小型公司的商人们，有时邀请建筑师、工程师等专业人士，让有相同背景，相同话题的一群人聚在一起，联络感情，交换生活讯息，认识新来乍到的朋友。这些小小茶会，虽然规模不比大型活动，却实实在在地把散布在各个领域、地方的科威特华人串联起来。

和其他海湾国家的华人社团比较，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显得特别有活力。虽然同样是非移民国家，但因为有了社团积极地把当地华人联系起来，科威特华人的生活，也因此仿如枯燥的沙漠里，多了一股汩汩温泉般，生气盎然。

        除了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IPC（Islam Presentation Committee，伊斯兰教宣传中心）也是一个深为科威特华人熟悉的机构。IPC隶属科威特宗教部，是一个文化交流机构，为各国侨民提供文化咨询，亦开办阿拉伯语文班，免费让侨民学习阿语。除了和华侨华人协会联办春节联欢会，IPC办的活动还包括带工人去郊游等，因为体谅工人收入低，参加郊游的工人甚至还能获得IPC的交通补贴费。IPC有几位中国老师，熟悉法律事务，精通阿语，中国人遇上什么困难，尤其是法律方面的难题，都会向他们求救。多年来，马俊坤、陈道亮这些中国老师，为华人到处奔走，帮工人办工伤保险，深受爱戴。

       在小小的科威特华侨华人群体中，有一群崭露头角的新生代，他们秉承着父辈的优良传统美德，又怀着自己的青春梦想；他们在学校品学兼优、名列前茅，还具有出众特长，并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和文艺演出。

        他们当中，有优秀少年武术运动员、有朗诵可兰经的最优秀获奖者、有芭蕾舞和民族舞的尖子，更有乐坛的新秀，例如：冯梦竹于2008年，获英国皇家音乐学院8级证书，并连续得到海湾青年音乐大赛木管乐器冠军，现已进入英国大学深造。

        又如：15岁的李飞雪，自幼学弹钢琴，成绩优越。她获得科威特肖邦钢琴比赛第一名、海湾肖邦钢琴比赛第一名、波兰大使特殊奖，科威特宫廷事务大臣特殊证书、阿拉伯金帆船奖、2010年海湾肖邦钢琴大赛总奖，被报界普为中国的金凤凰。她还应邀参加2010年8月在波兰举办的伟大音乐家肖邦诞生两百周年的盛典！而她6岁弟弟李海威，学习钢琴才一年多，就获科威特肖邦钢琴大赛（9岁以下级别）第一名，海湾肖邦钢琴大赛波兰大使特别奖，公评为小神童。

        如果说，有一双手，把散落在各个领域的科威特华人，穿针引线，编织成紧密的一个团体，那么，这一定是董泰康的手。如果说，有一双眼，见证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历史，看尽了华人在科威特的跌宕起伏，那么，这也一定是董泰康的眼睛。

        董泰康是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的创办人与现任会长。早在1985年，董泰康就接受妻子姑父的聘请，到阿联酋阿布达比打理红木家具的生意。1987年，董泰康被调往科威特开拓红木家具的市场。当时，中国的红木家具深受阿拉伯人的欢迎，因此公司赚了不少钱。可是，董泰康看到了科威特庞大的石油、建筑市场，加上本身的大学专业是自动化控制，希望能学以致用，因此，两年后，他和担保人各拿出1万5000美元，组成了一家贸易公司。

        岂料，1990年，公司刚成立不久，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战后，许多商人不敢踏足中东，董泰康却趁着科威特百废待兴的时机，迅速拓展生意，公司从此上了轨道。

        1997年，董泰康成立了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在董泰康积极经营下，该协会成了中东地区最活跃的华人社团之一，为当地华人作出许多贡献。该协会的理事孙亚茹女士表示，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能办得如斯成功，主要是因为领导人董泰康特别热心，该协会办活动，很多时候都由会长一个人掏腰包出经费。“没有董先生的努力，就没有今天的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她说。

        董泰康育有二女。两个女儿都在科威特念中学，并先后到加拿大念大学。目前，一个女儿留在加拿大发展，另一个则到了深圳，只有太太留在科威特陪伴他。

        虽然已经有点年纪，可是，身为Zahra-MAPCO公司董事总经理的董泰康，仍然充满雄心壮志，他期待着伊拉克战后重建工作的商机，把他的事业带上另一个高峰。

        酷热的气候，加上文化差异，令许多在海湾国家生活的华人无法适应，因此流动率很高。可是，许多来到科威特的华人，虽然明知道不能入籍，却有长住下来的迹象。

        不管是长居或短住，他们对科威特的怨言，都比其他海湾国家的华人来得少，更能享受异乡的生活。这也许是因为科威特有个很活跃的华人社团，把科威特华人连接在一起；也许是因为科威特健全的社会制度，令外来者的生活有一定的保障；也许，这更是因为，科威特的华人，肯用心去生活，发掘平淡日子里小小的快乐。

      卡塔尔是个从沙特阿拉伯向北延伸至波斯湾的小小半岛，南北全长仅160公里，东西宽80公里。属热带沙漠性气候，夏季酷热干燥，气温高达摄氏50度以上，冬季比较凉爽，最低气温达摄氏7度，年降雨量仅125毫米。

        公元7世纪时，卡塔尔属于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1555年并入奥斯曼帝国，被土耳其统治了200多年。1846年萨尼·本·穆罕默德建立了卡塔尔酋长国。1882年沦为英国保护国，直到1971年9月3日宣布独立。

卡塔尔

卡塔尔曾是个靠渔业和珍珠养殖业支撑全国经济的贫穷小国，直到1940年代发现石油与天然气后，经济才开始起飞，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1995年，埃米尔（酋长）哈马德·本·哈立法·阿勒萨尼发动政变，从父亲手中夺取政权。在他的统治下，卡塔尔开始一系列现代化改革，社会开放，妇权提高，而代表阿拉伯势力与西方抗衡的半岛电视台也随之诞生。他也建立君主立宪制，任命内阁首相。

        为了减少对石油与天然气的依赖，卡塔尔近年致力把首都多哈发展成区域金融之都，又建设科学技术公园，鼓励发展知识经济与商业活动，开始向外国人打开大门，吸引了近5000名华人的到来。可惜卡塔尔的发展始终不及邻国阿联酋迪拜般，举世瞩目。  卡塔尔与中国自汉唐时期就已经有来往。特别是在唐朝时期，两地商贸往来频繁。卡塔尔曾盛产珍珠，多哈则是珍珠的聚散港，当年郑和极有可能是为了取得历史上著名的“湾珠”而来到阿拉伯半岛北岸。

        1988年7月9日，中国和卡塔尔建交。那时卡塔尔仍然未大事发展，市场更暮气沉沉，只有6名中国人在此居留。1995年，在埃米尔哈马德·本·哈立法·阿勒萨尼夺权上位之后，他积极地利用石油及天然气所带来的资金，大力发展国家的基础建设，改革国家的经济，在推动商业活动方面不遗余力。

        然而，快速的城市建设是需要大量劳工的，但卡塔尔国小民寡，所以建筑劳工需从国外大量引进。于是，除了印度人及巴基斯坦人外，华人劳工也开始在卡塔尔出现。

        从1997年到2007年，卡塔尔的华人人数从60人增长至大约5000人，除了大量的建筑工人，也有一些是工程师、空服人员、体育教练等。

        2004年，新加坡积极地发展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政府鼓励之下，许多新加坡公司纷纷在卡塔尔设立了子公司，因此，在卡塔尔的土地上，逐渐出现了大批以华裔为主的新加坡人。

* *卡塔尔的建筑没有门牌。寄信时，所有住宅或商用建筑都用“P.O.Box”。就算某条路在地图上标有路名，路人或司机也不会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因为这里的路名常常改变。所以，告诉出租车司机自己要上哪儿时，最好能说出目的地附近的一个地标，譬如某家大酒店或商场。当地华人邀请朋友到自己家，都必须亲自给朋友带路一次，以后朋友才能告诉出租车司机怎么走，不然很难找到。*

      虽说卡塔尔有约5000名华人，可是，要发现华人的身影，不是件易事。主要是因为占了这数据绝大比例的建筑劳工，日常多呆在工地里，鲜少到街上走动。而这5000人的数据，也只是当地华人的粗略统计。上千名华人劳工随着工程的开展而来，亦将随着工程结束而离去。因此，人数的起落颇大，往往在数个月间相差好几千人。

        近年卡塔尔加速经济与城市建设，世界各地的华裔理工精英，如工程师及建筑师等，也纷纷被卡塔尔提供的高薪优职吸引而来。此外，卡塔尔的华人还包括商人、餐饮业者、空服员、技术工人等。

        外来者占了卡塔尔人口结构很大的比重。据统计，未来两三年内，移居到卡塔尔的家庭数量将达到20万户，至2012年，这个数字预料将攀升至50万户。为了吸引更多人到此就业，卡塔尔法律允许持有工作准证的人把家人都申请到卡塔尔来住；一家人不但可以到移民局申请身份证，获取健保卡，考取驾驶执照，还能把孩子送到学校念书。可是，外国人无论在卡塔尔住上多久，即使是在卡塔尔出生的孩子，都很难成为卡塔尔公民。换句话说，卡塔尔欢迎外国人，却不接纳外国人成为他们的一分子。

   卡塔尔原是个贫困落后的沙漠国家，完全引不起华人的兴趣。十几年前、卡塔尔政府几近破产，虽然天然气储存量居世界第三位，却必须向他国贷款才能开采。直到2000年，卡塔尔掌握液化天然气技术后，经济腾飞，成了暴富国家，才开始引起华人注意。根据联合国及世界银行的资料，2007年卡塔尔的人均收入已达7万2795美元，位居世界第五。而卡塔尔现任埃米尔也有意走迪拜的路子，积极发展金融业。在两个飞速发展的国家中，阿联酋暂时占尽上风，成为全球瞩目的钻石，形成华人大量涌进阿联酋的局面。

        然而，也有小部分华商，看准卡塔尔庞大的消费潜力，市场竞争不似迪拜般激烈，虽然人口少市场小，但市场还未被过度开发，进入市场的门槛较低，比较容易生存，因而到此寻求商机。

        中国金信商店的老板张胜育就是一例。7年前，他来到卡塔尔做起百货批发贸易，从2002年到2003年，他在多哈连续开了4间店，生意扩展得很快。今天，他已经是卡塔尔规模最大的华人贸易商，产品以服装为主。

        卡塔尔店租近年涨幅惊人，而且由于房屋短缺，要找间店面也难，因此，像张胜育一样有店面的华商，只有3人。其他的华商，多数都是近期才从迪拜过来碰运气、探市场的。没有根据地，他们就在街头兜售；这些华商来来去去，流动量很大，难以计算。

        卡塔尔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做生意不必缴税，入口货物报关方便，只要无知识产权问题，一般不会有什么麻烦。没有复杂的报账程序，做生意变得很简单，连会计都不必请，任何收入支出，只要抄一抄自己明白就好了。

   华商的货一般都批给在附近做生意的印度人、孟加拉人、索马里人。可惜的是，卡塔尔市场有限，吞吐量不够，不能把生意做大。像张胜育一样一年营业额达到1000万人民币以上，利润有100至200万人民币的华人小型企业，在卡塔尔并不多见。

        在这里经商，最叫华商头痛的，还是卡塔尔的担保人制度。卡塔尔法律规定，外国人在当地开公司必须有卡塔尔人做担保，而且担保人必须持有至少51%的股份。为了开公司，许多华商于是和卡塔尔人签下协议，生意由他们完全出资、操作、卡塔尔人只需挂名，赚来的利润大家分享。此外，当地的经营审批、租房、引进劳工、办理驾驶执照、开通电话或有线电视、个人离境等一切活动，都需要一个卡塔尔人做担保签字。因此，

        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担保人，成了华商生意能否成功的关键。

        由于卡塔尔人在法律上占有51%的权益，加上卡塔尔法律完全偏袒当地人，要是双方闹翻，最终吃亏的只会是华商，而且大有可能连血本都要不回来。尽管卡塔尔人恶意欺诈的情形并不多，这种担保人制度还是令华商不安，尤其小型华商，更不敢在此地做大手笔的投资。

        囿于市场发展空间，再加上对外来投资者不利的担保人制度，华商皆无长期在卡塔尔发展的打算。卡塔尔，只是他们的一个跳板，许多华商坦承，他们都在其他国家找着投资的机会，就连已在卡塔尔基础稳固的张胜育也不例外。

  卡塔尔热衷体育。国土虽小，卡国的足球队却足以和中国队抗衡，十几年来，多次成了中国进军世界杯的绊脚石。确定承办2006年亚运会后，为了在亚运会上吐气扬眉，卡塔尔更是重点发展体育运动，重金礼聘外籍运动员和教练加盟。

        身高体健的非洲裔球员最受卡塔尔足球队青睐。而经验丰富的中国籍体育教练，则是卡塔尔体育局频频招手的对象。目前，卡塔尔共有11名中国籍体育教练，排球教练占了4名，乒乓教练占了6名，还有一名是射箭教练。其中两名最资深的中国体育教练，分别是排球教练虞重华和射箭教练李玲娟。

        61岁的虞重华在卡塔尔当排球教练已经11年，是体育总局公派卡塔尔的援外教练，目前在阿赫里排球俱乐部当技术指导。2006年，阿赫量俱乐部在虞教练的率领下，获得卡塔尔全国联赛第3名，这也是该俱乐部历来最好成绩，唯虞重华谦虚表示成绩仍可更好，可惜俱乐部给的资金有限，很多训练方案难以实施。

        虞重华在卡塔尔生活多年，为人热心，俨然成了当地华人心目中的侨领。许多初到卡塔尔的华人，都受过他的照顾。其实，虞重华早萌去意，只是每次合约期满，都受到盛情挽留，只好一年又一年地留了下来。

        在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代表中国拿下射箭银牌的李玲娟，则是卡塔尔体育界的彗星。卡塔尔近年才开放让女性受教育，很多女孩长到20多岁了，还是很少出门，甚至一生只去过四五次购物商场。卡塔尔申办亚运成功后，有意成立一支女子射箭队，于是，大力宣传体育，鼓励家长把孩子送进国家队训练，因此那些少女们才有了接受体育训练的机会。

        2002年，李玲娟受聘来到多哈后，一手创立了卡塔尔第一支女子射箭队。2006年多哈亚运会上，卡塔尔射箭女队一举拿下团体铜牌。翌年，在开罗的泛阿拉伯运动会上，卡塔尔射箭女队又获得金牌，举国欢腾。由于卡塔尔射箭女队没有专业选手，队员多是学生、护士、教师，只在下班后训练两个小时，能在亚运会得到如此成绩已算难能可贵。

        回忆起刚开始训练这些女孩的情形，李玲娟笑说，一点也不容易。男孩子好胜，训练时还比较认真；女孩子却把训练场当成玩乐的地方，爱来就来，不爱来就不来，令她很头痛。不过，李玲娟敬业乐业，以身作则，渐渐赢得队员的尊敬。

        卡塔尔并非华人体育教练的热门选择。除了虞重华和李玲娟，因为成绩特别杰出，又和当地社会相处得不错，屡次受到热切挽留才在此工作多年之外，多数教练都和在其他领域工作的华人一样，少则两年，多则四五年，很少人愿意长留。

        在卡塔尔当体育教练，不如在中国风光。在这里，体育教练被视为工作人员，在训练场上权利不大。卡塔尔想怎么处置国家队，教练无权过问。各国教练的待遇又不平等，来自欧美的特别受尊敬，待遇工资特别高；东欧与中国的教练同一个档次，菲律宾教练的待遇更差。卡塔尔体坛完全不是看成绩，而是视国籍来决定待遇，这令许多中国籍教练心灰意冷。

        无论如何，中国籍教练对卡塔尔的贡献，还是慢慢受到了认可。卡塔尔奥林匹克委员会体育部主任哈利勒·伊卜拉欣·贾巴尔给予中国体育教练高度评价：”中国教练的教学水平有目共睹，他们为卡塔尔奥林匹克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卡塔尔航空近年开始意识到华人市场的重要性，因此频频在中、港、台、新等地招募懂华语的空服员。如今，卡塔尔的华人空服员已达200多人。这些年轻华人男女都是大学毕业生，时尚漂亮，在卡塔尔自成一个群体。

        卡航空服员首两年的基本月薪加上其他津贴，约有1500至1800美金，视航班多寡而定。在消费高昂的卡塔尔居住，这样的收入不算太高，不过，因为税务全免，加上住房、水电、来回机场的交通都是免费的，收入还算颇有余裕。

        他们热爱工作，喜欢飞行生涯，可是卡塔尔这个地方，对这些年轻男女来说，实在太无聊了。“台湾或香港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每一天都发生很多事，见了很多人。可是，在卡塔尔，每一个人都可以三言两语就把每天的生活交待完毕。”来自台湾的刘瀞璘说。

        没有飞行时，他们在宿舍里自己做饭，上网聊天，很少出门。这里交通很不方便，不但出租车难截，车费也很贵。在外头吃饭，消费一样高昂，且不合胃口。他们也很少到中餐厅用餐，中餐厅为了配合中东人，味道都变样了。问10个卡航的空服员，他们最喜欢到卡塔尔哪个地方玩，10个都会面有难色，想半天才答：“自己的房间。”

        在卡塔尔，空服员住在不同的宿舍，飞机航班表各不相同，很难碰在一起。他们也很少和当地人交上朋友。一些中东人对华人不太尊重，并且存有错误观念，一看到华人女子，就趋前“问价钱”，把他们当成妓女，更放肆的，甚至还会对他们“动手动脚”，台湾空服员郭秀娟就曾被一名中东男人跟到家门口，还企图伸手抓她，吓得她掉头就跑。不只女生，男性空服员被性骚扰的例子也屡见不鲜，有的空服员一坐上车子，司机的手就放到了他们的大腿上。

        许多港、台华人空服员，工作满两年就离职。进入卡航时，空服员签的都是3年合约。工作首两年，卡航每个月都会扣押他们一部分薪水，直到做满两年，才一次过发回给他们。这也意味着，两年后这张合约就没有约束力了，因此空服员都选择此时离开。愿意在此呆上两年，只是为了拿回全部薪水，由此可见他们多渴望离开卡塔尔。

        沉闷的生活，令许多卡航空服员热衷写起部落格。今天，网络上留下了许多这些空服员的生活印记。这群年轻人的部落格，仿佛沙漠里掠过的微风，掀开了中东世界神秘面纱的一角，使广大网友得以一窥华人在多哈的生活实况。

   如果说，卡塔尔有哪一群华人是较为快乐的，那一定是新加坡华人。

        据卡塔尔新加坡社交组织“Red Dotters”估计，来到卡塔尔工作的新加坡人约有400多名。他们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月薪至少有2万至2万5000里亚尔，月薪高达五六万里亚尔的也不少，生活优渥。他们主要分布在工程领域，土木工程师占最多，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师也不少。当中，华人占了80%以上。由于人数众多，加上生活背景接近，新加坡人自成一个圈子，相处得很融洽。

        五六年前，卡塔尔的新加坡人其实也不多。2004年，新加坡积极和中东国家建立经贸合作，新加坡贸工部长杨荣文率团访问卡塔尔开拓商机，并探讨签署自贸协定。李显龙总理也随后和卡塔尔酋长哈马德、首相阿都拉会晤，签订避免双重课税等3项协定。在新加坡政府的鼓励下，新加坡公司纷纷前往卡塔尔设立子公司，做为进军中东的基地。

        2005年可说是新加坡人在卡塔尔的分水岭。此前，赴卡工作的新加坡人不多，而且大部分都是被卡塔尔公司聘请过来的。2005年后，新加坡公司纷纷涌现，新加坡人人数激增，新加坡总公司外派过来的员工成了主流，占了80%至90%。

        被卡塔尔公司聘请的新加坡人，除了丰厚的薪金和福利外，通常还可获得家庭配套，把配偶、孩子接到卡塔尔生活，所有费用由公司承担，包括孩子的教育费。而被新加坡公司外派到卡塔尔的，通常都是只身前来。不过，他们的待遇也不差。由于愿意远赴卡塔尔工作的新加坡人不多，一般上，愿意来的，都能获得加薪50%以上，还不包括汽车与房屋津贴。不过，对他们来说，接受调派卡塔尔最大的动机，还在于出国工作的经验，对工作履历很有帮助。

        无论有家人陪伴，或是只身前来，新加坡华人在卡塔尔的日子，一般都过得相当惬意。这里的工作压力没有新加坡那么大，上班时间一般为早上七八点至下午三四点，很少加班，而且，也不必像在新加坡一样，每天把大量时间花在塞车或地铁上。周末时，不必奔忙于亲戚朋友间的应酬，可以静下心来和家人度过悠闲的一天，或是参加派对，好好享受异乡生活。

        当然，工作上的烦恼与冲突，还是免不了。中东的企业文化和新加坡很不一样，新加坡总部依循新加坡效率制订的工作进度表，卡塔尔往往赶不上，令总部大发雷霆。可是，卡塔尔子公司又不予配合，在卡塔尔的新加坡人，就成了两地文化差异的夹心饼。

        新加坡人也不满中东国家种族歧视的现象。在卡塔尔，欧美人和阿拉伯人备受尊重，亚洲人遭到歧视。有些场合如娱乐场所，明文规定亚洲人不许入内。商场或海滨公路办起家庭日时，也规定亚洲人，尤其是亚洲单身男子，不准入内，阿拉伯或欧美单身男子入内却没有问题。对重视平等的新加坡人来说，这种堂而皇之的种族歧视，令他们难以忍受。

        在卡塔尔，来自新加坡的高薪上班族得以过上一段优游自在的日子。可是，他们心里明白，这里只是他们生命里的一个驿站。两年，是一般新加坡人给自己的期限。

* *多哈中餐厅近年欣欣向荣。北京饭店与长城饭店是多哈的老字号，北京饭店在卡塔尔历史最悠久，于1998年3月开张，老板丁学超是巴林国王的医生。另外，开在Villaggio的香锅饭店和开在City Center的上海花园，则显示着中餐厅已经进驻高级购物商场，成了时髦的选择*。
* 在卡塔尔工作的新加坡人成立了一个社交组织，这个组织，就叫Red Dotters。Red Dotters成立于2006年新加坡国庆日当天。同年11月，新加坡总理到访卡塔尔，为Red Dotters主持了正式的开幕仪式。当时，卡塔尔连新加坡领事馆都没有，Red Dotters在有心人的推动下，应运而生，让新加坡人认识彼此，互相帮助。刚抵达卡塔尔的新加坡人，只要和Red Dotters联系上，该组织都会带他们到各部门办理居留证等证件、考取驾照等等。后来，新加坡领事馆成立了，Red Dotters就成了纯粹社交联谊的组织。
* Red Dotters经常举办一些周末聚餐、节日聚会、打保龄球、出海钓鱼等活动，甚至还办过瑜伽课，请一名修习瑜伽多年的会员给其他会员免费授课。每逢农历新年及圣诞等节日，策划一个大型派对更是不可少的节目。
* 目前，正式注册成为Red Dotters会员的新加坡人共有200多名。Red Dotters的现任会长曾春生，也是该会创办人之一。他指出，Red Dotters的管理层，正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很多人告诉他，Red Dotters要是有活动，他们愿意从旁协助，可是，却没人愿意担任主席、财政、秘书等职。也因此，从创会至今，几个会职，都是由他们人轮流担当。这除了是新加坡人个性低调使然，也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工作之外，给自己平添更多责任。
* 在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占了近四成人口的卡塔尔生活，华人显得格外孤独。除了劳工之外，华人分散在各处，联系不多，生活低调而平静，虽然偶尔也会和其他华人朋友聚在一起，聊聊天、打打牌，但基本上，都过着各自的生活，没有形成明显的华人社区。大家抱着过客的心态，凑合着过日子，只等时间一到就走。
* 华人会否在这片土地开出繁盛的枝叶，华人又将在这片沙漠写下怎样的历史篇章，
* 全看卡塔尔以后的发展和政策，是否能留住更多华人。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下简称阿联酋）位于阿拉伯半岛的东南部，除了赫赫有名的迪拜（Dubai），尚有阿布扎比（Abu Dhabi）、沙迦（Sharjah）、哈伊马角（Ras al-Khaimah）、阿吉曼（Ajman）、乌姆盖万（Umm al-Quwain）、富吉拉（Fujairah），共7个酋长部落。阿联酋境内除最东部为哈贾尔山地外，其余多为低平沙漠，属热带沙漠气候，年降雨量仅75毫米左右，夏季气温高达40至50℃。天然环境虽然恶劣，阿联酋却盛产石油，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出口国。

* 公元7世纪时，此区域属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16世纪，殖民主义抬头，波斯湾各小国迭遭葡萄牙、法国、荷兰等国相继入侵。19世纪初英国人开始侵入波斯湾，各酋长国逐步沦为英国的保护国，直到1971年，它们才摆脱英国统治，6个酋长部落组成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翌年，哈伊马角加入，形成今天的阵容。
* 各酋长国保持相对独立性，在经济、司法、行政和外交上有一定自主权，但7个酋长国之间可自由往来，无需签证。石油产量最丰的阿布扎比是阿联酋的首都，迪拜是享誉世界的国际贸易城市，沙迦则被定位为穆斯林宗教与文化城市。联邦经费主要由阿布扎比和迪拜两个酋长国承担，阿联酋境内的华人也多集中在这两个酋长国。
* 远在汉代时期，西域都护府名将班超就曾经派遣副将甘英出使罗马帝国，并且途经波斯湾地区。那时，波斯湾地区已经有不少商埠，包括迪拜与豪尔费坎（Khor Fakkan，即今日的沙迦）等。在哈伊马角城北的沿海地区，还曾经挖掘出聚勒法尔城的遗址。自十世纪开始，这座城即与东亚地区有商贸往来，而且一直持续到17世纪。聚勒法尔城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中国瓷器，即可证明当时已有很多人来往于中国与阿拉伯之间。可惜的是，17世纪后，两国之间却再无交往。一直到了1984年，中国与阿联酋才正式有建交关系。
* 之后，中国在海湾地区设立不少以工程为主的中资机构。直至90年代，在阿联酋已大约有十多家小型华资贸易公司，其中较早进驻阿联酋并取得成功的是台湾厂商。台湾的宏基电脑公司于1992年在迪拜的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Jebel Ali Free Zone）建立装配厂及发货中心，两年后，该公司的营业额即达到2500万美元以上，市场占有率在多个海湾国家中排第一。1995年，台湾的神脑无线电公司也在阿联酋成立分公司。但是，这时候阿联酋华人还不足100名。
* 那时，阿联酋已凭着石油而暴富，但却缺乏物产，大部分商品只能依赖进口。按理说，这段时期本该是商人们最佳的进场时机，可是，由于当时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战争导致中东局势极度不明朗，加上阿联酋又具有十分浓厚的保守宗教色彩，以致态度谨慎的华人存有疑虑，结果错失了这段黄金时期。
* 90年代末，迪拜酋长穆罕默德·马克图姆（Sheikh Mohammad Maktoum）开始积极地把迪拜提升为中东地区的商业、文化、旅游和金融中心，大刀阔斧地建设迪拜，并提供外资许多优惠。
* 从1998到2002年，迪拜的中资机构激增至100家以上，单是拥有居留签证的中国人就多达两万人。
* 最先到阿联酋做生意的是福建人及浙江人。他们精明能干、吃苦耐劳，在阿联酋已经有了深厚的根基。台州和温州商人尤其众多，在商场上甚具影响力。温州人初到迪拜之时，大多数都从事皮鞋和服装业。到了今天，他们的身影已经遍布房地产、机械设备、五金工具等领域，可说在温州有的行业，在迪拜也几乎都有了。
* 上海人则大部分从事零售业，早期在迪拜沿街兜售手表或墨镜等小商品的，多数便是他们。至于东北人，就以从事餐饮业为主。不过，由于少数害群之马在此从事诸如当蛇头等非法勾当，以致阿联酋对东北人的入境管理比较严格。
* 近几年来，阿联酋华人增长率更是惊人，保守估计已经超过16万。在历史上，很少国家能像阿联酋这般，在短短的几年间就吸引了那么多的华人。而且，这一切还只是一个开端。
* 远在汉代时期，西域都护府名将班超就曾经派遣副将甘英出使罗马帝国，并且途经波斯湾地区。那时，波斯湾地区已经有不少商埠，包括迪拜与豪尔费坎（Khor Fakkan，即今日的沙迦）等。在哈伊马角城北的沿海地区，还曾经挖掘出聚勒法尔城的遗址。自十世纪开始，这座城即与东亚地区有商贸往来，而且一直持续到17世纪。聚勒法尔城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中国瓷器，即可证明当时已有很多人来往于中国与阿拉伯之间。可惜的是，17世纪后，两国之间却再无交往。一直到了1984年，中国与阿联酋才正式有建交关系。
* 之后，中国在海湾地区设立不少以工程为主的中资机构。直至90年代，在阿联酋已大约有十多家小型华资贸易公司，其中较早进驻阿联酋并取得成功的是台湾厂商。台湾的宏基电脑公司于1992年在迪拜的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Jebel Ali Free Zone）建立装配厂及发货中心，两年后，该公司的营业额即达到2500万美元以上，市场占有率在多个海湾国家中排第一。1995年，台湾的神脑无线电公司也在阿联酋成立分公司。但是，这时候阿联酋华人还不足100名。
* 那时，阿联酋已凭着石油而暴富，但却缺乏物产，大部分商品只能依赖进口。按理说，这段时期本该是商人们最佳的进场时机，可是，由于当时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战争导致中东局势极度不明朗，加上阿联酋又具有十分浓厚的保守宗教色彩，以致态度谨慎的华人存有疑虑，结果错失了这段黄金时期。
* 90年代末，迪拜酋长穆罕默德·马克图姆（Sheikh Mohammad Maktoum）开始积极地把迪拜提升为中东地区的商业、文化、旅游和金融中心，大刀阔斧地建设迪拜，并提供外资许多优惠。
* 从1998到2002年，迪拜的中资机构激增至100家以上，单是拥有居留签证的中国人就多达两万人。
* 最先到阿联酋做生意的是福建人及浙江人。他们精明能干、吃苦耐劳，在阿联酋已经有了深厚的根基。台州和温州商人尤其众多，在商场上甚具影响力。温州人初到迪拜之时，大多数都从事皮鞋和服装业。到了今天，他们的身影已经遍布房地产、机械设备、五金工具等领域，可说在温州有的行业，在迪拜也几乎都有了。
* 上海人则大部分从事零售业，早期在迪拜沿街兜售手表或墨镜等小商品的，多数便是他们。至于东北人，就以从事餐饮业为主。不过，由于少数害群之马在此从事诸如当蛇头等非法勾当，以致阿联酋对东北人的入境管理比较严格。
* 近几年来，阿联酋华人增长率更是惊人，保守估计已经超过16万。在历史上，很少国家能像阿联酋这般，在短短的几年间就吸引了那么多的华人。而且，这一切还只是一个开端。
* 阿联酋可谓近代华人人口膨胀得最快的国家。全球华人工程师及其他专业精英，纷纷被丰厚的薪水和优渥的福利吸引而来。而数以万计的华商，更被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巨大的商机吸引，前仆后继到此拓展业务。
* 大部分的华商集中于迪拜的德拉（Deira），从事批发贸易，纺织品、生活用品、建筑材料、汽车配件等。夫妻或几名合伙人组成的迷你型企业，成了德拉批发市场独特的商业景观。这里的华商主要来自浙江、上海、福建、江苏、广东、新疆及东北三省。除了批发贸易，也不乏华商从事零售业、旅游业及饮食业。
* 阿联酋虽然投资政策开放，对移民问题却很保守。非阿拉伯人要拿到阿联酋的公民权，非常困难。也因此，这里的华人，犹如匆匆过境的候鸟，只想赚够就走，很少人在此建立家园。
* 阿联酋的迪拜，是现代华人心目中的“金矿”。华商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只要脑子没问题，到迪拜做生意，准能发达。”近20年来，迪拜在酋长谢赫穆罕默德·马克图姆致力打造下，成了整个中东区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而迪拜能如一颗超级磁石般，把华商吸引到阿联酋，不是没有原因的。
* 首先，阿联酋地理位置优越，处于中东、南亚、非洲、欧洲之间的心脏地带，迪拜的拉昔（Rashid）港和杰贝阿里（Jebel Ali）港被超过125条世界主要海运航线列入站点，运输方便，有利国际贸易发展。再者，迪拜是个名副其实的免税天堂，公司和个人所得税全免。贸易商进口一般商品，只征收5%的关税。至于在此设厂的生产商，进口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时，不必缴关税，出口商品亦同样免关税。
* 迪拜的经济政策非常自由，资金的流入与流出没有限制，这也表明，华人企业的资本和所获利润可随时汇回本国。而且，政府部门廉洁，贪污、商业欺诈等问题比较少。
* 迪拜也是充分国际化与现代化的城市，公路、电信网络等各种基础设施水平很高，世界各大银行都可在阿联酋找到，大型展览中心等种种设备提供了优良的商业环境。此外，阿联酋出入境方便，办理签证容易，尤其对大陆华人入境的审核，不像欧美般严苛。这也自然造成华人把阿联酋视为拓展公司业务的最佳据点。
* 迪拜港（Dubai Creek）以东的一个老城区——德拉，历来就是中东知名的批发市场。在华人进入这个市场之前，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伊朗人，早已在此经营买卖，势力稳固如老树盘根。华人近十年才进入市场，可是，走在德拉的下城区，不难发现华人也已占一席之地。穆沙拉大街上，“中国贸易城”5个字老远就可以看到。中国贸易城隔壁还有一座中国轻工城，再加上邻近的志远鞋城，形成了一个全华商的批发市场。这片市场背后的推手，就是温州商会会长陈志远。
* 除了商场，整个德拉的大街、巷弄里，都有不少华商夹杂其中，尤其木须巴扎市场以及纳莎广场附近，更是华商集中地，挂着红灯笼的小店到处可见。夫妻小店成了整个德拉贸易市场的主调。别看这些店铺面积小小，一间不到20平方公尺的小店，一年租金至少要16万迪拉姆。不过，木须巴扎是个远近驰名的老市场，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者都汇聚在此，一个月要达到100万迪拉姆的营业额并不困难。
* 华商的涌现，难免对当地的劳工就业市场以及贸易市场造成冲击。中国产品也逐渐取代了印度、巴基斯坦产品的位置。华人人数虽然不如南亚人，但华人在经济上的影响力，勿庸置疑。
* 迪拜淘金的热潮方兴未艾，可是，每一名受访华商皆异口同声表示，进场的黄金时机已过去了。“竞争太激烈了，生意越来越难做啊。”他们纷纷摇头感慨。
* 90年代初，迪拜华商不足100家，中国商品奇货可居，利润可达成本一倍以上。可是，这两年来，华商大量涌进迪拜，引发激烈削价战，中国商品的利润往往只剩下3%至5%。而实力雄厚的企业，为了垄断市场，甚至在短期内亏本卖货，以把对手逼出市场的做法，也时有所闻。在迪拜，商场成了名符其实的残酷战场，“这是一个大鱼吃小鱼的地方，没有实力的企业，还是不要进来。”迪拜华商说。
* 高昂的营运成本也使华商压力越来越大。来自温州的许佩佩和丈夫张荣在木须巴扎批发牛仔裤，因为租金涨得太厉害，3年间，他们搬了又搬，一直寻找着便宜的地方。像许佩佩那间仅跨几步就能走完的小店铺，一年租金就高达18万迪拉姆。仓库费、住所等，又是另一笔庞大费用。根据《绿洲报》报导，2008年迪拜一间两室的公寓，平均年租金为12万，比过去一年涨了50%，涨幅惊人。

         阿联酋华人主要是商人。可是，到此谋职的华人也为数不少。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在7个酋长部落中石油产量最丰，石油工业最集中，许多华人白领精英在此从事石化工作。而迪拜是中东区的金融与商业中心，自然更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年轻华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能说流利英语，并且都是相关领域的杰出人才。

         迪拜可说是一个大工地。4座世界最大的人造岛（朱美拉棕榈岛、杰贝阿里棕榈岛、德拉棕榈岛、世界群岛），耗资40亿、占地460万平方公里的运动城，建在海底的酒店，高度已经超过688公尺并且还在继续往上建的世界最高楼迪拜塔，高科技智能大楼The Pad，都在如火如茶地建筑中。

         除了这些举世瞩目的建筑项目，全城各处都在发展新的商业区、住宅区，可谓到处有建筑工程。这波建筑热潮预料会持续多十年，目前迪拜的人力市场中，需求最殷切的当属建筑师、工程师。除此之外，华人子弟的身影还出现在金融业、电信业等各个领域。他们的月薪高达三千至两万美金，还可获住房、车子津贴等优厚福利。

         另外，由于阿联酋的华商与华人旅客直线上升，成了阿联酋酒店的十大客源国之一，阿联酋的酒店与餐厅乐于聘请华人当服务员。全世界最奢华的七星级帆船酒店的中国籍员工，就高达10%至20%。

         此外，许多酒店与餐厅集团，也和中国旅游学院合作，录取中国学生到阿联酋实习。董云菲与丁文婧是来自山东旅游职业学校的大专生，阿联酋朱美拉集团（帆船酒店与Al Qasar Hotel等，都是该集团旗下的酒店）与该校有实习生课程合作。每年，朱美拉集团都会派人到中国面试学生，甄选出十来名赴阿联酋。

         被选中的学生等于是酒店的正式职员，可以一直在酒店工作下去。可是，新一代的中国学生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知道，只要有了一纸文凭，再加上在朱美拉集团工作的资历，他们可以轻易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找到好工作，直接进入管理层，因此，绝大部分学生都会在实习结束后，回到中国。

         在这些大酒店当最低层的员工，一个月薪水有1000迪拉姆。有趣的是，懂得中文的学生，还可得到每个月300迪拉姆的语言津贴。迪拜的星级酒店，汇集了来自全球各国的人才，“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不同国家的人，第一次接触到国际化的工作环境，并学习先进的酒店与餐饮业管理系统。这经验太宝贵了。”董云菲说。

         她初到迪拜时，英文不好，无法和人沟通，非常寂寞，再加上工作辛苦，有几度很想放弃。可是，坚持下去后，她发现自己英文进步了，眼界开阔了，人也成长了。

* *阿联酋另一酋长国沙迦，距离德拉只有20公里，公寓租金却只有迪拜的1/3，因此一些把店铺开在迪拜的华商，都住在沙迦，每天两地来回。近年也有华商开始在沙迦开拓市场。这里的家具、建材市场，本来多由印度人经营，中国人来了之后，看到印度人卖的都是中国货，还那么好赚，于是也纷纷到这里开店，令沙迦成了远近驰名的家具、建材市场。还有一名温州人魏建亮租下沙迦Rolla Mall二楼走道，设立柜台售卖电子产品，令该购物中心成了颇有名气的中国香港科技数码城。*
* 和所有高速发展中的国家一样，阿联酋贫富悬殊严重。迪拜是富人的天堂，却也是贫者的地狱。
* 一条迪拜港，把华人分成两个世界。迪拜港以西的朱美拉（Jumcirah），是所有国际大企业的所在。这是一块新开发的地方，马路宽敞，现代化大楼林立。
* 在这里，生活节奏不像其他国际大城市股紧凑，人们可以享受一切物质所能带来的快乐，大量国际时尚品牌在此汇集，从名牌服饰到名牌家具，应有尽有。Mall of Emirates、Ibn Battuta Mall这些购物广场几乎可以满足所有人的购物欲望。除了猪肉，他们可尝到世界各国的高级美食，还可以到各大酒店的舞厅、酒吧饮酒作乐，气氛不亚于其他国际大城市。这里的迪拜，是个享受人生的地方。
* 迪拜港以东，也就是华商云集的德拉区，和朱美拉形成强烈的对比。这里发展较早，建筑物非常密集，市内交通堵塞严重，夏天空气粘滞闷热，除了一些正宗的中餐厅能吸引白领华人偶尔光顾，就没有其他吸引人的地方了。“除非有绝对必要，否则我不会踏足德拉。”一名在跨国企业工作，领着月薪数万迪拉姆的中国籍人士说。
* 德拉的华商们，抱着淘金心态，勤奋地工作，刻苦地过日子。在这边苦个数年不要紧，最重要是能尽量多赚，回国后再过好日子，是当地华商的普遍心态。由于迪拜消费高昂，他们平时也不太舍得花钱。
* 他们的生活没有多少享受可言。以在伊朗市场从事眼镜批发的罗丁海与张淑卿夫妇为例，他们下班时已是晚上9点多，回到沙迦的公寓，夫妇俩一起做饭，11点左右才能吃上晚餐，第二天9点又要准时开店。至于午饭，也都是自己准备的便当。

     在中国贸易城附近开上海超市的白大婶，虽然年纪颇大，可是，为了帮女儿看管超市，一样过着早出晚归的生活。白大婶每天7点多就得起床准备开店，然后一整天守在小小一家便利店里，直到晚上11点多关店。回家后一家人一起做饭，晚饭吃完，一般已经是凌晨2点了。  德拉市场的老板，总算还有自己的一套公寓，而德拉市场的打工仔，则住在称为“大家”的廉价宿舍。这种公寓一般有三四间房，每间房住上7至12人，这类室内充满油烟味、汗酸味的公寓，一个床位，月租也要700迪拉姆。不过，艰苦的环境并没有击垮年轻华人，他们把这视为磨练，并且尽量保持乐观，住在“大家”的林元说：“中国人算不错了，印巴人还要睡马路！”

         阿联酋还有一些活在社会边缘的民工。由于整个迪拜市到处都是建筑工程，因此这里也涌现了大批华人建筑工人。沙漠夏季气温高达40至50度，在这里铺路盖房，宛如在烤箱里工作，如果忘记戴手套，一接触到金属，皮肤马上被烫出水泡。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周末还要加班。有人形容，这些华工是“住在‘集中营’，吃的食物连狗食都不如”。恶劣的生活条件，犹如现代版的“卖猪仔”。

         工人被中介公司欺诈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据一名在工地当管工的中国人透露，当初他来迪拜时，中介公司告诉他两年能赚十万迪拉姆，但他只拿了6万迪拉姆，那还是主管级的薪水，技术工人薪水更低。再加上这一两年中国汇率升高，兑换后他们赚的钱无形中变得更少。华工也没有获得医疗福利的保障，该名管工患肾结石，却因医疗费用太高无法就医，只好痛到无法忍时才自己掏腰包到医院打一支上百美金的止痛针。生活没保障，环境不好，消费又高，不少华工情愿回国工作。

         问他们为何不一走了之，他们说护照被中介公司扣着，哪里都去不了。该名主管申请回国就医，却不获上级批准。据了解，在阿联酋，扣押工人护照属于违法行为，可惜，因为大部分工人文化程度不高，不了解自己的权益，只好任人欺凌。

         这些华工是被遗忘的一群。曾在迪拜工作的白领华人陈裴瑶说，他有时在街上看见这些民工，只觉他们犹如动物般，一脸木然。他们出现在迪拜每个角落，却又仿佛是隐形的一群。今天，迪拜在向世界夸耀他们最耀眼的建筑奇迹时，这些华工的血汗，实在不容忽视。

         另外，华人性工作者也在阿联西悄悄滋长。许多中国劳务公司为谋私利，对迪拜作出不实宣传，宣称这里工作机会多，报酬高。交了大笔中介费来到迪拜的中国女性，却完全找不到工作。为了出国，她们已经欠下大笔债务，不能就此回国。许多人迫于无奈，只好卖身。由于华人性工作者的数量，在阿联酋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对当地华人的形象造成了一定影响，因此开始引起当地华社的关注。

* *阿联酋阿吉曼聚集了许多跑展览会的华商。他们在展览会摆小档位，哪里有展览会，他们便往哪里跑。选择阿吉曼落脚，是因为那里房租便宜，他们租了楼房，既可住人，又可放货。*

    阿联酋华人多，华人社团更多。这些社团多是地缘性商会，譬如温州商会、台州商会、河北商会、徐州商会、义乌金华同乡会等等，此外，在龙城营业的商家也组成了龙城商会。大大小小的商会多不胜数，可惜除了少数商会外，多数商会并不活跃。

         华人在阿联酋历史尚浅，而且，不同于其他移民国家，华人并没打算在此长留。许多长袖善舞的华商，找了几名志同道合的同乡，就办起一个社团，联络乡谊，开拓商机。不过，既然只是过客，搞起社团也就不太认真，缺乏长远规划。商会成立之后，只是联谊吃饭，接待外宾。由于社团注册手续非常繁琐，又要每年更新执照，因此，很多社团甚至没有注册。由于这些小商会并没搞什么大集会，因此倒也没有碰到过什么问题。

         目前，阿联酋办得最出色的商会，当属温州商会与台州商会，此外，中国商会虽然不如以前活跃，却也相当有名。温州人最早到达迪拜，人数也最多，约有一万名。有鉴于温商多是中年人，外语不好，又不熟悉当地文化，做生意常碰到困难，温州商人陈志远于是萌生了创立商会的念头。2004年，温州商会正式成立，陈志远出任会长至今。当

         商会成员和当地政府发生纠纷，或当同行间互相杀价，产生矛盾时，商会都会介入调停。

与其他国家的商会相比，阿联酋华人的商会力量小，结构也松散得多。当地华商最迫切需要的，也许是一个强势的商会，规范华商的市场行为，通过价格约束、品牌塑造等方面，提升华商的地位，并把华商团结在一起，争取华商在阿联酋的权益。

         除了商会，迪拜尚有一家阿联酋华人社区中心，对当地华社贡献很大。阿联酋华人社区中心是一家非营利民间组织，由TT特快汇款的老板何家财出资成立。社区中心每星期五都有一个免费让会员参加的英语沙龙，协助会员提升英语能力。此外，社区中心还开办了收费的阿语和英语培训班。

         负责该中心运作的，正是TT特快汇款的员工。在这群充满热情的年轻人的带领与协调下，社区中心成了阿联酋最活跃的华人社团之一。他们办过文艺晚会，也办过群英会，邀请成功的商业人士聚会，讨论市场状况，华社前景等。

         不过，该中心最主要的功能，还是帮助落难华人。该中心提供咨询服务，为华人解答法律、宗教、投资经商等方面的问题。当华人遭遇劳资纠纷、商业欺诈、意外事故时，也可直接到该中心求助。中心内有个法律顾问阿都拉曼（Abdureheman Wubuliyasheng）,协助华人进行翻译，及到相关部门立案、辩护、调解纠纷等。

         该中心自成立以来，每年受理200至400多宗案件。阿都拉曼表示，该中心受理的案件以劳务纠纷、签证等为多。

         到社区中心寻求咨询服务，每一次只象征性收费20迪拉姆，和外头律师每小时数百迪拉姆的收费比较，非常廉宜。当碰到完全没有能力，又迫切需要帮助的华人时，社区中心还会提供免费帮助。阿都拉曼说，能看到别人的笑容就是他最大的酬劳。

* *根据阿联酋华人社区中心的统计与分析，缺乏法律常识是华商的最大弊病。华商相信口头承诺，总是不找律师打一份正式的合同，或是随便乱签合同，等到有麻烦才后悔。华人也不看管好自己的重要文件，有一名华人曾把护照借给同事，该同事又用他的护照到银行开户口，并开出了21万迪拉姆的支票，结果该华人被银行追债。*
* 和其他海湾国家一样，回教在阿联酋受到绝对保护。尽管如此，迪拜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迪拜的杰贝阿里（Jebel  Ali)工业区，就有个地方专门让其他宗教进行活动，天主教、基督教、锡克教等教堂，全都集中在这个特定的园区内。不过，法律也规定，外教人士不得向本地人宣教，一旦走出教堂大门，也不准有任何非回教的宗教活动。
* 佛教在阿联酋并不活跃，迄今并无寺院或佛教徒的聚会出现。基督教近年在迪拜却发展蓬勃，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基督教徒一起在教堂内进行崇拜，有的还自动自发在家里办起圣经研究班。
* 阿联酋华人教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当时，有一名虔诚的华人基督徒欧阳仪珠，眼看迪拜其他种族的基督徒都有教会，于是，就和一些来自新加坡及其他地方的华人姐妹，在家里举办祷告会。1997年开始，每逢星期二，基督教徒开始聚集在欧阳家里祷告查经、唱赞美诗歌。2002年，在美国大使命中心的王永信牧师及欧阳仪珠的推动下，沙迦举行了第一届波斯湾华人宣教研讨会。会后，华人信徒在United Christian Church of Dubai （UCDD)国际教会开始礼拜，华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教会。2003年2月，会众正式以“杜拜华人基督教会”（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Dubai）为名，成立了迪拜第一家华人教会。
* 目前，迪拜比较有规模的华人教会共有3家，分别是由刘得贵牧师带领的杜拜华人基督教会、海湾华人基督教会以及由施约瑟牧师带领的华人福音普传会。
* 杜拜华人基督教会大概有200多名教友，每个星期在杰贝阿里的迪拜福音教堂中心（Dubai Evangelical Church Centre）有早晚两次崇拜聚会。有趣的是，为了配合当地的周休时间，基督教的主日崇拜，一律改为星期五，而非星期日。
* 华人基督教会常向当地的华工分发食物和传福音。这些华工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农村的年轻男子，生活苦闷，生活条件也不好，因此比华商更容易接受基督教。由于工作时间的关系，他们只能出席晚上的主日崇拜。住在附近的工友自己走路过来，住得远的，则有教堂派巴士接送。信教后，他们的精神有所寄托，打架斗殴的事件也比较少了。

         阿联酋的华人超过16万，对资讯流通需求迫切，掀起华文报刊创办热潮。

         每隔一段时期，阿联酋就有新的华文报刊冒出来，但很多发行了几期后就销声匿迹，也有些消失了一阵子又复刊。这些报刊当中，多数缺乏长远规划，也没有阿联酋新闻部发出的出版准证。不过，也有几份报刊，办报态度较为严谨，始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绝大部分华文报刊以商业资讯与广告为主，新闻与休闲娱乐内容的比例小于50%，可于各大小超市、华人经营的旅馆及中餐厅等地方免费索取。

         几家拥有高发行量和知名度的报刊分别是《绿州报》、《新民商报》、《华人时报》、《华人之窗》与《东方商报》。近期在阿联酋创刊的刊物还有《大家文萃》、《名报》等等。

         《新民商报》创刊于2004年，是第一家获得阿联酋新闻文化部出版准证的当地华文报刊。据统计，《新民商报》在迪拜及阿联酋北区每期的发行量高达一万份，另有5000份发行到其他国家，是海湾地区发行量最高的华文周报。

         《新民商报》的内容包括阿拉伯文化介绍，与侨民相关的当地政策、经济与商业情报、当地华社动态等等，跟其他当地报章比较，内容算是比较齐全，编辑方针也较严谨。难得的是，把这份报刊搞起来的，正是TT特快汇款和阿联酋华人社区中心的职员。他们利用工作空档，收集与整理新闻，再把资料发到中国去排版。

         此外，《新民商报》也和上海的《新民晚报》合作，推出了《新民商报·新民晚报阿联酋版》。这个合作版每周一期，每期两版，内容与排版，全由《新民晚报》供应。为此，《新民商报》的排版设计，也尽量依循《新民晚报》，以统一风格。在阿联酋拿起一份《新民商报》，恍惚中，有种回到上海的亲切。

         中东区最早创刊的报纸是2001年问世的《绿洲报》。该报创办人为湖北省的李明，曾在中国政府机关工作。因为历史最久，《绿洲报》知名度也比较高，发行量达到5000份，版面虽只有杂志大小，却高达44版。

         另一份办得颇出色的报刊是《东方商报》。这份每月逢5、20日出版的报纸，由阿联酋东方投资顾问展览公司创办。内容包括中东地区的金融与物流、投资建设、中东贸易、房地产以及全球的经济新闻为主，特别适合中东地区的华商与投资者。这份报纸也是海湾地区投资最大、最有企图心的华文报。该报有一个正规的编辑团队，记者持有阿联酋政府颁发的记者证。

         不过，在阿联酋，传媒并无太大的出版自由。华文报刊在出版前必须把所有的标题翻译成英文，让政府审查。任何有违当地宗教、法律、风俗的新闻以及敏感题材，都不会刊登。

         虽然华文报刊越来越多，可是，《新民商报》负责人肖琼小姐说：“市场是无限大的，华文刊物没有达到饱和的说法。能不能经营下去，要看你怎么去开发市场，和你自己的利益点在哪里。”

         网站方面，阿联酋华人社区中心管理的www.enterwto.com，以及温州商会副会长王伟胜和朋友刘海涛创办的迪拜华人网www.dibai.com，都是服务华人的网站。这些网站张贴了许多关于阿联酋的资料，从领事馆讯息、海湾新闻、商业资讯乃至餐饮购物资讯等，让投资者得以进一步认识这个地区，也让当地华人有个交流的空间。

* *2006年8月1日，中国人王伟胜和刘海涛收购的电视台“亚洲商务卫视”（Asia Business TV）正式开播。该电视台覆盖中东及北非地区21个阿拉伯语国家的4亿观众，节目包括《品位中国》、《周游中国》、《中国著名品牌》、《中国百业之窗》等，把中国与中国商品介绍给阿拉伯观众，协助中国商品在阿拉伯国家建立品牌知名度。*
* 1998年，中国大使的太太在一场饭局中向欧阳仪珠提议开办中文班，几个月后，迪拜第一个中文班便宣告成立。
* 今天，欧阳仪珠办的中文班共有40名学生，5名老师。学生多是来自中国和新加坡的华人的孩子，每周上两个小时课。中文班因为得到迪拜学院（Dubai College）赞助，可以免费使用课室，因此学费不高，3个月共550至600迪拉姆。
* 2007年，迪拜又出现另一个由中国人闯海鸥与新加坡华人潘惜娇开办的中文班。目前，该中文班共有50多名儿童与少年学生。
* 闯海鸥表示，家长送孩子来学中文，主要抱着两种心态，一种是让孩子多学习一种国际语言，另一种则要孩子把母语学好。如果是为学好母语而来上课的，她会采取新加坡小学的教材，不但要求小孩懂得用华语沟通，还得会写中文。如果只为兴趣而学华语，
* 课程就以趣味性为主，以激发和保持孩子对中文的兴趣。
* 除了中文，闯海鸥也希望孩子对中国和中华文化有一定的认识。譬如四川大地震时，她要求老师向同学解释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并发动筹款活动。北京奥运期间，老师们也会分享奥运的消息，以期激发华人孩子的民族自豪感。
* “师资是我比较头痛的问题。”闯海鸥表示：“迪拜华人虽多，但都是做生意或工作的，不像欧美国家有很多中、英语都很好，又有教学经验的大学生。在迪拜上国际学校的孩子完全不觉得学中文是种责任，因此中文班的老师要懂得生动教学，否则难以保持孩子的兴趣。”
* 在这些有心人的努力下，随父母来到迪拜生活、受教育的孩子，有了学习自己的母语与文化的机会，中华文化也得以在阿联酋的土地上，延续下去。
* 德拉人满为患，许多有意进军迪拜的华商欲求一店而不得，于是，龙城商场应运而生。龙城是中阿两国政府合作发展的项目，刚开始时，号称是中国在海外建立的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中国商品集散中心。龙城坐落在国际城（International City）内，从德拉开车前往龙城，须经过一片漠漠黄沙，约半小时才能到达。国际城是个新开发的区域，到处是未竣工的建筑工程。
* 龙城长达1.2公里，可容纳近4000家店铺。一眼望去，约30%还是空铺。这是个干净敞亮的地方，里头除了餐厅、小超市，还有长椅让人休息，和木须巴扎那些小巷弄里的华人商家相比，环境舒服多了。龙城在招商时，强调这里是做批发的贸易城，开业后却似乎成了零售式的购物广场。
* 龙城开业之初碰上不少问题，如装修没弄好，店铺内连电源都没有，只能靠走廊上的灯做生意，加上地点偏远，宣传不足，生意很清淡。坚持了3年多后，龙城生意开始上轨道，许多外国商家也慕名前来采购货物。当地商家坦诚这里的生意尚远远比不上德拉，但对龙城的前景非常乐观，认为只要守多几年，龙城生意会更火红。
* 在龙城经商与打工的中国人约有四五千人，不过，在国际城定居的华人可不止此数。由于这里租金便宜，所以在德拉工作的华人也跑到这里来住，每天开车来回。迪拜政府发展这个区域之初，本意是要把来自世界各国的人集中在这里，故名国际城。谁知，这里竟然成了一座唐人城。
* 今天迪拜的情况类似当年的纽约。这里汇聚了全球形形色色的人，尤其华人，更遍及了各个领域。有的华人用血汗建筑起这城市的一砖一瓦，有的华人则以丰厚资本与商业经验为这城市带来繁荣。和纽约不同的是，来到迪拜的华人，始终没有视此为家。在一块肯拼搏就有希望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理想家园是美国华人的梦想。迪拜华人也有一个迪拜梦——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取最多金钱，然后离开。也因此，迪拜梦和美国梦，有了不一样的深度。
* 阿拉伯半岛的南端，有片宁静的土地。它名气不大，却是阿拉伯半岛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这个被古代中国称为祖法尔的地方，如今就是富庶的阿曼苏丹国。
* 早在公元前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阿曼就有乳香交易的出现。它更曾是该区域的造船中心，海上通商贸易非常繁盛。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被引入阿曼。从1154年至1624年，阿曼进入巴尼那巴汉王朝（Bani Nabhan Dynasty）。由于苏丹与部落之间长期战争，葡萄牙势力乘虚而入，阿曼多个海港城市被葡萄牙占领。经过多年不屈不挠的抵抗，阿曼最终在1624年，逐出外国军队，建立亚里巴王朝。18世纪建立的赛义德王朝，更将势力拓展至非洲海岸，以及印度与巴基斯坦的一些地方。1920年，阿曼分裂为马斯喀特苏丹国和阿曼伊斯兰教长国，长期的内战使这个曾经与欧洲争辉的强大王国，陷入贫困落后的窘境。
* 把阿曼带上现代化道路的君主，是苏丹卡布斯。在苏丹卡布斯上台之前，阿曼只有两所小学，连一所中学都没有。1970年，苏丹卡布斯发动不流血政变，废父登基，从此，阿曼渐渐迎头赶上富裕的邻国，如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等。
* 阿曼大部分国土属热带沙漠气候，热季时气温高达40℃以上，凉季清爽宜人，平均温度约为24℃。约40%的阿曼人从事农渔牧业。乳香是阿曼名产，此外，阿曼也出产大麦、椰枣、棉花等作物，煤、铜、金、铬等矿物产量也很丰富。阿曼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开采石油，如今，石油与天然气已成了阿曼的经济命脉。石化工业的发展，吸引了许多华人专才到此就业。由于发展较晚，虽然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如科威特等国，仍不失为一个富足康裕的国度。
* 乳香是中国古代的贵族所钟爱的熏香。乳香来到中国之后，还成了一种功效极多的中药，适用于内科和外科，能活血行气，通经止痛，消肿生肌。公元11世纪，阿曼每年都向中国出口数十吨、甚至上百吨的乳香。而阿曼的佐法尔（Dhofar），在古时候就被中国昵称为香岸。
* 唐朝时期，中国的航海业和海外贸易极其兴盛，广州、泉州和扬州等都是知名的商港。那时中国的商船已经能够远航至阿曼湾以及波斯湾一带。中国海上商队将精美的丝绸和瓷器卖到海外，同时也把阿曼的乳香带回中国。阿拉伯的历史学家麦斯欧迪曾在《黄金草原》中提及：“很多中国船只多直航阿曼。”
* 据《星槎胜览》及《瀛涯胜览》二书的记载，郑和下西洋期间，也曾三度到达祖法尔。那时，郑和的船队一停泊在港湾，当地的居民就齐聚码头，敲着阿拉伯大鼓欢迎中国朋友的到访。
* 另一方面，阿曼人也同样曾远渡重洋访问中国。在公元8世纪时，阿曼的航海家奥贝达驾驶一艘名为“苏哈号”的双桅木船，历时两年抵达广州。在《一千零一夜》中有关辛巴达的海上历险记，就是取材自奥贝达的故事。在宋朝时期，还曾经有阿曼富贾在中国官府当过差，官至广州“蕃坊蕃长”。
* 中国和阿曼两国民间频繁的交往，直至清朝，才随着日渐保守的政治趋势嘎然而止。
* 到了近代，华人大胆走向世界各地，到海外追求事业上的理想以及梦寐以求的生活。尽管如此，到达阿曼的华人却少之又少。最早来到阿曼的华人，包括中医师、护士、体育教练和一些华商。1986年，一名来自上海的医生在马斯喀特（Muscat）开了一家诊所。他是如今阿曼华社所能打听到的最早在阿曼落脚的华人。
* 90年代，中国卫生部在全国各地征选专业能力出色以及能说英语的医护人员，派遣他们到中东地区工作。1995年，中国卫生部派出第一批为数14人的医护人员抵达了阿曼。在这队医护人员当中，有两名是中医师，其余全是护士。两名中医师一男一女，分别负责为男女病人看病。当时，女中医师李晓桂被任命为队长，负责跟卫生部及使馆联系。目前，仍然留在阿曼的，只剩下李晓桂和护士张小燕二人。
* 2001年及2003年，阿曼又分别来了两批护士，不过，目前他们也大都已经离开。这些外派的护士皆正值花样年华，除非愿意嫁给穆斯林，否则，在阿曼很难找到对象。为免耽误青春，她们一般在合约期满之后就回国；再不就是练好英文之后到别的国家去当护士。
* 2003年以后，中国开始重视阿曼市场，许多国有企业纷纷在阿曼设立分公司，自此，阿曼的华人人数才随着中资公司的入驻而有激增。
* 阿曼是个富裕的国家，人均收入高达1.43万美元。加上这里政局稳定，治安良好，投资环境稳定，因此也吸引了一些勇于闯荡的华人到此经商，从事餐饮、家具、服装与小家电等行业。此外，也有不少华人在阿曼的中医针灸、按摩、医疗护理等领域工作。
* 不过，阿曼华人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还是中资公司的职员。中石油、中水电、华为、中石化、中铁、中建材等中国大型企业，皆在阿曼设立了分公司。根据阿曼中资企业联谊会的统计，阿曼中资企业中方员工的人数已经达到1500名左右。
* 加上到阿曼经商或在私人企业打工的华人，阿曼华人的总数保守估计已达2000多人。绝大部分的华人来自中国大陆，来自台湾的只有十名左右、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华人则有20多名。
* 虽然华人人数不多，可是阿曼却有一个阿曼中资企业联谊会，以及一个完全由华人自发组织的阿曼华人华侨协会。虽然这个民间社团还很年轻，却已经改变了当地华人社会的面貌。
* 在华人迁徙的地图上，阿曼是最新的热点。这个盛产石油的国家，不像邻国卡塔尔、阿联酋那般拼命地发展、建设。在阿曼的首都马斯喀特，看不到迪拜、多哈那种到处是建筑工程的蓬勃景象。阿曼对于外资，更是采取谨慎态度，有条件地对外开放。华人对这个国家所知不多，阿曼对外资企业的挑选，也非常严格，因此2003年以前，阿曼只有零零星星的华人。
* 2003年可说是中国企业在阿曼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年。这一年，中国企业在石油钻探、油田服务、通讯、道路建设等等项目上纷纷中标，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旗下的数家公司，还有华为技术、中铁18局、中水远洋渔业等等先后在阿曼设立了分公司。中铁18局集团有限公司标得苏尔一古赖亚特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这项总投资5亿元人民币的项目，有多达300多名技术人员参与。而华为技术则标得阿曼全国骨干网项目，中水远洋渔业公司也获得合作捕捞项目。
* 于是，2003年以后，阿曼华人以倍数增长。“2005年，我出席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时，只有4个家庭的华人出席。2006年使馆办的招待会，已经多出了好多中国人。”阿曼华人华侨协会的会长王志梅说。
* 除了中资公司外派的中国籍职员，阿曼也有不少华人在外国公司任职。石油是阿曼经济的支柱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43%来自石油工业，石油占出口总值的90%。这些在外国公司上班的华人，多投身于石油领域。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已经取得英、美、荷、日等国的国籍，譬如在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 Corporation）工作的美籍华人杨先洪、王薇夫妇，以及在阿曼石油开发公司（Petroleum Development Oman LLC）上班的美籍华人莫涌、朱富萍夫妇等等。
* 这些外籍华人凭着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专业知识，在各自领域内取得耀眼成绩，是石油工业里不可或缺的顶尖人才。他们很早即从中国移民到美、欧等地。在接受公司外派到阿曼来之前，他们都做过慎重考虑。经过多番打听，他们发现阿曼社会安定，生活环境相当不错。孩子还在上学的家庭，甚至连当地的学校都细心比较过，才做出决定。朱富萍夫妇申请外派空缺时，有几个选择，马来西亚和阿曼都在考虑之列。夫妇俩颇为喜欢马来西亚丰富多元的文化，可是由于该国没有特别优秀的国际学校，反观阿曼的国际学校则办得很好，名牌大学录取率很高，因此最后选择了阿曼。
* 这些白领精英们在阿曼领着优渥的薪水，过着丰裕的生活。
* 和白领精英们一样，华商同样很满意阿曼的生活和投资环境。阿曼的华商非常少，50名都不到。他们多数从事纺织品、家具、建材等行业，也有一些从事餐饮业等。阿曼并不是他们最初的目标；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先到迪拜做生意，后来才转战阿曼。在阿曼批发窗帘、沙发套的华商李向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 李向东1995年就到迪拜打工，1998年自己当上老板。在迪拜站稳阵脚后，2003年他第一次到阿曼考察市场。结果，那短短的几天内，他量布量到手都举不起来。既然货物在阿曼这么受欢迎，他干脆就把生意扩展到这里。现在，为了兼顾两边的生意，李向东每个月都在两地之间来回奔忙。这也是许多阿曼华商的生活写照。幸亏，迪拜和马斯喀特之间不过数个小时的车程，还不至于太累人。
* 比较迪拜和阿曼两个地方，他认为阿曼的投资环境对外国人更有利。“在迪拜，外国人占的股权一定要低于本国人，也就是最多只能占49%。在阿曼，15万以上投资额的生意，外国人则可拥有高达70%的股权。此外，阿曼竞争远低于迪拜，因此利润比较高，但生意量不大。而在迪拜做生意，生意量虽然大，不过利润少，开销大。”
* 此外，阿曼也更适合小资本企业的生存。迪拜有个批发聚散中心，市场往往被大型批发商垄断，大鱼吃小鱼，资本不足的商人难以生存。而阿曼的商人分散全国，因此批发商很难垄断市场。
* 除了以上种种，阿曼还有一个更吸引李向东的原因：“阿曼除了投资环境更佳，也是个适合生活的好地方。这里人心纯朴，华人之间也没有利益冲突，因此沟通比较简单，不像迪拜，太商业化，人和人之间无法放心交流。”也因此，在阿曼和迪拜都买了房子的李向东，更愿意呆在阿曼。他还积极参与阿曼华人华侨协会，并担任华协的社会事务理事，和当地华人相处愉快，享受着迪拜华社所欠缺的浓郁人情。
* 阿曼发展虽然比其他海湾国家慢，但前景更为乐观；它开始大力发展经贸，但却不急不躁，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地做，它对外资控制得很严格，经题，一旦批准了外资进入，对外资还是比较公平的，阿曼华商稀少非因为华商不愿意来。如果不是签证难办，相信会有更多华商涌入阿曼。
* 1995年，中国卫生部向阿曼派出的第一批医护人员中，包括了两名中医师。从那时候起，中华医学就渐渐在阿曼扎根。虽然在此之前，阿曼就出现了数名中医师，不过，他们一般都在私人诊所行医，譬如大约在1994年抵达，至今仍留在阿曼的中医师施有奇。直到1995年，阿曼的政府医院，才开始有常驻的中医师。
* 这以后，又有数批中医师与医护人员被派到阿曼。在政府医院行医能更全面地接触到来自各层面的病人，而且也更容易获得病人的信任，因此是个把中华医学介绍给阿曼普罗大众的绝佳平台。不过，在政府医院上班的中医师只能给病人做针灸、拔罐，不能施药。
* 李晓桂是1995年第一批被公派到阿曼的中医师。在阿曼政府医院工作了一年，她曾给阿曼国王的妹妹看病。她笑说，当时皇家医院的院长亲自把她带到阿曼南部撒拉拉（Salalah）的另一所皇官，给国王妹妹做治疗。刚开始时，她压力很大，担心国王妹妹排斥针灸，也忧虑自己针扎得不对。很快地，她就发现公主非常平易近人，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 “我很高兴能在阿曼传播中医医学，让阿曼人认识针灸。”李晓桂说：“我刚来时，敢针灸的阿曼人不多，现在他们都接受了。在其他中东地区如阿联酋，大家多做按摩保健，不敢扎针，可是阿曼人却没问题，有的还主动要求。”
* 李晓桂有感中医师在阿曼比在中国受政府重视，感觉自己仿佛成了中医权威，很受尊重。许多部长夫人生病，都到医院让她看病。
* 多数政府外派的中医师在合约到期后，都选择回国。像李晓桂留那么久的非常少。目前阿曼中医师共有十几名，大多数都自己开私人诊所。要申请在阿曼开诊所的中医师，都由李晓桂负责面试评估。
* 张新平于1997年抵达阿曼。和李晓桂不同的是，他是私人诊所的中医师。他工作的那家诊所可谓“老字号”，从1986年就开始经营，担保人是Sheikha Mohammed Hamed Al Ghazal。这位当官的阿曼人到过中国，看过中医，对中华医学很有信心，眼看其他海湾国家纷纷有了中医诊所，因此起了在阿曼开中医诊所的念头。1997年张新平来到阿曼时，只是以打工的身份在这里当医师。2000年，张新平辞去工作，回中国发展。几个月后，担保人找上了他，提出让他当老板经营这家诊所，他答应了。
* 如今，张新平既是诊所的医师，也是老板。诊所规模不大，有两名医生和两名助理，但多年来，已经建立了忠实的顾客群。未来，张医师还想拓展推拿业务。
* 目前，阿曼的私人中医诊所达十几家。和政府医院不同，中医诊所能用中草药。在阿曼，草药属于灰色地带，没有明确的审核标准。张新平希望将来中草药能正规化，不过，他也表示，由于手续繁杂，以他个人之力，不容易办到。
* 在欧美国家，曾发生中医师因为给病人进行刮痧、拔罐等治疗，而被控告虐待病人的事件。不过，张新平表示，类似的医疗纠纷，在阿曼从来没有发生过。“阿曼人对中医的接受度很高，也很相信自然疗法，因为两地的医学系统相当接近。当地的Hajama和中医的拔罐就很相似。因此，中医并没有碰上很大的阻力。”张新平表示。
* 虽然中医的前景在阿曼一片光明，不过，阿曼中医师却有隐忧。这是因为近来坊间开始出现一些“推拿中心”与“按摩中心”，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色情场所，令阿曼人对中医有了负面印象。
* 最近，阿曼又来了一批天津中医学院的中医师，他们都在阿曼的第凡皇家医院服务。天津中医学院是中国顶尖的中医学府，阿曼的华人都认为这批年轻的中医师必然也相当杰出，因此对他们抱以极大的期望。阿曼对中医的接受度本来就相当高，在所有阿曼中医师的努力下，中华医学不难在阿曼发扬光大。
* 对早期在阿曼生活的华人来说，阿曼这地方正如它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一样，是一片“宁静的土地”，可是，宁静得过分，未免成了枯燥。
* 直到阿曼华人华侨协会的出现，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华人的生活。
* 2005年，王志梅与朱富萍于同一天抵达阿曼。这两人原本素不相识，也在不同的公司上班。可是，在阿曼的相遇，注定了这两名女士，要携手成就一些事情。
* 朱富萍与丈夫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石油公司工作。王志梅的丈夫是石油公司的高层职员，夫妇俩在荷兰与英国等国家待过多年。在欧美国家生活了多年，他们早就习惯了欧美庞大而活跃的华人社群。来到阿曼，发现这里虽然华人越来越多，却是各自为政，鲜少有机会聚在一起，两人于是决定为阿曼华社做一些事。
* “另外，我们也感到华人在阿曼的形象似乎不是太好，尤其是华人女性。这几年，不少‘小姐’从迪拜涌到阿曼，搞到华人女性常被人‘问价钱’。我们希望通过社团，提高华人形象。”王志梅无奈地表示。
* 两位女士都在欧美受过高等教育，非常重视法纪，她们可不愿意随随便便找几个人开个会就当成立了社团。为了令社团有个合法地位，她们经历了不少波折。首先，阿曼政府规定一定要有40名以上的会员，才能申请注册。两人好不容易收集了足够签名，政府又把最低人数的门槛上调到100多名。“刚开始时找会员确实很不容易，大家都不看好，还有人泼冷水。”王志梅说。
* 后来，他们打听到阿曼石油开发公司（PDO）的外籍职员能在公司内成立社团，而朱富萍又刚巧是PDO的职员，于是，就先在PDO成立了阿曼华人华侨协会（以下简称华协）。不过，朱富萍想到自己迟早会离开阿曼，因此，两位女士和几名理事，不辞劳苦，到处拜访华人争取签名，好向政府申请注册。
* 华协的第一届会长是朱富萍。第二任会长（现任会长）是王志梅。除了有正副会长、秘书长与财务，华协还有体育、社会服务、公关、旅行等等理事，分别负责不同事务。会员由最初成立时的20多人发展到今天，已有140多人，包括中国、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荷兰等国籍的华人。
* 除了中秋晚会、元宵聚会等等“例行公事”之外，在王志梅的带领下，华协还举办过许多活动，譬如在国际市场日开设中国美食摊，大家亲自动手做了饺子、春卷、包子、炒饭、茶叶蛋等，让各国人士品尝。这次义卖的收入，部分交给国际市场日组委会用于阿曼的慈善事业，部分用于中国的慈善以及帮助在这里陷入困境的中国人。
* 马斯喀特的奥运火炬境外传递是阿曼华社的盛事。由于前几站遭到政治异见人士的破坏，阿曼华社对此严阵以待，华积极配合中国大使馆，把华人组织起来到现场助威，并为保安情况做了一些部署。在那段期间，华协也给当地报章发了新闻稿，向阿曼社会介绍中华文化以及在当地生活的华人社会。
* 2008年除了奥运圣火传递，中国还发生了南方雪灾和汶川大地震等事件，华协积极号召华人和其他社团人士为灾区人民踊跃捐款。
* 把小孩也带到阿曼一起生活的华人父母不多，主要以已经移民欧美或其他国家的海外华人为主。可是，这为数不多的几个华人家庭，对孩子的中文教育丝毫不敢松懈。华协会长王志梅为了还在国际学校念小学的女儿，也为了其他的华人小孩，毅然挑起了百年树人的重责，在家办起免费周末中文班，亲自上阵教孩子们中文。中文班在家长们的坚持下一直办了下来，并另外找了课室和曾当过老师的华协会员来教。可是王志梅也没歇下，在一些对中文很感兴趣的老外要求下，又义务开了个成人中文初级晚班，还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在上班的公司开设中文课。
* 华协成立不过两年多时间，却对当地华社颇有建树，除了使华人渐渐凝聚起来，也促进了华人和阿曼其他族群的交流。
* 华协的成立，在生活上对阿曼华人之间的互动起了推动作用。首先，除了元宵、中秋这些大型晚会，其他大大小小，正式与非正式的聚会也多了起来。在华协一众理事的撮合下，来自社会各层面的华人，得以经常聚在一起，大家变着花样做几道菜，为思乡的胃解馋。老华侨李晓桂的家，是阿曼华人的其中一个聚会场所。在她家的聚会里，谁都可以轻易感受到阿曼华人融洽相处的情况。参加聚会的华人，既有石油公司高层，也有中医师与护士，既有在欧美生活多年的华人，也有第一次踏出中国的华人。大家的人生经验与社会背景都各不相同，但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却能齐聚一堂，过得很开心。

  热爱运动是阿曼华人的特点。阿曼华人常有篮球比赛、网球比赛，为平淡的生活带来不少乐趣。

        华人之间固然和睦，和阿曼人也同样相处愉快。许多华人都表示，阿曼人是个热情好客的民族。29岁的中国小伙子熊飞，就表示阿曼人情味很重，给了他一个家的感觉。“路边等车时，偶尔还有人停下来载你。去乡区旅行时，向当地人问路，他们会亲自把你带到你想去的地方，有的甚至带你到处参观，以尽地主之谊。”熊飞说。

        华协有一次办了个假日团出发到阿曼海边看海龟产卵，向路人问路时，生性好客的阿曼人就带他们到处游览，还把他们带回家里做客。临别时华协为了聊表谢意，想给他们一些酬劳，他们还坚决不收。

在这方宁静的土地上，华人享受到了久违的慷慨和仗义之情。

* *2003年，一位英国人Peter Copperwheat开始在阿曼传教，用中英对照的圣经教华人护士英文。一个中文教会渐渐成形。Copperwheat离开阿曼后，中文教会由其他人接任，不少华人受洗。2009年3月13日星期五，在热心的基督徒朱富萍的组织下，华人基督徒在Protestant Church of Oman提供的一间小课室内，开始了第一次中文查经班。*
* 阿曼社会近年发展迅速，而马斯喀特的面貌，年年在变。
* 1995年，被中国卫生部外派到阿曼的医护人员刚到马斯喀特时，整座城市静悄悄的，道路很窄，车子很少，没什么高楼，都是传统阿拉伯式白色房子。当时没有大型的购物商场和超市，买菜要到蔬菜店，买牛肉要到牛肉店。
* 阿曼国王卡布斯非常重视古迹与传统文化，就连对于城市楼房的高度，都有法律限制，以保留马斯喀特的特色。在竭力保护自身文化古迹的同时，阿曼近年亦不忘加快现代化进程的脚步。“近几年变化很大，道路拓宽，到处都有大型的百货商场。”在当地生活过一段日子的华人纷纷表示。
* 台湾人胡耀文回忆3年前刚到马斯喀特时，公司附近还是一片荒芜。可是，短短时日里，公司附近就开了又大又气派的购物商场和超市，生活方便了很多。
* 阿曼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比起来，算是相当开明的。虽然阿曼人不吃猪肉，但也不严加禁止，在特定地方还是可以买到猪肉。这里也允许女性独自开车，在中餐厅还能偶尔见到阿曼女性单独或数人一起用餐，无须男性陪伴。
* 华人女性大可随心所欲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不像沙特阿拉伯，规定外国女性也必须戴头巾。不过，华人女性一般还是“入乡随俗”，到哪里都穿得端庄得体。嫁给阿曼人的华人女性一般更是把自己包得密密实实，也不太参与社交活动，非常尊重夫家的宗教与文化。驻阿曼国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李自正认为：“这应该是华人女性的自我设限。同文同教的女人，如黎巴嫩、埃及这些地方嫁过来的，反而敢穿短袖短裤。”
* 在如此一个治安良好，开明友善的地方生活，许多华人开始对阿曼心生眷恋。朱富萍表示，很多外派人员都和他们家一样，爱上了阿曼。他们公司的外派合约，一般一签就要签4年，可是一般外派人员在合约到期后都选择续约，以便在阿曼多待几年。朱富萍和丈夫莫涌，就已经续签了两年合约。
* 对华人来说，阿曼生活纵使有些枯燥，他们还是可以找到娱乐的方式，因此普遍上不会觉得日子太难过，甚至有的人还觉得，这里赚钱多压力小，可说是个天堂。可是，在一个回教国家里，当华人人数太少时，始终还是难以长期留住年轻华人。对单身华人来说，除非你愿意嫁给穆斯林人，否则，择偶始终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因此，单身华人留在阿曼的时间，往往比把家人带过来的华人短得多。
* 在阿曼留了13年的李晓桂，愿意留在阿曼那么长的时间，主要是因为孩子的缘故。因为工作表现得到上级认可，她多年前获准把儿子韩绪龙接到阿曼一起生活。儿子今年16岁，在American British Academy国际学校上学。李晓桂表示，在国际学校上学没压力，着重于启发孩子的思考能力，他希望儿子能在阿曼完成中学教育。当儿子上大学后，她才会开始考虑回国的问题。
* 阿曼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外籍人士很难在此获取公民权。再者，阿曼消费高昂，如果没有工作，在这里退休也是难以享受生活的。也因此，再怎么喜爱这个国家，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地方只是生命中的驿站，不可能在此落地生根。
* “阿曼一直属于欧美的势力范围，这里有很多欧美公司，来自东亚的公司很少。我想要把更多东亚的公司带到阿曼。”Seven Seas Victory Knights Company LLC的董事经理许建章（Nicholas Koh）说。
* Seven Seas Victory Knights Company LLC是一家市场发展顾问公司，旨在协助有兴趣前来阿曼发展，而又不了解阿曼国情，缺乏实际经验的外国公司。据悉这也是阿曼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新加坡公司，除了新加坡籍华人，公司还有台湾和中国大陆员工。
* 许建章几年前来到阿曼，就发现阿曼和新加坡刚开埠时的情况很相像，有很大的发展潜能，只要好好发展，很有可能成为中东区的新加坡。因此，他想把新加坡的经验，移植到阿曼。
* 他从2005年开始到阿曼研究当地政策、商情与投资环境，积极建立人脉与商业网络，并深入了解当地文化、思想、政策。“我们会告诉客户公司这项业务是否适合在阿曼发展，如果成功的几率很低，我们会直接告诉他不合适。除非成功几率高，我们才会鼓励他前来投资。”许建章说。他也表示公司不只提供情报与咨询服务，也积极参与客户公司的运作，担任客户公司与当地担保人之间的协调者，确保客户能在阿曼取得成功。许建章的公司于2007年正式投入运作。阿曼亲王Shihab al Said是该公司的董事，有亲王做后盾，因此很占优势。
* 阿联酋的迪拜是全球商家必争之地，而卡塔尔也努力吸引外商，不少新加坡公司都把区域分公司设在多哈。问许建章阿曼和前两个国家相比如何，他认为阿联酋及卡塔尔竞争太激烈，新公司要在那边发展比较困难，营运成本也太高。而阿曼还是个有待开发的新市场，充满潜能。
* 近代华人闯荡天下，可说很晚才到达阿曼。直到二零零三年后，一个华人社会才逐渐在阿曼成形。
* 因为社团活动办得不错，仅有数千人的阿曼华社，却展现了海湾区华社少见的活力。华协成功地把各个国籍以及各种不同背景的华人，凝聚在一起。各方华人摒弃成见，在异乡同欢共乐。
* 其实，想到阿曼发展的华人不少，可是阿曼未必肯全面开放，让那么多华人进入。阿曼要是对中国有多一些了解，肯开放给中国人进来，这里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因此，阿曼的华社会不会继续壮大，取决于中阿之间的对话有没有进一步展开。

也门

* 3000多年前，阿拉伯半岛南端，濒临红海与亚丁湾的也门，已有关于乳香等事物的文字记载。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525年，这个中东古代文明的摇篮曾先后出现过麦因、萨巴和赫米叶尔3个辉煌的王朝。7世纪时，一股新的势力入侵也门，从此彻底改变了也门的文化、宗教与政治风貌，这股势力，便是至今仍深植也门的伊斯兰教。
* 富饶强盛的也门曾多次遭受外敌入侵，奥斯曼帝国从1535年开始占领也门部分地区，1918年才被彻底逐出也门。英国于1839年控制了也门南部区域，繁华的亚丁成为英国保护地。1934年，英国趁也门发生内乱，迫使也门王室承认其对南部的统治权，也门被分割为南北两区。北也门于1962年成立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南也门于1967年驱走英国殖民势力，成立南也门人民共和国，3年后改名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成了阿拉伯第一也是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 虽然南北也门人民渴望统一，但因为政治的分歧，以及内外势力的角力，两边关系紧张，数度发生血腥冲突。经过多番幹旋，1990年南北也门终于宣布统一，也门共和国诞生，定都萨那。统一后的也门，政治比以前稳定，但恐怖袭击事件时有发生，国际形象也被盖达组织蒙上阴影。也门至今仍是最贫穷的阿拉伯国家之一，约半数人不识字，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因为经济落后，到也门从商的华人不多，来到也门的华人多是中资公司的公派职员或医疗队的医护人员。
* 公元650年，阿拉伯帝国势力如星火燎原般向四面八方蔓延开来，擅长远航的阿拉伯人从世界各地收集并整理了各种知识，数学、医学、科学都极为先进。当时，也门已懂得进行精细的手术，对麻醉以及消毒都很在行，对眼科等疾病也都有丰硕研究成果。
* 从那时起，唐朝便不断派出医师到阿拉伯世界去学习精湛的医术。而这段历史，不论是在也门或中国的各种文献，如公元659年的阿拉伯文献《药材》，或穆斯林医师李锡旺的《草药》中，均有清楚的记载。那期间，中国人单单从亚丁采集的药材就多达41种，在整个也门，更收集了142种药材。今天，很多华人耳熟能详的中药如没药、茉莉、乳香、红花及指甲花等，皆源自阿拉伯。两国的医药交流，大大地推动了中华医学的发展。
* 除此之外，两国的商贸来往也是古已有之。阿拉伯世界刚被伊斯兰教统一的那段时期，中国正处于大唐盛世，双方的文化、商贸都空前鼎盛，而且来往频繁。当时，也门的亚丁是国际大港，世界各地的商人都到此开设商店，许多商人还与当地人通婚，落地生根。一位其亚德王朝的国王在他的著作《国家》中，也有提及亚丁湾上处处停泊着中国船只的情况。中国商人在此贩售丝绸、瓷器、麝香，并从也门购得香水及香料。两国之间的商贸往来直至宋代仍然非常频繁。
* 明朝初期，明太祖与明成祖皆十分重视海上商路和对外关系。郑和七下西洋期间也曾经走访亚丁等地，进行外交以及贸易活动。
* 亚丁被英国占领后，依然保持其国际大港的地位。当时，英国各殖民地的人民皆可自由往来，因此有许多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等地的华人途经此处，或在此地做生意。但是，由于当地气候炎热、加上语言不通，很少人愿意长期留下。
* 到也门独立以前，在亚丁的华人约有300名，他们大多数来自印度，主要从事电焊技工、钟表修理等行业。当时，曾有一位叫作顾锦模的中国人在此开设船员宿舍和餐厅。独立初期，中国人入籍也门并不困难，顾锦模的数名孩子都已入籍也门，并在也门生活至今。
* 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交通部对外援助办公室（即中国路桥公司的前身）派出了一队工程人员，协助也门建筑一条从荷台达（A1Hudaydah）通往萨那的公路。这是中国在也门最早的援建项目。当时，西方的建筑公司曾估计艰险的荷萨公路需要20年时间才能竣工，但中国援建项目组仅仅用了4年时间便完成。
* 公路建成之后，埃及军队曾经通过这条公路增援也门革命军，推翻了伊玛目时代的封建政体，建立共和国，故此，荷萨公路也被称为革命之路。
* 今天，荷萨公路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用。萨那属于山城，没有工业，物资均靠进口，荷台达港口的所有货物通过荷萨公路进入萨那，大大地缩短了运程。
* 从1979年到1998年之间，中国公司于也门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有近12家中国公司到也门承包工程，并且建立合资企业。
* 除了协助也门建设公路、医院以及桥梁等基础设施之外，1962年，中国也开始向也门提供医疗援助，派遣医疗团队到也门去照顾于战争中受伤的也门士兵。曾经有一次，伊玛目的势力包围了萨那，其他国家的医生都已经撤走了，只有中国医疗队义不容辞，坚持留下来和当地医务人员一起救助伤者。
* 此后，中也两国又在1972年、1977年、1979年和1981年，于萨那签署了卫生议定书。直至今日，中国仍不断地向也门派出医疗队，以改善也门乡村和城市的医疗卫生服务。
* 一千多年以前，中也两国便开始了医学方面的交流。今日，双方重续这一份情缘，让可贵的人道和互爱精神流传下来。
* 也门北方雨水充沛，是阿拉伯半岛上少数能发展农业的地区。也门南方地理位置优越，水产资源也丰富，亚丁自古就是重要港口。可惜到了近代，也门成了阿拉伯半岛上最贫穷的国家，对华人的吸引力也一直不如其他阿拉伯国家强。也门人口超过两千万，华人却只有1000人左右。
* 也门华人主要来自中资公司和医疗队。中国医疗队自1960年代起，就一直留在当地，为也门人民提供医疗服务。萨那、亚丁、塔兹（Taiz）、荷台达、木卡拉（Al Mukalla）和赛永（Sa'yun）都有中国医疗队，每个医疗队大约有20人左右。医疗队里的医生护士们，一般都服务数年后回国。
* 华人在也门从事的经济活动，以大型企业为主，主要集中在石油、电信、矿业、工程几个领域。这些外派到也门的企业职员，一般只会在也门逗留几年。民间消费能力不高，搞贸易的民间华商，自然也不多。
* 虽然华人稀少，萨那倒是有7家中餐厅。这大概说明了中餐在也门还是相当受欢迎的。
* 一般华人初到也门，心情恐怕都得先经历数次起落。从机场到萨那市区的路上，触目俱是残破不堪的建筑，小贩沿街摆卖旧书报或旧鞋，蒙面纱穿黑袍的女人用力拍打每一辆停在交通灯前的车辆，乞讨一些施舍。“也门连一国之都，都破落至此吗？在这地方日子要怎么过？”到此打工的华人想到将在此地生活好几年，难免心里起了疙瘩。
* 不过，要爱上也门，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来到也门的华人，绝大部分都住在萨那。不用多久，他们就会发现，其实生活必需品在萨那都可买到，生活不至于太不方便。这里没有其他富裕海湾国家美轮美奂的购物中心，却有密密麻麻的小店铺、小饭店，贩卖各种小吃的路边档也到处都有。也门人摩肩接踵，在嘈杂的街道上寻找他们需要的物品。他们贫穷，但是快乐。
* 萨那是座美丽的城市。它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据说洪水退却后，诺亚的长子闪决定在此建城。萨巴王朝时，这里就是繁华的都市，赫米叶尔王朝也定都于此。今天，萨那老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城里1万4000多座土楼，每座都有千百年历史。在这世界上最早出现摩天楼的城市里，现代文明的浪潮还未席卷过来，也门人仍然过着俭朴生活。大人们做着小买卖，小孩在巷子里戏要，当地华人闲来到老城区逛逛，很容易就感染上也门人的快乐。
* 也门人对外国人友善而热情。看见亚洲人，也门人会微笑着尝试用日语问好。日语行不通，他们马上改成华语：“你好。”在一个华人如此稀少的城市里，也门人能用华语打招呼，可见华人在也门人心目中的分量。
* 萨那位于阿邦山和纳卡木之间的盆地，海拔2200米，气候温和。阿拉伯半岛上大部分地区夏季时热如烤炉，萨那夏季温度却很少超过30度。海拔高、气压低、氧气稀薄这些现象虽然存在，不过因此产生高原反应的华人不多。一些健康欠佳的华人初到萨那，会感觉头痛、头晕、胸闷、厌食，但只要多休息多喝水，一般数天后都能适应。
*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2008年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index），也门在170多个国家里排名138。虽然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可是，和附近其他同样贫穷的国家比较起来，也门的治安无疑好太多了。
* 不过，小型犯罪不多，不代表也门的华人就可以高枕无忧。2001年，曾有一位中资公司的职员马卫东被恐怖分子绑架。自此，每当发生恐怖袭击或绑架事件时，华人不忘互相提醒，出门要小心。
* 自从中国交通部对外援助办公室于1958承建荷萨公路之后，中资公司就在也门占有了一席之地。虽然荷萨公路是援建项目，可是，高质量的工程却为中国赢得了信誉，自此，中国公司在也门的投资日渐增加，发展稳健。
* 1979年，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了中国公路桥梁工程公司（简称路桥公司），开始承包对外项目。由德国政府提供资金的“1986-1990年萨那一塔兹道路修复项目”，是路桥在也门的一个亮点项目。这条道路连接萨那与塔兹两个新旧首都，自1990年修复完成后至今，路况仍然非常良好，令中国的工程再次受到也门一致好评。
* 此外，亚丁海堤路修复项目、亚丁污水项目、也门伊卜扎马尔给排水工程，阿木兰一哈贾援建项目等工程，也为路桥公司赢得了更高的声誉。
* 路桥驻也门分公司全盛时期，员工人数高达1400多人，单是办公室就有20多人。路桥目前正进行着全长14.8公里，双向8车道的“萨那一阿木兰”道路拓宽项目。该项目的工程师、工头等都是中国人，不过，由于也门劳力市场的工资比中国低廉，因此民工都是当地人。
* 中国在修桥筑路以及建筑方面，占了相当的市场份额。此外，中资公司在通讯领域也有耀眼表现。而中国CMEC公司在亚丁承建了哈斯沃电站扩建工程，中国石化则在也门进行石油勘探。
* 不过，据了解，近年有不少外资公司，由于对市场了解不足，不了解也门政府的付款能力和办事效率等，因此都亏了钱，最后黯然离场。
* 路桥公司总经理范振江表示：“也门本土工程企业发展很快，工程承包市场竞争激烈，利润下降，在工程承包市场赚钱已经越来越困难。不过，路桥属于老公司，对也门风俗、市场相当了解，而且声誉好，因此能生存下去。”此外，物价疯狂上涨也是导致许多公司亏的原因，他补充说：“从2007至2008年，沥青就涨了60%。”
* 从1960年代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对也门的医疗援助计划。1962年，第一批到达也门的中国医疗队人员，经历了惊险的北也门革命，救助了无数受伤的士兵与平民。此后，中国又与也门签订了多项合约，一批又一批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不断到达也门，服务当地百姓。根据这些合约，中国政府向也门派出的医疗人员，每批高达100多人，累计到今天，曾在也门服务的医护人员已有约3000人之众。医生护士们必须留在也门服务两年或数年。
* 目前，萨那、亚丁、塔兹、荷台达、木卡拉和赛永都有中国医疗队，每个医疗队大约有20人左右。这些医护人员的工作环境相当艰苦，被分配到萨那、亚丁等城市的还好，被分配到偏远地区的医护人员，需面对更大挑战，这些地方通讯设备落后，生活条件差，且交通不便。从萨那乘车前往一些坐落在乡区的医院，要在弯曲破烂的山路上走数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才能抵达。可是，这些华人医护人员，还是秉承着救人济世的精神，尽力向当地的穷困百姓伸出援手。
* 2006年9月12日，也门总统大选的演讲现场，发生了踩踏事件，一时间伤者无数。中国医疗队的全体人员紧急动员，抢救了伤者近百人。这次事件令中国医疗队受到当地社会广泛赞赏。
* 根据2007年的一项统计，分布在也门12家医院的163名中国医疗队医护人员，共诊治病人13万人次以上，实施了2万2000多宗大小手术，抢救了严重病患3177人次。
* 因为中国医疗队对当地的贡献，华人赢得了也门人真诚的尊敬。
* 也门不是富裕国家，国民消费能力不高，难以成为华商看重的市场。可是，也有一些独具慧眼的华商，努力在也门贫瘠的土壤上，寻找利益点。
* 也门本来连一家外资开的旅行社都没有。一位姓雷的华商由于经常需要到也门处理公务，发现当地旅行社的服务、效率和信誉都欠佳，因此萌生了自己开旅行社，以后自己订机票的念头。2007年11月，也门第一家外国人投资的旅行社——康辉旅行社，在萨那正式开张。
* 旅行社开张没多久，也没多做宣传，就已有不少外国人自己找上门来订购机票，甚至还有一些国际大公司主动要求合作。近来，康辉的顾客也多了不少也门人。康辉决定乘胜追击，计划下半年在多哈和迪拜开分社。
* 陈媛是康辉旅行社的助理主席，旅行社大小事务全由这位年龄仅20多岁的中国女孩负责。她刚到也门时，在石油领域的公司工作，后来老板决定开旅行社，才调派她管理康辉。在此之前，她对旅游业一点概念都没有，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学。经过一年摸索，康辉业务竟然很快就步入正轨。
* 为了响应员工当地化政策，康辉的职员除了陈媛，全是也门人。陈媛表示，聘请也门人也有不少好处，也门人的工资只需中国人的一半，而且中国职员不会愿意长期留在也门，流动性大，每年要放长假回中国，又要顾虑他们不适应也门环境。
* 可是，聘请也门员工，也有意想不到的烦恼。“也门员工的水平高低不一，而且工作理念和公司不太一致。中国人对服务品质的要求高些。”陈媛说。为此，康辉花了很多时间培训员工，并提供不同的课程给员工进修。
* 海默油田服务公司是来自中国的民间企业，主要业务是为石油天然气工业提供测量数据、石油天然气设备和整体解决方案，以及优化生产等服务。在国际油气井多项测试技术领域中，海默以短小灵活的民企姿态，傲然与多家历史悠久的大品牌争雄。
* 海默在阿联酋和阿曼都有分公司，而该公司进驻也门，只不过一两年时间，却已经取得亮丽业绩，成功争取到壳牌、康菲、道达尔、中海油等客户，成了也门最成功的中国公司之一。法国道达尔公司曾给他们写过推介信，盛赞他们的环境安全与健康措施的标准、数据质量以及专业服务都有过人之处。
* 49岁的丁美玲，是相当早到也门发展的华商。她原本在中国开领带厂，有一次，朋友拿了她的货到也门卖，卖了个满堂红，两人于是决定跑到由门做贸易，2000年，两人来到也门，当时也门市场上很少中国货，全都是廉价印度货。丁美玲经验不足，不知道当地市场具能接受低档次的货物，结果，她从中国进口的高档货，全部滞销。
* 可是，她并没有打退堂鼓。“我抱着中国人不服输的心理，哪里亏了钱，就要从哪里赚回来，坚持继续做下去。”她说。经过几年时间，她摸熟了也门人的品味，在中国大使馆附近开了一家中档的服装、婴儿床零售中心。
* 零售生意做稳后，丁美玲又做起废塑料回收的生意。另一名华商戴建克经营的塑料回收厂是也门规模最大的工厂。丁美玲和戴建克两家中国公司，就占去了也门塑料回收很大的市场份额。
* 丁美玲到了也门不久，就把大女儿、大女婿和小女儿都接到也门。大女儿和女婿帮她打理生意，而小女儿陈吉正上着当地政府办的学校。“不选国际学校，是因为要学好阿拉伯语，还是在当地学校念书较好。”丁美玲解释说。一家人经过几年打拼，生意已经有了根基，和各方面也建立了关系，展望未来，也门商机也还不错，丁家母女都有长期留下发展的意愿。
* 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从商，安全是华人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关于这点，丁美玲认为问题不大。“也门人对中国人不错，一般不会骚扰外国人。不过因为国家贫穷，小偷小摸是难免的，但不会破门打劫或半夜入贼。我们店里装了防盗器。抓到小偷，也不报案，只要他们乖乖把偷的东西交出来就放他们走。”她说。
* 2008年末金融海啸后，也门的中国人骤然增加了不少。许多其他国家的华商在当地做不下去，纷纷跑来也门寻找活路。
* 已经年届50岁的安徽人韩明生，和几位朋友下岗后，想到国外闯一闯。他们曾在非洲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待过一阵子，但有感非洲市场太零散，生意难做大，且非洲太多中国企业，竞争激烈。经过仔细比较，他们发现也门虽小，但是萨那人口稠密、政治稳定，因此结束了非洲的生意，转到也门发展。
* 他们打算在萨那开一家汽车修理厂。“萨那到处都是旧车子，但这里的修车厂技术很差。在这里开修车厂，肯定好赚。”韩明生信心满满地说。修车厂还在筹备中，没能那么快开张。可是，商业嗅觉灵被的韩明生，很快又发现了一门生意。“在萨那买不到豆腐！”韩明生说：“一斤豆腐在中国只能卖人民币几块钱，在这里我可以卖到人民币15块多。阿拉伯人不吃豆腐，但可以卖给欧美人。”
* 于是，他们又“顺便”开起了豆腐厂。豆腐厂的筹备过程比较简单，于是，修车厂还没开，豆腐厂倒是先开了起来。豆腐厂投入生产的第一天，韩明生带着一名翻译和一袋袋豆腐、豆干，一家一家找客户，卖给各大超市。“在也门开工厂虽然成本比中国高，但收入相对也高。”韩明生说。
* 萨那还有一家中国人开的中也文化麦尔佳交流中心。这家中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也门人，涉及的业务相当广泛，包括汉语培训、帮也门人办中国签证、中阿语翻译等等，最特别的是还开办武术训练班。创办人吕鹤松是中国回族，曾在也门科技大学和萨那大学上学。他发现也门人热衷学习汉语，而且随着中也两国商贸来往日增，对翻译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因此萌生创业念头。
* 武术班由他亲自开班授徒，教也门年轻人心意拳和回族的查拳。高峰时期，武术班的学生曾高达60人，暑假班更有上百人的纪录。
* 交流中心自2005年7月开办至今，知名度渐高。回想刚开始时面对的种种问题，吕鹤松不胜唏嘘：“刚开始时资金窘迫，办公设备、租金等都没有。好不容易开成了，又不断有安全局或税务局等的人员来找麻烦。中国人在此创业，这方面还是比较需要领事保护的。”
* 也门虽然不发达，但不缺商机，留下来的中国人都找到了一条活路。
* 也门原来规定，外资公司须让当地人占至少51%股份。现在，也门出台了最新政策，允许外国人独资，无须担保，而且只要六七万美元的资金就可获准经营。这项政策实行后，相信将吸引更多华商到也门开辟市场。
* 萨那近郊山坡上，有一处埋葬着华人先贤的墓地，俯瞰着整个萨那城。这座墓地，就叫张工墓。墓地旁那条蜿蜒盘旋在崇山峻岭中的公路，正是闻名的荷萨公路。
* 1962年，荷萨公路建成，一名叫张其弦的工程师，在检查施工现场时，不幸因车祸过世，英年39岁就客死异乡。也门政府感念中国工程队的贡献，在荷萨公路旁拨了一块地，让中国驻也门大使馆在这里修筑一座墓园，把张其弦葬于此处。墓园里一块硕大的碑文“张其弦工程师之墓”，由时任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题字。从此，这块墓园就成了当地华人口中的“张工墓”。
* 每逢清明节，驻也门中国大使馆、各中资机构以及医疗队的代表，都会到这里扫墓，以鲜花和美酒祭莫英灵。
* 5000多平方公尺的墓园处处栽满鲜花，芳草萋萋傍碧亭。40多年来，在也门亡故的华人超过100名，其中50多名葬在此处。这些华人，有来自路桥、中建等公司的工程队人员，有也门各地中国医疗队的医生护士，也有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不管来自什么领域，他们对也门的发展，都有过贡献，也在此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 在亚丁机场，只要告诉出租车司机，你要到“中餐厅”，他们就会直接把你载到众胜餐厅（Chinese restaurant）。众胜餐厅如此深入人心，不只因为它是亚丁唯一的中餐厅，更是因为它从亚丁还是英国殖民地时就开始营业，见证了也门争取独立，步入统一，走向共和的过程，陪伴也门人度过了几十年岁月。
* 这家餐厅简陋得令人意外。陈旧的桌椅、冰箱、灯、电风扇，以及几盏蒙尘的灯笼，昭示了一段悠长的岁月，令人霎时时空错乱，仿佛回到战前的时光。
* 餐厅老板顾升贤62岁，出生在中国大陆，潮州汕头人。1948年，父亲把他和母亲接到也门；那年，他两岁。父亲顾锦模是船员，由于当时打仗，船停在亚丁开不了，于是就留了下来。1950年至1963年，顾锦模开始在亚丁经营船员宿舍。每当有船入港，他就亲自到港口招徕生意，他的宿舍包吃包住，费用廉宜，因此很多中国船员都到他那里下榻。
* 顾锦模过后再陆续把弟弟和母亲也接到亚丁。他后来再娶了一位也门太太。二太太的父亲是印度迁来的华人，母亲则是也门人。顾锦模和这名太太，共生了3个女儿和两个儿子。
* 后来，亚丁船务骤降，港口萧条，船员宿舍的生意一落千丈。顾锦模决定改行，1963年6月15日众胜餐厅正式开张。隔年，中学毕业的顾升贤就在爸爸的餐厅帮忙，然后继承父业，一直到现在。顾升贤在英国殖民政府办的学校上学，说得一口流利英语。
* 餐厅的厨师是香港聘来的，主要做英国人生意。由于父子没有经验，刚开始时餐厅一直亏钱。南也门独立后，英国人走了，餐厅生意反而更兴隆。当时众胜餐厅在也门算是比较高级的，也门官员要请客，一般都会到他的餐厅。
* 多年过去，众胜餐厅的辉煌已在时间里褪色。现在，众胜餐厅只是亚丁一家毫不起眼的小餐厅，是也门人不忍挥别的记忆。餐厅的顾客一半是忠实的也门顾客，一半是慕名而来的华人及欧美人。曾有一些中国人在此开中餐厅，不过没几个月就关门大吉了。“有我在，别人开不了，他们无法和我竞争。”顾升贤自豪地说。
* 不过，他没打算扩张营业。“不能太贪心，有赚就好了。正如阿拉伯语说的，用两只手吃饭会噎着。”他说。
* 顾升贤晚婚，娶了一个香港太太。他的父母有感二太太所生的两个小儿子都不像中国人，不会说华语，完全阿拉伯化了，因此坚持要顾升贤娶中国媳妇，把血统保留下来。目前，顾太太和3个女儿都在香港，只有他孤身在也门。“女人在这里没地位，我不想女儿嫁给也门人，这里也没有别家中国人，所以女儿到了开始上学的年龄，就叫太太回香港，让女儿在香港接受教育。”他说。
* 独立前亚丁曾有约300名中国人，现在全都走光了。他的父亲、母亲、奶奶都过世了，叔叔也回中国了。亚丁常住的中国人，只剩顾升贤一人，其他的都是在此短暂逗留的中资企业员工。他说自己不太留恋亚丁，打算退休后就回香港。“会一直留在也门，只是因为经济问题。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感觉自己还是个外国人。脸孔不一样，去到哪里，都还有人要查看我的护照，很没意思。”他说。
* 他的店面是租的，租金每年上涨，餐厅利润逐年下降，令他意兴阑珊。到他决定离开也门那天，屹立多年的众胜餐厅，也将走入历史。
* 在阿拉伯半岛上，也门是如此与众不同。也门曾是阿拉伯半岛的文化与经济中心，如今，却是最贫困的国家。当生活在其他海湾国家的华人，出入于五星级酒店、豪华阿拉伯风洋宅、大型购物商场时，在也门生活的华人，穿梭于古老建筑林立的小巷里。他们无法享受现代化城市的便利，却能沉浸于也门独特而浓郁的文化氛围中。
* 在也门，华人真正受到了阿拉伯人的接纳，没有歧视，没有敌意。这除了是因为也门社会贫穷，人心单纯，也许，也因为近代华人为也门作出了不少贡献，而也门人和华人之间，更有一段千年前深植的情缘。

约旦

* 上亿年前，这里曾经是被海水覆盖的大洋深处。随着地壳的隆起，海洋变陆地，奇迹般的地貌，赋于了约旦独特的美丽——红色的岩石、连绵的沙丘、辽阔的荒漠，仿佛讲述着这片国土所曾发生的故事。
* 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约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佩特拉王国，这里曾是当时的陆路交通
* 要塞。从历史遗迹中，往日的繁华，依稀可见。经过世代的变迁，原是巴勒斯坦一部分的约旦，先后被亚述、巴比伦、波斯、马其顿、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英国统治，如今是由哈希姆家族统治的独立王国。
* 约旦只有4%的土地可以耕种，其余都是戈壁、沙漠，水资源严重缺乏，而且充斥着数量极大的巴勒斯坦难民。现实的贫困与失业问题，让很多约旦人纷纷到他国打工，这些侨民的汇款是约旦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 有人走出去，同样也有人走进来。虽然约旦的经济并不发达，但是社会较为稳定、安全，这吸引了一些人来到约旦谋生，其中也包括近万名华人。
* 最早定居于约旦的华人，来自台湾。
* 在1977年，即约旦和中国大陆建交之前，它长期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那时，出现在约旦的华人，基本上全都是来自台湾的政府官员、工程人员或商人，他们在约旦、台湾之间往来穿梭，待工作结束之后便离开。
* 其中，有两家华人因与约旦王室的不解之缘，决定安顿在这个遥远的阿拉伯国家。
* 20世纪60年代，蒯松茂以台湾大使馆武官的身份来到约旦。两年之后，他的妻子杜美如，即当年上海滩传奇人物杜月笙的女儿，也获准前来定居。由于约旦王室对中华文化情有独钟，蒯松茂在这段时期和王室成员交上了朋友。一次闲谈中，他们聊到世上许多国家都有中餐厅，为什么约旦却没有？但是，当时他们只是一笑置之，双方都没有认真看待这个现象。在约旦与台湾断交之后，蒯松茂回到台湾去，然而，已经适应约旦生活的他，开始感到迷茫，于是又返回了约旦。
* 这时，叫他意想不到的是，王储哈山居然将“约旦之星”的称号颁发给他。这在当地是最高的荣誉，作为一名外国人的蒯松茂，感到光荣之余，自是感动不已，更是坚定了留在约旦的心愿。于是，蒯松茂在退役之后，一次过取出了自己所有的养老金，然后在安曼开设约旦的第一家中餐厅——中华饭店。
* 随着经济的衰退，华人制衣厂纷纷关闭，一些华商也撤退了，如今约旦华人人数已经回落到一万左右，这其中有七八千人是在制衣厂工作的女工。她们来自中国各地，以江苏居多，居住在约旦的3个工业区；伊尔比德（Irbid）、沙哈（Sahab）和卡拉克（AI Karak）。而以浙江人为主的华商都聚集在亚喀巴，数量有100多人，流动性较强。除此之外，真正长期居住、生活在约旦的华人，计有200余人，大部分安家在首都安曼。
* 真实的约旦与人们对中东国家的印象大相径庭，这里平静而安全。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华人总是这样安慰初来乍到的华人：“约旦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经济颇为繁华的免税区——亚喀巴，更是一派悠游、闲适的景象。那里的商人说：“即使你手里拿着十万块走在街上，也没有人抢。在穆斯林的脑海中，没有‘眼红’这个词。”
* 不同于其他阿拉伯国家，在约旦的华人移民中，入籍并不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因约旦皇室对中华文化的兴趣浓厚，与王室往来，对于一些华人来说，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遥不可及。有的华人也因此得到了约旦的国籍，为他们在当地的生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 约旦的相对宽容，也使华人的佛教和基督教组织在当地出现，并且与当地人有着深入的互动。如此情况即使在很多非穆斯林国家也是不多见的。
* 在约旦安家置业的华人，数量不多，但日子都过得很惬意。虽然谈不上豪宅名车，但至少居住宽敞、出外方便。其实约旦的贫富差距颇为悬殊，能够留下定居的华人，都较富裕。不过他们并不是做什么大生意，而是个体户的业务经营，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因为约旦华人少，做什么都能赚钱。不过赚的钱也只是够过我们的小日子，供孩子读书，为自己养老。”
* 因为国家小、经济欠佳、市场有限，约旦的华人都是身兼多职，事必亲躬。“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大家的口头禅，因为一种生意总是做一段时间就淡了。为了保持收支平衡，一定要做多重准备。
* 无论是留下来的华人留学生，还是因为机缘巧合停驻于此的外派人员，每个人几乎都做过华人能够从事的所有行业：贸易、中餐、翻译、制衣厂、承包工程、中医推拿等，事业起起落落、生活忙忙碌碌，倒也都赚得一份安稳、平静的好生活。
* 陈士忠十年前来到约旦。曾经在中国江苏国有皮鞋厂做厂长的他，因为工厂倒闭，带着一批员工到海外的华人工厂“再就业”。在公司打工的5年里，他前后换过15个岗位。现在已经有了自己公司的陈士忠，既经营工厂食堂，又为其他工厂提供食材，还代理劳务公司的管理业务。只要所属劳务公司的中国工人在约旦出现任何纠纷，不论罢工还是交通事故，都由他出面处理。“我的手机24小时不关机。”陈士忠虽也做中餐生意，但生活却很阿拉伯式，他说这是因为公事繁忙，“一边开车，一边吃大饼，就当做一顿饭了。”如今陈士忠的“梦想”都已成真：买房、买车，送孩子到美洲读书。“我没有白来约旦，出国前为自己制定的5年计划，都已经实现。现在，我在为实现第二个5年计划努力。”
* 与其他中东国家相比，约旦华人觉得经商的限制并不算大。“我们都是小本生意，所以没人管。”尽管如此，人在异乡还是难免要受委屈。像很多国家一样，在约旦做生意也是必须与当地人合伙经营，人地生疏，自然要付出高昂的“学费”。
* 在约旦已经15年的俞舟，前后被合伙人骗光了10多万美元。做贸易被骗货，做餐馆被骗走厨师和场地，开公司被骗钱。他曾一气之下，远赴塞浦路斯摆摊卖货，几年后才又卷土重来。
* 在俞舟第三次东山再起，创立了约旦的第一份华文、阿拉伯文、英文3语商业报纸——《金桥商报》，以3种语言为中、阿商家刊登广告。让他感到又惊又喜的是，第一期报纸就已经取得盈利了。报纸不但摆放在约旦的商铺、饭店内，在中国义乌阿拉伯人聚居的阿拉伯村也能看到，而这些都是俞舟一个人张罗。虽然他有自己的公司，但是约旦员工只负责拉广告。其他所有的排版、印刷、发放，他都一个人一手操办。每天俞舟把报纸放在车子里，谈生意、办事情，哪怕只是吃顿饭，临走前，总会向店主询问，可否放一些自己的报纸在店里。不过他现在再也不担心被欺骗了，因为“我的合伙人就是我太太”。此外，他还同时兼做旅游、贸易、工程等多个项目。
* 坐落在红海边上的亚喀巴，风景秀丽，港口风平浪静，是约旦唯一一个出海口和贸易进出口集散中心。自从2000年这里设立了免税区开始，擅长靠中国货打天下的华商也开始挺进亚喀巴淘金。他们有的直接来自中国浙江、福建，有的是之前的华人留学生，有的则从东欧、迪拜一路下来。
* 陈先生是第一个到亚喀巴开店的华人。在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捷克都闯荡过的他，第一次到约旦考察，就被这里的安宁与平静吸引。“这里的警察不贪污，给钱都不要。虽然约旦的市场有限，但对比之下，仍比为了赚钱搭上性命的环境好上百倍。”陈先生当时就决定把大本营转移到亚喀巴，并选择了市中心办公楼下层的门面作为自已的店铺。
* 其实做生意都不会一帆风顺，陈先生也不是一下就掌握了这里的生意秘诀的。初到约旦，习惯了欧洲进货方式的陈先生一次进了几货柜同样的商品，结果夏季摄氏50多度的高温，热得所有的鞋子都开胶了。“而且约旦人口稀少，这么多的货哪里卖得出去。”
* 那时他和太太只能每天看着满屋子的鞋子干着急。后来经朋友指点，陈先生才开了窍，在约旦上货，一个货柜至少要有几十样货品，以零售为主。他开始针对上班族的喜好，主打品质好、价格适当的商品，生意渐渐好转，也积累了不少回头客人。开始几年，他的年收入可以达到六七十万人民币，颇为可观。现在，由于整个贸易环境的萧条，年收入降到了三四十万人民币。
* 不久后，华商的主力军——浙江人也来到了亚喀巴。他们看中了市中心平民价位的闹市区，租下一幢店屋，楼下卖货，楼上住人。七八家华人商店，就这样分散在阿拉伯人的商铺里，没有华文招牌，没有特色服装，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与其他店铺的差别。但是当地人还是喜欢进去逛逛，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是华人卖的货，价格一定不会太高。“我们的脸就是招牌。”华商们指着自己说笑。
* 2006年，亚喀巴出现了中国城。其实，这个中国城只是一座3层小楼，外面有用阿拉伯文和英文写的“中国城”字样，里面有25家华人商店，都设在一层。因为华商知道阿拉伯人懒得爬楼梯，所以没人愿意租用二三层的商铺。虽然商城只有一层有商家，但每到周末，客流量还是相当庞大，很多客人从安曼特地过来血拼。中国城的老板是一位约旦的地产商，华商多来自中国义乌，几年经营下来，在约旦已经逐渐为人所知。
* 在亚喀巴，华商们除了琢磨生意，担心的事情并不多。安定的治安和纯朴的民风，让华商们感到“约旦人是全世界最好的”。华商小王19岁刚到亚喀巴时，不懂阿拉伯语也敢到街上看市场、找店铺，他说：“这里95%都是好人，即使是坏人也坏不到哪里去。如果遇到事情，10个人中至少有9个人会来帮忙，那你还怕什么？就算有时你自己生气，约旦人还会来劝你不要生气、不要着急。”
* 对于这些商人来说，惟一不能忍受的是天气。每到夏季，亚喀巴的平均温度就要高到50度左右，天干地燥，十分不适合人类居住。在室外暴露3秒钟，皮肤就有焦灼的感觉，走上100米路更是不敢想象。这些华商们每天在太阳升起前就要把空调的冷气开足，等到太阳落山，才会把当天卖出的货补上。
* 虽然大家总抱怨约旦人少、收入低、购买力差，但是和其他国家危险又饱和的贸易环境相比，华商们还是不会轻易离开亚喀巴这块平静、悠闲的好地方。
* 华人移居他国，经常是凭借着这个国家的某些看似不足称道的政策。当年的一个“零配额”，就使约旦的华人人口因华人制衣业的发展而激增。如今，约旦的华人有八成都生活在工业区的制衣厂内。他们中有港台的工厂老板和管理人员、大陆的技术和后勤人员，以及数量庞大的女性工人，大家称之为厂妹。
* 制衣厂刚刚进入约旦的时候，可谓困难重重。约旦最大的华人制衣厂富绿公司的负责人吴厂长说，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才使生意步入正轨。“刚来时很苦，什么都没有，都是自己慢慢建起来的。而且语言不通，出货、招工都有困难。尤其是生活适应很难，别说适应文化，就是华人工人适应水土都要一段日子。那时全厂从上到下，大家常常生病。”
* 在工厂，一般的管理人员每4个月可以回国一次，探望亲眷；而厂妹们为期两年的合同，虽有春节探亲，但是大都舍不得昂贵的机票和高额的加班费用，一干就干满两年。这些女孩子们非常年轻，多数在20岁左右，“想出来看看世界”是她们选择来到约旦的最大原因。然而她们工作在工厂，吃住在宿舍，工作朝八晚五，有时还有2到4个小时的加班，每天下班后已经很疲惫，洗漱后就快要到凌晨了。只有周末的时候，工厂的大巴才会载送她们到附近的市区去买些生活所需。
* 两年下来，别说世界，就连约旦对她们来说，都还是陌生的。即使有少数大着胆子毁约偷跑出来的，也很难找到生存空间。好在她们每月收入最低的也有400美元，如果努力加班可以拿到七八百元，平日里又没什么花销，大部分都可以存起来做积蓄。
* 制衣厂老板都喜欢聘请华人员工。“约旦人虽然纯朴，但是没有技术，而且出勤率低，做事拖拉，每天喝茶、上厕所、聊天、打扮就要占去很长的时间，加上当地法律规定，穆斯林女子不可以加班。反之，华人吃苦耐劳，出来了就是为了多赚钱，都喜欢加班。”
* 作为厂主，近年来的管理压力越来越大。欧美的订单客户会定期来工厂检查工人的工作环境，食堂饮食、居住条件、休闲生活都成为衡量厂方是否压榨员工的标准。富绿制衣厂就在厂区内为员工设立了电影室、图书馆、棋牌室、卡拉OK厅和长途电话房。他们还从大陆聘请了一位大夫，每日与员工一起上班，以防某些工人突发疾病。
* 随着近年来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中国薪水的提高，使制衣厂招工越来越艰难。大多是独生女的女工，也不如以前的工人受得委屈，维权意识也越来越高。工作时间稍长、汇率下降，都会引起工人的罢工，但是毕竞异国他乡，她们还是受制于雇主，不敢随便卷铺盖走人。谈起这里的生活，女工们说：“满意度还算可以，就是有些枯燥，工作压力不小。”
* 在保守的穆斯林国家竟可以找到华人基督教和佛教的踪迹，并发展得颇具规模，是约旦华人社会的一个惊喜。
* 在约旦，大部分长居此地的华人都安于经营自己平淡的家庭生活，很少有人抱有弘扬中华文化的远大目标。因此，除了台湾驻约旦的经济文化办事处组织的旅约华侨联谊会和每周一次的华文补习班外，约旦鲜有民间的华人团体。
* 但是华人基督教会的信徒在约旦却有250余人之多，主要是制衣厂的工作人员，主持者是来自新加坡的徐君华牧师及其夫人。
* 教会的礼拜在伊尔比德市一间阿拉伯人的教堂内进行。每到周五的傍晚，这间教堂都被华人挤得满满的，偌大的教堂，一时之间非常热闹。传到街道上的赞美诗的声音，与清真寺的祷告声，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约旦的基督信徒不超过全国总人口的5%，因此当地的阿拉伯基督徒十分乐意把教堂借给华人使用。他们说，这样可以鼓励当地人参加礼拜。
* 工厂女工参加基督教会，起初都是因为约旦的工厂生活实在太枯燥，出于好奇或者无事可做，过来看看。她们在这里畅吐心事、祈求祝福。平日里徐牧师与他的太太还会到各个厂区的宿舍去探望、讲经，久而久之、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空虚，因宗教的渗入而得到了舒缓、解放，寂寞的心灵也得到了鼓励和安慰。
* 徐牧师和徐太太从新加坡来到约旦已有七八年之久，一直居住在离工业区较近的伊尔比德，为工厂女工们传播福音。开始的时候，他们对这里的饮食、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都不适应，“新加坡人很直接，这里的人却很含蓄；新加坡人很守时，而这里5分钟就是半天。”
* 不过这么多年下来，早已入乡随俗的徐牧师感到自己十分幸运，“在穆斯林国家传播基督教有很大压力和困难，但是这里华人基督教会的土壤非常好，当地的阿拉伯基督徒也十分友善。”
* 而在约旦活动了十余年的慈济，更是深为当地人所接纳。在约旦，为慈济工作的志工有45人之多，他们不分宗教、种族、国籍、天主教徒、回教徒、台湾人、大陆人、约旦人，甚至连约旦的公主都是他们的会员。
* 而约旦慈济的负责人，正是老华侨陈秋华。他与太太和弟弟陈得雄，每月都深入到当地生活最困苦的贝都因人、巴勒斯坦人的家庭，送上生活用品，询问是否有困难需要帮助。
* 他们每到一户，都双手合十，行礼问候，而当地人虽然是穆斯林，也跟着以双手合十来回应。小孩子们还模仿说“阿弥陀佛”，然后亲热地互相亲吻脸颊。供养孩子读书、提供医疗费用、帮助生活所需，都是约旦慈济对当地社会的回馈。
* 陈秋华说：“一个月探望一次，根本不能够解决他们一个月的生活困难。我们做的就是陪伴他们生活，传播爱。很多困难的家庭，我们都是一直陪到老人往生。”
* 知足、感恩、善心、包容是约旦慈济人一直在传达和自勉的精神。陈秋华说，“我们做这些，其实是让自己得到更多，更加欢喜。”
* 在约旦，华人间总是笑说，俞舟是约旦华人“第一人”。这个“第一”并不是指他来得最早，也不是说他是华人首富，而是指他开创了华人与当地妇女通婚的先例。
* 十多年前，俞舟的父亲来约旦出差，看到几元钱的中国商品，在这里都可以卖出上百元的价格，感到阿拉伯国家商机无限。回国后，便把还在读书的儿子送到约旦留学。
* 毕业后，俞舟就操着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和英语开始在约旦做生意。但是由于几度合伙人选择失误，让他亏得血本无归。正当对约旦彻底失望，打算返乡回国时，俞舟认识了现在的太太苏哈。
* 苏哈说：“我可能是约旦唯一一个嫁给华人的女人。很多人都不理解我的选择，包括我家人，直到结婚一年后，他们才接受我的丈夫。”与穆斯林结婚必须要加入伊斯兰教，俞舟因此也成为了穆斯林，把家永远地安顿在约旦。
* 两种文化因为爱情而结合，看到的更多是对方文化中的传统美德。“阿拉伯女孩内心善良单纯，人好、勤劳。我们是在我最失意的时候结婚的，因为生意刚刚失败，所以也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只在家里请了几个朋友，喝喝茶、吃吃中国带来的瓜子，但我太太没有一点怨言。”俞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觉得心存亏欠。
* 而在苏哈眼中，她的丈夫就是真主赐予的礼物，善良、能干、英俊，做饭一流、做生意也是一流。“当时我惟一的烦恼就是，他是不是一个好人。我们在药店相识，直到决定结婚以后，我才知道我的丈夫有很好的房子和自己的生意。”按照苏哈的说法，穆斯林认为，别人的金钱是别人的，与己无关，即使已经拥有的钱财，也可能随时消失，因此是否富有，并不是她选择丈夫的标准。惟一让苏哈有一点小小的不满的就是，华人很难接受阿拉伯人向往的12个孩子的大家庭。
* 如今他们的二儿子已经开始咿呀学语，俞舟的生意也很平稳，苏哈便与丈夫合作，成为约旦第一份华、阿、英3语报纸的老板。虽然家庭内外、大小事情都要两人亲自动手，但是两种文化的融合，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 这个中阿合璧的家庭生活方式很华人化。约旦物价奇高，因此平时的生活用品、中餐调料等，大到家具电器，小到文具用品，都随着俞舟的集装箱从中国运来。平日的三餐，也是中餐居多，就连他的太太做起中餐来，味道也很地道。
* 他们的两个儿子，都有着中、阿两个名字，对中华文化充满了亲切与好奇。字正腔圆的“这是什么？”是他们每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苏哈说：“我希望他们从小就学习华文，因为他们是华人。”
* 跆拳道是约旦在世界竞技比赛中，成绩最好的项目，也是约旦人最喜欢的全民运动之一。现在全约旦约有十万人学习路拳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仪式上，在为数不多的约旦代表团团员中，有一位黑头发黄皮肤的团员，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台湾华人陈得雄——约旦国家队路拳道的教练。
* 跆拳道传入约旦仅有30多年的时间，它能在全国普及，要归功于陈秋华。当年陈秋华因跆拳道来到约旦，从事跆拳道的训练工作，约旦的许多军警都是由他训练出来。
* 从1977年，陈秋华成立约旦第一家道馆——安曼道馆到现在，约旦已经有了近百家跆拳道馆，影响巨大。
* 因陈秋华与陈得雄两兄弟都是慈济的成员，跆拳道也成了他们喜结善缘的桥梁。不少贫困家庭的孩子都在陈秋华的道馆免费学习。不仅如此，他还每月支付他们20第纳尔作为每次来学习的交通费。“车费足够让孩子们从家里往返市中心，但是从市中心到山上的道馆，我要他们自己走路来，不能让孩子们太娇气。”陈秋华不仅传武，也育德。同时道馆也提供一些清洁和看守的工作机会，让生活困难的家庭有一些收入。
* 在陈秋华的道馆中，最年长的学生已年逾花甲，最年幼的才3岁。学生中既有达官显贵，也有贫困的难民，所有的学生若聚在一起，可以称得上是约旦社会的缩影。
* 很多约旦华人都说，自己没有白来约旦。外人眼中保守的穆斯林国家，能做到让外来移民对它心存感激，必有它的迷人之处。
* 尽管在小小的约旦没有华人巨商富贾，也没有华人州长议员，但是一介平凡百姓能够实现自己的小小愿望，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就是一种成功。这些平凡的成就，华人在约旦做到了。

 叙利亚

叙利亚可能是被外界误解最深的国家。它地处伊拉克与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些冲突不断的地区之间，又一直被欧美一些国家冠以“邪恶轴心”的称呼，这让大部分人对它感到既陌生恐惧，又难以接近。

        其实，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有人类居住。它的首都大马士革，传说中曾是犹如天国一般的玫瑰之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首都之一。叙利亚拥有多种文明留下的遗迹，《一千零一夜》的古老传说、罗马帝国时期“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帕米拉（Palmyra）、阿拉伯帝国的伍麦叶清真寺等，数不尽的历史在这里交汇，见证着人类的文明。

        作为阿拉伯半岛历史上最为繁荣的区域，在7世纪以前，叙利亚是基督教的发祥地和传播中心。而后，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东地区的扩张，特别是在因反抗十字军东征而名垂青史的萨拉丁统治时期，大马士革更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中心。

        正因为文化底蕴的深厚和历史的辉煌，大马士革在19世纪下半叶，发展为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阿拉伯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中心。而在之后的反对侵略、殖民和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叙利亚也是阿拉伯国家中的急先锋。

        对西方文明的强硬抵制，使很多人对这个阿拉伯的文明中心望而却步。只有走进叙利亚并生活在其中的人才会真正了解这片土地的浪漫神秘和多姿多彩。而在叙利亚为数不多的华人，对这里也是赞美有加，被天方夜谭的神话彻底征服。

  叙利亚作为海陆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华人在唐代便已经踏足于这片土地。叙利亚的沙漠绿洲帕米拉，以及丝绸之路最西端的阿勒颇城（Aleppo），也都曾被记载于中国历史文献中。

        尽管两国之间很早就已经有了通商往来，但是，对于大部分华人而言，叙利亚一直都只是存在于天方夜谭的神话传说中，犹如阿拉丁神灯般神秘莫测。即使到了1956年，叙利亚和中国建交，两国有了商业往来，也因当地的诸多限制，没有华人愿意到这里定居。

        第一个真正移居叙利亚的华人，直至1963年才出现。她是为了爱情而放弃一切，跟随丈夫来到叙利亚的香港华人谢丽霞。她与叙利亚第一个被派到中国的留学生亚谷在武汉大学相识，他们俩既是邻居，又选修同一科系，双方因而有着共同的语言，从相识、相知到相爱，一切都仿佛是那么顺理成章。

        在那个年代，他们的爱情受到家人、朋友、校方的重重反对及阻难，最终乃是通过当时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批准，始得共结连理，并在亚谷毕业后移居叙利亚。“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谢丽霞在回忆这一段轰轰烈烈的往事时这么说。因为这段婚姻，家人也与她断绝了关系。一直到了1967年的中东“六日战争”，远在香港的父母因惦念女儿的安危，才与谢丽霞恢复了联系。

     从1963年到1980年间，定居于叙利亚的华人一直就只有谢丽霞一人。直到1981年，才开始有来自台湾的华人女性，跟随在台经商的叙利亚丈夫返回叙利亚生活。她们陆陆续续来了大约有好几十个，有些因为后来孩子在台湾求学而往返两地；有些则移民至其他国家，如今长期扎根叙利亚的只有十几个而已。

        随着中国大陆的对外开放，叙利亚商人也开始到中国大陆去经商，因此，在90年代之后，有更多来自大陆各地的妇女嫁到叙利亚。同时，一些华人也通过留学或餐饮业的劳务输出等方式来到叙利亚。

        到了1995年，这里已经有三四间中资公司，华人总数达到100多人。2004年，个体贸易华商也开始进入叙利亚的市场大展拳脚。

    如今生活在叙利亚的华人约有2000多人，其中中资企业的员工就逾千人，其余的则是通婚女性、回族华人留学生和少数的商人及餐饮业业主。他们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各地及台湾，在叙利亚主要聚集于大马土革，在阿勒颇（Halab）和塔尔图斯（Tartus）等城市也散居着少量华人。

        通婚的老华侨都是女性，新来的华商还不成气候。因此叙利亚华人在人口相对密集的当地，显得少之又少。正因为稀少，大家来往频密，仿佛家人一般。他们曾经完全不相识、隔着海峡、来自五湖四海，甚至不同国度的华人，因为这个陌生的国家，而相知相伴。他们间没有经济利益的冲突，有的只是共同的华人血液。

        出生在毛里求斯的克莉斯汀（Christine），在叙利亚已经生活了13年。她从没去过中国，不会讲华语，也不清楚自己的华文姓氏，但是纯正的华人血统，让她肯定自己是华人，并热情地参加每次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举行的中秋、春节联欢会。而中国使馆也仿佛变成了华人的“娘家”，有些老华侨子女的婚礼，使馆人员还作为亲友代表出席，并陪同主家迎娶新娘。

        在宗教开放、自由的叙利亚，华人虽身处穆斯林国家，却感到自在随意。女性不但在生活上可以行动自如，在事业上，只要愿意，也有足够的发展空间。

   “这是一个任何人都能生活得很好的地方，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这里没有枪林弹雨，有的只是平静、友好。”远嫁到叙利亚的华人太太们几乎没有人说这里不好的。

        作为叙利亚华人的主要群体，这些异族通婚女性，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但都像谢丽霞一样，有着同样为爱走天涯的爱情故事。“我们都是随缘来到这里，因为遇到了一个叙利亚男人，结了婚，有了孩子，孩子当然要了解自己父亲的国家，我们就跟着来了。”在叙利亚生活了十多年的邬凤娥如是说。

        到了叙利亚，发现这里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糟糕。古老传说中的繁华景象，如今依然历历在目。古宅深巷里放学的孩子背着书包嬉笑追赶；密集的商铺中贩卖着大马土革著名的玫瑰香料；茶馆内外总是坐着悠闲的阿拉伯老人，一边吸着水烟，一边下着阿拉伯棋；清真寺定时传出绵延不断的祈祷……一切安详平静得仿佛千万年未曾改变，让来到这儿的华人太太们竞有一种误打误撞地发现了世外桃源的暗喜。

        “每天早上起床后，我会和先生一起喝咖啡，然后游泳、健身；下午有时去朋友家串门聊天，有时自己开车出去逛逛，但最多时间还是和家人在一起。”这就是来自台湾的张淑萍的日常生活，很是舒缓惬意。除了叙利亚，她在埃及、约旦和美国也生活过不短的时间，但最后还是觉得叙利亚最好。“这里更有生活的感觉。”素养良好的人民，节奏缓慢的生活，对华人友善的态度，赢得了不止张淑萍一名华人的心。不少华人都是先到叙利亚，再到别国生活后，最终又选择回到这里。

        因为这些华人妇女的丈夫不是商人，就是曾留学中国的专业人士，所以她们在叙利亚的生活还算富裕，而叙利亚人热情、有礼、正派、宽容，社会风气纯良，宗教观念开放，让她们感到心舒气爽。唯一需要适应的就是语言，虽然她们和丈夫可以用英语或华语交流，但是在与婆家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交往中，阿拉伯语还是很重要。

        在叙利亚有90%的人口为穆斯林，因此华人与伊斯兰教徒组建家庭后，学习阿拉伯语、加入伊斯兰教便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华人基督徒，除了周日的基督教礼拜外，每天的社交、工作也还是要融入周围的穆斯林文化。

        虽然在叙利亚这样的阿拉伯国家，宗教是一切的基础，但是这些因婚姻而加入伊斯兰教的华人，并没有感到任何的束缚。他们对穆斯林文化从陌生到了解，反而发现了它与传统中华文化的共通之处。

        这些中阿合壁的家庭，房间不论大小，大厅里一定摆放着一大圈沙发。当地人说，这是回拉伯人大家庭观念的表现，在叙利业，人人重视家庭，讲究考敬老人，孩子要和父母一起分担家务，这些和传统中华文化中提倡的伦理观念不谋而合。“现在越来越国际化的大城市里逐渐丧失的美德，在这里还郑重地保留着。所以定居在叙利亚，对家庭的经营和孩子的成长都有利无弊。”古老的传统，让这些华人妇女们得到很多精神上的满足。已经习惯了以物质衡量一切的现代女性，在可兰经和阿拉伯的生活习俗中，又找回了心中最美好的本质。

        加入了伊斯兰教后，更为她们的生活提供了说不尽的方便。尤其是对一些还在兼顾生意的华人太太们，谈判时，只要说上一句“真主保佑”，对方马上会问你是不是穆斯林，如果得到肯定的答复，立即就亲热起来，如兄弟姐妹般的对待。曾经有一名异族通婚的女华商，在与欧洲的竞争对手旗鼓相当时，就因为这句话，最终拿到了竞标项目。

        叙利亚学习语言和宗教的百余名留学生，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的回族。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他们倍感亲切。有的人本来对宗教仪式已经淡漠了，来到这里，因为环境的熏陶，每当清真寺的祷告声通过喇叭传来，他们便和当地人一起走进附近的祷告场所，虔诚地礼拜，每天5次，毫不含糊。有些女孩子，在中国没有戴头巾的习惯，来到叙利亚后，也入乡随俗，漂漂亮亮地用各种颜色的头巾把头发包裹起来。“有种找到家的感觉。”她们发自内心地说。

      华商在叙利亚历史短浅，只不过五六年，总人数仅有几十人。这些华商既然敢把宝押在这个冷门国家，就有着超乎常人的沉着与本事。

        其实每年到叙利亚考察的华商，一直以来从未间断。但是叙利亚消费能力不高，在外界媒体报道中，又政局混乱，因此绝大多数人都不看好这个被美国“制裁”的国家，看上一眼，就匆忙走人。不过，还是有人看好这个市场，成为第一个勇于“吃螃蟹”的人。

        这个人就是来自中国浙江的女华商周东云。来叙利亚之前，她在中国、迪拜、阿根廷、意大利、利比亚等众多国家都有经商经验。2004年，周东云本是来谈一单生意的，却被这个鲜有华人问津的市场吸引了。

        阿德拉自由贸易区对21个阿拉伯国家实行零关税的政策，又地处叙利亚通往伊拉克唯一一条高等级公路旁。贸易区距伊拉克边境城市仅200公里，公路上每天奔驰着成百上千辆伊拉克的卡车、巴士、集装箱车，从叙利亚发往伊拉克的所有货物均在自由区办理出关手续，而正值战后重建中的伊拉克又潜藏着巨大商机。这里旺季时每天约有150个货柜转口至周边国家，就算是淡季也有50来个货柜的交易量。而这些货物，大部分都是中国商品。“为什么华人不自己来做？”周东云立即决定在自由区内买地盖房，建一座叙利亚中国城。

        因此，先有中国商城，再有移入的华商这种特殊情况便在叙利亚出现了。

        2006年，中国城顺利建成，占地一万平方公尺，可容纳150家商户。可是叙利亚的左右邻居伊拉克和黎巴嫩都陷入了混战。虽然叙利亚绝对安全，但是来考察的华商们，无论怎样都对局势不放心，再看到周东云只是一个温婉的女子，都打起了退堂鼓。很多人暗自替她惋惜，怪她为何这样“傻”，把钱砸在如此危险的地方，倘若一个炸弹落下，一切都将成了泡影。“这里真的很安全，只不过是叙利亚的国际形象被曲解了，中国城也就受到影响，我便跟着倒霉。”无人信任，让周东云感到很无奈。

    但是最后还是有些华商愿意冒险一试。一些来自中国江浙沪地区的商人，因中国城而来到了叙利亚，成为当地的第一批个体批发贸易商贩，多出售纺织品和床上用品。“真正来了，才知道这里也没什么可怕的，比哪儿都安全。”亲眼所见、亲身所感后，华商终于相信了叙利亚的稳定。

        不过毕竞市场刚刚起步，华商数量少，影响也小。他们坐在店里守株待兔等不到生意，只好自己去开拓市场。分别来自江苏和浙江的胡先生和胡太太，回想初到时，不是没有后悔的。“一开始很辛苦，没有客户。在这么陌生的市场，语言又有障碍，建立客户资源太困难了。那时我们只能一家一家店铺地上门推销。

        出乎意料的是，叙利亚人对华人充满了好感和好奇，每一家都客气地请我们进去喝茶、聊天。很多时候，坐了半天，虽然生意没有做成，但还是相谈甚欢。”两三年下来，他们积累下固定的客户，短期内也不打算回国了。

        原来在上海做生意的胡太太，来到叙利亚后，压力一下子不见了。“刚来时最痛苦，因为太闲了。”货物迟到，叙利亚客户也不催促；货到了，和客户约好见面，他们又迟到得离谱。早上醒来，想出去逛逛，店铺都未营业；到银行、车行交款办事，也要折腾上好几回。“没有压力，反而更着急，自己每天的计划无法完成，急得夜夜失眠。”

        渐渐地华商们发现，只有自己急是没有用的。再怎样焦虑，当地人不配合你的办事节奏也无济于事，还不如索性迁就他们的习惯，按照阿拉伯人的作息时间行事。早晨11点起身，下午两三点吃午餐，晚餐推迟到八九点，凌晨两三点入睡，所有的会面都安排到下午四五点或晚上十点以后。

        无聊的时候，有的人就重返校园，花上几百美元，报一个阿拉伯语课程，学学外语。另一项有趣的休闲就是洗澡。在叙利亚窄窄的街道旁，还保存着不少正常营业的地道土耳其浴室。整个人被包裹得密密实实地送进浴室蒸烤、洗刷，让本来压力就不大的华商们，更是放松到了极点。

        虽然叙利亚国民的人均收入不高，但是当地人没有存钱的习惯，只要有钱就花掉，因此华商在这里还是有生意可做。华商的生活条件虽不比家乡，但相对于当地居民，要好得多。租住一套不错的公寓只要三四百美元，车子虽然较贵，不过华商也都负担得起，就是缺少蔬菜，在市场上所能买到的，不外乎土豆、番茄、腌橄榄加大饼的老搭配。

目前在叙利亚只有5家中餐馆，其中两家是叙利亚酒店里的中餐部门，另一家则规模很小，业主是叙利亚人，所以真正的中餐馆就只有龙餐厅和家餐厅这两家。

        虽然当地华人不能独自经营餐厅，但是这两家餐厅里的华人与他们的叙利亚合伙人都是多年交情的老朋友，餐厅也以华人厨师的手艺、纯粹的中华文化气氛而闻名。

        龙餐厅走高档路线，它的叙利亚老板以前就在五星级酒店管理中餐部门，他与大厨程兆如从1995年饭店开业就一直合作至今。饭店在营业之初，并不被当地人接受，叙利亚客人仅占三成，其余都是各大使馆或者国际公司的外国职员。随着叙利亚与中国生意往来密切，叙利亚人对中餐的认识也越来越多，龙餐厅的生意渐渐红火起来。程兆如说，现在的客人比例正好相反，本地人占了七成，甚至连叙利亚总统都是这里的熟客。

        家餐厅走的是中档路线，叙利亚合伙人几乎不参与餐馆的管理，因此它可以说是当地唯一一家华人经营的餐厅。家餐厅为来自中国南京的丰雷和他的好朋友共同拥有，目前只有丰雷一个人在叙利亚打理生意。它坐落在大马士革古城的基督教区，开业已有四五年了。一个人撑起整间餐馆是十分辛苦的事，丰雷自己既做老板，又做厨师，只请了两名服务生和一名帮厨帮忙洗碗、备料，每逢吃饭时间，丰雷在闷热的厨房里，总是炒菜炒到大汗淋漓。

        竟受叙利亚的生活条件所限，做生意的华商们不会选择把家人带在身边，大部分都是一个人在外打拼。他们工作虽然辛苦，但是与无法填补的亲情相比，算不上什么。好在这里的华商少、没竞争，大家无事便聚在一起，让异乡的生活不再那么无聊。

        华人每到一个地方，一定要找中餐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来到叙利亚也是如此。因为华人少，所以这几家中餐厅的华人厨师，和当地华人都成了朋友。尤其是相对独立的龙餐厅和家餐厅，华人客人一进门，不用服务生领位，就直奔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可吃的”。而家餐厅更成了华商们的“家”，一周里有5天，他们都在这里聚餐，有时想吃什么，他们干脆自己买好材料，或者发货时随集装箱从中国运来，送到厨房，让丰雷为大家解馋。“我们天天在一起吃饭、打牌，感情像亲人一样。”而在叙利亚，即使同是做餐饮业的同行，也不存在竞争，大家总是在一起互通有无。

        丰雷说，餐馆起名字叫“家”，就是想给人“家”的感觉，这里的装修既强调东方特色，但也力求亲切感，比如外国人并不陌生的京剧剧照和通俗简单的华人流行歌曲，都特别受当地人的欢迎。不过丰雷没想到，最令他喜爱的，还是在叙利亚偶遇的这些华人朋友。而龙餐厅在当地的名字发音是“Canoun”，意思为大家围坐烤火，这种温暖、团聚的意境其实与家餐厅殊途同归。

        谢丽霞不但是移民叙利亚的第一个华人，还是叙利亚哈萨省的第一个女工程师和第一个华人公务员。

谢丽霞来到叙利亚后，语言不通，气候和饮食皆不习惯，人一点点瘦下来。但是生性好强的她，不愿意像大多数阿拉伯妇女一样，在家相夫教子，而是迫切地想出外工作。她的丈夫来自当地的一个基督教家庭，不但支持她工作，还主张谢丽霞一定要做自己的本行，让所学的专业得以发挥。不过，对于一个外籍女子来说，在阿拉伯国家从事土木工程谈何容易。首先是要过语言关，然后再经过多道繁琐的手续公证学历文凭，最后还要通过考核，才能加入当地的工程师协会。而这些只是找工作的第一步。为了能顺利地申请到政府建筑工程部的土木工程师职位，她加入了叙利亚国籍。

        用了6年的时间，谢丽霞终于在1969年成为了叙利亚哈萨省建筑工程厅工程师。“找工作虽然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一做就是30年。””在这几十年间，谢丽霞工作得十分卖力，“尽管我入籍了，可我的脸还是华人，就算生活100年，当地人也觉得我是中国人。所以我不希望给中国人带来不好的影响，一定要表现得很出色才行。”就连很多男性都不愿意接受的工作任务，谢丽霞也会毫无怨言地去执行。一次她要爬上30公尺高的水塔检查工程，大家都说太危险了，直接盖好章就算了，但是她最后还是一个人蹬着梯子上去了。“我心里也很矛盾，但是这是我负责的工程，一定要看过才可以盖章通过。建筑工人能上去，我也能，只要当天没有风就可以。因为我太瘦了，担心会被风刮下来。”

        幸运的是，正因为谢丽霞在叙利亚人眼中，永远都是“外国人”，她的女强人作风在穆斯林为主的社会并没有受到排斥。

        在叙利亚生活了近50年，谢丽霞对这里饱含深情，不仅是因为叙利亚人的修养与热情，以及对华人的友好，让她感到没有来错地方，更因为自己在叙利亚设计、监管的无数工程散布各处，让她对这里的每条路、每座桥都充满了感情。

        现在已经退休的谢丽霞，从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她的大半生既轰轰烈烈地爱过，也兢兢业业地努力过。如今她和先生亚谷居住在大马士革知识分子区域的公寓里，平静地享受着阿拉伯式的晚年生活，爱情、亲情、家庭、事业，都美满得无可挑剔。当儿科医生的长女、当内科医生的长子和担任物理教授并掌握9种语言的次子是她最大的欣慰。因为家庭语言是华语，她的孩子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华语，称自己是“半个华人”，而孙子们则调皮地说：“我是四分之一华人。”

  叙利亚曾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昔时曾有各国商旅带着五花八门的物品汇集于此进行交易，促成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几千年后，发达的国际贸易取代了这种极具冒险和传奇色彩的贸易形式，往日的繁荣和神秘只能在一座座古城废墟中寻找踪迹。

        在今天的叙利亚，这种边走边卖的流动市场依然存在，而且里面竟然还有华人的身影。

        俄罗斯有一批穆斯林每年去沙特阿拉伯朝觐。出发前他们装满集装箱车，在朝觐的路上，遇到城镇便停下卖货，货卖光了，便就地取材，在当地上货，继续前行。每到一月的时候，朝觐车队都会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停留一个月，组成暂时市场兜售商品。当地人叫它“扎哈拉”市场。

        此时在叙利亚留学的华人学生正值假期，灵敏的商业嗅觉，让他们很快就加入了这个队伍当中。租上一辆敞篷货车，从当地华人批发商手中进些服装、鞋帽和床上用品，来到市场，找好地方，铺上一块垫布，就开始和俄罗斯人一起摆地摊。

     因为是来学习语言和宗教的缘故，这些留学生中既有20岁不到的青年，也有40多岁的中年。有的女人头戴头巾、男人头顶毡帽，用阿拉伯语吆喝着，难辨他们究竟是哪国人。“来到这里就要融入当地，和他们穿的一样、吃的一样、说的一样，才能做成当地人的生意嘛。”曾经自己读书，现在陪女儿学习的一名云南华人这样分享她在叙利亚的生存心得。

        一个月后，朝觐的车队便离开，赶往下一站，学生们的假期也结束了。下一次摆摊，就要等到穆斯林的斋月了。虽然一年只有两个月的赚钱时机，但是如果赶上好时机，每次都可以有六七千美元的收入。这些钱，足够支持他们在叙利亚一年内的所有开销。

        来到叙利亚定居的华人都有着异于常人的勇气，无论是对家庭、爱情的付出，还是事业上的魄力，华人发挥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对这个国家的充分信任。因为这份难得的信任与勇气，叙利亚用自己最美好的一面来回报他们。纵然外界把这个国家形容得万分可恶，但是它给予当地华人的却是平静的生活、可贵的美德、丰富的文化。决定留在叙利亚的华商们坚信，这里的市场总有一天会为他们带来惊喜

黎巴嫩

在人们的印象中，黎巴嫩是一个战乱不断的地方，多年内战，黎以（以色列）冲突、黎叙（叙利亚）恩怨，形形色色的教派与政党、盘根错节的国际关系，使这个弹丸小国成为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的战场。

        硝烟弥漫的战场，掩盖了黎巴嫩曾经的辉煌与灿烂。黎巴嫩人的祖先——腓尼基人，曾以发达的航海业和丰富的雪松资源，使黎巴嫩成为地中海的贸易大国。他们发明的腓尼基字母，是如今希腊语、拉丁语和斯拉夫语字母的起源。黎巴嫩曾被许多民族占领过，最终于1943年脱离殖民统治，宣布独立。之后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中东的贸易、金融、旅游和文化中心，首都贝鲁特更被誉为“东方小巴黎”，繁华风光堪比日后的中东贸易中心迪拜。

        1975年以后，连年内战、以色列轰炸、叙利亚驻军、游行及爆炸事件，导致黎巴嫩元气大伤。连绵的雪山、茂密的森林及碧海的蓝天依旧，但散落四处的残垣断壁，无不使黎巴嫩人对往日的繁华扼腕痛惜。很多人选择了离开，以致现在生活在海外的黎巴嫩人超过本土人口的两倍。但是，黎巴嫩却也汇集了来自各国的人民，包括短期居住的年轻记者、上了年纪的欧美商业顾问、菲律宾女佣、周边经济稍差国家的打工者。这当中也有少部分华人，他们长久生活于此，已经以黎巴嫩为家。

        中国和黎巴嫩自古以来的交往历史可回溯到千年以前，中国的陶瓷及丝绸曾经通过黎巴嫩口岸运往欧洲各国，黎巴嫩的空心玻璃器皿制造工艺和紫色颜料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不过，华人真正定居于黎巴嫩，则是从1980年代初才发生的事。

        最早来到黎巴嫩的一批华人，是从台湾及香港过来的女性。她们嫁给在海外经商或留学的黎巴嫩人，并随着丈夫返回黎巴嫩。

        根据当地华人的说法，来自台湾的罗宝珍是第一个定居于黎巴嫩的华人。1980年代初期，她随着从商的丈夫从台湾来到黎巴嫩展开新生活。那时，内战还没结束，炮声时而从不远处传来，导致他们每日出门都提心吊胆，只能尽量留在家中。罗宝珍和丈夫在黎巴嫩生活了一段时日之后，基于安全理由，唯有无奈地返回台湾，直至内战结束，才又迫不及待地回到黎巴嫩。罗宝珍的丈夫开了一间大型超市，会说流利阿拉伯语的她，每天都到超市帮丈夫打理生意，而且还特别在超市开辟了一个角落，专门出售中餐的食材。目前他们全家已经离开了黎巴嫩。还有好些像罗宝珍一样早期嫁来此地的华人太太，待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也都移居他国去了。

        如今依然生活在黎巴嫩的华人当中，经敏敏算是来得最早的一个。她是上海人，自幼在香港长大，中学毕业以后就被家人送到美国去深造。她与丈夫在大学校园内相识，由于丈夫在毕业之后一定要回到黎巴嫩接管家族的果园，于是，出嫁从夫，习惯了都市生活的经敏敏就跟着丈夫去到黎巴嫩北部的乡下果园。

        经敏敏于1982年12月抵达黎巴嫩，虽然那时内战尚未熄火，但是生活在千亩果园旁的百年大屋中，她并没受到太大的影响，只是频繁的停电及湿冷的气候常常让她感到不适。经敏敏表示，她几乎是用了5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全习惯这里的生活。

  如今，经敏敏全家居住在的黎波里（Tripoli）市区，并已经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看着一对儿女都长大成人了，她感叹道：“开始时，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完全错误的，但是现在看孩子们，才感到当初的决定是对的。这里的青年比较保守，不像美国或香港那样随意和自我。对于培养下一代而言，黎巴嫩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可惜局势不太稳定。另外，孩子们在长大以后都喜欢到国外去工作，很难继续留在父母身边。如今当了人家的母亲，我才能理解自己当年来黎巴嫩时，我的母亲为什么会那么生气了。”

        除了这些嫁到黎巴嫩的华人太太之外，来自北京的姜俊升则可说是第一个到此工作创业的华人。在1980年代初期，他被公派到黎巴嫩负责建筑工程，结果一干就是8年。在这8年期间，黎巴嫩的内战未曾停息过，可是姜俊升却喜欢上这里秀美的景致，以及那热情的人民。回国之后，待战争平息，他便让儿子姜浩到黎巴嫩来经营中餐厅。随后，他再次踏足黎巴嫩，并且还开设了一间公司，承包交通系统的各类工程项目。姜氏家族无疑是黎巴嫩来得最早的华人家庭，之后，有很多从事餐饮业的华人，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来到黎巴嫩的。

        到了1990年代，在内战结束了之后，从事贸易、异国通婚、经营餐厅、中资公司的华人都陆续进入黎巴嫩，只是人数稀少。而那些从事贸易的华人，曾经尝试开拓服装、空调以及发电机的市场，但是却面对黎巴嫩极为严格的商品入境检验，以及一些无良黎巴嫩商人的刁难。

        从2000年至2005年间，黎巴嫩的局势十分稳定，这时的华人人数就达到了两三百人。2003年，也曾有一两百名华人从迪拜来到黎巴嫩，他们摆地摊、卖领带、并且开设按摩院，但是由于后来涉及一些不法行为，没多久以后就被驱逐出境。

作为一个异乡人，能对这样一个随时都可能被狂轰乱炸的国家不离不弃，若不是已经以此为家，便是因为对这里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现在居住在黎巴嫩的约200名华人，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各地的华人太太，个体创业者和打工者，以及中资公司员工和中国政府公派教师。黎巴嫩的华人分散而居，只有贝鲁特较集中。

        黎巴嫩华人胆敢选择在此地长久生活，肯定拥有超出常人的勇气。事实上，除了适应动荡社会的生存能力外，他们还具备乱世中永不消极、发掘美好的豁达心胸，以及历经危难依然重情讲义的真挚性情。

        人数过于稀少，局势动荡不安，使这里的华人社团无法正常发展。华人的社团组织和宗教团体还是一片空白。有一些台湾太太曾经组织开办华文班，但由于华人孩子太少，坚持了一两个月后就仓促解散了。

    黎巴嫩局势动荡不安，但社会却相对开放、包容，阿拉伯语、法语、英语在这里皆通用，为华人融入当地、寻找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正如一名华人太太所说：“自己就像一颗种子，在哪里都能发芽。”生活在黎巴嫩的华人太太，从家庭主妇、华文教师、音乐教师、瑜伽教练，到建筑师、商人、美容师、中医师，各行各业都有所涉猎，仿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将自己的十八般武艺发挥得淋漓尽致。

        来自北京的赵颖，现在是黎巴嫩孔子学院的协调人，被大家称为黎巴嫩传播中华文化的第一人。2001年，她随在中国留学的丈夫返回黎巴嫩北部的家乡生活。刚到的第二个月，赵颖便在当地的健身中心找到瑜伽教练的工作。性格开朗的她，工作不但比丈夫先一步稳定下来，还为丈夫的中医诊所招徕不少客人。

 华人积极进取，赵颖也不满足于住大房、有工作的生活状况，反而鼓励丈夫去贝鲁特发展事业。“首都人口密集，人们容易接受新事物，中医诊所才会有更多的顾客。”当时正怀有身孕的赵颖，帮忙丈夫到贝鲁特为诊所选址、装修。孩子出生后，她到贝鲁特一家健身中心当起瑜珈兼游泳教练，之后还教起了华文。渐渐地，丈夫的诊所在当地有了名气，从开始的一个月一个病人到现在的一天几十个病人，身后的太太功不可没。

        2006年，在一次中国使馆的活动中，她得知孔子学院打算在黎巴嫩创办，便开始积极参与筹划。如今，孔子学院已经运作了几年，招收的学生逾百人，成绩超乎预期的好。不仅如此，赵颖还成为黎巴嫩与中国交流的桥梁，她不但写文章介绍黎巴嫩的文化和美景，还帮助两国商人寻找各种商机，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时局不稳定，使黎巴缴人习惯了做多重准备，如持双重国籍、做多份工作等，华人自然也受到影响，虽然稍有动荡，就可能失去工作，但是这些华人太太们相信，只要自己有一技之长，就不怕找不到工作。

        学习中国民乐的何笑静从上海嫁到黎巴嫩，几经波折，找到了一份英语学校音乐老师的工作。她说：“像当地人般工作，压力很大，不但面对语言的挑战，还因为我的亚洲面孔，必须承受更多能力上的质疑。”进入学校后，她的考察期比当地任何一个老师都长。何笑静通常每天早上6点多就要出门，从比布鲁斯（Byblos）开车赶到贝鲁特上班，晚上有时还要兼职教华文，或去高级酒店演奏，回到家常常已是晚上七八点。

        其实，华人太太们大可不必如此操劳。很多嫁给有钱人的全职太太，家用十分宽裕，即使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家庭，基本生活也不成问题。太太们需要的，不过是事业上的成就感。

        曾在上海同济大学和比利时学习建筑的何彬嫁到黎巴嫩前，曾在上海最好的建筑师事务所工作。来到黎巴嫩的两个月后，她便到自己丈夫的设计公司上班。不久后，她就在当地数一数二的建筑师事务所任顾问，并在一所大学授课。

        即便如此，何彬仍感到事业发展的限制，她说：“黎巴嫩土地都是私人所有，无法规划，所以想承包公共建筑的规划项目是不可能的。况且作为华人，在这里并不容易受到承认。”

        不过，有的人还是从工作中得到了满足感。来自中国东北的王薇，1990年代初随中国医疗队公派到黎巴嫩做英语翻译，与黎巴嫩籍丈夫结婚后，便定居当地。她发现黎巴嫩盛行美容、整形，有人甚至向银行贷款整形。直觉告诉她，这个行业绝对潜力无穷，于是她马上开始学习纹眉。十多年下来，她的技术在当地已经声名远播，很多歌星和政界夫人都成了她的客户。只要一打开电视，就会看到王薇的作品。“这个眉是我纹的，那个唇线是我做的”，满满的成就感溢于言表。

   长年的战乱，使黎巴嫩的经济大幅度下滑，但由于黎巴嫩是个小国，恢复起来也较为容易。另外，黎巴嫩国穷民富，大量的海外侨汇和一代代的祖传财富，还是让当地人维持着相当的消费能力。

        黎巴嫩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汇集世界各地风味的餐馆。喜欢享受生活的黎巴嫩人，几乎人人都是美食家。他们平日很少在家用餐，而是喜欢到外面的餐厅品尝美食。

        在当地成百上千的餐厅中，有二三十家是中餐馆。这些餐馆大部分由当地人经营，雇用来自中国、菲律宾、苏丹和埃及等地的厨师。真正由华人经营、华人掌勺的只有“小中国餐厅”、“熊猫餐厅”、“好好中餐”3家。这3家高、中、低档餐馆定位不同，互不竞争。

        小中国餐厅坐落在繁华的贝鲁特市中心，旁边就是当地最有名的酒吧街，店内氛围古香古色，墙壁上挂着清朝皇帝图，烘托出餐厅的尊贵之气。小中国老板徐祝明还记得十多年前刚到贝鲁特的情景，“那时，这里的马路坑坑洼洼，楼房都是弹孔。我根本没想长呆，打算一年的合同到期后，马上背包回家。”谁知他一做，便做了十多年，不但从伙计变成老板，还把太太和孩子都接到了黎巴嫩。“黎巴嫩越住越美，环境干净，百姓单纯。因为我们开中餐厅，所以周围很多邻居都认识我们这家人，走在街上，常常就被陌生人邀请到家里喝茶、做客。”

        即使在2006年以色列轰炸得最为猛烈的时候，徐祝明也没有离开黎巴嫩。他独自一人留下，以确保餐厅正常营业。那时，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出门吃饭，他的工作就是为华人记者做晚饭，有时给使馆送些食物。每天打烊后，在没有一盏街灯的道路上，除了自己的汽车外，徐祝明再也看不到别的车子。“未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我不会离开黎巴嫩，不会扔下小中国，毕竟我十多年的心血都在这儿了。”

        其实，这次战争爆发前，黎巴嫩的连环爆炸案就层出不穷，连当时的总理哈利里和几名政要都相继被炸身亡，战争之后，黎巴嫩又开始闹静坐、搞游行。接连几年下来，小中国的生意备受影响。不过，徐祝明总是对自己说：“明年就会好的。”

        让徐祝明一家更加坚定留在黎巴嫩的原因，是孩子的教育。黎巴嫩语言环境得天独厚，在这里读完高中的学生，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一般都不成问题，而且还可以直接进入欧美的大学。“因为华人少，孩子在学校里就像中国熊猫一样宝贵，老师、同学都喜欢。孩子开心，我们也就安心留下，尽全力为他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每当看到孩子能用4种语言和不同的人交流，就是徐祝明和太太最大的安慰。

        熊猫餐厅的苏晓岚，也是从当年的餐厅打工族做到老板。她的餐厅开在贝鲁特北部的亚美尼亚基督教区，受到战火的威胁较小。苏晓岚并不觉得在外打拼有什么辛酸，对近在身边的战争也不感到有多可怕，“仿佛就是听别人讲了一个故事”。对于苏晓岚来讲，黎巴嫩就是气候好、人漂亮，虽然餐厅的营业只能度日，不能发财，但是生活了十多年、她已经适应了这里的悠闲。

        在比布鲁斯帮助黎巴嫩人经营中餐厅的冯予捷，就算2006年身陷枪林弹雨中也没有离开。黎巴嫩面积很小，以色列的飞机在上空盘旋，很快就飞完一圈，飞机的嗡鸣声不绝于耳。餐厅新来的中餐厨师一听到这种声音就害怕，表示“像苍蝇一样，简直没办法工作”，没几天就辞工走掉了。看着自己精心布置的餐厅摆设、亲手绘画的壁画，冯予捷实在舍不得走，而且餐厅老板当时已经去了美国，她再离开的话，餐厅就必须关门。况且，战时很多人都躲到餐厅所在的基督区，因此生意特别好，冯予捷只好自己亲自上阵，又当厨师，又做服务员。现在，她已经在这个小城生活了近十年，走在街上，到处都能见到相识的老朋友，很多当年在餐厅里玩耍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要是真的回去了，还真有些不舍。”冯予捷已经渐渐变成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在黎巴嫩，如果问当地人明天有什么计划，一定会被视为笑话。在一个不安定的国度里，“谁知道明天会怎样”成了黎巴嫩人的口头禅，他们能够确定的只有今天。

        “经历过战争的人，对生活的理解就会不同。”这是华人走过黎巴嫩战火的心得。战争让黎巴嫩人的心灵变得更加单纯，他们只为拥有生存的机会欢呼，不会为不可测的死亡杞人忧天。在生死的考验中，黎巴嫩人泰然对待战争，豁达看待生命，比谁都能轻松享受生活。就如他们自己所说：“不管发生了什么，太阳还是要晒的，咖啡还是要喝的。”

        当地普通人每月收入介于500到700美元之间，但电费、汽油费和通讯费偏高，连外出吃一餐饭也要花上二三十美元，很多人都入不敷出。即便如此，黎巴嫩人还是该喝酒时喝酒，该唱歌时唱歌，一个周末就会花掉一周的薪水。每个黎巴嫩人的家里，不管房子好坏，室内的装修几乎都很富丽堂皇，而且每家一般都有儿辆汽车，差别只在于富人的座驾是名车、新车，而穷人开的是普通车、二手车。这种“没有明天”的生活方式，说是浮夸也好，说是浪费也罢，但不管怎样，都是快乐的。

        黎巴嫩人这种乐观坚强的精神，深深吸引和感染着在这里生活的每一个华人。大家都不能预知明天，但都相信明天会好起来，战争总有打完的一天，每个人能做的，就是活在当下，享受今天。

        因此，这里的华人也更懂得享受生活。尽管黎巴嫩处处都有战争的痕迹，城市中遍布着被炸毁的房屋，街道拐角处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守着坦克，但是黎巴嫩华人几乎都把当地的景点玩遍了。从比布鲁斯腓尼基古堡到巴尔贝克（Baalbek）的罗马神庙，从白雪皑皑的雪山到海风习习的沙滩，从北卡（Bekaa）山谷的酒庄到雪松环绕的纪伯伦故居，黎巴嫩秀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古迹，让每个生活在这里的华人心醉不已。

        “上山滑雪、下海游泳可以在同一天实现。”人们总是这样形容黎巴嫩。山海相接的地理位置，让黎巴嫩拥有完全不同于中东国家的秀丽景色。住在北部的冯女士经常沿着海边的高速公路往返贝鲁特，“车子一边是碧海蓝天，一边是雪山丛林，我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黎巴嫩更美丽了。如果没有战争，这里就是天堂。”

        一些全职的家庭主妇会不时相约喝下午茶，聊聊煮饭买菜的话题。饮上一杯花茶，吹吹海风，她们在黎巴嫩就是这样消磨时间的。

除了照料家庭，一华人太太也会帮助丈夫处理生意上的信件和订单，或者潜心于宗教，常到清真寺上课修行、定期斋戒。来自台湾的华人太太施女士，因对伊斯兰教怀有浓厚兴趣而深入钻研，还设立了古兰经教学网站。她说：“在黎巴嫩就是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

* *停电，是黎巴嫩华人的共同话题之一。由于当地政府电力供应不足，因此黎巴嫩所有的用电设施都需要私人发电机与政府供电相互配合使用。一般上，一个区域内的普通居民用电，都由一户富人家庭的发电机提供，而不少华人家庭也拥有自己的发电机。不过发电机每隔几小时便需要更换一次内芯，所以在黎巴嫩突然停电两分钟，是生活中稀松平常的事情。*

除了照料家庭，一华人太太也会帮助丈夫处理生意上的信件和订单，或者潜心于宗教，常到清真寺上课修行、定期斋戒。来自台湾的华人太太施女士，因对伊斯兰教怀有浓厚兴趣而深入钻研，还设立了古兰经教学网站。她说：“在黎巴嫩就是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

* *停电，是黎巴嫩华人的共同话题之一。由于当地政府电力供应不足，因此黎巴嫩所有的用电设施都需要私人发电机与政府供电相互配合使用。一般上，一个区域内的普通居民用电，都由一户富人家庭的发电机提供，而不少华人家庭也拥有自己的发电机。不过发电机每隔几小时便需要更换一次内芯，所以在黎巴嫩突然停电两分钟，是生活中稀松平常的事情。*
* 2006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境内持续轰炸，当地近200名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华人，大部分跟随中国大使馆组织的撤侨行动，暂时离开黎巴嫩。选择留下的，不是居住在未直接受战火影响的地区，就是不愿意离开丈夫与孩子的母亲，以及几名放不下黎巴嫩事业的创业者。
* 一名留下的华人太太，丈夫是当地医生，因有很多重症病人需要持续治疗而无法离开。面临战争的危险，作为人妻人母，她不愿意扔下丈夫一个人在黎巴嫩，更不能在几岁的孩子面前显出一点恐惧。“当地人已经不把战争当作一回事了，我们只要不看电视，就没有太大的感觉。”每次爆炸声响起，她总是平静地告诉孩子，这是在放烟花，设法不给孩子留有一丝阴影。
* 那些选择撤离的华人，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还心有余悸。以色列轰炸黎巴嫩的机场和主要公路，也封锁了海港，使馆只能花高价租用客车载送他们，从偏僻小路辗转撤离。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穿着防弹衣，四处奔走，联络分散居住的黎巴嫩华人。陆路交通已经十分不安全，大家只好用中国国旗遮盖着车顶逃难。
* 有的华人不巧正在其他城市出差，为了赶回贝鲁特随使馆撤离，花了上千美元才租到一辆车子。“车子在山里蜿蜒行驶，为了安全又不能开车灯，只要有爆炸声就要停下来，手抱住头部等着轰炸平息。平时两三个小时的路程，足足走了一夜。”回到贝鲁特，每个人身上的衣服都被吓出的冷汗浸透了。
* 随着战事的恶化，陆路的安全已经无法保障，使馆只好借助希腊的撤侨船只，让最后的20多名华人从海上撤到塞浦路斯。
* 幸运的是，没有一个华人在这次黎以冲突中受到伤害。然而，不管是对黎巴嫩人还是当地华人而言，战争还是在每个人心中留下了难以忘却的伤痛。
* 2002年，出身于北京什刹海武术学校的武术高手陈朝阳，听朋友说黎巴嫩没有人教武术，搞个中国武术俱乐部应该很有发展。于是，他心血来潮，带着两个集装箱的货物就闯到了黎巴嫩。
* 由于考察不足，来到以后才发现，个人投资办俱乐部并不容易，而且带来的货物根本卖不出去，最后都砸在手里。无奈的他只好自己碰碰运气，到各个健身中心寻找当武术教练的机会。
*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陈朝阳在自己住处附近找到一家当地的武术俱乐部。俱乐部对这名送上门来的中国武术高手欢迎之至，马上就聘请他在此授课。他的加盟，让俱乐部一下成为贝鲁特最有名的武馆。很快地，陈朝阳受黎巴嫩武术协会之邀，担任国家武术队的总教练。
* 他的幸运只是刚刚开始。“好教练遇到好学生，和好学生遇到好教练，都是可遇不可求的。”陈朝阳在众多学中发现一株习武的好苗子——瓦池。孩子的父亲全力支持，甚至把自己工厂的厂房改装出一个房间，专供陈朝阳训练和居住。
* 经过教练、孩子、家长的共同努力，瓦池在2006年的欧洲武术锦标赛中，获得少儿组的长拳、武术和棍术3枚金牌。他在多哈亚运会上的精彩表现也引起各界瞩目，被誉为阿拉伯国家武术界的明日之星。
* 然而，在这些成就的背后，陈朝阳也有很多无奈。由于黎巴嫩战事不断，很多重要的国际比赛，国家都无暇支持，所以很多时候都要教练和学员家长自掏腰包去参加比赛。“出国比赛，住宿、饮食经常自己贴钱，但是没有办法，谁叫我在黎巴嫩呆了这么久，教了这么多学生。现在已经离不开了，因为这就是我的事业。”
* 让陈朝阳感到安慰的是，他和弟子们已经亲如父子。尤其是瓦池，由于常常去中国集训，生活饮食已经很中国化了。“没想到来黎巴嫩同化了一个当地孩子。”陈朝阳开心地说。不过，他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就是华人孩子习武的太少，目前只有华人太太赵颖的儿子在学习。“毕竟血液里有中华文化的因子，如果用心培养，成绩将不可限量。
* 黎巴嫩华人说，有时候天堂与地狱只是一步之差。在这个既美丽又动荡的地方，愿意不离不弃而留下的华人，都是因为对黎巴嫩有着真挚的喜爱。
* 无论是华人太太，还是意外留下创业的华人，他们心中永远有着「自己的黎巴嫩」，尽管没人知道这里的明天将会如何。

“日出之国”——日本

    提起“日出之国”——日本，总让人联想起勤奋、自律的日本人民。日本，如今已成为世界人口排行第十的国家，地狭人稠，平均每平方公里住着337人，最繁华的东京圈人口则高达3千万。

      国民不屈不挠的精神，使日本在二战后迅速摆脱了“战败国”的形象。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年均增长率超过10%。此后，日本经济一直稳健发展，特别是在汽车制造业、电子产业等领域表现卓越，傲视全世界。

      2007年，日本更创下4385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可惜好景不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日本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与此同时，日本人口老化现象继续恶化，劳动力短缺，但日本政府却始终拒绝接纳大规模的移民。

      如今在日本两百余万名外国人当中，华人人数已超过70万，成为在日本的第一大外来族群，其中11万左右已入日籍。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之间在历史上的两场人尽皆知的战争，是两国人民心底的疙瘩，尽管如此，也磨灭不了他们这两千多年交往所建立起的深厚情谊。

      华人迁移日本最早的记录可追溯至秦汉时期。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命令徐福率领3千童男童女以及能工巧匠东渡，以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倘若“徐福东渡”的事迹属实，那么徐福就成了最早旅居日本的华人。

      南北朝时代，中国政局动荡，出现了集体东渡的现象，不过自隋唐开始，集体东渡的现象便有所减弱，大多数华人用个人身份迁移日本，其中以商人及僧人居多，他们主要是到日本经商和弘扬佛法。此外，也有一些专业技术人员与学者侨居日本，他们将中国的农耕、制陶、建筑、炼铁和纺织等技术引入日本。同时，日本也派遣了“遣隋使”和“遣唐使”到中国观摩学习，将中国的礼仪以及制度传回当地。中日的频密互动对日本的文明进程起了关键作用。

      宋元时期有更多的华人抵达日本。当年，他们大多都聚居于福冈市（Fukuoka）的博多（Hakata）。12世纪50年代，居留在博多的宋人已经高达1600人。当时，宋人聚居的博多笤崎宫前一带建了许多中国式的房屋和祠堂，被称为“宋人百堂”。

      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开始动荡，沿海一带有不少百姓逃往日本。他们和大部分旅居日本的明朝商人一样住在长崎（Nagasaki）。 17世纪，华人在长崎先后建了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和圣福寺，合称“唐四福寺”，四福寺成为当时两千多名华人的礼佛以及联谊中心。

      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实行了“开国”政策，解除海禁，到长崎进行贸易的清朝商人因而逐年增加。接着，日本也开始“安政开国”，先后开放横滨（Yokohama）、长崎、神户（Kobe）和大阪（Osaka) 这些港口城市，吸引了许多中国以及欧美商家前往经商。欧美商家鉴于与日本社会之间的语言及文化隔阂，经常雇用华人充当买办或代理商。此时，在各开放的港口城市均出现了华人聚居地，横滨自1859年正式开埠以后，便迎来了大批的外国商社，在开埠初期，大约有四五十名华人在此居住，1870年，登记在册的华人人数已超过一千人，成为华人人口最密集的港口城市。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登陆日本的华人多数来自广东、福建、山东、浙江、江苏及江西三省（在日华人社会统称为“三江”）等地，他们大多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其中也有不少是“三把刀”业者（即厨师、理发师和裁缝）。

      自1871年，中日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后，旅日华人的人数便开始激增。虽然名义上华人可以自由进出并进行贸易活动，但现实中，华人在居住和经商时都受到了不少的限制。为了生存及发展，在长崎、神户、大阪、东京、横滨、函馆（Hakodate）等城市的华人便基于地缘和血缘建立起各自的乡团组织，团结起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尽管日本政府制定了各项法令限制华人在日本的活动及就业，但是当地华人人口仍然不断地增长。

      19世纪后期，日本奉行军国主义，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便开始对中国进行多次侵略。此外，日本也极力限制华人入境，且对在日华人加以羞辱。华人人数在动荡的局势中缓慢增长，1930年，全日华人人口约 2万7千余人。东京后来居上，华人人口超过一万人，成为华人最密集的地区；神户华人人口约有八千余人，位居第二；横滨5千余人，位居第三；而华人早期的聚集地——长崎的华人人口却只有两千余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在日华人社会的发展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华人经济一蹶不振，社团被强行解散，侨校也被下令停办。在日华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期间，有逾一万名华人放弃在日的家业，返回中国投入抗日的洪流。

      二战结束以后，有不少华人前往日本寻亲、经商、工作，并定居下来，导致华人人数大增。旅日华人以“战胜国”侨民的身份得到了优遇，不论是在经济或是社团组织等方面，都迅速恢复元气，发展也颇为顺利。

      20世纪60年代，有不少在日华人迁居至欧美等地，导致在日华人人口滑落。直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华侨华人的人数始终保持在5万人左右。

      从1980年开始，以留学、研修等名义前来日本的华人迅速增加，日本华人社会呈现出一番全新的景象，朝气勃勃。有人将1980年以前旅居日本的华人，称为“老华侨”，而1980年之后才登陆的，则称为“新华侨”。

      虽然华人社会在日本的历史悠长，但在中日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华人社会发展始终受限，影响力也不会太大。中日两国的关系至今仍然十分敏感，两国的人民均无法完全卸下沉重的历史包袱，彼此之间的关系既亲密又疏离。

* *孙中山深受中、日两国人民爱戴，他的革命事业，获得了日本华人和神户不少日本企业家的支持。当年他于革命期间多次流亡日本，前后造访神户市达18次之多。在神户舞子公园处，就有一座由该市市政府管理的孙文纪念馆。*
* *1995年1月17日，爆发了阪神大地震，当地华人很快成立了神户华侨赈灾对策总部，与日本当局戮力合作，积极展开抢救和善后行动。唐人街严重毁坏，但不少中餐业者仍在短时间内，冒着寒风，为灾民送上热腾腾的食物，显现出中日人民同舟共济，团结奋斗的精神。（神户华侨博物馆提供）*
* 站在东京最繁华的涩谷街头，熙攘的人群里，实在难以辨认谁是华人，谁是日本人。
* 华人说：“只要不开口，很少人会怀疑你不是日本人。”由于华人和日本人外形相似、文化相近，因此，华人在日本社会中，并不特别引人注目。
* 华人主要聚居在东京、横滨、大阪和神户。另外，在名古屋（Nagoya）、长崎甚至北海道（Hokkaido）也有不少华人。换言之，华人的足迹已遍布日本各地。
* 如果说日本的经济是一台精密又复杂的机器，那华人就像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和别的部件一起默默维持着系统的正常运作。这些年来，华人无论是为了融入当地，还是为了中日友好，总是不懈地努力着。他们涉足各行各业，与日本人一样长时间埋首工作，敬业乐业。
* 日本消费水平偏高，人人都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华人自然也不例外，但他们坚信只要肯努力付出，安定、舒适的生活并不难求。中产阶级的华人最多，其他多半是工薪一族。他们不刻意追求物质享受，较重视生活的质量，华人家长更是全力让子女接受优质的教育。
* 今天，大部分“老华侨”在日本已经扎稳了根，安享丰收时刻。“新华侨”则仍处于挥汗撒种的耕耘期，他们坚信，只要肯努力，终有一天，他们也能像“老华侨”一样，在日本安居乐业，成为这大家庭的一员。
* 早期定居日本的“老华侨”，几乎都与“三把刀”行业扯上关系。
* 由于文化水平偏低，加上当年日本政府严格限制外国人的职业选择，他们唯有依靠劳力谋生。“三把刀”中，剃刀（理发业）、剪刀（洋服业）已为时代所淘汰，仅有菜刀（餐饮业）留存下来，还在日本各地发扬光大。
* 如今，餐饮业成了新老华侨奋斗的领域。日本的中餐馆总计有多少家？很多人都答不出来。有人这样比喻：“日本中餐馆的数量可比得上日本人最爱的‘帕青高’游戏中心（Pachinko）的数量。”
* 中餐魅力大，受到日本社会的欢迎。忙碌一天之后，很多日本男人都爱到中餐馆来吃顿饭，喝杯酒。每当傍晚霓虹灯亮起，中餐馆便开始觥筹交错、高朋满座。
* 华人、日本人的饮食习惯，相似之处很多。例如，日本人的拉面、馒头及糯米等，近似华人的饮食风格。中国的普洱茶、乌龙茶、烤鸭、上海螃蟹等，如今也广受日本社会的欢迎。随着华人人口的上升，上海菜、四川菜、广东菜和北京菜，在当地都有了市场。
* 华人笑道：“日本人、华人饮食上最大的区别，就是日本人吃的，华人都吃；日本人不吃的，华人照样吃。”如今，普通华人超市售卖的中式速食越来越多元，如冷冻馒头、汤圆和饺子已成畅销食品，华人和日本人都喜爱。一些大型华人超市还售卖起中式熟食如红烧猪蹄、炒猪耳等，华人视为珍宝，但日本人则不敢恭维。
* 日本人做事细心，对吃很讲究，要求色、香、味俱全。因此，日本的中餐一般手工精致，卖相极佳，水平、价格都位于中上标准。
* 除了餐饮业，“老华侨”也活跃于商业贸易领域。“老华侨”创业经商最讲求信誉，作风踏实，曾创出不少知名品牌。不过在日本素有“富不过三代”之说。日本中华总商会一名理事指出：“政府征收的遗产税偏高，遗产越传就越少，到了第三代，往往就所剩无几了。”正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能继续发扬家族企业的例子并不多。不少由华人创办的企业，最终都渐渐演变成上至董事，下至生产操作员，几乎清一色是日本人的情况。
* 一些土生土长的“老华侨”后代，对继承家族小生意缺乏兴趣，倾向自行创业，一些则选择在大学毕业后，找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过安稳日子。另外，从事医生、律师、工程师等职业的华人专业人士也为数不少。
* “老华侨”刻苦耐劳、勤奋谦虚，为整个华人社会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他们受到日本民众的肯定与尊重，是华人与日本社会沟通的主要桥梁。
* 近二十多年间，“新华侨”通过留学、研修、经商、公务、文化交流等渠道，陆续登陆日本。其中，以留学生身份入境的人数最多，完成学业后，他们一般就在日本工作、安家，扎下根来。
* 住房问题，成为所有在日的“新华侨”所要面对的第一件事。当过留学生的华人回忆道：“大家都有过挤四迭半的苦日子。那小小的空间，总是潮乎乎、软塌塌的。”
* 所谓四迭半，就是相当于9平方米左右的空间，约有4张半榻榻米面积大小。许多单身赴日的华人，尤其是经济能力有限的学生，都曾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度过了在日本最初的岁月。日本的房产价格奇高，不少人奋斗了大半生，依旧没能力拥有自己的房子。约90%的在日华人，都住在租来的公寓或政府组屋里。
* “新华侨”大多是单枪匹马到日本闯天下。他们散居在日本各城市，以东京首都圈人数最多。东京的池袋，更已成了“新华侨”的聚集地。在池袋，华人的杂货行、旅行社、食品公司、书店及报馆等，各处林立。穿梭在街上鱼贯的人群中，耳际不时传来熟悉的华语。
* 近几年，涌入日本的“新华侨”不乏高学历、高收入的青年才俊。选择创业的“新华侨”，除了驰骋于商业贸易、餐饮业等传统行业外，还进军科技、信息和文化等领域。华人在日本创立的数百家软件公司，几乎全由“新华侨”创办。此外，他们也出版中文报及中文杂志，开拓华文媒体的市场。
* 与“老华侨”低调、朴实的作风相比，“新华侨”显得更具信心和野心。“老华侨”一般稳守江山，“新华侨”则努力进军、开拓新市场。“新华侨”善于利用各种宣传渠道，注重包装，积极树立品牌的口碑、形象。因此，他们特别喜欢经营连锁店，企盼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市场，赚取高额盈利。目前已有几家“新华侨”创办的企业在日本成功上市，这些上市企业，一般都拥有数千名员工，全年营业额超过百亿日元，业绩骄人。
* 随着中国不断开拓海外市场，一些赫赫有名的中国企业，如中远集团等，都已经进驻日本。此外，中国的一些银行，也纷纷到日本来设立分行。
* 1999年，由新老华侨，以及拥有中资背景的日本企业共同组成的日本中华总商会正式成立。这是日本规模最大的华侨华人经济团体，拥有百余名会员，定期举办各种经营管理讲座、交流会和经济论坛等。日本中华总商会成立至今，不断发展壮大，努力推动着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促进中日友好关系。
* 新老华侨中人才辈出，除了在经济领域表现出色，更有不少华人学者、专业人士在大学、研究机构中任职。如今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中已有超过3千人取得博士学位，约2千人在日本大学担任教授和副教授。
* 由华人博士、教授创立的“日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会”，组织在日华人学者，自资结集出版了中、日文学术报告，也定期举办交流会，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日商贸合作日益紧密，中文热潮也在日本蔓延开来。在密密麻麻的外语招生广告中，“中文班”的招生广告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显眼。不少华人父母都认为在未来的就业市场上，掌握中文和日语的双语人才必定最吃香，因此，他们都鼓励孩子学习中文。
* 目前在日本约有2万5千名年龄介于5至14岁的华人儿童及青少年，但仅有五所全日制的华侨学校。它们分别位于神户、横滨、大阪和东京，总共只能容纳约2千名学生，供不应求，故入学竞争非常激烈。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近几年，那些为新移民子女特设的周末中文学校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解决了“新华侨”子女学习中文的问题。
* 由于华侨学校在法律上不受日本政府承认，得不到教育部津贴，主要依赖华侨社会的捐献、学生的学费及各单位提供的补贴，故校方在短期内根本没能力扩建校舍来容纳更多学生。
* 神户同文学校校长金翼无奈地说：“报读人数逐年增加，我们唯有通过小学入学考试的方式，让学生公平竞争，以获取入学资格。”
* 华侨学校主要提供小学和初中教育，有些还设有幼儿园。在小学阶段，课程内容都是根据中国大陆、台湾的教材编写，让孩子从小接触中华文化，了解民族的历史。一名老师说：“上课时，我们中、日语交替使用，因为大多数家庭都把日语当母语，孩子完全没有中文基础。”
* 对这些小学生而言，中文比日文难学得多。尽管在听、写方面还能应付，但一开口说起中文，却又信心不足。一个华人少年，操着不甚流利的中文道：“小时候，身边的朋友都说日语，中文没人听得懂，所以我觉得中文没什么用，就不太愿意去说了。”大部分年轻人是在升上大学之后，才体会到掌握双语的好处，并开始自动自发，重新学习中文。
* 由于华侨学校的文凭不受承认，学生念完初中后，必须到日本学校继续念高中。为了让学生们顺利升学，华侨学校的初中课程，完全采用日本初中教育的教材。
* 神户华侨学校的训导主任杨震雄说：“无论黑板上、课本上，或是学生的笔记，写的都是日文。只不过，老师们仍用中文讲课，让学生始终能有鲜活使用中文的机会。”
* 大部分华侨学校毕业的学生，都能顺利考入日本高中，例如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高中升学率为100%。因此，华侨学校成了日本社会眼中的名校，不少日本家长都想送孩子前来报读。
* 华侨学校向来也是华侨社会相互联系的纽带。在日本，凡有华侨学校的地区，华人子女大都毕业于该校。华人即使初次见面，只要说出自已是华侨学校的校友，彼此马上熟络起来。在神户同文学校执教超过30年，退休后担任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馆长的蓝璞走在神户街上，总有许多受过他教诲的学生亲切地唤他一声“蓝璞老师”！有些还恭敬地90度鞠躬呢！
* 对 “新华侨” 来说，子女的教育问题是最大的烦恼。华侨学校不多，收生名额少，他们年幼的孩子大多就只能接受当地的义务教育。中文虽是家中沟通的语言，但一旦踏出家门，便无用武之地，中文水平也就难以提升。
* 日本的周末中文学校，主要就是为这些“新华侨”的子女而设，让他们通过每周约90分钟的时间来学习中文。目前，拥有12年历史的同源中国语学校，已成为东京规模最大的周末中文学校，分布在东京十个不同的地区，学生人数达1千人左右。理事长杨林说：“父母的表现很积极，风雨不改送孩子来上课。然而小孩的兴趣、耐力不足，程度一加深，就想放弃了。”
* 日本的华侨华人，始终在困境中认真办学，华社热切希望日本政府，能及早予以华侨学校应有的法律地位，让它能突破重重困难，造福更多的华人子女。
* *1898年成立的大同学校是在孙中山首倡、梁启超和康有为协助下，在横滨由华侨创办和独自经营管理的全日制学校，可称得上是世界上第一所近代华侨学校，也是今天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的前身。*
* 日本社会总给人一种守礼、严谨的印象。平日电车门一开，一大群西装笔挺的男士、套装齐整的上班族一拥而上，个个脸上神情冷静，营造出日本社会严肃、低调的整体形象。至于那些“老华侨”、土生华人，或居住超过三五年的“新华侨”，无论气质或生活细节上的表现，已俨然是一个“日本人”了。
* “日本社会讲究团体精神，华人的融入，可说是很自然的，而顺着主流社会的方式去生活，也轻松得多。” 这是在日华人最大的体悟。在日华人受日本文化影响的部分还真多。例如，彼此碰面或告别时，以鞠躬代替握手，说话时语调轻柔，与人相处不过分热情，学生和上班族都习惯带便当出门等。
* 此外，华人也跟日本人一般，开始讲究 “空间文化”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总保持着适度的距离。华人说：“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正是这个意思。” 举凡串门子之类的活动，在当地华人社会并不多见，他们尊重彼此的隐私，公私分明。平日也都忙着各自的工作，往来不多。
* 欣然融入当地生活是一回事，归化为日本国民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中日之间复杂的历史纠葛让在日华人在选择时多了一层犹豫和顾虑。
* 目前，日本政府希望透过教育，以及更宽松的归化条件，吸引华侨归化为日本公民。不过，一些早已落地生根的老华侨，却始终不愿入籍日本。
* “他们贡献良多，单是长期缴纳的税务就是天文数字。不过不入籍，他们就永远没有参政的权利。” 年轻华人惋惜地说。
* 近年来，入籍的华人越来越多，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本身对日本没有深厚的情感，纯粹是为了旅游、事业及生活的方便等因素，而选择归化；第二类则是因为打从心底喜欢日本，才毅然选择归化。一位入籍日本的华人说：“归化前不知道何去何从，归化之后，家就在这里了。”
* 但无论入籍与否，华人对传统文化的情感还是会深埋在心底。一些传统节庆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依旧会激起在日华人的热情。对华人而言：“形式上是元旦热闹，但内心深处，还是春节最重要。”
* 由于春节并非公假，大多数华人仍须照常工作、上学。结束忙碌的一天后，有些人回到家边吃饭边收看电视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感受热闹的过年气氛；也有人通过长途电话向远方的亲友拜年。
* 许多国际婚姻下出生的孩子，或在日本土生土长的华人子女，对春节并无深切的感受，甚至缺乏具体的想像。因此，有些父母会带孩子去逛一逛春节色彩浓厚的唐人街，顺便向孩子解释华人传统春节的点滴。
* 近年来，日本政府也费尽心思在华人春节期间举办一些旅游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前往日本观光，营造热闹的春节气氛。尽管整体而言，日本的年味是淡了些，但每次春节的来临，还是让许多在日华人深感温馨。
* 至于元旦，则是日本社会最重视的节庆，举国放假一星期。国情如此，许多在日华人干脆就把元旦当作春节来过。不少华人家庭全家聚集在一起包饺子，吃中式烹调的日本年糕，有些父母也会给孩子发压岁钱。
* 此外，华社之间也会互相拜年祝贺，往往还有热闹的团拜活动。横滨的中华街及神户的南京盯，每年都呈现舞狮舞龙，以及传统中华舞蹈、杂技等表演，与日本社会一同欢度新年。
* 此外，每年清明节也是 “老华侨” 非常重视的节日。在神户，华侨拥有自己的中华义庄。清明这一天，中华会馆就在义庄的祝堂举行公祭仪式，而其他华侨家庭，也会在清明前后的一个星期，到义庄来扫墓，以寄孝思。
* 目前， 在日本约有60多家平面、电子中文媒体，其中90% 都是“新华侨”在经营。自《留学生新闻》于1987年创立以来，日本中文媒体圈越发热闹，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营运超过15年的《东方时报》和《中文导报》，称得上是实力强，表现突出的中文报。
* 近年来，日本东京的池袋，成为新一代中文媒体的集中地，《半月文摘》、《华人周报》、《阳光导报》等中文报都在此营运。
* 身为传媒大国的日本，日本大报——《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每日发行量超过1千万份。相比之下，中文报在当地可谓小巫见大巫，微不足道。《中文导报》的主编杨文凯坦诚地说：“日本政府从不严加管制中文报，因为它对当地主流社会的影响微小，没有任何威胁力量。”
* 如今 “新华侨” 已成为中文报的主要读者群，陪伴报馆一起成长的老读者越来越少。一部分 “老华侨” 平日已习惯阅读日文报，听日语新闻，另外通过华侨总会或各宗亲团体发行的会讯、月刊来掌握华社发展动态。不过在进入科技时代后，日文或中文报纸对年轻人而言都不重要，他们能吸收资讯的渠道太多了。
* 读者群的流失，对中文报的收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更大的威胁，却来自于免费报。不少企业集团纷纷办起免费报，给传统报业带来了激烈的竞争，更影响了传统报业的发展。
* 现在，大多数办报人已将办报看作一门生意，而非文化事业。坚持内容质量的报人不得不感叹：“文人办报，已成过去。”大多数的免费报纸都以广告为主，如同广告合订本，正如一名中文报记者所说：“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的资讯，大家还能要求什么呢？”
* 随着近年来日本的中文热不断升温，有人相信中文报业必定能找到生存的空间。目前，中文报除了为华人读者提供讯息外，对学习中文的日本人来说，更是最生动鲜活的教材。
* 横滨规模最大、最繁忙的中华街，就坐落在横滨中区的山下町。岁月悠悠，它见证了老华侨在日本创下的辉煌成就。
* 横滨开埠140年，中华街风雨相伴，对横滨的发展影响很大。
* 如今，山下町住着3千名左右的华人，中华街是他们生活、工作、休憩及休闲玩乐的所在。
* 2004年，横滨的高速铁道开始运作，不但“元町 – 中华街站”被设为终点站，还有电车直达中华街。交通网络发达，使中华街的知名度大幅度提升。除了年均游客增至1800万人次外，直接的经济效益更高达500亿日元之多，令人刮目相看。
* 中华街各处，色彩鲜艳、古典精致的牌楼林立。走过牌楼的霎那，人仿佛坠入了神秘的时光隧道，来到了繁华的旧上海。两旁街道上尽是中餐馆、杂货行和会馆等，古色古香的中式建筑鳞次栉比，散布在中华街的各个角落。
* 漫步街头的游人，偶尔抬起头来放眼望去，还会看到那传播中华文化的展览空间——“九龙陈列窗”，将中华街的特色展露无遗。
* 这条街上，不但洋溢着浓厚的华人色彩，还充满了生命的热力。
* 横滨唐人街团体联合协议会副会长曾德深指出：“这里的惯例是华人开餐馆，日本人供应食材。”多年来，中、日双方合作密切，打造了这条和谐繁荣的中华街，横滨市民更一致推介中华街为不可错过的旅游景点。“日本人一直都是中华街的主要消费群。”一名华人商家说。
* 在不少国家，宗教团体总是华人圈子里最活跃的团体。然而，在日华人中的“新华侨”，却多数没有宗教信仰，只有部分华人信仰佛教、基督教、道教或神道教。“老华侨”们则大多对于民间信仰较为重视。
* 由日本华侨建立起来的关帝庙，在当地名气非常大。在日本列岛上兴建关帝庙，已有120多年的历史。目前，在神户、横滨、长崎和函馆，都耸立着富丽、庄严的关帝庙。
* 其中，位于横滨中华街上的关帝庙，不仅作为横滨华人的守护神，也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尽管它曾多次毁于火患，但华人却一次次合力将它重建。位于神户的关帝庙，也曾遭受空袭、火灾、地震等摧残，但每一次也都在华社的协力襄助之下，重新修复起来。
* 横滨关帝庙，经年香火不断，除了华人信徒的膜拜，来访的日本、外国游客，也总是络绎不绝。每年的关帝诞，横滨关帝庙都会举办盛大的庆典，中华街上的每一户人家，每一间商店，都热烈地参与。热闹的游行，精彩的舞狮、舞龙、踩高跷、民族舞蹈等表演，吸引了大批群众围观，连日本电视台都特地前来拍摄。
* 每年8月中旬，神户的福建同乡则会在神户关帝庙里举办“水陆普渡胜会”，超度亡魂。诵经之余，大会上也焚烧金银纸品，祭奠十方冥灵。1997年，“水陆普渡盛会”还被列为“神户市地域无形文化财产”，受到充分的肯定。“不过，传统上必定出现的纸扎‘鬼王’却没了，因为日本人觉得鬼王的造型实在太可怕了。”当地华人笑着说。
* 近年来，神户关帝庙也成了华人、日本人赏月的好去处。烟霭氤氲的庙宇，显得古色古香，空气中飘扬着悠扬的二胡声。人们一边欣赏着素色流辉的月华，一边品尝月饼和中国茶，过个不一样的神户中秋节。
* 一位日本老华侨给儿子地出了这么个问题：“一场足球赛，若碰上日本对垒中国，你会支持哪一方？”儿子想了想，答道：“我心里支持中国。不过中国赢了，我也不会表现得太兴奋，还要顾及日本朋友的感受嘛！”这个回应，也是大多数华侨内心深处，最真切的答案。
* 如今，日本华侨社会正逐渐转型为华人社会。然而，许多华侨在归化后，心理上却从未放弃“华侨”的身份，这份矛盾的情感总是难以厘清

韩国

  大韩民国简称韩国，位于亚洲朝鲜半岛上，北部以北纬38线与朝鲜相隔离。由于朝鲜与中国大陆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两国人民互动频密，经常越境进入他国。有学者更认为朝鲜半岛是世界上最早有华人的国家。

       首都首尔（旧称汉城）人口大约为1063万，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朝鲜半岛最大的城市。20世纪60年代的贫穷国家韩国，通过高储蓄率和高教育水准，在短短的40年间，经济迅速起飞，跻身经济发达国家之林。

       虽然在1997年因金融风暴而受到挫折，但是经过国民同心协力，韩国在短时间内克服了危机，重整汽车、造船、电子等主力产业，恢复了国家竞争力，表现杰出，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华人正式以侨民身份定居韩国，是从1882年壬午兵变的那段时期开始的。那时候，山东登州的吴长庆将军受清廷的指示，率领3千名士兵前往朝鲜协助平息兵变。随行的还有40名商人，而他们也正是最早抵达韩国的华商。

       那一年，朝鲜和中国还签署了《朝清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中国商人开始大批涌入朝鲜。当时选择移居到韩国的华人主要来自山东，也有一部分华人来自河北及江浙闽粤等省份。

       嗣后，华人在汉城的商业活动范围从观水洞和水标洞，逐渐向南大门一带扩张。在汉城商业集中的中心区——钟路市场，也可看到许多华商经营的店铺。这些华商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主，商品包括麻布、棉织品、丝绸、麦粉、烧酒及金属铁器等。

       除了商业活动，也有部分华人在韩国从事农业耕种。后来因为中国的局势动荡及经济衰败，导致不少华人到韩国去当土木建筑业工人。华人在各领域皆勤奋刻苦地工作，因此很快便在韩国积累起一定的经济实力。

       然而，日本发动战争并进一步控制朝鲜之后，韩国华侨社会蒙受了相当严重的损失。1894年的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不断诱导韩国人仇视华人，借故在群山、仁川（Incheon）等地发动排华运动，并成功利用韩国人来打击当地的华人。

       在排华高峰期，超过16万的华人仓皇逃往中国驻汉城领事馆寻求庇护。在许多老华人的心灵上，这段悲惨的过去是无法磨灭的伤痕。

       1945年，朝鲜摆脱日本的统治，当时物资匮乏，华人抓紧机会从香港、澳门等地输入各类杂货以及日用品。因为贸易的蓬勃开展，华人人口开始直线上升，同时也带动了其他行业，中餐馆如雨后春笋般在韩国发展起来，而专为中餐馆提供食材、炊具等用品的供应商也趁势崛起；为华人提供服务的理发业、裁缝业等同时受惠。这时，华人享有较好的社会地位，并称自己为“一等公民”。不过，这段繁盛的经济复苏期却仅是昙花一现。

       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当地华人的地位便开始直线滑落。为了保护本国的公民，韩国政府颁布许多限制外国人发展的政策，其中尤以《外国人土地管理法》对华人的打击最大，该法律规定华人不得拥有土地，不少华人只好忍痛出售家族好几代人曾经住过的房子和土地。

       有些华人被迫请韩国人代为注册，结果财产却遭人私吞，血本无归，申诉无门。此时，华人除了觉得生活毫无保障之外，更深感前路茫茫。离开，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约有两万多名华人离开韩国，美国成了这批华人的首选，有些则移居澳洲、加拿大等国。他们大多数拥有雄厚的资产，虽然已经身在国外，却仍然极关注韩国境内华人同胞的权益和发展。

       后来，华人外流的现象逐渐减缓了下来，但是韩国华人的经济发展仍然处处受限，因此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目前定居韩国的华人有两万多人，大部分散布在首尔、仁川和釜山（Busan）。他们通常以定期居留的身份在韩国居住，选择入籍的并不多。另有数十万中国朝鲜族长期旅居韩国，不过他们与汉族华人社会缺乏交流和联系，多数已逐渐融入韩国社会。

       华人在经济上的表现并不耀眼，从事小本生意者居多，在韩国几乎找不到华人创办的大企业。年轻华人则逐渐融入主流社会，在韩国企业或机构打工。曾经辉煌一时中文教育在华人外移潮后也面对华人学生生源不足的问题，年轻华人的中文水平偏低，华语说得流利的年轻人寥寥可数。

       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从大陆入境的华人人数每年都急速增加。2007年，中国留学生的总人数已经突破3万人。新登陆的中国大陆移民已大大超越原本定居在韩国的华人人口。

       新老华人的相互配合，期盼能为华人社会注入新活力，进而扭转长期不振的颓势。

     中餐馆是韩国华人从事的传统行业。正如当地华人所说的：“如果说华人把生与死都寄托在餐饮业上，一点都不为过。”

       韩国中餐馆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才算真正兴盛起来，在五六十年代的巅峰期，大约有58.2%的华人从事餐饮业，中餐馆共有2300多家。当时人们认为上中餐馆用餐是一件体面的事。

       从70年代开始，因政府法令限制，很多中餐馆难以为继。不少韩国人学徒在学满之后，也纷纷自立门户。到1999年，华人经营的中餐馆只剩下680家，而且规模一般都不大，通常只能招待6至10桌的客人，稍具气派的中餐馆更是屈指可数。

       唯一不变的是，炸酱面依然是韩国人最爱的中华料理，甚至成了“镇馆之宝”。仁川的中餐馆是这种韩式炸酱面的发源地。早年仁川开港，大批苦力到来，为苦力们提供三餐的华人餐馆，创出这经济实惠且可口的韩式炸酱面。

       炸酱面的成本很低，如今售价也仅约三四美元，可算是最便宜的一道中华料理。一般受薪人士每周会吃上4至5次。虽然一些韩国人把华人戏称为“炸酱面”，但薄利多销的炸酱面还真是养活了不少华人。如今就连在美国，也有很多来自韩国的华人在中餐馆出售这独一无二的“韩式炸酱面”。

       中餐馆主要的客源都是韩国人，因而口味都较为清淡。无论是炸酱面、小笼包或饺子等，上桌时都一定会附上韩国人最爱的泡菜和其他酸菜。韩国人曾千方百计地拒绝外国人和外来文化，但华人却把中华美食融入韩国的日常生活，进而征服了韩国人的味蕾，可说是华人在韩国的一大成就。

       年轻一代的韩国华人一般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因而不像父辈一样局限于餐饮业之类的传统行业里。

       一名年轻的华人大学生说：“华人子女在韩国升学时压力并不大，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外国人’，可以以优惠分数进入不少热门科系，比如医科。”不过，外籍身份让他们在择业时受到颇多限制，华人绝少有机会担任律师、教授或公务员等职位，大多专注于传承和发展家族事业，或自行创业，或加入其他企业机构成为工薪族。

       华人的就业圈其实非常狭小，可供选择的职业并不多，中医在韩国被称作“韩医”，是华人社会中的常青职业。韩国人对韩医学的接受度相当高，并且深受影响，就连畅销韩剧《大长今》也大力宣扬韩医学。由于“韩医”书籍都以汉字书写，掌握汉字的华人子弟就占了优势，学习起来更省功夫。在韩国由华人经营的韩医院超过百间，药房也有数十家。华人当“韩医”，一般都拥有不错的收入，也受到社会尊重。

       除了“韩医”，一小部分成绩优异的华人子弟，则成功考上韩国大学的医学系或牙科系。从医的华人可以晋身上流社会，过舒适生活，也容易被韩国社会接受，甚至受到重视，他们可算是最不想离开韩国的华人群体。

       旅游业是另一个受华人欢迎的行业。近年来，韩剧风靡亚洲，慕名前来观光的华人游客不断增加，兼通韩语和华语的韩国华人就成了最佳的导游人选。拥有足够资金的韩国华侨则开办旅行社，除推出吸引华人的韩国旅游配套外，也为韩国人设计中国观光团。随着两国人民的往来日渐频密，不少华人旅行社仅以代购机票为主业亦能生存。

       此外，随着韩国流行文化在各国大受欢迎，亚洲华人对韩国商品如服饰、礼品、化妆品等青睐有加，有些韩国华人看准时机，成立了包装公司，为来韩国选货的商家包装商品，然后寄往海外销售。

       与此同时，“中国风”也吹向韩国，韩国人学习汉语的热情在不断高涨。为此，许多韩国华人或华人留学生做起中文辅导老师，向韩国人传授中文。不少从台湾留学归来的韩国华人也投身教育，把所学知识传授给当地华人，继续推广中华文化。有些华人更在大学里任职中文系讲师。

* *旅居韩国的中国朝鲜族使用韩语沟通，生活方式与韩国人一样，非常容易融入韩国的社会。如今，华人社会仍在辩论是否要将朝鲜族归为新华人移民统计，若是加上这些朝鲜族人，韩国的华人总人口可能已经超出了十万人。*
* 与韩国华人谈起生活，他们总是欲语还休，眼神中有矛盾，语气中有些许失意。他们在经济上没有骄人成就，最叫人困扰的是模糊的身份。他们生活安稳，却总觉得不踏实，当然也就无法真正地快乐起来。
* 华人中，约90%祖籍山东，持台湾护照。他们生活的重心都在韩国，有些已经在韩国繁衍至第四代，但家族中却无人申请入籍。在韩国他们被当成中国人看待；到台湾或中国大陆，他们则被看成韩国人。华人苦笑说：“真是生的不亲，养的不爱。”
* 未取得韩国国籍的华人在生活上面对不少障碍。经过多番争取后，在2002年3月，韩国政府终于给他们颁发永久居留权。在这之前，他们只能以“定期居留”的身份在韩国生活，每三、五年必须更新居留申请。有些人因错过了申请期限，而离开韩国。
* 现在华人申请入籍的条件放宽，程序也已经简化，比如不需要参加韩文考试，入籍时也不需要宣誓效忠韩国。不过，许多华人并不积极申请入籍，从1992年至2006年，入籍的仅有2004人。
* 获得永久居留的身份之后，华人所享受的福利并没有提升，比如无残疾福利和医药福利。在日常生活中，许多网站和手机服务依然把永久居留者当成外国人，而无法注册和使用相关服务。华人无奈地说：“虽然可以永久居住，但我们依然只是个外国人而已。”
* 虽然华人都要像韩国公民一样，定期缴纳各类税金，但却没有被给予参政的权利。2006年，韩国政府终于让居留三年以上的华人拥有地方选举投票权。不过，不少华人却认为，华人居住地不集中，零零散散的华人选票，在地方选举中发挥不了作用，也难以为华人争取到任何福利。
* 人数不多的华人并没有形成一个密集的华人住宅区，他们大多分散居住在韩国各地。不少华人碰面时，总会讨论起哪一处的房子比较好，哪边的房子价格便宜等，从而推荐亲戚朋友一起居住，当起邻居，形成小小的华人圈子。与许多韩国中产阶级一样，华人大都有能力买房子，最多人选择在公寓的小单位里，筑起自己的安乐窝。
* 其实，韩国的房价不算贵，一般中等收入的华人家庭，都有能力购买房子。但由于之前政府对外国人购买房地产加以管制，即使再富裕的华人，也无法拥有太多的房地产。“现在虽然政策已经开放，但多数华人的经济状况并不允许我们把钱花在房地产投资上。”一名年长华人透露。
* 华人虽然保住自己的国籍，但要保住中华文化却不容易。许多华人家庭虽仍吃着中餐，但餐桌上无时无刻不能缺少的，是韩国人最爱的泡菜。许多华人离开韩国去旅行或探亲，最挂念的就是韩国泡菜。他们说：“对泡菜，从一开始的不能接受，到现在不能割舍，我们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泡菜文化的入侵，其实象征着韩国文化早已一步步入侵华人生活的各层面。
* 走在韩国街头，男性上班族都穿着西装大衣；女性则化上亮丽妆容，装扮优雅，大家都穿上最流行的服饰，画面和谐，乍看之下，根本分不清谁是韩国人，谁是华人。居善堂文化协会主席毕可信说：“韩国社会不喜欢大红色，所以即使过春节，也甚少看见华人穿上大红衣裳或传统服饰招摇过市，我们的品味，也与韩国人越来越接近。”
* 华人较为坚持的就是红白事的习俗。比如每逢婚宴喜庆，韩国人爱用高雅白色为主色，华人却喜欢以热闹的红色增添喜气。红彤彤的请柬、红包封，和韩国人的全白装饰，正好形成强烈的对比。至于殡葬礼仪，也已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简化，如今选择火葬的华人比土葬的多，但许多华人仍坚持出殡当日，灵车须绕过往生者住宅，才送往坟场或焚化场。
* 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华人已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但潜意识里，华人并不希望自己变成韩国人。“要我们穿上传统韩国服装过韩国节庆是绝不可能的事！”一位华人男子坚决地说。中韩两国的历史包袱，经过百年的岁月洗涤，似乎还没完全放下。
* 在这个提倡自由恋爱的年代，即使许多父母对韩国人没有太大的好感，他们却阻止不了下一代与韩国人恋爱和通婚的情况。
* 浪漫的韩剧风靡全世界，然而，生活在韩国的华人女性却感叹：“现实与电影的落差实在太大了！”韩国社会还保持着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一名家长说：“我们通常不反对儿子讨个韩国媳妇，但却不希望女儿嫁给韩国男人。”大多数华人父母都不忍心看着心爱的女儿嫁入韩国家庭。在韩国家庭里，太太必须为家人准备三餐，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把小孩照顾得无微不至，还要对长辈千依百顺。
* 繁重的家务把妇女压得喘不过气，而与韩国婆婆的相处之道，更是令许多华人媳妇费尽心思。每年多次的祭祖活动，媳妇都必须参与准备工作，如果是长媳更责无旁贷，一般必须扛起祭祖的重担，为此媳妇们必须向婆婆学习祭祖的每一个细节，小至贡品摆设，都要依照婆婆的指示，令华人媳妇头痛不已。
* 一名从台湾嫁到韩国的太太说：“韩国男人一般只负责挣钱养家，家里的大小事务，包括孩子的教育问题都由妻子打理，许多男人连孩子念几年级都答不出来。还有，韩国人嗜酒如命，丈夫下班后若有工作应酬，常常都要喝个通宵，太太也不能过问或抱怨，只能默默为丈夫守门。”
* 从相识相爱到相守，不少中韩通婚的家庭都面对了重重考验。台湾新娘游晴惠由衷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都摒弃各自的文化包袱，找到属于每个家庭独有的文化，才能拥有幸福的婚姻。”
* 韩国华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休闲活动很单调。空闲时，他们最爱的消遣就是搓麻将、和三五知已小酌聊天、唱卡拉OK、打高尔夫球、或在家中追看中国和韩国电视剧。韩国的科技和网络非常发达，年轻人都非常喜欢上网，玩线上游戏、聊天、听歌、写部落格等等。
* 随着网络日趋发达，年轻华人和海外的中文流行文化完全接轨。华人世界流行的综艺节目、歌曲、电影、偶像剧等，他们都了如指掌。不像以前，香港“四大天王”和台湾F4走红的年代，网络还不发达，追星族要到一些华人开的书店才能买到相关的光碟。中华书店的老板回忆：“当年香港的四大天王当道，每天都有歌迷排队等着买光碟、杂志等。F4也不赖，在这里的华人圈中足足红了两年。”不过，近年韩国娱乐圈和流行文化走势凌厉，不少年轻华人转而崇拜韩国偶像。
* 曾经，仁川是华人人口最密集的地方，由早期华人筹办的仁川华侨学校，至今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至2007年，韩国共有24所华侨小学和4所华侨中学。大多数的华侨学校创立于华人社会最繁盛的时期。各校采用的教材全由台湾侨务委员会提供，除了韩文和英文课之外，所有科目都以中文授课。
* 韩国政府不承认华侨学校，因此不给予津贴。学校经费主要来自学生学费及华人的捐助，台湾和大陆方面则不定时给学校增设硬体设备或财政补助。学生人数较多的汉城华侨小学及汉城华侨中学，校舍以及硬体设施都健全，但一些地点偏远、人数又少的华侨学校，学习环境则不太理想。汉城华侨中学校长孙树义说：“华侨学校给教师的待遇不俗，所以优秀的教学人才并不难求。”毕业自台湾或韩国大学的华人教师占大数，也有少数韩国教师。
* 近几年，各华侨学校内中韩混血儿的比例不断增长。在汉城华侨小学和中学，大约40%的学生母亲都是韩国人。此外，一些韩国家长把孩子送到华侨学校来学汉语。如今，华侨幼稚园和小学的韩国学生比例也逐渐超越华人学生。
* 在釜山华侨小学，韩国学生占了该校总学生人数的80%。釜山华侨小学校长说：“虽然看似越来越多韩国家长选择了中文教育，但这并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华侨学校‘学生荒’的困境。许多家长为了让孩子学好韩语，以方便日后升学，往往会在小四时把孩子转到一般的韩国学校学习。结果，华侨学校总会突然流失大量高年级学生，这情况不止打乱班级编排，还影响教学进度。”
* 除了汉城华侨小学和中学的学生人数符合理想外，仁川华侨学校的中、小学加上幼稚园的总人数不足500人，和高峰期的千多名学生相比，相差甚远。其他华侨学校更是惨淡经营。
* 华侨教育之路真是困难重重，家长对华侨教育的信心也开始动摇。大多数家长希望孩子掌握好中韩双语，了解中华文化，加强孩子对“华人”的身份认知。可是也有一些家长认为华侨学校的中文教学水平偏低，无法媲美中国大陆或台湾。为了提升学生们的中文水平，校方不得不规定学生在校园内不许说韩语，但每次下课钟声一响起，同学、家长就自然地以韩语交谈。华语的使用，仅局限于课堂上。
* 家长感叹，连小朋友最爱的卡通人物都讲韩语，孩子又如何能抗拒韩语和韩国文化呢？在韩国，最缺的正是一个鲜活使用华语的环境，孩子们在家庭、邻里、朋友圈内，主要都以韩语沟通。一名家长说：“很多年轻华人虽说懂中韩双语，但说韩语时突然出现华语词，说华语时又夹杂着韩语词汇，非常混乱。换言之，双语的整体水平都下降了。”有些家长为避免孩子两种语言都学不好，干脆把孩子送到韩国学校去，专心学好韩语。
* “汉语热” 在韩国慢慢升温中，不少大型书店内售卖的汉语学习教材也越来越多元。至于华人经营的小书店，对汉语爱好者来说，更是个小宝藏，中国历史、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等书籍一应俱全，比许多韩国大型书店的中文图书更丰富多元。一位书店老板说：“最受韩国社会欢迎的还是汉语教学和玄学之类的书籍。”

       华人已经习惯了生活在一个以韩语为主的环境。韩文书报、电台和电视节目，是华人社会吸收资讯的主要管道。华人经营的中文报章《韩中日报》因经费短缺，于2007年7月停刊，然而这对华人社会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冲击，华人几乎都能从韩文报章中吸收最新资讯。韩国电视节目精彩多元，也满足了大部分华人的需求，少数华人则透过卫星电视收看中国电视台。

       近年，韩国当地报章如《朝鲜日报》和《东亚日报》，开始在各自网站设立中文版，希望华人能更了解韩国的各大政策，也希望韩国人民更清楚中国的发展动向，以加强两国的联系和交流。

       2007年11月28日，韩国第一份由韩国人创办的中文报纸《亚洲日报》正式出版发行，主要以报道中韩两国经济、产业和文化新闻为主，还设有华语学习栏目，为了突出中文报纸的特色，《亚洲日报》在韩国招聘了50余名经验丰富的新闻从业员，其中在韩华人占了大部分。驻韩的中国人、华人团体，以及关注中国的韩国人都是该报锁定的主要读者群。

       中文媒体既无法负起宣扬文化的责任，华人社团就扛起了这个使命。1949年后，各地纷纷成立华侨协会。目前运作尚好、规模较大的有汉城、仁川、釜山等地的华侨协会。华侨协会具有一定行政职权，比如帮助华人登记户籍和办理结婚书等。

       近年来，不少新的华人团体陆续诞生。其中，华商团体最为突出，如1999年成立的韩国华侨商人协会和2004年设立的韩国中华总商会。后者2005年在首尔成功主办了第八届世界华商大会。此外，2002年2月，华人正式成立韩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不过，总的来说，华人对社团活动不甚热衷，许多团体在成立后就渐渐沉寂，活动很少。

* 韩国曾把佛教列为国教。源自台湾的佛光山在首尔设立了会所，成为华人及韩国佛教徒礼佛交流的平台。每年韩国社会隆重庆祝佛诞节，华人佛教徒也积极参与这一庆典。战后基督教在韩国发展迅猛。在华人较多的地区，宣教人士用华语广播来宣传教义，吸引华人聆听。长期以来，华人都有稳定的信徒人数，同时不少地区也开设华人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有人预言未来华人基督徒人数会不断攀升。
* 中韩两国关系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对韩国社会的影响深远。反映在节庆习俗上，春节和中秋节，成了华人和韩国人同庆的佳节。
* 农历新年是韩国华人最期待的传统节日。春节举国放假三天，韩国人都赶回家和家人团圆。除夕夜里，华人家庭成员聚在一块，包饺子，吃团圆饭。一些熟知传统的华人笑说：“如果新年正好赶上本命年，那么就要在除夕夜穿上大红内衣裤来冲喜。”长辈在除夕夜会给小辈派发压岁钱或红包。初一到初三，华人要么到亲友家拜年，要么参与华人社团主办的春节团拜活动。这里的春节没有传统的放鞭炮，不过小孩仍可点点烟花，增加欢乐气氛。
* 中秋时节，韩国举国上下同样休假三天，华人对中秋节的重视程度不如韩国人。一名华人说：“除了中韩通婚家庭外，一般华人家庭最多吃月饼庆祝，但韩国人一定要赶回家团聚，并举行祭祖仪式。”韩国人喜欢在中秋节送礼给亲友，不少华人也入乡随俗，在佳节期间赠送礼品给家人或韩国朋友。
* 坐落于首尔明洞中国大使馆旧址前的馆前街，是早期华人聚居和经商的地方，一度被称为“唐人街”，但现在街上大部分都是韩国人经营的商店，华人店铺已所剩无几，汉城华侨小学、汉城华侨协会以及居善堂文化会是馆前街上最具活力的华侨组织。
* 首尔之外，在仁川的善邻洞，有一条“中华街”。华丽的牌楼上写着“中华街”三个大字，穿过牌楼，映入眼帘的是红彤彤的建筑物、汉字招牌及大红灯笼等华丽的装饰，与寂静的大街形成强烈对比。只有在周末，这里才会显得较热闹。很多韩国人为了品尝中华料理而来，另有不少是随旅行团到来的观光客。这被精心打扮过的中华街，万事俱备，却缺少了最重要的元素——人气。
* 在釜山亦有一条唐人街，因釜山与上海结为姐妹城市，所以政府在釜山开辟了一条“上海街”。“上海街”经过翻修后，韩国政府还特别举行了启用仪式，不过街上只有少数由华人经营的餐馆、杂货店及卡拉OK歌厅，而半数左右的商店几乎都由俄罗斯人经营。看到迎面而来的俄罗斯人比华人还多，不禁让人叹息：这真是一条名不副实的上海街啊！
* 2005年，中韩双方签约，决定在首尔西北的京畿道（Gyeonggi-do）高阳市（Goyang）建造一个新的中国城，首期工程耗资1.2亿美元，在2007年启用。可是在所谓的中国城里，韩国人经营的商店远远超过了华商经营的店铺。
* “要发展成一个真正的中国城，我们必须让那些离开的华人回来，或者带来新的华人。如果没有华人，我们怎么能叫它中国城呢？”这是中国城内一名华商的心声，相信也反映了其他华人的看法。
* 居善堂文化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华人团体。它的前身是华人礼佛拜仙、祈福保平安的寺庙，也是华人举办红白事的地点。1982年，居善堂在原址修建成6层现代大楼，并将原本供奉的神祗迁至五楼，每天都准时开放给华人礼拜。可惜信奉道教的华人日益减少，楼层高又不方便前来烧香，殿堂内总显得寂静冷清。
* 居善堂从早期华人的宗教场所，演变成今天的居善堂文化会，除延续早期供奉神祗的功能之外，还每月出版会刊，定期颁发奖学金给家境清寒的华人学生，以及每年年末举办大型同乐晚会。如今，道教在华人社会日渐没落，居善堂里保存的具有历史价值的神龛、神像、香炉等，显得更加珍贵。
* 在国外的一些韩国城一带，许多韩国料理、超市的经营者，都是韩国华人。华人在韩国与韩国人的关系疏离，但到了海外，彼此却延续着一种微妙亲密的关系。
* 韩国华人对韩国的情感是矛盾复杂的。历史上两国之间的关系、上一代的境遇，都成了华人肩上无形的包袱。曾在仁川华侨学校执教的孙老师说：“也许我们应该想想能如何为这个国家付出，如何去回馈当地社会，不是一味把自己当外人看。”
* 韩国政府目前开始颁发永久居留证给华人，留学韩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也在直线上升，中韩两国贸易日益繁荣，未来华侨社会是否能摆脱之前那抑郁不得志的形象，重新出发，着实叫人期待

 印度

   印度具有极其浓郁的宗教人文气息，这种独特的气息使它蒙上一层谜样的色彩，并且散发出慑人的魅力。此外，印度的美食、手工艺品、庙宇及娱乐业，也都一直引起国外的高度关注。

       近年来，印度的农业和工业都有迅速的发展。只是，几千年的种姓观念依旧根深蒂固，贫富悬殊仍是无法跨越的鸿沟。加上近年来失业率、文盲率高居不下，传染病频频肆虐，这一切，都拖缓了印度前进的脚步。

       华人移居到这个荷花、孔雀和菩提树的国度，已经超过两百年。然而，随着传统行业的没落，华人纷纷移民国外，如今只剩下3千人左右，显得分外渺小、脆弱。

       于是，一种寂寥、落寞之感，笼罩着整个印度华人社会，更弥漫在当地唐人街萧瑟的大街小巷之中。

 1770年，一位名字叫作杨大钊的广东茶商，由于在海上遭遇风浪而迷航，结果鬼使神差地漂到加尔各答（Calcutta）下游的胡格利河畔。杨大钊将错就错，干脆在当地定居下来。

       与时任孟加拉总督华伦·哈斯丁（Warren Hastings）经过几番交涉之后，杨大钊把河畔周围的土地开辟为甘蔗园，再从中国引入数百名劳工到园子来工作。这批中国劳工均有幸获得当时英国殖民政府的承认和保护。

       不久后，杨大钊在印度逝世，其员工继承了他的甘蔗事业，不过业绩却差强人意。最终他们只好把甘蔗园、土地及机器都转卖掉，大伙儿一起移居加尔各答，迎向新生活。

       在当时的加尔各答市中心，也聚集了许多中国水手以及船务工人。船只停泊期间，他们往往必须在印度呆上几个月，而边等边打工，则是最实际的做法。船员们凭着木工和机械维修的手艺，逐渐于当地闯出了名堂。一些华人在获得稳定的工作后，决定终结四海为家的漂泊生活，自此在印度定居下来。

       早期的印度华人，辛勤工作，所赚足资糊口。有不少远在中国的华人风闻在此的境况而蠢蠢欲动，尤其是那些具有特殊技能的华人，便从动荡的中国南来，到这里投靠亲友，展开新人生。

       1930至1940年间，是华人移居到印度的高峰时期，那时华人人口一度高达5万人。主要原因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许多华人携带家眷涌入印度来避难。此外，一些不愿意受日军操控的缅甸华人也移居到这里来。

       印度华人日益增多，而加尔各答也成了华人扎根印度的集中地。据印度独立时的官方记录显示，当时全印度总共有3万名华人，单是加尔各答就已占了三分之一。

       那时，华人大多数都抱着落叶归根的观念，待时机成熟了，就携带家眷重返中国。但是，二战结束之后，国共之间的激烈内战，导致境内满目疮痍，风声鹤唳，华人返乡的心愿于是纷纷落空。然而，华人并没有就此怨天尤人，反而卯足全力打拼事业，决心在印度建立起美好的家园。

       在这里，各籍贯的华人都各有所长，称霸于不同的经济领域，也渐渐形成稳定的传统行业。客家人对皮革加工情有独钟；广府人擅长于机械维修以及木器制作；手艺出色的湖北人就擅长镶牙、纸花制造；人数比较少的上海人则从事洗衣业。

       大多数华人都经营家庭式的小生意。异地创业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华人还不至于如同贫困的当地人般露宿街头。他们大部分都有自己的房子，生活简单而安定，孩子们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在这一个贫富悬殊的国度里，华人可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之战，两国原本的友好关系顿时生变，并且导致一连串的排华事件，使华人深受折磨。不但商店屡遭查封，数以千计的华人还被送进了集中营，在那拥挤而脏乱的营房中，健康、自由和意志几乎都被磨灭殆尽。

在排华期间，有两百名左右华人被驱逐出境，其中包括中文教育工作者。最终，约有五分之二的华人含泪离开此地。

       至于那些自愿，或者由于个人因素而留下的华人，至今仍然在印度过着平静的生活。时移境迁，中印两国之间的关系逐渐和缓，双边贸易也开始增长。然而，在许多长辈的心底，排华事变的阴影还是挥之不去，偶尔夜半扪心暗思量，结疤的伤口仍然在隐隐作痛，每每忆起这段往事总会令人黯然神伤。

* 后人为了纪念杨大钊，把他所开发的胡格利河畔平原命名为阿钊坡，并立下墓碑和土地公祠
* *加尔各答Cheenapara的唐人街附近，有一条中山街，以及一条鲁迅街，这两个街名均沿用至今。近年来，印华文化发展协会积极向政府争取在唐人街设立路标以及牌楼、打造美食街、兴建文化馆等等，为未来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 *穿梭于加尔各答大街小巷的三轮车以及黄包车，最初都是由华人传入的，如今，已经成了印度最廉价、最传统的一种交通工具。*
* 区区3千名华人，在印度犹如沧海一粟。
*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后，印度华人在经济、生活上遭受沉重打击，移民热潮开始在华社延烧。短短数十年间，华人人口大量流失，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成员在海外生活。“希望下一代能拥有更好的将来”，往往是华人选择离开的原因。
* 祖辈们最早落脚的加尔各答，至今仍是华人最密集的地区；塔坝中国城，更是客家人稳守多年的堡垒。至于孟买（Bombay）、新德里等城市，只有少数华人定居。
* 客家人乃是印度华社最大的群体，其次是广府人。华人们大多跳不出传统经济的框框，恪守着多年形成的传统行业，各自谋生。
* 近几年，由于传统行业的发展出现瓶颈，华人开始尝试开拓新兴领域。餐饮、时尚、美容业纷纷崛起，犹如一股新气息，注入疲态毕露的华社。
* 年轻一代的华人，终于摆脱了挥汗卖力的生涯，一般拥有高中以上的学历，成为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 华人坦承，自身在印度的发展空间太有限了。年长的一辈曾经沧海，对生活早已无所奢求，情愿终老印度，留守着一辈子建立起来的事业和家园。然而，长辈们都会鼓励朝气勃勃的年轻一代，勇敢走出印度，到外头更辽阔的世界龙腾虎跃一番。
* 印度华人曾以皮革业闻名全世界，而印度最大的华人皮革中心，就坐落在加尔各答市的东向边缘，一个叫塔坝的地方。
* 19世纪初，一名熊姓商人开始在此设厂。从此，一代代广东梅县客家人，在这十多平方公里的沼泽地上，创建了第一代皮革王国。
* 今天，在塔坝社区入口处，立起一个以中文、英文、印地文和孟加拉文写着“塔坝中国城”（Tangra China Town）的路标。高高的城墙，将塔坝中国城与四周的贫民窟相隔开。然而，城墙外的破旧、脏乱，却一路延伸到城里。
* 那狭窄而长年失修的街道上，汽车、牛车、摩托车、自行车一路颠簸，行驶途中，还忙着闪避坑洞和积水，险象环生。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恶臭味，被皮革厂化学染料渍成浅蓝色的沟渠水，缓缓地流动。
* 灰色的围墙，搭配红、蓝色的大铁闸，是皮革厂数十年来不变的形象，也是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皮革厂是塔坝客家人挣钱的地方，而房子通常与皮革厂毗邻而建，仿若他们的命运，始终与皮革业浑然相连，紧密难分。
* 种姓观念强烈的印度，对皮革业成见很深，普遍认为最低贱的人才会去从事这种肮脏、低贱的工作，但华人始终用心经营这被当地社会唾弃的行业。华人皮革厂一般属于家庭式经营，多由男性参与其事。它不仅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当地华人，也为无数印度贫民提供了工作机会。
* 1980年代是皮革业的全盛时期，塔坝共有超过230多家的皮革厂，生产量占全国的五分之一。然而，基于皮革业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大理院法庭于1995年4月谕令塔坝皮革厂一律迁往新工业园，而皮厂所占之土地将不获赔偿。正当彷徨无助之际，加城华人联合会于同年7月成立，代表全体皮革厂业主，向政府提出上诉。最终，土地归业主所有，惟往后不得经营污染环境的行业。
* 对大规模的皮革厂而言，迁厂所需的费用虽不成问题，但对于新环境的设备及未知的将来，始终心存疑虑。小皮革厂则因为资金短缺，陷入了动弹不得的窘境。幸亏西孟省政府对迁厂之事抓得不紧，皮革厂主才得以苟延残喘，有的仍悄悄运作，直到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另一些皮革业主，早已万念俱灰，将生意结束或转让，举家移民到国外。
* 如今，皮革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连印度穆斯林也开始在制革领域大展拳脚。跟华人相比，他们资金更雄厚、技术更先进，可谓来势汹汹。
* 于是，55家迁到新工业园的华人皮革商，联合成立了“环保制革商会”，旨在捍卫华人皮厂的权利，向政府争取更多的福利和援助。此外，他们希望能与中资企业合作，因为无论资金或技术方面，中资企业都能给予印度华人很大的支持与协助。
* 然而，皮革业主们认为，这一行的前景仍不明朗，“印度政府非常善变，很多政策都不明确。除了等，我们也不能再多做些什么了。”言毕，犹疑与无奈交织在他们的脸上。
* 塔坝中国城是全印度华人最集中的地区。在这座快被世人遗忘的客家村里，华人在熙攘的人潮中，用高墙筑起了自家的文化堡垒。
* 高墙外，世界天天在变；高墙内，客家人过着怡然自得的淳朴生活。
* 华人将皮革厂的大铁闸，漆上象征吉祥的大红色，门口还有大红灯笼高高挂、大红对联两旁贴，那艳丽的姿态，与灰蒙蒙的街景形成强烈对照。
* 华人的皮革厂或住家，一般灯光昏暗，只有祖先灵位、神龛上的电蜡烛，不分昼夜地闪着小红光。大部分家庭都还保留着供奉祖先的习俗。除了早晚上香外，华人在春节、清明节等传统佳节，也不忘杀鸡宰鸭，敬祭先人。
* 塔坝中国城也许不能跟世界各地派头更大的其他唐人街相比，但它那淳厚、道地的客家文化，总是散发迷人的魅力。在客家家庭，从长辈到幼童，一般都能操一口纯正的梅县客家话。尽管抗拒不了印度咖喱的香气，但一日三餐，仍以正宗的客家菜为主。
* 自从卫星电视、网际网络进驻小城后，年长的华人终于找回了听中文歌曲、看中文戏剧的记忆。“不过我们的子女，就比较喜欢印度和西方的流行文化！”他们不得不承认，高墙挡不住那无孔不入的主流文化。
*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华人外移，中国城内盛景远逊当年，但凝聚力丝毫未减。每逢婚丧喜庆，更是邻里互助，全城参与。“每年回来除了拜年，还忙着喝喜酒呢！”一名移民加拿大的华人兴致勃勃地说。
* 长年散居各地的亲友，难得在春节千里团圆，新人们便趁着花好月圆、亲朋戚友济济一堂之际，共结连理，大宴宾客。如今，印度的春节，已成为华人的结婚旺季。
* 此外，春节也是华人相亲的好日子。移居国外的华人，新春返乡过年，也顺道物色佳人快婿。“我们希望另一半也是同乡，那么生活及文化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隔阂。”华人笃定地说。
* 在塔坝，许多华人仍旧将终身大事交由父母决定。相亲与自由恋爱结合的比例，大概是6比4。“我们这些50多岁的，多数通过相亲而结合，家庭也都很美满呀！”言罢，客家阿叔神采飞扬。
* 皮革业衰退之后，塔坝城渐渐岑寂了下来。塔坝位于加尔各答的黄金地带，若发展起来，必定是块福地。印度政府也曾在报上大事宣扬，要将塔坝打造成崭新的中国城，然而，华人对这套说辞，只是姑妄听之：“政府只是提出建议，资金和策划等一切事务，都要靠华人自行解决。”
* 面对印度政府的善变、高深莫测，塔坝华人摇摇头说：“这是一个梦，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 近几年来，人们对塔坝的印象已不仅止于皮革厂。更多时候，他们想到的是菜香扑鼻，令人食指大动的中餐。
* 中餐馆的崛起，与皮革厂的没落息息相关。许多没有能力迁厂，却又不想移民的旧皮革厂业主，干脆把心一横，将皮革厂改建为中餐馆。
* 目前，塔坝区的中餐馆至少有50家之多，高低档次都有。塔坝摇身一变而为美食天堂。每逢周末，城内车水马龙，名流使节纷至沓来。
* 大半辈子在皮革厂挥汗操持的华人，如今纷纷手握锅铲，凭着对印度人的了解，新创出美味别致的“印度中餐”。菜单中最热门的几道菜，不外是炒饭、炒面、酸辣汤、辣椒鸡和炸虾。“这当然不是正宗的中餐啦！印度人口味很重，因此我们的菜肴以香辣为主调。”
* 塔坝城内，倒也还能找到几家数十年历史的正宗客家餐馆。顾客主要是客家人，他们说：“传统的客家菜，让我们吃出家乡的味道！”
* 中餐馆唤醒了印度食客的味蕾，华人美容院，更俘虏了印度美娇娘的心。
* 走在印度的大街小巷，会发现许多店铺的招牌上标志着“Beauty Parlour”，而有些美容院更挂上中文招牌，如王后、月宫、兰花等。
* 华人妇女说：“印度女人比我们更爱美。我们通常在家里动手修眉护肤，印度妇女却舍得花钱，请别人将她们打扮得漂漂亮亮。”
* 华人美容院在印度有着悠长的历史。远在英国殖民时代，它主要为英国人及华人服务，今天的主要客户则是印度女性。关注仪表的印度女性，一般从十二三岁起，便到美容院进行手部、足部除毛。此外，华人美容院提供的美发及美白服务，也大获她们的青睐。
* 当世界各地的美容院都靠采用先进仪器来吸引顾客的当儿，印度华人美容师只需一条细长白线，就能替顾客修眉、除毛、美肤。这种称为“挽脸”的传统技艺在中国大陆已渐渐失传，在印度却流传、盛行至今。
* 皮革业衰退之前，许多在美容护理方面有一技之长的华人太太，都留在家中相夫教子。然而，随着皮革业发展逐渐走下坡，不少华人美容师毅然重操故业，帮助丈夫分担经济上的压力。
* 近年来，印度人也开设了不少美容院，一般装潢高雅，收费昂贵，主要为上流社会服务。华人美容师说：“我们的收费更加合理，平民都能负担，加上采用传统的美容技术及天然护肤品，还是大受当地社会欢迎。”
* 在传统皮革、制鞋业日薄西山的今天，中餐馆和美容院，已成为印度华人经济的新宠。他们迫切希望能从中看到振兴的曙光，重拾华人当年的风采，再现昔日辉煌。
* 华人经济不振，使中华文化的传承更加艰难。这几年，印度华人社会日渐岑寂、清冷，年轻人一批批如燕雀离巢，远走高飞，新生儿的出生率也偏低。
* 曾几何时，那些盛满华人子弟欢快童年回忆的中文学校，不是一家接一家地关闭，就是体制轮替，今非昔比。
* 印度第一所中文学校——建国学校，如今虽仍归华人所有，但已改用英文教学。学生以印裔穆斯林孩子为主，一张华人脸孔也没有。此外，华人创办的圣心学校，也改由基督教会管理，以英文教学，同样以印裔学生为主。另外，由客家人创办的梅光学校，已于1989年关闭，校舍一直空置到现在。
* 坐落在塔坝城里的培梅学校，是现今全印度硕果仅存的中文学校。它由客家梅县人创办，取 “培梅” 之名，意在 “培育客家梅县子弟”。
* 学校的全盛时期，是在中印战争爆发之前。校友们回忆，当时的培梅设有小学、中学部，学生人数高达数千，每个年级三个班。楼高三层的校舍，每间课室挤满了学生！
* 此刻，崭新的校舍，犹如失去了玻璃鞋的灰姑娘，弥漫着人去楼空的苍凉。偌大的校园，再难听见朗朗的读书声，以及成群孩子的嬉闹声。校园里，只剩下幼儿园和小学部，学生寥寥50人左右，加上校长，华人老师总共只有3名。
* 由于学生人数有限，两个年级的学生因此凑在一起上课，却仍无法将所有座位填满，场面稀落。华人说：“只有塔坝华人在校园举行春节联欢会等活动时，校园才恢复勃勃的生气。”
* 一名华人父亲感慨道：“我们没有忘本，只是必须考虑到孩子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如今培梅只剩小学部，毕业后我们就要四处奔波为他们申请中学。印度人口那么多，样样都得抢，孩子们若想升上优秀的英文中学，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小让他们报读英校。”
* 如今，90%以上的华人子弟，都在英校或教会学校接受教育。中文一般可作为第二语言供选修。为了应付考试，孩子们大多会报名中文补习班。培梅学校每天下午，也会为孩子补习中文，离校较远的孩子，则参加假期期间特设的补习班，平日多半自修，整体水平有待加强。
* 近几年，中印的双边贸易蒸蒸日上，中文的价值在印度提升了许多，许多印度华人开始重视中文，就连印度政府，也让一些驻守中印边界的印度军官学好中文。
* 此外，印华文化发展协会，也为印度政府策划、推动军官的中文速成班，将其中的盈利，用作推广华人学习中文的资金。如今，协会在圣心学校开办中文会话班，收费廉宜，任何年龄层的华人学生，都欢迎前来上课，学好中文。
* 整体而言，汉语热潮目前仍处于逐渐升温的阶段，还未完全在印度蔓延开来。但当地华人深信，随着中国的腾飞，中文教育及中华文化在印度发扬光大的那一天，应该不会太远。

       在印度，年轻一代的华人主要用英语沟通，大概五六十岁以上的华人，才有读、写中文的能力。硕果仅存的中文报纸《印度商报》，是这群华人的集体记忆、精神寄托。

       《印度商报》于1969年3月问世，每日4版。几十年来，物价翻腾了几倍，但这份报纸的售价，仍然维持在2.5卢比。

       《印度商报》一度是全世界仅存手抄的中文报。耐心的编辑仔细抄写，再付油印，手抄一版耗时4小时。直到2005年4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访问加尔各答时，送了一台电脑给报社，才结束了“手抄”历史，迈入电脑排版的时代。《印度商报》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报馆里只有编辑，没有记者。编辑杨小红笑道：“加尔各答的每一名华人，都是我们的记者。”华人圈中无论发生任何大小事情，例如婚丧喜庆等，人们都会主动将“新闻”送到编辑室。有了电脑和网络后，《印度商报》还能转载新华网的新闻，内容更加丰富、充实。

       然而，报上刊登最多的，依然是华人的婚丧广告。春节前后是报馆收入最丰的时候，华人结婚广告特多。此外，华人也喜欢在报章上刊登春节贺词，让各方共享温煦的祝福。

       《印度商报》目前共有三名编辑、两名派报员。前主编逝世前，曾说：“印度华人需要一份中文报，让大家了解外头发生了什么事。”持着这个单纯而坚定的理念，《印度商报》在这片中华文化沙漠上，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

       如今，除了春节大年初一至初五例常休假日之外，每天早上8点左右，《印度商报》总是风雨不改地送达订户们的家。1970年代，每月的发行量曾达五百多份，如今只剩下两百份左右。华人不断移居国外，读者人数逐年下降，加上办报主力日渐老去，这份报纸，究竟还能维持多久？

* *印度的华人若在春节前不久逝世，丧礼通常就会选择在春节期间举行，好让回来过节的亲友们送往生者最后一程。因此，往生者的遗体将在太平间冷冻一段时间，出殡当日才运到灵堂入棺。*
* 早期抵达印度的华人，一般都是在加尔各答的中心地带落脚的。当时在这里聚居的华人当中，人数最多的是广府人，其次为客家人，及少数的湖北人和上海人。他们在这里安家，也逐渐构筑了印度的第一个唐人街。作为传统华人社会的缩影，唐人街也是窥探华人生活的一扇窗口。
* 自1940至1962年间，是唐人街的全盛时期。华人店铺星罗棋布，中餐馆更是耀目的主角。华人说：“那时最有名的是南京饭店。二战期间，不少中国的将军都来这里吃饭，华人、印人名流，也均是座上常客。”
* 华人所从事的行业十分多元，包括裁缝、洗衣妇、医生、理发师、鞋匠及木匠等。在唐人街上，华人的烧肉店、药材店、古董店、金店、杂货店等更是应有尽有。
* 唐人街的会馆也很多，有些甚至还办起了华文学校，如南顺会馆内的建国学校、忠义堂所创办的梅光学校等，皆是华人求取知识的地方。至于华人庙宇，主要是供奉关帝和观音。
* 从清晨到午夜，唐人街总是熙熙攘攘的。天刚露出鱼肚白，菜市场早已人头攒动，叫卖声不绝于耳。菜市场是华人最佳的情感联络站、资讯流通站。若想探听最新的八卦，或派发结婚请柬，到这里准没错。每天晚上，小食挡摆售各类华人最爱的小吃，简直就是夜宵的天堂。
* 活力充沛的华人，把唐人街打造成一个繁华地带，不过也同时带来了帮派、赌博及鸦片。当夜色降临，三教九流之士，纷纷涌向烟馆或赌场。据说，当时四个男人中就有一个染上鸦片瘾，而那些在牌桌上倾家荡产的华人更是难以计数。
* 不论是繁华之地还是罪恶之乡，这一切，均被1962年中印交恶的滚滚狂潮席卷而去，唐人街也就从此步向没落。
* 华人纷纷移居海外，唐人街因而人去楼空。今时今日，遗留下来的中式建筑都已经残旧斑驳，就连充满中国味儿的黄包车也都破烂不堪，无精打采地瑟缩在角落，静候瘦弱的印度新主人前来拖曳。
* 华人的身影，早已淹没于密密麻麻的印度人潮当中。
* 而今，唐人街仅住着极少数的华人。早晨是此处最热闹的时段，华人与印度人都会前来“饮茶”吃早点。老华人叹道：“只有在那几个小时里，我才能感觉唐人街再次复活了。”
* 印度华人最重视的节庆，非春节莫属。一千多人的塔坝华人社区，春节期间，可以飙升到一万余人。移民美、加等国的华人像候鸟一样，春节一到，都从四面八方飞返印度老巢。他们深情地说：“回到塔坝，才有过年的感觉。”
* 年三十大清早，家家户户都忙于祭祖的活动。杀鸡宰鸭、焚烧红黑色的天地衣帽，客家人的习俗历历在目。塔坝青年会，在除夕夜还出动醒狮团，敲锣打鼓，挨家挨户去拜年。
* 新春正式降临，塔坝更展现出惊人的活力。大年初三、初四，培梅学校在校园里举办春节联欢晚会。
* 另一个重头好戏，就落在春节一周后的礼拜天。不同籍贯、地域的华人，都会到阿钊坡拜祭开路先驱——杨大钊。那里有一座超过百年历史的土地公祠，人潮汹涌，香火不断。
* “这里的签很灵，过年时若求得上上签，一整年都会顺利如意。” 华人一脸虔诚地透露。
* 中午时分，醒狮队会在土地公祠的空地上助兴，鼓声喧天，引来众多印度人围观。华人家庭则在临时搭建的帐篷下，全家席地而坐，吃起午餐来，活像一家大小在野餐，别有一番风味。
* 印度，从未赐予华人富裕的生活，却奇迹般地在他们的心灵镌刻下难以磨灭的印痕。在这肤色、文化及价值观皆大异其趣的国度中，不少华人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甚而萌生停靠下来的念头。
* 移民他国或许是年轻华人总是牵肠挂肚的心事，至于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中年华人，则并不十分向往外面的花花世界。他们说：“其实我们并不期待离开，在印度挣钱虽不容易，但渐渐适应下来，也得以轻松度日。”这些年过半百的华人，早已习惯了印度朴素、淡然的悠悠生涯。
* 很多远走高飞的华人，心却徘徊在印度老家，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没断过。然而，为了下一代美好的生活，选择离开的人越来越多。有人感慨：“照这样走下去，印度华人消失，是早晚的事。”
* 在南亚与西亚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横亘着一片片沙漠、山地和高原。这些地区潜藏着全球最丰富的石油，不过这里的大部分国家，却陷入延绵不断的战争，遍地硝烟，导致它们仍处于落后与贫困的窘境。这地区散居着数量不多的华人，他们占全球华人总额不足1%。与其他地区不同，这里的华人除了汉族以外，还参杂了维吾尔族及回族等少数民族。大多数华人从商，但也仅能糊口于四方，绝少大富大贵者。在某些国家里华人受到歧视与排斥，于是出现了再移民欧美国家的现象。
* 本篇章将论述南亚、西亚、中亚诸国华人简史及现状。南亚包括巴基斯坦（Pakistan）、孟加拉（Bangladesh）、斯里兰卡（Sri Lanka）及马尔代夫（Maldives）；西亚包括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巴林（Bahrain）、伊拉克（Iran）、以色列（Israel）及阿富汗（Afghanistan）；中亚包括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土库曼斯坦（Turkmenistan）及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
* 巴基斯坦的全名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位于南亚次大陆的东北部，东接印度，东北与中国比邻，西北与阿富汗相交界，西傍伊朗，是仅次于印度的南亚第二大国。
* 基斯坦是个多元民族、宗教复杂的国家，独立后不久，全国即陷入政治动荡的局面，政府更迭频繁。在长时期里，巴基斯坦有过好几次军人政变，实行军法统治，甚至发生政治暗杀的悲剧。国家的长期动乱，自然影响到经济的稳健发展。
* 农业在巴基斯坦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主要农产品有小麦、稻米、花生、棉花与茶叶；工业基础薄弱，拥有一些小规模的工业生产，其中以纺织业较大宗，其他还有制糖、烟卷、电力、水泥及化肥等工业。
* 巴国近年来对于引入外资不遗余力，但碍于基础设施如通讯、交通、电力供应的不足，成效不大。不过，由于这里具有廉价而充足的劳动力，可生产丰富的棉花、棉纱及皮革；再加上巴国产品输往欧盟及美国，均享有优惠关税，所以仍然吸引了少数港台及东南亚的商人前往投资。
* 1999年，巴基斯坦便已有华裔约4000人，其中汉族约占80%。另外的族群是维吾尔人与哈萨克人，约占15%；其他的则是藏族等少数民族。巴国华人多是早年从印度迁徙过来的，尤其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后，印度华人受到排斥而不得不离境。年轻一辈多移民加拿大与美国，年纪比较大的，一部分返回中国，另一些则流落到巴基斯坦。此外，也有少数华人来自东南亚以及港台。
* 与印度华人一样，早期巴国华人多数原籍广东梅县、湖北天门和山东，鼎盛时期数达两万人。由于早期华人在巴基斯坦的前景不太乐观，所以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们便陆续再迁居到其他国家。有的全家迁徙，有的则送子女到加拿大与美国念书，完成学业后就此定居下来。
* 然而，有人离境，也有新移民入境。80年代以后，来自江浙一带的新移民来到这里，人数众多。加上近年来大批到此工作的中资公司员工，如今巴国华人人口已达8万人之多。华人多聚集在首都伊斯兰堡（Islamabad）、拉合尔（Lahore）、卡拉奇（Karachi）等城市。
* 至于维吾尔人与哈萨克人，原是新疆的主要族群，19世纪下半叶之际，在俄国沙皇的挑唆下，聚众背叛清朝，清朝派左宗棠率大军前往镇压，击败叛军，追剿余党，逼得他们向西逃亡，跨越边界，有些逃到中亚，有些流落到印巴，在这些地区安家落户，一代代繁衍下去，直到今天。这些新疆人的后裔，大抵靠做些小买卖，或是出卖劳力为生。另有一些人还是过着畜牧生活。
* 巴国华人的经济活动，可说是印度华人职业的延伸。华人多经营制革、制鞋、牙医、餐馆、服装、成衣与杂货等业。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则以经营畜牧及贩卖日用品居多，港台及东南亚华商投资的行业，则有制鞋机械、医药用品、加工业等，兹分述如下：
* 1. 制革业：华人经营的制革厂有30多家。大、中、小型各占三分之一。巴国华人的制革业是印度客家人传统职业的延伸。1962年，在印度从事制革业的华人搬迁到巴国来时，眼见巴国盛产牛皮及羊皮，不乏制革业的原料，所以他们就干起了老本行。他们的工厂多设于卡拉奇近郊，现已辟建为加工出口区，供专业加工制造皮革，产品行销欧、亚两洲各地。
* 2. 制鞋业：华人经营的制鞋厂约有50余家，其制鞋技术均传自印度，以手工缝制。近年来当地鞋匠也采用来自台湾的塑胶皮产品，推出市场，价廉物美，颇为畅销。华人工厂散布于卡拉奇、拉合尔、白沙瓦（Peshawar）及金塔等城市地区。
* 3. 餐馆业：华人的餐馆多分布在伊斯兰堡及卡拉奇，有粤式与北方式的菜肴。正宗的粤菜选材广泛，烹饪技术多样，为中国名菜系之一。但当地的中餐馆，为迎合食客口味，已变质为杂粹及炒面炒米粉之类。而北方式的菜肴，要以鲁菜为代表。南北式的菜肴各有特色，都能适合不同顾客的口味。
* 4. 纺织业：巴国盛产棉花，纺织业发达，也有港台华商投资生产成衣的。华人经营成衣的有十余家，分设于各大城市。
* 此外华人开设小商店，贩卖食品与用品，还有流动商贩、木匠及工匠，赚取不多，仅够糊口。
* 斯里兰卡位于印度东南隅，西部隔着保克海峡（Palk Strait）和马纳尔湾（Gulf of Mannar）与印度遥遥相对，是南亚次大陆南端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位居海上交通要冲，是印度洋的航运中心。
* 斯里兰卡旧称锡兰，1815年沦为英殖民地，经过长期斗争，终于1948年2月4日取得独立，1972年宣布成立斯里兰卡共和国。
* 农业是斯国的主要经济支柱，农业人口达全国就业人口的40%，农产品主要有稻米、椰子、甘蔗、橡胶及茶叶等，斯国原是最大的茶叶出口国，但由于国内长年陷于内战，大大影响农业的生产。工业以农产品加工为主，有制糖、榨油、橡胶轮胎、制革和造纸等工业。近年来积极引进外资，增辟工业区，开拓外国市场。
* 华人足履斯国，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那时斯国还是荷兰殖民地，1740年，爪哇巴城发生了华人抗拒荷兰政府的压迫而揭竿起义的事件，也就是所谓“红溪惨案”，事后有一批华人“罪犯”，被强行押送到斯里兰卡来服苦役，服刑期满的华人可能有部分滞留下来。又据1911年的人口普查，引述在1816年，约有80至100名华人抵达锡兰，嗣后在各地安顿下来。他们并不像其他地方的华人勤俭刻苦，却沉溺于烟馆，爱好斗鸡。他们中也有与当地妇女通婚的。直至1911年的近百年间，华人人口并没有显著增加。
* 30年代初期，来自山东的一批商贩，带来了丝绸与刺绣品等物品，沿街兜售；也有人到乡间去，和乡民交换农产品及宝石，最终有一部分人定居下来；同一时期，来自湖北、广东、江浙的手工艺者及农民，也流落到这里谋生，后因战争爆发，无法归国，于是只好留居下来。
* 除了20世纪30年代曾有过一阵华人移民浪潮外，华人人口的增长，就只靠自然生殖。直至1948年斯国独立时，也只不过350人。到了1982年，华人激增至3000人，这可能是由于7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移民涌入所致。
* 据1999年《华侨经济年鉴》的统计，斯国华人共约4000人，目前则有5000人左右。他们散居在首都科伦坡（Colombo）及第二大城市坎迪（Kandy）。斯国对居留的华人规定甚严，华人如欲取得公民权，需父母都得在本地出生，才能获得批准，因此近年来华裔青年陆续移居美加等国，华人的流动性颇大。为了吸引外来投资，政府近年来逐渐放宽居留权条例，可是成效不大。
* 华人经济活动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商业、制鞋业与服务业等，兹分述如下：
* 1. 餐馆业：中餐馆约有20余家，散处于科伦坡及坎迪。其中较具规模及历史较久者有：北平饭店、乐宫饭店、新新饭店、馥莲店及中华咖啡馆等等。
* 2. 制鞋业：为梅县客家人传统行业，多分设于科伦坡及康地两大城市，总共约十余家。
* 3. 牙医业：多为湖北天门人所经营，医所有4家，开设于科伦坡市内，执业者都有较高学历及专业资格。
* 4. 贸易及杂货业：多为山东籍华人经营，零售与批发货品多是“中国制造”，包括服装、雨衣、鞋袜、塑胶制品、电器、电子零件及医护器材等。
* 5. 绸布业：绸布庄多为山东与江浙籍人经营，约有十余家，多开设于科伦坡市内。其业务为经售丝绸及布匹，亦兼售日用品及手工艺品，均从中国大陆进口。
* 6. 旅游业：华人投资经营的旅馆有两家，均开设于科伦坡，一家属馥莲饭店兼营的旅馆，另一家为国际观光旅馆。
* 7. 制造业：在斯国有十家台商设厂，从事生产螺丝、螺帽、手工具、成衣、毛织衣、电话机及鱼网等。
* 近年来，中国与斯里兰卡改善了邦交关系，促进了两国政治、外交、经济与文化交流。中国不但给予斯国无息贷款，更派遣技术专家与建筑工人，为斯国承建巨大工程，如兴建班达拉奈克纪念国际会议大厅（BMICH）、最高法院大厦、中央电讯交换中心及医院等。
* 孟加拉东、西、北三面与印度接壤，东南与缅甸交界，南濒临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19世纪下半叶成为英属的一省。1947年印巴分治，巴基斯坦分为东西两部分。1971年3月东巴宣布独立，1972年1月正式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孟加拉是世界上最穷困的国家之一，人口密度更为世界之冠。
* 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人口占全国总就业人口之半。主要农产品有稻米、小麦、黄麻、甘蔗、橡胶与椰子。黄麻产量居世界第二，多供外销。孟国南临辽阔的海域，渔产资源丰富，但由于捕鱼设备落后，运输交通不足，使其渔获量及商业价值欠佳。孟国的工业并不发达，以黄麻加工业及纺织业为主。近年来政府积极吸引外资，在外资的挹注下，吉大港（Chittagong）已有电子、五金、自行车等厂进行生产。
* 孟国的华人人口不多，大部分为早年从印度移居过来。据资料显示，1971年有华人约500人，20年后（1992年）也不过700人，可见这期间几乎没有华人移民入境，人口增加主要靠自然生育。华人祖籍多为广东梅县，少数为湖北、山东。过后大陆新移民涌入，人口才增加至1000人左右。华人多聚居在达卡（Daka）与吉大港两大城市。
* 孟国华人的职业多与印度、巴基斯坦的雷同，经营的大都是传统的行业，包括制鞋厂、中餐馆、牙医、零售店等。
* 近年来，孟国的政局较为安定，经济也纳上正轨，政府积极推出各种优惠措施，以吸引外资来发展工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少港台及中国大陆的商人，挟资前来投资，有的开工厂，有的做贸易，有经营中餐馆及旅馆也有兼营多种企业的。投资设厂的华商，以经营成衣厂、印染厂及制鞋厂较多。
*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孟国的成衣出口逐年增加。现有成衣厂4000多家，成衣出口额居世界第四位。随着成衣业的扩展，印染布料的工厂应运而生。成衣厂所用的布料，一般都是从外国进口坯布，然后按照服装设计所需的颜色到印染公司印染布料。台商到孟国投资设厂的有花旗国际鞋业公司，投资总额约370万美元，专营欧洲市场的鞋业订单，为新兴事业中较具规模者。另有少数人从事农业与畜牧业。
* 中国的建筑公司也到这里发展，并承建了横跨首都达卡河流上的中孟友谊大桥，及一些较高尚的住房。在达卡市还有一座中国无偿援建的孟中友谊会议中心，规模庞大，于2002年竣工。
* 马尔代夫位于印度半岛西南隅，是印度洋上的群岛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岛国，它由1190个珊瑚岛组成，其中只有200个岛屿有人居住。1887年沦为英国殖民地，1965年独立，1968年11月11日成立共和国。
* 马国小国寡民，土地面积狭小，农业生产不足国内的需求，天然资源贫乏，渔产资源虽然丰富，但碍于捕捞技术与设备落后，运输和加工业不足，所以独立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百废待兴。
* 独立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大力改善港口、电力、通讯等基础建设，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极力发展旅游业与渔业目。前旅游、进口贸易、建筑和运输，已成为马国的四大经济领域，其生产总值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60%，2002年的年均收入达到2090美元，是南亚地区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
* 马国的旅游业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尤其是促进了建筑业、运输业与银行业的增长。马国的华人很少，据资料1999年只有约100人，如今可能略有增加。他们多从事与旅游相关的行业，如开设商店，贩卖迎合游客的商品；经营中餐馆、旅行社与旅馆。
* 马国自1965年独立后，即与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中国也给予马国无偿的经济援助。从1985年起，中国公司开始进入马国工程承包市场，为马国承建巨大建筑工程及公寓，两国的贸易额也逐年增长。
* 沙特阿拉伯是西亚最大的王国，占阿拉伯半岛面积的五分之四。西濒红海、东临波斯湾，周围接壤的国家有：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卡达尔、阿联酋、阿曼及也门。19世纪英国侵入，1924年统一，1932年建立了沙特阿拉伯王国，以迄于今。
* 沙特实行自由经济政策，石油工业是国家的经济支柱，巨额的石油收入使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政府充分利用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建立外向型企业，逐步改变过度依赖石油的单一经济结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经济多元化政策，同时发展工农业。政府鼓励自由经济和自由竞争，支持私人及合资企业。这一来，也促进了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通讯业及旅游业的发展。
* 沙特居民以阿拉伯人为主，其他种族约占30%，包括一部分华人（这里“华人”包括汉人及中国少数民族）。据《华侨经济年鉴》的统计，1999年这地区的华人约有2万7000余人，其中有两万人聚居在西部，以新疆的维吾尔族最多，占百分之90%，其次是回族约1000余人，他们来自甘肃、宁夏及青海等省，还有藏族400余人，汉人有1000多人。根据当地华人提供的资料显示，如今沙特华人已达4万人。
* 华人多聚居在西部，如塔伊夫（At Taif）、麦地那（Al Madinah）、吉达（Jeddah）及麦加（Makkah）。此外，首都利雅得（Riyadh）、延布（Yenbo）、达兰（Dhahran）等地也有华人。维、回族人95%已入籍，改革开放后入境的中国新移民则仍持中国护照。
* 汉族人数虽较少，但在各经济领域较活跃，经济地位较高。汉人经营的多是传统行业，包括杂货业、百货业、饮食业、贸易出入口业、运输业及建筑业等等。吉达有一家大型中国商业城，多是由汉人经营的商店，售卖各色各样的中国小商品，琳琅满目，价格廉宜。家电、服装、玩具、食品、皮革制品、钟表、瓷器以及机电、汽车和重工业机械设备等中国商品在沙特随处可见。那里的华商生活都过得不错。少数台商投资经营的企业，如台湾荣民营建公司、德仁建设公司等，资金雄厚，规模宏大。较大型的中餐馆，有台商的来来餐厅及新加坡人的中国餐厅。除此之外，其他大都是小本经营。台商也有投资设厂的，生产食品加工及肥料。
* 沙特阿拉伯约有12家中资企业，包括建筑工程、石油管理、远洋运输及通讯网络等，其中规模较大、资金较雄厚及员工（技术专家及普通工人）较多的，要算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江苏第一建筑安装有限公司。2009年中国土木工程公司标得承建利雅得一卡西姆铁路连线的部分工程，营业额高达7.2亿美金。江苏建筑公司也承包库巴市区的阿拉锡德大厦，工程浩大，营业额达5.25亿美元。华为公司也被选中，负责沙特阿拉伯领域内的网络运营，网络优化和备件管理等业务。
* 至于维吾尔族与回族之迁徙沙特，源远流长，早在19世纪下半叶，清朝的左宗棠率领大军前往新疆镇压维、回族的叛乱，叛军被迫向西逃亡，几经辗转，最终流落到沙特定居下来。另一次大规模移民，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军阀盛世才大事屠戮维吾尔族，使他们不得不越境逃亡，最终在沙特安家落户。现居沙特的新疆人，都是当年逃亡者的后裔。经过了好几代的繁衍，物换星移，他们早已融入主流社会，入籍成为沙特王国的公民，对他们来说，故国新疆是那么遥不可及，他们早已遗忘了。今天在沙特的维吾尔族人，有些从事跨国性的商贸活动，有些经营杂货店生意，有些做烤饼（特米斯）及抓饭买卖，有些当劳工，有些做回老本行，从事畜牧业。
* 伊拉克位于亚洲东南部，阿拉伯半岛东北部。北接土耳其，东邻伊朗，西界叙利亚、约旦，南傍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东南濒临波斯湾。伊拉克的两河流域，曾创造了古代巴比伦的灿烂文化。1920年它获得完全独立，1958年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国。可是立国以来，伊国却长期陷于战乱，先是爆发了8年的两伊战争（1980-1988年）。1990年，伊国又入侵科威特，翌年引爆了海湾战争，伊拉克大败。2003年3月，美国又借口伊国储存巨大杀伤力的核武，向伊国动武。经过多年战火的蹂躏，加上联合国的禁运与制裁，制造业器材、原料、组配件难以入口，石油等产品不能外销，国家元气大伤。
* 据台湾《华侨经济年鉴》的统计，1999年，这地区的华人人口约有1000人。由于长期战乱，所以很少有华人移民入境。相反地，因逃避战乱而离境的华人日多。如今，在巴格达（Baghdad）危城的中国人已经很少了，而相对比较安全的伊拉克北方的库尔德自治区（Iraqi Kurdistan），却有数百名中国人。
* 在2003年伊拉克发生大规模战争之前，伊国的华人多从商，有的开设商店，贩卖中国的日用品，大到发电机组、铁路机车，小到针头线脑、服装玩具，应有尽有。有的从事出入口贸易与批发，主要进口与批发中国货品。有的经营中国餐馆。有的承包建筑工程，在巴格达的中国建筑公司，有多达十余家。但是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华商都纷纷结束营业，避乱到邻近的约旦、科威特及阿联酋等国家去。
* 伊国是个死亡陷阱，人们的生命朝不保夕，可是对一些精明而勇敢的华商来说，这里也是商机处处，容易发财致富的好地方。战争时期的伊拉克，生产陷于停顿，加上西方国家的禁运与制裁，所以市面上的食品、日用品与医药，都严重短缺。华商勇闯龙潭虎穴，进入伊国寻找商机，创立基业。至于那些暂时退避邻国的华商，对伊国虎视眈眈，伺机而动，他们早已在邻国囤积了堆积如山的货物，等待伊国战火平息，形势好转之后，便蜂拥而入，抢夺先机。那些承包工程的建筑公司，也早已着手进行相关的准备工作。战后的伊拉克，必将进行大规模重建，时机一到，他们便可大展拳脚了。
* 目前在伊拉克营运的，还有两家中国通讯公司，它们是华为和中兴。伊国的通讯项目还得交给中国公司来做，因为先前的通讯系统主要是由中资公司承包的，要是不让中资公司参与重建，伊拉克现有的通讯网络便动弹不得。
* 巴林王国位于波斯湾西南部，介于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由35个列岛组成，巴林岛是巴林最大的岛屿。巴林小国寡民，是西亚最小的国家。
* 巴林的石油资源丰富，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支柱，石油及石油产品占国家收入60%以上。政府推行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成效卓著。处于四面环海的优越位置，渔产丰。巴林的工业颇发达，有炼油工业、炼铝功业、石油化学工业、造修船工业及炼钢业等等。长期以来，国家政治稳定，经济蓬勃，国内基础设施良好，金融制度稳健，其国民年收入高达1万7000多美元。
* 据中国银行巴林代表处首席代表郭京思说，巴林目前有华人约2000人，大多是改革开放后迁移过来的，当中有少数台湾人。约有200人经商，有些经营杂货店，有些开中餐馆，业主包括中国大陆移民及台湾商人。中资机构则有中建公司、华为公司、中石油公司及中兴公司等。中建公司于2007年获得签署承建Zallaq五星级酒店的合同，合同额高达7846万美元。中石油公司于2009年获得巴林海上“二号区块”勘探工程，工程进行顺利。也有由中国政府派来的农业技术专家及大使馆人员。
* 这里也有远嫁到巴林来的华人媳妇，如来自台湾的郭芬惠女士嫁到巴林来已有27年；还有一个名为埃达的法国华侨，嫁给在巴林工作的丈夫而来到麦纳麦（Al Manamah）。
* 阿富汗是西亚的内陆国，西邻伊朗，北部接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东部与南部界巴基斯坦，东北部隔着瓦罕走廊（Wakhan Corridor）与中国接壤。境内多山地与沙漠，没有出海口，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 由于阿富汗地处中亚和西亚进出南亚与南下印度洋的要冲，战略地位重要，所以19世纪后，这里便成了英国与沙俄逐鹿的战场。1878年英国发动侵略战争，把阿富汗沦为英国附庸。1919年阿富汗获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阿富汗，更是充满动乱，70年代的阿富汗发生了两次政变，1978年成立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次年苏联出兵阿富汗，直至1989年才撤军。苏联离境后，阿国境内各派系爆发内战。1997年塔利班政权获得了控制权，改国名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由于塔利班支持恐怖活动，2001年美国以反恐为名，推翻了塔利班政权，扶持以卡尔扎伊为首的政府，进行艰巨的重建工作。多年来的战乱，使阿富汗经济备受摧残，人口严重流失。
* 据粗略估计，目前阿富汗约有800名华人。这些人当中，大多数是国有或私营企业员工，主要从事修路与电讯工作。此外还有一些个体户，做着铝合金、副食品及餐饮业等各种生意。
* 这些年来，塔利班的势力卷土重来，尤其在南部坎大哈（Kadanhar）一带，经常发动自杀式的袭击、绑架、勒索及杀害员工，使这里的中国生意人与工人都有撤离的打算。
*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公司（简称“中水”）于2007年在喀布尔（Kabul）以东修建一条外国军车经常通过的公路。5月23日，该公路施工处发生一起针对外国军车的自杀式爆炸事件，造成“中水”雇用的警察和另外3名平民死亡。事件发生后，四五名中国工人坚决要求回国。韩国人质事件发生后，“中水”员工情绪再次波动，他们唯一的想法就是：早点干完活，尽快走人。目前还有几家中国国企也打算在完成现有项目后撤出阿富汗。
* 喀布尔的中餐馆约有十多家。第一家中餐馆是在2002年11月开张的，那时正是塔利班政权倒台后一周年。开张后生意红火，为了品尝中国风味，食客不惜排长龙等候。因为经营餐厅有利可图，餐馆接二连三冒起，竞争激烈。
* 以色列地处亚洲西部，地中海东岸，东北与叙利亚为邻，东界约旦，南濒亚喀巴湾，西南部与埃及接壤，北傍黎巴嫩。据1947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规定，以巴分治，1948年以色列建国。自建国以来，它与邻近国家发生了6次战争，占领了埃及的加沙走廊、约旦河西岸与东耶路撒冷、叙利亚的戈兰高原及黎巴嫩部分土地。
* 以色列土地贫瘠，资源短缺，坚持走科学强国之路。以色列高新技术产业举世瞩目，尤其是电子、通讯计算机软件、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工程、农业以及航空等方面拥有的先进技术和优势。
* 据2008年的统计，以色列华人人口高达2万3000人。有些是中国官方机构人员，有的是留学生，也有来自港台的企业家，及中资公司的人员，不过绝大部分是劳工。单单在以色列打工的中国人就数以万计，劳工占以色列的中国人90%以上。中国政府允许输出中国劳工以赚取庞大的外汇，以色列是主要输出国之一，所输出的劳工大部分是建筑工人，主要来自福建与江苏。自1994年至2002年，中国输出到以色列的劳工超过两万人，总营业额高达3亿美元。中国工人的建筑技术获得当地人的赏识，尤其是瓷砖粘贴与墙壁装饰技术，令以色列雇主非常满意。
* 有些以色列华人是开设中餐馆及杂货店的。以色列的中餐馆有几十家，多在特拉维夫（Tel Aviv）及海法（Haifa）等地。但正宗的中餐馆很少，大部分是西化了的中餐馆。
* 以色列华人中，还有一位中医师李洪芬，开了一间诊所，专医肿瘤病患。由于医术精湛，仁心仁术，救人无数，获得了以色列永久居住权。对一位非犹太人来说，这是一项殊荣。
* 也有台商来以色列投资，主要是入股投资，较少介入实际经营。目前和以色列业务有密切来往的业者，包括旺宏电子、宏基电子、华邦电子、台积电、中华开发工业银行、东元电机、台翔航太和东讯企业。
* 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南部，南接阿富汗，东北、东南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西部与土库曼斯坦比邻。19世纪被沙俄侵占，十月革命后加盟苏联，1990年苏联解体后，翌年宣告独立，建立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乌国的经济，在中亚地区比较发达，国民经济支柱是“四金”，即黄金、白金（棉花）、乌金（石油）与蓝金（天然气）。有现代化的工业，农业由于过度专业化，大部分耕地用来种植棉花，粮食不能自给自足，需靠外地进口。从总体而言，仍未摆脱落后状态。
*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共有129个民族，其主体民族是乌兹别克族，约占人口总数的73%。乌国独立后，其主体民族开始当家作主，一切都以主体民族优先，其他民族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迫使他们纷纷离境。过去中资企业或独资或合资，有160多家，现在只剩下40多家了。中国私人投资的企业也不多。境内也有一些老华侨，依靠经营小买卖过活，境况堪怜；新移民则多是石油与建筑工人。
*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与中国维持了良好的政治、外交与经济关系。除了两国首长互访与促进贸易外，还签订了经济与文化协定，中国政府给乌国提供无偿援助与无息贷款。政府也派遣了汉语老师前往教中文，以提高乌国学生中文水平，进一步促进两国文化交流。
* 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都在里海以东，北接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东邻中国，南界伊朗、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在历史上，它们同样被沙俄征服，十月革命后，加盟苏联，1990年苏联解体后，翌年都宣告独立建国。
* 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与石油资源非常丰富，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规模开采。自1996年以来石油价格节节上升，导致土库曼斯坦的炼油工业迅速发展，吸引了外资的到来，从而推动了其他工业如电力工业、化学工业、机器制造工业及建材工业的发展。轻工业方面的纺织业及食品加工业都有良好的表现。
* 至于塔吉克斯坦天然资源贫乏，多年来政局不稳，持续的内战与动乱，使工农业生产衰退，物价暴涨，失业率飙升，是中亚最贫穷的国家。
* 两个国家都是多元民族结构，土库曼斯坦有100多个民族，以土库曼族居多，占总人口的72%；塔吉克斯坦有86个民族，主体民族塔吉克族占68%。两国都有少量的中国少数民族和汉族。
* 华人涉及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商业与服务业。如近几年来，土库曼斯坦的商业逐步走上繁荣，在零售商品中，食品类主要有肉类、鱼类、蔬菜水果、食糖、面包和茶叶等，用品包括服装、鞋袜、家具及电器等，其中有不少是“中国制造”的，由当地华人批发商与零售商经营，由于中国货价廉物美，很适合这些国家人民的低消费需求，甚是畅销。在服务业方面，华人参与的有交通运输业与旅游业。
* 据民间估计，土库曼斯坦的华人多达1万2000人。他们多是石油技术工人与商人，从事修理油井、建筑工程与贩卖小商品。在土库曼斯坦卡拉库姆大沙漠西部和东部，一支中国石油修井工人在修理油井的同时，利用8年时间艰辛地创建了一座“中国城”，里面有宿舍、库房、料场等，作为工作与生活休闲之用。到了2002年，工人再度以惊人的毅力与刻苦的精神，在荒漠上建起了第二座“中国城”，建筑里有电视厅、医务所、会议室、厨房、浴室、卫生间、换气与空调设施，一应俱全，而且有24小时热水供应。这同“中国城”外的荒漠形成鲜明的对照。
* 即使在贫穷的塔吉克斯坦，漫步在首都杜尚别（Dushanbe）的大街上，触目所见的，都是“中国制造”的商品。在商店的橱窗里，“中兴”手机赫然在目；体育商店的柜台上，中国制造的健身器材被摆在最醒目的位置上。在钱币兑换处，人民币被列为可自由兑换的币种之一。中国的新移民主要是建筑工人，其他则多是小商人。
* 南亚、西亚多个国家长期以来，战争绵延不绝，遍地烽火，军人平民死伤无数。尽管兵凶战危，处处是死亡陷阱，但也阻止不了华商的闯荡进入。这地区的华人，大部分是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他们踏遍千山万水，远道而来，在危机中寻找丰富的商机。但有些由于远景不明朗，华人陷于困境，因此有的打道回府，回归中国；有的再移民，勇闯欧美国家，再从头开始创业。
* 早在宋（960 - 1279年）元（1279 - 1368年）时期，中国商人已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到东南亚各个商港来贸易。华商在东北季候风吹送的季节，乘船南来，带来了中国精美的丝绸与瓷器，以换取当地的土产及奇珍异宝，再趁着西南风扬帆北归。不过那时的华商多是过客，少有定居。但自从明朝（1368 - 1644年）以来，尤其是郑和下西洋（1405 - 1433年）之后，南来的华商越来越多，并定居下来，形成了许多聚落。他们与当地人融洽相处，皈依当地的宗教，并与当地妇女通婚，繁衍了混血的后代，生生不息。
* 可惜的是，随着东南亚国家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种族间水乳交融的状态遭到侵蚀。尽管华人流血流汗，为各居留地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仍受到各殖民地政府的排斥与屠杀，埋下了排华的恶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当家作主，狭隘的民族主义气焰高涨，排华恶行蔓延各地。华人成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的对象。排华酿成的悲剧，华人固然是受害者，但实际上是两败俱伤，有关方面宜三思而行。
* 本文将分两部分来阐述这个课题，第一部分是东南亚的排华事件，这个地区的排华行为，其历史与演变有共同的脉络及规律，可作为一个单元来阐述。第二部分是东南亚以外的国家，包括美、加、澳等国。这些国家的排华运动，也有相似之处，不过各国因情况各异，大同中亦有小异，可作为另一单元来阐述。
* 除中国之外，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约有4千多万，其中大约有90%聚居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的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就占了约3100万，其他越南、缅甸及菲律宾也各有超过100万的华人。华人移殖东南亚以后，开疆拓土，流血流汗，为东南亚的城镇建设，与促进经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创建了辉煌的业绩。可是华人也历经悲壮凄惨的命运，那就是屡遭歧视、排斥、甚至大屠杀。尤其是战后数十年间，排华浪潮此起彼伏，华人如惊弓之鸟，风声鹤唉，人心惶惶，生命财产备受屠戮与摧残，损失惨重。
*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除了新加坡与文莱以外，各国无不爆发了排华暴行，标志了华人噩梦的开始。各国排华悲剧的大小程度不一，有的频频发生，犹如狂风暴雨，暴民聚众呼啸，烧杀掳掠，极尽残暴之能事，如印尼即为典型的例子。有的排华运动时断时续，手段较为温和，造成的损失较为轻微，如越南、缅甸与菲律宾。有的偶尔迸发，震慑力和缓，犹如和风细雨，并达到了同化华人的目的，诸如泰国。
* 为什么会发生排华的现象呢？综合而言，有以下几个原因，即：
* **1.    殖民政府种下的祸根：**
* 荷兰统治东印度群岛（印尼）历经300余年，长期以来，荷政府在不同的种族间，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对华人一味高压，限制华人居住在特定的地区，除非有特殊的通行证，否则不得擅自离开。华人从事的职业，不能随心所欲，受到立法的限制。华人需交纳沉重的苛捐杂税，稍有抗拒，便加以逮捕、监禁，甚至屠杀。高压的政策同样施诸土著的身上。荷政府实施的强迫制裁，把印尼人民视为奴隶，迫使他们无偿提供劳役，栽种政府指定的经济作物；稍有抗命不从，便以严刑峻法伺候。更绝的是，政府采用各种挑拨离间的手段，使两个种族互相猜疑与嫉恨，加深种族间的敌视，种下了仇恨的祸根。
* 西班牙殖民政府统治菲律宾，长达三个半世纪。对华人既爱又恨，政府既要利用华人来发展殖民地，又嫉恨华人势力的迅速膨胀，采取高压与限制的政策。华人稍有反抗，便不惜报以大屠杀或集体驱逐出境。另一方面，西班牙政府更在种族间挑拨离间，煽动菲律宾人对华人的仇恨清绪，加深种族间的裂痕。
* 其他如英、法殖民政府，分别在马来亚、缅甸及越南实施偏袒土著政策，并挑拨不同种族的矛盾，种下了种族间仇恨与敌视的祸根。这些由来已久的潜伏危机，到了战后，土著以当家作主的姿态，掌握政权，傲视一切，目中无人，视华人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
* **2.    根本原因是贫富悬殊：**
* 印尼的政客、极端种族主义者、回教原教旨主义者、以及别有居心的人士，都异口同声地说，华人都是富有的，是“经济强者”，而土著都是贫困的，是“经济弱者”。他们也夸大其辞地宣称，人口只占3％的印尼华人，却操纵了国家70％的资源与财富。他们恶毒地咒骂华人是吸血鬼、是剥削者，把华人的财富建立在印尼土著的劳力与血汗上，因此华人是造成社会贫富悬殊的罪魁祸首，土著若要摆脱贫困，便要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包括烧杀掳掠或集体驱逐出境，迫使华人财产均分。这些对华人的偏见，经过了舆论的曲意渲染，更使广大的印尼人信以为真，使土著与非土著（华人）间的阶级不平等，升华为种族的矛盾与仇恨。一旦国家陷于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物价腾贵，土著便嫁罪于华人，在政客与种族主义者的煽动下，沸腾的种族主义情绪，便一发不可收拾，爆发了排华暴行。
* 实际上，富有的华人，只是少数的资产阶级，大多数华人是中产阶级，以及低层的商贩、工人与贫农。华人也并非操纵了印尼的经济，国家的石油及天然资源，多是国营或与外国则团合营，通过贪污或其他不法手段，官商勾结，使这些少数的土著富豪，积聚了大部分的财富。少数的华人富豪只不过分得了一杯羹。
* 在英殖民政府时代，马来亚政府致力于推行“马来人务农，华人经商” 的政策，导致了马来人贫穷与落后。那时，马来人多数居住在乡村，华人大多在城市经商生活，族群的经济地位差距颇大。1957年独立后，联盟政府基于土著优先的原则，积极扶持马来人，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于是大量马来人从农村流入城市，在政府机构任职。并在政府贷款计划下，马来人建立了成衣、木薯粉、橡胶等产品的加工企业，开办了批发和零售商店，另外还组建和经营了国有巴士公司。而且马来人的公司股权比例也提高了。经过政府多年的努力，华人与马来人族群间，无论是在就业、收入、贫富及公司股权等方面的差距也逐渐缩小了。
* **3.    土著与华人间文化的歧异：**
* 美国学者亨廷顿强调，不同的宗教文化是难以调和的。他认为不同的文明迟早要导致更大的冲突，这就是他的文明冲突论，只有主流文化去同化其他族群文化才是解决冲突之道，而他心目中的主流文化应是盎格鲁萨克逊文化。放眼世界，因宗教不同而产生种族摩擦，最终导致种族战争的例子，比比皆是。文化的歧异，尤其表现在宗教信仰的不同。在印尼与马来西亚，土著绝大部分是回教徒，而华人却多是佛教徒与基督教徒。宗教的不同往往造成习俗的偏见，互相不能融合与信任。土著执政者强迫推行同化政策，要华人信奉回教，鼓励异族通婚，并不为多数华人所接受，这种潜伏的种族内在危机，往往成为煽动排华的火种。印尼与马来西亚的排华暴行，往往是以回教为号召，高举圣战的旗帜，来煽动盲目群众仇恨的情绪。
* **4.    华人政治效忠意识受猜疑：**
* 一些土著怀疑华人虽然入籍成为印尼公民，其实并非基于效忠居留国，而是要保护其固有财产。华人仍然不能忘怀于中国，仍然把大批资产用于中国家乡的建设与对乡人的接济。华人甚至被怀疑是中国的“第五纵队”，为中国政府服务。因此每当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恶化，海外华人便成为代罪羔羊。另一方面，一旦居留国稍有风吹草动，出现危机，华人资本家便把资产转移国外。土著怀疑华人不忠于居留国，加深了对华人的不信任与怀恨，往往就散播了排华的种子。
* 排华的形式是多样化的，计有以下数项：
* **1.    暴力排华**
* 在印尼，暴力排华的次数最频密，手段也最残忍。排华事件往往是在政客与军人的煽动与策划下，鼓动暴民，成群结队，四处呼啸，手持武器木棍、铁条与利刃，砸车烧屋，掠夺财物，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极尽残暴之能事。最近一次大规模排华暴行，发生在1998年5月13至15日，被称为“黑色的五月”。这是一场惊心动魄，骇人听闻的排华悲剧，为三十多年来所仅见。动乱波及各大小城市，而以雅加达最严重。暴徒杀人放火，掠夺财物，集体轮奸华妇，而且先奸后杀，有的更活活被烧死。暴徒手段之残酷，人神共愤，天地同悲。这场惨绝人寰的动乱，是由军方及极端势力幕后策划的。
* 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爆发了一场排华事件。事缘当年5月11日大选揭晓后，执政的联盟损兵折将，很多席位落在反对党手中。反对党在庆祝胜利游行中，向马来人作出挑衅的行为，引起了马来人的报复，群起闹事。13日傍晚时分，马来人开始向华人发动攻击，杀人放火砸车，华人措手不及，死伤惨重。嗣后华人展开反击，事情闹大，政府宣布实施戒严令。军警奉命维持秩序，却把枪杆子向华人扫射。事后首相东姑下台，由敦拉萨接任，大权在握。“513事件”是马来西亚历史的里程碑，标志了国家格局走上一个新阶段。
* **2.    通过立法，限制华人从业，提高土著经济地位：**
* 自战后独立以来，民族主义浪潮高涨，一切均以土著利益为依归，政府实施的政策，都以维护土著利益，提高土著经济地位为前提。于是国会通过一系列的立法，限制外侨（多是华人）自由从业，多项职业保留给土著经营。即使是过去多年来由华人垄断的行业，也一声令下，强制华人停业，把华人的资产充公，交由土著接替。
* 自20世纪50年代中叶开始，菲律宾政府便颁布一连串的菲化法令，接二连三，层出不穷。先有零售业菲化法，限制华人不得经营零售业，由菲律宾人取代。接着有米黍业菲化法，在该法令下，过去由华人垄断的碾米厂都要关门大吉，而由菲人接手。还有专门职业菲化法通过后，工程师、建筑师、律师等专业，都把华人拒于门外。
* 早在苏加诺执政时期，印尼政府就在50年代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限制外侨（主要是华人）从事多项职业，这些法令包括限制外侨进口企业、限制华侨汽车商行营业、限制华侨经营碾米业、限制外侨经营木材业及禁止外侨零售商在县以下地区营业。其中以1959年的禁止外侨零售商法令对华人影响最大。那时乡村的零售商有80％至90％是华人，直接受影响者达50万人之多。华人被迫结束营业，而政府又没有给华人适当的安置与补偿，使广大华人顿时陷于失业，无所适从。
* 苏哈多执政时期，经济政策稍作修订，一方面继续限制华人职业，另一方面却要利用华人资金发展国内的经济，因此兴起了华人资本家与印尼官方及军人的联营企业，这就形成了所谓“阿里巴巴”联营企业，或称“主公制度”，即由华人资本家出资经营，并负责管理技术，而官商或军人只是挂名董事，却能分得营业利润。苏哈多家族就从联营企业中，积聚了巨大的财富。
* 南越吴庭艳政权当政期间，也于1956年颁布了第53号法令，禁止外侨经营鱼肉、杂货、柴炭、燃油、丝棉织物、钢铁、粮食、运输、碾米等11种行业。
* 缅甸独立以后，吴努政府除了宣布外侨职业限制外，实行私营企业、工商业国有化政策， 把外侨企业收归国有，华人经营的企业也受波及。自1962年尼温政变执政后，国有化政策更是雷厉风行，缅甸华人的工厂、商店、商行及酒家全部收归国有，华人辛苦累积的资产，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及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513事件”的产物。1970年马来西亚政府宣布的新经济政策（1970 - 1990年），目的是要：1. 消除贫穷；2. 废除以职业分野来辨识种族，重组社会。据估计，在1970年，有限公司的股份资本持有权，外国人有63%，华人有34%，而马来人只有2.4%，因此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重新分配国家的财富，增加马来人拥有的股份资本，在20年内增至30%。政府要剥夺华人公司部分拥有权，分配给马来引起华人的不满。
* 1975年，政府又颁布了工业协调法令，给华人中小型企业平添了种种障碍。繁文褥节，助长了滥用职权及贪污的风气，对中小型企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压制了华人企业的发展。
* 新经济政策推行后，成效卓著，华人的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在金融业、矿业及农园的持有权，逐渐转移到土著手中，而土著的经济势力大为扩张，据称1999年，马来人的公司股份资金已达致19.3%，但土著公司及国营公司在银行业、保险业、船务与电讯等业的支配权已大为扩充，所持有的股份资金应超过19.3%。
* 在推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显然已趋向种族化。原本的目的是不分种族，消除贫穷，但结果是华族穷人的生活没有获得多大改善，乡村的马来农民也没有多大受惠，只是制造了少数的马来特权阶级。20年过去后，统治阶级声称，马来人尚未达到30％的目标，因此新经济政策仍要继续推行下去。
* **3.    强迫华人入籍，推行同化政策：**
* 执政者认为，华人具有强烈的中国意识，爱中国多于爱居留国，不利于居留地的发展，必须实行同化政策，让他们彻底成为居留国的一分子，完全效忠于居留国的政府，因此强迫华人入籍。此外执政者也认为，华文学校、华文报章及华人社团，是培育同情与效忠中国分子的温床，必除之而后快。于是强制关闭华校、华报与华团，彻底摧毁中国意识的根苗。
* 印尼的国籍法较为复杂。简单地说，在1980年之前，政府并非采取出生地主义的原则，尽管华人在印尼出生，却不能自动成为印尼公民。要成为印尼公民，尚需附有其他条件。不但有许多繁文褥节，还要缴纳高昂的申请费，加上即使申请成为公民后，也只是二等公民，所以许多华人不愿成为印尼公民，仍然保有中国国籍，或是无国籍民。据1965年印尼政府公布，中国籍民有113 万多人，印尼籍民200多万，其他还有少数持台湾护照或是无国籍民。但1980 年以后，政府却要迅速解决外侨问题，放宽公民权的申请条件，简化申请手续，减低申请费用，鉴于大势所趋，华人纷纷申请入籍。时至今日，绝大多数华人已入印尼籍，只有少数中国籍民与无国籍民。
* 在苏加诺时代，政府即开始推行华人同化政策。首先是加强对华校的管制，取消对华校的津贴。50年代后期，政府开始管制外侨报刊。追至1965年 "9.30政变”苏哈多上台后，强迫同化政策雷厉风行，政府下令关闭所有华校，华文报章停刊，禁止中文书刊、华语影片与华语录影带进口，禁止公开的华族节日庆典，并强迫华人改名换姓。
* 南越吴庭艳政府也推行华人同化政策，强迫华人入籍。政府采取出生地主义原则，规定凡是在越南出生者，即使其父母是中国籍，也一律是越南籍民。当局更采取种种措施， 强迫华人改变国籍。1975年，越共统一南北越后，一改过去善待华人的政策，开始迫害华人，强迫华人入籍。并以职业限制作为要挟，迫使华人加入越南籍。
* 菲律宾的国籍法，也是采取出生地主义的原则，即在本地出生者，达到法定年龄，即可归化成为公民。至于外侨要申请入籍，则需至少居住十年，并须经过语言测试，也因费用高，手续繁琐，申请时间长，所以归化的人少。但1975年后，政府简化入籍手续， 鼓励外侨归化，放宽入籍条件，反应热烈。据说，1975年至1986年间，约有20万华人加入菲籍。
* 50年代中期， 菲政府为了防止共产党势力渗透华校，开始对华校严加管制。1967年宣布停止成立新华校。到了70年代中期，绝大部分华校已实现菲化。菲化以后，华文学校主要教授英文与菲文，中文课程每天以100分钟为限。至此，华校已然变质，并日渐萎缩。
* 马来西亚独立以后，政府锐意要使华校变质，成为国民型的学校，纳入国民教育的体系。所谓国民型学校，即以英、巫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而华文的教学时间大大缩减，每周只有五六个小时，而且要有一定的学生人数才开班。后来经过华社、董总与教总的不断争取，终使华文小学得以保存下来。至于华文中学，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津贴，只好由华社自行开办独立中学，成绩斐然。
* **4.         集体驱逐出境：**
* 中国与邻国关系的好坏，往往决定了当地华人的命运。国与国之间关系良好，华人便受居留国政府的善待；一旦关系变恶，华人便成代罪羔羊，任人宰割，歧视、排斥、殴击、囚禁、关在集中营、甚至集体驱逐出境，越南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 1975年以前，中越关系良好。中国政府倾全力援助越南对外战争，当地华人也与越南人民并肩作战，抵抗外国的侵略，那时越南的华人获得当地政府的善待，人民的尊敬。但1975年越共统一越南以后，由于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两国渐行渐远，终致关系恶化。于是越共政府对当地华人的态度，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以怨报德，对华人横加迫害与打击，为了要改造华人，强行遣送华人到荒芜的“新经济区”去，任其自生自灭。在越南当局的迫害下，越南华人难以求存，只得沦为“船民”，投奔怒海，不知有多少人葬身鱼腹，成为海底冤魂。
* 至于越南北部的华人，也同样遭到迫害。自1977年，越南政府就在与中国比邻的省份推行“净化”边境地区的行动，把中国边民成批驱赶回中国境内。也有成千上万的华人，被越方从陆路赶至中越边境的老街、同登、芒街等地，然后赶回中国。截至1978年6月7日，被赶回国的华人已超过11万人。
* 自19世纪中叶以来，排华运动就不断上演着。就排华的时间与激烈程度而言，美国、加拿大、澳洲及纽西兰要算是先锋。而中、南美洲等国家，也东施效颦，开始有排华的举措，但程度上较缓和。不过到了第二次大战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些国家政府不得不放宽移民政策，容纳更多华人移民入境，政府也以较宽容平等的态度，对待入境的华人新移民。不过这不等于说，这些国家的华人都受到平等宽待。在某些方面，华人仍然受歧视与排斥，而民间依然潜伏着仇视的心态。随着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大规模华人新移民浪潮，触发了族群间的商业竞争，以及其他生活上的冲突，在欧洲、非洲与大洋洲等国家，也爆发了暴力排华事件，幸而都是规模较小的孤立事件，没有酿成巨祸。
* 以下就各国排华的原因与形式作综合性的论述。原因有下列数项：
* **1.    白人的优越感：**
* 早期美、加、澳、纽的欧洲移民，有些是无恶不作的罪犯，即使是自由移民，也有些是流氓地痞、奸商无赖之徒，偏生移民到新殖民地之后，便以新主人自居，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盎格鲁撒克逊的优秀民族，高人一等。在他们眼中，华人是劣等民族，因此轻蔑鄙视中国人，侮辱性地称他们为“中国狗”（Chow）、“中国佬”（John Chinaman）。白人羞与中国人为伍，为了维持“白人社会的纯洁性”，他们高喊“中国人必须滚出去”、“加利福尼亚乃美国人所享有”的口号。澳洲的白澳政策，就是贯彻“澳洲是白人的澳洲”的理念。
* **2.    职业与商业的竞争：**
* 华人秉性勤劳刻苦，诚实可靠。他们不计较工作酬劳，也不计较工作的性质，白人遗弃的矿地，华人再去挖掘，白人不愿做的低贱工作，华人欣然接受，而且做得更好。因此白人矿主与园主，都乐意聘用华人为雇员，引起白人工人的妒恨。至于经商，华人的零售店与餐馆，一早就开门营业，到午夜才打烊，一天工作十余个小时，一年当中，除了春节休业几天外，天天都做生意。而且通过地缘、血缘与业缘的组织，华商编织了严密的网络，便于货物供求与资金周转，当地商人无法与华商竞争，因此产生排华的心理，这也是排华最基本的原因。
* **3.    文化的差异：**
* 华人与白人生活习惯不同，宗教信仰各异，因而引起种种的冲突。白人认为中国人是永远不能同化的。他们把所赚得的钱都汇回中国接济家人，漠视当地的利益。华人文化、教育程度不高，时常沉迷烟赌与娼妓，不讲卫生，传播麻风、天花等疾病，对白人的生命安全是一大威胁。总之华人的道德文化对白人产生不良的影响。实际上，华人固然有许多恶习，但白人又何尝没有酗酒、赌博与嫖妓等行为。反而，华人的勤劳、节俭、温和、奉公守法、诚实可靠等美德恰恰是白人所欠缺的。
* 排华的形式是多样化的，计有以下数项：
* **1.    暴力排华**
* 美国人的暴力排华，早在19世纪50年代即已爆发。首先发生在加州的金矿区，白人暴徒杀害中国矿工。此后遭杀害的华工几乎无日无之；有的被集体驱逐。据中华会馆的了解，1862年，被杀害的中国人计有88人，而凶手却大多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逍遥法外。
* 1877年7月23日，爆发了所谓“暴动夜”，一连三天，暴徒在三藩市华埠聚众闹事，放火烧屋，洗劫商店，幸军警及时赶到，将暴徒击退，维持秩序，华人才得以幸免于难。
* 嗣后，暴徒杀害华人的暴行，从三藩市蔓延各地，洛杉矶、科一罗拉多的丹佛市、内华达州、怀俄明的石泉矿区及西雅图等地，都爆发了排华暴动，造成华人生命财产严重损失。
* 19世纪中叶以后数十年间，加拿大西部的金矿区，不断发生白人欺压与杀害华人的暴行。如1869年在奎斯尼河口华商广利行的房屋被放火，十名华工遇难。
* 意想不到的是，100多年以后的加拿大，又因港台及中国大陆移民的激增，引起了加拿大人与华人族群的紧张关系。加拿大人对新移民到来造成的负面影响怀恨在心。如港台企业家投资房产，把地价炒高。又如华人移民兴建的高楼大厦，破坏了加国的风景线。华人的喧嚣吵杂，扰乱了宁静的环境。华人不良的社会行为，有损于加国文化与团结。这些负面的因素，都加深了族群潜伏的紧张关系。
* 19世纪中叶，澳洲盛产金矿的维多利亚州，也爆发了排华事件。华人集体被驱赶。流氓冲进华人商店，放火抢劫杀人，有数名华人遭杀害。1860年12 月，新南威尔士的金矿区，发生了蓝坪滩事件。蓝坪滩矿区的排华事件的特点是持续时间之长，暴徒手段之残酷。从12月至翌年8月间的8个月里，共发生了 7起暴徒袭击华工的暴力事件，平均每个月一次。暴徒烧房屋，杀人殴击，劫掠财物，华人死伤惨重。暴乱事件蔓延到昆士兰、墨尔本与悉尼等地。
* 20世纪以后大量中国新移民涌人南太平洋岛国、非洲与欧洲等地，华商在商场的大事活动，尤其是在零售业与餐馆业的成就，引起与当地商人的激烈竞争，而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华商居上风，这一来导致了当地商人的嫉恨，从而掀起了排华的浪潮。
* 2006年4月18日，所罗门群岛的首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排华行为，前后延续了两天。这次暴动的原因，主要起源于多年来土著对华人的积怨。这里的华人有2千多人，他们控制了岛上的零售业、批发业、木材业与渔业，这些都是国家的主要经济资源，所以引起土著对华人的嫉恨。而直接导致排华爆发的，是缘于4月5日的大选。选民怨恨大选舞弊不公，认为总统利尼（Rini）的中选，是由于华人资本家行贿的结果，而总统也答应中选后，将给华人许多好处。在反对派的煽动下，最终爆发了排华暴行。在两天的暴动中，暴民冲着华埠而来，放火焚毁华人的商店，大事掠夺华人的财物，华人惊慌逃命。澳洲与纽西兰派遣军警来镇压，政府施行戒严令。至20日，首都终于恢复秩序。
* 2006年11月16日，在南太平洋汤加小岛国的首都，也爆发了暴力排华事件，暴民聚众群起呼啸，手持木棍刀矛，火烧华人商店，掠夺华人财物，所幸没有造成人命伤亡。汤加的华商拥有首都大部分的商业，这里的华人约有500 多人，他们多已入籍，视汤加为故乡。暴动发生后，华人向各处逃难，中国大使也呼吁政府须保护中国侨民。
* 2009年5月13日，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发生了反华暴乱，当时百多人参加游行，最后演变为暴力和抢劫。15日，暴乱蔓延到第二大城市莱城（Lae），成千上万的暴民涌入当地华人商店大事抢掠，使整座城市限于瘫痪。暴乱造成一死数人受伤。据说许多当地人抱怨，近年来涌入大批华人移民，把本地人挤出了规模不大的商业市场，还有说华人老板虐待员工，华人犯罪率增加，以及向当地官员行贿，激起当地人的公愤，以致最终引起暴动。
* 1962年爆发了中印边境战争。印度人民群情汹涌，反华情绪高涨。舆论也推波助澜，厉声怒吼：“中国人掠夺我们的土地”、“中国人该死”。印度境内的华人首当其冲，横遭迫害。数千名华人被围捕，囚禁在沙漠中的集中营，达数年之久。另外几千名华人，被集体驱逐出境，回返中国。其余的华人，有的逃往邻国的巴基斯坦及斯里兰卡，有的投奔欧美国家。加拿大的多伦多，就有好几千名来自印度的华人青年。
* 港台及中国大陆新移民活跃于工商业舞台，很快就在工商业上占尽上风，把当地的小商人与小工业家挤出竞争的行列，引起他们的嫉恨。其他如工商业之间的纠纷等因素，都会加深族群间的矛盾与仇恨，欧、非的某些国家，在政客与野心家的策动下，便把矛头指向华人，进而爆发了排华暴行，试举例如下：
* 意大利米兰市保罗萨比（Paolo Sarpi）已经成了中国人的唐人街，这里商店摆卖的成衣、皮鞋、皮包等日用品，业主都是中国人。近十年来，大量华人新移民涌入意大利，其中大部分是浙江温州人。官方估计中国移民总数达11万 4千人，但因非法移民很多，真实数字可能达到50万人以上。
* 保罗萨比大道与附近几条街的商店，几乎都被华人买下或承租，这个地区已逐渐成为华人的批发商区。住在这一带的意大利人，反而感觉自己像个外国人或少数族群。他们常投诉，抱怨这一带环境脏乱、嘈杂，违规停车，交通混乱。他们常组织队伍，示威游行，表示他们很难与中国新移民相处。
* 意大利官方明确表示，中国新移民自成一个小社会，使用自己的语言与生活习惯，已形成封闭的群体，华人区是米兰的“城中城”。由于语言的隔阂，造成误会，冲突事件时有所闻。种族矛盾不仅存在于意大利，欧洲华人移民近年激增，跟当地居民在文化上、法律上都不断出现大大小小的冲突，如果处理不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酿成巨祸。
* 非洲赞比亚的首都卢萨卡（Lusaka），1997年10月2日也爆发了排华事件。事缘中国人投资的铜矿公司，雇用了大批赞比亚人员工。可是工作环境恶劣，薪酬低微，激起了工人的愤慨，中国老板被认为是工人的剥削者。此外，廉价的中国货向赞比亚市场倾销，威胁到赞比亚公司的生存。而且华人人口迅速膨胀，已达3万人，过去十年间，华人在当地的经济力量日益壮大，引起赞比亚人的嫉恨。多年的积怨终于在1997年10月2日迸发，暴民在首都发难，华人在市内的商店与建筑物，成为暴民焚烧与掠夺的对象。经过两天暴乱后，终于10月4日恢复平静。
* **2.    立法排华**
* 经过多年的酝酿与波折，美国国会终于1882年5月6日通过了排华法令。规定在十年内，停止熟练与非熟练华工进入美国；非经正当途径入美的中国人，于法案通过之日起，将被驱逐出境；已在美国的中国人，无权申请美国国籍。
* 1888年，国会又通过了“禁止华工进入美国法案”，该法案对华工入境更为严厉，从第一法令的“停止”，进一步跃升为“禁止”。1882年的法令十年期满后，国会又于1892年通过了吉里法令（Geary Act），把禁止华工人境再延长十年，又增加了更苛刻的条文。此后1904年、1911年、1912年及1913年，国会更接二连三通过排华法令，对华人移民入境的限制与禁止，越来越严苛，入境的华人移民因此越来越少。1924年又制定了新移民条例，对华人移民入境的限制更严厉，是最严酷的律令。
* 加拿大的限制华人人境，也步美国后尘。先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通过“1884 年管制华人条例”。1885年联邦会议通过“限制和管治华人移民条例”，向入境移民征收十元人头税。另规定运载华人到加国船只每载重50吨只能接载一名华人。为了进一步限制华人移民少镜，后来又把人头税增加到100元。
* 加拿大限制华人入境的条例越来越苛刻，1923年联邦会议更通过“华人移民条例”，进一步从“限制”跃升到“禁止”，因为条例共有43条，一条比一条苛刻，华人称之为“四三苛例”。
* 1855年6月，澳洲维多利亚州国会通过限制中国人入境法令。规定赴澳船只载重十吨限载一名中国移民，而且得征收十镑人头税。嗣后，南澳、新南威尔斯等州也通过类似的限制华人移民法令。1901年，澳洲6个州成立了联邦政府，统一了限制移民政策，联邦会议通过了 “语言测验法”，规定申请者必须能听能写任何一种欧洲文字50个字以上，并能填写申请书及签名，才算合格。否则即被视为违禁的非法移民，不准入境。若入境被查获，当局有权将他们驱逐出境。这法令显然是针对华人移民而设，堵住了入境的大门。“语言测验法” 是白澳政策的顶峰，而白澳政策的最终目的是要维持“澳洲是白种人的澳洲”，不许华人及有色人种污染。嗣后订立或修订的移民法令，更进一步规定不许华人入籍澳洲成为公民。1958年的移民法，才准许杰出人士与技术移民入境。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联手对日本作战，为了表示对中国友好，美国国会于1943年底通过废除禁止中国人入境律令。在该法令下，中国移民每年有105个名额入境美国，并允准中国人归化美籍。到了50年代，政府颁布了新移民法令，进一步放宽移民入境。美国华裔公民享有永久居留权，其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子女、未婚子女、前妻或前夫子女也享有入境权。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新移民法令，给予各国申请人（包括中国人）同等待遇，允许每个国家每年两万名移民入境。尤其欢迎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及资格良好的专业人士移民美国。此外留学生、难民也获准永久居留权。再加上非法移民蜂拥而来，使美国的中国移民人数激增，至今已超过300万人。
* 战后的加拿大政府也放宽了限制移民政策。1962年政府宣布，废除以人种、肤色及国籍为接纳移民标准，重视移民申请人的教育水平与技术训练。加国当年即吸纳了一大批香港移民。1967年政府宣布新移民条例，以平等对待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申请人以教育程度及技术训练为取舍标准。自法令实施后，每年平均约有18万移民入境。入境后的新移民，也可以申请眷属移民加国。80年代以后，有更多华人移民涌入，他们分布在加国如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卡尔加利与埃德蒙顿等大城市。
* 澳洲政府也于1966年颁布新移民条例，初步废除白澳政策。1974年实施 “澳大利亚公民法”，最终否定了实行一百多年的白澳政策。此后港台投资移民与技术工人、东南亚等地的移民及留学生、以及印支难民纷纷涌入。80年代以后，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及留学生，更是络绎不绝，使澳洲华人人数激增。
* 对比东南亚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排华事件，便会发现两个鲜明的特征。在对待华人的移民政策上，战前东南亚地区的西方殖民政府，是采取自由放任政策。除了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那几年限制华人入境外，其他时期华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境。移民浪潮尤以20年代达致巅峰。由于地理上的接近，以及自由放任的移民政策的结果，东南亚地区是华人聚居最密集的地区，接近全球华人的 90%。那时期，殖民政府虽然对各个不同的种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挑拨离间，加深族群间的矛盾与仇恨，但政府基于殖民地的经济利益，不愿意爆发暴力的排华事件。一旦发生了暴力排华行为，政府便迅速派军队镇压，恢复社会秩序。所以战前的东南亚很少发生暴力排华的悲剧。
*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这期间，由于东南亚独立政府普遍患上“恐共症”，对中国政府深怀戒心，把华人视为中国的“第五纵队”，所以严禁中国移民入境。因此战后东南亚华人人口的增加，完全得力于自然增长率。正如前述，战后东南亚国家的排华暴行，此起彼伏，持续不断。而且往往是政客及种族主义者在背后煽风点火，使星星之火，扩大为燎原之势，造成华人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
* 然而，在东南亚以外的其他国家，尽管华人流血流汗，挖掘金矿、种植作物、修筑铁路及建设城镇，到头来却遭受歧视与迫害。从19世纪中叶起，各国政府就立法严禁华人入境，强迫华人缴纳沉重的税收。华人居住的矿区、乡镇与华埠，屡屡遭到暴民的屠戮与焚毁。百多年来，排华暴行陆陆续续上演。
* 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迁，美、加、澳等国一改其战前严禁移民政策，变为宽大开放的政策，接纳各地移民入境。战后几十年来，这些国家成为各地移民的目标，蜂拥而来。不但港台、中国大陆的移民倾巢而出，其他亚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等地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也都纷纷再次向欧、美、加、澳等先进国家进军。经过了一番移民大洗牌之后，使全球华人流布的比例重新分配，美国华人的人口，1980年估计只有80多万，1990 年增至160多万；2009年已超越过300万大关。加拿大1980年华人人口只有28万多，1990年激增至68万多，21世纪初年已超过100万。澳洲华人人口1960年只有 12万多，1980年激增至30万。估计1990年全球的华人人口约共有3700万，比1980 年增长了约1千万。亚洲的32个国家中，占了3200多万（88%）；美洲的32个国家中，占了320多万（9%）；欧洲的25个国家中，占了77万（2%）；大洋洲的 14国家中，占了37万多（1%）；非洲的33个国家中，占了约11万（少于1%）。
* 战后数十年来，这些国家虽然发生了零星的排华行为，但规模者环大，造成的损失也不太严重。但种族的歧视与排斥还是存在的，仍然潜伏着族群间的矛盾与仇恨，它就像埋在地下的定时炸弹，必须谨慎处理与预防，否则将会酿成巨祸。
* 长期以来，华人出国谋生，所到之处，开疆拓土，为地方的建设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中国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海外华人已摒弃了落叶归根的观念，代之以落地生根。时至今日，绝大部分的华人已入籍成为居留国的公民，身为公民的一分子，华人已经身无旁鹜，把居留国视为祖国。何况第二、三、四代的华裔，他们已经完全融入主流社会，思维与生活方式都已西化或本土化，对他们而言，中国是遥不可及的外国，不再有很多的牵连。
* 不幸的是，一旦爆发了暴力的排华事件，暴民砸车、掠夺、放火、杀人、强奸，极尽残酷之能事，造成了生命财产严重的损失。在21世纪高度文明与人权至上的世界里，这是不能容忍的，难怪成了千夫所指、人神共愤的行为。排华行为的爆发，造成社会动荡，给所在国带来严重的后果。首先是所在国的华人人心惶惶，觉得这里并非栖身之所，伺机移民欧美国家，连同带走雄厚的资金，而这些资金是国内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更何况这会造成原有外资的撤出，新外资裹足不前，缺少外资的投注，国内的经济是不能发展起来的，人民的生活是不能改善的。因此掀起排华浪潮是智者所不取的。
* 长期以来，经过了华人不断的努力，已经为居留国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华人编织了严密的商业网，遍布各地，建立与促进了本国与外国的贸易来往，使货畅其流，供求不绝。华人的工商企业与金融业，成了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动力，不可或缺。可是排华动乱却发生，或者政府立法剥夺了华人营运的权力，转由土著经营。由于土著资金短缺，又缺少管理技术，虽然接收了华人的营业，却无法使其适当营运，反而造成了混乱。例如在菲律宾，米黍业菲化以后，就造成市场米粮供应短缺，米价飞涨。由土著接收的华人零售店，很快就出现了货源不足的问题，不仅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也破坏了人民的生活节奏。
* 千千万万的华人已定居入籍，成为居留国公民，因此要把他们集体驱逐出境，是不切实际的事情。当政者应正视华人的资金及技术，视为国家的财富，给华人公平合理的待遇，让他们死心塌地留下来，将资金与技术留在国内投资设厂，从事企业生产，为国家制造财富，并为本地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缓解失业问题。华人专才也是国家的宝贵资产，服务人群，造福社会，政府也应予以平等优惠的待遇，设法使他们留下来，或设法把他们吸引回国。否则如一味发动排华，或立法限制，造成人心惶惶，见异思迁，蝉曳别枝，到头来国家流失了资金、技术与人才，毕竟是国家的损失。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古有名训，愿当政者三思而后行。
* 另一方面，海外华人如能入乡随俗，吸纳当地文化，融入主流社会，言行举止优雅，变更思维与生活方式，改善人际关系，建立起完美的形象，将有利于消弭排华现象。
* 华人羁身海外，寄人篱下，中国的崛起与强大，固然有助于提高华人的地位，而居留地的大使馆与领事馆固然以护侨为主要职责，但碍于国际公法，不得干预他国内政，以及维持国与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中国政府往往会尊重当事国法律，无法发挥全方位的护侨工作。因此华人唯有自助自救，避免贻人以排华的口实。
* 言行举止优雅得体是必要的。尽管个人的自由不可少，但要以不妨碍及破坏他人的自由为原则，更不应扰乱及破坏他人优雅的社会。
* 法律是维系整个社会与国家安宁的基本准绳，因此华人须奉公守法，不作奸犯科，不破坏社会的安宁。数百年来，老华人及其后裔，都能守法不渝，持之以恒，予当地人良好形象，这种形象须保留并发扬光大。
* 华人靠勤俭起家，多年拼搏，成功创业，集聚财富，过着安逸的生活，固然无可厚非。但生活起居，不宜过分炫耀，以免招致他人的忌恨，予当地人以华人都是富有的剥削者形象。相反，华人应具有“取诸社会，用诸社会”及 “人溺己溺”的精神，慷慨解囊，救助弱势群体；尤其是发生天灾人祸之际，应及时伸出援手，减除他人燃眉之急。华人对他人友善，必会善有善报。在某些国家，经常由于一桩寻常的交通意外，或是华人的虐佣事件，成为酿成排华的借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华人应提高警惕。据闻南太平洋某小国爆发了排华行为时，在华人聚居的地区，挺身而出，手持武器捍卫华人者，正是华人平日善待的土著，华人也应紧记勿忘。
* 华人初来乍到，一时无法适应陌生的环境。由于语言的障碍与文化的差异，以致自我孤立，困守在华人的小天地，不与当地人交往，引起诸多误会，成为排华的根源。为了促进彼此的了解，华人有必要学习掌握当地人的语言，与他人交往，吸纳他人的生活习俗与文化，融入主流社会，庶几突破种族间的藩篱，改善人际间的关系。
* 总之，华人必须放下涣涣大国国民的心态，改变自私自利的心理，在保留中华传统文化之余，吸纳当地人的文化，融入主流社会，与当地人并肩创业，迈步走向共存共荣之道，才是上上之策。

**大洋洲华人简史**

* 大洋洲涵盖了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三大群岛，另外还包括澳洲、纽西兰和新几内亚
* 现今，大洋洲华人人口已突破80万人，主要聚居在澳洲和纽西兰

**澳洲**

**移民简史**

* 1972年“白澳政策”废除：“公正、平等、正义、宽容”
* 澳洲社会以19至20世纪之交抵达的英国移民后裔，人数最多
* 出生于广州的麦世英被普遍认为是悉尼最早的自由移民（1818年）、经营“狮子”客栈据说，第一个从事家具制造业的华人，1827年抵达悉尼
* 从1840年开始，英国便停止向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输送囚犯，转而引进中国的劳工（月薪3-5元)
* 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发现金矿
* 淘金华工：广州西南一带（开平、台山、新会和恩平）
* 澳洲六合彩的前身：“白鸽票”赌博游戏
* 庙宇以关帝庙居多
* 1900年，西澳、维多利亚州以及新南威尔士约三分之一的华人都从事蔬果种植业
* 1901年限制移民法令及后来的“白澳政策”--1947年，华人仅剩1万2000人左右
* 政策转变：二战后
* 50-60年代：提供科伦坡奖学金（东南亚）
* 1972年底，澳洲工党政府全面取消了“白澳政策”：吸引中印半岛难民（船民）及港台中富裕人家（有船阶级）
* 华人都以“家庭团圆”、“商业移民”、“留学生”和“难民”等身份，入境澳洲
* “锡龙的足迹”：19世纪末，大批华工前往塔斯马尼亚岛采矿，主要集中在名为史葛斯迪奥的小镇
* “悉尼唐人街之王”方劲武

**经济**

* 约17%专业技术人员、11%行政管理人员、12%公务员、19%商业、担任产业工人及体力劳动者；其余从事服务业和体育、娱乐等工作
* 失业率最低的华人群体：新马华人移民
* 蓝领：东帝汶、中印半岛及中国移民
* 艾士菲“悉尼小上海”

**政治**

* 华人参政的转折点：1998年某党发表种族主义言论---华人成立澳洲团结党
* 黄肇强（印尼）
* 澳洲团结党创党人
* 澳洲历史上首位通过自组政党取得议员席位的华（1998年赢得纽西省大选议员席位）
* 创办澳洲中国留学生福利会
* 澳洲内阁第一位华人：黄英贤，2006，气候变化暨水资源部长
* 墨尔本市首位民选市长苏震西，当选为2006年度澳洲最佳市长
* 自由党华人主席香港移民廖禅娥
* 澳洲议会第一位女议员:1988年何沈慧霞(自由党候选人)
* 第一位进入政府下议院的亚裔人士:(马来西亚)林顺发

**教育**

* 中文教育代表团体：中文教育理事会，编写《中国语文》
* 澳洲最著名的华裔张任谦医生，于1984年成功完成澳洲首例心脏移植手术，并荣膺“本世纪最伟大的澳洲人”之赞誉。在他逝世之后，当地还成立了“张任谦心脏病研究所”。

**媒体**

* 澳洲有大约60家中文媒体，数量在世界海外华文媒体中排行第二：《星岛日报》《老子》
* 私营中文台：2AC澳洲华人电台、2CR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及3CW墨尔本中文广播电台
* 澳亚民族电视台
* 澳洲最大唐人街：悉尼市中心挂着“四海一家”、“中澳亲善”牌匾

**文化**

* 老华人创办的宗亲团体，多属于联谊性质
* 南半球最大的庙宇：南天寺
* 中国电影节、香港电影节、赈灾募款活动及中国书展等
* 一年一度的达令港国际龙舟赛
* 一年一度盛大的“东方魅力小姐”比赛
* 本迪戈华人于100多年前便开始进行舞龙的表演活动（每年1月15日），当地人称之为“复活节山会”；被称作“龙城”，当地华人历史博物馆被命名为“金龙博物馆”

**纽西兰**

* 1947年独立后，由欧裔白人掌政至今，而白人自称“Kiwi”（意即纽西兰国鸟——奇异鸟），借以宣示“土产”身份。

**移民简史**

* 第一个登陆的华人：1842，王鹤亭，抵达纳尔逊
* 19世纪中叶：黄金年代
* 第一波：1866年，首批12人华工来到纽西兰的丹尼丁奥塔哥金矿工作
* 第二波：二战收留难民，二战后放宽移民入境条件
* 第三波： 1987年颁布新的移民法令；华人可通过投资或一般移民（技术移民）的身份过来，只要住满了3年后，便可申请入籍
* 华人移民受同化的重要时期：1950-1980
* 华人聚集地：奥克兰（60%）、首都威灵顿、南岛基督城、丹尼丁
* 1866年，周祥从广东新会远赴纽西兰来淘金，成了纽西兰乳制品的奠基人，留名《纽西兰百科全书》

**经济**

* 华人奥克兰霍威特克区（Howick）的豪宅砖房给抢购一空--霍威特克区“Chiwick”（意即华人豪宅区）
* 马来西亚移民郑明贤，是奥克兰Tony Tay Group地产公司的执行总裁；今年与怀特克雷合作
* “薯条大王”：中国大陆移民黄玮璋
* “投资风险高，打工发达难”
* 华人商业中心：通往奥克兰市中心的多明丽路（最长的唐人街）

**社会**

* 2000年，纽西兰的国王、总督、总理、议长和最高法院院长5个官职，都由女性来担任
* 如今，男人反过来把妻儿放到纽西兰接受教育，而自己则留守家乡，使得当地华人社会出现阴盛阳衰的情况
* 2008年7月5日“亚洲反罪恶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大部分为华人（罪案受罪者）

**媒体**

* 1991年，马来西亚移民苏文德在奥克兰发行了第一份免费的中文报纸《华页》
* 1993年，香港移民冯朗山则创办了南岛第一份中文报《基督城华文报》

**社团组织**

* 香港女移民林爽创办了“语言交流园地”，召集导师教授英文
* 威灵顿华联会：组织“香蕉人论坛”
* 宋曼瑛、黄徐毓芳、陈梅显（律师）著华人领袖
* 荣登纽西兰十大畅销书排行榜的《也是家乡》，刻画了8名纽西兰华人女性移民的故事，作者叶宋曼瑛博士
* 黄徐毓是纽西兰首位华人内阁部长（2008，妇女事务部长）
* 巴布亚新几内亚
* 巴新国旗上绘有天堂鸟，象征独立、自由、幸福，但现实却恰恰相反
* 移民简史
* 开始：清末
* 1884年，德国占领了新儿内亚岛东北部之后，陆续从中国海南、广东、福州以及新加坡招募了数百名华工到马当省开发烟草种植业
* 19世纪末，2000多名华工陆续涌入，主要是来自广东省开平以及新会县
* 迁都：马当--马都比岛--可可帕--拉包尔（行政中心）
* 1949年首都与摩尔斯比港
* 中国大陆移民人数居冠，多来自福清、开平及台山
* 华人聚集地：首都莫尔斯比港、莱城、拉包尔
* 经济
* 马来西亚华人移民：常青集团及TST集团
* 空运乃是国内最重要的运输方式
* “只要下雨刮风，停电、停水、越狱，是一定发生的事。”
* 社会
* 土著的原始共产文化“one talk”：亲友、同乡及同族间互利互助的制度。也就是说，亲友失业或没钱开伙，都可以上门来免费吃住；一家人只要有一个人赚钱，亲友都可以上门讨钱，共享资源
* 华人和土著的后代被称为“半桶”
* 教育
* 华侨学校、天主教教会养正学校
* 老一辈土生华人：四邑话及英语
* 下一代：英语及土语
* 社团
* 中国移民：巴新中国友好联合会（2007）
* 土生华人：国泰俱乐部（1950）
* 华人之光陈仲民
* 巴新史上第一位华裔总理（1980，1994）
* 所罗门群岛“快乐群岛”
* 1976年1月2日开始自治，1978年7月7日独立，成了英联邦成员国
* 移民简史
* 19世纪末（英属保护地）：英国Levar Pacific公司由中国广东省招来一批华工，到当时的首府图拉吉服役
* 二战期间，霍尼亚拉成为新首府
* 1976年仅有452名华人
* 移民潮：1995-1998
* 唯一华人社团：中华总会
* 伐木业
* 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绝大多数从事伐木业
* 政府规划出27%砍伐面积
* 马来西亚伐木公司所占的比例最高，共有50多家，另有一家韩国、一家澳洲、一家菲律宾及一家当地公司
* 社会
* 石头餐：一种土著特有的土餐，以香蕉叶包扎肉类，然后堆放一块又一块烧热的石头，大概焗四五个小时，就可享用
* 最受华人欢迎的食材：凤梨、木瓜
* 2000年爆发种族冲突，主岛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及马莱塔（Malaita）隔岸开火，华人惨遭牵连。
* 骚乱肇因：贫富悬殊
* 早期，土著对华人敬重有加，尊称华人为“Master”
* 保留最完整的节日：清明节、重阳节
* 2006年4月18日，所罗门群岛唐人街遭火神吞噬
* 中国政府于4月22日作出撤侨决定，将受困华人接回中国
* 美属北马里亚纳群岛
* 3大岛屿：塞班岛（首府）、天宁岛、罗塔岛
* 20世纪初，曾经有一名姓钟的广州人，到达了现属密克罗尼西亚的丘克（Chuuk），并与当地一名查莫洛女子结婚，曾居住于帕劳、瑙鲁及塞班，被命名为“中国城”
* 第一个来到塞班岛的香港人是严明睿（开眼镜店）
* 80年代，岛上制衣业蓬勃发展之后
* 在北马里亚纳群岛，只有查莫洛人可以拥有土地；租用土地年限为55年
* 唯一华人社团：美国塞班中华总会，2006年“塞班中文教学中心”
* 宝阳出版公司的《塞班侨报》
* 塞班岛第一家设有网络版的报章：“塞班王”陈守仁的联泰国际集团所发行的《Saipan Tribune》
* 天宁岛“太平洋上的拉斯维加斯”
* 岛上唯一的五星级酒店：香港人所投资的天宁皇朝赌场大酒店
* 中国人超市：黄顺公司、天红商店
* 当地人称华人与查莫洛人的混血后裔为Chino，即Chinese和Chamorro的合称
* 中华总会会所大楼于2000年在“中国城”马苏街落成
* 名副其实的中国城：塞班岛西部加拉班海滨路
* 关岛
* 首名到关岛的华人是Chaco（1648年）
* 混血华裔姓名的组成顺序：先是本身的名字，接着是母亲的中间名字，最后是父系的姓氏
* 美军工程师协会还特别将一年一度的高尔夫球赛命名为The Charlie Corn Golf Tournament
* 第一波移民潮：二战之后
* 第二波移民潮：70年代，台湾人居多（专业人士、到美国留学的台湾人、政治动荡因素）
* 已故关岛前议长安东尼奥平科，1977年通过关岛议会投票，将孔子的生日9月28日，定为关岛法定的教师节
* 华人聚集地：塔穆宁、得得多
* 著名的华人西餐厅Shirley Coffee Shop
* 中文月报《华音时报》
* 3大华人社团：中华总会、中国侨胞联合会及华商总会
* 关岛中华总会（1972）
* 引进“中天台”
* 创办“中华学校”使华人子弟有机会接受中文教育
* 向政府征求土地并积极募款建立“中华公园”
* 关岛华商总会（1993年）
* 之前该会名为“关岛华商协会”，自2005年林锦镛先生担任会长后，始改名为“关岛华商总会”
* 关岛海外华人联合总会现任会长赖文章先生，是北马利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天宁岛以及罗塔岛的经济旅游大使
* 2008年，岛上有3名华人医生，分别是陈光明医生（神经科）、邱正吉医生（内儿科）以及陈文彦医生（小儿科）
* 关岛第一位华裔立法议会议员、首位代表关岛的美国国会议员：已故华查混血儿Antonio B. Won Pat
* 岛上第一个卖冰淇淋的商人：Antonio 的父亲Won Pat
* 斐济
* 地球上“最东又最西”的国家
* 辛亥革命期间，大批来自四邑和中山的广东人逃到了斐济投靠亲友
* 当时，斐济三大公司之一的广泰公司，就是华人所开创的
* 1948年，政府成立了椰干管理会以及开办合作社，华商被禁止收购椰干，杂货行的土地也不再获准续租。
* 谭炳南创立的和利肉店
* 主要华人群体：以广东人为主，其中东莞、开平、中山和台山四地的移民占大多数
* 华人聚集地：首都苏瓦市、老托卡市、巴城
* 20世纪20年代，有一中山人方作标在斐济西区巴城开办了“方利行”，当地人以“方利”称呼他，巴城还有一条以他命名的街道“方利亍”。斐济华人在抗日战争中，共捐赠4架飞机给中国，其中一架由方作标独自捐，因此而得到蒋介石的褒奖，并获赠以中正剑。蒋还在他的墓碑上题写了「贞固流芳」4个字
* 2001年春节，斐济第一家中文报《斐济日报》
* 2005年，另一份中文报纸《斐济华声报》
* 南太平洋区历史最悠久的中文刊物：《飞枝国民月刊》（1930），曾停刊两年后更名为《斐济华人月刊》
* 1936年，华侨学校建立，1976年它改名为“逸仙学校”
* 斐济第一个华人： 1855年，梅屏耀驾着小船，在当时的斐济首都列武卡（Levuka）落脚，开设第一家华人公司，取名“康利”
* 政坛华人精英：方文清（苏瓦镇议员）、余汉宏于（第一位华人国会议员）、司徒波（苏瓦市副市长）
* 法属波利尼西亚（大溪地）
* “世界最浪漫的地方”、“最佳蜜月胜地”
* 在19世纪中叶，澳洲发现“新金山”，华人前来后归程来到南太平洋
* 1861年，威廉史图华（爱尔兰人）得到了大溪地女皇的批准，在大溪地购买土地、招来华工以开辟棉田
* 人烟稀少的波拉波拉小岛（Bora Bora Island）上，唯一的杂货店也是华人开的
* 华人：客家人、广府人、香港、台湾移民
* 华人聚集地：大溪地岛首府帕皮
* ROULOTTE是以小货车改装成的流动小食档，据说由华人开创
* 大溪地盛产黑珍珠
* “大溪地珍珠之王”：温惠仁
* 自1968年开始举办的年度“飞龙小姐”（Miss Dragon）选美会，除了规定参赛者必须是华人或华裔外，他们也要有中文名字
* 大溪地关帝庙为南太平洋最大的关帝庙
* 沈秀纯：1869年5月19日，当地首个被砍头处死的人
* 大洋洲其他国家与地区
* 萨摩亚独立国
* 在1903年大批契约华工到来萨摩亚独立国之前，那里已有12名华人，其中6个经商：阿穆、阿苏、方违昌、阿清、阿松
* 20世纪伊始，大多数华工被派往乌波卢（Upolu）的种植园劳动，一部分被分配到萨瓦伊岛（Savaii）
* 商店集中地：首都阿皮亚（Apia）的法爱阿街
* 陈茂公司、Ah Liki家族集团
* 瓦努阿图
* 以农渔业为主
* 唐人街：Rue Carnot
* 汤加
* 银行业：马来西亚华人企业家雷贤雄与雷贤生兄弟与当地政要合作投资，创设马婆金融银行分行
* 马绍尔群岛
* 华人聚集地：首都马朱罗
* 最受华人普遍膜拜的神灵：航海神妈祖（天后圣母）、关公（三国时代的关云长）以及观音菩萨

**非洲华人**

* 时间：18世纪
* 地点：非洲东部和南部的国家，如南非、毛里求斯、留尼汪等
* 方式：契约华工，有的是自由移民
* 如今，华人遍布在非洲国家的各个角落，人数多者如南非，有30多万华人

**南非**

* 非洲大陆最南端
* 东临印度洋，西濒大西洋
* “西方海上生命线” “彩虹国度” “经济发展火车头”

**华人移民简史**

* 2002年，在开普敦展出的一幅由中国人于1389年绘制的非洲大陆最古老的地图——《大明混一图》，清晰地标出了好望角的位置，这可能是华人最早到达非洲的证据
* 15世纪，威尼斯地图制作师弗拉·毛罗在好望角发现了一艘中国船
* 1660年，一名叫万寿的华人囚犯被荷兰殖民政府从巴达维亚流放到开普敦
* 19世纪70、80年代（1886年）约翰内斯堡发现金矿—淘金梦—误认为是美国旧金山南南非老华人先驱：1907年2月，最后一批契约期满的华工撤离南非，只有305人愿意留下
* 1953年到1963年间，只有28名华人前来南非（种族主义隔离政策）
* 1995至1999年是中国进口贸易和零售生意做得最火红的黄金时代
* 三类：

老一辈：上个世纪，广东顺德、梅县的老移民及其后裔；分布于约翰内斯堡、开普敦以及比勒陀利亚等大城市，主要经营中餐馆和杂货店

中年一代：20世纪的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以投资或技术移民的身份到南非设厂及经商的港台人

* 中国大陆新移民是目前南非最庞大的移民群（30万人，1998年中南建交）之后
* 全非洲第一条受到官方正式承认的唐人街：西罗町的街道（2005）
* “老唐人街”：约翰内斯堡老城的市中心（瑞兴行、顺德家私、燕子酒家）
* 2004年，南非华社在约翰内斯堡成立了华人警民合作中心
* 2006年2月，南非首家华人保安公司注册成立
* 因早期的华人主要来自中国广东沿海一带，南非华文教育最早是以广东话为媒介语的
* 全日制华侨学校——斐京华侨公学

成立：1934年（国立学校）

地点：约翰内斯堡与比勒陀利亚的交接处

* 华文三报二刊：《侨声日报》（蒋介石题字））、《华侨新闻报》（冯荣生，1994年南非第一份民营华文报）、《非洲时报》（2005）、《虹周刊》（2006）、《声音》（2007，李铿发、刘利国）
* 2008年6月18日胜诉，获得了与黑人等同的地位与权益。这意味着凡在南非出生，以及1994年6月1日以前入籍的大约2万名华人，可享有“黑人经济振兴法案”。
* 南非首批华人国会议员：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的黄士豪、印卡塔自由党（IFP）的张希嘉、南非独立民主党（ID）的王翊儒以及南非最大反对党民主联盟（DA）的陈阡蕙（皆来自台湾）
* 约翰内斯堡首位华人市议员：孙耀亨（2006）
* 华人社团皆以“寺庙”或“祠堂”的形式成立同乡会、互救会、宗亲会
* 历史最悠久：杜省华侨联卫会（“爱国侨社”，目前福建华人最多）
* 老人院：康宁院
* 基督教是目前众多老华人信奉的宗教
* 1996年南华寺--弘扬佛教
* 开普敦市 “朝天宫”妈祖庙，供奉“海上女神”妈祖像
* 自2007年起，华社还每年一次的举办“妈祖千里出巡南非绕境活动”（巡视开普敦、布鲁方丹、德班、纽卡索、及约翰内斯堡）

**马达加斯加**

* 非洲第一大岛，全球第四大岛，印度洋航运要冲突
* 华人到来方式：自由移民、契约华工
* 最早记录：1862年英国传教士雅礼士在塔马塔夫（邹省）见到一间华人所经营的杂货
* 19和20世纪：落脚点塔马塔夫；（北）迭戈苏瓦雷斯，（南）富多凡
* 1896法国殖民政府从越南北部东京的芒街招募3000名华工，分为4批运抵塔马塔夫
* 20世纪初：在中国招3000名契约华工（广东南海和顺德；福州）
* 1959年，岛上已有8032名华人；1975年，岛上仅剩下4039名华人；1987年，岛上的华人已增加到1万2000名
* 新移民（福建人居多）聚集在一条名为Behoririka的街道做生意（唐人街）
* 华人集中地：首都塔那那利佛（此后称塔那）和塔马塔夫（唯一国际港口）
* 华人的宗教信仰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佛道教及传统信仰
* 马达加斯加的中文学校在抗日战争时期多达13所，以顺德话教学
* 3所影响较大的中文学校：（中国国民党）兴文学校、华体学校、华人天主教中心（又称古友道学校）。前两所学校后来合并成为塔马塔夫华侨小学。
* 如今，马达加斯加的中文学校只剩下在塔马塔夫的邹省华侨学校

**毛里求斯**

* 非洲著名蔗糖出口国
* 1840-1843：从新加坡和槟城，招来3000名华工（甘蔗园；工作，路易港“波累”）
* 1847-1860：这里的华商人数高达1164人
* 1860年：广东梅县客家人以商人身份来到，人数和势力都超过了福建人及南顺人
* 1901年，58名客家妇女成了第一批华人女移民
* 1920年，着手建立祠堂，南顺人一般称之为霍宅或陈宅等，至于姓刘、关、张的华人则有古城会馆
* 25卢比纸币印有朱梅麟头像（第二代华裔；毛里求斯华商总会的主席；二战号召华人成立中国人国土保卫队）
* 华人聚集地：路易港、鸠必小镇
* 新一代华人从小学习克里奥尔语——一种他们称之为“没有语法的法语”
* 非洲华人第一座庙宇：路易港的关帝庙（1842年，福建籍华人领袖陆才新）
* 在天主教规定的11月1日上坟扫墓
* 位于拉沙麟的华人公墓——南顺会馆坟场
* 仁和会馆、南顺会馆
* 岛上著名的华裔历史学家优给特·李卓凡·皮耐欧女士，分别用法文和英文，出版了有关印度洋华人移民历史的书籍
* 4份中文报：《华侨时报》、《中华日报》（繁体字及纵向排版）和《华声报》日报，《镜报》周报

**留尼汪**

* 印度洋上最富裕的岛屿，法国海外领地
* 1844年：第一批华工从海峡殖民地而来
* 首名在留尼汪开店的华人：陈章满
* 首名客家商人：李定伯
* 华人聚集地：（北）首府圣但尼、圣安德烈和圣宾华；（南）圣皮埃尔和坦邦镇
* 南顺人：北部、东部 客家人：南部、西部
* 位于留尼汪北部的利涉堂和世昌堂，创立至今已有一个世纪之久，且由祠堂发展成今日的关帝庙
* 自2004年开始，世昌堂邀请利涉堂共同庆祝关帝诞，打破了多年来各自为政的旧习
* 留尼汪的失业率高居法国之首

**安哥拉**

* 非洲西南沿海的热带国家
* 2002年，内战终于宣告结束
* 三波移民潮：

中国改革开放：10多名（贸易、中餐馆）

21世纪初内战结束（贸易、石油、建筑）

近年：2008年“安哥拉之年“（地产、制造业）

* 华人聚集地：首都罗安达（暂时没人入籍）
* 华人多来自陕西、安徽、四川等地

看家行业：承包商、建筑商、贸易商

新兴行业：物流业

未来行业：制造业和地产业

* 葡萄牙语是官方语言
* 花生月饼”——花生炒熟之后碾碎裹上面粉烤熟
* 安哥拉首份中文刊物——《中文安哥拉》于2008年7月1日创刊发行
* 当地目前唯一的社团组织：中国商会
* 商品批发集中地圣保罗市场

**尼日利亚**

* “黑非洲文化摇篮”“天府之国”
* 1931年：曾经有4名华人抵达尼日利亚
* 华人正式登陆：20世纪的50年代后期
* 早期华人企业家：朱南扬、查济民、沈文伯
* 朱南扬“伊克贾工业区酋长”
* 沈文伯：尼日利亚的首名华人公民
* 后来，由于尼日利亚开始陷入内战的纷扰，很多在尼日利亚投资的华人都暂时迁入西非的加纳或贝宁等地
* 如今华人超过7万，其中5万集中于有“西非纽约”之称的拉各斯，其他华人则分布在首都阿布贾、卡杜拉以及贡贝等城市
* 四大家族：董氏集团、查民集团“西非纺织王国”、李氏集团（拖鞋市场）、华享（陈氏）集团（搪瓷业）
* 中国集团两大项目：莱基自由贸易区、尼日利亚奥贡广东自由贸易区
* 当地目前规模最大的现代饮食企业集团：Cway
* 在尼日利亚拉各斯的伊柯贾区（Avenue Ikeja），有一条以香港在此地注册的企业——WEMPCO(董氏集团）来命名的道路。
* 华人聚集地：龙城（类似唐人街，位于拉各斯）、金贸商厦和尼日利亚大厦
* 无华文学校，但华人社团组织却不少：尼日利亚和平统一促进会、中尼华人商贸企业协会、尼中友好协会、中国工商联合会等
* 著名华人尼日利亚的酋长：胡介国、房一波和朱南扬
* 《西非统一商报》（2005），与大陆的《新民晚报》、《今晚报》以及新华通讯社合作

**肯尼亚**

* “野生动物王国”，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1963年12月12日独立
* 首都内罗毕被誉为“阳光下的花城”、“东非小巴黎”
* 郑和下西洋足迹：蒙巴萨、马林迪、拉穆岛（带长颈鹿“麒麟”回去）
* 华人聚集地：内罗毕、蒙巴萨
* 世界新七大奇观之一：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一年一度的百万角马大迁徙
* 因气候温和，联合国人居署和环境署都选择在这里设立总部
* 华人团体：肯尼亚华人华侨联合会和肯中经贸协会
* 肯尼亚华人华侨联合会成立于2005年1月8日，是肯尼亚华人成立的第一个组织
* 华联会也联同中国大使馆、经商处、新华社等出版《华声报》双月报刊；网络报——《非洲之声》
* 2006年初，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在肯尼亚开设了海外第一家调频广播电台（CRI97.9FM）

**埃塞俄比亚**

* “非洲屋脊” “享有13个月阳光的国家”
* 咖啡原产国
* 非洲之光：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和亚的斯亚贝巴机场
* 第一批：40年前，主要是河北人
* 第一波华人移民潮：2003年（河北人、江苏人、浙江人）
* 华人聚集地：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 主要行业：建筑业
* 2008年成立埃塞中国商会

**苏丹共和国**

* “世界火炉”
* 苏丹政府和南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反政府武装组织于2005年1月9日在肯尼亚内罗毕签署《全面和平协议》，结束了长达22年之久的内战
* 19世纪，英法联军统帅查尔斯·乔治·戈登在1860年率军火烧圆明园，后又出任苏丹总督
* 查尔斯总督于1885年被苏丹的民族英雄马赫迪所击毙
* 2004年，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李肇星访问苏丹期间，就向苏丹总统巴希尔表示：“中国人民欠苏丹人民一个人情。”
* 华人贡献：石油工业、建筑业
* 1999年，中国在穆格莱德盆地开发苏丹第一座油田
* 喀土穆以北约70公里的炼油厂被誉为“中苏的结晶”。2000年，中国副总理吴邦国参观炼油厂时，写下“中苏友谊丰碑”
* 1995年，武汉民营企业家李利红仅用了3年便创出资产过亿的星达公司，承包了整条尼罗河的航运
* 唐甜甜再喀土穆开办“绿湾中文培训中心”，校名灵感取自储光羲《钓鱼湾》中意境优雅非凡的“垂钓绿湾春”
* 除了友谊医院，喀土穆市中心还有华夏医院、天府诊疗所，当地医院多由河南人开办
* 第一家中文媒体——《华人商报》于2008年9月9日应运而生
* 2005年12月，苏丹籍画家阿菲菲出版了华人在苏丹的第一本画册——《我眼中的苏丹》

**埃及**

* *Maadi为开罗华人最密集的地区*
* *石材业：广东华人、、福建水头镇*
* 香港人黎馨馨创办的《中埃友谊——旅埃华人通讯》
* *旅埃华人联谊会在2009年4月创办了一本双月刊杂志《埃及华人》*

***非洲华人简史***

* 非洲是第二大洲，拥有56个国家和地区
* 在18世纪，法属毛里求斯、留尼汪、马达加斯加及荷属南非已经有契约华工的足迹。
* 1910年，非洲的契约华工已有约15万人
* 源流：
* 英属海峡殖民地及荷属爪哇
* 中国：广州、香港、澳门、汕头、厦门
* 山东的胶州湾、上海、天津、大沽及秦皇岛
* 东非：
* 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移居洛伦索马贵斯
* 早期移民为澳门华籍囚犯
* 19世纪末广东省工匠定居
* 1900年，洛伦索马贵斯和贝拉各有84名华人
* 1903年，谢三（木匠兼工程师）捐地修建中国亭
* 塞舌尔群岛首批移民：1886年23位来自毛里求斯的中国人定居首都维多利亚
* 1911-1945华人人口增长受到的影响：中国与世界形势的变迁，及非洲国家施行的华人政策
* 这时期女性移民增加，华人自然出生率提高，通婚现象减少
* 最受普遍膜拜的神灵：要数关圣帝君、天后圣母与观音菩萨
* 新移民：香港移民--台湾移民（80年代）---中国（90年代）
* 香港移民多为“投资移民”；台湾移民为“投资移民”与“技术移民”
* 中国移民以福建人居多，其次是浙江青田人
* 青田移民人数居欧洲华人之冠
* 经济活动：商业、工业、农业
* 南部纳米比亚中国城：首都温得和、奥西坎果
* 温得和中国城
* 创建人：李澄原
* 时间：1998年
* 前身：大仓库
* 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东方城
* 塞内加尔原是西非落后的国家
* 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百年大道”--“中国市场”
* 在东非的坦桑尼亚，估计有30名中医师替人治病
* 中国大陆企业家：
* 尼日利亚的朱南扬、加纳的周森林、南非的甘致竹、喀麦隆的陈伯松
* 莫桑比克华人投资发展的农场，就有30多家，大量种植香蕉等农作物
* 科特迪瓦的李承谷，与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技术合作，并聘用菲律宾的专业人才，经营大规模稻作农场，成为海外华人开拓农业的营运新模式
* 赞比亚华人农场佼佼者--中肯农场（王驰与李莉夫妇）
* 建筑业：赞比亚徐建学的扬子江建筑公司
* 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
* 摩洛哥第一位中国女医生：丁惠敏（嫁过去）
* 2007-2008组织“龙行天下耀中华“的驾车远征队，从开普敦到背景，作为北京奥运会宣传
* 福建人组织：南非的中华福建同乡总会、博茨瓦纳的福建同乡会及纳米比亚的中华福建同乡会

 美洲华人史

* 美洲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28.2%
* 北美华人约有500万
* 华工存够了资本，就做起小生意，如开设中餐馆、外卖店、洗衣店、超市等

美国

* 美国是最受欢迎的移民国家
* 每一年超过100万人成为美国公民
* 1848年，美国西岸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东北发现金矿
* 1850年，共有1万5000名华工在美国淘金
* 1850年，旧金山约有700名华商
* 1853年，当地报纸将华埠命名为“中国城
* 华人本身将旧金山华埠称作“大埠”
* 加州（California）在1855年起便向华人征收每人50元的人头税
* 旧金山立法禁止华人到市立医院就医，担任市政工作，定下反华示威日
* 1862年，美国政府决定修筑横跨美国大陆，连接东西部的铁路干线——中央太平洋铁路。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工人中，华人占了95%
* 筑路华工每个月的薪金为28美元
* 1869年5月10日，太平洋铁路正式通车
* 1959年，夏威夷华人首富邝友良成为美国第一位华人联邦参议员，也是美国第一位参政的华人
* 最初30多年的自由移民时期，有30万左右的华人先后来到美国
* 1876年，美国迎来建国100周年，旧金山却爆发经济危机
* 1882年，排华法令（Chinese Exclusion Act 1882）正式于美国国会通过，象征了美国自由移民时代的终结。
* 排华法令明文规定，在接着下来的十年之内，不许华人移民到美国，而那些已经居住在美国的华人以及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一概不得入籍。华人当中，仅有外交官、旅游者、商人、教师和学生可以入境美国
* 1920年，美国的华人仅剩下6万人。
* 1943年，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宣布废除《排华法令》
* 通过《战时新娘法令》，华裔军人的妻子或者家属获准到美国来定居。
* 70年代中叶，美国政府收容了大批来自印度支那的华人难民
* 1965年之前抵达美国的华人移民都算是老移民。
* 新移民法令在1965年通过，1968年开始实行、
* 在中美建交之前，美国允许每年有2万名华人移居美国
* 1982年，美国政府颁布了2 万个名额给台湾移民，在1987年，香港也获得5000个名额。
* 中美于1979年恢复建交之后，大陆移民遂如海水般一波波涌入
* 在美华人总人数已突破350万
* 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所引发的大火，将历史悠久的中国城烧成灰烬，美国政府储存居民身份资料的办公室也被烧毁。之后，美国政府让居民重新登记身份，有一些人便趁机用假身份取得美国国籍，这些人后来被称为“Paper Son”（冒名的家伙），其中包括不少华人。
* 2000年纽约华人人数约37万人，纽约华人占全美华人总数16%左右
* 洛杉矶（Los Angeles）和旧金山湾区（San Francisco Bay Aera，简称湾区）是高科技和创意行业的重镇
* 加州华人社区面积庞大，覆盖几十个城市，人数占了全美华人总数的40%
* 拥有超过15万华人的城市有休斯顿（Houston）、达拉斯（Dallas）、芝加哥（Chicago）
* 华人中，三分之一是拥有高学历、从事高薪工作的白领和上班族，三分之一是教育水平和收入偏低的中低下层，三分之一是介于蓝领和白领之间，以自雇人士和小老板居多，一般从事华人传统行业如餐饮业、零售业等
* 土生华人自幼受美国正统教育一部分能讲中文，但多数无法以中文书写，还有一些完全不懂中文，被称作外黄内白的“香蕉人”
* 成年新移民多数还与原居国保持密切联系，也无法放下对原居国的感情
* 受过原居国和美国教育的移民，一般则游走于两种文化间，因能熟练掌握中英文，在竞争中有明显优势
* 美国大大小小华埠约80多个，十大城市－旧金山、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Boston）、费城（Philadelphia）、华盛顿、夏威夷（Hawail）、西雅图（Seattle）、萨克拉门托都拥有较大规模的华埠
* 曼哈顿唐人街和旧金山唐人街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且历久不衰
* 曼哈顿唐人街大厦林立，旧金山唐人街主要都是不超过6层的楼房
* 东百老汇（East Broadway）街成为福建新移民的地盘
* 曼哈顿唐人街已渐渐从一个广东方言为主的社区，变成一个普通话和福建方言通行的天地
* 1975年在曼哈顿唐人街落成的孔子大厦是其中一个公共住宅计划。孔子大厦高44层楼，共760个公寓单位，成为4000多名中低收入者的家园，其90%为华人住户
* “单房旅馆”是许多老人的安身之地。它就像一般旅馆，由单人房组成，浴室、厕所、厨房和客厅则是共用空间。
* 单房旅馆月租大概是206美元
* 曼哈顿唐人街店铺楼上和地下室住着很多大陆新移民。一位新移民抱怨：“市中心房地产价格一直在涨，一房单位月租金都要500美元以上，我们只能和人分租，有不少一房单位内住了七八个人呢。”
* 唐人街于2006年3月加入帝国区
* 60至70年代，台湾留学生人数遥遥领先；但现在，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已成为最大的华人留学生群体。
* 美国人有“华人是数理天才”的形象。
* “玻璃天花板”指的是非白人在白人企业机构内，晋升到某个职位后便难以突破，如同被“玻璃天花板”狠狠压住。
* 1995年，杨致远创办雅虎
* 矽谷每年评选出的“10大风云人物”，少不了华人的身影。
* 高学历、经济稳定的华人精英，一般都喜欢选择到郊区（Suburbs）或大城市（Metropolitan）居住
* 旧金山华人文化协会曾在十多年前为华人青少年举办过“寻根之旅（In Search of Roots)”，让青少年回到祖辈的家乡，寻找家族的故事和根源。
* 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和丁肇中；女作家汤亭亭、画家陈逸飞、钢琴家孔祥东、网球名将张德培、著名电视烹饪节目主持和中餐书籍作者甄文达等，都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优秀华人。
* 1974年联邦高等法院裁定旧金山伽利略高中华人学生指控校方违宪
* 2003年美国大学理事会把中文列为大学选修课程（AP）
* 超过7500人参加过中文选修课程考试，大多成绩良好。
* 在华人人口密集的旧金山，有高达60%的华人每天阅读中文报。
* 由奥巴马领导的新内阁，也是美国历史上拥有最多华人成员的一届政府，他们分别是商务部长骆家辉、能源部长朱棣文、白宫内阁秘书卢沛宁、白宫公共联络主任陈远美以及国家安全部法律总顾问提名人方富宇。
* 在加省出生的美国华人关颖珊，在1996年及1998年均获得全美及世界溜冰赛冠军，但1997年泰拉立宾斯夺冠后，美国传媒MSNBC刊登的标题竟然是“美国人击败关颖珊！”
* 2001年1月11日，在乔治布什总统提名下，赵小兰出任劳工部长。她是美国第一位进入内阁的华人，也是内阁中的第一位亚裔妇女。
* 2008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华人又有了小突破。北加州有38名华裔候选人参选，余胤良当选为加州第一位华人参议员，马世云成为加州第一位女性华人众议员，而杨爱伦则成为纽约州议会的首位女性亚裔众议员。
* 1996年，骆家辉在华盛顿州州长选举中击败共和党竞争对手，成为美国第一位华人州长。
* 1983年，美国华人终于等到了两位华人市长。陈李婉若从一名医院社工，成为南加州蒙特利公园市市长；黄锦波则从1978起担任美国喜瑞都市市议员
* “天使岛”（Angel Island），是移民局用来羁押亚裔移民的拘留所。从1910年到1940年间，共有17万5千名华人移民被羁押在此。
* 1974年，在华人组织的争取之下，加州议会通过议案，成立“天使岛移民营历史公民委员会”。两年后，加州议会拨款25万美元进行遗址修缮。1998年，美国政府宣布天使岛为“国家级历史古迹”，并进一步进行保护和修复。
* 布碌仑日落公园（Brooklyn Sunset Park）8大道是继曼哈顿唐人街和法拉盛（Flushing）唐人街后崛起的纽约第三大唐人街
* 这个华埠占地不大，却住着超过10万华人，仅福州人就占了七成左右。主要是福建新移民

加拿大

* 加国三大城市——蒙特利尔（Montreal）、多伦多（Toronto）和温哥华（Vancouver）
* 2006年6月22日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Steven Harper）在国会里用粤语郑重地说：“加拿大道歉”，超过200名华人出席者情绪激动
* 中国与加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两国的贸易往来从1780年便已开始，比中美贸易还早了4年
* 1858年，有人发现卑诗的弗勒泽尔河（Fraser River）中游一带有金矿，此事被称为“弗勒泽尔淘金狂潮”
* 1859年到1860年之间，约有2000名华人由美国的旧金山（San Francisco）和波特兰（Portland）登陆加国
* 1860年之后，有更大批的华人从香港和澳门乘船登岸，他们大多数来自珠江三角洲
* 1880年，在加国建设横贯东西的铁路工程之中，有1500名曾经在美国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服务的华工被雇佣
* 铁路于1885年竣工后，一些年轻力壮的华工涌往卡瑞布（Cariboo）金矿以采金为业
* 加拿大政府通过《1885年华人移民法令》，向华人征收人头税，每名华人的税收是50加元。
* 1900年，数额增加到每人100加元，而1903年则是每人500加元。华人所缴纳的人头税，总共为加拿大当时的国库增加了2300万加元的收入
* 1923年，加国颁布新的华人移民法令，禁止华人入境。
* 加拿大首个华埠出现在维多利亚（Victoria）
* 二战时共有500多名华人参战
* 1947年加拿大正式废除排华法
* 1967年，加拿大政府在重新检讨移民政策之后，实行了“点计制度”
* 当“97回归”的期限越来越近时，许多香港人患上了“97恐惧症”而选择移民
* 从2002年到2004年的颠峰期，每年都有3到4万名中国移民登陆加国，占加国接收移民总数的20%。
* 1924年，为了反对拒绝华人入境的移民法的执行，华人商铺在加拿大国庆日——7月1日当天罢市，并称之为“羞辱日”。
* 华人主要聚居在各大城市，其中70%的华人居住在多伦多和温哥华。大多伦多地区（Greater Toronto）约有54万华人，居全国之冠，大温哥华地区（Greater Vancouver）也居住着约40万华人，华人总数还不到全国总人口的4%。
* 华语排在英语和法语两大官方语言之后，成为加国第三大语言
* 80年代以前，华人主要经营餐馆、杂货店、洗衣店等小生意。80年代以后，华人逐步涉足房地产、石油、金融保险、旅游、国际贸易、通讯、能源及制造业等领域。
* 温哥华的素里（Surrey）是了“小台北”
* 目前加国华人房东比例高达75%。
* 据估计，大约15%的大陆新移民长期处于失业状态，40%左右从事与原专业无关的工作
* 很多人过不了加国在职场上设置的重重门槛。第一关是学历和专业资格。第二关是语言能力。第三关最叫人头疼，就是加国经验。
* 第一个在加拿大出生的华人名叫温金有，他在1861年出生于卑诗省的格拉斯堡，并且在新西敏市长大
* 2003年时，全加华文报刊已达50多家。
* 多元文化电视台（OMNI）设有少数民族移民频道（OMNI2），专门制作和播放中文节目。
* 1993年，全加很有影响力的中文媒体——“新时代传媒集团”成立了“新时代电视”，总部设在温哥华
* 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CBC）开通了中文网页
* 华社每日的生活有中文电台陪伴，如多伦多中文电台、多伦多第一台
* 多伦多许多非华裔也开始学习中文，他们透过“汉语角”活动，和华人互相交流，学习充满乐趣。
* 全加第一位华人督察源植勉
* 中侨互助会成立于1973年，由一批热心的香港移民成立，主要是帮助新移民适应新环境，尽快融入加国社会。
* 1998年，中侨互助会创立了青年领袖培训计划

墨西哥

* 墨西哥位于北美洲南部，北邻美国，南接危地马拉与伯利兹，东临墨西哥湾与加勒比海，西南濒太平洋
* 墨西哥的天然资源丰富，主要有石油、天然气、金、银、铜等矿产，尤其是白银产量居世界之首，被称为“白银王国”。
* 墨西哥是文明古国，玛雅（Mayan）、阿兹特克（Aztecs）和托尔特克（Toltec）文化曾在这绽放出万丈光芒。它曾被西班牙统治长达300年，1821年宣告独立
* 1917年墨西哥颁布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将国名定为“墨西哥合众国”。
* 革命制度党从1929年起连续执政，71年后终于轮到国家行动党上台，执政至今。
* 1565年，随着西班牙征服马尼拉（今菲律宾首都）后，开展了与墨西哥的帆船贸易。
* 华人在墨西哥的繁忙港口阿卡普尔科（Acapulco）上岸
* 华人当中，除了一部分人在港口造船，还有一些人在墨西哥城经营理发、打铁、裁缝、铸银等生意，其中又以当理发师的居多
* 墨西哥人都亲切地呼唤华人作“拜山那”（Paisano，西班牙语意为“同胞”）
* 1864年，墨西哥迎来了第一批契约华工，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修筑连接美国与墨西哥的铁路。这批华工绝大部分是来自广东中山和四邑（台山、开平、新会及恩平）
* 枉死城和中国人山是华人在墨西哥奉献生命的见证
* 1910至1917年，墨西哥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
* 1911年，托雷翁市303名华人被杀害，正在店里做生意的华人，突然被士兵一个个拖出店外，捆在一起，让马匹拉着游街示众，直到他们皮开肉绽而死
* 1931年，墨西哥的华人人口从高峰期的4万6000人滑落至2万5000人。
* 1944年8月，中国和墨西哥签署友好条约
* 在墨西哥城的市中心有一座高约15公尺的中国钟，是墨西哥华人在1910年为了纪念墨西哥独立战争100周年而集资修建的。
* 在20世纪50年代末，墨西哥政府曾一度放宽华人移民家属到此地来团聚的条件，并且允许约3000名持“难民证”的华人从香港入境。
* 90年代初，经过墨西哥西北地区华社与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向墨西哥当局多次交涉，才解决了近万名华人合法居留问题。当地华人把这次的行动称作“大赦”。
* 目前墨西哥约有6万名华人，他们主要说普通话和广东话。另有约40余万的混血华裔
* 墨西哥华人非为4类
  1. 来这里不超过20年的打工族组成，占总人数的八成。
  2. 开小型中式快餐店的夫妻档或合伙人，占一成
  3. 有能力开连锁中餐馆，或从事私营行业如房地产等的，只有7%。
  4. 只占3%，他们多是拥有大量产业的家族企业成员。
* 墨西哥的华人目前大部分居住在西北部、北部以及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城镇。其中以毗邻美国的两个城市墨西加利和蒂华纳（Tijuana）的人数最多。
* 墨西哥城地处海拔2260公尺的高原，没有冬寒夏暑，终年云淡风轻，气候凉爽。
* 这里的华人约有一万名，以广东四邑移民为主，其中大部分是台山人，一般经营餐馆
* 北方中国人、香港人和台湾人则多数从事批发贸易，也有少数在大学任教。
* 西北部城市蒂华纳的华人人口约7000人。下加利福尼亚州首府墨西加利，干燥炎热，地面气温最高可达摄氏50度，最低35度，居住着6000名华人。这两个城市的华人，90%都开餐馆，以来自台山和恩平居多。
* 全墨西哥包括自助餐馆、快餐店和火锅店在内的中餐馆超过2000家
* 墨西哥人，不管是平日还是周末，只要有机会，就会到华人自助餐馆，享用要价75到80比索的丰盛早餐。
* 墨西哥人口味偏甜、偏咸又偏辣，餐桌上绝对少不了辣椒酱、柠檬和酱油这三宝。
* 墨西哥华人餐馆在收银台前多摆着“金蟾蜍”、“招财猫”及一些具中国特色的小饰品
* 墨西哥唯一的华人律师阚凤芹（Kan Feng Qin）
* 墨西哥入籍必须经过口试、唱国歌、然后是100道西班牙外语问答题笔试。这些题目包罗万有，涵盖了墨西哥的历史、文化、名胜古迹、地理、政治、经济、贸易等。
* 墨西哥人喜爱的“捧钱青蛙”，据当地华人说是从中国民间流传的“含钱蟾蜍”演变而来，摆在家中或店里，能招来财富和好运。
* 美墨边境是全球最繁忙的边境之一
* 墨西哥中文学校中，以墨西加利中华学校的历史最悠久。这所学校是在1920年由来自三藩市基督教会甘巴仑长老院的施家祺和麦平锦两名牧师所创立。该校只提供小学一到六年级的中文课程，采用中国小学的教材。另外还有数学补习班和英文班。校长是梁成安。
* 蒂华纳华侨协会管理的蒂华纳华侨协会中文学校成立于1940年，2008年2月由前蒂华纳华侨协会中文学校的老师李卓洪复办。
* 在墨西哥城营运了十余年的墨西哥福尔摩沙中华文化学院（Instituto de Idiomay Cultura China,s.c. ），则是由来自台湾的华裔姐妹李美虹和李丽虹共同打理。
* 墨西哥华人华侨社团联合总会（简称墨华联）是当地最活跃的社团。
* 墨西哥西北部的墨西加利是小广州
* 墨西哥城佐卡洛（Zocalo）区多洛雷斯街（Dolores）是墨西哥的唐人街
* 在这条不长的中国街附近，矗立着一座醒目的中华牌楼。牌楼竣工于2008年2月

危地马拉

* 危地马拉位于中美洲西北部，西部、北部与墨西哥等国为邻，东北与伯利兹接壤，东南与洪都拉斯及萨尔瓦多交界，南濒太平洋，东临加勒比海。
* 危地马拉是古代印第安人玛雅文化中心之一
* 危地马拉于1524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直到1821年独立，1839年建立共和国。
* 危地马拉经历数次军事政变，直至1996年底，才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内乱。
* 危地马拉在印第安语里有“森林茂密之地”的意思，林地占该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境内有中美洲最高、最活跃的火山。
* 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咖啡、棉花、甘蔗和香蕉等，小豆蔻出口量居世界首位，也是中美洲第二大咖啡生产国。
* 1860年，有一对陈姓兄弟，合力抬着一架手摇缝纫机，从墨西哥徒步走到危地马拉，从此落地生根。
* 1895年，登记的华人共有579人。
*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前来危地马拉的华人与日俱增
* 第二波华人移民潮始于30年代初，当时有不少广东中山人先到香港
* 危地马拉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华人入境的法令，包括1933年的取缔黄种人居留条例、1936年的取缔亚洲人营业条例，以及1944年的禁止新华人入境居留条例。
* 90年代的危地马拉有华人约1万4000人，其中80%以上已经加入当地国籍，大多居住在危地马拉城以及一些海港城市。
* 危地马拉华人大多经营中餐馆、杂货店和超级市场
* 华人餐馆以粤菜著称，深受当地居民喜爱。首都危地马拉城的市中心，中餐馆比比皆是，不少餐馆的室内装饰犹如香港50年代的茶餐厅。
* 危地马拉最负盛名的华商是陈幸雄。他于1978年从台湾移居危国，创建吉利公司，主要经营蔬菜水果销售。经过几十年的打拼，他已拥有150多家处理蔬果工作站，年营业额达1500万美元。生产的荷兰豆质量佳，大量供外销，故被冠以“荷兰豆大王”。
* 20世纪初，墨西哥发生排华事件，让危地马拉侨领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遂于1912年发起成立“旅中美洲危地马拉华侨总会”，简称华侨总会，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
* 1919年，两位热心的华商侨领慷慨解囊，加上当时华社的捐助，才成功买下了使用至今的会馆。
* 华侨总会会馆坐落在首都市中心1区的黄金地段，与国立圣卡洛斯大学戏剧院等国家重点保护建筑为邻。
* 危地马拉是个宗教自由的国家，其中以信仰天主教最为普遍
* 危地马拉华人天主教徒家里同时膜拜观音和圣母玛利亚
* 危地马拉华人对与异族通婚仍然持保守看法。第二代华人受父母影响，也很少与当地人联婚，达适婚年龄的男子通常会到中国娶新娘。第三及第四代华人，除少数与当地人通婚外，大部分仍然坚守着祖先的遗愿，只与华人结婚。
* 种福堂基金会（简称种福堂）则于20世纪初成立，旨在向华社筹集资金购买地段，建立一个真正属于当地华人的坟场。
* 华侨坟场由一间“先友祠”以及后方的灵堂墓园组成。
* 现代华人与当地人一样，习惯在每年11月1日扫墓。
* 华文学校坐落在华侨总会的会馆左侧，共4层楼高
* 危地马拉人民每年最期待的节庆非复活节莫属。尤其在安蒂瓜市所举办的大规模活动，吸引了许多人（包括华人）来参与

伯利兹

* 伯利兹有潜水爱好者流连忘返的海洋火山孔“蓝洞”（Blue Hole）
* 这里的总人口只有31万，种族多元，包括最早住在这里的马雅人、16世纪就到来的西班牙人、黑人与他族混血生下的克里奥尔人、仍活在19世纪中的德国村孟诺教徒、来这边工作的美国人以及开杂货店或餐馆的华人等。
* 1981年独立以来，伯利兹仍依靠英国和美国的经济支援。经济发展不稳定，失业率居中美洲之冠，有三成以上的国民为生计担忧
* 1865年，一艘载着480名广东籍契约华工的货船，从中国大陆远航至伯利兹（当时为英属洪都拉斯）。这一批华工甫一抵岸便被安置在森林中，从此过着清苦的伐木生涯。
* 20世纪初，墨西哥爆发了排华暴行，迫使不少华人仓皇离境，从墨西哥逃难到伯利兹，这才壮大了华人的行列。
* 二战后至80年代初，这里的华人人口只增加了200多人。那时候华人主要是住在伯利兹城（Belize City），另一些则住在潘塔高达（Punta Gorda）以及口罗萨（Corozal）。
* 1988年，伯利兹政府为了加速当地的经济发展，特地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宣布外国人只要购买价值2500美元的伯利兹国家债券，就可以申请成为伯利兹人，并获得护照。这一年，伯利兹华人的数量有了激增的现象，达到1500人。
* 目前伯利兹大约有一万多名华人，他们大部分聚集在伯利兹城、口罗萨和橙埠（Orange Walk）
* 关世铭（Simon Quan）和伍永泉（William Quinto）旗下的企业。是华人在伯利兹规模颇大的企业
* 关世铭所创立的百货商店货品繁多，就如公司口号——“你说得出的我们都有”（You name it, we' ve got it）。
* 伯利兹公立教会学校念书，学费不算太贵，小学学费每年不到100美元，政府免费供应书本。

萨尔瓦多

* 萨尔瓦多位于中美洲西北部，东北接洪都拉斯，西北接危地马拉，南临太平洋，面积虽小，却是中美洲工业化程度和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
* 萨尔瓦多境内有数十座火山，其中几座为迸发频密的活火山，故有“火山之国”之称。
* 萨尔瓦多原是印地安人居住地，是古代玛雅文化发祥地之一。
* 1524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821年宣布独立，1841年成立共和国。
* 1979年萨尔瓦多国内爆发了内战，长达12年之久，有近7万5000人因为这场战争而丧失了性命。
* 1992年萨尔瓦多内战结束，政府集中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目前国家经济结构仍以农业为主，盛产咖啡、甘蔗与棉花。
* 1877年，萨尔瓦多就已有华人的足迹
* 1880年，一名叫Adan Ton-Loy的华人来到萨尔瓦多，可惜其中文姓名已经无从考证。当时，萨尔瓦多的移民条例宽松，外国人在入境的时候不必提供任何身份证明文件，只需在港口登记姓名即可通关。
* 萨尔瓦多华人大多数来自广东，另外有少数华人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这些从美国来的华人，有者是1869年美国东西铁路完工后被解雇的华工。
* 20世纪初，萨尔瓦多颇具规模的华人商号已多达7家，包括广生隆、东兴隆、厚得昌、鸿盛泰、安记、昌记和广经祥，皆以丝织品买卖为主。那时，这7家商号也被华社称为“七家丝发庄”。7家商号的老板都是来自广东南海的九江。
* 1920至1930年期间，萨尔瓦多政府颁布了禁止阿拉伯人、黑人、黎巴嫩人、中国人和巴基斯坦人入境的法令。
* 1931年，萨尔瓦多受到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国内经济发展面临严重萎缩。华人商店必须每个月上缴200美元的营业税。
* 这项条例仅仅维持数月，即碰上一场改朝换代的军事政变。新的独裁政府上台后，并没有刁难华人。除了批准一些华人商店重新营业，也把营业税降到每月7.50美元，只是不准许华人售卖日常用品。
* 两年后，当时的圣萨尔瓦多市长不但把营业税提高至300美元，还限令华商必须于8小时之内缴款
* 1954年，华人的入境要求以及居留的条件才有所改善。到了1975年，当地的华人人数回升至700多人。
* 1979年10月28日，萨尔瓦多人民忍无可忍，最终爆发内战。
* 1992年内战结束后，当地政府开始实施6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移居他乡的华人才纷纷回流。
* 萨尔瓦多共有2000余名华人。他们大部分居住在圣萨尔多，其中以混血华裔居多。他们的先人早期绝大多数来自广东省南海，也有祖籍中山、番禺等地的。后期移居此地的华人则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
* 萨尔瓦多华人的经济活动领域仍以中餐业为主，中餐馆约有20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3家；百货商店居次，其他行业则包括旅店、塑胶厂、面粉厂、成衣厂、资源回收公司、中医等。
* 海拔680公尺的圣萨尔瓦多常年气候宜人，也是华人舍不得离开的因素。
* 近年移民到萨尔瓦多的华人，多数是以餐馆厨师的身份申请过来。
* 萨尔瓦多的劳工保护法非常严格。如果老板开除员工，可能会被勒令关门大吉。
* 萨尔瓦多劳工很喜欢顺手牵羊进行偷窃
* 在萨尔瓦多，要当商店的保安必须超过21岁才能持枪，要不就只能用刀。华人多请持刀保安员，以节省费用。
* 40年代初期，华人先辈就曾开办过华侨学校，以期后代们能有学习华语的机会。
* 萨尔瓦多的学生每月只需交十美元的学费，就可以在每个周末到华侨学校上两小时的华语课。
* 这所学校目前设有幼儿、初级、中级及成人4个班级，学生人数约150人，教师有7名。其中有4名是在当地聘请的台湾华人，另外3名则是由台湾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派驻的义务教师。
* 华人后裔口操着西班牙语、吃咸咸的白玉米饼——普普萨（Pupusa）、喝甜腻的热可可饮料、支持萨尔瓦多足球队。
* 中美洲暨巴拿马六国中华会馆与华侨总会联合总会，在1966年1月27日于圣萨尔瓦多正式成立。这是中美洲最大的华团。

洪都拉斯

* 1502年，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在中美洲西北部发现了洪都拉斯，并赋予这个在西班牙语中有“无底深渊”意思的名字。
* 洪都拉斯国内政局变幻莫测，自1821年独立以来的100多年间，陆续发生了百多次政变。这里20%的富裕人口掌握着国家80%的财富，而50%的人民每天只有一美元的收入。
* 199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不只夺走了洪都拉斯1万3500条人命，也造成国家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 早在19世纪末，便有一名华人从巴拿马来到洪都拉斯。他是祖籍广东的华人，叫作Dario Yip
*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洪都拉斯大约有400名华人。
* 洪都拉斯华人店主只需要懂得物品价格和名称，还有“muchas gracias”（谢谢）、“bienvenido”（欢迎光临）等日常用语，就足以应对一般交易。
* 一直到了80年代，中餐馆才后来居上，成了当地华人的主流行业。
* 1988年，包括土生土长的华裔在内，洪都拉斯全国的华人人口还不到1000名。
* 90年代初，洪都拉斯政府为了吸引外资而放宽了移民限制，只要愿意支付两万美金，就可移民
* 华人社会已发展成两个群体。他们主要分布在特古西加尔巴和北部工业城圣佩德罗苏拉（San Peho Sula），其余则散居在全国各地。

1. 第一个群体指的是在当地出生的混血华裔，人数约有两万，他们会西班牙文而不懂中文，绝大部分没有中文名字，只知道自己身上流着华人血统。前三军总司令熊伯雄（Mario Raul Hung Pacheco）、前国防部长Maria Elizabeth Chinz Sierra、前财政部长Wilian Chong Wong和前洪都拉斯国立大学法学院院长Rigoberta Chang Castilo,都是非常出色的混血华裔。
2. 第二个群体则是6000余名在最近数十年从中国大陆、台湾等地到这里谋生的华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这些华人不论是否在当地出生，多数从事中餐馆和杂货批发这两个传统行业。

* 一踏出洪都拉斯通孔廷国际机场（Toncontín International Airport），一路上都就可以看到中餐馆。在进入市区后，中餐馆更是四处林立。此外，市内与郊区，华人经营的杂货铺随处可见。
* 在特古西加尔巴山城，街道曲折起伏，群山环抱，开餐馆的华人95%是广东人。中餐因价格适中，份量又足，很受当地人欢迎。
* 在拉丁美洲一带，女孩满15岁就算成年，父母不管是贫是富，都会隆重其事，为女儿举行庆祝成年仪式。当地人多选择到中餐馆举办成年礼
* 只要有一个华人坐在店里，这家店的中餐一定既正宗又好吃。
* 洪都拉斯北部的圣佩德罗苏拉省的华人群体以及南部首都的华人群体，就是否该成立华侨总会这一个问题进行商谈。最终华侨总会在1930年代末正式成立，至今已经拥有超过3000名会员。
* 关有佩夫妇就在1937年设立了洪都拉斯华侨学校。
* 华侨总会在2007年复办了中文学习班。
* 洪都拉斯的广东人给这个国家取了一个粤语谐音「穷到拉屎」的别名

尼加拉瓜位于中美洲中部，东邻加勒比海，西濒太平洋。小国寡民，经济落后。

境内湖泊遍布，尤其闻名遐迩的尼加拉瓜湖（Lake Nicaragua），是中美洲第一大湖，湖水湛蓝清澈，美不胜收。周边300多座大小不一的岛屿，是寻幽探秘的好去处。中部高原山地多为活火山，因而有“火山之国”的称号。

       1502年哥伦布发现了尼加拉瓜，1524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821年宣告独立，1823年加入中美洲联邦，直到1839年正式建立共和国。美国从20世纪初多次干预尼加拉瓜政局，并在1937年扶持苏慕沙家族（Somoza family）上台，开启了尼加拉瓜的独裁统治时代。

       1972年，首都马那瓜经历大地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1979年左派桑地诺解放阵线（FSLN，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取代独裁政权成立新政府，实施私产国有化政策。

百余年来，尼加拉瓜的政局动荡不安，国家经济停滞不前，民生困苦。生活在这个命运坎坷的国度，华人只能随之载浮载沉，前途未卜。

于华人何时最早抵达尼加拉瓜，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约于19世纪中叶，便有华人到尼加拉瓜来。另一说法却认为，直至1884年才有华人首次登陆尼加拉瓜的东岸地区。此外，也有记录显示，在1890年，有一些华人从美国、墨西哥等国移居到这里。

       接着，华人逐渐开始从东岸往西移，在马那瓜、格拉纳达（Granada）、马萨亚（Masaya）、莱昂（Leon）等省落脚。安定下来之后，华人大多数都选择从商，经营小型的杂货店，开设肥皂厂或饼干厂，也有华人经营餐馆，只有少数的华人务农或当工人。日子一久，便有一些华人和当地的妇女成婚，并且生下了混血的后裔。

       1930年，尼加拉瓜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华人入境。翌年，尼加拉瓜政府制定新的保护劳工条例，规定外侨所经营的企业必须有75%的员工是尼加拉瓜人。这一项新政策的推行，使不少华人陷于困境，不得不做离开此地的决定。

       如此一来，尼加拉瓜的华人人口自然就越来越少。1937年，尼加拉瓜的华人约有1000人。

       二战期间，大批华人涌进尼加拉瓜，华人人口逐渐回升。在1967年，尼加拉瓜已有大约3000名华人，其中以广东人最多，华人商号则超过250家。到了1970年代后期，这里的华人人口增至4000人左右，其中土生华人就占了3000人，他们主要是聚集在东岸和首都马那瓜一带。

       然而，70年代发生的两件大事，却令原本稳定的华社开始动摇了。一是首都马那瓜在1972年被大地震所摧毁。这次的地震不只造成死伤无数，经济大受影响，也震毁了位于市中心的中华会馆，并且阻滞了华资企业的发展。

       第二件事则是1979年桑地诺解放阵线成功推翻了苏慕沙的独裁政权，并将国家导向社会主义之途。这个新政府除了把私人财产国有化，也推行激进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内陷入通膨危机。同时，由反对派挑起的频繁内战以及美国方面的经济制裁，更使原本危困的局势雪上加霜。

       眼看情况越来越糟，许多华人于是纷纷避走他乡，转往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及巴拿马等邻近国家，尼加拉瓜的华人人口骤降。而那些坚持留下来的多数是当地出生的华人。到了1983年，此处的华人商店已经减少至180多家。

       在1990年之后，尼加拉瓜的政局逐渐恢复稳定，新的民选政府励精图治，除了积极鼓励外商前来投资，亦很努力寻找解决外债的方法。

       从1992年开始，台湾人也陆续来这里投资设厂。到了2005年，华人成衣厂已经为尼加拉瓜制造了3万多个就业机会，当时的加工区一片欣欣向荣。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桑地诺解放阵线于2007年重回政坛，有好些华商担心过去的乱局将会重演，于是又再度酝酿着准备离开这里。

   目前，尼加拉瓜的华人可分为三大群体。第一个群体是老华人，他们多原籍广东，大多已年近古稀，主要居住在大西洋沿岸地区。

       第二个群体是土生土长的华人，他们是构成尼加拉瓜华社的主要群体，约有1800人，散居在全国各地。他们经过百余年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已经繁衍到第四、五代。这群混血华裔大部分都不会说华语，只会说西班牙语，也没有中文名字，有些甚至从外貌上看已不似华人，只能从他们的姓氏如司徒、刘、张、关、王等来判断他们具有华人血统。

       第三个群体则是近20余年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移居到尼加拉瓜的华人，约有300人。他们大部分是在成衣厂打工，或是结束工厂合约后，选择留下创业的华人。另一些华人则是早期外派到尼国协助开发农业技术的专家，任务完成后，他们因留恋这里的自然环境而留下来。

       华人大多经营中餐馆和从事商品贸易，也有华人经营杂货店、生产药品或种植稻米等。整体而言，华人在这里的经济状况还算不错，大部分人都有车有房。他们多数集中生活在首都马那瓜和莱昂省。

       由于尼加拉瓜近年来政经陷于困境，治安不靖，许多华人选择离开。不过还是有华人持观望态度，静观其变，何去何从，取决于今后局势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的尼加拉瓜加工区，成衣业发展欣欣向荣，为当地人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

       1992年台湾成衣制造企业富太，打响了华人到加工区投资的第一炮。翌年，年兴纺织也到这里开设成衣厂。接着鼎大、中国今一等也陆续到这里设立分公司。全盛时期，这个加工区共有12家华人成衣厂，总投资额达2亿美元，这是华人在尼加拉瓜史无前例的大型投资，也是华人经济发展最辉煌的时期。

       目前担任诚扬成衣厂（Chen Yong S.A. ）总经理的张光宇说：“早期这里的成衣厂很好赚。当时，尼加拉瓜的纺织品出口到美国没有限量，运输又便利。这里的劳工工资低，也没有劳资纠纷问题。那时的投资环境真是好得没话说！”他指出，像成衣厂这类劳力密集的工业，如果少了这3项优势，就很难维持成长动力。

       然而，自左翼政府奥尔加特（Daniel Ortega）执政后，一切发展优势不复存在。新政府至今已数次调高国民最低工资，从先前的月薪100美元调高至125美元，无形中提高了成衣厂商的生产成本。

    这里的生意不好做，政治不稳定，治安也越来越差，很多华人都选择离开。但是也有人选择留下来，而吸引他们留下来的，不是奢想大富大贵，而是那不愁三餐温饱，又能获得适当享受的简单生活。

       据这里华商反映，由于这里华人少，同行竞争不那么激烈，没有竞相压价的恶性竞争。而且这里人工便宜，虽然工人工作效率低，但秉性纯朴，很少顺手牵羊偷东西。当地人虽然穷，却舍得消费，所以生意还是很好做。

       在东方市场（Oriental Market）经营服饰批发的浙江青田人南旭东说：“我们这里是全国最大的中国货品批发中心，不止用现金交易，人流也很多，看起来是治安不太好的地方。但是我在这里做了几年生意，也没碰到有人进来打抢，反而常常看到店门前的路人被抢。可能是我们市场内的商店都会相互照应，抢匪才不敢猖狂作案。”

暇时南旭东会带着家人到海边购买新鲜海产，他开心地说：“尼加拉瓜两边靠海，海产很便宜，但是当地人不太吃鱼，我们就有机会买到便宜又新鲜的鱼虾。这里虽然不是什么都买得到，可是我已经觉得生活很不错了，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请几个工人帮我做事。如果在中国，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享受。所以我喜欢这里。”

       来自巴拿马的吴小丽说：“2006年8月我和夫婿决定来尼加拉瓜做生意。这里人民虽然穷却舍得花钱，竞争也小，生意好做得多。”他们现在一切满足，还没有离开的打算。

       尼加拉瓜华人基督福音会，是部分华人的生活场所。该会查经班成立了十余年，成员多是来自台湾的华人女性，每到周四，他们就会聚在一起，分享阅读圣经的心得，闲话家常。此外，他们也会不定期相约在周六晚上，带着家人到餐馆饱餐一顿，唱唱卡拉OK，或喝酒聊天，愉快地度过周末。对他们来说，这些活动是日常生活里重要的调剂品，不管日子多么单调，能跟三五知己相聚也是一种享受。

 尼加拉瓜最早的华人团体，是1925年由7名华人共同成立的中国友好联盟（China Fraternal Union）。1930年代末，随着华人人口逐渐增多，当地华人觉得有必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社团，以维护华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团结华人的力量。1942年中国友好联盟改名中华会馆，并注册成为尼加拉瓜第一个合法的华人社团。成立初期，会员主要为居住在尼国太平洋沿岸的华人。

       到40年代后期，会员已发展到尼国各地，许多华人以个人或团体的身份加入，中华会馆成了尼加拉瓜最活跃和重要的社团。

       早期中华会馆主要的任务之一是兴办中文学校，为华人子弟提供学习汉语文的机会。曾在中文学校念过书，拥有四分之三华人血统的刘兰坤回忆道：“还记得我十岁时曾经上过中文学校，那时会馆还专门从中国请老师来教我们说广东话。”

       另外，会馆还设立神像，带领会员祭祀祖先。中华会馆也为华人排难解纷，收留无家可归的华人，办理华人入境手续，及提供生活资讯等。此后，以中华会馆为核心的尼加拉瓜华社茁壮成长，随着华人移民持续移入，会馆的成员也不断增加。

       1972年，一次大地震使位在市中心的中华会馆会所毁于一旦，损失惨重。更不幸的是，随着1979年左派桑地诺政府上台，会馆被迫停止运作，直到1992年才恢复活动。

   华人人口少，加上文化断层，有些尼加拉瓜华人悲观地说：“30年后，中华文化说不定会在这里消失，如果没有办法把文化传承下去，下一代的华人将会忘记自己的华人身份。”而在这个非常时期，Fabio Lau所做的一切就显得难能可贵。

       60多岁的Fabio Lau是土生土长的华人，他只有二分之一华人血统，不会说中文，只会西班牙语，原来连自己姓“刘”都不知道，却在尼加拉瓜进行了3年多的华人研究。为了探寻华人先辈的足迹，他走遍尼加拉瓜，反复探寻和记录，并从各个政府单位收集官方资料，撰写了数本关于尼加拉瓜华人移民的史书。

       2005年，第一本《尼加拉瓜华人移民史》（Antecedentes Históricos de la Inmigración China en Nicaragua）问世。2007年的《华人在尼加拉瓜之根源与发展历程》，则更详细地纪录了华人先辈在尼加拉瓜的发展经过。他说：“接下来，我要让全国人民认识华人。”他计划把记录华人历史的文章，像传单一样免费夹带在尼加拉瓜日报供读者阅读。除了这些关于华人历史的研究，Fabio也将华人在当地的生活现况，刊登在由中华会馆出资，不定期出版的西班牙语刊物《EI Mandarin》上。

       Fabio之所以开始热衷研究华人历史则是缘起于数年前的一段经历：“2004年的某一天，一名加拿大学生来我们的华人中心，说要找华人在尼加拉瓜的资料。可是，我们无法提供任何资料。因为属于华人的历史，早在1972年地震时，就跟着旧中华会馆一起消失了。”

       在那之后，他意识到必须有人记录华人在尼加拉瓜的发展历程。他知道如果再不记录，资料就会越变越少，所以他便从父亲留下的一些文件中，开始着手研究华人在当地的移民经过。

 身在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局势都不稳定的国家，选择留下来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人，没有十足的归属感。而土生华人，对中华文化已是一知半解，想要支撑起整个华社，已是有心无力。

       现阶段的尼加拉瓜华社发展，就像是一盘散沙，这里的华人，前途未卜，忧心忡忡。

  哥斯达黎加位于中美洲南端，介于太平洋与加勒比海之间，南北分别是巴拿马和尼加拉瓜。由于境内森林密布，野生动物种类繁多，享有“野生动植物园”和“生态家园”的美誉。

       哥斯达黎加政治安定，是拉丁美洲各国中实施民主政治最悠久的国家，于1948年内战后更废除军队，在国际间以爱好和平著称。如今，它是中美洲国家中经济最发达、教育最为普及的国家，2007年与中国建交。

华人移居哥斯达黎加已经有160年的历史。

       早期千里迢迢去到哥斯达黎加的华人，大部分都是苦力，他们当中多数曾参与太平洋铁路的建设工程，最终定居于沿海一带。

       1855年，有32名华工自巴拿马被引入哥斯达黎的加泮大连省（Puntarenas）；同年，另有45人稍后抵达。他们被派往农园工作，是当地最早的一批华人。

       哥斯达黎加自19世纪70年代起便开始兴建铁路，因而需要大量的劳工。当时，身在秘鲁策划华工兴建铁路的美国人Henry Meiggs Keith，在1873年引进了653名粤籍华工。这批来自香港及澳门的华工，在海上航行了近3个月以后，才抵达哥斯达黎加。

       甫一下船，这些华工便马上被安排去兴建连接圣何塞到大西洋沿岸的铁路。他们工作时赤身露体，餐风露宿，除了面对恶劣的非人待遇外，还必须面对蛮荒地区瘟疫的侵袭。不少华工因为不堪被凌虐，为求解脱而选择自杀，华人人数也就因此明显减少。根据人口统计调查显示，1855年抵达哥斯达黎加的77人中，到了1864年仅剩13人；而1873年间到来的华人，在十年后只剩下200多人。

       1897年，哥斯达黎加国会以华人是“有害种族”为由，通过了一项禁止华人入境的法令。直至1943年，经由吕华昌（Luis Wachon）等华人侨领的努力交涉之后，这些对华人不公平的禁令才得以解除。

       20世纪初，许多华工在合约期满之后均选择留在哥斯达黎加发展，有的弃农从商，有的栽植香蕉、可可、咖啡等作物。

       那时候，有一批中国人为了达成淘金梦，决意偷渡到美国的旧金山去，结果没有得逞，该船惟有南下并驶至哥斯达黎加的泮大连省港口。上岸了之后，他们在香蕉园或华人的店铺打工，储蓄了一定的资金便自已做生意。当经济状况开始稳定后，有一部分华人重返中国家乡成亲，并把妻儿带回哥斯达黎加，也有部分华人和当地的妇女结婚，从此衍生了许多混血华裔。

       从20世纪50到70年代，哥斯达黎加的移民政策相当宽松，较易申请入境证。华人只需在该国定居5年之后，便能够成为合法公民。因此，从广州、中山等地区涌入了大批中国移民。

       最近一波华人移民潮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哥斯达黎加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敞开国门，欢迎移民的到来，因而吸引了许多香港、台湾与中国大陆等地区的移民。有些新移民开设中餐馆或杂货店，有的投资设厂。

目前，哥斯达黎加华人约有4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他们主要经营传统的中餐馆、五金店、杂货批发、伙食店等；近年也进军其他行业，如旅行社、旅馆、汽车行等。早期华人多来自广东，聚集在泮大连省；后来的大批恩平人则落脚柠檬省（Limon）。如今，大部分老华人以及新移民大多在首都圣何塞经商。

    如今，华人已成为哥斯达黎加社会结构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沿海的柠檬省、泮打连省内的小城镇到国际大都会圣何塞市中心，每隔几条街就可发现一两家中餐馆和挂着中文招牌的杂货店与五金店，华裔的脸孔也随处可见。

       最初，大部分老一辈的华人都抱着落叶归根的观念，赚钱回国、买地盖房、安享晚年。然而，经过几十年的拼搏，在当地闯出一番事业后，观念已慢慢转变。如今他们选择在当地购地置业、落地生根。无论在人口集中的城市，还是人烟稀少的小镇，华人已从家庭式的杂货铺、餐馆、伙食店等，逐渐扩大经营房地产等领域。尤其在一些华人聚居的城市，华人商业占有很大的份额。老一辈的华人多以开中餐馆起家。如今，这些中小型规模的餐馆遍布全国各地，非常受当地人欢迎，尤其在首都圣荷塞，华人餐馆最具规模，且数量也最多。这个不满30万人口的首都，在闹市的大路两旁，中餐馆鳞次栉比，相隔几步便有一间。较早时，华人因资金少，一般在较偏僻的乡郊创业，这些地方治安不好，大家都步步为营，做足保安措施，唯恐发生不测。

       中餐馆大多是小本经营，属家庭式的生意。只需一个小店面，几张桌椅，便可开张营业。老板、厨师、服务员，打扫卫生，则动员全家，各司其职。如果生意兴隆，顾客盈门而忙不过来，至多雇用一两个外人助手。不过在首都闹市，也有三几间大型的中餐馆，富丽堂皇，装潢讲究，上门的食客不是达官显贵，就是富商巨贾，像“皇朝”、“新东王”等饭店，都是有名的大餐馆。

  跟中餐馆一样，华人的杂货店，也多是家庭式的经营。不过，当中不乏具规模的连锁大型超市。超市售卖的货品，包括吃的用的，大多从中国进口；也有少数从日本、美国等国家进口电器、电脑与汽车零件。哥斯达黎加中哥工商联合总会曾举办过几届中国产品展览会，成为当地最具规模及影响力的商贸平台。

       从中国进口的各式商品价廉物美，深获哥斯达黎加人欢迎。华商每年都会往返中国几趟，与制造商洽谈合约进口货品。当地中国杂货业的繁盛，无形中也带动了该国进出口贸易行业的发展。

       哥斯达黎加以农立国，盛产的咖啡、可可、香蕉、凤梨、甘蔗等远销世界各地。华人资本家以其雄厚的资金，丰富的营运理念，购买大片的农园，大规模栽植蔬果，供本地市场与外销。也有企业家投资设厂，进军制造业与食品加工业。台湾人在渔业与水产业累积了丰富的经验，移居到哥国之后，因势利导，占天时地利之优势，投资远洋捕鱼业及鱼虾养殖业，获利颇巨。

       哥斯达黎加沿海风光绮丽，境内多高原山地，火山穿插其间，迸发出的喷泉，云雾缭绕蔚为奇观。南部的拉米斯塔德国家公园，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首都圣何塞美丽洁净，被誉为“美丽的花园城市”。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的哥国旅游业发达，沿岸省份的海港，常有来自北美、南美洲国家的游轮，载来许多游客。这些小镇内的小型旅馆，大部分由华人经营。旅馆设计简单，但设备齐全，加上价钱低廉，单人旅客一晚最低收费只要十美元左右，成为许多游客的首选。这些旅馆大多是当地经营五金批发零售或农牧等业务的华商，进行多元化投资的副业。

       近几年华商除了发展传统行业，也积极开拓新领域。他们看中当地人每年重修房子的习惯，极力进军五金零售批发、室内设计装修、建筑工程承包等行业。随之还兴起了多家房屋中介公司，替屋主办理买卖房屋、出租房子等业务。此外，亦有华人涉及服装、娱乐等行业。

       哥斯达黎加的国泰金融集团，是中美洲第一家华人控股的金融机构，集团旗下的哥斯达黎加国泰银行，可满足当地商家，尤其是华商在财务上的需求，同时促进该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商业发展。

在哥斯达黎加，华人一般上事业有成，生活安稳。尤其老一辈华人，生性勤劳节俭，颇受当地人敬重。然而，由于当年华人妇女移民较少，两性比例悬殊，定居之后，多半与当地妇女通婚。他们终日忙碌于创业工作，无暇督导子女，儿女们从小与母亲一起生活，长期受母方的熏陶，因.此都逐渐本土化，失却了中国的传统习性。但他们仍保有华人的姓氏，并以拥有中国血统而自豪。

       第二、三代的混血华裔，很多都已成为医生、律师、会计师与工程师等专业人士。他们也成立一个“华侨专业协会”，经常聚集连络感情。不少混血华裔也担任公务员，热衷从政，至今已有3位华裔国会议员。

       他们也重视仪表。出门前一定会悉心打扮一番。走在街上，男的西装笔挺，女的时尚优雅。见面或告别时，不忘握手、拥抱和亲吻等礼节。

       哥斯达黎加华人大部分祖籍广东，到中餐馆用餐或在家常吃到的大都是粤菜。然而，他们也接受当地美食，尤其偏爱炸大蕉、玉米、薄饼、黑豆炒饭等，平常在家中准备的中式美食，早已经混合当地的食材与口味。哥斯达黎加是世界上盛产玉米的地方，华人家常饭菜中，少不了玉米粽、玉米饼、玉米团、玉米酒等。

       哥斯达黎加土质优良，盛产的蔬果新鲜甜美。华人喜欢在周末逛圣何塞的蔬果市集，这个大型露天蔬菜水果市集位于市中心附近的第十四大道，每逢周六沿街开放，出售各种新鲜蔬果，价格比超市便宜，广受市民的欢迎。

       哥斯达黎加的甘蔗糖赫赫有名，咖啡豆亦属顶级品种。大部分出口到欧洲国家。咖啡已成为华人早餐最普遍的饮料，而午餐和晚餐他们则饮用加粗糖制成的郎姆酒、糖酒等。每逢周末或假日，华人喜欢邀请好友到家中，喝着咖啡，吃着水果和甜品，闲话家常。

       搓麻将、下象棋是当地华人喜爱的休闲活动；运动方面，华人首选乒乓球及羽毛球。当地人非常喜欢与华人切磋球技，年轻华人则喜欢与当地人一起踢足球、跳交际舞、逛街或看电影，生活多姿多彩。这些互动的交流活动，无形中促进了华人跟当地人之间的了解。

   2003年10月6日，哥斯达黎加国会将每年十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订为“中华文化日”，华人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这是华人经过160年辛劳努力的成果，也是当地政府和人民认可华人贡献的具体表现。

       每一届的中华文化日，哥斯达黎加华社各团体都会在旅哥广东华侨联合总会的带领下，全情投入，在国家公园、国会大厦和文化广场等地区，举办游行、书画工艺品展览、义卖、现场中餐烹调和传统歌舞表演等活动，中华文化气氛弥漫现场。除了华人，游行表演团队中还包括了一群当地青少年，与华人同欢共舞。

       哥斯达黎加华人重视中华节日，一般都会与家人一起欢度，春节会在家中吃团圆饭及向亲人朋友拜年。各地的中华总会，会举办一系列的迎春活动，尤其除夕夜的晚宴和大年初一的舞龙舞狮表演，更是不可少。

       每逢春节，在圣何塞市中心的中餐馆都会趁机推出应节菜肴。这些菜肴的名字都别具一格，寓意在新一年带来好运、幸福和财富。另外，业者也会准备一连串的欢庆活动，其中包括别开生面的醒狮表演、中国乐器、传统舞蹈演出、传统服饰时装秀、中华武术等。

       端午节最主要庆祝活动是赛龙舟。直到今天，在北圣何塞的La Ribera de Belen河畔，每年端午节都有举行龙舟竞赛活动。

       圣何塞市广东同乡会也曾举办盛大的中秋庆祝和牡丹小姐竞选会。这项节庆活动在酒家举行，会场以嫦娥奔月的彩画作布景，佳丽们身旗袍，在传统乐曲的伴奏下，登台亮相。如此气氯热烈的庆祝会虽然不是每年都有，却也为当地华人津津乐道。

当地有30多个华人社团散布各省，其中最主要的是设在圣何塞的哥斯达黎加中华总会，其他还有恩平同乡会、中哥华人华侨联合总会、致公党、台湾协会等。这些华人社团大多数仅靠老华人在支撑，年轻一辈华人大多参加哥斯达黎加华人青年协会、华侨专业协会以及中国哥斯达黎加工商联合总会。

       中华总会共有泮大连、柠檬、尼哥耶、圣十字中华会馆四个分会，鼎盛期会员人数曾高达2000余人，目前人数仅约200人。中华总会为加强各社团间的凝聚力与联系，经常举办大型新年、中秋晚会及其他艺文活动。

       为促进中哥两国贸易和提升华人社会地位，中国哥斯达黎加工商联合总会于1992年成立。现任会长翁翠玉上任后，于2005年创办了中美洲第一份中西文双语会刊——《工商》。该杂志面向哥斯达黎加主流社会及广大华裔，免费赠阅。杂志内容主要涉及中国哥斯达黎加双边贸易促进活动、两国商界投资资讯、杰出商业人士专访以及两国文化交流等；总统阿里亚斯、外贸部长鲁伊斯等官员都先后发表过文章。

       当地华人没有出版任何中文报纸，市场上可见的三份中文日报，即《拉美快报》、《拉美侨声》和《新报》，都是从巴拿马进口，除了巴拿马新闻，也有哥斯达黎的相关报导。而中文刊物则有《活水》及《号角周报》两份免费赠阅的资讯刊物；另外，中华总会、海外团结协会、台商会、台湾协会以及佛光山等均会定期出版会刊。

哥斯达黎加华人多为天主教徒，尤以第二代为甚。亦有小部分华人信奉基督教、佛教与道教。华人社会现有4间教会，即圣荷西华人福音教会、圣荷西国语浸信会、圣荷西活水基督教会和哥斯达黎加台福基督教会。四间教会的会友总数约350人，每周参与崇拜的人数约300人。身为佛教或道教徒的父母亲都很开放，会尊重孩子的选择。因此一个家庭成员信仰不同的宗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哥斯达黎加华人散居各地，当地没有华人庙宇。华人惟有在住家或店铺内安置神像或祖先灵位，每天简单祭拜。哥国唯一的华人义山设在柠檬省，历史悠久，多埋葬第一代华人移民。清明时节仍有少数老一辈的华人到这里扫墓，悼念先人。

       如今，华人葬礼都依照各自所属宗教仪式进行，分别葬在当地人经营的坟场。大部分华人后代皈依天主教，自然选择天主教式的墓地。与当地教徒一样，华人都在每年的11月2日万灵节，一家大小带着鲜花、水果等祭品，前往坟场扫墓，纪念先人。

 在哥斯达黎加，华人子女可享有6年义务教育。华人子女大多就读于公立或私立学校，亦有一部分进入美国学校或其他国际学校。公立学校教学语言以西班牙文为主，部分学校亦有英语课程。私立学校则以西文及英文双语教学，但仍以西班牙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美国学校以英文为主，兼有少部分西文课程。

       华人家庭重视子女的教育，大部分华裔青年都有机会受高等教育或专业的技能培训。

       目前，真正修读中文的华人后裔非常少，而且学习管道有限。现只有私立维多利亚学校及佛光山哥斯达黎加福慧精舍中文学校开办中文班。

       台湾人罗贞香女土开办的维多利亚学校，于1991年12月创立。从1979年开始的托儿所，到后来1990、1998年逐渐成形的中小学，通过当地台湾华人资助，罗女土一步一脚印慢慢地把学校办起来。该校原址位于首都圣何塞圣彼得区内，由于学生人数日益增加，学校在2000年搬迁到首都郊外。

       维多利亚学校把中文列入必修课，教学分为初级、中级与高级，从幼儿班至中学七年级，同时提供课外一对一补习课。毕业后，成绩优越的学生更有机会获得奖学金前往台湾大学深造。校内的学生大部分是当地人，只有小部分是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等地的华人学生。

       在哥斯达黎加成立了将近20年的佛光山，是中美洲地区的主要分社。佛光山福慧精舍配合当地慈善机构Atenas红十字会，有时派发物资救济该国贫民。

       除了弘扬佛法，福慧精舍亦设立中文学校，以培育华人下一代人才。该校目前有140多个学生，其中三分之一是当地人，其余则是华人后裔。中文班固定在每个星期六全天教学，也安排一对一的个人补习。由于当地华人在中文听力与书写上比较吃力，学校尽量采取图文并茂、轻松易懂的教材，分初级、中级和高级3种。

私立维多利亚学校创办人罗贞香女士是首位在当地办校的台湾人。

   随着中国的崛起，每年都有大量哥斯达黎加厂商参加广交会和其他中国商品交易会，到中国旅游的人也逐年增多，当地掀起了一阵学汉语的热潮。

       有鉴于此，中哥工商联合总会于2006年开办了首个“商务汉语”学习班，近20名哥斯达黎加企业界人士成为首批学员，其中不乏知名银行集团、物流企业、进出口公司负责人。当中更有一些华人后裔，他们多不谙中文，但仰慕中华文化，借此机会好好地学习中文。

  在哥斯达黎加，许多华人后代拥有地道的西班牙姓氏，例如Sanchez、Acon等；或者根本说不清来源，如Yockchen、Sanchun、Manzan等不中不西的奇怪姓氏；有些甚至一家人拥有不同的姓氏。

       西班牙式姓名的排列顺序通常为：名字、父姓、母姓。有些妇女结婚后，会在她的本名后加上丈夫的父姓，中间则用前置词“de”连接，如前柠檬省中华会馆会长黄倩珍女士，姓名是“Juanita de Acon”。

       早期华人与哥斯达黎加女性结婚后，为了得到当地户籍，都选择以妻子的姓氏为小孩登记户口。如华裔前驻华大使Francisco Tacsan，其家族在哥斯达黎加的姓氏是Tacsan，但其祖先本姓应为卢（Lu）。

在哥斯达黎加，华人从早期的被排斥到最终被接纳，是数代人坚持不懈地奋斗与抗争的结果。

       如今，华人已渐渐融入当地，成为哥斯达黎加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着富足与安逸的生活。展望未来，哥国华人的前途还是令人感到乐观。

   巴拿马，位处中美洲地峡部分，东西各与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为邻，南北濒临太平洋以及加勒比海。

       巴拿马境内贯通太平洋及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有“世界的十字路口”之称，在经济及军事上极具重要性。巴拿马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该国发展成为中南美洲最重要的交通运输中心，以及拥有100多家国际银行代表处的金融中心。

       巴拿马于1501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821年独立成为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一部分。1830年，大哥伦比亚共和国解体，巴拿马成为新格林纳达共和国的一个省。1903年11月3日，巴拿马脱离新格林纳达共和国，成立巴拿马共和国。

  巴拿马的第一批华人移民是在1854年左右抵境的，他们主要从事铁路建筑的工作。当时，西班牙殖民统治者为了发展当地经济，计划开辟一条横贯巴拿马地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Panama-Colon）的铁路。由于当时黑奴制度被废除，劳工极为缺乏，统治者遂转而引进契约华工。1848年，一家专门承包铁路修筑工程的巴拿马铁路公司，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量招募华工。1851年到1856年之间，他们把大约两万名华人送到巴拿马修筑铁路。

       华人不仅是修筑铁路的主要劳力，在开凿举世闻名的巴拿马运河工程中也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从1881年运河工程动工开始算起，巴拿马运河公司在20年内先后招募了上万名华工。1914年运河竣工之后，巴拿马人在这项工程最险峻的地方树立了“契约劳工亭”，以表达他们对华工的崇敬之情。

       20世纪20年代，美洲国家接连颁布限制移民法令，巴拿马政府也依样画葫芦，制定了限制华人入境法令。这时期墨西哥爆发排华暴行，大批华人流落到巴拿马。1935年，巴拿马政府规定，在农工商业等领域所雇用的职工必须要有至少75%是巴拿马人，而外籍人士在巴拿马经商也必须有当地人股东，这导致华人营业困难，失业率激增。后来经中国驻巴拿马外交机构及华商的努力交涉，巴拿马法院最终裁决该规定违宪而停止执行。

       据中国驻巴拿马外交机构的统计，1945年巴拿马境内的华人不足2000。到了60年代，为了配合巴拿马经济的发展，巴拿马政府实施了开放式的外国人投资条例，促使很多华人重返巴拿马。

       基本上，巴拿马的华人新移民可分为两批。

       第一批是1990年代末期来自港澳的华人，他们属投资移民，带来雄厚的资金，准备投资在巴拿马运河区、自由贸易区或者商业中心。

       另一批华人新移民，则大部分来自广东花县，他们随着20世纪80、90年代的移民大潮来到巴拿马，并散居在郊区小镇，从打工开始，慢慢积累资本，再踏上艰苦的创业路。经营小本生意的以中餐馆、洗衣店、伙食店、五金店居多。

       这些充满冒险精神的华人新移民，散布于巴拿马许多偏远而资源匮乏的市镇，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注入了不可忽视的推动力。

巴拿马城中巴公园内华人抵达巴拿马150周年纪念碑。

巴拿马华人人口居全中美洲之首，占巴拿马总人口的4%左右；而混血华商的人数可能达到全国总人口的10%以上、当地华人有90%来自中国广东省，以花县最多，约占70%；另外也有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的华人。

       华人主要分布在首都巴拿马城和科隆市（Colon），部分散居在戴维（David）、贝诺诺美（Penonome）和奇特雷（Chitre）市等地。巴拿马城华人最多、新、老华人移民，分别聚集在新华人街区和旧唐人街。

       巴拿马华人中富商巨贾不多，多数是中产阶级，收入增长平缓。150多年来，华人从小型中餐馆、洗衣店、杂货店开始，扩展到大型加工业、制造业、进出口贸易，进而渗透至旅游、医疗、金融、建筑、运输等行业，基础稳健。他们开的成衣店、珠宝行、钟表店、烧腊店等在巴拿马城区比比皆是；而城外较偏远的乡镇，街头巷尾都有华人开的伙食店和中餐馆。

       此外，也有华人从事农牧业，以种植蔬果和养殖鸡、牛为生。这些农产品在当地极为畅销，科隆区一家由华人经营的畜牧场，是该区最主要的牛肉供应商；此外，由台湾人投资种植的柚木林，占了巴拿马柚木总量的50%。

       巴拿马运河让巴拿马在国际上声名显赫。提起运河，当地华人会想到香港和记黄埔集团旗下的巴拿马运河港口公司，这家由香港企业家李嘉诚创立的公司，于1997年标得对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长达25年的管理权，并于2005年对运河扩建工程追加投资，和记黄埔在巴拿马运河地区的投资总额已达4亿美元，让当地华人引以为傲。

       由于华人移民历史悠久，加上人口众多与集中，巴拿马华人在文化传承方面没有太大的难题。他们成立了中美洲最具规模的中文学校，也创办中文报、网路媒体以及中文电台，丰富了华人的精神生活。近年当地开放的经济体制，不断吸引、也留住了华人的心。他们积极参与当地发展，与国家共存共荣

 以前，老一辈的巴拿马华人为了生活和孩子的将来，不分昼夜埋头苦干。迫于无奈，他们把孩子交给当地保姆照顾，也让下一代接受当地教育，以便他们可以轻松地融入当地社会。然而，却忽略了让孩子接触中华文化的机会，不知不觉中塑造出了许多黑眼睛黄皮肤的巴拿马人。

       如今，在巴拿马土生土长的华人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入籍成为公民。他们与当地人一同学习、工作，说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可惜许多不通晓中文，对中华文化一知半解。他们被当地老华人称为“十一点仔”，意为差一点、是不完整的华人。这些新生代大部分不再子承父业，也不愿像父辈那样天天埋头经营餐馆，而是选择自己创业，或出任政府部门与大企业高职，或成为工程师、会计师、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基本上，他们的收入属中上层，生活西化，与老一辈华人比起来相对舒适无忧。

       在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华人逐渐习惯了当地拉丁文化和民俗。华人与当地人一样，在正式场合一般都是西装革履。富有的华人女性多数都有一件名叫“波列拉”（Pollera）的传统巴拿马服装，以便出席隆重的场合。饮食方面，当地华人很喜欢巴拿马鸡肉汤“桑科乔”（Sancocho）以及肉煮赤豆，配上大米和玉米等主食。

       至于消遣活动，老一辈的华人喜欢到左邻右舍作客，下棋、搓麻将，闲谈生活趣事，或到赌场小赌。年轻华人则喜欢参与现代体育运动，如足球和棒球；周末或假日晚上，则相约三五好友去看电影或到歌舞厅劲歌热舞。

       同样的，当地人与久居巴拿马的华人接触日繁，对中华文化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

       在巴拿马首都，华人经营的商店约有2000家，其中以杂货店和中餐馆数量最多。城中的萧德庆、振兴、永和昌、三环公司等大商行已是全国有名的大型杂货零售店。华人店里的中国货价廉物美，加上中国日益昌盛，尤其具中华风味的装饰品很受当地人喜爱。走进一间间华人商店，顾客大多是当地人，购买力非常高。

       此外，当地人对华人文化的认知，已从敬佩华人的勤奋营生，提升到对中式菜肴的欣赏。巴拿马人对中华饮食的高度接受，造就了当地蓬勃的中餐业，用筷子品尝炒饭炒面等食物的习惯，也已融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从早期华人移居巴拿马开始，华人在此代代繁衍。巴拿马建国之初，华人多和当地人混居于市郊，经营小生意；如今，各大城市如巴拿马城、科隆市、贝诺诺美市等都形成了明显的华人聚落，成为正式与非正式的“唐人街”。

       国家经济中心巴拿马城，是最多华人聚集的地方。巴拿马城分古城、老城和新城3部分。早期华人主要聚集在巴拿马古城的Calidonia社区，这里别致的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式的修道院、大教堂、医院和皇官等建筑，被狭窄的街道、色彩缤纷的楼房围绕着，散发着浓烈的西班牙风采。古城在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巴拿马第一个唐人街（如今统称旧唐人街）便现身在这个古城区中。

       当初巴拿马铁路和运河工程为古城带来了商业生机，竣工后部分留下的华工拿着苦苦省下的积蓄开始做小生意，慢慢地演变成今天的旧唐人街。早期唐人街的发展区域一度扩大到中央大道、涵盖Santa Ana公园，鸦片馆、算命馆、寺庙与华人老铺林立。当时陆路交通不发达，而唐人街就坐落在火车总站旁，许多在科隆等外埠的华商三两个月就搭火车到此进货，大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如今，城内有同乡会、杂货批发零售店、五金行、餐馆及中药铺等，还有填满一座座楼房的华人住家。除了火车总站，旧唐人街还连接中央市场及周边的码头、蔬果和鱼肉市场等地。这些都是华人与当地人聚集、交际、做生意的地方。

 随着巴拿马城的发展，华人社区跟着不断扩展，延伸至Betania行政区的El  Dorado新城。这个华人密集的商业中心，于1994年被巴拿马市长Mercedes Garcia de Villalaz正式命名为巴拿马新唐人街。一排排的店铺：中餐馆、旅行社、中国杂货店、理发店、洗衣店、中文影碟中心等，全由华商经营，而顾客则以当地人占大多数。

       巴拿马首都的华人多居住在新旧唐人街附近。一般年轻上班族栖身简单方便的现代公寓，较富有的华商则选择恬静幽雅的高级住宅区，不少与兄弟姐妹亲友为邻。每逢周末假日，华人都会涌向高楼林立的首都新城。位于老城和古城交接处的新城，其中央大街为全城最宽阔、最繁华的街道，是华人和当地人的购物天堂。中国银行也在这里拓展业务，为华社工商界和当地人提供金融服务。

       在角纪利省的贝诺诺美市以及科隆贸易自由港属的科隆市，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唐人街，但有许多华人聚集在那里生活。贝诺诺美市的发展早期是由两家华人主力开拓，如今继续由他们的后代在背后推动着。

 这里，华人多集中在市中心两条主要的横贯街道。华人表面上经营杂货店，实际上却通过三四代多年的置业投资，买下了市中心多条街区的店铺，控制了当地的房地产市场，进而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幕后推手。许多华裔姓氏更是在当地成了响当当的招牌老字号，例如Chang、Him、Lam等。

       离巴拿马城约100多公里科隆市，位于运河大西洋入海口处，是国内第二大、但也是最穷的城市。许多华人在这里谋生，当中以新移民尤多。华人大部分经营小型的中餐馆、伙食店及五金店，客源尽是当地人。这些华人都居住在店铺后方或楼上，生活简朴。

       而在位于科隆市东北部的科隆自由贸易区内，有不少较富裕的华商，在这占地约400公顷的2000多家企业中，与阿拉伯及犹太人肩并肩，从事进出口和转口贸易。他们从中国进口各类纺织品、日常用品、家电以及各型机械，再转出口到其他欧美国家。

在传统节日方面，当地华人最重视春节。华人遵循旧俗，除夕夜阖家团聚吃团圆饭，大年初一派红包、拜年等。由于大部分华人在农历正月初一仍做生意或上班，大部分节庆活动都安排在傍晚打烊后进行。巴拿马前第一副总统阿图罗·巴利亚里诺曾数次出席花县同乡会的春宴，而巴拿马市长也出席中华总会的新春晚宴，向全体华人拜年。不少当地人会与华人一起过春节，参与贴春联、挂红灯笼、放鞭炮、拜年和春宴等活动。

       每逢春节，各大华人团体都会举行春宴、茶会，庆贺新春的来临。角纪利、科隆等华人地方社团，会筹备敬老春宴、理监事就职等欢庆活动。花县同乡会曾举办过“投胜灯”活动，吸引了当地各大商行及金融机构出重金投标，以求个“万事胜意”的好兆头。而代表巴拿马全体华人的中华总会，每年都在首都不同的地点，尤其是购物商场及商业区，举办一连串的庆祝活动，如拜年、醒狮采青、文艺表演以及放烟花鞭炮等，把巴拿马城渲染在一片浓浓中华节庆气氛当中。

       巴拿马华社把每年的4月5日定为清明扫墓日。这一天，华人会聚集在华人历史最悠久的安肯山（Ancon Hill）El Chorrillo 坟场、El Carmen教堂等地祭拜祖先，凸显了当地华人重视儒家传统及孝道。他们认为清明除了悼念先人，也是获得先人祝福的重要节日。

  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巴拿马，华人大部分信奉天主教。但当地也约有2万5000名佛教徒，因此有些华人家庭中会有两种信仰共存的现象，例如年轻一辈的华人子女可能从小就受洗礼，常参加教会活动，却又恭敬地遵从父母亲意思祭拜祖先或神佛。

       19世纪首批华人到巴拿马建筑铁路时，就带进了关公信仰。当时，有多个客家团体，在如今的巴拿马旧唐人街区联合兴建了供奉关公、观音圣像的人和会馆。这座于1898年建成的人和会馆关帝宝殿，是目前当地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庙宇，每当华人庆祝农历新年、中秋和关公诞等节日，庙里庙外香火鼎盛，人潮沸腾。

* *自2004年开始，巴拿马政府宣布，每年的3月30日为“全国华人日”。这一举措是对华人为巴拿马所作的贡献表示肯定。*
* 年轻一代巴拿马华人从小生活在西方文化的氛围里，西班牙语及英语是他们的生活语言，只有少部分人会以简单的普通话或方言与父母交谈。当地最常见的华人方言有粤语和客家话，而部分新移民则习惯以普通话沟通。
* 巴拿马许多华人子弟都报读由基督教浸信会所办的学校，例如巴拿马城的Instituto PanAmericano学校、科隆城的La Salle de San Jose学校，以及La Academia Santa Maria学校等。由于一些天主教学校规定，学生必须信教才能入学，因此有些华人家长，让孩子在出世时就接受洗礼，以方便长大后入学。为了不让孩子丧失学习中文的机会，有不少华人家长为子女聘请家教补习中文。同时，也有不少家长趁着学校年终假期，把孩子送到中国学中文；有些孩子则在高中毕业上大学前，到中国学习华语一年。
* 老一辈华人移民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不断为下一代的中华文化教育而努力。1986年，巴拿马华人集资百万美元在新城边缘的友谊大道建立了一所集体育、教育、文化与观光于一体的普及化教育中心。这所全权由华人承办的教育中心——巴拿马中巴文化中心和中山学校，现有学生近2000名，是中美洲最完整、且最具规模的教育机构。学校内有会议室、图书馆、体育馆、游泳池、运动场等；学制分为幼稚园、小学及中学的12年教育。此外，该校还提供社区教学、烹饪、武术、美术劳作等副科。
* 在巴拿马，除中山学校外，教授中文的学校还有华人基督教所建立的仁爱书院。这所位于拜地耶区（Paitilla）、于2002年注册的学校，使用英、西、中3种语文教学。与中山学校相比，仁爱书院规模较小、教授中文科的时段较短，从幼儿园至小学6年级各4班，每班学员30名左右，中文课由3位教师负责，以融合当地教育与中华特色为办校宗旨。而其他学习中文的管道，包括基督教会、巴拿马大学以及中华工商总会开办的中文班。
* 华人只要有能力，都会供孩子完成大学教育，较富裕的家庭常把孩子送到美国、加拿大等地深造。在中山学校毕业、成绩优异的华人子弟，有不少获颁巴拿马各大国立及私立大学奖学金，免费进入大学就读，毕业后回馈社会。而到国外深造的华人子弟，毕业后有些继续留在国外，部分则选择回国工作，对国家发展贡献良多。
* 巴拿马华人除了成立中美洲规模最完整的中文教育机构，也透过中文报章、网络、电台3种方式，推动该区域中文媒体的发展。
* 巴拿马华社每天出版3份中文报，即《拉美快报》、《拉美侨声》以及《新报》，传播最新的国内外新闻。这3份中文报价格统一，零售价每份50美分，每月订阅费十美元，每天总发行量在3000份左右，读者群主要是通晓中文的老华人及新移民。他们大部分通过订阅，获取当地第一手的华社新闻，同时了解中港台最新消息。与当地土生华人相比，他们对当地华社及祖国的发展较为关注，中文报对他们而言已成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 于1992年创刊的《拉美快报》，是目前巴拿马发行量最大、历史最久的中文报，居拉丁美洲中文报发行量第二位。每日推出对开16版新闻，每周出版6天。发行区从国内各省延伸至哥斯达黎加，并在哥国设有分社，主要负责该国境内的报纸发行及广告业务。
* 前身是《侨声日报》的《拉美侨声》，创刊于2002年，同样以16大版发行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两国。秉持着“服务侨胞、华侨之声”的理念，该报配合国内外华社创办版面，着重报导华社侨团的各项活动。巴拿马最年轻的《新报》，则由当地华社于2004年集资成立，办报宗旨为提升华人在该国的形象与地位，同时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
* 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也加入中文媒体阵容，丰富且快速地传播华社资讯。对电脑科技兴趣浓厚的科隆侨领冯培坚，在2002年自行成立了“巴华网”，经常转载当地中文报新闻，为当地华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资讯管道。另外，中华总会也与时并进，于2005年成立了“巴拿马侨网”及“巴拿马论坛”，为会员提供即时华社动态。
* 此外，巴拿马还拥有唯一的一个中文广播频道——1180AM中文频道，每日广播新闻和各种音乐节目。中文综合节目“雯雯与你，空中相会”，尤其广受欢迎。该节目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从早上9点至11点播放，内容精彩多元，主持人以鲜明活泼的港式播音风格，吸引了当地许多原籍广东、通晓粤语的听众，大部分是年轻的新移民。
* 早期巴拿马华人分散在奇利基、角纪利省、科隆、西部等地区，成立宗乡组织，如科隆四邑同乡会、巴拿马花县同乡会、巴拿马西部中华公所、旅巴四邑华侨联谊会等。眼见社团各自为政，缺乏一个中心团体，各地华社之后成立了一个联合性的代表社团——巴拿马中华总会。
* 前身为中华会馆的中华总会，成立于1943年，其宗旨为“以一个慈善机构联络感情，共谋全侨福利，发展华侨事业，促进中巴文化交流”。中华总会理事来自各个华人社团，当中包括花县同乡会、古冈州会馆、中山同乡会、鹤山公所、四邑华侨联谊会、人和会馆及清远从化同乡会等。各地区同乡会主席或会长自然成为中华总会理事，国内其他省份的华人组织也都派有代表参加。总会透过工作委员会，不断扶助会员，并负责协调各社团、商会、民间组织等。同时，总会经常在国内发生重大灾情时参与赈灾活动。
* 如今，许多成功华商以及新移民创业家，都是通过巴拿马同乡之间“充会”的方式筹集资金。长久以来，华社利用同乡经常会面的机会集资，再贷款给有需要的华人，扶助他们创业或扩展经营。这一筹集资金和互助互利的“充会”方式，对新移民尤为重要，直接推动、壮大了华人经济发展。
* 巴拿马华人在事业有成后，从不忘回馈社会。例如始自1998年的巴拿马电力通（TELETON 20-30）慈善募款活动，中华总会每年的捐款额均在6万美元以上。2007年，中华总会正式成为电力通主要赞助单位，旗下各大华团捐款总额更高达8万8000美元。该笔款项将资助巴拿马儿童医院，造福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华人的爱国之心获得当地社会好评。
* 拥有中美洲最大的华人族群，巴拿马华社引领着中美洲华社的互动与交流。巴拿马城自1966年召开第一届的中美洲暨巴拿马华侨恳亲大会后，续由中美洲各国的华社轮流举办至今。中美六国恳亲大会可称得上是历史最悠久的海外华人国际性会议，且已发展成该区华人联系的重要平台，成就许多共识与合作。
* 老一辈华社领袖在每一届恳亲大会交流，不忘邀年轻一代积极参与。每年，中美洲6国都会举办各自的华侨小姐选美，当选的华侨小姐将代表该国华社参加“中美洲暨巴拿马华侨小姐选美”比赛。而中美洲中国青年会的成立，也是由该恳亲大会发起。

现今许多巴拿马华人后代已失去祖先的姓氏，主要是因为早期华人初来报到登记资料时，由于语言障碍，当地官员常把华人姓名中第一个字误填为名字，后两个字填为姓氏。例如，陈阿福，登记时他会说自己叫“阿福”，记录的官员只写“Apuy”，流传到后代就以“Apuy”代替了“陈”姓。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奇怪的西文姓氏便取代了华人原先的中文姓氏。

       这类姓氏当中，姓Ah-Kai者其原姓是Cheng，Vong-Chong则为Wong。也有原姓Chong的被误写为Lim-Yuen，Him姓登记为Naranjo，Ho姓改为Othon或Ocon。当时，许多华人终日忙于工作，无暇处理更正名字所要面对的繁杂手续，将错就错让填错的西文名字一代接一代继续使用至今，有些当地华人的原本姓氏早已无从考究。

       所以，如今可以直接通过音译姓名来辨别华人身份的可能性极低。尤其部分华人后代信奉天主教、取了教名，或父母为了方便以及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干脆把孩子名字拉丁化，其中文名更是无迹可寻。

 在华人踏足巴拿马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充满了心酸与悲愤的历。他们为了寻找美好的生活，漂洋过海来到巴拿马，在不同的阶段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修铁路、开运河到现代化建设，洒下的血和汗凝聚出无数的成果。

       如今，巴拿马华人已渐渐融入主流社会，开拓出一番新天地。巴拿马运河的扩建工程、科隆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无一不是华人在幕后默默推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踏实勤奋的华人是推动巴拿马二十一世纪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古巴离美国佛罗里达州两百多公里，是加勒比海面积最大、也是当今世上寥寥可数的孤傲国家。这里的统治者不理会世俗的眼光，坚持走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

       古巴由1600多个岛屿组成，气候温暖湿润，以蔗糖为主要经济支柱。古巴出产的雪茄，及由糖蜜提炼的兰姆酒更是闻名于世。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旅游业揭开了古巴的神秘面纱，到古巴观光成为许多旅游者的目标，而到这里则一定不要忘记欣赏一场古巴人的棒球比赛——这是他们引以为荣的全民运动。

       在1868年与1895年的两次独立战争里，华人曾积极投身于古巴的革命洪流中。他们舍身杀敌的功绩，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那坐落在哈瓦那市中心、8尺高的黑色大理石记功碑上这么写着：“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叛徒。”

       但是，1959年那场改变古巴命运的革命，也同样改变了华人的命运。那时，能离开的华人都走了，留下来的，在50年后的今天，绝大部分都只能靠着政府每月的配给静静度日。虽然最近几年华人新移民不断增多，但华社昔日的荣耀已一去不复返。

  最早抵达古巴的华人是以苦力的身份到来的。1847年6月，212名广东籍的契约华工飘洋过海来到古巴。他们到岸后立即被剥去上衣，热烫的铁条接着便在他们的身上烙下一个“C”字，表示他们是属于古巴的；然后被他们带往哈瓦那的人贩市场，分为上、中、下3种等级，全身赤裸地任买主看验估价，甚至被鞭打以测试其筋肉反应能力。

       买主选好并付钱后，便将这些契约华工送到种植园去劳作。他们在工头的皮鞭下一周工作7日、每日十三四个小时不停地劳动。在买主的眼里，华工的性命不值一文钱，他们仅是出卖劳力的畜牲而已。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每个月仅有几个古巴比索的工资。挨了数年，好不容易到了合约期满，原本约定的一张免费回乡船票却被雇主扣押下来，回不去的他们唯有留下来继续工作。

       那时候，客死异乡的华工们最悲凉的下场莫过于死无全尸。据记载，在古巴还曾经发生过糖寮用华工的尸体混杂牛马的骨头，燃烧成灰来提炼白糖的事件。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活着的时候已被压榨得不成人形，在死后仍然得不到全尸。

 1874年，被卖到古巴的华工已经多达14万3000人，被虐待致死的竟有1万7000人。由于回国无望，华工唯有留在当地娶妻生子，并且开枝散叶，这便是古巴目前数十万名混血华裔的来源。不过，华工在行婚礼的时候，非常坚持传统风俗，他们不愿意前往教堂结婚，只希望能在关公像前与当地妻子互相许下终身承诺。

       1886年，古巴取消了奴隶制度，获得人身自由的华工们陆续进入城镇，他们用累积多年的资金自行创业，或在华人的商店里打工。

       在短短数年内，华人所经营的商行、杂货店、洗衣店、旅馆等已经遍布全古巴。而那些走街串巷的卖货郎，以及自产自销的蔬菜小贩也活跃于各个社区。除了哈瓦那之外，古巴东南面的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Santiago）亦成了另一个华人聚居地。

       那时候的哈瓦那唐人街，是美洲最大、同时也是最兴旺的华人社区。这里极为热闹，烧腊点心铺、布店、药店、杂货店林立，还有好几家戏院和麻将馆，向来非常注重子女教育的华人也在这里建立了中文学校。

       1893年，一批华人在哈瓦那成立了中华总会馆，每逢农历新年或其他中国重要的节日，他们就会聚集在谷奇瑶（Cuchillo）与桑哈街（Zanja）之间，燃放爆竹、舞龙舞狮，热热闹闹地进行各项庆祝活动，一直到了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维持着这样的传统。

       1915年前后，中华总会馆筹资了数万元，设立颐侨院，专门收容那些60岁以上孤苦无依的老人，又购下一块国家墓地作为中华总义山，让华人死后能够入土为安。

       华人最后一次大量移民古巴，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到50年代革命的前夕，那时候，有不少华人因为中国动荡不安而逃到古巴来。

       但是，自从卡斯特罗宣布带领古巴走社会主义经济之路，华人又纷纷逃离古巴。卡斯特罗政府采取极为严格的国有化措施，没收所有人的财产，取缔所有私人经济，甚至连修补鞋子的小摊位也要收归国有，对华人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无数人的资产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短短的数个月间，华人人口非常明显地急速减少，能走的都移居到附近的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留下来的旦夕之间都变成了领工资的劳动者，以往一片欣欣向荣的哈瓦那唐人街也迅速变成了落寞孤寂的街区。

       从那时候开始，美国海关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偷渡的古巴人能够抵达美国的陆地就算移民成功，不会被遣返。可是，倘若在海上被逮住的话，就只能遣送回国。1959年之后，从古巴移出的众多华人当中，可能大部分都选择前往美国。

   在推行社会主义治国的最初阶段，古巴政府全面禁止个人拥有私产，因此有些老华人就算想把私下收藏的三五千美元，留给自己的儿女也不行，因为一旦被政府发现，就会收归国有。那段日子，华人都不敢把钱存在国家银行，因为只要被政府发现在银行存入超过每月基本工资的钱，就会被当局彻查资产。

       自1959年古巴推行计划经济后，长期以来，古巴的经济就停滞不前，民生困苦，境内的年轻华人都已远走高飞。如今，这里只剩下198名老华人，他们都在65岁以上，祖籍包括广东四邑（开平、恩平、新会和台山）、番禺、斗门、顺德、九江等。他们大部分都在40、50年代之间移入，主要聚居在哈瓦那华区周围，其中有8名老人住在市中心的颐侨居里。

       另外这里还有多达10余万名混血华裔，除了少数几个混血华裔懂得华语，活跃于华人社区，担任中文教师、社团主席等职务外，其他人几乎都已不会中文。除此之外，现在在古巴所见到的年轻华人，绝大部分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据悉，古巴华人是拉美地区华人社区里与异族通婚最多的群体，混血华裔改名换姓现象最为普遍。为留住即将消失的古巴华人历史，邵正和将军和现任中华总会馆主席的崔广昌等人，多年来积极致力于哈瓦那华区的挽救与复兴工作。但放眼来看，古巴华社暮气沉沉，前景依然不甚乐观。

    50年来，时间之神似乎跟古巴开了一个玩笑，整个国家好像依旧在原地踏步。在古巴留学6年的阳楚明说：“这里好像是中国大陆的80年代，但是那种感觉却又不太一样，好像少了什么，又多了什么。”说不出的情绪是复杂的，也的确无法用单纯的思维去理解古巴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仅就货币制度而言，古巴就比其他国家复杂得多。这里同时流通两种货币，华人称那类供当地人使用的货币为土比索（Cuba Peso），也就是古巴比索，称另一种供游客使用的货币为红比索（Cuba Convertible Peso），也称为可兑换比索。华人通常用土比索到国营商店和菜市场买东西，红比索则是到自由市场、超级市场、旅游区等地购买奢侈品时才派上用场。

       在古巴要赚红比索不容易，这里大部分人的收入都是以土比索来计算的，每月平均只有300元左右（约12个红比索），如果是公务员则可以按薪水比例，每月获得额外的10至30个红比索补助。

       古巴的老华人多数靠着微薄的退休金度日，每个月可领取约200土比索。他们每天带着供应本，到指定商店领取一颗比拳头小一点的免费面包，像果汁、汽水这种要付红比索才能买到的奢侈品，他们可能要省上几年的时间才舍得去买。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在古巴赚到可观的红比索，就不要有物质奢望，不然日子会很难过。

    老华人说这里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政府并没有让他们挨饿。在古巴，只要有粮油供应本，每个月都可以用低价买到定量的日常所需，包括鸡肉、鱼肉、牛肉、大豆、米、菜油、肥皂、牙膏等。“面包、糖加水”就可以当一餐，当然不会饿死，只是想多吃些什么就要自己想办法了。有华人表示，他们有时半年也吃不上一粒鸡蛋，牛肉的话，恐怕要多走几家商店才能买到，鱼肉呢，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另外在供应本上有个特殊的栏目，就是每月老年男性可免费领取数支雪茄和4包香烟，7岁以下的孩童则免费配给牛奶。

       因为国家长期物质短缺，所以不得不实行供应本以保障国民基本生活所需。古巴民间常常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今天有的，明天未必有。”

       阳楚明说：“我就经历过市场上足足两个月没有卫生纸的日子，那时候有机会去酒店，就从那边悄悄带些出来，不然能怎么办？”那种感受当然不好，因此她后来也养成了生活必需品在有的时候就尽量多买的习惯。

       4卷卫生纸要价1.5红比索，按照当地收入来看，真不便宜。阳楚明这样的留学生没有供应本，许多生活用品就得到红比索商店购买，开销很大。不过她认为自己的日子还算过得去，只要省一些，对生活不要太计较就行。“其实现在的古巴比以前好很多了，尽管现在有钱还是买不到一些想要的东西。”她说。

       在劳尔（Raul Castro Ruz）未接任哥哥卡斯特罗的总统职务以前，古巴华人简直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除了通过外国游客得知外面发生的事情外，就没有其他管道了。直到2008年劳尔上任后，政府才逐步放宽通讯限制，开放手机市场，也批准国营商店向个人售卖电脑等。

* *在1961年4月17日猪湾事件发生后的隔天，古巴华人为保家卫国而组织了一支百余人的华侨民兵队，这支编号179的民兵队被称为黄淘白（Jose Wong），是为了纪念在1939年遭政治谋杀的华人革命领袖黄淘白。此后每年的4月17日，古巴社会主义同盟都会为这位古巴革命先驱者、革命组织保卫工农联盟领导人及民兵队举行纪念活动。*

       尽管有进步，但从国外拨电话到古巴，费用依然高昂，且通话也不清晰，要想跟古巴华人通过电邮联系，也要等上好一阵子才会有回应。

       目前，古巴互联网的发展很不均衡。在大学校园内已经可以使用无线网络，但在一般百姓家里还是不能自由上网。古巴华人想要上网，只能到特定地点，费用每小时要价6个红比索。外国人则可以自由申请互联网服务，月租费约合28个红比索，限用30个小时。

       一名中国留学生说：“因为网速慢，费用昂贵，而且有时间限制，所以我每次都只是上网发邮件，内容都是离线打好后粘贴到邮件上的。”

  古巴人喜爱读报，最受欢迎的《格拉玛报》常在开卖两个小时后就会售罄，如果想看，就只能从起早摸黑去排队的古巴人手上用多出几倍的价钱购买，常常一份原价20分土比索的报纸，二手价高达80分或100分。

       在龙岗亲义总公所等待免费午餐的81岁老华人李鼎来，就习惯每天清晨6点半到报摊去排队，买格拉玛报来看。不过，他却不一定买得到，因为许多人比他来得更早。对古巴人来说，虽然转手卖报纸的收入不算可观，毕竟也是一个额外收入。

   龙岗亲义总公所旗下的餐馆，是华区唯一提供免费午晚两餐给无依无靠的老华人的地方，老华人把这里称为“老人食堂”，每天中午11点半都可以看到数十名老人聚集在这里用餐。除了吃午餐，他们也自带餐盒把晚餐带回家。

       90岁的马熙平是“老人食堂”的常客，1948年从中国大陆来到古巴。数年来，他前后6次想离开古巴，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成行。马先生这样的经历，也是许多老华人的写照。

       由于这里物质匮乏，“老人食堂”虽然有政府资助，免费供应的饭菜也仅仅是一块小小的肉，一小碗由黄豆或黑豆熬成，时淡时浓的汤汁或面条汤，再加上一小堆有点干硬的白米饭。对这些孤苦无依的老人来说，虽说不上美味可口，但至少还能够填饱肚子，因此，他们都很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食物。

       除了龙岗总公所，古巴洪门民治党旗下的餐馆，也一样每天免费供应午晚餐给老华人，但是来这里用餐的人必须是民治党的会员才行。

   在哈瓦那除了唐人街的十家中餐馆，还可以看到另一类别具一格的餐馆，那便是由华人社团所经营的中餐馆。有趣的是，这些餐馆的名字就是社团的名称，餐馆的老板就是社团的主席。这些社团主席，必须是华人或华人后代才有资格担任。

       中华总会馆是古巴最大，也是唯一没有经营餐馆的华人社团。第二大华团是民治党，社会主义同盟排在第三。其他有黄江夏堂、李陇西公所、九江公会、余风彩堂、安定堂、朔源堂、至德堂、陈颖川堂和中山自治所。另有一家林西河堂已宣告倒闭，现在成为古巴武术学校办事处。

* *古巴是拉丁美洲地区最早出现华人社团的国家，即1867年由古巴华人钟熙等人在哈瓦那市成立的“结义堂”。*

古巴每一个华人会馆的会员，每年都必须缴交12个土比索的会费，他们除了可以参加新年聚餐外，会馆每个月也会为当月生日的会员搞生日会，并派发一袋小礼物。这样的福利在古巴非常少见，因此许多人都希望成为会馆的成员。只不过入会并不容易，一定要提出确凿的华人血统证件才行，以杜绝有人冒充华人后代。

       古巴至今仍不允许私营机构的存在，但是在哈瓦那却有华人私人餐馆，原来，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与古巴的友好关系，以及华区促进会的努力而促成的。

       华区促进会成立于1993年，由邵黄将军和一群古巴华人在庆祝中华总会馆成立100周年时所发起。当时，他们委任拥有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背景的华裔伍月梅，规划重建华区的蓝图。

       伍月梅指出，在重建计划中，除丁修复华区老建筑外，他们也希望能延续中华文化的传承，因此，他们的规划定期举办中华文化活动及文娱表演。不过，这样的计划需要大量资金，那时古巴经济极度低迷，政府根本设有资金拨款协助华区的整修。

       这时，华促会想到了自给自足的方法，便向政府申将唐人街内的9个店面规划成餐馆特区。然后他们再把执照发给华人或华裔，与他们合作开设私人餐馆以筹集资金。这项计划除了能招揽游客促进观光业外，也能筹到数修华区的经费。

       后来，华促会把这个概念扩大使用，与华人社团合作馆，挽救了许多因严重短缺经费而濒临关门的社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许多会馆和餐馆合二为一的原因。

       与华促会合作的餐馆在运营初期，华促会每周都会调查餐馆的成本和利润，经过计算再决定每周该向餐馆收取多少营运费用。

       华促会还建立了老华人养老院——颐侨居、古巴武术学校和中国传统艺术馆。其实，对伍月梅来说，自己不仅不懂中文，对中华文化的接触也非常有限，复兴华区的工作对她而言是很艰难的任务，她说：“能够走到现在，真是很不容易。”

       尽管华促会已在2000年解散，但是伍月梅坚持传承中华文化的决心却仍未消失。她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回到华区转转，看看这里的发展状况。

   现阶段，华区内的古巴武术学校已经办得有声有色，每周一至周六的上午7点半到9点半都会看到学员在这里练习武术，有时舞剑，有时挥拳，有时耍棍。

       武术学校负责人李荣富说：“我们主要教学员两种修身养性的功夫，分别是导引养生功和练功十八法，小孩、年轻人、老年人、生病的人都可以到我们这里练功。”

       该校目前有5000多名学员，全古巴包括公园在内，共有50多个不同的练习场地，全国有40多名武术老师。

       值得一提的是，李荣富的一名华裔女学员黄美莲的表现非常出色，常常能在古巴的电视节目如“看中国”中，看到她的表演。黄氏曾到北京学习过数年武术，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另外一位必需介绍的华人，是在中国传统艺术馆教授普通话的邓小荣。当年他也是华促会的成员之一，是难得会说广东话和普通话的纯血统华人。

       “我之所以能够说流利的广东话，是因为我母亲以前在家里开班教小朋友广东话、唱歌和玩游戏。所以从小我就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学习。”后来他发现，如果想要更透彻地了解祖籍地的文化，必须学会普通话，所以到林肯学校去上课。

       当时，林肯学校是古巴唯一能学普通话的地方，华语教师也只有一个，他就是冯啸天。邓小荣去上课的时候，冯啸天已经在那里教华语30余年了。

       邓小荣说，冯啸天在世时，除了当华文教师之外，也曾担任过华文报《光华报》的总编辑。1995年在中国传统艺术馆里成立的华文班，也是由冯啸天一手创建的。对于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的贡献，冯啸天功不可没，直到去世数年后的今天，古巴华人仍会常常提起他。

       一位中文名叫美兰的古巴华文教师，很努力地用生硬的华语解说道：“除了星期天以外，这里每天都上课，上课时间从傍晚到晚上8点，每个月的学费是20个土比索。华文班分成一至四年级，念完四年级后可升到高年级。”她对华文有浓厚的兴趣，也是冯先生的学生，她的女儿目前也在这里学华文。

       此外，艺术馆在周六还另外开设免费的普通话和广东话补习班，而教师就是平日在傍晚上华文课的学生，他们都是义务教师，学员则从小学生至50多岁的老人家都有。这里的师生非常希望中国政府能派出正规的华文教师到古巴授课，毕竟这比学生做义务老师强多了。

  1868年，古巴的独立之父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Carlos Manuel Céspedes）为了反抗残忍的西班牙殖民者，带领古巴人民展开第一次独立战争，而契约华工们为了替惨遭棍打鞭笞致死的同胞们讨回公道，也义无反顾地从庄园逃出来参与这场斗争。

       在这次的独立战争期间，有一位名叫Tankredo的华人中尉，作战时遭西班牙军队逮捕。当时，西班牙人误认为他仅是一名“苦力”而要将他放走，可是一身傲骨的他却从口袋里取出文件并交给对方看，以证明自己是“古巴解放军”的高级军官，并非苦力，然后他说：“射吧！”请对方了结自己的性命。另一位名叫Pio Cabrera的华人战士则是在1878年的一次战争当中，为了掩护战友安全地转移阵地，而独自一人面对50多名西班牙殖民军，直至壮烈牺牲为止。

       到了1895年，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José Martí）领导人民展开了第二次独立战争。期间，华人军官胡开枝把他的全部财产都捐作革命军饷，并以大量的粮食接济古巴革命军。在革命结束之后，胡开枝曾经担任圣克拉拉（Santa Clara）省的卫生局长、哈瓦那移民局领导等职。他一生性格豪迈，且乐善好施，死后被古巴政府授予上校军衔，安葬于中华总义山。

古巴华侨纪念碑，为纪念华人参加两次独立战争中的贡献，上面刻着：

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逃兵，

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叛徒。

   在长达30年的独立战争当中，有成千上万留着辫子的古巴华人投身革命洪流，当时有数支部队是由华人所组成。一名古巴老华人自豪地说：“那些西班牙军很怕我们华人军队，他们都以为我们华人会武功，很能打又不怕死，还没有跟我们的先辈正面交锋就已经被吓坏了。”

       1938年于古巴马坦萨斯省出生的华裔将军邵正和（Moisés Sío Wong），曾经与古巴领袖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并肩作战，一起投身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目前，他是古巴储备局局长兼古中友协主席。

       卡斯特罗曾问过他，到底有多少名华人参加古巴独立战争和革命战争？邵将军回答说他也不知道确实的数字，因为有许多华人已经改用西班牙名，仅从姓名上完全无法分辨他们的身份。不过，保守估计前后至少有一万多名华人参与两次的独立战争，而参加卡斯特罗革命战争的，则可能有数百人。

       为了纪念这些在战争中壮烈牺牲的华人勇士，仍在古巴生活的华人于每年的清明节，总会到哈瓦那市滨海大道与Reina街交汇处那8尺高的记功碑，以及中华总义山的先烈纪念碑敬献花圈，以表达对先贤的敬意。

    哈瓦那市中心的德拉贡乃斯街（Dragones）是华区的入口处，那里有一个写着“华人街”3个大字的中式牌楼。这条华人街是1993年经过华区规划和整修后而形成的。

       走过4个街口，眼前出现了另一座小小的“中国城”牌楼。从牌楼下走入华区，常令人疑惑，这里真的是华人区，抑或仅是一个招揽观光客的旅游景点？

       没错，这条满是游客的步行街，就是昔日唐人街的原址。入口处左边，挂着残旧招牌的金鹰戏院仍在营运，只不过，观众早已不再是华人，而是当地人。

       有50%华人血统，只会说西班牙语的古巴社会主义同盟主席沈先莲，回忆父亲在世时的生活时，也聊起了自己当年在戏院玩耍的经历，她的父亲以前在市场卖猪肉，她小时候最喜欢跟着父亲到唐人街的社团、公园、餐馆和戏院送肉。

   “有时，父亲没办法照顾我，就把我放在戏院看戏。我最喜欢戏院里的卡通片，虽然我懂的中文不多，也看不太明白卡通片的内容，不过戏院里会有人解说，所以我很喜欢去戏院。”她回忆说。那时，除了新大陆戏院，还有一家新民戏院，另外还有演出粤剧的上海大剧院。不过现在都已拆除，只剩下金鹰戏院。

       父亲是华人，母亲是古巴人的中华总会馆书记周卓明，对唐人街里的电影院也有很深刻的记忆。他说自己的广东话和普通话就是从电影里学来的，小时候自己总喜欢往电影院里钻，还依稀记得一些那时候放映的电影“宝莲灯”、“黄飞鸿”、“方世玉”……“那时，每周都会有一部华语新片上映。”

       老华人说，虽然这里的街道依然和从前一样热闹，只不过，一切已变了样，从前的永兴隆、广生荣、万草和、两利、恒安隆、广昌隆等老字号，都已经找不到痕迹，现在这里只有排列在两旁，由华人或者华裔经营的十家中餐馆。

       事实上，真正由血统纯正的华人经营的餐馆只有两家，其中一家是东坡楼，业主是已经在古巴生活了60多年的老华人陈钊森。

       另一家是1997年由李荣富夫妇所开设的天坛饭店。李荣富只有1/4华人血统，太太陶琦则是在1995年和父母来哈瓦那寻找商机的上海人。

       为了吸引游客，这里的中餐馆装潢，必不可少的就是红灯笼、鞭炮、对联，还有佛像。而为了配合天性浪漫的古巴人，这里所有餐馆的室内照明设备还特别采用了昏黄的灯光。

       岁月沧桑，昔日鼎盛的唐人街，如今已很少看到华人的踪影，特别是年轻华人。没有人知道这条唐人街究竟承载了多少故事，但是每当走过这里，就会隐隐地让人感到有些悲凉。

 百余年来古巴华人的命运，随着古巴的发展而大起大落。

       他们经历过腥风血雨的独立战争，也历经过从腰缠万贯到一贫如洗的日子。对他们来说，以前的日子是值得缅怀的美好回忆，但是现在的日子过得也不算太凄凉，虽然手头没有几个钱，却能平静地安度晚年。

       他们之中有人到死都还想着回中国看看，只不过能如愿以偿的并不多。也有回过中国几次却还是选择回来的老华人。

       或许他们回到哈瓦那，每天抽劣质雪茄，跟老友打上两圈麻将，然后在华区闲逛几圈再回去休息，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才能让自己安心吧！

       许多人都有顾虑，华人总有一天会在古巴完全消失，中华文化会在这里灭绝。然而，依照目前的发展看来，中华文化似乎还能苟延残存，只是今后如何发展，就取决于华人今后的动向了。

    牙买加风光旖旎，每年接待至少100万名游客。除了旅游业，铝土和蔗糖也是重要的经济支柱，其中铝土产量位居世界第三。

       牙买加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却融合了非洲的诡谲氛围、西班牙的华丽风格及英国的贵族传统，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它以蓝山咖啡闻名于世，在贫民窟长大的鲍勃马利（Bob Marley）则创造出风靡全球的雷鬼音乐（Reggae Music）；而短跑飞人博尔特（Usain Bolt）更是横空出世，连创佳绩，叫人啧啧称奇。

       经过百余年的岁月洗礼，华人已逐渐从小型咸头铺（Ham Tdiu Poo）老板，蜕变成零售业巨子。早期华人一般对这里怀有深厚的感情，很少想过离开，但随着当地治安每况愈下，新移民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熟悉的画面周而复始地上演着。

 早在1854年，华人已经取代黑奴而到牙买加的甘蔗种植园以及糖厂来工作，其中包括英国殖民政府从中国广东招来的客家华工，还有由巴拿马转移到此地的契约华工，共有472名。

       这一批华人刚抵达牙买加不久，大多数便因为健康欠佳，或无法适应当地环境而相继死去，只有极少数人存活下来。

       在合约期满之后，有者选择回国，也有一些人移民到其他国家去，而决定留下来的则各自创业，有的从事批发行，有的开咸头杂货铺。

       从1864年至1870年之间，又有200名左右的契约华工，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或圭亚那迁移到这片土地。而第三批华人移民则是在1884年直接从中国乘船过来，主要是来自广东东莞、宝安和惠阳3县的客家人。在这之后，陆续抵达牙买加的华人大多数是这批客家人的亲属。

       另外，也有一些来自四邑（新会、台山、开平、恩平）的华人，他们中包括了男性、女性以及婴儿共680人。

       1893年，牙买加华人增至800多人，他们大多集中在金斯顿市中心创业。此处开始成了华人主要的活动地点，中国城也就逐渐成形。经商的华人收入日益丰厚，商店也逐渐由小型转为中型规模。

       1904年，这里的华人筹资修筑中华义山；1923年，他们开设了华侨留医所；1924年，新民学校成立，供华人子弟学习中文，华人社会日渐成熟。

       1950年代，华人在牙买加的经商势力，已经从零售业扩展至食品制造业以及轻工业等。那时，华人拥有全国最大的冰淇淋厂以及数家大型超级市场；同时，华人在面包业也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外，还有部分华人将触角伸至电影、保险、旅游以及房地产等行业。

       根据统计，牙买加当时大约有两万多名华人，其中超过半数是纯华人。在这一个倡导“来自多元，一个民族”（Out of Many，One People）的国度里，华人的身份认同逐渐倾向于华裔牙买加人（Jamaicans of Chinese Origin）。

       到了70年代，牙买加开始向古巴靠拢，在国内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其政治倾向引起社会恐慌，许多华人担心本身的私产会遭国有化，于是以低价变卖产业，接着迁往加拿大、英国、美国以及圣马丁岛等地展开新生活。

       那段时期，牙买加华人人口大减，各地的商店可说是十室九空，仅有数千名华人选择留了下来。

       80年代末，牙买加积极推动自由市场经济，因而吸引了大批华人前来谋生。此后，华人群体更趋多元，除了客家人，也有很多来自福州、温州、广州等地的移民，另外，还有一些因为苏里南的政局动荡而来到牙买加的再移民。

       90年代中期，华人人口回升到两万人之多，这一个数目至今仍没有多大的改变。

牙买加住着一万多名土生华人，祖籍以广东东莞、宝安和惠阳3县为主。他们大部分已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不会说家乡话，平常以英语或帕托阿语沟通。然而，他们对中华文化的传承还是相当重视，如农历新年会吃团圆饭、清明时节举行公祭（Gah  San）等等。他们在各自领域也都有亮眼的表现，零售业巨子Wayne Chen、音乐家Bryon Lee、国家商业银行（National Commercial Bank）大股东Micheal Lee Chin就是当中的佼佼者。

       至于新移民，尽管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日子，但投入的感情并不深厚。对他们来说，牙买加不过是移居加拿大或美国的跳板，赚够了钱就会离开。究其因，他们说：“这里治安越来越差，政府又束手无策，我们每天做生意都不安心，所以才会想着离开。”

土生华人长期从事零售业，占了极大的市场份额，早期开设咸头铺的经验，乃是他们经商的最大优势。Super Plus Food Stores掌舵人Wayne Chen的父亲，就是靠在穷乡僻壤开咸头铺起家，目前拥有25家超级市场连锁店。

新移民也大多追随前辈的步伐，开设咸头铺或从事批发业。单单就金斯顿市中心和蒙特歌湾（Montego Bay）的大街小巷，就能找到上百家华人杂货批发店。另有一些华人选择开设超级市场、中餐馆、快餐店、面包厂，或在华人店铺打工。

    开咸头铺是牙买加华人的传统行业。早期华工在契约期满后，就陆续在全国各地开起这类主要售卖日常食品，如咸牛肉、咸猪皮、咸猪尾、咸鳕鱼、咸马鲛鱼的店铺，顾客大多是市井小民。

       早期开咸头铺的华人，通常会就近住在店铺楼上。华人初来乍到，往往连一句英语或帕托阿语都不会说，也不晓得怎样做生意，只好默默观察顾客的眼色，接着拿起竹竿轻敲着货品，问说“This？That？”直到顾客点头或回答“Yes”，才把货品取下来。

       今天，首都金斯顿的公主街（Princess Street）聚集了至少20家华人咸头铺和批发商店，但从店名或店铺外观，根本难以判断老板是否为华人。店内架着铁栅栏，从地上延伸到天花板，只有探头细看，才能发现一张张躲在铁栅栏后的华人脸孔。他们有的是坐在特意筑高的柜台往下监看员工的“掌柜”，有的则是在铁栅栏内忙进忙出拿货的伙计。守在第一线的通常是当地黑人。来这里购物的顾客，其实无法随心所欲地浏览，他们只能隔着铁栅栏说出自己想要的物品，再请店员帮忙取货。

       在蒙特哥湾的超级市场则大开门户，让顾客任意选购商品，而老板就在柜台上方的阁楼，观察店内的营业状况。就此，华人店主剖析道：“我们这么做，不但较容易抓到小偷，而且能更快察觉到匪徒有所行动，以防受到攻击。另外，疲倦时也可以小睡一下。”约15尺长，6尺宽的空间，可容纳一个单人床架、一张办公和电脑桌，除了去厕所、出外办事，华人一整天几乎都会呆在这里。

  基于牙买加法律极为注重对女性的保护，这里的男性一般都不敢随意碰触女性，所以只好耍要嘴皮子，转以轻佻语言来占女性的便宜。

       在蒙特哥湾与先生一起经营咸头铺的古绮云（Sweetie Liu），就常常碰到黑人顾客向她示爱。她说：“那些游手好闲的黑人，不管你已婚未婚，只要看到你是华人就喜欢把‘Do you want to marry me? I really love you!’(我真的爱你，嫁给我好吗？）挂在嘴边。你如果不搭理，他就用帕托阿语骂你几声，骂完之后，又若无其事地继续向你示爱。”他们乐此不疲，就是好玩。

       刚到这里的华人女性几乎都有过这般境遇，所以她奉劝各位女性切勿躲躲闪闪，只要强势应对，他们也就知难而退。

       Wayne Chen出生于牙买加，却不受当地复杂的男女关系影响。他说：“我认为父母影响我最大的，就是对婚姻的忠诚、做生意的居安思危以及对儿女教育的关注，我会想办法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

牙买加华人女性倾向于与华人男性结婚，在她们看来，华人比黑人男性来得可靠。黑人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对生活没有太多规划，反观华人，大多拥有稳定的工作，或自己开店做生意，无论是经济能力，还是对伴侣的忠诚度，都比黑人高。

       在中华会馆担任中文教师的苏燕指出：“我教的牙买加男学生都已成家立业，有好几个孩子，但向我介绍他们的妻子时，还是用‘This is my girlfriend’（这是我的女友），跟我们很不同。还有几个50多岁的学生，子女都在国外，都是自己或跟父母一起生活，从不提起另一半。”

       华人男性，则大多希望自己的另一半也是华人。不过，由于到牙买加谋生的华人男性比女性多，讨到华人老婆的机会便相对少了，因此许多已届适婚年龄的华人男性，若在本地无法找到合适对象，一般会通过媒妁之言来完成终身大事。

       选择与当地人一起生活的萧德文（Siu Tak Man）则说：“感情的事没有种族之分，缘分到了自然就会在一起，我跟她很合得来，我开店她帮我很多，我们不常吵架，只有讨论到孩子的教育问题才会出现争执。”

       一个是23岁时才从香港移居牙买加的华人，一个是在当地出生的黑人，双方的文化背景、思维模式截然不同，唯有多番磨合才能在感情路上走得更长久。

       经历了一次抢劫事件后，他就萌生带妻小回香港的念头，只是担心家人无法接受他与当地人结为夫妻的事实。尽管如此，他还是乐观地认为：“孩子都生了，他们还能怎样？”

 土生华人与新移民之间难免会一些文化上隔膜。由于新移民不会说英语或帕托阿语，而土生华人又对华语或家乡话一窍不通，故此，土生华人与新移民的交流可说是几乎等于零，新移民一般也不会去参与当地华人社团所举办的活动。

       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移居牙买加超过20年，现任中华会馆会长的陆康华（Wilson Look-Kin）意识到这一点，希望能通过中文教育来促进彼此的互动。他说：“当务之急就是大力开展中文教育，让我们的后代不要忘记自己的‘根’。此外，土生华人和新移民聚在同一间教室上课，也提供了多一个相互交流的管道。”

牙买加中文班由新民学校首办。新民学校于1930年易名为华侨公立学校，40年代获得大力发展，学生人数高达300人，但由于师资、经费短缺，50年代开始改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华语为辅的方式授课。中文班曾一度停办，直到近年才由中华会馆复办。

       目前，中文班的一切教学工作，都由中国公派教师苏燕负责。她亲自教授周一至周六的中文学习班，包括成人班、儿童班、汉语考试辅导班等，工作压力着实不小。会馆希望能多找几名教师减轻她的负担，但这里的中文人才不多，中国公派又须等上一段时间，现在唯有由苏老师一个人支撑。

       华语在牙买加只属外语，受重视程度远远不及英语和帕托阿语。苏老师有些泄气地说：“班级太大，时间太短，很多学生又常常迟到，能学到的就更少。加上这里没有一个让小孩说中文的环境，这个星期学的可能下个星期就忘记。”其实，她了解学生所面对的问题，却无法做出什么改变。

     牙买加有一份免费派送的中文报纸——《蓝山侨讯》（The Blue Mountain Journal）。这份出版将近30年的报纸，由华人协会资助。现阶段由来自中国的李蕾琴（Maria Lee）和来自印尼的吕启明（Lui Kai Meng）担任中文和英文编辑。《蓝山侨讯》每月出版一次，印刷1000份，内容包括英译的中国大陆新闻以及中译的牙买加新闻。

       兼做中医自然疗法生意的李蕾琴说：“我们都是这份报纸的义工，因为这是一份免费的刊物。我们主要是为华人服务，让华人有个发表心声的空间，同时也希望让刚来这里的华人多了解他们周遭发生的事情。华人来到牙买加，却无法融入当地主流社会，那是没有意义的。”此外，她自费将报纸送到国外，希望外界更了解牙买加华人的动向。

       至于华人所办的英文媒体，以前有《宝塔》（The Pagoda）杂志，现在则有中华会馆不定期出版的《中华会馆通讯》（CBA News）。《中华会馆通讯》涵盖面广泛，内容包括当地杰出华人的专题介绍、华人节庆的由来等等。

       除了提供讯息，这份刊物也是会馆与会员之间的沟通桥梁，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每逢公祭，会馆将在会讯注明祭祖的时间；中秋节将至，它也广邀会员前来参加聚餐。陆康华说：“至少我们每年清明祭祖时，能看到许多华人面孔，比较可惜的是，新移民鲜少参与。”

       农历新年期间，中华会馆也会推出一份随《新闻集锦日报》（Jamaica Gleaner）星期天刊附送的英文特刊，专门介绍牙买加华人过去一年在音乐、科学等领域的发展与贡献。这仅有助于华人更了解自身群体的动向，也是当地社会了解华人群体的一扇窗。

  在牙买加，除了店铺，新移民最常出没的，该是教会了。早在20世纪中期，当地华人就试图通过信仰基督教，融入当地社会；如今，新移民则是从宗教信仰寻找心灵慰藉。

       这里共有两所华人基督教会，一所是金斯顿的牙买加华人基督教会，另一所是蒙特哥湾宣道会。天主教和佛教由于信徒不多，至今仍未设立教会。

       蒙特哥湾宣道会发起人之一陈婉燕（Nancy Poon）说：“平日出席教会活动的信徒大约20至30人，而受洗的华人将近300人，多数是新移民。”金斯顿的教会人数，则比宣道会多出好几倍，有土生华人，也有新移民。对信徒来说，教会不仅仅是每周日必须报到的地方，更是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重要场所。

   蒙特哥湾没有华人社团，因此每当华人碰到难题，总会第一时间向宣道会求助，位于金斯顿的中华会馆和中国大使馆，可说远水救不了近火。许多新移民初来乍到，无法适应新环境或内心积累太多压力，都会找牧师倾谈；与雇主产生纠纷，也会透过教会去调解。

       以1999年抵达牙买加的熊琼霞为例，她当时在一家华人纺织厂工作，后来结婚生子，没想到丈夫在一次争执后离家出走。从那时起，她便独立撑起整个家，日子并不好过，所幸她从宗教信仰找到精神寄托：“对我来说，‘主’真的非常重要，他让我找到生活下去的力量。”她非常希望“主”会把丈夫带回他们身边，毕竟年幼孩童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

       另外，教会也撮合了不少佳偶。许多华人刚抵步，语言不通，通常会选择加入教会，开始结交新朋友。日子一久，许多男未娶、女未嫁的单身男女就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另一半。蒙特哥湾宣道会近几年曾多次举办结婚典礼，在牧师的见证下，新人在三房一厅的教会活动中心许下终生承诺。

   在牙买加常常会听到华裔被称作“十一点”（Ship Yit Diam），关于它的由来，有两种说法。据当地华人作家钟全安解释：“一跟十合起来就成了“土”字，代表土生华人。”在蒙特哥湾经营超级市场的潘文健则持有不同的观点：“十二点是正中间，指纯正华人，十一点少了一点，就是指不会说华语或家乡话的华人后代。”

       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许多华人新移民也入乡随俗，把跟自己没有共通语言的华裔称为“十一点”。

       华商对这个称谓相当抗拒，因为他们觉得带有歧视意味。然而，牙买加知名媒体从业员李逢生却认为：“当你知道你是谁，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你就不会去在乎别人怎么说你。”即使被人当面称作“十一点”，他也丝毫没有受歧视的感觉。

       此外，当地人常会以Miss/Mr.Chin来称呼华人，“如果刚好姓陈，可能会感到诧异，如果不是就会莫名其妙。”

       对此，华人不厌其烦地解释道：“早期到来的华人，以广东东莞陈（Chin）姓客家人为主，郑（Chang）曾（Chong）李（Lee）姓的客家人也不少。当地人对华人这4个姓氏印象较为深刻，所以只要看到华人面孔，就会称他们为Miss/ Mr.Chin，或换上其他3个姓氏。”这与通行中南美洲的“Chino”一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当地人来说，华人的名字并不好记，于是索性把常见的姓氏当作对华人的统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牙买加华人基于当地政局动荡而移居国外，后来形势逐渐明朗，部分华人选择回流，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这里始终是他们的家。

       今时今日，这个国家尽管称不上人间乐土，但是其独特的风土民情还是充满着魅力的，也难怪这里的华人大多不舍得离开。

       所以，初来乍到的华人如果对这片土地没有什么好印象，那只是因为他们在这里生活的时间不够长，因此，若是还没来得及发现牙买加的美好，就匆匆决定移居他方的话，那就真是太可惜了。

    与海地（Haiti）相邻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位于加勒比海第二大岛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东部，占该岛三分之二的面积。首都圣多明各拥有历史悠久的教堂、医院、法庭，名胜古迹随处可见。

       相继被西班牙、法国、美国统治过，多米尼加如同文化大熔炉。外来与本土文化碰撞出独具特色的多米尼加风情。温暖的阳光、蔚蓝的海水和洁白的沙滩，更让游客流连忘返。此外，制糖、咖啡和卷烟工业也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

       国内贫富悬殊，基础设施不完善，时而断水断电，但当地人总是乐观以对，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而华人到来，也不过是为了一圆淘金梦。秉持这股信念，华人目前已占据当地快餐和汽车旅馆业的领导地位，并把触角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

 据记载，最早来到多米尼加的华人应该是于1862年抵达的。这批华人大部分是契约华工，以来自广东的台山和恩平人居多。

       住在多米尼加已有50年的华人律师何荣欣披露，第一名出现在多米尼加历史上的华人，名字叫李潘乔（Pancho Lee的音译），曾经参与1864年的复国战争（War of the Restoration）。

       另一位名留史册的华人是华商Gregorio Riva。他从古巴引进了少数华工，前往多米尼加的希巴欧（Cibao）生产砖块以及生石灰。之后，这一批华工先后到萨马纳（Samana）、尤纳（Yuna）和莫卡（Moca）定居，并各自发展本身的事业。

       在1920年代，多米尼加的移民政策比较宽松，因而吸引了更多华人移居到此地。抵达多米尼加后，他们大部分在章鱼养殖场、洗衣店及餐馆里工作。之后，也有一些华人陆续在城镇做起生意，并且带动了当地零售业的发展。在1940年代的多米尼加，售卖汽水、果汁、啤酒、三明治、烤面包的华人“凉水馆”（即茶餐室）随处可见。

       1950年，这里的华人人口已经达到455人，以广东恩平人居多，也有一些从古巴迁移过来。当时，华人的经济渐具规模，许多华人经营的杂货店陆续转型为超级市场。圣多明各的杜阿特街区（Duarte）汇集了多华人商店，唐人街开始成形。另外，一些华人也开始经营菜园，以满足当地的日常所需。

       到了1960年代，一名吴姓钟表师傅从香港移居到多米尼加，并引进了钟表珠宝的营业概念，在当地掀起一股热潮。那时候，华人修理钟表的技术精湛，加上信誉良好，以致华人钟表业一度占据了95%的市场份额，华营钟表店曾经多达80家。

       在1966年抵达多米尼加，而今已经移居美国的岑灼槐说：“我到多米尼加替一位同乡的叔伯打工，主要是做首饰和修理手表。那里聚集了数千名华人，光是我们的那一家店就有十多人在工作。”对那时的生活境况，他仍然记忆犹新：“在这里，人们都十分热情、友善，不会歧视华人。有的甚至还认为华人高人一等。”

在累积了一定的资本之后，华人便陆续投入其他行业，数名华人于1963年合股在圣多明各建起第一家名为“皇宫”的汽车旅馆。

       1980年代初期，此处的华人人口增至5800名，主要分布在圣多明各以及其周边城镇，除了投靠亲友的恩平人之外，也有来自香港台湾的投资移民。

       为了使新来的同胞更快融入多米尼加的主流社会，华侨总会开始出版《侨讯》，可惜后来因为缺乏人才和资金，在1990年代中期被迫停刊。

       1990年代以后，大批的中国大陆和台湾移民抵境，使华人人口迅速膨胀。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主要经营利润丰厚的炸鸡快餐店（Pica Pollo）和指甲彩绘店；来自台湾的移民则多数是投资商人。

       2006年之后，多米尼加华人人口达到百余年移民史上的最高峰，并持续上升。华人主要分布在圣多明各、那罗曼拉（La Romana）、圣地亚哥（Santiago）等地，他们大部分从事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

       据华侨总会统计，多米尼加目前有两万多名华人，主要是广东人后代，以及来自中港台的新移民。土生土长的华人，大都说西班牙语、英语，会说家乡话或华语的少之又少。在这当中，较受瞩目的是鲜花基金会主席吴玫瑰。她不仅积极推动中国城的兴建工程，也筹备出版《多米尼加华人移民史》，记录19世纪至今多米尼加华人的移民概况。在当地华社提起吴玫瑰，几乎无人不晓。可惜身为混血华人的她不会说华语，但她的儿子曾到北京修读十个月的华语班，简单对话不成问题。

       百余年来，华人在多米尼加发展顺遂，享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而当地人对新移民也抱持开放态度，华人可以自由从事任何工作，当医生、教师、会计师、律师、作家或经济学家的，不乏其人。

       在多米尼加的大城小镇，不难找到华人开设的炸鸡店，粗略估计，全国大概有500家。华侨总会秘书陈佩珠说：“华人开的炸鸡快餐店数量很多，就连全国连锁快餐店集团，也快要被我们逼出市场。”

       近年迅速崛起的，则是由杨浩文和一名来自美国的越南华人引进的指甲彩绘店，全国约有70至80家。多米尼加约有50家华营汽车旅馆，绝大部分集中在圣多明各郊区，而经营杂货店、超级市场、进出口贸易、食品买卖等生意的华人也不在少数。有的华人还投资经营高尔夫球场和乡村俱乐部。

       多米尼加华人人口虽少，但经济影响力不容小觑，难怪总统莱昂内尔·费尔南德斯·雷纳（Leonel Fernandez Reyna）非常关注华人在当地的发展，并呼吁当地人多花时间学习中文。

吴玫瑰推动中国城的兴建工程，贡献良多。

在多米尼加开炸鸡店只需几万美元成本，但想从这盘生意赚钱，必须靠长时间营业及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

指甲彩绘店是华人的新兴行业。

每天上午9点，华人业主就要到市场买鸡肉、大蕉、木薯、猪蹄、牛腩等食材，然后赶回店内烹煮菜肴，完成后即放入保温柜内。到了11点开门营业，客人陆续进来点菜，才能稍稍喘一口气。一般华人店铺会营业至深夜12点，有些甚至到凌晨一两点才打烊。他们大多全年无休，或只在生日时放自己一天假，余下的时光都献给工作。

       炸鸡店老板每天就在炸鸡、砍鸡、炒菜中度过，而身为太太的，除了服务顾客和收钱外，还要处理许多突发事件。旺角炸鸡店老板娘陈佩珠表示，自己的西班牙语说得不太好，很多问题无法妥善处理，因此只好找儿女代劳，毕竟两个孩子从小在这里长大，熟悉西班牙语，也了解当地民情。

       其实，像陈佩珠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许多华人就算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却还是无法融入当地社会。他们的生活圈子，就像一个小小的中国城，自己走不出去，别人也走不进来。

       炸鸡店生意虽好，但必须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相比之下，汽车旅馆的回报更优。因此，有一定资本的华人都选择合股投资汽车旅馆，只是这行业成本高昂，没有千万至亿元很难成事。投资这门生意的华人，大多是靠其他行业起家，如经营炸鸡店、超级市场和照相馆，合作对象也几乎都是华人。有需要的话，他们还得成立银会（Chinese Money-Loan Associations）筹集资金。

       对许多华人来说，在多米尼加开设一家小小的店铺，就能养活整家人，衣食无忧。虽然华人社群不大，却也能找到三五知己，闲暇时一起相聚出游，偶尔办个聚餐联络感情，至少比留在祖籍地替人打工来得强。

       多米尼加华人，只要行为端正、刻苦耐劳，一般都能找到工作。他们每月平均工资比当地人高，约为1万5000比索，而且老板通常提供免费吃住，可谓衣食无忧。做生意的华人，若想长久居留，也会买房置地。反观当地人，大多态度懒散，薪资不高，且没有储蓄的习惯，钱花光后就跟老板预支，买东西通常选择分期付款。

       这里的华人大多选择跟同族结婚，如果在当地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他们通常会回到祖籍地物色对象。毕竟两夫妻胼手胝足经营生意，总好过一个人单打独斗，就算是入行门槛较低的炸鸡店，也无法一个人独立经营。

  另一方面，或许是成长背景相似，一些土生土长的华人男性还是会选择当地女性作为终身伴侣。他们愿意与异族通婚，能否白头偕老，彼此的包容、体谅还是很重要的。

       择偶之外，华人做生意也倾向于跟文化背景相近的同族合伙。大部分当地人天性乐观，认为迟到是理所当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想不来上班就不来上班，工作只是为了赚取生活费；做生意即使签了合约，他们还是有本事要赖，难以令华人信任，所以寻找同族合伙人，较为妥当安全。

       当然，不能一竹竿打翻一船人，将Supermercado 100%超级市场打理得有声有色的夫妻档梁顺伟（Deigo Leong）和何仪秀，就相当欣赏多米尼加人的单纯善良。梁顺伟说：“许多当地员工在我这里工作超过十年，彼此和睦相处，我们很放心把事情交给他们去办，他们也办得很好。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雇主和员工要互相体谅，好好沟通，一起合作才能达到双赢。”

     多米尼加华人喜欢合伙做生意，喜欢聚在一起吃早茶，也喜欢到会馆搓几圈麻将。此外，他们还喜欢一起搞社团，这里的社团数量之多，在加勒比海地区可说数一数二。

       自1940年代开始，多米尼加华人先后成立了多个华人团体，服务广大华人。依成立年份排序有1942年华侨总会、1975年华侨青年会、1977年三益堂、1981年至德宗亲会、1989年台湾商会、1993年洪门致公总堂、2000年鲜花基金会、2002年全侨民主和平联盟多米尼加支盟、2004年中多联合总商会，以及2006年七姓堂等。这里还有两个宗教团体，即中华基督教浸信会咏恩堂和慈济基金会多米尼加联络站。

  目前有4个社团的会所坐落在中国城内，包括华侨总会、七姓堂、至德宗亲会和洪门致公总堂。而三益堂则在离中国城不远的位置设下堂口。这些团体在多米尼加不仅扮演着凝聚华人的角色，也逐渐成为一般华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以七姓堂和至德宗亲会为例，它们为华人提供了完善的娱乐设施，包括液晶电视、麻将桌、特别订制的发牌桌等，还有服务员不时斟茶递水。而洪门致公总堂则设有乒乓桌，让大家通过运动强身健体，近年也开始举办乒乓球公开赛。

       此外，这些社团也发挥了文化传承的功能，华人逢年过节的庆祝活动，几乎都由这些社团联合包办。每逢农历新年，华侨总会和台湾商会通常会找一些大型场地举办联欢会，有时候是聚餐，有时候是郊游。庆祝方式虽然简单，节日气氛却依然浓厚。

       大部分当地华人，每年清明节都会选在休息日或在开店营业之前，携带鲜花、香烛、冥纸等，到个别会馆的公墓去祭拜祖先，整个扫墓仪式既简单又庄严。有时他们也会带同孩子前去祭祀，以灌输他们饮水思源、不忘先人的观念。

由于多米尼加是个天主教国家，所以设在当地人坟场内的华人墓地，为了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除了会在墓室内置放十字架，也会采用当地人的安葬方法入殓。后人会将先人的棺木放入大型存放格内，7年之后捡骨，再放入较小的存放格，往后就以献上鲜花、焚香烧冥纸的方式祭拜。值得一提的是，由多米尼加华人集资筹建的华人公墓在2008年2月23日开始启用后，举凡无亲无故的华人往生后都能安葬于此。

 多米尼加的华人子弟，自小就从父母的身教言传中学习到孝道和对长辈的尊重，并且懂得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华人也非常重视子女的中文教育。许多家长希望孩子至少能听懂华语，所以从小就让他们到中文学校上课。因此，这里的华人子弟一般都能掌握3种语言，首要是西班牙语，其次是广东话，再来便是普通话。由于这里与海地为邻，许多私立学校也教授法语。语言能力强的小孩，还会说英语和恩平话。不过，孩子难免会诉苦：“我不喜欢学华语，不喜欢写中文字，因为很难写！”

       翻开多米尼加的中文教育发展史：华侨总会于1958年就成立华侨学校，当时由朱华担任教职，饶凤祥于1967年接任。1980年代中期是华侨学校发展的全盛时期，那时一共开设幼稚园班、初阶、中阶、高阶4个级别，学生人数将近100人，教师由台湾侨务委员会聘请。当年还有由华人基督教会附设的圣多明各中文学校，那时学生有30余人，不过后来随着学生逐渐减少而关闭。

   华侨学校也曾多次面临关闭的风险。“1998年接任教职的施老师才到这里没多久就染上赌瘾，几乎天天上赌场，完全没有尽到教师的责任。”熟悉华侨学校历史的秘书陈佩珠说。

       从那时起，侨校的学生人数迅速减少，校内运作始终无法回到正轨。眼看侨校快要倒闭，陈秘书在2004年毅然接下教职，同时让自己的女儿到校兼课。直到近两年另一名新教师加入，学生人数才慢慢回升到30多人。

       而另一所办了十多年的台湾商会附属中文学校，其师资与环境都较华侨学校强。副校长鲁玉香这样介绍学校的营运情况：“目前，学校固定在每周五和周六上课，分小学、初中、成人等14个班级。学校共有200多名学生，98%为华人子弟，其余则是本地人的子女。”

       令人惊喜的是，这里即将出现一所崭新的中文学校，即中多联合总商会附属中文学校。该会总顾问吴国祥透露：“我们商会目前还没有会所，所以计划在一片2000平方米的土地上，兴建4层高的办公楼。我们还打算在大楼内设置大礼堂、公尺文和英文学习班教室、学生自习室、文化中心和100个车位的停车场。如果这个计划顺利推行，预计能在明年完工。”这项计划估计耗费150万美金，完全靠中多联合商会的13名执委和50多名会员联合出资。看情形，多米尼加中文教育即将迈入一个新阶段。

 位于首都圣多明各市中心杜阿特街区的中国城，是多米尼加华人主要的商业中心。这座于2008年4月17日正式启用的中国城，共有两个入口，分别设有“天下为公”和“四海为家”两个牌坊。一条横街加上一条竖街，整个城区共有40余家商店。

       中国城内有孔子广场，孔子像后墙上是栩栩如生的龙凤雕饰；另一座广场则矗立着十二生肖、观音雕像，富有中华文化气息。

       据说当地华社曾多次提出兴建中国城的计划，但皆告失败，究其因是华人在多米尼加的影响力还不足。直到曾任策划部副部长的吴玫瑰展现出莫大的魄力，这项计划才初露曙光。

       吴玫瑰与其他数名推动者吴健儒、何荣欣和吴华叶，不仅要周旋于市政府各个部门，还要争取广大华人的支持，着实不易。所幸后来在总统的大力支持下，才获得市政府融资。

      建设中国城，是为了重新打造这个地区，除了兴建两座广场和两座牌楼之外，也将更新这里的照明、通讯、道路系统，翻新华团会馆，兴建图书馆和中文学校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平日虽然只有四五个华人菜摊，但每到星期天就会变得车水马龙，人头攒动，讨价还价声此起彼落。为了应付一星期的需求，顾客通常都是将蔬菜大把大把地装入购物袋内。

       菜贩忙着做买卖，中餐馆服务员则不停地招呼喝早茶的客人。在多米尼加，除了中餐馆和炸鸡店一周营业7天之外，从事其他行业的华人大多在周二休业。

   多米尼加华社可说是加勒比海上一颗热力四射的明星。在经济上，华商们试图把触角延伸到各个领域；在中文教育上，他们更是不遗余力地倾注心血。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打拼，在祖籍地发生天灾时慷慨解囊，在多米尼加遭遇风灾时亦出钱出力。一个是祖籍地，一个是居住地，如有可能，两者都要兼顾。

       也有的华人觉得这个地方落后肮脏，跟不上时代，当地人不文明、没礼貌，于是将孩子送回祖籍地生活，希望他日赚够钱后能回乡与子女团聚。

       然而，还是有许多华人不惜耗费万余美元，申请移居多米尼加，一方面到这里来碰运气，另一方面则试图以此地作为跳板，再移居到美加等国去。

唐人街上的牌楼刻着“四海为海”4个字，道尽了多年来尼加华人的苍凉。

   波多黎各原为印第安人居住地，在西班牙语中寓意“富裕之港”。西班牙曾在此建立殖民据点，1898年美西战争后割让给美国。1917年起，美国承认波多黎各居民为美国公民，并于1952年赋予它“美国自由联邦”的政治地位，在税务、教育、卫生、住房、文化、语言等领域享有自行决策权力，美国联邦政府则主控移民、国籍、海关、防卫、外汇、交通、通讯、国际贸易等事务。岛民可投选波岛总督，却无权参与美国总统的投票。1998年就未来政治定位举行公投，超过半数的岛民对此并未表达意见。波岛的身份地位，仍旧得不到确认。

       波岛自1950年代起迅速实现工业化，现已成为美洲重要的医药业和制造业中心，同时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然而，密集的人口和有限的资源，成了波岛经济发展的阻力。多年来失业率偏高，致使涌入美国工作、定居的波多黎各人，接近岛上的半数人口。

       今天，岛民衣食住行，样样都是美国品牌，但生活、文化层面依然保有拉丁美裔的特色。这里西班牙文比英文盛行，从路牌、招牌到餐牌，都采用西班牙文；不会说西班牙语的人很少，却约有四分之三的人根本不说英语。

迈入21世纪，移民往来愈加频繁，岛民的背景文化更趋多元，不变的是，波岛依旧难以摆脱“美国驿站”的角色，而华人，则是这驿站的常客。

    早在19世纪，华人已踏足波多黎各。

       在西班牙殖民时代，除了拉丁美裔人士之外，其他移民一律不受欢迎进入波多黎各。直至19世纪末，西班牙与美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以推动地方发展，大批的中国男性才通过“苦力贸易”登陆美洲。多米尼加、古巴及波多黎各一般都是他们踏足美国的驿站。

       不过，也有部分华人为波多黎各优美的景色及淳朴的民情所迷，决定留在这里从事餐饮或洗衣业。

       1882年，美国颁布排华法令，华人移民因而无法以劳工的身份入境美国或美属地区。一部分原本就在美国生活的华人，也迫于无奈而迁移到波岛，并参与当地的铁路及城市建设工程，据说另有一部分华人在庞塞（Ponce）的制糖厂工作。

       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后，波多黎各因为《巴黎条约》的签署而成了美国的海外属地。政治地位的改变令华人入境波岛的阻力更大，岛上华人的人口增长率因此减缓了下来。

       到了1899年，由于美国担心人口贩卖集团把大批华工引入波岛，于是进一步强化排华法令，禁止古巴华人进入波岛；只有那些原本就已经在美国定居的华人，才能够自由往返美国和波岛。

       1959年，古巴共产党革命胜利，大部分古巴华人为了避免私产被收归国有，纷纷逃往国外，波岛也成了他们其中一个落脚点。到了1960年代，委内瑞拉及多米尼加等中南美洲国家的华人陆续涌入波岛，同时也有少数来自台湾和香港等地的华人移民。

       迈入21世纪，华人移民潮仍然没有间断，主要来自中南美洲，而中国移民也不少，其中以广东恩平人最多。他们一般都会在这里住上二三十年，待挣够了钱并获得美国绿卡之后，便另寻出路。

       早期的华人，有的已经离境，有的已不在人世，有的则与当地人通婚，早已脱离了华人圈子。

       今日的波多黎各华人，大多是在1970年代之后才抵达的。在这一批人当中，来自古巴的华人可说是资历最深的前辈，目前仅剩数十人，现任中华会馆主席周国强便是其中一人。他笑说：“其实我算是来得比较迟的古巴华人了。”

       事实上，古巴华人早在1959年革命之后，就已经大批迁移到波多黎各。当时最叫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们的雪糕生意。由于波多黎各的天气炎热，雪糕深受当地居民的欢迎，古巴华人只需要购置一台雪糕机器，便可开一家雪糕店。“雪糕店的成本低，盈利高，自然成了最热门的生意。”周国强说。

       在岛上住了将近40年，看尽了华人社会的变迁。他说：“从数百人，慢慢变成2000、3000人，如今已经突破7000人了。当年祖籍九江的华人很多，现在新移民则多数是恩平人。”

周国强是现任中华会馆主席。背后悬挂着孙中山遗像及波多黎各邦旗

黑头发黄皮肤的亚裔人士，是波多黎各的少数民族。约一万名亚裔人口当中，华人占了多数，共7400人。华人家庭只有280户左右，余下的都是单身男性，男女人口比例严重失衡。

       岛上华人看似朴实无华，但笑容里却掩不住经年累月漂泊后留下的沧桑。他们当中以恩平人居多，但绝少数直接从恩平移民波岛。许多华人抵达波岛前，曾在多米尼加、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古巴等地生活过，或跑遍了半个地球，最终决定停驻波多黎各。

       波岛华人以第一代移民居多，大部分居住在首都圣胡安和周边城镇，约98%从事餐饮业，少数经营杂货进出口或零售等小生意。新一代华人则大多成为上班族或专业人士。

       “在中南美的生活经验，让我们更轻易融入当地社会。我们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也熟悉拉丁美洲的文化风情。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对亚洲人总是那么友善、亲切。”这是华人普遍的说法。

       然而，波多黎各是华人奋斗、挣钱的地方，却不是厮守一辈子的家园。美国才是华人的终极目标。

       不少华人辛勤工作，都把赚到的金钱送到律师楼，为的就是早日申请到美国绿卡，一圆他们的美国梦。等待是一种煎熬，许多华人即使在波岛拥有稳定的收入，却为了居留问题而忐忑不安。

       华人一般选择在波岛创业，在美国置产，把子女送到美国深造，最后全家迁移到美国。也有不少人大半辈子就在美国、中南美州和加勒比海岛国之间奔走。

  波多黎各不大，却集原始与文明于一身。城镇和郊区的落差甚大，圣胡安或周边城镇人口密集，交通设施完善，建满平房、高楼及商店，尽显波岛繁华的一面；走入郊区，人烟稀少，处处是黄泥路，眼前都是高山绿林。

       华人到波多黎各，绝非为了远离世俗或亲近大自然。他们正是冲着岛上的勃勃生机而来，大部分居住在圣胡安或周边城镇。华人聚居地不多，却显得有点零散，整个族群缺乏凝聚力。

       华人就在自己的小天地有规律地生活着，也许是一个厨房、一家小店铺、一所房子或一张赌桌。

  波岛市区最常见的是五彩缤纷的快餐店招牌。一公里长的街道上，往往并排着四五家快餐店，足见当地市场之庞大。“当地人不爱烹调，比较喜欢到外用膳或订购外卖。”华人餐饮业者道出其中原因。

       多为小本经营的中式快餐店，犹如一匹黑马、以风味独特的美食，成功冲破众多欧美连锁快餐店的重围，争得一席之地。

       中式快餐店的招牌上鲜少出现方块字，倒是常看到“Asia”或“Chino”的字样，并挂上红灯笼或漆上红色来突出华人的特色。店内装潢一般简洁明亮、柜合后方贴着菜单，列明菜式名称和价钱，有些还附上照片；餐桌整齐地排列着，地砖抹得发亮，绝对可媲美连锁快餐店。中式快餐店大多设在路旁或路口，主要为了方便顾客开车到“Drive Through”叫外卖，有的还附有小型停车场。

       从硬体设备至待客服务，中式快餐店与连锁快餐店可谓旗鼓相当。客人选择中式快餐，主要还是对它的食物情有独钟。“这里的人非常喜欢吃饭，如果他们只爱吃面包，我们就完蛋了。”华人笑着说。

       中式快餐店的招牌菜是炒饭和炸鸡，另有迎合当地人口味的青椒牛肉、辣椒鸡肉等菜式，同时也售卖当地传统美食，如炸大蕉、炸猪扒、炸猪肉等等。“以前雪糕也是我们的一大卖点，但由于准备工作太繁复，很多店家只好把它放弃。”一名快餐店老板说。

 现今，华人在波岛开了600多家中式快餐店及20多家服务式中餐馆（Service Restaurant）。

       服务式中餐馆大多开在商场内，规模中等，约有4至8名招待员，不时推出中西自助餐，消费群主要是当地的中产阶级。近几年，日本餐开始在岛上流行，华人也把握商机，以期能分得一杯羹。现今，日本餐馆的老板和师傅几乎都是华人，要吃到日本师傅做的料理还真不容易。

       “华人总是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框框内，相互竞争。比方说，某华人开了家餐馆，如果生意不错，另一家华人餐馆马上就开在它附近。”在波岛生活超过20年的台商梁鹏，分析了华人餐饮业所面临的问题。目前，他积极开拓新市场，所经营的几家餐馆，装潢高贵时尚，兼售中西美食，希望能吸引中上层的消费群。

 在餐馆打工的华人，称得上是当地的高收入群。一位华人厨师说：“当地人月收入少于2000美元，我们这行的月收入却介于2000至3000多美元！”难怪华人纷纷投入餐饮行业。只要不上赌场，在餐馆打工的薪水足以让华人过好生活，并可在短短几年内，存够资本，自行创业当老板。

       由于资金有限，中式快餐店多属家庭式经营，最常见的是丈夫掌厨，妻子掌柜，或亲属联手打理。若生意火红，或许会多请一两名华人厨师或当地人当收银员。

       “波岛的员工薪金支出太高了，多请一名员工，一年就少了几万美元的收入，许多华人情愿自己辛苦一些。”华人老板说起他们的难处。另外，几乎所有快餐店都使用即用即弃的塑料餐具，省却了聘请洗碗工人的费用。

       当地人多数一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时，周末休息，每天下午3点半之后，公路上便开始出现下班赶着回家的车龙。华人赚取了稳定的收入，却牺牲了正常的生活。有的一星期工作6天，每天从上午11点一直忙到晚上11点，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一名在餐馆打工的华人无奈叹道：“我们的生活日夜颠倒。当地人晚上9点吃夜宵，我们才吃着晚餐呢。”其实，华人也希望能与主流社会多些接触，但现实却不容许。“就算华人圈子要办联谊活动，我们也很难挤出时间，大家都太忙了！”华人感慨。

  出席华人宴会，是一件累人的事儿。华人办喜宴，总是要等到午夜12点才能开席，曲终人散已是凌晨两三点，小睡片刻，又要抖擞精神，起身干活。“多数华人结婚都不宴客了，因为很难挑到一个适合的日期。我也很久没吃喜酒了！”湖南酒家老板“醉龙”笑说。岛上两家最大的中餐馆——利口福和湖南，适合举办大型宴会，但设宴的通常是当地商人或高官显要，华人甚少大排筵席，顶多是亲友聚餐。

       近年来，波岛经济开始下滑，餐饮业带给华人的利润，远不及1990年代般丰厚。Kimpo Garden餐馆老板张志明说：“这几年百货腾涨，我们餐馆用得最多的白米，价钱涨了好几倍，成本越来越高，盈利越来越少，生意难做啊！”

     竞争激烈、经济不景之外，华人还面对生命威胁。一名快餐店员工说：“持枪抢劫在这里司空见惯。我碰过好几次，匪徒午间冲进来，用枪指着我，我只好把收银机的钱全都掏出来给他。”华人快餐店多数用现金交易，自然成了抢匪的干案目标。“2008年，有一个华人被匪徒在脑袋开了一枪，死了；2009年，另一个华人被射穿肺部，幸好保住性命。”华人心有余悸地说。有些餐馆为保安全，只好聘请保安人员在晚间看守。

       创业能赚取比打工更可观的收入，为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于是这群踏实、耐劳的华人，继续在餐饮业里默默耕耘。

      少数华人成功跳脱餐饮业，转向其他行业发展。

       岛上的第一家华人超市——加华超市，创立于1980年代。老板娘王景香分享创业点滴：“当年我原本也在餐馆工作。看着华人越来越多，我想这些华人离家那么远，一定非常想念家乡的食物。于是我就开了这家超市，专卖华人食品，比如罐头、酱料，还有从纽约运来的新鲜华人蔬菜！有些顾客还开心得跑来向我道谢，这也是我开超市最大的满足感。”

 现在，岛上共有4家华人超市，集中在圣胡安市区，大多从下午2点营业至凌晨2点，因为主要消费群——华人都是在午夜下班后，才前来选购食品和杂货。除了从事零售业务，超市也批发蔬菜和食材给中式快餐店和中餐馆。

       运输发达的今天，货物流通快速，但亚洲超市老板娘李慕贤回忆起当年：“这里的超市只能买到小白菜，其他蔬菜或食材根本找不到。有华人从美国回来，带给亲友的手信，就是各种各类的蔬菜！”如今，岛上出售的食品和蔬菜，虽比美国贵了一倍，但还是大受欢迎。毕竟对华人来说，身处异地，却可以尝到家乡风味，真是无上的享受啊！

       “现在在岛上生活的华人真是幸福多了。”一个在岛上住了接近20年的华人说。除了食品越来越多样化外，华人接收中文资讯也更加方便。当年要看中文报，就必须订阅。中文报纸从美国船运过来，送到手中往往比出版日期慢了几周。现在只要到超市，华人就可以购得当天出版的《星岛日报》、《世界日报》、《侨报》和多种中文杂志。

       此外，华人也可以透过互联网、卫星电视，观看中港台最新的节目。和另一端华人世界的距离，终于拉近了许多

除了餐饮业和超市，也有一些华人经营食品批发业。华美和中美是岛上两家食品批发公司。华美创立至今已超过20年，中美则属后起之秀，两者主要批发米、油、盐、肉类以及蔬菜给餐馆。

       另有华人从事礼品零售和批发生意。在圣胡安老城区，有两三家华人开设的纪念品零售店，专做游客生意；服装店和假首饰店的消费群，则是当地妇女。

       华人的经济发展局限在特定领域，大规模的商店也寥寥可数。商人张志光说：“和美国的连锁品牌店相比，我们实力相差太远了。我们根本无法和他们竞争，大商场也不会给我们机会。”华人只好继续在他们的小圈子里，守住一盘小生意。

       大部分华人后代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在父母的鼓励下，前往美国发展，多数成为白领阶层。少数不喜欢美国生活的年轻人，则留在波岛，选择创业的不多，一般都是上班一族。

   在阳盛阴衰的波多黎各华人社会里，许多男性到了适婚年龄还找不到伴侣。一名华人回忆道：“在岛上孤独老死的华人不少。我曾两度替朋友抬棺木，灵堂上空荡荡的，死者没有家人，朋友也寥寥无几，非常凄凉。”

       一些中年男子努力工作，存够“老婆本”后，便透过媒人或亲友介绍，回乡娶妻，然后带着妻子回到岛上继续打拼。老夫少妻的现象在这里很常见，不少年轻的过埠新娘坦承对波岛毫不了解，却义无反顾地决定出走，无论婚姻成败，都是一次心甘情愿的冒险。

       波岛华人思想传统，结婚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感情大多在婚后才开始培养。为了子女的未来，他们携手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丈夫通常支撑家里的生计，妻子则负责打理家务、照顾孩子。如果丈夫选择创业，妻子就是最好的合作伙伴，两人共同为一盘生意拼搏。

       华人父母尽量在物质方面满足孩子，也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只要能力许可，父母坚持把孩子送到著名的私立学校求学，让他们掌握好英语和西班牙语，以期日后能顺利考上美国大学。父母用心付出，子女一般听话长进，但由于受到不同文化的冲击，双方在思想上总有着难以跨越的鸿沟。一名母亲说：“我的女儿西班牙语说得比家乡话好，有时她想跟我分享一些事情，却碰上语言障碍，看她着急的样子，我也难受。我走不进她的世界，她也不了解华人的传统观念。”华人后代外表像华人，但个性和生活方式却跟当地人没有两样。他们从小说西班牙语和英语，家乡话或华语只是家用语言，对中华文化多半是一知半解。

       除了家中亲友之外，出现在华人后代生活圈子的几乎都是非华裔。一个华人女生说：“母亲希望我以后的结婚对象是华人，但跟我同辈的华人真的少之又少，要碰上喜欢的就更难。华人总认为当地人太花心，婚姻难持久，但跟华人结合就一定幸福吗？”土生土长的华人，大多和当地人共组家庭。

       老华人一般对当地人有着负面的印象，如当地人喜欢享乐，对人生缺乏规划，不懂未雨绸缪，加上对待爱情合则来不合则散的态度，都叫华人父母安不下心。然而，为了孩子的幸福，许多父母最终还是妥协：“只要孩子喜欢和开心就好。”

 华人父母为孩子铺设未来，花尽心思让子女到美国升学。省下的钱，一部分用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另一部分则用来购置美国的房地产。“我们通常会在美国买房子，那么孩子升学时就有地方住。以后我们退休了，也会搬过来一起生活。”10个华人中，8个都会说出类似的人生大计。

       岛上有不少华人家庭长期分隔两地生活。有些父母留在波岛工作挣钱，孩子独自在美国求学；有些则是丈夫一人留在波岛工作，太太随孩子到美国当陪读妈妈。

       华人坚信，暂别是为了以后的重聚，分隔两地，也是为了美好的将来共同努力。

    波多黎各华社中单身汉占多数，他们没有家庭，只有工作和同事，每天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最恼人的是如何打发业余时间。岛上营业到深夜的只有酒吧、舞厅和赌场。酒吧和舞厅挤满了当地人，热闹的氛围更凸显华人的孤寂。落单的华人多数会选择可单独进行的活动——赌博。因此，赌博成了许多华人的生活乐趣，甚至精神寄托。

       美国政府有意把波岛打造成加勒比海上的拉斯维加斯。大部分酒店都附设赌场，主要是为了吸引游客，却意外招来大批当地华人捧场。有些华人平日一下班便赶到赌场搏杀，到了星期天晚上，由于隔天是大部分华人餐厅的休息日，因此赌场更是挤满华人。华人赌得倾家荡产的不多，但无法自拔的赌徒却不少。“那些嗜赌的人若不戒赌的话，再拼个十年八年，最后也会是落得身无分文的下场。”一名华人感叹。

       岛上生活单调，缺乏娱乐，赌场确实是消磨时光的好去处。“到赌场不一定要赌，我们也常邀约朋友去喝茶聊天，那里的环境相当舒适。”当地华人说。

       为了吸引人潮，赌场不时会办活动。“每逢春节赌场都会举行派对，设有幸运抽奖，还有舞狮和华人歌星演唱，香港歌手罗文也曾来登台呢！很多华人喜欢到赌场过年，可惜这两年经济不好，活动也减少了。”一名华人太太说。春节在波岛并非公假，加上华人分居各地，过年时大家都如常埋头苦干，“年味”不浓，其他华人传统节庆也一样。

       曾经，中华会馆是让华人联谊的地方。中华会馆成立于1975年，是岛上第一个华人组织。随着会员老化，人数逐年下降，所办的活动也越来越少，现在华人到会馆，大多是搓麻将或聊天。“要不是摆着几张麻将桌，那就更难聚集华人了。”中华会馆主席周国强叹息。

       如今较活跃的华人组织，该是成立于2000年的洪门致公总堂（简称洪门）。创办人兼现任主席何永强对当地华人情况非常熟悉，领导理事们收集当地华人资料，协助华人处理问题、解决纠纷。另外，洪门也和中国大陆领事馆及世界各地洪门组织保持密切联系，接待到访的海外宾客和媒体等，拉近波岛华人与海外同胞的距离。

       “波多黎各人口流动量很大，华人要不忙着工作，要不在美国、中南美州之间来回奔走，召集华人办活动并不容易。”洪门理事道出华人组织所面临的困境。

       今天，华人人数不断攀升，华社壮大了，但关系却比以前疏离。

  对波岛华人来说，三餐温饱比心灵富足更为重要。很多华人对宗教毫无概念。岛上的佛堂乏人问津，目前规模已缩小至一张小桌子，桌上摆着几尊供人膜拜的佛像，就算初一十五，来上香的人也非常少。

       然而，不少心灵空虚的华人仍渴望透过宗教得到精神慰藉。1997年，波岛华人写信向香港基督教会传达他们对宗教的需求，于是两名香港女传道士千里迢迢到岛上传福音，并协助成立华人基督教会。现今，教会共有200多名教友。每个星期天的主日会，分成两个时段——午间2点和晚间11点举行。“白天出席的多数是华人家庭，我们还特别为小孩开办主日学和中文班。晚上11点出席者以单身男性居多。”传道士梁清云解释。

       前来赴会的教友大多居住在圣胡安和周边地区，住在偏远地区的教友，由于工作时间无法配合，加上路途遥远，因此甚少参与教会活动。传道士说：“我们也会尽量抽出时间到访郊区，把福音传给更多华人。”

 除了是一个宗教组织，华人基督教会也负起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教会开办的中文班规模很小，教学方式也不正统，但至少让华人子弟享有接触方块字的机会。教会的中文老师说：“我们用西班牙语和粤语教学。这里粤语最通行，无论是台湾人或中国大陆人，几乎都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每逢华人传统节庆，教会也举办一些庆祝活动，学校假期则举办郊游，联系彼此。

   创办于1974年的Star Cream，是波岛最有名、且历史最悠久的中式快餐店。现任业主方宝璇夫妇回忆说：“当年我们从美国来到这里时，岛上只有古巴华人开设的雪糕店，以及几家售卖川菜和粤菜的杂水楼。我们一开始只卖雪糕，后来尝试加入炒饭和炸鸡，反应不错。之后我们再参照欧美快餐店的概念，就开创出中式快餐店了。”他们为快餐店取名“Star Cream”，也是希望借“Cream”来纪念他们以雪糕创业的历史。

       Star Cream真正引起注目，与一场火患有关。“当时店铺附近发生火灾，媒体采访时正巧提到我们的店名。或许是因祸得福，我们的知名度大大提升，客似云来。”方宝璇回忆。自此，Star Cream迅速窜红，成为业界亮眼的品牌。

       Star Cream成功后，马上引起一阵跟风潮。一些曾在Star Cream打工的华人自立门户，开了风格相近的中式快餐店，另一些华人新移民眼见有利可图，也遵循这经销模式大量复制。不久，中式快餐店迅速遍布大城小镇，到了1990年代，中式快餐开始在波岛餐饮业中站稳阵脚。巅峰时期，Star Cream开了7家分店，甚至有上市的计划。可惜后来家族里的年轻人都往美国发展，管理层青黄不接，他们只好逐步结束分店生意。现在方宝璇夫妇在打理的，是仅存的一家店，经营了约20年。

       方宝璇感慨地说：“许多已到美国生活的波多黎各人，回来度假探亲时，会特地来这里吃炒饭和炸鸡，他们想念这味道。老顾客透过我们的食物，找回了旧时光。”

       方宝璇夫妇守住的岂止是一盘生意，当中还包含了风光的家族历史和早期华人移民的珍贵回忆。

 在岛上居住超过二十年的老华人，早已习惯四海为家。他们在岛上花光了青春，积累了财富，时机到了，就潇洒地挥一挥衣袖，往邻近的美国大陆奔去。他们相信，那就是「家」。

       对土生土长的波多黎各华人来说，这里就是家。他们深爱着这片土地，并以它为傲。然而，他们却不能背弃父母的期望，为了追求更美好的未来，离开的终究比留下的多。

       历经万水千山的漂泊，「家」的轮廓已逐渐模糊，但华人却不曾放弃追寻。

   坐落在加勒比海安的列斯群岛（Antilles）的圣马丁，南部属法国管辖，北部是荷兰属地，两地分割350多年来，没有海关也没有边界，岛民不需护照就能自由往来。圣马丁岛山清水秀，年平均气温不超过摄氏30度，每年都吸引无数欧美游客到这里来过冬。

       从17世纪开始，圣马丁陆续遭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英国入侵。荷兰和西班牙殖民者在17世纪为了争夺食盐而爆发战争；法国与荷兰人于18世纪为了甘蔗种植园而发生冲突；18至19世纪英国殖民者还前后3次占领圣马丁。后来统治权又回到荷兰和法国手中，两国终于在1815年签下巴黎协定，正式确定法属圣马丁占地52平方公里，荷属圣马丁占地34平方公里。

       在荷、法、西、英4种文化的互相融合下，圣马丁散发出自己特有的文化魅力，也吸引了世界各地近百个不同国籍的人民到这里居住。这些文化各异的族群，在坚持自己信念的同时，也尊重他人的文化，和平共处。因此，40多年来华人才能在这里自在地生活，并乐观积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

 根据在圣马丁生活了近40年的华人余玉华透露，最早到这里讨生活的两名华人，名叫余永良和张生。余永良是从荷属阿鲁巴（Aruba）迁移到这里，张生则来自荷属库拉索（Curacao），两人的原籍地同是中国广东。

       1962年，他们听说圣马丁还是个未开发的地方，物资缺乏，也比阿鲁巴和库拉索容易创业，因此不约而同地踏上冒险之旅，前往圣马丁一探究竟。

       在这里打工存了一点钱的余永良和张生，1964年合资开了岛上第一家中餐馆，取名为“中国夜”。在毫无竞争的优势之下，他们所售卖的中式杂碎餐一碟2美元，顾客每天络绎不绝，收入日渐丰厚。后来张生选择再移民到其他国家，余永良则在这里继续打拼。

       在圣马丁住了20余年，来自台湾的侯晋德补充说：“和余永良差不多同期抵达的华人还有林木龙。60年代，圣马丁渔业兴盛，很多台湾渔船都停靠到这里补充食品，林木龙当时就因喜欢这里的环境而留下来。这里最好的时候，港口能停驻超过50艘渔船，不过现在鱼都差不多被捕光了，也很少看到渔船。”

       在这里开洗衣中心将近20年，来自香港的王柏林说：“在1962年至1964年之间，这里住着7名华人。”从1970年到1972年，又有20多名华人从千里达和牙买加移民到圣马丁。1973年，余玉华从苏里南到圣马丁投靠余永良。

       1975年至1976年期间，大约有70名华人从千里达、多米尼加、牙买加等地过来，中华会馆第一任会长岑悦昌及最后一任会长余健新便是于这段时期移居圣马丁的。

       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华人移入圣马丁的巅峰时期。于这段时期到来，而今仍然住在这里的华人包括王柏林、赵国良、朱远光、黄慧霞、侯晋德、黄少为、蔡云天等，这批华人不论是住在荷属圣马丁还是法属圣马丁，都已入籍荷兰或法国，或拥有两地的长期居留身份。

      华人在圣马丁虽然只占总人口的5%，却稳居零售批发业的第二位，同时在餐饮业也占据相当大的市场份额。目前华人已开设超过70家超级市场和近百家餐馆。

       根据中国驻安提瓜和巴布达大使馆统计，圣马丁大约有4000多名华人，平均每22个华人之中，就有一个华人拥有自己的商店。这些华人大部分来自广东省，少数来自香港。这些华人在商业上的发展，可说是岛上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圣马丁至少住了20年的华人，彼此之间或多或少都有亲戚或姻亲关系。在这里以香港楼的老板余玉华的亲戚最多，而跟岑悦昌一家有亲属关系的也不少，还有朱远光家族则因为有9兄弟姐妹，所以由他们申请过来的亲戚也很多。因此，来圣马丁只要找到这3个家族，就大致能够了解华人在整个圣马丁的发展情形。

  居住在圣马丁的大部分华人是生意人。

       在这里经营超级市场的华人，除了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辛劳，也必须节俭度日，才能把钱累积起来。他们大部分都是乐在其中，并没有太过埋怨这样的日子。

       一大清早，当地人喜欢在上班前到华人开的超级市场排队购买新鲜出炉的面包，下班后大约是4点半左右，也会再度光临等待新鲜面包。圣马丁的居民一般上薪资不高，在扣掉房租和交通费以后，他们只能选择便宜又美味的面包当作主食，不然一个月的薪水根本不够负担生活开支。

       50多岁的朱远光在17岁时就到圣马丁帮姨丈余健新工作，4年后在姨丈的协助下他自行创业，开了现在的超级市场。他在香港的本行就是做面包，到这里后，他也不忘本业继续在超市内卖面包。对他来说，做面包的利润太少，比一般超级市场要花更多时间，不过可以带客入店，带动生意。

 这些华人超级市场，由于在店内供应现烤新鲜面包，所以他们凌晨4点半就要到店里准备烤面包的所有材料。他们说：“我们都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早上起来吃了早餐，就去开店，一直忙到晚上7点多才休息回家吃饭。”

       他们的午餐通常是随意解决，对他们来说，晚餐是比较重要的一餐。部分华人喜欢自己在家里做晚饭，有时候煎条鱼，炒个小菜，弄些沙拉（Salad），再加个腊肠切片，就是丰盛的一餐。只是他们的用餐时间一般比较迟，通常都是7点半收工回家烧菜做饭，到真正用餐的时间已经8点半，如果是开店到9点半的华人就更迟。这样的生活的确辛苦，但是对这些华人来说日子过得还算充实。

       由于圣马丁分属两个不同的国家，两地商家在买卖货品的时候采取了不同的标价方式。在荷属区的商店内，所有商品的标价都必须采用荷属安德列斯盾来标示。不过在付款方面可以选择用盾或美金，只要在收银机上按键，系统便会自动转换。美金也通用于荷属区。

虽然在这里做生意的华人都习惯了这样的计算方式，但是他们却仍然觉得这种货币制度还是有些麻烦，他们说：“不明白为什么在荷兰境内早就淘汰的荷兰盾，在这里却还要继续使用，其实我们希望能取消这样的制度，毕竟领美金薪水，会比荷兰盾更省事，至少不用再做货币兑换。”

       在法属区，则已从早年采用法郎的制度改为通行欧元，政府也规定商家在店内只收欧元，不能用美金，用美金等同犯法，被抓到就要罚钱。

       除了要适应不同的货币制度外，在法属区和荷属区做生意的华人也要面对两地施行的高税收政策。在法属区做生意的赋税包括劳工保险、营业税等至少占生意额的四成或更高，荷属区的税务则约占生意额的一半。在法属区做生意的华人，每月必须给予当地员工的法定最低工资为1100欧元。而荷属区的每月法定最低工资则约为700美元。不过在这里开超级市场，扣完税后，一般还能有三成左右的盈利，因此部分华人认为还是颇有赚头，也逐渐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来适应这样的税收政策。

       朱远光觉得现在生意没有以前好做，利润也没有从前高，税务也太重。但是他却认为：“比起以前，现在的我更懂得做生意。我来这里的时候怎么说都只有17岁，哪里懂得什么是会计、怎么去做生意，在这里这么多年，看到政府那些精明的官员，是怎么跟我们这些小生意人算税，我学了很多，自己也在进步，就知道如何去应付他们。”

岛上唯一的华人酒店——幸福酒店。

   在圣马丁做生意的机会很多，有心人大可不必舍近求远。只要持有护照就不必申请营业执照，只要有钱有地方就可以开业，税务缴足政府不会来找麻烦。

       只可惜在这里做生意的华人，除了超级市场、酒店、餐馆和洗衣店之外，经营其他行业的却不多。目前只看见一些华人开设的珍珠奶茶铺、影视光碟和摩托车出租店。而在岛上吸金最多的珠宝首饰、电器等名牌商品店则没有华人的踪影，都掌握在印度人手中。

       住在这里的华人，几乎都对圣马丁的整体治安和环境感到满意。税务虽重，但是是有得赚，因此觉得钱还不够的华人一般都不会想着离开。有钱赚，生活又过得相当稳定的华人，更希望在这里定居。

在圣马丁生活的华人，经济能力较好的通常会置业。一些华人贪方便，就会买下距离店铺不远的房子，或者就住在店楼上。当然，也会有人到治安比较好的半山腰地段买房子。

       想在这里置产的华人大部分都有在这里定居的打算。但是他们通常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在这里念大学，如果要念小学就一定要念私立学校，要念中学就必须是美国和加拿大名校，大学当然是送到美国或加拿大去，他们都希望孩子能成为人中龙凤。孩子如果打算回来，他们通常都已决定继承父母的生意，当然也有人会在这里创业，毕竟比起在美国帮别人打工，还不如自己回来做生意好。

       以T恤、短裤和拖鞋打扮就能出门的王柏林，就正和业主洽谈买下他现在居住的房子。他说自己住了十多年，都懒得搬家或者离开这里，儿子有工作，女儿也嫁到加拿大去，他已经没什么好担心。他说：“都住习惯了，朋友都在这里，回去老家没有朋友，也不知道要做什么，还不如留在这里好。”

       超级市场的老板娘朱慕升则选择在圣马丁建自己的房子，这栋房子在2009年初建好。她说：“我在这里呆了20多年，能建起一幢大楼，我已经觉得此生无遗憾。我满意现在拥有的一切，并认为在圣马丁的华人都应该感恩自己能生活在这片土地。”她觉得这里的华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没有真正融入当地社会，当地的文化那么丰富，华人却还是生活如前。“我喜欢参与社会活动，捐助慈善单位，因为这样可以更好的跟当地人打成一片。”她语重心长地叙说自己的想法。

    而对朱远光来说，虽然现在的日常收入不比以往，却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所需，日子过得还算舒适。他曾经考虑移民加拿大，但后来却由于资格不符而放弃。其实他在这里那么多年，想离开又谈何容易。在这里他可以找到生活的重心，找到满足感，又何须到其他地方受苦？至于未来，他总是抱着平常心去看待。“我今天规划，事情明天可能就出现变化，与其去规划不知道的将来，倒不如把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好，不是更好吗？”

       在圣马丁经营珠城酒楼（Pink Pearl Bar Restaurant）的赵国良是位好客的华人，他喜欢和朋友分享美食，朋友说起某家的包子好吃，他隔日就给捧上一个自家的让朋友试吃：“怎么样，比那家的好吃吧？”在这样的热情下，谁还说不好吃？当然包子的好味道也真是没话说。

       正因为赵国良对于美食的这份好胜心，珠城酒楼才能屹立不到。同时顾客只要来到珠城用餐，就可以免费欣赏圣马丁美丽的海滩风景，这也是这家餐馆的重要卖点。这里不只游客和当地人喜欢光顾，华人在周日的时候也喜欢到这里喝茶聊天。

       朱慕升和黄慧霞是对好朋友，她们偶尔会在周日选择到珠城酒楼用点心，两个家庭的成员一起到餐厅用餐享受天伦之乐。而刘戴安娜（Diana Liu）则喜欢到天鹅酒家（White Swan Bar & Restaurant）用餐，她说：“这家餐厅是我每天必到的饭堂，每次老板都会给我做好菜，常常有惊喜，我喜欢在这里吃饭。”戴安娜觉得吃饭最重要是开心，不喜欢吃主食只爱特色小菜的她，最明白个中乐趣。

       在这里有数位平均年龄不到30的年轻少妇，每个周日都会带着自己的宝宝，找个地方聚会聊天，她们一个月平均会光顾珠城酒楼一次。大部分来自广东恩平和新会的她们，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移居到圣马丁来，在这里住了两年到十多年不等。

       提起相互认识的经过，其中一位年轻妈妈冯小燕说：“那时我们正好都怀孕，待在家里很闷，就不约而同走到海滩散步。那时碰到跟自己差不多年龄的华人孕妇也在散步，就很自然地交上了朋友。”

       只不过这群年轻妈妈对圣马丁这片土地并没有太强的归属感，她们始终认为自己的家乡比较好。其中一位妈妈说：“等孩子大一点我就要把他送回大陆让我的父母带，在中国的学习环境比较好，我还是希望让他在那边求学。”其实，身为父母的哪舍得跟自己的孩子骨肉分离，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总会有回国的一天，所以也就不介意那短暂的分离。

       每个人对于生活的定义都不同，但是能肯定的是，这些华人大部分都能在圣马丁找到自己的人生归属，对他们来说，是走是留都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活在当下。

  在圣马丁岛上，有两位华人从无到有建起慈济联络站，并致力为岛上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务，虽然耗上许多时间精力，却成功地赢得了当地人和政府机关对华人的尊重；这两名华人就是张振业的父母——张杰荣和朱细芳。

       张氏夫妇在1984年从香港经由加拿大，辗转来到圣马丁发展事业。在这里经营超级市场多年后，朱细芳开始走访圣马丁的老人院及残疾收容所，希望在这里找到心灵寄托，找到一个能回馈社会的方法。终于在数年前，她在一次回香港的旅程中，在当地书展看到了静思文化的书摊，从此开启了她的慈济生涯，也让她经历了不一样的人生。

     认识慈济后，朱细芳于2001年决定在圣马丁建立慈济联络站，以大力推广为善的理念，希望亲朋戚友和超市员工都能投入慈善事业。经过数年努力，他们成功地让员工自愿投入慈济事业。现在只要他们发起任何慈善活动，员工几乎都是二话不说地全情投入。而那些当地女性员工，也已经习惯在当义工的时候梳着标准的慈济头型，穿着蓝色或灰色上衣以及白色长裤来做慈善。

       “可惜的是，这里的华人都不太参与慈济，现在我们的义工只有20多名，定期捐款的会员也不多，只有50多人。”也帮母亲分担慈济行政工作的张振业感慨地说。

       不过他们从事慈善事业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因为在数年前他们的善行获得了荷属圣马丁国会议员的肯定和表扬。

       张振业认为慈济改变他许多观念：“我们一家人变得更和睦，做什么事都很团结。我非常乐于从事慈济。”慈济的义工们通常会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到老人院去服务，帮忙老人家剪指甲，并表演唱歌和手语给他们带来欢乐。

       当然，在这里除了从事义务工作，有些华人会选择在周末到俱乐部去和朋友喝一杯或跳跳舞。经济能力要是好些，也可以选择到附近的萨巴（Saba）、圣尤斯特歇斯（Sint Eustatius）等小岛轻松度假。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年一度的四月份狂欢节中，华人也会献上舞龙舞狮的表演，一起欢庆这个圣马丁岛上重要的节日。

      来自中国天津的田树培博士，是位卓越的教育家，他在圣马丁建立了岛上规模最大的加勒比美国大学医学院（American University of The Caribbean School of Medicine）。

       1964年，他到美国短短的9个月，就完成了由餐馆跑堂到电子公司技术员的角色转换，后来又进入辛辛那提大学攻读电机工程硕士，最后又在美国联合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为时8年的苦读，为田树培打下了进入美国教育界的坚实基础，他先后在两所大学担任过电子工程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教务长。

       他在1975年获选为立百乐蒙工艺学院的校长，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华人校长。在任期的3年多光景，他先后增设了8个科系，学生人数增加了50%，令该院达到了空前的繁盛。

       然而，这位教育家却在1978年时辞去年薪丰厚的校长职位，在一所天主教大学租借宿舍，用4万多美元开办了加勒比美国大学医学院。这是第一次由一位东方人用私人名义在美国兴办医科大学。

       可惜199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火山灾难将田树培苦心经营的大学毁于一旦。但田树培并未因此而放弃，反而越挫越勇。

     如今在校园协助舅舅处理业务的刘戴安娜说：“幸亏我们之前就已经在圣马丁买下十英亩的土地，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就到这里重建大学。我们是在1995年8月23日搬到圣马丁岛的。那时候的我简直忙得焦头烂额，十多年来，还是一直在忙。”

       提起这位舅舅，刘戴安娜的脸上总是挂着敬佩之情：“我很多事情都是跟舅舅学的，他对每一件事情，不论大小事，都一丝不苟，仔仔细细地完成。他觉得华人在国外不能被别人看不起，一定要比别人强，所以他坚持要做的任何事情，就一定会完成。”

       已经有80岁高龄的田博士，如今不再为加勒比美国大学医学院的校务烦恼，将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事业全权交由儿子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从此就不再热心教育事业。除了圣马丁的医学大学，田树培也在天津捐助了一所幼儿园和一所小学的建校工程。刘戴安娜补充道：“我舅舅打算在天津捐助一所中学，预计投入数十万美金。”

 圣马丁数百年来由两个国家管理，岛上各族长久和谐包容地生活着，身在其中的华人，也充分体会了只要愿意去尝试，就能看到奇迹的精神。

 华人都习惯将这个国家称为千里达。它主要由特立尼达岛和多巴哥岛组成，超过70%的人生活在特立尼达岛上。

       1498年，哥伦布宣布特立尼达岛为西班牙所有，而多巴哥岛则历经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多次争夺而易手。1889年，两岛终于合并成为英国殖民地。1962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宣布独立并加入英联邦。

       特殊的历史，造就了这个国家多元种族共存的局面。其中，印度人与黑人占大多数，其余还有欧洲人、阿拉伯人以及各族混血的后裔等。

       而华人与这个国家的历史渊源已超越了200年。

     在早期的西方殖民政府时代，由于许多当地土著印第安人死于传染病，导致殖民者到这里建立甘蔗园及咖啡园之后，面临缺少劳工的困境，于是就把非洲人贩卖到此处当奴隶。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华人和印度人就成了千里达最主要的契约工人。

       1806年，第一批为数147人的契约华工抵达首都西班牙港。早期的华工大多数都来自广东省，且以中山县居多，其次是东莞、台山和新会人。在契约期满之后，决定留下来的华人就把积蓄投资在洗衣、制鞋、制衣、餐饮等行业。

       当时，在千里达的华人女性只有20多人，导致许多华人男性与黑人或印度妇女结婚。

       华人所经营的店铺遍布西班牙港，大多是小本经营。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里出现了第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华人企业家、银行家，其中阿良家族便是其中的佼佼者。1926年，阿良家族的祖辈踏上了这一块土地，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成功创立了以食品加工、日用品化工、房地产、餐饮业等为主体的家族公司。

     华人在经济上站稳了脚步后，便开始将原本身在广东的亲友陆续接到千里达，这里的华人人数逐渐增长。90年代，新移民大多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也有一部分是来自香港的移民，他们多数在华人餐馆或商店打工。

       “华人刚来时，身无分文，拎着两个皮箱就来闯天下了。他们大部分都是先替朋友或亲戚打工，累积了一些钱之后才做生意。”当地的华人回忆说。“华人大多从事小本生意，几乎所有的伙食店都是由华人经营的。”

       千里达的商业竞争力较弱，所以华人赚钱也很容易，这是吸引华人前来的原因之一。

       1989年，千里达发生暴动，大部分华人的店铺都遭了殃，超过半数的华人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

       然而，华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待事件平息了之后，他们重整旗鼓，继续营业。华人为了实现自己所憧憬的美好生活，不惜一切重来。他们大多数都是从早忙到晚，一周工作7日，每日工作18到20个小时。

       “老天还是会眷顾有心人的，幸运的是，千里达近十年来的经济越来越好，大家的生活也逐渐安定。”这是当地华人一般的看法。

*祖籍广东宝安的何才爵士（Sir Solomon Hochoy），于1960年出任最后一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督，是历来首位获英国委任为总督的华人。他在当地独立后的1962年至1972年，出任首任高级总督（Governor-General）。为了纪念他，人们将千里达第二大城市圣费尔南多的一段高速公路命名为“何才”公路。*

 千里达约有6000名华人，但在全国134万人口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华人来到这里，悠悠两个多世纪，积年累月用青春和汗水一点一滴地搭建自己的舞台。

       祖辈们最早落脚的圣费尔南多（San Fernando），仍然是华人最密集的所在。首都西班牙港是新移民大展拳脚的地方，大部分知名的中餐馆、百货店都集中在那里，华人四大社团也集中在市中心的大街上。

       客家人是最早到来的华人，但大部分都移民了，他们留下来的后代，就像老树盘根错节，已根深蒂固地融入了当地社会，并在各个领域大放异彩。他们紧紧地拥抱着这里的文化，说的唱的都是流利的英语，华语反倒疏远了。

       这里90%的华人，来自广东一带。部分新移民来自福建，以亲属、厨师的身份移居到千里达。英语是他们融入当地的必修课。

       华人最感遗憾的是，这里没有中文学校，也没有中文报刊。

   华人踏海来到千里达，船一靠岸，右面是细滑白沙，清澈海水，左边是山丘屹立，碧草如茵。华人窃喜：“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健康的生活环境。”加勒比海阳光暖和，微风迎面徐徐吹来，华人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毫不犹豫地决定留下来。

       刚到的华人，一般都是替亲戚或朋友打工，先熟悉环境、学一点英语，攒积了本钱后，再自立门户，自己开店当老板。

       华人离开家乡，心里希望自己不要成为寄人篱下，天天看人脸色的打工仔，他们认为“工字不出头”。“帮别人打工，就是帮别人赚钱，自己开店做生意，赚的钱都是自己的。”于是，千里达的华人十之八九都是自己做生意。

       初次创业的华人，大部分都会选择开中餐馆。

       对华人来说，开一间中餐馆成本少，但收益大。“早上用了100元买食材，晚打烊时就可以连本带利全收回来了。”千里达人酷爱中餐，简单的炒饭炒面加鸡肉令人百吃不厌。在他们心目中，华人是一流厨师，并执着地认为只要是华人就一定会下厨，而且厨艺一定很好。

       因此，千里达中餐馆不怕没人来光顾。

     华人小本经营的小型中餐馆多如牛毛，有些是夫妻携手打理，有些则聘请几个店员帮忙作业。因为治安问题，小型餐馆的柜台上都架上了大拇指粗的铁栅栏，将里外截然分开。不论从里往外看，还是从外往里看，怎都像是活在笼子里。老板、员工、厨师、家人的活动全都在笼子里。“没办法，围栅栏可以防盗，也可以保护自己。”华人无奈地说。栅栏底部还有个小小四方格空间，让人付钱买单。

       经营中餐馆的时间自由。一般的中餐馆从上午十点开始营业，到晚上十点打烊。“如果人手足够，你甚至可以营业至凌晨一两点。”周末，客人在店里喝酒嗑花生，华人就不着急赶客人。“运气好，还可以多卖几瓶啤酒，赚些小费呢。”华人笑着说。

       千里达有近5000家大大小小的中餐馆。用最简单的乘除法来计算，意味着平均1.2个华人就有一家店！

       “其实，这里大部分的华人习惯分散投资，他们常在同一时间开好几家分行。”小小的中餐馆只要开张就能赚钱，所以即使辛苦，华人也乐此不疲。

       位于圣费尔南多的点心皇大酒家的老陈炎平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在千里达奋斗了十多年，一人兼营好几家中餐馆，除和朋友合股经营占地一万平方尺的点心皇大酒家，卖点心也卖各式粤菜。此外，他还单独另开了几家中餐馆，生意都不错。“千里达中餐馆很多，多少还是有些竞争。大型的中餐馆人来人往赚得比较快也比较多，小餐馆则是分散投资，赚点零用钱。”他如是分析。

       圣费尔南多的长城酒家，是千里达面积最大的中餐馆。它像是一座中国城堡，因为治安问题，主人要求客人把车开进来，停车免费。下车后，经过小型“御花园”，行过小桥流水，才来到餐厅。客人推开大门，中国菜香味扑鼻而来。千里达的总统、高官、名媛淑女、名人球星特爱光顾。

       老板宋耀金来自东莞龙岗，爱吃梅菜扣肉、焖猪肉，是个不折不扣的客家后裔。在千里达住久了，他已忘记如何说客家话。他用英语说：“在千里达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赚到钱，不像欧美国家，那里的竞争力大，华人餐馆若不出奇制胜，就没有立足之地。”他那爱好音乐的小儿子，也从加拿大回到千里达，因为只有在千里达的慢步调，才能兼顾他的工作与兴趣。

       在Chaguanas镇上的Buffet King自助餐厅，可容纳百人，在千里达一枝独秀。与其他叫餐点菜的中餐馆不一样，来到的客人付上一定的费用，就可以自助式地任选任吃。自助餐馆因此异常红火，即使营业了十年，客人还是源源不绝。老板Ronald Chow于60年代从广东来，他说：“自助餐盈利很高，开张第一年，我原以为其他华人也会效仿经营，哪知等了十年，还是没遇上同行对手。”他很失望，连做梦也希望千里达可以多冒出几家自助餐馆和他一决高下。

      华人星期天饮早茶吃点心的文化，也渐渐成为千里达人的习惯。

       星期天，茶楼必定人山人海，华人、黑人、印度人齐聚一堂。“一大早，当地人就来喝早茶了。以前，他们点菜千篇一律，不是烧卖就是虾饺，现在可会吃了，凤爪、排骨、蛋挞、奶黄包样样都要试。”西班牙港金鹰酒家的老板萧容庆说。

    餐馆生意好，华人也头疼，最大的困扰就是人手不足问题。特别是星期天，生意滔滔，人手不够，所有的事情都会乱糟糟。“这里请人工作很难，老板还得看员工脸色，特别是大厨，他们自尊心很强，骂一骂就走人。有些攒够钱的华人也会自己开店做生意，华人很少打长期工。”老板也有本难念的经。

       因此，很多华人老板透过经纪公司，以两年签约形式，在中国大陆聘请厨师。“这有点像赌博，一赌就是两年，万一聘请到情绪化的厨师，只好自认倒霉了。”华人说：“签一个厨师的手续费用至少6000美元，老板不仅需要为他们免费提供伙食和住宿，每个月还得准时发薪水，薪水每个月约1800至2000美元不等。”

       当老板苦水多，然而，“老板”这头衔却是华人出外闯世界的梦想。

## 

    如果说中餐馆“劫持”了千里达人的味蕾，那华人百货、超市就成功地占领了千里达人日常生活的消费市场。

       走在西班牙港的夏洛特街（Charlotte Street）上，会发现很多华人经营的百货店或超市。早期的伙食店已消失，顺应时代改变，华人把自助式、开放式的超市营业模式，呈现给千里达人。

       当地人爱吃零食爱吃甜品，一些华人百货店就零售糖果、饼干、让当地人自由选择。“只要卖些包装可爱的精果干粮，当地人就很喜欢了。他们口袋只要有钱就会天天来，有些更是早上、晚上来两趟，店里不怕没人来光顾。”在夏洛特街拐角处经营明斐贸易公司的潘丽珍说。

       当地人爱花钱、爱购物的欲望，正好满足华人爱赚钱的心态。

* *为了让当地人意识到华人的杰出贡献，2006年，千里达总统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宴会，庆祝华人抵达千里达200周年。那一年，千里达政府更是把10月23日的华人登陆日设为公共假期，全国放假一天。*
* “百货店顾名思义就是什么都卖，进货的时候，看见什么都会拿到店里去卖，数量不多，但一定卖得出去。”小型百货店设什么规则模式可言，华人想卖什么就卖什么，小小的一家店，里里外外，塞满了各种货物。当地人说：“除了应有的商品外，偶尔还可以在华人百货店找到惊喜。”所谓的惊喜就是，譬如原本想买面包，结果却“捡”到便宜且合心意的帽子。
* 夏洛特街上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永盛唐山百货。店面不大，一进门还有铁栅包围着，几个类似警卫的当地人在门口把关。客人要购物，得先通过黑人那关，他们只要对你咧齿一笑，那就表示你合格，可自由通过铁栅门进去购物了。整个过程，在几秒钟内完成，明明要去买东西，却感觉是去银行保险库领黄金。
* 永盛唐山百货是老字号，店里全卖华人货品和食品。干粮、调味料、药丸药品，还有华人拜祭的物品等，填满整间店铺。这里是华人常来“朝圣”的地方。特别是星期天，华人喝了早茶，就来购物了，人来人往，店家忙得连去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 “这里的东西，在许多超市都买不到。千里达天气热，华人喜欢来这里买龟苓膏、腐竹、薏仁等回去煮凉茶或糖水。”老板黄帝良说。他在千里达住了40多年，家人孩子都移民加拿大了，他却留在这里。“我喜欢加勒比海的天气，喜欢这里的老朋友街坊。”他说。
* 他和当地华人相处融洽，华人喜欢到他店里溜达。“在这里买东西很有亲切感，老板常会给优惠价，每次来都有不同的折扣。”一个提着大包小包刚从永盛百货出来的华人说。
* 华人生病了，也去永盛百货。“华人病了都习惯吃些成药。小孩咳嗽了就来买枇杷膏，肚子吃坏了就买保济丸，女人吃的白凤丸也可以在这里买得到。”华人说，在千里达看医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这里看医生要等很久，常常都是痛的时候看不到医生，不痛了才见着医生。”为了省时省麻烦，华人小病小痛，自然而然地就往永盛百货跑。

|  |  |
| --- | --- |
|  | 夏洛特街的永盛百货最受当地华人欢迎 |

     就像旅游书籍推介，在加勒比海滩晒太阳，是最舒服的度假方式。当地全年夏天，有点炎热，但海风徐徐吹来，也算舒适宜人。比起北美和欧洲大陆的寒流来袭，华人更是享受这里天天摄氏27度的气候。

       撇开忙碌的工作不谈，华人的生活可用写实写意、悠哉游哉来形容。

       千里达是个美丽的岛国。这里植被繁茂，四季鲜花盛开，酸甜香郁的热带水果压满枝头。明媚的阳光，洁白柔絮的海滩，清新湿润的空气，加上阵阵轻柔的海风吹拂着岸边的椰林和棕榈树，让华人找到释放疲惫的休息站。

       这里有好几个漂亮的海滩。忙累了，华人带着妻儿，就在Maracas Bay清澈的海水中游泳，或滑板冲浪。躺在细软的沙滩上晒晒太阳也是常有的事。“千里达很小，驱车到海边也不过几十分钟，星期天下班了，就坐在车上吹海风，很舒服。”黄帝良介绍说。

       华人无论怎么忙，都可以找到放松解压的方式。在千这里很难找到一个肤色白皙的华人。或许因为天天与沙滩阳光为伍，华人的肤色几乎都是健康的古铜色。

       华人说，来到千里达，他们是幸运的。天天与阳光“见面”，想法也变得很积极。

       对新移民来说，闯世界、创事业是辛苦艰难的，然而他们的想法和态度却没有因此而消极。他们努力工作，辛勤地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铺路。他们不赌不嫖，星期天陪着家人去饮早茶，或是带小孩到海边玩。

* *来自广东省的李龙（John Lee Lum)是千里达第一个发现油田的人。1880年，他来到千里达，刚开始在朋友的百货店工作，后来自己当老板。他在千里达发迹，后来还投资开发石油、办银行，并受政府委托发行首批千里达货币，是千里达华人的翘楚。*

       有些华人则上教堂寻找寄托。平安与满足写在华人的脸上，心底流出的微笑明显地刻在他们的嘴边。“华人与当地人共用一个教堂，每个星期天一起崇拜，教堂的费用一起分担。”来自香港的陈伟国说。每个星期天，他负责教会的粤语唱诗班。“干里达的华人多说英语，参与教会的华人其实不多，懂得用中文宣教的人更少。”

       千里达的华人必须会说英语，因这里的人种多，即便是占多数的印度人也说英语。华人入乡随俗，也天天用英语。“很多中文词汇都忘记了，要说华语，其实有点为难。”华人说。

       千里达的新生代很少能说华语。土生土长的黄洪治回忆说：“这很容易理解的。小孩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忙于工作，小孩童年时接触的所有东西，包括教育、资讯、娱乐、电视、课本都是英文，朋友们也都说英语。英语无处不在，强烈地包围小孩，就连在家里，家长也和小孩说英语。”

       “以前，爸爸妈妈会用蹩脚的英语和小孩沟通，想要从他们那里学到更多的英语词汇，好方便做生意。”不知道是小孩影响父母，还是父母影响小孩，到最后，千里达的华人，老的少的都说英语了。他们的英语，带着当地的口音和特殊语调，也混杂了当地人自创的词汇。

       早期的华人多与印度人、黑人通婚，他们的下一代已不再是华人那样的黄皮肤。千里达大部分的新生代，都不会继承父辈的生意。他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想要自己去闯。

       于是，他们选择当医生、律师、校长或银行的高级职员，在社会上有着较高的威望。“在千里达，华人地位很高。特别是土生土长的华人，他们生意发展都很成功，是华人的骄傲。”千里达著名华人厨师周国强说：“唯一的大型购物兼娱乐商场Movie Town也是属于华人的。”

       华人在千里达代代相传，但在这里住得越久，身上中华文化的成分就越来越微弱，连中餐的餐牌，也渐渐地换上了英文字母。老一代的华人还能用粤语或客家话说上几道华人菜名，像Pak Chan Kai（白斩鸡）、Chow Har Look（炒虾仁）、焖猪肉、梅菜扣肉等。新生代只有兴趣吃，根本不懂菜名。

       如今华人都说英语，让中华文化的传承工作更显艰难。这里没有华文报纸和华文学校。华人有心要办报，但办报的资金以及专业人才是最大问题。“我们也试过办学校，常常都只有老师没有学生。”当地华人说。

       “虽说华语是自己的母语，但是小孩学了也用不上，因为这里是英语通行，所以还是得为小孩的前途着想，一切英语为先。”大部分的华人家长都说同样的话。“这里连中文名字也用不上，我已经忘记自己的中文名字是怎么写了。”一名家长如此坦言。

       华人也不过中秋节、农历新年或其他的传统节庆了。“偶尔朋友送月饼来，我们才知道快过中秋了。”在餐馆打工的华人说。

       农历新年，千里达没假期，华人也照常上班。除夕夜吃团圆饭这回事早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但华人说：“我们还是会坚持给孩子红包，象征祝福，让孩子在新的一年里安康顺利。”

       新春佳节对新移民来说，是平淡的一天。对新生代来说，更是个模糊的日子。

       然而，夏洛特大街上的四大会馆，可不会因此而放弃。为了提醒华人不忘农历春节，他们每年都很用心地筹备新年聚餐。

     迎着海风面向海洋，华人承认心里总会惦念着海洋另一岸的故乡。然而，想到自己用一辈子青春努力建立的家园，看着一手培育的孩子踏向幸福的人生，他们觉得由衷欣慰。

 南美洲西部的秘鲁，是古代印加文明所在地。后来又是西班牙殖民政府在南美洲的统治中心。首都利马建于1535年，以浓厚的殖民色彩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秘鲁矿产丰富，铋和矾的蕴藏量居世界首位，石油自给有余，在拉美诸国中，属于经济中等水平的国家。山地约占总面积的一半，全境从西向东分为热带沙漠气候、高原气候和热带雨林气候，适合发展多样的农作物种植和畜牧业。秘鲁人经常自夸，他们的土地可以种出将近4000种不同品种的马铃薯。

       20世纪80年代，秘鲁经历了严重的社会动荡，通货膨胀高达10000%；90年代备受争议的总统藤森上台，才扭转颓势。近几年，秘鲁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稳定，利马城到处大兴土木，一片蓬勃发展的景象。

       这片古老而富足的土地，养育着世界各个种族的人群，其中包括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南美最大的华人族群。

近年的史料显示，早在1613年，就已经有来自菲律宾马尼拉的华人住在利马城，他们多数从事石材加工以及手工劳作。

       然而，世人一般都公认19世纪中叶才是大批华人抵达秘鲁的年代。那时的秘鲁刚独立不久，百业待兴且急需劳动力，于是，为数75人的首批契约华工，在1849年10月15日抵达秘鲁。后来，秘鲁废除了奴隶制度，又立法奖赏那些引入华工的国人。此后的25年内，十万名华工源源不绝地踏上了卡亚俄（Callao）码头，形成秘鲁历史上最大的华人移民潮。

       这些华工大多数在广东以及福建沿海一带被拐骗而来，签下了长达8年的契约。在为期4个月的海上航程中，华工挤在卫生条件极其恶劣的船舱内，仅有大米和咸菜充饥，很多人因为传染病而接连病倒。在航程结束时，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华工葬身茫茫大海。

       熬过这段“死亡航线”上岸之后，华工们随即被带到苦力市场任人挑选。有者因为身体瘦弱而无人问津，被迫站在烈日下暴晒好几天，最后被人口贩子以贱价卖出。当时，在当地的报章上经常刊登这样的广告：“又一批苦力完好到达，身体健壮，无生理缺陷及恶习”。对买卖双方而言，华工不过是一件会劳动的商品而已。

       由于当地的印第安人认为下海是不吉利的，大部分华工因而被卖到沿海的棉花及甘蔗种植园当苦力。他们早上4点便得起床工作，晚上则睡在上锁的寮棚内。部分华工在钦差岛（Las Islas Chincha）挖掘鸟粪，作为出口肥料。烈日下，他们忍受着恶臭，以铁铲挖鸟粪，再将之装上船，稍有松懈便遭毒打。另外，也有华工在塔拉帕卡（Trapaca）和阿塔卡马（Atakama）一带的硝石区采矿，或者在中部及南部修建铁路。总而言之，在秘鲁，最危险和最辛苦的工作都由华工来承担。

       华工那微薄的工资，在七除八扣之后已所剩无几，许多华工在合约结束以前就积劳成疾或受虐至死。也有人趁着监工不备时自缢、跳崖自尽，甚至挖鸟粪自埋。在那个年代，每一个种植园都有华工的墓地。埋葬于小沙堆底下的他们没有棺木，也没有寿衣，甚至连一小块注明姓名的墓碑也没有，似乎也没有人记得这群可怜人。

       1874年，秘鲁和中国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废除对华工的苛刻规定，并严禁华工买卖及虐待事件，此后，华工的生活才得以改善。契约期满的华工大部分流向内地，转行经商或者从事农工业生产。那时，利马的卡蓬街（Capon）渐渐形成了唐人街，到处都是华人经营的杂货店、面包店、裁缝店、理发店、修鞋店和小饭铺，还有赌馆及鸦片馆。这些小商人除下布衣裤的农民打扮，穿上了呢绒西装。

       1890年至1930年间，一批香港移民抵达秘鲁创业。他们很快便垄断了秘鲁华人的商贸活动，并进军金融保险和船运业等。这些卓越的成就使当地人对华人刮目相看，加上秘鲁政府严禁鸦片，以致华人瘾君子的数量大为减少，秘鲁人于是逐渐改变了先前对华人的不良印象。

 几乎每一名离乡背井的移民，心中总是怀着衣锦还乡的梦想。而身在家乡的父母也翘首企望，通常还会先为儿子娶亲。在婚礼当天，新娘子就只能和公鸡拜堂。然而，由于新郎一直都没能回来，根本不知道父母在老家已给他添了家室，所以多数会在当地与印第安人或黑人妇女成婚。

 当年，有华工请人到山里找来一群女子，然后双方蒙眼进入屋内，并且分成两排面壁站立。当主持人击掌时，男方和女方便同时转过身来，站在对面的就是自己的终身伴侣。这种情况看似荒唐，却是早期华人极其无奈的真实写照。

       在那个年代，得以踏上漫漫长路回乡，是一件让人羡慕不已的事。即将返乡的华人除了在报上登广告之外，还要请同乡吃饭饯行，十分铺张。欣喜若狂之余，回乡的行李还带上送给亲人们的衣服、收音机、甚至脚踏车。

       华人再度大批来到秘鲁，是在20世纪70年代。移民初来乍到，大多数都只能在街上卖菜、猪肉以及洋葱炸肉“奇卡隆”（Chicarron）。他们居住在市场对面的横巷，每日早上4点就得开始工作。而那些早来的华人却已经发展到坐拥良田，设有碾米、麻绳和布匹等工厂，过着十分富裕的生活。

       此外，自80年代开始，就有许多广州人移居秘鲁，当时华人约有4万人，华人商贸公司遍布利马各地。他们在塑胶、土产批发、玩具生产、粮食加工、保险和电器等行业都有一定的成就。

       近年来，一些华人不法之徒，将秘鲁沦为偷渡的中转站。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新移民登上了开往美国海岸的船只。途中，有人因为遇上风浪而翻船、或是为了躲避海警而跳海，甚至被无良的人蛇遗弃荒岛，尚未抵达彼岸就已经含恨而终。秘鲁华工的辛酸史早已落下帷幕，小部分的新移民却开始奏起了另一首悲歌。

* *19世纪中叶，在利马南部小镇干盆地庄园的华工因不堪长期受欺压，在南美洲太平洋战役中充当智利军的向导，击退了秘鲁军队。这件事激起秘鲁庄园主人对华工的仇恨，引发大规模的屠杀华工事件。仅仅一个月之内，便有1500名华工惨遭杀害，写下秘鲁华人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秘鲁华人的确实人数，至今仍是个解不开的谜。

       华人和当地人经历几代通婚，后裔血统复杂。有人估计，华人华裔数量已突破300万，超过秘鲁总人口的10%。

       华人大多聚居在首都利马，北部的特鲁希略（Trujillo）、奇克拉约（Chiclayo）、标拉（Piura）以及意基度（Iquito）等城镇也分别有几十户华人。秘鲁华人大多祖籍广东，主要是中山，其次为番禺、鹤山、台山、恩平、新会等地。这也是为什么粤菜得以成为秘鲁饮食的主流，以及利马每条街上都有中餐馆的原因。

       华人凭着智慧才干，在商业领域表现突出。土生土长的华裔融入秘鲁社会各阶层，从蓝领阶层的德士司机、技术工人，到白领阶层的教授、经理、总裁，再到政军界人物都有。

       今天，华人和秘鲁人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吃一样的中式炒饭，建设秘鲁的经济，丰富着秘鲁的艺术，共同打造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中文媒体和学校不缺，但在普及中华文化方面，眼前却是一段漫长而未知的路。

     首都利马是秘鲁华人的大本营。

       在这里，燥的陆地和潮湿的海滩相邻，残破的老房和新式的大楼交错，富人和穷人擦肩而过，一切是那么两极化，却又是那么和谐。

       老华人、新移民以及许许多多混血后代安分地各据城市一角，寻找属于自己的乌托邦。位于市中心的唐人街，成了各群体的汇集地。华人来买《秘华商报》，来茶楼吃港式早点，来选购中国食品，来参加社团活动，甚至就在这里开店谋生。隔着一百多的时光，剪去长辫子、摘下瓜皮帽的人们，正在同一条街上，和怀着同样梦想的先贤遥遥相望。在街上不期而遇的华人，仍以华语或广东话问候聊天。如果不是穿梭其中的秘鲁人，还有那招牌上的西班牙文，人们也许会误以为这是广州或香港的某条街道。

       对秘鲁人来说，中国并不遥远，因为中国人就在他们左右，中餐就是他们的主食。

       大半个世纪以来，华人在5000家中餐馆里忙忙碌碌，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当地人称作“chifa”的中餐馆，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到了秘鲁每个角落。秘鲁中文杂志《新视野》曾报道，连没有华人居住的郊外小镇也出现挂着大红灯笼、写着Chifa招牌的小饭馆。不过，那是懂得煮几道中餐的当地人经营的“翻版中餐馆”。

地人之所以会把中餐馆称为“chifa”，个中有段渊源。早期移民多为广东华工，每到吃饭时间，送饭来的人就高喊“吃饭！吃饭！”当地人乍听之下像是“chifa”，久而久之“chifa”就成了中餐的代名词。当时的华工肯定没想到，今天秘鲁人对中餐的喜爱，甚至超过了华人本身。一名年轻的秘鲁人说：“如果只有一种选择，我会放弃秘鲁菜而选吃中餐。”

       1921年开张的第一家中餐馆南京酒家，让利马市民开始接触中餐。此后，当地人的餐桌上不再只有马铃薯、玉米和面包，而是各式中国菜，米饭更成了秘鲁人的主食。如今，中餐已和秘鲁餐并驾齐驱，成为当地两大菜系。报摊上摆着中餐食谱，扭开电视可看到中餐烹饪节目，中餐在秘鲁无所不在。当地人可以随口说出一串熟悉的中餐菜肴：炒米饭、炸馄饨、馄饨汤、柱候鸡。60年代中餐风行起来，市面上出现了一些西班牙语新词，如姜叫kion，酱油叫sillao，炒饭叫chaufa，云吞汤叫sopa wantan。当秘鲁人喊出这些和广东发音相似的字眼，也意味着中华饮食文化已在这里落地生根。

       创业起家的艰苦辛酸，早已随时间消逝，但遍布利马各个角落的中餐馆，却成了华人奋斗最好的见证。

       在利马数一数二的富临门酒家，就是华人以坚毅、冒险和勤奋得来的成果。这里接待过秘鲁许多高官显要。继承父业的罗兆雄有他的坚持：“我们要推广正宗的中餐，也要提高中餐馆形象。”他的厨师都是从广州和香港重金聘请过来的。餐厅的自助餐极受欢迎，他还计划推出让客人在家上网点菜叫外卖的创新服务。秘鲁的中华美食节，富临门是主要承办单位，还请来秘鲁总统主持开幕。

* *平安夜的餐桌上，很多华人和秘鲁人都会以烧乳猪取代火鸡。中华饮食在秘鲁的深远影响可见一斑。*

       利马蔚蓝的天空下，有在五星级酒楼运筹帷幄的商贾，也有在城市边缘挣扎求存的新移民。事业稳定的华人可以开房车，可以去郊游、打麻将或唱卡拉OK。以福建人为主的新移民，却只能和那间仅可容纳五六张桌子的小“chifa”相依为命。他们说：“除了生大病起不了床，不然每天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生活要比在中国老家辛苦十倍。”不走的唯一理由，就是赚到的钱比老家多。当地人最爱吃的炒饭售价一碟4块新索尔，一个月下来餐馆就有2000美金的盈利

    新移民集中的圣华区（San Juan de Miraflores），目前有两三百家这类中餐馆。那一带以当地贫民居多，治安不靖。哪怕只是一张小凳子，或是一张餐单，经常不翼而飞。对新移民来说，即使是一个廉价灯泡，也是重要的财产。

       新移民语言不通，只能在城市一角默默耕耘，似乎早已被世界遗忘。因此，当张献珉牧师带着福音走进他们的小“chifa”，很多人深受感召。宣道会秘鲁华侨事工会每两星期一次的聚会，教友都风雨无阻的出席。这也许是全世界最晚开始的基督教聚——午夜12点，新移民打烊后匆匆赶来，有时连晚餐都来不及吃。平淡生活中唯一的心灵养分，的确比生理上的饱餐更重要。

  秘鲁虽未追上发达国家的脚步，但它却不是一无所有。除了矿产、石油、生态资源等，秘鲁的农渔产品尤其丰富，却因为疏于管理而得了个“坐在金山上的乞丐”称号。然而，善于开拓的华人，还是找到了创业起家的空间。

       今天，秘鲁人到中餐馆吃饭，到土生华人黄业生经营的“Wong”连锁超市买生活用品，穿着由黄仲儒创立的Calimod品牌鞋子。秘鲁小孩用的文具，多由刘铨兴公司、泰兴公司、泰来公司或大陆公司批发出来。近几年秘鲁的建筑业和矿业前景看俏，揣着资金的新移民，飞到秘鲁大展拳脚。圣窝霞区（San Borja）这个新兴商业区的公寓，住进了许多踌躇满志的华人。这个地区治安较好，消费自然水涨船高，一栋中档公寓要六七万美金。

  混乱与污浊，是很多华人对利马的第一个印象。一年只有几场霏霏细雨，这里既不需要下水道排水，也不必携带雨具出门。少了大雨的洗礼，利马空气污染非常严重。当汽车疾驰而过，路上黑烟四窜，尘土飞扬。“窗明几净”这种美好画面，在这里是不可能的事。

       比起国际大都会，利马也许不够繁华，不够先进，甚至不够干净。但是华人发现，这里也因此没有发达国家的匆忙和压力，没有大都会的冷漠和疏离。秘鲁人亲切和善，没有等级观念，而且包容心很大，乐于接纳每个族群和文化。人文环境如此和谐，真正难得，下不下雨，倒显得微不足道了。

       华人移民常对他们远方的亲友说：“利马是个留人的地方。”也许是为了四季如春的气候，也许是为了发展的机会，也许是为了包容和谐的社会，但最重要的是，这地方从不让华人觉得难以适应。想念中餐，道地的粤菜、上海菜、四川菜、火锅都有，连婚宴喜庆需要的鱼翅乳猪也一应俱全。腻了，有海鲜或牛肉为主的传统秘鲁美食，也有当地盛产的玉米做成的饮料和甜品。华人既吃秘鲁鱼生（Cebiche）,喝秘鲁汽水印加可乐（Inca kola）,也到郊外烤肉。秘鲁华侨宣道会的刘牧师在国外住了几年，还是决定回来，原因竟然是：“这里的水果很便宜。”

 居住在利马的华人，总找得到爱上这座城市的理由。

       华人一旦住下来，多数都不愿走。不过，1996年，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袭击了日本大使馆并绑架人质，到处人心惶惶。有些华商为了人身安全，变卖产业，举家迁移他国。隔年，恐怖分子遭政府一举歼灭，利马的治安才逐渐改善。今天，和许多首都一样，利马也免不了一些小偷小抢事件，不过华人都知道哪一区是安全地带，哪一区是治安黑区。庆幸歹徒一般不伤人，对当地华人来说，利马仍是一个相对安定的城市。

       每当夜幕低垂，霓虹灯闪烁的赌馆和角子机店，成了城里的一座座游乐园，诱惑着华人。有人只是赌赌运气，有人却押上了全副身家。某某华人沉溺赌博的新闻，偶尔在华人圈子里口耳相传，华人基督教团体还因此办过几场戒赌讲座会。秘鲁不禁赌，遍布利马大街小巷的赌馆很多是当地华人经营的，利马最大的赌场亦由华人投资。

       利马地广人多，却没有地铁连贯各区。搭出租车既方便又便宜，是华人出门的首选。当地人收入不高，路上充斥着兼职司机，加上政府管制不严，有执照的、没有执照的、旧车、破车都开到路上来载客。司机为了争取时间载客，在路上横冲直撞，而且为了节省都不开冷气，仅是开车窗透风。抵达目的地，又是一阵灰头土脸。当地华人对司机的驾驶态度颇有微言，但想想一公升无铅汽油要超过17块新索尔，还是搭出租车比较划算。

这座看似失序的城市，其实住着一个悠哉游哉的民族。秘鲁人约会一定迟到，答应的事也经常食言。了解了他们的习性，华人学着放慢脚步。在这个地方，一切都需要包容，他们深深明白这点。

   像漂泊的船终于找到停泊的港湾，许多华人来到秘鲁便停下了流浪的脚步。

       这么遥远的一个国家，为什么每年竟吸引了近万名新移民千里迢迢前来？“秘鲁不是花花世界，生活却很自在；秘鲁不是先进国，华人地位却很高。”这是在这里待了18年，经营旅社的汪丽群所得出的结论。

       秘鲁社会对外来移民的包容和接纳，让人忽视了传统的价值。春节期间，唐人街的舞狮舞龙固然热闹，一名父亲却说：“家人各忙各的，年夜饭也吃不成了。”

       每逢端午中秋，走在唐人街的华人后代，已经无法从包装缤纷的应节食品里，体味到其中包含的传统文化底蕴。

   中文教育亦然。早在1925年，秘鲁华社就设立了中文学校。不过多年来几间中文学校的大门总是开开关关，至今剩下3所，即中华三民学校，其分校孔子学校以及若望廿三世中文学校。这3所都是正规的私立学校，在利马颇有名气，每星期有2到3节的中文课，其余科目皆以西班牙语授课。

       在若望廿三世中文学校任教多年的高老师说：“学校里约三分之一的学生有华人血统，但他们学起中文非常吃力，倒是有时秘鲁人更有兴致学中文。”这所学校由意大利人丘先觉主教创办，所以校园里有一间天主教堂，高老师和其他十几名华人天主教徒每个星期日都来做弥撒。

       今天的秘鲁华人，仍然努力在主流文化之外寻找保留祖先传统的一方空间。他们在秘鲁亡人节举办集体祭祖活动，并请神父来祈祷。少了清明的肃穆，少了传统的元宝蜡烛，秘鲁华人敬仰先辈的精神始终未改。

       两族通婚的婚礼中，有上香、敬茶仪式，也有秘鲁式的晚宴派对。根据秘鲁习俗，新郎要跟女方所有女亲戚跳舞，新娘则必须跟男方所有男亲戚跳舞。

       华人和当地女子通婚几乎成了这个社会的传统。自华工开始，秘鲁女子就对华人的刻苦、负责和专一赞赏有加。难怪当地至今还流传着“华人是蜜糖”的说法。秘鲁有个有趣的规定，婚前15天，结婚双方必须在教堂和3家不同的报章刊登启事，公告天下。

适应和融合都需要时间，而华人社团总是及时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当年，重获自由身的华工无法马上适应当地社会，带着强烈宗亲色彩的华人会馆于是在利马沿海城镇成立。先贤在秘鲁开拓、建设，也带领华社融入当地，为华社排难解忧。他们走了，却留下了一个和平而没有纷争的华人社会。

       “秘鲁华社非常团结，没有帮派之分。”说起这件事，古冈州会馆主席罗源深感自豪。古冈州是秘鲁最早的华人会馆，成立于1867年，也就是第一批华工抵达的18年后。此后，其他八大会馆相继成立，即番禺、中山、同升、鹤山、介休、花都会馆、龙岗公所以及龙善社。中文读物也陆续诞生。至今还在出版的《公言报》就是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老报。而走过了70多年岁月的西语杂志《东方文化》，仍是土生华人了解东方文化的重要平台。

       当秘鲁中华通惠总局在1886年建成，当地华社从此有了核心的管理机构。

       今天，华人仍以位于唐人街中心点的通惠总局马首是瞻。至于其他的华人会馆，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霜，它们的任务似乎也完成了。想当年，先贤曾在这里开过多少会，做过多少关于华社的重大决定，安顿过多少无处可去的新移民。如今，会馆的墙壁已斑驳，墙上的照片也已发黄，它们就像一个个寂寞老人，向无数经过的后代，絮絮诉说着那些早已远去的辉煌事迹。偶尔一两名路过的后辈仿佛听到了这些故事，他们走到先贤的灵位前深深鞠躬，再给旁边的关公塑像上香。

       秘鲁华人始终相信，关公保佑了他们漂洋过海的先贤，也一定会继续保佑在秘鲁生活的万千华人后代。因此，5000间中餐馆都不约而同地挂上了关公画像。每年6月，古冈州会馆、同升会馆以及龙岗公所都会准备烤猪，隆重庆祝关圣帝诞辰。秘鲁中文网站“秘鲁通”，也会报道当时的盛况。

* *中医极有可能是随着华工一起进入秘鲁的。直到1918年，利马发生了致命流行病，由一名中医师潘侣安所配制的中药挽救了很多人命，中医中药才被秘鲁民间所认可，在秘鲁，中医师一度享有颇为崇高的社会地位。如今，中医诊所非常普及，然而那些拥有小铜秤以及百子柜的传统中药店却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

  关公也许真的听懂了秘鲁华人的祈求。今天，华人在秘鲁是备受尊重的民族。很多秘鲁人拥有华人血统，自然是其中一个原因。然而最关键的是华人的贡献。

       “中国人不仅为秘鲁人提供了美味的中餐，也提供了一流的哲学家、作家和专业人员。如果没有那些在19世纪耕种了我们土地的中国人，秘鲁不可能取得现在的发展和成就。”秘鲁前外交部长费尔南多德特拉塞格涅斯 格兰达（Fernando de Trazegnies Granda）这样说。最好的例子就是当年戴宗汉引进新的稻米种植法，提高了秘鲁稻米产量，获得政府颁予的农业勋章。参与建设的同时，华人也全力回馈秘鲁社会。他们为贫困地区建学校、盖医院、送物资。

      不管天灾或人祸，华人华裔始终和这个国家站在同一阵线，甚至，走到了最前线。

       1999年是华工抵秘150周年，秘鲁从官方到民间都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那年，圣窝霞区建起了中国公园，卡亚俄港口伫立了一座纪念碑，秘鲁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了一套纪念银币，通惠总局和土生华人组织联合举办许多大型的庆典活动，有花车游行、文化表演、联欢晚会、土生华裔小姐比赛、表彰有功华人等等。秘鲁国会和文化界也出版了多部跟华人移居史、中华文化以及中餐有关的书籍。

       同年，秘鲁总理更为早期秘鲁雇主欺压华工的事件，公开道歉。虽然这句“对不起”迟了150年，然而，华人和秘鲁人并没有把自己羁绊在历史恩怨里，因为大家早已是一家人，难分彼此。

       走到今天，最令华人安心的是华人可以在秘鲁自由地参政。华裔将军和高官比比皆是，甚至有人担任过总理。即使只要住满两年，或与当地人通婚3个月后就可入籍，一些华人仍旧拿着永久居民的身份。反正在这里，身份、种族、肤色都不是重点。差别在于，永久居民必须每年缴付约20美金的外侨税，如果要和秘鲁公民结婚，则须出示自己在原居国没有结婚的证明。

1921年，配合秘鲁独立100周年纪念，通惠总局筹资在利马市区的大公园里建了一座宏伟美观的大型云石喷水池作为贺礼。4年后，总局又以全秘鲁华人的名义，向利马市政厅捐赠了两座分别为“驼羊”和“训牛”的铜雕，庆祝利马开埠400周年。

  通婚是两种文化互相交融的捷径。在秘鲁，这个过程早在100多年前就开始了。

       如今，每十个秘鲁人之中，就有一个拥有华人血统。他们也许有着鲜明的东方轮廓，也许还保留中国姓氏，也许懂得说几句广东话，也许还受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影响。又或许，在一些通婚好几代的家庭，所有关于中国人的蝶丝马迹，经历过时间的冲刷和过滤，早已消失殆尽。然而，他们跟在当地出生的纯华人一样，都拥有共同的名字——土生华人。

       很多土生华人都知道，自己身上流着一定比例的华人的血。然而，秘鲁文化才是大部分人的母体文化。

       一出世，他们就和当地人一样，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以后，最隆重的节日都和秘鲁习俗有关。元旦前夕，土生华人穿上代表好运的黄色衣服，和朋友喝酒、跳舞、开派对。有人在大街上焚烧布人偶。他们相信，霉运会随着一切烧成灰烬。有人换上远行装束，拖着行李箱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盼望来年得偿所愿到国外旅行。当午夜的钟声响起，有人吃下12粒葡萄，许下12个月份的期许。在拉丁文化下长大的土生华人，总能在生活的每个细节上挥洒热情。

       部分土生华人曾听长辈的唠叨，或因童年到过中国，对美丽的中华文化念念不忘。于是，他们创立了土生华人组织，如秘鲁华人协会和秘鲁华人文化中心。通过文化表演、展览等活动，拥有同样身份背景的人来寻找对自我的认知，寻觅着一条通往祖辈文化的道路。这个过程，化成了文字和照片，记录在秘鲁华人文化中心出版的月刊上，留给后人去回顾。

  华人来到秘鲁，不只改写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秘鲁的社会结构、饮食习惯，甚至创造了秘鲁一部分的历史。

       秘鲁的过去和现在，都写上了华人的名字。未来，秘鲁人仍会亲切地把华人唤作「同胞」（Paisano）。这份和谐，一定会代代相传。

      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西北部，其国名在西班牙语为“赤道”之意。它曾经是印加帝国发源地，1532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长达300年，1809年宣布独立。二战后政局动荡，政变迭起，文人和军人政府交替执政达19次之多，直到1979年之后，政局才渐趋稳定。

       厄瓜多尔属于发展中国家。其石油产品占其出口贸易总值三分之一以上，是该国最重要的外汇收入。此外，厄瓜多尔也出口香蕉、虾及咖啡。2000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厄国取消了贬值中的苏克雷货币（Sucre），改用美元为通用货币。

       厄瓜多尔气候因地区而异：港口城市瓜亚基尔（Guayaquil）四季皆夏，是全国最繁忙的城市；首都基多海拔2830米，属凉爽的高原气候；而丛林区如克维多（Quevedo）属于潮湿的热带雨林气候。华人基本上分布在以上3个地区，并顺应环境发展各种行业。

   1875年，一批广东中山人被人用“卖猪仔”的方式骗到秘鲁建造南美大铁路。当时有许多华工或过度劳累、或染病致死，有者甚至因为不堪折磨而自寻短见。所以，有不少华工费尽心思准备逃到周边国家。与秘鲁相邻的厄瓜多尔，就这样迎来了第一批华人。

       他们首先在曼塔（Manta）登陆，然后辗转来到克维多。在农民出身的华人眼里，克维多的沃土是一块难得的宝地。他们传授给当地人种植方法，当地居民也对他们以礼相待。华人终于认定克维多为栖身之所，正式为漂泊不定的日子划下了句点。

       待一切都安顿下来以后，华人在缺乏资本及语言不通的困境下，只得从事当地人不愿意做的粗重工作，例如挨家挨户地收集脏衣物，替人洗衣糊口。

       1899年，厄瓜多尔政府开始禁止华人入境。这项变相的排华法令，完全断绝了厄瓜多尔华人的发展，迫使华人无奈地再次踏上征程，另谋出路。而走不了的华人就只能听天由命。1918年，厄瓜多尔境内只剩下1500名来自广东的华人。

       1944年8月，厄瓜多尔前总统维拉斯哥（Velasco）发表声明，欢迎华人通过正规的手续移居到厄瓜多尔来，从此掀起了第二波的移民高潮，同时也惠及了原本就在境内的华人。经过数十年的彷徨，老移民终于获得合法的居留证，他们的财产也获得更大的保障。

       此后，到来的华人大多是合法的移民。他们从中国飞到南美洲的周边国家，之后再辗转进入厄瓜多尔。此外，也有一部分移民从秘鲁迁往此处。新一批的华人移民虽然是名正言顺入境，而且出路也不再仅仅局限于耕田种地等劳力工作，但是在手头上没有太多资本的情况之下，他们免不了还是要打工数年，一边苦干一边偷师学习经商之道。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掀起出国热，适逢厄瓜多尔的移民条件放宽，只需要在中国把手续办妥，在入境厄瓜多尔7天之后就可以领取合法证件。这一来，华人自然更是蜂拥而至，这一批移民的出现，为当地华社注入了一股新力量。

*当年，厄瓜多尔政府曾专门聘请了6名农民出生的华人，前来传授耕田种稻等种植技术。该国农业发展蓬勃，并成为盛产香蕉的“香蕉之国”，华人功不可没。*

     目前，厄瓜多尔约有混血华商17万人，他们主要说西班牙语；另外约3万名华人则是老移民及其后代，以及讲华语的新移民。

       华人集中在瓜亚基尔、克维多和首都基多3个主要城市，其中以沿海的瓜亚基尔华人最多，其中又以来自广东中山的华人老移民为主。早期，首都基多并无华人移民，直到最近十年，新移民人数渐多，而且来自五湖四海，各个籍贯皆有。

       厄瓜多尔庞大的混血华裔社群有着历史因素。早年华人移民均为男性，在此落脚后即与当地女性成婚，衍生出混血华裔。随着时间的推移，代代相传，混血华裔如滚雪球般增加，远远超过纯血统华人的数量。

       混血华裔已完全被同化，不论是生活方式、思想行为，宗教信仰，都已全然本土化。他们能讲流利的西班牙语及地方语言，但却不会华语或中国方言。不过他们仍保留“变相”的华人姓名。他们也隐隐然意识到自己身上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并引以自豪。

       虽然厄瓜多尔华人的构成分子复杂，从事不同的行业，彼此不相往来，但也没有严重的矛盾和冲突，多年来相安无事。彼此相处尚算融洽，隔阂不大。

在厄瓜多尔，不同籍贯的华人，从事行业亦有别。广东老移民多投身餐饮、五金、杂货等行业，而九成以上的福建新移民则从事贸易，并以经营鞋子及手提袋为主。据悉，福建人曾尝试靠“锅铲”起家，但因烹调手法不合当地人口味，导致生意惨淡而被迫结业。近年来新移民中的外省人，多从事零售、批发进口及餐饮业。

       目前厄瓜多尔共有约800家规模不一的中餐馆，其中500家集中在瓜亚基尔，另300家则在首都基多。

       此外，华人五金店在上世纪80年代发展可观，目前，全国拥有约130间华人开的五金铺。在瓜亚基尔，五金店铺都集中在一起，几乎家家都生意兴隆。但投入五金行业的商家越来越多，竞争激烈，造成该行业难有突破。商家表示：“这一行依旧有利可图，只是发展再难攀高峰。”

       如今，中餐馆和五金业已呈饱和状态。商业头脑灵活的华商，转而引进中国商品，中国货价廉物美，大受欢迎，这就大大促成贸易进口业与零售业的兴起。进口的中国货种类繁多，包括服装、鞋袜、电器、装饰品及脚踏车等等。

   至于台湾商人，携来丰厚的资金，投资设厂，生产食品、纺织及塑胶等产品。

       厄瓜多尔华人亦有从事种植业及养殖业的。种植业主要集中在土地肥沃及雨量充足的克维多，养殖业则分散在沿海地区，大部分集中在马查拉（Machala）一带。一些华人拥有自己的农园，在自给自足之余，也批发予当地市场。华商朱家俊就拥有30公顷的农园，除了种植供自己超市贩卖的蔬菜之外，也种植油棕幼苗，外销他国；当地著名企业家梁公壁也种植水果供自家工厂生产罐头。

       在首都基多，还有少数华人从事旅行社及美容院等行业。

       厄国混血华裔则人才辈出，其中包括厄瓜多尔大学教授华盛顿·阿霍伊（陈志忠）、经营太平洋香蕉王公司的“香蕉王” 赛贡多·王（已故），及前劳工部长吉列尔谟·陈博士，都是当地著名的专业人士。

     当年中餐在当地掀起热潮时，广东话译音的“Chaulafan”（炒冷饭，意为炒饭）及“Chifa”（吃饭，现指中餐馆）等外来词，也被纳入厄瓜多尔的西班牙文里。而炒饭更是各家中餐馆的“镇店之宝”。  说起“Chaulafan”的典故，就得回溯几十年前的往事。据说，当年广东人陈箕公在厄瓜多尔经营餐馆，某晚11时左右，陈箕公的餐馆如常要打烊时，店里突然闯入3个当地人，嚷着要食物。当时店里已无主要食材，老板灵机一动，生火把冷饭炒一炒，再加点酱料、虾仁、鸡丁、肉块及青菜丝，炒成3大盘炒饭。那3名当地人狼吞虎咽、饱餐一顿后，满意地离开了。

       3天后，店里来了六七个生客，对着菜单看了又看，却叫不出名堂来，说了半天，老板才恍然大悟，再次生火炒起冷饭来。客人问起菜名，老板不假思索地说“Chaulafan”，翌日，菜单上就多了这道菜肴，并在当地大受欢迎，当地人甚至以“Chaulafan”称呼华人，让人啼笑皆非。

       改良式“炒饭”征服了当地人的味蕾。当地客食量大，消费能力有限，所以经济实惠的炒饭经常成为餐桌上的主食。

       走在瓜亚基尔街道上，偶尔可见中文字的招牌。小小的店铺上，挂着“Chifa”的招牌，高挂的红灯笼永远成双成对；走进店内，墙面上的中国结、红彤彤的挂历映入眼帘——这些正是厄瓜多尔小型餐馆、甚至任何华人店铺的招牌装饰。放眼望去，顾客九成是当地人。

       当地人好中餐，因此以“Chifa”为招牌开设的餐馆在当地有一定的号召力。华人说，近年来连当地人也看中了中餐馆的商机，也纷纷开起“Chifa”来了。

  当初，多数华人抱着“赚到钱即移民北美”的想法而来，岂知当赚得第一桶金后，他们却已心系厄瓜多尔。“当时，几乎人人都盘算着赚了钱便走，但到后来实际走的也没几个。”老移民李树强表示。

       如今还留在那里的老移民，除了继续忙碌过日子，每逢周日还会相聚，打打太极、会友聊天，甚至组团到南美各国参加各项比赛。当初的美国梦，早已不知所踪。

       新移民眼见老移民发展不错，便接二连三到来。不少来自穷乡僻壤的新移民向亲友借了钱，冒着非法逗留的牢狱之险，背负着一家老小的期望来到厄瓜多尔。他们总是期盼着数美金的日子快些到来，早日把债务还清，衣锦还乡，或到美国去，一圆美国梦。

       他们先是勤奋刻苦、安分守已地打工挣钱，稍有积蓄，便当起老板来。厄瓜多尔的创业成本低，区区一两万美金，便能做些小生意。

       不过，厄瓜多尔的华人移民，落叶归根者人数远不及落地生根者多。目前，3万名华人之中只有六七千人仍持有中国护照。许多华人为了实际利益及经商便利，而选择入籍厄瓜多尔。

 一名华人表示，拿着该国护照，可免签出入中、南美洲国家。“只要有了证件，学会西班牙语就不怕被欺负。碰上海关刁难，我还能理直气壮地与之争论。”

       放弃祖国国籍，并不代表忘本。许多已入籍的华人，每年也必忙里偷闲，一家大小返中国一解乡愁。部分人则坚持保留原国籍，期盼有一日能告老还乡。

       新移民多为福建人，而老移民多为广东人，两者语言不通，又从事不同类型的生意，彼此甚少打交道，关系也比较淡薄。除了为生活挣扎求存，新移民还面对语言不通的困境，难以融入社会。后来，厄瓜多尔华侨华人总会贴心地为新移民开办西班牙语班，并聘请通晓粤语及华文的老移民担任导师，不但帮助了新移民，也拉近彼此的距离。

       一些热心的老移民还会赠送电器及物品给新移民，用以装备他们租住的居所，双方关系日渐融洽。

* *设于1978年的肯尼迪医院（Grupo Hospitalario Kennedy），是历史最悠久的私立医院，创办人为王（Wong）氏与林（Lama）氏两大华裔家族。医院由王氏出资开设，林氏则负责看病问诊。医院从只有20名医生及60张病床，发展至今已有160名医生及近千张病床的规模。这家医院还有个连当地人都不晓得的优惠，即凡华人问诊，费用会自动打九折。*

       目前，该国共有20个华团，由不同的群体组成。最早的是成立于1907年的中华总商会。后来移民陆续到来，华人人数增多，分歧在所难免。当年厄瓜多尔中华总商会就因政治及家属因素，分化成两大派系，权力斗争相当激烈，最后导致一代商会就此没落。

       自中华总商会没落后，华社群龙无首，直到1993年成立“8人小组”，并吸纳了100名原属瓜亚基尔华侨华人协会的会员后，终于1999年成立了厄瓜多尔华侨华人总会，再次团结华社。

       如今，厄瓜多尔华侨华人总会发展稳定，每年固定主办节庆活动之余，也当起红娘，举办活动让未婚男女相互认识，而8月份的花车游行更是华社的年度盛事。

     除了为华人服务，厄瓜多尔华侨华人总会也负责接待中国官方访问团、表演团体等，住宿、饮食、旅游全由华人解决。

       1967年成立的克维多中华慈善会，则在70年代建立了该国唯一的华人公墓，这在南美洲诸国中实属难得一见。华人公墓虽建在天主教坟场里，但并不局限任何宗教的先人在此长眠。华人会在每年11月2日至11月3日的万圣节（又称亡人节）前来扫墓，而中华慈善会在这一天也会提供元宝、蜡烛、烧猪、水果等祭品让来者供奉先人。克维多华人公墓仅有160个墓位，所以一些华人死后或葬在当地坟场，或由后人将遗体运回家乡安葬。

   在厄瓜多尔，华人移民后裔懂华文者少之又少。这些老移民后代，外貌虽仍是百分之百的华人，但是他们几乎已完全同化，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但华语或方言却一窍不通。

       其实，厄瓜多尔曾出现过正规的中文学校，并拥有校产，高峰期曾有300名学生，共开办6个班级。然而随着华人移民减少，华人子弟和混血华裔又不上中文学校，故中文学校被迫改制成当地学校，并招收当地学生。后来，随着中华总商会的没落，学校因无人管理，在1997年关闭及拆除。

       不过，随着近年来中国与厄瓜多尔的贸易扩展，前往中国做生意的商人越来越多，更多人需应用华文华语，相应地提升了华文的价值。目前，厄瓜多尔至少有4所大学开办中文班。

       在中国大使馆和中国国家汉办的支持下，振华中文学校于2007年9月正式成立，华人终于有机会学习母语。不过，振华中文学校仍在起步阶段，目前只有一名老师及60名学生，每周授课两次，每次两小时，采用中国编印的教科书，3个月为一学期，收费40美金。

       老移民生活宽裕，且重视孩子的教育。他们一般把孩子送入每月学费约300美金的美国国际学校，让孩子以后能到美国接受大专教育。通常，孩子毕业后会留在美国发展，成家立业，再把父母接过去定居。不过老移民一般习惯了原居地，只是厄美两地来往穿梭。

       “我把孩子送入德国学校，好让他们多学一种语文。”华人家长认为孩子不会华文已输人一截，所以应学会另一种外语，有助于将来的出路。

* *台湾高雄的菩妙上人一心想在厄瓜多尔弘扬佛法，经由台湾移民的热心捐助，建成了厄瓜多尔第一间佛堂元亨寺，占地一万平方公尺。该寺于2007年对外开放，并特邀瓜亚基尔市长Jaime Nebot主持剪彩仪式，厄瓜多尔电视台亦有报道。庙堂的静坐班及华文班还吸引了不少当地学员。*

       一些老移民把孩子送入德国国际学校就读，学习德语、英语及西班牙语，继而到德国接受免费大专教育。

       厄瓜多尔唯一的华语电台，是1968年在基多市始创台的“安第斯之声”（HCJB-FM）。它一直延续至今，是厄国唯一的华语电台。然而以往一连7天开播的电台，如今只有在周六与周日晚上十点才开播，分别有粤语及华语的“医药信箱”及“非常岁月”两个节目。

       2007年，卫星转播让厄瓜多尔的电视荧幕出现了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在同一年里，华人也创办了华文报章《厄华侨报》。12版的《厄华侨报》为厄瓜多尔华侨华人总会的机关报，内容以中国及厄瓜多尔政治、经济、社会等新闻为主。

       该报的出现对华社而言是一大惊喜，该报先是免费派送3个月，后来因广告收入不足，亏损过巨，只得收费销售。尽管目前日销600份，依然入不敷出，每月亏损800至1000美金不等，还需仰赖华团补贴，才能支撑下去。

郝晶是振华中文学校唯一的中文老师。

从厄瓜多尔华裔的西班牙姓名里，可寻见中文姓名的踪迹，而所谓的中文名字，实际上为小名。原来，当年首批华人移民目不识丁，在登记时误报小名及乳名，当地官员也不明就理地把小名当成姓氏来记录，这么一来，“阿海“（粤语A Hoi）成了”阿霍伊“。由此造成的变”姓“比比皆是。

       如今，华裔西班牙文姓名中常常出现“阿二”（A Er），甚至“阿狗”（A Go）等令人啼笑皆非的“姓氏”。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二批移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不再重蹈覆辙，姓氏翻译也较为正规，例如将“顾”姓译为“Cruz”。

       变“姓”之误固然令人遗憾，但如今古怪姓氏却成了华裔考究祖籍的唯一线索。他们从残留的中文姓氏中寻根问祖，再认祖归宗，亦在抽丝剥茧的寻根过程中了解中华文化，对自身拥有的华人血统感到光荣。

       2006年，厄瓜多尔第五代华裔华盛顿·阿霍伊（陈志忠）就曾千里迢迢从厄瓜多尔到中国中山市三乡白石铑山村寻亲。他高兴地表示：“虽在厄瓜多尔成长，但在祖父的调教下，我还会说中山客家话，与乡亲沟通绝无问题。”

  “东方大酒楼”是厄瓜多尔企业家梁公壁的一项投资，从筹建至开业只花了一年时间。

       这座4层楼高的豪华餐馆，是华人办婚宴、洗尘、请客的最佳选择。餐馆内的会议厅曾获厄瓜多尔总统垂青，在该处召开记者会。

       梁公壁自1975年由香港到厄瓜多尔闯天下，以制酱油起家，因此有个“酱油梁”的称号。创业初期，他带着产品到小商铺推销，游说店家摆卖其产品。后来产品受欢迎，生意渐上轨道，他再借机生产自家品牌的即食面，产品还外销至周边国家如巴拿马及墨西哥。

       做生意“求新、求变、求快”的梁公壁似乎永不言倦。这边生意一上轨道，那边便开始涉猎其他行业。他还以“一条龙”形式生产水果饮料及罐头，全权包办种植、生产及销售。

       本着永不停歇的企业精神，他在2008年开设了第三家工厂。这回，他看准厄瓜多尔“水比汽油贵”的市场，在山泉地带建了200公顷的现代化工厂，生产矿泉水。除了主干产品之外，其“东方食品公司”亦生产香蕉粉、玉蜀黍粉、味精、辣椒酱等。

   厄瓜多尔华社是复杂的。华人与混血华裔之间，老移民与新移民之间，因思想上的分歧及生活方式的差异，始终存有鸿沟。然而有时中国的情意结，却把老、新移民联系在一起，一旦面对共同的难题，他们便会站在同一阵线，共赴时艰。

       当初被华人视为跳板的驿站，经过了长期的经历与考验后，华人改变了对厄瓜多尔的看法，觉得这个赤道边缘的国家，地方美丽，人民热情，确实有留下来的理由。

       厄瓜多尔华人，终究还是幸福的一群。

 玻利维亚因纪念拉丁美洲的解放者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而得名。1825年，正是这位来自委内瑞拉的英雄率领大军，帮助玻利维亚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赢得独立。

       拉巴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首都城市。它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和平”，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望。然而，独立后的玻利维亚一点也不和平。

       与邻国的两场战争，使玻利维亚不但丧失了一半以上的国土，而且还从临海国家变成了内陆国。国内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前后经历了190余起政变，平均每十个月一次，更换过近70名总统。加上贪污腐败盛行，工潮澎湃，即使蕴藏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各种资源，玻利维亚至今仍是南美洲最贫穷的国家。

       尽管没有吸引人的优越条件，这里却包容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为了生计而勇闯四方的华人，一直到了20世纪初才注意到玻利维亚。据说，最先抵达此地的是一名姓方的广东人，他当初是从秘鲁坐着牛车而来的。

       玻利维亚华人的先驱为宗教移民，此一现象在整个海外华人世界中并不多见。1963年及1965年，在香港普世教会的安排之下，两批移民由香港乘船来到圣克鲁斯市（Santa Cruz），每一批约有十户人家。

       60年代的圣克鲁斯仍是一个落后的乡镇。这里完全没有柏油路，只有稀疏的路灯，房子屋顶上盖的是棕榈叶，而最普遍的交通工具则是马车。

       当时，教会将移民安顿在中国第一农场和第二农场，给他们提供生活上的一切所需，包括住宿、衣服以及一年免费的伙食。

       起初，这些华人在农场里种菜，每逢收成时节，他们便挑着担子步行到城里去售卖农作物。直至两年后，教会自香港运来自行车，华人才有了代步工具。

       他们省吃俭用，存够本钱之后，就开始饲养猪、鸡和牛等家畜。当时，圣克鲁斯市的人口还是很少，市场并不大。有的华人购买了卡车运货到首都拉巴斯去卖。

       渐渐地，华人开始走出农场，进城开店，做起小生意来。其中以开设餐馆的最多，也有少数人开设杂货店、贸易行与小工厂。如此一来，日子长了，两个中国农场也就荒废了。

       台湾人到来则是70年代后期的事。他们以投资移民的身份开设小百货店。另有一些应聘过来的技术工人，在合约期满后，就留下来经营小生意。

       嗣后，这里慢慢有了华人开设的珠宝首饰店、汽车和电器修理铺、旅馆、面包店、礼品店、舞厅、照相馆、中医诊所、理发店、纺织厂、塑胶制品厂和食品加工厂。然而，到了70年代末，玻利维亚的华人总数也不过约寥寥的100人。

       那时，玻利维亚的商业发展尚在起步阶段，华人的店铺生意兴隆。但是，好景不常，1982年的一场货币危机，导致华人的存款大大贬值，一夜之间，财富几乎化为乌有，让人欲哭无泪。老华侨回忆说：“到医院生个孩子都要背一麻袋的钱去。”

       由于前途茫茫，华人唯有纷纷打道回府，或另觅栖枝。

       在货币风暴过后，依然有华人前来投靠亲友，甚至携带家眷过来闯事业。90年代，中国大陆的移民来得最多。当时，玻利维亚的签证条件较为宽松，许多人都将此地当作移民欧美国家的跳板。

       有些移民通过中介偷渡入境。他们大多来自福建的农村，每人只需付3万美金，中介便能代购船票，获得经济担保书，办妥签证手续。

       在那些年代里，华人被欺诈及勒索事件每天都在玻利维亚上演，遇害被杀的案子也不时发生。华人大多经商，经济条件比较好，往往成为受害者。

       后来，当地华社痛定思痛，毅然团结起来对抗这些不法分子，迫使他们知难而退之后，玻利维亚华人的日子才逐渐回复平静。

尽管玻利维亚政变不断，游行示威频繁，经济落后，华人移民仍然继续入境。现今3000名左右的华人，居住在东部最大城市圣克鲁斯的占三分之二，其余则散布在首都拉巴斯和西部城市科恰班巴（Cochabamba）。

       福建莆田人姗姗来迟，但已跃升为主要的华人群体。他们几乎无例外地开炸鸡店或烤鸡店，圆着自己安家致富的梦想。夜里，他们大多喜欢打麻将或上赌馆消磨时光。早来的香港人及台湾人则延续传统行业，安份地经营中餐馆、百货店以及其他服务业的商店。少数佼佼者也在进出口贸易和工业领域别开天地，脱颖而出。

       当初，很多人的确把这里当跳板。然而，住下来的华人觉得，如果资金有限，到北美国家只能替别人打工，又要遭人白眼。在这里，不管店面多大，自己毕竟是老板，乐得自在。

       这里华人人数不多，却也组织起华侨联合会守望相助。人在异乡，并不妨碍他们建起佑海宫膜拜妈祖。中文学校的出现恐怕还需时日，华人期望能先办个中文班。

       时光流逝，不知不觉，华人其实已经对玻利维亚日久生情，平添了几许留恋与不舍。

    社会政治局势长期不稳，的确严重阻延了经济发展，加上市场空间有限，无法造就财力雄厚的大企业家，外来移民更缺乏一展身手的余地。教育程度不高的华人，为了养家糊口，只能在当地复制一间又一间烤鸡店。

       华人从20世纪70年代起涉足烤鸡店，很快就后来居上，取代了日本人和韩国人。目前，华人经营的烤鸡店已突破200家，也就是说，基本上每十多个华人中就有一个是烤鸡店老板。在华人比较密集的圣克鲁斯，华人烤鸡店几乎占据了当地烤鸡业市场的80%。

       王和夫卖了20多年的烤鸡，回忆当年，犹是无限感慨。“当初的店铺都是租来的铁皮屋，摆上几张桌椅就开张做生意。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烤鸡、收钱、打扫、洗刷，样样都要自己来，非常辛苦。”

       这些烤鸡店单一菜色，要么烤鸡，要么炸鸡，规模大一点的店两种套餐都卖。不用推出新菜式，也不用创设新煮法，更不必大肆宣传，却天天客似云来。烤鸡店甚至不用装璜，因为当地人只想填饱肚子，不讲究任何情调或排场。当地华人常说：“烤鸡店真是伟大的行业。同样一式的烤鸡不只养大了好几代的玻利维亚人，也养活了开烤鸡店的几千名华人。”

       一座城市有上百家烤鸡店，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华人靠的就是薄利多销。烤鸡套餐除了有鸡肉、炸薯条、炸香蕉片，还附上米饭或面条。当地人觉得比较划算，更喜欢光顾华人烤鸡店。

       只提供汽水和矿泉水，不卖酒，是华人烤鸡店不成文的做法。原因是当地人嗜酒，老板最怕招来借酒装疯的“醉猫”。

       店里的34寸电视机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它对招揽食客大有助益。装不起卫星电视的玻利维亚人喜欢到店里边吃烤鸡，边观赏电视节目。到了足球赛季，店里更是座无虚席。顾客少的时候，华人老板会把电视转到中文频道，关心一下中国大陆或台湾的最新消息。

       烤鸡店属于小本经营，开业不难。新移民过来后，只要在亲友的店打工偷师，再拿出几千美金，就可以另起炉灶。当地劳工便宜，哪怕是初来乍到的新移民，也会请几个玻利维亚人到店里帮忙。

   早上8点，华人老板就必须打开店门，让工人进来清洗鸡肉、烤鸡、炸鸡，或做其他琐碎的准备工作。11点，烤鸡店开始营业，忙碌的一天正式开始。店里人声喧闹，老板不断把柜台的抽屉拉出来又推进去，收钱、算钱。员工充足的时候还能应付，要是有员工请假或缺勤，老板就得卷起袖子，到又闷又热的厨房帮忙。到关门打烊，华人回到店后或楼上的住家，已经是午夜十一二点。

       烤鸡店全年无休，华人老板嘴里抱怨疲倦，心里却很踏实。每个月的盈利，除去基本开销，就是汇款回老家，或让孩子上好一点的学校。

       玻利维亚没有太多奢华的物质诱惑，华人最大的娱乐不过是和朋友打牌搓麻将，唱唱卡拉OK，或是上赌馆解解瘾，生活俭约而朴实。

       说起勤俭持家，当地华人可是想到做到。很多人以店铺为家。如果租房，月租大约70到140美元。虽然他们开的是2万美元一辆的二手车，外出主要还是搭公车和出租车，一来方便，二来省钱。尤其在拉巴斯，市内道路狭窄，车子又多，开车上街老是找不到地方停车，还不如搭出租车便利。只要拨个电话，三五分钟后出租车就开到家门口，到市中心收费一般不会超过1.5美元，经济实惠。

       这个地方就是这样，赚得少，花费也小。

       对华人来说，发大财也许不太可能，但实实在在工作，扩大营业，一家人三餐温饱也不成问题。除非有一天玻利维亚人突然不吃鸡肉，要不然华人在烤鸡业这行仍可以细水长流。

 “不喜欢的早就走了，留下来的都喜欢这里。”这是一名老华侨谈到玻利维亚时的切身感受。

       的确，也许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有资格去评断一个地方的好坏。

       在外人和离境者的眼里，玻利维亚政局动荡，是一个令人却步的国度；但留下来的人看法不同，觉得生活环境安定。虽时常上演的罢工示威，是他们熟悉不过的街头一景，但对生活并没有大碍，日子照样可以安心地过下去。

       问问做各类生意的华人，答案竟惊人地相似。

       经营塑料制品厂和木材厂的郭照庆，手下有40个工人。去过不少地方，但惟有回到玻利维亚，他才能真正放松下来。在圣克鲁斯住了快30年，他毫不掩饰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其他地方的人工作是工作，娱乐是娱乐。在这里工作就是娱乐，不必刻意去休闲放松。”

       与郭照庆差不多同一时期来的还有大约200多名台湾人。他们在这里开素食餐馆、美容院、旅馆、保龄球馆等，生意大都上了轨道。其中陈锐津开的养猪场，现已发展为当地规模最大的农场，也是唯一的华人大型企业。

       民风纯朴，环境干净，生活简单，没有压力，是华人身居玻利维亚最实在的体会。

       即使在这里扎下了事业根基，甚至建立了新的家园，第一代华人仍不时想起老家的种种好处。大部分人赚到钱后，多半会将子女送往欧美读书就业。他们在这里撒下了汗水，消磨了年华，是留还是走的问题，在日复一日的劳碌中，成了他们心中难解的困惑。毕竟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已化为他们的记忆与情感，很难潇洒地说走就走。

       虽然玻利维亚的周边国家，平均生活水准都比较高，东面的巴西更是南美洲最富有的国家，但久居这里的华人深深了解，生活中那份自在悠闲，才是可遇不可求的。

       这里没有邻国紧张兮兮的工作环境，没有令人沮丧的交通堵塞，没有空气和噪音污染，更没有败坏的治安问题。看似萧条的城市里，其实也透着生机，只是一切都显得宁静而安逸。不疾不徐，不慌不忙，正是这里的生活节奏。因为从容，幸福放大了，快乐深化了。当地华人从不因身在南美洲最穷的国家而看轻自己。

       内心的满足，难为外人道也。

    当外人好奇华人对玻利维亚的留恋时，华人想也不想，脱口而出：“不必担心青菜有农药，因为农夫没钱买农药。海产肯定很新鲜，因为鱼贩没钱买雪柜。”三两句话，几分幽默，几分轻松，伴着几分智慧，几分热情。

       既来之则安之，市场太小，华人小规模、多样化经营即可。只要诚实、公平做生意，这里不会让人饿肚子。当地餐食菜式单调，华人学着去欣赏，慢慢地也爱上了用土豆、豌豆、玉米、大葱加上肉类熬煮的热汤。路上遇上游行，交通堵塞，可以干脆把车子停在一边，反正大家都不赶时间。这时候烤鸡店反而门庭若市，因为当地人做不了什么事，只好跑到餐厅打发时间。不过，罢工若持续好几天，运输不畅，煤气和鸡肉短缺，华人老板又难免会愁上眉梢。

* *拉巴斯地处高原，一般电饭锅煮出来的米饭熟不透，因此当地每户华人家庭和烤鸡店都有高压锅，才能做出美味可口的米饭和面条。*

       在华人看来，玻利维亚原始、朴素，充满着新奇和特别的事物。穿戴着传统服饰的人随处可见，热闹的露天市场喧嚣不断。人民天真纯厚，容易相处。当地华人曾遇到这样的事：买柳橙不能买一整篮，买针只能买一根。问为什么不能多买，当地小贩会瞪着眼睛说：“这么快把东西卖完，那我下午岂不是没事干了吗？”

       当地人做任何事都当作享受，但是数学不好，经常找错钱。他们没有减法概念，让华人既觉有趣，又感无奈。比如说，一件东西23元，拿张50元钞票付账，收款员会慢条斯理打开抽屉，边拿出钱，边从23开始算起，直至加到50，那叠多出的钱就是该找还的余数。数学能力堪称天下第一的华人，这时虽然已经心算几十遍，却也只能耐心等待，最后还要道声感谢。

       乐天随性的当地人，什么事都可以等。即使生病看诊，也是慢吞吞的，让华人哭笑不得。拉巴斯的中医师于萌，就经常碰上没有准时赴约的病人。7年过去了，他已经不会动气：“只好自己晚点回家休息。”不仅如此，每次那些没有经济能力的病患找上门来，他不但分文不收，还给他们车费回家。他对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

       当地华人常说：“当初根本没想过要呆下来。”结果留了下来的华人也不在少数。

       因为，玻利维亚还有其他的魅力吸引着他们。

       是天气！圣克鲁斯地处平原，属热带气候，四季阳光灿烂。中部山谷地区科恰班巴市属于温带，温和宜人。

       两个城市夏天不热，冬天不冷，硬是留住人心。

       拉巴斯处于3600公尺的高原，低温、缺氧，竟然也可以吸引华人。也许，站在这个全世界最高的首都，抬头看到那片湛蓝，乡愁融化，就不再念念不忘要离开了。

       其实，当初华人也都经历过一段适应期。3年前从福建过来和丈夫团聚的周敏，就曾病得一塌糊涂，后来才克服了高原反应。“现在反而不习惯圣克鲁斯的平原气候，太热了。”拉巴斯印地安人以羊毛斗篷和五颜六色的手编帽子保暖，华人出门都带上毛衣或外套；圣克鲁斯华人则是终年穿着夏装。从拉巴斯到科恰班巴，从科恰班巴到圣克鲁斯，不过是几个小时车程的距离，高低凉热，却让人以为到了地球的另一端。一天之内，温热变幻无常，身处其境，也是有趣。

## 

这个地方让华人有归属感，除了环境和民情，还因为政府对移民的宽厚政策。

       只要住满5年，外来者就可申请永久居留，之后再归化为公民。不过，近来归化条件多了一条，即申请者必须会唱玻利维亚国歌。第一代华人西班牙语本来就不灵光，用来唱国歌更是提词忘句，尴尬得像个孩童，所以都乐于当个永久居民。反正入籍与否，差别不大。

       玻利维亚公民60岁以后可每个月领取200玻币的养老金。这对华人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此外，每次总统大选，公民都必须前去投票。有些华人被政府抽中当投票站站长，也就一板一眼地履行起服务公众的职责。

       受惠太多，理应回馈。华人关切当地的方式有多种，人数也越来越多。当得知玻利维亚尚有64%的人处在贫穷线以下时，华人纷纷带着物资和金钱，走进当地人的社群，送上一点心意。最近，佛教慈济刚刚在圣克鲁斯和拉巴斯设立办事处，开始为慈善事业忙碌奔走。当地一名退休银行经理受感召加入了义工团队，并坦言：“中国人在这里帮助我的同胞，令我非常惊讶，也很感动。”

       尽管入乡随俗，尽量去了解当地，但华人也意识到要敞开胸襟，用文化来介绍自己。华人社团曾和中国使馆联合举办过一次“锦绣中国”的大型展览。用色彩斑斓的照片展现出中国面貌的日新月异和华人文化的多姿多彩。当地电视台还特别制作了一个相关报道，让玻利维亚观众对中国有更深的认识。

       除了看家的中餐手艺外，华人也把望闻问切的中医带过来。圣克鲁斯和拉巴斯都有中医诊所，提供针灸、推拿、按摩等治疗。政府承认中医，近几年中医师经常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当地人对中医，尤其是针灸便熟悉起来。只见中医师拿几支针这里插插，那里扎扎，病痛马上消失，仿佛魔术一样神奇。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西医看不好的病、很多人都会来找中医解决。中医收费相对便宜，连带中医师也让人觉得更加亲近。

       到华人住家转一圈，墙上春联已经褪色，小小的中国结沾着些灰尘，很难再看到更多其他具中国特色的摆设。润物细无声，倒是玻利维亚人对中华文化越来越感兴趣，精致的中华小饰物更是令他们爱不释手。一些对中华文化认知更深的当地人，摆放的中国饰品甚至比华人家里还要多。一个不小心，会让人误以为进入了一个华人家庭。

       华人与当地人，开始结下不解的情缘。

当地人热情善良固然是事实，但华人还是愿意有一个自己的圈子。

       华语、福建话、广东话或莆田话，是第一代华人惯用的语言。对他们来说，西班牙语像隐形的障碍，使他们难以融入主流社会。

       每年春节，圣克鲁斯的两广同乡会和拉巴斯的天河中国文化之家，都派出舞狮队伍来给华人商家拜年。平常多累都不愿休息的华人，会提早打烊，参加华人社团举办的佳节聚餐。端午中秋，大家互赠自家做的粽子月饼。人数虽少，节日气氛难比故乡，但脉脉温情，聊慰于心。

       中文报在目前还是奢侈的计划，不过两本内容丰富的侨刊填补了空缺。玻利维亚中华总会出版的《侨声》和玻利维亚中华工商总会的《长城侨刊》，成为华社圈子的信息来源。而其中的当地新闻和移民权益的相关特写，更是当地华人所需的生活指南。

       曾经，华社内部纠葛连连，让人寒了心。如今这里的华人走出阴影，安居乐业。他们深深感到，团结，才能安身；和谐，才有安定。

       中华总会、两广同乡会、莆田同乡会、中华工商总会、华人基督教会和佑海宫管理委员会，是圣克鲁斯的6大华人社团。现在它们已经成立华侨联谊会。联谊会的最高执行员，由6个会长轮流担任，每两个月轮换一次。华社的任何冲突和问题，都在联谊会的月会上公开协商、沟通和解决。烤鸡店老板如果遇上当地官员借卫生检查来敲诈，社团会义不容辞协助争取权益。华商们说：“近来，这类烦人的事件明显减少了。”

       大部分华人在春节期间，会到圣克鲁斯的佑海宫上香。佑海宫古典雅致，供奉的妈祖娘娘，是近年刚从万里之外的台湾请来的。不管怎样，侨领和华人信众都相信，此后那些戾气十足的事情果然少见了，人心也越来越齐。香烟缭绕中，华人祈求神明继续保佑这群跨海越洋谋生的子民。

一些新老移民是虔诚的基督教徒。1988年，圣克鲁斯华人修建起自已的教堂，正式成立了华人基督教会。主日崇拜定在周日下午4点到5点半，因为这段时间烤鸡店的顾客比较少。

       每当夕阳的余晖照进这座教堂，寂静的圣殿顿时充满了祷告、赞美和感恩之声。

       除了温暖富足的生活，华人还在这里找到了心灵的依托和平安。玻利维亚的可爱，也包括让华人自由拥有自己社群的生活。

    在玻利维亚，婚嫁成了华人的大问题。

       华人在这里找对象不容易，异族通婚还只是偶尔有之。单身男子通常到了适婚年龄，就请老家的长辈物色对象。待一切准备就绪，他们飞回中国娶亲。婚后返回玻利维亚，等到孩子出生满月，他们才设宴请客。

       有了孩子，教育又是另一个难题。烤鸡店生意忙碌，父母只好把孩子送回中国请长辈照顾，也好让孩子学学中文。等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再接回来。

       这里的华社在不断改善，唯独欠缺的是中文学校。以前曾经开办过中文班，可惜早已停办。华人有意让下一代接触些华文教育，但现实中又不可能。华人孩子一般会送去当地的私立学校就读，这些学校的教育质量不错，但学费却非常高，然而为了让后代有更好的出路，华人家长都不惜代价。他们不想让孩子像自己一样，困在一间间闷热的烤鸡店里。

       私立学校注重西班牙文和英文，华裔子弟的双语说得异常流利，但因为没上过中文课，只能说简单的华语，读和写的能力不高。

       重开一个中文班，是目前玻利维亚华人的急切企盼。

       孩子在当地学校上学，突破了语言鸿沟，但一毕业，他们又飞到外国去深造。出去了，感受到大都市的繁华热闹，很少人会再回来。玻利维亚，只是他们每年回来度假、探亲的地方。

       “这一辈子赚到的钱都花到孩子身上了。”华人常这样感叹。

       这正是他们的生活写照——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只要梦想在延续，自己在玻利维亚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周遭的一切也是美丽的。

   坐落在拉巴斯一条宁静街道上的天河中国文化之家，是玻利维亚唯一一家华人开的武术馆。

       馆主黄幼十多年前和队友受邀到南美洲表演武术，后来滞留在玻利维亚。那时他身无分文，只能在公园过夜。户外寒风凛冽，衣衫单薄的他根本无法入眠，一早起来练功取暖。到公园来晨运的路人看见一名中国人在练功夫，马上过来好奇地询问。原来当地人很早就对中国武术有种莫名的迷恋，只是一直没有人教。黄幼于是应邀当起教练，中国武术从此式走入玻利维亚。

 武术馆名气越来越大，黄幼也经常上电视台表演以及接受报章杂志的访问。几名学有所成的徒弟已经成为他的助教。经过黄幼的不懈努力，武术逐渐褪去神秘的面纱，受到当地的普遍欢迎，连海军陆战队军人、名人政要的保镖都来拜师学艺。

       当地最早的舞狮舞龙活动也是由他发起。他激动地回忆：“这里第一只舞狮是我自己亲手制作，一笔一画完成。”近期，他更是把武术馆大大改造一番，门口刻上了两只栩栩如生的雕龙，馆里也增加了更多中国特色的装饰。每一部分，他都是自己动手，用心打造。目前，天河中国文化之家正在筹办中餐烹饪班、雕刻班、绘画班、书法班以及中文班。

       如今他和玻利维亚籍妻子已有一儿一女，家庭生活美满。从被迫在公园过夜的穷光蛋，到今天是超过6000个学生、备受敬仰的武术师父，黄幼写下了华人玻利维亚故事的精彩一页。

新春时节，天河中国文化之家的舞狮会积极排练，准备给华人商家拜年。

    最初陌生担心，现在熟悉自在，华人在波利维亚落脚，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

       这个南美高原之国虽不是华人的故乡，却热情款待他们，给了他们奋斗的空间，成就了他们小小的梦想。当初为何决定移居这里已不重要，因为这些华人都开始了新的生活，都找到了留下的理由。

 南美洲内陆小国巴拉圭资源匮乏，先天条件不足，被西班牙长期统治；加上几次战争，更使它元气大伤。19世纪60年代，巴拉圭倾全国之力对抗巴西、阿根廷、乌拉圭3国，连8岁儿童和年迈老人都被征召到前线。战败后，被迫割让大片国土，还失去超过一半的人口，成年男子剩下不到3万人。

       1932至1935年，与玻利维亚的一场血战，又使它的国力跌到谷底。在1989年斯特罗斯纳的独裁统治被推翻之前，巴拉圭经历了无政府状态与军政府专政时期。

       巴拉圭长期依赖农林畜牧业，经济增长缓慢，贫困人口高达40%；贪污腐败盛行，治安败坏，社会乱象丛生，难题多多。唯一叫当地人津津乐道的，是与巴西合作建造了世界第二大水电站——伊泰普水坝（Itaipu Dam）。

       面对各种严峻挑战，巴拉圭一直是南美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因此，直到20世纪中叶，才有华人踏足这片土地。

1952年，欧玉明和家人从香港来到巴拉圭，13年后，他的妻舅陈雄才一家跟着到来。如今，陈雄才的后人仍然留在这里。

       此后，贫瘠落后的巴拉圭，就一直没有太多华人问津。

       到了70年代，台湾掀起出国热，许多华人选择登陆巴拉圭。实际上，这些移民大多是要到巴西、阿根廷、美国和加拿大等大国，只是巴拉圭签证条件较为宽松，容易入境，所以成了最好的跳板。

       然而，老天似乎给这些华人开了个玩笑。当年，在巴拉圭的亚松森机场，前来接机的亲戚神色凝重地告诉他们：由于巴西加强入境管制，现在，他们恐怕是过不去了。前方无路可走，他们就只好先留下来找些事做，再伺机而动。很多人就是这样滞留在巴拉圭。据说，这时期领取过巴拉圭身份证的华人数以万计。

       那时的巴拉圭非常贫困。一名华人忆述道：“一下飞机，看到破败的机场，马路是泥土和石头铺成的，巴士好像随时会散开，眼泪就掉下来了。”然而，生活还是要继续。

       华人最在行的就是做小买卖，因此，华人经营的杂货店逐渐布满了亚松森街道，中间也穿插华人所开设的旅行社、中餐馆和旅馆，还有当地人称为“Copetin”，即一种以卖点心和汽水为主的小吃店。

       开了店，又进了货，一切都得从头开始，除了毅力，他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不论卖什么，都得用纸笔、计算机，再比手划脚一番，才能把价钱说清楚。

       没想到，他们这一呆就是几十年。更没想到的是，他们后来的命运，竟然也跟着巴拉圭的经济一路起伏跌宕。

* *90年代中期，当地政府特别在桥头成立了扫黑组，负责保护当地华人。扫黑组的警员都住在桥头的中华会馆，当中还有多名警员会说华语。*

       在80年代中期，巴西与阿根廷严厉管制货品进口，税收极高，物资也严重短缺。同时，巴拉圭则采取自由进出口政策，降低进口税。因此，周边国家的人纷纷前来跑单帮，以华人为主力的批发以及零售百货业也随之形势大好。

       当年赶上这波“经济奇迹”的华人依稀记得：“走在路上，总是有当地人搭讪问时间，华商因此大量入口手表，还有首饰、化妆品等。”

       那时候的运输业不发达，华商必须亲自去台湾或香港把货押来。这些小物件可以带得多，卖得也好。一只手表只有5分钱蝇头小利，但一天可以卖几万只。来巴拉圭的航班不多，每个上机的华人都至少带着几十包货。那时，机场满地都摆满了华人准备带上机的货品，蔚为奇观。

       到1985年，当地华人人数已突破1万5000人。近年来，更有一些中国大陆移民陆续前来；大展拳脚，期待能够创造新的奇迹。

 巴拉圭目前有6000名华人，80%聚集在第二大城市桥头，其他则散居在亚松森、贝多芳市（Pedro Juan Caballero）和英格纳松（Encarnacion）。

       多年来，华人坚守百货零售和批发业，掌控了桥头60%的商业活动。少数涉足木材和家具出口、黄豆出口、农药进口、机械进口、木屑发电厂、旅行社等。

       桥头是个拥有17万人口的移民城市。巴拉圭人、阿拉伯人、犹太人、韩国人等多方杂处，华人在其中打造出自己独特的社区。华人商店、中文学校、社团、中文报章和宗教团体，一应俱全。因此，通晓华语、英语和当地语的第二代，到国外念书、就业都极具优势。

       不轻言放弃，是当地华人的信念。如今百货市场低迷，华商并没有萌生去意，反而觉得这是转型的好时机。他们始终觉得，巴拉圭极具发展潜力和经商机会。

巴拉圭是农业国家，工业落后，工厂缺乏零件，须坐飞机出国去买。在这种情形下，进口就成了最好做的生意。华人到此，不管是什么出身，都下海从商。资金雄厚的做进出口，口袋有点钱的开间小店，什么都没有的就先打工。

       做生意，总有风险。在巴拉圭经营进口贸易，更要面对市场不按牌理出牌的游戏规则。

       “巴拉圭是个畸形市场，大好大坏的极端都会出现。”华人说时轻描淡写，其实经历了不少惊心动魄的场合。这些年来，经济大起大落，市场时好时坏，官员敲诈贪污，盗贼伺机而动。山穷水尽，柳暗花明，还好每次经济下滑总跟着另一波经济重振，华商早已处变不惊，总算闯出了一条路。

       90年代，华人聚集地由首都亚松森渐渐迁往东部的东方市（Ciudad del Este），并且开始了另一个传奇。

       东方市地处巴拉圭、巴西与阿根廷的交界处，由于3国同属南美共同市场（简称“南共市”，MERCOSUR），3国之间的民众可自由出入境，并不需要签证。而且附近有世界奇景伊瓜苏（Iguazu）大瀑布以及伊泰普水坝，每日都吸引不少游客和单帮客前来。

    桥头是巴拉圭最大的贸易区，每天迎接着成千上万的人流。对突如其来的拥挤，小城有点招架不住；空间小了，垃圾多了。这显然不是最理想的居住环境。然而，华人却在这里聚集、生活。

       桥头市中心，几条街道纵横交错，这便是华人主要的活动空间。漫步街上，可以看到华人经营的中餐馆、面包店、东方食品百货店、牙医诊所、图书以及录影带出租店、保龄球馆。还有中华会馆、中文学校，都是相隔几步之遥。                 华人依然过着出国前的生活，他们说闽南语、华语、客家话，吃地道的客家菜、豆浆油条、蚵仔面线或港式点心，家里都安装“小耳朵”卫星转播，收看中国大陆和台湾电视节目。网络普及，年轻人听的是港台最流行的歌曲。“有时候一整天都说不上几句西班牙语，根本感觉不到这是在国外。”这绝非夸大之词，之前有个销售员只说会闽南语，生意额还很高呢！

     难得的是，传统习俗在这里依然如故。派红包、舞狮舞龙、提灯笼或口味繁多的应节食品也都不缺。然而热闹归热闹，大家还是每天照旧开店营业。华人忙碌之余不忘参加社团聚餐，有时每人带一道菜去，让大家分享，有时到中餐馆边吃边唱卡拉OK.

       一切得来不易，桥头华人非常惜福。

       华人之间不是亲戚，就是邻居，关系非常好。闲来串串门子，打打麻将，日子平淡了些，胜在舒心自在，浓浓的人情味叫人倍感温馨。东方市中华会馆会长孙志雄就是因此而决定留下。他也是个热心人。只要有人找上门，即使请教芝麻小事，他也会一一给予满意的答复。

     “我们可以在半个小时内横跨巴拉圭、巴西和阿根廷3国。”此话并非夸大其间，尤其是一水之隔的巴西福斯市，对桥头华人有极大吸引力。那里的消费水平比桥头高1.5倍，但环境洁净，空气清新，治安良好，搬去居住的华人有增无减。早上，华人从福斯到桥头开店，桥头孩子则到对岸上学。周末，桥头华人到福斯购买日用品，也有人开车过去吃早餐。

       每一天，两三百名“两栖华人”在友谊桥上擦肩而过。过了桥，是另一个国家，也是另一片天地。

       巴拉圭大盗小贼横行霸道。当地华人都说：“遇劫就像吃饭那么平常。”曾有盗贼在光天化日之下，载走华商整座仓库里的货物。市区华人于是选择有保安的公寓，走出家门则马上提高警惕。

       盗贼能防，贪官却防不胜防。官员经常以查税为由，向华商索取财物。华商语言不通，又不了解当地法律，只能任人鱼肉。殊不知贪官食髓知味，变本加厉，连政要也来索贿竞选。久而久之，华商养成了“破财消灾”的观念。

       巴拉圭就是这样。看似风平浪静，其实险象环生。为了生存，大家各出奇招，明哲保身。

   巴拉圭贪官多，贫民更多。华人走在街头巷尾，总看见伸手要钱的失学孩童。车子停在红灯前，街童马上翻跟斗、要杂技，盼看官赏赐一两个硬币。另一些则在身上挂满小商品，穿梭在车子之间叫卖。这个国家的贫穷，就是这样暴露在阳光下，毫不隐瞒。车内车外，不过一窗之隔，却俨然是两个世界。

       华商入驻，为当地人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话说回来，华人也需要他们当雇员、帮佣和保姆。偶尔家长抱怨：“孩子太依赖帮佣，洗个碗都不愿意。”但每户华人家庭都离不开当地工人。在华人眼中，巴拉圭员工忠诚、尊重老板。不过他们同时也有拉丁民族乐观知足的天性，不太把工作当一回事，不但无故缺勤，还装病请假。华人最受不了他们慢吞吞的态度，但全国上下都一样，叫人无可奈何。

       对当地人来说，工作是明天的事，今天应该用来享乐。大路旁、公园里、店门口，总坐着无所事事的人们，手里一个茶杯，怀里一个茶壶，悠闲地喝着南美人最爱的马黛茶（Mate）。

夏天的巴拉圭气温可达摄氏40度，茶中加入冰块就变成“马黛凉茶”（Terere），也有华人抱起茶壶边走边喝。大部分华人其实不习惯马黛茶的味道，也无法接受传统喝法。

       当地人也未必接受华人的食物，对没吃过的中餐食材不敢尝试。华人吃得津津有味的虾，在他们看来是一只只恶心的虫子。当地的中下阶层没能力上餐馆，吃中餐成了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除此之外，双方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太多交流。

       华人认为巴拉圭人有热情，没感情：“送礼物给他们时就表现得很热情，有事请他们帮忙却不得要领，还说礼物可是你自愿送的。”时间一长，华人便筑起一座隐形的城堡。巴拉圭人无意走近，华人也在自己的城堡里自得其乐。双方始终保持雇主和雇员的安全距离。

       孩子若是跟巴拉圭人交往，家长多半要反对。早年战争使巴拉圭男性人数锐减，如今男女比例是1对7，加上当地人婚姻观念开放，一个男子可能在3年内结3次婚，一个女人的5个孩子也可能有不同父亲。道德伦理观念薄弱，华人说什么也不愿女儿嫁给当地人。虽然当初是自己把孩子带来这里，下一代跟当地人来往在所难免，但看到许多异族通婚夫妻都以离婚收场，只好硬下心肠棒打鸳鸯。

       死后，华人和当地人安葬在同一墓地。华人遗体都在24小时内下葬到公立或私立墓地，私立的有保安人员看守，以防有人“盗墓”。曾有一群医学院学生为了省钱，叫人到公立坟场挖走死者头盖骨，直到家属要捡尸骨火化，才发现亲人头盖骨不翼而飞。只要负担得起，华人宁愿多付一点钱，也不要亲人死无全尸。

  东方市中华会馆是桥头华社的核心，陪着华人走过了25年风雨飘摇的岁月。会馆的活动中心总有人在学西班牙语、上电脑班，参加社交舞蹈班、唱歌联谊会和棋艺社。会馆也设立了贫寒子弟奖学金。此外，亚松森中华会馆、巴拉圭客属宗亲会、台湾商会和巴拉圭工商妇女会也相当活跃。

  近几年新成立的华人社团不少。当地华人常开玩笑说：“一个招牌掉下来，打中的可能就是某某会长。”

       巴拉圭自上世纪80年代就有华人基督教会，那是最早的宗教团体。如今桥头有4个华人基督教会，教友超过100名。

   90年代，佛光会和慈济陆续在亚松森和桥头设立据点，同时开办各种手工学习班，反应热烈，甚至当地人也皈依佛法。亚松森道场经常看见当地人打太极、做禅修，非常积极。同时也有华人信奉一贯道和白莲教。

       此外，华人组织积极回馈当地社会。慈济功德会连续7年募捐旧衣物给贫困的印第安人，为他们盖学校、赠送桌椅课本，同时长期参与救急扶危，协助车祸伤者、顽疾病患。一贯道在亚松森设立普济医院，针灸收费非常便宜。其实，大部分华人没有宗教信仰，但只要做慈善，大家一定出钱出力，从不计较名利。

 热心的华人曾因捐赠轮椅过关卡，遭受敲诈而显得沮丧，但也因为受惠者一个友善的微笑，或一个感激的拥抱而开心。巴拉圭佛光禅净中心的主持觉圣法师还记得：、“一个男子坐上轮椅后喜极而泣。40年来只能在地上爬行的他，第一次发现坐起来后，天空竟如此广阔。”这是给施赠者最好的回报。

 蓦然回首，移民的辛酸历历在目。不过，诸多的人生梦想，却也因当年迈出这关键一步，才得以实现。

       忙忙碌碌，就是为了给下一代更好的生活和教育。孩子也不轻松，清晨五六点就起床，准备到当地学校或搭校车到巴西学校念书。放学回来，又得赶到中文学校上课。

       巴拉圭有4家中文学校，桥头有民办的中山学校、大成学苑、中华语文学校，亚松森则有巴拉圭中正学校。在这里，接受中文教育的华人子弟高达85%。

       而来自大陆的家长则多数把孩子送回家乡就读。

       20年来，第一代华人坚守岗位，细心照料这一片片文化的园圃。中正学校的萧哲文校长多年来坚持为学生的文章剪报写评语，中华语文学校豁免贫寒子弟学费，中山学校则每年举办园游会和校庆，让孩子在互动中学习。学校经费不够，华人马上捐出日用品。

       春风化雨，学生中文水平颇高，混血儿也说得一口流利华语。巴拉圭中文学校因此成为南美洲中文教育的楷模。

       第二代华人自在游走于不同文化之间，不过交友时要么选择华人圈子，要么选择当地人圈子，楚河汉界，非常清楚。课余，华人子弟除了参加才艺班，也趁空档打篮球、打保龄球，生活非常充实。

 高中毕业后，有人到合湾升学，小部分留在当地，其他的到欧美国家深造。通晓华语、西班牙语、英语、瓜拉尼语，甚至是巴西的葡萄牙语，使他们就业时无往不利。近来，不少人进入墨西哥华资企业工作。

* *华人往来于桥头和福斯市，言谈之间不时夹着巴西的葡萄牙语。他们把这种自创的语称作葡西语（Protunol）。*

       离开好像是一种必然。虽然第二代华人认定自己是巴拉圭人，在巴拉圭有家人有朋友，有他们认为全世界最好吃的香肠夹面包（Pancho），但就是少了发展机会。除非愿意在百货店里复制父辈的人生，否则他们将在外国成家、扎根，延续上一代寻梦和圆梦的故事。然后，等着父母捎来他们爱吃的圣诞蛋糕、巴西特产水果汽水（Guarana）、以及巴拉圭亲友的消息。

       父母宁愿两地奔波，也不想把孩子绑在身边，担心这个环境磨损了年轻人的斗志，又担心下一代找不到对象。倒是他们自己，还在几个落脚点之间徘徊。回去台湾，恐怕已跟社会脱节，故人也所剩无几。有心跟孩子团聚，却担心难以在欧美国家另起炉灶。一切要重新来过，太冒险了。

       只要生意还能做，还是呆在巴拉圭比较好。

       于是，他们安于现状，努力工作，再用换来的酬劳，去化解现实中种种问题。水质不干净，买矿泉水或滤水器；警方执法不严，买枪自保；贪官横行，给钱了事。再有余钱的话，还可到周边国家旅行。

       为方便出入境，第一代华人多数已入籍。不少人拥有多重身份，左手拿巴拉圭护照，右手持巴西居留证，在北美洲有业务的还持有美国、加拿大护照。

       近来，申请入籍巴拉圭除了口试还要笔试，导致入籍人数减少。

       拿到巴拉圭护照，并不等于就有了归属感。这也许是华人不关心当地政治的原因。他们大多不去投票，即使参政也只是昙花一现。迄今，只有一位叫林阿枝的桥头华人当上过市议员。

       西班牙语不灵光，一直是他们的致命伤。一名移民16年的华人承认：“会一些单字，全没文法，也连不成句子。”关于居住国的种种消息，只能依赖阅读当地唯一的中文报《传薪日报》以及巴西出版的《南美侨报》。之前还有《城市新闻》以及承播台湾电视节目的影视公司，可惜都已停业。

       第一代华人的隐忧是就医疗服务。孩子不在身边，自己不会西班牙语，有病痛无法找医生，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为此，不少人萌生起回老家的念头。这一天，却不知是何年何夕。

《传薪日报》创刊于1991年，每周一至周六出版。

   20多年前，华商看到许多巴拉圭人三餐不继，动了恻隐之心，主动捐出物资。孰料物资来不及送到贫民手中，就被贪官瓜分，还拿到市场上出售。原来做善事倒成了考验智慧的事。于是，巴拉圭华人慈善基金会应运而生，就是希望汇聚更多华人力量，更透明、更有规划地推动慈善事业。

       基金会办过的活动不胜枚举，有冬令大型物资发放、圣婴节玩具派送、轮椅捐赠、意外紧急救护、义卖、资助病痛复健中心、提供电脑教材给贫寒学生等。十几年来，它和国际佛光协会巴拉圭分会一起，每天送面包、牛奶、日常用品到老人院、孤儿院和聋哑学校。基金会还捐出几十台豆浆机，教人用当地盛产的黄豆制造豆浆，取代价格较高的牛奶。

       中巴佛光康宁医院，是巴拉圭华人慈善事业的另一个里程碑。耗资100万美元的医院坐落于幽静郊外，主要对象为妇孺。只要踏进医院大门，所有服务皆免费。当地孕妇早产问题普遍，医院的保温箱已救活2000多个小生命。穷人死后没钱下葬，基金会也会施赠棺木。

       生老病死，只要贫民有需要，基金会总是解囊相助。

       如今，巴拉圭第一夫人基金会、当地私人企业和非营利团体纷纷跟华人慈善基金会合作。经由媒体报道，华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几年前桥头计程车司机罢工示威，当地人特别叮嘱：“华人帮助我们，别去骚扰他们。”李云中会长道出感悟；“要在别人的地方立足，一定要回馈当地社会。”

       巴拉圭华人也许不是最富有，却是最懂得施惠的一群。付出，令他们内心更加宽怀、富足。

  巴拉圭，无疑是这群华人生命中的转折点。居住环境和日常生活不尽完善，但他们并不祈求太多。一间自己的住房，一份比在老家时高点的收入，一个让孩子受更好教育的机会，巴拉圭正好实现了这些梦想。

       和主流社会仍有一大段距离，然而华人以慈善开了头，并将循着这个方向，主动走近对方。坚韧、坚强、坚持，曾帮助华人渡过许多难关，也一定能让他们从容面对未来。

  乌拉圭是南美洲第二小国，夹在阿根廷和巴西之间，仿佛注定了它受人忽视的命运。然而，它也曾因为在1930年夺下第一次世界杯足球赛冠军而声名大噪。50年代的乌拉圭，曾有过一段令人美慕的辉煌时期，那时期它政治稳定、福利优厚，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度位居全拉美之首，还因此赢得“拉丁美洲的瑞士”的美誉。这一切随着1973年军政府上台而烟消云散，高压政治迫使十万人民迁移到邻国。

       半个世纪的时光过去了，乌拉圭的经济还在原地踏步，工商业发展停滞，人民主要依赖农牧业为生。还好乌拉圭境内几乎没有高山，不是丘陵就是草原，土壤肥沃，非常适合耕种和畜牧。

       走过风光与低潮，而今的乌拉圭安静恬然，几乎让人忽略了他的存在；即使因优越的自然环境与舒适的气候而被列入全球最适合居住的十大国家之一，也没引来太多的华人。

  这里的华人可算是姗姗来迟。

       在20世纪50年代，广东省新会、开平及浙江省的中国移民，乘船来到乌拉圭。这里移民人数的增长率十分缓慢，直至1967年，也只有区区151人。他们在这里经营洗染店、杂货店和餐馆，一些人则从事劳力工作。

       从70年代至80年代初，有少数台湾人挟带着资金到乌拉圭定居，从事小买卖安家立业。同时，也有一些台湾士兵因为退伍之后有意到海外发展，遂来到这里一探究竟。

       当时，经常有台湾的远洋渔船停靠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港口，这些台湾船员就成了当地华人做买卖的主要对象，有者索性将中餐馆开在码头旁，以招徕台湾船员的生意。

       此后，乌拉圭华人的状况便没有多大变动。

       一直到90年代，一小批来自中国大陆沿海一带的移民辗转到这里住了下来，才使乌拉圭的华人人口略有增加。

 时至今天，乌拉圭只有区区300名华人，在乌拉圭300万总人口中显得微不足道，但他们往来密切，相处融洽，更像一个大家庭的成员。

       乌拉圭的环境洁净、景色秀丽，人民热情。这里的华人开设中餐馆，与当地人分享中餐和素食；中医悬壶济世，为当地人解决疑难杂症。然而，由于移居时间尚短，他们和主流社会之间难免仍有许多隔阂。

       今天，华人成立了社团、出版了刊物，开办了中文班，在当地的主流文化之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也一点一滴找回归属感。也许，先找到了自己，才能更好地融入到别人的生活中。

     这里是一片没有污染的处女地，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全国文盲率只有3%，劳工教育水平极高。蒙德维的亚港设施完善，然而，乌拉圭独独缺少那些踌躇满志的华人所需要的市场。“留下来的都是没有憧憬、胸无大志的人。”当地华人总是这么自嘲。是的，如果他们真的想发大财、赚大钱，当初的目的地就不会是乌拉圭。

       可是，他们不是不能走，而是不想走。

       蒙德维的亚安静的大街上，散落着二三十家华人经营的杂货店和礼品店，还有少数贸易公司、超级市场、照相馆和旅行社。

  这些店主多是夫妻档。他们像是一个上了发条的钟，每天定时开店、理货、买卖和打烊。晚上煮顿晚餐，租看连续剧光碟，或到朋友家打打麻将，唱唱卡拉OK，或跟在国外深造的孩子通电话聊天，平淡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这些年来，也不是没有其他华人来过这里，只是看到这么一小块蛋糕，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乌拉圭的工业至今难成气候。塑料袋工厂老板王东埔说：“我来的时候，已有一家当地人开的塑料袋工厂。当我的工厂投入运作，那家工厂就不得不关门大吉。”

       20年过去了，他的工厂仍是当地唯一一家塑料袋制造厂。然而，这中间曾有过风浪。乌拉圭的工会势力很强，动辄煽动员工罢工示威。他的工厂一度因为员工罢工停产。此后请工人的时候，他会筛掉工会成员，果然换来了风平浪静。

       乌拉圭法律规定，3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工会，如果发生劳资纠纷，工人有权利霸占工厂，把老板赶出去。有意在这里投资设厂的商家，因此都打退堂鼓，一走了之。乌拉圭现在的4家华人工厂都是“老工厂”，有十几年历史，包括一家化工厂、一家塑料袋制造厂和两家渔业加工厂。

       “想当初，因为语言不通，又不了解人家的法律和风土人情，吃了不少亏。”吃一堑，长一智，经营渔业加工厂的翁贵重总算摸索出一条路。他还一度名列乌拉圭150大出口商。他的工厂主要把渔产品加工冷冻再出口到国外。

       当地人虽然住在海边，却不爱吃鱼，对海产了解甚少。早期他就是在海边捡当地人不要的鲨鱼鳍，卖到中国大陆和香港，打下了事业基础。他深深明白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道理。身为乌拉圭台湾商会会长的他，认养了当地的孤儿院、公共食堂等福利机构，极力帮助弱势群体。

       90年代抵达的那一批华人没有经济基础，得知当地人爱吃炸春卷，索性在家制作春卷卖给当地餐馆。至今大概有十个家庭从事这门生意，竞争相当激烈。其中以王振德创立的斌歌中华料理最具规模。他利用机器生产，一天最多可以卖出6000条春卷，许多餐馆和星级酒店都向他要货。

       位于市中心的十几家中餐馆，春卷也是主要卖点。除了中餐，一些中餐馆也卖当地食物。乌拉圭人本来只爱吃牛肉，而且食量是华人的两倍。近来当地人健康意识提高，加上全球刮起瘦身风，成就了当地3家华人素食馆。

乌拉圭，可以说是当地华人一个意外的发现。

       没发生过惊世骇俗的大事件，也没有令人刮目相看的大成就，在偌大的世界版图中，乌拉圭是这样一个安静的小国。这群路过的华人住了下来，而且正以同样的态度，不强求，不急躁，写下自己最满意的人生。

       乌拉圭地处亚热带，气候舒适，温度常年保持在摄氏18到24度，四季常青，风景秀丽。这里工业发展缓慢，没有污染，水质干净，空气清新。一个患有呼吸器官疾病的华人，来了几个月就不药而愈。现在，她说什么也不愿走了。

     周末的街上，露天咖啡座飘散着浓郁的咖啡香，公园木椅上坐着聊天休息的人群。除了广场中央遛狗的路人，一切看起来就是一幅静止的画面。蒙得维的亚城里最寻常的街景，完全体现了这里的恬静、安详与平和。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身心自然开朗愉快。

       真有什么烦恼，大不了驱车到郊外，享受不用花钱买的蓝天白云和青青草地。再远一点可以到著名的旅游景点。东边有著名海滩东角（Punta del Este）、西边有独特的湖光山色和位于萨尔托（Salto）省的大温泉。

       在全球“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名单中，乌拉圭总保持在前5名的位置。可以想象，能够和大自然相处得这么和谐的，一定是个温和而友善的民族。乌拉圭人的热情，叫华人受宠若惊。他们都说，即使是路上的陌生人有困难，当地人也会主动帮忙；如果和他们交上了朋友，他们会两肋插刀。

 “乌拉圭人非常淳朴，人情味浓，跟他们交往不必拐弯抹角，很轻松。”移居这里不过十年光景的吕先生，却做好了落地生根的打算。他偶尔会和孩子说中文，但是他很清楚，学好西班牙语才是最重要的。往后，乌拉圭才是他们的家。

       这里一切的美好，只奖赏给愿意留下来的人。

   在乌拉圭，生活从来不会焦头烂额，而是让人享受的悠哉游哉。吕先生的农场种了满山梨树，每到收成季节，他就骑着马巡视工人采收梨子。南美小国有此景此情，不免让他想起一千多年前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

       “当初也有一段过渡期，每个人都一样。突然之间，文化不同了，语言不一样了，朋友也变少了。还好，华人之间平常来往频密，浓浓的人情味很快弥补了心灵上的失落。”吕先生是虔诚的佛教徒，也是国际佛光会乌拉圭协会的主席，在乌拉圭这二十几年的得失，也许只能用因缘来解释。

       今天，这个小群体里的每个人都彼此认识，凡事互相帮忙。比如家长们自组中文班，把孩子送到其中一个人家里，由家长轮流担任义务老师。这做法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随着乌拉圭华人协会在2007年成立，当地才有了另外一个正式的中文班，也办起了唯一的中文刊物《乌拉圭华人通讯》。

    他们总是用尽一切方法，把自己和传统联系起来。

       过年过节，应节食品匮乏，华人自己制作糕饼互相赠送。除夕夜，几户家庭约好一起吃团圆饭。婚礼上也保留迎娶和敬茶仪式。中国食材在这里非常稀罕，于是，回国探亲后回返的行李中，总有大包小包的药材、食品。连家里摆设的佛像或观音塑像，也跟着他们千山万水来到乌拉圭。

       有一年中秋，乌拉圭华人协会托人从距离3个小时船程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买来月饼，分送给会员。2007年的中秋节，他们还第一次举办了中秋茶话会。乌拉圭的月亮不见得比故乡圆，但那一晚，月光却照亮了每颗思念传统文化的赤子之心。

      就像无法适应当地那些甜得令人舌头发腻的甜品一样，许多文化差异也不是一时之间可以适应。

       至今，许多华人父母仍无法接受孩子和当地人交往。那些发生在异族通婚家庭的文化冲突，他们都听得太多。比如，华人家庭以男性为主，但乌拉圭是女性地位更高；当地人没有长幼之序，在家都直呼父母亲姓名；儿媳婚后也不懂称呼公公婆婆。这一切对仍有强烈传统观念的华人父母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妥协的。

       华人移民乌拉圭只有半个世纪，要求第一代完全融入主流社会，的确太难。其实，华人对当地人而言，也只是刚刚搬来的新邻居。双方对彼此的生活习性仍是一知半解。

    尽管如此，当地人都乐于接纳这群陌生的邻居，从政要首领到平民百姓皆不排外，华人在当地生存和就业都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只要持有临时居留证，就可以呆3年，同时还能马上申请永久居留。当地政府承认双重国籍，符合条件的华人大多已入籍。

       很多华人毕竟不是这里出生长大，持乌拉圭护照，对他们来说只是多了一层方便。然而，他们也无法否认，乌拉圭的土地承载了他们太多的感情，当中还夹杂着一种习惯。习惯了，就不想再奔波，再漂泊。唯一可以令他们再次动身的，也许就是来自家乡的呼唤，以及身在跟国外的孩子团聚的心愿。

       “我们西班牙语不好，万一有什么病痛都不晓得怎么告诉医生。”上了年纪的华人，最担心这件事。把孩子叫回来是不可能的事。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当初怎么胼手胝足也要让孩子上当地私立学校，然后送到欧美国家念书。这个地方没有让子女施展才华的平台。于是，这些羽翼丰满的孩子飞出去了，留下渐渐年迈的双亲和年幼的弟妹。弟妹们长大了，总有一天也要走的。

       乌拉圭拥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当地中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大学和专科学校均免收学费。但是，公立学校上课情况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翘课的不是学生，而是老师。他们常常罢课示威，要不然就自己放假去了。私立学校则不会有这种荒唐事，不过学生每月要交高达六七百美元的学费。“现在最大的负担是教育费。”这是华人家长共同的感受，但开放式的教育制度，的确让孩子获益不浅。在这里，功课都是分组完成，孩子有机会在讨论和分享中学习。

       乌拉圭华人家长高度重视子女的中文教育，50年代之际，社团几乎都热衷于开办中文班，一度把当地的中文教育推上高峰。1951年，乌中文化学院成立，除了开设华文、书法、绘画班外，还开办中国文史和哲学班，学生大多是当地人。每到节庆之日，还有茶会、酒会和电影招待会。

       后来，一名叫曾瑜的人创办了中国文化中心（1963年扩建为中国文化之宫），进一步把中华文化推广到乌拉圭各阶层。60年代，华文班的当地学生曾达6000人。此外，一名热衷中文教育的乌拉圭女子也办过中文学校。

* *乌拉圭人不喜欢大红颜色，一些华人会入乡随俗，就算在春节时期也避免穿得红彤彤。乌拉圭人的名字必须冠母姓，因此当地华人的身份证也有两个姓氏：母亲姓氏与家族姓氏，变成“复姓人”。比如李大明，母亲姓刘，他的名字就是刘李大明。*

       另外，华人也曾经从瑞士运来十多万册的中文图书，至今还收藏在乌拉圭国家图书馆。

       1954年，华人还成立了中华会馆。会馆曾经安养许多孤苦无依的老移民，并筹建了中华公墓，安葬去世的老移民，每年还买鲜花去祭拜。如今这个社团因为后继无人，已经不再活跃，但是为华社的种种付出，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

       虽然华人经济能力比一般当地人好，但勤俭持家的乌拉圭华人不张扬，不炫耀，从身上穿的衣服到开的车子，都是强调朴素和实用。不过，有些人却舍得花三五万美金，为去世的长辈买一块花园式墓地。这也许是他们这一代移民的最佳写照——侍奉父母、照顾孩子。这一辈子，总在为别人奔波劳碌。然而，他们却甘之如饴。

 当初对乌拉圭一无所知，后来发现它的种种美丽。当初只想要过境，今天却割舍不下。这一切都在华人的意料之外。

       也许，乌拉圭华人真的没想到要落地生根，但一直到今天，许多人还说不出一个离开的理由。如果平静是一种生活赐予，那他们已经拥有，而且心底还带着点甜甜的滋味。

   阿根廷仅次于巴西，为南美洲第二大国。它位于南美洲东南部，东濒大西洋，西接智利，北界玻利维亚与巴拉圭，东北连巴西与乌拉圭。

       阿根廷自然资源丰富，有石油、天然气、煤铁等矿产。农林牧渔业发达，盛产米粮与肉类。工业相对进步，种类繁多，有钢铁、汽车、电力、化工、石油、纺织、机械及食品等。

       20世纪初，阿根廷经济迅速增长，一度跻身世界经济十强之林，吸引大批移民迁入。但自1930年的一场政变，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内，阿根廷政府更迭频繁，大大影响了经济发展。

       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更是重创阿根廷经济，继而引发社会动荡。一路颠簸了20多年，目前已趋向平静，并以丰富的物产成为世界五大粮食出口国之一。尽管如此，它至今仍无法走出负债累累的窘境，使得外资一直保持观望态度，裹足不前。不过，乐天知命的阿根廷人还是一如往常跳探戈、看足球，乐此不疲。

       阿根廷经济局势暗潮汹涌，当地华人生活亦随之起伏不定。

    追源溯流，华人最早在19世纪末，途经秘鲁、智利、巴西等地之后而来到阿根廷。

       接着又有一些中国移民从欧洲辗转抵达这里。有者为欧洲船上担任海员的广东人，也有一战时期被招募到欧洲战场当华工的浙江青田人。战争结束后，他们一路打短期工，以凑足船资，然后来到阿根廷谋生。

       那时侯，阿根廷政府十分欢迎欧洲移民，对亚洲移民则管制较严。因此，直至20世纪的20年代，阿根廷只有40多名华人。

       50年代前后，一些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的游客入境之后，申请居留获准，华人逐渐增至300人。70年代之后，台湾人听说阿根廷不但局势稳定，而且遍地黄金，于是不惜花费几千美金办理手续，全家移民到阿根廷来，阿根廷华人的人数开始大幅度增加。

       在那段时期，对比周边国家，阿根廷的生活水平是较高的。华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经营洗衣店、水果店、中餐馆、中餐外卖店等，生活稳定。

       当时，阿根廷华人的地位颇高，阿根廷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一切不明白的事都可以去问华人。”

       但好景不常，正当大家准备在此地安居乐业的时候，阿根廷却陷入了债务危机。接着，阿根廷政府垮台，1989年，物价还一度上涨了50倍。

       许多华人被迫放弃本身的业务，迁往美国、加拿大、西班牙、日本等地，或者回到台湾。华人人数从原本的5万人滑落到3万5000千人。

       到了90年代，一批批中国大陆移民涌入，华人人数又很快地回升。他们大多来自上海、福建、浙江和广东一带。

       2001年，阿根廷爆发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货币大幅度贬值。所有人的个人资金惨遭冻结，每个月仅能从银行取出一定的数额。至今，提起当年的惨况，一些老移民仍然心有余悸：“原来可以购置一套三房一厅房子的存款最后只够买一张短程车票。”

       2002年，阿根廷经济逐渐好转，一批中国大陆人闻声而来，当中许多人并未取得合法的身份。两年后，当地政府宣布大赦，允许符合条件的非法移民办理合法居留权，约有9000多名华人取得合法身份。

       此后，阿根廷华人急速上升，迄今已高达十万人，成为南美洲华人人数增长幅度最快的国家。以福建福清、福州、长乐等地为主的新移民，占了十万华人中的三分之二。

       近20年来，尽管阿根廷经济波动激烈，它依然是中国人向往移居的国度。

20世纪50年代之际，由于当时华人人数不多，很难买到中国食品。当地人的主食是牛肉，青菜只有马铃薯、番茄、黄瓜等几种，因此华人决定自己栽种青菜，吃不完就拿到贝尔格拉诺区（Belgrano）中华会馆附近贩卖。摊档越来越多，每个周末还有人卖鸡鸭，形成一个市集。随着时间的推移，唐人街遂逐渐成形。

       生活稳定后，华人开始向更多领域拓展，大多数人以经营杂货店、珠宝店、陶瓷店、旅行社、中西药店、旅馆、照相馆等。少数人涉足工业，包括设立造纸厂、炼油厂、塑料厂、食品加工厂、成衣厂，也有人在农牧业、渔业开拓事业。

       今天，华人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开设了4000家超市、700家中餐馆、200家洗衣店、100家网吧以及60家进出口公司。此外，机械厂、汽车维修厂、电器维修厂、食品制造厂、化工厂等，也发展到数十家，均为小型企业。

       如今，每星期有一两百名新移民带着期待的心情，坐着长途班机降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机场。纵然很多华人并未入籍，然而，这里环境宜人，当地人不排外，如果事业顺利，定居下来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区有300万人口，加上周围同属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22座卫星城镇，总人口达1400万。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集中在此。这个繁华热闹的城市，是很多人创业的起点，当然也包括远道而来的华人。

       他们首先发现这里物产丰富。牛肉是当地人的主食，阿根廷境内的牛只比人还多，不管物价如何高涨，吃牛扒始终最经济实惠。当地人没挨过饿，造就了他们平和洒脱的个性，凡事大而化之、慢条斯理，到银行办一件事排上三四个小时是平常事。当地华人不禁形容阿根廷为“整个国家像一部没有上紧发条的机器”。

       当地人不思竞争，反倒为华人制造许多机会，加上商业环境自由，华人超市迅速扩张。短短20年，遍布大城小镇的华人超市占据零售市场30%份额，年度销售额高达85亿比索。超市的兴起带动华人相关行业，包括律师事务所、翻译、运输报关、旅行社、超市货架和设备销售、传单印刷、移民事务所等，专门为华人提供配套服务。

  当年，新移民刚从农村出来，没有太多资金，又不懂当地语言，只好先到中餐馆或杂货店打工，有了积蓄后，便承顶下阿根廷人的小超市，边做边学。华人勤奋苦干，周末也不休业，给城里人带来许多方便。他们很快取代阿根廷人，掌控了城里大部分超市。现在，许多阿根廷人的店铺也效仿华人超市，周末照常营业。

       为了节省开支，老板什么都得做。忙不过来，就把家人接过来，每个人都身兼多职。很多新移民还来不及多看阿根廷几眼，就开始了昏天黑地的工作。生活似是一部单调的电影，不断重播。一切都在匆忙中完成：起床、开店、吃午餐、进货、收钱、打烊……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超市是唯一的生活平台。

       规模较大的超市除了食品、卫生用品、厨房用具、衣物、家电、烟酒、海鲜和蔬菜水果，还附设牛肉部。超市雇用秘鲁或玻利维亚外劳，但他们经常缺勤。碍于法令过于保护劳工，而且员工难找，超市老板往往都忙得团团转。大超市老板在柜台安装了广播器和麦克风，以方便跟员工沟通。

       长时间营业、薄利多销，是华人超市后来居上的致胜妙方。一件货哪怕只赚一毛钱，也不会放过，一天下来，两三千比索的营业额不难，通常两三年就可以回本。好事传千里，同乡纷纷赶来分一杯羹。

       向人借也好，和别人合伙也好，凑足30万到60万比索（约10万到20万美元），在店门口挂上“supermercado”（西班牙语：超市）招牌，一间新超市就开张了。当地华人说：“3年还没本事开店是很丢脸的事。”

 新移民循着相同的轨迹，一步步走向发迹的梦境。苦干几年后赚了钱，或扩充营业，或和朋友合股再开一间超市。一个人拥有好几间超市股份并不稀奇。现在，每个月平均有19家华人超市开张。据说前几年的移民高峰期，几乎每天一间。

       市内超市数量逼近饱和，有人把心一横，闯进周边的贫民区。那里治安不靖，黑社会猖獗，连当地人都却步。然而，15万贫民的庞大消费市场，却叫华人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贫民区的华人超市果然大受欢迎，那里的左邻右舍说：“有了华人超市，我们不必到很远的地方买东西，这里什么都有，价格又便宜。”为安全起见，超市都聘请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驻守。市区内的华人超市也安装铁门、警报器和闭路电视，以防盗贼毒手。

       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华人无法忘记2001年阿根廷经济崩溃时，398家华人超市遭暴徒洗劫的惨剧，也记得遭大型零售集团肆意抹黑的教训。庆幸每一次，华人都咬紧牙关熬过去了。

 气候凉爽，空气清新，这是大部分华人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一个印象。400多年前，西班牙人来到这里，就把它命名为Buenos Aires，意思是“空气清新”。如今，这里空气清新依旧，华人开车时最爱拉下车窗，使车内弥漫着清爽的气息。

       古老而庄严的欧式建筑散落各个角落，雕像和纪念碑林立，植物四季常青，街头艺人自得其乐。抬眼望去，俨然是某个欧洲城市的街景，处处美不胜收，果然没辜负“南美小巴黎”的美誉。

       美景令人舒心，然而，华人忙碌到无暇欣赏。他们大多数是移居不超过3年的新移民，最熟悉的路线是从家里到超市。有人甚至很少走出店里，在超市2楼加几张床褥，添几张桌椅和厨房用品，就是一个家。一直到午夜，才有洗澡和电视机传出的声音，回荡在偌大的屋子里。一天当中最轻松的时刻，就是观赏卫星电视的中文节目。

       其他的消遣活动似乎跟华人无关。阿根廷人在舞厅大跳探戈，在歌剧院看演出，在海滩享受周末阳光，华人则在超市里打滚。每天傍晚，阿根廷人在横跨市中心的女人桥上和河畔散步、聊天，华人却还在超市里工作。阿根廷人享受圣诞和元旦的长假，华人依然蜗居在超市里。

       难怪替华人打工的阿根廷人会说：“华人没有7月9号也没有5月25号（这两天都是法定假期）。”

周日来临，大部分超市只开半天，总算可以松懈一下。这时候，平时游客居多的华人街街道上，仍可见许多华人在商店、中餐馆、理发店、中医和牙医诊所、美容院、咖啡馆进进出出。有人乘便到中国屋和东亚超市添购自己超市没有的东方食品，也有人选租了几部连续剧，或给家乡的亲友拨打长途电话。

       除此之外，他们既没时间，也不需要花费，吃的喝的、日常用品都可取自超市。比起当地大学生1500到1800比索的月薪，超市老板的收入足以挤进中产阶级。有了一定积蓄，买车子买房子都以现金一次付清。此举并非炫耀财富，而是认为分期付款要还利息太划不来。

       即使买了房子，很多人还是继续住在超市楼上，理由是“每家超市都被打抢过，住楼上既方便又安全”。曾有人不甘血汗钱被劫匪抢去，顽强抵抗而酿成死伤悲剧。阿根廷允许民众拥枪，华人都带一两把防身。

       新移民还没能力买一部3万多比索（约一万美元）的汽车，出门大多乘搭地铁。在阿根廷搭地铁是件有趣的事。第一站上来一个卖口香糖的，第二站来个推销剪刀文具的，第三站又来两个街头艺人，在车厢里奏起乐曲，路程充满乐趣。

       有车的华人有时也搭地铁。“车资一律75比索，几平等于不花钱，而且不会堵车。”首都车流量高，经常要堵上一两个小时，但不堵车时又得面对当地司机的“疾速考验”。华人常说：“阿根廷人什么都慢，只有3件事快，花薪水快、放假快、开车快。”

       但是，又不得不佩服市内的街道规划。偌大的城市有2000多条大大小小的马路，包括能让24辆车并排通行、全世界最宽的街道——七九大道。这里每个街区都经过严密规划，每一条街固定有100号，街道两侧门牌单偶数相对，非常工整。即使真的找不到目的地，还可以询问路上站岗的警员和热情亲切的路人。

阿根廷社会丰富的拉丁文化，华人要了解和融入，需要一段很长的磨合期。

       第一代华人日常生活中极少有跟当地人交流的需要，学几句简单的西班牙语就能应付。总的来看，华人社群至今仍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说自己的语言，过自己的生活。

* *2006年，华人青年刘松代表阿根廷参加第八届的南美运动会，并且摘下乒乓球男子单打金牌、男子团体赛的银牌和男子双打铜牌。此后，他还曾代表阿根廷参加过两届奥运会，甚得阿根廷人民的爱戴。*

       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对华人而言非常新鲜。华人发现：“阿根廷人个性浪漫，感情丰富。”在地铁站打电话讲到伤心处，可以旁若无人哭起来；位于街心的广场或公园，常见躺在那里午睡的人们，或正拥抱亲吻的情侣。他们就是这样一个真情流露的民族。

       说到装扮，他们却一点不马虎。阿根廷人注重仪表，出门一定是套装或西装。他们爱面子的程度，最让华人感到好笑：“年底放长假，阿根廷人爱到海滩把皮肤晒成古铜色。没钱去度假的人为了面子，买好干粮，足不出户在自家天台晒两个月，好让别人以为他们也去度假了。”

       待得较久的华人，生活习惯多多少少受到影响。到当地餐馆吃饭，也学会了把面包当前菜，烤牛肉吃得不亦乐乎，吃完正餐后再来一个甜点或一杯咖啡。跟当地人打招呼，同样会把右脸贴上对方的右脸。含蓄的第一代华人开始总觉得很忸怩，“练习”几次就会越来越自然。

       华人比较难接受的是当地人对遗体的处理方式。曾有华人死后火化，阿根廷妻子主张把骨灰撒向大海，男方家人却不愿亲人“魂飞魄散”。还有一回，碍于当地法律，一名遭谋杀的华人迟迟不能下葬，直到破案为止。华人虽重视入土为安，却也无可奈何。

宴会是当地华人参加得最频繁的社交活动。今天张三结婚，明天李四孩子满月。一名华团领袖笑说：“一个月有20个晚上要在宴会中度过，有时一晚要赶几场。”

新移民很多是20多岁的年轻人，正值适婚年龄，首都中餐馆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婚宴。为了迁就开超市的亲朋戚友，宴会在晚上11点才开始。午夜时分，餐馆外寒风凛冽，餐馆内“salud”（西班牙语：“干杯”）敬酒声此起彼落，一直到半夜两三点才结束。酒足饭饱，回家小睡一下，第二天还是照旧开店营业。

       日子没一刻空闲，连传统春节也挤不进他们忙碌的人生。派红包、吃粽子都在超市里。春节期间，如果没参加华人社团的聚餐，几个人在家吃一顿简单的便饭，也就算过年了。

       难怪当地人对华人的印象，一直是“开超市的”或“工作很勤奋”，其他的一无所知。虽然对中华文化不甚了解，却掩不住好奇。当舞狮舞龙出现在华人街，阿根廷人总会争先恐后，涌到最前面摸一摸龙头，祈求走好运。他们对中国小饰物、风水以及中医更感兴趣。中国医药专科学院创办人钟清医师的学生几乎全是当地人，尤其以西医为多。当地华人说：“他们学成后治病中西贯通，很受病患认同。”

       钟医师在阿根廷开班授徒50年，出版过许多相关书籍，培训了很多当地人，曾荣获当地移民局颁发的贡献奖。这份肯定令他欣慰，但大部分华人无力维持文化传承却让他担忧。

中医在阿根廷不需执业执照，吸引很多当地人来学。这是中国医药专科学院里唯一一名华人学生。

   20世纪的第二代华人，在这里长大、受教育，融入得非常快。他们互相称呼彼此的西班牙语名字，爱泡露天咖啡座，喜欢追看足球赛。周末不是在舞厅跳舞，就是在同学家开派对。受当地人影响，土生土长的年轻华人18岁后喜欢搬到外面公寓独居。他们跟阿根廷人一起长大，跟当地人通婚的例子不少。

       在这样的大环境里，第一代难免担心土生儿和母体文化渐行渐远。庆幸一群有心人在20世纪70年代就种下了中文教育的幼苗。

       那个年代，资源和条件有限，几名家长以车库和储藏室充当教室，自己敲敲打打钉了桌椅，开始教中文。后来他们在华人街办了侨联中文学校，却因无法负荷不断增加的学生人数，一再搬迁。

       创办人之一的杨镕鉴老先生回忆起过程的艰辛：“有一年开学，全校师生被拒于借来的校舍门外。我只好带大家到附近的植物公园举行开学仪式。”

       30年岁月流转，阿根廷多了华兴中文学校、新兴中文学校、爱育中文学校以及最年轻的富兰克林中文学校。4所资历较久的学校老师还成立了阿根廷侨校教师联谊会，切磋教学方法。

       如今，前人种下的中华文化之树，正在这块南美土地上茁壮成长。

每个周末早上9点到下午5点，1500多名孩子到学校上中文、数学、历史和地理，课余则学习古筝、书法、跆拳道、空手道、水彩画、舞蹈、音乐以及各种球类运动。校方每年举办各种学术比赛、办校刊，学习过程充实而精彩。坚持到高中课程毕业的华人子弟，中文造诣颇高，中文交谈、阅读和书写都不成问题。

       近年来，华人把孩子送到中国念书蔚然成风。一方面家长工作忙碌，没时间关心孩子学业，另一方面也希望孩子从小接受中文教育。那些在阿根廷完成高中教育的，少数到台湾或欧美国家升学，也有人成功考进当地著名的公立大学。公立大学只上半天课，华人学生利用下午时间打工，赚些看电影、喝咖啡的零用。

       当地师长对华人子弟印象很好。一位中学校长赞誉道：“华人家庭教育一定很严格，跟阿根廷小孩相比，他们注重礼貌、校服整齐、上课不迟到、责任感强，看到老师还会点头行礼，这在阿根廷是很大礼节呢！

华人子弟数学和英语成绩特别好，即使是插班生，只要掌握西语，很快就追上课业。接着就看得懂西班牙语的电影和报章。     这对第一代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第一代新移民因为语言障碍，遇到问题只能去请教早来的移民。这后来促成了第一份中文报章的诞生。创办人解俊林回忆：“同样的话重复一百次，我想不如办一本刊物。加上当时我本身经营旅行社，想做一本宣传公司、招揽生意的小刊物，于是就有了《阿根廷通讯》。”那是1984年，当年印刷不普及，每则新闻都是一笔一划写出来的。

       写着写着，20多年过去了。如今报纸易名为《新阿根廷通讯》，与《新大陆周刊》和《世界新闻》一起为华社提供各种资讯。翻开报章，除了新闻，广告占了很大篇幅，且大多刊登在显著版位。超市聘请切牛肉工人的广告最多，其次是超市转让、承租等，再来是社团的聚会、活动通告。当地另一本中文杂志《时事商业报》同样以超市业者为主要服务对象。

*阿根廷的电影协会曾经联合中国相关部门，以阿根廷华人的创业经历为题材，摄制了一部名为《天涯尽处的中国人》的纪录片*

大部分华人并没有宗教信仰。他们把300坪大的超市当作最实际的依靠。只有少数人参加佛教团体活动，或受洗成为基督教徒。

       阿根廷共有7个华人基督教会，不少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20多年来，教会慰藉了许多空虚的心灵，帮助许多新移民熬过过渡期。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和阿根廷新兴教会有小班制的西语课程，帮助新移民掌握当地语言。规模较大的教会不仅开办华语、闽南语和西语聚会，还出版周报和小刊物，让教友们交流、分享。

       教会的关怀和理解，让新移民在超市以外，找到了另一个寄托所在。一位牧师分享：“很多年轻人因此成功戒掉烟瘾。”超市星期天营业半天，一家人无论多累也坚持轮流上教会。教会也积极配合，特别设早堂和午堂两场主日崇拜。

       宗教组织不时访问贫民区、孤儿院、老人院和智能障碍学校等，帮助华人走进当地人圈子。阿根廷慈济义工甚至号召当地人一起参加活动，市政府也极力配合每次的义诊和物资发放。

    陌生的环境、对法律不了解以及真假难辨的稽查人员，一再考验着他们的毅力和决心。更无奈的是华人同业之间不时发生钱财纠纷。两家超市靠得太近，常有争执、打架，甚至暴力威胁事件。也有新移民想一步登天，成帮结伙打劫、勒索同乡。

       华人社团不得不从中调解。福清会馆为了避免这类恶性竞争，规定会员的超市至少须相距3条街。成立于2004年的阿根廷华人超市公会，则通过专题讲座、超市展销会等，积极整合和引导小资本超市改善营业情况。公会出版中西文并茂的月刊，刊登法律、税务制度等实用商业资讯，是华人超市老板最实用的参考书。懂得使用网络的老板还可登陆网站www.casrech.com浏览最新资讯。

       为了收得事半功倍之效，该会还特地聘请阿根廷人担任秘书，协助争取华商权益，同时树立华人良好形象。阿根廷近几年通货膨胀令百姓雪上加霜，公会主动跟政府签署协议，维持物价。为此，阿根廷总统还向广大华人致谢。

       成立短短几年，公会的成绩有目共睹，成了当地影响最大的华人团体之一。与此同时，以业缘和地缘为主的新社团不断冒起，几乎每年平均增加十个。

       岁月静静流过，阿根廷华社已在逐渐成熟、壮大。

       新移民持续通过留学、旅游、探亲等渠道进入阿根廷。当地政府很大方，不会遣送逾期逗留者回国，更让华人趋之若鹜。

       现在，很多人持有永久居留身份（俗称红本）。华人之间的家常，不是超市就是红本。持红本者可参与省政府和市政府行政当局的省长选举，入籍者则可投票。不过，要不是法律强制规定国民必须投票，华人宁可把时间放在工作上。

       在心底深处，仍有许多人只把自己当过客。

       对于现在的生活，他们的答案千篇一律：“谈不上满不满意，习惯了。”对于这片土地，大多数人的感受也相同。“物产丰富，没有天灾，适合居住”；“商业机会多，不歧视华人”；“生活节奏较慢，压力小”，说着说着，却又舍不得离开了。

1972年，第一个华人社团——阿根廷自由华侨联谊会成立，并在华人街上建立中华会馆。如今这里成了许多老年华人的聚会地点。他们在这里下棋、喝茶聊天、跳舞或唱卡OK，消磨时间。

   早期，阿根廷人经营的自助餐，效益一般。后来，华人闯进这一行业，以更低廉的价格吸引顾客，终于使自助餐受到阿根廷人的欢迎。甚至曾有华人自助餐馆因生意太好，店里无法容纳众多顾客，老板突发奇想，到郊外把一家戏院改装成自助餐馆。如今，最大的自助餐厅已发展到可容纳千多人的规模。

       华人自助餐馆靠的是薄利多销。在自助餐馆内，顾客只要付12到15比索，就可以吃到烤牛肉、鸡肉、意大利面等主食，以及各种中式菜肴，还有当地甜点、蛋糕，样式繁多，任君挑选，能满足食量比华人大两三倍的阿根廷人的胃口。市区内主要的步行街开了好几间这类餐馆，竞争非常激烈。每到晚餐时间，员工都拿着广告单走上街头招徕顾客。

       在阿根廷，自助餐叫做tenedor libre，据说是当地华人创造的词汇。当时华人不晓得西语“自助餐”怎么讲，想起自助餐就是拿着叉子走来走去，于是结合了西班牙语的叉子（tenendor）和自由（libre），创造了这个新词汇。

  一间间超市像一艘艘小船，阿根廷华人正在海上破浪前行。这些年来的坎坷仍历历在目，但顽强的华人却早已重新摇动手上的桨，奋力向对岸划去。

       他们是一群太专注划船的水手，不知不觉错过了沿途的美景，也错过了和从旁经过的船家交流的机会。然而，只要他们愿意敞开心胸，主动招呼和攀谈，一切都不会太迟。

    智利是全世界最狭长的国家。在地图上，它宛如一条曲折的道路，蜿蜒于南美洲大陆的边缘。有人夸张地形容：“当你把头枕在安第斯山脉，脚就伸进了太平洋。”这里气候多变，北部是干燥的沙漠地带，南部却有冰山漂浮于海面，智利的地理环境，就是那么不可思议。

       16世纪中叶，智利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808年，趁着西班牙国内动乱之际，智利人民高举独立的旗帜，击溃了殖民地的军队，于1818年正式宣告独立，成立智利共和国。独立后，智利历经政治动乱，经济萎缩。但近些年来政治渐趋稳定，治安良好，政府廉洁，对外贸易发展蓬勃，吸引不少外来投资者，其中也有不少华人企业家。

       目前，智利有华人1万5000人，此外还有人数众多的混血华裔。

 华人最早来到智利，是出于偶然。

       在19世纪中期，一批广州沿海一带的华人被送往秘鲁、古巴和巴拿马当苦力。他们之中约有70人临时改变航程而到智利去，在北部阿塔卡马（Atakama）及沟进波（Coquimbo）的矿场工作。

       1879年，智利、玻利维亚和秘鲁发生太平洋战争。当智利攻打秘鲁时，原先在秘鲁甘蔗园和农场受尽虐待的1000多名华工，协助智利军队取得胜利。战争结束后，智利政府为了答谢华工的助战，于是允许他们留下来。就这样，华人在盛产硝石的达拉帕卡（Tarapaca，原属秘鲁）、安多法卡斯达（Antofagasta，原属玻利维亚）及伊基克（Iquique）等城市住了下来。

       20世纪初，轮船公司开始有了往来中国与南美之间的航线，越来越多的华人因此来到智利。当时在智利的华人至少超过1500人，他们从事各项足以糊口的买卖活动，并且省吃俭用，有了一点钱就在硝石矿场附近开店售卖牛肉、酒、家用燃料以及食品杂货等。

       等到经济好转，华人就迁往城内。北部的达拉帕卡、伊基克和阿里卡（Arica），首都圣地亚哥开始出现华人店铺。

       自30年代起，全球经济大恐慌严重地冲击智利的硝石出口，市场萧条，杂货铺更是惨淡经营。有的华商被迫变卖家当，然后回国；有者选择迁居到邻国去碰运气；更多的人则因为破产而滞留智利，回国之日遥遥无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牛肉店成了智利华人的新兴行业。除了牛肉店及传统杂货店之外，华人也经营服装店或电器店等。据说，当时伊基克的街道拐角处全都是华人店铺。

       华人与当地女子通婚的例子也越来越多，他们的后代至今仍然保留中国姓氏，不过大多数已经和当地人没有多大分别。

       1973年之后，智利的局势逐渐恢复稳定，于是开始有不少台湾人陆续移民过来。他们大部分都受过高等教育，带着资金过来开店售卖礼品、服饰和文具等，也有一些华人在伊基克从事进出口贸易。

       1983年，席卷智利的经济风暴致使新移民纷纷迁到欧美国家，有的则选择回到台湾。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广东人因为有同乡或亲戚在智利开中餐馆，因此前来投靠他们。从1990年到1995年，智利的经济前景一片大好，华人纷纷赶来分一杯羹，到了2000年，智利华人已经增至5000人。

随后，又有从中国北方过来的大批新移民登陆。自此，智利的华人群体便不断地扩大。

早期伊基克中华会馆在公墓买下一个坟墓区，安葬客死异乡的华人。

  带着冒险的勇气，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华人从遥远的东方来到这里。

       目前，居住在智利的华人约有1万5000名，大多是近20年间的移民。遍地机会的智利没有让人失望。广东鹤山、恩平和台山人在中餐馆开创人生，而台湾、浙江、福建等地的华人，则在百货贸易行业找到了自己的小天地。

       拥有全国三分之一人口的首都圣地亚哥是华商圆梦的乐园。辛苦是必然的，还好回报也成正比。今天，大多智利人都熟悉中餐；每户智利人家里，都可找到几件中国货。这些年来，华人社团、中文学校、宗教组织陆续成立，中文网站和中文报纸也在近两年陆续登场。

       智利华人不介意比别人付出更多，因为，每天当第一道阳光照进这座城市时，他们便又向梦想靠近了一步。

  中餐馆在智利极受欢迎。“哪怕只是一间小店，只要脚踏实地工作，没有赚不到钱的理由。”智利华人总是这么说。在700家中餐馆里埋头苦干的华人，为的就是丰收那一天。“中餐馆中午开店，午夜打烊。回家看看电视节目，凌晨两三点才睡。第二天早上11点再回到店里工作。”这是昌华大酒家老板马志华一天的作息，日复一日。即使生意上了轨道，有当地人伙计，但订货、算账，老板一定亲力亲为。

       拼搏了大半生，现在很多华人已拥有好几间中餐馆。

 丰富多姿的中餐，飘洋过海来到智利，最后只剩下寥寥几味——葱炒牛肉、春卷和炒饭，再加上经过改良的“炸馄饨”，这就是智利人认知的“中餐”。尤其是当地人称作蒙古牛肉的葱炒牛肉，几乎是他们必点菜肴。中餐馆老板说：“几十年来就吃这一道，智利人的口味太容易打发了。”

       如果说很多华人靠葱炒牛肉发财致富，并不为过。他们纷纷把家乡的亲戚朋友接过来，先在中餐馆打工，然后开外卖店。外卖店不需桌椅，不请工人，小孩负责看柜台，父母负责煮炒，夜里就睡在店里。快则一年，慢则两年，就可以开餐馆了。

       智利的中餐馆就是这样一家变两家，两家变四家，而且都是自家人在经营管理。第三代华人的新兴酒家老板罗文广说：“现在我们家族的中餐馆加起来有三四十家，这还不包括远房亲戚呢！”

眼前的风光，实在很难令人想象智利人曾排斥中餐。早期当地人觉得中餐馆不卫生，污蔑华人用猫肉、狗肉和老鼠肉做中餐食材。后来，华人聘请当地人当主厨，又请当地官员到中餐馆吃饭，想方设法，才政变他们对中餐馆的观念。中餐逐渐登上当地饮食文化的殿堂，并渗透到智利人的饮食习惯里。以前智利人不吃葱，现在郊外的农田种着大片的青葱，还有华人爱吃的大白菜、苦瓜等。

       智利人爱享乐爱消费，华人爱做生意、肯拼搏。不只中餐馆以平均每月一家的速度增加，价廉物美的中国货也很快“攻陷”智利市场。在圣地亚哥火车站附近的百货市场、韩国街和智利中国商品贸易中心（当地华人称作温州城），中国制造的玩具、手表、礼品、布料、衣服、五金等商品琳琅满目。

       火车站附近的百货市场就是唐人街。华人店铺占90%，除了大大小小的批发零售店，还有中国食品店、中餐馆。华商笑说：“只有在这里才可以看到短裤拖鞋打扮的人，因为只有华人才会穿得这么随性。”占尽地理优势的市场，早上十点开始人潮不断，直到傍晚6点才散去。

       眼光独到的华商比别人更早掌握当地市场趋势。梁政渊创办的Golf球鞋、钱维国的Fashion Park服装连锁店和石崇的Cuci背包已是当地知名品牌。近来，越来越多华商回到中国大陆设厂，再把自己工厂的商品运来智利，开创了新的产品销售网络。远在智利北部伊基克的华商，也是这么两点一线做贸易。2007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智利最大的贸易进口国，华商在其中作出不少贡献。

     “只要这里还有赚钱的机会，就会继续呆在这里。”习惯漂泊的智利华人，对于未来，总有一丝不确定。

       无可否认，智利庞大的商机，是大部分华人移居的理由，也是他们至今还在这里的原因。加上迷人的景致、友善的民族、浓郁的文化气息，就显得锦上添花。连频繁的地震，也只是华人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在智利经历过无数次地震的华人，早已习以为常。

       开埠400年之久、充满殖民时代风格的圣地亚哥城，在无数次的地震和洪水中，经历着侵蚀、破坏、修复和重建。街上往来的路人仪表堂堂，连乞丐都衣著整齐。圣地亚哥治安良好，市中心每隔几步就有身着绿色制服的警察巡逻。路旁的长椅，经常有人在聊天或闲坐；露天咖啡座上，永远有人啜着咖啡谈笑风声。

       这份闲情逸致，对华人而言却太奢侈。他们的目标明确，不能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

   在温州商城经营服装店的郑婉洁，别人晚上8点放工后就回家休息，她还一个人跑到仓库搬货。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已是午夜12点了，但她没有抱怨：“只要有生意就好。”温州城里有许多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很多才踏出大学校门，就来这里创业，卖一些中国进口的鞋子、首饰、背包等小商品。

       圣地亚哥消费颇高，这一带租用两房一厅的公寓，月租600美元。在外买个便餐大概也要5到10美金，华人大都自己带便当，一来省钱，二来不习惯当地食物。智利人一日三餐离不开肉类和面包，又喜欢甜食，口味比较重，华人也会偶尔品尝，天天吃就受不了。

智利人的这道菜肴，混合肉类和各种蔬菜炖熟的Cazuela，相当受华人欢迎。

 天生喜欢享乐的智利人，花钱只图当下开心。周五发薪，周一口袋已经空空如也。华人拼命郎似的工作精神，丝毫也影响不了智利人。这点，身为老板的华人感受最深：“即使给他们双倍工资，他们还是不愿超时工作。如是华人，过年也要赶来加班！”无关孰对孰错，只是文化和价值观不同。

       这些文化差异，华人都适应了。但让他们忧心的是孩子选择当地人为婚嫁对象。反对归反对，街上不时可以看到当地女子挽着华人男子的现象。等到论及婚嫁，父母亲只有无可奈何地接受。

       智利是天主教国家，不鼓励堕胎和避孕，拉丁民族又热情开放，单亲妈妈比比皆是，很多女孩才上初中就怀孕了。华人家长惊吓不小，认为社会风气太开放，不太适合小孩成长。有些人因此计划等小孩到了上学年龄就打道回府。智利人爱抽烟，全国有40%的人是烟民，也使他们担忧。

  不过，在华人眼中，智利人单纯、善良、个性温和，非常尊重外来移民。智利人对很多事情不求甚解，不会刻意过根究底，生活的确少了很多烦恼。

       大部分第一代华人因为语言障碍，与当地人交流甚少。极少踏出华人圈子的他们，很多时候只讲华语，偶尔会说几句西班牙商业用语。当他们的孩子跟智利朋友在咖啡座谈笑风生，在智利朋友的生日派对上跳舞歌唱，他们却只能“袖手旁观”。

       不过，只要相互尊重，主动踏出第一步，一切隔阂都会迎刃而解。

     2002年，圣地亚哥的智利佛光协会成立后，陆续开办的中文班和中国武术班，让很多智利人认识了中华文化。在素菜教学和佛经讲解的活动中，也以智利人居多。当地已有3000名智利佛教徒，远远超过为数200多人的华人基督教徒。除了圣地亚哥和伊基克道场，圣地亚哥郊外小镇塔拉甘特（Talagante）建设的佛光园也已开放。

       关怀，让双方又靠近了一点。佛光协会不时举办义卖筹款、募捐和轮椅捐赠活动，帮助当地贫困人士。基督教徒也经常举办活动奉献爱心。圣地亚哥华人基督教会还定期率众探访老人院、孤儿院和家暴受害者。

  奔波，是许多智利华人共同的生活写照。有时为了社团之间的联系，有时为了生意，有时为了探望妻小。从伊基克到圣地亚哥，再从智利到中国，他们马不停蹄，处处留痕。

       从智利搭飞机到中国，要在好几个机场转机，过程非常繁琐。然而隔着海洋的家乡，让智利华人心甘情愿地在地球的两端，一次又一次地跋涉。要结婚就回国去讨媳妇；老移民过世时举行火葬，好让家人把骨灰送回老家。尤其那些成年以后才来到智利的华人，他们不愿，也无法融入当地。这里赚了钱，就回去买房子，很多人是这么想的：“总有一天要回去。”说着说着，大半生就过去了，他们却还在智利。

       华人入籍，很多时候只为了智利护照带来的出国便利。外来移民在银行存入两万美金，就可申请居留，两年后改为永久居留。一旦在智利居留满5年，就可以申请入籍。智利并不强制国民投票，但一旦登记为选民，就必须前往投票。华人嫌麻烦，大多选择不登记。加上很多人并不想长久呆在这里，总是抱着一副事不关已的心态。内心深处，那个他们出生长大的地方，才是家。

       由于智利人不爱爬楼梯用餐，这里的中餐馆无论规模有多大，大部分都仅以底楼做生意。很多中餐馆老板干脆把二楼当作住家。

       在这里长大的第二代却不是这么想。他们说智利人的语言，吃智利人的食物，读智利人的书，玩智利人的游戏，甚至都有西班牙语名字。他们的工作、家庭和朋友都在这里。他们的未来，也在智利。

       这些年轻华人，有人如鱼得水，却也有人迷失彷徨。有的很小的时候，就跟父母来到这里，受智利文化影响极大，模仿智利人的一切，想当个“智利人”。他们的确融入了主流社会，但在当地人眼中，依然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他们有些沮丧，担心迷失了自己。

       移民智利，改写了两代华人的人生，也让两代人之间衍生出许多矛盾和挣扎。

智利很早就有华人社团。19世纪末，在圣地亚哥的智京中华会馆成立之后，其他城镇也相继出现中华会馆。早期，穷困潦倒又无依无靠的华人，就靠着智京中华会馆安排三餐住宿，得以度过晚年。那个穷困的年代已经结束，但会馆旁边那一排残破的楼房却一直没有拆除。斑驳的墙壁是智利华人的历史烙印。

       随着圣地亚哥新移民增多，新社团纷纷冒出来。华人社团总数并不多，而且地域性相当显著。广东人加入智京中华会馆，台湾人参加智利华侨联谊总会、台湾会馆和台湾商会，江苏人则有智利江苏商会，另外还有一些大陆商人加入智利（伊基克）华商联谊会。

       社团除了举办传统佳节聚餐，也定期举办夏令营，让属下青年会的成员重新认识并亲近自身文化。智京中华会馆和智利华侨联谊总会也分别买地充作华人专属坟场。

       中文教育，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是使命，更是责任。1914年，老移民曾创办了一所中文学校——华侨华文学堂。这么多年来，即使华人人数不多，中文教育断断续续，有心人却一再捡拾起这颗文化种子，一次次播种、施肥、灌溉。

       在伊基克，台湾会馆开办了中文班，以小班制的方式让孩子在周末上课，母亲们轮流当老师。首都则有隶属智利华侨联谊会的圣地亚哥中文学校，以及隶属智京中华会馆的智京中文学校。两所学校设备相当齐全，可惜孩子们始终难以理解父母亲的苦心。方块字对他们而言，陌生而艰涩，说华语经常词不达意。下课钟声一响，他们就说起了西班牙语。

       孩子们渐渐长大，当地学校的课业越来越繁重，能够坚持每个周末来上4小时中文课的人越来越少。上了高中后，他们更加抽不出时间。

   华人子弟成绩好，成功进入名牌大学的不在少数。出国的出国，留在本地大学的多选修医药、法律、会计等专业科系，很少继续选修中文课程。智利圣地亚哥大学开办的中文课程，报读的都是当地人。

       大环境固然有其限制，但“有志者，事竟成”也不无道理。2008年2月，智利华人引颈企盼的第一份中文报《智利华报》终于亮相。在此之前，智利华侨联谊总会出版的《智利侨讯》和智京中华会馆出版的《旅智华声》是华人主要的中文读物。年轻人则喜欢上智利华人网和智利华人天下，浏览各种讯息。

       智利也有一群爱好文学的华人，来到天涯海角仍孜孜不倦。他们成立了智利文艺协会，出版过5期《智利文艺》。第一届会长钱维国还办过“包子宴”，一篇文章换一个包子，鼓励大家投稿。智利本身是个文艺气息浓厚的国家，提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已故诗人聂鲁达（Pablo Neruda）,不少当地华人都知道，智利人更是一脸自豪。这位诗人曾3次游历中国，写下了壮丽诗篇《中国大地之歌》，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2007年，5名华人子弟在圣地亚哥中文学校修毕高中中文教育，在毕业典礼上接受校方赠送的礼物，以资嘉奖。

  面对海天一色的太平洋，背靠一望无际的沙漠，这就是伊基克独一无二的风景线。寸草不生，滴雨不下，看似荒凉，却居住着1000多名华人，因为这里是著名的免税区（Zona Franca，简称ZOFRI）。

       30年前，免税区初设，设施简陋，生活艰苦，路上随时可见赶着马车的人们，但没想到后来却成为华人做生意的天堂。当时智利邻国物资短缺，华商看准时机经营转口贸易，加上竞争不大，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当时的华商都是台湾人，2000年以后中国大陆商人逐渐增加，连带中餐馆也迅速发展到30多家。免税区里华人开店接近200家，占所有店铺的10%，其他商家来自印度、玻利维亚和阿根廷，但卖的都是中国货。这里只批发不零售，拥有固定的顾客群。每天早上9点，来自秘鲁和玻利维亚的买家已等在店门外。仓库一般设在批发店隔壁，卸货的港口也在免税区附近，非常方便。玩具批发老板叶庆和说：“这是最容易做的生意。”

       生活朴实悠闲，常年都是摄氏18到22度的好天气，在浩瀚的海洋和荒凉的沙漠之间，唯一要忍耐的是单调和寂寞。偶尔免不了有人抱怨“连一间有情调的咖啡馆都没有”，或是“青菜选择太少”，但伊基克华人学会了在单调中找乐趣。周末不开店，到超市买日用品、看场电影、或是到漫天沙地的高尔夫球场打球，都可以非常尽兴。为了互助联谊，这里设立了台湾会馆、伊基克佛光协会、台湾商会、高尔夫球协会，有早期广东人创办的中华会馆，也有新移民成立的华商联谊会。

       这个充满潜力的小城，将继续迎接怀着理想而来的华人。

   华人最初停留在这里，纯属偶然。今天，他们的停留，也未必长久。

       这么多年来，智利华人总是不停地寻找、停驻、再启程。他们像是盘旋在高空的苍鹰，看准目标，就勇敢往前冲。为了未来，一切的冒险和挣扎都有了意义，因为他们始终深信明天会更好。

       远处终年积雪的安第斯山脉，一直默默注视着这群来来往往的过客。不管抵达还是离境，不管停驻还是过境，智利总是以这种安静而沉着的姿态，敞开胸怀，迎接华人到来。

    哥伦比亚位于南美洲西北隅，北临加勒比海，西濒太平洋。它是世界第二大咖啡生产国，咖啡在这里被称作“绿色金子”，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哥伦比亚也盛产黄金；绿宝石出口量占世界总供应量的50%左右。

       哥伦比亚不仅资源丰富，优美的景色也使它享有“南美洲的雅典”之美誉。高山地带如首都波哥大四季如春，而沿海地带的巴兰基亚（Barranquilla）及卡塔赫纳（Cartagena）则有着让人心旷神怡的秀丽美景。近年来，哥伦比亚政府积极扫毒，誓要洗净背负已久的可卡因生产老大的恶名，还哥伦比亚一个美丽的名声。扫毒工作得到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协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历史上，哥伦比亚原为印第安人安居之地，却在1499年遭西班牙人入侵，此后沦为西班牙殖民地，直到1810年独立。独立后，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直到2000年5月，独立人士乌里韦当选总统，这一格局才得以改变。

       华人在灾难深重的19世纪离开祖国，跋涉到这个美丽的国家，用血汗谱写了一代又一代的移民故事。

   在19世纪40年代，第一批广东台山人飘洋过海，来到了圣安德烈斯岛（San Andres Island），它是哥伦比亚的管辖区。

       第二批移民则是在1870至1890年间到来。那时候，美国正兴起排华浪潮，迫使华人从旧金山等地迁移到墨西哥、巴拿马、秘鲁等国。谁知排华风又蔓延到这些国家，导致华人别无选择，只得再次迁移，因而来到哥伦比亚。

       那时候的哥伦比亚仍是一块未经开发的宝地，空有肥沃土地，却无人力去劳作开垦。大部分为农民出身的华人，正好发挥所长，将本身所熟悉的种植技术引入哥伦比亚。除此之外，辛勤的华人也不畏艰苦地从事采矿工作。因此，早期华人对哥伦比亚的农业及矿业都有不小的贡献。

       当地政府非常欢迎华人的到来，所以在那时期，华人的入境手续非常简单。更多广东台山人纷纷闻风而至，他们从广州乘船出发，历经两个多月的航行，先抵达巴拿马，再辗转到达哥伦比亚。直至1913年，华人人口已从寥寥数十人增至1200人。

       1930年代，拉丁美洲的经济开始陷入萧条的困境，失业率日益飙升。一些别有居心的政客借意在哥伦比亚掀起排华浪潮，试图转移国民对经济问题的视线。大批华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离开，使哥伦比亚的华人锐减至300人不到。直至50年代，哥伦比亚政府重新接纳华人，于是掀起了第三波的移民潮。然而，政策规定，只有与哥伦比亚境内的华人具有父子关系的人才可申请入境，因此当时移入的清一色是男性华人，后来他们大部分与当地妇女通婚。

巴兰基亚的哥伦比亚码头（Puerto Colombia）是当年华人的一个登陆点。

  这批中国大陆移民从家乡前往香港乘坐飞机，先到巴拿马，再转入哥伦比亚。他们在哥伦比亚买地种菜，并以井水灌溉田地。当菜地的经营运作上了轨道之后，他们便开始饲养蛋鸡；后来，由于肉鸡的市场非常好，他们又开始饲养肉鸡。如今，传统的养鸡业已经逐渐没落，目前硕果仅存的3家鸡场分别为“中国第一鸡场”、“中国第二鸡场”以及“富兴鸡场”。随着饲料价格不断上涨，鸡场老板近年来还得自作饲料以减低成本。

       1980年，随着哥伦比亚与中国建立邦交关系，华人又陆续前来。源源不绝的移民使华人人口在7年内飙升至将近3600人，当中以广东人居多，台湾人则占了一成左右。到了1998年，华人人数更达到高峰，增至1万5000人。

       2006年1月，哥伦比亚移民局宣布，凡是持有中国护照者，可免签入境证，遂掀起了新一波的移民潮。为了控制移民的人数，哥伦比亚政府不得不在3个月后中止免签条例，但是仍有大批的华人以游客的身份入境，并且逾期逗留。移民众多，良莠不齐，当中有小部分的害群之马在此地干起非法勾当，令华社蒙羞。

*1970年代是华人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华人曾集资百万美金创建占地一万多平方公尺、员工120人的“幸运超级市场”，其附属生意“熊猫面厂”生产的速食面及威化饼畅销全国，风头之健，一时无两，可惜好景只维持了十余年，后因管理方式不合时宜而结业。*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约有新老华人移民两三千人，是华人人数最多的城市。第四大城市巴兰基亚的华人人数则居全国第二，约有1100人。其余华人散布在哥伦比亚27个城市。

       华人主要以开设餐馆谋生。目前，全哥伦比亚一共有400多家中餐馆。以台山人为主的早期移民中，几乎都以开餐馆为业。这种情形在巴兰基亚尤其明显，当地约有400多名台山人，就开了80余家餐馆。巴兰基亚华人社会单纯，人数不多且相互认识，彼此非亲即友。波哥则大约有两三百家中餐馆。

       此外，也有部分华人经营杂货铺。可是，让南美华人赚得盆满钵满的中国商品，在哥伦比亚却不见踪影，华人杂货铺里卖的多是当地货。这是因为当地政府实施严厉的进口条例，例如，单是5个不同品牌的酱油就要5张执照，而且申请手续冗长费时。商家还需交出物品样本供化验，至少需3个月时间等待报告出炉，物品才能上架售卖。再者，哥伦比亚大百货商场遍布，随处可见法国家乐福及哥伦比亚自家品牌EXITO，使中国货品“红”不起来。

   饮食业是哥伦比亚华人的主要行业。中餐馆的店门口往往顶着油漆斑驳的陈旧中文招牌，店内张灯结彩，还供奉着关公神像，有的甚至挂上毛泽东画像，装潢如出一辙。

       按常理说，同行之间势必争个你死我活，但在哥伦比亚却不然。哥伦比亚人爱吃中餐，每家餐馆都有各自的客源。店家无需出奇制胜抢客户，免去了激烈竞争，人人心安理得。

       然而，满街的中餐馆却没能烧出一道原汁原味的正宗菜色，最受当地人欢迎的中式菜肴，就是炒饭。尽管如此，哥伦比亚的中餐厅，仍然高朋满座。

三几张桌椅，简单地布置一番，即能开业。餐馆几乎都是家庭式的小本生意，老板、厨师、收银都是自家人，当地员工只负责招待、切菜等打杂工作。

       在哥伦比亚首都，也有一些富丽堂皇的中餐馆。它们一般设在北部的高级住宅区，开业资本动辄二三十万美金。店里的装饰品，多采用中国味极浓的吊饰、陶瓷与对联，有的更设计成拱桥式的屋顶。不过，许多豪华中餐馆里，却摆着西式餐具，华人亦入乡随俗，吃饭用叉舍筷子。

       除了中餐馆外，巴兰基亚的华人也开西式餐厅，卖红酒、芝士蛋糕等高档西式餐饮。这类餐馆拥有高雅的西洋格调，顾客只能在餐牌上的中式菜肴——炒饭中看出一点中华特色。

* *华人在此地做生意，即使不会说西班牙语中的数字也无甚大碍。华人只要说“广东”二字，手持计算器即可。原因是“广东”二字正巧与西班牙语“多少钱”谐音。当地人相信计算机精准无误，觉得华人使用计算器谈生意是表示基本的尊重。*

 贩毒、抢劫、狙击与杀人等恶行，经过媒体大事渲染，仿佛草木皆兵，使得周边国家的人民对哥伦比亚望而却步。

       哥伦比亚真有那么危险吗？对于这样的问题，哥伦比亚华人处变不惊，笑而不语，似乎里头大有玄机。

       以巴兰基亚为例，小镇民风淳朴，华人朴实随和。无论陌生人或熟人，见面都能毫无顾忌地侃侃而谈：“来来来，吃饭，吃饭。”这就是巴兰基亚华人的待客之道。华人习惯晚饭后驱车至中华侨联会会馆，或去同乡家，会会老友、打打麻将，直到深夜才踏上归途，也无需担心安全问题。

       华人勤劳刻苦，大多经营小本生意，积年累月，虽非大富大贵，但总属小康之家。平日省吃俭用，工作之余忙里偷闲，每一年，他们总会抽出时间出国度假、探亲。“通常，我们一行人合资租辆小巴士到处去，住的是五星级酒店，吃也选比较好的餐厅，一趟旅行大概花费数万美金。”哥伦比亚华人说来淡然，绝无炫耀之意。

       在4000多万人口中，哥伦比亚华人属少数民族，然而他们的日子却过得怡然自得、与世无争。“游击队不搞我们，当地人又喜欢华人。”当地华人欣慰地说。

       实际上，在华人眼中，哥伦比亚人民善良好客，也尊重华人，彼此相处融洽。哥伦比亚人，无论平民百姓或军警，文化素养高，待人亦彬彬有礼。满街各色制服的军警，从不会找华人麻烦。在捷运站驻守的实习警察，甚至还会热心地为华人引路，普遍上不存在针对华人的歧视现象。

       总体而言，哥伦比亚人普遍上对华人还是存有好感的，这应归功于当地华团的付出。2006年圣诞节，华团主席徐铭添名下的坚利国际有限公司，赞助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7200件玩具及灯饰等圣诞礼物，并由联谊会副主席扮成圣诞老人，把礼物送给贫穷地区的小孩。哥伦比亚华人取诸社会，亦晓得回馈社会，自然能赢得当地人的尊敬。

  哥伦比亚一共有4个华团，均以地区划分。其中以成立于首都的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最为活跃，会员最多。另外还有巴兰基亚中华侨联会、卡塔赫纳中华会馆及圣马尔塔中华会馆。 老移民大都把孩子送往外地留学，让他们顺理成章在当地落地生根，也为自己将来移居美国铺路。华人新生代大多无兴趣继承父业，父母也不希望孩子步其后尘，一辈子窝在弥漫油烟的厨房里。这里的发展空间有限，而外地则海阔天空，若要大展鸿图，就得冲出哥伦比亚。

       第二代华人无意经商、不从政，对社团也不感兴趣，社团接班人面临青黄不接的危机。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主席的位子也在苦苦寻觅接班人。“第二代人不出来，新来的人不懂，旧人又慢慢老去。”连任两届主席的徐铭添连连感叹。他自2001年起出任主席至今，深知此位的担子不轻，举凡任何筹款，主席必须带头号召身先士卒，而且还要出钱最多。哥伦比亚华人领导不能空有满腔热情，慷慨解囊、树立典范，才是重要的条件。

       在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的支助下，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中文学校终于在2006年6月创立。

       联谊会腾出会馆的空间，花了8个月的时间填平鱼池，兴建校舍，耗费甚巨。此外，校园内的一景一物，包括桌椅、校铃、饮水机，甚至学生的书包文具，都靠华人集资购得。哥伦比亚华人社群小，但对华教事业却不遗余力。

       中文学校聘请波哥大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师来教华文，教科书则采用暨南大学专为海外华人撰写的华文课本。为了学生安全，学校亦安排了4辆专车载送学生往返学校。

       办校不易，更何况身在异国。“我是打杂的，也没有办公室，是校长也是校工。”校长卢钟泓说道。为了开源节流，校长管理校务之余，也毫不计较地打点学校的一切，上至编班，下至敲校钟，卢校长都亲力亲为。

 1985年7月1日问世的《哥侨周报》，每逢周一出版，20多年来风雨不改。“我只想为华人服务，让他们了解哥伦比亚的政策及动向。”发行人周成德秉持最初的理念，坚持到现在。

       《哥侨周报》的创办人兼主编徐延树为旅居哥伦比亚的台湾人。他热爱写作，亦写得一手好文章，所以在朋友的鼓励下策划办报。这一办就不曾停歇，直到逝世为止，而遗孀周成德依旧为报纸默默耕耘。她每周不计成本影印200份《哥侨周报》寄给分布在哥伦比亚各地的订户，却不向他们追讨邮费。

       《哥侨周报》创刊号以手写形式问世，后发展至电脑打字。这份报章如A4纸张一般大，共5页，并以复印形式发行。报章的重点新闻以台湾新闻为主，内页则有哥伦比亚及国际新闻。

       周成德表示：“每个月开销，单是邮费就花去了600美金，其他开销还需千余美金。”然而，《哥侨周报》却没有固定的津贴，一切费用全由周成德负责。“我有商铺及餐厅等收入做后盾，能为华人奉献，小小付出算不了什么。”

       除此之外，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亦在每个月出版《旅哥侨讯》派发给当地华人。这本厚达50页的刊物，以当地华人动向、中国大陆及国际新闻为主。近年来，哥伦比亚华人可以付费收看华文卫星电视，获取华文资讯的管道越来越多元。

《哥侨周报》发行人周成德

 “主席，您在就好，您在我就放心了。”“主席，您回来啦，今天到我家吃饭吧。”

       哥伦比亚华人口中的主席正是徐铭添。华人在哥伦比亚遇到麻烦或遭到不公平对待时，只要徐铭添一出马，问题马上就能得到妥善解决。他曾经放下手头上的生意，大老远从国外飞回哥伦比亚，为的就是保护华人，维护他们的权益。

       “华人在此安居乐业，没干坏事，是好人，我一定帮忙。”好几回，有华人因无居留证而被逮个正着，在送往机场被遣返之际，徐铭添靠着与官方良好的关系，让他们得以长居此地。他后来还将这些人安置在自己的餐馆工作，以防他们再遭逮捕。如今，徐铭添更着手为哥伦比亚华人争取大赦。他说：“这是我退位前必须完成的事。”秉持着孙中山“天下为公”的信念，身为广东中山人的他不只为哥伦比亚华人付出，亦热心服务社会。

       徐铭添自小在哥伦比亚成长、受教育，然后到香港念了几年书，再负笈美国接受大专教育。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与哥伦比亚政要保持良好的关系；标准的华语让他能与中国大使亲切地以母语交谈；而流利的粤语更是他与华人移民之间的沟通工具；英语则让他在生意上无往不利。

       “语言就是条件，多学一种语言，就多一份优势。”身为广东中山人的徐铭添，却能在台山人为主的哥伦比亚当了8年的华团主席，且备受华人尊重。任职主席一职不易，徐铭添一来不推卸，不畏麻烦；二是他好学不倦；三是他幽默豁达，行事作风明快，因此广结善缘。

       徐铭添也是名成功商人，曾登上香港商业杂志的封面。他从事的生意非常多元化，其中包括餐饮业、珠宝业、进出口贸易、礼品连锁店、旅行社等。

  哥伦比亚华人历经风风雨雨，终于在多年后的今天，享有安居乐业的平静生活。

       老移民对哥伦比亚产生了感情，但为了替孩子寻觅更光明的前程，他们仍不停地在现实生活中上演一幕幕「孟母三迁」的故事。然而，每当一批老移民离去，必有一批新移民涌入填补他们遗下的空间。哥伦比亚华人社会，就在这种迎新去旧的循环中，生生不息。

逾百年历史的巴兰基亚中华义山，埋葬着许多早期华人的身躯及他们的美国梦，如今只供举目无亲的华人长眠。

 委内瑞拉在西班牙语意为“小威尼斯”，来源于早期原住民在湖边盖房子的生活景观。1498年，哥伦布登陆委内瑞拉，眼前尽是阿拉瓦族和加勒比族印第安人。1567年，它沦为西班牙殖民地，后来在民族解放英雄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的领导下，才彻底摆脱殖民统治，1811年宣告独立。

       当全世界因油价高而鼓噪时，委内瑞拉华人却笑说：“委内瑞拉的油比水便宜。”的确，石油为该国带来了巨大财富，但其多变的局势，令未来发展蒙上阴影。自1999年执政以来，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推动一系列变革。

       新政策纷纷出台，委内瑞拉华人难以适应，但凭着坚毅刚强和灵活变通的民族特性，时间久了，相信一切均能迎刃而解。

   根据记载，第一批抵达委内瑞拉的华人，是在1836年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拿马等邻国，辗转来到这里的广东恩平人。

       另一种说法是，一艘开往美国和加拿大的轮船，因为发生故障而停泊在委内瑞拉，船上的数十名恩平人被迫滞留在当地，结果便阴差阳错地成了首批踏足委内瑞拉的华人。

       第一批华人移民多数从事耕种或洗衣等行业。他们不辞劳苦，挨家挨户地收集脏衣服，一双手不停地洗刷粗厚的衣物，然后送到家家户户去，以换取极为微薄的报酬。另有一些华人则在餐馆当杂工，或售卖香烟和食物。

       1920年代，终于有了第二批华人抵境，他们大部分都是因为在中国染上了恶习或触犯法律，如吸鸦片、赌博、偷窃等，以致亲友迫不得已把他们送到委内瑞拉来。

       1930年代，委内瑞拉迎来了第三批华人。这群华人大多是从邻近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入境。他们十分勤奋，一般从事咖啡馆以及酒馆生意。

       身在他乡的华人，日子好坏与当地政府对待华人的态度息息相关。委内瑞拉的历届总统当中，胡安·戈麦斯（Juan Vicente Gomez）最为厚待华人，所以华人经济发展顺遂。到了1935年，拉斐尔·卡尔德拉·罗德里格斯（Rafael Caldera Rodríguez）继任总统，3年后即发生排华事件。

       当时委国政府限制华人入境，关闭华人所经营的店铺，并且还准备了3艘邮轮，打算将华人遣送回国，只是适逢中日战争爆发，导致航路不通而作罢。可是，无法离开的华人，依然被迫将利润丰厚的酒馆生意转让给欧裔移民。

       由于委内瑞拉宪法的限制，华人也无法取得当地的国籍，华人移民入境更是难上加难。

       直至1974年委内瑞拉与中国建交，情况才稍有所好转。此后，只要持有中国护照和身份证，华人便可申请合法入境，这个转变导致华人移民人数与日俱增。

       到了1980年代末期，中国再次掀起移民热潮，当时至少有一万多名华人从中国涌入委内瑞拉，其中以恩平人最多。

       2004年，查韦斯总统决定给予外国侨民大赦，大批华人获得了正式的居留身份，而且申请的手续极为简易，许多华人因此陆续移居到委内瑞拉。华人大都以“乡亲投靠乡亲”的方式到来，因此，恩平人的人数始终居高不下。

 “一元人民币的商品，在这里能卖上一美元。委内瑞拉满街都是钱，就看你怎么捡。”许多华商如是表示。

       外来商品一入“委门”，则身价十倍，委内瑞拉百货店铺多不胜数，不无道理。因此，局势再动荡险峻，老华人仍然不离不弃，新移民来了一批又一批。

       新移民的创业首选为开设百货商店、超级市场，其次是经营餐饮业。

   这里的百货商店与超级市场外观相似，出售的商品却大不相同。百货商店一般销售日常用品、装饰品、礼品、文具等，而超级市场则主要摆卖食材干粮等。两者多为小本经营，虽不见连锁形式，但有些店铺的商品种类达千种之多。也有些华人在家中腾出小小的空间，然后向亲友取货，即能开业。“就算是街坊买卖，也稳赚不赔。”华人异口同声地表示。

       华人餐馆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为设计简单的快餐店，主要做当地人的生意；第二类是装潢讲究的中餐厅，客源以华人为主。首都加拉加斯有3万多华人，就有多达800家中餐厅。

       华人开设的快餐店，经营方式与西式快餐店无异，大多设在商场里，菜单以当地人喜欢的烤鸡、炒饭等为主。不过，从店面外观来看，难以辨别老板是华人抑或是当地人。

       想在委内瑞拉品尝正宗的粤菜，绝对没问题。中餐厅大部分开在首都的高级住宅区内，且毗邻而建。门外不见大红灯笼，反而以利落的西式建筑风格为主，内里又是一片古色古香的氛围。当地人的饮食习惯与华人不同，但中餐对他们而言，却有着难以言喻的吸引力。

       近年来，尽管政局不稳、市道不景，但生产及制造业前景备受看好，发展空间极大，不少华商蠢蠢欲动，筹备设厂，以便在这块经济蛋糕上分一杯羹。华商纷纷收购意大利及西班牙人在马拉凯工业区留下的中小型工厂，再从中国购入机器，生产自家品牌的塑料袋、塑料容器、衣架、纸箱等等，盈利据说比批发零售更高且快。

        83岁的冯雪茂可算华人商界的佼佼者。他早期从餐饮业转战杂货业，还涉足房地产、塑料制造、媒体等生意，如今仅百货商店、超级市场就有十多家。

        委内瑞拉资源丰富，肥沃的土地尚待开发，丰富的矿物只等人挖掘，发展潜能无限。华人一方面感叹当地人不会善用，一方面则不得不等待时机。

     华人在委内瑞拉耕耘了百余年，尽管曾有华裔当过部长，但社会与经济地位并不高。再者，政局动荡，治安欠佳，更使华人吃尽苦头。

        治安较差的华恋社中区，白天黑夜，两幅景致。天色渐沉，白天的车龙与人群，瞬间被黑夜吞噬，在橙黄街灯的照映下，独留破砖烂瓦的倒影，形同一座荒废已久的死城。当地人于傍晚6点关店乃习惯使然，而华人在7点锁上大门，以策安全。

        华人到餐馆用餐，随时会碰上枪指太阳穴的惊悚场面；即使待在高级酒店，匪徒一样有本事破门行窃。尽管如此，委内瑞拉华人大多逆来顺受，既没佩戴枪械，也不聘请保镖，唯有家里的保安做得最足。

踏入华人家门，总得先解开外锁，再开旁锁，门的下方还有个内锁，好不容易开了铁匣，内里还有一个暗门，进门后又得重复刚才的步骤把门锁上，整个过程需时至少15分钟。

        无奈的华人没法改变整个大环境，但也懂得见招拆招，部分华商靠着与警长的私交而获得“警察顾问”、“警察特派员”等证件，一旦被军警刁难，就能派上用场。

        近几年，“快餐式”绑架取代了哄抢，这边绑架恐吓，那边收钱放人，速度之快，效率之高，让人始料不及。有鉴于此，华恋社中华会馆及华人商会联合成立护侨小组，与警方密切配合，成功倾覆几个匪巢，解救多名人质。此护侨小组也附设护侨基金会，以便向有需要的华人提供经济援助。

  委内瑞拉华社结构复杂。

        不同语言使用的频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迁。过去，非恩平人到此做生意，必须入乡随俗学习恩平话，否则难以融入当地华社，即使能说得一口标准的广州话，一样没辙。倘若口操普通话，即被贴上“北佬”的标签。

        如今，情况稍有改变。华商若能说普通话，将有利于生意上的交往。与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沟通，也需要讲普通话。十字港（Puerto La Cruz）的华侨福利会也在近年开设普通话班（华文会话班），让华商在周末上课学华文。

* *委内瑞拉的恩平人占八成，因此出现西班牙语“恩平化”的情况。有些华人会把百货商店称为“经解野”（西班牙语Quincalleria的译音），中文报章一般选择以恩平话译音，如把“巴伦西亚”（Valencia）写成“华恋社”、“玻利瓦尔”（Bolivar）写成“保利华”等，规范的中文译名反而少用。*

        委内瑞拉华人之间的人情味，建立在彼此的信任程度及相识时间的长短。华商征聘员工，一般优先考虑华人，倘若员工肯做肯学，雇主还会大方地出钱出力协助员工当老板。据悉，冯雪茂就曾帮助至少100名华人创业。

        政府明文规定雇主必须聘请当地人工作，但一些华人存有“老番为人信不过”的想法，表面上关系和谐，实际上日夜防范员工监守自盗。近年来，华人与当地人的关系已稍有改善。

        委内瑞拉的华人是矛盾的，尽管对当地人有所抱怨，却又希望他们不思长进，原地踏步。如此一来，华人少了竞争对手，生意就会越做越旺。

    近几年，委内瑞拉各大华团纷纷在会馆内开设华文班，使用暨南大学出版的海外教材，部分学生完成小学一到四年级的课程后，还会到中国继续升学。

        “希望孩子们毕业时已能阅中文报。”中文教育宗旨明确，而部分华文班亦设有“祖根课”，学校不时举办“回国寻根”之类的课外活动，让学生放松身心的同时，也借此多认识中华文化。

        全委内瑞拉中文教育体系最完整的，要数华恋社中华会馆所设立的中文学校。它拥有8名专业华文教师，6个班级，一星期上5天课，每天5小时。大部分学生早上在当地学校上课，下午就到中文学校学习母语。

* *委内瑞拉全国华人文学艺术爱好者联合会（简称“全委华人文联”）于2008年1月成立，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宗旨，凝聚华人文化力量。*
* 华人虽然仍受歧视，但倘若华人子弟表现优异，进入国立大学并不成问题。西蒙·玻利瓦尔大学及中央大学为当地著名的大专学府，学费廉宜，学位亦受美国和加拿大承认，毕业后许多工作机会都会主动找上门。
* 华人在异国赚钱，依旧不忘捐助家乡的教育事业，冯雪茂就曾于1986年捐献300多万人民币，在恩平县建立了雪茂学校。

目前，委内瑞拉的中文报章有《委国侨报》以及《委华报》等。《委国侨报》是委内瑞拉的第一份中文报刊，仅比第二份中文报刊《委华报》早出版3个月，至今已有十年历史。目前《委国侨报》报社全职员工有十余人，而业务和发行人员则遍布委内瑞拉各省市，基本上都是兼职性质。报纸的销售量为4000份左右，主要在委内瑞拉几个华人偏多的大城市销售。

     2009年，《委国侨报》报社创办了另外一份西班牙语报纸《CHINA EN ESPANOL》，读者群面向委内瑞拉人，以及不懂中文的委国土生华人，以让他们多些了解中国，宣扬中华文化。这份报纸也受到了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支持，目前已发展为中委文化、商务交流的平台之一。

        《委华报》主要报道中国和世界新闻，而中国中央电视台也曾转载该报的新闻报导，销量约4000份，旗下还出版《委华博览》杂志。

        委内瑞拉屡屡在世界选美赛中荣摘桂冠，中文媒体也顺应华社及当地人对选美的兴趣，《委华报》于2005年首开先河，举办全委华人选美小姐比赛，而2007年3月创刊的《南美新知》中西双语杂志也以华裔美少女为封面。

        目前，中文报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各中文报馆规模甚小，员工只有十余人左右。报章每周出版一期，交由会馆及通讯员派发。读者投稿纯属兴趣，并没有稿费。

《南美新知》以中西双语出击，争取华人及当地读者群。

    每逢星期天，早晨7时至下午1时，委京中华会馆摇身一变成了唐人市集，聚集了大批华人。约60个大小不一的华人档口在这里摆摊营业，所出售的装饰品、糕点、影碟等大部分来自中国，而蔬果则为当地产物。

        这个唐人市集已有十余年的历史，原先在委京中华会馆对面的中餐馆外摆摊做生意，但附近居民投诉唐人市集制造噪音及污染环境，当局遂展开扫荡。当时，摊主做不成生意，华人也少了一个购物集中地，后来经由委京中华会馆主席梅其羡医生以私人交情与当局协调，摊主获准继续摆卖，但只限于委京中华会馆内。

唐人市集每周开放一次，售卖各类蔬果、日常用品和家乡美食。

委内瑞拉内忧外患不断，但华人移民毫不退缩，依然纷至沓来，而华人经济发展也日趋多元。

        然而，即使拥有百余年的移民历史，委内瑞拉华人社会地位却未见提升。他们始终还是弱势的一群。华社尚未成功，华人仍须努力。

 南美洲北部大西洋沿岸，曾经有过3个圭亚那，从西向东依次为英属、荷属和法属圭亚那，即如今的圭亚那合作共和国、苏里南共和国和法属圭亚那。这里森林密布，河流纵横，在印第安语上，有“多水之乡”之称。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是南美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这里却有世界最高的木质白教堂、世界最长的浮桥。它曾被西班牙人与荷兰人占领过，1831年成为英国殖民地，1966年宣布独立，是南美大陆唯一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因为历史渊源，圭亚那种族结构复杂，是多元文化的聚集地。

       独立后的圭亚那政局长期动荡不安，种族关系紧张。如今，政府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与解决种族冲突，但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仍不断上升，这一切都让人望而生畏，前来冒险闯荡的华人人数也一年比一年少。

       大部分华人都把这里当成歇脚点，一赚到钱，便纷纷移民海外。但是，也有华人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园，说是习惯了这里悠闲的生活，哪里都不想去了。

从早期的契约华工直至后来的新移民，华人在这个国家落脚的时间已经有近160年。

       1834年，英属圭亚那废除奴隶制度，黑奴离开了种植园。为了补充廉价的劳动力，英国人便从中国及印度招募苦力，以解决甘蔗园劳工短缺的问题。

       1853年，首批来自中国沿海的契约华工乘风破浪而至，掀开了华人在圭亚那生存和发展的序幕。

       据说那时的契约华工价格比印度劳工还高。在合同期内，华工的劳动力价格是25英镑，印度劳工则只有15英镑。为了降低成本，种植园主都比较偏向于聘请印度劳工，不过，由于种植园的劳动力严重不足，加上华工勤劳卖力，工作认真负责，且奉公守法，得到英国人极大的信任，故此，越来越多契约华工涌入圭亚那。

       根据统计，到1912年为止，圭亚那共有约1万5000名契约华工。后来，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被转送到加勒比海一带的国家，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牙买加等地，也有一些华人在合约期间由于工作操劳过度而丧命。

       逐渐地，也开始有华人女性进入圭亚那，不过人数不多。1861年，玛格丽（Margery）的曾祖母来到了圭亚那。“听说她是第一个到达圭亚那的中国女人，她的脚板只有5寸长。”玛格丽是圭亚那第四代华人，她家的柜橱里珍藏者祖辈们从中国带来的“宝贝”：5对金莲鞋、茶壶、玻璃碗筷、福禄寿瓷器、煤油灯等，保存得完好如初。“这些‘古董’，都是长辈从中国随身带来的，意欲可以给他们带来好运与光明。”玛格丽这样解释。

       一般来说，华人的契约期为5年，期满之后，华人可以自行决定自已的去留。想返回中国的，雇主会付每人50英镑的路费，愿意留下来的，则可以得到补助金。

       回乡对当时的华人而言，是一个极其冒险、九死一生的旅程。他们至少需在海上航行半年时间，才能抵达中国沿海地区。船上的卫生条件恶劣，还得提心吊胆地面对变幻莫测的大海。那时侯，华人在海上的死亡率高达40%。

       故此，一些华人选择了续约，继续留在种植园里工作。不过，大多数华人不为土地或补助金所诱惑，他们决定离开种植园，在城镇定居并转行经商，有的开食品店、洗衣馆、餐馆，有的当了理发师、铁匠、裁缝师、木匠等。也有华人选择去法属圭亚那、苏里南、巴西等地谋生。

       1966年，圭亚那宣布独立，社会秩序曾经有过一段混乱期，导致人心惶惶。“那是圭亚那最苦的时候，没有面包没有米饭，人们只能自己耕种。”华人回忆说。

 因此，华人纷纷移民他国。“那个年代，只要到了英国就可以拿到合法居留证，要办理加拿大居留也很容易。华人手中只要有机票的，都会选择离开。”老华侨说。

       那些走不了的华人唯有听天由命，继续经营伙食店或餐馆。“虽然这里什么也没有，但是做生意就很不错，至少市场竞争力不强，成本低，赚钱容易。”所谓富贵险中求，留下来的这一些人，希望能在这里创一番事业，日后才可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

       由于早期华人移民当中，女性的数量非常少，所以，大部分的男性移民都和当地其他种族通婚。而他们所生下的混血后代虽然大部分保留着华人的姓氏，但是却连一句中文也不会说了。

       华人非常重视教育，父辈们总是宁愿自己吃苦受罪，也要设法让子女接受良好教育。所以，大部分圭亚那的混血华人都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他们多数是社会上有地位的成功人士。

       虽然不论样貌还是肤色方面，都很难让人将他们和华人联系起来，但是，传承下来的家庭格训，让他们认定中国人就是他们的祖先。

  目前，不包括混血华人在内，圭亚那华人只有约2000人，多数集中住在首都乔治敦。

       华人新移民大部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来自广州白云区，数量超过1000人。由于不谙英语，他们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大多数人都在餐馆里找生活。

       成立于20世纪初期的中华会馆联系着整个华人社会，但因为种种原因，它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附属的中文学校时办时停，常常有学生却没有老师。

       这里的每个华人都想要把华社做好，只是群龙无首，长期处于松散状态。

 圭亚那资源丰富，却穷得不可思议，是个典型的农业国。在这里，华人凭借餐饮业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华人在圭亚那百多年，做得最多的就是餐饮业。这里有200多家不大不小的中餐馆，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市中心或郊区。

       圭亚那中餐馆主要分成3种。家庭式餐馆最普遍也最简陋，一般多为夫妻俩或一个人在经营，卖些炒饭炒面和简单的热食，价钱也最便宜。普通的中餐馆有冷气设备，除了炒饭炒面外，热炒的种类丰富些，有些也承包宴会用餐。另外，这里还有几间大酒家，集中在乔治敦，店内宽敞洁净、菜色选择多样，用餐环境与菜肴口味都令人满意，但价钱比较高。

       在圭亚那开一家普通的餐馆，成本不高，平均1万5000美金就可以自己当老板了，家庭式餐馆的资金，更是低于这个价钱。华人说：“圭亚那人口少，失业率高，他们对中餐的要求不高，装潢费人工费都可以省下来，剩下的就是租金而已。”

       大部分的家庭式餐馆都用木板搭成，光线穿过板与板之间的缝隙透进来，阴凉的感觉与外头强烈的阳光形成对比。小小的楼面仅仅简单地摆了些桌椅，连电风扇也没有，更别说其他的摆设或点缀。

       家庭式餐馆的柜台上方，写着简单的菜单。为了安全考虑，柜台外围上栅栏，将老板与顾客隔开，栏杆底部空出约30厘米左右的空间，以方便老板与顾客沟通，与旧式银行的柜台设计一样。在圭亚那点餐，好像去银行取钱一样，老板与客人之间永远隔着一些距离。

    “这里治安欠佳，凡事都要小心谨慎，凡事都要考虑安全。营业时间不要太长，门窗要锁好，不要让别人有机会对你下手。”华人都知道若没做好基本安全措施，就等于送羊入虎口。

       尽管有诸多风险，华人还是很享受自己当老板的感觉。中午没客人的时候，老板可以借机睡午觉，客人来点餐，只要在柜台外大喊几声就可以了。

       “相较于经营百货店生意，开餐馆最轻松不过了，至于安全问题，只要低调、不张扬，时刻提高警惕就行了。”和妻子一起经营家庭餐馆的朱构雄如是指出。朱家的店就在郊区大路旁，每天平均可卖四五十碟炒饭炒面，一天约有100至250美元的收入。

       圭亚那的中餐馆已有100余年的历史，深受当地人欢迎。在乔治敦外的郊区，有一家非常受当地人欢迎的中餐馆。老板自豪地说：“这里很多人都是吃我的饭长大的。”

       小小的中餐馆，虽千篇一律，但却是大部分华人在当地生存与发展的根基。

   华人说，在圭亚那做生意最自由。“只要照章纳税，遵守法律，你开什么店，营业到几点都可以，没人会刻意刁难你。”华人在这里做生意如鱼得水。

       近年来，廉价的中国百货风靡全球。乔治敦的大街上也出现了几家华人百货店和衣饰店。百货商品一般是从苏里南进口，华人在圭亚那开店售卖。

* *连任两届圭亚那总统及国家元首（1970-1980年）是名叫阿瑟钟（Raymond Arthur Chung）的华人。他的父亲是来自广东的客家籍契约华工。阿瑟钟曾留学英国，返回圭亚那后，担任律师及高等法院法官。1977年，他曾经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问中国。他在圭亚那享有崇高的威望，2008年辞世时，举国放假一天来悼念他。*

       苏里南华人也因此过来做生意。“苏里南百货店已达到饱和状态，竞争激烈。听说圭亚那华人不多，还是片处女地，便过来尝试一下。”苏锐辉是浙江人，在苏里南住了几年，累积了闯天下的经验后，就单枪匹马地来到圭亚那发展。

       越来越多中国商品进入圭亚那，从大型的拖拉机到小巧的打火机，都是“中国制造”。华人说，圭亚那人对中国商品非常喜爱。圭亚那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雨量充沛。当地人一出门，至少会带一把伞。有些当地人对设计精美的中国雨伞表现出极大兴趣，他们会拿在手里，边亲吻伞边说：“我喜欢中国伞。”

       “在圭亚那做生意，竞争小，利润多，但是员工薪水比较高。”苏锐辉说。以前，聘请一个当地人每个月要100美元，现在则是每个月350到450美元不等。星期天还要付双倍工钱。因此，华人商店最多聘请一至两个当地人，其余都是亲戚朋友来帮忙打理。哥哥放假去旅行了，就请弟弟到店里来坐镇；弟弟到国外进货，哥哥就会到店里帮忙打理。

       圭亚那贫穷，但物价却出奇的高。“这里的人口不多，薄利多销是行不通的，每样商品的顾客群都不多，只能提高商品价格销售，否则成本压力会很大。”华人说。

       虽然这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华人商店的销售量还不错。华人透露：“当地人消费观念和华人完全不一样，他们非常乐观，只要身上有钱，就会迫不及待地要把它花光。”令人奇怪的是，他们的钱好像永远也花不完。

       原来，这个国家70万总人口中，竟然有50万人长期定居在发达国家，留在圭亚那的几乎每个人都有亲人在海外，他们的家人会定期给他们汇款，因此当地人每个月都会有不菲的收入。

       “加上他们天性乐观，真的没钱了，也会卷起裤脚到河边抓鱼虾去卖。或者到深山去采金，只要在山里待上半个月，就会有钱了。”华人说，“他们有钱，我们的口袋就有钱。”

       因此，这个国家看起来很贫穷，但生活消费一点也不便宜。

     圭亚那有些华人从事伐木业。

       这里超过85%的土地被森林覆盖着。“圭亚那的每一片森林都是宝藏，埋藏着无尽的宝物，等着伯乐来发掘。”华人如此形容。听说在这里伐木也能赚到钱后、华人、外资公司便陆续前来投资，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

       巴拿马伐木集团、长青集团、中国木业资源集团是这里数一数二的大型华人伐木公司，其中，巴拿马伐木集团在香港上市，掌舵的是马来西亚华人。这几家公司在圭亚那有好几个规模非常大的林区，虽然政府批准他们伐木，但也规定他们注意保护生态平衡，不能过度开采资源。

       森林里蕴藏着无限资源，同时也潜藏着无限危机，特别是蚊虫带来的危害。“圭亚那森林里有超过十种毒蚊，有些毒蚊的潜伏期是十天，被叮着的人一定要留在圭亚那，因为只有圭亚那才有药医。”华人说，“一般人不能被两种以上的蚊子叮到，不然就有生命危险。很多人以为只要上山把树锯断，再运下山就可以换取一桶桶的金币了。殊不知，他们贸然上山，往往会走上黄泉路。”

       “然而，有些林区很安全，他们会先‘消毒’林区，然后再进行伐木工作。”华人说。比起一般小规模的伐木发展商，大型的伐木公司会更注重伐木工人的安全，他们的林区还有医疗所。

       圭亚那交通不发达，从市中心到林区路程遥远，一般要花上好几个小时的车程。人们到了林区边缘的小码头，还得乘坐小船才能去到目的地。这对于每天往返奔波的人来说，实在是浪费时间。

       于是，有些华人干脆就住在林区。他们有来出差的、伐木的、在伙食店打工的，也有参与新建食堂的华人等。他们生活简单，早上8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后，就和朋友踢踢球，6点半天黑了就吃晚餐。天黑以后，林区野兽出没频繁，华人只能待在宿舍，避免野兽攻击。“无聊时可以上网，想不到吧，在林区还可以无线上网。”华人说。

   随着时代的进步，林区的物品供应也渐渐地丰富起来。有华人在这里开伙食店。小小的伙食店，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到毛巾、床褥、煤油灯等应有尽有。雪柜里还有冰冻肉类、水饺、汤圆等。

       伙食店老板知道林区的员工多来自东南亚，就卖东南亚的罐头、干粮等食品。“马来西亚的美禄、炒面特别受欢迎。”老板说。每隔3天，他就把新鲜的蔬果、干粮送到林区去卖。

       华人一般不会在林区待很久，有些华人3个月或半年就回家一趟。他们说，他们的家不在圭亚那。

    尽管圭亚那政治局势长期动荡不安，物资匮乏，物价奇高，但还是有华人留在这里。

       “这里什么都没有，治安不好，医疗设备不齐全，消费又高，生活很不方便。”华人希望退休后可以到一个比较“先进”的地方养老。“至少可以吃得到宵夜的地方。”华人要的其实不多。

       然而，留下来的华人也多了份圭亚那人对生活安闲的态度。

       乔治敦是个宽敞且悠闲的城市，这里没有高楼大厦，一排排的平房散布在随风摇曳的椰树间。宽敞的街道一览无遗，载货的马车与汽车并行，简单的4轮马车功能大，有的装载几根木头或水管，有的则载满了一笼笼小鸡。

       车夫戴着草帽随意地坐在货物上控制马匹，马儿一步一步地走，身旁的车辆一辆一辆地滑过，车上的人则一边悠闲地抽烟一边哼歌。红灯一亮，车夫悠悠地拉拉绳子，马儿渐渐放慢脚步停下来，不缓不急。“当地人的生活就是这样，他们做任何事情，从来不赶时间。”华人说。

       华人既来之则安之，慢慢地也就习惯了他们的生活态度，也渐渐敞开胸怀，学习享受人生。

当地人对物质也没什么奢求，工作效率慢吞吞，常常领了薪水就不去上班，“你和他们发脾气也没用。他们自有道理，说什么今天有钱不花，万一明天死了怎么办？”华人无可奈何，只能调整自己来适应他们。

       圭亚那人热爱生活，摇床是他们家里的“标志”，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一两张摇床。下午时，把摇床悬挂在椰树之间，躺在摇床上，享受着徐徐的大西洋海风，看着椰树和芭蕉树在风中起舞，很是惬意。华人有样学样，也把摇床悬挂在屋外的柱子上。

     很多理由，让华人迟迟不想离开圭亚那。

       每个华人都说，圭亚那人情味特别浓。“老华侨都很乐意帮助新移民。新来的华人如果无依无靠，到各中餐馆，大家都会请你吃饭。”来自广东的黄埔源指出。甚至有些已经移民到欧美的老华侨，因为习惯了圭亚那的人情味，还特别折返回来。家人都在美国的周绍良说：“我去那么多地方，还是觉得圭亚那的人情味浓。虽然我已经拿到了美国居留权，但我还是比较喜欢留在这里，哪里都不想去。”

       华人还说，圭亚那森林多、河流多，不仅空气异常清新，就连蓝天白云看起来都比别处近，感觉自己靠近大自然，心情常常会感到特别的舒畅。“心情郁闷时，也可以租条小船到河上去兜风，让大风把烦恼吹走，很过瘾的。”经营中餐馆的萍姨说。

## 

   中华会馆是当地唯一华人社团。早在19世纪中期，圭亚那华人就组建了自己的社团，但没有注册。直到20世纪初，才正式注册成立了圭亚那中华会馆。

       早期的会馆为华人提供了大量的服务。老华侨说：“那时候，凡是无家可归的老人都可以免费住在会馆。没有华人流落街头。”

   只是，在80年代，圭亚那华人大规模地迁徙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国家后，会馆的会员人数逐日减少，会馆的凝聚力也渐渐转弱。大家走的走，留下来的华人也忙于打理自己的生意，会馆的事情，也就很少参与，有些新移民甚至不知道有中华会馆的存在。

       “会馆还是正常运作，只是犹如一盘散沙，大家都没时间帮忙处理华人事务。”中华会馆会长黄埔源很无奈地说。就连他自己，也常常周旋于自己的生意，对会馆的事情上难以兼顾。

       “会长的事情很繁杂，新移民一有状况就会找你，你可能要去法庭帮他们做翻译；中国大使馆有时候也会请你过去帮忙。”华人的事情，大部分都是黄埔源一个人在做，他相信如果有更多人热心参与，会馆可以发挥更大的功效。

       华人希望圭亚那能早日出现一个健全的华人社团，把背景不同的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让大家在这片土地上，都能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

     比起大多简陋的中餐馆，新隆酒家在圭亚那可谓赫赫有名。

       刚开始，老板车剑萍和丈夫肖广钊用了4000美元来创业。“1989年，我们到圭亚那旅游，发现这里没有好吃的食物。这个国家什么都没有，发展餐饮业肯定有前景。”车剑萍和丈夫拖着两个行李箱就过来了。

       车剑萍是女中豪杰，肖广钊是细心老板，夫妻俩双剑合壁，在圭亚那闯天下。大家都以“萍姨、钊叔”来称呼他们。

       夫妻俩初到圭亚那时，人生地不熟，到超市买菜、订货、下订单、洗厨房等都自己做。“早期做餐饮业很辛苦，但是赚钱容易，只用了3个月时间，我们就已经赚回本了。”他们越做越开心，越做越有心得。

       “中餐馆的炒饭炒面份量大，口味好，此外，到中餐馆聚餐也是一种娱乐。”萍姨分析着华人餐馆兴隆的原因。

   1995年，她把赚来的好几万美元投资在新餐馆，还特地从美国订了4台冷气机，也开始聘请员工。因为不懂英语，她半开放厨房，在橱窗上挂着猪肉、鸡肉、鸡蛋、青菜等，让客人点菜。“他们只要指着那些食材，我就知道要怎么炒菜了。”

       没想到，透明厨房的创意，吸引了大批客人。“他们一方面觉得很新奇，另一方面也觉得卫生，看得见厨师在炒菜，大家吃得放心。”于是，店里客似云来，2000年萍姨的事业达到高峰。

       华人说，是圭亚那人就必定会到新隆酒家用餐。无论是商人要招待朋友、官员要请客、外资公司办聚餐、侨乡团聚吃饭等，都会想到新隆。“这里人来人往，可以认识很多人。”因此，不管是当地人还是政府官员，萍姨钊叔和他们多少有点交情。

       可惜，因为一把火，一夜间，他们的餐馆化成一堆灰烬。

       那次的意外事故，让萍姨的心情跌到谷底。过后，她重新振作起来，决心要在圭亚那打造一个当地最大的中餐馆。她在中国订做餐桌餐椅桌布，还特别在中国大陆聘请了专业设计师和建筑工人来圭亚那为他们装修新店，共投资了350万美元。

       新的新隆酒家有3层楼高。3楼隔作厢房，有好几间包厢，也包括可容下30多人，结合开会与用餐的大会议室。2楼的露天餐厅，场地宽敞，客人可以迎着海风品尝佳肴。楼下的自助餐品种繁多，更是让人垂涎欲滴。

       圭亚那是多元种族聚居的国家。为了满足多个族群的需要，新隆酒家还提供印度餐、黑人餐、素食等。它就像一个小联合国，随处可见各种肤色的人种，无论是谁，都能在此享受到居家一样的温馨服务。

  玛格丽是中国人与印度人的混血儿，她既过印度人的节日，也过中国的传统节庆，如中秋节与春节。每年华人的农历新年，她都在家里办聚会，并规定亲戚朋友须穿旗袍或唐装才能出席。

       圭亚那买不到华人传统服饰，他们就上网订购。“农历新年前两个月，我们就开始订购了，有些人还特别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去购买唐装。”她说，“除了服装，还得购买一些红色的、喜气的小饰品来搭配。”

       “我的孩子取笑我，一个不会说中文的人，竟然坚持过华人节日。”玛格丽的用心，其实也感动了很多的华人。出席盛会的多是土生土长的混血华人。“他们不会说中文，但可以感受华人新年气氛。”玛格丽还会准备一些简单的表演节目娱乐大家。

       熟悉的中国曲风加上华人的热情表演，往往都能感染当地人，让他们也融入其中，与华人一起欢度新年。

       那一天，圭亚那华人会互给红包。玛格丽说，早期华人踏海而来，身上没多少钱，新年时，他们在红包里放着一大一小的鸳鸯八卦铜板代替零钱，表示祝福的意思。“如果每天都把红包携带身上的话，那就表示你一整年都有钱用。”玛格丽就随身携带丈夫给她的红包，希望好运天天来。

       玛格丽有个心愿，她花了十多年时间收集资料，访问老人家，记录整理了几近完整的圭亚那华人族谱，希望为自己的下一代留一些线索，让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圭亚那华人不多，大部分更是与异族通婚了，有了族谱后，华人才不会误和自己的家人结为夫妻。”族谱很厚，其中一份副本被保存在圭亚那国家图书馆。

华人踏足圭亚那已近一百六十年。不喜欢这里的华人，早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留下来的华人，已经与当地人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留恋的是这里的悠闲生活和浓浓的人情味。

       华人在这片土地，留下了一路走来的汗水与泪水，以及脚踏实地、辛勤劳作的成果。他们也在这片土地的每个角落，洒下了永不熄灭的民族之光，提醒新一代华人，不要忘却自己的根。

    法属圭亚那，本是不为人知的法国海外领地，随着1964年法国在这里建造航天中心，一支支火箭腾空而起，渐渐远近闻名。

       这里也曾经是法国的流放营。1973年，好莱坞根据真人真事拍成的经典越狱电影《巴比笼》（Papillon），就是描写当地一个因沉冤入狱的囚犯为了自由而越狱的故事。百年来，岛上留下的种种传奇故事，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

       法属圭亚那森林密布，景色优美；加勒比海人用他们天生的率真，热情地拥抱着远道而来的华人。渐渐地，华人对这片土地产生了眷恋之情，留下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如今在法属圭亚那生活的华人，起初都来自英属圭亚那（即今圭亚那合作共和国）。1870年，有十名契约期满的华人，因为不愿意续约，又不想就此回国，于是便抱着拓荒的精神，带着本身仅有的积蓄，从乔治敦（Georgetown）跋山涉水步行至苏里南，再由苏里南的日计里（Nickerie）辗转抵达法属圭亚那。

       后来的华人都称他们为“十杰”。这十人大多数为广东客家人，初来乍到时，语言不通，在沟通方面也成问题。起初他们仅能以面包或杂粮充饥，并睡在公车站廊。后来，他们慢慢与当地人混熟了，开始跟随他们到海边捕鱼、到森林中伐木、到山上去狩猎，有些甚至还到荒岗掘金。

       任谁也没料到，华人竟能如此快速地融入当地社会。当地华人说：“那些老前辈们为了生活，有的仅仅花了3天的时间就能和当地人聊起来。”

       日子一久，“十杰”攒积了一点钱，便开始转而从事商业活动，这地方也自此有了华人杂货店、中餐店、面包坊和洗衣店等。老华人回忆道：“虽然那些店面非常简单粗陋，可是这对当时落后的法属圭亚那来说，已经算是创新的行业了。”而今，接下“十杰”棒子传薪的后代们，有些还留在此处，有些则已经移民到其他国家去了。

       到了1950年代，移居过来的华人日益增加，他们大多数是广东惠阳、宝安和东莞的客家人，并以“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的方式，逐步将家乡的眷属申请过来团聚。华人拎着两个皮箱乘船而来，一艘艘渡船承载着的都是他们满满的梦想。他们之中，有的是过埠新娘，有一些是年轻小伙子，更多的是为了改善生活而被迫离乡背井的中年人。

       1951年，法属圭亚那已经有60名华人，其中女性有6名。

       当时的华人非常团结，又相互关怀照应。“我们客家人是很好客的，一有新的华人移民过来，每家人都会轮流请他们吃饭，以表示欢迎。”法属圭亚那的华人每每提起50多年前家家户户轮流请客的情景，就好像饭局才刚刚结束一样，那热情的余温犹在。

       当时这里也来了一户以修理钟表为生的郭姓人家，他们是第一户居住在法属圭亚那的浙江青田人。

       70年代的法属圭亚那还没有完全开发，人口的增长率也非常缓慢，土地更是一片荒芜。一名华人妇女回忆道：“听别人说我老爸在这里开餐馆，我便想过来帮忙。哪里知道飞机落地之后，看见那简陋的机场，和没有路灯的黄泥路，四周都是黑人的影子，我的心就一直往下沉。”眼见这里比自己的国家还要落后，她真的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可是想转头离开也来不及了，唯有留下来努力挣钱。

       两手空空而至的华人，通常来到这里就会先替亲戚打工，让亲戚将他们的工钱存下来，几年过后再把积蓄拿来开店做生意。此处的华人，几乎皆是这样起家立业的。

       早期华人大部分经营伙食店，客家人称这种伙食店为“咸头店”，是属于家庭式的小店铺，专卖日常用品及食品等，只要手头上有2500至4000法郎的资金就可开张营业了。

       来自香港的何广富是首名经营“咸头店”的华人。1907年，他抵达法属圭亚那，听说这里有金子，就做起了“淘金梦”。哪知上山掘金比他想像的还要困难得多，只有少数的当地人才能忍受那种艰苦。于是，他只好转行，在圣罗兰（St. Laurent）开了一家伙食店，没料到居然会门庭若市，客人源源不绝。

       当地人的性情单纯友善，他们到“咸头店”买货时，若是身上没钱，就会用金块来换取日用品。华人说：“他们对金钱没有什么概念，就把金块放在柜台上，任由我们来估算。”

       当地人每次在店里买了饮料之后，就会坐在店外，三五成群地边喝边聊。如此一来，华人和当地人就有了更多的沟通机会。“多一些和他们闲聊，学讲土话也学得比较快。”

       “咸头店”的面积虽小，但是五脏俱全，多为夫妻俩一起打理，工作时间长，而且相当辛苦。店里卖的多是柴米油盐、蒜头、酒、豆类、也卖些腌制食物如咸猪尾和腌牛肉等。“当地人很喜欢吃腌制的食品。小小的伙食店一星期就可卖掉25公斤的咸猪尾，利润非常可观。”老华人回忆说。

       每一家“咸头店”的前头都有一个柜台，客人把棍子握在手里，要买什么就指什么，老板再把货物拿给客人。老华人说：“当时的货品完全没有包装可言，所有的东西都必须秤量。有的客人要半公斤的盐、有的要一公斤的油、有的要两公斤的面粉……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爬上爬下地拿货给客人，一天忙下来，把人累得够呛。”

       那时候的法属圭亚那基础设施落后，居民的生活既贫困也简单。他们经常到华人伙食店赊购食物，待发薪时再慢慢地付还欠款。当地人几乎都没有储蓄的习惯，为了生意着想，华人只好让他们赊账。他们说：“宁可大家做个朋友，让他们慢慢还钱，也总比他们到店里偷东西来得好。”

       客家人说，这也叫做生意，常做常有。

       虽然华人在法属圭亚那工作非常辛苦，但是收获丰厚。

       在80年代初期，浙江青田籍的华人才开始小规模地踏上这片土地，他们虽然来得比较迟，但是却发展得最快。而他们今日的成就，都得归功于郭胜华这一名令浙江人在当地站稳脚跟的核心人物。

     法属圭亚那目前共有华人6000人。其中广东客家人约有4000人；其次是浙江青田人，约有2000人，首府卡宴一直都是华人最密集的小城，罗兰这个与邻国苏里南一河之隔的小镇，也是华人的聚集地。至于太空城市库鲁（Kourou），也有约400名华人定居。

       在这片土地上，华人人数虽只占总人口的3%，但华人店铺却占了商铺总数的70%.可以说，华人对该地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随着时代改变，华人逐渐走出咸头店，进军各行各业。他们有的开旅馆，有的经营精品店，但更多的还是从事百货超市、餐馆、服装等行业。据估计，现有的华人店铺有600多家，其中有400多家集中在卡宴市。

       其中，备受欢迎的中餐馆成为继咸头店后，法属圭亚那华人引以为荣的另一行业。

       相较于其他南美各国，这里最大的中餐馆只能容纳百余人。华人说：“法国是万税之国，什么都要抽税，地方大一点就要多缴一点钱。”小小的中餐馆，装潢也简单，却能聚集多方客人。

       这里中餐馆受欢迎的程度让人惊讶。每家新开的餐馆必定门庭若市。百多年来，客家、粤菜让法属圭亚那的人们回味无穷。餐馆老板谈起成功原因时说：“主要也是因为价钱合理，一个人吃饭的话，估计十欧元就很够了，若点菜则大概就要15至20欧元。”相比之下，吃西餐若点一个主菜、一杯红酒再加甜点咖啡，至少也要花上30至40欧元。

位于卡宴市的喜宝茶楼，算是华人的主要饭堂。每天清晨，那里必定人潮汹涌。华人喜欢到那里吃点心，喝茶聊天。“每天最新的新闻、八卦是非、各路消息等，都可以在那里打听得到。”他们说：“别说华人，就连当地人也爱去那里吃午餐。若没预先订位，搞不好会等待很久。”

       当地人爱吃面包，喜欢把面包当早餐。于是华人就卖面包、批发面包。“早市的中餐馆要卖牛油面包、牛角包，超市也要卖法国面包，所以每天清晨5点多我就得去送面包了。”27岁的曾启文（Jean Tsang）说。他在这里土生土长，曾到巴黎留学，现继承父业，与弟弟一起经营面包坊生意。他说：“这地方小，面包生意竞争大，大家各凭创意，看谁能在这小小的圈子里赚得到钱。”

       法国政府在库鲁市建设太空城后，引进了许多欧美专业人员，爱吃面包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市场也就越来越大。来自上海的老谢，就在那时候看见商机，买了德意法兰西（Delifrance）的经营权，如今他每个早上就可卖掉200多条面包。

       面包房的烤炉温度很高，让人难以忍受，因此即使高薪聘请华人，他们也不太愿意从事这份工作。于是大部分的店主只好聘请当地人。“但他们没有责任心，上班聊天喝咖啡，请假没有理由，心情不好就不来上班，让人头疼。”店主如是道。

       尽管对当地人有诸多不满，但私下里，华人还是认为他们个性单纯、热情，如果不是因为双方的雇佣关系，他们会成为华人很好的朋友。

据华人说，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是华人在法属圭亚那做生意的黄金时期。那时期姗姗来迟的浙江人，却正好赶上了好时机。他们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创造出自己的春天，在短短几年间就把法国与犹太人的百货商店挤向了边缘，让中国百货和服装称霸整个法属圭亚那的市场。

 他们经营的百货店遍布整个卡宴。在卡宴大街，甚至有条“青田街”，街上的华人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店外高挂着用汉字或汉语拼音译成的招牌，如DaDi、DaDu、东方、FaFaFa等。

       华人商店的门面有大有小，店铺内出售的货品多达千种，但店里没有什么装潢设计可言，几乎每家百货店都呈现一个模样，琳琅满目地摆满了“中国制造”的廉价电器、塑胶用品、门帘挂饰等——华人费尽心思地将有限的空间充分利用，到处都挂满、塞满了货品。

       当地人不像华人那样省吃俭用。“他们刚领了薪水，两三天的时间就可以把钱花光。我们哪能这么潇洒？”华人说。另外，当地人过节时，会大量购买礼物及添置新衣。特别是复活节、母亲节、圣诞节等节日，他们都会买礼物送人。华人从中发现了商机。

       可以说，这个市场需要什么，华人就会提供什么。遇上开学日，店外两旁挂满了书包、衣服鞋子，走廊边也摆着地摊，上面堆满了颜色鲜艳的文具、日用品等。有的华人还为客人提供制作名片、设计菜单、打字、婚礼拍照等服务。华人充分地把握了当地的每一个商机。

       虽说早期来的广东客家人已经够勤奋了，但后到的浙江新移民比他们更为拼搏。别人早上8点开门，新移民则清晨6点不到，肯定就会打开百货商店大门开始营业。别人晚上7点关门，他们则坚持到9点才打样。有人笑说，要和华人比勤劳，连下田耕种的牛都会认输。

       “初到的华人，个个都拼命工作。我们华人‘会走路哪有慢吞吞的’？只要大货柜一到，大家都是以赛跑的方式来搬货，22分钟内一定会搬完。”华人颇为自豪地回忆当初他们工作的情况。

法属圭亚那发展缓慢，然而，到来的华人绝大部分都不想再离开。原来，这里有比香港、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加拿大温哥华更吸引人的地方。

       当飞机徐徐降落在卡宴国际机场，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虽然南美的热带阳光火辣辣地照在身上，但透过百叶窗徐徐溜进来的清风，却让人感到有一丝丝凉意。走在身旁的当地黑人，会亲切地给你声声问候：“Bonjour”（你好）、“Ca Va Bien?”（你过得好吗？）面对着那份笑容那份真诚，即使再冷漠的心也会融化。

       遇见当地朋友，一句“我的孩子，来抱一下”，他们就会热情地把人拥进怀里。要不，就来个南美式的亲吻，脸颊碰脸颊，碰了右脸再碰左脸。南美人的热情，总在相见的第一刻，就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

       华人与当地人也因此结下了百多年的情感。

       “许多大城市的华人，赚到了钱，自我优越感就会很强，但是这里的华人不会。华人和我们的感情很好，他们没有架子。早期的客家人还和当地人通婚呢。”佐治曾是圣兰玛莉（Sinnamary）的市长，他说，法属圭亚那华人礼貌至上，即使法语说得不好，但见了人，不管认不认识都会先说一声“Bonjour”。

       在法属圭亚那，不管白天的天气有多热，到了晚上，一定是凉风习习。“这里空气很清新，深深吸上一大口气，你一定会爱上这片土地。”华人说。

       这里民风淳朴，生活简单，节奏也慢，工作起来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当地人做事效率很低，想急也急不来，但好在大家都很遵守秩序。”经营礼品店的老板邹素怀（Nathalie Zou）似乎已经习惯了卡宴的慢步调，她说：“回到深圳，我发现那里的人步伐太快了，好像没有休息时间似的，感觉自己和他们格格不入。”

       虽然很多华人常说自己无法接受当地的生活和饮食习惯，然而，他们在这里生活久了，多多少少也受到一些感染。例如，华人喜欢吃的咸猪尾巴，就是一道典型的当地菜肴，用番茄酱、香料等煮成，口感酸酸的，足以增加食欲。此外，大部分的华人吃饭，也喜欢搭配葡萄酒，因此饭桌上总少不了一支酒精度在7至14度之间的葡萄酒，又称Table Wine（桌上酒）。饭后，华人也会喝杯咖啡或吃点甜点。

香浓醇厚的咖啡让华人体验了生活的悠闲与轻松。“不止咖啡，还有吊床！”华人补充说：“下午躺在吊床上，看着报纸，吹着凉风，真是人生一大乐事啊！”

       在这里，可以花钱的机会不多。法属圭亚那吃的、用的、穿的几乎都从国外进口，物价高而选择少，所以华人一般都到国外去购物。华人说：“很多时候你有钱也未必买到东西。”因此，这里没人在乎潮流这回事。

       他们也说：“这里四季如夏，一件衣服穿个十年，也不会有人笑你。”这里生活随性自在，穿着也不需要太拘束。“穿着短裤凉鞋就可以出门了，舒服又自在！”太过整齐，反而让人觉得受约束。

       看来，华人似乎很享受这里的南美法式生活。

以前，法属圭亚那人只说法语或者当地的土话，现在英语也能用得上了。接受法国教育的华人新生代，一般至少都能说上5种语言——粤语、华语、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或者葡萄牙语、日语等。华人说：“孩子懂多种语言，对他们的前景会好一些。”

       华人重视孩子的学习，也欣赏法国的教育制度。“这里重视通识、外语教育，除了教给学生书本知识外，也努力拓宽孩子的视野，增强他们对世界的认识。”

       尽管法式教育在孩子群中深受欢迎，家长也乐意看到孩子们学习法语和英语，然而，在他们的心里深处，还是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懂中文。因此，近年到中文学校学习的小孩越来越多。

       法属圭亚那的中文学校就设在华侨公所（Association Fa Kiao Kon So）里。学校课程以前受台湾影响较大，后来则由中国大陆机构资助，由北京方面的侨务机构和中国驻苏里南大使馆负责为学校提供教材。学校从早前的两个班级，增加到现在的5个班级，学生估计共有250人。学费是每人150欧元；除了春节与圣诞节放假外，学校每个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上午都要上课。

       “我们的师资充裕，都是有经验的中文老师，他们有的在国内还当过校长。”冼慧贤校长说。她希望孩子学好中文之余，也能明白华人传统道德。“小孩除了功课好，了解中华文化传统也是必要的。”

       中文教育所取得的成绩令华人感到欣慰，但遗憾的是，中文媒体仍是一片空白。

       冼校长曾试过开办华人电台，好不容易向政府电台争取了一个小时中文广播时间，但华人听众甚少，最后只能黯然收场。她也办过中文报纸，但是找不到有热诚或有志投身此行业的工作人员，华人社会对报纸的发行也反应冷淡，所以在维持了一段时间后就关门大吉。

       有华人分析中文媒体失败的原因说：“这地方小，华人居住集中且彼此认识，消息在华人圈里传播得特别快，信息一点都不闭塞，也就很少有人去关注华文媒体了。”另外，这里上网方便，更有华商代理了欧洲版的《星岛日报》、《欧洲时报》等内容更丰富多彩的中文报，当日的报纸当天就能在大街小巷的任何一家超市中买到。

 老华人说，早期的华人少，较容易融入当地社会。“当地人在我们店外喝酒，大家认识了，周末就到俱乐部跳舞狂欢，华人的舞艺高超，连当地人也自叹不如。”已经80多岁的何子良陶醉在年轻时代的美好回忆中。

       渐渐地华人越来越多，大家需要一个固定的活动场所和共同认可的组织，华侨公所也就应运而生了。

       那时候法属圭亚那贫穷落后，华人不过200人。但大家都同心协力，竭尽所能地凑钱修建大楼。年长的华人回忆道：“大家省吃俭用，一些打工仔更是把数个月的工资都拿出来。”为了公所，华人想尽办法筹措资金。当时苏里南的华人发展比这里先进，华人数量也比较多，于是法属圭亚那的华人还专程到帕拉马里博找当地华人帮忙捐款。或许因为苏里南华人几乎都是客家人的缘故，慷慨解囊的也特别多。

* *早期法属圭亚那的华人，大部分都姓何。由于姓何的华人不能与同姓结婚，因此很多人都出嫁到苏里南，或到那里娶亲。*

       经过一番努力，法属圭亚那华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华侨公所大楼，建筑面积达数千平方尺。这座凝聚着无数华人心血的公所，是法属圭亚那华人的共同产业，因此卡宴市的每一家华人店铺都是华侨公所的会员。

       后来，华人越来越多，圣罗兰同乡会、广东同乡会、江浙沪同乡会也相继成立。然而，华侨公所仍是当地华人社会的核心组织。以新移民为主体的江浙沪同乡会，不少会员也加入了华侨公所。华社的团结，让法属圭亚那华人的整体实力和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妇女会的诞生，更为公所锦上添花。它虽是公所的附属组织，但女将们协助公所打理会务，可说是细心周到。隶属于公所的中文学校在她们的管理下，学生的中文水平日渐提高。

       华人尽心尽力地为社团付出，努力在这片土地上编织绚丽美梦的同时，也散播中华文化的种子。

郭胜华的爷爷是第一个来到法属圭亚那的浙江人。郭胜华出生在青田县农村，1976年他来到法属圭亚那，是这里的第八个浙江人。

       那时他早晨在父亲的钟表店工作，晚上就骑着自行车踏遍卡宴的大街小巷，考察这个市场还能有些什么发展。他发现，当时由法国人或犹太人经营的百货超市，货源大多从欧美国家进口，所以价格昂贵。在充分调查后，他动起了经营中国百货公司的念头。

       “那时候这里什么都没有，华人多经营伙食店，百货业一片空白。这是一个崭新的尝试。”他说。1977年，他开始进口中国百货，从代销开始，逐渐过渡到批发贸易，生意越做越兴旺。

       1981年，他在法属圭亚那开设了第一家专营中国商品的“友谊百货商场”。他在店里示范使用高压锅烹煮中国菜，吸引无数当地人困观。“我记得营业第一天，店内就人头汹涌，大家都排队来买货。”这时期中国货大受欢迎，商品往往供不应求。

       物美价廉的中国日用商品迅速占领了整个法属圭亚那的百货市场。“以前卖的电饭锅一个要接近100欧元（约五六百法郎），价钱贵得让人吃不消。现在只要15至20欧元就可以买到。”郭胜华骄傲地说。

       3年后，他陆续把家乡的亲朋好友一批批地带出来，还特别聘请法语老师来给他们上课。“唯有克服语言障碍，才能创造出自己的事业。”他从过来人的经验出发，为后到的人设想周全。

       此外，郭胜华也为他们安排工作，或借钱给他们创业成家。几乎每一个浙江人都曾得到他的帮助。“我们过来的时候，身上没带一分钱，他就是我们的老板。没有他，我们也不会来。”说起郭胜华，新移民都满怀尊敬与感恩之情。

       郭胜华是新移民心中的领袖。不管谁遇上什么问题，一定都会找他。就连婚丧嫁娶，也会请他来主持大局，或作见证。在他们每个人心中，郭胜华犹如他们的大家长。

       “相较早期或者其他国家的移民，法属圭亚那的新移民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有郭胜华，省下了漫长和艰辛的创业路程。”这里的老华人说：“几乎每个新移民都听他的。”

       郭胜华也扮演了桥梁角色，不管是新移民还是老华人，他都吃得开。身为江浙沪同乡会会长兼华侨公所副主席的他，左手牵着新移民，右手领着广东老华人，一同踏着和谐安乐的步伐，一步一脚印地构建法属圭亚那华人的大家庭。

法属圭亚那华人与邻国苏里南华人来往密切，基于大家都是客家人，所以感觉就像亲戚一样。苏里南的广义堂和法属圭亚那华侨公所每年都会以运动会友，两国华人轮流举办运动会，比赛项目只设篮球、乒乓球和足球。只要赢了两种球赛，就是年度冠军，但还需得连续3年蝉联冠军，才可以把奖杯带回去。

       每一年两国华人都会相聚一起，除了打球，还有说不完的话题以及吃不完的饭局。华人在一起会相互取经，例如广义堂中文学校第一次办夏令营，就曾虚心地请教华侨公所的负责人。每一年，广义堂中文学校也会替法属圭亚那中文学校向中国驻苏里南大使馆申请中文教材。它们的关系就像兄弟一样亲密。

       2008年，轮到法属圭亚那主办运动会，苏里南五六十名华人浩浩荡荡前往赛场。队伍中有老有少，有运动员，也有专程赶来加油打气的家长。两队参赛的几乎都是“泥鸭“——客家人把土生土长的新生代喻为”泥鸭“，即不会游泳的鸭子，意指他们对中华文化已很陌生。

       运动会作为两国华人加强沟通的桥梁，扩大了华人特别是新移民和新生代的交际圈子，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结识不同的人，同时把苏里南与法属圭亚那的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片土地或许并不富裕，甚至有点破落，然而对于许多华人来说，这里却富有人情味。

       迎着卡宴的海风，伴着热带雨林的景色，法属圭亚那华人生活悠闲而安逸。他们无论在事业上还是生活上，都多少融入了些法国特色。华人笑言，喝红酒、咖啡，已经成为日常习惯。

       法属圭亚那华人辛勤工作，所得到的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多。初来乍到的华人，或许还有想走的念头，但是，留下来的老华人，早已把这里当成家了。

苏里南旧称荷属圭亚那，是荷兰王国在南美洲的殖民遗迹，1954年成为荷兰海外自治省，1975年独立。

       有“森林之国”美称的苏里南，国土面积的95%为森林所覆盖，空气异常清新。这是个美丽的国度，境内河流纵横，土壤肥沃，只是懂得弯腰捡枝耕耘沃土的人不多。因为历史渊源，这里还有“小联合国”之称，黄、白、黑、棕，各色皮肤应有尽有。漫步在首都帕拉马里博街头，映入眼帘的是欧洲式、印度式、非洲式等各种风格的建筑，宛如置身于国际建筑博览会。

       这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因各种机缘巧合留了下来，没有疙瘩，没有仇恨，大家和乐融融地相处。多年来，这些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族群通婚率极高。混血后裔代代相传，使苏里南的多种族色彩更显浓厚。

       苏里南人一般都能说上几种语言，因此这里也被公认为语言天堂。

       近年来，越来越多华人到苏里南。他们说，这片土地得天独厚，易于谋生，连种菜都可以发达，于是，后期抵步的华人绝大部分都留了下来。

早期的苏里南华人大多是来自中国广东省的惠阳、东莞、宝安一带的客家人。那时期，客家话是华人较主要的沟通语言。

       1853年，第一批抵达苏里南的华人共有14人。他们都来自印尼，以契约劳工的身份在苏里南的农庄、甘蔗园工作，其中3人在合约期间去世。契约期满之后，共有8人返回爪哇，其余3人则自愿留下，被聘为下一批500多名华工的翻译员。

       从1858年到1874年，有2500多名来自印尼、澳门、香港等地的契约劳工抵达苏里南。华人踏海而来，乘风破浪数个月，经好望角横渡大西洋，吃尽各种苦头才抵达苏里南。翻开老华人悲惨的回忆录：“那时船上完全没有任何医药设备，旅途上一旦有人染病死了，就像死猪一样被残忍地丢进海中，葬身鱼腹，华人的性命犹如蟑螂一般低贱。1864年，一艘载了475名华人的船只上，就有197人因死于疾病而被丢进大海。”

       历经九死一生，这些华人的双脚终于踏上了苏里南的土地，但是创巨痛深的经历，让他们感觉双脚犹如踩在甲板上，四面仍是汹涌的浪涛。

       对于在海上飘荡的际遇，老华人始终不堪回首。“那是切肤之痛，现代人是不会明白的。现在搭乘飞机从东南亚一带来这里，只需要27个小时。以前坐船，至少要3个月才能到达苏里南。”年事已高的苏里南老华人这么说。

       苏里南地处热带，登革热（热带传染病）流行，华工生活条件极度恶劣，雇主苛虐华工如同对待奴隶一般。华人好不容易才抵达苏里南，又因为被欺压虐待及水土不服等问题，而丧失了性命。苏里南契约华工的情形甚至引起欧美舆论的谴责。之后，中国政府也颁布禁令，不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境内招募华工，只允许华人以移民的身份自由出入。此后，再也没有听说过华人以契约华工的身份进入苏里南。

       华工对被欺压的经历心有余悸，所以契约期满后全都不愿意续约。因此，大家渐渐地从种植园里走出来，有些华人选择了回国，有些则决定留下来。

       “那时候的生活真的很艰苦，华人都只能够靠廉价的劳力糊口，衣锦还乡这回事，连做梦都不敢想。”老华侨这么说。

       留下的华人有了积蓄，就开始经营起小本生意来。苏里南的老华侨基本上都是靠伙食店起家的，客家人称之为“咸头店”。伙食店售卖咸牛肉、火柴及煤油等用品，赚取蝇头小利。

       一般由夫妻俩所经营的伙食店，就只有两个人打理整间店铺的大小事务，从早忙到晚，生活的担子把他们压得透不过气。

       苏里南华人辛苦耕耘，颇见成效，由华人所经营的店铺，不久之后已遍布城郊的每一个角落。

有了扎实的经济基础之后，华人开始将亲朋戚友们一个个接过来。

       苏里南流传着一句话：“来了一个华人，就多了一家店。”华人认为，只有做生意，才能够有出头天，因此，即使当初只是来打工的华人，两三年内也必定会自立门户，自己开店当老板。

       苏里南这片土地得天独厚，风调雨顺，很少发生天然灾害。随便丢下一颗种子，都能在这片绿油油的沃土上长出丰硕的蔬菜水果。“只要够勤俭，做生意就一定能赚到钱。虽然称不上大富大贵，但也肯定不愁吃穿。”老华侨说，在这里的竞争并不激烈，华人做生意，极少会蒙受亏损。

       大家都说：“这里赚钱容易，治安也很好。”华人的前景，必定是无限美好的。

       就这样，华人的经济发展日益蓬勃。街上的华人店铺逐渐增多，有金店、洋货店、钟表店、摄影店、鞋店等等。旧式的伙食店则被较具规模的百货店、超级市场所取代。

       中餐馆赚钱快速，利润又高，所以华人都乐意经营，因此也越开越多，生意极好。

 苏里南现有4万多名华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然而，他们在经济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近十年是苏里南华人的全盛时期，浙江和福建人风闻这里赚钱容易，也纷至沓来。廉价的百货店、超市和服装精品店开了一家又一家，大街小巷的中文招牌随处可见，华人商店无处不在，约占了全国商店总数的70%以上。

       最热闹的帕拉马里博是大部分华人的聚集地，而少数华人则散居在郊区，如日计里（Nickerie）、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等地。

       客家人来得最早，他们多半生活稳定，事业有成。他们的行业包括：金饰、五金、批发、汽车维修、汽车零件、建筑、餐饮等。

       华人人数多了，华人社会也日趋成熟。在这里，华人社团林立；中文学校建在首都市中心，各种设施比公立学校还要好；中文报、中文电视台都应运而生。

 华人多从商，生意越做越大，成功的因素很多，通过“月会”筹资，就是其中之一。

       当地华人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几个好朋友想要做生意，大家就互筹资金，把一定数额的钱集合在一起，每个月每人轮流领一次，以备急用。”这就是“月会”的起源。它像小型投资，也像分期供房子一样，如果每人每月要交1000元，那十个人就有一万元，十个月内，大家轮流领钱。“不等钱用的，最后会得到比较多的利息。”因此，华人不必向银行贷款，不借高利贷，个个可当老板。

       “月会”最讲求信用。由于曾经有人领到钱后就远走高飞。为杜绝后患，因此华团后来索性当起号召人，通过“月会”制度解决华人财政问题。广义堂是苏里南最有名望的华人团体之一，它每次从“月会”中抽取会首金，作为堂内重要的经济来源。

       “月会”虽是华人民间的一种筹措资金方式，但所有的缴钱手续、审核一点都不马虎。为了预防有人拿钱潜逃，会员至少要有5个值得信赖的担保人。“万一有人拿了钱逃走，至少还有担保人要负责，其他人也不至于亏了血汗钱，这对大家都公平。”

       苏里南华人的“月会”办得非常成功，有些华人甚至一个月供好几份“月会”作为短暂投资。华人拿这笔钱去创业，或解决家庭经济危机，也有人用来扩展生意，或者让小孩到国外留学等。华人不愁资金运转，因此当上老板的特别多，单单在帕拉马里博就有5000多家华人店铺。

由于苏里南生活日用品十分匮乏，许多华人新移民便从中国浙江义乌等地办货。于是，大量“中国制造”的廉价货品，如小型家电、服装、化妆品等，迅速充斥了苏里南的百货市场。

       这些货柜一到苏里南，华人就在当地报纸或中文报刊上登广告，招聘当地的经销人员。华人说，早前市场走俏时，成本20万人民币的货柜，估计可净赚50万人民币左右。

       华人卖的货品价廉物美，就连当地擅长经营生意的印度人都不是华人的对手。原先由印度人垄断的小超市，渐渐被华人取代。华人超市的数量成倍增加，十家有九家是华人经营。虽然也有一些印度人直接到中国批货，但华人懂门路，所以卖的东西还是最便宜。

    天还未亮，华人就起床开门营业；下午4点半大家关门下班，华人店铺都坚持晚上十点才打烊，即使是公共假日、农历新年，他们店铺也照开不误。华人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让印度人自叹不如。

       华人商家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但他们脸上却都挂着亲切的笑容。“我们属良性竞争，不会随意调低货品价格，也不刻意薄利多销，因为大家心里明白，那是个恶性循环。”浙江同乡会会长郑国庆说。苏里南华人以和为贵，绝不为了一己之利而搞砸整个市场。

       小小的百货店铺，应有尽有，华人什么都卖，包括衣服、鞋子、参考书、纪念品、化妆品、电器、饮料、零食、柴米油盐醋等。店里内堆满了各样货物，而值钱的小玩意就摆在透明的橱柜里。天花板上还有勾子，挂满各种款式的包包、帽子和玩具等，琳琅满目。

 当地人喜欢购物。苏里南人有个习惯，就是从来不存钱。“他们好像和钱有仇，手上一有钱就迫不及待地花掉，特别是在圣诞节与元旦，他们都喜欢到百货店来买礼物。因此年底一到，华人的生意总是特别好。”

       华人赚了钱，大部分都会买地皮盖房子。刚开始，大部分华人都租房子来做生意，一楼经商，二楼住人。一些华人会扩展业务，甚至干脆把百货店扩充成贸易公司，从零售转到批发业。

       在首都郊区的飞龙摩托综合商城（Filong Trading Center N.V.）就是最好的例子。这里占地6000平方公尺，是苏里南最大的华人店铺。原本只卖摩托车的老板郑国庆，在赚钱后便把店面扩充，卖起脚踏车、婴儿手推车、电器、吊灯雕饰等，零售兼批发。飞龙生意不错，曾经在一年内卖掉6000台摩托车，老板的秘诀就是增加售后服务项目。苏里南有60多家摩托车行，只有飞龙提供售后服务。

老板郑国庆在商城一侧盖了自己的房子，与妻小一同居住。他说：“这里地方大，人口不多，只要一切符合政府规定，华人可自由地在自家土地上盖房子做生意。”

       近年来，苏里南基础建设热火朝天，房子、商场与大楼越建越多。华人看准房地产热，从中国运来大量建筑材料。许多原本开中餐馆、金饰店的华人也纷纷转行经营五金店，有些则经营贸易公司，专门批发建筑材料，或者开设建筑公司，直接承包建筑工程。

       华人盖房子讲求效率，收费便宜。不管日晒雨淋，工作有多辛苦，从不抱怨。因此，各大公司和政府部门都喜欢找华人承包工程，让华人替他们盖房子和维修大厦。

       苏里南最大的良友商场（Maretraite Mall）就是华人建的。它有两层楼，算是城中数一数二的大型购物商场，而规模较大的中餐馆龙凤酒楼就设在二楼。龙凤酒楼可容纳2000多人，华人一般都会选择在此宴客聚餐。

       首都唯一的汉堡王快餐店（Burger King）也是由华人承建。从建设到开张，不用40天就搞定了。“这里的娱乐活动其实不多，只能寄情于工作，快速地把工作做完，才能有更多的工作，多赚一点钱。“一名华人边喝冰汽水边说。

       苏里南中餐馆林立，每条大街几乎都有吃饭的地方。随着时代的变迁，中餐馆的菜色也变得多样化。从单一的广东菜、客家菜，慢慢增加了四川菜、北京菜、上海菜等，华人的选择渐渐丰富。

       中餐馆宽敞又干净，各有特色，菜色口味不一，老板的经营手法也大不相同。有的华人会把源自印尼的马来餐编进食谱里，华人炒马来菜，口感特别，当地人也爱吃。早在荷兰殖民时期，一些华人与印尼人从爪哇远渡而来，他们的食物与文化也成为苏里南的特色之一。

       当地茶楼每到星期天的清晨，便人满之患。在茶楼，华人喝茶吃点心，顺便见见朋友，聊聊天、谈谈新闻。话题聊开了，屁股就粘在板凳上起不来。直至上午11点，茶楼一直座无虚席，人声鼎沸。

 很久以前，有人在苏里南山区发现了金矿。华人听说在这里可以很轻易地找到大大的天然金块，于是千里迢迢赶来，想要分一杯羹。

       事实上，上山淘金是一项非常艰苦而危险的工作。如果不慎被山中巨大的毒蚊叮咬，很容易丧命。一般上，当地人都是固定一两个月在山里工作，然后再把黄金拿到市中心去卖。华人没有挖金经验，一些人遇上危险而丢了性命。后来，华人不再挖金，开始经营起金饰生意，有些则拜师学艺，学习分辨金饰真伪，研炼金饰等。

       苏里南华人的金饰店多集中在首都市中心的马登大街（Maagdenstraat），华人把这条街称作“唐人街“。整条街上几乎都是华人店铺，包括鞋店、服装店、家具店、贸易公司等，但还是以金饰店居多。

       这个国家产黄金，人民对金饰也情有独钟。“当地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习惯把金饰往身上挂，他们一天不穿金戴银，就全身不自在似的。”金饰店老板钟晓舒还有过一大早就被地人电话吵醒，催他开门营业的经历。

       华人说：“苏里南的天然金块非常独特，自然形成各种抽象造型，只需稍微加工就可以做成项坠、耳环等，当地人叫PP金。周边的委内瑞拉人、圭亚那人会定期到苏里南收购，然后作为天然艺术品，卖到美国和欧洲去。”每逢旅游旺季，华人金饰店特别忙。由于苏里南的金饰便宜，所以很多游客或者回家探亲的华人都会买金首饰送人。

       苏里南金饰店不赶时髦，一种款式过了十几年仍然流行。当地人对旧款的手链、戒指情有独钟，那些刻着传统图案的金戒指售卖了40多年，至今还有人问津。如今，华人金饰店追求时尚设计的同时，也保留了传统设计，以迎合不同顾客的需求。

       苏里南一度抢劫猖獗，华人金饰店几乎都有警卫坐镇。打开大门，一整排透明的橱窗陈列着各种款式的金饰。展示柜外隔着栅栏，栅栏与展示柜之间有十公分的空隙，方便客人看首饰，作交易。为了店面美观，一些华人也把监狱式的栅栏改成大片玻璃，用玻璃隔开客人与店家的距离。凡此种种，华人不过希望把意外的发生几率减到最低。

     在苏里南，客家人几乎占了华人总数的一半。俗话说：“客家好客，好客之家”，苏里南华人确实热情好客，又富有人情味。

       苏里南华人都是通过亲戚关系到来的。华人见华人，分外亲热，再听到熟悉的客家话，心里就认定对方是自家人。华人与人相遇，必定会主动问好，即使在路上看见陌生长辈，也会用客家话问安：“好没？”客家人注重礼仪，筵席上看见长辈，也一定主动过去打招呼。

       华人如此亲切又热情，一声招呼，一句问候，一个点头微笑，双手紧握，不管认识与否，一见面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轻易地化解了人与人之间初相识的拘束。在这里，想到华人家串门子，都不需要预约，主人家随时打开大门欢迎，还会用最好的茶水招待客人。

       “我们客家人见人第一句话，就是问别人吃饱了没。没吃饱，就带你去喝茶吃饭，吃饭比见皇帝还要重要。”《洵南日报》社长兼苏里南中文电视台副台长陈舜军笑说。

       中华会馆会长张秋源指出，大家初来乍到，寄人篱下，如果不团结不相爱，就很容易遭欺负。他觉得，苏里南的华人特别团结。“一个华人有事，大家都会挺身帮忙。有时候出国旅行，我也会因为挂念着这里的人情味而提早回来。”

       这里地方小，华人彼此认识，下班或下课后，都会相约到白莲花俱乐部踢足球、打篮球或打兵乓球，流一身汗，顺便舒展筋骨。它是早期华人社团广义堂隶属的机构，也是华人平日的好去处。

       周末或假日，许多华人也爱在白莲花俱乐部打发时间。年轻男女活跃在各个竞技场上，小朋友们则在游泳池里嬉戏，或在娱乐场上荡秋千、玩捉迷藏。妈妈们坐在休息椅上，一边看顾自家孩子，一边与朋友畅叙家常；老人家则与朋友较量棋艺。

       在苏里南赌博是合法的，赌场开了一家又一家。小小的市中心，就有超过十家赌场。赌场提供啤酒等免费饮料，有人说，就算不赌钱，来赌场也可以喝到饱。

       农历新年，赌场送餐券、礼券，吸引更多华人前来捧场。“华人是赌场的财神爷，新年一到，赌场免费招待吃喝，里里外外都是人。”华人大多图个热闹，至今未有人因赌博而家破人亡。

       华人其他的休闲活动，还包括打猎、钓鱼、唱卡拉OK等。

    苏里南有数十个华人社团，其中广义堂、中华会馆以及华侨商会的历史最悠久。

       华人社团凝聚了华人力量，解决华人问题，政府也透过侨团传上情下达。若华人与当地人发生纠纷，或者华人发生了重大事件，政府一般都会找侨领协商解决。

       苏里南华人社团的活动，常吸引整个华社参与。广义堂堂长池玉基说：“新一辈的侨领思想新颖，办起事情来也比较灵活有系统，他们办的活动庆典，往往吸引了大批华人参与，活跃了整个华社气氛。”每年的中秋节活动就是一例，参加人数就超过3000人。

       华人一有事情，就会找社团帮忙，特别是广义堂。广义堂俨如华人大家庭的家长，为华人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由于成立较早，人面广，办起事情也更方便。新移民受伤住院，或出入法院、移民厅、警局，都找广义堂的老华侨帮忙翻译和疏通。

华人说，在苏里南，人际关系是最重要的一环。“在这个国家生活一定要认识人。比方说，华人生病住院，如果认识当地医生或护士，就能得到妥善照料，否则就像弃婴一样，搁在病房外，好几天没人理。这是苏里南的‘文化’，大家都靠人际关系办事，我们也只能有样学样。”华人无奈地说。

       隶属广义堂的苏里南中文学校，是当地唯一的中文学校。它成立于1986年，拥有自己的校舍，占地超过2000平方公尺。学校里有图书馆、室内篮球场、舞蹈室和教师宿舍，基本设施比公立学校还要完善。

       华人说：“中文学校的教室有冷气，窗口、铁架都完好无缺。但公立学校连电风扇也没有，窗口也是铁丝网构成，太阳晒起来的话，会要人命。”中文学校的主要开支由广义堂负责，其他的华人团体也会赞助。

初创时，这里只有两个班级，50个学生。“20年后，学生已有280人，老师8人。这里提供完整的6年制中文教育，学生每星期上课两次，每次上两堂课。”校长林少波说。

       苏里南华人有个共识，即把小孩送到中文学校。每个周末，家长会自动送孩子上学，除学习中文之外，也让他们参加学校活动。

       广义堂的《洵南日报》是华人自创的第一份报纸，从采访、编辑、排版到印刷，都由华人一手包办，每天印刷1100份。《中华日报》则是由中华会馆出版，对华社的影响也大。

       中文报是华人的精神粮食，特别是对不懂荷兰文的华人来说，它似一个会说话的朋友，将每日的新闻娓娓道来。

《洵南日报》是苏里南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黑白印刷，每日发行1100份。

   2008年2月，苏里南中文电视台正式开播。“要在这个落后的国家创建自己的电视台，预算很高，估计需要400万美元。光是安装一个电视发射塔，就要150万美元的安装费。广义堂投资了70万美元，每个月还要支付员工薪水，其余的数额只能向银行贷款了。”台长张志和说。

       免收费的中文电视台是华人的骄傲，它代表着华人的呼声，也显示华人在这片土地上的身份和地位。社团若有任何节目或讯息公告，它就是最好的广告栏，只要在苏里南境内都能收看得到。

       “电视台会播放很多港台的连续剧，我们试着和香港的无线电视台联络，希望可以得到他们的播放版权。然而，我们打了无数次电话，传了无数次电邮，对方都不理我们。”华人努力和“外界”联系，却不得要领。

       然而，他们并不因此打退堂鼓，反而积极通过多种管道，尽量满足华人观众的需求。“2008年中国奥运开幕典礼的DVD一推出，我们就迫不及待在电视台上播放，让全苏里南的人都可以收看。”一名电视台工作人员兴奋地说。

 这里很难找到大众传播的人才。“这个国家小，专业人才不易找。翻开华人的履历表，都和大众传播没有关系，而之前的主播也毫无上镜经验。全靠一位来自帕拉马里博的老师，以本身在中国当过主播的经验，给予一些技术指导。”台长张志和淡然地说，电视台也请了两个新人负责摄影，广义堂出资送他们到国营电视台学习操作录制器材。

       电视台的目标虽然很远大，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做起事情来还需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目前，他们与中文报纸合作，自行录制每天傍晚6点和晚间9点的新闻。晚间9点新闻一般会先预录，后再播放，以减低播报错误的几率。

       平时，中文电视台会播放一些英语或荷语卡通片，让小朋友观看。为了迎合不同观众的口味，电视台也会播放粤语与华语的港台连续剧和综艺节目。晚上没人值班，就直接转播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

  苏里南华人勤奋工作，店铺越开越多、越开越大，在商场上游刃有余。但若只有经济上的成功，而无法在政治上立足，华人的诸多权益也就得不到保障，更不可能融入当地社会。因此，华人也开始参政。

       杨进华是苏里南第四代华人，也是目前唯一的纯华人血统部长。

       杨进华的曾祖父17岁来到苏里南。“为了生活，我爷爷什么行业都试做过。”杨家是客家人，特别注重下一代的教育。“那时候，爷爷赚到了钱，就把孩子送到国外念书。我父亲就曾在美国纽约念新闻系。”

       17岁那年，杨进华到加拿大多伦多念书。他在那里生活了11年，之后回到苏里南接管父亲的生意，曾从事过汽车销售、报业、旅游、贸易等方面的工作。

       后来，他弃商从政，阔步踏入政坛，为的就是希望苏里南华社更加壮大。“毕竟我在这里长大，已经和这片土地融为一体，这里就是我的家。”

       2002至2004年间，他担任苏里南贸易部长。“在政府部门打工，薪资不高，华人忙于生意，很多人都不愿意参政。我要代表华人发出声音。”他把印尼排华事件当作借镜，认为华人不能只在经济上独当一面，还要懂得参与政治。“华人应该了解当地人的文化、习俗与经济背景，知彼知己，才能百战百胜。”

       他是个很好的“外交官”，精通多国语言，如荷语、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也懂一点巴西土语，就连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也没他厉害，唯独中文无法掌握。他说：“没办法，我爸爸连方块字都看不懂，全家说英语。”身为一个不会说中文的华人，他深觉惋惜，所以特地到台湾辅仁大学报读两个月的中文课程，但他的中文程度还是不足以用来沟通。

       1980年代，苏里南政局动荡，大批华人往外迁移，让当地经济受到重创。为了挽回华人对苏里南的信心，杨进华曾积极推动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当上部长后，他甚至到访中国与当地官员交流。

       “要振兴苏里南的经济，就必须招揽更多生意人过来投资，而中国人就是最佳选择。”令他欣慰的是，经他一宣传，短短几年间，苏里南就来了几千名华人。

       2005年，杨进华转任环境规划与土地森林政策部长。他在政治上站稳阵脚，华人也受益良多。“苏里南是个多元种族国家，主要由印度人、黑人和印尼人执政，在福利争取上，他们都会帮自己人。华人若不帮华人，就不会受到尊重，也就没人理你了。”对于华人的事，他往往多留一分心。

       杨进华与华人社团关系良好。很多华人虽然对政治不热衷，却在背后默默支持他。华人只占总人口的10%，但一经凝聚就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杨进华扮演桥梁的角色，一方面把华人的声音反映给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意见转达予华人社团，协调着彼此的关系。

       因此，华人参政，不管对苏里南，还是对华人群体来说，是双赢的。

华人笑看人生，在乎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他们之间的和谐相处。虽然苏里南华人只有区区四万人，但他们却异常活跃，生活充实忙碌，每天仿佛有忙不完的事情，包括工作、家庭、社团等。他们倾力传承文化、推广教育，事业有成的新生代，都尽力回馈社会。

       苏里南华人努力耕耘，享受人生，过着悠闲安逸的生活。华人要的不多，天堂好像就是这个样子。

 巴西地广人稀，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这片土地原是印第安人的家园，直到16世纪被葡萄牙航海家发现，才掀开了它被殖民统治的序幕。葡萄牙国王后来开放门户，允许外国人移民，为巴西日后成为世界移民大国奠下了基础。如今，这个南美洲人口最多、最富有的国家，集合了200多个民族，流通100多种语言，但彼此之间相处融洽。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经济年均增长10.1%，创造了“巴西奇迹”，全国欣欣向荣。此后20年间，因受区域和内部因素影响，经济波动不断，近年才逐步恢复元气。如今，巴西咖啡、足球和桑巴舞闻名于世，不过，严重的贫富悬殊现也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治安状况令人担忧。

       自200年前第一批带着茶苗来试种茶树的华工开始，巴西华人就一直与这个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华人移民故事大抵滥觞于1810年。

       当时，统治巴西的葡萄牙帝国试图拓展种植茶业，于是派人到中国的广东及澳门一带招募了400名华工前来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简称里约）。茶叶试种的计划虽然成功，但是很多华工却因过度操劳，及无法适应当地炎热的气候而客死异乡。

       后来，又来了两批为数600人的契约华工，负责到农场种植茶叶、甘蔗和咖啡。他们每日工作9小时，月薪仅得4至5美元，每周可领取十磅米或面粉，3磅半牛肉、咸鱼或猪肉，一磅糖以及3盎司茶，此外，每年还有棉布上衣两件、长裤两条、毛毯一条；同时，雇主也必须负责他们的医药费。总体而言，巴西华工的待遇比其他国家的契约华工稍好。

       20世纪初，巴西的种植园发展日益蓬勃，劳工短缺的问题却依然严重，于是便计划从中国引入100万名华工。当时，中国政府并不鼓励人民移居海外，因而拒绝了这项建议。后来，巴西得到日本政府的积极配合，输入了20万日本劳工，当年的日本劳工，今天已发展为100多万人的巴西日裔群体。

       一战结束后，一部分欧洲华人离开了荷兰、法国等地，辗转抵达巴西，导致当地华人的人数增加到1000人。他们大多数经营酒吧、洗衣店、餐馆、有的则当裁缝、或贩卖手提包和小礼品等。当时，洗衣业也几乎由华人垄断，在东北部的许多城市，人们甚至称洗衣店为“中国”。

* *在里约热内卢蒂如卡国家公园内有一座具有中国建筑风格的凉亭，据说是葡王若奥六世（D. João VI）时期所建，以表彰华人茶农的贡献。*

       华人大批地移居巴西是二战以后的事。自1950年代开始，广东人便陆续抵达巴西。接着，香港的浙江籍企业家和退伍军人，以及台湾的企业家也相继入境。他们的到来，正赶上了巴西1960及70年代的经济巅峰期。港台企业家带来雄厚的资金及先进的管理技术，给巴西的经济发展注入了一支强心针。

       70年代末，印度支那发生了排华事件，迫使“船民”投奔怒海，部分印支难民为巴西政府收容，他们大多加入行商行列，靠售卖角仔或提包为生，过着清苦的生活。而手上有点资金的港台新移民则经营加油站、停车场和洗车中心，财力雄厚的则往农产品出入口、农牧、食品加工、纺织或化工等领域发展。例如：华人企业家林训明旗下的公司就一度高踞巴西黄豆出口之首，使他赢得了“黄豆大王”的称号。

       从1980年代，大批中国大陆与其他地区移民不断涌进，使华人人口不断膨胀。到了1998年，巴西已有10万名华人；近年来已有超过20万人在这里生活。

   走过近200年漫长的移民岁月，华人如今在巴西形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

       现在的巴西华人约有25万人，主要来自广东、台湾、福建、浙江等地。80%居住在巴西最大的城市圣保罗（Sn Palo），其他则散居在里约热内卢、首都巴西利亚以及福斯市（Foz）等地。

       华人之中，有的是白手起家的商业巨子，有的是德高望重的专业人士，也有贩卖走私冒牌货的市井小民。他们吃中餐、看中文报、看中文频道、到佛堂上香。新生代则在专业领域工作，完全融入巴西社会。尽管如此，传统佳节气氛比其他南美国家浓厚的巴西华社，中文教育却不够普及。一个家庭里通用葡语、华语和方言是常见的事。

       人们称巴西是天堂和地狱的结合体。这里没有种族歧视，唯一让大家人心惶惶的是治安问题。这里可以赚大钱，也可以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这个华人视为冒险天堂的国度，让人欲走还留。斟酌间，华人已成为巴西多元社会的一分子。

圣保罗是个名副其实的花花世界。街道纵横交错，形形色色的人群擦肩而过。华人在这里经营百货店、进出口贸易公司、超级市场、中餐馆，也有人在制造业、建筑业、工矿业等领域寻找机会。他们累积着经验和资金，蓄势待发。当地华人季友益的“季家电话”（Teleji）和尹霄敏的“尹氏箱包”（Yin's），已是巴西家喻户晓的品牌。

       华人小贩、企业家、专业人士，在巴西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力量。

       巴西是发展中国家，但当地轻工业产品无法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很多民生用品都得依靠进口，其中又以价廉物美的中国货独占鳌头。角仔店、提包业和跑单帮已经被时代淘汰，小资本的百货业却迅速崛起。

       这些以批发零售杂货为主的华人小店和地摊，集中在圣保罗25街、巴拉伊斯区（Prais）和里约热内卢沙拉区。多年来，不少新移民以25街为起点，开始在巴西创业。岁月悠悠，这条拥有100多年历史的老街，见证了成功的华人发迹，也目睹了落魄的华人三餐不继。

       春去秋来，这些生活故事还在不断延续着。

       25街一带的廉价公寓住着很多华人，每天清晨6点，天刚刚破晓，他们已推着载满货物的小车子来摆地摊。他们多数是浙江青田、温州及福建的新移民。他们曾经听人天花乱坠地叙述这里遍地黄金，于是交上至少3000美金，向蛇头换取一个发财的机会。

       他们或是夫妻俩，或是单枪匹马，向早来的同乡批一些小百货，比如墨镜、文具、发夹、帽子、手提袋、围巾、手帕，什么都好，反正什么都卖得出去。商贩在晨曦中摆摊，转眼就把冷清的街道挤得密密麻麻。后来的人没有位子，必须向“前辈”租摊位。据说，现在一个小摊位已经炒到每年一万雷亚尔以上，令人咋舌。

       当城市慢慢苏醒，路上行人来往匆匆，和着小贩的吆喝声、顾客的讨价还价声，使25街进发出勃勃生机。华人商贩在充满朝气的喧哗中，利落地摆货、收钱。他们只有区区两个小时，因为得赶在警察上班以前收档。要不然随便一个理由——贩卖走私货、无执照营业、没有居留身份，都会让他们惹上很大的麻烦。

       收档后，他们不是去批货，就是提着黑胶袋，搭上公车到郊外沿街叫卖。存到钱，就和别人合伙在25街的百货商场里租店做生意。商店抵押金就一万，每月还要交几千租金。开销这么大，华人商贩根本不敢休假，每天8点准时开店，傍晚6点打烊。不过，也有人选择继续摆地摊。摆地摊不用执照，不用交税，可以省下好多钱。

       新移民见缝插针地摆地摊、开店铺，25街逐渐饱和后，大家又往附近的巴拉伊斯区涌去。现在，25街和巴拉伊斯的华人店铺、摊位加起来有3000间，占了这两个地区商店总数的四分之一。

       巴西人喜欢穿戴名牌，但很多人买不起名牌货。25街华人从中国进口的膺品销路特别好，但也引来警察和关税局人员，三天两头就来取缔。一有风吹草动，地摊小贩马上落荒而逃；店主也拉下铁闸挡灾。迟一步的人一见到警察就先给钱疏通，谈不拢货物统统充公，或连人带货一起抓。再把货要回来，最少三千，多者几万，数目不小。

       每天诚惶诚恐，华人埋怨“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却没有要马上离开的意思。赚不到钱自然不能回去，赚到钱更加不可能一走了之。每天在这座城市隙缝中挣扎求存，既不能休息，也不容放弃。他们欠了债，没有身份，教育程度又不高，继续打拼是唯一的出路。

       看着早来的同乡不但赚到房子车子，还赚到让孩子出国留学的费用，他们只好咬紧牙关，继续撑下去。

  巴西宜人的气候和景色，令许多华人流连忘返。圣保罗处于丘陵地带，地势较高，平常天气凉爽，一热就下雨；里约则是背山面海的城市，有着全世界最美丽的海滩。虽然这两座大城市日常消费高，但庆幸巴西物产丰富，蔬菜水果和牛肉特别便宜。蔬果市场每到中午12点就大平卖，一堆新鲜青菜只要一元。据说，早期穷困华人都是吃这些菜挨过来的。

       当地人总觉得上帝一定是巴西人，其实不无道理，他们说：“从古至今，巴西只有人战死、病死，从没听说过有人饿死。”

       丰衣足食的社会，养出了乐天知命的子民。巴西人赚多少花多少，凡是随性而为，不会未雨绸缪。华人雇主总要好一段时间才能明白，当地员工不愿加班，原来只为了去海滩晒太阳或游泳。

       相对地，25街华人新移民的生活显得单调。工作十几个小时后回到租来的小房间，胡乱煮些东西吃，七八点就累极睡着了。很多人一天只睡四五小时，不过年也不过节。对自己最大的奖励，就是到中餐馆点一桌吃不完的菜，仿佛这样可以弥补一切物质和精神上的匮乏。

       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力气去认识巴西。

       反观1970、80年代的华人移民，他们多数事业有成，消遣活动丰富，包括参加华团开办的合唱团、拉丁舞培训班、开车去体验各个小镇风情、到私人农场休闲等等。圣保罗还有华人的高尔夫球协会、网球协会、保龄球协会以及篮球协会。第二代华人经常和巴西或日本人后代混在一起，多少沾到当地人喜欢享乐的个性，工作和学习之余，最爱泡酒吧和舞厅。

       巴西人性格开放，女人穿着暴露，好象永远嫌布料太多似的，华人常说：“在巴西卖布肯定亏钱。”这当然只是玩笑。巴西人异常热情却是事实。

       老华侨说：“如果向当地人问路，对方不理你，他肯定是个哑巴。”这个乐于助人的族群，帮助很多华人适应新环境。住下来，华人又发现他们容易相处，脾气温和，不记仇。今天和人闹意见，明天见面又可以勾肩搭背。你还在为昨天的事耿耿于怀，他们早忘了这回事。有人移居巴西20多年，竟没看过当地人吵架。当地人很有礼貌，华人入乡随俗，也爱把“请”和“谢谢”挂在嘴边。

       巴西景色优美，资源丰富，人民热情，本来是个近乎完美的定居地。奈何随着贫富悬殊日益增大，当地治安每况愈下，谋杀案发生率高居世界第四，又以圣保罗和里约最恶名远扬。一位里约华人说：“我认识的朋友都被打劫过。”还有华人调侃：“里约好山好水，好危险。”

       在巴西，买枪就像到市场买根葱那么方便，许多劫匪都是持枪抢劫。当地华人不管贫富，都尽量低调行事。他们住在保安森严的公寓，穿最不起眼的衣服出门，经常更换上下班路线。此外，买车得买路上出现最频密的那款，豪华房车则安装防弹玻璃。万一遇上劫匪，要保持镇定，只要不反抗，最多伤财，不会丢命。虽然当地夜生活精彩，很多华人却宁愿躲在家看电视节目、玩扑克牌、打麻将。

 套一句巴西华人的话：“巴西不打仗，只打球，如果没有治安问题，就是人间天堂”。小部分人因治安不靖而萌生去意，开始往中国投资，送孩子回去念书，为日后回归故里铺路。

       巴西人吃中餐、学汉语，但在他们心目中，真正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是武术。巴西人因李小龙电影，开始向往神秘的功夫世界。当中国武术专家移居巴西收徒授艺后，学武之风马上席卷巴西。

       今天，巴西人已了解到武术是一门结合健康、自卫和管理的艺术。中国武术成了巴西的全民运动。鹰爪功夫总会的李荣基师傅透露：“1970年代初巴西只有4名中国武术师傅。今天加上巴西人，武术师傅可能有几十万人。”拥有80多间武馆的李师傅，徒弟已传到第四代，学生数以万计，当中不乏警员、军人和专业人士，深受当地人敬重。

       除了中华武术之外，中医也风靡巴西。

       基于利益冲突关系，中医师的地位和权利一直受当地西医质疑。不管怎样，在巴西风行了30年的中医因就诊简便、收费廉宜，一直深获大众喜爱。目前华人中医师有4000人，巴西中医师则超过两万名，还创立了中医学会。

   在刘之明中医师眼中，巴西是发展中医医学的好地方：“全世界80%的中草药可以在这里找到。”除了看诊，他还开办针灸班、气功班、中草药班、推拿班以及风水班。风水是近来巴西人的热门话题，当地华人苏成皿还以葡文撰写了《吉祥风水》。

       圣保罗大学自1968年开设东方文学中国语文组后，报名就读的都是巴西人。倒是华裔子弟不太热衷学习华语，估计只有30%华裔子弟到中文学校上课，真正看得懂中文、会说华语的不多。

       巴西人正走进中华文化的门槛，探索其中奥妙。

       华人的中文教育始于战后。1970年代，全国中文学校和中文班加起来有100所。纵然众志成城，仍敌不过许多现实问题，至今剩下40多所，主要由宗教团体或华团开办。少数为附属在巴西语言学校的中文班或个人开办的补习班。圣保罗中华会馆中文学校和圣保罗华侨天主堂中文学校的规模最大；而由著名企业家张圣凯赞助的仁德国际学校，则是巴西唯一的葡中双语学校。

 华人孩子自巴西私立学校毕业后，不是到欧美国家深造，就是进入当地名牌大学，如最著名的圣保罗大学升学。

       第二、三代华人俨然已是巴西人。对他们而言，葡萄牙语才是母语。

       因此，当地中文报读者一直是第一代华人和新移民。除了拥有20多年历史的《巴西侨报》和《美洲华报》，如今只要动动鼠标，也可以在《巴西侨网》浏览新闻。

       免费派发的刊物，也是华人的精神粮食，包括《台湾侨报》、中华会馆的《华光报》、圣保罗华天主堂的《心声》、中观寺出版的杂志、里约华人联谊会的《华联报》以及巴西华人文化交流协会的《华人报》。南美华人作家协会亦不定期出版《南美文艺》，让文友抒发情感和意见。

       华文文学谈不上普及，却有一群人正努力用方块字记录自己的移民故事，并结集成书。也有人在美术学会、摄影学会、书法学会、唐韵艺术团等找到兴趣归属，水墨画家周毛如珠、圣保罗歌剧院首席女高音陈黄淑英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巴西没有唐人街，圣保罗的东方区（Avenida Liberdade，也称作自由区）是华人、日本人和韩国人的聚集地。国际青商会巴西协会华侨分会就是在这里举办“新年快乐活动”，欢庆春节。这项活动每年吸引16万巴西观众，不只电视台来报道，市政府也推举它为模范的社区活动。

       中餐馆和中国食品店林立的东方区，也伫立着圣保罗中华会馆、巴西广东同乡会会所、客属宗亲会馆、圣保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巴西华侨教会、弥陀寺、中观寺和观音亭。它们是巴西华人群策群力，团结合作的见证。

       1929年成立的中华会馆是巴西历史最悠久的华团，而1956年创立的华侨天主堂则是最早的华人宗教组织，对华社影响深远。1970、80年代，华人如潮水般涌入圣保罗，这两个团体接济过很多无依无靠的新移民。在圣保罗山度士（Santos）港口，萧金铭和何彦昭神父帮忙填表格、通海关。中华会馆也帮忙找工作、租房子。至今，教会仍跨越宗教，服务当地华人，和医院合作建立惠及群众的医疗保险制度，设立和平公墓，安葬老华人。目前，它正筹建博爱园安老院。

       此外，还有巴西华人协会属下的广东、青田、温州、闽南、北京、上海、东北、江苏、江南、大西南等同乡会，总是及时对受到“老飞”（华人对当地警察的俗称）敲诈或遭到警方扣留的新移民伸出援手。

圣保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拥有40多年历史，设有华语、葡语和闽南语的主日崇拜。

 新旧社团在岁月推移中传承、交接，巴西累积创办的华团超过200个。有联谊同船移民的台湾乘船移民南美联谊会；有引导华人争取政治地位的巴西华人选民联谊总会；有集合退休军人的巴西荣光联谊会和旅巴中国空军联谊会，还有最新成立的杀鸡业公会。

       巴西华人大多数信奉佛道或道教，在家供奉关公或观音。佛教组织、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也有20多个。

       除了春节、端午节、中秋节聚餐等例常活动，华人组织也不时给当地人捐助，发放金钱、食物、日用品，以及义诊。如来寺发起“如来之子”计划，给贫困儿童布施米粮和用品，教导他们手艺，使他们不致于在街上游荡。巴西华侨慈善基金会多次筹办募捐活动，并亲自前往灾区救助。不管灾难发生在中国大陆、台湾、南亚，甚至是偏远的巴西亚马逊河流域，都阻挡不了华人奉献爱心。

       可想而知，各种社区活动占据华人不少时间。不过，每到星期四，圣保罗华人就会减少出门。原来，为了缓解堵车问题，每天早上7点到10点，以及傍晚5点到8点，都有指定车牌不能上路。星期四轮到车牌最后一个号码是7和8的车子。华人车牌最后一个号码多数是8，星期四就是他们车子的“禁行日”。

     华人社团把第一代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那里有来自同一个家乡的人，有熟悉的华语和方言，有相同背景和文化的朋友。然而，他们不排斥巴西文化，并且愿意入乡随俗。

       他们尝过巴西道地的烩豆饭（Feijoada）、烤肉、橙汁、咖啡和Guarana水果汽水；收到礼物时，当着对方的面把礼物拆开，表示感谢。复活节买巧克力做的彩蛋给孩子；亡人节带鲜花拜访亲人墓地；丰收节（Festa Junina）如来寺会举办玉米庆祝活动，和巴西人一起欢庆农作物丰收。

       即使孩子要和当地人结婚，家长也欣然接受。婚礼中西合璧，早上到教堂完婚，晚上在中餐馆请客。也有人以巴西方式——沙拉、面和烤肉3道菜宴客。主人家通常不收礼金，来宾改为签字或写婚联祝福新人。

       在巴西，一个华人家庭里有韩国、巴西或日本成员，甚至混血后裔都是平常事。

       巴西是个移民大国，种族复杂，混血儿比比皆是。当地人种族观念不强，而且当地反种族歧视法律严厉，让华人觉得更为踏实。当初想把巴西当跳板的华人都说：“现在给我钱，送我到美国，我都不去了。”

       在巴西，外来移民和国民待遇差别不大，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择业。这么多年，巴西仍是华人心目中的“金矿”。有人通过亲属申请过来，有人和巴西人或是持有身份证的华人假结婚入境，有人则逾期逗留。

如来寺是佛光山在巴西的据点。占地15公顷的如来寺是南美最大的佛教圣地，也是当地著名的观光景点。

 巴西政府几次大赦，允许非法移民申请居留，最后一次是在1998年。大赦时，非法入境或在巴西留下不良记录的移民，都在中文报刊登护照遗失启事，然后到当地中国大使馆拿一本“清白”的新护照，申请居留证就能马到功成。

* *中国画家张大千自1954年起旅居巴西十多年。他在圣保罗郊区兴建有名的八德园，并在这里完成许多画作。张大千仙逝后，政府在该地段修建水坝，八德园从此淹没在水下。*

       有了居留证，只要住上5年，能说葡语，拥有正当职业，且没有犯罪记录，便可申请入籍。居住15年以上的，只需回答几个问题即可。子女在巴西出生的，父母自动成为永久居民。巴西地大物博，容纳移民完全不成问题。老华侨大多成了巴西国民，而新移民仍抱着“赚够钱就回去”的想法。可是，十几年过去了，这些人不但没离开，而且还把家人都接了过去。

       经济基础稳定后，华人开始进入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代表人物有创办巴西第一家加护病房的心脏病专家王昭平、华人法官马劲球等。积极参与国家建设、社会救济而获颁殊荣的华人也不胜枚举。近几年，不少华人后裔开始在政府、议会、军队及政党中担任要职。2006年，纯华人血统的巫威廉在圣保罗州当选为首位华裔联邦众议员，巴拉那州则由徐敏淦代表华人出任州议员。

       在巴西，真正代表东方文化的是日本人，但华人地位正日益提升。以往华人走在街上，巴西人都这么打招呼：“日本的朋友，你好！”现在巴西人会先问：“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让华人深感欣慰。

角仔店、提包业和跑单帮是很多巴西华人安家立业的起点。

       “角仔”是用面粉裹着肉碎、竹笋和乳酪油炸的点心，巴西人很爱吃。20世纪60、70年代，圣保罗的电影院、车站、每个区域的中心点都有广东人架起来的角仔架，全市约有几百家。角仔现做现卖，一个25分，等于搭一趟电车的车资。穷人点三四个角仔和一杯鲜榨甘蔗汁，就能填饱肚子。“角仔佬”工作辛苦，还必须应付流氓和偷鸡摸狗的顾客，身心俱疲。1980年代初期，巴西大财团开办的角仔连锁店以及国际知名快餐店强攻饮食市场，华人角仔店招架不住，只好收摊转行。如今在里约华人聚集的沙拉（Sara）商业区，还有几间硕果仅存的华人角仔店。

       提包业比角仔业开始得更早。第一批提包人，很可能是20世纪初从欧洲来的华人。当时他们把带来的珠链串满双手，一手提一个包穿街走巷叫卖。后来，提包业进入售卖桌布和黄金珠宝的风光时期。不少青田人，就是这样日晒雨淋存到第一笔钱。1990年代，女性成了提包业主力，她们推一辆小车，沿街挨户兜售家用电器、香水、化妆品、手表之类的小礼品。小孩为了帮补家用，也加入提包行列。

      提包业盛行，需要大量小商品，跑单帮应运而生。以里约华人为主的单帮客每次搭上“野鸡车”（专载单帮客的巴士）到巴拉圭东方市（Ciudad del Este），背回上万美元的走私货，批发给提包人、商店、公司和街边的摊贩。1990年代初期，跑单帮风行一时，引来不少新移民。跑一次有1000美元，代价却很大。野鸡车司机超速，路况又糟，有人因此魂断公路；有人长时间背重物，患上肩膀、脊椎酸痛的毛病。运气不好的话，货物被充公了还得交罚款。后来巴西开放进口，并严厉管制巴拉圭进口货，单帮客逐渐沉寂。

       1990年代末，提包人因常遭土匪和警察敲诈，萌起转行念头。不过，这时候已有许多华人买大车、住大屋，或累积了足够资本往其他领域投资。提包业、角仔店和跑单帮渐渐走入历史，但其中交织的辛酸血泪，却是巴西华人奋斗史上永不磨灭的烙印。

 巴西华人一步一脚印，经历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当地社会取得不俗的成就。

       纵然过程有辛酸有泪水，但巴西美丽的湖光山色、多姿多彩的生活以及巴西人热情的微笑，足以抚慰他们的挫折和失意。

       对喜欢冒险的巴西华人而言，这个梦想之都永远有许多预想不到的惊喜。

  碧波荡漾的加勒比海，点缀着千万个大小岛屿，串成多个小国寡民的岛国。这里的国家大部分都有同一特点，就是主要以农立国，旅游业发达，但工业却尚处于萌芽阶段。此处的华人移民姗姗来迟，人口稀少，多靠经营小本生意为生。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少数港台移民向加勒比海地区进军，投资设厂。而自70年代以后，也有部分中国大陆新移民迁徙到加勒比海地区，使华社的结构起了变化。华人的籍贯更多元，经济范围扩大，社团组织也多了起来。

  介于大西洋南端美国佛罗尼达州（Florida），中美洲东岸及南美洲北岸，是辽阔的加勒比海（Caribbean Sea），它是因当地原居民加勒比印第安人而得名。在这片辽阔的海域上，有着许多大小不一的岛屿，有些是珊瑚岛礁，状呈一大弧形，宛如璀璨的串珠，光彩夺目。这里风光明媚，处处鸟语花香，充满热带情调。

       众多岛屿主要由3组群岛组成，即巴哈马群岛（Bahamas）、大安的列斯群岛（Greater Antilles），包括古巴、海地（Haiti）等及小安的列斯群岛（Lesser Antilles），包括多米尼克（Dominica）、巴巴多斯（Barbados）、格林纳达（Grenada）等，这些群岛也被统称为西印度群岛。

   远在15世纪末西方列强势力入侵之前，当墨西哥南部中美洲一带的玛雅文化绽放着绚丽的色彩时，加勒比海地区的印第安文明还在萌芽。这里的印地安部族基本上还是处于渔猎或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文明阶段。

       1492年，在西班牙女王的赞助下，哥伦布率领舰队航抵古巴与海地，建立了最早的殖民地据点。到了16世纪中叶，西班牙已经将古巴、海地、波多黎各及牙买加纳为殖民地。

       自16世纪之后，英、法、荷也到新大陆来开拓殖民地，和西班牙展开殖民地争夺战。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间，西班牙国势衰落，英国得以从西班牙手中掠夺其胜利品，同时与法、荷展开的殖民地争夺战中取得上风，而获得加勒比海地区许多国家的宗主权。

       法国在殖民地争夺战中败下阵来，只落得留守住几片残羹，它们是：法属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今海地），马提尼克（Martinique），瓜德罗普（Guadeloupe）等。除了海地于1804年摆脱法国取得独立外，其他仍是法国的“海外省”。

       荷兰实力不如英法，只能在加勒比海地区保住几个小岛，它们是库拉索（Curacao）与阿鲁巴（Aruba）等小岛。

       西方列强近400年来的殖民统治，给殖民地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生活水深火热，自由受压制，激起人民的怒火，从18世纪末年就爆发了反殖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经过长期的斗争与牺牲，最终摆脱了列强的桎梏，取得了独立建国的辉煌成就。如海地（1804）、多米尼加（1844）及古巴（1902）都先后成为共和政体的独立国。一般而言，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殖民地政府，历来都是采取高压手段与政策，独立过程比较艰辛与曲折，殖民地人民需经流血与牺牲，付出极大的代价。至于英属殖民地的独立，则多是通过宪制谈判的过程，以避免流血冲突，不过大都是迟至第二次大战后才完成独立，如巴马哈（Bahamas，1973）、巴巴多斯（1966）及特立尼达与多巴哥（1976）。

在西方殖民地政府的统治下，加勒比海地区的发展缓慢。虽然殖民者带来了新的文化冲击、改善了物质文明，但只有少数人受惠，广大的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中。加勒比海地区除了少量的石油外，矿产资源贫乏，但大部分土地肥沃，适合耕种。殖民地政府鉴于甘蔗、香蕉、椰子、棉花、咖啡、可可与烟草等农作物是世界市场最为畅销的产品，除了能够带来庞大的盈利，又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因此大力发展种植业。为了鼓励外国资本家到来开垦种植，除了给予投资者种种优惠，还协助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成效卓著，以致几百年来，农产品成为各国的主要经济支柱。

       加勒比海地区风光旖旎，引人入胜。近二三十年来，各国政府都大力发展旅游观光事业，兴建豪华旅馆与赌场，改善机场与市内交通，以吸引各国游客的到来，为国家带来庞大的外汇，成为国家重要财政来源之一。

       鉴于这地区的资金不足，人才短缺，政局不稳定，因此能够吸引的外来投资不多。除了巴哈马等少数国家有石油提炼厂外，其他国家也只能发展轻工业，大多集中在纺织业、制衣业、造纸业、电器业、皮革业、塑胶业及食品加工业等领域。

   古巴是华人最早登岸的加勒比海国家。1847年6月3日，一艘英国商船从厦门载来212名华工，在哈瓦那登岸。1859年，法国殖民政府从广州运载华工到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去，这批华工多被派往大农园种植甘蔗。1882年，法国殖民政府从上海又招到2102名华工，这批华工则被运往瓜德罗普。

       在19世纪80年代，即有华人在库拉索开垦耕地。1915年，也有华工和技匠在那里的炼油厂工作。早在1920年，库拉索首都威廉斯塔德（Willemstad）市内就已经出现了小唐人街，并有中国人所开设的餐馆和小商店。

       19世纪末，阿鲁巴发现黄金，吸引了大批华工前来淘金。1924年，阿鲁巴建立炼油厂，厂内也聘用了华工。此外，岛上也有从事种植蔬菜与水果的华人。

       早期的华工都是契约工人。契约华工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兴起的。自从过去盛行的非洲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宣告废除后，美洲新大陆就出现严重缺乏劳动力的困境，西方殖民主义者与资本家于是便从东方寻找新的目标。而中国人吃苦耐劳的天性，被认为是最理想的“廉价劳动力”，因此，人口贩子便以厦门、汕头、广州、澳门及香港等地为中心，利用拐骗与掳掠的卑污手段，将华工运载到美洲各地去，或被分配到大农园种植甘蔗，或派去修筑铁路与运河，或进行挖掘矿产或鸟粪等劳力工作。

       契约华工的命运是悲惨的，他们与雇主所订的契约，如同卖身，限期5年或8年不等。这期间华工必须从事无补偿的劳动，工作时间长，生活与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又受督工殴打虐杀，死亡率极高。

       1874年以后，契约工人制度便走向衰落，开始有大部分华工的身份变为自由民。

# 

      自由民可以自由迁移，流动性较大；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有新移民从中国大陆或美国旧金山迁徙过来，因此扩大了华人分布的区域，过去没有华人的地方，也开始有了华人的足迹。华人的增加，大大促进了这些地区甘蔗的种植与蔗糖的生产。

       进入20世纪初期，加勒比海地区掀起了一股移民浪潮，流入英荷属地。他们多是自由移民，以手工艺者及小商人居多。1900年至1940年间，超过7000名华人到此地区登陆。移民中有些是从美、加及拉丁美洲来的再移民。华人人数日益增加，许多华人从乡村流入城市，职业也随之改变。他们有了少许的积蓄，便弃农从商，从事餐馆、杂货店、洗衣店等小本生意，经过多年的经营，生意由小而大，有的办工厂或农场，有的经营出入口生意，从而提升了社会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中国陷于内战，国民党溃败后退守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与此同时，世界出现了东西两大集团对抗的局面。这些状况的形成，大大遏制了全球华人移民的浪潮。加勒比海国家不与中国来往，中国政府也严格限制人民出境，因此，自1950年后的20年间，除了少数台湾与香港的商人入境外，鲜有中国大陆移民。

       这种情况一直到了70年代以后才改变，随着古巴首先在1960年与中国建交，牙买加、巴巴多斯、安提瓜与巴布达（Antigua and Barbuda）等国也相继与中国来往。另一方面，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间，掀起了一波移民浪潮，中国人纷纷涌入美国、加拿大、西欧、澳洲与日本等国家，其中也有少部分流入加勒比海地区，加上1980年以后，从香港和台湾前来的投资移民也激增，这一来，便扩大了这地区的华人人口。

       加勒比海地区的华族群体结构，大致上可分为以下3个群体：一、老华人，为早期移民，多数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四邑（台山、新会、开平与恩平），也有少数的潮州人、福建人及客家人。他们注重传统，沿袭中国习俗，使用中国方言，感情上还是眷念故国；二、年轻的华裔，是属于第二、三或四代具有华人血统的后裔，他们土生土长，接受当地的教育，结交的朋友也大多是本地人或西方人士，深受西方文化熏陶，不会说华语或中国方言，更加不懂得书写中文；三、新移民，大都是战后来自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的移民，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科学技术，及较多的财富，其中尤以港台人士为甚。他们多是投资移民或技术移民，或投资设厂，或受雇为专才。他们视野广阔，但感情与思维仍然倾向中国，依然遵循中国人的生活习俗。

       这些不同的华人群体，地域观念较浓郁，来自同一地域的人，凝聚力较强，至于不同地域的华人，大都不相往来，鲜少交流。

       华人社区阶级分明，上层的包括企业家、医生、律师以及会计师等专业人士。中层阶级包括公务员、小商人与小农场主；下层的成员是劳动工人，终日劳作，仅足糊口。然而，这种阶级分化是处于流动状态的，有些下层阶级的成员因为奋发图强，因而摇身一变，顿成富翁，跻身上层阶级之林；也有少数原是上层阶级的富豪，生意失败，宣告破产，变成一穷二白的穷光蛋。

       有些地区有社团组织，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地缘与血缘性的组织，如会馆及姓氏公会，各地都有。第二种是代表地区的泛华人组织，如巴哈马的华侨联谊会，阿鲁巴的中华公会；第三类则包括一些俱乐部与教会组织。至于华文学校的设立，鉴于财力与师资所限，数量不多，如巴哈马只有一所华校。

       另一个对华人移民人数增减有所影响的因素是外交关系。与台湾维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如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圣茨基和尼维斯（Saint Kitts and Nevis）、圣卢西亚（Saint Lucia）及圣文森特及格林纳丁斯（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等，台湾政府在这些国家设有大使馆，双方也不时派代表互访。台湾除了派遣农业技术、养猪及竹工专家去协助外，更协助公共工程的建设。而新中国自建国以来，与之有外交关系的则有古巴、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和格林纳达等。中国政府通过大使馆或商务代办机构，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扩大贸易，也承诺给予对方优惠贷款，并派专家协助改善生产技术，修建桥梁、公路等建筑工程。大使馆人员每逢春节或其他良辰佳节，举办联欢招待会，广邀当地华人华侨代表、中资企业代表、港台同胞及学生参与其盛，场面热闹非凡。

 加勒比海诸岛国，小国寡民，开发较晚，经济落后，以农业为主，工业仍是处于萌芽阶段，资本欠足，规模不大，因此对外来移民欠缺吸引力。到这里投资的华人移民稀少，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也多是餐馆饮食业、杂货店与出入口贸易等。近年来，随着台湾、香港与中国大陆企业家前来投资，制造业日益兴盛，其中尤以成衣业最为发达。兹分国论述如下：荷属安的列斯群岛（Netherlands Antilles）为荷兰海外属地，包括库拉索岛、波力耳（Bonaire）、圣尤斯特歇斯岛（St Eustatius）、荷属圣马丁岛及沙巴岛（Saba），1954年获得内部自治，2010年10月10日将解体，其中库拉索和圣马丁将成为高度自治属地，余者则成为荷兰海外行政区。群岛耕地面积小，土地贫瘠，生产的农产品仅供当地居民消耗。国家收入主要依赖石油出口，促进了海运与空运的发达。近年来观光旅游业也兴盛起来。

       在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居住的华人约有5500人。库拉索岛的华人有70%是当地出生的第二代华人，早期华人移民多广东籍，新移民主要是80年代移殖过来的港台人士。华人多聚居在首都威廉斯塔德及新港两地，多数经商，经营餐馆业、杂货业、贸易进出口业、洗衣店、超级市场、照相馆、家具业与旅游业等。这里的华人做小生意，容易赚钱，对于生活现状也大多感到满足。

 巴哈马是由700多个小岛及礁岩组成的岛国。其经济以石油出口、金融业及旅游业为主，国民平均收入高，是加勒比海最为发达的国家。当地华人约有500人，以广东籍的第二代华人居多，大多数聚居于首都拿骚（Nassau）。

       这里的华人多经营杂货店以及餐馆业。根据资料统计，1999年由华人开设的杂货店有18家；餐馆约17家；还有华人经营的旅馆5家，金融机构则有香港恒生银行于拿骚所设立的分行。

       此外，有华人的建筑公司一家，还有洗衣店、文具店、书店、美容店、西服店、照相冲洗店等。而中国的齐鲁建设集团公司则承建过巴哈马国家体育场。香港和记黄埔自由港港口公司、自由港集装箱码头公司、大巴哈马岛机场公司是香港和记黄埔公司（Hutchison Whampoa Limited）在大巴马哈岛投资的三大公司，主要经营集装箱运输、客运码头和机场业务。

阿鲁巴位于委内瑞拉北岸，农业不发达，国家的主要收入依赖石油出口与旅游业。华人约有5000人，当地出生的第二代华裔占了80%，他们多已融入了当地主流社会，不会说华话或方言。老一辈华人多属粤籍，以鹤山、恩平人居多，新移民则多来自港台，大部分华人聚居在首都奥拉涅斯塔德（Oranjestad）。

       这里的华人多数经营杂货店、餐馆业、旅馆、超级市场、药房、五金店、家私店及洗衣店，都是小本生意。一般华人工作勤奋，稍有积蓄，就拥有自己的房屋汽车，属中产阶级，生活过得安逸舒适。

## 

位于加勒比海岛屿的最东端，人口约26万，为世界人口密度较高的国家。国内盛产甘蔗，富石油资源，加上旅游业发达，三者成为国家主要外汇来源。

       岛上华人只有区区600人左右，多聚居在首都布里奇敦（Bridgetown）。大部分当地华人都经营餐馆业与加工业。餐馆多属小规模，业者多为中国大陆与香港移民。另有杂货店、裁缝店及塑胶加工厂。

       巴巴多斯于1977年与中国建交，中国多次给巴国援助贷款，并于1993年援建体育馆。中国在巴国设有大使馆，常在佳节举办招待会款待当地华人代表，联络彼此的感情。有两家中国建筑公司进入巴国承建庞大建筑工程，它们是中国建筑总公司巴巴多斯分公司和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业绩卓著，声誉良好。

       位于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南端，盛产香料，其豆蔻、丁香、肉桂之产量，居世界之冠。由于风光明媚，气候宜人，旅游观光业相当发达，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外汇收入来源。

       该国的华人大概只有100人左右，大多是广东籍，多数从事餐饮业、百货商店、商贸、食品加工及建材加工等行业。

       格林纳达与中国大陆建交后，中国多次派遣农业、医药与体育的专才予以协助发展。同时也有数家中资机构在此承包庞大的工程建设。为了配合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也投入兴建三星级酒店。

位于加勒比海东部，以观光、农业（盛产甘蔗）为经济基础。这里的华人只有近100人，多从事观光、农业相关产业。该岛国与台湾建交至今，两方常派代表互访。

位于小安的列斯群岛南端。以农立国，大量生产与出口香蕉、椰子、甘薯及香料。旅游业是另一庞大收入来源。

       华人在这里所开设的，都是小规模的餐馆，以赚取薄利为生。该国与台湾建交，台湾也派遣农技团协助该国改善农业生产、养猪及植树等技术。

   位于加勒比海海地岛西部，由于长期政局动荡不安，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农业产量不高；工业以制造业为主，也仅供国内消费；交通运输设备欠完善，致使旅游业难以发展，因而成为中美洲生活水准最低，文盲比率最高的国家。

       由于华人的经济活动范围受限，仅有一家餐馆，一家成衣厂以及一家农场。自1956年以来，海地与台湾便开始建交。除了经常互访，双方更订立了文化、科学与农业等合作协定。

 多米尼克以农立国，尤以香蕉的出口，占全国外汇收入的50%。工业基础薄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很小。

       据2001年的资料显示，当地华人仅43人，其中20人来自台湾。由于多米尼克给予中国人落地签证的待遇，近年来大陆移民较多，目前华人已有大约200人，而且超过半数已入籍。他们多经营小型杂货店或餐馆为生，规模不大，且发展有限。

       华人经营的小型杂货店以及现代超市，单单在首都罗索就有13家，均由大陆移民经营，货物多半由中国进口。罗索也有十余家中餐馆，其中以中华阁与古都的规模较大。也有专营外卖的，不过多是家庭式的小生意。另外，这里也有华人所开设的旅馆、礼品店、洗衣店等。至于在该国栖身的台湾移民，他们主要在经营洗衣厂、中医、小型餐馆及礼品店。

  位于小安的列斯群岛向风群岛中部，以农业占主导地位，尤以香蕉及可可种植业为主。圣卢西亚山明水秀，有利于发展旅游业，成为第二经济支柱；不过，工业基础却尚处于薄弱的阶段。

       岛上华人人口很少，大约只有百余人，主要从事餐馆业与杂货业。值得一提的是岛上有个“中国城”，那里有3家中国美食城、4家中国商店、一家批发中心，还有一家水上运动公司。

       圣卢西亚于1984年与台湾建交，接受台湾的援助，但到了1997年双方中止关系，转而跟中国建交，中国曾援助圣卢西亚建体育馆及精神病院。但是到了2007年，却与台湾复交，引起中国的抗议，中国中止与圣卢西亚一切外交关系，包括各项签订的协议均告失效。

位于小安的列斯群岛北，经济以农业与旅游业为主，盛产甘蔗、棉花及葛薯，旅游收入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工业方面则有制糖、炼油及水泥等领域。

       这里的华人主要从事中餐馆、小商品零售店以及超市，都是小本经营。

       该国之前曾与台湾建交，1983年双方断交之后，便与中国建立邦交关系。跟据资料，中资在该国有两家大企业，一家是中国进出口集团，另一家则是合资的安提瓜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在加勒比海一带的海岛国家，山青水秀、风光旖旎，旅游观光业的无限潜能，确实是吸引华人前来这里的重要因素。比起北美以及南美，加勒比海的华人移民历史短浅，人口稀少。早期的华人以广东籍人士居多，华社也比较单纯。这地区的华人，大多是小康之家，生活还算安逸。有的人安于现状，打算长期居留；有的则以此为跳板，希望有朝一日，累积了足够财富，再移民美、加等先进国家，追求更美好的明天。

* 俄罗斯
*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国土西自芬兰、东抵中国，与14个国家接壤，海岸线从北冰洋一直延伸到太平洋。
* 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曾经在1917年，与周边国家共同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成为盛极一时的超级大国
* 1991年，苏联解体
* 俄罗斯是华人最早到达的欧洲国家。
* 15世纪或更早以前，就已有华人移居到西伯利亚。
* 在绵长的中俄边界上，中国的牧人、猎人、渔夫以及采掘人参者便经常来来往往，自由活动。
* 清朝初期，莫斯科附近甚至出现过一座“中国城”以供华裔交易。
* 18世纪，莫斯科出现了俄国史上第一所汉满语学校，任教者是来自清朝的满族人周戈
* 从17世纪到19世纪，清政府被迫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俄国。
* 19世纪中叶，中国西北一批反抗清政府的回族起义军被镇压之后，余部集体逃亡至当时已并入俄国版图的地区，并被当地人称为东干人。
* 中国商人在莫斯科、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托母斯克（Tomsk）、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等数十座较大的城市都设有商行，销售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及各种手工艺品，再购买俄国的金沙、呢绒、皮货、毛毯等，带回中国贩卖。
* 两大商团是在俄罗斯各地贩卖石器的浙江青田帮，和以纸花而闻名的湖北天门帮
*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劳工短缺，沙俄招募了一大批主要来自中国山东及东北等地的华工。
* 中国山东及东北等地的华工被运送到俄国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从事修筑铁路与垦荒工作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在中国招募劳工人数达15万，大部分被分派到全国各地的码头、工厂、矿井、伐木场和荒地充当苦力，还有万余人则被送往前线挖战壕、抬担架、运弹药。
* 当时在远东的中国商人，以东帮（山东）、南帮（江浙）、北帮（河北、东三省）和广帮（广东）为主，经营商品贩运、建筑、酒馆、洗衣铺和杂货铺等生意。
* 在莫斯科红场的俄罗斯国家一级公墓中，安葬着两位曾为了十月革命而献身的中国革命者的尸骨，纪念碑上还镌刻着“张，死于1917年”、“王，死于1917年”的字样。
* 邓小平和蒋经国等名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
* 蒋经国还娶了位苏联太太，即日后的蒋方良。
* 俄罗斯华人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Irkutsk）、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乌兰乌德（Ulan-Ude）、海参崴（Vladivostok）等地，其中以莫斯科华人数量最多。
* 俄罗斯华人有相当数量来自中国东北黑龙江、辽宁、吉林，以及北京、福建、山东和浙江等省市，极少部分来自台湾。
* 如今俄罗斯华人社会的主流，是一批被称为“倒爷”的华商。
* 在莫斯科还剩下半幢唐人楼
* 俄罗斯华人有宗教信仰的不多，数量较可观的首推华人基督教信徒。
* 每年1月7日的东正教圣诞节，是俄罗斯最热闹的时候，当地人通常会有十天的假日。
* 在莫斯科十分著名的新圣女公墓，安葬着中国革命家王明。
* 公立学校中最为著名的是莫斯科的1948学校，它的校长打出“只要学习华语，就有面包”的口号，吸引了很多当地学生。
* 俄罗斯目前在市场上发行的华文报纸有《路讯参考》、《华俄时报》、《捷通时讯》、《环球日报》、《侨报》以及《莫斯科华人报》。
* 《路讯参考》和《莫斯科华人报》还设有自己的网站，读者主要是俄罗斯当地和打算到俄罗斯的华人，以商人和学生居多。
* 在莫斯科有一支已经有十多年历史的华人足球队。
* 白俄罗斯
* 白俄罗斯位于东欧平原西部，与俄罗斯、拉脱维亚、波兰、立陶宛以及乌克兰接壤。
* 国家以民族命名，意为纯俄罗斯人。
* 白俄罗斯被誉为“万湖之国”
* 20多年前，在乌克兰境内、近白俄罗斯边境处的一场震惊全球的切尔诺贝尔核泄漏事件
* 在白俄罗斯定居的早期华人，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历史因素的迁徙，另一类是为了到这里留学而来的，这些留学生原先大部分是属于公派性质的，后来则多为自费的留学生。
* 白俄罗斯在历史上曾经数度被划入俄罗斯的版图，又曾经是前苏联的一部分，所以有些俄罗斯华人的活动范围曾经扩展到白俄罗斯区域，他们的迁移史已成了俄罗斯早期华人历史的一部分。
* 清朝道光年间，来自浙江青田的章旦乡以及留庆云等人，抵达了当时还是属于俄罗斯疆域的明斯克，他们起初贩卖石雕，后来又去当矿工。
* 如今在白俄罗斯的华人中，河南人还是占大多数，并不似其他的欧洲国家，以浙江人为主。
* 2000年过后，在白俄罗斯的华人留学生越来越多，最终甚至占了当地华人的97%至98%
* 白俄罗斯地广人稀，华人在这里打工薪水低，税率高，语言不通，商机可遇不可求。
* 目前生活在白俄罗斯的华人多数是留学生，仅有少量的中国大型企业的工作人员和个体商人。
* 留学生和商人中，以中国河南籍居多，其次为东北人，大部分集中在首都明斯克一带。
* 因为经济能力的不足，这里的华人社会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没形成规模，媒体、社团也势微力弱，所以还称不上是成形的华人社会。
* 当地人常说的“白、俄无国界”，让人总有白俄罗斯附属于俄罗斯之感。
* 那些在白俄罗斯生活了十多年的华人说：“我走过这城市的每一条街，对每个角落都充满感情，想回国的欲望越来越小，唯一的牵挂就是国内的亲人。时间越久，对白俄罗斯越不舍，越觉得这里像故乡。”
* 在明斯克，必到的景点是“泪岛”。这里有座流泪的小天使铜像，按照当地风俗，抚摸小天使，会保佑自己多子多福。
* 在白俄罗斯的华人圈子中，经常会听到有人娶到一名美丽的白俄罗斯太太，或者交了一个漂亮的白俄罗斯女朋友。而华人女性嫁到白俄罗斯的例子却微乎其微。
  + 乌克兰
* 乌克兰意为“边陲之地”，首都基辅享有“俄罗斯诸城之母”的美誉
* 拥有上千年历史的乌克兰，在1991年之前，却未曾正式独立过
* 直到前苏联解体，乌克兰才真正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
* 社会体制转型，国家成立时间短，法规政策不完善，这些不利因素，反而成为了以赚大钱为目的的商人的契机，其中也包括纷纷涌入的大批华商。
* 在清朝末期，有些浙江青田人以及山东江湖艺人沿着陆路走过俄罗斯到西欧，最终停留在乌克兰境内。
* 乌克兰隶属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时期，有中国公派留学生进入乌克兰
* 60年代，中苏边境爆发伊犁事件
* 从1994年开始，大批以做皮货生意为主的华人“倒爷”涌入
* 1995年至1996年间，有福建和浙江的近万名农民移入乌克兰，他们以零售各种纺织品和轻工业品为生，还在基辅开辟了一个属于他们的露天市场。
* 在乌克兰的华商中，盛传这样一句话：“要做大事业，就去敖德萨。”
* “七公里”是乌克兰最大的露天集装箱批发市场。因距离市中心的火车站7公里而得名。
* 东欧的商人，不做赚不到一半利润的买卖，但这里的华商们却只是赚取蝇头小利，以量取胜。
* 在基辅华人开设的中餐厅里，王明熹的九龙餐厅，要算是行业中的翘楚。
* 华人称作“乌克兰四大菜系”的土豆、洋葱、圆白菜和胡萝卜
* 不打算在乌克兰扎根的华人，在乌克兰生活一切从简。即使是结婚，也不像在中国那样讲究
* 乌克兰式的婚礼十分热闹，要分别举行3个仪式，即教堂仪式、注册仪式和马拉松式宴会。如若集中在一起举行，要闹上24小时
  + 波兰
* 波罗的海之滨、中欧北部的波兰，曾经长期受制于其左右两个强悍国家——德国和俄罗斯
* 波兰是二战中按照人口比例计算死伤最惨烈的国家。
* 最早一批的波兰华人，是20世纪30年代从俄罗斯辗转而来的十几名青田人。
* 靠打苦工或兜售纺织品以及小工艺品为生
* 青田华侨大会的移民资料记载，浙江青田的刘焕清，辗转法、意、捷、德等国之后，1936年在波兰开设了橡胶工厂，还雇用了7名工人，安装了7部电话，1947年回到中国时，带回了一万多银元
* 二战之后，一些温州人来到了波兰。他们在那时就已做起了皮鞋生意，并多数在华沙或罗兹（Lodz）安家立业。
* 1959年从北京嫁到波兰的李丹凝大夫，在波兰攻读了医学博士，并被称为波兰的中医之母
* 波兰当地华人自称是“在欧洲历史最短的华社”。
* 华商大部分聚集在华沙市外的GD中国城。
* 只要能多挣钱，华人最不怕吃苦。条件良好的市场环境，并不能成为吸引他们的诱因。
* 《波兰环球周报》和《波兰华人周刊》都是当地活跃的华商因感到信息的闭塞而在2007年创刊的。
* 《波兰环球周报》是香港华商成标创办的华文报纸。
* 《波兰华人周刊》则走杂志路线
* 波兰引为自豪的传统食物是饺子
* 问起波兰华人有何特点，很多人都会回答“在欧洲的历史最短，但能力最强。”语气里充满着自信。
* 柴洪云是中国复旦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来波兰之前，有着一份稳定舒适的工作。
* 1994年作为贸易公司的一名员工从中国上海来到波兰，每个月的薪水300美元。
* 在柴洪云餐厅的收银合前，有一份彩色打印、用钉书机装订的A4纸的《华都文摘日刊》
  + - 捷克
* 东连斯洛伐克，南临奥地利，西接德国，北枕波兰，是欧洲中部的内陆国。
* 捷克在欧洲是个制造业发达的国家
* 皮尔森酿酒技术，可以与奔驰、宝马齐名的斯科达汽车
* 加入欧盟后，捷克反而比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更快建立起规范的市场体系。
* 据史料记载，20世纪初，就有华人在捷克穿街走巷，贩卖货品。
* 从1950年至1985年间，在捷克的华人仅有20余人。
* 目前在捷克的4000多名华人中，有一半以上获得了永久居留权
* 捷克华人大部分居住在首都布拉格，在奥斯特拉瓦（Ostrava）和布尔诺（Brno）等城市居住的仅有百余人。
* 捷克华人中来自浙江青田的华商就占了三分之三
* 近年来，全球贸易不景气，致使在捷克从事纺织品贸易的华商数量一再滑落，反而是中餐馆却一家接着一家开业。
* 初时，捷克华人历尽艰辛。平日在大市场做买卖，周末还要到外地去勤加跑动。
* 在捷克曾有个说法：“越南人靠华人货活着”。意思是说，市场的状况是越南人向华人拿货，或者把摊位租给华人
* 近三四年间，中国快餐、中国饭店遍布捷克大街小巷，以及购物中心。
* 捷克的经济快速发展，使这里的薪金、机会、工作环境和西欧相比都不相上下，甚至超过了意大利、西班牙的一些地方
* 若来的顾客是华人，一般店主都对厨师喊一声“给中国人吃的”，厨师便会酌量地少放些勾芡。
* 20世纪50年代随丈夫来捷克定居的唐云凌，十多年前创办华联会，目的竟然是为了对付华人的恶势力，主持社会正义。
* 华联会最大的一项成就，就是坚持主办了捷克唯一的华文报纸——《捷华通讯》。
* 而网络上华文媒体则以多种形式存在，有综合性的网站《捷华网》、论坛形式的《中捷行捷克华人华侨网》、《捷克华人》及《留学生之家》、提供各种信息的《捷克华人网》、《华人街》和捷克汉语工作者主办的《CINSKY》、以及博客形式呈现的《布拉格华人视界网络杂志》。
* 华人来到捷克有不同的原因，有来此创业做老板的；也有不能入境他国辗转流落到此暂居的，偏偏就是少有一开始就决定要移民捷克的。
* 当地唯一一所华文学校——布拉格中华国际学校，被华人称作“中华小学”。
* 曾有旅捷华人写过一部小说，叫做《布拉格有张床》
  + - 斯洛伐克
* 斯洛伐克是中欧的一个内陆国家，与捷克、波兰、乌克兰、匈牙利及奥地利为邻。
* 斯洛伐克原本仅是一个区域名称，最初是大摩拉维亚王国（GreatMoravia，830-905年）的中心地区，十世纪后成了匈牙利国土的一部分，1919年独立成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 1939年，斯洛伐克被纳粹德国占领，并首次宣布以“斯洛伐克”立国，但当时仅是个有名无实的傀儡国。
* 二战后，斯洛伐克再度与捷克联合为一国，直到1993年才脱离捷克，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
* 斯洛伐克与捷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在各方面却更受匈牙利影响。
* 捷克：重工业发展
  + - * 斯洛伐克：传统农业
* 斯洛伐克凭着自身的实力，开始工农并重，发展逐渐步入佳境。
* 首都布拉迪斯拉发成了工业发展中心，造船、家具、化学、烟草等工业皆有不错的发展，斯洛伐克因此而成为华人经商移民的选择。
* 有人说，其他国家的华人需100年时间才办成的事，斯洛伐克华人却能在短短的十年内完成。
* 20世纪50年代，当捷克斯洛伐克还未分家时，大部分华人都聚集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Prague），而斯洛伐克境内的华人则是少之又少。
* 1992年12月31日，捷克与斯洛伐克成了两个独立的国家。斯洛伐克处于百业待兴，一切从头开始的状态。那一年，聚集在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华人不过区区23人。
* 在到处都有浙江人的欧洲，这23名华人却不是来自浙江，而是来自移民史上鲜少出现的北京。他们到来的原因各异，只是大多在此待了一段时日之后便陆续离开。
* 1994年到1995年期间，斯洛伐克的移民局开始实施限制移民的苛刻条例，华人必须符合种种条件才能获得签证，这就是当地华人所谓的“签证被卡死”。
* 斯洛伐克迎来最大批的移民是在1995年至2003年间的第二阶段。
* 斯洛伐克有可能是因为人口不足，急需填补人口，因此才将入籍条件放宽。
* 斯洛伐克华人的主流行业仍是“开库”，即批发库。
* 移民历史不过十几年，区区二三千人口的斯洛伐克华社，社团组织却有6个，包括最早成立的青田同乡会、斯洛伐克华人华侨联合会、斯洛伐克中国友好协会、华人华侨商会等。
* 匈牙利
*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矗立着7个穿着东方服装、骑马射箭的勇士雕塑，他们代表着最早创建这个国家的7个部落，是为纪念匈牙利人西迁定居欧洲1000周年而建。
* 有着浓郁东方情结的匈牙利人，经过十多年的官方考古协会研究，宣称自己的祖先源自新疆天山一带。
* 用20年的时间走完了别人50年的路。”在海外这么说，就知道是指匈牙利华人。
* 匈牙利现有3万华人，约2万人直接来自中国大陆，一万人则从西欧流动过来。
* 四虎市场如今已成为布达佩斯地图上的一个景点，被称为中国市场（Chinese market）
* “在匈牙利生活过后，会觉得其他国家都没有布达佩斯方便。”这是很多匈牙利华人的切身感受。
* 匈牙利最大的连锁中国超市——环宇超市
* 华文媒体在匈牙利开始的时间并不长，1996年才有第一份华文报纸，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在市场上已有9家华文报刊。其中，除了匈牙利华商经营的华文出版社发行的《世界华人名人录》杂志外，《新导报》、《市场报》、《欧洲万事达时报》、《欧亚新闻报》、《欧洲论坛》、《中华时报》、《布达佩斯周报》、《中欧商报》都为周报。其中一些还兼办杂志、搞印刷和制作电视节目。
* 这些媒体虽被当地人称为“非主流族裔媒体”，但是报人们认为，他们已经藉此融入了匈牙利的主流社会。
* 《新导报》、《万事达报》，在办公室里都设有专业的摄影棚，器材、背景、灯光完全不逊色于当地同行。商品和模特儿的拍摄，都是由报社的华人摄影师独立完成。
* 匈牙利人在欧洲被誉为“有数学脑袋的民族”，
  + - * 奥地利
* 奥地利位于欧洲中部偏南，是个历史久远，艺术氛围浓厚的繁华国度
* 二战曾导致国内人口锐减，战后一段时间，国土被美英法苏4国分别占领，后来才重获统一。
* 奥地利珍惜和平，于1955年宣布为永久中立国。凭着原有的良好经济基础，它大力发展工业，同时放宽移民政策，允许外国人入境就业、定居。
* 早在清朝末年，就有一些湖北天门人、山东江湖艺人及浙江青田人来到奥地利
* 一战结束后，孙巨兴4兄弟从贫瘠的浙江青田，乘船两个月，在意大利登陆，辗转西班牙、法国、荷兰、德国，最终落脚于奥地利。
* 背着石雕、领带、袜子、手套等小商品，沿街叫卖，挨家挨户兜售
* 二战的炮火打散了孙家4兄弟。两人打道回府，一人去了荷兰。孙巨兴和张岩方、王兴标两名青田同乡则留在了奥地利的格拉茨（Graz），靠为当地人做粗活度日。
* 那时中国人移居奥地利的不多，除了孙氏和同乡，有的就是来自台湾的移民。
* 70年代初，奥地利已有二三十家中餐馆，店主皆为台湾人。
* 几千名来自柬埔寨、印度、越南等国的华人，于1975年后纷纷涌入，使当地的华人急剧增加
* 80年代末，奥地利经济起飞，各行各业皆面临劳工短缺的困境，政府于是开放劳工市场，凡持旅游签证来到奥地利的外国人，皆可办理工作居留。
* 中国人便借此源源不断地涌入奥地利。短短一年，已有两万华人来到奥地利，有的当教师、科技人员，也有的成为音乐家、画家等。
* 直至90年代末，奥地利的经济开始下滑，政府对移民的限制又日渐严厉，华人移民才明显地减少。
* 奥地利国小民富，华人大都聚居在首都维也纳
* 奥地利的3万华人，有七成来自浙江青田及温州
* 当地制度规范、社会福利优越，外国人只要连续8至10年交税，就可以申请入籍成为公民
* 约三分之二的华人都选择加入了奥籍。
* 除了占大多数的浙江人外，还有来自福建、东北、上海、北京、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和印度等地的华人。
* 大多经营餐饮业，只有5000余名来自中南半岛的华人在林茨（Linz）的工厂工作。
* 奥地利环境优美，治安良好，旅游业发达，人际关系简单。
* 导游总是这样介绍：“也纳历史悠久，教堂有300多座，可是这里的中餐馆比教堂还要多。”
* 光在维也纳就有中餐馆600多家，整个奥地利的中餐馆加起来约有1400余家。
* 几乎每户青田人至少拥有一间中餐馆
* 奥地利局势安定，社会福利健全，华人克勤克俭，只要干上几年，就能买车置房，过上安定目子。
* 每年来到奥地利的华人学生就有近万人，其中70%的人都选修艺术科系，尤其是音乐专业
* 目前在奥地利有3所教授中文的学校：温州华人创办的维也纳中文学校、在外企工作的华人发起的维也纳中文教育中心、以及台湾中文学校。
* 在奥地利活跃着3份华文周报和3个华文网站，分别是以公司形式经营的奥地利《欧洲联合周报》、浙江华人联谊会主办的《华信报》和青田同乡会主办的《中国人》，另外还有朋友网、欧华侨网和欧拓社区网。
* 奥地利的早期华人移民人数少、历史短，影响甚微，所以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唐人街或中国城
* 奥地利的两个主要政党－－奥地利人民党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被华人称作“黑党”和“红党”。黑党比较保守，代表当地中产阶级的利益；红党则反对歧视、主张为条件欠佳的人提供平等机会。作为移民的华人，觉得自己处于社会的边缘，大多数很自然地更倾向于“红党”。
* 加入奥地利国籍的华人，约占华人总数的三分之二
* 第一代华人不热衷参政，对自己的投票权利并不重视。
  + - * 德国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德国）位于欧洲中部，四周与9个国家接壤，因处于东西欧来往要冲，素有“欧洲的心脏”之美誉。
* 雄伟的阿尔卑斯山东西迤逦，境内有美丽的莱茵河与多瑙河缓缓流淌，壮丽的雪山，柔情的流水，交相辉映，谱成美妙的旋律。
* 德国的日耳曼人是一支优秀的民族，富于浪漫的情调与绵密的思想，无论在文化艺术，或是科学技术等领域，都绽放出万丈光芒
* 德国著名诗人海涅曾说过，德国人很“可怕”
* 这个爱思考的民族，造就了太多的伟人：马克思、尼采、歌德、黑格尔、贝多芬、巴赫、爱因斯坦、格林兄弟等等。
* 认真严谨和恪守纪律的天性，使它的工业技术傲视全球。说起汽车、机械、电子电器、航空、航天甚至皮革，都会让人不禁联想到这个连续5年称霸“世界出口冠军”的欧洲中部大国。
* 1945年战败投降后，德国分裂为两个主权国家，最终在1989年推倒了分隔两地的柏林墙，东西德重归统一
* 统一后的德国，于世人眼前再次展现过人的魅力，迅速成为欧盟最大的成员国，跻身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 德国从传统的单一民族国家，慢慢走向开放及接纳外来移民，至今拥有许多来自东欧与地中海区域的移民。这里的华人不到德国总人口的0.2%
* 诗人海涅于1823年写的一封书信中，提及在德国的两名中国人，他们是冯雅学与冯雅生
* 冯雅学与冯雅生两人从广州经伦敦辗转到柏林卖艺
* 19世纪70年代，清廷派遣第一位特使到柏林，也带来了首批留学生和军事实习员
* 中国学生联合会早在1880年就已成立，当时会员大约有40多人
* 一些广东海员陆续到德国打工，他们大多居住在汉堡（Hamburg）港区
* 另一批华人来到德国，是在19世纪末。他们有山东的江湖艺人，从陆路经西伯利亚、莫斯科和东欧国家入境
* 20世纪20年代，已有数千名华人生活在德国。汉堡的圣堡利区Schmuckstraβe街已形成了繁华的唐人街
* 当年的《汉堡晚报》就称这一区为“小中国”。
* 30年代有许多华人子弟来德国深造。当时的3700名华人中，留学生就大约有700人
* 德国过去的华人以粤人及浙人为主，后来福建、江苏、上海、东北等地人士也来了。粤浙人目前各占华人总数40%，其他则约占20%
* 他们有些是老华人的后代；十万人来自中国大陆，其中两万人已入籍；台湾人有8000多，入籍的有3000人；印支华人约有4万；还有来自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
* 华人较集中的城市有柏林、汉堡、法兰克福（Frankfurt）、慕尼黑（Munich）、纽伦堡（Numberg）、北莱茵（Nordrhein）、波恩（Bonn）和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等
* 华人的传统谋生工具有菜刀、剃刀和剪刀，德国华人只有第一把刀——菜刀
* 19世纪末、德国出版了华文刊物《日国》
*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曾涌现过许多中文报刊，但最后都销声匿迹了，办得最久的是走过25个春秋后才停刊的《西德侨报》
* 1997年创刊的《华商报》，是德国第一家商业化的中文报纸，也是第一家以半月刊形式出版的报纸
* 《欧华导报》、《联合周报》、《欧洲商旅报》等报纸，也有中文杂志《本月刊》、《商务先锋》，以及中德文对照的《你好欧洲》
* 德国最早成立的中华会馆，从1929年至今
* 欧洲首家少林寺开设在柏林市区中，由5名来自中国少林寺的师父住持
* 德国唯一的华人公墓，早在1929年由中华会馆争取建立，设在汉堡卧尔斯多福公墓内（Hauptfriedhof Ohlsdorf），共租用两片墓地。
* 旧的公墓可容纳百余个穴位，立了一个刻着“华侨公墓”的石碑，德文则写着“纪念在汉堡逝世的中华海员和同胞”。其中，中华海员的字体特大，可见当时该会馆和华人社会都是以海员为主体，后来才包罗了其他行业成员
  + - * 瑞士
* 瑞士地处欧洲腹地，因境内盘踞着欧洲最高、最大的阿尔卑斯山脉，有着“欧洲屋脊”的称号
* 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山青水碧和终年不化的冰河使它成为“世界公园”
* 是“钟表王国”，久负盛名的钟表业迄今不衰
* 是金融保险业高度发达的“金融帝国”，人均在国外的资产占世界第一位
* 瑞士独立于1648年，1815年宣布为永久中立国，及后实行独特的银行保密法，令它一直承载着许多传奇
* 瑞士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接受移民的条件也特别严格
* 极力捍卫人道和人权，愿意为许许多多的弱势群体打开方便之门
* 最先到达瑞士的华人是浙江青田人
* 在一战之后，日内瓦（Geneva）成了国际联盟的会址
* 20世纪30年代，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也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起人之一的李石曾，率领一批人员抵达瑞士日内瓦并于1936年在国际联盟的会址设立了“中国国际图书馆”，主要是供到欧洲勤工俭学的留学生进修之用
* 90年代，华人移民主要来自中国大陆
* 政治稳定，经济发达，设施先进，教育完善，环境优美，空气清新——住在瑞士的华人儿乎都会这样形容这个国家
* 华人社会中，还有自中国大陆移入的4000人；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则分别有500人左右。比较大的州属，通常聚居了较多的华人，比如苏黎世、伯尔尼、日内瓦、圣加仑（St.Gallen）等州
* 瑞士是一个国际大都会，有至少157个国家的人居留在此
* 瑞士的化学和化工领域发展蓬勃，许多大型企业如西药制造商都在当地设厂
* 瑞士华人养成早上10点、下午3点的“瑞士式”喝咖啡习惯。
* 只有瑞士籍或拥有永久居留权的人士才有资格买房子，而华人通常都用储蓄了20年的养老金来付款购屋
* 瑞士华人以信奉佛教居多，印度支那移民没来之前已是佛教徒
* 卢塞恩附近的瑞士佛光山面积2200平方公尺，在1996年由旧建筑改造而成
  + - * 意大利
* 欧洲南部的文明古国
*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是古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版图遍及整个地中海沿岸
* 古罗马的辉煌成就，表现在文学艺术、建筑艺术、雕刻绘画、农业技术、地理科学及医学等方面，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 文艺复兴运动，起源于意大利
* 意大利虽然自然资源贫乏，但却是当代欧洲四大经济强国之一，经济实力全世界排名第六
* 工业发达，其中以汽车工业与钢铁工业最为称著；制鞋业更是传统工业，为它赢来“制鞋王国”的美誉；旅游业发达，为世界第四旅游大国。庞大的外汇收入，足以弥补国家收支的逆差
* 外来移民占总人口4%，约240万人，其中华人约26万，散布在全国各地
* 中国浙江省文成、瑞安及青田的农民，是第一批来到意大利的华人
* 他们于20世纪30年代远涉重洋到意大利来谋生，最年轻的只有18岁
* 他们从上海出发，在海上飘荡了41天后，终于抵达意大利第二大城市——米兰（Milan)
* 第一批意大利华人流落到陌生的异域，人生地不熟，没有居留身份，身无分文，再加上言语不通，只好沿街兜售领带、皮夹等小商品
* 他们起早摸黑，白天在海滩、街道上叫卖，晚上就到餐馆、咖啡店向食客兜售
* “两个里拉”成了华人的代名词
* 他们不绝的叫卖声终于引起当地人的厌恶，结果经常遭到驱赶。他们只好提着货物到乡下去卖。一年的辛苦劳碌，只能够挣来维持生活的区区360里拉
* 二战爆发，中国与意大利成了敌对国。他们有的被关进集中营，有的遭到枪杀，生命、财产几乎都失去了保障
* 战争结束，作为战败国的意大利，赔偿了华人在战争中的部分损失，有人便利用这笔钱重新创业，也有人返回了中国
* 50年代中，随着意大利华人经济条件的逐渐好转，家乡亲戚们也陆续接踵而来，其中也包括战后离开该国的华人
* 那些重新踏上这片土地的华人，凭藉过往的经验，积极发展皮革业，得心应手的他们发展迅速，很快就打进了被当地人垄断的市场
* 华人群体以浙江人居多，其余则来自福建、北京、山东等地
* 即使同为浙江人，也散居各地。文成人聚居在米兰，瑞安人在佛罗伦萨（Florence),青田人在威尼斯（Venice),温州人在罗马
* 40年代的皮革业、70年代的餐饮业、80年代的服装加工业还是90年代的批发贸易业，都发展迅速，现已成功扎根于各大城市之中
* 华人社团数量高达80个，有十多个侨团还自行创办了中文学校，为子弟们提供中文教育
* 当地华人贫富悬殊。富者拥有多处房产，出入以名车代步，生活令人称美
* 贫者为了还债日夜工作，那些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华人更是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
* 高峰期，佛罗伦萨的皮革加工厂有2000多家，但目前只剩下约400家
* 鼎盛时期，米兰共有500家中餐馆，罗马有300多家
* 米兰如今200家日本餐馆中的95%，其前身都是中餐馆
* 普拉托（Prato）是意大利的纺织业基地，华人于2001年到此抢滩
* 如今，普拉托的服装加工厂已有3000多家，90%都是华人业主。业主大多以温州、青田人为主
* 新人遵循着中国的风俗，男女双方在注册结婚后，会在中餐馆举行盛大的宴会。婚宴一般在下午两点开始，傍晚6点结束，以便于外地亲友们往返
* 佛罗伦萨中文学校，是当地唯一一所由政府资助的全日制中文学校
* 意大利有6份中文报，即《欧华时报》、《欧洲快报》、《欧洲侨报》、《华商报》、《欧洲华人报》及《欧华联合时报》，皆由华人或社团创办
* 报章内容以翻译当地的法律法规为主，重点报道劳工的申请、身份及居留等问题
* 《欧华日报》于1996年创办，是当地创刊最早的中文报，每份售价欧元一块半，每期销量在一万至两万之间，扣除了开销、印刷费用后，有时不赚反亏，苦苦支撑两年后才有起色，但也是维持着一个不盈不亏的局面
* 在意大利，华人社团多达80个
* 法律规定，只要有会员3人就可以注册成立社团，因此它的种类繁多，有同乡会、联谊会、文化交流协会及商会等。历史较长，影响力较大的社团，要属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及罗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
* 米兰华侨工会于1956年创办，前身是意大利北部华侨华人工商会，直到1986年才改名并沿用至今；后者成立于1998年1月，是罗马地区较大的华人团体
* 2000年成立的罗马华人华侨妇女联谊会，在维护妇女同胞的权益之余也不忘公益，多次为当地筹集善款，大大提升了罗马地区华人的形象
* 2004年3月，来自青田的潘永长在罗马市30余万外来移民的支持下，当选为罗马移民议会议员
* 同年9月，他又被选为罗马移民议会副会长，任期5年
* 潘永长是首位荣膺这个职位的华人，也是欧洲政坛职务最高的华人
* 入籍意大利的华人林红玉，于2008年当选为佛罗伦萨省冈毕比森齐奥市政府移民局局长，专事负责处理中国移民事务
  + - * 克拉地亚
* 1991年克罗地亚脱离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宣告独立后，随即陷入内战，直到1995年才签署和平协议
* 克罗地亚摆脱了社会主义框架的束缚，走向自由主义经济的道路，经济才逐渐发展起来
* 在巴尔干半岛诸国中，克罗地亚的经济较为发达，工业及制造业稳步发展，在石化、机械、造船、医药等行业，均以先进高超的技术见称
* 克罗地亚有漫长的海岸线，沿海地区渔产丰富，渔业发展甚佳。境内有高山绵延，河流密布，自然风景秀丽，享有“千岛之岸”之美誉，亦被称为欧洲最美丽的国家之一，是其中一个旅游业最发达的欧洲国家，旅游业每年为该国带来数以亿计的外汇
* 最早抵达克罗地亚的华人，是一批大多数来自中国北方的知识分子
* 克罗地亚脱离南斯拉夫之后，迁移到克罗地亚的华人便逐渐增多，他们大部分来自周边国家，主要有罗马尼亚、波黑及奥地利等国，其中，罗马尼亚和奥地利的移民人数最多
* 移民的原因，除了为财富，而且还为了保命
* 当年，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的战争即将爆发，华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从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Belgrade）迁至克罗地亚
* 2002年至2003年间，到来的华人人数最多，并且多数属于商业迁移
* 华人来此的目的并非旅游，面是为了商业考察，一旦发现此处有商机，就会即刻着手创业
* 九成华人集中在首都萨格勒布，他们多来自浙江青田，东北人则占少数

希腊

* 奥运发祥地，西方文明的摇篮
* 首都雅典是希腊文化与艺术中心，巴特农神庙、雅典娜纯金塑像以及无数的神殿、古迹等，其建筑艺术风格之独特，及雕塑与装饰图案之精湛，可谓独步古今，充分显示了古希腊人的聪明与睿智
* 拥有3000多个星罗棋布的岛屿
* 最早把华人带到希腊来的，是跨国婚姻
* 华人分别聚集在首都雅典，以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Thessaloniki），主要从事批发、零售及中餐业
* 批发货行的老板多是浙江人，零售店的老板则多是福建人
* 希腊唯一的中文报《欧洲联合周报希腊版》
* 当地政府于2006年开始，规定从商者必须持有“老板居留身份”，才有从商的资格，否则必须关闭店面以保住原有的居留身份
* 希腊的华人社团包括希腊华侨联谊会、希腊华人华侨总商会、希腊华人华侨联合总会、希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希腊福建同乡会、希腊青田同乡会、希腊萨洛尼卡华人华侨联谊会及希腊华人华侨妇联总会
* 希腊2005年才出现了首份，也是唯一的中文报——《南欧时报》，内容包括希腊经济、政治、当地法律和风俗人情，扩大了华人的视野
* 2006年9月，《中希时报》与法国《欧洲时报》、上海《新民晚报》合作，正式加入《欧洲联合周报》报系，更名为《欧洲联合周报希腊版》
* 希腊青田同乡会于2007年开办了中文班，首批学生只有8人，后来通过宣传增至15人
* 上课分为大、中、小3班，由来自中国的李芳老师负责执教，每周5天，每天从下午2点到4点
  + - * + 保加利亚
* 素有“玫瑰王国”之称的保加利亚，是全世界最大的玫瑰产地，酸奶、葡萄酒更是享誉国际
* 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东部，北连罗马尼亚，南接土耳其、希腊，西临塞尔维亚、黑山和马其顿，东濒黑海
* 公元681年，斯拉夫人及古保加利亚人，在多瑙河流域建立了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
* 1946年宣布废除君主制后，成立了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
* 1990年11月15日，正式定名为保加利亚共和国
* 多年的封闭，让保加利亚被视为巴尔地区最神秘的国度
* 20世纪40年代，3名来自河北吴桥的中国男子随杂技团前来表演。后来，其中一人随波兰籍妻子回乡发展，另一人离开后不知去向，只有一人留了下来
* 来自北京、当时年仅23岁的张荪芬，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积极投身抗战医护工作。在硝烟战火中，她邂逅了响应“国际医药援华会”的号召、前来支援中国的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
* 移民政策的限制、过高的关税加上难学的语言，纵使有钱可赚，也难以吸引更多华人到来
* 其中，青田人占了总数的80%，其次则是温州、福建、河北、上海及江苏人
* 早在20世纪50年代，保加利亚医学院就设置了针灸临床专业
* 保加利亚卫生部，也承认中医师的行医资格及中药的合法性
* 目前，中医诊疗所共有4家，中药和相关保健品，则在药店、化妆品店等地广泛销售

罗马尼亚

* 景色秀丽，雄伟的喀尔巴阡山、蓝色的多瑙河与绚丽多彩的黑海，是三大国宝
* 1989年齐奥塞斯库独裁政权被推翻后，罗马尼亚从此山河变色
* 历经了近15年的争取，罗马尼亚于2007年1月1日加入欧盟
* 来自浙江文成的支德严，是最早定居在罗马尼亚的华人
* 。1990年，约有20名来自福建、浙江、河南的华人，带着装满了小商品的行李前来跑单帮
* 当时短期访问罗马尼亚并不需要签证，致使1993到1998年之间有大量的华人涌入，在高峰时期，华人共有两万名之多
* 在布加勒斯特市郊Colentina，一片尘土飞扬中，映入眼帘的尽是批发商铺和摊档
* 因“Colentina”发音与中国的高粱地相近似，华人初期干脆称它作“高梁地”
* 这里原来是一片庄稼地，在1993年被开发成拥有20多家批发摊档的欧罗巴市场。露天的摊档以土灰、砖石及水泥搭建，再用铁皮间隔而成。店面粗糙简陋、店前摆货物，店后则是仓库。华人打趣地称之为“铁皮房子”
* 批发市场上的华商以浙江青田及河南人居多
* 尼罗市场旁的唐城批发市场，则是首个由华人投资并管理的批发市场
* 罗马尼亚是第三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 目前，罗马尼亚共有18个华人社团，其中多以同乡会居多
* 罗马尼亚华人虽少，却拥有4份中文报，分别是《旅罗华人报》、《欧洲华报》、《欧洲青年报》及《企业家报》，其中以《旅罗华人报》最受欢迎
* 罗马尼亚华人成立了“旅罗华人维权中心”，由90名商家共同集资，合力将布加勒斯特政府控上法庭，并在当地中文媒体发表《告全体旅罗华胞书》

塞浦路斯

* 公元前1500年，希腊人迁入塞浦路斯，后土耳其又于1573年占领该岛，并带来大量的移民，形成希腊、土耳其两大民族并存的局面
* 塞浦路斯共和国于1960年成立时，即由这两大民族组成了联合政府
* 两大民族因为信仰等因素的分歧，爆发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 1974年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占领了37%的领土，导致希腊族南迁，土耳其族北移，形成南北对峙、国土分裂的局面
* 南、北之间有一个联合国缓冲区，通称为“绿线”（Green Line)，将首都尼科西亚一分为二，成了柏林围墙推倒后，世界上最后一个被分裂的首都
* 南塞政府于2004年5月1日加入欧盟，北塞则被拒于欧盟之外
* 塞浦路斯是地中海地区第三大岛屿，传说爱神维纳斯即诞生于此
* 20世纪40年代，华人为了逃避战乱，飘洋过海来到塞浦路斯
* 那时候的塞浦路斯仍是个荒凉的岛屿，道路破旧，设施落后，除了首都市区，其他地方连交通灯都没有
* 塞浦路斯分裂为南塞、北塞之后，华人大多生活在南塞，分散在首都尼科西亚、利马索（Limassol）、帕佛斯、拉纳卡（Larnaca）及阿亚纳巴（Agia Naba）各地
* 在岛国上生活的华人约有5000名，入籍或持有永久居留身份者有约300人，余者则以留学生为主
* 大多来自中国东北、辽宁、福建、浙江及南京，少数来自香港、台湾
* 当地华人涉足的行业，包括中餐馆、网吧、酒吧、服装批发、食品及婚纱设计等
* 首家中餐馆名为“Pagoda”，于1968年开设，老板是个娶了香港妻子的英国人
* “路不拾遣，夜不闭户。”这是华人对早期寒浦路斯众口一词的形容
* 塞浦路斯有三宝：气候、橄榄及葡萄酒
* 属于地中海型气候，冬暖夏凉，气候宜人
* 椒榄是当地特产，餐桌上无论主菜、配菜或头盘，它都被派上用场
* 习惯中餐的华人，对当地“无橄榄不欢”的口味仍无法全盘接收
* 塞浦路斯餐与希腊餐不相上下，菜色都以烤肉为主，烤得焦焦的肉类口感欠佳，所以华人还是以中餐为主食
* 婚礼通常采用希腊形式进行
* 华人婚前都先受洗成为东正教徒，之后才正式在东正教堂里举行婚礼；至于非教徒则于市长办公室内，在两名证婚人的见证下注册结婚，接着便举行简单的自助餐会宴请亲友
* 没有华人公墓，只有东正教公墓与政府公墓，早期在当地过世的华人都葬在公墓里
* 塞浦路斯是一个福利国家，国立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学费全免，还另有多所私立国际学校
* 当地第一代华人都以中文沟通，至于第二代则多为华人与当地人通婚的后裔，自小在当地接受教育，平时多以希腊语、英语交谈
* 当地没有中文报刊出版，华人都通过塞浦路斯唯一的中文门户网站——“塞岛在线”，获取当地的资讯
* 来自上海的蔡伟洲，是当地首位华人中医师
* 塞浦路斯第一位华人歌手——胡庄礼

马耳他

* 处在南欧、北非之间的地中海上，共由5个岛屿组成
* 首都瓦莱塔，位于马耳他岛的东北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 国土虽小，但素有“地中海心脏”之称，它是欧、亚、非之间重要的交通枢纽
* 追源溯流，至早踏上马耳他的华人，要属上个世纪70年代的华人客工，他们是由中国大陆公派至马耳他筑建码头的
* 该批华人曾对这个国家作出贡献，可惜并没有居留下来
* 第二批华人则来自香港。他们是首批正式驻留于此地的华人，担任中餐馆厨师一职
* 马耳他华人以自由移民居多，其中包括了居留移民、技术移民、或通过与当地人通婚而移民等
* 外来者必须居留此地长达19年以上，并符合种种要求才可获得公民权
* 有人笑说，倘若在马耳他岛迷了路，沿着海岸线就能走回原地
* 没有所谓的华人聚集区。华人留学生多集中在马耳他大学附近的幕思达（Msida）。
* 马耳他华人来自五湖四海，包括广东人、浙江人、陕西人、四川人、山东人及香港人等，其中以广东人最多
* 捕鱼技术却非常落后，海产业并不发达，国家主要收入来自旅游业
* 马耳他另一小岛——戈佐（Gozo），住有20几个华人，全来自四川；无论当老板或替人打工，一律从事餐饮业

葡萄牙

* 位于欧洲大陆伊比利亚半岛最西端
* 号称“欧洲之角”
* 葡萄牙东及北部连接西班牙，西部和南部濒临大西洋，并且囊括大西洋亚速尔群岛（Azores）以及马德拉群岛（Madeira）
* 15世纪之际，这个蕞尔小国，竟是地理大发现的始作俑者，曾经一度是在非、亚、美洲拥有大量殖民地的海上霸主
* 1986年，葡萄牙加入欧洲共同体（也即是后来的欧盟）
* 80年代，随着中国大陆移民潮的到来，来自上海、广东、山东、福建、北京等地的移民陆续迁往葡萄牙
* 目前葡萄牙华人大约有1万5000人，主要由中国大陆移民、澳门及非洲华人三个群体组成
* 中国大陆移民以浙江青田和温州人最多，占了近90%
* 主要居住在首都里斯本、波尔图以及南部的旅游城市法鲁（Faro）
* 葡萄牙华人有三业，指的是早期一枝独秀的中餐业，和近年慢慢开创出来的“三百”业和批发业。这3项行业平分天下，在葡华经济蛋糕中各占三分之一
* 大略估计，葡萄牙的华人批发商已有近1000家
* 葡中工商协会成立于1978年，是葡萄牙第一个致力于中葡经贸关系发展的工商界联合机构
* 除了葡萄牙华侨华人协会和由北部华人组成的葡萄牙华侨华人总会为主要华团外，活跃的还有葡中工商协会、葡萄牙中华工商总会等
* 全葡大约有30多个华团
* 995年2月成立的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至今大约有固定会员260人，也拥有固定的道场
* 里斯本基督教生命堂于1999年10月21日成立
* 波尔图市分别在2001年及2006年成立波尔图基督教生命堂和明德路基督教生命堂
* 第一家中文学校——里斯本中文学校，在2001年才在里斯本出现
* 创办初期的14名学生，发展到今天已有200多名学生，已成为葡萄牙规模最大的中文学校
* 1999年创刊的《葡华报》，是目前唯一本土出版的中文报纸
* 前身为半月刊《葡华通讯》
* 《葡华报》自加入欧洲联合周报的体系后，与其他报章如中国的《新民晚报》合作，有更加全面的新闻报道
* 葡新报》（由西班牙华文传媒集团出版的葡萄牙报章）、《欧华报》、《侨声报》和《华新报》等。此外，还有在中国印刷，免费在葡萄牙派送的《同心报》

西班牙

* 位处欧洲西南部伊比利亚半岛，西邻葡萄牙，东北与法国接壤，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非洲北部相望，东濒地中海
* 境内群山巍峨，高原起伏，沿海海岸线绵延，多优良港湾
* 1492年，西班牙就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
* 曾一度是海上强国，在全球各地都有殖民地，但于1588年开始衰落，1873年爆发革命后建立西班牙共和国
* 1936年，佛朗哥（F.Franco）发动武装叛乱，西班牙内战爆发
* 1939年，共和国倾覆，佛朗哥建立了独裁政府
* 长达36年。1975年弗朗哥病逝后，西班牙才走向西方议会民主政治
* 强烈地中海风情的西班牙，被誉为世界上最令人神往的国家
* 世界三大旅游王国之一
* 早在16世纪，华人便已经踏足西班牙，他们是跟随西班牙传教士而来的佣人
* 1570年，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殖民地之后，与当地华人接触频密，并且展开了贸易往来
* 当年首名入籍西班牙的华人，就是来自菲律宾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部分法国和英国所招募的华工，便转到西班牙来定居
* 一些山东杂耍艺人经由俄罗斯以及东欧等国，辗转进入西班牙
* 生活费比较低，谋生也容易，致使他们最终选择了此地作为立足点
* 温州人和浙江青田人也一批又一批地踏上这块土地
* 石雕工匠，后来转行经商，穿街走巷兜售领带、首饰和青田工艺品等
* 来自湖北省的天门人也千里迢迢来到西班牙，在当地或售卖纸花，或当牙医
* 曾经担任西班牙青田同乡会会长的陈迪光，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名定居于西班牙的华人
* 直至1973年中国与西班牙建交之前，在西班牙定居的华人仅有大约500人
* 在西班牙过百万名外来移民中，华人是第四大移民群体
* 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其中70%来自浙江的青田、温州；其次是上海、广东、福建，另外还有一些台湾、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华人
* 多数持着居留证，分布在西班牙120多个大小城市，较集中的是首都马德里、巴塞罗那（Barcelona）和瓦伦西亚

（Valencia）等。有近万名华人已入籍西班牙，其中一半是在西班牙出生的华人

* 当地政府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在整个西班牙，有超过30%的华人移民都是老板
* “埃尔切大火”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华商的营销模式和西班牙本土模式的冲突
* 原来的郊区封都（Fonto），如今已发展成巴塞罗那的华人城
* 现今，全西班牙共有90个华人社团，主要设立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其中75个由中国大陆移民创立，余者则属台湾移民的团体
* 1983年成立的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是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和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社团
* 是唯一获选为西班牙外国移民组织执委的华人社团，同时也是唯一享受政府每年津贴的组织。该会秉持的“两个维护”方针，即维护华侨华人合法权益，以及维护华侨华人社会安定团结，也推展到整个欧洲华人社会
* 只有逾十万名华人的西班牙华社，就拥有至少5家当地出版的中文报章
* 早的《华新报》创刊于1994年，目前每逢周三和周六发行

中国报》、《欧华报》、《侨声报》和《西华报》则属周报，此外，还有葡萄牙的《葡华报》和《同心报》等，种类繁多。有些报纸着重报导区域新闻，有些则把重心放在中国新闻

* 2002年成立的《欧华报》是唯一获“最佳移民媒体”奖的中文媒体，它在主流社会的影响也让它成为西班牙期刊协会唯一的华人会员
* 2005年出版了西班牙文报纸El-Mandarin《东方周刊》，以最直接的方式让当地社会更了解华人的动态
  + - * 法国
* 法国位于欧洲西部
* 早在18世纪之际，就产生了一批如卢骚与孟德斯鸠启蒙思想家
*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推翻了专制君主，树立了宪法议会民主共和制
* 19世纪初，拿破仑一世（1769－1821）自立为法国皇帝，率领千军万马，铁蹄横扫欧洲大陆，长驱直入莫斯科
* 法国也是现代化的强国
* 有高度发展的经济，是一个以工业为主导，农业非常发达的国家
* 重工业如汽车业、飞机制造业、造船业及钢铁业饮誉全球
* 其他工业如机械、冶金、化工、电子及纺织业，也享有盛名
* 如今的法国是戴高乐于1958年领导建立的第五共和国，其首都巴黎是享誉全球的时尚花都
* 在欧洲大陆，法国是华人最早登陆的国家之一，其历史可追溯到18世纪初
* 最早到达法国的华人是福建莆田人黄嘉略
* 于1702年跟随传教士前往法国，曾任法国国王的中文翻译，并娶了法国女子为妻
* 法国语言学家合作编写了《法华字典》、《汉语语法》，还曾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共同探讨中国历史、语言、刑法和习俗
* 华人首次大规模到法国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 法国与中国的北洋政府达成协议，从中国北方几个省份招募了14万劳工到法国从事战地后勤服务
* 1918年战争结束时，他们大多数死于战场，幸存者中有的历经千辛万苦返回故乡，但大约有3000人选择留在法国谋生
* 大多住在巴黎火车站附近，从事劳力工作
* 早期到法国的华人还有浙江温州，青田人，马赛港口和里昂火车站是他们的聚居地
* 70年代中叶，法国政府接纳了大约15万名印度支那的华人难民
* 来自曾经是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柬埔寨和寮国三地，使当时法国华人人数激增
* 80年代开始，以温州人和青田人为主的中国人，纷纷移民至法国
* 作为勤工俭学运动先驱的“留法学生俭学会”
* 曾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的留法学生，后来都成为著名的中国政治领袖，包括周恩来、陈毅、李富春、李立三，以及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
* 法国华人最大的特点是：人数众多且居住集中，超过一半以上的华人聚居在大巴黎地区，其余散居在马赛（Marseitle）、里昂（Lyon）、里尔（Lille）等大城市。差不多每40个巴黎人中，就有一个华人
* 法国华人主要有两大群体，即各占40%的印度支那华人和中国大陆新移民，其中温州人又占了中国大陆移民的70%；港澳台移民很少
* 印度支那华人由于拥有法国文化背景，熟悉法语，容易融入主流社会，他们绝大多数已入籍
* 中国大陆新移民虽受制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但仍凭着拼搏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在法国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 法国华人社会较成熟和活跃，全国共有约100多个大大小小的社团
* 除了百余家由各个机构开办的中文学习班，媒体也是丰富多彩，至少有3家中文日报以及数十种中文杂志，还有数家中文电子媒体
* 法国华人有传统的四大经济支柱，分别是皮革业、餐饮业、服装业和杂货业
* 皮革业起步较早，基本上是温州人的天下
* 1951年，华人最早的皮革批发店“庙街之星批发店”在巴黎开张
* 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就曾说过，由华人林东岩在1986年创办的“牛车水饮食中心”，是他最爱的中餐馆
* 巴黎的服装业在世界上独领风骚，拥有“服装王国”之称
* 法国的中餐已经融入了很多当地元素。譬如，菜式虽以中餐为主，但味道却更像当地的西餐，更加入了饭前喝开胃酒、用餐饮葡萄酒和餐后吃甜点或喝咖啡的法国餐“程序”
* 目前，华人在法国经营的杂货店，已有1000家左右
* 华人聚集区的杂货业，通常经营亚洲蔬菜、水果、罐头食品、干粮、肉类冷冻食品及日常消费的轻工产品等
* 非华人区则以供应西式食品为主，兼卖亚洲熟食
* 巴黎第一家专营亚洲产品的超级市场——陈氏百货商场和郑辉创办的巴黎士多商场，主营亚洲食品，货品应有尽有，已成为法国社会家喻户晓的品牌
* 法国人喜欢用3个谐音字 Métro、Boulot、Dodo 俗语来形容自己一天单调劳碌的生活，意思是搭车、工作和睡
* 1981年，法籍华人成之凡曾宣布竞选法国总统。她是法国，也是欧洲第一位竞选总统的华人
* 1995年成之凡又两度参加法国总统竞选，引起全球华人极大关注
* 2001年的法国市政选举，出现了两位华人副市长，而且都在塞纳马恩省
* 中国留学生何英被选为碧西市副市长；从寮国移民到法国的颜如玉，则当选艾斯玻利市副市长
* 来自柬埔寨的陈文雄当选为巴黎市13区的副区长，主管经济发展事务
* 法国华人更于2004年，把春节大游行破天荒地移师到巴黎最著名的香榭丽舍（Avenue des Champs Elysees）大街上
* 这是巴黎市政府第一次允许外籍侨民在“法国第一大道”举办节庆大游行活动
* 全法国共有60万名佛教徒，其中大部分是华人
* 巴黎已成为欧洲华文媒体的“心脏”。全欧最大的两份华文日报《欧洲时报》（1983年）和《欧洲日报》（1982年）均创刊于此
* 法国的中文媒体一方面争取与当地主流媒体合作，如《欧洲时报》和法国《巴黎竞赛周刊》联手出版法语版的《中国特刊》，同时又加强与中国大陆媒体的互动，如《欧洲时报》和中国上海《新民晚报》共同打道的《欧洲联合周报》，更开拓了华文媒体广阔的发展空间
* 当地除了能收看到香港的凤凰卫视台外，由当地华商所创立的陈氏传媒公司，还在2006年把中国中央四台带到了法国，再从法国辐射到周边国家，大大丰富了欧洲华人的娱乐资讯生活
* 1907年李石曾创办的《新世纪》，可能是法国最早的华文刊物
* 而在法国留学期间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曾于1922年编辑过一本名为《少年》的月刊，后改名为《赤光》
* 法国的华人团体大大小小近百个，主要集中在巴黎
* 成立于1949年的旅法华侨工商互助会（现改名为法国华侨华人会），是法国最早成立的华人团体，也是最有凝聚力的华人之家
* 987年10月，一本名为《黄色黑手党在法国》（La Mafia Jaune en France）的法文小说出版。书中把华人描写成走私贩毒和杀人不眨眼的黑帮，唐人街更是藏污纳垢、神秘危险的街区。为维护华人的尊严和形象，法国潮州会馆与陈氏公司联名把该小说作者控上法庭，最后获得胜诉，法院裁定将该书全部收回，不许出售。此事在华人社群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也直接促成了华人融入法国促进会的成立，积极维护华人权益和协助华人融入当地社会
* 巴黎13区、3区和4区唐人街，后来崛起的有19区、11区以及中国城，被认为是全欧洲最大的华埠
* 但这里所说的“唐人街”，其地位并没有受当地政府承认
* 13区的华人主要来自东南亚，街区具有浓厚的东南亚特色
* 13区唐人街被誉为塞纳河畔的香港
* 3区、4区则是温州人和青田人的天下，其他省籍华人难以插足
* 9区美丽城则是13区饱和后形成的又一个唐人街，也是东南亚华人和温州、青田华人混合居住的街区
* 巴黎东南面的安富市有个于1992年建成的中国（商业）城，面积4万2000平方公尺
* 卢森堡是欧洲内陆小国，四周与德国、比利时和法国相接壤
* 是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国，200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全球首位
* 钢铁业、金融业和卫星通讯广播电视业是其三大经济支柱
* 公元前50年，这里曾是高卢人居住的地方；公元400年，日耳曼部族入侵；后经历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法国、奥地利和荷兰的统治，直到1890年才彻底脱离荷兰的统治
* 有着“千堡之国”的称号
* 居民一般会讲4种语言，除了卢森堡语，还能说法语、德语和英语；不少人还懂得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
* 在清末年间，就已有中国移民到达卢森堡，但人数不多
* 第一个来到卢森堡的华人，有说是瑞士籍的香港人，也有人说是英国籍的沈阳人
* 20世纪50年代，有许多香港华人来到卢森堡。60年代则是比利时籍华人到来的巅峰期
* 中国广东籍、浙江籍华人逐渐移入，使卢森堡华人的地域结构更加广泛
* 面积小人口少，市场也相对地小，加上生活消费颇高，因此移居该国的华人并不多，且流动性极大
* 1975年至1984年间，卢森堡收容了一批以华裔为主的印度支那难民
* 卢森堡华人约有2500人，散居在各地，首都卢森堡市是主要聚居地
* 人数不多，华人大都互相认识，但因分散在各个角落，平时各自忙于生计，彼此少有联系，偶尔通过社团或宗教活动才会聚在一起
* 当地华人以青田人最多
* 1979年，詹冠令成为首名登陆卢森堡的青田人；至今，已有1000多名青田人移居此地
* 部分人是来自温州、上海、北京、昆明等地。台湾人则不多，除了台湾投资厂商驻卢森堡人员及家属外，其余多分散在境内各地经营餐厅；另外，据说还有大约30名台湾女子远嫁到卢森堡来
* 卢森堡是个生活节奏缓慢而平静的国家。在许多新移民的眼中，它显得暮气沉沉，单调乏味
* 有超过90%的华人在餐饮领域打拼
* 华人在全国各地开设餐馆，大多以中餐为主，也有一部分经营东南亚餐、日本餐和韩国餐等
* 源自台湾佛教团体的法鼓山，在卢森堡华人家中设有联络处，免费派送台湾出版的《法鼓》月刊
* 卢森堡并没有本土的中文报，但是，这里依然可以看到发行全欧洲的《欧洲时报》以及《欧洲日报》
* 也有华人以邮购的方式长期订阅荷兰、比利时等地的中文报章
* 2007年9月创刊的《海潮——侨界通讯》，则是卢森堡—中国经济文化交流协会所出版的刊物，也是当地华人的第一本刊物
  + - * 比利时
* 与法国、卢森堡、荷兰和德国为邻
* 球铁路密度最高，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全部高速公路设置路灯的国家
* 首都布鲁塞尔除了是北约和欧盟的总部所在地，同时也驻有近1000个重要国际机构
* 欧洲第二大港口的安特卫普市（Antwerp）是世界最大的钻石加工地，因此享有“钻石之都”的美称
* 历史上，它曾先后沦为西班牙、法国、奥地利和荷兰的殖民地，1830年才脱离荷兰独立
* 是一个南北两半各有自治权的联邦国家，南部法语社区由瓦隆行政区管理，北部荷语社区由佛兰德行政区掌管，东部边疆地区居民以讲德语为主，首都区则三语共存
* 因地理位置的优越，早在19世纪，就有华人海员及商人抵达比利时，因此，比利时可算是西欧国家当中，中国人较早涉足的国家之一
* 清朝末年，比利时已有中国留学生。根据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卷十中记载，他访问布鲁塞尔时，曾代表清王朝向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致谢，感谢他对中国留学生的优待
* 20世纪初，许多华人陆续到欧洲各大港口当海员，这当然包括欧洲第二大港口安特卫普
* 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卷十中记载，他访问布鲁塞尔时，曾代表清王朝向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致谢，感谢他对中国留学生的优待
* 第一代来此开餐馆的华人大多数是广东籍，因此中餐以广式菜肴为主
* 老移民说：“我们都称这种卖广东菜的餐馆叫‘集粹’，也就是‘杂菜’的广东话发音
* 蒋华是中国近代著名军事家蒋百里的第四名女儿，曾留学美国，获得哈佛大学理学硕士，并于1951年旅居比利时
* 华人聚集最多是在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
* 华人在比利时属于中产阶级，但在税收方面却贡献良多，因为一般华人都自己开业做生意，每单交易抽税至少21%
* 安特卫普的唐人街——冯·维森贝克街（Van Wesenbekestraat），在安特卫普官方网站的“购物指南”一栏被推荐为值得一游的地方
* 1973年成立的联合会，是比利时最早的全国性华人社团组织
* 比利时是个多语言的国家，但由于华人是少数民族，中文很难在当地受重视，更别说被列入主流教育的教学中
* 创办于1965年的旅比华侨中山学校，是历史最悠久的中文学校
* 学校拥有自己的校舍，是由台湾代表处拨款一半，并由华侨餐业公会和台湾乡亲会合力购买的校址，一共开办16班教导约300名学生。虽说是间台湾办的学校，学生群中却有80%来自中国大陆，学习的是注音繁体字
* 广东人较多的安特卫普市，最早的中文学习班是由华人教会在80年代开办的，通过广东话来解说圣经故事和背经句等，也传授中华传统的思想和价值观
* 二战时，钱秀玲不顾个人安危，竭力劝说德国将领肯豪森免除近百名比利时人质的死刑，她因此成了比利时人心中的英雄，被誉为中国的“女辛德勒”
* 战争结束后，比利时政府在1945年颁发国家英雄奖章给她。当地的小镇艾克兴市更是特别将一条街道命名为钱夫人街
* 欧洲西部濒临北海的荷兰，是千百年来与海争地的低洼之国
* 荷兰国名“Nether”指的是“低的”，“lands”则意为“土地”
* 说它是世界最低的国家，一点也不夸张——它有一半以上的国土低于海面或海拔不到一公尺。而这些环海的陆地上，却住着六成国民
* 自1229年，荷兰境内耸立着逾万座由荷兰人发明用来抽水和提供动力的风车，使它赢得了“风车王国”的美誉
* 是世界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
* 仅5%的国民从事农业，其鲜花、蔬菜、奶酪和土豆种子的出口量却居世界第一
* 仅5%的国民从事农业，其鲜花、蔬菜、奶酪和土豆种子的出口量却居世界第一
* 这个国家不屈服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反屡创奇迹，曾以200万人口的国力建立起海上贸易和殖民强国
* 今天的荷兰，是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的富裕国家
* 不大的荷兰华社，仍孕育出超过250个华团组织
* 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旅荷华侨总会，其前身是1947年由浙江青田、温州人在阿姆斯特丹成立的瓯海同乡会，现在则是在全国都有分会和中文学校的核心组织
* 最早的中文学习班可追溯到1919年，拓荒者是当年中华会的主要成员。华人移民骤增后，欧洲福音布道会也在1973年开设中文班，两年后购买会所，创办全荷兰第一所中文学校。后来许多社团也把推动中文教育视为己任，纷纷设立中文学校
* 早期华人多数是广东籍，中文教育全以粤语授课。近年来，以华语为教学语言的中文学校纷纷开办后，许多老学校也逐步缩小粤语班规模，或完全改以华语教学
* 除了语文，大部分的中文学校还设有其他课程，例如丹华文化教育中心为500多名学生开办了21个各类文化学习班。该中心还创立了荷兰丹华奖学基金会，及中文教育专刊《桃李园》
* 荷兰华人申请了中央政府补助，推展《中文教育发展计划》，自行研究和编写教材
* 荷兰第一份中文刊物是旅荷华侨总会在1977年创刊的《华侨通讯》，成为华人了解居住地和祖籍国的窗口
* 移民持续增加，促使中文媒体蓬勃发展，除了90年代出版的《唐人街中国人》、《华侨新天地》，还有2003年出版的《中荷商报》等，每份报章的发行量可达3万份
* 荷兰第二代年轻华人组成的“城市之声”电台
* 阿姆斯特丹唐人街里还有一座古色古香的佛寺——荷华寺，是由政府献地，华人捐助建成
* 荷兰华人社会非常关注老人问题，他们一直秉持着“少有所教，老有所养”的精神，努力为年老华人打造一个安乐环境
* 每年9月，许多华团还会举办全国“敬老日”
  + - * + 英国
* 英国地处欧洲大西洋不列颠群岛上，主要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组成
* 殖民地曾经遍布世界各个角落，足足占了整个地球20%的面积
* 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 沈福宗是第一个抵达英国的中国人
* 1687年，他随着一名叫着菲利普·科普列特（Philip Couplet）的神父到了牛津博德利图书馆（Oxford's Bodleian Library）编中文图书目录
* 从18世纪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亚一带大肆扩张，他们雇华人为海员，把华人带到英国去
* 840年代的中英鸦片战争结束后，中英两国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政府
* 华人是继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之后英国最大的亚裔群体，超过25万华人拥有英国公民身份，主要集中在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Manchester）等地，其中，伦敦的华人数量最多，居住地也最集中
* 英国的华人，估计约有40万
* 散布在英伦各岛的华人，英格兰约有33万人，苏格兰约5万人，威尔士约5000人，北爱尔约1万5000人，主要聚居的城市包括伦教、利物浦、伯明翰、格拉斯哥（Glasgow）、爱丁堡（Edinburgh）、曼彻斯特、卡迪夫（Cardiff）等
* 有70%的华人来自中国香港。其他的则来自台湾、中国大陆、东南亚及世界各地
* 英国目前约有200多个华人社团
* 早期的华人社团像利物浦致公堂、四邑总会馆和伦敦正义工商会、伦敦互助工团等已有近百年历史了
* 解放》、《民主阵线》、《诗语》、《华人商业影响》、《亚欧评论》等中文报刊，都见证了英国华人社会每个阶段的发展历史
* 1975年，欧洲版的《星岛日报》在英国诞生
* 每个周末，《星岛日报》也会附上刊载亚洲讯息的杂志《东周刊》，以丰富当地华人的生活。每日发行至少14万份的《星岛日报》，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覆盖了整个英国的华人社会
* 英国，中文报刊至少超过十份。除了《星岛日报》需要付款购买外，其余的中文报刊，像《欧洲时报》、《文汇报》、《英中时报》、《英中商报》、《华商报》和《新欧侨报》等一律免费
* 国的中文电视台主要有3家。其中，欧洲东方中文卫星电视台是香港徐展堂东方卫星电视在欧洲的分支机构，总部设在伦敦，有普通话和粤语节目，以中国内地节目为主，每日播出4个小时。欧洲无线卫星电视则以港台节目为主，每日播出16个小时。另一家传讯电视，则是香港传讯电视在欧洲的子公司
* 华语广播电台有4家，全国性和地方性各两家
* 英国官方所办的英国国际广播公司中文部，每日有一个小时全国性的华语节目播出，华人所办的伦敦国际电台中文部，每日也播出一个小时粤语节目
* 成世雄来自香港新界，是英国少数参政的华人之一
* 英国伊斯特本市（Eastbourne）市议员，也是所在选区的郡、区和地方议员，是英国第一位同时拥有4项议员头街的华人
* 伊斯特本是英格兰东南部东萨塞克斯郡（East Sussex）最大的自治市镇，大约有十万居民
  + - * + 爱尔兰
* 西临大西洋，东隔爱尔兰海与英国相望，山明水秀，风光旖旎
* 爱尔兰人曾在英国的占领下，度过了700多年灰暗的日子，到1921年才获得自治权，但北部6郡一直在英国管辖下
* 1973年爱尔兰加入欧洲共同体后，经济开始突飞猛进。以前的农业小国，摇身变成欧洲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近年人民平均收入甚至超过英国
* 华人移民爱尔兰的历史很短
* 在20世纪50年代，移居到这里的华人只有十来位
* 早期的华人，大多数是从英国或香港辗转而至，另外，还有少量来自越南、马来西亚和台湾，总数估计也不超过一万人
* 他们大部分都集中在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那里不但气候温和，而且到处均是绿油油的草地及盛开的鲜花
* 爱尔兰十方华人大多聚居在都柏林，其余散居在科克（Cork），高威（Galway）及其他大小城镇
* 早期爱尔兰的中文学校均以粤语授课
* 爱尔兰的中文学校不多，估计不超过十所，且大部分集中在都柏林
* 爱尔兰有11个华人社团。它们多属地缘和业缘的组织，有成立最早的爱尔兰华人协会、爱尔兰越南华人协会，以及近期才诞生的华人专业人士协会、福建同乡会和福清同乡会等
* “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每一个爱尔兰华人的心里
* 爱尔兰主要有3家中文报刊，分别是《新岛周报》、《华人报》和《海外新报》。
* 《新岛周报》与《华人报》的读者较多
* 3家中文报的负责人都年轻有冲劲、想法新颖。它们的长期合作伙伴包括中国内地及爱尔兰本地的媒体，像中国新闻社、新华社、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Irish Time、Daily Star、Herald等。此外，它们也与欧美17家中文媒体透过互联网建立伙伴关系
* 来自大连的王瑞新，在爱尔兰居住了7年，早先在中国做现场直播的主持人，说是因为酷爱爱尔兰音乐和歌手恩雅，才被吸引来到了这个国度
* 在爱尔兰成立了一间文化传播公司（Chinatown Promotion Service），负责制作和筹划有关华人节庆或文化的节目

芬兰

* 地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东边，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在北极圈内
* 内遍布大大小小的湖泊，有“千湖之国”的美誉，景色秀丽。广袤静谧的树林，湖滨小木屋，是芬兰最常见的景象
* 夏季的光照时间长达20个小时，又被称为“太阳不落之国”
* 芬兰人笃信“认清事实是智慧的开端”
* 政府在教育和科技研发方面，不惜投下大笔经费。享誉全球的手机品牌诺基亚、Linux操作系统，都是芬兰人智慧的结晶
* 在2003至2005年，连续3年名列全球竞争力之首
* 上世纪的60年代，芬兰仍然属于欧洲的少数穷国之一
* 第一个定居于芬兰的华人是陈安萍，她是因为在1953年嫁给了一个芬兰人而来到了这里
* 大部分华人居住在首都赫尔辛基及坦佩雷（Tampere）、爱斯堡（Espoo）、万塔（Vantaa）等几个首都周边的城市
* 大约4000名分别来自香港、马来西亚及中国大陆的华人来说，芬兰虽不是当初的首选，可是这个小国却给他们带来安定的生活，让他们内心充满安全感
* 1992年，作为芬兰的第一个华人组织，华人华侨协会正式成立

瑞典

* 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南
* 19世纪初期还统治过芬兰及挪威
* 1814年起，它一直谋求中立，近200年来不曾卷入任何一场战争
* 仅次于英、美的世界第三大音乐输出国
* 瑞典产品以其实用、简约的风格闻名于世，宜家、爱立信、沃尔沃等均是风靡全球的瑞典品牌
* 瑞典成了北欧最多华人聚居的国家
* 第一个踏上瑞典这片国土的华人，是一个名字叫作阿福的广东人，他是在1786年以海员的身份登陆的
*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有数名浙江青田人来到瑞典
* 住了半年以上，就能和瑞典人享有同等的福利，满5年就可申请入籍
* 国民一年享有5个星期的年假、55天的病假，瑞典人认为，不能为工作卖命或牺牲掉生活
* 尊重女权
* 比较活跃的有3个社团，分别是香港人居多的瑞京华人协会，凝聚青田人的青田同乡会及越南华人创办的潮州同乡会
* 瑞典目前有一万名越南华人，其中大多是在1979年以难民身份迁移过来。南部城市马尔默（Malmo)是最多越华居住的城市，但他们散居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越华的第二大聚集地是忆基斯都娜（Eskilstuna)
* 在忆基斯都娜这个距斯德哥尔摩一小时车程的城市，住了大约1000名越华，其中近六成为潮州人
* 成立了潮州同乡会和耆青联谊会，凝聚当地的老人和青年
* 号称“西北欧的桥梁”，位于波罗的海与北海之间，由西兰岛（Zealand）、菲英岛（Funen）和日德兰半岛（Jutland）及406个小岛组成
* 具有北欧国家的典型特色——经济发达、高福利、高收入、高税收、高消费，虽是北欧最小的国家，但其首都哥本哈根却是北欧最大、也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 丹麦王国曾经非常强大，统治过挪威、英格兰、苏格兰大部分以及瑞典南部
* 世界主要的农国之一
* 成为世上人民最快乐的国家
* 最早把华人带到丹麦这个童话国度的是杂技团
* 1902年的夏天，有34名华人来到趣伏礼公园（Tivoli Garden），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华人村”展览，成员多为香港及广东人
* 早期的华人移民当中，有大半是香港、广东以及海南文昌县的海员，还有来自浙江青田的小商贩
* 1970年，已有为数500名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的华人留居丹麦
* 一群越南华人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之间，陆续以难民的身份进入丹麦
* 丹麦约有1万5000名华人，其中半数左右已入籍
* 来自福建、浙江及广东的华人，占了一半以上，其余则是越南、香港、台湾及新加坡华人
* 大部分都居住在哥本哈根、奥胡斯（Aarhus）、奥登赛（Oderse）、奥尔堡（Aalberg）等大城市
* 丹麦华社虽不大，却有20多个华人组织
* 以中式烧烤店（Kina Grill）起家
* 第一家中式烧烤店是由一个来自新加坡的海南人所创
* 丹麦的中餐馆基本已发展出烧烤店、外卖店和餐馆3种类型，全国共有约300家，单在哥本哈根就有258家
* 只要3个人就能注册成为一个团体

挪威

* 多年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 界第三大石油出产国外，挪威农、渔、牧业，也非常发达，大批出口的三文鱼，更是享誉全球。2007年，人均收入还名列世界第一
* 中国青田人陈特浩，是第一个闯荡挪威的华人
* 先后在法国、意大利和丹麦逗留过，再辗转来到挪威，决定留下来发展
* 挪威目前约有一万名华人，大多来自中国的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等地，有些来自越南
* 华人主要集中在首都奥斯陆，其次是卑尔根（Bergen）、斯塔万格（Stavanger）等大城市
* 拥有自己的中文刊物《北欧华人通讯》，还有华人社团及宗教组织等，这些都是华人保持联系的媒介
* 挪威华社现共有14个组织，社团间互通有无，往来频密

冰岛

* 由火山聚成的
* 2000多万年前北大西洋深处的一次岩浆喷发，铸就了孤悬海外的冰岛
* 地球上最美的一道伤痕”的雅号
* 又被称为“冰火岛
* 3/4是高原，1/8被冰川覆盖，冰川面积约8000平方公里
* 地下蕴藏着丰富的地热资源，温泉数量居全世界之冠
* 境内共有火山二三百座，其中有许多是活火山
* 邻近北极圈
*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整座冰岛的华人也不足5名
* 冰岛的渔业相当丰富，在渔场谋职自然就成了早期冰岛华人最主要的行业
* 冰岛总人口约32万，限于地理条件，人口密集度非常高，首都雷克雅未克就集中了全岛60%的人口
* 约800名华人，同样也主要居住在雷克雅未克及其近郊
* 华人多来自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身份大部分是老板，也有的是体育教练、研究人员，还有留学生和家庭主妇等
* 2007年，在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上，冰岛更取代了挪威成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位居世界首位
* 冰岛唯一的华人杂志《冰花》
* 有人说，极夜的漫长让书籍成为冰岛人最好的伴侣，有人说，绮丽的山川让他们充满想象力，也有人说，冰岛人继承了祖先的浪漫与思考，《尼雅尔萨迦》传奇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荡气回肠的《埃达》史诗更被誉为文学奇葩

## 